



陳一諮回憶錄

原中國經濟體制
改革研究所所長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研究會副會長



原中国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
中国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陳一諮回憶錄

MEMOIRS OF CHEN YIZI
CHINA'S REFORM IN THE 1980S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陳一諮回憶錄
作者： 陳一諮
封底照片(六四)： 蔡淑芳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5571-4-8
定價： 港幣 148 圓

香港印刷，2013 年 5 月。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Memoirs of Chen Yizi - China's Reform in the 1980s
Author: Chen Yizi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5571-4-8
Price: HK \$148

First printed in Hong Kong, May 2013.

Back cover photos (of 1989 demonstrations): Choi Suk-fong

Front cover photo (bottom, of author), photos inside the book (except pages 8, 9, and 10 of photo insert section): Courtesy of the Author.

All other photos: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Copyright ©2013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目錄

自序：此生坎坷為尋路.....	1
說明：本書的資料來源.....	4
楔子：「六四」逃離虎口.....	7
第一章 世代書香子弟（1940-1959）	14
1-1 母親避難成都誕下「龜兒」.....	14
1-2 「清半灣香百里衣食萬家」.....	18
1-3 快樂無憂的童年生活.....	24
1-4 「氣平事更久 心曠得春多」.....	27
1-5 從陝西輾轉到北平看望祖母.....	30
1-6 聰明頑皮的「孩子王」.....	32
1-7 《灰姑娘》讓我蒙羞.....	35
1-8 「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鳴鳥一般春」.....	39
1-9 「驚才振世悲無命 傲骨撐天尚有詩」.....	41
1-10 「清白原無片瓦復，平反焉用一錢求」.....	50
1-11 祖母吳儀孟和大表伯吳宓.....	54
1-12 如饑似渴地想辦法讀書.....	59
1-13 「小臭」莊則棟的成功.....	61
1-14 胡耀邦題詞：「青年代表著國家的未來」.....	63
1-15 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	66
1-16 1959年，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68
第二章 燕園春秋 10年（1959-1969）	71
2-1 「反右傾」和批判馬寅初.....	71
2-2 「三年建成共產主義新北大」.....	74
2-3 中蘇關係破裂的震撼.....	76

2-4 「右派言論」和「秘密報告」.....	78
2-5 甄別平反和請教名師.....	80
2-6 回鄉探親和轉中文系.....	82
2-7 黃偉民組織「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	85
2-8 送往中南海的「反黨萬言書」.....	90
2-9 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和農村的實際.....	92
2-10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標本——陳一諮.....	95
2-11 「高呂之爭」和全國大串聯.....	98
2-12 「2·22 反革命集團」和「二月逆流黑幹將」.....	102
2-13 3月17日，北大最殘酷的批鬥會.....	104
2-14 沈達力為什麼會自殺？.....	106
2-15 聶元梓的倒行逆施.....	108
2-16 北大師生的憤起抗爭.....	111
2-17 俠肝義膽的孫勇剛.....	113
2-18 父親慘遭批鬥，母親一夜白頭.....	116
2-19 舅舅王安被打死，外祖母神經失常而亡.....	118
2-20 軍宣隊進北大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121
第三章 農村基層鍛煉（1969-1978）	124
3-1 中國80%以上的百姓生活在農村.....	124
3-2 楊從久憶苦：「一村一村的人都餓死了！」.....	127
3-3 米嵩山和他父親米邦啟的故事.....	130
3-4 「吃派飯」和「家計調查」.....	132
3-5 程莊農業勞動學校的創辦.....	135
3-6 胡耀邦說：「青年人的雄心壯志和廣大民眾的利益結合起來 才会有大出息」.....	138
3-7 山西紀行：知識青年理想和現實的衝突.....	142
3-8 「大家都成了歪嘴和尚，念的經一定不是好經！」.....	145
3-9 「共產黨是中了邪了！」.....	148
3-10 「共產黨真他媽的扯蛋！」.....	151
3-11 「不把人當人看，才會幹出這種事啊！」.....	157
3-12 王墨林和駐馬店農業勞動大學.....	162
3-13 「書記不如老鱉，不如老鱉！」.....	165

3-14 鄧英淘、吳琰、楊小東、何念民們的精神.....	168
3-15 駐馬店的「塌天大雨」.....	171
3-16 三回北京和「小鄧小平集團」.....	174
3-17 毛澤東病逝和「四人幫」垮台.....	178
3-18 「一天解決了公社三年的老大難！」.....	181
3-19 「別白費勁了，下邊的問題都在上邊！」.....	184
3-20 葉劍英題辭和父親病危.....	186
3-21 「六零年死人少，多虧包產到戶辦法好！」.....	189
第四章 推動農村改革 (1978-1984)	192
小引.....	192
4-1 「耀邦批示，調你到北京工作」.....	193
4-2 何維凌的雄心和我的思考.....	196
4-3 胡耀邦說：「他們都是為革命貢獻了一生的人，早該平反」.....	200
4-4 胡喬木說：「否定了毛主席，就否定了我們黨！」.....	203
4-5 從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探討改革的突破口.....	207
4-6 「張浩來信」和「郭崇毅上書」.....	210
4-7 農村問題的禍源是奴隸勞動加平均主義的人民公社.....	212
4-8 參加「模型小組」和提出「中華振興百年設想」.....	215
4-9 王小強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	218
4-10 安徽調查之一：趙紫陽批示「絕不能谷賤傷農」.....	221
4-11 安徽調查之二：張愷帆「大鬧無為」.....	223
4-12 安徽調查之三：人口問題十分嚴重.....	226
4-13 安徽調查之四：萬里的膽魄和小崗的創造.....	228
4-14 安徽調查之五：回答張勁夫的質疑.....	231
4-15 向各界彙報：「農村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	234
4-16 籌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236
4-17 「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	239
4-18 鄧小平的一席話，又激發起人們的改革熱情.....	242
4-19 陳雲適時出擊，讚賞「緩改革，重調整」.....	246
4-20 「北京三結義」：小凱、維凌和我的聚會.....	249
4-21 「三總家鄉的農民又笑了！」.....	252
4-22 一次成功的綜合研究：滁縣地區的農村調查.....	257

4-23 楊冠三先後 5 年到鳳陽解剖麻雀	260
4-24 趙紫陽的批示和萬里的支持	263
4-25 屋漏偏逢連陰雨，滄海桑田人難知	265
4-26 《以農村為突破口，實行分區立體開發的改革戰略》	271
4-27 「你得了疲勞綜合症，是中晚期」	274
4-28 名利於我如浮雲，蘇州休養議大局	278
4-29 母親的教誨：「人一定要慈悲為懷！」	281
4-30 老爺子生氣了，何維凌、翁永曦倒霉了	284
4-31 「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真理負責」	287
4-32 「這年頭，你不維護自己的利益，誰管你？」	289
4-33 鄧樸方的眼光、才具和忘我	292
4-34 對農村改革和發展組的回顧	295
第五章 促進經濟改革（1984-1986）	299
5-1 抓住歷史的機會，做一個大寫的人	299
5-2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301
5-3 「包」字的誘惑：高漲的城市經濟改革呼聲	304
5-4 錯過了一次百年不遇的改革良機	306
5-5 莫干山會議：「價格雙軌制」的提出	309
5-6 全面經濟改革的起步：承認「商品經濟」	311
5-7 與趙紫陽到廣東之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314
5-8 與趙紫陽到廣東之二：「不改革，中國沒有出路！」	317
5-9 袁庚：「一諮啊，歡迎你到蛇口來工作！」	320
5-10 思考怎麼辦，告別鄧力群	322
5-11 組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325
5-12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建立	328
5-13 過河先要試水深：組織 400 人進行全國大調查	331
5-14 習仲勳說：「中國專制主義的東西源遠流長！」	333
5-15 我和鄧小平說：「中國需要自己的華盛頓！」	338
5-16 建立組織結構 實現正常運轉	341
5-17 給青年人講述《人生的選擇》	344
5-18 索羅斯資助 18 人考察匈牙利和南斯拉夫	347
5-19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改革給我們的啟示	351

5-20 「馬丁事件」和「秦柳方告狀」.....	355
5-21 提拔周小川，保護孟瑋，使用朱嘉明.....	358
5-22 在中央黨校的報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361
5-23 創建中國社會輿論調查系統、中國企業跟蹤觀測系統和 中國宏觀景氣分析系統.....	363
5-24 建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	367
5-25 協助榮毅仁、唐克建立國際所.....	370
5-26 中國文化書院和《走向未來》叢書.....	373
5-27 「家國不易兼顧」，國事惟艱.....	376
第六章 參與政治改革 (1986-1987)	379
小引.....	379
6-1 趙紫陽主持制定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	380
6-2 中共中央政治局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	383
6-3 鮑彤提出：「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	386
6-4 黨史專家認為：「最大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	389
6-5 地方大員的意見：放權、分權是關鍵.....	392
6-6 討論《政治體制改革涵義與重點的彙報提綱》.....	395
6-7 駐外使節說：「我們不是法治國家，而是人治國家」.....	398
6-8 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黨政分開.....	401
6-9 研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	403
6-10 政治法律學者的意見：「首要的是黨內民主」.....	411
6-11 「上至當頭的，下至耍猴的」，吃皇糧的都是幹部.....	415
6-12 高揚說：我們的「民主很差，專政也有些歪！」.....	417
6-13 胡啟立說「政治體制改革，要從中國實際出發」.....	420
6-14 何東昌認為：學潮是「煽動資產階級自由化」.....	424
6-15 政改辦討論「黨政分開」和「黨內民主」.....	426
6-16 鄧小平發動政變，胡耀邦被迫「辭職」.....	429
6-17 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衝擊下的改革.....	432
6-18 研討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	434
6-19 研討小組召開第三次會議.....	437
6-20 「那就把陳一諮那夥人幹掉！」.....	440
6-21 研討小組召開第四次和第七次會議.....	442

6-22 研討小組召開第五次和第六次會議.....	447
6-23 塔爾多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會打擊改革派」.....	451
6-24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454
6-25 王芳說：「索羅斯是反共老手，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	458
6-26 我和鮑彤說：「不出3年，你就會成為晁錯！」.....	461
6-27 從「百人座談會」到中共十三大.....	464
6-28 10年改革的基本經驗：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	469
第七章「勝利大逃亡」(1987-1989)	472
7-1 改革態勢不容樂觀，丫丫成長令人欣慰.....	472
7-2 《立足於打持久戰，著眼於打攻堅戰》.....	475
7-3 應羅德丞之邀赴香港考察.....	477
7-4 趙紫陽提出「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戰略.....	480
7-5 體改所的一大特色：白南風、楊冠三的社會問題研究.....	483
7-6 支持汪道涵、陳琦偉建立亞洲研究所.....	486
7-7 推出「三江一海戰略」.....	489
7-8 李灝請體改所派調查組到深圳.....	492
7-9 王輝的研究《改革中的經濟秩序創新》.....	499
7-10 張震寰請張寶勝、嚴新給我「發功」.....	502
7-11 與朱嘉明赴南美洲考察.....	505
7-12 德國社會民主黨拉薩爾的精彩思想.....	509
7-13 鄧小平的「價格闖關」帶來了麻煩.....	512
7-14 學潮分析：原因、後果及對策.....	515
7-15 參與組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	523
7-16 「治理整頓」成了李鵬、姚依林大搞復舊的借口.....	526
7-17 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協會組團到蘇聯訪問.....	529
7-18 我國所處發展階段需要一個甚麼樣的體制環境？.....	533
7-19 我國改革面臨的三個根本性難題.....	537
7-20 《中國改革的深層難題和戰略選擇》.....	540
7-21 體改所的成功與困境.....	542
7-22 金觀濤一句「盟主」，把我烤在了火爐上.....	544
7-23 楊冠三預言：「可能出現動亂時期」.....	547
7-24 應外務省之邀與高山訪問日本.....	550

7-25 改革 10 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555
第八章「天安門事件」(1989)	559
8-1 中國的困局和胡耀邦病逝	559
8-2 人大貼出的「關係圖」和北大提出的「七條」	562
8-3 矛盾的激化：「新華門事件」與「大會堂事件」	565
8-4 「4·26 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568
8-5 平和理性的「4·27 大遊行」	571
8-6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引起的震盪	574
8-7 衣錫群告訴我：體改所已被誣為操縱運動的「黑手」	577
8-8 我帶李峻、白南風與鄧樸方長談了 5 個小時	580
8-9 李先念蠱惑鄧小平實行鎮壓	583
8-10 趙紫陽、胡啟立、萬里扭轉局面的努力	586
8-11 學生「5·13」絕食與戈爾巴喬夫訪華	589
8-12 「5·15」北京知識界 3 萬人大遊行支援學生	591
8-13 《5·17 宣言》	595
8-14 鄧小平再一次發動政變，搞掉了趙紫陽	598
8-15 「三所一會」發表《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601
8-16 李鵬宣佈「戒嚴」，我最後一次見鮑彤	604
8-17 康華副總裁黃大樹對我的警告	608
8-18 趙紫陽不具備扭轉時局的實力	611
8-19 首都各界聯合會的抗爭	614
8-20 我向體改委黨組作的最後一次彙報	617
8-21 我給體改所骨幹的留言：《論實事求是》	623
8-22 6 月 4 日凌晨，我發表了《我的辭職和退黨聲明》	626
8-23 萬里帶來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629
8-24 北京「六四屠城」震驚全球	632
8-25 「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化妝離開香港	635
結語：路漫漫其修遠	639
第一、創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639
第二、中國改革的新政與畸變	641
第三、專制的缺陷和民主的迷思	643
第四、中華民族面臨著五大挑戰	647

人啊人，你要往哪裏去？.....	651
附錄：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653
一、何以這些國之良才會一個個英年早逝？.....	653
二、因禍得福，我的生命延續了下來.....	654
三、恬淡虛無，精神內守，與晚期癌症周旋.....	656
四、消滅癌細胞，還是與其和平共處？.....	658
五、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660

自序：此生坎坷為尋路

一

2009年初，本人重病幾乎駕鶴西行。近日夢中，與友人談論人生，得詩四句曰：「人年七十古來稀，老夫沉痾留殘軀。此生坎坷為尋路，倖存嬰兒自在心。」醒後錄之。後赴西來寺禮佛，得大佛法語云：「從征萬里起風沙，南北東西總是家。落得胸中空索索，凝然心是白蓮花。」前後相映，令人欣然。正如墨西哥國家博物館門前所書：「人啊人，你從哪裏來，又往哪裏去？」又像羅曼·羅蘭《母與子》一書所述：人為追求理想，十之八九受盡了苦難，最後得到的卻不是自己嚮往的。於是，一個新的夢又產生了，如此這般直到終老。赫爾岑說：世上有兩種人，理想的人和現實的人，前者往往患有難以治癒的「真理病」，後者則往往陷入「泥潭主義」而難以自拔。可試想，人類若失去了對理想的追求，社會怎會進步？一個人若沒有了理想，存在又有何價值？這本回憶錄《尋路》，正是本人忍住病痛記述自己成年後追求理想，所親身經歷的種種往事。

二

許多友人勸我將近乎「傳奇」的經歷寫下來，為往事留下一個比較客觀的視角。確實，我此生也許經歷了很多人幾生都難以遇到的劫數，值得警示後人。但我卻為什麼遲遲未動筆呢？一者，自共產黨在中國執政以來，受害者是家家戶戶。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何人何家未受過非人性的對待、非人道的折磨？像我的這種遭際、甚至更慘的，可以說多如牛毛、不可勝數。這類內容已大多為世人所知，不足為奇。二者，我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有幸介入了1979年至1989年的中國改革並影響了當局的決策，而那時的改革確實收到了一定的實效，我也為之盡了自己的心力。但將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實描述出來留給後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者，自述體的回憶總難免主觀性、片面性與局限性。而1967年「文革」和1989年「六四」先後兩次抄家，又將我收集、整理的各種原始資料抄沒殆盡，這就為寫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何況，世事猶如萬花筒，各自觀察均不同。為不使這段歷史盡成灰，十多年來我四處尋集的資料已

有十餘箱之多，雖難免遺珠與誤記之憾，但總算為盡可能地記述真實作了相應的準備。

三

人的各種抉擇，或因良知，或因性格，或因情感，或因利祿，或因時勢，便會有不同的命運。我此生的兩次出於良知的重大抉擇，卻使我陷入了困境：第一次，1965年為被錯打成「反革命」的同學打抱不平，給毛澤東上書，文革中被打得死去活來，竟當了15年的「反革命」，但在基層的見聞使我認識了真實的中國；第二次，1989年為反對「六四屠城」，而被迫離國流亡海外，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時光荏苒竟已長達20餘年。第一次抉擇，使我體味到在共產制度下民間的疾苦，激發起我改變這種制度的決心；第二次抉擇，使我更深地體味到共產制度與世界潮流——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背道而馳。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兩次抉擇雖使我受盡磨礪，也使我受益非淺，正可謂「求仁得仁，得其所哉」！

四

我出生在一個中國傳統上叫做「書香門第」的知識家庭，來往的親戚朋友也多些名門望族。耳濡目染的不是「修齊治平」的儒家倫理，便是「普度眾生」、「師法自然」的佛道精義，當然也少不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評議和「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的討論，自幼便逐漸形成了「以天下為己任」和「外儒內道，常存佛心」的情懷。雖說二十世紀以降，中國經歷了滿清覆亡、民國建立、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國共內戰等諸多變局，但大多數國民的生息還都依循著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優秀文化道德傳統。共產黨掌權以後，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裂變，一次次人為製造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使中國變成了一個地獄之邦。歷史錯位導致的價值紊亂，使中國事事處處都成了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之地。人們信奉的美德似乎都變成了因之獲罪的淵藪，一向被人們所不齒的惡行卻橫行無忌。多數人在排天的濁浪中只有隨波逐流，有異議者的命運則大多是「殺關管」，其殘酷程度史無前例，經歷過共產黨「煉獄」之苦的人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五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合理制度，前仆後繼地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這裏呈獻給讀者的是一本自傳體的回憶錄。本書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講述自己的際

遇，展示人性、良知與不合理制度、環境的抗爭。本書中第一次披露了許多重大而不為人知的辛秘，其真實性均由本人負責，這些資料也許對人們研究歷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阻斷中國改革的歷史罪人李鵬（時任中國政府總理），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認為本人是「趙紫陽黑線與學生運動之間的樞紐」，而將本人定為「頭號通緝犯」；大家公認的「左王」王忍之（前任中宣部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則指斥本人為「頭號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能獲此等「殊榮」，本人可謂受寵若驚而為之自豪。

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時，本人年方九歲；1989年遭李鵬「通緝」被迫離國時，49歲。在共產黨治下生活的40年間，我親身經歷了在中國歷史上、也許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劫難，將之記錄下來也許可以警示後人。近代以來，本人祖父、父親和同輩親友，幾代人都在為中國的進步，不懈地努力著、奮鬥著、甚至犧牲了生命。本人將這本回憶錄，獻給那些為中華進步而努力的人們！

說明：本書的資料來源

第一，本人從1967年開始記的「大事記」，為我提供了寫作的基本線索。（「大事記」影印件）。我從15歲起，就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一年兩本或三本。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僅這些日記成了我的「反革命」罪證，而且全部沒有了下落。從此，我把記日記改成了寫「大事記」，即每天將發生的事用幾個字記下來，以幫助記憶，又可以防止再讓人抓把柄。我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今天，已經有40多年了。

這次寫回憶錄，過去的「大事記」給了我直接的幫助。「大事記」使我不致忘掉那些過去發生的事情，還能幫我回憶起許多細節。「文革」時的抄家，使我損失了許多家傳的文物和家族的史料；「六四」後的抄家又使我集攢了22年的各種資料損失殆盡。所幸者是我所記的「大事記」，由友人從國內給我帶了出來。

第二，我要感謝年邁的老母王毓芳，她在1997年到1998年，近80歲時仍筆耕不綴地為我書寫了3萬多字的家族史，她最後寫道：「鄧小平說，今後不會再有文革了。但世間多少傷心事，真正是『恨壓三山華嶽低，淚流九曲黃河溢』啊！」令遠在異國的我傷情不已。但母親提供的資料，是我寫作本書第一章的基礎。

哥哥、嫂嫂、姐姐、弟弟、妹妹及其他親友，都給我提供了各種資料和照片。他們從陝西省圖書館，給我拷貝了祖父陳伯瀾的《審安齋遺稿》和《審安齋詩集》；又托人給我帶來了表伯父吳宓的《吳宓自編年譜》、《吳宓詩話》、《吳宓詩集》和《吳宓日記》；還從家中搜集了大量的珍貴照片，為我的寫作提供了難得的幫助。他們主要是：陳一訥（已逝），陳一諤（已逝），陳一詠（已逝），陳一誥，吳學昭，劉秀嫻，李仁，陳一詢，陳一諾，陳一諫，陳一訓，陳一謙，陳一謀，陳一詒，吳學昭和李斌。

第三，我還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和東亞系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和費正清中心資料室，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和東亞系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他們都慷慨地給我提供了細緻、認真而無償的服務。

第四，在我寫作本書第二章時，北京大學的師長和同學以及朋友、親戚都給了我無私的幫助。他們是：林庚（已逝），朱德熙（已逝），林音，楊新華，黃偉民，高運安，侯漢青，牛輝林，奚學瑤，何青，楊偉延，趙習文，趙春華，沈達非，孫勇剛，孟繁華，王亞葵，王亞薇，王亞芸，陳一謙，陳一謀，陳一詒，王效嵐。

第五，從第三章到第八章的寫作，「大事記」給了我莫大的幫助。同時，我要感謝許多朋友、親戚和同事，若不是他們幫我提供了一部分重要的資料和素材，本書是難以完成的。以下所列姓名以提供資料的時間先後為序：

給我提供寫作第三章資料和素材的有：米嵩山，羅小朋，王飛欣，鄧英洵，楊小東，何青，楊偉延，孟繁華，孫達人，李仁，郭笙，侯漢青，孫方明，吳琰，何念民，王冀豫，劉秀嫻，陳一詒，陳一謙，陳一謀，陳一詒等。

給我提供寫作第四、五、六、七、八章資料和素材的有：吳琰，郭秋姮，何青，孟繁華，羅小朋，王飛欣，侯漢青，王小強，楊冠三，王曉魯，白南風，孫方明，毛揮，趙小冬，謝揚，高王凌，文冠中，王世儒，張阿妹，高小蒙（已逝），黃曉京，王依依，王耕今（已逝），楊勳，朱德熙（已逝），龔祥瑞（已逝），楊新華，楊小凱（已逝），蔡定劍（已逝），胡平，吳象，孫達人，孫恆志，魏承思，沈家模，張少傑（已逝），高梁，彭照平，王輝，齊永貴（已逝），李峻，羅安義，李磊，陳一謀，陳一詒等。

此外，本人寫作第六章時，參閱並引用了吳國光、陳曉魯、吳偉、黃海的若干論述，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第六，關於本書的「註釋」。書中所涉人物較多，故而採取了「遠注近不注」的辦法，一者因時間的隔膜，許多過往的人物後人已多所不知，故注之；二者與本人在發展組、體改所、政改辦工作的朋友，一般不注，只能望讀者諒解；張阿妹為本書作了許多「註釋」，魯利玲則按出版要求為本書統一了體例並進行了校勘，特此深表感謝。

第七，本書寫至 1989 年本人被迫離開中國；往後歲月發生的故事留待以後描述。

第八，我還要感謝的是，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洪朝輝、羅小朋、王小強、張海萌、楊冠三、吳琰、閻淮、麗莎、賽燕、魯利玲等友人對本書寫作的指導與幫助。

第九，本人每日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從2010年4月到2011年10月，總算完成了本書的初稿。但已經沒有能力再做推敲和修改，錯謬之處只能請讀者指正了。本人寫作中，每天都受到愛妻蕭雨無微不至的關照，沒有她自始至終的幫助，這本書是難以完成的。

2011年10月於美國洛杉磯

楔子：「六四」逃離虎口

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太陽在地球的另一方。依稀可見的，只有天邊飄忽明滅的幾點燈光。

陣陣海風吹得小船不停地搖蕩。我靜靜地躺在小船的底艙。不敢發出聲響，汗水沁透了衣裳。不知道小船會把我載向何方。

也許是上帝的慈悲，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在險象環生的通緝、追捕中，幾次險些落入虎口。最終，卻來到了這艘一人不識的小船上。

7月的南方天氣酷熱，全身長滿了痱子，船的底艙悶熱的讓人呼吸不暢。嘴唇乾裂了，思維若斷若續。怎麼也睡不著，浮想像海浪撞擊著船艙一樣……

「六四」屠殺的第二天，1989年6月5日深夜，我在朋友們哭著相勸下離開了北京。

一個月裏，到處逃匿、躲藏。處處遇到善良的人們，人人給了我無限的同情和不顧一切的幫助。我幾乎一人不識，但是誰都把我當作親人一樣。

一道一道的關卡，多少次的化險為夷，終於讓我飄流到了海上。

閉起眼睛，就似乎看到了那些天真無邪、驚愕不已、但已停止了呼吸的滿是血跡的年輕面孔。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民族的興旺，為了民主和自由，他們去了，永遠離我們而去了。而我卻還活著。

——這是我1990年5月，在美國哈佛大學寫《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1]一書「引言」的開頭。

1989年10月22日我到洛杉磯西來寺拜訪星雲大師^[2]時，他送了我這樣的題辭：「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是啊，什麼能妨礙流水和白雲呢？

北京「六四屠城」後，李鵬認定我為「頭號通緝犯」，密派400名特工到全國各大口岸要津抓捕我，並下令「不惜一切手段務必將陳一諮緝拿歸案」。那時，北京到處在抓人、殺人，陷入一片恐怖。朋友們流著淚勸我

[1] 台灣聯經出版社1990年出版。

[2] 星雲大師，美國洛杉磯西來寺主持。

盡快暫時離開北京，說：「李鵬若讓人把你綁架到新華門，一陣亂槍打死，說你是個暴徒，就太不值得了！」

6月5日凌晨，北京各處還不時響起零星的槍聲。中共元老萬里給我送來一封急信，寫了兩行字，一行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行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考慮到前兩天，李鵬身邊的人就托朋友轉告我：「李鵬認為，你是趙紫陽黑線和學生運動黑手之間的樞紐，要抓你。還說活的、死的都要，你要小心。」

不能等死！可往哪兒去呢？親戚家不能去，朋友處不能去，工作過的地方也不能去，否則會殃及無辜，暫時到南方避避風頭再說。我給體改所副所長劉曉峰打了個電話，他馬上開車來了。曉峰今年3月才調到體改所，是一個急公尚義的漢子。一見我，曉峰就說：「趕快離開北京，以防不測。我去給你作些準備，中午接你走。」

午飯後，他帶著體改所宏觀室的黃永山來了，還帶了給我做的化名「石堅」的工作證和5,000元人民幣。黃永山說，他6月3日凌晨藏在人民大會堂旁的小柏樹牆後邊，一聲槍響，他旁邊一個人被打死了，他嚇的順著柏樹牆爬出來，保住了一條命。他願意陪同我離開北京。

下午兩點，我們三人到了北京站。只見軍人荷槍實彈一個個盤查來往行人。顯然，進站有危險。曉峰掉轉車頭上了長安街，街上行人、車輛很少，燃燒過的汽車、戰車還在冒煙，西長安街的彈痕隨處可見，六部口的下水道邊血仍在流，多少天真無邪的生命喪送在這裏啊，淚水不自禁地嘩嘩流了下來。政府怎麼會下這樣的重手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

我早就估計到，這場以「爭自由，爭民主，反腐敗，反官倒」的運動會以悲劇收場，但絕沒有想到會如此慘烈！從一個人最起碼的良知出發，我也應該反對政府鎮壓。我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一場清算10年改革的軍事政變」，但還想盡可能避免最壞的結果。北京戒嚴前夕，我口授並經大家同意以三所一會^[3]的名義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這是我此生最重要、也是最痛苦的一次抉擇：是屈從政府淫威以待來日？還是寧為玉碎伸張正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義無反顧地只能選擇後者。現在，要逃離養育了我近30年的北京，令人實在是感慨無限。我們到中央團校的朋友家，休息一會，吃了晚飯。6點多，又化了妝，去了豐台火車站。站上人很多，警戒的軍人不多。我和黃永山登上了開往南京的列車。

[3] 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國國際信託公司國際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南京火車站人頭攢動，擁擠不堪。通往上海的滬寧線已不通車，聽說因「六四屠城」，人們阻斷了交通。街上貼滿了「打倒鄧小平、李鵬、楊尚昆！」「血債要用血來還！」的標語。時不時幾百人、上千人的遊行隊伍喊著口號，激憤地抗議北京殺害學生和平民。

我們買了去南昌的火車票，想到雲貴一帶偏遠地區避避風頭再說。到了南昌，才知道通往各處的火車都中斷了。怎麼辦？在火車站睡了一夜。7日下午，終於買到了兩張通往廣州的長途汽車票。汽車上人們都很沉悶，似乎一半以上都是南逃的學生。

車行了兩夜一天，第二夜凌晨抵達廣州郊區。突然，一隊荷槍的軍人包圍了汽車，凶巴巴地要上車檢查乘客證件。我看大家睡的東倒西歪，靈機一動，出溜到座位下裝著呼呼大睡。檢查證件的軍人搖了我兩次，看搖不醒我，就下車了。車開到總站，我和黃永山商量，先找個旅館住下來再說。

當我第一次拿那個化名「石堅」的工作證登記住宿時，即引起了旅館服務員的狐疑。因為正式的工作證必須在照片上蓋有鋼印，而我的工作證上卻只蓋了紅油泥印。她端詳了我一會兒，給了我們房間。我預感到不妙，立即和黃永山拿了行李從側門走出旅館。這時，只見一隊荷槍的軍人衝進了旅館，我們立即叫出租車去了花園飯店。

按約定，6月9日中午，我們在飯店大堂見到了老馬。老馬把我們帶到了許晉豫^[4]的辦公室。許晉豫的父親和趙紫陽是老戰友。北京戒嚴以後，趙紫陽的二兒子趙二軍三次給我捎話，讓我速到廣州。我還想力挽危局，調和各方以避免流血，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誰知事與願違，北京還是出現了最壞的局面，軍事鎮壓血流成河。

許晉豫是個俠肝義膽的人，時任中國聯合承造實業公司總經理。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開門見山地說：「老石，去香港吧！」我不想去，說：「第一，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留在中國；第二，我身體不好；第三，我不懂英文，出去很不方便。」他說：「紫陽軟禁了，鮑彤被捕了，李鵬決放不過你！先出去避一下再看。」這真又是個痛苦的抉擇。不過，形勢所迫，眼下只能如此了。朋友從北京給我送來了護照。

美國駐廣州總領館立即給了我簽證。我們連夜開車到了深圳，住進了園嶺。約好了6月16日12點從羅湖出關，由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鮑恩在羅湖接我。那天12點多，老許回來無奈地說：「公安部搜捕7個著名知識分

[4] 許晉豫，其父與趙紫陽係革命戰友。後因保護筆者而入獄。

子的通緝令已經到了深圳海關，名單裏有你，這兒出不去了。」當即，我們又返回廣州，第一次出關的計劃沒有成功。

6月17日，台灣商人方君自告奮勇陪我去海南，黃永山回北京了。到海口後，方君安排我住在高醫生家就走了。我在高醫生家看了幾天書，聽說風聲越來越緊。6月20日，方君陪著趙二軍和汪建莉^{【5】}來了，說試試從海口機場去香港行不行。海口機場四處都是荷槍的軍人，方君先去探路。不一會興沖沖地回來說：「我給了售票小姐100美元，機票就換成老石的名字了。快走，這趟班機已登機了。」

我跟著他往登機大廳走去，剛到門口，兩個軍人用槍一架，要查證件。方君急中生智，拿出「台胞證」說：「我得趕快走，飛機就要起飛了！」軍人放行了。要入關時，方君突然說：「老石，有你名字！」原來，邊檢提到了入關之前，每過一個人都對照一遍桌上的名單，隔著玻璃窗可以看見那份名單，第一頁第三個名字就是我。

我和方君立即回到車上。汪建莉又去看了一次，回來說：「老石，就是你的名字。」正在這時，一隊荷槍的軍人包圍了我們的麵包車。司機趕快下車，不知說了些什麼，領頭的軍人大聲說：「快開走，不要違規停車了！」司機發動了車，笑著說：「塞給他1,000港幣就過關了。」第二次出關的計劃又沒成功。

怎麼辦？方君給我辦了個新加坡護照，但通緝的照片貼出來了，這個護照也用不上了。我在高醫生家又看了幾天書。7月5日上午9時30分，方君急匆匆來找我，說：「老石，快跟我走！」，坐上他的小汽車東拐西轉了約半小時，停在了一家賓館門口。門內走出兩個人，只說了一句：「跟我們走！」。說時遲那時快，一輛麵包車開了過來。門打開讓我進去，那二人也上了車。車立即開走了。

一個人跟我說：「老石，你外甥接你去安全的地方。他正等你吃飯。記住，你是他舅舅，是來看他的。」並給我臉上、脖子上和胳膊上、手上塗了些古銅色的敷料。車行約半小時，停在一家兩層樓的餐館前。他們二人帶我進了餐館，上到二樓。一個身材較我略高，30多歲滿臉風霜的壯漢，從一張餐桌旁站了起來，說：「舅，快來吃飯。」我在他對面坐下，那兩個送我的人就走了。

桌上已擺了四個涼菜，還有兩瓶啤酒。他不緊不慢地邊吃邊喝，還東扯西拉地說些閒話。我雖心裏有些焦急，但看他那若無其事的樣子，也就跟著吃喝起來。他又要了四個熱菜，連吃了三碗米飯，我也吃了一碗米

【5】 趙二軍和汪建莉，趙紫陽次子與媳。

飯。走出餐館已 12 點多，他側身悄悄說：「舅，你別著急。我帶你出海去逛逛，保你沒事。港口的警衛 12 時 30 分換崗，我們趁他換崗前，大搖大擺地往裏走。」

果然，12 時 20 分我們到了一個碼頭。碼頭邊停了許多貨船，碼頭門口有個崗哨。我們按約定往裏走去，剛走進碼頭門十幾步，值勤的崗哨喊道：「站住！幹什麼的？」我們站住了，「外甥」笑了笑走了過去，也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我看那個崗哨往我這兒看，大方地走過去，遞給那個崗哨一支「萬寶路」。崗哨擺擺手，讓我們進去了。

我被帶上一隻貨船。「外甥」把我帶到船的下層，說他是這個船的船長，運貨去香港，受朋友所託帶我過去。我這時才知道要去香港，沒有其他安全去處，只能碰碰運氣啦。他又帶我到下層的後艙，指著右手一個大水箱說：「查船的巡警來了，你就鑽到裏邊去，鑽進去以後隔板上還有個洞，你再鑽過去，保你不會被發現。」

我看那個水箱，約兩米高三米寬，左邊有一個一尺半寬的圓門。他打開那個圓門，裏面裝滿了水，我用手一試，水是溫熱的，上面飄著一層油。船艙中間是一台柴油發動機，靠船的右舷鋪著一張蒲蓆，還有兩瓶水、四個小麵包。船長說：「你就在這兒休息，再熱也不能到上艙去，我去裝貨了。」

7 月的海口驕陽似火，船艙內悶熱不堪，不到一個小時我全身就濕透了。從下午兩點開始，荷槍的軍人十幾個人一隊，「卡，卡，卡」地走過來走過去的在碼頭巡邏。時間停滯的讓人窒息，一秒一秒不情願地往前走。我脫掉汗透的衣服擦擦身子又穿上，不到兩個小時身上出痱子了。躺在蒲蓆上，輾轉反側，全身又濕又粘，似睡非睡了一會兒，痱子不斷湧出來，癢的難以忍受，撓的渾身到處都是血印。

下午 6 點，機器發動了，伴隨著機器的轟鳴聲，一股股熱浪撲面而來，船艙的溫度陡然又升高了，悶熱的像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裏。週身灼熱起來，汗倒是被蒸發走了不少。快 7 點時，船長滿頭大汗走下來，說：「馬上開船出海。」從船舷邊的小窗戶往外看，軍人還在巡邏，工人仍在搬運，我們的船正提錨解纜準備離岸。

船慢悠悠地開離港口，突然四面探照燈齊明，船停了。船長急忙走來說：「巡警要來檢查。我腳一踩船板，你馬上藏到水箱裏，再鑽到隔板那邊。」這時反而不驚慌了，讓人抓住好似甕中捉鱉，無處可逃，身處絕境，又能如何？不一會兒，就聽見船長腳踩船板的聲音。我趕忙把蒲蓆捲

起，走到水箱前，鑽了進去。關上水箱門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了，只覺得全身泡在滿是油污的熱水盆中。

用手一摸，隔板靠下邊有一個和水箱圓門大小差不多的圓洞，人蹲下來才能鑽進去。豎耳細聽，除了機器的轟鳴聲，還傳來船上人的走動聲和聽不清楚的說話聲。我連忙鑽過隔板，把頭伸出水面，些許微光只能看到水面上漂著的油花在閃動。我閉目冥想深深地吸氣，使自己鎮定。說話聲由遠及近，水箱的小圓門打開了，一股光線透了進來，有人用棍子攪動著水，我屏住呼吸一動不動。

水箱門關上了，人走了。又過了大約半小時，「出來吧！沒事了！」船長敲著水箱大聲說。我鑽了出來，不知像個落湯雞，還是落水狗。脫掉全身衣服，擰乾晾在機器旁。船長說：「這是例行抽查。查過的船不能出港。明天8點才能走。不過，一般不會再有人來了。你好好睡一覺。」水箱裏一泡，倒舒服了許多，躺在蒲蓆上怎麼也睡不著。想想李鵬為什麼凶神惡煞般地一定要置我於死地呢？

——1978年經胡耀邦批准調我回北京後，1980年我創建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鼓動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李鵬一夥認為，是我帶頭「破壞人民公社集體經濟」。

——1985年由趙紫陽任命，我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努力研究如何改革國有經濟以提高效率。李鵬一夥認為，我是在「破壞社會主義國有經濟」。

——1986年趙紫陽主持研究如何進行政治改革，調我擔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秘書長，研究中國的政治改革。李鵬一夥認為，是我在「削弱和破壞黨的領導」。

那麼，既已發生了「六四屠城」，一場以復歸「計劃經濟」和「一黨專政」為目標的「清算10年改革的軍事政變」，焉能放過我？！李鵬要「不惜一切手段」抓我，也毫不奇怪。從1979年到1989年，10年來我夜以繼日的工作，為什麼？除了為「民富國強」而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外，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和所求，我無愧於百姓和國家。想著想著，我睡著了。醒來時，船長蹲在我身前。船已起航。

船長說：「我來了兩次。看你睡得好香。今天一天船要沿海岸往東航行，委屈你還得在這兒躺著。千萬不要上船。若有邊防快艇檢查，你還得鑽到水箱裏。」又給我丟下兩瓶水、四個小麵包。往窗外看，除了幾艘船隻外，都是茫茫大海。海風一吹，船艙已不那麼悶熱，蒲蓆也不那麼沾身子了。

人生真是奇怪，多少次面臨死亡都活了下來，難道這次又真能逢凶化吉嗎？也許還真是命不該絕，上蒼對我此生的磨煉還要繼續。往事讓人感慨萬千，我為什麼會去搞改革呢？

——我出生在一個中國傳統上叫做「書香門第」的世家，祖父是「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的積極參與者、著名詩人；父親在「9·18」事變發生後即到南京總統府絕食要求抗日，是著名水利專家；外祖父痛斥汪精衛降日後即辭官返鄉……親人多為愛國知識分子。

——我自幼即受到嚴格、良好的教育，「富國強兵」是從小的追求，嚮往「大同世界」到信仰「共產主義」是少年到青年的轉變。誰料想，一份為同學鳴不平、批評當時「不民主」的《意見書》，竟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殘酷迫害幾次被打得昏死過去。

——在農村和基層使我對「極左」的破壞和制度的不合理，給百姓帶來的苦難有了進一步認識。如何才能改變？毛澤東關於和尼克松打交道的一席話啟發了我，只有「影響決策」，才能「改變中國」啊。花費一生所學，盡力推動改革，卻又被「六四屠城」劃上了句號。

捫心自問，我始終抱著父親指教的「外儒內道，常存佛心」的精神，不求任何功名利祿地為百姓、為國家奉獻一切，以「盡人事而聽天命」的心態面對各種難題。現在竟又要像康梁一樣被迫逃離自己的國家了，實在讓人痛心！

貨船平穩地航行在海上，再沒有遇到檢查。但船長仍不讓我出來，只能躺在船的底艙。過去的往事一幕幕、一樁樁浮現在我的眼前。是的，應該把我所瞭解的往事留給後人。

第一章 世代書香子弟（1940-1959）

——我的家族及我的成長

家族傳統和環境熏陶，使我從一個「孩子王」成為一個嚮往大同的少年，又進而成為一個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激進青年。

1-1 母親避難成都誕下「龜兒」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日本侵略軍以閃電般的速度攻城略地，中國東部的大部疆土陷入了戰火紛飛之中。11月，日軍轟炸西安，妄圖佔領陝西，打通西北、西南通道。但是「雙十二」^[6]之後，陝西軍民抗日情緒高漲，同仇敵愾，寸土不讓，奮擊日軍使其難過黃河與潼關。當時，正在西安高級中學讀書的母親王毓芳，不顧日機的轟炸，經常與丁玲^[7]等人一起上街宣傳抗日、表演節目。

到1938年，日軍飛機的不斷騷擾、轟炸，使西安民眾時時處於不寧之中。一聽到警報響，人們就扶老攜幼鑽入防空洞，炮彈的爆炸聲、房屋的倒塌聲、人群的呼叫聲和孩子們的哭喊聲，混雜成一片。市內各業趨於癱瘓，學校也幾近停課，

不少民眾躲到鄰縣去避難。日軍的連續狂轟亂炸，西安當時有兩、三千人罹難。



母親王毓芳

[6] 雙十二事變：又稱西安事變，是當時任職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當時任職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動的直接軍事監禁事件，他們扣留了當時任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和平解決。

[7] 丁玲（1904-1986），原名蔣偉，字冰之，湖南醴陵人。當代中國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1932年參加中共，1955年被打成「反黨小集團」，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

1938年9月，母親和父親陳之顯喜結連理。次年初，母親在躲避日軍轟炸時，第一個孩子不幸地流產了。1939年夏，母親考上了已搬遷至城固的西北聯大（西北大學前身）英文系。開學不久，母親卻懷上了我。正在漢中主持修建褒惠渠的父親，為策安全，把母親送到了成都。據父親說，陰曆六月十五，他帶母親去成都青羊宮祭拜老子，行至三清殿時，母親突然腹痛不止。當夜，也就是1940年7月20日子時，我提前出生了，父親給我起了個小名「憨兒」。

外祖父看到早產的我，搖著頭說：「這個孩子，難養活啊！」母親心急地找了有名的青城山道長卜了一卦，道長卻恭喜母親說：你這孩子命格大貴。一生雖風險不斷，卻能成就大功業，而且很長壽，可起名「龜兒」，拴住他！母親聽了很是高興，可拖著孩子上學太不方便，就暫時休學了。為了生活的便利，母親於是帶著我到了父親工作的漢中。日本的軍機雖然也不斷來轟炸，但比起西安還是安全多了。

母親晚年在寫給我的回憶中說：「你是第一個孩子，哺乳、穿衣、換尿布、洗澡，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開始真不知如何是好，可又不能看著那天真無邪的小生命受委曲。俗話說，要知父母恩，懷裏抱兒孫，自古如此。母愛是天性，是天底下最純潔無私的愛，是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比擬的神聖瑰寶，是千百萬年流傳不滅的。日本的飛機一到，我抱著你就往防空洞鑽，生怕傷著你一點點。」

母親接著寫道：「眼看著你這個小生命，你的一哭一動，吮吸乳汁時的專心，本能地用兩隻小眼睛盯著母親的臉，表現出滿足的神態。漸漸地似乎天天都在長本事，嘴裏會發出聲音了，可能是想表達什麼意思……，以至會笑，會坐、會翻身、會爬了，慢慢又學會站了。當孩子喊出第一聲『媽媽』時，當母親的會有多麼高興啊！你把我的整個身心都吸引住了，甚至一步都不願離開。」

「眼看著你快週歲了，健康活潑，白嫩的臉龐泛起兩片紅暈，誰見了都很喜歡。自己更是攔不下，只能再休學。」為了孩子，母親放棄了「做一番事業的理想」。隨後，母親又一連生了5個孩子，整整操持家務16年。因為母親的付出，父親的善良體貼，家裏總是



父母結婚照

和諧、快樂並充滿了情趣。慢慢我才知道，我生長在一個中國傳統的書香門第世家。

我的母親王毓芳（1919.10.16-1998.6.29）生於成都，從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讀書時一直品學兼優。以後，每當我們兄弟姐妹學習偷懶時，母親就給我們講她小時讀書的故事：在家受了兩年童蒙教育後，從上小學到初中，每天早起要走 10 多里路才能到學校，特別是從三原北城到縣城，要過龍橋，下河坡、上河坡，一遇下雨下雪，就跌一身泥。

有錢人家的孩子可以坐轎、騎驢去上學，但外祖父母家教很嚴，只讓孩子走路上學，鍛煉孩子吃苦耐勞的精神。那時求學哪有現在這麼方便！縣裏沒有高中，母親 15 歲考上省城的西安高級中學，便離開三原的家了。「雙十二」發生，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兵諫蔣介石抗日。學生們也抗日情緒高漲，組成各種小組宣傳抗日救國。不久，學校為了躲避日機的轟炸，南遷到了洋縣。

1938 年春節，父親在三原老家第一次見到母親時，就被其打動，向她求婚，母親以「學業未竟」婉拒了。父親回家後，即盤膝打坐、不吃不喝，並同我四婆說：「我此生非毓芳不娶！」兩天後，兩家的世交茹欲立^[8]、吳懷仙^[9]去給父親說親，外祖父當即說：「之顯人品好，學識好，家世好。毓芳不答應，我答應了。」這一年 9 月，母親和父親成婚時，茹欲立、吳懷先當證婚人，世交于右任^[10]、孫慰如^[11]、李儀祉^[12]等人都送來了賀禮。

[8] 茹欲立（1883-1972）字卓亭，陝西三原人。1905 年入中國同盟會，1931 年 2 月任南京政府審計部長。後不滿蔣介石而辭職，回鄉以賣字畫為生，他「精研漢書事例，喜臨玩碑版」，專攻魏碑，後攻楷書，功力深厚，列名《中國美術家名人大辭典》。

[9] 吳懷先（1883-1950），陝西徑陽人。為陝西首富「安吳寡婦」周瑩之螟蛉子、吳宓之堂兄，長期在川陝江浙從事鹽業。1936 年傾其家財捐給了國民政府以助抗日，1937 年又將吳家大院借給中共中央青年部舉辦「安吳青訓班」。

[10] 于右任（1878-1964），名伯循，陝西三原人。1906 年於日本加入同盟會。1912 年 1 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交通部次長。1924 年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執行委員。後曾任國民黨監察院長達 30 年之久。1964 年逝於台灣，後人為他在玉山峰頂立銅像。善草書，喜作詩，為現代著名詩人、書法家。有《右任文存》、《右任詩存》行世。

[11] 孫蔚如（1894-1979），陝西省咸陽人。1916 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反袁，1918 年參加靖國軍反段。後追隨楊虎城，1922 年任陝北鎮守使。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陝西省主席，抗戰時任第四集團軍司令，以堅守中條山出名，被稱為「中條山鐵柱子」，最後官至第六戰區上將司令長官。獲抗戰青天白日勳章，美國二戰金質自由勳章，首批抗戰勝利勳章。

[12] 李儀祉（1882-938），原名協，字宜之，陝西蒲城人。他生於書香門第，伯父李仲特和父親李桐萱都是關中名儒，同盟會會員。1900 年，他入三原宏道學堂求學，與于右任結為學友，1906 年加入同盟會。他一生致力於水利教育和水利工程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績，也贏得了諸如「中國近代水利先驅」、「中國水利教育奠基人」、「中國近代水利之父」等殊榮。

我的外祖父王曙樓（1880-1961），原名王文海，與于右任、茹欲立、朱仲尊^[13]為同窗好友，在開封曾幫助于右任逃過清廷抓捕。清末中舉後任工部主事，隨盛宣懷^[14]赴川主管鹽務，因成效卓著受到嘉獎。1917年，于右任在陝組織反袁靖國軍任總司令，外祖父得訊即辭掉北洋政府職務，投入靖國軍與胡景翼^[15]、井勿幕^[16]等一起反袁。1931年，于右任就職監察院長，同時聘請茹欲立為監察部長、外祖父為監察部秘書長。外祖父一上任，即將自己的實薪 500 銀元減為 400 銀元。

茹欲立因在任上拒撥蔣介石江西行營「剿匪」軍費，1933年辭職回鄉，住在三原縣北城以賣字畫為生。外祖父在「9·18」後，當面痛斥汪精衛賣國言行後亦憤而辭官返鄉，住在三原縣北城。外祖父回鄉後，不斷來往的朋友，有茹欲立、朱仲尊、吳懷仙、王子端^[17]、李瑞峰^[18]、程博九^[19]等多人。時任 38 軍軍長孫蔚如將軍也以師執之禮待外祖父，常攜夫人李定印造訪，談論時政與抗日方略、文學和武功。

原來早在 1917 年，于右任組織靖國軍時，外祖父在二軍任軍級參議，孫蔚如任連長。後因孫蔚如有勇有謀，屢立戰功，1932 年任 38 軍軍長，並與楊虎城結為兄弟，1937 年兼任陝西省省長。孫蔚如十分欽佩外祖父的道德、學識，故常往訪與其探討國事、商議抗日。1938 年，孫蔚如率軍長 3 萬夜渡黃河，開進中條山脈，3 年間粉碎日軍 11 次大掃蕩，此作戰方略即孫將軍與外祖父共同商定。解放後，孫蔚如力薦外祖父為省政協委員，外祖父以「年高體衰」為由堅辭不受。



外祖父王曙樓

【13】 朱仲尊，早年和于右任、王曙樓就學於三原宏道大學堂。

【14】 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幼勛，江蘇武進人。清末政治家、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和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創始人，同時也是一位實業家和福利事業家。

【15】 胡景翼（1892-1925）名笠僧，字勵生，陝西富平人。1910 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 年武昌起義時，在陝西舉兵響應，任第一標統帶。後與馮玉祥之國民軍合作，敗直奉軍收復北京。其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河南軍務督辦時病逝。

【16】 井勿幕（1888-1918）原名井泉，字文淵，陝西省蒲城人。1903 年留學日本，1905 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被孫中山譽為「西北革命巨柱」，任陝西靖國軍總指揮。1918 年被殺害時年僅 30 歲。1945 年國民政府追贈其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銜。

【17】 王子端，早年和于右任、王曙樓就學於三原宏道大學堂。

【18】 李瑞峰，同上。

【19】 程博九，同上。

因外祖父為人一貫廉潔奉公、耿直正派，又常為鄰里排憂解難，故得地方官紳、鄉親父老交口稱讚，名重一時。1947年，外祖父無奈被族人推為族長，遂負起處理族內事務的責任。一般讀書就業、照應孤寡、親鄰糾紛，外祖父均能妥善處置，深得族人擁戴。他的一個族侄病歿，其妻改嫁，遺下一個患病的孤女王秋芳，外祖父將之收為乾孫女，並代管族侄所遺一百畝地，誰知後來竟惹來麻煩。



外祖母張惠芬

我的外祖母張惠芬（1895-1977），係滿清正藍旗貴族，14歲選秀入宮，17歲出宮，嫁王曙樓，育二女一子：王毓華、王毓芳與王安。外祖母從小受過良好教育，知書達理，賢惠善良，勤儉樸實，一生未與親友鄰里有過爭執。她善主中饋，相夫教子，不慕虛榮，不計得失，始終秉持「待人從厚，生活從儉」的祖訓。每日灑掃庭院，煮飯做衣，從無停歇，成年累月操持家務而無任何怨言。使幾個孩子均養成了尊老愛幼、誠實待人、勤奮好學、認真勞作的良好品德。

1-2 「清半灣香百里衣食萬家」

我的父親陳之顛（1911.1.9-1982.1.31），是我心中的偶像。父親生於廣州，自小即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祖父道家的「清心寡慾」和祖母佛家的「明心見性」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一生。父親為人敦厚純良，一生行善，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父親幼年在私塾讀四書五經，中學以後又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化，可以說他是一個既傳統又開明的中國知識分子。父親在廣州出生後半歲，即隨祖父母至上海，5歲到北京，6歲入北京師大附小，11歲入北京師大附中，17歲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21歲畢業。



父親陳之顛

那時，師大附中由著名的教育家林勵如^[20]任校長，他經常用「愛國，仁義，善良，勤勞，節儉，守信」十二個字教育孩子，培養出了一批批的優秀人才。父親一提起當年在師大附中緊張而快樂的學習生活，就非常讚佩那位令人難忘的林校長。入清華以後，父親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也有賴於師大附中的中英文雙語教育和從高二起即學習了大學的數學、物理等課程。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但不久即發生了南北戰爭、袁世凱稱帝、簽訂21條、北伐戰爭、南北議和、北洋統治、「9·18」事件等諸多大事。父親一生憂國憂民和實業救國的思想便於此時形成。父親心目中最欽佩的人有諸葛亮、李世民、玄奘、陳搏、岳飛、詹天祐和華盛頓、林肯，還記得兒時父親有空就給我講他們的故事。

從中學到大學，父親都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而且為人既聰穎又誠樸，同學們都親切地叫他「小孩」，也都像兄長一樣呵護他。他上清華土木工程系，為的就是「學好技術，報效國家」。有感於人世的偽詐，他在清華大學還組織了一個「率真會」，提倡人與人交往的率直真誠。他的同窗好友林庚^[21]、覃修典^[22]、張友齡^[23]、譚葆憲^[24]、劉迺桐^[25]等人都參加了，幾十個同學每月活動一次，共同修練道家功法。

1931年，「9·18」事變發生後，清華同學無比激憤，父親帶頭到南京總統府抗議並絕食。據父親說：當時絕食時間最長的是他、林庚和曾鼎禾^[26]3個人。絕食時，世伯于右任和大伯陳之碩都先後來看望、慰勉他們。絕食的第三天，蔣介石就出面接見了他們，並表示「將率師北上抗日」，以安撫憤怒的學生。

【20】 林勵如 (1889-1977)，我國著名教育家。時任北京師範大學附中校長。

【21】 林庚 (1910-2006)，字靜希，福建閩侯人，生於北京。1928年與筆者父親同時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附中，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後轉入中文系。與吳組細、李長之、季羨林並稱「清華四劍客」。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為現代詩人、古代文學著名學者，乃父親一生最好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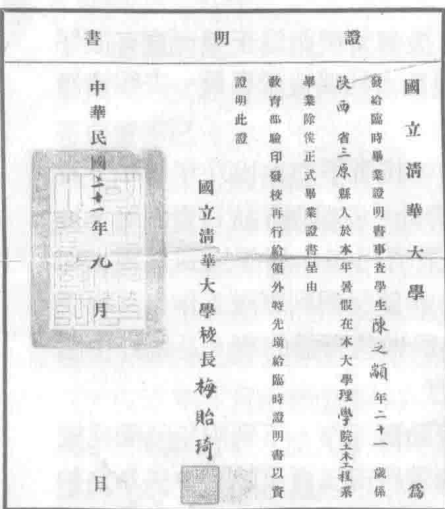
【22】 覃修典 (1909-1994)，湖北省蒲圻人。覃修典的父親曾參加武昌起義，在孫中山的統帥辦公處任職。1928年，覃修典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畢業後，與筆者父親同時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1934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學位，1936年赴德國柏林高等工業學院考察。1937年回國後，任教於清華大學。後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設計院院長。

【23】 張友齡 (1910-)，1932年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留學英國、德國。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總工程師長。

【24】 譚葆憲 (1910-2000)，生於北京市。1932年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鐵路工程專家，參加過皖贛和大秦等11條新線建設和京廣、津滬等4條舊線改造工程。

【25】 劉迺桐，1932年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水利專家，任職不詳。

【26】 曾鼎禾 (1910-1971)，四川華陽人。1932年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1938年赴法國留學系，後任南開大學數學系主任。



父親清華畢業證書

學高元白^[27]為褒惠渠落成寫了如下題聯為賀：

水一石泥數斗畝畝千頃

清半灣香百里衣食萬家

世伯于右任也專門寫信誇讚父親「不辭勞苦，造福鄉梓」。

1941年，父親調任陝西省水利局技正並兼西北農學院副教授，於《中農月刊》發表了頗具影響力的《陝西省農田水利工程概況及其可能發展》，至今仍被學界參考和引用。1943年父親參加了中國工程師學會組織的「國父實業計劃西北考察團」，先後考察了甘肅河西、寧夏

居延與新疆哈密、迪化、伊寧、塔城、阿爾泰、阿克蘇、焉耆7個地區，並與沙玉清^[28]合寫了《河西居延新疆水利考察報告》。1944年，父親受聘到「李儀祉農業職業學校」水利系任主任。

抗戰勝利，舉國歡慶。父親急於赴北平探母，無奈火車不通。直到1946年10月，父親攜眷由西安轉漢口、南京、上海，乘船至天津到北平，才見到近10年未見到的老母親。1947年6月，父親受聘南京水利部任視察工程師，先後踏勘浙江錢塘海堤，陝西洛惠渠和福建長汀灌田、寧德西陂塘、甫田、木欄陂等地。並於1949年3月保護了南京中央水利部的全國水利檔案，使之未受戰火焚燬。

同年底，父親受傅作義^[29]、李葆華^[30]之邀赴北京。剛受命擔任水利部部長和副部長的傅作義和李葆華，在全聚德為父親接風，他們擬請父親擔任水利司司長，父親極力推卻，說自己不善行政工作，只願意做工程，

[27] 高元白 (1909-2000)，陝西米脂人。1935年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歷任西安師範學院、西北大學教授，陝西師範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陝西文史研究館館長。專於漢語音韻學、文字學、漢語史。著有《漢語音韻學要略》、《古代漢語》等。

[28] 沙玉清 (1907-1966)，江蘇江陰人。1930年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1935年赴德國留學，後任西北農學院水利系主任。

[29] 傅作義 (1895-1974)，字宜生，山西臨猗人。係抗日名將，1949年1月，他響應中共「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的主張，率部起義，促成北京和平解放。後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長。

[30] 李葆華 (1909-2005)，河北省樂亭人。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之子，1949年後任水利部和水利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兼黨委書記等重要職務。

並推薦山東河務局的錢正英^{【31】}到部工作，後來父親與錢正英一直有很好的私交。很快，傅作義、李葆華即任命父親為水利部特派專員，去綏遠修建黃楊閘。

父親在渭惠渠完工後，因感於政府腐敗、抗戰不力，1937年曾私下資助樊雲繼^{【32】}、張清化^{【33】}等四位熱血青年奔赴「安吳堡」抗日青訓班，後來張清化當了周恩來的秘書。1950年初，張清化在水利部找到父親，和父親說軍隊條件好，可以給父親軍級職銜，希望父親到軍隊工作。父親表示：「中國的農民太苦了，自己願一生為農民做些有益的事，為搞好中國的農田灌溉作出努力。」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

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父親在綏遠日夜勤奮工作，不到兩年時間完成了當時全國最大的灌溉閘——黃楊閘，可澆灌農田三百萬畝。中央為之拍了紀錄片在全國播映，綏遠省政府給了父親獎勵，綏遠省領導人還寫了感謝信，如下：

陳專員之顛同志：

你奉部令，不辭勞苦來到塞外偏枯的綏西，大力協助我們進行水利工作，黃楊閘在你多方指導之下，鉅大的工程已接近完成，創造了綏遠水利上光輝的一頁。特別是你的吃苦耐勞，日以繼夜忘我的工作精神，給綏遠廣大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幸福，這是我們十分感激的。但是我們遠在省方，對你的艱苦生活未及照顧，對工作中的困難也不能及時解決，覺得很是抱歉。茲當黃楊閘工程即將告成之際，特向你致親切的慰問。為了勝利完成黃楊閘工程和順利地推行全部水利建設工作，希望你給我們更大的指導和幫助。並盼對工作中發現的缺點和存在的問題，多多提供意見，以便隨時改進。

順致

敬禮

董其武
楊植霖
奎璧
孫蘭峰

八月二十九日

(綏遠省政府給父親的感謝信原文影印件)

【31】 錢正英（1923-），浙江嘉興人。肄業於上海大同大學，1941年參加中共。曾任山東河務局副局長，水利部副部長、部長。

【32】 樊雲繼，不詳。

【33】 張清化（1915-2002），河北獲鹿人。1938年參加中共，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測繪局局長兼測繪學院院長。

遺憾的是，父親正忙於工程之際，祖母病危不治，於1951年11月5日殞天。父親自工地趕回為祖母送葬時，竟哭暈過去，對自己不能盡孝痛苦自責不已。

1952年，國務院成立「黃河規劃委員會」，父親擔任灌溉組組長，參與規劃了黃河46個梯級，包括鹽鍋峽、劉家峽、青銅峽等大工程的設計，以解決黃河流域灌溉問題，因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表彰。1954年，水利部成立北京水利勘測設計院，制定「海河規劃」，父親遂調入該院任副總工程師，參與規劃了密雲、十三陵、黃壁莊等工程，以解決京津灌溉問題。

1956年5月，一直堅持「君子不黨」的父親，在江國棟^[34]、范海波^[35]的動員下，加入了中共，但父親從不與家人提起此事。這不久，父親以「水土保持」為主的「流域治理」思想被蘇聯「長籐結瓜」的思想所批判。此時，水利部成立廣州水利勘測設計院制定「珠江規劃」。6月，水利部調蔡邦霖^[36]和父親分任該院正、副總工程師，解決珠江三角洲排灌問題。父親正好可以實現自己流域治理的願望。經過兩年努力，父親參與了規劃廣西西津電站和廣東南水、新豐江、楓樹壩等工程。

周恩來在南寧聽取了劉兆倫^[37]與父親的彙報，誇讚說：「珠江規劃做的很好，非常好！」並請他們一起吃飯，討論水土保持問題。1958年秋，趙紫陽又找父親談了廣東的水土保持問題，同時請中央將父親調給廣東，以創辦廣東水利電力學院培養人才（這件事我從未向趙提起過）。1959年6月，父親收到廣東省省長陳郁聘其為學院副院長（未聘院長）的任命書，即回北京向水利界汪胡楨^[38]、覃修典、謝家澤^[39]、陳明紹^[40]等友人請益如何辦好學院，順便也看望了當時在北京讀書的我。

[34] 江國棟（1909-1989），江蘇阜寧人。1934年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1949年參加中共。曾任水利部北京勘測設計院副院長、山東水利廳廳長。

[35] 范海波，不詳。

[36] 蔡邦霖（1895-1972），江蘇泰興人。1916年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曾於山東、天津、廣東從事水利工作，任職水利部水政司司長、測繪司司長。

[37] 劉兆倫（1920-），廣東大埔人。1938年參加中共，曾任延安自然科學院副科長、吉林和龍縣縣長，水利部廣州勘測設計院院長、廣東水利廳廳長。

[38] 汪胡楨（1897-1989），浙江嘉興人。1915年考入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20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習水利發電，1924年回國後從事水利工作和教學，曾任佛子嶺工程總指揮、水利部北京水利勘測設計院院長、北京水利電力學院院長。

[39] 謝家澤（1911-1993），湖南新邵人。1934年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1938年赴德國留學，回國後曾任工程師、教授，水利部水文局局長、水利水電研究院副院長。

[40] 陳明紹（1914-2009），廣東大埔人。1936年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著名能源環境專家。曾任北京工業大學教授、副校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母親為了照料6個孩子，直到1956年北京市教育局招聘中學教師，母親應聘考中，到北京六十三中當了語文教師。1959年父親正式調去廣東，5月便接母親和弟弟妹妹去了廣州。我因高考在即，便留在了北京。母親到廣州後被安排到廣東水利電力學院中專部任教。因母親普通話講的好，校方安排她給全校師生開普通話的講座，她的講座深受師生歡迎，母親因此還獲得了獎勵。

母親為了孩子，38歲才參加全職工作，但無論做什麼，都受到大家的喜愛和尊敬。母親一直奉行外祖母「生活從儉，待人從厚」的教誨。記得我們在讀書時，母親給孩子們每月發零用錢，小學一毛、初中兩毛、高中五毛，我考上北大後每月給二元。可是親戚朋友求助，母親總是慷慨解囊，有一次一個友人家有急用，母親把買米的錢都借出去了。想起母親含辛茹苦的養育之恩，心頭總是不斷湧動著「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情懷。

1-3 快樂無憂的童年生活

我出生半年後，為節省開支，母親帶我從成都到了漢中，和父親住在一起。那時，因為抗戰，各種物資供應嚴重不足，百姓生活十分艱難。父親的薪金除了養育我們母子，還要奉養祖母，按月歸還求學時的借款，不時還要接濟窮困的職工和學生，日子過得並不寬裕。雖然我出生時不足月，但由於母親的精心呵護，她用開水泡饅也把我養的白白胖胖。父親在西北農學院任教時，我有了大妹一諾。

從4歲開始的兩年時間裏，母親對我進行了嚴格的童蒙教育，並把我送進了私塾，從《百家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弟子規》「弟子規，聖人訓」、《神童詩》「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到唐宋詩詞、《二十四孝》、《大學》、《中庸》。每天塾師和母親都給我規定背誦的段落，如果背不下來，就不許吃飯，還得打板子、罰跪，直到背會為止。

至今我還記得母親給我講解《三字經》、《弟子規》時的情景。如，母親講到「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時，就說了不少從小好好學習，才會有出息而不會變壞的故事，鼓勵我「自強不息」；講「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時，先後用了三個月時間，邊講解邊指教，告訴我怎麼作才是「孝、悌」，怎麼作才是「謹、信」，等等。母親望子成龍的教誨，使我永難忘懷。

母親還在門前做了一個兩尺見方的沙盤，每天下班後教我在上面寫字、畫畫兩小時，還教我唱「九一八」、「長城外」、「滿江紅」等愛國歌曲，讓我練笛子、洞簫、口琴、二胡。每天還給我講一段「孟母三遷」、「孔融讓梨」、「岳母刺字」這樣的故事。想起背誦「《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教誨，還覺得幼時的童蒙教育，對自己一生受益無窮。

母親還教我怎麼「對對子」，從一字對到兩字對、三字對、四字對、五字對，直到十字對、二十字對。比如：「天」對「地」，「日」對「月」，「大地」對「長空」之類。至今還記得兩幅有意思的對子：一幅是，我上小學時，母親出了一聯「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讓我對，我對不出來，母親說：「師臥龍友子龍龍師龍友」。我上初中時，母親又出了一個鑲名字的對聯，我還是對不出來，對聯是：「一擔重泥（諧音『仲尼』）攔子路（指『子路』），兩岸夫子（指『孔子』）笑顏回（指『顏回』）」，這一類教育很開小孩子的腦筋。

父親總是笑咪咪地在睡覺前，給我講「唐僧取經」、「大鬧天宮」、《三國》、《說岳》和一些名人故事。我聽完一個還纏著父親再講一個，直到呼呼睡去。每到週末，父親就會和母親帶上我與妹妹去玩。有時，父親划船母親吹簫，引得遊人們駐足傾聽；有時，帶我們看古跡，講歷史上的故事；有時，帶我們到果園，飽餐鮮美的水果。父親高興起來，就親熱地叫我「憨兒」，叫妹妹「木糶頭」。

我那時既聰明又淘氣，是個「孩子王」。一天，母親從「儀祉農業職業學校」兼職教英文下課回家，聽見我和幾個小朋友手拉手，帶頭一邊跳一邊唱：「人之初，狗咬豬，性本善，狗咬蛋」，氣的不由分說拽起我就回家，責備我為什麼不學好，把我摀倒在床上，直掐得我大腿根發紫，一個星期走路都疼。母親的說法是，孩子的腦袋和四肢不能亂打，但掐大腿根是要讓我長記性，一個人從小就不能學壞。

記得還有一次，幾個小朋友在水塘邊玩，大家都很好奇鴨子在哪兒下蛋，我和不到三歲的妹妹說，你下去撈個鴨蛋吧。她剛一下去就陷在稀泥裏了，我趕忙伸手拉她，也掉到了塘裏，變成了「泥猴」。大人把我們救上來送回家，我又被母親揍了一頓。農校的葡萄熟了，我帶著幾個小朋友鑽到架下去偷吃，也許過熟的葡萄發酵了，大家都吃醉睡著了，直到晚上家長們才發現，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那時，小朋友們最愛玩的遊戲，是鑽到防空洞裏捉迷藏、抓漢奸和打日本。無論是在武功還是在西安，都挖了許多防空洞，還能從這個洞鑽到

那個洞，有時玩的太高興就不知道鑽到甚麼地方去了。我總是中國一方的「將軍」或「元帥」，頭上帶個紙做的將軍帽，腰裏斜挎一把木頭的軍刀，手裏拿一把木頭的盒子炮，玩得十分盡興。就是有時還要把一些嚇哭的小女孩，哄著送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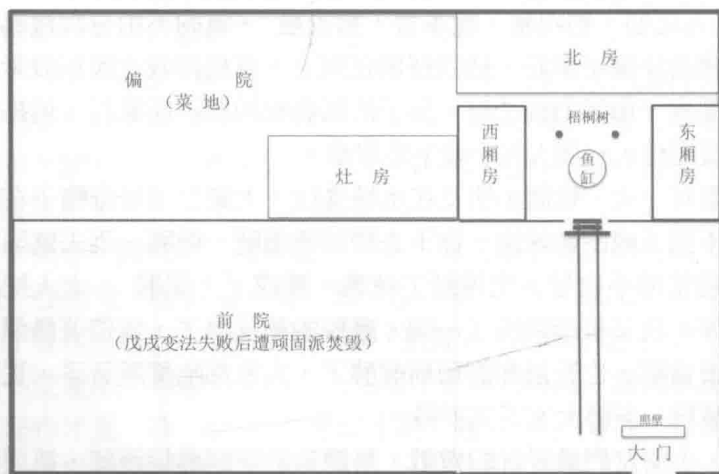
也許白天玩的太瘋了，每天夜裏我都會作各種夢，忽然尿憋的不行了，趕快到處找廁所，好不容易找到了，尿得很舒服，結果是尿了一床，害得母親每天早晨都得給我曬床墊。幸好農校的幾個農工都喜歡我，瓜果一熟就讓我去吃，還送到家裏來。母親也能從他們對我的誇讚中得到不少安慰，也常回贈他們一些食品和衣物，大家處的很融洽。

兒時那些快樂無憂的日子，讓人想起來總是回味無窮。

1945年「8.15」，日本投降了，抗戰勝利了！家家戶戶都高興地放起鞭炮慶祝。趁著農校放暑假，父母帶著五歲的我、三歲的妹妹一諾和不一歲的弟弟一諫，一起回到三原縣祖居東關石頭巷一號（見陳家祖宅平面圖），看望祖父的弟弟四爺陳仲哲與四婆和五爺陳月波與五婆。

一進門，照壁上一個大大的「福」字，上邊掛滿了金銀花。前院一片荒蕪，長滿了野草。父親說，當年頑固派認為祖父是維新派的首領，縱火燒了祖居。當年火燒的遺跡在西牆和北牆上仍依稀可見。

進入中門，裏面的小四合院收拾的很整潔，院中有兩顆高大的梧桐樹，正中北房住著四婆和三伯的兒子四哥陳一謙、十姑的女兒大表姐李仁，東廂房住著五爺、五婆和十二叔陳之頌，我們全家住在了西廂房。北房和西廂房之間有一個門，出去的偏院除了三間灶房外，種滿了菜。四婆



陳家祖宅（平面圖）：三原東關石頭巷一號

和五婆每天都給我們做很多好吃的，還崩梧桐豆給孩子們吃。晚飯後，父親就會即興跳起新疆舞，引得孩子們也跟著高興地跳。

四哥給我教了「疊紙炮」，而後藏在門背後，大表姐一走過，我就跳出來「砰」地把紙炮弄響，嚇得她嗚哩哇啦亂叫。自然，四婆會把四哥和我訓上一頓。那時，五爺看我身體不夠壯，早晚兩次教我練「騎馬蹲襠」，開始每次十分鐘，一周後增加到每次二十分鐘；還在我小腿上各綁一塊薄鐵做的「馬甲」讓我跑步，鍛煉腿部的力量。回頭想想，多虧兒時的這種訓練，才使我能經受得起後來的種種磨難。

1-4 「氣平事更久 心曠得春多」

父親回儀祉農職上班去了。母親帶著我、一諾和一諫兄妹三人到三原北城外祖父王曙樓家過中秋。從東城到北城要經過「龍橋」，龍橋中間路兩邊都是做「獅子頭」和各種燈籠的店舖。龍橋上下各一個「之」字形的河坡，河坡兩邊的路很不好走。外祖父辭官回鄉後就住在北城西社巷1號。大門口蹲著一對石獅子，門上一副楷體的對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見外祖父故居平面圖)

走進大門，過了照壁和過廊進入中廳。院中魚缸裏養著睡蓮和金魚。正廳3間，上邊還有一個小閣樓，東西廂房各3間。正廳中央掛著一幅對聯，斗大的10個字：

氣平事更久 心曠得春多

抬頭寫的是「曙樓學長兄法家正之」，落款是「于右任」。據母親說，是外祖父1937年憤而辭官時，于右任送的。

外祖父平日裏沉默寡言，生活規律。早晨起床後，先去園中澆菜、澆花、拔草，早餐後讀書、看報、寫字，書房正中掛著岳飛「還我河山」的拓片，下午則因公出門，或訪友會客。只有請親戚朋友來歡聚時，外祖父才會有說有笑。

母親帶我們三兄妹住在外祖母張惠芬的東廂房，房中掛著戊戌重臣宋伯魯^[41]題書的對聯：

真輔相才葵向日

大光明地月當門

外祖母的房間收拾的井井有條。睡在熱烘烘的暖炕上真是舒服極了。

[41] 宋伯魯(1854-1932)，字芝棟，陝西醴泉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入詞林。與楊深秀合疏彈許應騷阻撓新政。戊戌政變後，遣回原籍，致力詩、畫，山水專攻王時敏，花卉具陳淳、徐渭風韻。書則參合柳公權、趙孟頫。著海棠仙館集，《畫人軼聞》、《清畫家詩史》。

第二天一早，外祖母挎了一個菜籃子，拉著我到東邊的園子裏。原來從北房和東廂房的門出去，有一個近二畝的東院，除了十幾顆棗樹，種的都是耐冬的菜。外祖母帶我挖了兩根蘿蔔、拔了一顆白菜，放到灶台邊。而後帶我轉到偏院和後院，中廳和東院之間有一條寬約八尺、長約三丈的過道，過道東邊是灶台，有兩口大鍋，往北排著八口大缸，這是每年過年時才用的。

過道最北邊有個西門，出去就到了偏院。偏院東北有兩間管家房，東南有一棵很高的皂角樹，偏院西北有三間茅草屋，用於儲藏。屋前正對著一個小門，出去是三畝大的後院，種滿了紅棗、石榴和各種花木。後院西北門進去還有一個小院，東西北邊各有三間小房，外祖父住東房，舅舅王安住西房。這個小院土改時分給了貧農喬德昌。外祖母告訴我，想玩的時候就可以到後院，這裏蚰蚰、八猴很多。

外祖母拿的籃子裏裝滿了從後院摘來的石榴和紅棗，讓我們美餐了一頓。外祖母五十出頭，烏黑的頭髮、白皙的皮膚，加上慈眉善目、和藹可親，讓人喜愛尊敬。一有空，外婆就給我教民謠、講故事。這時，在西安上高中的舅舅王安放假回家。家裏頓時熱鬧了起來，舅舅經常給我講各種故事，還帶著我一起捉蚰蚰、鬥八猴、打兔子，好玩極了。一次玩「捉迷藏」，外婆把我藏在了麵缸裏，舅舅沒找到我，直到吃晚飯，都沒見我的人影兒，外婆打開麵缸，見我竟蹲在裏面睡著了。

舅舅住的房子門前，放著幾十個蚰蚰罐。他告訴我：古人說養蚰蚰「聽鳴忘倦，觀鬥怡情」，兩隻小蟲張牙舞爪，英勇無前，攻守有據，勝者鼓翅長鳴，敗者落荒而逃，實在妙趣橫生。然泥土中者不如老牆中者，不蒙頭者不如蒙頭者，腐骨中者不如毒蟲把門者，最好的是大八厘的「紅頭



外祖父故居（平面圖）：三原北城西社巷一號

金背拉拉腿」。舅舅說的讓我垂涎三尺，每天還鬥上幾對讓我看，我連睡夢中都常常在抓蚰蚰。

鬥八猴就簡單多了，黃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圓洞，洞的上邊有一個軟蓋，用「咪咪毛」一逗，八猴就出來了。大一點的八猴像個大蜘蛛，嘴上長兩隻像鋸齒一樣的牙，整個身子都是棕紅色，一個滾圓的大肚皮，翻過身來肚皮上還似乎寫了個「王」字，把大小差不多的兩隻放在一起，就會互相掐起來，鬥的不可開交，直到一方被咬破肚皮，另一方才會停嘴。

舅舅還帶著我去打兔子。幾條獵犬在前邊開道，人小心翼翼的跟在後邊。可惜每次都還沒見到獵物，我就累得倒在路邊睡著了。但兩次晚餐時，都吃到了舅舅打來的兔子肉。舅舅還和鄰居的青年人一起套狼，只有一次我看見他們套到一隻小狼崽，小狼崽叫起來很像小孩哭，就又讓他們給放生了。那裏，家家戶戶都在牆上用白粉畫滿了大白圈，據說狼看見這些白圈就會嚇跑。

一到臘月，外祖母就帶著家裏的女眷們忙碌起來了。她們為過年作各種準備，一籠籠的饅頭、花卷，一屉屉的各種包子，炸的麻花、麻葉，鍋盔^[42]、石頭饊，上百個蓋碗的菜餚，真是饞人！當地民間的風俗，從臘月二十三過小年到正月初一過年，因為灶王爺上了天，家家都吃已經做好的飯菜食品，不再燒火做飯。親朋好友相互拜年，請人吃飯也都是熱已經做好了飯菜。

從臘月二十三開始，孩子們就都換上了新衣服，三五成群地拉起手，歡快地一邊跳一邊唱：「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家家戶戶放鞭炮。耍龍燈，搖旱船，舞獅子，踩高蹺，大頭和尚哈哈笑。逛廟會，真熱鬧，艷花燈，爭著俏。放風箏，一個更比一個高！」大年三十，晚輩向長輩辭歲，長輩給 12 歲以下的孩子們「壓歲錢」^[43]。家家戶戶都掛起紅燈籠，貼上對聯。這是孩子們一年中最開心的日子。

過了初一，縣城裏的廟會開始了，四鄰八鄉的人都去看熱鬧。母親讓舅舅背著我，過龍橋到廟會去玩。廟會裏人頭攢動，好不熱鬧，看西洋景、耍把式，吃麥芽糖、吹糖泡。回來時，舅舅還給我買了個蓮花燈，又興致勃勃地為我紮了個虎頭風箏，放的老高。正月十五賞月吃元宵，外祖

[42] 鍋盔 (英文: guokwei), 又叫鍋魁、鍋盔饊、乾饊, 是陝西關中地區城鄉居民喜食的傳統風味麵食小吃。鍋盔源於外婆給外孫賀彌月贈送禮品, 後發展成為風味方便食品。鍋盔整體呈圓形, 直徑尺許, 厚 1 寸, 重 5 斤。料取麥麵精粉, 壓稈和麵, 淺鍋慢火烘烤。外表斑黃, 切口砂白, 酥活適口, 能久放, 便攜帶。省外編成的順口溜「陝西十大怪」中, 有一怪為「烙饊像鍋盔」, 指的就是鍋盔。

[43] 陰曆年時長輩給 12 歲以下孩子的錢。

母會出好多謎語讓大家猜，她抽著水煙袋，笑咪咪地說：「麻屋子，紅帳子，裏邊住個白胖子。打一物？」

話還沒說完，小孩子們就會搶著說：「花生！」外祖母就每個人獎一塊糖。她又說：「外國進來一隻船，船裏有水船外乾，孔明定下燒船計，只燒貨物不燒船。打一物，猜猜看，是什麼？」幾個孩子誰也猜不著，外祖母向我搖搖手裏的水煙袋，我趕忙說：「水煙袋！」外祖母獎了我一塊糖。大人飲酒賞月對對子，小孩放炮遊戲猜燈謎，一直玩到深夜。

1-5 從陝西輾轉到北平看望祖母

1946年9月初，我6歲時，父親聽說京漢線通車了，於是辭掉工作，與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弟弟前往北平探望祖母。東出潼關的鐵悶子車，又髒又擠還不通風，車廂內污穢的更是讓人喘不過氣來，乘客或站或蹲或臥。母親坐在行李上，我是大孩子，負責照顧妹妹和弟弟。幸虧這一系列鐵悶子車，走不遠就停半天，大鐵門一打開，乘客紛紛跳下車透氣。火車一鳴笛，大家又爭先恐後地擠上車。

車剛出潼關就又不走了。大家都下了車，才目瞪口呆地看到了從未見過的慘像：月台上坐滿了傷兵，十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躺在地上。父親一問才知道，這些受傷回鄉的官兵因鐵悶子車裏擠不下，不少人坐到車廂頂上，車一過山洞就給軋死了。中國人是真可憐啊，這個場景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車到鄭州又不走了，往北的京漢線不通，父親探母心切，只能乘火車南行往武漢繞道而行。

在武漢，父親帶我們拜會了在武漢大學任教的大表伯吳宓和武漢行營孫蔚如將軍及其秘書長李百川^[44]。乘江輪東下南京，住到了張府園大伯父陳之碩家。其時，大伯父已蒙冤入獄，大伯母楊筠仙帶著三哥陳一詢、四姐陳一誠住在這裏。第二天，父親帶我去看望獄中的大伯父。給大伯父叩頭後，他拿了兩塊糖給我。大伯父雖蒙冤獄，但態度坦然、談笑自若，多次謂「吾無愧於國家民族，請老母與家人放心」。父親則執禮甚恭，泣涕不已。

接著，又去拜會世伯于右任。一見面，父親說「諮兒，給于大伯磕頭」，老人家隨即拿出三原名產水晶餅、蓼花糖給我吃，他那過胸的長鬚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父親拜託于大伯關照大伯父，于大伯很無奈。後

[44] 李百川(1891-1968)，陝西三原人。辛亥革命時參加陝西新軍起義，任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府書記官，旋任護國軍總司令部書記官，直至「雙十二事變」任楊虎臣部秘書長，後任孫蔚如第四集團軍司令部秘書長，官封中將。為筆者十姑父李子俊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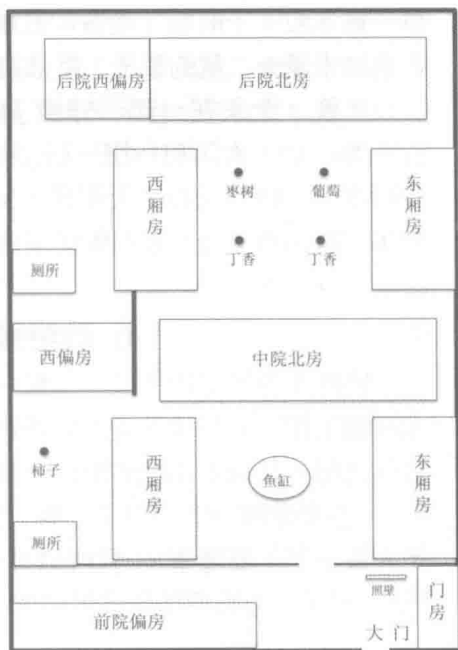
來父親告訴我，大伯父原來一直在於大伯手下做事，故而於大伯深知大伯父的為人與氣節，但對軍統插手的事很難說上話。大伯父去世後，于大伯深為惋惜，還幾次去看望過大伯母。

從南京到上海，見到了大哥陳一訥和大姐陳一詠。父親省母心切，很快買了到天津的船票。從上海到天津的小海輪，顛簸的十分厲害，幾乎所有的人都往「嘔吐袋」裏不停地吐著，有的人把胃液都吐了出來。我倒沒什麼事，出於好奇，不停地跑到船頭、船尾、船舷，四面觀看那一望無際的蒼茫大海。十月底，輾轉了差不多兩個月，我們總算到了北平，拜見了從未見過面的祖母。

祖母這時已七十有六，見到兒子雖老淚縱橫，卻不失大家風範。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都換上整潔的衣服，先祭拜祖先，接著祖母帶大家禮佛，而後依長幼次序給祖母磕頭。祖母先給了母親見面禮，又給我和妹妹、弟弟一人一個小紅包。接著，祖母給我們講了些居家注意事項，我似懂非懂地聽祖母在唸叨朱子、顏氏家訓裏的話。顯然，老人家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熏陶的女性。

祖母家教的嚴歷，讓我永生難忘：全家吃飯時，12歲以下的小孩子是不能上大桌子的，一齊圍坐在一個小桌子邊。一人一碗飯，菜蓋在上邊，吃完後還得坐著，姑母過來檢查飯菜吃乾淨沒有。而且，可以和大人一起吃飯的孩子，大人不動筷子，孩子不能動；孩子的筷子不能從大人筷子的上下穿過；喜歡吃的東西不能連吃三口，等等，規矩很多。

一次吃完飯，「諮兒，不要走」姑母說著，走到祖母身邊耳語了幾句，祖母沉下臉來叫我過去。我膽怯地走到祖母身邊，祖母從頭上取下髮簪，二話不說在我嘴上紮了三下，我強忍住淚看著祖母。祖母卻把我摟進懷裏說：「哪個孩子吃飯掉一粒米，嘴上就要扎一針，你姑母早已交待了吧？你怎麼碗裏還剩了三粒米！」又從懷裏摸出三塊糖給我。從此一直到老，我吃飯再也沒掉過一粒米。



祖母故居（平面图）：北京前园恩寺9号

那時，祖母住在前園恩寺9號小四合院中。大門門柱下蹲著兩隻小石獅子，黑漆剝落的大門上隱約可見「忠厚傳家久 詩書繼世長」10個大字，進門右側一個門房，左側小前院3間南房，進二門中廳3間，左右廂房各兩間。左邊側門進去偏院有兩間北房。左右兩邊過道均可進入後院，後院正房三間，西側連著一個小屋，左右廂房各兩間，院內種兩棵丁香，還有一個葡萄架。（見祖母故居平面圖）

除了祖母、姨婆、姑母、姑夫，其他長輩、孩子，我當時還難以辨認，但全院的人都相處的和樂融融。不久，我在北平過了一個兒時最熱鬧的年。從臘月初五全家吃五豆，臘八喝臘八粥，到臘月二十三「祭灶」過小年，一天比一天好玩。民謠說：「二十三，糖瓜粘，灶王爺上天，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灶王爺和灶王奶奶的畫像供在鍋台上邊的灶牆上。

臘月二十三剛貓黑，父親帶頭和家裏的男丁擺上供桌，點燈焚香跪拜，揭下灶王爺神像，把灶糖抹在灶王爺和奶奶嘴上，連同秸桿扎的馬、狗、雞一起燒「升天」，鞭炮齊鳴為之送行。孩子們都換上新衣服，滿嘴粘著麥芽糖做的「灶糖」，東跑西顛地放炮竹。

從第二天開始，女眷們換窗紙貼窗花，除浮塵掃房子，蒸饅頭、炸麻花，殺雞宰鴨。男士們則貼春聯、沽老酒、購年禮、請灶神。大年三十夜，貼了門神放了炮，全家一起包餃子吃餃子，當然少不了給新請的灶神供一盤水餃。子時前，晚輩向長輩辭歲，孩子們要給長輩磕頭，每個長輩都會給未滿十二歲的孩子「壓歲錢」。

而後，全家在一起「守歲」，桌上放著各種點心水果。雖說「大年三十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小孩子們鬧了一天熬不住就睡了，大人們則聊天打牌到天亮。天剛亮，父親就會把我拉起來，出門給親戚和長輩拜年。以前和父母一起過年從沒這麼熱鬧過。

1-6 聰明頑皮的「孩子王」

1947年春節過後不久，二妹一謙降生了。1947年5月，父親要到南京水利部工作。父母帶著兩個妹妹和弟弟去南京，把不到七歲的我留在北平陪伴祖母。父母走出門的瞬間，我眼淚差點奪眶而出，覺得「爸媽不要我了」，心裏好像一下子沒了依靠。姑母看我站在門口發愣，說：「諮兒，你是大孩子了，要懂事。」我醒過神來，連忙說：「姑母，我挺好的！您放心吧。」可是，心裏還是覺得很失落。

中國有句俗話：「七歲八歲狗都嫌」。指這個年齡的孩子活力旺盛、求知慾強、充滿好奇心，惹貓逗狗閒不住。偏偏我又自小主意多、膽子大，每天都給管照著我的姑母惹麻煩。姑母把我送入附近的前園恩寺小學讀書，有老師管束，好了幾個月，熟悉環境後又調皮起來了。因我發蒙早，各科成績好，不僅語文、算術成績總是全班第一，而且圖畫和體育成績特別優異，又成了班上的「孩子王」。

一下課，小朋友都圍著我玩，作各種遊戲。因為五歲時父親給我買了《芥子園畫傳》，以後每天塗抹幾張。到上小學，什麼花鳥魚蟲、老虎獅子、古今人物，我已經畫的有模有樣了，我就給他們每人畫畫。我個子不高，體質不強，但五歲開始每天早晚練「騎馬蹲檔」，走路時小腿綁過「鐵甲馬」，所以跑的很快，班上的同學都跑不過我。班主任張淑英老師也特別喜歡我。

我很得意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學校二、三年級幾個「小痞子」下課後，總欺侮學校一個漂亮的小女生，一下課就攔住她，還說些流氓話。我實在看不慣，就挺身而出「英雄救美」，每天下課把她送回家。誰知那幾個小痞子下課後，就到我家門口罵人，跟我找碴打架。嚇得姑母讓我轉到南鑼鼓巷小學上學了。我很失落，父母離我而去了，姑母也開始煩我了。

其實，每個孩子都有一個自己純真神妙的想像世界。這時我迷上了各種童話故事、神話故事、民間故事、探險故事和俠義故事，每天都和幾個小朋友一起講這一類的故事，講得自己似乎也能飛簷走壁、擒魔除妖了。那時，我一個人住在後院西偏房裏，夜裏不是夢見自己在行俠仗義，就是夢見妖魔鬼怪追著抓我，夢著夢著就尿床了。因為怕姑母知道，就悄悄把床墊蓋起來，房間裏總是弄得臭烘烘的。

我開始逃學，和幾個調皮的小朋友一起折騰，去北京城外的窯坑釣魚摸蝦，到亂葬崗子抓蚰蚰，拿到安定門內的小市上賣些錢，租各種故事書看。後來，我又每天做十幾個馬糞紙的拉線小人，有孫悟空、關公、岳飛這些人物，三、五分錢一個賣給小同學，換的錢租書看。晚上就和幾個小朋友一起講故事，什麼「鴻鈞老祖和鬼臉教主」啦，「大人國和小人國」啦，講得雲遮霧罩的唾沫橫飛。

一天，我正在後院種玉米，我保護過的那個漂亮小姑娘找上門來。她說：「北平要打仗了，我和父母要搬走了。」說時眼淚汪汪的，還遞過手絹讓我擦汗。我剛擦了一下，她突然「撲」在我臉上親了一口，我還沒反應

過來，她已經跑了。我拿著她的手絹愣在家門口，直後悔沒問一下她叫什麼，搬到哪裏，心裏感到很失落，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內心衝動。

北平並沒有打仗，就和平解放了。

學期末，因我曠課太多，老師告到家裏，姑母非常生氣。當晚不讓我吃飯，還要罰站。姑母在故宮博物院當研究員，畫得一手漂亮的工筆畫，寫得一手工整的「瘦金體」^[45]。第二天，姑母帶我到她上班的故宮博物院，監督著給我補課。姑母佈置的作業，我一般兩個小時就作完了。我就故意把告狀老師的「師」字寫成「獅」，姑母罰我寫了一百個「師」字。但不到半個月，我就把近一學期的課補完了。

姑母很高興，見我挺聰明，又愛看書，就給我找來《說岳》、《說唐》、《三國》、《封神》、《西遊》等書，我饒有興味、似懂非懂地都讀完了。這年的暑假，每天上午我自己看書，下午練字、畫畫。下班前姑母帶我參觀故宮，不僅看了開放的中路、東路、西路和御花園，而且還看了不對外開放的各種宮中寶藏。從這時開始直到初二，我幾乎看遍了能找到、租到的各種神怪俠義章回小說。

1949年秋季開學，姑母把我送到離家最近的弘仁小學就讀。這時北平改稱為北京。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我還代表小朋友們到天安門廣場去「觀禮」。年底，父親調到北京水利部當專員，母親也帶著妹妹、弟弟回來了。兩年多不在父母身邊，心裏總覺得少了個依戀，這回可好了。誰知沒過多久，父親又要出差了，母親帶著四個孩子很吃力。祖母已快八十，還要靠姑母照顧。父親於是把母親和孩子送到三原北城外祖父家，這樣外祖母可以幫母親照應幾個孩子。

外祖父家比先前冷落了許多，舅舅王安參軍去了新疆，家裏一個成年男丁都沒有。外祖父明顯老了，外祖母也消瘦了許多。我們的到來，給家裏平添了許多生氣，兩位老人自是高興。外祖父每天早晨給我教一小時大楷和小楷，主要是學「永字八法」^[46]。我本來是個左撇子，外祖父便教我如何用兩手同時寫字。外祖母則每天帶我幹一小時農活，鋤地、移苗、澆水，還學著擠羊奶，給我講「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外祖父還是三、五天就會和一些老朋友，海闊天空地談論天下大事，秋冬在房間裏，夏天則在附近的打麥場上。老人們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很不滿，對蔣介石的「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也抨擊甚多；對毛澤東提出

[45] 瘦金體：宋徽宗（趙佶，1082-1135年）創造的書法字體，亦稱「瘦金書」或「瘦筋體」，是楷書的一種。

[46] 永字八法，是中國書法用筆法則。以「永」字八筆順序為例，闡述正楷筆勢的方法。

的「自由民主新中國」，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則頗多讚許；但對共產黨的「殺富濟貧」有所恐懼。許多鄉黨鄰里倒是都聽得津津有味。

我那時聽老人們說幾句也不放在心上，每天都和小朋友們一起鬥蝻、玩八猴、掏鳥蛋、捅蜂窩、逗蜈蚣、抓蠍子，經常一天會讓蜜蜂、馬蜂、木頭蜂和一些毒物，把10個手指和臉上都螫的紅腫腫的。母親心疼我，老給我螫腫的地方塗些醋消毒，可也氣得沒辦法，外祖母倒是總勸母親不必介意，說男孩子小時候都是這樣，不調皮長大沒出息。也許後來我的免疫能力特別強，和當時那些毒液的「饋賜」或許有些關係。

1951年，土改工作隊進駐了。因為外祖父替族孫女代管了100畝地，被劃成了「地主」成份。但因外祖父是「開明紳士」，係「統戰對象」不宜戴帽，家人除舅父王安參軍外又無成年男丁，故由外祖母戴了「地主帽子」。外祖母既要一年出席幾次「光榮軍屬」的祝賀活動，又要一年參加幾次「四類分子」的訓話活動。回想當年的中國，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場景恐怕在全國各地都不少見吧。外祖父的乾孫女王秋芳，因覺得對不起老人家，竟自此精神失常了。

土改工作隊的隊長叫李友三，看我是個孩子王，就讓我當了「兒童團長」，把幾十個七、八歲到十一、二歲的孩子組織起來，胳膊上綁個紅布條，手裏拿根棍子，輪流守在各個路口盤查過往行人，看有沒有形跡可疑之人，查有沒有人轉移財產，破壞土地改革。不到三個月，新鮮勁過去了，孩子們覺得沒意思了，慢慢也都不來了，這個兒童團也就無形解散了。

1-7 《灰姑娘》讓我蒙羞

我當時插班到了三原北城普育小學。每天中午下課，我就組織小朋友做各種遊戲，踩方、夾包、搨三角、捉小雞、拔河，鬥牛、掰手腕。下午放學，小朋友都喜歡聽我講故事，每天差不多講半個個鐘頭，講了一年多，什麼「說岳」、「三國」、「說唐」、「薛家將」、「羅家將」、「楊家將」等等，但小夥伴們最愛聽的還是「小麻子」戲弄老師的故事。周末的時候，大家還會一起進城聽說書、看鬥雞。同班的小朋友上晚自習，都提個小煤油燈。我沒有，只能摸黑去，很想買一個。母親說，你的壓歲錢有一塊三，還差一塊二，你去揀麥穗湊吧。我於是揀了一夏天麥穗，賣了一塊五，總算買了一個自己的小煤油燈。

每逢夏天，我們就下河坡到清峪河去游泳、打水仗；秋天一到，就玩捉蚰蚰、鬥八猴；冬天在一起堆雪人、擠暖和；春天則踏青、遠足。母親還會帶我和大妹妹，在小麥返青以後，挖薺菜；連綿陰雨以後，撿地軟、找蘑菇。

那時候，似乎一年到頭的日子都是豐富多彩、快快樂樂的。

可「土改」分了外祖父的房子以後，母親怕惹事，1951年夏天帶著四個孩子搬到了西安，和姨媽王毓華一家住在了一起，相互可以有些照應。我則插班考入西師附小讀五年級。第二年夏天，三妹一謀出生了。

姨媽王毓華（1916-1971）嫁給了王芾南，他們倆人均長期從事教育工作，育有二子一女，長子王潤民、長女王孝蘭、次子王新民。姨夫王芾南有一段傳奇的經歷：他1926年加入中共，曾任陝西省學生聯合會主席、華縣地下縣委書記、中共陝東特委委員。1928年領導了震驚中原的「渭華暴動」^[47]，後任渭南中心縣委書記、陝西省常委、組織部長，並輸送了一批骨幹到陝北。1932年，他到馮玉祥部汾陽軍校任地下黨委書記，繼任抗日同盟軍二師政治處長兼該師中共地下黨委書記。

後來，王芾南參加了馮玉祥、吉鴻昌領導的抗日反蔣活動，1934年在北京被捕押送南京，兩年後經馮玉祥保釋出獄，繼續在馮部工作。1938年因眼疾返陝，從事了教育工作，曾任西安師範學校校長。後來，在「反右」時以「誣蔑黨的政策，讚揚右派言論」等罪名劃為「右派」，每月只發不到30元的生活費，子女均受到不公平對待，直到1979年才予平反。

我插班進入的西師附小，是西安當時最好的小學，教師都很出色。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當屬教「自然」的老師張俊德，他先後發明了「月地運行儀」（又叫「三球儀」）和「風雨實驗器」，是他使我最先愛上了自然科學，我經常跟著他做各種實驗。不久，他調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了，臨走前送了我一套「自然小知識」。經他的啟蒙，我開始沉迷在各種自然科學的小實驗裏。

就在這時，我做了一件糊塗的事情：每天放學我都到一個兒童書店，看一小時書再回家，有一天，我看正讀一本安徒生的童話故事《灰姑娘》，被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一個小時過去了，但還有一半沒看完，我不知不覺一邊看著一邊往門外走，剛出門就被抓住了。店主說我「偷書」，慫我怎

[47]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陝西省委號召共產黨員到農村去，到軍隊中去，準備力量，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統治。1928年3月，省委決定在黨的力量強大、群眾基礎較好的渭華地區發動起義，以西安東部為暴動區，成立中共陝東特委，省委常委劉繼曾兼任書記。省委書記潘自力到渭華地區佈置檢查，準備在5月初組織農民起義。王芾南則是「渭華暴動」的實際領導者。

麼辯解也沒有用。書店於是告到學校，老師把我領走後送回了家。母親為此大為惱怒，罵我丟了陳家人的臉，生氣地把我趕出了家門。

我也很懊惱自己怎會如此，就在街上漫無目的地亂走著。深夜一點鐘小心翼翼地回到家，母親仍不給我開門。我無奈地只好走到學校門口，坐在地上迷迷糊糊睡著了。第二天早晨，班主任帶著我回家，對母親說：「這孩子一直品學兼優，可能看書入了迷犯了錯，不必過份責備，記住這個教訓就好了。」母親還是認為我敗壞了門風，很長時間不給我好臉。我也很羞愧，心裏揹上了沉重的包袱。

轉機出現在 1953 年春節前，父親接我們回北京。回京前，父親帶我向西安的長輩辭行，記得有戊戌重臣宋伯魯之妻宋婆、于右任之妻高仲林——于大婆、孫慰如伯伯、茹欲立伯伯、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高元白伯伯（筆者義父）等，及二爺李百川、十姑夫李子俊和十姑陳玉潤。接著，到三原看望了外祖父和外祖母，走時外祖父還送了我一棵棗樹苗。

最讓我忘不掉的是，父親從北京來接我們時，給我帶來了一套五十位名人的故事系列，每本七、八十頁。這些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一有空我就讀幾頁，一天平均可以看兩本，到北京的時候，我已經全部都看完了。他們高貴的品質、深邃的思想、不朽的業績、超凡的毅力和奮鬥的精神，從那時起就銘刻在我的腦海裏。以後，他們的傳略、業績和作品成為我讀書的重點。這些名人是：

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孫子，莊子，屈原，司馬遷，諸葛亮，李世民，玄奘，文天祥，史可法，釋迦牟尼，耶穌，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凱撒，但丁，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哥白尼，伽里略，洛克，莎士比亞，笛卡兒，伏爾泰，盧梭，歌德，莫扎特，貝多芬，巴爾扎克，雨果，安徒生，達爾文，托爾斯泰，普希金，泰戈爾，牛頓，瓦特，愛迪生，弗蘭克林，諾貝爾，羅蒙諾索夫，哥倫布，華盛頓，拿破侖，林肯，甘地。

那時祖母雖已去世，北京家裏卻人丁興旺。大娘一個人住在前院西廂房，待人和善親切。三伯父一個人住在偏院，人雖較孤僻，但對孩子們很好。七伯一家住前院正房，有四個孩子，七媽熱情好客，四婆和他們住一起。姑夫、姑母住後院東廂房。我們一家七口住在後院正房。十一叔一家四口住前院東廂房。後院西廂房和正房西側小屋放著祖父上百箱的書與一些文物，1952 年大都捐給了陝西省圖書館，所餘部分都堆放在我後來住的正房西側小屋裏了。

父親讓我先把帶來的棗樹種在後院西側，這棵樹很快就活了，當年就結出了甜甜的棗子。後院正房靠北牆有一條三尺寬的過道，我在上面種滿了玉米。不久，家裏又辦了個喜事，在中山公園當園藝工程師的二哥陳一諤娶了個漂亮的嫂子劉秀嫻，她是一位優秀的保育工作者。雖然，1950年抗美援朝時，二姐陳一詵、三姐陳一誠、四哥陳一謙都參加了志願軍，但這時家裏還有11個孩子。一到周末，父親會讓8個6歲以上的孩子排成隊，走到鼓樓後邊的各種小攤上喝豆汁、品小吃，孩子們無憂無慮，都玩的很開心。我在這些孩子中最大，他們都不叫我大排行的「五哥」，而是親切地叫我「哥哥」，我也常給他們講故事，和他們做遊戲。

再後來，大人們的日子漸漸有些不好過了，「批武訓」、「批胡風」、「鎮反」、「三反」、「肅反」，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不斷傳來大表伯吳宓，被當成「反動學術權威」受批判的消息；姑母因為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也得老「坦白交待」，是不是貪污了甚麼東西。弄得家裏的大人提心吊膽，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惹上麻煩。

我則考入北京香餌胡同小學六年級第二學期的插班生，很快成績就又名列前茅了。學校旁邊有個天主教堂，記得一個星期五，下課後，同學帶我進了教堂，傳教的人送我一張五彩的耶穌受難像，很是精美。我記起《耶穌的故事》裏的描述，肅然起敬。以後每週都會去一兩次，竟也積攢了幾十張畫片。小學快畢業時，教堂一位特別慈祥的牧師還給我舉行了洗禮，送了我一本燙金邊的《聖經》。可惜我那時只是特別喜歡教堂那肅穆祥和的氣氛，以及周末免費的豐盛午餐，並不曾懂得頭上滴幾滴水的禮節就表示入教。未曾想，「文革」時，那本兒時的《聖經》卻也成了我「反黨」的一個證據。

因父親信道，講求「清心寡慾」，而且每天睡前都會打坐煉「龜息功」。我這時正沉迷於中國的神怪小說，就跟著父親煉道家功，還做著到名山大川修道的美夢，總想成為一個雲遊四海替天行道的仙人。聽說陰曆三月三「蟠桃會」那天，崇文門外「呂祖廟」開廟會，我下午就逃學去那兒了。呂祖是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和我家始祖陳搏是好朋友。到呂祖廟時，已經三點多了，廟會裏人頭攢動，香火鼎盛。我好不容易從人群中擠進去求了個籤，雖說是個「上上」，卻又說：「修道不妥」！住持還說我有「道眼」，弄得我很是失望了一陣子。

1-8 「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鳴鳥一般春」

1950年春節祭祖，祖母和姨婆帶領家中老少幾十口，依長幼次序向祖宗牌位焚香叩頭。祭拜儀式結束後，姑母遂攙扶祖母去進餐，姨婆、大娘、三伯、姑夫、七伯、父親和十一叔帶著眷屬和孩子們也先後離開。

待大人小孩都離去後，出於好奇，我悄悄爬上供桌後邊的條案想一探究竟。只見北牆正中懸掛著一幅長約一丈、寬達六尺褪了色的黃銅色的《陳氏族系譜》，《族譜》最上端，用黑色楷體端端正正地寫著：「始祖陳搏 字希夷」。不由得心中掠過一絲驚喜。

那時，我剛剛第二遍讀完《說岳全傳》。記得書一開篇便寫到：仙人陳搏，騎著騾兒經過天漢橋，抬頭看見五色祥雲，大笑一聲跌下騾來。眾人忙問其故，陳搏老祖道：「好了，好了！莫道天下無真主，一胎生下二龍來。」原來是那夾馬營中，趙匡胤、趙匡義兩兄弟降生，以後創立了大宋三百年基業。那趙匡胤也著實灑脫，和陳搏老祖在華山下輸了棋，竟「未得天下，先賣華山八百里」。稱帝后，免了華山周邊的錢糧。後來，仙人陳搏又為剛出生的岳飛起了名號。陳搏老祖是我心中無比欽慕的仙人，沒想到不但果有其人，竟還是我家的始祖。

我興沖沖地跑到父親的書房，他剛坐到書桌前，準備看書。我急忙問父親：「爸，我們家族譜上寫的始祖陳搏，是不是《說岳全傳》裏的那個陳搏老祖？」父親說：「是啊！」我問：「陳搏老祖不是成仙了嗎，怎麼會有後人呢？」父親笑咪咪地看著我說：「道家是可以娶妻生子的。」我又問：「那為什麼奶奶每天拜佛不信道呢？」父親說：「我和你爺爺、祖爺爺都信道，你奶奶從小就信佛。」我問：「那麼，道和佛一樣嗎？」父親說：「道講『清心寡慾』，佛講『明心見性』，實則一家。你現在還小，大了就會明白了。」

9年以後，我剛接到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的通知書，還沒有開學。父親到北京開會，住在科學會堂。週末，父親約我去他那兒，先帶我拜見了幾位他的好友和前輩，而後連續兩天給我講了家族的往事。



始祖陳搏像

父親告訴我，俗話說「陳林滿天下」，陳是個大姓。他小時候，祖父給他講過，陳姓的先祖是帝舜，《史記》說屬黃帝后裔。到唐代，陳姓已遍佈中原。我們這一系的始祖陳搏生於四川普州，15歲時即熟讀經史百家之言，懂醫理，好佛學，有才名。後悟及世事浮華的虛妄，就遍游名山，訪道求仙，隱於武當山、華山、少華山，與隱士呂洞賓、李琪等交往甚密。他將黃老的清靜無為、道家的修煉方術、儒家的修身養性與佛教的禪密觀悟熔於一爐，開拓了宋元學術之始。

他的著作很多，所作《無極圖》刻於華山石壁。理學大師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即由之衍化而來。他的詩詞也名動天下，其中的《歸隱》深深表達了他的觀念及歸宿。詩曰：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鳴鳥一般春。

始祖之後歷經宋元明清的先人，後來分出20多支，主要居於江河流域，兩廣、閩浙亦有數支，其足跡幾乎踏遍中原大地。他們或隱逸山林、潛心修煉，或懸壺八方、濟世救人，或入仕為官、造福百姓，均能秉承始祖陳搏的精神，沒有出過什麼敗壞家風的浪子。從醫最有影響的一支，當屬後居於福州的陳修園，其人品、醫德廣受稱讚，並有醫著傳世。

清道光年間，晉南大旱，居於山西洪洞縣的我們這一支，高祖父舉家南遷入川，為走方郎中。數年後，其醫道、武功一時威鎮川陝。其時，南少林主持雲遊至川，與他談佛論道，皆覺相識恨晚，彼此又切磋武功，竟三日不分高下，遂結為好友。後高祖父定居於陝西三原，因其醫術高超，



筆者高祖父親筆所書之中醫書《醫學慈航》和《暫記集》

應各界之請，遂開館授徒，並著有《醫學慈航》四卷和《暫記集》三卷。幸虧文革中母親明智，趁造反派抄家之前，將高祖父親筆所書之醫書深埋地下，才得以保存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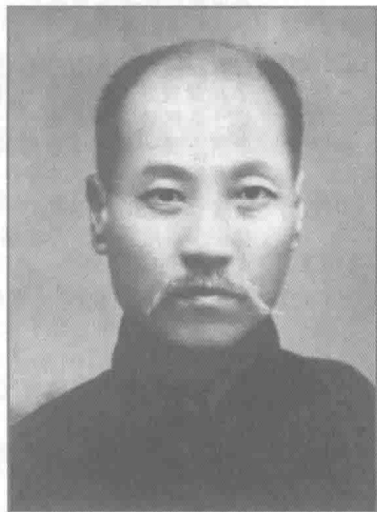
曾祖父年方5歲，即被高祖父送入昭覺寺，學習少林功夫六年。11歲又入青城山拜主持道長為師，修練道家功夫4年。15歲起隨高祖父行醫，於川陝湖廣晉冀魯豫各地。洪楊亂後，西捻殘部流竄陝甘，燒殺搶掠為禍民間。時任陝甘總督左宗棠，傳諭各地自保以安民。三原雖為陝西學政所在地，人文薈萃，但兵力單薄，難以保境禦敵，常受流寇侵擾，民生不安。

地方鄉紳公議，遂一致推曾祖父主持保護縣境。曾祖父時當壯年，品學出眾，武功高強，醫術精湛，為四鄰八鄉百姓診病，對貧苦者常不收費，且又免費贈藥，早已享譽遐邇。曾祖父本無意從政，但推挽不過，即臨危受命。後來，曾祖父身先士卒，數次率眾擊潰來犯之流寇，使三原終未受到大害。各界士紳對曾祖父讚不絕口，陳家也在三原成為名門。

流寇平定之後，左宗棠對高祖父特令嘉獎，並對其保境安民多所慰勉，讚賞不已。曾祖父連為善舉，名聲遠播，四鄰八鄉、世家望族求親者絡繹不絕，後娶了八房夫人，而各房均能彼此敬重、和睦相處。曾祖父養育三子，即祖父陳伯瀾、四爺陳仲哲、五爺陳月波。生下祖父的曾祖母系蒙古貴族之後。可惜文革中《陳氏族系譜》被毀，祖父以上各代名諱均難以考尋。

1-9「驚才振世悲無命 傲骨撐天尚有詩」

我的祖父陳伯瀾(1865-1923)，名濤，號跡陶。四歲開蒙，五歲能詩，修文習武，皆優於同齡。及長，聰穎過人，飽讀經史，過目能誦，針砭時弊，才氣縱橫，所論常為長輩稱奇。此時，國運危艱，外夷入侵，內亂頻乃，開明人士「富國強兵」之聲不絕於耳，洋務運動開始發端。祖父遂入開陝西風氣之先的「味經書院」就讀，師從關中大儒劉古愚^[48]先生，漸立「富強我中華，拯民於水火」的志向。



祖父陳伯瀾

[48] 劉古愚(1843-1903)，名光黃，字煥堂，陝西咸陽人。著名教育家，創辦味經書院、崇實書院並任院長。響應康梁變法，積極宣傳西學，時有「南康北劉」之稱。著有《煙霞草堂文集》。

1889年，祖父考中陝西省己丑科解元，後遊學京津滬寧，與康有為^[49]、梁啟超^[50]、康廣仁^[51]、林旭^[52]、麥孟華^[53]及宋伯魯、李孟符^[54]等維新黨人為友，傳播並推動維新運動。甲午戰敗，群情激憤。1895年4月，祖父應康有為之邀積極參與「公車上書」，並不時返陝向劉古愚等開明人士介紹京中情勢。同年8月，祖父參與梁啟超籌組的「強學會」，所居京中陝西會館成為活動據點。

可歎「百日維新」，光緒皇帝的一百多道「明定國事詔」，尚未及推行，即遭慈禧太后政變。光緒皇帝幽囚於瀛台，康梁出逃至港日，「六君子」遇難於京師。祖父潛逃出京城，悄悄返回陝西。誰知，祖居又遭頑固派縱火焚燬，祖父為避禍，遂舉家與妻弟吳建常^[55]一家南遷入滬，與維新人士宋伯魯、李夢符等，共同避難於英租界。其時，把酒吟詩，彼此唱和，廣傳士林，名重一時。

1901年初，清廷發出學習西方的上諭，開始了清末的「10年新政」。湖廣總督張之洞^[56]數次相邀，祖父遂以候補道身份赴粵入幕，幫辦兩廣興實業、開學堂事宜。同年秋，祖父至廣州入督府，為開礦山、辦工廠、

[49] 康有為（1858-1927），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1895年4月以其為首的1,300名舉子發起了著名的「公車上書」，8月又組織了「強學會」，並在給光緒的上書中主張「君主立憲」。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逃亡海外16年。為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書法家和學者。代表著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等。

[50]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1890年師從康有為，走上了維新變法之路，世稱「康梁」。變法失敗逃亡日本，考察美歐後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以後，兩次討伐復辟，為再造共和奔走。晚年則從事學術，其一生以「救國新民」為己任。乃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和史學家。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51] 康廣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幼博，廣東南海人。康有為胞弟，積極參與戊戌變法，事敗入獄，乃宣稱「若死而中國能強，死亦何妨？」遇害時年31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52] 林旭（1875-1898），字墪谷，福建福州人。積極參與戊戌變法，被授予四品卿銜，不少變法上諭出自其手筆。變法失敗入獄，遇害時年23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53] 麥孟華（1875-1915），字孺博，廣東順德人。系康有為忠實弟子，變法失敗逃亡日本。主持梁啟超創辦的《清議報》，提倡學習日本維新，增強國力以救亡，後參與倒袁（世凱）。

[54] 李孟符，名岳端，戊戌變法時任工部員外郎，積極參與變法，變法失敗後「永不敘用」。

[55] 吳建常（1876-1950），字仲旗，陝西涇陽人。筆者祖父之妻弟，主張維新變法，曾任靖國軍秘書長、涼州副都統。

[56]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河北南皮人。早年為清流派健將，後為洋務派代表，大力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曾任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軍機大臣。對清末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

建學堂不遺餘力，深得同仁好評。岑春煊^{【57】}督粵時委任祖父為學堂監督（相當現在的校長）創辦「兩廣高等工業學堂」（堂址在舊廣東巡撫署）。

學堂「以研究學術技藝為宗旨，以製造精良，振興工藝為成效」（見「兩廣高等工業學堂」介紹）。因祖父人品好、學識廣博，深受學生歡迎。張鳴岐^{【58】}繼任粵督後，學堂經費不能按時撥付，祖父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迭辭監督之職。1911年3月，革命黨火攻粵督府，全城人心惶惶。10月，祖父攜家離粵赴滬，學堂員工亦各自星散。

辛亥革命成功。于右任倡議在上海創辦大規模的「中國圖書公司」，南京新政府要人投資者甚多。1912年春，祖父被推舉為公司總經理。祖父與一批名士所議縱橫，評論宏闊，詩酒唱和，聲名遠播，但卻不善經營。祖父為人樂善好施，常仗義疏財，但竟將「中國圖書公司」之股款，不斷贈送眾多有困難的朋友，致使公司經營兩年以後，虧損連連，難以為繼。

1914年祖父赴京任財政部議員。由大伯父陳之碩清理公司餘業，逐步償還外欠款項，又以所存印刷設備及現款，在上海的海寧路創設一家印刷兼出版的書局，稱之為「右文社」。書局以章炳麟^{【59】}弟子、北大教授康寶忠^{【60】}為顧問，曾印行《章氏叢書》，即為章炳麟的各種著作。因大伯父與陸費逵^{【61】}為好友，故「右文社」不久即併入新成立的「中華書局」。

據覃孝方^{【62】}在《審安齋遺稿序》中所述：祖父「就職計部後迭次視察各省稅務，所為報告類多詳盡而具縝密之評論」，「凡君所舉理財之策與權稅之方，一絲一粟無不歸本於民命之大原，與國家制節謹度之根本計

【57】 岑春煊（1861-1933），字雲階，廣西西林人。曾任陝西巡撫、山西巡撫、四川總督、兩廣總督，支持維新立憲。辛亥革命後宣佈支持「民主共和」。民國「二次革命」，被革命黨人推為大元帥。「護國戰爭」又被推為都司令。一直主張「經濟立國」和「教育為本」。

【58】 張鳴岐（1875-1945），字堅白。初為岑春煊「智囊」，後任廣西巡撫頗行新政，其署理兩廣總督時鎮壓了「黃花崗起義」。

【59】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浙江餘杭人。先後擔任《時務》、《昌言》編輯，因發表「革命軍序」，坐「《蘇報》案」入獄。1905年參加同盟會，主持《民報》。辛亥後專意治學，在經學、史學、文字音韻、文學諸方面都有很深造詣。著述輯為《章太炎全集》。

【60】 康寶忠（1884-1919），字蝶庵，陝西城固人。1905年參加同盟會，井勿幕、于右任即由其介紹加入該會。後任北京大學講師、教授，並首開社會學班，被譽為中國第一位社會學家。

【61】 陸費逵（1886-1941），字伯鴻，號少滄，浙江桐鄉人。自幼即尋求救國之道，為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華書局創辦人。

【62】 覃孝方（1880-1959），字壽坤，湖北赤壁人。1904進士。曾任廣東新寧、香山知縣，欽州、直隸州知州。後與于右任、邵力子在上海創辦《立言報》。民國建立，任副總統府顧問、湖北省議會議長、國民政府審計院、監察院秘書。1917-1920年後任山東、河南、陝西省教育廳長。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49年後，任湖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

劃」。祖父去世前對他說：「前清之季吾游粵督幕，為陶文勤^{【63】}論洋鹽入口事，並及整理鹽政之策。辛丑和議草約始發表，客吏某君條舉而論列之於關稅獨詳，吾以茲事關於吾國財政至為重大。就其所列附為贅言，糾其弊而導其利於我者凡若干款。」

祖父又說：「計其時距今且 20 年，國家財政日益紊亂無狀。向此，吾儕所論列乃不幸而言中。至於所陳根本救濟之策，則無一能行之者。吾意以為，今後之財政當局不求砥礪操行與學識有根柢之人，而專以市井工心計之流司全國出納，輿人民食貨之生命微獨！吾說之不行，今後之策財政者，其亦已矣！」令其歎息不已。

祖父妻弟吳建常則曰：「伯瀾少負才名，高視一世。使得行其志，必有造於國家。」，「庚子歲飢，伯瀾又以黨禍攜眷南遊。入民國後，移居都門。八九年間，余兩至都，皆主伯瀾家。夜分酌酒，上下縱談，拔劍狂歌。論及時事，尤激昂痛哭。」（見《審安齋遺稿》）。

其時，政局混亂，官員腐敗，祖父報國拯民之志難申，遂每日吟詩醉酒，於 1923 年不幸駕鶴西去，享年僅 58 歲。

祖父辭世，早年師從祖父的于右任用尺方大字送輓聯曰：

驚才振世悲無命，傲骨撐天尚有詩。

當時，送葬聯對近百，現鈔錄數首如下：

陳季濤^{【64】}輓聯云：

元龍氣，司馬愁，都萃一身，鬱鬱以死。杜牧狂，嵇康懶，從茲千古，凜凜猶生。

王幼農^{【65】}輓聯云：

舉念不忘國家，孤憤所流。杜陵野老稱詩聖。此心別有寄托，澄懷獨抱。彭澤先生豈酒狂？

吳建常輓聯云：

本姻姪而共門牆，訂交論學，益我良多。每當把酒對談，舉念不忘天下事。自戊戌以迄癸亥，為國忘家，知君有幾？竟使懷才莫遇，遺集留待後人刊。

《吳宓日記》1923 年 8 月 31 日記：「驚悉陳伯瀾姑丈，已於八月二十三日在京寓辭世。嗚呼痛哉！丈生平甚愛重我。我受丈之訓誨及其家

【63】 陶文勤，不詳。

【64】 陳季濤，不詳。

【65】 王幼農（1865-1943），名典章，陝西三原人。曾任清四川寧遠（今西昌）知府。民國任廣東高雷、粵海道尹，陝西民政廳長，屢辦賑務為民稱頌。

之資養，恩德甚深。而我常自命為能知丈之一人。我之學為詩，及於詩之派別、義理、方法、精神，實遵依丈之《南帆集》。後以聚珍版排印，改名《審安齋詩集》。

又，1945年曹冷泉^[66]先生編著之《陝西近代人物小誌》一書，於「凡例」中稱：「近代關輔人才雖未能遠繼漢唐，但亦極稱盛焉。如劉古愚、賀復齋^[67]之於理學，張扶萬^[68]於史學，宋伯魯之詩書畫，陳伯瀾之詩，李孟符之詞，皆可傳之奕世而不朽者。」可見祖父的詩在當時有一定影響。

祖父喜詩，有《審安齋詩集》傳世（《審安齋詩集》影印件）。康有為作序說：「陳伯瀾靜篤而質敦，好學而隱秀。」公車後20餘年，世變日深，「伯瀾懷抱鬱鬱不得展，皆托於詩」，其詩「沈痛飛驚，歌泣纏營，哀厲幽清，悱惻芳馨」，「名章俊句，絡繹彌滿」，「詩之雄學少陵，綿麗學玉谿，而神似遺山，遇合亦同之」，「士生亂世，懷抱珠玉，沈屈下僚，或為諸侯賓客，不能展才用，抑鬱磊落，窮愁放歌，不過聊自娛耳！」（見康有為《審安齋詩集序》）

《吳宓詩話》說：「予學詩於陳伯瀾姑丈」，並錄祖父「流利真切」未收入詩集者二首。《遺懷》云：「我家渭涇河之陽，華岳吳山在我傍。搔首江湖徒泛泛，側身天地自涼涼。折腰恐被陶潛笑，白眼聊為阮籍狂。一任青雲飛鳥去，鷗心只在水雲鄉。」《再入粵督幕》云：「入洛爭看少年時，越來選樹到南枝。如何意氣輕升斗，豈有文章比色絲。幕府重來凡鳥笑，珠江一臥螭龍癡。安排酒盞消長日，莫管傍人打劫棋。」

又，《吳宓日記》載：今人詩名句殊少，然瀾丈名句甚多。如「憔悴憐君詩易瘦，淒涼入世酒傷多」，又「乾坤杯酒珠槃會，風雪梅花繡囊飛」，均足壓倒一時。瀾丈《滬江秋感》諸律初出，章太炎見而推崇至極，謂今世安得有此音？瀾丈之「病知藥價貴，貧入酒家羞。」平等閣主人^[69]最稱之，相見謂曰：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見1915年9月28日《吳宓日記》）

[66] 曹冷泉（1901-1980），安徽穎上人。1925年參加中共，從事革命活動。後任陝西師範學院、陝西師範大學教授。著有《陝西近代人物小誌》、《劉古愚的哲學思想體系》。

[67] 賀復齋，字瑞麟，陝西三原人。清末理學大師，1870年以「正其誼不謀私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宗旨，創辦「正誼書院」。

[68] 張扶萬，陝西富平人。1892年入味經書院，師從劉古愚，與康有為多所往來。

[69] 平等閣主人（1872-1939），其名為狄平子，江蘇溧陽人。曾參加公車上書，與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過從甚密。1904年在上海創辦《時報》，深受各界歡迎。

祖父在粵暮時，與丘倉海^[70]、張季鸞^[71]、覃孝方等為友，詠懷唱和不斷。現僅錄丘倉海《短歌贈陳伯瀾》一首：

終南大華遙相望，從天東下黃河黃。
 千年王氣久消歇，秋陵思哭秦漢唐。
 三原陳生胸有史，東隨黃河觀海水。
 茫茫海水揚胡塵，嗟哉何止秦無人！

及祖父《贈邱倉海》一首（名逢甲號仙根台灣割讓時被民眾舉為臨時總統）：

颶風激盪海水立，十萬王師蟲沙泣。
 漢家下詔捐珠崖，田橫義士同悲哀。
 義旗一日舉海上，功雖不成氣亦壯。
 吁嗟乎！
 鱗甲修養蛇成龍，爪牙摧落虎變鼠。
 我儕聚鷗作玉冠，鄰家介雞為金距。
 眼中黑白棋分明，更著一子向何許。
 英雄成敗事偶然，胸有奇氣化雲煙。
 新詩脫口萬眾傳，如聽風雨鳴龍泉。

對照 1916 年冬祖父《為胡勵生題岳武穆王畫像》一詩：

撼山易，
 撼軍難！
 浩然之氣吞契丹。
 東窗一夜話，
 談笑無臨安。
 惜哉黃龍未直擣，
 芊芊永昌陵上草。
 丈夫患，

[70] 丘倉海（1864-1912），即丘逢甲，字仙根，台灣苗栗客家人。1864 年生於台灣彰化，1887 中舉，1889 年中進士，授任工部主事。但其無意在京做官，返回台灣到台中衡文書院擔任主講，後又於台南和嘉義教育新學。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割讓台灣於日本。台人激憤，其倡立民主國，並為義勇軍統領。後見事不可為，乃內渡廣東嘉應州，先後主講幾個書院，並被推為廣東教育總會會長。為近代著名詩人。

[71] 張季鸞（1888-1942），名熾章，陝西榆林人。就讀煙霞草堂師從劉古愚。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筆政時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辛亥革命後，任孫中山秘書，負責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文件。後任《大共和日報》編譯和《民信日報》總編輯。1916-1924 年任北京、上海兩地的《中華新報》總編輯。1926 年，接辦天津《大公報》，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負責評論。中國著名新聞家，政論家。

不成仁不患殺身。
氣凝山嶽光星辰，
肝膽猶足照後人。
男兒報國無今古，
有手只應殺胡虜。
君不見，
風雲莽莽壓神州，
躍馬橫戈何其武。

從中可見祖父的追求與志向。

祖父育三子一女：長子陳之碩，長女陳芝潤，次子陳之顥，三子陳之頤。

其中，祖母吳儀孟生一女一子：陳芝潤（1909-1972，筆者五姑母），北京女師大畢業後，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嫁王琴軒，從事會計工作，無出。陳之顥（排行八，筆者父親）清華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從事水利工作，任陝西省水利廳總工程師，娶王毓芳，教師。育二子四女：長子陳一諤（大排行為五），娶吳琰，後離異；長女陳一諾，西北工業大學飛機系畢業，任陝西科技出版社編審，嫁劉國平，任陝西化工研究所研究員。次子陳一諫，任西安自行車廠車間主任，娶朱素華，任檢驗員；次女陳一謙，任陝西財經學院研究生部負責人，嫁張存江，任小學校長；三女陳一謀，任西安啤酒廠保管，嫁劉緒發，任技術檢驗；四女陳一詒，任酒店總會會計，嫁范建功，任圖書保管員。

祖父 1910 年娶如夫人羅桂枝，大家稱姨婆，育一子：陳之頤（1913-1985，筆者十一叔），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任一機部工程師，長期從事機電工作，娶侯雪蘭，育二女二子：長女陳一詒，長子陳一評，次女陳一言，次子陳一謹。

祖父四弟陳仲哲，娶某氏，育一子：陳之穎（1895-1987，筆者三伯父），南通紡織學校畢業，從事財政工作，娶朱仲竹。育一女一子：女陳一誠（筆者三姐），參加志願軍，後嫁經緯，軍人；子陳一謙（筆者四哥），參加志願軍，作文藝工作。陳仲哲再娶師寶珍，育一子一女：次子陳之頤（1910-1978，筆者七伯父），留日長崎財經專科學校，從事銀行工作，娶王敏，從事會計工作，育二女二子：長女陳一論，長子陳一訓，次子陳一謨，次女陳一詳；生女陳玉潤（1913-1994，筆者十姑），從事教育工作，嫁李子俊，從事銀行工作。育一女一子：女李仁，大學教師，嫁郭笙，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子李立，西安電子大學副校長，娶謝海珍。

祖父五弟陳月波，其子陳之頌（筆者十二叔），娶趙美玲，育一子，陳一詩。

父親從來沒有這麼嚴肅認真地與我談過家族的往事，我一邊聽一邊記，兩天記了一本筆記。父親又給了我不少資料和家傳的文物，可惜都在「文革抄家」時全部抄走了，《陳氏族系表》也被紅衛兵「破四舊」時燒燬。許多往事的細節依稀難辨，只能概略描述。

[附記]近日於《中國秦腔網》中查到祖父26歲（1891年）觀賞黨甘亭之藝所作《群兒贊》，讀來饒有興味，茲錄之如下：

《群兒贊》——贊秦腔名旦黨甘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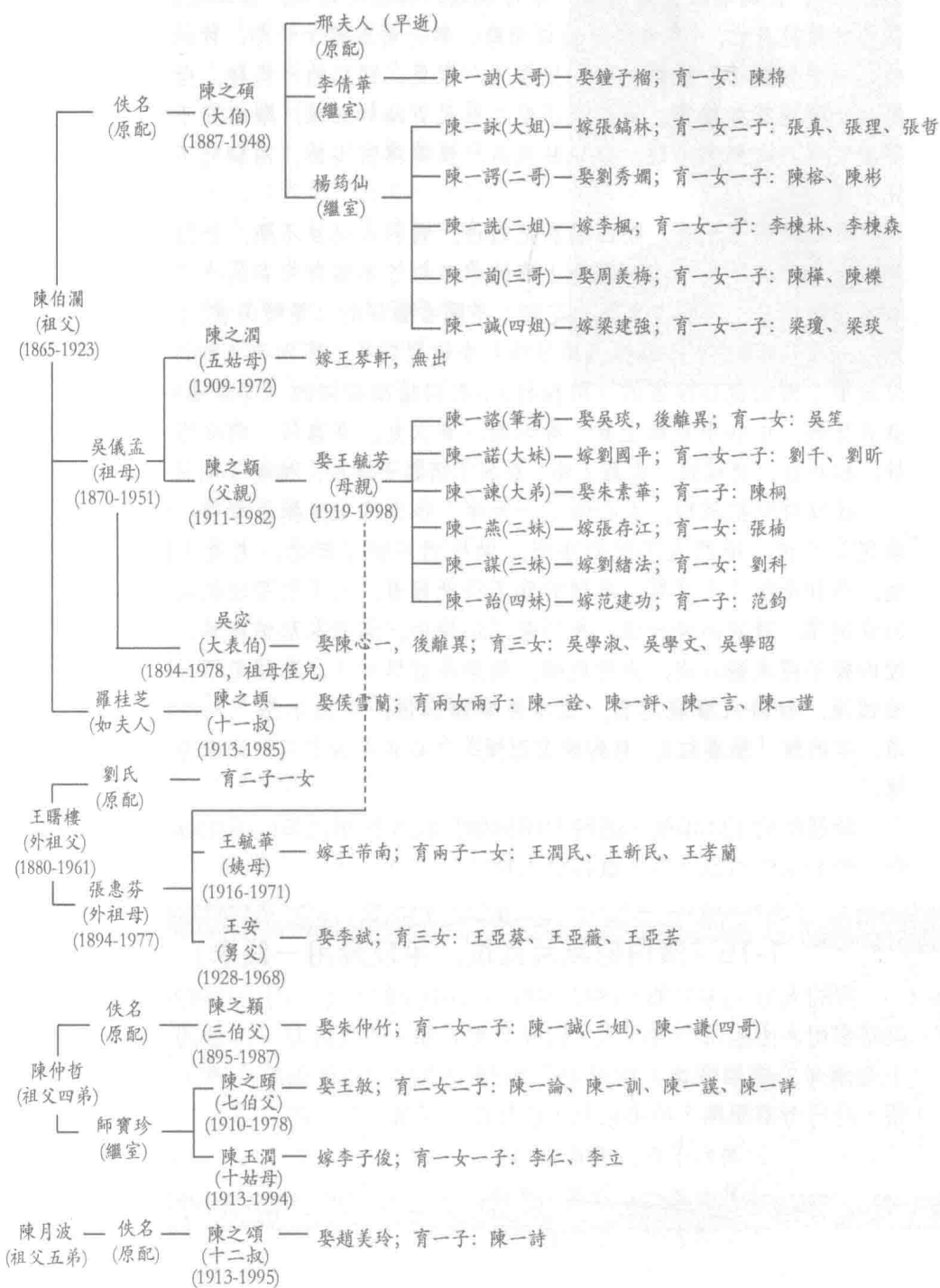
西安省三原縣，光緒年間一名旦，黃衫兒復生，蓋省兒再見，黨群兒著美名，年紀兒未弱冠。

態驚鴻，貌落雁，月作眉，雪呈靨，楊柳腰，芙蓉面，顏色賽過桃花瓣。笑言兒可掬，愁言兒堪羨，背影兒難描，側身兒好看，似牡丹帶雨開，似芍藥迎風綻。似水仙凌波清，似梨花籠月淡，似嫦娥降下蕊珠宮，似楊妃醉倒沉香畔。

兩淚嬌啼，似薛女哭開紅杜鵑。雙蹠緩步，似潘姬踏碎金蓮瓣。看妙舞翩翩，似春風搖綠，聽清音裊裊，似黃鶯鳴歌院。玉樹曲愧煞張麗華，掌中影羞卻趙飛燕。任你描鸞刺鳳手，畫不出傾城傾國面。任你是鐵打鋼鑄心，也要成多愁多病漢！不但是我見猶憐，就天上神仙也應欣羨。不但是人狂如醉，想閨中嬌娃也應掛念。述不盡的媚態綽約，柔情繾綣。

得手戲選說一遍：《打淮安》太聰明，《打金枝》特嬌慣，《麒麟山》扯洞房，《北邙山》入宮院。劉金定別母，佘太君卸劍。三皇女亂打桃花，五逆生輕飄羽箭。《乾坤帶》為姨娘捧酒，《梅龍鎮》叫軍爺吃飯，殺婆惜柔聲兒一呼，遇慧娘鬼臉兒一變。艾騫草坡將話傳，曹莊殺狗將妻勸。《黃逼宮》死的可憐，《梅絳雪》笑得好看。《百花庵》有趣有情，《翠花宮》不錯不亂。《串龍珠》的公主，《玉虎墜》的王娟。小青兒路上拔刀，曹玉蓮雪中打戰。《汴梁圖》、《錦繡圖》、《鐵獸圖》樣口兒能幹，唐玉英、廖鸞英、黃桂花，人口兒稱讚。你再看飛彥彪得忽生忽旦，《雙合印》的裏腳一綻。更有那出神處《二返安》一出，把魂勾散。見狄青愁容兒一盼一怨；庠寶刀輕手兒一按一慢；繫羅帕情眼兒峪倦一干；抱孩子笑龐兒忽換一顏，看得人神也昏，望得人目也眩，掙出一身風流汗。

族系圖



把這些喜怒哀樂七情畢現且莫算，武藝兒熟且練。《姬家山》把夫換，《撮合山》把詩看。雙陽追夫，水母吃麵。穆桂英破州，孫二娘打店。《殺四門》槍挑身亡，《九龍峪》飛鏢命斷，救哥哥血戰十一郎，伴妹妹宿九華棧。纖手兒接槍，能幹；一指兒攪刀，罕見。回風的一條鞭，撥月的兩根劍。一騎桃花如摯電，腳步兒不亂；三尺青鋒如匹練，眼睛兒不眩，舡斗雲凌空現。心兒裏不跳，口兒裏風占，鶻鴿窠當場旋，兩腳兒不停，一色兒不變。

眉眼過場有千萬，陝西壩裏把魁占，喝彩人兒聲不斷，把紅掛了無其算。一切把式不願看：不願看上海的十二紅；不願看京都的十三旦；不願看望兒的漁舟；不願看喜臣的花鈿；不願看貓兒的《雙鯉傳書》；不願看狗兒的《百花贈劍》；不願看《鐵弓緣》小道兒開弓；不願看《湘江會》趕運兒放箭；哪怕他高陵客的《破棺材》；更何論蘭州紅的《捧藥罐》；天順天壽且休提，中和中見難上算；賽姑娘、賽太九、賽寡婦，何必思念；要命娃、船戶娃、寶雞娃，也難上串；羞煞了隋韃子的腔，愧煞了明桂子的面。

聽說群兒把戲扮，人心慌了一大半，作文的先生拋了筆硯，演武的爺爺遺了弓箭。衙門人不把公事辦，學生們不把子曰念，老道士懶回八仙庵，小和尚離了七寶殿，掌櫃的顧不得把帳看，長工們那怕把活算！擔水的遺桶擔，縫衣的攔針線。教門豪不怕帶枷，滿冊家那怕糧算。還有那吃煙的顧不得灰翻八綻，泡兒乾咽，勉強在前場立站。真個是不分貴賤，不論回漢，看得人廢寢忘食，這才是樂而忘倦，勞而不怨，人口說好真可讚。有的說「胎裏紅」，有的說習而慣。任以眾公說月旦，漢嘉金那怕爐中煉。

此贊作於120年前，而贊中所述劇目我等後輩大多已不知曉，中國文化之斷裂由此可見一斑，實在令人歎息。

1-10「清白原無片瓦復，平反焉用一錢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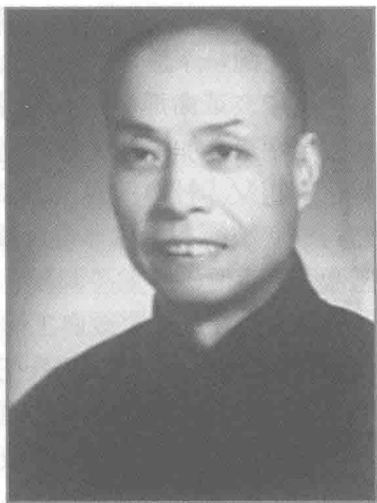
我的大伯父陳之碩（1887-1948），是祖父的長子，出生於陝西三原。4歲時喪母，由祖母撫養成人。自幼勤奮好學，善良純厚，14歲隨父至滬，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後，18歲赴日留學。時祖父正任兩廣高等工業學堂監督，赴日考察學務，於東京為大伯父作《示蕃兒》一首。詩云：

三萬六千日，百歲豈偶然。

分其十之一，倏忽已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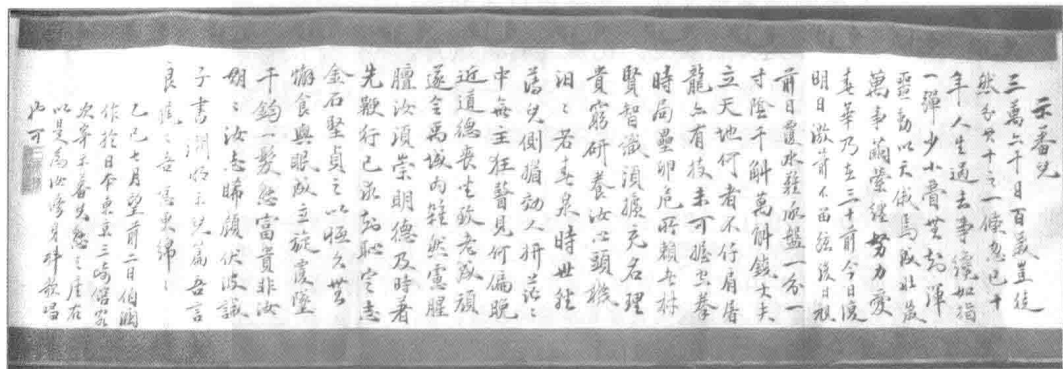
人生過去事，才如指一彈。

少小嘗無知，渾噩遂其天。
俄焉成壯歲，萬事繭縈纏。
努力愛春華，乃在三十前。
今日復明日，激箭不留弦。
後日視前日，覆水難承盤。
一分一寸陰，千斛萬斛錢。
丈夫立天地，何者不仔肩。
屠龍亦有技，未可恃空拳。
時勢正危急，所賴者材賢。
學術貴深究，名理要窮研。
養汝心頭機，汨汨若春泉。
時世輕薄兒，側媚效人妍。
茫然中無主，狂瞽見何偏。
晚近道德喪，坐致老成頑。
遂令禹域內，雜然慮腥膻。
汝欲崇明德，及時快著鞭。
行己須知恥，立志金石堅。
貞之以恆久，無懈食與眠。
成立旋覆墜，千鈞一髮懸。
富貴非汝期，期汝志晞顏。
馬援誡子書，淵明示兒篇。
吾言雖媿媿，吾意更綿綿。



大伯陳之碩

跋云：乙巳七月望前二日，伯瀾作於日本東京三崎館客次，寄示蕃兒
懋之座右，以是為汝修身科歌唱也可（註：大伯父原名陳祖蕃）。



陳伯瀾《示蕃兒》詩墨跡

此詩未收入祖父《審安齋詩集》中，吳宓認為此詩與嚴復^{【72】}《示璿兒》詩同一「婉摯深嚴」。

後辛亥革命爆發，大伯父自日本東高等工業學校機械工程系肄業歸國，至南京參加中華民國新政府工作。大伯母邢氏不久病歿。但大伯父當時信奉祖父「社會改良」之說，尤信康有為的「物質救國論」，認為「自然科學與技術、工程，可以救國」。並不贊成孫中山的「社會革命」，「自感激烈之手段破壞尤甚，為平和理性之人所不取。」

但大伯父在南京政府工作認真，處事公正，不辭勞苦，深得上司的嘉許與同僚的好評，很快即升任監察院審計部次長、代理部長。「9·18」事變發生後，父親代表清華大學學生至南京請願，並帶頭在總統府前絕食，大伯父親往現場表示支持與鼓勵。事後，大伯父還請北京南下學生至家中餐敘，對學生的愛國抗日行為多所讚許與慰勉。大伯父始終對日軍侵華痛恨不已。

1938年，汪精衛^{【73】}降日，組織偽政府，大伯父憤而辭職。這時，周佛海^{【74】}密訪大伯父，說：現日強我弱，重慶方面密諭：「望一批愛國志士留在南京汪政府為國民政府服務。」並拿出重慶密電以證之。大伯父沉吟一陣後表示：「本人寧背罵名於一時，決不負國民於長遠」，遂決定忍辱負重而留任，以圖今後的變局。在其任汪偽政府財政專門委員會主任期間，定期將汪偽財政狀況密報重慶，按說大伯父實實在在應當是一個抗戰功臣。

誰知抗戰勝利後，因戴笠^{【75】}與周佛海爭功傾軋，軍統竟將大伯父以「賣國罪」投入監獄，1948年瘐死獄中。大伯父入獄後，軍統方面放話云：「當可無罪保釋出獄」，後又云：「需交一筆錢以之贖身」。大伯父一生為人清正，哪裏有什麼錢可交呢？遂於1947年除夕寫詩《懷諸弟》告之曰：

勞燕分飛幾度秋，相逢虎口不知愁。
成行兒女欣欣見，比翼鴛鴦款款浮。
清白原無片瓦復，平反焉用一錢求。
呼牛喚馬等閒事，慘淡龍蛇斗不休。

【72】 嚴復（1854-1921），字幾道，福建福州人。他系統地將西方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

【73】 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浙江紹興人。曾因謀刺清攝政王而名聲大噪，成為孫中山得力助手。抗日期間投靠日本淪為漢奸。

【74】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期中共領導人，國民政府要員，後淪為漢奸。

【75】 戴笠（1897-1946），字雨農，浙江江山人。曾擔任國民政府軍統局局長。

又作《示諸兒》曰：

年來習靜已成癖，高臥厭聞爆竹喧。
寂寞情懷無累熱，雍容心緒少增煩。
應知恥過不為勇，能免作非方是原。
薛鳳荀龍期汝輩，乃翁籍此住邱樊。

好一個「平反焉用一錢求」！好一個「能免作非方是原」！從這兩句詩中可以看出大伯父為人難得的品格與風骨。試問：於今日中國宦海浮沉者，又有幾多人能於處逆境而作出此淡定鏗鏘之言？！中國古人常說：「時窮節乃見」，此其大伯父人品之所謂也。可歎中國官場黑暗，人妖顛倒、是非混淆，以致正人君子常常受到打擊，蒙冤莫白以致難以立足。

祖父去世時，祖母 53 歲，姨婆 30 歲，六姑母 14 歲，父親 12 歲，十一叔 11 歲，只有大伯父一人具奉侍長輩及養育弟妹的能力。當時，大伯父 36 歲，正值壯年，即承擔起奉養祖母、姨婆及諸弟妹的責任。大伯父待雙親至孝，待弟妹至愛，待子女至嚴，待友人至厚，實為中國傳統書香門第的一個典範。父親、姑母及親人們每每提起大伯父，無不肅然起敬。因大伯父的「問題」，親人們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祖母因此哀歎「這個世道是越來越沒有天理了！」

同年，大伯父繼室李倩華病歿，遺下六歲的大哥。第二年，大伯父續娶楊筠仙為妻，後育有子女五人。大伯父死後遺下三子三女。大伯父的幾個孩子，後來都學有所成，人格高尚，耿直正派，為國為民，不計得失，令人敬佩。茲概述如下：

長子陳一訥（筆者大哥），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從事銀行業，娶鍾子榴；長女陳一詠（筆者大姐），嫁張鎬林，任上海金山石化總會計師；次子陳一諤（筆者二哥），畢業於南通大學園藝系，任北京市園林局高級工程師，娶劉秀嫻，任北京保育教育協會秘書長；次女陳一詵（筆者二姐），南開大學肄業參加志願軍，嫁李楓，軍人；三子陳一詢（筆者三哥），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娶周羨梅，北醫三院主任醫師；三女陳一誠（筆者四姐），北大醫學院畢業，醫生，嫁梁建強，工程師。



大娘楊筠仙

1-11 祖母吳儀孟和大表伯吳宓

我的祖母吳儀孟（1870-1951），是陝西「安吳堡」大族吳門之後，吳氏族人明末清初即居於此。祖母之嫂周瑩，系孟旬姑娘，17歲過門，不久即守寡，人稱「安吳寡婦」。周瑩有頭腦會經營，平日樂善好施，逢災捐賑獨多，慈禧太后避難西安時，捐出白銀50萬兩（一說100萬兩），受封為「誥命一品夫人」。

祖母生而秀麗端莊，又聰穎好學，猶篤於佛學，後終其一生，晨昏唸經禮佛無一日間斷。1892年嫁給祖父為繼室，生姑母陳芝潤、父親陳之顛。其弟吳建寅、吳建常為吳宓之生父與嗣父，吳宓詩文集中多處提及的「五姑母」即我的祖母。



祖母吳儀孟

號稱「全省首富」的安吳寡婦一門，累世為鹽商，總號設於揚州，分號遍於漢口至上海沿江各埠。吳周氏無出，收「螟蛉子」吳懷仙以承祖業。吳懷仙自幼受良好教育，後經商於滬揚川陝之間，與于右任、茹欲立、王曙樓、古耕虞^{【76】}（應為1）等為友。中共在安吳堡辦抗日青年訓練班時，吳懷仙捐給彭德懷一窯宋明古磁器以助抗日，據說當時從蘇聯換回了不少槍炮。

吳懷仙的女兒吳寶珠，我叫她「寶寶姐」，自小聰明好學，貌美敦厚。1949年後積極追求進步。「反右」時在西安醫學院當政治經濟學教師，上級下達反右派「指標」，吳寶珠不忍「動員人家提意見事後又整人家」，不願抓右派。上級遂認定：「你不抓右派，就是個右派！」，竟給她莫名其妙地劃了個「右派分子」！致使全家以後都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對待。吳寶珠之子呂建安，後獲美國斯坦福大學數學系博士，從事電腦工作。

吳家在陝西是個大戶，祖母的姪兒、姪女有幾十人。其中與祖母來往最密者為大姪兒吳宓，（吳宓遺像）他既是一位著名的詩人、又是一位中西比較文學的開拓者和國學大師，後人評價他「博識古今，學貫中西」。祖母十姪兒吳協曼，是英國劍橋大學終身院士和著名詩人，他的夫人柯翼

【76】古耕虞（1905-2000），四川重慶人。30年代成為中國的「豬鬃大王」。著名實業家。

如與筆者母親常有來往。祖母其他姪兒、姪女或從政、或從商、或從學，亦多與陳家經常來往。

祖母持家嚴謹，為人慈悲公正。大伯父四歲失恃，祖母待之如己出，諄諄教誨不遺餘力。大伯父成人後，亦待祖母如生母，奉養定省半無懈怠。祖母自1916年由滬入京後，一直住在大柵欄三原西館，後遷入大伯父為其購置的前園恩寺九號小四合院內，院裏住著陳家後輩五、六家二十多人，各家彼此都能禮敬以待，皆因祖母治家有方。

院內長輩除祖母外，還有姨婆羅桂枝，她們相處融洽，言行均為子弟榜樣。院內晚輩有，祖父四弟陳仲哲之子：三伯父陳之穎和七伯父陳之頤一家，祖母女兒六姑母陳芝潤一家，姨婆之子十一叔陳之頤一家。抗戰勝利後，父親自陝西帶全家探母，也住在這裏。大伯父於冤獄屈死後，祖母一直悒悒不樂，將大伯母自南京接到北京後，才舒心了一些。

祖母還有兩個常來常往的乾女兒。吳宓夫人陳心一離異後，帶著3個女兒，祖母即收其為乾女兒，不時予以各種幫助，使其不致失落、困頓。祖母的另一個乾女兒叫楊景任，是張奚若的夫人。雖然張奚若早年師從祖父，但後來主張「革命」，與祖父社會「改良」的主張漸行漸遠。但楊景任卻始終是祖母家的常客。楊景任曾留學英國，是個活躍的女性，說話辦事總是風風火火，熱情有加，朋友們都玩笑地把她叫作「楊瘋子」，可她卻深得平日不苟言笑的祖母的喜愛。

我的大表伯父吳宓(1894-1978)，字兩僧、兩生。他有兩個父親，生父吳建寅字芷敬，嗣父吳建常字仲旗，均為楊太淑人所出。太淑人守節撫孤，擇師教讀，命兩子先後入味經書院，從學劉古愚。楊太淑人未讀書，不識字，然通人情、性嚴明，掌管家業數十年，鄉親皆服其公正。祖父於滬曾與吳宓談及其「二父」之事，謂：「此是祖母楊太淑人之亂命！」吳宓生父芷敬公為此終生不樂。

而吳宓則「與嗣父仲旗公親，事無不告，後深知且極佩仲旗公之學問、修養、道德、行誼，則更親。」吳宓說：「仲旗公既為宓之父，又為宓之師，兼為宓之友，且為宓之母」。1900年，祖父舉家南遷赴滬，仲旗公



姨婆羅桂枝

亦奉楊太淑人攜家隨同南行至滬，共居於上海新馬路昌壽裏 71 號。祖父憤於戊戌之後時局的艱難，日日和避居滬上的戊戌政變浦臣宋伯魯、李孟符與吳建常等一起飲酒賦詩。

楊太淑人認為改名可使吳宓健體增祥，請祖父為吳宓另取新名，祖父乃於醉中寫出「陀曼」二字，吳宓遂從「吳玉衡」改名「吳陀曼」，繼之其以下弟妹名字均以「曼」字相排，如：倩曼、祥曼、殊曼、孔曼、綏曼、須曼、含曼、珍曼、協曼、引曼、琬曼、資曼、瑤曼、瑤曼等。吳宓自知「陀曼」不通，但難拗楊太淑人之命，且以下弟妹又均以「某曼」為名，也只能將錯就錯了。

吳宓自幼受祖父影響極深。1911 年，他 17 歲入清華學堂，1917 年赴美留學，先入弗吉尼亞大學英國文學系，後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師從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與陳寅恪^[77]、湯用彤^[78]被譽為「哈佛三傑」。1921 年，吳宓 27 歲獲碩士學位後歸國，受聘於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同年與梅光迪^[79]、柳詒徵^[80]等人一起創辦了《學衡》雜誌，先後共主編出版 79 期，以宏揚中國文化，傳播西方新人文主義，試圖結合中西方文化之所長。

1925 年，吳宓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時，聘請王國維^[81]、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82]「四大導師」，培養了一批兼通中西的文史人才。

【77】 陳寅恪 (1890-1969)，江西義寧人。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吳宓稱其「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78】 湯用彤 (1893-1964)，字錫予，湖北黃梅人。其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中國近代著名國學大師，中央研究院院士。

【79】 梅光迪 (1890-1945)，字迪生，安徽宣城人。1921 年任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主任時，與吳宓創辦《學衡》雜誌。

【80】 柳詒徵 (1880-1956)，字翼謀，江蘇鎮江人。中國近現代史學先驅、文化學奠基人、現代儒學宗師、書法家。

【81】 王國維 (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中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方面的學術鉅子，國學大師。

【82】 趙元任 (1892-1982)，字宣仲，江蘇武進人。1910 年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後任哈佛大學哲學系講師、中文系教授。1925 年受聘任清華國學院導師，乃中國語言學先驅。

著名學者、作家錢鍾書^[83]、曹禺^[84]、王力^[85]、李賦寧^[86]、季羨林^[87]等，均出其門下。吳宓說：「予學詩於陳伯瀾姑丈」。不僅如此，吳宓的人文情懷「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與社會觀念「不贊成革命暴力，主張社會演進」，也深受祖父之影響。

他創辦《學衡》，不懼來自左、右的攻擊始終如一，均來源於對中西方文化認識的深刻。1919年3月27日《吳宓日記》說：「今世之大患，莫如過激派 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其國民之程度最高者，過激派之來也遲，或竟不得逞。譬猶身體素強，則不感風寒。如英國是。而過激派之來，有如病毒黴菌，必致天翻地覆，實無絲毫佳處。凡下愚之人，多樂從過激派，則以劫殺乃人之天性之一種也。而上流之人，亦有提倡過激派者。此等人非盲從，即黑心。此等人少生一個，其國之福也。凡自昔以『革命』等號召，均不外劫殺竊盜之用心。古今東西，實無微異。」今日讀來，真是先知先覺醒世之言。

吳宓是個至情至性表裏如一的人。他深受中國文化熏陶，一生尊師重道，孝親悌幼，耿直率真，不阿流俗。他在《空軒詩話》的「平生自謂」中說：

予恆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戀愛亦人格之表現。予於德業，少所成就，於戀愛生活，尤痛感失敗空虛，然予力主真誠，極惡偽善，自能負責，不恤人言，且敬事上帝，篤信天命。對人間萬事，一切眾生，皆存悲憫之心，況於親交之友及深愛之女子豈有不婉解曲諒，而為之誠心祝福者哉。予對人但有愛怨，對己不免矜憐，於公共之事業責任，則黽勉竭力，於一己之快樂享受，則犧牲無怨。」

此說，確能真切概括其為人品性。正像陳寅恪謝絕郭沫若^[88]之邀，不北上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樣，吳宓也謝絕了他的學生胡喬木^[89]邀

[83] 錢鍾書 (1910-1998)，字默存，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和翻譯家。代表作品有《圍城》、《談藝錄》。

[84] 曹禺 (1910-1996)，原名萬家寶，字小石，湖北潛江人。中國著名劇作家、戲劇教育家。代表作有《雷雨》、《日出》等。

[85] 王力 (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人。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

[86] 李賦寧 (1917-2004)，陝西蒲城人。西方語言文學大師、教育家、翻譯家。

[87] 季羨林 (1911-2009)，山東臨沂人。文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

[88] 郭沫若 (1892-1978)，四川樂山人。中國新詩的開拓者、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但其在一系列政治活動中的人品受到廣泛的質疑。

[89] 胡喬木 (1912-1992)，江蘇鹽城人。中共理論家，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共政治局委員。

其參加《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之請，二人之舉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於當時情勢下殊屬難得。

吳宓與陳心一育有三女：學淑、學文、學昭。吳、陳離異後，二人對3個女兒均呵護有加。3個女兒中，以學昭最為激進，她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參加了中共地下黨，1949年為表示其「革命」，宣佈與吳宓脫離父女關係，此舉對一貫注重親情的吳宓打擊甚大，也引起親友的諸多非議。以後的各種運動、批判，吳宓均在劫難逃。而在筆者父輩的心目中，吳宓一直是一個值得大家尊敬的大表兄。

吳宓於1941年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1942年到1944年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1945年改任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1946年至武漢大學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90】}以文學院院長之位邀其南下，且其好友陳寅恪亦在嶺南，教育部長杭立武^{【91】}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文學院長，女兒要他去清華大學，而他於4月底飛到重慶到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兼任梁漱溟^{【92】}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兩院相繼撤消，吳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9月又隨校併入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後到中文系）任教。結果是虎落平陽，晚景甚為不佳。

至文革到來，吳宓成為西南師院批鬥的頭號罪人，打入「牛棚」，強行勞改。76歲的老人幹不動重活，還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後跌斷左腿胯骨，以致夏天斷腿處竟生出蛆蟲。之後，他又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又令他打掃廁所。直到1971年，吳宓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1977年，吳宓生活已不能自理，由其妹吳須曼領回老家，終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顧和溫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吳宓病逝老家，一代文學大師就此淒涼而去，終年84歲。

【90】 陳序經（1903-1967），海南島文昌人。1925年赴美留學，獲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回國後任教南開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後任嶺南大學校長、暨南大學校長，為著名思想家和學者。

【91】 杭立武（1903-1991），浙江杭州人。一生歷任教育、文化、外交、社會團體等各方面要職，晚年仍不懈從事保障人權和救助難民的工作。

【92】 梁漱溟（1893-1988），河南開封人。中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還是社會實踐家，對推動鄉村建設不遺餘力。

1-12 如饑似渴地想辦法讀書

1953年秋，我考入離家不遠的北京22中。這所學校第一任校長是蔡元培^[93]，時任校長是著名教育家郝仲青^[94]。學校一直注重學生德、智、體、音、美的全面發展。一入校感到比小學大多了，老師既嚴格又親切，課程也很容易。

校圖書館一人一次可以借5本書，第二天我就借了5本，就這樣，一學期下來，差不多看了五、六百本，有各國民間故事、寓言、童話、小說、遊記……，圖書管理員都說我是借書最多的學生。讀書時也常常琢磨：為什麼中國和歐洲的書那樣不同？前者多讚賞「勤勞致富」，後者卻頌揚「探險尋寶」；前者多反對「喜新厭舊」，後者卻鼓勵「不破不立」，一時也想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學校裏體育比賽很多，最讓人羨慕的是那些練體操的大同學，特別是高年級的李大鵬和李大器兩位，他們全身肌肉十分健美，很令人羨慕。我一有空，也就學著練雙槓、單槓，一個月後學會了雙槓的「三起」（挺胸起、蹬空起、後拉起），兩隻胳膊都磨破了，但兩胸與胳膊的肌肉卻明顯地隆起了。那時，我還特別喜歡圖畫課，畫的畫也常被拿去展覽，後來又參加了北京少年宮美術組。

一學期下來，雖然我各科成績都在前三名，但老師的傳授仍滿足不了我求知的渴望。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交道口，那裏東北拐角有個店，專租各種小人書、各種俠義章回小說和各國長篇小說。上小學時，我就常到這家店租書看，書店老闆一看見我，就給我介紹各種書，而且會給我租書的優惠。那時，租一本書看一周要五分錢，可我一個月零花錢才一毛。怎麼辦呢？

我只能去釣魚、摸蝦、捉蠅蠅、逮蚰蚰來換錢。於是乎，安定門外窯坑、朝陽門外六里屯、廣安門外荷花池，就成了我下課後經常光顧的地方。釣到一隻三斤重的大青魚可以賣六毛錢，摸一斤小蝦只能賣一毛錢，一隻叫得很脆的蠅蠅也就賣三毛錢，有一次我捉了一隻全鬚全尾的大八厘黑蚰蚰竟一下賣了3元錢。書店老闆答應我放學時借書、第二天上學前還，每本只收兩分錢。

這樣，我一放學租個一兩本，什麼《七俠五義》、《小五義》、《狄家將》、《包公案》、《大紅袍》、《兒女英雄傳》、《江湖奇俠傳》、《蜀山劍俠傳》、

[93] 蔡元培 (1868-1940)，號子民，浙江紹興人。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國學大師。

[94] 郝仲青 (1879-1957)，河北霸縣人。著名教育家。

《青城十九俠》、《三俠劍》、《彭公案》、《施公案》，光是《濟公傳》就一百多續，《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書，又看了五、六百本。也許是受這些民俗文學的影響，行俠仗義、扶弱濟貧、追求大同、懲治貪腐，漸漸融入了我兒時的夢想，成了我的嚮往。

父親這時開始讓我看一些祖父的存書，最先引起我興趣的是《聊齋》、《封神榜》、《蕩寇志》、《三言》、《儒林外史》和蔡東藩的《二十四史通俗演義》，接著是《綱鑑易知錄》、《古文觀止》和《焚書》等。祖父的《審安齋詩集》和《審安齋遺稿》，我翻了翻，興趣不大。但祖父存的碑帖拓片、名人字畫，我雖還不懂得怎麼欣賞，卻可以讓我照貓畫虎進行臨摹。

很快，學校又進了一批蘇聯小說，果戈理、普希金、托爾斯泰的書以及《古麗雅的道路》、《真正的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還有《牛虻》、《絞刑架下的報告》、《格蘭特船長的兒女》、《福爾摩斯探案》、《亞羅平探案》、《鮑爾頓探案》、《魯賓遜漂流記》等，都很吸引我。於是，福爾摩斯、保爾、伏契克、魯賓遜又成了我崇拜的英雄。

不久，父親給我買來了「趣味」系列，有《趣味數學》、《趣味物理學》、《趣味天文學》、《趣味化學》、《趣味生物學》。我的學習興趣不知不覺中又轉到了自然科學，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裏，我每天嘗試著作各種試驗，還做出了土火藥和土火柴。

母親生了小妹一詒後，全家搬到北京西南的宣武區白廣路水電設計院宿舍，我一人留在前園恩寺以讀完初中。父母不在身邊一年多，我的自由度更大了。

我還學會了用青蛙皮做胡琴，用青蛙尿搞惡作劇。又學著做了一個手搖的小捲煙機，捲的煙可以在小市上賣錢，維持我租書的開銷。在姑母家後院的過道裏，我種滿了黃瓜和玉米，供我和孩子們解饞。各種棋牌遊戲，小朋友中也很少有人玩的過我。

表哥王松聲在北京市文化局當藝術處處長，常常帶我去看各種文藝節目，像京劇、評劇、話劇、相聲、說書、歌舞，差不多每週都看個一、兩場的，比如梅蘭芳的《霸王別姬》、《貴妃醉酒》，馬連良的《甘露寺》、《失空斬》，譚富英的《將相和》、《二進宮》，筱白玉霜的《秦香蓮》、《玉堂春》，新鳳霞的《劉巧兒》、《鳳還巢》，還有侯寶林的《買猴》、《夜行記》等，我看了都不止一兩次，如醉如癡的。還看了烏蘭諾娃的《天鵝湖》，到音樂廳欣賞各種演奏會。後來，竟還真當了兩回湊數的票友^[95]。

[95] 票友：戲曲界的行話，其意是指會唱戲而不以專業演戲為生的愛好者，即對戲曲、曲藝非職業演員、樂師等的通稱。相傳清代八旗子弟憑清廷所發「龍票」，赴各地演

回想起來，從童年到少年的那一段時光，實在是我一生中過的最為快樂的日子。就是在這樣一種憂國憂民的知識家族氛圍中，我漸漸長大成人了。

1-13 「小臭」莊則棟的成功

初一下半學期，我當了少先隊中隊長，班主任讓我和王肇基組成小組幫助莊則棟^[96]。莊則棟是全校出名的調皮生，和我住一個胡同。他父親是個中醫，叫莊肇一，有一次給病人扎針過深出了問題，故改名莊惕深。他大夫人是哈同^[97]的乾女兒，出嫁時哈同給了不少嫁妝，家境很富裕。莊則棟則系二娘所生，由於生母的溺愛，他上小學時就既豪爽又任性，一次和一個女生吵嘴，竟把人家打的頭破血流。

莊則棟上中學後，仍不好好學習，到處惹事，經常受老師責罰。那時班上同學家裏多不寬裕，莊則棟常愛顯擺，買了個小黑皮球，今天不讓這幾個人玩，明天不讓那幾個人玩，不到一學期把自己孤立了。同學們三五成羣地玩彈球、夾包、撞拐、拍洋片等各種遊戲，可是見他一來，就叫嚷著「小臭來了！」，「小臭來了！」，都跑了，把他弄得很是無趣。

他家住在前園恩寺1號，我下課就常去他家，和他一起做作業。他父母都很和善，也耽心孩子成績不好將來沒出息，很歡迎我。可我看他集郵很認真，只要他認真的事就可以做的很好。我那時也喜歡集郵，每逢課後或週末早晨，就到王府井的「中國集郵公司」門前換郵票。記得一次，我和他為換郵票起了爭執，鬧翻了。王肇基家住百萬莊，不久也轉學了。我們這個「學習幫助」小組也就散夥了。

初二時，我先參加了少年宮美術組，跟中國美院李松濤老師學水墨畫，他畫的老虎特別有名。後來，我畫的一幅中式水粉畫，還送到世界青年聯歡節展覽。接著，又參加了舢板組，划200米六人舢板，一年後得了個北京青少年組第二名。還有航模組，學作模型飛機。後來又參加了游泳組，學游泳和跳水。也不知道那時，怎會有這麼多的精力。

莊則棟一直參加少年宮乒乓組，被教練莊家富看中，重點培養。初二結束時，他擊敗了北京七中的張紀潭，獲得北京市少年乒乓冠軍。這個冠軍可救了他，因為他常在校受罰，就很恨那位嚴厲的教導主任楊老師，一

唱子弟書，不取報酬，為清廷宣傳，後就把非職業演員稱為票友。

[96] 莊則棟 (1940-)，中國著名男子乒乓球運動員。

[97] 哈同 (1851-1931)，生於巴格達貧困猶大家庭，五歲隨父母遷居印度後加入英國籍。1873年隻身到上海，1901年創辦哈同洋行，專營房地產成為大亨。

天正下著大雪，他看見楊老師走過來，便捏一個雪球打了過去，把楊老師的眼鏡打碎了，眼角也流了血，學校正準備要重重地處分他。因為這個冠軍，特別重視體育的二十二中，也就擱置了處分。

初三快結束時，莊則棟蟬聯了北京市少年乒乓球冠軍，又打敗了當時歐洲亞軍傑特維。22中把他培養成「三好學生」並升入高中。以後再一次見到他，已是1958年了，我帶少先隊員到陶然亭游泳池去，經他斡旋，管理員才讓孩子們進門游泳。再後來，他連奪三屆世界乒乓球賽男子單打冠軍，為中國爭了光，大家都替他高興。

記得當時數學的老師叫劉謙，動不動就讓不好好讀書的莊則棟罰站，總是訓他說：「你整天就知道打球，不好好學習，一上課就打瞌睡，打球能讓你將來混口飯吃嗎？」你還別說，莊則棟後來不僅靠打球吃上了飯，而且吃的還不錯。可見，人年輕時若能依其天份發展，揚其所長，因材施教，才會為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正所謂「行行出狀元」呵！

1955年秋，學校開始實行「半工半讀」，把我分到後門橋的「馬凱食堂」義務勞動。這個餐館做的菜味道特別的好，尤其是「溜肝尖」、「炒腰花」、「裏脊玉蘭片」一類菜餚，很受顧客歡迎。每天午飯後，我就去那裏勞動，掃地、擦桌子、洗菜。當時餐館的大廚手藝出色，但性情有些古怪，員工都很怕他。聽說他原來在北京飯店操廚，因為得罪了領導才被下放到這家小飯館。

在這裏幹了約一個月，這位大廚看我幹活勤快，又不怕苦不怕累，喜歡上了我，還時不時的讓我給他幫幫廚，教我怎麼做菜。半年的時間，我從他那兒學到了不少炒菜做飯的本事。其實，這位大廚人很善良，只是看不慣北京飯店領導的指手劃腳，頂撞了起來才被貶。70年代初，這家餐館搬到了鐘樓附近，改名叫「馬凱餐廳」，生意做的很是紅火；我曾帶幾個朋友去吃飯，想順便拜訪一下師傅，可惜他那時已不在那裏了。

學校的課業不重，我一有空就讀文學書，莫泊桑、契柯夫、歐·亨利、魯迅的短篇，普希金、雪萊、海涅、泰戈爾的詩，莎士比亞的戲劇以及巴爾扎克、雨果、陀思妥也夫斯基、羅曼·羅蘭、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都是這時讀的，也開始讀《烏托邦》、《懺悔錄》、《名人傳》、《弗蘭克林傳》、《馬克思傳》等書，每天從晚飯後一直讀到夜裏一兩點。

不久，學校認為我「又紅又專」，還發展我加入了共青團。每年我也都參加學校組織的一些宣傳活動，像「歡迎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勝利歸來」、「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上街敲鑼打鼓遊行，等等。當然，每年「五一」、「十一」排成方陣，站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這種「政治任

務」是必須完成的。在空軍服役的三姐夫經緯，還帶我去了幾次東郊民巷的空軍俱樂部，我在那裏認識了空軍戰鬥英雄王海和張積慧，他們給我講了許多空戰的故事。

1-14 胡耀邦題詞：「青年代表著國家的未來」

1956年7月我初中畢業後，為和父母住在一起，就選擇了離家最近的北京66中讀高中。當時的校長叫姚幼鈞，以前是個新聞工作者，教導主任叫朱玄，教育工作經驗豐富。這所學校創辦時間不長，但很快成為宣武區的重點中學。我入學時，這所學校剛由女校改為男女合校，又是第一次招收兩個高中班，一個女生班、一個男女合班。我入校不久，被選為校團委的宣傳委員，並兼初一五班的少先隊輔導員。

這時，社會上已開始「鳴放」^[98]，中學只在教師中整風，學生中倒沒什麼大的動靜。但看得出來，社會上的「反右」給不少家庭帶來了麻煩。上課以外的在校時間，我大都和初一的小孩子們在一起，給他們組織各種活動，像朗誦比賽、繪畫比賽、乒乓球比賽、足球比賽，到蘆溝橋紀念7.7事變，去紀念碑緬懷先烈，還組織夏令營、冬令營活動，和孩子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10年以後，我在北大挨批鬥時，他們還自動組織起來去救我。

可能是青春期的萌動，從初中二年級起，我開始喜歡看小說中的一些愛情故事，看到感人處總會臉紅心跳的。高一時一個同學借給我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全本拍案驚奇》，我饒有興趣地讀了起來。因為當時的「禁慾主義」教育，書中描寫情愛一類的東西都被認為是「腐朽墮落」的，官方出版的古籍版本，把書中涉及性愛的部分都刪節了，我以前看的「初刻」、「二刻」，全都是刪節本。

我們家規定孩子們晚上十點半睡覺，我就鑽到被窩裏打開手電繼續看。正看得來勁時，忽聽到「怎麼還不睡覺？鑽到被窩裏幹甚麼哪！」不知何時父親走了過來。他拿起書一看，二話不說就把書拿走了。我悄悄爬起床，蹣手蹣腳地走到父親的房間，從門縫裏一看，父親正在看剛剛沒收我的書，我只好回去睡覺了。原以為父親會責罵我一頓，沒想到第二天父親下班，竟把書還給我，說：「這種書不是不能看。但心思一定要放在正經的學業上。過早地關注情啊愛啊，今後會沒有出息的。」我連連點頭。

[98] 『鳴放』：事實是：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的「鳴」、「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上來，賦予全新的意義，並將「鳴放」引向政治。

1957年5月，第三次團代會召開，團中央少年部讓我帶30個少先隊員給新當選的大會主席團獻花。主席團成員接受了少先隊員的鮮花和領巾後，剛當選為第一書記的胡耀邦^{【99】}笑容可掬地走過來，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好好好，你這個輔導員幹得不錯！來來來，介紹介紹你的工作。」他和藹、親切、率直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我。

少先隊員們坐在一個可以容納百人的會議室裏吃水果，我毫無拘束地彙報了半小時。臨走時，我突然靈機一動，說：「耀邦同志，給我題個字吧！」他拿起鋼筆在我的小本扉頁上題了「青年代表著國家的未來 胡耀邦」幾個字，還笑著說：「哈，這是總理的話，我照搬！」第三次團代會結束時，在新完工的北京飯店新廳舉行茶話會，我收到了團中央的邀請信。

晚上8點左右，大廳沸騰了，耀邦高興地陪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進入了會場，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看到了這些共產黨人中像神一樣的傳奇人物，心裏十分激動。過了半個小時，領導人都跳起舞來，毛澤東、劉少奇都跳的很慢，周總理則是風度翩翩地滿場飛。聽旁邊的人說，那些陪領導人跳舞的漂亮女孩，都是特地從總政歌舞團請來的演員。

趁舞曲暫停，我擠到了耀邦的身邊。他看見我，立刻拍著我肩膀說：「年輕人，一塊跳舞！」我趕忙說：「我不行，我不會！」他爽朗幽默地說：「不會學嘛，開明一點，別當個『小封建』噢！」那時，中共建政初期，幹部們清廉、親民，社會穩定，我們又接受了大量「共產主義是天堂」的教育和受許多蘇聯文學的影響，都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充滿了無限憧憬。

不久，胡耀邦在團中央作了一個修建十三陵水庫的激情動員，號召青年團員不怕「風硬水硬窩頭硬」，帶頭為建設共產主義事業獻身。我最先報了名，卻沒被批准，醫生檢查我患了嚴重的關節炎。想起保爾當年忍著病痛不怕犧牲築路的精神，我決心為田漢描述的「十三陵暢想曲」添磚加瓦。經三番五次的請求，學校終於批准我參加十三陵水庫建設的「66兵團」。兵團開到十三陵工地前線，住在一間四面透風的茅草屋裏，人擠人睡在一起，每個人側身躺下就不能動了，誰要起夜回來就沒地方睡了。

第二天天一亮，整隊走一個多小時才到工地，幹兩小時休息十分鐘喝點水，中餐、晚餐都是窩頭就鹹菜。下工時天已黑，一步一移地回到住

【99】 胡耀邦（1915-1989），湖南瀏陽人。時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一書記；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曾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組織部長、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總書記，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討論，在民眾中有很高的評價；因其病逝，引發了「八九民運」。

處，躺下就睡著了。到了第三天，大家手上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泡。我腿疼的站不起來，就跪著往筐裏裝沙石。幾天後我發高燒昏迷了，醒來看見大家都出工了。我就一點一點爬到工地，咬著牙幹了起來，結果受到指揮部表揚。10天下來，我不僅天天帶病出工，而且一頓飯可以吃8個三兩的窩頭，膝蓋的疼痛也麻木不知了，直到我們完成任務，建成一條「666315」（指北京66中、63中和15中）攔水牆，勝利返校。

1958年寒假後，學校響應「掃盲大躍進」的號召，組織全校師生參加「掃盲運動」，我被分到牛街的菜市口浴池。每天下課後，先到浴池幫師父打雜，給顧客端茶倒水，下班後給不識字的職工教認字。後來，還跟老師傅學搓背、捶腰、修腳，很快跟他們打成了一片。掃盲進度很快，浴池的職工都對我的工作很滿意，區裏測驗成績優秀，給我評了個「掃盲模範」。

接著，全國開展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運動。家家都放老鼠夾、老鼠藥抓老鼠。每人一個蒼蠅拍，晚上報打了多少。五月份，北京「大戰三天」，男女老少一起上陣殲滅麻雀，天一亮大家就站上房頂牆頭，揮舞彩旗，敲鑼打鼓，讓麻雀無處棲身，每個人也都喊得口乾舌燥，不少麻雀飛不動了就從天上掉了下來。很快「大躍進」掀起了高潮。

學校還組織學生參加夏收當農民，我從中體會到了「鋤禾日當午，汗滴合下土」的辛勞。後來，又去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幹活當工人。我們的食堂辦的不好，學校讓我去當管理員。我想起過去「老字號」飯店的經營辦法，也就來它個「長進短出」，頭三天油水大，大油大肉、大米白麵，讓大家把肚子填足；三天以後，油水逐漸減少，半葷半素，粗細糧搭配；一周後又加些油水，過三天再減下來。一個月下來，大家吃的都很滿意，伙食費還有了結餘。

放暑假，我們到南口6028坦克團實習當戰士。天氣很熱，開始練集合、解散、隊列、左右看齊、齊步走、正步走、跑步走，接著練穿越沙灘、水溝和溝豁，晚上一躺下來就動彈不得了。10天以後，練越野、體操、射擊、扔手榴彈。再後來，先用三八大桿打200米胸靶，我僥倖打了個全紅，又學了726蘇式步槍，再學54手槍。20天以後，穿上坦克兵的服裝和戰士學開坦克。每天都是幾身汗，確實受到很大的鍛練。一個月學軍結束，我被評為「五好戰士」。部隊領導專門把我送到北京，還照相留念。

1-15 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

1958年9月剛開學，黨中央號召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開始了。雖然學校作了動員，響應「以鋼為綱，全面躍進」，「大搞群眾運動，大搞土法煉鋼」的號召，但實際上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急得發愁。我靈機一動，去查報紙雜誌，結果在《科技報》上找到一篇河南「商城土爐」煉鋼的報導，似乎簡易可行、容易辦到。我向校領導一彙報，立即得到了支持。

我找了幾個愛動腦筋的同學一齊動手，夜以繼日地苦戰了半個月，終於煉出了宣武區中學的第一爐鋼，向上級報了喜，學校也總算交了差，區裏又給我評了個「煉鋼英雄」。當時，大家都狂熱了，「一天等於二十年」、「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叫的震天響，標語貼的到處都是。年底，我先後被北京市評為「優秀青年」和「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

當時，錢學森^[100]說，「糧食畝產萬斤不是問題」，若充分利用太陽能量，畝產可達百萬斤。這年秋天，各地大放小麥、水稻畝產衛星，北京的學校也得響應號召。就在操場東南角挖了一塊大約三分大的地，深有八尺，一尺糞一尺土墊了四層，下麥種300斤，計劃畝產20萬斤。結果第二年麥苗出土還挺喜人，密麻麻綠油油的，到三四月間，卻長成了一片綠色的牛毛，拔節時仍瘋長不休，一個穗也沒出來。可能是怕丟人，不知誰下令，這塊地一夜之間給翻掉了。我和母親說起此事，母親說她任教的北京六十三中種的「萬畝田」也像這樣。

開春以後，學校又搞起了「體育大躍進」。像乒乓、摔跤、拳擊、三個人決出第一，三個第一再決出第一，三個第一的第一再決出第一，也就是27個人中的第一名，這個人就是三級運動員。只要你不怕摔得腰酸腿疼，就會當個摔跤三級運動員，不怕打的鼻青臉腫就可以當個拳擊三級運動員。至於徑賽、田賽，要想當個「三級運動員」就不容易了，因為有硬指標卡在那裏。

想想還真有趣，為實現指標，不少男同學不是頭上纏著紗布，就是胳膊上吊著繃帶。大家瘋鬧了一、兩個月，全校湧現出了幾十個三級運動員、幾個二級運動員。我只通過了一個「二級勞衛制」。幸好，我那時每晚回家做功課、看小說從不耽誤，文理科成績一直是第一名。高三畢業班進行了幾次全區、全市的語文、數學測驗，我的成績都是最好的。

[100] 錢學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中國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為中國「兩彈」(指原子彈和氫彈)上天作出了很大貢獻。

母親拿出父親從廣東寄來的兩封信給我看。一封是去年9月沿西江考察時寫的，信中說：「群眾熱情很高，幹勁空前。可惜植被破壞恐不利水土保持。各地吃飯不要錢，大家歡天喜地。我們所過之處，頓頓雞鴨魚肉，甚至吃上了老虎肉。浪費的嚴重，讓人吃驚。我已向省裏反映，頭腦發昏是會吃虧的。」一封是今年2月寫的：「廣東提出『鼓足幹勁搞生產，放開肚皮吃飽飯』，已造成不少地方斷糧，顯然違背了自然規律。」我很是疑惑，大躍進怎會如此？但父親一貫求實，又不可不信。

班上一個家境貧寒的周姓同學被抓了，說他常在廣安門商場偷東西。我問他為什麼偷？他說媽媽吃不飽，常挨餓。我和母親一說，母親立即給我五塊錢、十斤糧票讓送給他。後來，他退學了。再見到他時，他戴了一個大口罩，清晨正在街上揀破爛，說要養活多病的母親。往後幾個月，北京街頭的乞丐好像不知不覺多了起來，食品的供應也開始緊張，幾乎購買日用必需品都開始要票證了。

我們的校長姚幼鈞是個和藹可親的人。高三開學不久，她把我叫到校長辦公室，肯定我入校兩年來的表現優異，接著問我想不想入黨？我很惶恐，連忙說：「我不夠格！」姚校長笑咪咪地送給我一本書，我一看是一本艾寒松寫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她說：你認真讀一讀，寫個人黨申請書給我，我可以介紹你入黨。我激動地回到家，連夜看這本書直到天亮。

父親這時正在廣東，母親對孩子們這類事從不過問，我也沒個什麼人可以商量。連著一個禮拜，我把艾寒松這本書看了幾遍，要點幾乎都能背下來了。艾寒松描述的共產黨員幾乎要具備中國傳統上仁人志士所有的優秀品質。這和父母從小對我的教育，諸如：「儉樸勤勞」、「先人後己」、「急公好義」、「正直剛毅」、「以天下為己任」等等，十分暗合。

週末，我到表哥王松聲家向他請教。他說：這是好事啊！看來黨組織準備吸收你入黨了，快把申請書交上去。我說，追求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也是我們從小的嚮往。好像和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致的。可不斷的運動總在整人，許多名人都挨批了，讓人費解。

1-16 1959年，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表哥王松聲是聞一多^[101]先生的高足，抗戰時期赴延安參加革命，1939年入黨，在關中作地下工作時，和王炳南^[102]的堂妹王效嵐結婚。組建北京市委，時任秘書長。1957年隨胡耀邦率團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任秘書長。回國後，因「同情右派」，結果弄了個「右傾」，先後貶為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藝術處處長。他為人正直、熱情、豪爽、有見地，我從初中起就不斷受到他的指教。我叫他表兄，是因為論資排輩起來，王效嵐叫我外祖父「叔爺」，他們兩口叫我父母「八叔」、「八嬸」。

表哥和我說：「大同世界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也可以說是一種空想。因為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人們並沒有找到實現這個理想的方法和途徑。康有為和孫中山也認識到私有制的弊端，但只有共產黨人真正深刻地認識到，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對剝奪者實行剝奪才能實現人類美好的理想。不通過鬥爭，舊勢力和他們的代表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你看，新中國剛建立不到10年，社會安定了，人人就業了，貧富差別消失了，娼妓盜匪沒有了。再有二、三十年，我們就可以實現人類幾千年來未能實現的理想，做一個為之奮鬥的共產黨員多麼光榮啊！」

表哥一席話說的我熱血沸騰。回家連夜寫了「入黨申請書」，第二天一早交給了校長。下午校長又還給我，改了幾個字，添了幾句話。我又工工整整抄了一遍交了上去。6月初，姚校長代表校黨支部跟我談話，我才知道她還兼任校黨支部書記。她莊重地說，黨組織決定吸收你——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6月26日，我和同班同學王敬榮，一起成為學校中第一批發展的學生黨員。

表哥還介紹我讀格拉塞寫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學習方法和工作方法》，我到書店買了一本，反覆閱讀受益匪淺。書中提到要成為一個有較大貢獻的人，必須具有「巨大的理論能力，巨大的宣傳能力，巨大的組織能力」。看來，自己今後應該從這三方面鍛鍊，以適應工作的需要。我入黨後，去看表哥，他說：「從入黨到成熟，適應黨內生活，還要慢慢磨練。」我雖點頭稱是，卻還是不太理解。

父親從水利部正式調職廣東創辦廣東水利學院，5月進京接母親和妹妹、弟弟去廣州。一個週末，父親帶我到青龍橋車站瞻仰詹天祐^[103]的銅

[101] 聞一多（1899-1946），湖北黃岡人。中國著名學者、詩人。

[102] 王炳南（1908-1988），陝西乾縣人。1926年參加中共，為著名外交家。

[103] 詹天祐（1861-1919），安徽婺源人。中國第一位鐵路工程師，修建了京張鐵路等工程。

像。一邊參觀一邊講解當年詹天佑如何克服種種困難，建成青龍橋鐵路為國爭光的故事，並詢問我的志向及準備考哪個大學。我說：「新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有個高速空氣動力學系，錢學森當系主任，我想考這個系，將來研究原子彈、氫彈。要不然，就研究物理，這是各門科學、技術的基礎。」

父親說：「少奇同志最近說，我國今後的任務主要是建設好社會主義。原子彈、氫彈幾十年以後就不先進了。你看牛頓發現萬有引力、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貢獻多大！一個國家基礎科學上不去，其他領域上去會很困難。我看你不如上北大物理系理論物理專業，研究原子核結構這類課題，這是有長遠意義的啊！」聽父親一說，我把高考志願改成了：第一志願：北京大學物理系；第二志願：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第三志願：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高速空氣動力學系。高考前兩個月還有個小插曲：空軍來招人，選中了我，因為身體檢查時，我的眼耳鼻特別好。後來，學校通知我說區委沒有同意，想讓我去留蘇預備班以便深造。可能是因為中蘇關係出現了問題，過了一個月，就又讓我參加高考了。

高考前一週，為放鬆神經，我天天讀小說，跑步、游泳。考前一天，同班的俞伯良來找我，問一道幾何的軌跡題怎麼解，我當時也不會。我們就一起去問數學老師，一時也沒解出來。說來神奇，在高考前一天的夜裏，我竟然在夢中把這道題給解出來了，早晨驗算了兩遍，一點不錯！考前半小時，我把夢中參到的解法告訴了俞伯良。高考數學竟真出了這道題，我們兩人都多揀了20分。後來，俞伯良考到了中國科技大學半導體系。

8月中，我收到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的錄取通知。正巧這時父親又到北京開會，不僅給我講了家族的往事，而且還帶我看望了覃修典、張有齡、謝家澤、陳明紹和梁思成^[104]幾位伯伯，月末又到北大先後拜訪了湯用彤、馮友蘭^[105]、朱光潛^[106]、林庚、李賦寧和周培源^[107]、饒毓泰^[108]、葉企

[104] 梁思成 (1901-1972)，廣東新會人。中國著名建築學家、建築史學家、建築教育家。

[105] 馮友蘭 (1895-1990)，河南南陽人。中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

[106] 朱光潛 (1897-1986)，安徽桐城人。中國著名美學家、教育家、翻譯家。

[107] 周培源 (1902-1993)，江蘇宜興人。中國著名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和社會活動家。

[108] 饒毓泰 (1891-1968)，江西臨川人。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文革中不堪受辱而自殺。

孫^{【109】}諸位先生，他們都是父親與大表伯的朋友，後來對我有很多關照和指教。

從我長大以後，從沒和父親有過這麼多的交流，以後也再沒有過。父親臨走告誡我說：「一個人要能擺脫名韁利鎖的羈絆，將個人得失置之度外，才可以做到無慾則剛，也才能為國家和民族做些大事，中外先賢莫不如是，自己修道亦正為此。祖母修佛明心也為的是安貧知樂、不欲不貪，使本性不致迷失。但人年青時難免犯錯，知錯能改則為至善，兒其勉之」，讓我永生銘記。

我和父親分手時，父親給了我12元錢，10元伙食費，2元零花錢。父親又教誨我說：「學業上要 and 好的比，生活上要和差的比。還要切記『外儒內道，常存佛心』這八個字，對己要『外儒內道』，待人應『常存佛心』，此生既使無大為，亦可無愧矣！」父親的品德學識、為國為民，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看著父親轉身慢慢離去，我想起了朱自清^{【110】}的著名散文《背影》，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

我，對即將開始的大學生活，充滿了憧憬……

【109】葉企孫（1898-1977），上海人。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文革中備受折磨。

【110】朱自清（1898-1948），浙江紹興人。中國著名現代散文家、詩人。

第二章 燕園春秋 10 年（1959-1969）

——追求理想與倍受磨難

從 1959 年開始，我在北京大學度過了跌宕起伏的 10 年。我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熱情激進，被文化大革命的極左狂熱打得粉碎。國家的出路何在呢？

2-1 「反右傾」和批判馬寅初

走進北京大學校園，確實給人一種自豪感。北京大學不愧是中國的最高學府，它的前身是戊戌變法時成立的京師大學堂。蔡元培任校長時奠定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廣延良師，教授治校」的優良校風。以後雖屢經磨難，但因人文薈萃，始終保持了一定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

可以說，北大因其中西合璧，古今交融，故而學界翹楚匯聚，青年才俊輩出。北大既有「五四」的激越，也經受了「文革」的慘烈。其校園的俊美更在中國各高校無出其右，未名湖畔的小橋流水，島閣飛簷，博雅塔下的湖光塔影，孕育精魂。一代代長城內外、塞北江南的學子，懷著報國救民的夢想到這裏苦讀求知。

北大物理系當時是全國各高校系科錄取分數線最高的。從各地考入的同學一個個都喜不自禁。1959 級錄取了近 200 個學生，分成了四個班，我分到三班當團支部書記。大學和中學很不同，每周課表提前發出，不同的課教室不同，人數也不同，要自己尋找授課地點。大課 90 分鐘，小課 45 分鐘，實驗課則一般要半天或一天。沒排課的時間就自己安排自習，靈活支配的時間很多。

物理系一年級的主課是普通物理和高等數學。物理系叢樹桐老師開物理課，課本是福理斯的《普通物理學》；數學系文麗老師開高等數學，課本是菲爾斯哥爾茨的《高等數學教程》，兩門課都講的引人入勝。物理實驗課最有趣，做「自由落體運動」、「加速度」、「布朗運動」這一類實驗可以讓人忘掉一切。大學緊張的學習生活開始了。

還有個滑稽的事：大學外語可從英語、俄語任選一門。母親寫信讓我學英語，我也報了英語。黨支部組織委員叫王玉倉，是個工農調幹，人很

實在，悄悄跟我說：「你還是個預備黨員，怎麼能學帝國主義的語言？一定要學俄語，我幫你改過來了。」從此，我一直學俄語。但也許是命中注定，我與說英語的「美帝國主義」緣份過深。「六四屠城」以後，我被迫離國流亡至美，一住就是 20 多年。

當時，學生食堂採取的辦法是：自己打飯打菜，自己交錢和糧票。可大家的共產主義覺悟不夠，每個月食堂結算都要虧損 2/3 以上；每天都有夜宵，供應非常豐富，也是免費的。兩個月以後，就又有由食堂師傅打飯打菜、收錢收糧票了。即使這樣，我一個月的伙食費也不過六、七元錢。父親每個月給我 12 元錢的生活費，我總能用五、六元錢買上幾本書。

但開學還不到一個月，系黨總支召開黨員會議，傳達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反右傾」的文件，一場新的運動開始了。很快，黨總支和黨支部安排了「反右傾」的步驟，通過學習討論端正大家對「三面紅旗」的認識。同學們慢慢熟悉起來，自然會天南地北說起家鄉的風土人情，對「大煉鋼鐵」砍伐林木、浪費資源，和「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弄得青黃不接餓死人的議論也最多。

運動一開始，那些反映了真實情況的說法，就成了被批判的內容。在一次黨支部會上，支部宣傳委員郝玉敏出身不好，但人非常「左」，激烈批評我「階級鬥爭觀念薄弱」、「包庇右傾言論」，並責成我整理朝鮮族同學崔明巖的言論。崔明巖在班上討論時，講了家鄉延邊「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引起了不少同學共鳴，我也感覺那些問題挺嚴重值得重視。

怎麼整理他的言論？我很為難，又不能不做。只得把崔明巖的發言作了個摘要交上去，郝玉敏找到我說「要用階級鬥爭這根弦」分析，就她說我寫按條分類，弄了個「言論」摘錄。後來，把「反右傾」中人們的表現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左派，第二類是中間派，第三類是右派，這一類中又分為「人民」和「敵人」兩類。崔明巖受了批判，卻還沒有按「敵人」處理。這是我一生違心整過的唯一的人，為此事我至今都感到內心不安。後來，在美國我還曾和同班同學葛惟昆談起過。

北大校黨委傳達了副校長鄒魯風^[111]「惡毒攻擊三面紅旗」自殺叛黨的政治事件。原來由鄒魯風負責、北大與人大兩校組織的「人民公社調查組」，到河南信陽、魯山與河北稿城三個先進縣進行調查，發現大煉鋼鐵

[111] 鄒魯風(1910-1959)，原名素寒，後化名陳蛻，遼寧遼陽人。歷任遼陽市市長、遼南行署主任、遼寧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和北京大學副校長等職。1958年秋，因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受批判而自殺。1979年，直到彭德懷沉冤昭雪之後，鄒魯風的錯案才終於得到糾正。

和大辦公食堂時，任意調用各家鍋碗瓢盆、樹木板材，連生活用品都被無償取走，群眾生活發生了極大的困難，還餓死不少人。彙報討論時，大家暢所欲言，問題集中在生產力落後時，盲目改變生產方式，是否適當？

會議將大家的意見整理成一份《問題彙編》，發給與會者供參閱。誰知廬山會議召開時，北京市委竟在《內部情況簡報》上全文刊載了《問題彙編》，所加大字標題為《人大、北大部份師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鄒魯風含冤莫白，自殺後還被開除了黨籍。事件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調查組成員也無一例外地被批判、處分。從此，北大校園內，黨員、幹部無人再敢對「三面紅旗」妄加評議。

接著，學校突然鋪天蓋地的貼滿了大字報，上網上线地批判校長馬寅初^[112]。我認真地讀了馬老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感到很有道理。特別是在北京大學校刊上所附的《聲明》最後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令人不由敬佩，我遂悄悄到馬老住處燕南園向他致意，他面色紅潤，談笑自若，毫無懼色。

馬老的「硬朗」由來已久，有兩件事在北大師生中廣為傳誦：

一件是，1927年北大校慶時，他發表了《北大之精神》的演講，他說：「……此種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

一件是，抗戰期間，馬老在重慶大學商學院大禮堂演講，他帶了女兒和棺材上台，鏗鏘有力地講：「為了真理，我不能不講，我帶了棺材，是準備吃特務的子彈；帶女兒來，是讓她親眼看著，特務是怎樣卑鄙地向她爸爸開黑槍的，以便她堅定地繼承我的遺志。」大義凜然，深深刻在了人們的心裏。

馬老常說，「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難，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難。我就是言人之欲言而不敢言之言。」其耿耿士子風骨，躍然可見。1960年1月初，馬老被迫辭去了北大校長。我和同班學友週末一起去頤和園，大家談及批判馬老，都感到憤憤不平，並為之抱屈。北大整個校園，這時充滿了一股肅殺的左傾情緒，令人十分不安。

[112] 馬寅初(1882-1982)，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家、人口學家。1906年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務長。1949年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並先後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1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2-2 「三年建成共產主義新北大」

馬老走後，陸平^{【113】}接任了北大校長。他剛接任就提出了：「苦戰三年，建成共產主義新北大！」的號召。北大陷入了狂熱之中，各系都制定了相應的規劃。物理系先組織師生編「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各年級物理教材，我們班的任務是編輯《普通物理學·力學部份》。同時，去北京電工合金廠勞動，以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我還應校刊之邀與同班葛惟昆合寫了一篇論文《物理學與生產》。

全校教育革命的調門越喊越高，各系紛紛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目標和口號，物理系則提出要在三年內實現生產、生活「四化」（半導體化、無線電化、超聲波化、原子能化）的要求。本來，在物理系半導體專業黃昆^{【114】}教授帶領下，中國率先生產出鍺二極管、三極管和硅二極管，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個「四化」一搞，正常科研秩序被打破，落後於中國的日本迅速趕超了過去。

為了「四化」，大批二極管、三極管、光敏電阻、熱敏電阻浪費了。同學和老師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地實驗「四化」項目，累得人仰馬翻，也沒弄出個什麼名堂。開始時，夜裏兩點到四點學生大食堂免費加餐吃的是麵條、餛飩、麵包、雞蛋，兩個月以後只有高粱米飯了，又過了三個月這頓夜宵也取消了。加上白天「反修」學習兩三個小時，大家夜裏大多兩三點鐘，才拖著疲憊的身子從物理大樓回宿舍。

5個月下來，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住進了校醫院。各系許多「建設共產主義新北大」的積極分子都和我一樣，生了同樣的病，人躺在病床上，整天處在精神恍惚之中，吃不下也睡不著。學校組織了「慢病快治」班，給大家治療這種「神經衰弱綜合症」。幾百人每天練簡化太極拳，大家的情緒似乎從高峰跌到了低谷，怎麼也振作不起來。

物理系黨總支委員潘永祥也參加了這個班，聽他說起來才知道：他原在四千人的物理系擔任黨總支書記，經過「反右派」和「紅專辯論」（拔白旗，樹紅旗），他不堪重負，神經衰弱的全身癱軟，躺在病床上半年多。我用疑問的口氣向他討教：「三年能建成共產主義新北大嗎？」他說：「共產黨員要有實現共產主義的意志，但決不可頭腦發熱蠻幹！否則會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我們生病就是如此。」

【113】陸平（1904-2002），吉林長春人。1933年參加中共，1957年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1960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14】黃昆（1919-2005），浙江嘉興人。國際著名物理學家。

雖然期末我因各科成績優秀，評上了「三好學生」，後來又評了個「優秀團幹部」，還上了學校的「光榮榜」，得了獎品，可我卻高興不起來。暑假去廣州探望父母。車上人擠的滿滿的，車過武漢才找到了一個座位。沿途停車的站台上，竟不見一個賣食品的。火車上的盒飯還沒送過來，就被前邊的客人搶光了。兩天兩夜車抵廣州，我飢腸轆轆地回到家裏。

母親已做好香噴噴的米飯等我，我一口氣連吃了三大碗米飯，僅有的一盤空心菜也被我一掃而光。父母笑咪咪地看著我吃，弟弟和妹妹都安靜地坐在桌邊看著我吃，露出也想吃的神色。第二天吃飯，我才發覺，每人吃完母親給盛好的飯後都不再加飯。私下一問，原來供應緊張，家裏由母親分配飯。弟弟妹妹每頓都吃不飽，看我吃得那麼香，坐在飯桌旁的他們都很羨慕。

我驚訝地問父親：「為什麼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廣東也會如此？」父親給我講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造成的危害，特別是廣東提出「鼓足幹勁搞生產，放開肚皮吃飽飯」以後，公共食堂浪費很大，許多地方就開始餓死人，並說中央已開始糾正，否則問題會更嚴重。廣州的各種供應現在也很緊張，主要的副食品都已經憑票才能有少量的供給。

那時，沒有肉吃，油也很少，大家總感覺餓。為補充營養，我想「有水就有魚」，附近的河溝裏一定會有魚，就拉著15歲的弟弟到小河邊轉。果然水中有魚，我和弟弟試著在河溝裏摸了幾條，媽媽做好後吃起來還真鮮美。後來，我們乾脆做了個小魚網，每天都在河溝裏撈出七、八條小魚，全家人都吃的很高興。媽媽笑著跟弟弟和妹妹們說：「還是你哥有辦法，這叫自力更生嘛！」

父親帶我在廣州參觀了「中山紀念堂」、「七十二烈士紀念館」，拜訪了陳寅恪、蔡邦霖兩位伯伯。到佛山遊覽了「祖廟公園」，還在那兒買了兩個小香蕉，父親一口也不吃，全讓我吃了。父親告訴我，廣東現在「左」的很，已經無法正常工作了，擬調回陝西，為鄉親父老做工程。原來，父親1958年9月和1959年2月給省委的信，差點給他弄了個「右傾機會主義」。

父親傾盡心力為剛創辦的廣東水利電力學院制定了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贏得全校師生的擁護。但「反右傾」一開始，上級派來一個沒文化的、從部隊轉業的老幹部胡福保擔任學院黨委副書記。上任伊始，他就推翻了父親主持制定、全校教師贊同、省高教局已經批准的教學計劃，堅持

教學與勞動要各佔一半，還批判父親「提高教學質量」的做法是「右傾」，二人爭執到高教局，事情弄了個不了了之。

父親在水利部時，和錢正英關係不錯。記得我們住在白廣路北京水利設計院宿舍時，一到周末錢正英就約父親去跳舞，還引起過母親的不快。父親給錢正英寫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答，部裏同意了父親的要求。1961年4月，父親如願調回了陝西，母親和弟弟妹妹也隨父親一起回到了西安。父親擔任了陝西省水電廳總工程師，每天在水利工地上奔忙，能為家鄉父老做事是他的心願。

暑假結束，回到北大。同學們紛紛說起家鄉的情況，各地都因「浮誇」出現了浮腫、以致餓死人的情況。學校食堂供應的飯菜也越來越差，油水越來越少。食堂新做的二兩一個的黑綠色葉蛋白饅頭（係用樹葉提取的「蛋白」加一些麵粉做成的饅頭），還沒有原來的饅頭一半大，一頓飯吃四、五個也不飽，可也就把一天的定量吃光了。外祖母給我寄來一包三原老家曬的紅棗，我吃了三個，放在抽屜裏，晚上回宿舍，已被同學們瓜分完了。

學校建南口分校，修一條「200號」公路。歷史系一個同學，一頓飯喝了二斤一兩糧票的粥，當時一兩糧票的粥就可以盛一大碗，結果腸子撐斷死了。全校出現浮腫的師生達到四千多人。浮腫到大腿的可以到校醫院喝「浮腫一號」，我浮腫到小腿喝「浮腫二號」。聽校醫說：學校撈了未名湖的魚熬成湯，「特號」供給校領導，「一號」、「二號」給浮腫到大腿、小腿的師生。我每天下午領的那一勺魚湯，連個油花也看不見，不過還有點鹹味，也許對恢復健康有益。

從起初的狂熱到之後的迷茫，一年就這樣過去了。

2-3 中蘇關係破裂的震撼

當時，官方對出現困難局面的說法是：嚴重自然災害和蘇修撤消援助。由於經濟形勢持續惡化，學校食堂供應也越來越差，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的說法仍然不脛而走，各地又不時傳來餓死人的消息，而中蘇關係破裂更加劇了人們對共產主義能否實現的懷疑。

1960年4月，《紅旗》雜誌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以紀念列寧誕辰九十週年為契機，開始全面批判蘇聯搞了「現代修正主義」。一系列對蘇共的批判和內部學習，在北大師生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我從初一讀《鋼

鐵是怎樣煉成的》到初三加入共青團，再到高三加入共產黨，走的是一條越來越激進的路子。

毛澤東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蘇聯怎麼會變修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難道我們的明天也會變修？美妙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一下子變的一團漆黑難於辨認了。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保爾、古麗雅、斯達漢諾夫為之獻身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就變修了呢？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斯大林領導的，世界革命燈塔怎麼就變色了呢？

看來蘇聯只解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取得政權以後如何才能實現共產主義並沒有解決。那麼，我們中國解決這個問題了嗎？解決哪些問題我們才能不變修呢？因為新聞封鎖，那時大家都不知道外部世界是個什麼樣子，只知道「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一起在欺負我們。

也許出於從小個性中對追求的執著，我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人生目標和人性良知、社會理想和社會現實的矛盾每天都在折磨著自己。做為一個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共產黨員，我曾發誓，要像保爾那樣為偉大的理想獻身，但怎樣獻身呢？

進入北大一年來，狂熱的努力並沒有好的結果——自己身體搞壞了，學校教學停頓了，大家飯都吃不飽了，校園裏瀰漫著師生的不滿情緒，對「共產主義」的懷疑也越來越多，加上蘇聯變修帶給自己和同學們的震撼。我開始研究「怎樣才能實現共產主義」的問題。按黨的要求，我是劉少奇說的「馴服工具」，系黨總支安排我擔任了「學生幹事」，半日讀書、半日工作，還給了一個月 20 元生活補貼。

這倒給我創造了一個自學的好條件：除了聽物理和數學兩門課外，其他時間大都可以上圖書館看自己喜歡的書，下午 5 點以後做些學生工作。1961 年初，我從 43 樓學生宿舍搬到未名湖畔教師住的備齋，和團總支書記程遠通住在一起。程遠通是遼寧人，工農調幹，人很實在，不趕風頭。我們住在一起近兩年，相處很融洽。幾乎每天晚飯後，我們都會繞未名湖走一圈，交流彼此的看法。

當然，討論最多的話題還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問題。除了研讀《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外，我開始研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像《經濟學一哲學手稿》、《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和《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帝國主義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都是那時讀的。

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揚棄；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容納不了發展的生產力時，社會主義革命就會到來。列寧則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落後國家首先實現，但必須有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才有可能。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逐步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那麼，我們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生產力不發展而不斷改變生產關係，搞「三面紅旗」是否犯了「左派幼稚病」呢？

這個想法一閃念，我立即嚇出一身冷汗，這不是和被批判的鄒魯風那些右傾分子很接近了嗎？我和遠通一起剛在黨內學習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新生事物」，馬克思當年不贊成巴黎工人起義，但巴黎公社一建立，他立即給予高度評價。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嶄新的制度，付出昂貴代價的實驗是不可避免的，做為一個共產黨員，應當自覺充當社會主義事業前進過程中的鋪路石子，怎麼能對黨的決策產生懷疑呢？可見我的立場很不堅定。

2-4 「右派言論」和「秘密報告」

一天下午，我到黨總支書記平秉權^{【115】}的辦公室給他送幾本書。他顯然對當時「左」的傾向很不滿意，時不時發些牢騷，常讓我去給他借些史書看。我看他桌上擺著《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彙集》和《校內外右派言論彙集》，就盯了兩眼。他笑著說：「你想看就拿去看看吧，可以接受教訓。」我看上面還印著「內部參考」的字樣，就裝到書包裏急忙回到宿舍看了起來，

遠通回來也一起看。我們兩人連續四、五個晚上看完了這四百多頁的「右派言論」，誰都不說話。內心的天人交戰彼此都明白，但作為黨的幹部必須聽黨的話。當時物理系學生中的右派佔了百分之十以上，是重災區。自己既佩服這些「右派」的風骨，又告誡自己不可犯這類錯誤。

我把書還給平書記時，他說：「你很聰明能幹，但一定要站穩立場。要不會摔的很重！」我想，很可能反修學習中我的幾次發言已傳到他耳中了，遂連連稱「是」。反修學習中，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為什麼」，其實中心問題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解決哪些問題才能實現共產主義」。

在黨員會議上，著名的左派王養萍卻帶頭批評我「懷疑中央領導」、「懷疑共產主義能否實現」，是「嚴重的立場問題」，讓我寫檢查，這個檢

【115】平秉權，時任北大物理系黨總支書記，後任北大黨委統戰部長。

查怎麼也寫不好。我雖在支部會上作了兩次檢查，既沒過關，也沒解決思想問題。遠通卻告誡我，「要經得起黨內鬥爭，不要輕易給自己扣帽子」。

這年冬天的備齋因供暖不足格外寒冷，我坐在桌前寫檢查，窗外一陣寒風襲來，我隨口吟道：「朔風破窗入，薄衾不勝寒。手僵難捉筆，書草不成篇。」正看書的遠通連連說：「好詩，好詩！」我們二人一起哈哈大笑，一股暖意流過我的心頭，不快和緊張卻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黨總支副書記曹芝圃^[116]家，看到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因我數學不錯，曹書記請我每周給他的兩個兒子小朋和小友補一次課，兩個孩子都很喜歡我。這天，我去補課，曹書記不在家，書桌上卻放著赫魯曉夫的報告。我一看就驚呆了，報告中的斯大林和過去宣傳的完全不同，「英明的領袖」一下子成了「殘酷的暴君」，讓人難以置信，也無法理解。

正在思考中，曹書記匆匆回來了。他嚴肅地說：「你不該看這份文件！」我很尷尬。他臉色緩和下來說：「既然看了，就認真研究一下。注意保密啊！」這個報告讓我疑問叢生：斯大林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不是我們對他的評價是功過「三七開」嗎？為什麼蘇共二十大會贊成赫魯曉夫的報告呢？斯大林怎麼會有權力把蘇共十七大70%的中央委員逮捕和槍決呢？看來，斯大林的時候太缺乏民主了，但列寧不是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嗎？蘇聯變修自赫魯曉夫開始，反斯大林恐怕就是反對……，腦子一下混沌了。

反修學習越來越緊鑼密鼓地進行，同學們對「帝修反」圍攻中國個個義憤填膺，對《列寧主義萬歲》說的：「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個個充滿了激情。但會上的發言則與私下的議論完全是不同的調門，比較有頭腦的往往囁嚅不言、半信半疑，而大多數人則按上級指示的口徑說話。

大環境的氛圍是無所不在的。「反右」、「反修」的宣傳，使我也越來越左傾，全身心都貫注在如何才能有效「反修、防修」，使中國不致「改變顏色」的問題上。「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成了我每天思考的問題。回想當年參加過「論戰」的那一代人，大多往往會關起門來自鳴得意，覺得「唯我獨革」，而又常常會以勢壓人，將有不同意見的人視為「異端」。

【116】曹芝圃（1927-2011），河北順平人。時任北大物理系黨總支副書記，後任北大分校黨委副書記。

這時，我感覺「物理」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想轉而研究「人理」。我非常欣賞馬克思「對一切都懷疑」的治學態度，並開始用一切可能的時間研讀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同時，也讀了啟蒙運動代表人物的若干名著。近一年的時間，一有空我就讀黑格爾、費爾巴哈、李嘉圖、聖西門、歐文和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洛克的作品，更加深了我對現狀的懷疑。

2-5 甄別平反和請教名師

自1961年6月起，北大根據中央指示，對在拔白旗、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處分的黨員、幹部進行「甄別」和「平反」。1962年初，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參加會議的同志說，會開了20多天，「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特別是劉少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讓人還比較滿意。會後開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58年「大躍進」以來瀰漫全國的狂熱情緒開始退潮。

我做為物理系黨總支的學生幹事，一個個和各年級被錯批的同學談話，聽他們的申訴和牢騷，為他們整理甄別平反材料，他們差不多都是說了真話、實話挨了整。折騰了幾年的北大，從1961年9月貫徹「高教60條」後，也逐漸恢復正常秩序，學校又慢慢像個學校了。師生們重新回到教室和實驗室，再也不是整天忙著去搞運動和勞動了。甄別平反這項工作幾乎持續了一年，據後來官方統計，全國甄別平反的人高達300多萬。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到物理系蹲點。耀邦找了一些被錯批的「甄別」對象開座談會。他一開始就開誠佈公地說：「同志們受委屈了！搞錯了嘛，就承認錯了。甄別就是改正錯誤。一個黨、一個人都會犯錯誤，錯了不要緊，改了就好。現在大家心情舒暢了吧？」一個叫王舒民的同學說：「還不太舒暢！」耀邦爽朗地笑起來說：「你說的是真話！批錯了，甄別了，大氣消了，小氣還總會有的。」

他話鋒一轉，語重心長地說：「年輕人啊，我們從事的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錯誤、曲折總是在所難免。一塊鐵千錘百煉才能成鋼！一錘下去就碎了，只不過是一塊廢鐵。今天挨一錘就受不了，今後走入社會，那999錘怎麼挨？當然啦，列寧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七嘴八舌才能集思廣益嘛！俗話說：管天管地，管不著說話、放屁。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總不能『一鳥入林，百鳥壓音』吧？我重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永遠有效！」

他接著說：「列寧就說過，只有死了的人和沒出生的人不會犯錯誤。我這個人就像個維吾爾族姑娘，辮子一抓一大把！」他的話把大家說的都舒心的笑了。甄別平反使北大校園的空氣一下寬鬆了許多。我作為黨總支學生幹事參加了這次會，散會時我走過去，和胡耀邦說：「您一點沒變，講話總是那麼鼓舞人！您還認識我嗎？」他說：「好像見過。」我說：「五年前，我帶少先隊員給您獻過花。」

他笑著說：「噢，噢，小陳嘛！考上北大了，好！北大可是個出人才的地方。」其實，第三次團代會後，他率團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我表哥王松聲當秘書長，回國後舉行報告會，我還見過他。胡耀邦「千錘百煉才能成鋼」的話，激勵了我的一生。可惜耀邦「三不政策」的許諾，很快就被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所取代，1964年各高校都不斷抓出了大大小小的「反革命集團」。

1962年3月，學校又傳達了「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的講話，說「知識分子是勞動者，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校園的老師，特別是一些老教授也不再每天膽顫心驚了，算是過上了幾天平靜的日子。從入北大前，父親帶我拜訪幾位北大的名師，到入校後他們給了我許多忠言和教誨，特別是他們廣博的學識和高潔的人格使我受益終生。

父親帶我第一個拜訪的是湯用彤伯伯，他雖然患病，仍任北大副校長，為著名佛教史家，其父湯霖係祖父好友，其本人係大表伯好友，臨走時送我一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個拜訪的是李賦寧教授，因父親與其父李儀祉為同事，他又是大表伯學生，故其稱父親為八叔，還記得其堂兄李賦林當「右派」後，曾找父親為之安排工作。

接著，拜訪了父親的摯友林庚伯伯，並在他家午餐。下午，先後拜訪了朱光潛伯伯和馮友蘭伯伯。第二天，父親帶我拜訪了他的老師饒毓泰、葉企孫和周培源。

林庚伯伯是福建閩侯人，從中學到大學都是父親最要好的朋友。在北大林伯伯對我幫助最大、關照最多，一直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林伯母王希慶在北農大當教授，周末往往做一桌美餐叫我去吃，即使在食品短缺時，依然像母親一樣照顧我。林伯伯的大女兒林蓉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小女兒林音在農大讀書，她們也都對我像一家人一樣。我轉入中文系後，林伯伯還專門給我開了很長的書目，指導我入門，並請他的學生袁行霈幫助我。

林伯伯很欣賞「辭賦懸日月」的屈原，更喜歡「大鵬飛兮振八裔」的謫仙人李白，也喜歡嵇康、阮籍等人「拜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

的「魏晉風骨」，但最喜歡「盛唐氣象」的「少年精神」。他常告誡我：「歷史就是歷史。一種潮流襲來，個人往往難以抗衡。這時要出污泥而不染，超然物外！」，可惜我那時正處在「少年狂」時期，尚不知人間「愁滋味」，並未理解。

朱光潛伯伯是安徽桐城人，治學一直強調「愛真理」、「創造」、「實證」和「批判」精神。他從1949年以後不斷受到批判，第一次見到他時，即感到他瘦小的身軀中蘊藏著一種靈動而深邃的美。後來，朱伯伯送我一本《西方美學史》和一本《拉奧孔》，還給我開了一個很長的書目，並教我讀書和作筆記的方法。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朱伯伯侃侃而談「美和人性」時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往往會突然一下黯淡起來，壓低聲音惶恐地說「這是應該受批判的資產階級觀點！」，令人心酸。

1965年以後，因為我開始被批判，不想因此牽連長輩，和師長們的來往也就少了起來，直到文革後才慢慢恢復聯繫。

2-6 回鄉探親和轉中文系

1962年寒假，我回西安看望父母，並探尋他們對我轉學文科的看法。父親認為，現在學文科風險太大，大表伯吳宓和朱光潛伯伯等，解放後就不斷受批判，還是學理科接觸實際，又與世無爭，比較好。母親則說，你喜歡什麼就學什麼，只有學自己喜歡的東西才能鑽進去。我則決定，中文系、歷史系選一個，但我更喜歡文學。我覺得，通過文學研究人和人所生存的環境，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春節前，我去三原接外祖母到西安過年。從下火車，經縣城，過龍橋，到北城，一路行來，三原可說是一片蕭條，與兒時記憶的繁榮熱鬧竟似兩個世界。因土改補課，外祖母已搬到西偏院的三間茅屋中。外祖母人雖清瘦了許多，卻仍很精神。10年未見，外祖母見到我，喜極而泣，把我緊緊摟在懷裏。外祖父去年春天剛過世，說起來還有一段令人辛酸的故事：

從1958年刮「五風」，連續3年冬天青黃不接餓死不少人，配給外爺的口糧大部分竟是棉籽餅和玉米桿做的，人吃了以後拉不出屎，只有用手一點點摳出來。外祖父說，「以前連牲口都不吃這些東西！」，竟因此被批鬥了好幾場。80歲的老人哪禁得起這等折磨。一天，外祖父躺在籐椅上就走了。外祖母含著淚連連說：「你外爺走得好。早走早脫生，不再受罪了！」。

說起 1960 年秋天給我寄棗，外祖母慈愛地說：「棗還沒熟透，都讓鄰居搶光了，幾個好心的鄉親送了一筐拿來，我曬乾後挑了些好的寄給你，剩下的到冬天餓極了就嘴裏含一個。」我聽著聽著，已淚流滿面了。我問外祖母：「您這輩子什麼時候日子好過？」她說：「民國 20 年以後的 10 年過得最好，那時候社會安定、東西便宜，一個袁大頭就可以買 300 個雞蛋，一個要飯的也沒有。」她的話令人深思。

外祖母秉性純良、樂善好施。街坊鄰里遇有急難之事，外祖母二話不說即立予幫助，而且她從來沒有與鄰里發生過爭執，故而在左鄰右舍中極有人緣。外祖父去世後，她只給自己留了少量的日用品，把家裏的大部分用品和衣物都送給了四鄰。當地大隊支部書記李仁和就無奈地和我說：「王娘這麼好的人，大家都尊重。政府咋給她戴了個帽子？！叫我的一見她就臊的慌！」

茹欲立伯伯境況更慘。他早年參加同盟會，後任國民政府審計部長，因與蔣介石政見不合，1932 年辭官返鄉以賣字畫為生，很同情共產黨，1949 年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其為人剛直敦厚，「大躍進」時，因說「現在都窮成個啥啦，還吹啥牛嘛！」遭了批鬥還不服氣，給整的很慘。他大兒子和女兒均於解放前投奔延安，女兒 1957 年當了右派，大兒子 1959 年成了右傾，都開除出黨了。

見到姨父王芾南時，令人暗暗訝異，當年那個叱吒風雲領導「渭華暴動」的領導人被打成了右派，變得滿臉沮喪、沉默寡言，一家人都在愁雲慘淡中過日子。姨媽王毓華也從熱情好客變得落落寡歡。彭德懷誇讚「抗戰有功」的吳懷仙伯伯去世後，他的女兒吳寶珠一直追求進步，也因不願意打右派而當了右派，弄得一家人很淒慘。面對這些社會現狀，實在讓人困惑，難以理解。

回到北大，我繼續廢寢忘食地鑽圖書館讀名著。但入大學以來的心結始終未解：黨的教育、宣傳把我往左拉，社會現實又把我往右拉。1962 年 5 月我親自到教務長崔雄昆家拜訪，表明想轉入中文系的心願。他聽我講述了理由後，讓我寫個轉系申請，不久就批准了。物理系同班同學黃偉民聽說後來找我，勸我不要轉系，說他準備今後研究自然辯證法，希望能夠一起合作。他的女友陳碧珠來北京，約我一起吃飯。

陳碧珠長的嬌小玲瓏、清麗脫俗，是陳嘉庚^[117]的近親。談起話來，語出不凡，知道很多我們平日不知道的新聞，特別是中蘇交惡以後蘇方的

[117] 陳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人。是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廈門大學、集美大學、翔安同民醫院等，均由其創辦。

情況。赫魯曉夫提出了「一切為了人」的口號，似乎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原點，但背棄了無產階級革命，人不是又會被異化嗎？看來，反修的關鍵還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倘少數人的犧牲能換來人類的自由和解放就是值得的。

離開物理系前，黃偉民跟我說：「我越來越覺得，老陳你是個人才，今後能做些事情。但我考慮，第一，你有足夠的政治頭腦，但你不懂政治權謀。第二，你這個人很有熱情，但冷靜不足。第三，你為人剛烈有餘，柔緩不足。」他說的恰中我的要害，我真是這樣的人。孔子說「君子愛人以德」，我覺得黃偉民正是這樣的君子。我說：「謝謝你的諍言！希望今後我們還能不斷交流。」

1962年9月，我本應轉入中文系四年級，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118]和副書記華秀珠找我談，說1962年入學新生中只有一個黨員，希望我到一年級，可以為黨作些工作。雖然對黨的組織和黨員，已不像我剛入黨時，感到的那麼崇高和神秘，但做為一個黨員服從組織決定卻是必須的，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同時，我又被安排成了中文系學生會主席。父親得知後，來信讓我退掉學校給的工作補貼，繼續由家裏一個月供給我20元生活費。

我找來高教部制定的中文系「必讀書目」，竟發現其所列書目80%我已讀過，遂有空就跑圖書館，讀一些未讀的經典，並按朱光潛伯伯教授的方法一邊閱讀一邊作筆記。同時，我還選聽了歷史系、哲學系、經濟系的課，如：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許大齡的《中國歷代典章制度》、任華的《西方哲學史》、朱伯崑的《中國哲學史》、肖灼基的《政治經濟學》等。

當時，我對學校搞的「學雷鋒」等社會活動，越來越失去興趣，遂辭掉了系學生會主席一職。當時，學校主管學生會的王玉璽找我，說組織上擬讓我到校學生會當主席，被我以身體有病為由婉言推卻了。後來，校學生會再三讓我推薦一名副主席，我就推薦了正積極爭取入黨的同班同學任喜貴。誰知此人是個看風使舵之人，我紅的時候，他天天給我獻慇懃；我挨批時，他帶頭上綱上線整人，使我看到了人性中醜惡的一面。

自1962年初起，我給自己制定了嚴格的學習和生活綱要：每天早上5點起床，跑步到圖書館用書包在門前佔個位子，而後到東操場跑兩圈，回宿舍洗冷水澡，到食堂買個饅頭夾上鹹菜，邊吃邊聽新聞廣播，到圖書館四小時，午餐後又在圖書館4小時，5點上期刊閱覽室，六點鍛煉半小時，

[118] 程賢策，時任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文革中自殺。

晚餐後又到圖書館四小時，夜裏 11 點回宿舍，12 點休息。從這時起，我養成了每天睡眠五小時的習慣，直到今天。

如此下來，近 3 年時間，我幾乎讀了過去沒讀過的古今中外經典 500 多本，各種雜書 2,000 多本。到大圖書館借書一次就借 20 本，依「泛覽」與「精讀」分類閱讀，「泛覽」又分出「泛中之精」與「泛中之泛」，「精讀」則分為「精中之泛」與「精中之精」。下午即將「泛覽」部分歸還，「精讀」部分則需借幾天以便熟讀和摘要。這段時間是我在北大讀書最多的時候。這些廣泛與深入的閱讀，不僅開闊了我的視野，而且指導我進一步思考人生。

我還糾正了延續了 5 年的口吃。1958 年我參加了中學的足球隊，踢後衛的同學張書或有口吃，上自習時經常問我問題。有時開起玩笑，我也學他的口吃，誰知這一學，學出麻煩了。說話一著急竟也口吃起來了，而且越急口吃越厲害。到北大後，一次在物理系，一次在中文系，講話時口吃得都講不下去了。我先後用了兩年時間，每天早晨跟著「新聞聯播」唸。真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我的口吃自己給糾正了。

同時，我又加強了身體鍛煉。早起跑步，下午打球、作體操，夏天游泳，冬天滑冰。1964 年，學校為改善大家的體質，開展了「五百分運動」，考核短跑、長跑、跳躍、投擲和體操，我在中文系竟得了 800 分，全系第一。可惜的是我在北大那麼多年，一場電影也沒看過。後來在農村，朋友們說起什麼「魂斷藍橋」、「佐羅」，夢露、赫本，我都一無所知，令人十分遺憾。

2-7 黃偉民組織「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

黃偉民和我同時考入北大物理系 59 級，分在一個班。他是福建南安人，自幼父母雙亡，靠助學金的幫助以優異成績在著名的廈門一中畢業。他考上北大後，以勤學多思、文理兼優著稱。不到一年，我們成為經常交流各種看法的好朋友。他更是常懷一顆感恩之心，強烈地期望報效養育他成人的國家，但現實卻一再擊碎他那單純的青春之夢。

一樁樁令人無法想通的事接踵而來：彭德懷提意見怎麼就成了「反黨」？客觀形勢的發展頑強地為彭作了辯護，明明是「左傾冒進」出了問題，卻歸罪於不存在的「三年自然災害」，如何讓人信服？校長馬寅初是經濟學家，提出「節制生育、提高人口素質」有何不當？縱與上司看法相左，何至於全校批判、甚至侮辱？恩格斯把杜林批了個透，卻譴責柏林大

學對杜林的不公平做法，老祖宗的紳士風度何以傳到了徒子徒孫手裏，竟變成把馬老「批倒批臭」，當成敵人對待了呢？

想不通的事讓他患上了「思想梗阻」。他「平反」後，曾回憶說：

我想不通的許多事，追根溯源，在理論上都以馬列主義作為法寶。那麼，馬列主義的原意和本意是什麼呢？為了追求真理，我走火入魔似地大量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由於他們的著作涉獵極為廣泛，我也循其思路，盡可能地閱讀了許多西方或有關西方的著作。其中，古希臘的民主政治，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啟蒙運動的科學精神和法制思想，百科全書派的理性主義，布魯諾、伽利略等人堅持真理的精神，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如饑似渴汲取知識的同時，經過「獨立思考」的發酵，我也漸漸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觀點和想法；對於位居主導地位的理論和學說，當時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產生了強烈的質疑。如此的狂妄自大，連自己也沒有想到。為此，我常以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的名言自勉：「為真理而死，難；為真理而生，更難。」

一諮有著廣闊的知識視野，我和他特別談得來。孔孟之道，諸子百家，西方哲學流派，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等等，都曾是我和一諮熱烈議論的話題。我和一諮都執著地認為，一個國家要發展，必須既堅守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又積極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

也許正是我們追求真理的執著，使彼此之間產生了許多共鳴。但回過頭看，他比我清醒，給我介紹了不少人文主義的觀點和名著，才使我不致在左傾思路上的更遠；而我若干務實的看法也提醒了他，使他不致陷於滅頂之災。

黃偉民的中學同窗好友黃明華，是傾慕社會主義而歸國的越南華僑，同年考入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他和偉民同樣興趣廣泛、好學深思，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明華同系同學宋德楠是顧准^[119]的外甥，對經濟學有濃

[119] 顧准（1915-1974），江蘇蘇州人。1955年參加中共，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會計學家。1949年，曾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殘酷迫害。

厚興趣。他們三人經常在一起討論各種理論和現實的重大問題，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嚴重異化了：

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開始，馬克思主義在歷史上產生了巨大、持續的影響，影響所及的地域也不斷擴大。這一現象說明，馬克思主義自有其合理的內核。令人深思的是，馬克思主義在其發源地西歐日趨式微的同時，加上列寧主義之後，居然在蘇聯和中國等國家獲得了「國教」一般的地位，實際上卻是與「原教旨」漸行漸遠了。

當時，我們也是馬列主義的天真信徒。但是，任何社會學說、任何哲學、任何經濟理論，都不是無懈可擊的，而且在它們的詮釋和應用中，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異。仔細檢點馬克思主義的來龍去脈及其伴生現象，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未與國家政權相結合時，它是富於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可是一旦與國家政權相結合，情況就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列寧曾向高爾基說過：「我們生活中的殘酷是由種種條件造成的」，「誰不同我們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

問題在於，階級鬥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很容易被濫用，在封建王朝延續到二十世紀的國度，尤其如此。毛澤東曾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一「八字真言」的確十分傳神。輿論一律，思想統制，報喜不報憂，通過「運動」整人，時不時抓住辮子、戴上帽子，用政策代替法律……這一切，無不是在階級鬥爭的旗幟下，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進行的。然而，這一切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和真諦嗎？社會生活本應是豐富多彩的，但是作為工具的「階級鬥爭」使之圖式化了，並且使許多有識之士噤若寒蟬。

人性論是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哲學前提，也是民主政治的奠基石。發軔於盧梭的「人生而平等自由」的天賦人權思想，不過是人性論的法學表述。而基於階級性的成份論，卻硬生生地預設了人生的空間，由此不知阻斷了多少「出身不好」的青年才俊的錦繡前程。恩格斯對於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有著極高的評價，但到了徒子徒孫這裏全走板了。

可以說，當時比較談得來的同學，都有類同的心路歷程，也有彼此認同的許多理念和觀點。

隨著討論的深入，黃偉民、黃明華和宋德楠三人一致認識到計劃經濟存在著嚴重的弊病：

三年大饑荒，使我們不能不對計劃經濟產生深深的質疑。計劃經濟是馬列主義的重要結論之一，並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經濟形態。在正式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明白無誤地宣稱：計劃經濟的目的在於「最大限度

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目的無疑是高尚和令人嚮往的，可是實踐的客觀效果，卻是令人失望的。

在蘇聯和中國建立工業體系（特別是軍工體系）的過程中，統一調配資源、統一安排生產的做法，看起來是成功的。但是這並不能掩蓋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因為不論怎樣的「計劃」，都不能同時確保其必定是合理的，再加上缺乏自我調節和自我矯正的機制，一旦出現重大失誤，勢必造成災難性的效果。否則，怎麼解釋大躍進中簡直是昏了頭的一系列高指標，以及種種荒誕不經的弄虛作假呢？

更重要的是，計劃經濟本性上要求中央集權。從理論上講，只有高度的充分的集權，才有可能精確地計劃和實施既定計劃。然而，中央集權有其天然的負面效應，這就是對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壓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雖然實行了選舉制，但不難看出，真正起作用的卻只有任命制。被選舉人名單其實都是「內定」的，那麼，這不過是套上選舉制服飾的任命制。萬一選不上，通過做「工作」，照樣可以選上。在中央集權國家，普遍存在極端神化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崇拜，這種現象絕非偶然。

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意識、政治生態和文化精神中，到處都打上了計劃經濟的烙印。最典型者，莫過於「凡事依靠組織」，它成了時代的口頭禪和無遠弗屆的準則。個人角色定位則應當是「螺絲釘」，任何「成名成家」的思想苗頭，都會遭到嚴厲的批判。於是，抹煞自我、消磨個性、幽禁想像力，就成了「識時務」的「俊傑」們的救贖之舉。發人深省的是，大力宣揚和歌頌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集體主義精神，始終未能（實際上也不可能）在社會生活中紮下根來，而被嚴重忽視的實實在在的人的品德和素質，諸如仁義、誠信、尊師、孝道、社會公德等等，卻遭到摧毀性的破壞。

基於上述認識，他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

有必要對馬克思主義重新進行批判性的研究。憑心而論，他們當年的許多深刻認識，我是若干年以後才逐步認識到的。黃偉民告訴我說：「我和明華、德楠三人，經過一年多的交流，一致認為，馬列主義需要重新研究，一方面要糾正那些落後於時代的、不為實踐所認可的、有悖於人類優秀文化的命題。另一方面，要發揮那些精闢的、真正有價值的、具有時空穿透力的命題。也就是說，只有經過黑格爾所說的揚棄，馬列主義才能保有蓬勃的生命力。於是，在1963年，我們決定成立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我負責起草了一份學會宣言，明華和德楠負責擬定一份學會章程。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吸收一些志同道合者加入學會，不過並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我們十分明顯地感觸到，運動在許多學友心中所留下的餘悸。」

當他和我談起想搞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組織時，我立即告誡他：「千萬小心，若給弄成個反革命集團就糟了。」以後，他未再和我提起。很快，不幸的事發生了。偉民對「學會」的結局作了這樣的記述：

明華和他在清華的英文老師過往甚密。在這位老師的建議下，明華打算和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大使館建立聯繫。因為他認為，這兩個國家搞的社會主義，不同於中蘇，有必要深入地瞭解，從而探討其中的可借鑒之處。我和德楠都不贊成他那麼「張狂」的打算，認為學會應該只限於從事理論探討，不可節外生枝。不過，在我們三人中，明華算是「走火入魔」得最厲害的一個，他不僅這樣想而且堅持這樣去做，結果便出乎意想。

1964年10月，清華校方追究明華去阿爾巴尼亞大使館一事，組織同學進行批判，給他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壓力。想不到一向踴躍風發的他，卻並不堅強。明華覺得只有和盤托出他所有在當時屬於「離經叛道」的想法和做法，才能擺脫這種壓力。11月一個滿天陰霾的日子，明華把我和德楠約到頤和園，向我倆訴說了他內心的痛苦和掙扎，希望我倆同意各自向校方坦率交待組織「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一事。幾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我和德楠力圖勸慰和說服明華放棄這一念頭。最後，明華竟說，「不這樣做，我的精神將會崩潰」，倘若如此，我和德楠一輩子也不能心安，只好無奈地接受了他的提議。

當天，告別了明華之後，德楠帶我去見了他住在中關村的舅舅顧准，想向他討教彌補之策。後來才知道明華交待以後，引起康生注意，意欲從顧准入手，把孫冶方、張聞天一起打成有組織的反黨集團。沒想到顧准竟無辜地成為學會事件株連的第一個人。他因此在1965年被隔離審查，工作組對他反覆折磨，無情批鬥。後來又給他第二次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5年在我們即將大學畢業之際，清華和北大黨委會，把學會定性為「反動組織」，把我們三人定性為「反動學生」。幾位平素與我較為親近的同學，都受到牽連。儘管如此，仍然有幾位同學不顧非議和壓力，給了我誠摯的關切和同情，令我銘感終生。

我被分配到天津市一家工廠，從此當了15年工人，不僅所學無以致用，接著又逢文革，挨批鬥自不待說，被歸在「黑五類」之中監督勞動受盡折磨。

明華遲至1966年被分配到北京一家水利設計院。文革期間，他的日子比我更難過。由於絕望，他於1967年跳樓自殺了。他父親拿著兒子的骨灰，在返回廈門的當天晚上也自盡了。

直到 15 年後的 1979 年，他們三人的這一案才得以平反。1980 年，黃偉民結束了 15 年的工人生涯，調到廈門當老師，先後任教於集美輕工業學校和廈門理工學院。

三個北大、清華的青年才俊，他們的好學多思和憂國憂民，卻使之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一個人自殺了，兩個人在屈辱中慘淡地渡過了 15 年。

2-8 送往中南海的「反黨萬言書」

從 1962 年底黨內傳達毛澤東「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到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再到「以階級鬥爭為綱」，各個高校都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名義，對資產階級思想、言論展開批判。1963 年底，北大的政治空氣又驟然地緊張起來。

中蘇論戰的白熱化，批「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與「全民國家、全民黨」）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和「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先後發表，將北大「反修批資」推向了新的高潮，各系均對有「異端」想法師生進行批判，大大小小的「反革命組織、集團」被審查。這次，我終於在劫難逃了。

1965 年 2 月，北大校黨委和保衛部的人找我談，疾言厲色地說：黃偉民組織「反革命集團」，是個極右的「反革命分子」！你已經走到反革命分子的邊緣，老老實實交待，爭取寬大處理！咋一聽，把我驚呆了，這麼一個愛國熱血青年怎麼會是個「反革命分子」？！我極力為黃偉民辯護，沒有任何效果，他們責令我連夜寫揭發材料。臨走時，一位好心人把我送出門外，悄悄說：「一五一十交待，上綱上線，劃清界限，你才會沒事。」我該怎麼辦？！

問題的嚴重性顯而易見，搞不好自己也會成為「反革命」。也沒個人可以商量，遠通已調回遼寧。我繞著未名湖走了兩圈，回到宿舍。宿舍和樓層裏只我一人，同學都在湖北江陵參加「四清」。仔細回想我和偉民的交往，無論如何我也不相信他是「反革命」。可是，從校方五個找我談話的人的態度看，組織上似乎已給他定性了，我該服從組織、還是為偉民辯護？

我 18 歲入黨以來，基本上是一個黨的「馴服工具」，有想不通、看不慣的事也總是自己做「檢查」。隨著大環境越來越「左」，自己也越來越「左」，對運動中受委屈的人，總是用「反傾向鬥爭中為挖掉毒瘡不可避免

會挖些好肉」做解釋，這也是為革命做犧牲嘛！這回不同了，自己經常接觸的朋友遇到麻煩了，怎麼可以投石下井去揭發他呢？更不可以避重就輕保存自己，那還算個人嗎？！更不符合我做人的起碼道德，共產黨員不是應當「為真理獻身」嗎？

內心湧動的良知鼓勵我挺身而出為朋友洗脫冤情。我翻閱了入北大以來的日記，摘出與他相關的記錄，從凌晨兩點到四點，寫了一份《讓事實說話——和黃偉民的關係》的材料，最後提了個要求：「黃的問題落實後，我希望看到對他處理的材料，是敵我問題可以使我受一次教育。若不超出（或不甚超出）我所述的他的觀點。我認為是人民內部矛盾，若定為敵我性質，我願為他辯護。」交了上去。

聯想到以往運動總是整人過頭，而後又甄別平反的教訓，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級為迎合上級，運動總是搞過頭。我想應該給毛主席、黨中央寫個意見，反映這種情況。憑心而論，我到北大五年半以來，通過各種學習、討論和運動，雖對「人性和民主」有一定嚮往，但主流思想還是接受「階級和革命」的左派觀點，並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信不疑。

頭腦中雖不時閃過現實中「不夠民主」、「整人過頭」的想法，卻都認為是執行中的問題，對「反修防修」、「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和追求並沒有動搖。所以，既出於對黃偉民挨整的伸張正義之心，更出於對社會主義的愛護關切之情，我以一種「置個人身家性命於度外」的心境憤筆疾書，一周內寫出了一篇三萬字的《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點意見》。

《意見書》寫好後，我親自送到時任北大工作組組長的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120]手中。三天後，戴著金絲眼鏡、穿著藏青色西服便裝的張磐石和藹地向我說：「向黨的中央和主席提出意見，是一個黨員的合法權利。你最好直接送到中南海。」並告訴我怎麼送，從他的語氣能聽出是支持我的。第二天，我借了自行車，把《意見書》送到了中南海西門，還收到一張蓋有「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章的回執。

回校的路上，我心情格外輕鬆，覺得自己可盡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一個24歲青年，懷著赤子之心所寫的《意見書》，8個月後竟會被批成「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反黨萬言書」，後來為此險些三次送命、兩次被開除黨籍，一下當了15年的「反革命」。回過頭來看，我當時提的那些意見，現在人們幾乎都能接受；但在1965年的政治背景下，敢於提出還是冒了很大風險的。

[120] 張磐石（1905-2000），山西壽陽人。時任中宣部副部長。

我寫的這個「反黨萬言書」，中心議題是以蘇聯斯大林時代缺乏民主而變修為鑑，指出「我們今天嚴重地缺乏民主」，尤其是反右派以後，所以應該鼓勵「放」、鼓勵大家「講真話」。這在當時還是犯了很大的忌諱。文化革命中，批判我的人給《意見書》加了「十大罪狀」，把我打入了「另冊」。同時，也使我在倍受磨難之後，有了進一步的思考。我被加諸的「罪名」主要的有：

首先是「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寫道：「世界上沒有完人。任何人都可以一分為二的，再偉大的人也會有缺點和錯誤。」「不應該把領袖神化、偶像化。」「應該鼓勵黨員和民眾批評中央、主席。」

其次是「攻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我提出：「學習中有兩種偏向：知識分子中大多數是教條主義式的斷章取義，工農群眾中不少是經驗主義式的另敲碎打。」

再次是「攻擊反右派、反右傾」，我指出：反右派以後，「基層領導開始聽不進反面意見；群眾較普遍地開始不敢講真話、不敢提意見。」以致形成了批評黨的工作中的錯誤就是攻擊黨、批評黨的基層領導就是反黨的局面；而「中央反右傾打擊面過寬了。不應該把群眾中的一些人也當『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待。與此同時，未制止當時已大為流行的『五風』，結果反右傾進一步助長了說假話。」

接著是「攻擊我們黨不民主」，我認為：「我們尤其是從反右派以後出現了較嚴重的缺乏民主的情況。」「如果一個人在某些問題上的看法和基層組織或某個黨的領導人有分歧，不是『不聽黨的話』，也是『否定成績』，從此，說假話成風，民主受到破壞，以致1960-1962年一些問題越來發展的越嚴重。」所以，「要鼓勵『放』，『放』是一個民主的問題，放的過程中「要正確對待放出『毒草』的人」，這樣「才能形成民主的局面」。

就是這些今天看來不是甚麼問題的「問題」，在極左的氛圍下，使我被批判了無數次，而文化革命中又使我受盡了折磨。

2-9 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和農村的實際

1964年9月底，大家聽完王光美^[121]繪聲繪色在河北撫寧縣桃園大隊搞「四清」的錄音報告，什麼「扎根串聯」、「訪貧問苦」，似乎十分神秘，都訝異不已。原來農村的階級鬥爭竟如此嚴重，似乎已經變天，建立了「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帶著「敵情觀念」，1964年10月我們到湖北江陵參

[121] 王光美（1921-2006），天津人。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

加「四清」。武漢真不愧是中國三大火爐之一，住在省委安排的洪山賓館，還全身出汗，熱的睡不著覺。

聽完省委書記王任重^[122]的報告，乘江輪到沙市培訓了一周。從北京出發前，我查閱了《楚地方誌》，才知道東有金陵、西有江陵，自戰國以來即為長江兩大通商要衢，而江陵乃古郢都，亦為三國時關羽所守之荊州。我趁便參觀了孫叔敖墓、張居正墓、關帝廟和荊州古城。社教工作團把我分到荊州縣灘橋公社遂心大隊工作，不知這個自古以來的漁米之鄉老百姓的狀況如何？

我住在一戶老貧農家裏，房子是土改時分的，已破舊不堪，雨下大就會漏。屋裏沒一件像樣的東西。一張大竹床，夜裏夫妻兒女擠在一起睡。養一頭豬，五隻雞。早餐喝稀飯，午餐一人一碗米飯，菜只有一盤「炸胡椒」（就是當地農民用碎米粒和碎辣椒加少許鹽炒的），晚餐喝稠稀飯。夫妻二人都很老實，很少說話。我們「訪貧問苦，扎根串聯」，才找到這個三代都是貧農的家住下來。

後來，聽他兒子說，父親也當過隊長，「大躍進」時不會吹牛給整下來了。一次一起下田，老人家打開了話匣子，才說了心裏話：土改以後過了幾年好日子，初級社時生產開始下降，高級社沒幾天又搞人民公社，這時就吃不飽了，煉鋼又把樹木砍光，一點家當也都貼進去了，青黃不接又不斷有人餓死。誰敢提個意見、哪怕說個俏皮話，也會挨批挨鬥，甚至把人打死，誰還敢再說話？

我問老人家，解放前怎麼樣？老人說，那時給地主扛活，幹一季子就夠全家吃一年了。你沒聽說嗎？我們這兒叫「一年四十二天忙，一天要慌九天糧」，就是一年栽秧、割谷只忙42天，剩下的日子我們就搞些副業、手工業，日子還過得下去。現在可不行了，特別是「大躍進」以後，一年四季瞎折騰，人累得要死，還吃不飽。日子過的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嘍。

我親眼見到了生產隊裏發生的十分悲慘的事情：白天，大人們都出工了。為了取暖，用一塊布把孩子包裹著，放在尚有餘溫的草木灰裏，下工回來以後，孩子竟被燒死了；五、六歲的小孩兒，在水塘邊上玩兒，掉下去就給淹死了。沒有到過那裏的人很難想像，那裏是什麼條件啊？但在此時，我對農村的問題還沒有更深入的認識，只是覺得都是骨肉同胞，他們竟然苦不堪言到這種程度！

[122]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時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後任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我先後住過的幾個隊，和老鄉一熟，聽他們說的說的大體差不了多少。那裏靠長江邊，多是水田，一個隊的人住在七、八個小村落上，房子大多是竹子搭的，泥巴糊牆，茅草蓋頂，只有大隊部有幾間瓦房，窮的可以。幹部確有「多吃多佔」現象，但絕不像王光美報告說的那麼邪乎。北大來的師生大多沒下過農村，連公雞「彈旦」（指交配）都沒見過，楞說「公雞欺負母雞」，用棍子給趕開，引得農民哈哈大笑。

這時，可抓著一個「階級鬥爭新動向」，發現農村幹部大多都有幾個「男女關係」，幾乎各個有北大師生的工作組，都報材料要把這些人打成「壞分子」。殊不知，荊襄之地多水田，老百姓「吃女人和牛的飯」，栽秧割谷多靠女人，男人入贅女家改為女家姓，農忙時往往在家做飯抱孩子，「打皮絆」（指男女不婚歡合）自然也就多了起來。十五國風講「楚風邪」，恐亦與之有關。當然，《二十三條》下來以後，這些「壞分子」一個也沒定上。

聽老百姓說，遂心大隊有一個「遂心橋」，每年一到栽秧割谷，女方唱起山歌，男方一應和，當天夜裏就會有男女「遂心」的事情發生。大家都不把這些事當甚麼醜事，反而覺得有本事。大隊工作組選中了一個在大隊油廠當廠長的轉業軍人，想讓他擔任黨支部書記。結果，他在栽秧時搞了一個「皮絆」。左右為難之後，工作組討論這在當地也不是甚麼大事，還是讓他當了黨支部書記。

3月底，各村放炮栽秧好不熱鬧。我凌晨兩點爬起來薅秧，栽了一天才栽了三分田，兩天下來腰酸的都直不起來了。經過勞動鍛鍊，我高興的是，自己也可以在獨輪車兩邊，放上兩百多斤東西，在田埂上推十幾里路了；用架子車在鄉間小路上，拉個三、四百斤東西也不成問題。農民都誇我能吃苦，和他們呆在一起，心裏很輕鬆，不用耽心哪句話說錯了誰會整你。

更糟糕的是那裏血吸蟲病、鉤蟲病流行，可能是我連續幾天薅秧，腿腳泡在糞水中，竟染上了鉤蟲病，當地叫「黃瘦病」，面色蠟黃，全身無力，大便黑油油的，潛血四個加號，被緊急送進了醫院。幾乎在病床上昏睡了兩個月，病情才有所緩解。這時，一個在部隊工作的朋友送來一本總政出版的《毛主席語錄》，每天背幾段收益非淺，出院時幾乎都可以背下來了。

1965年10月底，我們又到北京西北郊的延慶縣參加「四清」，我分到劉斌堡公社大觀頭大隊工作組。這個大隊五百多人都住在一個大村子裏，房子大多是土坯為牆，和江南水鄉相比，乃苦寒之地。老百姓可謂貧窮已

極，農民幹一天活掙不到一毛錢，近些年都是「生活靠救濟，生產靠貸款」，1/3以上壯勞力窮的娶不上老婆。人們穿的破衣爛衫，吃的包谷加菜糠。

農民看到我們這些人進村，開始都有些害怕，慢慢熟了以後才說些心裏話。和農民私下聊起來，所說幾乎和江陵農民說的差不多，大躍進傷了元氣，生活越來越差，前幾年還餓死人，這兩年剛緩過點氣來。農村幹部也是受盡了委屈，牢騷滿腹，稍不小心，就挨批判、鬥爭。下雪以後，村裏五六歲到七八歲的小孩子一絲不掛地跳著腳，瑟索地在牆角下曬太陽，一個個凍的像小紫蘿蔔，讓人心疼。

農村的現狀和農民的苦況，給我內心似乎深深地紮了一刀，痛苦的讓人食不知味、睡難安寢。深一步想，為什麼農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勞動，卻仍是衣不遮體、食不果腹？而我們卻住高樓、吃白饅？大家都是人，何以如此的不公？可是農民說起解放前，好像日子過的都比現在好，為什麼？總體上看來，是生產關係的頻繁變動嚴重破壞了生產力，引起了農民和幹部的不滿，這難道就是「階級鬥爭尖銳化」了嗎？

究竟是「階級鬥爭尖銳化」了，還是我們過激的做法造成了問題？斯大林在蘇聯「強行集體化」不是也採取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做法嗎？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是普遍性的嗎？為什麼荊州和延慶農民說的和上級的看法差別這麼大？再加上這麼嚴重的「三大差別」，可見實現共產主義還很遙遠！想起父親願一輩子為窮苦農民修水利、灌農田不辭勞苦的精神，覺得自己也該下決心為這些勞苦大眾作有益的事情，我提出了到農村工作以改變落後面貌的申請。

2-10「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標本——陳一諮

隨著全國階級鬥爭這根弦越繃越緊，北大的「反修批資」也不斷升溫。各系「反右派」的英雄們紛紛跳出來重操舊業，在1957年把好朋友劉紹棠^[123]打成右派的中文系「左派」教師呂乃巖，也到我們班來製造所謂的「階級鬥爭」了。本來，我所在的班是個思想活躍、十分融洽的集體，一搞階級鬥爭，突然這個「反動」、那個「右派」，弄得大家的關係緊張起來。

【123】劉紹棠（1936-1997），河北通縣人。曾被稱為「神童作家」。

他們先根據我反修學習中提的問題，批評我「懷疑中央」、「有反黨傾向」，繼而在主管日常工作的黨中央副總書記彭真，批示「黨內批評教育」將我送往中南海的《意見書》轉回北大後，於1965年10月底組織了對我的系統批判，說我寫的《意見書》是「反黨萬言書」，「有一整套和黨對立的看法」，「攻擊反右派和反右傾」，「徹底否定社會主義」，「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說來也真是無巧不成書，正是這些當年批我的「反右派」骨幹，「六四」後又最先發表聲明支持政府鎮壓學生。

中文系黨總支多次讓我檢討，我則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拒不認錯。但幾乎所有的師生都和我保持了距離，見了我惟恐避之不及，還不時投來懼怕或敵對的目光，外界的巨大壓力讓我時時感到孤立無援。少數有正義感的同學，像高運安、祁茗田，也只是遠遠投來悲憫的目光。可笑的是，那些在我挨整以前，一個勁地向我拉近乎、拍馬屁以爭取入黨的任喜貴、黃介山，為表示和我劃清界限，經常找碴批我，比任何人都起勁，這種人性中的醜惡，實在令人噁心。

但四周的壓力在日益增加，自己也處在天人交戰中，那些中外先賢為追求真理不懼艱險的往事，一幕幕閃現在我眼前，激勵我不致神經失常。在延慶農村，聽到廣播姚文元評「海瑞罷官」^[124]的文章，感到很尋常。緊接著，又傳達了「解散市委，打倒閻王」和「黑線專政」的《紀要》，繼而揪出了「彭、羅、陸、楊」^[125]，學習《516通知》，我預感到，一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了。果不其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了。

[124]「海瑞罷官」：《海瑞罷官》是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根據毛澤東在1959年4月號召學習海瑞「直言敢諫」精神而寫成的一齣京劇，內容是寫明朝大臣海瑞因為上書批評當時的明世宗而被罷官下獄，這齣戲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毛澤東曾經贈送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給吳晗，以示對其作品的認可。數年之後的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突然扭轉了這一評價，斥責《海瑞罷官》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由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25]「彭羅陸楊」：由於毛澤東的「左」傾，加上林彪等人的陷害，從1965年底開始，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書記羅瑞卿、陸定一、彭真先後遭到批判鬥爭。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根據林彪的指控，把彭羅陸楊打成「反黨集團」，停止和撤銷了他們的職務。這起冤案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當晚，中央台播出了聶元梓^{【126】}等7人的大字報《宋碩^{【127】}、陸平、彭佩雲^{【128】}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估計北大肯定亂起來了。6月5日我們回到學校，到處貼的都是批判陸平的大字報，口號的喧囂聲此起彼落，校園擠滿了來參觀大字報的人群，比廟會還熱鬧。聽留校的同學說：聶元梓的大字報5月25日貼出後，立即受到一批支持陸平的黨團幹部的圍攻。

中央台一播這個大字報，那些擁護陸平的人，馬上搖身一變又成了聶元梓的支持者，校黨委和老教授成了批判的重點。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129】}是河北省委書記，他說「北大是資產階級長期壟斷、專政的反動堡壘」，鬥爭的重點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很快，陸平和校系領導人、著名學者紛紛被批鬥、抄家、關入牛棚。被批鬥的人越來越多，行為也越來越野蠻，終於釀成了震驚全國的「6.18事件」。

6月18日早晨，北大到處紅旗飄揚，大小字報鋪天蓋地，高音喇叭不斷傳出批鬥黑幫的消息。不知何時，38樓前搭起一個「鬥鬼台」，將學校和各系抓來的黑幫分子輪番批鬥，且以各種侮辱人格的方式對他們進行體罰，有的墨汁塗面，有的抹滿糞糊，有的剃成怪頭、畫成鬼臉，當然，諸如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罰跪、挨打等刑罰，所有挨批鬥的人都無一倖免，實在讓人慘不忍睹。

據說，這個「鬥鬼台」上一天鬥了五、六十個人，看到那個場面的人都感到恐怖。張承先連夜召開全校廣播大會，力圖制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當天夜裏三點鐘，在北大第六食堂的南牆上貼出了一份二百多張紙的長篇大字報，標題用一張紙一個大字赫然醒目地寫著：《堅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標本——陳一諮》。早上五點剛起床，一個同屋的好心人告訴我：「左派貼你大字報了！」

我出去一看，大字報周圍人都滿了。大標題下面寫著嚇人的「按語」：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標本陳一諮，比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早一年就拋出了反革命的「二月提綱」，比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更系統、更惡毒地向黨進攻。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標本陳一諮，惡毒攻擊偉大領

【126】聶元梓 (1921-)，河南滑縣人。1938年參加中共，「文革」時期因張貼大字報，發動衝擊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和北大領導陸平、彭佩雲而聲名大噪。聶元梓和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被稱為造反派「五大領袖」。

【127】宋碩 (1932-1969)，浙江餘杭人。時任中共北京市委高校黨委副書記。

【128】彭佩雲 (1929-)，湖南瀏陽人。時任中共北大黨委副書記。

【129】張承先 (1915-2011)，山東高苑縣人。曾任河北省委書記，時任北大工作組組長。

袖毛主席，惡毒攻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惡毒攻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惡毒攻擊反右派，惡毒攻擊反右傾，惡毒攻擊我們黨不民主，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惡毒鼓動批評中央，惡毒鼓吹資產階級的「放」，惡毒鼓勵放出毒草的邊緣人物。我們必須徹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一諮的「反黨萬言書」，這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是射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毒箭！堅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標本陳一諮！陳一諮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我立即寫了一個一張紙的《聲明》說：「一、作為一個黨員，向中央提意見，是我的合法權利；二、既如此『反黨』，何不全文公開；三、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轉移鬥爭大方向。」這個來勢洶洶的批判總算在人們心頭產生了疑問。經同班同學朱殿慶要求，看了我寫的《意見書》，立即貼出了《陳一諮是個好同志》的大字報，將似乎要立即批鬥我的氣氛壓了下去。

時任中文系工作組副組長是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趙峰^[130]，她看了我的檔案，又找我談了話，而後說：「這是個雷鋒式的好青年啊！」阻止了事態的擴大。然而，我身上的壓力並沒有減輕多少，大多數熟人見了我還是遠遠地躲著，少數左派則對我「橫眉冷對」把我當成十惡不赦的敵人一般。那時，誰不繃緊「階級鬥爭」的弦，誰不「越左越革命」，就會被認為是「階級立場不堅定」。

2-11 「高呂之爭」和全國大串聯

由呂乃巖策劃貼我大字報的幾個人，又貼了批判高運安的大字報，但在班上的辯論中他們失敗了。我們班也成為北大第一個被「階級鬥爭」搞分裂了的班。高運安7月20日又以「工作組不發動群眾，包庇右派呂乃巖」為題貼了大字報，呂乃巖則聯絡中文系左派圍攻高運安。8月初，以呂乃巖就任中文系文革籌委會主任，結束了轟動全校的「高呂之爭」。

這期間北大先後發生了幾件大事：7月12日，地球物理系陳必陶、李丹林等寫了《把運動推向更高階段》的大字報批判工作組；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開全校大會，江青稱讚「6.18」是「革命的」，說工作組是「障礙物」；7月26日，在江青主持的北大萬人大會上，張承先被北大附中國學生彭小蒙打破了頭，還坐了飛機；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江青幾乎聲淚俱

[130] 趙峰，係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時任北大中文系工作組副組長。

下地控訴「階級鬥爭進了我家」，說：張文秋是個「叛徒」，把女兒張少華（後改名韶華）嫁給毛岸青，是為了迫害她。

會後，大家議論紛紛。記得我曾代表學生會去看望過住在留學生宿舍的張少華，她人很熱情自然，沒有貴胄子弟的習氣，怎會迫害毛主席有病的兒子？可是，江青總不會信口開河吧？回到宿舍不久，馮隆拿來一篇剛寫成的文章讓我看，題目是《江青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批判江青剛才的講話，還準備抄成大字報，被我極力勸阻了。7月28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成立，聶元梓當了主任。同時，建立了校園的「勞改隊」，強迫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勞動改造。

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鼓勵他們「造反有理」，並「熱烈支持」，從此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8月5日夜，北大貼出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明顯地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劉少奇；8月8日，文化革命《十六條》通過。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文化革命從此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血雨腥風的紅色恐怖浪潮。

一方面是全國各地大破所謂「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不僅到處焚燒中外典籍、搗毀文物字畫、破壞名勝古跡、批鬥各界名人；而且普遍出現了挑起鬥爭、煽動仇恨、破壞倫常的惡行，子女揭發父母、學生批鬥老師、徒弟毆打師傅，各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橫行無忌，人人都面臨著被整肅的「紅色恐怖」，不是你被別人揭發，就是你去揭發別人。

一方面則是「踢開黨委鬧革命」，造反聲浪席捲全國，各級黨委和政府機關均開始處於癱瘓之中。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等領導人，紛紛被造反派揪鬥；11月8日，聶元梓和孫蓬一等人貼出了全國第一張《鄧小平是黨內又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接著又炮打朱德，真是一時間鬧得烏雲滾滾；北大的紅色恐怖搞得人人自危，北京市到處都是打人、抄家、搶劫。

這時，姑母托人找到我，我看她一臉驚嚇的樣子，兩個手的手指都用紗布纏著，到底怎麼啦？原來，附近幾處領導和名人的家被抄，她耽心祖父的遺物出問題。結果在儲藏祖父遺物的小西屋中，還真發現了問題：祖父與各種官員名士來往的書札信函，有康有為、孫中山^{【131】}、于右任的，

【131】孫中山（1886-1925），廣東香山人。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創始人。

也有丘倉海、章太炎、章士釗^{【132】}的，還有許多名人字畫、古書、古硯和拓片。姑母一邊拿剪子絞著，一邊流著淚，雙手的指頭都磨破了，100多軸徐渭、董其昌、朱耷、查士標、汪士慎的字畫一塊錢一幅賣給了收破爛的，三伯父趁亂拿走了一幅趙孟頫真跡。幸好家人因此躲過了一劫。^{【133】}

為躲開無謂的爭端，從1966年8月中開始到1967年2月，我先後5次到全國各地串聯，趁機做些調查研究，先後去了濟南、泰安、南京、蘇州、上海、杭州、南昌、吉安、井岡山、韶山、長沙、廣州、桂林、南寧、貴陽、昆明、西安、蘭州、瀋陽、長春，增長了不少知識和見聞。印象比較深的有以下幾件：

一、造反派和保守派。縱觀各地，紅衛兵都以「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為旗幟，而「橫掃牛鬼蛇神」首當其衝的是文藝界、學術界權威，以及「地富反壞右」。接著，則是基層領導人，再後來則是省市以上領導人。往往單位領導得人心則保守派多，反之則造反派多。而衝擊到省市以上領導人時，往往由中央文革的臧否決定。但造反派中多激進圖變者、不滿現狀者、曾受不公者、異想天開者、多才多藝者、出身不佳者，痞子流氓亦往往雜入其中；而保守派中則多出身紅色者、黨團幹部者、保爹保媽者、保守附庸者、看風使舵者，出身不佳欲抱粗腿者亦往往混跡其中。故毛澤東煽動人們造反除卻政敵，先利用造反派而後再清除掉實乃題中應有之義。而像我這類文革伊始即被揪出之人，兩派是都不敢要的。

二、結識王申酉。1966年8月，我在華東師範大學看了王申酉的大字報，和他交談了一天。彼此惺惺相惜，還相互留下了聯絡方法，可惜兩人後來都慘遭迫害難以再見。他1962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入校後日漸對高調宣傳和社會現實間的反差不滿，幾乎是懷著和我同樣的心境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對「反右派」、「反右傾」、「不民主」的看法，也與我不謀而合。可惜，他卻在「四人幫」倒台後，和張志新^{【134】}一樣被無辜地殺害了。

三、江隆基^{【135】}冤死。北大的老師提起江隆基均交口稱讚。我的表姐夫郭筌到延安後在他手下工作，也對他佩服不已。為拜訪他這個「高校行

【132】章士釗（1881-1973），湖北善化人。曾任中華民國司法總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委。

【133】徐渭、董其昌、朱耷、查士標、汪士慎、趙孟頫，均為中國古代著名書畫家。

【134】張志新（1930-1975），天津人。1955年參加中共，文革中批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極左，後被殘酷處死。

【135】江隆基（1905-1966），陝西西鄉人。1927年參加中共，曾留學日本、德國，回國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先後任陝北公學教務長、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副廳長、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

政一級」的著名教育家，串聯中我特意趕到蘭州大學。誰料到，他竟已經自殺了。蘭大的師生痛哭失聲地告訴我：江校長 1959 年一到任，就指出學校的「主要問題是左」，整頓教學秩序，建立為教學科研服務的教育體制，還親自聽課，學生廁所堵了就自己掏，使蘭大出現了一個勤奮好學、尊師愛生的「黃金時期」。文革伊始，他即被打成「三反分子」慘遭批鬥，直至不堪受辱而自殺。我懷著難以言表的痛惜之情離開了蘭大。

四、「紅米飯，南瓜湯」。步行登上井岡山，參觀了茅坪、茨坪、八角樓、黃洋界，聽了當年根據地蘇維埃政府鄒主席的報告，但印象至深難忘的卻是紅軍當年的伙食供應：「每人每天三斤紅米飯，三錢油，一錢鹽」，竟比解放後城市的供應都好的多。再步行到韶山沖，參觀了「毛澤東故居」，從其擁有的土地財產，怎麼說土改最低也該劃個「富農」，卻給定了個「中農」。

五、在鄭州訪「人種」。鄭州郊區的一個軍用倉庫主任，被大字報揭發當過日本人的「人種」。出於好奇，我特意去拜訪。這個「人種」是哈爾濱人，「9·18」事變後被擄到日本，當時很多日本男人去打仗了，他被當成「人種」每個月包 15 戶，以滿足日本女人的性需求。一年後，他買通了一位在海船上工作的女工，逃回東北參加了抗日聯軍。文革開始時是個團級幹部，卻因此而挨鬥。

六、串聯中，在山東登泰山看日出，到浙江海寧觀錢塘潮，在廣西遊覽了桂林、陽朔，到雲南遊了滇池、龍門，在江蘇保護了西園寺。我到蘇州時，紅衛兵「破四舊」正要砸西園寺，被我極力勸阻，並當即給周總理發了電報，使其未受破壞，我還和主持雪相^{【136】}交了個朋友，他痛苦地說自己已經相信「唯物論」了，就是還弄不清楚到底有沒有「靈魂」和「報應」。

串聯所經之處，大字報鋪天蓋地，大辯論隨處可見。雖然無限上綱、斷章取義的東西居多，但不乏對各種問題揭露、分析獨到的見解，而最令人深思的則是：何以各級領導人奢靡腐敗如此之重？何以各種冤假錯案如此之多？何以幹群關係搞的如此緊張？而這種「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民主」似乎深具俄國民粹主義的特點，這麼個搞法能解決什麼問題呢？令人生疑。

【136】雪相（1913-1997），浙江嘉興人。1936 年落髮出家，1956 年任蘇州西園寺首座。

2-12 「2·22 反革命集團」和「二月逆流黑幹將」

1966年10月上旬我回北大，發現學校一掃聶元梓當政以來的獨霸局面，並成立了反聶的「井岡山」、「紅聯軍」，各種看法的大字報貼滿燕園。我溜躑了幾天，又去串聯了一個月。再回北大時，「北航紅旗」的幾個人找到我，要把我寫的《意見書》印發傳播。我說：「現在大家都很狂熱，這個東西若傳得太廣，一旦到了江青手裏，我就沒命了！」勸阻了他們。

原來，中文系幾個有正義感的同學把我寫的《意見書》油印出來，以便為我申冤，他們是馮隆、郭慶山和張自修。這時，農大附中伊林、滌西寫了批評林彪鼓吹「頂峰論」、「絕對化」的大字報，馮隆立即寫大字報支持，還沒貼出來，又被我勸阻了。我悄悄跟他說：「從林彪大談政變到現在權勢熏天，毛不支持，他怎麼敢？千萬不能往槍口上撞！」其實，當林彪「政變經」的講話傳出後，很多人都對他有看法。北京各個大學兩派爭論正酣，我就又去串聯了。

12月下旬，上海化工十七廠的一份血淚控訴，引起了我的義憤。工人們反映說：他們入廠以後，女工兩年就不能生孩子，男工三年就全身無力提不起重東西，原來是放射性元素超標幾千倍，而排入黃浦江的污水的放射性元素超過規定上萬倍，不顧工人們的死活竟到了如此地步？打聽到12月30日中央文革小組要去清華，我帶著反映情況的四個工人趕去了。江青穿著黑色女式西裝，熱情地和我們握手，聽工人流著淚講完情況，江青激動地說：「走資派這樣迫害你們，我和中央文革支持你們造反！」事後，問題是否解決不得而知。

聽說湖南長沙貼出不少周總理的大字報，我和幾個同學立即趕去。長沙果然貼了很多「周恩來是黨內又一個最大的走資派」的大標語，還有一些大字報。我們感到，若搞倒周總理可真要天下大亂了，就四處張貼「誰反對周總理誰就是反革命」的標語，將那股勢頭壓了下去。我到長沙一中拜訪著名的「奪軍權」戰鬥隊的楊曦光^[137]，可惜沒有找到。

接著，我和幾個同學應邀去了大連，先到造出中國第一艘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的大連造船廠，又到製造出我國第一台蒸汽機車和內燃機車的大連機車車輛廠，這兩個大廠一搞文革，生產幾乎停頓。我們一討論，覺得這一類工廠的生產搞亂了，對國家損失太大，決定發電報向周總理彙

[137] 楊曦光 (1948-2004)，後改名楊小凱，湖南長沙人。1967年因寫「中國向何處去」而入獄10年，後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任教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為澳大利亞科學院院士。

報。很快得到回音，2月25日上午周總理接見我們和工人代表。我們興沖沖回到北京，住在鐵道部招待所，準備給周總理的彙報材料。

1967年2月24日下午，我給高運安打了個電話。兩小時以後，黃介山帶著高運安等五六個人，突然來找我。黃介山皮笑肉不笑地騙我說：「系裏辯論呂乃巖的問題，請你發言。」讓我立即回校。我說：「大連的事關係國計民生，明天給周總理彙報完，我馬上回校。」黃介山又騙我說：「晚上全系開會，就等你了。會開完你就回來。」我看看高運安，他似乎很害怕，也說：「你就回校一趟吧。」

我和他們剛一走進校門，就被兩手倒架了起來，中文系的人站在路兩邊，高喊口號：「堅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一諮！」「堅決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陳一諮！」「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誰反對林副主席就打倒誰！」「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陳一諮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還時不時你一拳、我一腳地打人，只要稍一掙扎，胳膊就被擰得更緊，路上圍觀的人也跟著喊口號，我被押上了32樓中文系宿舍。樓梯兩邊站滿了人，一邊喊口號，一邊打我。進入樓道以後，兩邊人的拳腳像兩點般砸了下來，拳腳相加地把我從樓梯這頭打到那頭，又打到這頭，直打了三個來回，打得我鼻青臉腫，失去知覺，癱倒在地。這是我第一次被打死過去。直到第二天下午醒來，全身疼痛動彈不得。我強烈抗議這種法西斯暴行，要求見聶元梓，並宣佈絕食。

絕食的第二天，華秀珠來看我，她人很善良，原是上海紗廠的女童工，我表示：聶元梓不來不復食。絕食第三天下午，校文革辦公室主任夏劍彘來了，他說：「聶元梓同志很關心你，擔心你身體出問題，特別委託我來看你。不要絕食了，有話慢慢講。」我表示：「黃介山這種做法完全違背《十六條》，要允許申辯、允許看大字報、允許讀報紙。」他都答應了，還讓人端來一碗米湯，看我喝完才走。

又躺了兩天，我才能下床。走出樓外，看見黃介山、任喜貴署名的的大字報，題目竟是「死鬼陳一諮又活了！」我心想：他們怎麼會變的如此沒有人性呢？原來，聶元梓的校文革借批「反中央文革」和「二月逆流」之機，把「井岡山」、「紅聯軍」打成了「反動組織」，又在反對她的師生中大抓「反革命」，搞得到處都在鬥人，學校呈現出十分恐怖的局面。

黃介山藉機把反對聶元梓、呂乃巖的馮隆等人打成了「222反革命集團」，只不過這幾位同學經常在32樓222房間討論問題。以把自己的同學打成「反革命」的功勞，黃介山當上了剛成立的「新北大公社紅七團政委」。因為馮隆等人支持高運安揭發呂乃巖，黃介山騙我回校前，高運安

已被打成「反革命嫌疑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我上廁所，看見馮隆被剃光了頭在掃廁所，但眼神並無懼色。

3月初，黃介山連續兩次組織人批鬥我，仍是邊喊口號，邊坐飛機，連踢代打，讓我揭發馮隆「反江青」、「反林彪」的罪行。知道馮隆去年7月、11月先後寫過不同意江青、林彪說法大字報的人很少，因為並未貼出。揭發他的人很可能出於政治壓力下的恐懼，那麼，馮隆若承認了，肯定已經鬥的很慘。在大環境不實事求是的情況下，我若如實說出真相，馮隆豈不真的成了「反革命」？我一口咬定沒這個事，打得再慘也不鬆口。

2-13 3月17日，北大最殘酷的批鬥會

我的「頑固」使黃介山氣急敗壞，指揮新北大公社紅七團強行抄走了我所有的東西，以湊集把我打成反革命的材料。果如其願，黃介山從我的日記、讀書筆記和來往信件中，先後摘錄並印發了第三批「反革命分子陳一諮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材料。三月上旬，學校的高音喇叭裏播出了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中文系文革、新北大公社紅七團將我「開除黨籍和學籍」的聲明。

1967年3月17日下午1點，我被8個人從32樓押到第二教師樓，脖子上掛了一個沉重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陳一諮」的牌子，兩個彪形大漢反剪我的雙臂，讓我坐著飛機，連踢帶打把我押入了102教室。500人的教室坐滿了中文系師生，由任喜貴帶領著高喊：「堅決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陳一諮！」、「誰反對聶元梓就打倒誰！」、「陳一諮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各種打倒我的口號。

黃介山主持會議，惡狠狠地講了幾句上綱上限的話，走過來揪住我的頭髮讓我「認罪」，我剛說了一句「我沒罪！」就遭到一陣毒打。接著，新北大公社的骨幹輪番揭發我「惡毒攻擊」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林副主席、江青同志、活學活用、反右派、反右傾、不民主、社會主義、聶元梓和新北大紅色政權的罪行，說幾句就打一頓，頭髮一縷一縷揪下來，汗水和血水染濕了地面。

開始，我還能有些反抗，高喊著：「你們實行法西斯專政！」、「聶元梓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沒有好下場！」、「毛澤東思想一定會照亮新北大！」。但16個人分4個組不斷輪換，將我倒架雙臂、按下上身、揪住頭髮、仰頭向上還不斷毆打、腳踢，4個小時的酷刑折磨，使我漸漸失去了

知覺。恍惚中，馬西沙大喝一聲，把我右臂給擰斷了，任喜貴又用腿把我左肋踢斷了。我癱倒在地，昏死了過去，再也沒有醒來。

昏迷中我被幾條大漢架出會場，倒拖著拉到32樓，扔到了宿舍的床上。依稀中感覺自己還有一絲游息，只要停止呼吸就可以死去。活著是那麼艱難，死卻非常容易。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了，可是又怎麼能就這麼死去呢！在大家的眼中，在戰場上犧牲是個英雄，在刑場上就義是個烈士，自己這麼不明不白的死去算個什麼？何況還背上了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太不甘心了，不能死。

混沌中似乎聽到樓下高喊著：「沈達力畏罪自殺罪該萬死！」的口號，心中吃了一驚。再細聽，果然是沈達力自殺了？！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動彈不得，淚水從眼角不知不覺流了出來，我又昏迷了過去。再次醒來，腦子裏不斷閃動著古人受苦受難不屈不撓的畫面，「上天讓人類降生了，上天讓人類受苦了，上天讓人類死去了，這就是歷史」，但我不能死，有一口氣就要堅強地活下來，一定要活下來！「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活下來才能給沈達力、給自己洗刷清白，活下來才能最終伸張正義，活下來才有實現理想的機會。朦朧中想起1960年在廣州，父親給我教的「龜息功」和「瑜伽功」，舌上放一粒米頂在上顎，吸氣到丹田循環運行而不呼出，這樣7日水米不沾仍可維持生命。我試著做起來，做著做著就又昏迷過去了。

這樣，我在床上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醒來時，看見同屋的高運安、朱殿慶、劉鎮偉、張崇巖都眼睛紅紅的看著我。劉鎮偉說：「我們都以為你活不過來了！」張崇巖端過一碗粥說：「喝點吧！」朱殿慶則痛罵了一句：「真他媽的法西斯！」流下了熱淚。我想上廁所，高運安趕忙把我扶起來，全身疼痛的不堪忍受，擰斷的右臂腫脹的不能動，左肋也疼的更厲害了。我的腳剛一踩到地上，又疼的縮了回去。原來把我從第二教室樓拖回宿舍時，腳趾頭和鞋襪都磨破了，血肉、泥土和鞋襪粘在了一起，實在疼痛難忍。高運安扶著我，一步一挪地到了廁所，尿裏尿出的竟都是紅黑色的血尿，後來醫生告訴我是右腎讓踢壞了。左手按著左肋，往床上一躺，又是鑽心的痛，醫生檢查說是左肋讓踢斷了四根肋骨。

真應了泰戈爾所說：「人一旦變成獸，一定比獸更凶殘」的箴言。多年以後，幾個老同學說起「3·17」批鬥我的場景，一致說那是他們參加過的「北大最殘酷的批鬥會」。2006年，我的胳膊和腿腳突然先後不能動了，中國科學院顧問郭德純醫生給我診治時說：「你40年前，身上留下了十幾處斷傷和瘀傷，能活下來真是個奇跡！」。

2-14 沈達力為什麼會自殺？

據目擊的同學說，「3.17」批鬥會開到5點時，我已被打的昏迷不醒。主持會的黃介山把矛頭一轉，揭批起沈達力的「反動面目」，而且拿出沈達力寫給我的信一段一段念，一段一段批，污蔑她是「反動的資產階級臭小姐沈達力愛上了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陳一諮」，是「反革命階級本質相同的臭味相投」，是「兩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企圖顛覆新北大紅色政權」，對她極盡攻擊和羞辱之能事。散會時，黃介山宣佈：「明天批鬥現行反革命分子沈達力」。當時，沈達力嚇得面如灰槁、形似木雞，散會時仍呆坐不動。旁邊的同學同情地拉起她來，她流著淚走出二教，一個人默默地往未名湖走去。她親眼看到一下午對我的殘酷批鬥，那無所不用其極的惡劣手段，讓她產生了無比的恐懼，一個女孩子明天怎經得起這等折磨？在迷茫中，她到紅湖游泳池旁喝下「來蘇兒」，結束了自己21歲的生命。

當天夜裏和第二天上午，黃介山、任喜貴等人為逃脫逼死人命的罪責，竟連續在32樓前組織聲討會，聲嘶力竭地批判她「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罪該萬死」、「死有餘辜」、「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真是天良喪盡，禽獸不如！中文系師生在「反轟即反動」的政治高壓下，一時也無可奈何，只能對這種滅絕人性的惡行憤懣於胸。

沈達力1945年8月5日出生於江蘇如皋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沈灌群^{【138】}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後回國從事教育工作，任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母親石淑儀^{【139】}是南京大學天文系教授。沈達力自幼即受到良好教育，又非常聰穎好學，積極追求上進，高一時所寫劇本即獲得過上海市中學生創作一等獎。1962年17歲時考入北大中文系，參加文學社、合唱團、短跑隊、游泳隊，是個美麗、清純、活潑的姑娘。

入學一年多後，她對我的博學多思非常欽佩，我也對她的多才多藝傾慕不已，我們相戀了。那個年代，在大學談戀愛是犯忌的，不能讓旁人知道。平日裏，總是我給她在圖書館佔一個座位，她則時不時給我寫一個條子問我問題，我的回答往往讓她點頭稱是，微微一笑中讓人倍感溫馨。每逢周末，我們就在校園大圖書館旁邊的魏士毅烈士紀念碑的柏樹牆內偷偷約會，討論各種彼此關心的問題直到深夜。

【138】沈灌群（1908-1989），江蘇如皋人。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中國著名教育史家，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139】石淑儀（1916-2006），南京大學天文系教授。

考試前，我們會一起交流學習心得，可我總比她考得好。她多次深情地說「與子相識，三生之幸」，她還說：「將來你出思想，我給你當秘書。」她返家探親還來信說「與子之別，思心徘徊」，走在路上似乎我就在前面，結果趕上去一看不是就很失望，多少次還在夢中和我「縱論天下」。但我們那時何等守禮，從無越軌行為。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想摸摸她那豐滿的乳房，她說：「不行，不行，那樣我們就不純潔了。」害羞地躲開了，弄得我自慚形穢了許久。

1965年2月，我給毛澤東寫了《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點意見》以後，就把《意見》的複印稿和我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寫的兩本日記，寄給了在上海休假的達力。她回到北大和我談起來，深情地說：「你寫的《意見》中，提出反右派、反右傾和不民主的問題，我也有感覺，我妹妹達非看了，都說你是個難得的人才呢。你日記中說『生產關係的頻繁變動破壞了生產力』，很有道理。可你不害怕嗎？這麼寫會不會惹麻煩？」我說：「發現了問題誰都不說，國家怎麼搞好？我無所畏懼！」她一下躺到我的懷裏柔情地說：「我就喜歡你這種精神！」

1965年10月我受批判後，呂乃巖讓她和我「劃清界限」，她當時感到非常困惑和痛苦。文革開始，她支持聶元梓，後對其打擊異己不滿，參加了「紅聯軍」。聶元梓借「反二月逆流」之機大整反對派，一下子在師生中抓了200多「反革命」，沈達力亦在其中。新北大公社的裘燮君，還跑到華東師大揪鬥她的父親，並攻擊她的父親是「反動學術權威」，養了個「反革命分子」的女兒。她受盡了各種恐嚇與侮辱，若非難以承受的煎熬，一個風華正茂的少女何至於輕生呢？

愛女的棄世令她的父母痛不欲生，給家庭蒙上了深深的陰影。直到8341部隊1968年進校為沈達力平了反，我見到來北大取骨灰的她的妹妹沈達非。我們握著手，低著頭，流著淚，默默地在北大東操場站了一個晚上。從此，我們每年都會通幾次信互致問候，她待我如兄長，我待她如妹妹。後來，我認她父母為義父母，每年「3.17」達力祭日時給老人家寫封信以表慰藉之情。兩位老人家也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給了我許多指教，我和達非的友情一直延續到現在。

人生中的第一次戀愛總是刻骨銘心的。在那以後的好些年裏，或有女性向自己表達愛意，或有朋友給自己介紹女友，我都極力推脫，內心總有一種對達力的愧疚，覺得自己不該「六尺黃土未乾，三寸之心即變」，或則常常以達力來苛求對方，「既要有她的優點，又要有她的缺點，而缺點

又要成為某種優點」，以致使自己很難對其他女子再產生和達力那樣的情愫。此後的八、九年間，我再也沒有碰到過像和達力那樣投緣的女子。

從1966年12月聶元梓借批「反中央文革」大整反對派開始，到「反二月逆流」狠鬥各系對她有異議的師生，終於在北大出現了「紅色恐怖」的一統局面。這期間北大被整肅、批鬥、抄家、毆打、傷殘、自殺、冤死的人真是不知有多少，知識分子更是無人倖免侮辱，像達力這樣被迫害致死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罷了。那時，全國被逼被整至死的冤魂數不勝數，令人觸目驚心。

2-15 聶元梓的倒行逆施

聶元梓因被毛澤東稱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成了叱吒風雲的人物，她當上北大校文革主任之初，師生們還對她寄予希望。但她很快就頭腦膨脹、忘乎所以，對持不同意見的師生排斥打擊，甚至製造出「反對聶元梓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聶元梓就是反對中央文革」、「反聶即反動」的邏輯，借口反對「二月逆流」，把批評她的「井岡山」、「紅聯軍」打成「反動組織」，殘酷鬥爭。

當時，北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一批極左派在校園裏為所欲為，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持異議者隨意抄家、搜集材料，而後批鬥、毆打、迫其認罪。連聶元梓的「戰友」孔繁^[140]、楊克明^[141]、郭羅基^[142]、張俠^[143]、楊勳^[144]等人給她提意見，也被認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是「陰謀家」、「野心家」，遭批判、毆打，甚至送進監獄。幾乎各系都在師生中不斷抓出各種「反革命」，搞得多數人心驚膽顫，敢怒而不敢言。

中文系在系文革主任呂乃巖操縱下，新北大公社紅七團政委黃介山，更是無法無天地隨意批鬥不附己意的人，在各個年級亂抓「反革命」和「反革命集團」。人們見到他，都既噤若寒蟬，又側目而視。

我被押回北大後，開始的幾次批鬥會，主要是為核實我反對毛主席、林彪、江青的材料。經我矢口否認後，呂乃巖、黃介山等人一時還湊不夠

[140] 孔繁（1930-），山東東平人。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副書記，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

[141] 楊克明，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聶元梓7人大字報作者之一。

[142] 郭羅基（1932-），江蘇無錫人。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先支持聶元梓後來反之。

[143] 張俠，時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黨總支書記。

[144] 楊勳（1932-），山東壽光人。因反對聶元梓被捕入獄，後任北京大學經濟系副主任、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副組長。

將我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證」，而「3.17」批鬥會無非是要搞臭我、孤立我，以起殺雞儆猴之效。我若「低頭認罪」，後果將不堪設想，只有對抗到底才有活路。他們聲言要將我送交公安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表示「歡迎，可以少挨打了」，但卻不見回音；又說要將我送校文革「勞改隊」，也沒有了下文；對我實行「強制勞改」，我硬是一天都不去。

系裏不少人被迫去「勞改」，而我這個「最頑固的反革命分子」卻一天也沒有去。他們就用輪番批鬥折磨我，企圖讓我從肉體到精神都垮掉。小到我的一言一語，他們都會批鬥一場，陪鬥更是家常便飯。任何把柄都會拿來大作文章，我看《三國》，說我「尋找對付革命人民的陰謀詭計」，鬥一場；看《紅樓》，說我「對封建貴族情有獨鍾」，再鬥一場；我有一本《聖經》，說我是「真基督教，假共產黨」，又鬥一場；……。就這樣，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我先後被批鬥了一百多次，有時一天一次，有時一天兩、三次。

我拒絕參加所謂的「早請示，晚彙報」，並且說「我們又不是宗教，幹嘛搞這一套！」，又是一場接一場的批鬥。事後，我倒覺得自己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量，全國都成了紅海洋，人人都要「早請示，晚彙報」，到處都在「跳忠字舞」、「唱語錄歌」，只有我這個傻子，寧可皮肉受苦，也不做這些違心之事。我很為自己文革中沒參加過一次這類群氓活動而感到自豪。

第三次把我打的昏死過去的一場批鬥，是新北大公社孫蓬一^[145]等人要組織人馬衝公安部，我說：「這麼做是犯罪行為！」立即被黃介山等人，給掛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押到大飯廳批鬥，而後又全校遊鬥，一邊呼口號「堅決打倒惡毒攻擊新北大紅色政權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邊眾人你一拳我一腳打個沒完。半天下來，我又氣息奄奄地被扔到床上，幾天都動彈不得。

北京各高校不少有正義感的師生，對北大出現大規模鎮壓反對派的「左派恐怖」表示強烈的不滿，紛紛伸出援手。10年前，我當少先隊輔導員時的那些少先隊員，幾十個人串聯起來到北大救我，看到我被打的慘狀很多人都哭了，說一定要嚴懲打人兇手。我感謝他們，但勸他們不可盲動，需要時再找他們。回宿舍時，正巧路遇打人最狠的馬西沙，我悄悄說：「你今後再打一次人，10天內讓你也嘗嘗挨打的滋味！」以後他果然收斂了，見了我都躲著走。

[145] 孫蓬一，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時任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

我原住宿舍的幾個同學都同情、支持我，黃介山為便於監督，強行把我搬到另一個宿舍。這個宿舍有兩個小市民習氣很重的人，不斷找碴打我鬥我，一天我忍無可忍豁出去了，說：「你們再無端生事，別怪我無情。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嚇得他們逃離了宿舍。不一會兒，黃介山帶一幫人來，又把我狠狠地批鬥了一場。接著，把我搬到住著一個經常打人的神經病人的房間。

原來這個有病的人叫王紹奇，當過廣東汕頭一中團委書記，高中畢業時入黨。此人才氣橫溢，寫得一手漂亮的詩詞和書法。考上北大不久，因汕頭市黨內派系糾葛，被開除了黨籍，女朋友也吹了，以致神經失常。中文系誰都怕他，我卻和他成了好朋友。他還常照顧、保護我。多年以後，他還從廣東順德糖廠來信問候我。

黃介山當時像瘋了一樣，對我非法「抄家」時，不僅抄走了我的文字材料，如：讀書筆記、日記、信件、書籍和我收存的家族資料，還抄走了我祖父留傳的珍貴物品，如：康熙皇帝賜的玉帶、祖父收集的六十多國郵票、整套的清朝大龍郵票和戰國以來各朝各代的古錢，以及我的各種生活用品，如：衣服、棉被、鞋襪和二百多元錢、幾十斤糧粟。

「抄家」把我抄的一無所有了，「革命人民」哪管「階級敵人」的死活？你一旦成了「敵人」，就是畜生不如。我沒地方找人評理，就在垃圾箱裏揀了一個破棉絮，一半當褥子、一半當被子；又揀了兩隻一順兒的鞋換掉已磨破的鞋；把兩塊磚頭用報紙一包當枕頭。天涼以後，又揀了一件別人扔的破棉襖，好不容易把破處補上補丁，權且禦寒。朋友們都笑著說我當時像個「丐幫長老」。

北大師生對聶元梓一夥的倒行逆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高壓3個月以後，1967年3月，北大由暗到明，又先後出現了批判聶元梓的「北京公社」、「紅旗飄」、「井岡山」、「東方紅」等群眾組織。6月，新北大公社也分裂出了「革命造反總部」。8月，這5個組織聯合為「井岡山兵團」，得到了北大師生的廣泛同情和支持。聶元梓獨霸北大的夢想破滅了。

這時，校內、校外的朋友兩次質問校文革為何將我打成「反革命」？聶元梓竟厚著臉皮說：「我們從來沒把陳一諮打成反革命！」。因為我的情況「特殊」，文革前寫的「反黨萬言書」，多處「攻擊黨和黨的政策」，在當時是個所謂「有爭議的人物」。為了不給北大的反聶組織帶來麻煩，我決定不參加什麼組織，只交個人朋友，以利冷眼旁觀。

江青「文攻武衛」的講話，迅速在全國形成「全面內戰」的局面。極左狂熱繼續發酵，各地武鬥不斷升級，兩派的殘殺也越演越烈，特別是草

管人命的消息令人髮指。湖南道縣的紅衛兵竟一次將全縣四千多個四類分子及其子弟集體屠殺，連不滿月的嬰兒也都不放過，這麼慘無人道的悲劇讓人震駭！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一方面趁機在中央各部委奪權、在地方製造混亂，一方面還要在楚歌四起的北大到處挑起糾紛，揪鬥新的「反革命」，北大師生實在是忍無可忍了。

2-16 北大師生的憤起抗爭

北大的「右派翻天」了，居然敢反中央文革支持的、大權在握的「大左派」聶元梓！連著名教授周培源、季羨林、侯仁之^{【146】}等都參加了井岡山。正像季羨林後來所述：「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滿意的不多。我拼著老命反『老佛爺』一事，是最滿意的事情之一，它證明我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膽小鬼。」人的正義感和良知終於迸發而出了。

我在受了6個月的折磨和屈辱以後，又可以挺起腰桿做人了。我先去看望了周培源伯伯，8年前父親帶我拜訪過他。周伯伯滿頭銀髮，精神矍鑠，聽我講了挨鬥的情況，他氣憤地說：「我說聶元梓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她還不認賬。不擇手段地亂批亂鬥，把北大搞得亂成了甚麼樣子！」周伯母王蒂澂^{【147】}一邊聽我講一邊流淚，臨走還送我兩件衣服，叮囑我要多保重。

接著，我貼了幾張聶元梓的大字報，並和「井岡山兵團」五派組織的頭頭陳醒邁、趙凱元、侯漢青、牛輝林、徐運樸、樊立勤等進行了交談，還結識了何青、謝佐平、石天曙、陳必陶、趙豐田、王紹賢、王七一、王傳智、彭秋和、黃仕強、王棉棉等朋友，深感聶元梓一夥的所作所為激起了眾怒。在校外，我也交了幾個好朋友：有北醫的孫勇剛，地院的孟繁華、李仲學，北工大的張念慈，他們的人品、學識均使我受益非淺。

從1967年秋到1968年春，當全國一片混亂時，我還算過了半年多比較輕鬆的日子。每天上午讀《資治通鑒》、《法國革命史》、《英國革命史》這類史書；下午、晚上則和朋友們打橋牌、下圍棋。每週都會和幾個朋友騎著自行車，到北京附近的名勝古跡遊覽，像八達嶺、周口店、上方山、蘆溝橋、十渡、妙峰山、潭柘寺、十三陵、雍和宮、小湯山、密雲，去了都不止一次。那時，大家都沒錢，買幾個饅頭，幾分錢鹹菜，頂好時再買五毛錢豬雜碎，可玩的盡興，吃的香甜，一切煩惱暫且擱下。雖然前途未卜，但希望未滅，沒有人相信這種局面會延續下去。

【146】侯仁之（1911-），山東恩縣人。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

【147】王蒂澂（1810-2009），山東濰縣人。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當聶元梓頭腦膨脹、橫行專制、胡作非為時，遭到思想活躍而富有正義感的北大師生的強力批判和抵制。而她「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鎮壓行為，更加激起眾怒和公憤，反對派越聚越多。1968年3月，「新北大公社文攻武衛指揮部」成立，聶元梓企圖以武力消滅反對派，這使她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她派人四處抓捕反對派骨幹，生物系學生樊立勤被抓受到慘不忍睹的迫害，抓周培源未遂而抄了他家……各系也紛紛倣尤。聶元梓的種種惡行使北大又一次陷入「左派恐怖」之中。3月29日凌晨，聶元梓下令讓手持長矛的新北大公社武鬥隊，突然襲擊住在31樓手無寸鐵的反對派學生，致使100多人被打傷，許多人光著身子逃出了宿舍。

從此，開啟了北大長達4個月的武鬥。4月26日，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孫蓬一現場指揮，揚言要「將井岡山兵團消滅乾淨」，一時箭簇齊發、磚瓦亂打、棒矛飛舞，口號、叫罵之聲不絕於耳，打傷兩百多人。同時，繼續抓捕反對派骨幹，逼供拷打，哲學系學生何青被打流產，俄語系徐運樸被打傷致殘，物理系學生鄧樸方^{【148】}被綁架至物理大樓，他不忍受辱從四樓跳下而摔成了高位截癱，地理系學生劉璋被抓活活打死……

3月底，在北京衛戍區調解下，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兵團交換俘虜。樊立勤被交換出來，奄奄一息地抬到海澱醫院。謝佐平跑來告訴我：「樊立勤不行了，醫院已放棄治療。」我們趕到海澱醫院，黃仕強搖搖頭說：「不好辦了！」大家一時想不出好的辦法。我說：「我三嫂周羨梅是北醫三院的主治醫生，快送那兒去吧！」謝佐平的老朋友孫勇剛，揹起昏迷的樊立勤就跑。我找到三嫂說：「樊立勤是江青讚賞的革命小將，請務必救活他。」她急忙帶我去找了駐院工宣隊長。經三天三夜的搶救，樊立勤終於出現了生機。我再三向醫院工宣隊和三嫂表示了感謝。樊立勤出院後又到北京地質學院療養了4個多月，直到8月中軍宣隊進北大才返校。我原來和他並不熟，因他堅決反工作組、反聶元梓，我對他的硬骨頭很欽佩。

1967年2月我挨鬥時，他也挨鬥，偶爾見面就彼此鼓勵一下。後來，新北大公社鬥我時，就加了一條「勾結反革命分子樊立勤，攻擊堅定左派聶元梓，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康生」的罪名。3月26日，樊立勤散步時，被新北大公社抓走施以酷刑，打斷了右臂、右腿，左膝釘了釘子，左右手指被鉗子夾斷。他被打的死去活來時，井崗山兵團和新北大公社交換俘

【148】鄧樸方（1944-），四川廣安人。前中共領袖鄧小平的長子，北京大學原子核物理專業畢業。196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第十五、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連任四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團主席。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團名譽主席。

虜，侯漢青特意將他救了出來。也是出於義憤，他在地院養病時，生活沒有著落，我又從姑母處借錢養他。

但我對他許多過於極端的痞子想法和厚黑作法並不苟同。後來，幾個熟知他的朋友都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個紅衛兵」。其實，我何嘗不知，他貼康生大字報，是認為康生左的還不夠；他還很欣賞林彪「不說假話成不了大事」的鬼話。「六四」後，他為諂諛鄧家，竟喪失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線，昧心地對我進行攻擊，讓人噁心地看到了極權制度下的痞子嘴臉和人性扭曲。

聶元梓在北大挑動的武鬥仍在升級。7月23日，聶元梓決定對井岡山佔據的樓房全面停水停電，又演變成一場大規模武鬥。抓人之風也愈演愈烈，新北大公社各系的分支組織都在亂抓反對派。一次，我和謝佐平去看西語系的劉淑貞，剛到她家門口，就看見幾個新北大公社的人正等著抓她。我們趕忙騎車就跑，他們也騎車追了上來，一直逃到北京體育學院，藏到一個墳頭後邊才躲過一劫。

聶元梓在北大的倒行逆施，北京各高校無人能望其項背。連毛澤東後來都批評聶元梓這位愛將的校文革是「派文革」，「武鬥文革」，「逼供信文革」。40年後，看到《聶元梓回憶錄》，萬萬沒有想到這個致千家萬戶於死地的罪人，玩弄陰謀權術的專橫政客，不僅絲毫不作一點真誠的懺悔，反而把自己打扮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和無辜的受害者，真是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2-17 俠肝義膽的孫勇剛

1967年我結識了孫勇剛，他是哈爾濱人，為人聰穎好學、仗義豪爽、剛正不阿，是北京醫學院口腔系的高才生。聽說芭蕾舞團選男演員，就喜歡哈爾濱人，因為那裏的男青年體型優美。孫勇剛入學不久，就被老師當作教學「模特」，只穿一條游泳褲，讓各班同學觀看他的身體構造。他不僅肩寬腰圓、胸肌發達，而且通體勻稱、結構合理，是一個標準的美男子。女同學見到他，也無不嘖嘖稱羨。

文革不久，工宣隊進校，他在北醫帶頭反對亂整人，但又不願捲入運動的是非中，就在西什庫的「菜園」——北醫十三宿舍裏，和一批朋友們讀書、下棋、聊天，日子過的十分愜意。北大生物系謝佐平是他的中學好友，介紹我和他交了朋友。我們一見面就很投緣，均感相識恨晚。我們最

看不慣的，就是文革時那種弟子揭發師長、兒女批判父母，這一類的反倫理行為。

在那荒唐的文革歲月裏，為逃避惱人的各種政治花樣，勇剛巧妙地泡了個「肝炎」病號。一天早晨，他在食堂吃了四個油餅，喝了四碗加糖豆漿，之後便上街狂奔。屢獲北醫中長跑冠軍的他，跑了1小時後，以肝區不適為由，進行抽血化驗，結果「谷丙轉氨酶偏高」，乃「肝炎」病人。有病休息，天經地義，他從此爭取了一個「逍遙派」的條件，「菜園」也成為朋友們聚會的世外桃源。我也和他學到一些「泡病號」的本領。像喝一瓶墨水去照透視，肺部就會有陰影；提肛門屏氣，血壓就會升高；試體溫時，悄悄把溫度計的水銀柱拿手一搓，溫度計就會上到三十八九度，發燒……醫生就會給你開一個病假條。這種權宜之計，使我也逃過了多次批鬥會。為了活下去，人們學會了不少躲開激烈政治鬥爭的能耐。我一開了病假條，就住到他那裏去「避難」。

勇剛在「菜園」可是威風八面，同學都戲稱他為「山大王」。一次，一夥流氓來搗亂，勇剛不動聲色走到流氓頭面前，說：「別搗了，走吧！」那傢伙還不想走。真是靜如松、動如風，說時遲、那時快，勇剛一手抓住那人胳膊，一反手將那人摔出四、五米遠，嚇的那夥人紛紛逃竄。其實，勇剛外表雖強悍驍勇，骨子裏卻是個謙謙君子，非但不仗勢欺人，反而一貫扶困濟危，所到之處口碑均極佳。

有一次，我到王府井買完東西。登上14路公共汽車，車剛開就聽一個30多歲的婦女尖叫了起來：「我的錢包被偷了，這可怎麼辦哪，剛領的工資都在裏邊啊！」婦女急得大聲哭泣，可四邊的人沒一個吭聲。車馬上要到站了，我大聲說：「司機不要開門！我們一個一個搜！」車停了，大家都沒有動。那個婦女突然說：「錢包在地上！」她撿起錢包，千恩萬謝地下了車。一個老人給了我一個眼色下了車。三個賊眉鼠眼的人往我身邊走過來，我立即下了車，他們也跟著下了車。老人走到我身旁悄悄說：「小偷盯上你了，你趕快找個安全的地方，我可以陪你走一段。」我和老人又上了14路公共汽車，那三個人也跟了上來。我們到西什庫北醫「菜園」宿舍下了車，那三個人還是緊追不捨。我和孫勇剛一說，他立即找了七、八個壯漢，拿棍子把那三個小偷打跑了。

住在「菜園」，總會有朋友們來湊熱鬧。最有趣的是，一次兩個北大的小女生王棉棉和席莉莉來玩。我們打「四十分下台」，我和勇剛一頭，她們兩人一頭。我們已經轉了三圈，她們還沒開糊，兩個小姑娘竟相互埋怨起來。這時，勇剛哈哈一笑，拿腳趾夾起牌，說：「這牌怎麼有腳丫泥

味兒呵！」她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約定好了，他摸頭髮，我遞黑桃；他摸眉毛，我遞梅花；他摸臉蛋，我遞紅桃；他摸下巴，我遞方塊；我也同樣作法。她們哪會贏牌呢！但大家玩的很痛快。

我們一起玩遍了北京的名勝古跡。8月的一天，大家說，「南有蘇杭，北有上方」，上方山雲水洞很值得好好去玩幾天。我們做了幾支火把，又準備了汽油、蠟燭、手電、繩索和食品、炊具。在一個月明星稀的凌晨，七個朋友騎著自行車往房山縣進發。快速行進了兩個多小時，車行了近八十里，有人拉在了後邊。勇剛忽前忽後的兩頭照應，不斷催促後邊的人跟上。我說：「打個尖吧！」歇下來，大家喝水、吃餅、閒聊。

雖說誰也不是酒囊飯袋，但陡然這麼急行軍，還是挺累人的。佐平慢悠悠地說：「玩三天哪，別著急！」一歇，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勇剛說：「不怕慢，就怕站。走吧！」中午，就到了上方山。這裏為「燕郊諸山之冠」，以奇峰、異洞、流泉、古木、寺庵而聞名於世。登山上行，右手巖壁硃筆寫著：「鴿子洞驚險萬狀，稍一不慎，粉身碎骨！」我和勇剛偏不信邪，非要過去看看。

走到鴿子洞下，向上望去，只見一絕壁矗立，竟無一處可攀援。勇剛高喊一聲：「看老子的！」他竟作壁虎狀爬了上去，大家齊聲喝彩。勇剛在上面喊：「上來呵，風景這邊獨好！」我不幹示弱，就脫了鞋，用手指和腳趾摳著巖縫，一點一點爬了上去。洞裏鴿子糞足有一尺多厚，裏面什麼也沒有，極目遠望倒是層巒疊嶂剎是好看。勇剛向我擠擠眼，喊道：「快上來啊，好看極了！」竟無人響應。

上山容易，下山難。怎麼下去呢？我說：「大家把皮帶接起來，拴在繩子上扔過來！」有人說：「我們走了，你們慢慢下吧。」佐平還是把繩子扔上來了，我和勇剛順利地爬了下來。大家說說笑笑往前走，抓住鐵索攀過鑿於陡崖的「天梯」，過雲梯庵到了隋末所建的兜率寺。天色已暗，我們在寺中一小井旁安營紮寨，有人作飯，有人薰蚊子。吃完煮麵條，大多已入夢鄉，我和勇剛在每人睡處四周，又點了些艾蒿。

第二天早飯後，我們緩步順小路西行，到雲水洞。洞內漆黑一片，勇剛自告奮勇，腰裏拴上繩索，手上點起火把，往前探路。聽說，明代有人放鴨子到洞裏水中，竟從門頭溝游了出來。此洞有多深，我們誰也不知道。摸摸索索前行了一、二百米，洞穴突然大了起來，遍佈鐘乳、石筍、石花、石幔。有什麼「二龍戲珠」、「吊睛臥虎」、「石鍾天韻」、「像馱寶瓶」、「十八羅漢」，等等，真是目不暇接，美不勝收。玩了4個多小時，

走時火把齊明，大家齊吼，餘音迴蕩竟不知所蹤。令人流連忘返，遲遲不肯離去。

回程，大家遊興未盡，夜色中又跳到永定河畔抓蛤蟆。凌晨，在鄉間小店吃剛炸好的油條，剛煮好的豆漿，不知多麼香甜！回到「菜園」後又來了一頓鮮美的「爆炒小屁股」（北京人炒青蛙腿的叫法），至今想起來還回味無窮。和勇剛一起度過的這些快樂的日子還有很多，在文革中實在難能可貴，我們也成為永遠的朋友。

我被聶元梓打成「反革命」以後，和親朋好友的通訊極不安全，就把通訊地址放在了勇剛這裏。1968年6月上旬，勇剛告訴我：「聶元梓派人到西安抓你沒抓著，你父親挨鬥了！」，我當時只覺晴天霹靂般，痛哭失聲，一下子暈了過去。為人子不能盡孝，卻還給老人帶來麻煩，真是該死！我想立即去西安，被大家勸阻了，他們說：你現在不能回去。否則，會使事情複雜化，先等等看。

誰知，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竟在我的父輩身上發生了……

2-18 父親慘遭批鬥，母親一夜白頭

父親是一個嚴於律己、寬厚隨和的人，又是一個深懷愛國救民之志、不計功名利祿的人，且常對貧苦者、弱勢者心懷悲憫伸以援手。解放後兩次輪他提級，他都讓給了別人，所以人緣極好。從小他就要我以「外儒內道，常存佛心」修煉自己，就是說，既要有「治國平天下」的志向，又要有「清心寡慾」的品格，且時常懷有「普渡眾生」的悲願。父親是這樣教育我的，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但父親怎麼會挨鬥呢？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1961年，父親調回陝西後不久，陝西省成立「渭河治理小組」，父親任規劃隊隊長，提出《渭河干流中下游河道治理規劃》，深受好評。1963年，又以中國高級專家身份赴高溫少雨的非洲索馬裏，為其作水利規劃一年。文革開始時，他正參加「四清」。陝西省水電廳領導人除他外均被打倒，怎麼老同志都成了「走資派」、「反革命」？他不理解，造反派就讓他去工廠勞動了。

1968年6月2日，造反派讓父親回廳，準備「三結合」（註：指文化大革命中群眾代表、軍隊代表、幹部代表組成領導班子）。父親看到「堅決支持西鐵聯罷工的革命行動」的大標語，就和秘書陳汝嫻說：「總理和省委都批評這是『反革命』事件，怎麼還能支持？」第二天，6月4日

早晨，在痞子趙印、王洪福帶領下一夥專搞打砸搶的「造反派」就凶神惡煞般地衝進家裏，不由分說搶走了父親保存了幾十年的書箱、資料和日用品。原來，聶元梓派人來抓我沒抓著，就說從我處抄家才證實我是個「反革命」，這些造反派當然就心領神會了。

隨即而來的是對父親進行批鬥，硬逼父親承認是「反革命」，父親說「不是」。王洪福等人蜂擁而上，朝父親頭上、臉上、身上、腰上、背上拳腳齊下，打的父親口鼻出血、臉青眼腫，牙打掉了幾個，肋骨也斷了，上衣撕成了碎片和血粘在了一起。造反派宣佈對父親「隔離審查」，並停發工資。10天內天天批鬥，天天打的昏死過去。年近60的父親不堪忍受，逃到省革委會告狀無人受理。連續幾天躲在荒僻的地方，合衣倒在牆根過夜，東躲西藏了一星期，覺得長此不是辦法。

後來，父親乘火車到四平氣象台找我三姐陳一誠，三姐小時候曾經父親撫養，後參加志願軍，三姐夫經緯在空軍任職，住在她那兒應該比較安全，誰知當晚就被當地造反派抓了。7月1日，當地造反派和陝西水電廳造反派在鬥爭父親以後，他被帶上手銬乘火車押回西安，一路罰著跪，邊打邊罵，受盡侮辱。又是一連3個月的嚴刑拷打，打的父親遍體鱗傷，死去活來，都不成個人樣了。

心裏牽掛著父親，我總是被噩夢驚醒。7月上旬我悄悄回到西安，母親十分憔悴，妹妹們嚇的不知如何是好。剛從部隊轉業的弟弟，從部隊帶回三顆子彈，也被抄家時作為「妄想變天」的證據，當作「反革命」挨了鬥。一天黃昏，突然有人敲門，我打開門嚇了一跳，門口站著的這個人，蓬頭垢面的，眼皮浮腫，眼窩深陷，臉上青一快紫一塊，穿著一件撕碎的破衣裳，用草繩繫在腰上，腳上踏一雙沒跟的鞋，血水順褲腳流下來，後面還跟著兩個惡狠狠的粗壯漢子。

我遲疑了一下，問：「您找誰啊？」只見那人眼中湧出淚花，顫抖地說：「諒啊，你認不出我了嗎？」聽著是父親的聲音，我定睛一看，果然是父親！怎生被折磨成了這等模樣，不由淚如泉湧。急忙扶父親進屋來，那兩個人也跟了進來，父親不敢坐，只說要換洗的衣服、錢和糧票。母親忍淚給父親拿了東西，父親一句話也不敢說，臨走時只是辛酸地說了一聲「保重！」父親一走，母親就暈倒了。

我一夜都難以入眠，恍惚中天亮了。起身看了一眼還躺在床上的母親，不由大吃一驚：昨天還是一頭黑髮的母親，一夜之間，頭髮竟全變白了！我小心走過去說：「媽媽，您怎麼了？」母親失聲痛哭地說：「這些禽獸不如的東西，這麼折磨你爸，老天會報應的！」。當夜母親的枕頭都

讓淚水浸透了。我輕輕扶母親起身，她對著鏡子也愣住了，半晌沒有說話。過去讀「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頭」還半信半疑，這次眼見母親一頭黑髮，一夜之間全部變白、一根黑髮不剩，可見母親內心的煎熬是何等沉重。弟弟、妹妹都一言不發，不知應當怎樣安慰母親。

我回北大前，還去三原看望了外祖母，老人家已75歲，一個人在老家孤苦地過日子。文革一開始，舅舅、母親和姨母擔心老人家受驚嚇，把她送回了三原。她問我：「世道咋這麼亂啊？」我只能含糊以對。三原已從過去的蕭條變為破敗了，倒是出現了一個奇景，街上的人最少有1/3前胸或後背都縫上一塊白布，分別寫著「地主xxx」、「富農xxx」、「反革命xxx」、「壞分子xxx」、「右派xxx」、「叛徒xxx」、「假共產黨，真國民黨xxx」、「野心家xxx」、「走資派xxx」、「小爬蟲xxx」的字樣，讓人感覺真像進了煉獄一般。

後來，軍代表進駐了，按說水電廳的造反派不能再為所欲為了。可他們又把父親送到廳屬涇陽永樂店的拉絲廠，讓那裏的造反派游鬥、拷打了兩個月，父親經常被打的昏死過去，甚至一腳踢出門外摔死過去，整的父親骨斷筋傷，大小便失禁。父親先後被批鬥100多場，十幾次昏死過去，還得「監督勞動」，被折磨的不像樣子。其野蠻、殘酷超出正常人的想像。

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2月，省革委會讓父親參加茂陵省級機關學習班，新的精神折磨又開始了。左派們攻擊父親「推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反對文化革命」，還逼父親承認「堅持反動立場」、「妄想變天」，父親嚴詞反駁，就說父親是「態度惡劣」的「頑固分子」。把父親下放到寶雞峽工地勞動，直到1972年10月重病才離開。

弟弟在部隊是五好戰士，因父親挨鬥，他轉業後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幾個妹妹也均受到牽連，母親則被迫退職。父親挨鬥後，給我舅舅王安打了個電話。沒想到小小一通電話，竟致舅舅慘遭毒打，又演出了一場人間悲劇。

2-19 舅舅王安被打死，外祖母神經失常而亡

舅父王安（1928-1968），較筆者年長12歲，在西北大學讀書時就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1948年在奔赴延安途中，遵指示返西安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參軍隨王震入疆，任新華社隨軍前線記者，參加過十七、八次較大的戰鬥，是西北前線歷盡艱苦、征途最遠的記者，舅父與杜鵬

程^{【149】}二人一起出生入死，步行隨軍作戰萬里之遙，直達帕米爾高原下的古城喀什。1950年，遂介紹舅父入了黨。

1950年冬，他們相繼到新華社新疆分社工作，杜鵬程極看重舅舅，認為他有著知識分子最難得的革命堅定性，始終不畏艱險、不怕苦不怕死。到分社後，在條件極差的條件下，舅父哪一年都是置嚴寒酷暑於不顧，奔走萬里，勇往直前，他上過帕米爾高原的烏恰，天山深處的昭蘇，阿爾泰草原的福海，崑崙山腳下的和闐，火焰山下的吐魯番，各族人民生活的艱難與改善是他報道的主題。

在荒唐的「大放衛星」的年頭裏，舅舅對「農業衛星」、「鋼鐵衛星」持懷疑態度，他的稿件也「浮誇」最少，他的求實精神深獲同事們的讚佩。為侍奉年近古稀的老母親，1962年舅舅調到新華社陝西分社，並任領導小組成員。1957年，舅父娶妻李斌，她一直在新華書店工作。他們育有三個女兒，長女王亞葵、次女王亞薇、三女王亞芸。

熟悉舅舅的人都知道，他秉性耿直、為人正派。1968年，舅舅已進入陝西分社「三結合」領導小組，造反派李遇、和坪為掃清他們奪取領導權的障礙，從父親給舅舅打過電話以後，先逼問舅舅：「把陳之顯弄哪去了？」，接著就批鬥、隔離、抄家，又以「反黨」、「叛國」、「特務」等捏造的罪名，對舅舅實行法西斯式的迫害。他們私設公堂，嚴刑逼供，舅舅的一切真話都被誣指為「不老實」。

60天的時間裏，批鬥刑訊日漸升級，從打耳光、揪頭髮、坐飛機、跪凳檔，到踩胸膛、踹脊背、蹬小腹、踢腦袋，無所不用其極。一個年方40歲的壯年人，竟被折磨的不像個人樣了，他遍體鱗傷，目光遲滯，便尿失禁，每夜都傳來讓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舅舅6月20日挨打，到8月23日含冤離開人世，短短60多天被活活打死。李遇、和坪的邪惡、殘酷、無恥程度，為新華社30多個地方分社所未有。舅舅也是5,000多人的新華社系統文革中唯一被打死的記者。

舅舅的冤案直到10年之後才得昭雪，新華社國內部在1978年4月28日發出的《通報》說：

陝西分社王安同志之死，是一件駭人聽聞的大冤案。王安同志明明是一個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邊疆、忠誠黨的新聞事業的優秀黨員、優秀記者，卻被誣陷為反黨叛國集團的成員。他明明是冒著生命危險，從蔣管區來延安，投奔革命，卻被說成是打入邊區的特務行動。王安同志堅持原則，說明事實真相，遭到種種毒打，身受重傷，含冤死去。

【149】杜鵬程（1921-1991），陝西韓城人。中國著名作家。

舅舅的大學同學，後來又是新華社同事的楊克現與夫人丁文，自舅舅蒙冤即不顧壓力仗義執言，以後的10年裏不計個人得失到處為舅舅申訴直到冤案昭雪。他的朋友、新華社記者劉野寫的《哭王安》表達了大家的心聲：

十年天地轉，唯君設祭壇。冤案奇千古，昭雪在今天。
遙獻花一束，寄上心一片。悼我好戰友，思緒萬萬千。
一聲哭王安，長淚掛襟前。何罪遭毒手，怒眼問蒼天。
憶昔君在時，革命意志堅。刻苦讀馬列，肝膽照河山。
奮筆走龍蛇，滄桑二十年。俯首孺子牛，何惜血和汗。
忽然風雷驟，君起鬥敵頑。林彪四人幫，篡權害忠賢。
可憐我戰友，白日遭暗箭。再聲哭王安，含冤臥九泉。
長睡不瞑目，悲忿向人間。四害橫行時，魔鬼舞翩千。
是非全含混，人妖齊倒顛。冤案何其多，那止君一端。
君仇即眾仇，君冤即眾冤。民心並黨心，悲忿化巨瀾。
怎消萬古恨，常記在心田。三哭好戰友，今不在人間。
人間已伏虎，鼓樂報九天。歎君何逝早，恨敵何誅晚。
昭雪雖有日，烈士永不還。君為革命死，君為真理戰。
人民好記者，我黨好黨員。功績垂青史，英名在人間。
遺願有人繼，三女已接班。撒淚歌一曲，聲聲伴君眠。
待到花開時，再現紅杜鵑。

舅舅去世時，舅母只有30歲，帶著11歲的大女兒王亞葵、8歲的二女兒王亞薇和5歲的小女兒王亞芸艱苦度日，以淚洗面，仍受盡了造反派的種種凌辱和欺侮。舅母在政治氣氛十分惡劣的環境下，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實在難以支撐，就把小女兒王亞芸送到新疆的姨媽家寄養。小亞芸因為吃不飽飯，就搶外公拌好的豬食吃。

最悲慘的莫過於外祖母了，一個人住在三原老家，誰也不敢把舅舅的噩耗告訴老人家，提起舅舅就先哄她說：「出國了」，後來又說「下放了」。老人家開始喃喃自語地唸叨著，後來可能從鄉親鄰里處聽到了些風聲就神志不清了。母親含淚把外祖母接到西安，外祖母整天想念兒子，一不留神，她就一個人跑出去找兒子了，經常大小便失禁倒在街上，好不容易讓人找回來，沒幾天又走失了。一生賢良的外祖母，就這樣淒慘地在神經失常中，離開了這苦難的人世。

那時，我家的生活也處在十分困難的境地，父親整天挨鬥，工資扣發，母親被迫退職後也沒有了收入，幾個孩子也都沒有收入。為了給舅父

留下的三個孩子一些幫助，母親無奈地將外祖母留下的故居，托人以 900 元的低價賣了出去，留了 300 元給外祖母維持生計，另外的 600 元分給 3 個可憐的孩子每人 200 元，以維持她們的日常溫飽。

2-20 軍宣隊進北大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1968 年 8 月，以 4587(63 軍) 部隊政治部副主任劉信為總指揮的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大，雖然制止了兩派武鬥，新一輪的恐怖又開始了。他們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大搞「逼、供、信」，整出了 200 多個「反革命集團」、1,000 多個「反革命分子」，主持此事的 4587 部隊楊順德處長竟在北大師生大會上不無得意地宣稱：「北大不愧是『廟小神靈大，池深王八多』！摸一摸九百六，撈一撈一千五，還有大的在後頭！」這個駭人聽聞的講話，搞得人人自危。

短短的兩個月，北大有 20 多個人被逼自殺，包括中國物理學奠基人饒毓泰、史學泰斗翦伯贊^[150]、教務長崔雄昆^[151]等人。8341(中央警衛團) 部隊副政委王連龍帶人進入北大。10 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次會議決定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令人深思的是：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委已有 71% 被定為「叛徒」、「特務」、「反黨」而打倒，與蘇共十七大的中委 70% 被處治十分相似。

9 月時，軍宣隊主持分配北大應於 1966、1967 年畢業的學生，我則被劃入各種不能分配的學生中，其中有「右派學生」、「反動學生」、「走資派子女」等，讓這些人到部隊的沙城農場「勞動改造」。當時去的人有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等。我心想，我的「問題」若在北大都不能解決，到外地豈不被整的更慘？就說：「你們如果說，你是共產黨員，組織分配你勞動一輩子，我馬上就走；若說你有問題，要去勞動改造，我一天都不去」。

這時，8341 部隊黨委委員、營教導員孫連仲到中文系主持工作，他主動約我談話，人很誠懇，也對我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打成「反革命」深表同情，就讓我在全系「鬥私批修」大會發個言。那時，雖然呂乃巖已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但新北大公社那批極左勢力仍很頑固。會前，孫連仲特意看了我的講稿，還幫我修改了幾處，表示「這樣應該可以了」。

[150] 翦伯贊 (1898-1968)，維吾爾族，湖南桃源人。1937 年參加中共，中國著名歷史學家。

[151] 崔雄昆 (1919-1968)，文革前任北京大學教務長。

會上，我從為什麼寫《意見書》談了自己的想法。誰知立即受到左派們的批判和圍攻，說我「頑固堅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立場」、是「劉少奇『黑六論』的忠實信徒」（黑六論指「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評論」、「公私融化論」）、是「封建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堅持要將我「開除出黨」。後來，在邵岳主持的黨員大會上，除我一人表示反對外，其他與會的人都同意將我「開除出黨」。

但這個結果似乎並未得到軍宣隊認可，孫連仲讓我「耐心再等一等」。這次會後，系裏不少人表達了對我的真實看法。「五四」運動時曾「火燒趙家樓」的中文系主任楊晦^[152]約我去他家，說了許多稱讚和鼓勵我的話。魏建功^[153]、王力、王瑤^[154]、袁行霈^[155]等教授和華秀珠，也表示了對我的同情和支持。林庚伯伯更是含著淚約我到家裏吃飯，連連說「好孩子，你受苦了！」。

系內系外不少同學也紛紛找我聊天討論各種問題，政治空氣畢竟沒前兩年那麼緊張了，但中共「九大」的召開還是給大家心理上投下了不少陰影。1967年組織了《共產青年學會》，批判林彪、江青的技術物理系學生何維凌，關了14個月監獄剛放回學校，我們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還有侯漢清、趙凱元、郭朝田、樊能廷、王公娥、方同德等，也經常來往。

軍宣隊先後兩次分配我去北大漢中分校和4587部隊工作，均被我婉言謝絕。我以1968年底毛主席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為由，幾次找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與副政委王連龍談話，堅持到最艱苦的農村改造自己。1969年底，軍宣隊終於批准了我的請求。我走後不久，遲群^[156]在全校大會上，仍無端地攻擊我說「陳一諮不是個什麼好東西，是個右派！」

我分析當時的形勢，很明顯，老師們跟周恩來是不會接受林彪的，而林彪也鬥不過那些老師。但是，無論是周恩來這批官僚得勢，還是殺氣騰騰的林彪得勢，我如果待在城裏，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我決定去河南農村。為什麼要選擇河南呢？我認為，河南的落後是整個中國落後的縮影。河南是個農業大省，瞭解了農民，才會知道中國今後的走向。農民的喜怒

[152] 楊晦(1899-1983)，遼寧遼陽人。「五四」時曾火燒趙家樓，中國著名文藝理論家。

[153] 魏建功(1901-1981)，江蘇南通人。中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

[154] 王瑤(1914-1989)，山西平遙人。中國著名文學史專家。

[155] 袁行霈(1936-)，江蘇武進人。中國著名文學史專家。

[156] 遲群(1932-1983)，山東乳山人。文革中作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進駐清華、北大，後與「四人幫」一起被判刑。

哀樂，將是我們今後做事情的一個基礎。不深入中國農民的生活，不瞭解他們的想法，就無法瞭解中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狀況。

1969年深秋的一天，突然有一個人敲我的門，他介紹說：「我是北航的，叫羅小朋。我高中一個同學叫姚奉保，在你們中文系。他告訴我，我們中文系有個奇人，把他鬥得打得死去活來，還在唱李玉和的『渾身是膽雄赳赳』、『雄心壯志沖雲天』，一點兒都不害怕。學校分配，他也不走，非要自己去農村。」羅小朋問我：「你為什麼要去農村呢？」我從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說起，認為激進派不可能長久，而林彪、江青這些人容不得總理，總理和老師們又根基深厚、實力強大。我留在城市的話，很可能會成為兩種力量鬥爭中的祭品。而中國80%的人口在農村，認識農村、瞭解農民，才能真正認識中國。農村迴旋餘地大，這裏不行，可以去那裏，潛沉下去，調查研究，必會有所做為。

他很興奮地聽著，並且很認同我的看法。他問我：想到哪裏去？我說，河南很落後，是中國的縮影。新蔡縣農村幹部辦了個學校，為農村培養人才，搞得很不錯，還受到了周總理的表揚。我十月剛去那裏看了看，自然條件差一些，但「窮則思變」，很有些意思，我計劃到那裏去磨練自己。我們談了四、五個小時，他臨走時熱情地說，如有可能，畢業後會和一個朋友去找我，並祝我順利。

在同學們給我送行時，我順口吟了一首詩《出嫁》：「捨不得離開媽，又想早點見到他！」北大的10年本應是我人生的黃金時期，那麼多著名學者給我傳授了他們的知識、經驗，特別是他們的品格、情操；但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文革浩劫，把我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熱情打的粉碎，噩夢般的極左狂潮幾次將我推到了死亡線上。殘酷的現實磨練了我的意志，我將到基層繼續探索今後的路該怎麼走。

第三章 農村基層鍛煉（1969-1978）

——重新認識中國的實際

狂飆式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對極左的危害有了切膚之痛。但對中國制度性的不合理，我卻是在基層才深深體悟的。這種局面能改變嗎？

3-1 中國 80% 以上的百姓生活在農村

1969 年底離開北京前，我和幾個好朋友聚會，何維凌笑著說：「你活生生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我說：「我不準備搞共產主義新村。兄弟此行，前途未卜，但我會盡力而為，闖出一片天地。中國 80% 以上的百姓生活在農村。要真正認識中國，必須瞭解農村，熟悉農民。否則，我們就很難說認識了中國。」孟繁華說：「壯志可嘉！但我是從農村來的，你對農村的艱苦，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走時，我有幸得到了一筆寶貴的財富。當時，燕京造紙廠天天都收到幾百麻袋各種書籍，全是各處抄家送來的，在廠裏堆積如山，古今中外什麼書都有，每天回爐一部分做紙漿，通過熟人用三毛四分錢人民幣就可以買 1 公斤。我聽說後，用母親剛寄來的 200 元錢，一下子買了 400 多公斤。我挑了 1/3，許多都是內部出版的書籍，剩下的讓何維凌、王彥等朋友們分了。

我又從三哥陳一詢工作的中國科學院物理所，買了兩個從計算機上拆下來的高性能 ZK 三極管，請同學初志農幫我做了一個八管收音機，收音效果極佳。在祖父剩下的藏書中，我從上海聚珍版的《四庫備要》中選了史部、子部、集部各一部分。就這樣，我帶著三大羊皮箱的書和少量衣物，告別了親友，奔赴河南新蔡縣插隊當農民了。

我還在北大圖書館查了《新蔡縣誌》，該縣位於河南省東南部，地處淮河流域洪汝河下游，約 60 萬人，120 萬畝地，是小麥、棉花產區，沒什麼工業，交通也不發達，屬於比較貧困的地區。孔子周遊列國，曾「厄於陳蔡」，使子路於此問津，現屬駐馬店地區轄下的一個縣。可以這麼說，新蔡縣基本上是當時落後中國的一個縮影。

我到駐馬店地區革委會報到時，政工組的李蘭田給我介紹了鄭州大學數學系的米嵩山，他也要去新蔡工作，正好結伴同行。坐在公交車上三個多小時，我們談的很投機。他住在新蔡，擬到縣城高中教數學，人很憨厚實在。我告訴他，程莊大隊辦了個農業學校，為農村培養人才，說不定可以為落後的農村幹點實事。他被我說動了，決定一塊兒去看看。

到縣城後，程莊大隊派了個拖拉機來接我們。程莊大隊屬澗頭公社，距縣城二十里，有一條沙石路可以直達。坐在拖拉機的拖斗上，米嵩山不好意思地和我說：「臨走時，李蘭田還讓我注意你，說你是個剛落實政策的『反革命』，看你有沒有什麼反黨言行，隨時向他報告。」我笑笑說：「你說呢？」他說：「我看你人不錯，挺好的嘛！就不知道農村生活你能不能適應了。」正說著話，拖拉機停了下來。一個40多歲、矮矮胖胖的農民迎了上來，他說：「小陳，歡迎你來我們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叫楊公民，是北楊莊的政治隊長。」原來，我已被分到程莊大隊北楊莊生產隊勞動鍛煉。

這個生產隊剛由南北兩個隊合併，是程莊大隊的落後生產隊。北楊莊有42戶，230多口人，500多畝地，主產小麥、玉米、紅薯、大豆和棉花。全隊無一間瓦房，每戶的住房都是土坯為牆、茅草蓋頂，門前堆一垛棉稈、一垛桔稈當柴火做飯。每家養一、兩頭豬、十幾隻雞，靠賣豬和雞蛋的錢解決日常開銷。全隊有12頭牛可以耕作，還有5頭驢給各家磨面，此外也就沒什麼其他財產了。

楊公民安排我在牛屋旁的一間小土房裏住，屋裏有一股濃濃的鮮牛糞味兒。土房裏有一個土炕，還放了一個舊條桌、一盞油燈、一個凳子，可以看書、寫字。第二天一大早，縣科委的駐隊負責人崔慶美來看我，他說：「歡迎你到程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你們知識分子和實際一結合，作用可就大了。農村很艱苦，但天地很廣闊，需要幹的事很多。你這麼文弱，申請不要工資到農村，那怎麼生活？工資照發！勞動半天，學習半天，慢慢適應。楊公民人很老實，就是能力不夠，你給他當個參謀吧。」讓人感到基層幹部辦事還挺通情達理，幾年來緊張的神經總算放鬆了一些。從此，我每月有了42元錢的工資和定量32斤的糧票。

每天一大早，楊公民就敲掛在村中唯一一棵老槐樹上當鍾用的小鐵軌，催促社員們上工。幹兩小時活，回家吃早飯一小時，午飯送到地頭。天抹黑，吃晚飯。飯後，男女老少都到場裏學習。說是「學習」，大多是楊公民向大家訓話，東家長西家短的總要扯上兩個多小時，而後安排第二天的活，這時人們大多已經東倒西歪的睡著了。

後來，聽農民說，生產隊的這種安排，叫做「吃三睡五幹十四，剩下兩個小時抓大事（「抓大事」指政治學習）。14個小時在地裏幹活，卻效率很低，農民們有個順口溜：「上工一窩蜂，幹活大忽隆。出勤不出力，人人磨洋工。」芒種栽紅薯時，因為速度太慢，北楊莊連續兩天受到大隊在廣播裏批評。楊公民也很著急，讓我幫他出出主意。

我說：「這不難辦。你把十個人分一組，五個壯五個弱。三個壯勞力起垌，兩個擔水。弱勞力一個挖窩、一個起秧、一個澆水、一個栽秧、一個合土。互相比賽，一定會快。」他耽心地說：「這不是劉少奇的『三自一包』了嘛？會受批判。」我笑笑說：「這叫分工合作，有問題我扛著。」一用這個辦法，果然速度快、質量好，一周後還受到了大隊表揚。楊公民高興地改叫我老陳了，他說：「老陳，還是你有本事。以後就多幫我們出出主意吧。」從此，我的「待遇」有了改善。楊公民和生產隊長連續幾天，帶我看了全隊各處的地塊和水系，讓我幫著安排種植計劃。接著，我用三天時間，和隊長、會計一起，搞了一個「北陽莊生產規劃」。給社員們一講，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提了不少建議，最後，形成了三條一致的意見。

首先，在村中修一條沙石的南北路，不致雨後泥濘邁步都難，同時獎勵大家在房前屋後種樹。其次，在村頭挖了七個大糞坑，每天一層草一層糞一層土填滿封頂漚肥，改變大家不積糞肥的習慣。第三，解決隊裏辦事缺錢，用生產隊的三頭草驢去配騾子。那時，一頭驢才七塊錢，一頭驢騾就值四千塊錢。解決了肥料和資金，再按土地肥力輪值各種作物，生產慢慢就會搞好。

從此，每晚社員開會時，楊公民都會說幾句後，「請老陳指示」，我就一二三四五用幾句話，把第二天活該怎麼幹說完了。會散的早，一些農民就蹲到我住的牛屋四邊聊天。我又買了三斤菸葉，用酒一噴，晾乾揉碎，讓大家吸，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就這樣和他們親近了起來。我也從生產到生活、從過去到現在，詢問他們的各種看法。也就一個多月，我和淳樸的農民們處的很是融洽。

農民們也慢慢開始和我說些心裏話，對合作化以來不斷的「瞎折騰」大都牢騷滿腹。但我長期生活在城市，怎麼能想像到農民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過日子呵。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一年到頭也沒有停止過勞作，可換來的卻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幾乎家家都是空無一物。據他們說，合作化以前，日子過的還湊合，以後則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與湖北江陵、北京延慶農民說的一樣。

我在楊公民家吃了兩個月「階級教育憶苦思甜」飯。一天，楊公民笑謎謎地告訴我說：「老陳啊，大隊工作組通知，為了讓你更多瞭解農村的情況，從明天開始，你一天到一家，輪流在各家吃派飯，按駐隊幹部待遇。還像在我們家那兒吃飯一樣，吃一天飯，交三毛錢、一斤糧票。」

3-2 楊從久憶苦：「一村一村的人都餓死了！」

楊公民的父親楊從久，60多歲了，個子挺高，滿臉滄桑。每天吃飯都是我和他們父子倆，3個人圍坐在一張一尺半高的小方桌旁，女人和孩子是不上桌的。到第三天，那飯菜我就實在吃不動了。前兩天一頓還能吃兩個粑粑，喝一碗菜湯。現在吃一個粑粑就好像飽了，一到晚上肚子又咕咕地叫。粑粑是七成紅薯粉加三成玉米麵做的，還有一股霉酸味。

聽楊公民說，秋天收紅薯後，大部分切片曬乾，一部分發霉的淘洗一下再磨粉，加些玉米麵做粑粑，青黃不接時能吃上就很不錯了。這天，楊從久飯前給我「憶苦思甜」。老人說：「小陳啊，你從城裏來，沒吃過什麼苦，我們農民可是苦死了。現在能吃上這粑粑就不錯了！過去草根樹皮都沒得吃，一村一村的人都餓死了！10個人就餓死三、四個啊。」我疑惑地問：「怎麼會死那麼多人呢？」老人家說：「那還不是大躍進嘛！」楊公民是政治隊長，知道這麼說會惹麻煩，連忙說：「爹，吃飯吧！」打住了老人的話頭。過了一天，我趁大家出工未歸，找到楊從久，說：「大爺，給我講講餓死人的事吧？」老人搖了搖頭說：「公民不讓我說。唉，不說也罷，省得傷心。」我說：「怎麼會餓死那麼多人呢？我不信。」老人說：「慘得很啊，都是大躍進那時惹的禍！」

老人坐下來，抽起了旱煙袋。看我急切想知道的樣子，他邊抽煙邊對我講述：1958年，本來風調雨順是個豐收年。不知咋啦，夏收以後，到處都要放「衛星」，吹牛皮，說瞎話，放不出「衛星」，就當「右傾」批鬥。夏糧大多都交公了，接著又辦起了「人民公社」，在公共食堂吃飯，浪費很大。秋糧還沒下來，不少地方就斷頓了。秋糧長的不錯，大家偷偷煮還沒熟的玉米棒子吃。再一搞「全民煉鋼」，這下更糟了。一個公社編一個營，一個大隊編一個連，男女老少都按軍隊一樣編起來。男勞力煉鋼，婦女搞運輸。每家的鐵鍋、刀鏟、門栓，只要沾個鐵就拿去煉鋼，煉出好多啥用處都沒有的鐵疙瘩。家裏的床板、門扇和村裏的樹，也都弄去煉鋼了。村裏沒了勞動力，不少玉米、紅薯、大豆都爛在了地裏。冬天，到處開始死人。說起來話長。回家吃飯，明天再聊。

連著兩天下午，老人繼續給我講：放「衛星」把產量放上去了，糧食徵購任務一下來，大家都傻眼了。沒打那麼多糧食，上哪兒去完成那麼高的徵購任務呢？完不成就說你「右傾」、「瞞產」，就得挨批鬥，差不多前後搞了三年，批鬥死的人不知有多少。1959年夏季小麥豐收，大部分上交了，秋季遇旱，收的玉米、大豆也都上交了。還是完不成任務，可也沒什麼糧食可吃了。入秋後，食堂大多煮糠菜度日，豆糠、紅薯葉、棉花葉煮一鍋，一家打一盆分著吃。到冬天，糠菜吃完了，吃樹皮、草根。各家不許冒煙做飯，有人餓急了偷著挖野菜用瓦盆煮煮吃。一旦發現，砸爛瓦盆，人被批鬥，有的當場就鬥死了。從入冬到開春，大家糠菜都吃不飽，又沒有樹葉和野草，餓的人頭暈眼花，不少人浮腫到肚臍就死了。一戶一戶的死絕，一村一村的死光。

說著說著，老人眼裏已噙滿了淚花，說：有人為了從食堂多領一碗菜湯，家裏死了人不說，還把死人腿上的肉割下來吃，回想起來慘的很哪！開始死人還能埋一下，後來死人越來越多，連個埋的人都沒有了。方圓幾十里的看不到一個60歲以上的老人，幾年裏也聽不到嬰兒的哭聲。活著的人，面黃肌瘦，有氣無力。人們為爭一碗菜湯，弄得六親不認。上邊這時還不斷「反右傾」，什麼都要「大辦」，把大家折騰得沒活路。牛皮吹的越大、瞎話說的越多的地方，大家受的罪也越厲害。可是，為怕挨批鬥，隊裏幹部又不得不弄虛作假，打腫臉充胖子。

其實，照當時的徵購任務，哪個隊也完不成。結果，今天批這個，明天鬥那個，人人批鬥別人，人人又被批鬥，扛不住的就給批鬥死了。1960年夏收後，大家喘了口氣，吃了幾頓飽飯。人們餓怕了，到處收集各種糠、菜、草，以備過冬。因為夏秋糧上交後，每個人只剩下不到3個月的口糧，公共食堂仍以糠菜為主，幾個解散公共食堂的地方挨批鬥後又恢復了。1961年春荒，仍不斷有人餓死。我感慨地想，我們搞的「共產主義」，真的像赫魯曉夫說的，讓農民連「大鍋清水湯」都喝不上嗎！

老人歎著氣說，明明是上邊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逼得下邊說假話。餓死人又怪基層，1961年下半年，據李先念說，我們這兒「政權被階級敵人掌握，專了貧下中農的政」，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就把農村幹部集中起來進行批鬥，還說要「殺一批，鎮一批，關一批」，把大家都嚇壞了。我那時也是隊幹部，被押到縣裏，鬥爭了幾十場，虧的我們莊死人少，才沒被打死。「集訓」了三個月，也沒查出什麼「階級敵人」，「民主補課」也就草草收場了。

1962年初，上邊提出「休養生息」，每個農民借三分自留地，公共食堂也停辦了，生活才開始好轉。誰知剛吃了兩年飽飯，又批「三自一包」，自留地又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真不知道上邊是怎麼拿主意的，還讓不讓我們過安生日子。聽了老人的講述，萬萬沒有想到，極左路線竟給農村和農民帶來了這麼深重的苦難。夏收以後，我又到附近幾個村莊和一些老農座談，他們說的大體也和楊從久老人講述的差不多。

新蔡南邊的息縣，有個鐵道部的「五七幹校」，我去看望北大同學何青的父母何鳳池和韓素貞。何伯伯是1926年參加中共的，還與劉伯承一起到蘇聯留過學，韓阿姨也是老革命，建國後看不慣腐敗和極左，運動中總受批判。我向他們講了插隊地方餓死人的情況，何伯伯激動地拍著桌子說：「息縣餓死的人比你那兒還多啊，光死絕的就有5,000多戶！姜寨村400口人死得只剩了90多。全縣餓死最少也有1/3！」我嚇了一大跳，半天楞是沒回過神來。

晚上吃飯時，來了個馬千里伯伯，解放前是渤海軍區司令，可能喝多了點兒，紅著臉拍著我肩膀說：「小陳，再往南邊跑跑，光山、羅山更慘，人餓死了一半多呀！老毛是沐猴而冠，瘋了！」他們給了我10元錢當路費，我又去了光山、羅山。果如馬伯伯所說，當時真可謂「千家餓殍無人問，萬戶蕭疏鬼唱歌」，老百姓說起那幾年的慘狀，還禁不住淚流滿面。那裏幾乎家家都餓死了人，兩個縣的死人比例竟高達60%以上。

光山、羅山的老百姓家裏，也是什麼都沒有，窮的讓人看了心酸。僅光山一縣，就死絕了5,600多戶！不僅是家家有餓殍，而且處處吃人肉，真是慘絕人寰。接著，我又先後去了新蔡北邊的上蔡、西邊的平輿和東邊的安徽臨泉，結果發現這幾個縣，那幾年餓死人的比例都在30%以上。每到一地調查回來，我往往會幾天食不知味、睡難安寢，夢中常常會為那些餓殍呼冤。「極左」給老百姓帶來的災難實在是太深重了！

殘酷的現實告訴我：毛澤東和他所代表的路線是這些苦難的根源。如果說為了多數人，少數人的犧牲值得；那麼，以大多數人的苦難為代價，這樣的革命又為了什麼呢？顯然，1956年以後，毛澤東搞的一系列革命完全是脫離實際的空想，越來越「左」的行為遭到抵制，就又製造出新的「階級鬥爭」來整肅反對者，其實「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這麼引發出來的。我從書本上對毛澤東產生的崇拜，被社會現實徹底轟塌了。

3-3 米嵩山和他父親米邦啟的故事

插隊不到兩個月，我的手上磨出了十個厚厚的繭子，因為營養不良，我又患了夜盲症。米嵩山在離我不遠的徐莊插隊，一天來看我。他向我擠擠眼，跟楊公民說：「我帶老陳到縣裏去看看眼睛。」楊公民說：「好啊！」。我們一人一輛自行車，往縣裏去。老米說：「我想帶你到我家裏住幾天，改善一下生活。不過我們家在縣城西邊 70 里的余店公社馬港大隊，你騎車行不？」我說：「沒問題。」

一路上，他給我講了他的故事：「我家住在米韓莊，靠正陽縣東北。1958 年我考入陳店初中，勞力都去煉鋼了，農活靠老弱幹，學校就讓我們幫著幹。每天走 30 裏路到學校，幹一天活再回家，很少上課。初二剛開學就放了長假，糠菜都吃不飽，就到野地裏拾大雁屎吃。不少人餓死了，老人差不多死光了。虧得我父親當隊長，比較會料理，提前儲藏了很多紅薯葉，我們隊倒沒死人。」

「1961 年秋，我僥倖考入縣城高中。每到星期六下午走 70 里路回家，星期一早再揹五、六十斤紅薯到學校。1964 年考到鄭州大學數學系，上了一年多課，文化革命又開始了。我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造反，參加了『二七公社』，當了鄭州大學的廣播台長，直到 1968 年底畢業，分到湖北沉湖農場勞動鍛煉。」一邊說話一邊騎車，兩個多小時就到他家了。

老米的父親米邦啟個子不高，人很強壯，既樸實又精明。家裏用土坯圍牆，座北朝南 5 間土房，養著兩大兩小 4 頭豬和十幾隻雞，牆上掛著幾串玉米、辣椒和蒜頭。老米出去了，讓我休息，我躺在床上就睡著了。晚餐 4 個菜，一碗雞塊，一碗紅薯粉條燒肉，一碗西紅柿炒雞蛋，一碗炒油菜，熱騰騰的玉米白面饅頭，還有一瓶紅薯酒。下鄉以來，還真沒吃過這麼好的飯。

飯後，坐在院子裏聊天。我又問起米老伯 1958 年的事。老人說：那時上邊瘋了，什麼都要「共產」，什麼都要「衛星」，跟不上就批「右傾」，我也差點給批鬥死。幸好我們隊偏遠，徵購完不成也沒再追，反正大家都完不成。後來「民主補課」，把我們隊幹部用繩子拴起來，一串一串武裝押到縣裏關著批鬥。虧了我們隊沒死人，揭批了兩個多月後就放了。聽說全地區關了二十多萬人。唉，真是瞎折騰！我們農民過的不是人的日子呵。

第二天，老米在河溝裏撈了幾條魚，一人一大碗魚湯，我吃的很香。我問老人：「你這個隊長可還好幹嗎？」老人歎口氣說：沒辦法啊，我多

少次不想幹了，鄉親父老非讓我頂槓。你不知道，既要應付上邊一會兒一變的政策，又不能讓這 100 多口鄉親受罪，實在是難得很。你沒聽說吧，我們這些生產隊長，老百姓有個說法，叫做：「春天是紅人」，上邊下邊都求著你幹；「夏天是忙人」，收割、播種、徵購、分配，樣樣不省心；「秋天是罪人」，秋收完，不是上級批評任務交不夠，就是鄉親埋怨錢糧分的少，還搞運動整你；「冬天是閒人」，你給整的灰頭土臉，入了冬就沒人搭理了，說不定還派你個重活，「修河工」，讓你去遭罪。年年這麼轉一圈，興許就是命，老人無可奈何地歎惜著。仰望星空，我不由的想：難道社會主義該這麼個搞法嗎？

第三天晚飯後，我問老人：「解放後，什麼時候日子好過？」老人說：土改後過了三五年好日子，家家都能吃飽飯。初級社還可以，高級社一併大堆就不行了。我問「為什麼？」他說：土地、耕畜一歸公，幹多幹少都差不多，就出勤不出力了唄！我說：「多幹的工分高，分配也多呀？」

老人笑笑說：這個，你們城裏人就不懂了。幹農活要根據天時地利，好好幹的輕活可以幹成重活，不好好幹的重活也可以幹成輕活。農忙時為搶農時，幹活加工分，平時偷巧的人，一天能掙老實人兩天的工分。年終一決算，兩人就差不多了。誰還會好好幹？再說大躍進以後，實行「吃糧不要錢」，有個人頭就有一份糧。後來改成「人七勞三」，現在又實行「人五勞五」，就是人頭糧佔五成，有一口人就不要錢分五成糧食，而後，再按工分多少分的糧食佔五成。這幾年大家拚命多生孩子，為的就是可以不幹活多分人頭糧。

像縣裏規定，5 斤紅薯算 1 斤糧，隊裏分時只算 5 分錢，可到農貿市場能賣兩毛五。如果年終按一人 300 斤分糧，3 個孩子人頭糧分 450 斤，若 300 斤是紅薯折糧，就有 1,500 斤，賣 1,000 斤得 50 元，淨賺 40 元。而勞力多的家不夠吃，得去買，一出進，多子女戶佔了便宜，誰還不多生。

我想，這農村分配政策學問還真大。走前，我再三感謝老人，使我學到了在書本上學不到的許多知識。最後，我問老人：「怎麼才能搞好？」老人滿臉茫然，說：「不知道。只能上邊讓咋搞就咋搞唄。現在的辦法，雖說活不好，也死不了。」

回去的路上，我不斷思索：難道上邊真不知道農村搞成這個樣子了嗎？難道現在不合理的政策就不能改變了嗎？難道我們搞的社會主義就這麼讓老百姓受苦嗎？怎麼才能改變農村這種落後的面貌呢？再多看看聽聽

吧。老米問我：想什麼哪？我回過神來問他，畢業後咋沒回來？他給我介紹說：

他和同學們一塊都被送到解放軍 6090 部隊湖北沉湖農場鍛煉。沉湖是淤泥衝擊形成的季節湖，方圓百餘里，春夏有水，冬季乾涸。部隊響應「五七指示」，在那兒圍湖造田。我們到後，按連排班編製，每天「早請示，晚彙報」，平時就幹活，主要任務是每人開墾六畝水田。先用人工拉犁翻泥，6 個人拉一人扶犁，湖泥很深，掉進去就出不來。泥裏滿是蚌殼、菱角和螞蟥，弄得人人腿上、腳上都是傷，最可怕的是得了「無名高燒」就沒命了。

稻子長勢很不錯，可惜一場大水又全淹沒了。後來聽說，水稻連種三年都被淹了。沉湖本是調節漢江水系的，違背規律強行開墾怎麼能成功？只是白白搭上了不少大學生的性命。我告訴他，我聽說：很多在廣東「圍海造田」的學生手挽手擋海嘯也都送了命。

我回到北楊莊，意外收到了黃以平寄來的信。裏面裝的幾份《紅衛兵通訊》分別是延邊白若立、突泉任功偉與臨河張木生的文章，其中以張木生寫的《農民問題學習》一文最敢講話，他基本上把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出現的問題，歸結為對體制不合理的懷疑，但也受到「老貧農怒斥張木生」一類文章的批判，看來這個人以後有機會值得一會。

說起黃以平，她人長的漂亮可愛，又非常聰穎，是北京中學生裏帶頭支持遇羅克、反對「血統論」的活躍人物，算得上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她住在中關村，常在家裏開各種辯論會。其父黃秉維^[157]是著名的地理學家，我下鄉前去過他家幾次，老人家總是笑瞇瞇地歡迎客人，我一個遠門姨夫貝時璋^[158]（係我大姐夫張鎬林的姨夫），恰巧住在他家樓上。

以平信中說，要和朋友來看看我。還沒等我回信，她已經和一個朋友劉小楓就到了。劉小楓是個詩人，文革剛開始，在中央當副部長的父親就自殺了。他們聽我講了這兒餓死人的情況，簡直是目瞪口呆。他們穿著游泳衣褲在小河裏游泳，大人小孩圍起來，指指點點看新鮮。他們住了一個星期，走訪了一些農戶。可能艱苦的生活使他們很不習慣，就走了。

3-4 「吃派飯」和「家計調查」

我那時上午勞動，下午讀書，倒也樂得個自在。當時讀的書中，最引人深思的灰皮書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

【157】黃秉維（1913-2000），廣東淡水人。中國著名地理學家。

【158】貝時璋（1903-2009），浙江鎮海人。中國著名生物學家、教育家。

革命》和一本厚厚的《修正主義》，黃皮書則是懷特·海的《含糊的遺產》和薩繆爾遜的《經濟學》。一般人過去是看不到這些「灰皮書」、「黃皮書」的，因為這些書或為「內部發行」，或為「領導參閱」。多虧燕京造紙廠的師傅手下留情，讓我在即將回爐的各種書中，挑了80多本這種「禁書」，使我得以大開眼界。

楊公民讓我「吃派飯」以前，我請小隊會計填了一張表，把每戶依居住順序排列填入，戶主及成員名字、性別、年齡、成份、文化程度、曾任職務、有何特長、親戚關係。三天後，會計送了表來，只有38戶。一問，會計才說：4戶「四類分子」幾其子女沒有填，駐隊幹部不往這幾戶派飯。我說：「還是填上，可以不派飯，但方便我瞭解情況。」會計照樣給我填上了。

「吃派飯」是當時國家工作人員常駐農村的通行作法，如果你真心想給農民辦些事，「吃派飯」好處很多：第一，可以從不同農戶那兒聽到他們對各種問題的看法；第二，能夠避免只聽幹部的一面之辭；第三，便於瞭解各戶之間的恩怨情仇；第四，利於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第五，農民樂於接受。因為那時農民幹一天收入還不到兩毛錢，「吃派飯」的幹部一天要交三毛錢、1斤糧票，而1斤糧票還可以換3兩細糧。

一家吃一天，38戶吃了38天。一般早餐是玉米粥、蒸紅薯，午餐是紅薯粉玉米粑粑、兩個素菜，晚餐喝稀麵條或稠粥、兩個素菜。偶爾會有個煎雞蛋，各家差不多，但總比在楊公民家連吃兩個月好多了。每戶幾乎都是家徒四壁，像樣的傢俱都煉鋼時燒了，一些罈罈罐罐也在大躍進時砸了。勞力多的戶不滿意「人五勞五」的分配辦法，孩子多的戶可以接受，正和米邦啟老人說的一致。

大家都希望自留地、宅基地多一些，不必天天點名出工，能自由一些。對隊裏幹部的看法也意見不一，一推敲其實很有文章：原來北隊是楊姓為主，3個門頭（註：「門頭」指宗族），以楊公民家門頭最大；南隊以彭姓為主，人口不到全隊1/3。無論幹活、分配，還是自留地，大門頭自然佔便宜。連當年餓死人，都是先餓死四類分子家庭和小門頭及外來戶的。一個三、五十戶的生產隊，若不由大門頭掌控就會事事不順。

北楊莊生產隊就是由原楊莊北隊楊姓大門頭楊公民當政治隊長，原楊莊南隊彭姓門頭當生產隊長，原楊莊北隊楊姓二門頭當會計，他們雖本事不大，卻大體能讓80%以上的人接受。正像恩格斯所說：「生產越是不發達，生產組織就越和血緣關係相聯繫」，看來弄清一個隊的彼此血緣關係還真重要。一般說來，無論發生什麼問題，同門頭的總會幫同門頭的。

以後，我每到一隊，都先讓會計給我填一份「社員情況表」，既能很快摸清基本狀況，又便於在各姓間迅速找到平衡。凡用王光美那套「扎根串聯」辦法去整黨、整隊的，往往能找到幾個老實巴腳的貧農撐撐門面，工作組一走就垮了。因為那種神秘主義的作法是主觀設計的，而解決問題則需根據人脈關係因勢利導，只要門頭利益大體平衡就可以基本穩定。

麥收後，家家吃上了麵條、饅頭，還不時殺個小雞。端午節後，程莊大隊駐隊幹部崔慶美和大隊支書毛好珠，陪著縣革委會主任王墨林、澗頭公社革委會主任李德潤，一起到北楊莊來看我。王墨林長的高高大大的，人很胖，不斷擦汗，一見我就說：「哈，早聽說我們這窮鄉僻壤，來了個北大學生，幹得很不錯，今天聽你聊聊。」我說了學鋤地、栽紅薯、收小麥、蓋豬圈、積糞肥，長了很多知識，也鍛煉了身體。

這時，李德潤插話說：小陳帶頭把隊裏青年男女組織起來積糞肥，弄得身上到處是屎尿也不在乎，把社員們感動的不得了。楊公民興奮地說：老陳還讓隊裏草驢去配種，兩頭都懷上了。王墨林連連稱讚說：「了不起，了不起！發現什麼問題沒有？」我說：「人五勞五」不利調動勞力的積極性，能不能改成「人三勞七」。王墨林說：「這得請示上級。不過你很能想問題。老崔啊，這麼好的人才，你不用，我可要調走了。」崔慶美馬上說：「我們正準備調他到勞動學校工作。」

從在北楊莊第二圈的派飯開始，我一家一家做「家計調查」。頭五家的調查並不成功。可能是長期受「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宣傳的影響，每家說起收支情況都吞吞吐吐，不願說實話，怕說多了「共產」，寧可哭窮。所以，他們報的分糧、柴、款數都少於會計的存賬，而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收入又遠不敷家庭日常開支，各家報的收入往往只有支出的2/3。怎麼辦呢？只有先開個社員會說明我的意圖，以打消大家的顧慮。

楊公民倒很支持，向大家說：「老陳從北京來，調查各家收支為的是瞭解農村生活的不易，越實話實說，調查才越真實，給上邊反映才越清楚，大家一定要配合。」我調查時，又從一年四季都有哪些支出開始，一項一項計算，往往各家報的還是超過實際支出10%到20%；而後再計算收入，仍是低於支出差不多20%到30%；兩頭一比對，收入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部分就增加了，而支出的吃穿住行用部分會有所減少，兩頭就接近了。

以後，我用這種方法先後做了幾十個隊的「家計調查」，大體上可以做到八九不離十。夏至還沒到，崔慶美催了我三次，讓我搬到周莊，和他同駐一個隊。因「家計調查」還差十幾戶，我想過半個月再搬，可他已派人來搬我的行李了。和老崔搬到一起，就沒那麼自在了，要經常和他與大

隊支部書記毛好珠開會，討論大隊和學校的各種事情，每天下午讀書的機會也少了。不過，和他們在一起，學到了一個大隊都要處理些什麼事情。

倒是認識大隊會計，長了不少見識。接連3天，他向公社電話彙報生產進度，隨口而出毫不遲疑。我很訝異他的記憶力如此之好，他卻詭笑著說：「小貓哄大貓嘛！」。原來自初級社、特別是大躍進以來，上級天天電話催各種進度的指標，報晚了、報少了都會挨批評，會計就練會了「冒報」的本領。從春耕到秋收，諸如犁地、施肥、播種、管理、追肥、收割、產量、交售的日期和產量都得報。

在大隊還有一個好處，可以和各個生產隊的幹部接觸，聽他們訴說哀腸。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上邊可知道我們農民日子過的這麼苦？8月初，羅小朋真和他的好友王飛欣一起來了，他們都是北航畢業的，也都因為1966年底貼了批評中央文革搞「極左」的大字報當了一段「反革命」。老崔讓羅小朋到南王莊、王飛欣到南楊莊去勞動鍛煉。

我和小朋、飛欣一有空就討論各種問題，彼此對「極左」的危害都深感憂慮。秋收後，經老崔同意，我們3人一起對周莊作了一次深入的「家計調查」，一天調查一戶到兩戶，匯總以後發現：集體收入只佔社員家庭收入60%，卻用了90%以上的勞動。而周莊作為程莊大隊的先進生產隊，社員一年的人均集體收入也就80元人民幣。後來才知道，那時全國農民人均集體收入還不到60元人民幣。

當時，在小張莊插隊的還有一個女知青嚴延英，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來的。她每天勞動的很辛苦，農民都很稱讚，但不怎麼願意和大家交往，似乎受過什麼打擊。她的朋友張涑涑來看她，好像是個高幹子弟，人很有教養，談吐間很憂國憂民，和我聊的很投契。若干年後，聽說張涑涑在《歷史研究》當了編輯，可惜沒有機會再行交往。

3-5 程莊農業勞動學校的創辦

崔慶美和毛好珠一起創辦「程莊農業勞動學校」絕非偶然。首先，大學畢業生很少分配到農村工作，其次，年青人讀了書都往城裏跑，農村需要的人才奇缺。這所專門為農村培養人才的學校就應運而生了。新蔡縣是個產棉區，但單產一直上不去。縣科委和中國農科院棉花研究所在這裏的駐隊人員，在大隊黨支部支持下，從辦「植棉培訓班」發展成培育農村科技骨幹的學校。

學生實行「社來社去」，入校後與農民實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同批判），學校要求學生成為「五員一兵」（理論輔導員、政治宣傳員、工作隊隊員、農業技術員、生產戰鬥員和基幹民兵）。畢業後要能「搞好一個隊，種好一方田。」學校創辦後確實收到明顯的效果，學生懂科學種田，又能吃苦耐勞，畢業後回隊很受農民歡迎。

學校課程分三部分。一是技術課，學習各種農作物的種植、栽培與管理，主要學小麥、棉花、玉米，也學大豆、紅薯、土豆，都是當地需要的；同時，還學果樹栽培、家畜養殖。二是勞動課，學習各種農活，如犁耙整地、耨耨播種、修渠灌溉、堆肥漚肥和修建廁所、豬圈、雞捨等。三是政治課，學習一些哲學、政治、經濟、時事、品德教育等。

學生畢業後，一部分當了大、小隊幹部，大部分應聘到各地當技術員，他們活躍在河南、安徽、湖北、山東等地，往往可以使當地棉花畝產從四、五十斤增產到百斤以上，小麥、玉米畝產也能增加三、五成。附近各縣紛紛把學生送來學習。當時，這種實用型人才正好填補了貧窮落後農村的需要。

而像後來擔任潤頭公社書記的崔慶美，縣科委農藝師李宗明、周金兆，中國農科院棉花所研究員鄧煜生、蔣國柱，鄭州大學畢業生米嵩山、劉大明、梁希忠，程莊大隊的幹部毛好珠、張玉林、毛好友、代文功、王德眾等人，都成為很受學生喜愛的老師。這些老師開的課，能理論與實踐結合，學生們很愛聽。

我到周莊後一邊勞動、一邊聽課，抽空就搞些調查。周莊百姓的生活和北楊莊差不多，家裏也是空空如也，全隊無一間瓦房。有件事讓我記憶彌深：

一天，我和老崔在隊長尤青海家吃飯。飯前，尤青海端來一盆燒灶水，水上漂滿黑黑的灰屑，一條已經髒的發黑的白毛巾放在水裏，老崔洗洗手、擦擦臉，我也只能依葫蘆。隊長3歲的兒子坐在門口當小飯桌的舊磨盤上，他娘圍裙裏兜著剛出鍋的熱粑粑，就吆喝著讓兒子從磨盤上下來，孩子一著急一泡黃黃的稀屎竄到磨盤上，他娘嘴裏罵罵咧咧地用圍裙一角把屎一抹，粑粑就徑直倒在了磨盤上。老崔若無其事的拿起一個就吃，我也連吃了兩個。

我不由心中感慨，農民但凡條件允許，何嘗會如此不講衛生呢！飯後離開時，老崔說，你要是不吃的話，農民會覺得你嫌棄他，就有了隔閡，我點頭稱是。後來，駐馬店發大水，北京、上海的醫療隊來時，女孩子穿的時髦衣服都給弄得污穢不堪，到農民家裏吃派飯嫌髒吃不下，可見城鄉

差距之大。如果農民連飯都吃不飽，還談甚麼講衛生呢？正如管仲所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還記得麥收後的一天中午歇晌兒，我到村外轉悠。忽然聽見有隻羊在咩咩地慘叫著，我尋聲走了過去。不禁大吃一驚，村裏的一個男青年竟在與一隻母羊性交。我故意大聲咳嗽了一聲，那個男青年驚慌地跑了。可歎的是，一些到了婚配年齡的男青年因為家裏窮，娶不起老婆，就做起了這等荒唐的事情。記得我在北京延慶縣大觀頭大隊時，也曾見過男青年和小母牛性交的場景。

和老崔熟了以後，一天他問我：「老陳啊，你都這麼大歲數了，還沒尿女人肚裏啊，你不癢癢啊，你不想啊？」我說：「我也不是不想，沒合適的。」他說「什麼合適不合適的，我給你找倆漂亮妞兒，你先跟她們試試。」我說：「那要是懷孕了怎麼辦？」他說：「懷孕有什麼關係呀？你走了不就結了嘛！」我忙說：「我不能幹這種事兒。」他後來果然找了兩個農校的女學生來照顧我，讓我婉言推掉了。

在程莊農業勞動學校近一年的時間，我學會了種小麥、玉米、紅薯、棉花，體驗了「粒粒皆辛苦」的生活，懂得了各種農作物和「六畜」（雞、狗、豬、羊、牛、馬）的生長規律：營養生長與生殖生長的關係。凡農作物但凡營養生長不足的結實一定少，營養生長過旺的則貪青旺長結實亦少；「六畜」也類似，過瘦則難孕仔且個性較躁，過肥也難孕仔而個性遲鈍。推而衍之，人亦有所同，從中體悟到「致知在格物」的道理。

中國的農民實在是勤勞、淳厚又忍辱負重。一年 365 天，天天隊裏要派活，沒有一天休息。上級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可謂「被驅不異犬與雞」，他們真是「幹的牛馬活，吃的豬狗食」，讓人從心裏為他們打抱不平。私下聊起來，他們大多是說：「沒人給我們主持公道呵，能有口飽飯吃就好了」，50 歲以上的人則會說：「合作化以後越來越不自由了，幹什麼都犯忌諱。」

10 月底，上級號召學哲學，老崔讓我結合農村的實際，寫一個「大眾學哲學」的講義，給幹部和學生講。縣革委會主任王墨林看到這個講義後，大為誇獎，並將之轉發全縣。11 月初，王墨林在十里鋪公社整黨，把我、小朋和飛欣 3 人，調到整黨工作隊工作，讓我們增長見識，我們被分到十里鋪公社的黃店大隊，聽說這個大隊的生產一年比一年差。

老崔是個熱情洋溢的人，能幹而又有創造性，講話很有煽動性，幹部和老百姓都愛聽，最難能的是多少年都和老百姓摸爬滾打在一起。我們和他分別時，他依依不捨地拉著我們的手說：「我無法留住你們，有空就回

來出主意，農村太需要你們這樣的人才了。」當時，程莊農業勞動學校在特殊條件下，先後為農村培養了兩千多名生產技術骨幹，對當地農業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黃店大隊自然條件好，1956年時小麥畝產達到過五百斤，因為左傾破壞，我們去時小麥畝產只剩下80斤！和社員座談才知道：搞高級社小麥畝產降到400斤，再搞人民公社小麥畝產又降到300斤，一大煉鋼鐵，秋糧一半爛在了地裏，冬春之交就餓死1/10的人。1959年高徵購，夏糧無存，秋季遇旱，還高徵購，人又餓死1/3。1961年冬繼續餓死人。3年差不多餓死一半人，從此一蹶不振，生產越來越差。

我們去時，不少戶已是吃了上頓沒下頓。走了幾個村子，沒見一處像樣的草房子，大人小孩都穿著破衣爛衫，一個老農拉著我的手悲淒地說：「我們活的還像個人嗎！」。到他家一看，一間也就十一、二平方米四面透風的茅草屋，裏面用土坯和秸稈搭了個大床，床上只有一條黑粗土布的棉被，祖孫三代九口人擠在一起睡。屋裏灶台上有一口鍋，一個麻袋裏裝著發霉的紅薯片，屋裏還養著一頭小豬，人吃完給小豬留一口。見他們實在可憐，我走時給留了三塊錢。

從我到北楊莊以後，就不斷有農民和我借錢。少則三、五元，多則七元、八元，一般都是家裏有人生了急病，或是小孩子上學沒錢買筆墨紙張，我基本上是有錢就借。眼看農民日子過的那麼苦，你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拒推的。可是我一月42元的工資，差不多每月都借出去一半以上。基本上除了吃飯、吸煙，也就分文不剩了。偶爾到縣裏吃上一頓，改善一下生活，都是小朋、飛欣掏錢。

說來慚愧，我在新蔡兩年多，領工資以後，竟沒有給父母寄過一分錢。先後借給了農民四百多元，是很難張嘴要回來的，也就算扶危濟困了。我去駐馬店工作前，去縣辦公室裏還和縣裏借的八十元錢，竟已被別人替我還了。我問了幾個朋友，誰替我還了錢？誰都說不知道。我估計是米嵩山，他也說不是。一直到今天，這還是個謎。也許蒼天有眼，一個人多行善事，總會有好報的。

3-6 胡耀邦說：「青年人的雄心壯志和廣大民眾的利益結合起來才會有大出息」

當時，我和羅小朋、王飛欣到各家輪流吃派飯。我們一去，他們就給我們做點兒特殊的飯菜。後來，我們宣佈，你們吃什麼，我們就吃什麼，

不要給我們特別做。結果吃了一個禮拜，一個老農就跟我們說：「小陳啊，你們說我們吃什麼，你們就吃什麼。我們總不能讓你們吃發霉的紅薯片啊？總得吃好點兒啊？你們吃好的，孩子也得吃好的，我們都得跟你們一塊兒吃。這樣吃法，一個禮拜就把糧食吃沒了。」我們一想，是啊，不能只說，你們吃什麼，我們就吃什麼；而得說，你們平常吃什麼，我們就吃什麼。

那個時候，一過了11月，農民吃的都是發霉的紅薯片，前三鍋水都得倒掉，太苦了呀！後來，吃得我們腦筋都不轉了，晚上開會的時候，話都說不出來了。1971年元旦過後，黃莊大隊老百姓的生活更難過了。多數人家裏都吃的是「救濟糧」——折合3分錢1斤的發霉紅薯片。這種紅薯片下鍋後，吃到嘴裏都是苦的，拉不出屎，還會生病。我們3個人也餓的有氣無力的，實在沒辦法，小朋悄悄到供銷社買了些雞蛋，我們每晚一人一個煮雞蛋，用來補充營養，以便支撐下去。

偏偏討厭的是，我們每人身上又都長滿了虱子。飛欣說：周總理把虱子叫「革命蟲」，身上越多越革命，我們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全身脫光抓虱子。睡覺的桔稈上還爬滿了臭蟲，一個個吃的紅肚肚的氣人。跳蚤也不時會蹦出來咬人，還一跳老高，很不好抓。小朋讓咬的全身是包，我稍好一點，飛欣又好一點。我說：小朋血熱是「甜皮」，飛欣血涼是「苦皮」，蟲子也專揀好的吃。小朋只有苦笑。

小朋和飛欣兩人多才多藝，特別是都有美妙的歌喉。小朋藝術氣質很濃，樂感特別好，哼起各種民間小調，一會兒是小橋流水，一會兒是天馬行空，聽得人如臨其境，如醉如癡的。飛欣的拿手則是唱「三套車」、「船夫曲」一類歌，深沉、高亢交相運用，給人悠遠、繞樑之感。他倆讓我唱，只能唱個「借東風」、「空城計」湊湊數兒。唱得高興時，飛欣的歌聲往往會引來許多小孩子圍觀。

閒聊中才知道，他們兩人都是「高幹子弟」。小朋的父親羅朋原在中央工作，1959年打了「右傾」，下放到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當副校長，文革中又貶到江西新建拖拉機廠當革委會主任，後來鄧小平就在這個廠勞動。飛欣的父親王奎先是個老紅軍，在廣西軍區當副司令。他們二人很少貴冑習氣，有理想，喜鑽研，不怕吃苦，老百姓都願意和他們拉家常，我們也成為終生的好朋友。

春節前我們三人商定，由身體最好的飛欣留守，我去北京轉轉，小朋去江西看父母，順便給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帶封信。我跟小朋說：樸方住在積水潭醫院時，我與何維凌去看他。他悲觀地說「不想活了」，我勸他

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死了只會讓壞人得意，他淚流滿面地一再感謝，你去拜訪，他一定會很高興。我們兩人先到縣城洗澡、理髮，而後又買了些土特產品，就各奔南北了。

我到北京後，住在姑母家。去《人民日報》拜望老友孟繁華，他還身陷「清查五一六」的審查之中。老孟是山東東阿人，孟子後人，為人正直、有才，因寫了《打倒「私」字，實現革命造反派大聯合》一文，受到毛澤東的肯定並其文上批示「要鬥私批修」。後來調到《人民日報》社工作。他在上海調查時，發現了上海市革委會的問題，竟被莫名其妙地當作「五一六分子」一直在審查。

二哥陳一諤自1950年起即任北京園林局園藝師、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已下放當了工人。三哥陳一詢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頗有所成，被打成「修正主義科研苗子」，下放湖北潛江廣華寺幹校當炊事員。表哥王松聲在北京市文化局當副局長，也被打得死去活來，就在老舍^{【159】}自殺那天，他受盡折磨後，氣息奄奄地讓人送回家。大姑姑陳心一告訴我，大表伯吳宓被抄家批鬥，打的都沒了人形兒。當時，所聽到的親戚和朋友，無一不受到各種屈辱與折磨，真是「千家萬戶沒蒿萊」啊。

回到北大，很難見到什麼人，據說大多是下放了。我看望了林庚伯伯，老人家清瘦了不少，倒是過著恬淡的日子。聽說樊立勤還沒有離校，我找到他，看他宿舍裏臭烘烘的，東西亂成了一片，人也是蓬頭垢面很潦倒。我勸他說：「你整天呆在這樣的環境裏，對你的身心都不好。還是得和民眾多打交道，心氣才能旺起來。」他不置可否。看他無助的樣子，我把身上帶的一個月工資，給他留了下來。

聽說胡耀邦自潢川幹校回京養病，便去富強胡同看他。恰巧胡德平也在家，他是一個正直誠懇的人，文革中我挨鬥，他也挨鬥。一見面才知道，他已調到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工作。他開玩笑說：「我們去沙城農場改造，名單有你，可沒見人。後來傳說你投靠蘇修去了！」我告訴他，我去了河南新蔡，想把農村情況和你父親談談。他說，父親每天上午讀書，下午多和找他的人聊天，我告訴他。

不一會兒，德平帶我到他家北房客廳，耀邦正在看報紙。見到我，他還是那麼熱情、真摯，緊緊地和我握手。因為和德平是同學，我說：「耀邦叔叔，還認識我嗎？」他笑笑說：「小陳嘛，有印象！」我說：「我剛30歲已經挨了幾百錘了！」他說：「年輕的時候多受磨練，一生都會受用啊！」接著，我向他詳細報告了自己在農村調查的10個問題。

【159】老舍（1899-1966），本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

主要有：「左傾的危害」，「吹牛造假」，「過火鬥爭」，「幹部挨整」，「生產破壞」，「生活下降」，「吃糧不要錢」，「大集體和小自由」，「人口失控」，「自留地、家庭副業和農貿市場」。中心一點就是說明：自大躍進以來，「左」傾路線已把農村搞的破敗不堪，家家戶戶都是家徒四壁，吃不飽，穿不暖，如果說是「民不聊生」，一點兒也不為過。

明明是上邊要「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搞得生產大破壞，卻又大整講實話的基層幹部；什麼都大放「衛星」，導致說假話成風，說真話就扣「右傾」帽子批鬥；結果，「大煉鋼鐵」樹砍光了，男人煉鋼，女人運輸，玉米、紅薯、大豆爛在地裏；「打碎罈罈罐罐」把各家菜罈子、醬罈子都砸光了；農民按年齡、男女分別編成班排連營，夫妻一個月見一次面過過夫妻生活；再加上「高指標」、「高徵購」、「大食堂」，農民還怎麼活下去？

1959年冬，新蔡及周邊各縣開始餓死人，到1962年差不多有1/3以上的人都餓死了。退到生產隊核算以後，情況有所好轉，但生產還是「大呼隆」，分配是「吃糧不要錢」，調動不起大家的生產積極性。農民說，現在2/3的人日子過的不如1956年以前，1/3的人日子比解放前還差。連基層幹部私下裏都說，共產黨搞的「山河破碎」！

不知不覺中一下子談了5個多小時。耀邦時而坐在沙發上沉思，時而站起來踱步，還不時插話。後來說到知青寫的一首詩《左舷》，所有的人都要劃左舷時，船翻了。他說：「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看過沒有？我們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啊！許多人至今還不醒悟！」當說到左傾路線一次次把敢說真話的幹部整下去，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假大空」就氾濫了。耀邦慷慨激昂地說：「這個『假大空』把我們黨、我們國家害苦了！為什麼『假大空』會流行？是從上邊一層一層逼出來的嘛！你和你的朋友們深入實際幹得不錯，什麼聶元梓，蒯大富，不過是些害群之馬，但他們是極少數的，成不了氣候。」談話結束時，他握著我的手興奮地說：「好啊！到了農村，和農民交朋友，認真作調查研究，可以學到在書本上、城市裏學不到的東西。」

最後，耀邦右手握著我的手，左手拍著我的肩頭，熱情地說：「認識中國、改造中國，不瞭解佔人口80%的農民只能是空談。青年人的雄心壯志和廣大民眾的利益結合起來，才会有大出息！面對實際，敢於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樣的青年才是國家的希望！中國的未來就在你們這樣的青年人手上！請你向你的朋友們轉達我的問候。以後回北京，有空就來談談。」

那時候，耀邦每天上午通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資治通鑒》、《法國革命史》、《英國史》一些書。我覺得，在共產黨的領袖裏面，耀邦的知識應該是最淵博和豐富的，他最接近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價值。耀邦的熱情正直、開明坦率，讓我從心眼裏佩服。直到「四人幫」垮台，我每次回北京總會去拜訪他一、兩次，實在是終生受益。

3-7 山西紀行：知識青年理想和現實的衝突

過完春節，我乘火車到了山西渾源，想拜訪一下1969年寫了《楓葉紅了的時候》的北京八中知青計三猛，結果沒見著，就和與他一起插隊的幾個北京八中知青聊了聊，喝了兩頓玉米糊。他們畢竟年青，沒太多想法，倒是帶我看了已遭破壞的北嶽恆山和懸空寺。說來可歎，「北嶽恆山鎮山之寶」的大印就被他們偷來藏在炕洞裏。倒是在那裏插隊的女知青生生活料理得還不錯。

途經大同，參觀了雲崗石窟和上下華嚴寺。又在應縣看了木塔。而後，到山陰拜會了在大蟲堡大隊插隊的北京四中學生，20幾個人睡在一個大熱炕上。那時，朱錦文和洪毓安正辯論「堅持理想」還是「面對現實」的問題，前者說後者是「庸俗唯物主義」，後者則說前者是「空想社會主義」，彼此互不相讓，爭論的難解難分，但其實都與老百姓的生產生活並不相干。

我聽了兩天，第三天來了一群民兵，不由分說把我捆起來戴上手銬送到了縣公安局。兩個公安惡狠狠地拍著桌子，質問：「誰派你來的？搞什麼情報？」我一頭子霧水，不知所云。縣公安局的牢房陰暗潮濕，夜裏更是凍的睡不著。第二天上午，送來兩個窩頭、一塊鹹菜、一碗水。吃後，又審問。忽然想起馬千里伯伯說過，他一個老部下叫張維滋，是28軍軍長，駐守山西，有什麼事可以找他。我說：「我來找張維滋。」問：「他是什麼人？」我說：「28軍軍長。」兩個公安馬上態度變了，問我叫什麼，是幹什麼的？我說了名字，又說是「新蔡黃莊大隊整黨工作隊的」，問我負責人是誰？我說：「王飛欣」，公安往新蔡打電話證實了。晚飯送來一碗高粱米飯和一碗炒蘿蔔絲。第三天上午，來了個負責人，連連道歉，說：「蒙古修正主義派特務到了晉北，誤會你了。」馬上兩葷兩素、一碗白米飯、一碗雞蛋湯送了上來，算是賠禮。看來，這兒的人敵情觀念還真強。

接著，我到原平縣去找鄧英陶。羅小朋介紹的，說是他登泰山時碰上的，十八、九歲的小伙子，才思敏捷，胸懷大志。英陶在桃園大隊插隊，

文革開始時在北京景山學校上初二，1968年和同學到這裏接受「再教育」。知青點的房子是專門蓋的，一排磚瓦房，熱炕也很暖和，四周還有圍牆，養了一隻退役狼犬看門。見我過來，狼犬聞了聞就搖著尾巴走了。據知青們說，牠只要聞出「北京味」就不咬人。

鄧英陶和曲守國住一間房，到處堆的都是各種書籍。晚餐時，英陶和插隊的女生對罵起來了，因為他給我多搶了兩個包子。原來，隊裏專門派人給他們做飯，按人頭定量，菜包子味道還真不錯。晚飯後，來了一屋子人，記得名字的有楊小東、石小抗、曲守國等。我給他們簡要介紹了新蔡的情況，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人，他們都很驚訝；說到「男女分編班排連營時」，馬上有人插話，「這是太平天國洪仁玕的辦法」；對「辦農校培養人才」，都認為是個解決農村缺乏人才的好辦法。他們也給我紛紛介紹山西風情，只是對今後的出路大家都很迷茫。

第二天一大早，英陶帶我去天涯石鼓山，一路閒聊，感到他讀書不少，是個人才。我這個人別無所長，只有一條他人不及：見才則喜，見才則惜。遂動員他去我們那兒一塊幹，他說：在這兒幹意思不大，回城又時機不到。他的一首詩就寫道「去留幾經穿肺腑，得失數度起波濤」，可見一時還拿不定主意。我介紹說，到我那兒去，可以有許多深入農村做調查研究的機會，隨時歡迎你來，他有些動心。

晚上閒聊，說起山西農村窮困，流行「借種」和「換妻」，「借種」是借腹生子，「換妻」則是兩三家男女互換，可以節省財禮。曲守國插話說：我看這個段子可比《金瓶梅》裏王婆教唆西門慶勾引潘金蓮的描繪傳神多了，你們聽：「一要人才二要財，三要功夫四要纏，五要臉皮厚，六要忍住性，七要下得手，八要桿兒硬，九要捨得身，十要豁得命！」剛說完，大家已笑的前仰後合。

在這兒呆了三天，過得很愉快。這些知青從16歲到19歲，一個個都很聰明純潔有理想。農村使他們看到了另一個天地，增加了不少各種見聞，但可惜學業的中斷，使他們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不夠，也就使他們很難在農村作深入調查研究，為改變農村落後面貌作出較大貢獻。所以，大多是白天幹活、閒聊、混日子，晚上抽空看各種雜書。

從原平前往五台山，參拜了顯通寺、佛光寺。又到太原遊覽了晉祠，而後到太谷。聽說清華附中的知青在這兒搞了個「共產主義新村」特來拜訪，只見到高王凌一個人。他說，他們確實搞了一年共產主義實驗，錢和食品都從家裏帶來共同消費，勞動收入也共同享有。半年左右矛盾不斷發

生，一年後就解體了。說起農村的情況大體與我在其他地方瞭解的情況脈絡一致，只是困難時期死人較少。

高王凌還說，謝覺哉^[160]的女婿王培新去年夏天寫了個大字報貼到縣城，提出1956年以來太谷農村的情況是：「口號越喊越高，牛皮越吹越響，生產越搞越差，產量越來越低，徵購越來越多，生活越來越苦。」結果讓縣革命委員會打成了「反革命」，人不知跑到哪兒去了。不到兩年，清華附中的知青，有門子的一個個就都走了，沒門子的只能在這兒苦熬。恢復高考以後，他考上了山西大學歷史系。

往南我到了臨汾，看望了北大老同學唐宗瑤、何青夫婦與楊偉延，他們三個人都是北大籃球隊的主力。分別畢業於北大法律系、哲學系和中文系，現在都在中學教書。何青說只有女兒寧寧能逗她開心。楊偉延一個人帶三個孩子很是艱難，當年那「一樹紅花照碧海」的醉人歌喉似乎還在耳邊迴響，不知迷倒了多少男生。但令人感慨的是，時遷勢易，歲月的滄桑磨礪著他們，青春永不再來。

我乘車前往昔陽，拜訪了大寨大隊。看了大寨的梯田，對大寨人戰鬥地改變艱苦生產條件的努力深感佩服。陳永貴不在，見到了郭鳳蓮²，她似乎情緒不好，半躺在炕上和我聊了一個小時。一戶戶人家雖然住在整齊的窯洞裏，但吃的仍是玉米麵窩頭、玉米碴子粥，也沒什麼菜吃，生活十分清苦。再一瞭解，每年冬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縣裏的幹部和部隊戰士都來幫他們修梯田，對他們幫助不小。

決定去刀把口看看。在新蔡縣轉發的整黨《簡報》上，曾看到「杭州女知青王練鬥倒太行劳模張老太」的介紹，王練就在昔陽縣刀把口大隊插隊。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從縣城走了150多里路，夜裏11點見到了王練，交談了兩個多小時，感覺她熱情有餘而缺少頭腦，很難堅持下去。喝了一碗熱麵條湯，夜裏三點決定翻山往東，到河北贊皇縣的虎寨口。摸黑在山上走的跌跌撞撞，還不時聽到野獸和梟鳥的吼叫聲。為了壯膽，擷了一根樹枝，既可以當武器，又可以當柺杖，好不容易走出了山林。到虎寨口已是中午了，身上僅剩的五元錢，又給了往刀把口路上的一家窮人，如何是好？巧的是遇到了兩個騎摩托的石家莊記者，再三懇求，他們把我帶到了石家莊。向在石家莊水泥廠工作的北大老友朱光磊借了十塊錢，才回到新蔡。

[160] 謝覺哉(1884-1971)，湖南省寧鄉縣人。1921年參加新民學會，1925年參加中共，曾任毛澤東秘書、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² 郭鳳蓮(1946-)，山西昔陽人。時任大寨大隊黨支部付書記。

小朋、飛欣都在黃店大隊。我向他們介紹了北京、山西之行，轉達了耀邦的問候，講了山西知青的狀況。小朋回江西，沒見到樸方，但講了不少鄧小平的情況。他說，鄧小平住在離新建拖拉機廠不遠的望城崗步兵學校，每天走路上下班。他開始做車工，工人耽心他不會，小平卻說：「我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幹過。」他人很淡定，還自己種菜，喜歡吃白菜燒豆腐，身體很好。一次羅朋去看他，他以為是上邊專門派來監視他的，羅朋苦笑著說：「現在是小鬼管閻王呵，14級的縣革委主任管我這個7級，我這個7級又管你這個2級！」小平立即心領神會，笑著說：「對，小鬼管閻王！小鬼管閻王！」

3-8「大家都成了歪嘴和尚，念的經一定不是好經！」

我、小朋、飛欣3人議論，「極左」的東西仍然籠罩著各地，目前只能一邊深入體察民情，一邊靜觀全國動態。1971年開春不久，小麥長勢不錯。不知何故，河南省軍區政委王新^[161]突然派軍隊幹部進駐各縣大整地方幹部，新蔡縣武裝部長劉銀奎當了縣革委會主任，辦學習班讓縣、社領導人「爬坡」，王墨林、李德潤、崔慶美等人都挨了批，說他們「右傾」，「爬坡爬不上去」。

十里鋪公社的整黨無人領導，也就無疾而終了。我和小朋、飛欣出於義憤，給當時的省委書記劉建勳^[162]寫了封信，說：「王墨林很受百姓歡迎」、「崔慶美辦農校功不可沒」。3月，我先後去了河南新鄉七里營和江蘇江陰華西村，這兩個地方搞得都不錯，但其他地方卻很難效仿。幾乎各個地方都會扶植一批「學大寨」的典型，政府投入了很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其他地方則很難有那種條件。這些典型裏，少數還不錯，多數會成為「高產窮隊」，還有一部分則只是個花架子。

在以後的5年裏，我又先後去了山東、吉林、內蒙、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廣西、廣東、江西、江蘇、安徽等多省進行調查。為什麼跑這麼多地方呢？

1970年底，一次和幾個投契的縣社幹部一起吃飯喝酒聊天，酒到半酣，大家說出了心裏話。一個說：「誰說實話誰就挨鬥，搞不好還被整的家破人亡，說假話的反倒不斷陞官，憑良心的只能混口飯吃啊！」一個說：「蔣介石也不會把農村搞得這麼糟，共產黨搞得簡直是山河破碎！」

[161] 王新（1919-1991），山東武城人。時任河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162] 劉建勳（1913-1983），河南新鄭人。時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河南軍區第一政委。

又一個說：「過去常說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念歪了。我看啊，大家都成了歪嘴和尚，念的經一定不是好經！」這些話對我震動極大，想多看一些地方，為的是研究如何才能改變當下這種局面。

——觀察一下就會發現，除了運動以外，縣、社幹部一年到頭主要做五件事，一、會議傳達，二、催種催收，三、攤糧派款，四、檢查評比，五、處理民事，此外，拉關係、走後門、特殊化，則人人不可避免。但認真做這五件事的幹部不到 20%，50% 則是應付差事，30% 是吃喝了老百姓還坑害老百姓的混混兒。第二種人反而運動來了整不著。這些縣、社的幹部裁掉 90% 都無大礙。

——從 1956 年搞高級社開始，農業生產逐年下降，到 1958 年實行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全民煉鋼，全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對農村生產的破壞難以估量，怪不得農民說「今年盼著明年好，明年還穿破小襖，二十多年吃不飽，讓人咋說社會好！」連抗日時入黨的內黃縣黨支部書記都說：「想社會，盼社會，誰知社會來了更受罪，搞得個山河破碎！」

——一個隊搞不好，為什麼隊隊都搞不好？一個社搞不好，為什麼社社都搞不好？一個縣搞不好，為什麼縣縣都搞不好？個別先進隊、先進社、先進縣的成功難以掩蓋 90% 以上的不成功。我雖在文革中看到無數人慘遭迫害，但始終認為是個「路線」的問題，是極左路線的禍害。但，農村的實際讓我對制度是否合理，開始產生了深深的質疑。

「大家都成了歪嘴和尚」，為什麼？顯然，「唸的經一定不是好經」。那麼，問題是出在馬克思，還是列寧、斯大林？抑或是毛澤東？人為地不斷在黨內、黨外「製造階級鬥爭」，蘇聯搞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在中國也出現了。似乎問題是從斯大林搞「獨裁」開始的，毛澤東則猶有過之。可以說，搞的是人人自危、國無寧日，這麼搞真的是社會主義嗎？

馬克思說，「未來社會」應當是「人的解放」，而不是人被奴役，蘇聯、中國又是恰恰相反。強行「公有制」帶來的是生產力的嚴重破壞，人沒有了積極性。那麼，什麼條件才能走向公有制呢？現在的辦法肯定行不通。我的腦海中不斷閃現《右派言論集》、赫魯曉夫報告、德熱拉斯、拉薩爾、盧森堡等，一系列對社會主義實驗中獨裁政治和公有經濟的批評，中國的現實似乎正在印證他們的看法。

聯想起黃偉民、黃明華、宋德楠搞「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時所討論的問題，「人性、人道和階級鬥爭」，「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現在想來，他們可真是先知先覺，但六年前卻都當了「反革命」，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萬萬不可盲動，重蹈 1965 年

寫《萬言書》的覆轍。一定要小心，要以能改變現狀為目標，不能逞一時英雄之氣卻於事無補。我這樣提醒著自己。

我回到黃店大隊後，看到小朋、飛欣很沮喪。原來，夏收時連日大雨，不少小麥捂的發了霉。公社卻還要強行徵購好的麥子，一斤都不能少，好麥子大部分進了國庫。小朋、飛欣據理力爭，要求給農民留夠口糧，農民也眼巴巴地希望這兩個北京人能為他們做主。糧食徵購完成了，農民失望了，小朋、飛欣十分難受。覺得「一定主持公道」的許諾不能兌現，很對不起農民。

十里鋪公社書記卻對他們說：「我也知道農民不夠吃。可是，任務完不成，你們城裏人吃什麼？」一下把人噎的不知說什麼好了。不久，我們寫給劉建勳的信落到了劉銀奎手中，他在全縣幹部會議上狠狠地批判我們「目無組織」、「狂妄自大」、「不好好改造」，撤了我們整黨工作隊員的資格，讓我們隨隊勞動。這下可好，倒給我們創造了進一步深入民間和抽空讀書學習的機會。

我從北京帶來的那個半導體收音機性能特別好。每天晚上8點到11點，我們3人都會清晰地收聽到「美國之音」、英國BBC廣播電台、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和莫斯科廣播電台播出的節目。特別是10點到11點「美國之音」，15分鐘的「國際新聞」和45分鐘的「時事經緯」，是我們每天必聽的。這在當時叫作「偷聽敵台」，被發現可不得了。幸好我們住的生產隊牛屋四周無人，也就沒被發現。

9月19日起，播音員周幼康和於音在「美國之音」的節目中，連續3天播出「中國政局發生異常事件」，說1949年中共建政後，曾3次全國飛機停航。第一次是志願軍入朝前停航三天，第二次是廬山會議停航三天，這回是第三次，全國民航與軍用機已停航7天。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我們三個人討論，估計是中央出了大問題，請飛欣立即到北京他姨父蘇振華^{【163】}處打聽一下。

3天後，9月23日，飛欣從北京回來，興沖沖地說：「林彪叛逃，9月13日摔死了！」我們感覺，這標誌著極左路線的巔峰已過，是個好消息。飛欣又說，基辛格訪華時，毛主席說：「尼克松雖然是右派，中美關係正常化，還得和尼克松打交道，因為他是決定美國政策的人。」是呵，看來要改變現狀就要影響決策，就得和決策者打交道。隨著中蘇關係惡化，中美關係將會有所調整。

【163】蘇振華（1912-1979），湖南平江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9月底，劉銀奎讓我們回程莊大隊，繼續勞動鍛煉、改造思想。我和小朋、飛欣，分別回到周莊、南王莊、南楊莊。我和小朋、飛欣一邊參加勞動，為學校出謀劃策，一邊繼續做各種農村調查，農民們都很歡迎我們，日子過的倒也輕鬆而愉快。

這裏的農村還是保存了許多傳統的習俗。像春節、端午、中秋的歡慶，婚喪嫁娶的禮節，各村大門頭長輩都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小伙子找媳婦叫「挖財氣」，小姑娘嫁人叫「尋靠山」。最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延續了原始的親情：像村裏的姑娘出嫁，各戶都會為之添嫁妝；哪家娶媳婦，都會「三天不分老幼」，誰都可以和新媳婦胡鬧，3天過後，老公公、大輩子哥就不能和新媳婦說話了。

不久，王墨林又重新擔任了縣革委會主任，崔慶美也恢復了職務，而劉銀奎卻作為林彪死黨、省軍區司令王新的追隨者被免除了職務。11月，王墨林擔任組長、新升任縣政工組組長的李德潤擔任副組長，率領一批公社書記、副書記進駐陳店公社整黨，又把我們三人調了去。這次，小朋和一個老公社書記李洪燦在三廟大隊，我和飛欣在王寨大隊。不久，我和飛欣又去了郭莊大隊。後來我又調到了大劉莊大隊。我們所到之處，農民的窮苦程度不亞於黃莊大隊，幹部和農民所述也和黃莊大隊大同小異。

3-9「共產黨是中了邪了！」

1971年底，我和飛欣在郭莊調查時發現，這個40戶的生產隊竟是一個老祖宗的後代，土改時傳到了第五代。土改時，老大一直是單傳，男人在外面教書，女人靠親戚幫工，劃成了地主；老二傳了4戶，兩戶劃了富農，兩戶劃了富裕中農；老三傳了14戶，兩戶劃了中農，12戶劃了貧農；老四傳了21戶，18戶劃了貧農，3戶劃了雇農。各戶一直相處的不錯，共同祭祖，年節往來，農忙互助。土改「劃成份」以後，人為地使他們發生了不少矛盾。

我好奇地和那個「地主婆」談了一次，她竟哭訴了起來：她先生在外邊教書，農忙時老四家的主動幫忙，結果她家成了地主，老四家幫忙的兄弟成了雇農。老二家的兩戶富農也是老四家的幫忙給劃的。我又到那三戶雇農家訪問，他們說：他們這一門人丁旺，給老大家的幫忙，大嫂可仁義了，不光吃的好，收成下來差不多分我們一半。咋一土改，她就成敵人了？我們都愧的慌，覺得對不起人。當時鬥她，沒一個人吭聲，就拉到外

村鬥，她的家當也讓外村人分光了。這些年，我們都私下照顧她。你說，這共產黨咋沒人味呢？

我們難以回答。那時，每次運動一來，開場鑼鼓總是批鬥「階級敵人」，而「四類分子」(即：地、富、反、壞)及其子弟當然次次在劫難逃。我們所經之處，每次都要批鬥他們「亂說亂動」，他們已被批的惶惶不可終日，見人就低頭哈腰。而子弟們為求生路則往往學一門手藝，像木匠、鐵匠、篾匠、泥瓦匠、理髮匠等，以彌補生活的不足，但一舉一動都特別小心，唯恐犯忌。機械地把人劃分成三六九等的各種成份，又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實行歧視政策，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文革中流行的什麼「紅五類」、「灰五類」、「黑五類」之類的說法，就源於這種錯誤的階級成份的劃分，而這種給每個人劃分階級成份的作法，應該說是一種在落後國家形而上地理解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理論而形成的極左的做法，這種做法成了構建一個新的等級社會的基礎。回想起北大錄取新生、畢業分配，階級成分都是首要的問題，這種把人劃成三、六、九等的作法，不知埋沒了多少才俊。

看來從斯大林到毛澤東，把「階級鬥爭擴大化」不是偶然的，為了「革命」成功，就要不惜一切地將可能反對自己意志的人當成「敵人」，其實這些「敵人」都是人為製造的。所謂的「四類分子」中，真正有劣跡的少之又少，大多是農村中有文化、有能力的人；而「貧下中農」裏，除了少數老實巴交的以外，多數是多子女、少勞力的戶，或者就是不好好幹活的懶漢，土改前把家業敗了的。

大劉莊大隊的「劉老爹」給我進一步講解了農村的慘況。他在莊裏輩份最高，很有威望。聽說他當幹部時搞的不錯，後來死活不幹了。但隊裏有什麼事，還請他出主意幫助解決。大家都說他在莊裏文化最高，是個「智多星」。我先後拜訪五次，他話匣子才打開。劉老爹說：「小陳啊，不是我不想說，說了也沒用呵，弄不好還給自己惹禍。這世道我是看穿了，搞不好啊！」他接著說：

看你這麼誠心，我就給你掏掏心窩子。我高中沒畢業就參加國軍去打日本鬼子，幹瞭望。五年，當了個排長。後來，看不慣官場習氣，和團裏長官發生頂撞，就是一氣之下回鄉了。開始當長工扛活，日子過得不錯。後來，土改劃成了貧農，還算過了兩、三年吃飽飯的日子。但從土改起，共產黨亂定成份、亂鬥人，大家就已經開始看不慣了。後來，勤勞苦幹的農戶，日子慢慢過的好起來了。

1953年一搞「統購統銷」，日子又不好過了，勞力多的戶不夠吃了。1956年，上邊又讓搞合作社，勞力多的戶不願意入社，可也沒有辦法，但幹活的勁頭不如以前了，勞力少的戶跟著混反倒能吃飽。村裏人推我當初級社社長，我推不掉就當了，總的說這時生產搞的還可以，大家也還算滿意。但剛一年，又搞了高級社，土地、耕畜、農具入股都歸大堆了，鄉親們很不願意，大家開始不積肥了，不買農具了，有錢的也不投資了，沒錢的就伸手要錢，出工不出力了。

我也沒辦法啊，生產下降不少。接著，可真亂套了，又是成立人民公社、辦大食堂，又是大煉鋼鐵、大放衛星。勞力去煉鋼了，地裏的莊稼都爛掉了，還搞高徵購，食堂裏只能喝湯，大家都沒有飯吃了，弄得簡直一塌糊塗，一戶一戶的人就這麼餓死了！好慘啊。我不願意說假話，被批鬥的死去活來，以後上邊不管咋勸，還讓我幹，我死活都不幹了，誰幹也幹不好呵。真是造孽啊，據我所知，雖說河南有「水旱蝗湯」的說法，但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麼慘的事呵。

我反覆思忖，總是琢磨不透，是不是毛主席也想讓大家都嘗嘗爬雪山、過草地的滋味？要不，就是瘋了？哪個皇上也沒這麼胡搞過。照我看，共產黨是中了邪了！要不，怎麼整天睜眼說瞎話？現在老百姓的日子過的，可以說都不如1956年以前，恐怕一大半不如解放前，還總在吹什麼「形勢一片大好」，好個屁！人餓死那麼多，沒造反就不錯了。

我說：「老爹，那麼多人餓死，咋不跑哪？」他說：「跑？往哪兒跑？無論跑到哪兒，你沒戶口、沒糧票，不只沒飯吃，還得把你當盲流抓起來，弄不好還得吃槍子兒！」老人的一席話發人深省：看來，人們一旦沒有了財產，就不得不依附於超經濟的政治強權，否則，基本的生存條件都沒有，只會是死路一條。不由讓我想起洛克說的「沒有私有財產制度就沒有民主制度」確有道理。

劉老爹一邊抽著旱煙袋一邊說，本來農村都有「貓冬」的習慣，這幾年啊，又搞起了「學大寨」，一入冬就要「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可把我們弄苦了。我問：「國家不是有補貼嗎？」他說：「甚麼補貼？上邊一個勞力一天只給兩毛錢、一斤糧食。隊裏還要貼上兩斤糧食和蔬菜，社員要出所有的勞動工具和衣服、鞋襪。一年差不多要幹120天，隊裏和社員甚麼也撈不著。可幹的活，又常常是今年李書記讓挖渠，明年張書記叫修路，儘是些無用功，沒辦法呵。」

我和小朋、飛欣在調查中，還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每個生產隊有一個平均主義的帶有照顧性質的「共產主義價格」，農貿市場上有一個

上下浮動調節需求的「資本主義價格」，居於兩者之間有一個國家計劃制定的「社會主義價格」。比如，紅薯，生產隊分給社員每斤一分錢，帶有共產平均的意味；農貿市場每斤則四至六分錢，貨源多就價低，貨源少就價高，起市場調節的作用；而計劃收購每斤二分錢、出售三分錢，居於兩者之間，既剝奪農民，又壓低市場。

我們工作組的日常事務，由副組長李德潤主持處理。一天，李德潤笑瞇瞇把我們3人找到一起，讓我們給他的工作提提意見。小朋思路敏捷又快人快語，一下子提了七、八條。我看李德潤的臉拉了下來，就敷衍了幾句，飛欣平日不善言辭也沒說甚麼。誰知第二天，在李德潤主持召開的工作隊員會議上，他竟批評起我們來，說「有些知識分子眼高手低，這也看不慣，那也不滿意，只會評頭品足，你有本事就給大家幹出個樣兒來，別淨挑刺！」其他人看著我們不吭聲，我們都愣住了。會後，我們一商量，覺得領導人讓提意見，有的是真心的，有的其實不過是客氣話，想讓你誇他，我們確有書生氣。以後，領導再讓提意見，得先給他戴戴高帽兒，再說幾條他能做到的改進意見，他做不到而你能做到的，要說是在他的指導下做到的，而那些他做不到你也一時做不到的，最好不要提。

我和飛欣在王寨做了個整合勞力、提高效率的最基本的責任制。第二天我們向他彙報說：「根據您的指示，我們做了個實驗。」他高興地去看了，並在工作隊會議上說：「你們看看，我講了，人家小陳，小王，在郭莊生產隊馬上就找出一條方法，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了幹部的積極性，你們也得像他們這樣嘛！」把我和飛欣大大表揚了一番。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官場。

我和小朋、飛欣議論：到農村後，我們時時感到自己常容易犯用理想代替現實、以書本照套社會的毛病。在目前的狀況下，大多數的知青都不能不隨俗沉浮，少數知青不甘如此，又多取潔身自好的態度，這樣雖可出於污泥而不染，卻於改變現狀無益。只有深入民眾，瞭解他們的所求、所需、所想、所盼，並在基層紮下根來，才會發芽、開花、結果，我們應該努力爭取做到。

3-10「共產黨真他媽的扯蛋！」

1972年初，王墨林調任駐馬店地委宣傳部長。他走前和我說：「農明的孩子讀了大學都不回來了，農村越來越窮，應該從農村中培養孩子。」想調我到地區文教局，幫他抓抓農村教育和科技，這樣工作的接觸面可以

更寬一些，對我瞭解社會也很有好處。王墨林在基層幹部中，算是一個難得的想幹點兒事的人，我想了想就答應了他。小朋則準備回江西，飛欣計劃到廣西。我們約定先一塊去北京，看看親朋好友，瞭解一下各方面的情況。

春節前，我和小朋、飛欣拜訪了耀邦。來來往往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只與我們談了一個小時，對農民的疾苦非常關心，又鼓勵了我們一番，就接待別人了。飛欣可能因為緊張，平日拿手的「三套車」，在耀邦家竟唱得走了調，惹的我們大笑了一場。我們又一起或分別拜訪了幾位師長和朋友，大家對林彪摔死和中國回到聯合國，均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總的形勢恐非短期內能夠好轉。

在向老友孟繁華介紹了我們在農村的調查後，他說他的老家東阿的情況也差不多是這樣。臨走時，他為難地說，能不能借我五斤全國糧票？原來他想過年回鄉看望父母，讓他們能吃上一頓白麵煎餅，5斤全國糧票可以買到一斤半白麵。這時我才知道，他上中學時20斤定量，自己不夠吃也每月省下幾斤給家裏，多少年了家裏過年都吃不上白面煎餅，想孝順一下老人都難以做到。我拿出20斤全國糧票給他，他不知是高興、感動，還是難受，淚水竟都快流出來了。

我被朋友拉到紅霞公寓，參加了一批知青的沙龍。當晚的主題是「存在主義」，主要討論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加羅蒂的《人的遠景》和沙夫的《人的哲學》，顯然比四年前「當代馬克思」的趙金星們大大前進了。最活躍的是人大附中老紅衛兵許浩淵，她曾化身乞丐到各地體察民情，她的高論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各執一端，兩頭總會相互接近，尋找恰當的節點。」年輕人已從狂熱的左傾中漸漸清醒過來，正尋找著新的精神食糧和出路。相反，老大學生們一個月有40多元工資，大多缺少了知青們探索的熱情。

我和小朋、飛欣商定，三五年內還要調查研究、參與實踐和認真讀書為重點繼續提高自己。1972年2月，我到駐馬店地區文教局報到後，分到教育科。這個局有40多名員工，人們大體上相處還不錯。局長鄒慶厚是個老教育工作者，為人幹練、開明。連續兩次在局長參與討論的教育規劃會上，我的發言都受到局長稱讚。

如何站住腳並有效利用時間呢？我把每天早晨6點到晚上10點，每兩小時作為一個單元，將每天學習、工作、活動分為A、B兩部分，A是不可缺少的，B是可有可無的。每天記錄，週末統計，盡可能減少B的比例；又將A分為創造性與非創造性，盡可能增加前者。一個月後我發現，

第一，坐辦公室效率極低，看報紙、喝茶水、閒聊天、應酬人佔了大部分時間；第二，討論業務多為公事公辦，只是每週局長參加的會認真一些；第三，環境嘈雜，難以讀書作研究。我遂向鄒局長提出，我分工抓農村教育和科技，但辦公室大多是抓城市中小學教育和教材，我的宿舍就在辦公室旁邊，我不如在宿舍辦公，這樣效率更高。局長爽快地同意了。這樣，進局不到三個月，我取得了不小的自由空間。每天可以有六小時讀書，六小時研究業務。接著，王墨林帶我到駐馬店地區各縣轉了一圈，回來後讓我寫了個《關於建立駐馬店地區縣公社大隊三級農村教育科技網的意見》，很快地委就批准了。

由文教局主管，讓我組織實施，一方面由我到程莊農業勞動學校蹲點，加強師資力量，提高教育質量，培養農村技術骨幹；一方面由各縣教育局組織部分教師、農業技術人員為公社、大隊培養所需技術人才。兩年多的時間裏，在農村人才奇缺、知青沒有出路的特殊條件下，這種辦農村教育科技網的方式，對駐馬店地區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年底，地委先後任命我當了教育科副科長和局黨委委員，我和王墨林說了在北大曾被開除了黨籍，他笑著說：「那是聶元梓那些造反派胡鬧，不做數，不做數！」這期間，我 1/3 時間調研、1/3 時間實踐、1/3 時間讀書的願望也能大體實行。我抽空讀了《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主義》、《大策略家》、《第三帝國的興亡》、《尼克松其人其事》等內部讀物及蘇聯解凍後的一批文學書，又讀了《舊唐書》、《宋史》和《明史》等史書。

這時，我不僅對自己從高中到大學時的左傾激進有了徹底的反省，而且意識到共產主義烏托邦對百姓和國家危害的嚴重性。對毛澤東的迷信也從根本上破除了，感到他比斯大林更專制、更殘酷。斯大林搞「階級鬥爭擴大化」，是在黨內「清洗」、在「強行集體化」時錯殺了一批人，毛澤東則是在各行各業、黨內黨外製造階級鬥爭，整人、殺人可比斯大林多了太多了。毛澤東很欣賞朱元璋。建國之初，即專門請吳晗等人研究明史。朱元璋為鞏固政權和猜忌功臣而大開殺戒，可他為老百姓、特別是農民，還是辦了不少好事。即使到了明末政治腐敗，多數百姓日子也還過的不錯。毛澤東不僅整肅黨內黨外的政敵，還把除共產黨以外的各種獨立民間組織都消滅了，實行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獨裁專制，改變起來恐怕絕非短期之功。

這時，我的調研不僅可以在農村，也可以在學校、在部門，不限於一個縣，而是 10 個縣，範圍廣泛多了。我先後到各縣先進隊、落後隊調查，到中學、小學與公立教師、民辦教師座談，還到縣計委、經委、財政局、

工業局、糧食局、銀行調查，到糧管所、供銷社、信用社、醫院、科技站等各個部門調查。調查中時常覺得五味雜陳，怎麼這些部門都成了給自己謀利益的團體，實在讓人感慨萬千。

駐馬店各縣的先進隊，一般集體年收入每人最多七、八十元，個體年收入每人三、四十元，落後隊只有其一半多。多數農民窮困不堪，用長期「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形容毫不為過。教師們則讓運動整的噤若寒蟬，「右派」比例最高，文革又慘遭迫害，大部分民辦教師一月補貼才四至六元，也吃不飽飯。可能我真誠隨和的作風，容易讓人們親近，很快大家都願意與我說說心裏話。

汝南師範的幾個教師讓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們說：周代「井田制」八份私田、一份公田，難以維持；唐代從「均田制」到「兩稅法」，再到明代「一條鞭法」，歷朝歷代幾乎都是「什一稅」。不瞞您說，現在的「人民公社」比周代的「井田制」還落後啊！說難聽點，是一種人身依附於政府的農業奴隸，再加上平均分配，怎麼可能搞好哪？農民的所得連付出勞動的 1/3 都不到啊。

我到平輿縣，縣委書記劉福祥帶我見到一個 38 歲的婦女，生了 27 個孩子，哪一胎都是 2 個、3 個。只有孩子的媽媽能分出誰大誰小，孩子的爸爸都搞不清楚。我問她：「你怎麼生了這麼多啊？」她說：「我不懷孕就難受。」鄉親們說：「多一個孩子就多一份口糧嘛，誰不想多生？」確實，是「人五勞五，吃糧不要錢」的平均主義分配政策，造成了農村人口的不正常增長，一般社、隊的多子女戶日子都比多勞力戶過得好。

在調查中，我感到糧管所、供銷社、信用社等多成為幹部謀私利、剋扣農民的部門。像糧管所收「統購糧」時，往往降級壓價，還七折八扣的少付款，而售「統銷糧」時又提級抬價，其利自然歸己。供銷社則緊俏、急需物品都走了後門或賣高價，收購農副產品往往是「多了砍，少了趕」，吃虧的又是農民。信用社更是「存款容易取款難」、「貸富不顧窮。」

各級弄虛作假竟習以為常，從大隊、公社、縣都有三本帳，像主要農作物產量都有「實際產量」、「黨委認可產量」、「上報產量」。若領導人提升了，「上報產量」就多報些，表示有政績；若領導人貶職了，「上報產量」就少報些，表示政績差。基本的生產數據都跟著政治風向變，聽基層幹部說是從搞「初級社」以後開始，「大躍進」時最烈，現在已經成了習慣，而且縣、地、省都有 3 本帳。

後來回到北京時，聽杜潤生^{【164】}說：據 1956 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當年糧食減產了 50 億斤，毛澤東聽了勃然大怒。嚇得統計局長連夜加上了 90 億斤，算增產了 40 億斤，才過了關。從此，各級報統計數字都要看上級的臉色，「經濟統計」變成了「政治統計」，「虛報」、「浮誇」也就屢禁不止，統計數據也就只能參考而不可全信了。甚麼事情都可以弄虛作假，到頭來遭殃的還不是老百姓。

最糟糕的是，「反右」、「反右傾」以後，從黨政機關到社會各界，真是正氣蕩然無存，搞不好就成了「敵人」。光是確山縣右派就打了 14.7%，多為給領導提了意見的知識分子幹部和外來幹部，反右傾又將 20% 講真話和不願說假話的幹部整了下去。誰會阿諛奉承說瞎話、看風使舵迎上意誰就會得到提拔。各縣那些素有名望的耿耿敢言之士不是被整的家破人亡，就是被搞的灰頭土臉。最可氣的是，一位老教師深受師生敬重，反右派開始時在家養病。打右派時，黨支部書記找他談話說，毛主席說啦，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你現在又不教書，就當一個右派吧。這位教師問，當右派沒甚麼麻煩吧？那位支部書記說，你不當就得讓別人當，求求你就當一個吧。老教師無奈地答應了。誰知這位老教師當了右派以後，被發配到了青海，弄了個妻離子散好不淒慘。

當時，看似一聲令下萬民響應，無人敢於反抗，實則各懷恐懼，眾人早已離心。這恐怕也是文革伊始，各地造反派蜂湧而起的重要原因。難怪中共元老李富春說：「17 年我們的欠賬太多了」。豈止是欠賬？中華文明幾千年形成的「仁義禮智信」優良傳統，被「你死我活」的殘酷階級鬥爭和「假大空」的誤國之言掃蕩的幾無存身之地，才是中國這個素以「禮義之邦」聞名於世的國家的最大悲哀！

1973 年初，我收到母親來信，說父親病的很重，自去年 10 月底從寶雞峽工地回來就住院了，怕我耽心就沒敢告訴我。我立即回到西安，見到一頭白髮、滿目蒼涼的母親和一臉病容、骨瘦如柴的父親，不由得淚流滿面。我深感自己作為人子的不孝，對不起養育自己成人的父母。我把自己一年來攢的二百元錢交給母親，以彌補不能侍奉老人之罪，同時，盡可能為父母做些需要做的事，特別是為父親寫申訴信、找上級領導機關。

因受父親挨整的牽連，大妹一諾自西北工業大學飛機製造系畢業後到化工廠當了工人，弟弟一諫自部隊轉業後到自行車廠當了工人，二妹一謙

【164】杜潤生 (1913-)，山西太谷人。1936 年參加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後任國家農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和三妹一謀去農村插隊當了農民，小妹一詒同班這一屆全部分配在城市，而她卻被貶到農場勞動。舅父被鬥死後，舅母帶著孩子孤苦度日，鄰居都同情地說「她比祥林嫂還可憐！」。姨夫幾經抄家、無數批鬥，一家人都也進了另冊。

大表姐李仁是十姑陳玉潤和十姑父李子俊的大女兒，人漂亮聰明能幹，一直是我們親友中的驕傲，她讀大學時就當了人大代表，後任陝西師範大學團委書記，文革中也被鬥的死去活來。表姐夫郭笙讀雲南大學時投奔延安，在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江隆基手下工作，和大表姐婚後，到陝師大任教育研究室主任，文革中也是首當其衝的受迫害對象。我到陝師大去看望了表姐、姐夫和乾爹高元白。

晚飯時，表姐夫請來了他的好友孫達人^{【165】}。孫達人為人好學多思，一直研究農民問題，1965年寫的《怎樣估價讓步政策》曾受到毛澤東稱讚。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批鬥，妻子不堪受辱而自盡。他聽我談了河南農村和農民的情況認為：各地會有差異，但脈絡大體相同。農民只種糧食不務它業，拴死在土地上絕非出路。他對我建立農村教育科技網培養人才很為贊同。高元白伯伯任陝師大中文系主任，文革一開始就受到衝擊，人顯得蒼老多了。

春節後，我去看望北大老友侯漢清^{【166】}，他是一個真誠敦厚的人，現已調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記得他做為中國第一個圖書館系研究生，和化學系高才生的妻子俞良雲，剛畢業時分配到陝西東南山區商洛中學教書，我去看他們時感到實在是太大才小用了。我們聽說8341政委楊德中^{【167】}被貶到咸陽軍分區當副政委，我們便一起去拜訪。他人瘦了一圈，顯然受了什麼委屈。在北大時，我和他提起姨夫，他說：「那是我們渭華暴動的領導人，我當時只是個紅小鬼。」我們感到他人很實在，所以在他落難時去看望。以後他又回京到8341當政委，我和漢青也先後回京，卻再也沒去找過他。

另一個北大老朋友王七一講了他的故事：他中學時的老同學楊夢雲愛上了他，可他卻愛上了吳春艷。雖然楊夢雲文革中當上了陝西省革委會副主任，王七一並不為所動；而吳春艷的父親曾參與殺過毛澤民，這在

【165】孫達人（1935-），浙江富陽人。他在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時，發表了「怎樣估價讓步政策」；文革開始，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後來當了陝西省副省長。

【166】侯漢清（1943-），山東臨清人。就讀北京大學時，不滿聶元梓的胡作非為，而成為「井岡山兵團」頭領。中國首屆圖書館學研究生，現任南京農業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

【167】楊德中（1923-），陝西渭南人。曾任中央警衛團政委，時任咸陽軍分區副政委，後任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當時可是個了不得的罪名，但王七一毫不介意，對吳春艷始終如一。而王七一有一次寫信，落款「王七一」有些連筆，又誤被安全部門當成了「五七一」，審查了了許久，因為那時正清查林立果的「五七一紀要」。他生氣地和我說：「共產黨真他媽的扯蛋！」

3-11 「不把人當人看，才會幹出這種事啊！」

1973年春節過後，我趁機西行，去參觀了敦煌石窟，莫高窟的唐宋木構窟窟實為稀世之珍，令人歎為觀止。在蘭州聽北大老同學談起，張仲良^{【168】}主政的「困難時期」，1100萬人的甘肅竟餓死了120萬人！超過全省總人口1/10。回程時，我先後參觀了陝西的黃帝陵、始皇陵、華清池、兵諫亭、茂陵、昭陵、乾陵和碑林、半坡博物館，並在黃陵縣、臨潼縣、興平縣、禮泉縣、蘭田縣、戶縣訪問了不少村莊和農戶，純樸的農民向我講了他們的境況。

我還和老朋友李仲學一起去了離西安不遠的終南山，據說那裏有上千個修行的世外高人。我們饒有興味地拜訪了幾位仙風道骨童顏鶴髮的老人，他們住在自己修建的草房子裏，吃的是自己耕作種的糧食和蔬菜，穿的是在農村集市上買的土布做的衣服，不聞塵世的喧囂，每日修道參禪。一位老道人說：「北望長安，紅塵滾滾，繁華如夢；終南山下，古剎鐘聲，明心開悟。」令人深思。記得還有一位百歲以上的修行者和我說：「你天生有道眼，望好自為之！」

顯然，自古富庶的「八百里秦川」的農民，日子比河南的農民過得好一些。但最窮的隊一天工分也就兩分錢，依然很窮。在興平、禮泉、咸陽和農民聊起來，他們大多說「生活沒解放前好。」問：「為啥？」回答：「都是大躍進神吹冒料，給弄瞎咧！」再問：「這幾年咋向？」回答：「左一個運動，右一個運動，誰還好好幹活！能混口飯吃就不容易了。」

而後，我去看望了關在華陰榮軍療養院養病的四哥陳一謙，他參加志願軍後在文工團擔任主演，回國後即因「狂妄自大」被當作精神病人關在了這裏。當年那個能唱能跳才藝出眾的四哥，早已變成了一個滿嘴胡言亂語蓬頭垢面的中年漢子。他見到我，似識非識地嘴裏還不斷發出喃喃的聲音：「我沒罪，我沒有罪！」他的遭遇實在令人痛惜不已。

我又去看望了三妹一謀，她先在彬縣插隊三年，後被十三冶金建築公司招工到華陰當了鑄工。一個女孩子面對諾大的熔爐，每日裏因翻砂吸入

【168】張仲良（1907-1983），陝西耀縣人。在其擔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期間實行極「左」。

鉛粉，先後幹了12年，後來得了肺矽病，一說話就咳嗽，還常發低燒。二妹一讜在千陽縣插隊，幹活不怕累不怕苦，總是評為先進，但兩次招工、上大學已錄取，均因父親挨整，「政審不合格」被取消了。家人不幸，國人不幸，不知何日方到盡頭？

懷著對家國不幸的不安心緒，我順路去華山，拜謁先祖陳搏修煉之地。山下的玉泉院，原稱「希夷祠」，已破敗不堪。與院中幾個道人聊了一陣子，覺得他們並沒有什麼真正的道行。經王猛洞、回心石到山腳，登千尺幢、百尺峽和老君犁溝到三元洞，天上飄起了雪花，幾個同行的年青人都知難而退了。只有三個朝山進香的老婦人徑直往蒼龍嶺登去，可見人有追求就會產生力量。我追上她們一問才知道，三人中最年輕的已78歲，不一會兒她們已消失在大雪中。

我登上峰頂時已是夜色迷茫，地上冰雪覆蓋，四周渺無人跡，跌跌撞撞走了許久，順著一縷燈光到了西峰氣象站，在那兒求宿了一夜。凌晨趕至朝陽洞觀日出，玉女峰看弄玉吹簫處，觀兒視諸峰、南天門、長空棧道、捨身巖、老君掛犁處、鶴子翻身、下棋亭，最有趣的當屬「老君肚臍眼」。華山的鬼斧神工讓人留連忘返，西嶽奇險果然名不虛傳。回河南途中我在洛陽參觀了龍門石窟，高大、莊嚴的「大蘆舍那佛」令人起敬。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繼續「九大」的左傾路線，毛澤東的「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的講話讓人不寒而慄，國家就這麼不斷亂下去嗎？而「九大」、「十大」代表的「一致歡呼」簡直和羅莎·盧森堡當年批評列寧說的「領袖專政的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只能成為歡呼的機器」毫無二致，看來獨裁製度走上這一步並非偶然。社會主義先驅的預見都被蘇聯和中國的實踐所證實。

回到駐馬店，收到了貴州都勻孫方明寄來的幾篇他寫的文章，都是結合現實評論歷史的，很有見地。特別是《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一文，對梁效、羅思鼎（「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批儒評法」的錯誤觀點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後來，我印了三十份送給朋友們看，大家都認為寫的好。孫方明是羅小朋介紹給我的一個朋友，在貴州都勻麻袋廠當醫生。一有空就鑽研各種典籍。

年底，孫方明介紹一位女士顧健來拜訪我。她為人，熱情多思，而且願意和我交個朋友，我感到她聰敏賢淑，也表示可以。我們一起去了北京和西安，一路走一路談，還挺有共同語言的。但等她回到貴州後來信，卻表示「自己到了一個難以勝任的位置」，我怎麼能勉強人家呢？就回信請

她慎重考慮。她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我雖感到可惜，也只能同意她的選擇了。

在京期間我去看鄧英陶。正巧他父親鄧力群^[169]和母親羅立韻也從石家莊幹校回來了，他們住在一間只能放一張大床和一個五斗桌的小房子裏。這時我才知道，鄧立群去幹校前是《紅旗》副主編，被陳伯達^[170]打成「反革命」在石家莊勞動。我向他介紹了河南農村的情況，他非常認真地聽，並給我介紹了正在河南的吳南生^[171]。我又請他們父子在吉祥劇院看了李世濟主演的《鎖麟囊》。

我和鄧力群、鄧英陶一起看望了胡耀邦，並談了很長時間。在胡耀邦家午飯時，談起了「男女平等」，耀邦叔叔說：「我在延安時，有一天，一個年長的朋友把我和一個年齡相當的女孩鎖在一個窯洞裏，我倆各在一個角落蹲了一夜。第二天那個朋友打開門直搖頭，指著我們說真是『傻孩子』！那時講男女平等，好像結婚都要年紀一樣，根本不懂男女生理不同。解放後出問題了，男人40多歲正在性旺盛期，婚外情、第三者都來了。」力群叔叔說：「我看，女人懷孕生孩子，男人長乳房餵養，男女就平等啦！」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來。

1974年1月，「批林批孔」開始不久，即傳出江青的「批周公」，矛頭是指向周總理的，但這種指桑罵槐似已是強弩之末。有趣的是，供批判的《三字經》、《弟子規》，反被不少農村學校當做教材。駐馬店地區兩派籍「批林批孔」鬧的很凶，一派猛攻另一派已擔任地委宣傳部副部長的李秋萍有「歷史問題」。墨林派我和文教局人事科長李如穎「外調」，正好可以避開是非之地，又可以去各地轉轉看看。

我們二人先到信陽雞公山上「避暑」了幾天，整理各種資料。而後到了大悟縣、應城縣和安陸縣，最令人捧腹的是火車一到孝感，就看見牆上醒目的大標語：「全黨動員，人人動手，全黨搞雜交，人人搞雜交！」（「雜交」係指雜交水稻）。在宜昌見到了北大老同學俞啟義和魏秀芬，據他們說湖北「困難時期」餓死了140萬人以上。

[169] 鄧力群（1915-），湖南桂東人。1936年參加中共，曾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秘書長、《紅旗》雜誌副主編，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部長。

[170] 陳伯達（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參加中共，曾任馬列學院副院長、毛澤東秘書、《紅旗》雜誌主編、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被開除黨籍。

[171] 吳南生（1922-），廣東汕頭人。時任中共河南省委調研室主任，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

接著，我們到了岳陽，在岳陽樓品嚐了鮮美的洞庭金鯉。南下長沙遊覽了橘子洲頭，在衡陽登了南嶽衡山，聽遊人說湖南「困難時期」餓死了220萬人。往西南行至柳州，到雒容農場提問「犯人」，才知此農場是一個軍事管制的勞改農場，關押了十萬「犯人」，均為各種犯罪的軍人，上至師長下至士兵，各種不滿現狀、違法亂紀的人都有。

到南寧去看望王飛欣。飛欣的父親王奎先^{【172】}將軍住在兩層的小樓裏，他把我拉到二樓關上門，語帶激憤地說：「殺人殺的邕江的水都堵住發臭了，又五塊錢撈一具屍首。全省殺了30多萬人啊！不把人當人看，才會幹出這種事啊！真是罪孽，怎麼向老百姓交待？中央怎麼能縱容這樣胡作非為！」原來老人說的是韋國清支持的一派「聯指」亂殺另一派「422」，40多萬人都當了枉死鬼。

我和李如穎商量，反正回去也沒甚麼事，不如在外邊多轉轉。我們先到廣西桂平看了洪秀全起義的金田村；又拐到桂林和陽朔玩了兩天；再到貴州安順看了黃果樹瀑布。往南到了紫雲縣，這裏雖然山青水秀但百姓依然困苦。我還花三塊錢買了一隻小猴子。一路上，這隻小猴子上躡下跳的，可把我折騰苦了，火車到武漢，只得把牠賣掉了。這次外出，感觸良多，看來「外調」倒是個瞭解民情的好機會。

外調交差了，李秋萍沒什麼問題，但兩派仍在相互攻擊。反正也沒什麼正經事可幹，我趁機去江西看望小朋，順便請已復職的羅朋^{【173】}叔叔介紹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情況，能感到老人是個理想主義者。而後，我到了上海，先拜見大哥一訥和大姐一詠，接著到興國路看望沈灌群、石淑儀兩位老人和達非妹妹。老人喪女之痛的陰影仍能依稀感到，對我的關愛和憐惜溢於言表。

達非妹妹人很聰慧恬靜，長的比姐姐還要俊俏，正在崇明島插隊當農民。自到農村後，每年我們總會通一兩封信，彼此內心都有好感。我們四目相對，手握著手，促膝而談，心意相通，很是投緣。突然，她頭一低，壓低了聲音說：「你已經害了一個，還想再害一個嗎？我還得奉養二老。」我感到心頭像挨了一悶棍，是啊，我遠在河南，前途未卜，怎可讓她再跟我受罪？我鬆開了手，收斂心神，連忙說「對不起！」

第二天一早，我送達非登上了開往崇明島的渡輪。她站在船頭，靜靜地，低著頭，雙眼噙著淚，手絞著衣襟兒，隨著渡輪緩緩遠去了，我悵然地離開了碼頭。順路到蘇州遊覽，在獅子林、拙政園、西園寺、寒山寺、

【172】王奎先（1916-2003），安徽霍邱人。時任廣西軍區副司令員。

【173】羅朋（1915-1995），廣東番禺人。時任江西共產主義大學副校長。

虎丘玩了三天。又到無錫梅園、蠡園、寄暢園、鼇頭瀆玩了兩天，想起當年范蠡攜西施隱於太湖，何等愜意。突發思古之幽情，歎而今之磨難，想到後漢李固所說：「自有生民以來，治世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遂打點起精神繼續前行。

我又乘興參觀了宜興善卷洞、張公洞、靈谷洞。到鎮江甘露寺看了劉備招親處、試劍石，又參觀了金焦二山，特別是與金山寺老和尚談禪，他說：「施主乃紅塵中人，然常存佛心，十分難得。老衲送施主一偈語：『他大你比他還大，他小你比他還小。』望自悟之。」令人深思。北上揚州，參觀了瘦西湖。在南京看望了二姐一詵，又遊覽了中山陵、雨花台、燕子磯、玄武湖、莫愁湖和秦淮河。

1974年4月，我在鄭州拜會了幾位前輩和友人。有父親的老友河南水利廳總工程師李賦都^{【174】}、羅朋叔叔的戰友河南糧食學院黨委書記林朗天^{【175】}、河南省委調研室主任吳南生、河南豫劇團小香玉^{【176】}、鄭州國棉六廠王道明，聽到他們不少有益的見解和建議。吳南生告誡我說：「在農村做調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到村莊和農戶，多年後，閉上眼睛也能想起不同類型農村的基本情況。」

林朗天是羅朋叔叔的戰友，只記得他熱情地請我吃家鄉廣東的「沙蟲」，他還有兩個漂亮動人的女兒。可一提起當前的左傾，林朗天叔叔就氣不打一處來，說「再這麼搞，共產黨就完了！」小香玉是豫劇名角常香玉的孫女，駐馬店文教局的同事楊正常，介紹她給我唱了幾齣戲，沒想到她小小年紀，唱的《花木蘭》、《楊家將》總好像不斷在耳邊迴響。在枯燥的生活畫面上，平添了幾許美妙的色彩。

王道明是鄭州國棉六廠的工人領袖，為人豪爽仗義，朋友極多，是他最早使我知道了國營企業的狀況。他的夫人小高是廠裏的勞動模範，她耿耿地說，文革前廠裏一個工人一個月只出兩匹次布，現在一天要出8匹，這麼下去怎麼行呢？損失都是國家的。王道明找來了幾個國棉廠的工人聊了聊，他們都對當前的情況憂心重重，希望能盡快改變。遺憾地是，王道明後來被作為造反派「清算」了。

【174】李賦都（1903-1984），陝西蒲城人。時任河南省水利廳總工程師。

【175】林朗天（1916-1995），海南島北海人。時任河南糧食學院黨委書記。

【176】小香玉（1965-），河南鄭州人。為豫劇名角常香玉的孫女，後為國家一級演員。

北大校友金觀濤^{【177】}與劉青峰^{【178】}調到鄭州大學任教。金觀濤出身書香門第，多才多藝，文革時一直「觀濤」；劉青峰是教育部副部長劉仰嶠的女兒，聰明可人，文革中當過王任重的聯絡員。他們的可貴之處在於，和大多端起鐵飯碗只埋頭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不同，總在不斷思索中國的出路。觀濤興奮地告訴我說：「10年之後，我要用控制論代替毛澤東思想！」我雖未贊同，卻很欣賞他的雄心。

3-12 王墨林和駐馬店農業勞動大學

回駐馬店前，我在鄭州火車站餐廳吃飯時，一個乞丐從後邊往我吃的麵條裏連吐了兩口痰，我剛氣得要斥責他，他竟撲通地跪了下來，說：「我們村沒得吃。只能出來討飯，我實在餓極了。這碗麵就給我吃吧？」看著他沒幾口就把麵狼吞虎嚥地吃完了，我又買了5個火燒，送給了他3個，他再三感謝地走了。想起1946年途經鄭州，也曾遇到過類似的場景，父親也是給要飯的乞丐買了幾個火燒。

1974年5月麥收時，因過於勞累，我發高燒住進了醫院。可能打的吊針沒有消好毒，兩條腿都紅腫了起來。我被送到鄭州，住進了省立醫院。治療了20多天後，兩腿的紅腫倒是消退了，但兩腿的靜脈血管卻都硬化了，每天要倒吊在病床上。醫生說，你這是「脈管炎」，需要將這兩條嚴重曲張的靜脈血管從小腿到大腿都截掉，重建下肢側枝循環才行，不然，腿會壞死的。我心想，自己年紀輕輕，這怎麼行呢？就沒有同意。

朋友介紹說，北京廣安門醫院石晶華大夫治療脈管炎很有效，我回到北京請石大夫看了幾次。又聽說，德勝門外蘇一趙很神奇，我也找他看了。似乎效果都不甚明顯。王飛欣給我介紹了他同學的父親張協和，據說張協和在延安時曾給毛澤東、葉劍英治好過病。張協和給我看了兩次，為了酬謝他，姑母將從故宮買的兩塊明代的胡開文松墨送給了他。據說，他後來用一塊就與黃胇換了一幅畫的驢子。

我帶著三個醫生開的藥方回到了駐馬店。吃了1個月，沒什麼起色。怎麼辦呢？我心想，恐怕光靠藥力不行，還要靠自己增加身體的抵抗力。

【177】金觀濤（1947-），浙江義烏人。其1965年進入北京大學化學系讀書時，即對黑格爾有所研究；調入鄭州大學後與劉青峰形成了「中國社會超穩定系統」的假說；到《自然辯證法》雜誌當編輯時，與包遵信創辦了《走向未來》叢書；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78】劉青峰（1947-），山西岢嵐人。1965年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轉入中文系；調到鄭州大學後，與金觀濤一起對中國的現狀和歷史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他們以文學形式推出的《公開的情書》即在青年人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了《二十一世紀》雜誌。

我開始每天下午慢跑一小時，慢慢地似乎效果不錯。醫生知道後，再三勸我說：「脈管炎一定要靜養，千萬不能再跑步了。」可是跑步有利於血脈流動啊，我仍然每天堅持跑步。兩個月後，我嚴重的脈管炎竟奇跡般地好轉了。

8月初，地委宣傳部長王墨林打電話讓我去他家一趟。他住在地委專門為常委蓋的小院裏，一座二層小樓住一戶，十分漂亮。夏季的淮北驕陽似火。騎自行車到他家，已是汗流浹背了。一見我，他說：「快進屋，吃幾塊冰鎮西瓜。」他已50多歲了，胖胖的身子，搵著扇子，還全身冒汗。他說：「有一件事，不知你願不願意幹？」看他興奮的樣子，我問：「什麼事讓您這麼高興？」

他說：「確山縣有一個農場，有600多畝地，辦不下去了。我想，把它辦成駐馬店地區農業勞動大學怎麼樣？」這幾年我在農村跑來跑去，深感貧困的農村需要各種人才，可大學畢業生又分配不來，只有靠自己辦學培養這條路。是個好機會，我心想，墨林這份對農民關心的情懷，就不容你推托，立即說：「太好了！農場能接過來嗎？」墨林說：「地委還沒定。找你來，就是想明天一大早，我們去考察一下。」

第二天，小吉普開了一個半小時，到了確山縣瓦崗公社南端的農場，墨林先找農場的負責人談了情況。午餐後，又找了附近四個大隊常莊、貫台、衝口、盧莊的支部書記常大全、李學、程明倫、張文煜座談了一下。原來這個農場是「大躍進」時辦的，有600多畝河灘地，幾十間房子，處在四個大隊中間。因經營不善，又和農民糾紛不斷，而致連年虧損，辦不下去了。

農場西邊有武漢軍區的158靶場，西南是老洛山林場。看來，只要和附近4個大隊搞好關係，這裏還真是個辦農校的好地方。晚上墨林問我：「怎麼樣？」我說：「不錯！」墨林說：「你給地委寫個報告，把地區辦農校的重要性和怎麼辦寫清楚給我。」說實話，當時農村很需要像「抗日軍政大學」式的、類似程莊那樣的學校，但生產技術和社會調查課程要加強，不能以勞動為主。

三天後，我把起草的報告交給了墨林。一周後，墨林告訴我，地委已經批准。問我願意不願意去創辦這個學校，為辦學時得到附近大隊的支持，還需兼任學校所在地瓦崗公社書記。這幾年，我一直在想辦法為農村培養人才，創辦這所學校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在公社兼職還便於深入基層瞭解民情，我立即答應了。墨林又調來正陽縣委宣傳部蔣副部長協助我，並調配了若干教師。

我開始主持制定了「駐馬店地區農業勞動大學」的各種教學、科研和生產計劃。9月1日，從全地區選拔的200多名學生入學了。我作了新生入學的動員報告，學生們一個個興高彩烈。學生的第一堂大課是「秋收秋種」，由地區農藝師講解，怎樣根據天時、地利種冬小麥，如地溫多少度、陰坡還是陽坡、壤地還是崗地，冬性品種還是春性品種，何時下種及下種多少，學生們聽的都很認真。

同時，我請4個大隊的幹部和各生產隊隊長也來聽聽課，有不清楚的問題當場解答。課後把學生分到4個大隊去實踐。學生們很興奮，個個摩拳擦掌。幹部們也很高興，一下子一個大隊多了50個壯勞力。那一年的秋收秋種比往年提前完成了。學生們回來後是提問、討論、總結，每個人都覺得這樣理論和實際結合，比只在課堂上聽課收穫大得多。

學生的第二堂大課是「調查研究」，每個學生在一周內調查3個農戶，瞭解這裏農民生產、生活的現狀、問題和要求。學生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教師隨時給他們指導，比如：選擇甚麼樣的農戶才有代表性？怎樣作農戶的家計調查才真實？怎麼和農民交往他們才會說心裏話？等等。一周後學生每人作彙報，先個人在小組彙報，小組再向班裏彙報，每班選3個人向全校彙報。

這次的彙報討論可真熱鬧，有說「政府徵購過高，政策多變」的，有說「幹部大吃大喝，作風惡劣」的，有說「幹活大忽隆，出工不出力」的，有說「以糧為綱，其他掃光」的，也有說「孩子上不起學，生病看不起病」的，等等。我們就引導學生討論「你當支部書記應該怎麼辦？」，研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把學生學的理論、技術與解決現實問題結合起來。

繼夏季小麥豐收之後，秋季大豆、玉米、紅薯也都豐收了。走到哪裏，人們臉上都洋溢著喜悅。我每周和四個大隊支部書記討論一次，像如何改善幹部作風、如何提高生產效率、如何發展多種經營、如何幫病困家庭解決看病、上學問題。年底時，幾個支部書記誠懇地說，陳書記能在我們這兒幹個三、五年，我們一定會脫貧致富，幹部要都能像您這樣就好了。

和幾個農村支部書記熟悉了以後，他們說起農村幹部的甘苦，與我在新蔡聽到的幾乎差不多。他們對1956年以後的各種運動十分反感，說：「許多抗日時參加革命的老積極分子都要求退黨。嫌共產黨一進城臉子就變了，不為窮苦人著想了。當官的誰不給自己撿？吃喝了老百姓，還坑害老百姓！我們多年都沒有見過像您這樣，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幹部了。」

我自己感覺，在農村基層和老百姓、幹部打交道很舒暢，心裏有甚麼就可以說甚麼，只要自己平易近人，他們就會把你當自家人，甚麼話都願意和你說。在農村的五年，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和幹部給了我無數的教益，使我學到了在書本上學不到的許多知識，也改變了我把理想當作現實、用書本生套社會的思維方式，明白了只有弄清「現狀」和「問題」，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和農大比鄰的是武漢軍區 158 靶場，一天靶場的徐政委請我吃飯。靶場內一排排整齊的紅磚瓦房，受訓的幹部、戰士一隊隊正在操練。徐政委一邊勸酒一邊上菜，酒當然是茅台，菜先後竟上了五十多道，全部是野味，烹調的也不錯。最稀罕的是熊掌、老虎肉和一些山珍，真有些暴殄天物。據徐政委說，這全是學員繳獲的戰利品，山裏什麼珍稀動物植物都有。我心想，真可惜這些珍貴的資源啊！

3-13 「書記不如老鷲，不如老鷲！」

1975 年夏糧又是豐收，秋莊稼因為長勢喜人。地區農大周邊四個大隊中，以貫台大隊條件較差，耕地大半在山坡和山溝裏，我選擇這個隊蹲點。常莊大隊半在山裏、半在河畔，條件強於貫台。衝口和蘆莊兩個大隊土地肥沃，產量也高。四個大隊支部書記中，以常莊常大全和貫台李學兩個人比較能幹。一天，我正在農大開會。常大全笑瞇瞇地來找我，請我到他家吃晚飯。我問他為什麼？他詭秘地不說。我知道這個歷經滄桑、勤勞能幹的老支書一定有什麼事，就答應了。

走到他家，天剛濛濛黑。他家門前，放著一個小方桌，幾杯茶。幾個客人都到了，有李學、程明倫、張文煜幾個支部書記，還有當地著名的抗日勞模白老太。看我來了，大家都站了起來。大全快八十歲的老娘也從堂屋邁了出來。我趕忙迎上一步，笑著說：「大娘，您老人家好啊！」她顫微微的手摸著我：「好哇，好哇！大全常給我說，你這個北京來的幹部不一樣，不吃請、不受禮，整天為我們窮苦人操勞。」寒暄了幾句，大家就圍著小方桌坐下了。

大全端起酒杯，突然興奮地大聲說：「掌燈！」只見大全房前屋內一片通明，整個村子都歡騰起來。我站起身一看，原來常莊大隊通上電了，遠處幾個村子也能看見電燈的光亮。我詫異地問大全：「你怎麼這麼大本事，一下就讓全大隊都通上電了？」大全滿臉正經地說：「靠關係唄！」我說：「去年我剛來時，在縣裏開會，就和縣委幾個領導談過，貫台、常

莊兩個大隊很多莊子在山上，老百姓盼望能通上電。以後又提過幾次，縣委領導一口應承優先考慮，至今都沒有下文。你本事可真大！給我說說，你有什麼過硬的關係？」

大全說：「陳書記啊，這就是你們北京人不知道的了，我主要靠張寶林、王香花夫婦幫忙！」我不解地問：「他們怎麼權力那麼大？我怎麼不知道這兩個人啊！」大家嘴裏的酒飯都噴了出來，哈哈地笑做了一團。大全說：「入鄉問俗嘛！『張寶林』是張弓大曲、寶豐大曲、林河大曲，『王香花』是王八、香油、花生米。都是俺們這兒的特產。」我這時才恍然大悟，連忙說：「大全，講講怎麼搞的？」大全喝了一口酒，得意地說：「我知道您誠心為我們辦事，可這種事大半靠正經渠道辦不成，與其等到猴年馬月的，還不如自己想想辦法。」

他又抿了一口酒，接著說：「眼看秋收在望，我算了算，隊裏攢的錢夠裝電的了。就坐上小手扶，帶了3箱『張寶林』、100多王八、100斤香油、100斤花生米，上縣裏了。先找書記批了條，再到生產指揮部批條，最後找電業局長辦。一路暢通無阻，一天事就辦好了，不到一個月設備就都齊了。現在，除了深山的兩個村子，其他十幾個村子的電都通了。呵呵，喝酒，喝酒！」我祝賀他們通上了電，也連喝了幾杯，心裏卻感到這酒喝進肚裏十分苦澀。四個大隊只有我蹲點的貫台大隊不通電了。

憨厚直爽的李學看出了我的心思，說：「陳書記啊，如今這世道，書記不如老鱉！」大家又轟地笑了起來，笑聲中都帶著幾分尷尬。我趕忙打圓場，感慨地說：「是啊！書記不如老鱉，不如老鱉！」幾杯酒下肚，大家話匣子打開了。你一言我一語地說個沒完，大多是感謝我教他們「科學種田」，也奇怪我這個城裏人怎麼懂種莊稼，聊得很有興致。

確實，這幾個大隊每年小麥畝產二、三百斤，好年景時也不過三、四百斤，今年畝產達到五、六百斤。玉米從畝產四、五百斤增加到八、九百斤。棉花從畝產一、二十斤更增加到八十多斤，我親自管的試驗田達到一百五十多斤。我說，我當「反革命」到程莊勞動鍛煉，在那裏學了「科學種田」，又看了幾本書。去年我剛來時，讓你們陪著一個一個村子跑，既瞭解了民情，又考察了地力。還給你們講「科學種田」的道理。其實，人勤地不懶。你們上心，加上老天爺幫忙，今年才會豐收。

半天悶頭喝酒不說話的白老太開腔了：「現在這年頭，為我們老百姓操心的幹部可不多見了。誰都是當了幹部，就給自己撈一把。自己沒撈夠，還忙著幫子女撈。你看，每年招工、招軍指標，都讓公社領導包了，連大隊幹部都輪不上，更別說我們這些平頭百姓了。」我趁機問：「聽說您

抗日時可積極了，劉少奇在竹溝時，您還入了黨。怎麼，現在什麼活動也不參加，20多年也不交黨費？」

老人一下激動起來，說：「那時，共產黨說打鬼子、打國民黨，說是為窮人打天下，我當然積極。可一進城，臉子就變了。什麼統購統銷反購產，大躍進放衛星，大煉鋼樹砍光，大食堂喝稀湯！一個村子一個村子，餓死那麼多人，我也差點見了閻王爺。老百姓苦，他們當幹部的也一碴碴挨整，沒少遭罪！溜鬚拍馬的爬上去了，好人都整的差不多了。交黨費？我早就要退出來，他們不讓！」

大全連忙勸他：「您別說了，犯忌！」老人紅著臉站起身來說：「我怕誰？我又不當官兒，犯什麼忌？！你們喝，我不奉陪了！」轉身頭也不回地走了。大全忙著打圓場，說：「唉，他這強脾氣，直筒子，這些年沒少挨整，就是改不了！」望著白老太遠去的背影，我不由生出了幾分敬意。從此以後，白老太的身影總不斷在我心頭閃現。

瓦崗公社屬確山縣，秋收後我在全公社十五個大隊轉了一圈兒，顯然自然條件優於新蔡的澗頭公社，西南為伏牛山、桐柏山餘脈，境內溝壑縱橫，屬淺山丘陵區。可惜實行「以糧為綱」後，宜於發展的中藥材和板栗等大部砍光，豐富的礦產資源尚未開發。這麼優越的條件，大部分百姓的生活也僅得溫飽，少部分仍難以自足。所過之處百姓純厚樸實，都會用荷包蛋加白糖招待你，他們最愛說的話就是：「不怕你們吃，不怕你們喝，只要能給我們主持個公道就行了。」

每次回到公社駐地，都看見觥籌交錯、杯盤狼藉地大吃大喝。一瞭解才知道也真是無可奈何，地區、縣七八十個局委部辦來人辦事，若招待不周就會剋扣你應分的「指標」，再加上「檢查評比」、「擁軍愛民」等活動，公社的飯局、酒局真是百姓說的那樣「酒肉雞魚蛋，天天像過年，喝得醉醺醺，隔頓不隔天」。每見到公社老書記王光宇喝的醉紅著臉說：「實在是沒辦法！」我只能說：「理解。」

春節前我回到公社，打開門看見地上堆滿了各種年貨。一問，公社秘書說：陳書記，這是公社給您過年分的。我又問怎麼這麼多？他說：不多！兩個豬後腿是公社養豬廠的，50斤，第一書記60斤，副書記40斤，委員30斤，一般幹部20斤。魚是公社養殖廠的，第一書記9條，您8條，副書記6條，委員4條，一般幹部兩條。香油20斤，酒20瓶，煙10條，還有大米、芝麻、白糖和棉花這些東西，都是按級別分的年貨。

我看酒是茅台、五糧液，煙是中華，就再問，從哪兒能買到這麼好的煙、酒？他說，是用香油和棉花與駐軍換的，您放心，不會有違法亂紀的

事。我心想，這些東西最少也值個三百多元。我和公社秘書說：「我只要5條魚、10斤香油和煙酒，別的就不要了。」秘書說：「那您不要的交給我處理吧。」我說好吧，他高興地搬走了。春節過後，我3次問他年貨什麼時候交錢，他都說不著急。兩個月過去了，我又問。他把我拉到一邊悄悄說：「陳書記，每年過年，公社都給幹部分東西，從不收錢。您要交錢，大家怎麼辦？大家都拖家帶口的，收入又不高。您真要交錢，不是把大家全得罪了嗎？何況，各個公社年年都是這樣。」我心想，看來只能今後運動來了，自己檢查「四不清」嘍。就問那些我沒要的東西怎麼處理的？他說，您不是給我了嗎！我只能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3-14 鄧英淘、吳琰、楊小東、何念民們的精神

1974年4月，鄧英淘從北京到駐馬店來找我。他給我講了一段奇事：1970年夏天他扒火車、蹭汽車，從東北到東南，行萬里路，各地周遊，以開闊眼界，增長見識。8月20日到了廬山腳下，發現路已被持槍軍人守住，遂從後山巖壁攀援而上，不料被巡邏擒獲。原來，廬山正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把他當作刺探情報的「特務」，關到了廬山下的九江看守所。看守所裏邊關著各種各樣的人：有走資派，有造反派，有政治犯，有刑事犯，更多的是各地的盲流。從他們嘴裏聽到了許多書本上讀不到的故事，特別是官場的黑暗和民間的疾苦，激發起他進一步深入底層的決心。

我們雖相差12歲，卻很投緣，同吃同住，無話不說。他又帶來不少市面上買不到的書，我們一邊讀一邊議，談現狀論未來，很是投契。英淘飯量奇大，一天能吃3斤糧。我很訝異，他笑著說：「我在桃園一頓可以吃像包子一樣大的蒸餃108個！」幸虧我可以兩毛錢一斤在公社買到全國糧票，才不致挨餓。我建議他把「陶」改為「淘」，我說：「浪淘盡千古英雄人物嘛！」他後來就改叫「英淘」了，3個月後，他去了程莊農業勞動學校。秋收後，英淘景山學校的校友吳琰、陳雁二人也到程莊來參觀，對這所學校大為稱讚。

春節在北京，經鄧英淘介紹我和吳琰認識了。她20出頭的年紀，充滿了勃勃向上的革命熱情，為人豪爽正直。英淘告訴我，在桃園他給我搶包子時，就是吳琰出面和他吵的，插隊的男生都對她又敬又畏。原來，吳琰從小上香山慈幼院，以後上景山小學、景山中學，始終是班上的好學生。文革開始後，她父母親雙雙被打倒，她一下成了「狗崽子」，靠賣家裏東西換飯吃。

1968年，19歲的吳琰和同學一起到桃園插隊，幹活不怕苦不怕累，總搶在別人前面，深受當地農民好評。剛開春，地裏還沒化凍，一個青年農民激她說：毛主席說了「男女都一樣」，你敢跳到冰碴子裏犁地嗎？她二話不說，脫鞋挽褲就跳到冰水裏幹起來了。當時雖獲得農民一片讚歎聲，可她從此月經就不來了。她父親給她辦了「病退」回京，找了許多中醫給她調治，說她的脈像60歲的老人，黃體已經萎縮，今後很難生育。一天晚飯後，我們在故宮後門聊了3個小時。

她很豁達，對病毫不在意。但憂慮自己很難再為窮苦的農民做什麼了。對我為農村培養人才深表歎服，並表示她已存了200元，願捐給我們辦學，我當然不能收，勸她好好養病，來日方長。1975年3月英淘告訴我，吳琰到程莊了。我趕去一問，原來她堅持來程莊，就辭去了北京162中教師的職位，並把戶口從北京遷到了這裏，弄得父母很傷心。我既責備又同情地問她，為什麼這麼做？也不來個信商量一下？都不給自己留一點餘地。

她含著淚說：「我要把有生之年獻給養育我們的農民，和誰商量都不會同意，就自己決定了。」我被她的犧牲精神深深感動了，拉著她的雙手不知說什麼才好。她依偎在我肩膀上，我們靠著草垛一直聊到凌晨兩點。一種又憐又愛的情愫油然而生，從此，我們相戀了。我再三勸她多動腦筋不要蠻幹，可她從來是日未出就搶先上工、日已落才遲遲歸家，每天汗水都會濕透她的衣襟，背上都是白白的汗漬。她艱苦奮鬥的精神，讓當地幹部群眾無不交口稱讚。

英淘到程莊後一直和農民同甘共苦，後來被選為生產隊長。他經常第一個起床敲鐘，帶領男勞力幹那些苦活、累活和技術活，農民們都很信服他。有一天，來了個穿軍裝的漂亮小姑娘找英淘，這一下在偏僻的農村引起了轟動。英淘以前和誰談過，誰喜歡過他，他喜歡過誰，我都知道，這個人他怎麼從沒提過？原來這個女孩叫王梅，是山東省委書記蘇毅然^{【179】}的女兒，正在軍中服役，從山東來看他。我說：「淘淘，你艷福不淺啊！」他竟害羞了起來。

我看英淘和吳琰每天都累的不輕，就和他們說，「將在謀而不在勇」，不能光當百夫長，要做萬人敵。成天光帶頭勞動不行，必須幫農民解決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告訴他們，在一個隊如何通過「社員情況表」弄清基本人際關係，如何進行「家計調查」摸清收支狀況，如何根據實際條件制定「生產規劃」，農民看到了希望，調動起了積極性，生產生活才會有

【179】蘇毅然（1918-），四川蒼溪人。中共山東省委原書記、中顧委委員。

大的變化。他們覺得有道理，以後也這樣做了。吳琰看了我在周莊生產隊做的「家計調查」，感動地跟我說：「沒想到在這麼個大轟大嗡的環境裏，你還能沉下心來，對農民的生計做如此細緻的調查，實在難能可貴。」我又和英洵、吳琰討論了如何提高農業勞動學校學生的質量問題，學生畢竟不同於農民，在校期間提高他們的基本素質至關重要，怎樣加強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能，需要很好的研究。

和英洵一起在山西原平插隊的楊小東，到新蔡來參觀程莊農業勞動學校。他父親許力群^{【180】}原來是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因為寫了《二月提綱》，要把吳晗寫的《海瑞罷官》當作學術問題討論，引起毛澤東大怒，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楊小東 14 歲就到農村插隊，苦於農民的貧困和沒有文化，他參觀了程莊農業勞動學校以後，主動在原平縣大方公社辦起了一個農校，專門培養農村青年人才。

這時，英洵、吳琰的朋友何念民也從北京來了。原來他父親何均^{【181】}是朱德的秘書，文革中也被打倒。念民技工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半導體研究所工作，受我們影響，也想到農村插隊鍛煉自己。我說：「農村生活很苦呵！」他說：「敢來，就不怕苦，認識中國嘛！」他考察了一番，第二年夏初，選擇了我所在的瓦崗公社北部半山區葉老莊大隊當了農民。

何念民在葉老莊幹了 4 年，1980 年又調回北京，到農業經濟研究所作研究。臨離開葉老莊前，大小隊幹部依依不捨，他放了一炮，說：「我看學大寨不是出路，還是你們說的『包產到戶』好！」結果，大家一下就把地包了起來。消息傳到縣裏，縣裏說「這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言論」，立即組織批判、滅火。但又有什麼用呢？葉老莊第一個在確山縣「包」了，其他隊也就紛紛起而效尤。

那時，到駐馬店探訪我的人很多，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但都是些憂國憂民之士。像軍隊幹部子弟王冀豫，外號「黑子」，他是在軍隊大院裏成長起來的孩子。文革開始不久，和一批大院子弟參加了「聯動」（指：由一批黨、政、軍幹部子弟組成的「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1967 年他 16 歲時在一次武鬥中打死了人，從此他逢人就懺悔。1975 年經胡繩^{【182】}兒子胡依朗介紹到駐馬店找我和英洵，探討中國的出路，後來他在北京開了一個馬場。

【180】許立群（1917-2000），江蘇南京人。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181】何均（1918-1989），安徽桐城人。曾任朱德秘書。

【182】胡繩（1918-2000），浙江錢塘人。中國著名哲學家、近代史專家。

曾當過首都三司司令的聶樹人，自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後，分配到青海工作。他返家探親路過，找到我說：聽說你在給農民辦些實事，很不錯。我是苦孩子出身，誰知響應毛主席號召「造反」，結果弄得洗不完的罪過。我也想到農村幹些實事。僅此一面，「清查三種人」時還查到了我，聶樹人後來判了刑。列寧說過，上帝允許青年人犯錯誤，可中國是只允許老年人犯錯誤，太不合情理了。

像英淘、吳琰、小東、念民這麼一大批人，出身高幹家庭，為當時「上山下鄉」的潮流所鼓動，紛紛到了農村基層。他們親身在農村中體察到了中國底層的落後與黑暗，感受到了中國民間的疾苦，這使他們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四人幫」垮台後，他們先後回城到了不同的領域工作，大多後來都成了促進中國改革的先鋒力量，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3-15 駐馬店的「塌天大雨」

從鄧小平的復出到提出「整頓」，使人們對結束文革以來的混亂局面，又產生了新的希望。我反覆思考，新創辦的駐馬店地區農業勞動大學如何辦才能培養出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人才呢？必須圍繞「提高教育質量，整頓教學秩序」做文章。我研究了抗大、江西共大和程莊的資料後，又帶人訪問了江西共大和遼寧朝陽，想從他們的經驗中尋找辦法。

我提出，「教學、科研和生產勞動三結合」，應以教學為主占 50%，科研占 20%，生產勞動不超過 30%。在教學中，30% 為基礎課，70% 為技術課。基礎課包括：「哲學知識」，重點教認識論和方法論；「經濟學知識」，教政治經濟學要點、工業和農業、農林牧副漁；「品德修養」，教做人基本品德；還有「農業學大寨」和「時事政治」，這在當時是必須有的課。技術課包括：當地主要農作物（小麥、水稻、玉米、紅薯、棉花）的育種、栽培、管理；林果、畜牧、養殖、土壤以及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等。科研不僅含農林科學研究，還應包括社會、農村和農戶調查分析。又經王墨林同意，我準備調英淘擔任了地區農大的科研組長，吳琰擔任了地區農大的教學組長。這時，我在駐馬店地區農業勞動大學和 4 個大隊幹的挺起勁。

記得 8 月 5 日吃完晚飯，不知來自何處靈感的啟示，我突然感到全身不寧、坐立不安，想起明天上午在駐馬店文教局有個會。我和王墨林說，要回駐馬店開會。他說，這麼晚了，算了吧。我堅持要回去。他就和我一起乘小吉普回駐馬店了。誰知天不遂人願，一場老百姓叫作「塌天大雨」

的暴雨傾天而降，剛建起的學校後來被洪水一掃而光。小車才開出了30分鐘，天突然變得漆黑，大雨傾盆而降。車過二五坡時，路面都是半尺深從天上潑下來的雨水，只能從路邊兩旁的小楊樹看出車走在石子路上。過一座漫水橋時，車熄火了，兩尺多深的水流沖的車身打斜。我和墨林跳下車來，全力從後邊推，小車總算又發動起來了。我們兩人衣服淋透了，都成了泥猴，但總算逃過了一劫。

回到駐馬店。我住在地區文教局辦公樓二樓，一樓已經進水半尺多了。事先沒有預報，誰也沒想到會下這麼大的雨。據說是南方的熱氣流和北方的冷氣流在駐馬店地區上空頂住了。3,000米厚的雲層，壓的天黑乎乎的像深夜，電燈不亮了，電話不通了，人也出不了門。雨連著下了三天三夜，1,800毫米的潑天暴雨傾天而降，街上的水都有1米多深。

8日早上6點多，墨林的車來接我，讓我和他一起去救災，說板橋水庫垮壩了。我聽了一驚。他又說：你真是個福將！要不是你要趕回來開會，說不定我們都報銷了。車開出駐馬店往遂平縣走，沿途的房子大多都塌了。遂平縣城洪水剛過，滿目蒼痍，到處都是淹死人和牲畜。據親歷者說，半夜兩點多，就像千軍萬馬奔來一樣，一兩丈高的洪水呼嘯而過，很多人在睡夢中就被捲走了。

後來聽彙報說，蘇聯專家幫助設計修建的「鐵殼壩」，所謂能抵禦「千年不遇」洪水的板橋水庫，8日凌晨水位達到118米，庫水爬過防浪牆，晚上1點時，7億立米的庫水傾瀉而出，掘地十幾丈，形成了一個喇叭口，排山倒海地向汝河兩岸席捲而下，吞噬了一個個村莊和縣鎮，京廣鐵路108公里被擰了麻花，50-100噸的油罐車都被捲進東邊的宿鴨湖裏。大熱的天，到處都發出死人死畜的惡臭。

災情不知會有多大，我們心情沉重地離開了遂平，又往別處轉了轉。下午3點，墨林通知我，乘坐剛開通的小火車，6點以前要趕到確山縣的武漢空軍李新店機場報到，召開救災會議。墨林和我登上小火車，裏面還坐著從鄭州趕來的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戴蘇理^{【183】}。戴蘇理一臉嚴肅，一言不發，鼻孔架著一幅金絲眼鏡，手上還戴著金戒指，一副居高臨下不可一世的樣子，讓人難以親近。

到站後，李新店機場的李師長、王政委把我們接到招待所住下後立即開會。會議由戴蘇理主持，主題就是「抗洪救災」。這時才知道，洪汝河上游數10座水庫相繼垮壩，洪水向四面八方奔襲，駐馬店地區盡成澤國，500多萬人頭頂驕陽被困在大水之中。但戴蘇理的一句「這次是天災，也

【183】戴蘇理（1919-2000），山西襄垣人。時任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

是人禍！」卻讓我詫異了許久，明明是不可預見的一次天災，為何說「也是人禍」呢？

從9日上午開始，墨林和我每天7點乘直升機起飛到11點回航，在地圖上標出需投放食物和藥品的地點，由空軍負責投放。因為疫情的蔓延，3天後改為一天起飛兩次，投放兩次。直升機可以飛的很低，每天見到的慘狀觸目驚心。水中漂浮的人畜屍首到處都是，一股股腐臭的氣味直衝機艙。直升機上只坐4個人，墨林、我和兩個駕駛。

從第二天起，我們也搬幾袋救災物品上飛機，看到幾個人、十幾個人困在房頂或小山坡上，就給他們扔下去。一次飛過宿鴨湖時，只見湖邊幾棵泡在水中的死樹上黑壓壓地爬滿了不知什麼東西，飛機低飛過去，一陣氣流衝擊，滿天竟飛起了數不清的手指甲那麼大小的綠豆蒼蠅。衝到湖邊的兩隻死水牛身上，爬滿了三寸多長的肥蛆，煞是嚇人。洪水圍困中的老百姓，真是慘不堪言。

根據我在救災過程中所知，這次洪災的損失是巨大的。洪水所過之處，河南、安徽兩省，沿著洪汝河流域，1,400萬人的家園盡毀；淹死的人多達14萬；大水過後，因瘟疫流行，病死的人多達15萬；一共死了29萬人！後來，有的報導說死人8萬、10萬，都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這次垮壩造成的損失和死人之多，在世界垮壩造成的水災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首先，這次洪災是一個未能預知的天災，氣象部門都未能提前預報出這場大雨。其次若從總結教訓入手，當從治水方針檢討，自1956年照搬蘇聯經驗「長籐結瓜」、批判歐美「水土保持」學派以後，中國的治水即走向了捨禹而就絲的方針，一座座水庫建成後又「重蓄水，輕治理」。如：洪、汝河河道處處都是「腸梗阻」，洪水一來小災亦會變成大災，駐馬店「塌天大雨」造成的慘劇即為典型。

事後，正是那個在「信陽事件」中搞「民主補課」大整基層幹部、又是「文化革命」中唯一倖存的極左副總理李先念^[184]，按照他製造階級鬥爭的慣性，大筆一揮，就把在駐馬店地區頗有民望的、時任地委書記蘇華抓進了監獄，充當了這次「人禍」的「替罪羊」。共產黨視人命為草芥不足為奇，出於政治需要對自己人也毫不手軟，各種事件中總會有人當「替罪羊」實在殘酷。

我倒是很幸運，在李新店機場又躲過了一次死劫。機場只有幾架北京調來的法式米八，這種直升機飛翔穩定、噪音小，另有十幾架從附近軍兵

[184]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黃安人。自1954到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許多「極左」的經濟政策均由其制定，故其一直對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

種調來的蘇式空五，一般勘察投放點都乘米八。有一天，米八都出航了，墨林和我上了一架空五。飛到新蔡上空，我突感心臟不適，胸悶地喘不過氣來，立即請駕駛員回航。墨林和駕駛員都勸我再堅持半小時，飛完臨泉就回航。我說不行，難受得很，馬上返航。誰知下機後到空勤灶吃完飯卻沒事了。這時，武漢空軍緊急命令，讓機場派機往安徽臨泉執行救災任務，我們原先乘的那架空五飛走不久就在安徽掉下去了。墨林說：「你可真是個福將，福將！」我心想：莫非冥冥之中真有神靈庇佑不成！當時，洪水未退，疾病和瘟疫已開始流行，不斷有人死亡，救災任務非常繁重。幸虧炸掉了班台閘，放走了上游 60 億立米的洪水，這樣困在水中的民眾才迅速減少。

3-16 三回北京和「小鄧小平集團」

駐馬店地區農大的房屋，因為上游竹溝水庫垮壩，都被洪水沖毀了，耕地也沖的七零八落，許多學生被洪水沖到了幾十里外，重建工作很不容易。英洵、吳琰已調來任職，制定了科研規劃和教學計劃，並且開始執行。每天晚上，我們都一起研究怎麼辦好這所學校。學生們大多已經返校，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迅速恢復。突然，縣委傳達了中央「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精神，顯然上邊又出問題了。

我和英洵、吳琰商量，立即去北京一趟，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先走了。那時，毛澤東批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的說法已在小範圍內流傳。途徑鄭州時，我和觀濤、青峰議論起這次運動，感覺中央的「極左」派中張春橋是個危險人物，要想辦法組織個「倒張委員會」把他搞掉。

到北京後，英洵給我拿來了她父親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和耀邦關於科學院工作的《彙報提綱》，前者指出：「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的很壞，而硬說革命搞的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後者則提出：「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應該說在當時很有針對性，卻又開始受到批判。看了幾個朋友，大家都對「四人幫」憤恨不已。

我去看望鄧力群，他已搬回新鮮胡同前院原來的住房，客廳內擺滿了書籍。我說：「鄧叔叔，老百姓都希望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你們寫的《論總綱》雖被批判，但很得人心。」他很高興地帶我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見了胡喬木、吳冷西^{【185】}、胡繩、熊復^{【186】}、于光遠^{【187】}、李鑫^{【188】}。他們聽說我當公社書記，很想聽聽基層的看法，我圍繞民心「求治怕亂」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們紛紛點頭，但似壓力很大。後來才知道「極左」派已開始找他們的麻煩。

吳琰告訴我：她父親從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林潤青^{【189】}等朋友那兒，聽到許多毛澤東批評「四人幫」的消息。如：1974年說「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又批江青「不要你組閣當後台老闆」；1975年又明確說「不要搞四人幫」，還批評他們整周總理「有野心」。聽的讓人很解氣。接著，又在幾個朋友那兒聽到類似說法，顯然「四人幫」很不得人心。

吳琰帶我去見了她的父母吳寄寒^{【190】}和戚雲^{【191】}。他們住在教育部後院紅頂樓。吳寄寒這時任國務院科教組的高教組組長，他為人不事張揚卻又古道熱腸，詢問了駐馬店農大的情況後，一再告誡我，學校辦得好壞，關鍵在教學質量。又帶我到他辦公室拿了些辦學資料，還向我介紹了他的副手、後來在武漢大學當校長一直主張教育改革的劉道玉^{【192】}。回河南前，我去看望了胡耀邦，向他說了人們的擔憂，他堅毅地說：「一定要相信人心所向！」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病逝，噩耗傳來人們無不悲痛。雖然追悼會上鄧小平致了悼詞，但「反擊右傾翻案風」明顯是衝著他的。孫方明從貴州來看我。他說，去年8月初，和錢理群一起來看我，被擋在了武漢，京廣線因駐馬店大水不通了，只得折返。我帶他到駐馬店農業勞動大學參觀，並和他交流了幾天。他又到程莊農業勞動學校住了一個禮拜，和鄭州大學畢業的米嵩山、劉大明以及縣科委崔慶美、李宗明進行了深入的交談。從此，我們成了要好的朋友。

1976年1月29日，我和吳琰在駐馬店登記結婚了。我們結婚只花了一元人民幣，買了一斤水果糖請大家吃。那時人們結婚，一般人是沒有錢購置東西和請客的。慚愧的是，我當時沒有一件像樣的禮物可以送給她，

【185】 吳冷西 (1919-2002)，廣東新會人。曾任新華社社長、廣播電視部部長。

【186】 熊復 (1915-1995)，四川鄰水壇人。曾任《紅旗》雜誌社總編輯。

【187】 于光遠 (1915-)，上海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188】 李鑫，曾任康生秘書，其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領導成員。

【189】 林潤青 (1922-2008)，福建連江人。其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國內組負責人。

【190】 吳寄寒 (1912-1977)，原名沙兆豫，回族，陝西漢中人。1935年參加中共，曾任中共宣傳部教育處處長。

【191】 戚雲 (1914-1996)，山東威海人。曾任全國婦聯國際部副部長。

【192】 劉道玉 (1933-)，湖北棗陽人。著名教育家。

她卻把下鄉時父親送給她的一塊上海錶送給了我。當時要買這種錶，一般人要用3到5個月的工資，而且還得憑票才能供應。不久，傳達了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文件，總算沒讓江青這夥人上去，大家懸著的心也算輕鬆了一點兒。

我和英淘、吳琰也整日忙於地區農大的工作。2月底，傳達了毛澤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講話，輿論造的很大，各地開始揭發「右傾翻案」和「正在走的走資派」。與此同時，大家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憤怒也與日俱增。終於從3月下旬開始，人們以悼念周總理為契機發洩對「四人幫」的不滿了，北京上百萬人連續到天安門廣場給周總理獻花圈、誦悼詩，並聲討「四人幫」。

4月5日清明節的夜裏，首都工人糾察隊用棍棒驅散了天安門廣場的民眾，還打傷了不少人，北京市委宣佈「這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事件」。3天後，我和英淘、吳琰悄悄回到北京。吳寄寒做為「正在走的走資派」又被打倒，他和我說：「小燕（吳琰小名）這孩子很純正，有理想，就是形而上學猖獗，今後就托付給你了。」戶口查得很嚴，吳琰家不能住。我於是住到了吳鵬在北京展覽館的一間工作室裏。吳鵬拍了不少「四五」時的照片，並義憤填膺地給我講了民眾抗議及鎮壓的過程。孟繁華也拍了不少照片，他和我說：「這麼明目張膽地鎮壓民眾，完全是法西斯行為！」

一天夜裏，我到了鄧力群家。我說：「鄧叔叔，公開鎮壓廣大群眾紀念周總理的天安門事件，表明共產黨已經墮落成一個法西斯的黨了！」他沉默著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鄧力群說：「我可能會被捕，也許遭到殺害。淘淘（鄧英淘小名）就交給你了，學校呆不住了就當農民！別的也幫不上你，我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屋子裏的書就送給你。」他的形象一下在我面前高大了起來。臨走時，我們緊緊握手，眼眶都有些濕潤。我給他帶了三樣禮物：中原煙、彩蝶煙和杜康酒。我說：「您多保重。中原鹿正肥，彩蝶當空舞，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給一位長輩送禮。

我又去看望了胡耀邦，我說：「從文化革命開始到四五鎮壓，共產黨已從脫離人民墮落成一個反人民的黨了。」耀邦拍案而起，激動地大聲說：「什麼文化大革命？！哪個時代發生過兩億人被鬥爭、批判、牽聯的事情啊？這是一場大悲劇啊！這是毛澤東同志的悲劇！中國共產黨的悲劇！中國人民的悲劇！」當時，哪個人敢這樣非議文化大革命？我從心裏敬佩耀邦的無畏、正直和深刻，但還是有點擔心，就說：「您小心點！萬一被人揪住可麻煩了。」

他正義凜然地說：「怕什麼！我這個人『五不怕』！」（指：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耀邦剛毅果決的態度使我深受鼓舞。離開北京前，我去找已調到歷史博物館工作的胡德平，讓他勸耀邦叔叔保重，他再三感謝。我們在天安門和歷史博物館照了幾張像留念。北京當時真是風聲鶴唳，到處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我那時在北京很不方便，輾轉了幾個地方都呆不住。

朋友悄悄告訴我：張春橋批示公安部、教育部負責人施義之^{【193】}、遲群，要嚴厲「追查」我「傳播政治謠言」，其實就是毛澤東批評「四人幫」那些話。他們想通過追查「陳一諮—吳琰—鄧英淘」，追出「吳寄寒—鄧力群與胡喬木—胡耀邦與鄧小平」這條「黑線」。我不動聲色立即回到駐馬店，和吳琰、英淘商量好了對策：一口咬定，是我在天安門廣場聽一個穿軍裝便服的小平頭說的。

5月初，由教育部司長薛壽章帶隊，公安、教育兩部聯合調查組到了駐馬店。加之，吳琰在鄭州又把這些「政治謠言」告訴了省教育廳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告密了，省公安廳將之列為「豫字 001 號」專案，也一同來人了。地方幹部哪裏見過如此陣仗，又不清楚上邊發生了什麼事情，如臨大敵，緊張的不得了。半個月的時間，調查組沒從我們三人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東西，只得鑣羽而歸。我們 3 人則會心地喝了慶功酒。

駐馬店地區農大很快貼出了大字報，說我是「正在走的走資派」，藉口「提高教學質量，整頓教學秩序」搞「復辟」，還說我、英淘、吳琰是「小鄧小平集團」。我們已很難正常工作。我去找墨林，他無奈地說：「老陳，我有心臟病，已受不了大的驚嚇。上邊的事情我也搞不懂。我看，你們另謀出路吧！」這時，常大全和李學來找我說：「父親就算走資派，兒女有什麼罪。我倆商量的，讓英淘到常莊，吳琰到貫台，農大不要他們我們要！」

他們兩人暫時有個棲身之地了，我這個公社書記還沒被免職。閒來無事之際，加之新婚燕爾，便與吳琰夜夜歡娛，我這時才體會到《聊齋》所說「人間尚有此等樂事耶！」倒也算過了一段逍遙的日子。不久，吳琰就懷孕了，我倆自是萬分欣喜。7 月朱德逝世。緊接著，唐山發生大地震。英淘的妹妹羅小韻從北京來了，她給我們詳細介紹了「四五運動」的前前後後，看來「四人幫」不得人心已極，垮台是早晚的事。

英淘的朋友李湘魯從武漢來看我們，他一表人才、心懷大志。我們聊了 3 天各種動向、傳言和趣聞，還說起「毛主席病危了」。臨走前，我們

【193】施義之（1917-1995），江蘇武進人。時任公安部負責人。

登上老洛山，在密林中，湘魯說：「萬一打起游擊，這兒倒是個好地方。」我說：「以前，劉少奇就在竹溝打過游擊，是抗日根據地。」他開玩笑說：「真打游擊，你這個『瓦崗寨主』兵馬太少了！還不三下五除二，一下子讓人家給端了。」大家笑了一陣。

9月初，我今年第三次悄悄到了北京。那時，唐山餘震還不時發生，北京到處搭的地震棚，不少人睡在街上。戶口仍然查的很嚴，沒固定的地方可住，我就在朋友那兒打游擊。吳鵬因參加「四五運動」拍了很多照片受到嚴厲審查，我除了與他密議如何藏好照片外，替他給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194]寫了一封為「四五運動」抗辯的信。

3-17 毛澤東病逝和「四人幫」垮台

我去拜訪胡耀邦，說下邊對「批鄧」很反感，剛穩定一點的秩序又攪亂了。現在人心思安，人心思治。並說了吳鵬的事。他堅毅的臉上充滿自信地說：「自古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順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是千古不易之理！」還讓我安慰吳鵬。接著，我又拜訪了鄧力群，他說：「情況沒有預想的嚴重，有備而無患嘛！你和淘淘、小燕，扎根農村，好好讀書，將來是有用的。」胡耀邦和鄧力群他們二人，對批判《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和《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所謂的「三株大毒草」毫無懼色，讓人從內心敬佩他們的風骨。後來聽英洵說，上面讓他父親出任山東省財辦副主任，讓萬里出任紡織部副部長，他們都拒不出任，真是令人欽佩的硬骨頭。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病逝了。聽到這個消息，心裏不知是個什麼滋味：從開始對他的盲目崇拜到後來的徹底失望，是在親身體驗民間疾苦中認識的，中國歷史上還有哪個朝代、哪個皇上把自己的國家和百姓禍害到如此地步？沒有，從來沒有！

毛澤東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為了「人的解放」而強調的「人本主義」和「自由人」的思想在毛澤東這兒統統不見了，有的只是比斯大林更專制、更殘暴的「無法無天」。而秦始皇滅六國後，設郡縣、車同軌、書同文、制律令、統一度量衡、修萬里長城，又是何等功業，但他焚書坑儒之舉為後世所垢病。毛澤東卻說秦始皇「只殺了360個儒，鎮壓反革命不徹底！」而他殺了超過千倍、萬倍。他只繼承了秦始皇的專制思想和手段，且大為過之。毛澤東又說：魯迅若活著，「不閉嘴，就進監

[194] 吳德（1913-1995），河北省豐潤人。曾任天津市市長，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代市長。

獄。」怪不得章伯鈞當「右派」後，感慨地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流氓！」

想起文革前自己對毛澤東的迷信，真是幼稚可笑到了極點。聯想到讀過的許多灰皮書、特別是那本厚厚的《修正主義》，感到似乎我們批判的修正主義更符合人性、更貼近生活，而我們堅持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卻更像「左傾」幼稚病、更像極端的斯大林主義。否則，何以一輪輪的「階級鬥爭」弄得人人膽戰心驚、國無寧日呢？何以一波波的「一大二公」搞得農村凋蔽破敗、民不聊生呢？連激進的清華附中紅衛兵搞「共產新村」都行不通，何況廣大的農村呢？看來，烏托邦思想一旦變成國家的「烏托邦工程」，只會是殘民以逞。

與其說別人搞了右傾「修正主義」，不如說我們搞了左傾「教條主義」！我們自己搞得如此糟糕，還有何顏面與能力搞所謂「解放全世界 2/3 受苦受難的階級兄弟」呢？「反修防修」只不過是個清除「共產主義急性病」障礙的假想敵。看來，落後國家很容易犯「趕超」的急性病。毛澤東統一中國功不可沒，但他掌權後給中國帶來的禍害莫此為甚，後世史家會有公論的。毛澤東在我心目中，已經從「英明領袖」變成「禍國魔頭」了。

毛澤東走了，中國今後會怎麼樣呢？

北京戶口一天一查，我無法住下去了，就回到駐馬店。文教局還有我一間宿舍，想好好休息幾天。沒想到，三五成群、一批一批的人拜訪我，打探北京情況，大多是耽心江青、張春橋掌權會胡來。沒想到，10月6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被捕。喜訊傳來，人們紛紛放起了鞭炮，自動湧上街頭慶祝，可見「四人幫」不得人心之深。

華國鋒繼位，大家總算鬆了口氣。各地都掀起了揭批「四人幫」的運動。這次運動雖順應人心，卻有兩大問題：一個是批「四人幫」同時連帶批鄧，說他們都是「極右」，而不批「極左」；一個是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時，把各地已三結合的一批比較溫和又受民眾歡迎的群眾組織代表整了下去，形成了更嚴重的派系傾軋。看來，清除 20 多年形成的「極左」痼疾談何容易。

吳琰在買台大隊生活很艱苦。這個大隊的土地大多在山坡和山溝裏，出工時不小心就會摔跤滾出去很遠。吳琰懷有身孕，身體又不好，李學和農民對她都很照顧，我也不時給她買些雞蛋和雞補養身子。可一次不小心，她還是從山坡滾下了幾丈遠。為策安全，還是讓她回北京調養。她離開買台大隊時，老鄉們依依不捨甚為留戀，很多人一直把她送到確山縣火車站。

英淘在常莊大隊也深受好評，他不僅幹活賣力，而且給老鄉說古論今，每晚都圍一圈人聽他講故事，秋收後他也回北京了。走前，他動情地拉著我的手說：「老陳，幾年來你對我各方面的幫助，我是永生難忘的。我最佩服你的地方，就是你能作到出於污泥而不染，整天和官場打交道卻沒有沾染上官場的各種惡習，還始終能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

我也回西安看望父母，經過三年的調養，父親的身體雖有好轉，但傷痛仍不時發作，冤案仍未平反。舅舅的案子也拖在那裏，舅母神經受刺激常自言自語，埋怨「世道不公，沒有王法」。雖然「四人幫」倒台了，極左的影響還無處不在，各處被錯整的幹部、群眾仍抬不起頭來，還是處處低人一等。看來，糾正「四人幫」的破壞，尚需花大力氣，費以時日。

孫達人也又經歷了一次磨難。「批林批孔」剛開始，陝西省革委會接到江青電話，說偉大領袖毛主席問：「孫達人現在在哪兒？替我問候他。」省革委立即安排孫達人擔任了陝師大革委會副主任，孫達人難以推脫就掛了個名。誰知「四人幫」一倒台，他又讓當作「四人幫爪牙」被打倒，再次挨了批鬥。生於亂世，人世滄桑，白雲蒼狗，如之奈何？

春節時，父親拖著病體帶我去涇陽，到八表姑吳須曼家看望剛回到老家的大表伯吳宓。上次見到大表伯還是1961年秋季剛開學，姑母讓我回家與大表伯見了一面。大表伯還一再勸我多讀些中國的典籍，這樣才會知道做人的道理。轉眼之間10多年過去了，大表伯已83歲。令人不忍看到的是，他老人家整個人形銷骨立，右眼已盲，左眼視物亦難，左腿骨折，被折磨的不像樣子。

盡歷浩劫，大表伯與父親兄弟相見，相擁而泣，互訴衷腸。大表伯說起「批孔」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險些送命，仍堅持「寧願殺頭，也不批孔」，因為「批孔就斷了中國文化的根」，老人的士子氣節凜凜感人。走時，他說：「八弟，你秉性純厚正直，法儀祉造福鄉里，功在千秋。為兄恐來日無多，只能聽天命而已！」大家唏噓而別。不久，大表伯就含恨離開了這個世界。

回家的路上，父親向我詢問了駐馬店1975年大水的情況。父親聽到近30萬人死於非命，禁不住流著淚無奈地說：這確實既是天災，也是人禍。這次駐馬店垮壩是全世界最大的。自古以來，中國就有禹的「疏導」和鯀的「堵截」兩類治水方針，禹的辦法才是合理的。自1956年照搬蘇聯經驗，1958年又大搞「蓄、小、群」，全國修的水庫，大多不合工程標準。父親說：「若參考美國治理密西西比河的經驗，上游水土保持搞好了，下游氾濫自會減少，流域治理應首重上游的水土涵養，而不是節節築壩，長

籐結瓜正是鯨失敗的做法。陳惺^{【195】}就跟我說過，重蓄輕排，不僅會造成土地澇、漬、鹼三災，一旦垮壩就不可收拾，結果後來打成了右傾。人離不開水，但水多為災、水亂為患啊！1956年以後，水利工作越來越不講科學了，總是投領導人所好。這麼下去，駐馬店這類慘案就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發生。」

3-18 「一天解決了公社三年的老大難！」

1977年初，確山縣委任我為胡廟公社黨委書記。離開瓦崗公社前，我找李學、常大全和林莊大隊支部書記林大有一起座談了一次。我問他們農村怎麼才能脫貧致富？他們說，難啊，吃奶的勁用上也不成。我問為什麼？他們說，農民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你沒聽說嗎？農民吊在嘴上的順口溜，就是「公家的活慢慢磨，人家咋著我咋著，一天都是十分多，幹得多了劃不著」。

他們說：「再說種什麼、咋樣種，上邊都規定的死死的，完成徵購任務以後，家家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糧。要不是我們這兒有山有林，還能上山採些野果充飢，1960年也會餓死很多人。」我說：「你們培養些技術員總可以產量高些嘛！」他們說：「陳書記，不瞞你說，你在我們這兒辦農業大學我們支持，可青年人有了點兒技術誰不願往城裏跑？留不住的！農民是二等人啊。」是啊，「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把人劃成了不同的等級，這是農村發展的一大瓶頸。

胡廟公社在確山北邊，除了西南有些丘陵崗地，絕大部分是平原。人口比瓦崗公社多了近一倍，近5萬人，15個大隊。這個公社原來還不錯，1974年搞「批林批孔」以後，兩派鬧得很凶，生產就降下來了。縣裏先前調來個書記李學曾，人很實在，但缺少魄力，任職以後收效不大。我任職後，先到各大隊做了一圈調查研究，瞭解情況才能制定對策嘛。

調查中，我發現大韋莊大隊近3年生產幾乎下降了30%，不僅不夠吃，國家的返銷糧還逐年增加。縣裏和公社派人瞭解情況後說法又不一，原來他們各自支持不同的派別。我反覆考慮以後提出了一個辦法，我和李學曾說：「我們不管誰是哪派，也不管誰支持，只要弄清誰在職時生產搞的好、群眾擁護誰就讓誰幹，一定能解決問題。」他半信半疑地表示可以試試看。我通知全體公社幹部和大隊支部書記，以及大韋莊大隊全體社員務必於3天後上午9點到大韋莊大隊辦公室前開會。

【195】陳惺（1921-），江蘇南京人。曾任河南省水利廳總工程師。

我和李學曾到會場時，已到了上千人。我說：「大韋莊大隊已經鬧了3年，再鬧下去大家都沒飯吃了！願意再鬧的舉手？」沒一個人舉。我又說：既然誰也不願意鬧，我給你們出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今天公社幹部都來了，分到各個小隊，由其他大隊的支書監督，開5個會：貧下中農會、老農會、青年會、婦女會和四屬五保戶會，每個會對三個問題投票，一是過去誰當家生產搞的好？二是過去誰當家生產搞不好？三是你們今後想讓誰當家？4小時以後回來當眾彙報，大家都當場聽。下午兩點，人們陸續回來了，兩點半開會，由各小隊彙報三個問題，把各隊提的名字寫在黑板上。結果很快出來了，90%以上的人都擁護3年前被派系整下台的支部書記（註：好像姓郭，名字忘記了）。

我們開了個現場公社黨委會，立即通過並宣佈任命此人為支部書記，群眾可高興了。5點散會了，幾個老農圍過來說：「陳書記，你給我們主持了公道，這回我們可有飯吃了。」十幾個大隊支部書記都沒走，一個個翹起大拇指說：「陳書記了不起，一天解決了公社3年的老大難！」我笑笑說：「公道自在人心，遇到難題只要順應人心，聽取大家的意見，發揚民主，事情就好辦了。」回公社的路上，李學曾感慨地說：「你真有辦法、有魄力，這回公社裏、特別是縣裏支持胡鬧台的人也沒法張嘴了。還有幾個大隊有類似問題，你就全權去處理吧，我支持你。」

接著，我又到葉莊、大韋莊、黃樓、窪李、龔樓幾個大隊，把老百姓認為的「光吃喝老百姓不幹好事」的幹部也拉了下來。我發現那時大隊班子從7人增加到13人，小隊班子也從5人增為9人，完全沒有必要。公社黨委開會，我建議大隊幹部減少4名、小隊減少4名，通過並實行了。這個做法當時得到了公社黨委的一致同意，各個大隊的老百姓也高興的不得了，因為他們養幹部的負擔大大地減輕了。可笑的是，「六四」以後，北京的報刊上竟批判我在農村時「大整基層幹部」，真不知道這些寫文章的人還有沒有一點起碼的人的良知，還有沒有一點兒對負擔沉重的窮苦農民的同情與憐憫的正義之情，農民的利益根本不放在他們的眼裏。

夏收時因過於勞累，我又高燒昏迷住院了。醒來時，胳膊上打著吊針，武漢軍區教導隊的張政委笑瞇瞇坐在我病床前，還帶了水果、茅台和中華煙來看我。他說：「陳書記啊，你解決大韋莊問題的消息不脛而走，大家都很欣賞你。但基層工作千頭萬緒，不可能一下都解決。養好身子，慢慢來，別著急，來日方長嘛！出院再到我那歇幾天。」出院後，他把我接到他家又住了一周。張政委是個耿直正派的老革命，抗日時參加了共產黨，因為講實話，1959年差一點兒當了「右傾」。他讓家裏每天都給我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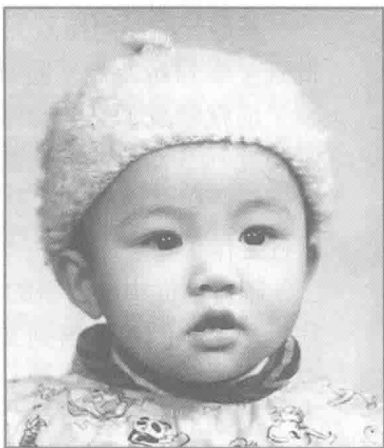
些好吃的飯菜，我們也聊得很投機。說起我在農村的感受，他說：「你還年輕呵！從1956年起農村政策左得很，不是一下就能改變的，不過比1958年可好多了。那幾年，到處餓死人，一個信陽地區就餓死了200多萬人！河南全省餓死了700多萬啊。」聊得我們都很沉重。

一天，李學曾來看我說：老陳，恭喜你得了一個千金啊。原來，吳琰產下一女，我立即請假購票趕赴北京。4月20日小傢伙出世了，一個月後見面我才知道，她除了兩隻靈動的眼睛透出聰明，簡直是個醜小鴨，臉皺皺巴巴像個小老太婆。我拍了些照片，說等長大讓她看看，「這是哪家的醜丫頭？」說來也怪，那時只要一放輕音樂，她再哭再鬧也會跟著手舞足蹈了。

但不幸的是，岳父吳寄寒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第二次被打倒」，說他是「正在走的走資派」，遭到遲群一夥的殘酷折磨。當「四人幫」垮台時，老人家因過於興奮，一下得了腦血栓。為使老人靜心養病，換個輕鬆的環境療養，岳母戚雲和吳琰陪岳父去桂林療養了。7月底，吳琰自桂林來信稱，父親已於7月19日病逝。

岳父吳寄寒（1912-1977）一直很受大家敬重，因其為人忠厚老實、耿直正派、且不求名利。他原名沙兆豫，為漢中回族大家，其父沙品三阿訇的塑像至今仍豎立在南鄭。他16歲離家到成都讀書，即組織了「青年勵進社」。後考入南開大學，1935年入黨，係一二九運動領導人之一。七七事變後，吳寄寒赴延安，以北平《晨報》特派記者身份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周恩來與他同赴西安途中，在勞山遭胡宗南軍伏擊，為掩護周恩來，他中槍受了重傷，那顆子彈直到他去世後才得以取出。以後，他奉周恩來之命，與李公樸創辦《中外通訊社》，先後活動於太原、武漢、重慶。1941年任《新華日報》總編室主任，曾主編「江南一葉，千古奇冤」等專版。後又與吳玉章營救關在白公館的韓子棟、周科征等人，他一直低調工作不圖報償。

解放後，他任中宣部教育處處長，不辭辛苦地組織編輯了各高校的文科教材。「反右」時他不願意揭發別人，被打成了「右傾」。「文革」中則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關了起來。1973年復出，任國務院科教組高教組組長，1975年再次被打倒，遭到半年多的批鬥，終至重病不起。



女兒吳笙生於1977年4月20日。

老人若地下有靈，不知是否也會發出德熱拉斯在《新階級》一書中發出的「共產主義革命一批批地清洗那些純潔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感慨。

3-19「別白費勁了，下邊的問題都在上邊！」

真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確山縣委7月通知我參加縣裏的「揭批查」學習班，幾乎將當過造反派或支持過造反派的幹部都當做揭批對象，這就變成了又一輪派系傾軋。我說：「應據所言、所行揭批，不應分派揭批。」3個月前，到處攻擊我在胡廟公社「大整造反派」的人，現在又攻擊我「包庇造反派」了。幸好我一直未介入當地的派系糾葛，就讓我回公社工作了。

確實，從中國傳統的「成王敗寇」思維模式，發展到共產黨的「你死我活」階級鬥爭，再到文革將對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甚至還要「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這種惡劣文化的極端化，已將孔子的「仁者愛人」拋到了九霄雲外。一旦形勢對自己有利，就想把有不同意見的人整得服服貼貼，不服那就把你當成「敵人」往死裏整，正應了泰戈爾所說的「人變成獸真是何其可怕」。

我一到胡廟公社地界，就下了班車往公社方向走，順便看看玉米、大豆、紅薯、棉花的長勢，同時和地頭的老鄉聊聊天。一個老農正歇晌兒，叭達叭達吸著旱煙袋。我走過去說：「大爺，莊稼長得不錯嘛！」他說：「湊合著，你哪兒來的？」一個中年漢子看見我說：「陳書記，我認識你。怎麼，明查暗訪來啦？」聽他一說，馬上男男女女的圍過來了十幾個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聊了起來，一個說：「大韋莊讓幾個小痞子攪得幾年都搞不好，您一天就解決了，真行！」一個說：「葉莊那幾個小混混一下台，也好多了。」另一個說：「我們這兒條件不錯，就怕胡來。」我問他們，夏糧能吃到什麼時候，秋種準備的怎麼樣，冬天幹些什麼好？不知不覺聊了半個多小時。臨走時，一個老漢說：「您別白費勁了，下邊的問題其實都在上邊！」我仔細琢磨著，還真有道理。

回到公社後收到吳琰的信，說丫丫還沒名字和戶口，讓我給她辦一下。給小丫頭起個什麼名字呢？吳琰懷她時，我說不管生男生女，就叫個「於無聲處聽驚雷」的「無聲」，以紀念「四五運動」，現在「四人幫」垮了，又叫個什麼好呢？小名可以就叫「丫丫」。我請公社秘書去辦，名字就叫「春曉」吧，春天的拂曉，雖仍春寒料峭，畢竟嚴冬已過。

在調研中，我感覺農民的負擔實在太重了。除了夏秋兩季徵購任務，冬季兩到三個月修水利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攤派，加起來幾乎已經相當農民全年收入的50%以上。公社各部門的臨時工大多參加生產隊的分配，部門一般只給30%左右補貼，大隊、生產隊幹部那麼多人也靠農民養活。農民一年忙到頭，所分錢糧物還不到勞動應得的40%，有的地方甚至低於1/3。怪不得農民自留地長的那麼旺，大田卻遠遠趕不上。但這些問題絕不是公社能解決的。而公社的臨時工大多是大隊幹部的子女和親戚，公社幹部的子女往往能在縣裏的局委部辦謀個差事，從自帶口糧、以工代幹逐步轉為城市戶口和正式幹部。從澗頭公社到胡廟公社，有一個共同的現象，20多年的人口不流動，附近的人往往親上加親，既降低了人口素質，又形成了一層層的關係網。

秋收前一個月，我找了七、八個老農，請他們座談小麥增產的經驗，又結合在程莊實踐的知識，在胡廟大隊找了三分地，根據不同肥力、密度、品種，做了300個小區對比實驗。種麥前十天，我請各大隊支書、大隊長和小隊隊長來開了個現場會，向他們講解地溫高低是播種的關鍵一環，山地、崗地、壤地、陰坡地和陽坡地，對不同品種播種有不同溫度要求，何時開耨你們自己決定，千萬不可按過去「幾月幾日開耨」的大忽隆辦法行事。會後全公社傳開了，紛紛傳說，「陳書記真有本事」，「陳書記是從北京來的農業專家」。

果然，縣生產指揮部在大喇叭裏要求全縣一齊開耨。我立即在公社廣播站講話，希望各大隊、生產隊參考現場會議精神，並依據本隊實際，決定何時開耨。要以本隊明年小麥高產、人人多吃麥面為目標，決不能亂聽別人瞎指揮。縣生產指揮部來電話責問，為甚麼不按統一部署種麥？我搪塞了過去。各隊種植進度雖然不同，但麥芽破土後長勢喜人。許多老農都說，多少年了都沒見麥苗長過這麼好。

今冬沒有大的修水利任務，我們幹點兒什麼呢？經反覆討論，公社幹兩件事：一是把1975年被大水沖斷的橋修好，二是把西南邊十幾年失修的渠修好，後來，縣裏又要求每個生產隊建一個集體豬圈。這三件事都幹得不錯，幹部群眾的勁頭上來了。我無論走到哪裏都很受歡迎。快年底時，公社黨委召開了3天大隊支部書記和部門負責人會，討論制定一個3年到5年的「山水地林路廠村」規劃，決定各大隊先做出來，討論修改後再做一個全公社的。

希望大家：不吹牛皮說瞎話，不相互較勁攀比，從自己實際出發，邁出一、二、三步就可以了，如何衡量好壞？一是生產上去了還是停止不

前，二是百姓夠吃還是不夠吃，三是集體企事業盈利還是虧損，四是大家居住交通條件改善還是沒變，五是貧困戶少了還是多了，六是國家任務完成的好還是不好。大家都說這麼辦法實在，各個大隊支書的勁頭也上來了。

近一年的實踐，我覺得把一個公社搞得比別處好一些並不難，難的是上邊規定的許多不合理制度、辦法，條條框框，自己並沒本事改變。總的看，局面在好轉。今年初還講「凡是」、「批鄧」、「反右」，年中調門降了，又恢復了高考，開始平反冤假錯案了。可又提「抓綱治國」？難道在百廢待興的情況下，還用「階級鬥爭為綱」來解決問題嗎？人們氣不順，還怎麼實現現代化呢？還得再看看。

得知胡耀邦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長，看來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有希望平反了。元旦「擁軍」活動一結束，我立即回到北京。確山縣駐軍單位多，每年元旦、春節、端午、八一、中秋和國慶都有「擁軍愛民」活動，地方領導帶禮物到部隊慰問叫「擁軍」，部隊首長帶禮物到地方看望叫「愛民」，雙方的禮物當然由頭頭收了看再分給誰，雙方互訪時都會把對方灌的酩酊大醉，一次宴會最少喝三五箱茅台。

3-20 葉劍英題辭和父親病危

1978年元旦過後，我回到北京。丫丫已8個多月了，越長越可愛。小人躺在小床上，人一去她就笑，小手小腳還不斷搖晃。見到她，我不由內心本能地生出一股愛意和愧疚，自己忙於在基層工作，一天都沒有照顧過她。岳母戚雲剛恢復全國婦聯國際部副部長職務開始工作，雖仍未擺脫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有了丫丫這個小「開心果」，老人心裏也增添了不少歡快。

吳鵬告訴我，吳德最近找他談了一次話，說「四五」大多數人是好的，也有壞人，還沒有「平反」的意向，但調門低多了，又說了一段為自己開脫的話想寬慰我，「從我參加共產黨以來，哪個人沒挨過整，哪個人又沒整過人？經受一次也是個鍛煉」。聽得讓人心寒。看著吳鵬編好的紀念「天安門事件」的攝影集，彷彿看到了當時激動人心的場面。吳鵬說，請你找胡耀邦題個辭：「人民的悼念」。

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後，忙的不亦樂乎，吃飯時都要處理事情。約了幾次才見到他，我說，「四五」是個重大歷史事件，吳鵬想請您題辭。他翻看著影集連連誇讚說：「編得很好！『人民的悼念』，名字也好。我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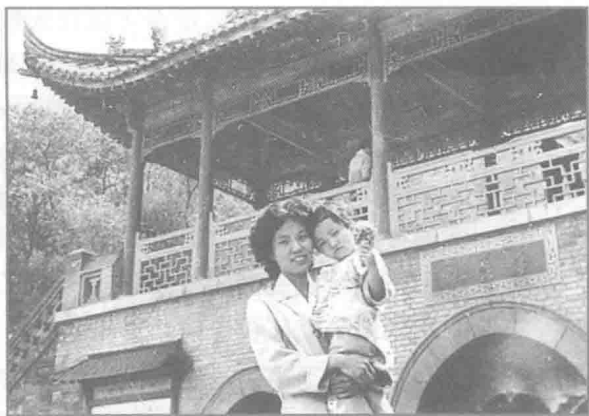
辭還不夠格，還是請葉帥^{【196】}題吧！」我告訴了吳鵬，他很高興。春節剛過，德平讓我去取題辭，葉帥用宣紙豎題了「人民的悼念」5個大字，左下角款「葉劍英」。吳鵬看到葉帥的題辭喜出望外，立即請大家湊錢把影集印出來，送給方方面面。這本影集在促進平反「天安門事件」中，可以說起了衝鋒陷陣的作用。到年底，北京市委終於宣佈：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因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

拜訪了幾位朋友，大家都感到現在比「四人幫」垮台以前，擔驚受怕壓抑地過日子好多了。但對能不能撥亂反正、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仍心存疑慮，特別是對華國鋒政治和經濟上的繼續左傾有些擔心。

到西安看望父母，知道父親、舅舅的冤案仍未解決，但父親仍忍辱負重、帶病工作制定黃河、涇河、洛河、渭河規劃，父親不計個人得失為國為民的精神一直激勵著我。「予則立，不予則廢」，中國真要現代化，八億農民不調動起積極性怎麼行？要進一步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2月下旬，我回到胡廟。按農村慣例，過完元宵節才開始新年的工作，休息了兩天。吳琰抱著丫丫從北京來了。哈，小傢伙才剛10個月，就到農村來體驗生活了。我們給丫丫找了個阿姨，她先生是胡廟衛生院的醫生，兩人非常高興幫我們照看孩子。吳琰把孩子安頓好，我們又商議了深入調查研究的想法，她就又回到貫台大隊戰天鬥地去了。

小麥喜獲豐收，全公社增產三成以上，農民每人幾乎都能多分60斤糧食，公社還因此得了地區的紅旗。英洵、吳琰一起到胡廟，說準備參加夏天的高考，可他們都已超過25歲，聽說25歲以下錄取分數線低一點兒。為保險起見，我去找確山縣文教局局長李文奎，請他把英洵、吳琰的檔案讓我看看。他很幫忙，但說吳琰檔案找不到，只有英洵的。我一看，檔案中居然還有他父母挨整的黑材料，就取出來銷毀了，並把他年齡改到25歲以下。我和英



【196】葉帥，指葉劍英（1897-1986），廣東梅縣人。曾任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八路軍參謀長；1949年後任北京市長、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

淘、吳琰一說，英淘先罵起了「那幫整人的混蛋！」，吳琰很詫異：自己的檔案到哪兒去了呢？後來，英淘以駐馬店地區第一名的成績錄取到北大經濟系，吳琰因無檔案則沒有報考資格。後來，反覆查找才知道：1976年「豫字001號專案」把她的檔案調走一直沒送回來，以致影響了她讀大學的機會。

不久，從北京發來母親的急電，說父親重病到北京住院。我立即趕到北京才知道：3月中旬父親到北京參加「全國科技大會」，聽了鄧小平「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講話，與會者都對摘掉「臭老九」的帽子如釋重負，父親又見到許多歷盡劫波的老友，興奮之餘喝了幾杯酒，卻感到很不舒服。到醫院一檢查，卻發現已經是胃癌晚期了。父親住在北醫一院胸外科，我見他面黃肌瘦的樣子心裏十分難受，連忙找到主治醫生盧運侃詢問病情，他說：你父親的病從發生到現在已有10年以上，從他挨打以後多年飲食不調，常在工地吃冷饅、涼餅，晚上又常喝熱茶，胃都吃壞了，再加上常年郁氣凝結，才造成賁門兩個癌變點都出血了。現在，每天給他輸2,000毫升血，紅血球還在下降，已到了1.8，恐怕難辦了。

母親也一籌莫展，不知該怎麼辦，我只能遍訪名醫諮詢。經反覆分析以後，我和盧醫生商議：是否可以每天輸2,000毫升的血漿，看看紅血球能不能增加。盧醫生答應了。3天後，父親的紅血球升到了4。盧醫生說：看來還有希望，紅血球升到8就可以動手術了。為安全起見，最好能搞到兩、三支人血白蛋白，我們醫院沒有，這個藥需經衛生部批准才能拿到。我找了父親的好友李伯寧^[197]，他正任水利部副部長，立即給衛生部寫了封信。我連夜趕到後海一位衛生部副部長（註：忘了姓名）家，求他批了三支人血白蛋白，送到盧醫生那裏。父親又輸了8天血漿，紅血球升到8，盧醫生讓我簽字給父親手術。手術成功了，父親垂危的生命有了轉機，母親懸著的心也放下了。父親由母親和小妹一諮護理，他堅持讓我「快回去工作，別耽擱公家的事」。

父親的老同學林庚、覃修典、張有齡、謝家澤，老同事錢正英、李伯寧、江國棟，都不斷來探望他。我的朋友孟繁華、孫勇剛、鄧英淘也來看他。在京的親戚更是絡繹不絕。父親的臉上漸漸有一些血色了，說話的聲音也慢慢大些了。父親幾次催我「回去工作」，母親慈愛地說：「諮兒，這次多虧你救了你爸一命。你就聽你爸的話，回去工作吧。省得你爸心裏不安。」

[197] 李伯寧（1918-2010），河北高陽人。時任水利部副部長。

我回到胡廟公社，見到丫丫，小臉紅撲撲的，滿頭麥草，煞是可愛，正在阿姨家的小院子裏蹣跚學步。阿姨笑著說：你這丫頭可聰明了，她看大人從雞窩裏掏雞蛋，就也鑽進去掏。吃西瓜時，一牙兒西瓜上咬一口，再給自己挑兩、三塊甜的慢慢吃。真心疼人啊！我說，辛苦你了，抱起丫丫轉了兩圈，她咯咯地笑了起來。10月初，吳琰調回北京，帶著在農村生活了8個月的丫丫走了。臨走時，我給丫丫起名「吳笙」，取「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意，蘇杭乃吳也，吳地笙歌之意，且與「無聲」同音，而我的祖母和丫丫母親又都姓吳。

3-21「六零年死人少，多虧包產到戶辦法好！」

反覆思量，我覺得只有「影響決策」，才能「改變中國」。正像毛澤東所說，中美關係正常化還得和尼克松打交道，因為他決定政策。靠個人微薄之力難以有所作為，在下邊再賣力也不過影響一隅，何況上邊政策不合理也沒法解決。我決定給胡耀邦寫封信，請吳琰回京時帶給胡耀邦。吳琰說不認識胡耀邦，我說：『你可以找胡德平。』她說：「可不可以請鄧力群轉？」我說：「也可以。」她拿著信走了。

我在給胡耀邦的信中說：粉碎「四人幫」後大家都很興奮，禍害中國10年的「文革」終於結束，但造成的破壞不是短期內能改變的。中國80%以上人口在農村，中國要走向現代化，農村不現代化不行。農村要現代化，農民沒有積極性不行。要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不改變現在農村的領導方式和管理方式不行。我當時沒有直接批評人民公社，以免欲速不達。

我接著在信中說：我過去在北大10年，先後讀過物理系和中文系；後來在基層鍛煉也有10年，在生產隊、大隊、公社和地區工作過，參加了勞動，搞過農業生產，又辦過教育、科技，還做了各種深入的調查研究。我相信，自己能為改變農村落後面貌做些有益的事情，希望到中央一個研究農村政策的單位工作。我來了個「毛遂自薦」。

我和胡廟農民、幹部的座談會，今年已經開過5個，準備再開5個，主題還是「你們隊怎麼才能搞好？」圍繞著改善內部管理和外部環境兩方面討論。最有意思的是：群眾和幹部在「內部管理」上分歧較大，而在「外部環境」上看法比較接近。我的調研座談會每次多則七、八人，少則兩、三人，先後有50多人參加。我心中的題目是「如何清除調動農民積極性

的障礙」，給座談的人提的問題是「你們隊怎麼才能搞好？」回答是五花八門的，歸納起來，大體如下。

說到「內部管理」，幹部、群眾看法分歧較大：

1、怎麼才能當一個好的支部書記、生產隊長？

幹部：很難辦，大到方向路線、生產生活，小到鄰里糾紛、母雞下蛋，什麼事都得管，誰有那日天的本事？管得嚴就像個家長惹反感，管得松只能當和事佬又挨批評。

群眾：幹部是不好當，只要能主持公道就行。可大多幹部都偏心自家人，還多吃多佔，偷奸耍滑，搞不好還給你穿小鞋、坐蘿蔔。最好外邊派人監督著，要不誰上台不給自己撈一票。

2、農活怎麼擺佈才能效率高？

幹部：種什麼、怎麼種都得聽上邊的。自己想種的只能偷偷種一點兒。計酬辦法也是上邊定的。上工一窩蜂，幹活大忽隆，沒法解決。誰都知道自留地產量比大田高幾倍，又不讓擴大自留地。

群眾：種啥我們決定不了。可隊裏輕鬆活、乾淨活、技術活都是幹部和家屬的，苦活、髒活、累活都是我們平頭百姓的，工分還都是他們評的高。年終分配往往勞力多的成了虧空戶，誰還好好幹。

3、勞動分配怎麼進行大家才滿意？

幹部：怎麼分配都不會滿意。首先，「人五勞五，吃糧不要錢」只有利多子女戶，得上邊改變。交公糧是國家任務沒得說。可各種攤派款太多，大隊、生產隊大多沒什麼提留。修河工又是自己貼勞力、工分、工具、柴草和吃食。所剩實在沒多少。

群眾：幹部說的是實情。但一年到頭，送往迎來、大吃大喝，哪天斷過？幹部哪家不比我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幹部不搞特殊，我們總能多分幾個。查查哪個隊幹部不私分隊裏東西？哪個會計、保管不給自己家裏摟？大家說，「公屋漏，公馬瘦，公家的老鼠不長肉」，一心為公、不顧自己的人，誰也找不出來。

說到「外部環境」，幹部、群眾的看法比較接近：

其實，「內部管理」很多問題解決不了，都是上邊的主意和規定不合理造成的。像：「以糧為綱」了，就其他砍光，不能因地制宜；「學大寨」照搬，「大寨工分」老百姓叫「大概工」，效果更差；家庭副業、自留地、農貿市場都當「資本主義尾巴」砍，大家更窮了；想起 1958 年的「一平二調」，要再「窮過渡」可真活不成了……但群眾認為，有些事幹部也跟風跑，跟對了就會陞官。幹部認為那多是不得已，跟不上會挨批鬥。

說起「外部環境」，大家還心有餘悸。從「初級社」轉「高級社」，幹部、群眾都是被迫的，家家殺豬、砍樹，怕共產了，當年生產就下降了；還沒站穩腳，又「人民公社化」，那個浪費、破壞就大了去了；接著，「大放衛星」、「大煉鋼鐵」、「大辦食堂」、「砸爛罈罈罐罐」、「全民軍事化」，還「反右傾」，上邊像發瘋了一樣，把農村毀了個底朝天；連著3年餓死人，一戶戶死光、一村村死光，到處都出現了人吃人。

那個慘像永遠都忘不掉；明明是上邊逼著幹的，出了事又怪下邊，搞什麼「民主補課」，農村幹部一溜挨整，又批又鬥又打，大家的心算是寒透了；那時，有的幹部、群眾就說，要早知道共產黨這麼胡整，咋會支持共產黨打國民黨？現在國民黨要回來，大家都會幫國民黨打共產黨！後來又是「四清」，又是「文革」，紅衛兵造反，「破四舊」，「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資臭」，算整了個遍，弄得人人提心吊膽地混日子。

大隊支部書記蘇倫彩說：現在這個平反，那個平反，實事求是地說，我們農民受的罪最多，就是沒人給我們農民平反！其實，從「統購統銷反瞞產」開始，上邊就不管農民死活了。後來，又搞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城市戶口」就高人一等，從吃糧、住房、看病、上學到養老，國家都包了，「農村戶口」什麼都不管，誰還願意呆在農村？還不越搞越窮。

大隊支部書記李和義說：過去的那麼多事，再冤也過去了。現在農村這麼多問題，一時半會兒也解決不了。我看最簡單、最可行的辦法，調動大家積極性最快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大家都說「責任田是救命田」，「六零年死人少，多虧包產到戶辦法好嘛！」大多數人認為，這個辦法好，最能多勞多得，少數人覺得上邊通不過，不會讓搞的。

那又怎麼辦呢？我和幾個支部書記商量，目前不能「包產」，能不能先實行「包工」，這樣也可以提高效率。幾個支部書記都猶豫地說，上邊批判這是搞「修正主義」。我說，這總比「大呼隆」好吧，生產搞好了，大家有飯吃，日子才能過下去。一些條條框框妨礙生產就不要管它，老百姓吃不飽飯才是大事，出了事我擔著。幾個支部書記都說，有您這樣的書記撐腰，我們的膽子就大了。

第四章 推動農村改革（1978-1984）

——創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了，中國向何處去？這是當時人們面對的首要問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深得人心。改革從何入手？人們卻莫衷一是。

小引

這一章是本回憶錄的第一個重點，將向大家介紹從1978年底我回到北京，直到1984年底這6年間發生的故事。「四人幫」的垮台，給大家帶來了希望，「中國向何處去？」成了人們無處不議論的話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但從何入手？卻看法各異，諸家蜂起，莫衷一是。從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到開展「真理標準討論」，大大掃蕩了中國的左傾陰雲；萬里支持農民「包產到戶」打開了農村改革的缺口，本人組織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為推動農村改革起了先鋒的作用。

這個時期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衝破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改革從農村擴展到城市的時期。本人的經歷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底到1980年底，人們不斷從左傾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西單出現民主牆，理論務虛會，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討論。同時，「四項基本原則」為解放思想劃了框框，中共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仍供奉毛澤東的神主牌。農民為活命，搞起了包產到戶，爭論激烈。我為判斷形勢，到安徽作了深入調查，回北京後組織起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第二階段，從1980年底到1982年底，農村的包產到戶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發展成燎原大火，不僅衝垮了強行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也改變了陳雲「緩改革」、以圖將中國經濟體制「調整」回50年代的願望。農村改革的發展對城市經濟體制提出了迫切的改革要求，「發展組」的各種調

查、彙報不斷得到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的肯定和稱讚。但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卻是阻力重重。

第三階段，從1982年底到1984年底，為使「改革形成不可逆轉的局面」，我過度勞累，得了「疲勞綜合症中晚期」幾乎死去，在不得不休養了18個月之後又重出江湖。在趙紫陽的努力下，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終於承認「商品經濟不可逾越」。因為我在農村改革中的努力，後來卻被推到了力不能勝任的今後要寫《多餘的話》(瞿秋白^[198]臨刑前寫的回憶錄，講他在力不勝任的位置如何演出悲劇)的位置。

回想這6年、特別是前4年，在經歷了北京大學10年的磨勵和在農村基層10年的鍛煉之後，我運用自己積累的政經文壇知識和對中國體制現狀的認識，總算對中國的進步事業、對中國處於最底層的農民，盡了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但中國的積弊，可以說是「冰凍三尺，決非一日之寒」。中國真正走上現代化之途還很遙遠，需要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做出堅韌不懈的努力。

4-1 「耀邦批示，調你到北京工作」

1978年10月底，我專程到胡廟公社北邊的臧集大隊，向這個公社最好的3個支部書記李和義、蘇倫彩和韋祖倫討教「包產到戶」的問題。李和義是個善動腦筋又不事張揚的能人，他說：「為什麼說『包產到戶』最簡單可行呢？大隊把國家徵購任務和大隊的各項提留分攤到生產隊，生產隊再加些隊裏的提留，而後分攤到每個戶，每戶自會動腦筋怎麼多生產，因為產的越多自己得的越多，幹部不費心也會增產。這個辦法最能調動農民積極性，真正是多勞多得嘛！」我問：有人說還得「五統一」？蘇倫彩笑笑說：「老百姓說那叫『脫了褲子放屁，多費一道手』，是糊弄上邊的，要不會批你『分田單幹』。1960年，凡是搞了『包產到戶』的地方就沒死什麼人，沒搞的地方沒東西吃，死人就多了去了。」公社秘書進來說，省委組織部找你。我接了電話，對方說：「省委組織部通知你，耀邦批示：調你到北京工作。」吳琰回京還不到一個月，耀邦就批了，真是高效率。

李和義立即悄悄又通知了幾個支部書記為我送行，大家依依惜別，並再三叮囑我，到了中央要多替農民講話。我也表示：一定為改變農村落後

[198]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他曾兩度擔任中共總書記(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後被國民政府逮捕並執行槍決。為著名散文作家、文學評論家，死前寫了《多餘的話》。

面貌努力，不負大家所託。1978年11月初，我和在駐馬店地區工作時結識的朋友、同事、鄉親們依依惜別，特別是老領導王墨林語重心長地說：「農民日子過得太苦了，要想辦法解決啊！」到鄭州河南省委組織部換介紹信時，才知道調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部在北京東長安街一棟大樓裏，沒想到人事局長竟是原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文化革命之初擔任北大中文系工作組副組長的趙峰，她還像當年那樣熱情而平易。我先感謝她文化革命開始時對我的保護，她笑著說：「我看了你的檔案，就知道呂乃巖、黃介山在胡鬧。」我又講了後來的經歷，她說：「調你到新成立的農業經濟研究所工作，應該能發揮你的才幹。有了房子會給你分，你先住戚雲那兒吧，我們過去都在婦聯工作。」

見到岳母、吳琰和丫丫，皆大歡喜。吳琰已分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當編輯，她大哥吳小嶺在石景山化工廠當工程師，二哥吳小枚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研究所作研究。丫丫一歲半了，聰明、活潑、可愛，特別是一放音樂，她就能隨著節拍起舞，還挺有模有樣，惹得大家一片讚歎。就有一條讓人哭笑不得，她一拉屎就在地板上，拉一撮兒換一個地方，一泡尿順著牆邊拉，得換七、八個地方。姥姥總是心疼得抱起她，拍著她的小屁股說，你這個農村丫頭，把我們家當豬圈啊！引得大家哈哈地笑起來。

家裏每天都人來人往的，有岳父、岳母的朋友，有我和吳琰的朋友，忙乎了一個多月。我去拜訪胡耀邦，只見到德平，他說父親忙極了，平反「冤假錯」案任務很重。我又拜訪了鄧力群，他見到我很高興，說：「農業經濟研究所剛成立，你去了要努力工作，有什麼問題可以找所長詹武^[199]。」和英淘住在一起聊了一夜。接著，我看望了姑夫、七孀、二哥嫂、三哥嫂和大姑姑陳心一、表哥王松聲和老友孟繁華、孫勇剛、何青等人。

岳父的老朋友鄭伯克^[200]、程宏毅^[201]、顧大椿^[202]、謝筱迺^[203]與甘露夫婦、周科征^[204]與邵漪容夫婦，先後來拜訪岳母。鄭伯克原任雲南省委

【199】詹武(1920-)，浙江溫嶺人。經濟學家，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山東省財政金融局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200】鄭伯克(1909-2008)，四川沐川人。曾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時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

【201】程宏毅(1914-1997)，山西孟縣人。曾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時任全國合作供銷總社副主任。

【202】顧大椿(1915-2007)，江蘇南京人。曾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時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203】謝筱迺(1917-1999)，浙江平湖人。時任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4】周科征(1909-)，上海人。長期在中央調查部工作。

書記，「反地方主義」時遭整肅，時任中央組織部老幹部局局長，他說部裏正籌建中青幹部局，問我是否願去？我說，我不熟悉人事工作，喜歡研究農村問題。岳父介紹入黨的程宏毅，時任全國合作供銷總社副主任，說他們那兒正缺人，希望我在基層工作的經驗到他們那裏能有用處，而且一年四季他們那裏都有下邊送來的土特產品，福利也特別好，我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剛從香港華潤調回國、正在中央黨校籌辦「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並任副主委的謝筱迺最熱心，三番五次動員我去他那兒，還親自開車拉我到他在中央黨校的辦公室參觀，說：「這兒工作、生活條件都是北京最好的，你再找個喜歡的領導人，給他寫個『回憶錄』，很快就可以提拔個副部級。」條件確實很誘人。我說，我睜眼閉眼都是那些吃不飽飯的農民，願為他們做些事。他對我的「頑固」很惋惜，並表示隨時歡迎我來。

我那時住在岳父吳寄寒遺下的宿舍——大木倉胡同 35 號教育部內的紅頂樓。北大老同學陳必陶家住的離我家很近，晚飯後，我經常到他家去聊天。陳必陶的父母陳於彤^[205]與黃紀都是老革命，兩位老人熱情好客，又很健談，特別是告誡我，北京「左」的東西還很厲害，千萬辦事不能著急，以免欲速不達，給了我不少教益。後來，我組織「發展組」，陳必陶也積極地參加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在月壇北小街 2 號的 2 號樓辦公，是原來的華北局 2 號樓。樓內有原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經濟所，以及新建立的工業經濟、農業經濟、財貿經濟、數量經濟研究所。5 個研究所各自獨立，但後勤服務在一起。農業經濟研究所已調入近 40 人，我分到人民公社研究室。室主任王貴宸，研究人員有魏道南、王鳳林、秦其明、楊德柔。可能彼此還不熟悉，大家都客客氣氣的，學術討論的空氣不濃，對重大現實問題的討論也很少，大多根據中央精神寫些文章。

我決定先從瞭解情況入手，弄清在農村問題上過去和現在都在哪些主要的問題上發生過爭論，以及各自的觀點如何，這樣才不致抓不住研究的重點。和所長詹武談了一次，他當過任弼時^[206]的秘書，人很謹慎，不輕易談自己的看法。只是和我說：「耀邦推薦你來，力群也和我說過，好好幹，好好幹。」王耕今^[207]從國家計委調來，曾任國家計委農業局局長、計

[205] 陳於彤，曾擔任董必武秘書，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206] 任弼時(1904-1950)，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207] 王耕今(1911-2007)，河北南宮人。經濟學家，曾任國家計委農業局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委委員，人很開明，對極左深有認識，後來當了副所長，他和我談了以後說：「你從基層來，熟知農村情況，這對你做研究很有好處。」

王貴宸自人大農經系畢業後到經濟所工作，農經所創辦時調入擔任人民公社研究室主任。但在室內討論起農村的情況、特別是提起包產到戶，似乎大家都有些談虎色變，囁囁而言地，唯恐避之而不及。我到資料實查關於包產到戶的資料，一點也沒有，私下一問，好心人才悄悄告訴我，中央內部傳達「搞包產到戶」是「復辟資本主義」，「一定不能讓這股歪風刮起來。」怪不得對這個問題大家都會這麼諱莫如深。

4-2 何維凌的雄心和我的思考

聽說何維凌在北大化學系徐光憲^[208]教授那裏研究分子結構，與岳母一起住在永內東街。1978年11月底，我去拜訪他。二人一見，不勝歡喜，竟一下聊了兩天兩夜。他還和10年前一樣，熱情洋溢，豪氣干雲，只是經歷滄桑後多了些老成。說起當年他們「共產青年」，實行「共產」，一天只吃四個火燒、兩分錢老虎醬，就差沒妻可共了，不由哈哈大笑，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又說起他和王彥、胡定國1967年發表的《共產青年宣言》，還和上海「反覆辟學會」胡守鈞^[209]一起公開批判林彪、江青、張春橋「極左」，真可謂膽大包天。

1963年，何維凌考入北大技術物理系，因其才華出眾、成績優異，二年級時即通四門外語，教授們都對他稱讚不已。鄧樸方與他住一個宿舍，兩人成為要好的朋友。文化革命打碎了他成為科學家的夢想，他廢寢忘食地研究起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信奉起了青年馬克思。1967年11月，因組織「共產青年學會」，維凌鋸鐐入獄了。他在獄中，仍向看管和獄友傳播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個性解放，還將大學的數學、物理編成通俗教本，給三教九流上課。維凌喜詩詞，在獄中寫道：「欄杆拍，看吳鉤，豪情似我便無愁。自強十載薪與膽，坐待馮唐也堪羞！」

他的遺傳中一直流著「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熱血，那以天下為己任、俠肝義膽、不畏強暴、率真樂天的特點，亦承繼了父祖之風。當然，家境的變遷也不可避免在他的心靈上烙下了很多畸形的印跡，像鄙夷普羅、諂諛權貴等等。他的祖父何仿檀是清末武狀元，民國初在保定軍官學校任教習，馮玉祥尊其為師。民國一代名將張自忠、趙登禹、鹿鍾麟、宋哲元、吉鴻昌等均受教於其祖。七七事變前，其祖官拜中將，苦勸宋哲元率部抗

[208] 徐光憲（1920-），浙江紹興人。中國著名物理化學家。

[209] 胡守鈞（1944-），湖北武漢人。1967年因批判張春橋而入獄，現任復旦大學教授。

日，未被採納後怒而辭官，返歸廣東中山故里。第二天，日寇即在盧溝橋打響了全面的侵華戰爭。

他的父親何焜祖由宋哲元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成婚，後在上海永安公司任高級經理。解放時公司股東都逃去了香港，只有他父親不忍丟下這麼大一個攤子沒人管。1955年以後，其父作為「資方代表」主動將保留工資800元降為200元，希望當一個普通勞動者，但在「向黨交心」時卻當了「右派」。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作為右派子女的維凌除了「白專」之路，還有什麼前途可言呢？他在上海復興中學讀書時，即立志得「諾貝爾獎」。

也許是命中注定，文化革命的發生，使中國少了一個天才的科學家，卻多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探索者。維凌和我說：「四人幫」垮台後，北京各個機關以至家庭，人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就議論「中國向何處去」，週末還有各種方式的研討，可真熱鬧。我參加了各式各樣的沙龍和討論：有主張思想啟蒙的；有主張總結歷史的；有主張反思文化的；有主張引進新思潮的；有主張批判封建專制的；有主張教育救國的；有主張經濟救國的；有主張科技救國的；有主張自由民主的；有主張全盤西化的；也有主張政治革命的……真是諸家烽起，百花齊放啊！

我問他：那麼，你有何見教？他說：「我可是孔夫子門前賣孝經啊。你學富五車，又深入基層，一定有更深的考慮。我先拋磚引玉吧，經過文化革命，大家都有所覺醒，知道毛澤東過去的路走不通了。但今後的路子該怎麼走，都在熱烈討論，卻有些莫衷一是，什麼看法和說法都有。我認為『四人幫』之所以能橫行無忌，是在一種特殊的制度環境下由毛澤東支持造成的，想避免再發生類似悲劇，就必須剷除產生『四人幫』的土壤，改變產生『四人幫』的環境。也就是說，中國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你同意嗎？」

我說：「英雄所見略同！但這場變革的依靠力量為何？變革又該從何入手呢？中國現在是人心思變，人心思治。但『巴黎公社』式的法國大革命行不通，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證。可英國『光榮革命』走向憲政民主的路子，我們又缺少起碼的條件。我認為，任何一場成功的社會政治變革，必須從現實的『需要』和『可能』兩方面考慮。否則，又會是『烏托邦』式的空想。俄國『彼得改革』和日本『明治維新』倒可以供我們參考。」

維凌問我：「聽說你給耀邦寫信毛遂自薦了，還想學你祖父『公車上書』嗎？」我笑笑說：「1965年我給毛澤東寫《意見書》時，確有『致君堯舜上，更使風俗淳』的傳統士大夫情結，這次為的則是『影響決策』，以『改變中國』。」維凌詫異地問：「你一封信就能『影響決策』，『改變中國』？」我

說，沒那麼簡單，我給他講了三小時在基層的調查，他說：「沒想到農民那麼苦啊！」我說：「現在只要搞起了包產到戶，把8億吃不飽飯的農民從人民公社解放出來，就會是一股誰也阻擋不了的變革推動力量啊！」

我接著說：「毛澤東強化了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形成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加之共產黨掌權後就一步步消滅了基層社會的各種獨立組織，中國要走向民主還有漫長的歲月。你看，英國光榮革命前經過『百年戰爭』，誰也吃不掉誰，才形成了我活你也活的局面。我認為，民主是生長出來的，是現實政治力量妥協的結果，而不是知識分子理念的產物。如果廣大農民進入市場，就既能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又能瓦解計劃經濟的基礎。同時，也給獨立的經濟實體和公民社會提供了發展的空間。」

這時，維凌的老岳母秦德君，雙手拍著掌走了過來，笑咪咪地說：「我已在隔壁房間聽了許久，不怪罪吧！」我趕忙起身向老人家致意。她問：「依你看，大家想要什麼？」我說：「人類幾千年的歷史，老百姓想要的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條，一是吃飽穿暖、豐衣足食，二是自由自在、自由選擇。」她又問：「那麼，你又圖個什麼？」我笑笑說：「我別無所圖，只想民生富足，國家強大，就可以告慰祖先。」老人欣慰地點點頭說：「一諮，維凌目高於頂，可老聽他誇讚你，果然人才難得！有什麼需要儘管和我說。」老人留我吃晚飯。飯後我就留宿在她家了。

晚上，維凌告訴我：「你的想法老太太大為讚賞，我也覺得有道理。可我不喜歡農民，他們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啊！但我應該能幫助你。」我說：「毛澤東當年搞『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了成功，現在若能把8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改變中國創造歷史。『8億農民』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啊！他們都動起來，絕對可以做到少數知識人辦不到的事情。真正解放農民，光靠我們不行。需要聚集一批人，形成一種共識，擰成一股力量，才能抵擋各種明槍暗箭，做成一番事業。我想在上山下鄉的知青中物色一批人才。睡吧，明天接著聊。」

第二天，我說：「維凌啊，我們都是文化革命的『倖存者』，本應無所顧忌。但我看了許多灰皮書以後感到：東歐那些共產黨的執政者往往整肅兩種人，一種是黨內純潔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上有影響的自由主義者，二是黨內『托馬改制』的所謂『修正主義者』，後者的『跪著造反』往往也很難成功，我們不能做這兩種人。鄧小平不是說過『白貓，花貓』嘛，我們只要能抓老鼠就行了！要盡量避開『主義』的爭論。你可以多參加各種討論，我要盡可能低調的組織一個研究隊伍。但萬萬不可時機不到，各處亂講。」

維凌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放心好了。我參加過不少討論，可從沒聽到過你這種切入實際的高論，感到深有啟發。我反覆想，可以為你做三件事：第一，我可以兩周和樸方、德平開一次碰頭會，還可以幫你瞭解各方面情況；第二，可以在自然科學方法論上幫助你；第三，老太太要搬到木樨地 22 號樓，可以為你提供一個聚會的場所。」我說：「非常感謝，希望我們能一起為推動中國的進步，做出歷史性的貢獻。」我們約定，每周最少見一次面，而後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原來維凌的岳母秦德君是個傳奇式的人物，彝族，15 歲時即被馮玉祥稱讚為「抗清英雄秦良玉第二」。她 1923 年 19 歲時經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共，21 歲擔任中共女工部長，23 歲赴日找黨，與茅盾邂逅相處數年，後知被騙，氣憤返鄉。26 歲任第七戰區司令部參議官。33 歲協助丈夫郭春濤在家中成立「東方文化協會」。1949 年至京參與籌備政協，任委員。1967 年入秦城囚禁 8 年。鄧小平曾說：「我們是老戰友。」

下午，兩位個子高高、文質彬彬的一老一少來拜訪秦德君，老年人叫文強，年輕的是他兒子文貫中。聽維凌說，文強老先生更是傳奇：他是文天祥的後代，姑母文七姑是毛澤東的母親。他先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後又經邵力子介紹加入國民黨。最傳奇的是，珍珠港事件前夕，他根據情報得出日軍將進攻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結論，後又策反過百萬漢奸部隊。淮海戰役中與杜聿明一起被俘，但拒寫悔過書。他說：「我曾任紅一師師長兼政委，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老師，林彪是我部下，要寫悔過書應該他們寫，誰讓他們沒把我教好。」

維凌妻子郭秋姮的父親郭春濤，是中共建國之初政協和政務院副秘書長。秋姮漂亮、大方、得體，他們育有一子毛頭、一女毛毛，小日子看來過得不錯。他們結婚時，維凌作《木蘭花慢》一首贈秋姮：

何處拈彩筆，為卿卿，寫春風？把呼嘯一集，平生意氣，字字清譽。
知我意，感君憐，此心心相印繫金繩。且寓琴心劍膽，還托海誓山盟。
十年離亂驟然逢，琴瑟友同聲。是玉腕當壚，釵荆裙布，機遇天成？
歷滄海，夢巫山，看氤氳雲水為君生。暫向高梧棲鳳，長隨萬里鵬程。

婚後，維凌將其所作詩詞彙為《呼嘯集》贈與了秋姮。我們許多朋友到秋姮家聊天、座談，她都熱情地端茶送水從不怠慢，還經常為大家做飯。提起她，大家無不嘖嘖稱讚。

4-3 胡耀邦說：「他們都是為革命貢獻了一生的人，早該平反」

1978 年底，吳琰給我講了韓子棟、周科征兩位伯伯的故事：

韓子棟是小說《紅岩》裏華子良的原型，先後被軍統關在白公館、渣滓洞、息烽 14 年，裝瘋賣傻騙過特務的眼睛才活了下來。解放後，擔任貴陽市委書記，反地方主義時挨了整，文化革命中又不斷挨鬥，一直問題沒有解決。我見他時，他感慨地說：「我坐共產黨的冤獄比坐國民黨的還長！」看著他那乾瘦如柴的身軀，真讓人覺得太不公平了。周科征是小說《紅岩》裏劉思揚的原型。他原是富家出身的一個銀行主管，傾盡家財支持共產黨，被捕後關在白公館。吳寄寒將他營救出來以後，組織派他到香港工作。潘漢年^[210]一案中，他又受到牽連，調回北京接受審查，文革被關進監獄。「四人幫」垮台後，放了出來，可問題一直拖在那裏。我真為他們二位前輩抱屈，接連幾天替他們寫了申訴信，而後送到了胡耀邦家。耀邦聽我講了情況，又看了信，當即批示，責成有關部門解決。

我去看望何青夫婦，他們已調到中國公安大學任教，情緒顯然比在臨汾時好多了。何青又帶我去拜訪了何鳳池、馬千里兩位伯伯，才知道文化革命整他們的冤案還沒有平反。整人的人一般很難認錯，我又連夜幫他們寫了申訴信，送到胡耀邦家。耀邦聽我介紹情況後，立即看了申訴信，當下批示要求有關部門盡快解決。我說，何伯伯入黨 50 多年了，人也 70 多歲了，總感歎共產黨一進城就變了，不為窮苦人辦事了，得罪了些上司。耀邦說：「無論如何，他們都是為革命貢獻了一生的人，早該平反！」。

說起平反冤案，還真有意思。維凌說：「你的冤案還沒有平反哪！走，去北大。聽說因樊立勤受聶元梓嚴重迫害，從湖南調回北大協助周林工作，我們先去看望他。」誰知樊立勤一口官腔：「我現在要午休，三個小時以後你們再來。」我們去拜訪了師長周培源、王蒂澂和林庚、王希慶。而後，又來找樊立勤。他打了個哈欠，伸了伸懶腰，拿腔拿調地說：「我馬上要開個重要的會議！」就一癩一拐的走了。維凌搖搖頭說：「真是小人得志，痞子難扶！」又問我：「你是不是得罪過他？」我說，「從來沒有啊！文革中我還救過他。我到農村後，第一次回北京，見他很潦倒，還把身上帶的一個月工資送給了他。不過，也許是文革中他的極左看法，經常受到我的批評，可能那時就結下了一些疙瘩。」維凌說：「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我們一起到校長辦公室找了潘乃燧。她是文革中自殺的北大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妻子潘乃穆的姐姐，正負責學校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潘

[210] 潘漢年 (1906-1977)，江蘇宜興人。中共著名特工，蒙冤而死。

乃燧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說：「啊，陳一諮，我知道你文革中被鬥的很慘。放心吧，問題一定會實事求是地解決。」我到中關村看望了原中文系黨總支副書記華秀珠，給她帶了幾斤水果。她腦中風正病臥在床，手腳不靈活，但頭腦還清晰，她流著淚說：「當年我不同意呂乃巖他們的作法，可也沒辦法幫你。讓你受苦了，對不起！」我連忙說：「都過去了，您是好人，好好保養。」

沒過多久，維凌告訴我：你的問題解決了，潘乃燧讓你去取平反決定，還有補發的工資。當我看到平反決定時，真是感慨萬千。決定說：「陳一諮同志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度覺悟，較早發現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向黨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本來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合法權利，卻受到了不公正對待，文化大革命期間更受到慘酷迫害。現在決定，推翻一切強加給陳一諮同志的污蔑不實之辭，恢復陳一諮同志的名譽，並補發工資。」雖然 15 年的「右派」、「反革命」帽子摘掉了，但心裏卻只有苦笑，當我相信馬克思時當了「反革命」，不相信時又變成革命的了。

我提出，應該歸還文革時被抄走的物品，潘乃燧讓我找校衛隊。我連去三次，均渺無結果。父親調到廣東後，我把家裏一個小黑木櫃搬到了學校，裏面珍藏了我所有的貴重物品。最重要的是父親交給我的祖上的家譜和各種資料，最有價值的當屬自戰國秦漢至明清以來的各代古錢，還有康熙皇帝賜給祖上的玉帶，以及祖父集攢的 60 多個國家的珍貴郵票和我後來又搜集到的解放區、蘇東各國郵票。據說，一套大清龍票當時在香港就可以賣 3,000 萬港幣。不過，比起文革對國家的全面破壞，這些東西也就微不足道了。

我帶維凌去見了正在北大經濟系讀書的鄧英洵，他們後來也成為好朋友，經常一起討論科學方法論的問題，還一起合寫了《經濟控制論》一類的書。維凌告訴英洵：「樸方說，他父親訪美歸來，說美國的校園民主培養了很多人才，學生組織了很多有益的活動，各種各樣的社團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對培養民主的學術空氣很有益。」英洵說：「我正和同學籌劃要辦一個同仁刊物《學友》。」我告訴英洵，準備把曾上山下鄉又考入大學的一些青年人，組織一個業餘的研究小組專門研究農村問題，他很贊同並表示願意參加。

補發工資一下領到了近 1,500 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先給母親寄去 200 元，又給姑父送去 200 元，給吳琰和丫丫買了些衣物，還有 1,000 元。在北京建材局工作的北大同學姚榮啟告訴我，光華木材廠

正在內部賣傢俱，一套 14 件，可以裝配三室一廳，只要 540 元，真是很便宜。吳琰很想買，我沒有同意，覺得剩的錢要用在急需上。誰知，後來這些錢就成為我籌備農村發展組的第一筆資金。

春節過後，我去《人民日報》拜訪孟繁華，他已調到報社的群眾工作部。這個部由聶眉初負責，老太太很開明，他們每天處理幾百上千封群眾來信，基本上都是各地的申冤告狀，真可謂積案如山。典型的案例，每天用「內參」的方式上報。第一天我看了他們出的「內參」。晚飯後，問他對「西單民主牆」的看法，老孟說：有一定啟迪作用，恐怕難以維持。你看，開始大字報貼的都是要求平反「四五運動」，要求鄧小平復出，當然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都支持，當民主的訴求越提越多，黨內反對的聲音就會出來了。

我說：你估計的很有道理。前幾天，我給胡耀邦送兩封冤案申訴信，彭沖^[211]和汪峰^[212]先後從上海、新疆打來電話，抱怨西單民主牆給他們那裏帶來了嚴重的衝擊，並以「北京再這麼鬧下去，我們在地方上幹不下去了」來施壓。我聽耀邦在電話裏向他們說：「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討論，群眾的積極性大大調動起來了，十幾年不敢講的話講出來了。這是好事，不是壞事。要保護他們的積極性，不要壓制。當然，對少數壞人要警惕，要防止鬧事。一定要注意解決好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

老孟說，多年的專制主義和左傾習慣，使多數領導人聽不進群眾的意見，像耀邦這樣開明的領導人還是少數。你看，現在一方面平反冤假錯案，一方面又在繼續製造。清理「三種人」，面搞的很大。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思維模式，改變起來談何容易！當然，誰的孩子誰心疼，高幹子弟造反就是「好人辦錯事」，平民的孩子造反就是「壞人幹壞事」，雙重標準嘛！我說，我和耀邦也談了這個問題，他似乎有難言之隱。

老孟問：怎麼說？我說：我和耀邦說，現在，不少地方整肅「三種人」，往往變成一派整一派。當年造反的人，98-99% 是這樣三種人，一種是年輕幼稚響應毛主席號召的紅衛兵，一種是看到了 17 年的問題想革新摸錯了門的人，一種是本人或親友曾受到不公正對待想改變現狀的人。狄德羅說過：「如果把傻子當做壞人那就遭了」。也確有 1% 不到 2% 的人，可能是壞人，一種是渾水摸魚的痞子流氓，一種是挾私嫌尋報復的人，一種是煽動極左製造事端構成犯罪的人，但對這三種人應當用刑事犯罪懲處。治亂世用重典，但文革剛結束，不宜用民眾厭煩的政治運動方式解決。

[211] 彭沖（1915-2010），福建漳州人。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212] 汪峰（1910-1998），陝西藍田人。時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

我接著和他說，若不是文革一開始，我被打成了反革命，也可能成為造反派。從北大和各地看，造反派中有很多有頭腦、有才幹的人，也混有痞子、流氓，保守派則較多是工農或幹部家庭，比較循規蹈矩。所以，不應該一棒子夯。耀邦很認真的聽著，感慨地說：「你說的很對。對造反派應該區別對待！毛主席不號召，哪會有那麼多的人造反？17年不欠賬，群眾哪會有那麼大的冤氣？你比我們許多老幹部清醒。有些人受了冤枉就想出口氣，也可以理解。」老孟感慨地說，有耀邦這種認識的領導人畢竟不多啊！

西單貼了長篇大字報，題目是《2000年：中國法西斯化的危險就在眼前》，給人們提出了警示。老孟笑著說：野火燒不盡嘛！不過，對我來說，就像化石在看自己的歷史。我想，老孟大概從當《首都紅衛兵報》主編被毛澤東看中調到《人民日報》，又讓當成「五一六」整了許多年，把甚麼事都看淡了。我把準備找一批人研究農村問題、推行包產到戶的想法告訴他，他認為這倒是一個切合實際的好想法。但中央剛決定「不許包產到戶，不准分田單幹」，切不可操之過急，往槍口上撞，最好是因勢利導。我介紹他認識了維凌，並商定我們三人每週碰一次面。

朋友介紹我認識了寫電影文學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的彭意東，他高高瘦瘦的，一副文弱書生的樣子，但談吐不凡，文筆犀利，思想深刻。以王靖筆名寫的這部劇本，十分尖銳地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深藏於不合理體制內的封建特權和官僚階層，正義人物都逃脫不了悲劇的命運。在他家，我還碰到了遇羅錦，這是一個有思想、有追求的女性。我說：「遇羅克^[213]的《出身論》寫的多好呵，鼓舞了一代人！你最好寫寫他。」她笑了笑，什麼話都沒有說。

4-4 胡喬木說：「否定了毛主席，就否定了我們黨！」

我和維凌、繁華3個人都在文革中歷盡蒼桑，彼此也都欣賞對方的人品、學識、眼光和能力。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雖然「四人幫」垮台了，雖然一系列冤、假、錯案正在平反，雖然真理標準的討論開始解放人們禁錮的思想，雖然天安門事件的平反讓人們出了一口氣，雖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30年形成的「極左」影響滲透在各個方面絕不可低估，因而千萬不能輕易盲動，不能作無謂的犧牲。怎麼辦？我想不妨先投石問路一下。

[213] 遇羅克 (1942-1970)，北京人。因寫「出身論」批判「血統論」，慘遭殺害。

1979年1月底，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理論務虛會」。幾個經濟所的研究人員在月壇北小街2號2號樓的四樓會議室，由馬洪^[214]主持進行討論，大約有60多人參加。我發言說：「大家對文革浩劫都有切膚之痛，我也是個文革的倖存者。後來，當反革命到農村，看到農民活的不像個人，經濟破壞的一塌糊塗。我們既然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說馬列主義是真理，社會主義是正確的，而我們又堅持了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那麼，我們的民主就應該是越來越多的，經濟就應該是越搞越好的。可實踐卻恰恰相反，我們既缺少起碼的民主，經濟又長期遭受破壞，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環顧了一下大家，接著說，邏輯的結論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說馬列主義是真理，社會主義是正確的，而我們沒有實行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或者說馬列主義不是真理，社會主義是不正確的。毛澤東從1956年「反冒進」，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反右傾」，1960年「餓死人」，直到1966年起的10年文革，越來越左，以致使國家走向崩潰的邊緣。若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四人幫」何能橫行無忌為禍全國？現在很多人說，毛澤東的過和功是三七開。我認為，隨著歷史真相的披露，對他的評價恐怕倒三七也不止！會場上大家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第二天，院部通知讓我上午10點到胡喬木家。胡喬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住在南長街，我準時到達。一見面，他嚴肅地說：「一諮啊，力群一直說你很有頭腦。你怎麼說話不講分寸，否定毛主席呢？你要知道，否定了毛主席，就否定了我們黨！必須堅決維護毛主席。」我說：「否定了毛主席的錯誤，才能使人們相信黨改正錯誤的決心，才能使人心信服，也才能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他有些不高興地說：「我不是跟你辯論，是提醒你不要犯大錯誤。」話不投機。騎車回家的路上，我心想：一定是我昨天的發言，已經摘要「簡報」上送了。否則，何以今天胡喬木就向我發出了警告？看來「解放思想」是有限度的，一定要小心從事。經過天安門，望著城樓上掛著的毛像，覺得這個魔君還真是厲害，把手下人一個個整的稀里嘩啦，可他的「洗腦」確很有效。再放個試探氣球看看，回家寫了個《我國幹部制度必須改革》，做為「提案」向即將召開的人大會議提出，卻一直沒聽到什麼迴響。

週末，我和維凌、繁華見面交換意見，大家都感到上層的較勁很厲害，我們一起分析了一下。雖然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

[214] 馬洪（1920-2007），山西定襄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遵循」) 不得人心已經失勢，但相信「繼續革命」的還大有人在。在幹部隊伍中，大體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人，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被「四人幫」破壞了；第二部分人，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是好的，很不完善，又被「四人幫」破壞了；第三部分人，認為現行制度必須進行大的改革。

第一部分人，基本上是陳雲的信奉者和歷次運動提拔的左派，他們認為只要糾正了毛澤東的錯誤和「四人幫」的破壞，恢復 50 年代的計劃經濟，加強黨的領導，中國就可以搞好。他們在幹部隊伍中有很大的影響，但群眾大多對他們持不信任態度，特別是青年人往往認為他們是一批左傾的教條主義者。而陳雲在延安時即被共產黨內尊為「中國的小斯大林」。改革一定會遭到他們強烈的反對。

第二部分人，大多在文革挨整後有所醒悟，認識到個人專權和計劃經濟的弊端，需要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但多年的理論禁錮、左傾習慣和既得利益，往往使他們採取「政治上左，經濟上右」的態度，他們對政治改革保守希望維護黨的領導，對經濟改革開放希望富國強兵。群眾大多覺得他們是務實派，青年人雖對他們政治上的保守不滿，卻對他們的務實還可以接受。鄧小平是他們的代表，何況他又是黨內最大的實力派。

第三部分人，以胡耀邦、趙紫陽^[215]、萬里^[216]為代表。他們經歷了文革，廣泛接觸各階層群眾，知道老百姓的疾苦，敢於下手解決難題，是共產黨內最有眼光、最開明的一部分人。他們深知，中國的現行制度不進行大的改革就沒有出路，所以後來在農村改革、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得到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但黨內的左傾勢力始終把他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少數有眼光的青年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實踐進行國際比較以後，體認到所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出現了違反人性、壓抑人的積極性的嚴重問題，而極權政治又剝奪了人起碼應有的各種權利和自由。他們意識到：不實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中國是不會有前途的。雖然這種看法還未入流，在主流中還被認為是大逆不道。但在不少青年人和知識分子中卻討論熱烈，很有市場。

[215] 趙紫陽（1919-2005），河南滑縣人。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後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其在任期間，積極推動農村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八九民運」發生後，同情學生反對鎮壓，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被非法軟禁直至病逝。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奠基人。

[216] 萬里（1916-），山東東平人。在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時，積極支持農民實行「包產到戶」，為中國農村改革開了先河；後任國家農委主任期間，主持制定了農村改革的 5 個中央「1 號文件」。

其實，年青人的覺醒是有一個過程的。文化革命開始，純真的青年抱著「批判資本主義」、「批判修正主義」的熱情投入運動，當他們發現自己成為毛澤東整肅異己的工具時失望了。特別是林彪摔死以後，各地的青年都悄悄組織起各種形式的讀書會或沙龍，討論的主題大多是：毛澤東怎麼會選一個野心家當接班人？現行的制度合理嗎？他們曾經想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改造這種制度，又沒能取得任何有實質意義的進展。那麼，馬克思主義還靈不靈？社會主義道路還通不通？成為青年人討論的熱點。

「四人幫」垮台以後，青年人的討論更活躍了。基本上是兩種看法爭論不休：一種是馬克思主義是靈的，但中國沒有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走的通的，問題是中國沒有走社會主義。所以，必須改變毛澤東的左傾路線，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已經失敗，社會主義是一種空想，各國的試驗都不成功。當然，第一種看法當時在青年中還佔多數。不過，這兩種看法都被當局視為離經叛道之論。

認識到現行制度的弊端並要求改革是一個前提，究竟怎麼樣才能改變這種制度呢？看法很多。在文化革命中受衝擊的領導幹部中，確有不少人思索這類問題。但他們往往有很強的留戀，不能徹底的反省。當他們的政治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時，他們認為毛澤東的路線是錯誤的。當他們的政治經濟利益恢復以後，他們又來維護這種制度。青年知識分子對如何改變這種制度的討論就深入多了。

我們參加的討論中，大多數青年人都認為：中國必須進行一場全面的政治經濟社會改革。那麼，改革怎樣才能有效進行？大家爭論的很熱烈。正在這時，一瓢冷水澆來，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做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理論務虛會上的大膽發言，西單民主牆引發的請願，使色厲內荏的黨內文霸胡喬木十分恐慌。遂不斷慫恿鄧小平，將毛澤東的衣鉢移植了過來。

所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像鄧小平所說：「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堅持的」。那麼，人們自然會發出疑問：為什麼「長期堅持」的這些「原則」，卻使中國長期陷入了苦難的深淵？不過，這卻提醒人們：鄧小平的「解放思想」是必須在這個劃定的框框內進行的，越過了是不行的。顯然，胡喬木這類左派和鄧小平的心還是相通的。

鄧小平講話之後，全國各地立即掀起了「左」傾回潮風。在胡耀邦支持下，寫過《讀書無禁區》的著名理論家、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

林^{【217】}，連續在《人民日報》發表反「左」的文章，用改革開放的觀點解釋「四項基本原則」，又使各地因思想解放而受壓的幹部和群眾重新抬起頭來。但不久，鄧小平下令逮捕了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他》的魏京生^{【218】}和《中國人權宣言》的任曉町^{【219】}。

雖然胡耀邦不同意這種做法，奉勸「不要抓人」，但也無可奈何；他還痛心的指出：「幾十年的教訓，就是不要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像張志新這樣遭到殺害的，有 30 萬人！」與此同時，陳雲擔任了新成立的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提出：比例失調相當嚴重，要對經濟實行「調整」的方針，實際上是想「回到 50 年代的計劃經濟」。看來，中國的改革很不容易，要走一條艱難曲折的路。我決定潛沉下來，認真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國家的發展史和改革史，思索中國如何改革的路徑。

4-5 從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探討改革的突破口

1979 年 1 月，彭意東和幾個朋友創辦了一個綜合性民間刊物《沃土》。特別是 3 月號的「特刊」登載了胡平^{【220】}寫的《論言論自由》和彭意東寫的長詩《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胡平的文章邏輯嚴密、震聾發聵、令人深思。我拿給幾個長輩看，他們一邊讚許，一邊搖頭。讚許的是論辯清晰、無懈可擊，搖頭的是言論開放、實難做到。我和維凌討論，都認為胡平是一個難得的人才，覺得他的想法很有價值。但維凌認為，共產黨若允許言論自由就不是共產黨了，這個問題恐怕很難成為改革的突破口。

我進一步分析說：在農村調查時，我意識到人們沒有了任何財產，就失去了起碼的獨立生存條件，就不能不依附於超經濟的政治強權。城市何嘗不是如此？每個人的戶口、工資、糧票都由政府控制。即使人們再不滿意，多數人為了生存，也不會往槍口上撞。洛克說的很深刻：「沒有私有財產制度，就沒有民主制度」。社會發展不成熟，先知先覺只能充當悲劇的英雄。改革一定要從薄弱環節突破，在中國就是有 8 億農民的農村！

維凌說，我贊成你的說法，農村是個薄弱環節容易突破。但是，如果能在政治上有所突破不是更好嗎？歐洲經歷了 1000 年中世紀，不是先有文

【217】李洪林 (1925-)，遼寧蓋縣人。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後任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

【218】魏京生 (1950-)，安徽金寨人。曾在北京西單民主牆貼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他》宣揚民主，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後流亡美國。

【219】任曉町 (1944-)，江蘇宜興人。曾在北京西單民主牆貼出《中國人權宣言》並組織「中國人權同盟」，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後流亡海外。

【220】胡平 (1947-)，北京人。1979 年發表《論言論自由》轟動一時，現任《北京之春》主編。

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解放佃奴、光榮革命，這些思想政治上的變革才發生工業革命的嗎！我說，一點不錯。但是，中國沒有當時歐洲各國的社會政治結構、特別是基層存在的各種獨立組織。中國的基層不成長出各種獨立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組織，中國要走向民主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接著說，從鄧小平講「四個堅持」可以看出，他雖然贊成改革開放，但政治上卻繼承了毛澤東的傳統，想從政治上突破恐怕不易。何況，我們討論過，幹部隊伍中的第一、第二部分人佔了大多數，他們不會支持大的政治改革。再說，經過10年文革，大多數群眾不希望政治上有大的動盪，想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正像艾哈德《第四帝國的崛起》所說，二戰之後，德國民眾已經對政治不感興趣了，大家關心的是「麵包、洋房、小汽車。」

改革究竟從何入手？1979年3月，在一批認真思考中國制度變革的年青人的討論中初步得到認同：城裏人希望多買到一些菜肉蛋，農村人盼望吃飽肚子，從經濟變革入手得人心。那麼，經濟變革又該從何處起步？工經所的研究生朱嘉明提出：「應當從改革計劃體制入手」，確實計劃體制是計劃經濟的核心。而中央集權正是建立在計劃體制基礎上的，要改變中央集權而不改變計劃體制是不可能的。所以，計劃經濟國家改革經濟體制，核心就是改革計劃體制。在這一點上大家沒有爭論。那麼，能不能從此入手呢？大家議論紛紛，商定分頭研究蘇東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後再討論。

一個月後，在又一次的討論中，大家分析了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的改革和蘇聯的「謝基諾試驗」^[221]，探討他們的改革為什麼都沒有取得成功？除了國際條件外，改革一開始，就從最頑固、最不容易攻破的環節入手，當然會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頑強反對。我又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從最容易攻破的薄弱環節入手？計劃體制的基礎是低價收購農產品，然後用轉移價值進行高積累去發展重工業。如果低價收購農產品的格局不再存在，改革計劃體制就有了前題。

在討論中，多數人逐漸認同了我的看法：如果八億農民能從類似奴隸勞動加平均分配的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來，他們調動了積極性就能煥發出極大的生產力，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前景。而且計劃體制的基礎也就會逐步瓦解，中國的改革就可能走上不可逆轉的道路。這時，翁永曦提出了獨特的看法，他說：農村有「三個不能變」，一是「人民公

[221]「謝基諾試驗」：蘇聯前總理柯西金在工業部門試行工資報酬與產品產量、質量相掛鉤。這個試驗因為非熟練工人和黨政官僚的反對而失敗。

社不能變」，二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變」，三是「農業學大寨不能變」，否則「八億麻雀滿天飛還得了！」有人問：「你去過農村嗎？！」大家哈哈地笑了起來。

當時，雖然經過一年的討論，大家取得了以下共識：第一，中國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第二，不具備立即從政治變革入手的條件，從經濟入手比較得人心；第三，經濟改革的核心是改變計劃體制，但一開始就攻堅不容易成功；第四，改革需要從最薄弱的環節農村入手；第五，從農村入手的關鍵是改革人民公社制度。那麼，如何改革？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從總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教訓入手；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從推動農村的實際變革「包產到戶」入手，我主張後一種意見。

這些討論先後在社科院農經所會議室、《未定稿》編輯部、北大、人大、北師大、農民日報和一些朋友的家裏進行，多則三、五十人，少則七、八個人。從1978年11月開始到1980年9月，先後歷時23個月，討論了50多次，直到「農村發展組」成立。當時參加討論的人，老一輩的只有69歲的王耕今和49歲的楊勳，30歲以上的老大學生有我、何維凌、孟繁華、羅小朋、王飛欣、陳必陶、侯漢青、胡定國、王彥9個人，其他的人都是30歲以下上山下鄉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個個憂國憂民、才華出眾，眼光、知識、能力均為一時之選。

「農村發展組」成立以前，經常參與討論和籌劃的主要是王小強、鄧英淘、白若冰、王曉魯、江北辰、楊冠三、趙小冬、謝揚、毛揮、王文仲、任大衛、李誼青、張木生、白南生、白南風、翁永曦、朱嘉明、黃江南、高王凌、李凡等人；楊小凱、王岐山、孔丹、秦曉、李捷男、文冠中、沈志華、李零、呂秋夢等人，也參加了部分討論。

農村發展組成立以後，參與工作的人更多了。我記得名字的，先後有林順寶、王世儒、孟昭晉、尚自力、陳秉才、郭朝田、王鐵南、何鳳琴、鄧煜、陳錫文、杜鷹、周其仁、高小蒙、黃曉京、馬蘇元、吳奇、梅興保、張阿妹、徐寬、劉慧勇、曾亞強、袁崇法、孫明、李平山、李慶曾、秦其明、高山、宋國青、梁曉冬、王子平、鄧永思、趙明宇、文潔、劉昶、杜巖、王依依、吳奇、王群英、李灼榮、史永銘、林克雷、左思、董迎、佟錚、古海燕、王振耀、劉丹華、丁曉聰、鄭熱力等，約200人。

4-6 「張浩來信」和「郭崇毅上書」

從1978年11月回北京，到1980年9月農村發展組成立，我一直忙得不可開交。除了週末陪丫丫玩玩，帶她去動物園、植物園、自然博物館、天文館，讓她增長些見識外，沒有休息過一天。每天的睡眠從5小時減少到4小時，還是忙不過來。我都忙些什麼呢？開始的3個月算是瞭解情況，研究在農村問題上過去和現在都有哪些爭論，討論中國的可能前景和改革的路徑，與老朋友交換意見並認識新朋友。

1979年2月以後，我開始研究發達國家，像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是如何走上現代化之途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為何發展不快，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的問題和改革，「亞洲四小龍」是怎麼騰飛的；同時，對不同類型國家發展的初始條件、邊界條件、歷史階段、社會結構、文化承傳、經濟形態、政治制度進行比較。夜以繼日的先後研究了一年半，似乎頗有所得。

3月初，國務院決定提高糧、油、豬18種農副產品收購價格。農經所討論時，一致讚許「這是黨中央的英明決策」。我在人民公社研究室說：「這固然使農民得利，但關鍵是怎麼調動農民內在的動力。」王貴宸問：「那你說怎麼辦？」我說：「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包產到戶！」研究室內一片嘩然：「中央剛決定不許包產到戶，你怎麼能發表這種言論！」「你這是想另搞一套啊！」恰巧，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張浩來信」，題目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編者按說：應「堅決糾正」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錯誤做法」，當時在全國造成了很大的震動。後來才知道，這是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的意見。在正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李先念也強調：「『包產到戶』不宜提倡」，會議的主調是否定「包產到戶」的。接著，在所內傳開了這樣的流言：「陳一諮想走第三條道路，是個造反派！」「這是和民主牆相呼應的反黨言論！」

所內只有少數人支持我，像副所長王耕今、編輯部崔力群等。其他人一提起「包產到戶」都是顧左右而言他。我和維凌、英淘說起此事，英淘說：「這些人對農村根本不瞭解！」7月8日下班以後，我還在看書，秦其明走過來說：「告訴你，有人來宣傳你主張的包產到戶了。安徽來了個政協委員，叫郭崇毅，帶了個包產到戶的資料。可是所長讓副所長處理，副所長又讓我處理，你說我能咋辦？」我問：「人呢？」他說：「走了。不過，別急，他明天還來。」我說：「明天他來了，你讓他找我。」

第二天，下午兩點半，郭崇毅來了。他面色黝黑，年近花甲，剛一坐下，就興奮地從書包裏拿出一份《關於參觀肥西縣午季大豐收情況的報告》遞給我，同時滔滔不絕地介紹起來：原來，1978年肥西縣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從夏到冬，未落透雨，晚稻無收，田地龜裂，人心惶惶。山南區被迫大膽採取包產到戶，種「保命麥」，誰知讓老天爺逼出了一個今年的夏季大豐收！夏糧竟比上一年增產兩倍半，徵購完成指標的5.7倍。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喜訊。我們一下談了三個多小時。

我決定將郭崇毅的這個報告上送，並請郭崇毅三天後來聽回音，他高興地走了。我立即將材料複印了兩份，晚飯也沒吃，騎上自行車就去了胡耀邦家，耀邦叔叔和德平都不在，我留下一份材料。又騎車到了鄧力群家，我說：「鄧叔叔，我有重大情況彙報。」他說：「什麼事啊，看把你累得一身汗。吃飯沒有？沒吃，一塊吃吧。」飯後，我向他詳細介紹了郭崇毅反映的情況，並把材料交给了他。

鄧力群很認真地在看那份材料。我到英淘的房間聊了起來。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鄧力群走了過來。他問：「這增產的數字可靠不可靠？」我說：「我也問了郭崇毅這個問題，他說是他親自核實過的。」我接著向他介紹了在胡廟公社調查時，李和義說的一番話。鄧力群說：「1961年曾希聖^{【222】}在安徽搞『責任田』，渡過了困難，後來被毛主席批判。現在，安徽農民又搞了起來，這個問題值得重新思考。」夜裏，我住在英淘那裏沒有走。

第二天，還沒吃早飯，鄧力群給在甘肅當省委書記的宋平^{【223】}打電話時說：「去年安徽大旱，肥西農民搞了包產到戶，今年夏糧增產兩倍半，你那兒落後邊遠地區，不妨也可以試試。」對方似乎回答說，中央剛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啊」。鄧力群說：「試驗一下嘛，錯了再改就是了。」我心想，鄧叔叔做事還真是果斷，有魄力。後來知道，當天書記處就研究了郭崇毅的報告。會後，胡耀邦給萬里打了電話說：「你可給農民辦了件大好事啊！」

回到農經所，我告訴了王耕今。他握著我的手說：「一諮，這件事你辦得好！對還是錯，讓實踐檢驗嘛！」郭崇毅如約來了，我讓他放心，材料已上報中央，並請他吃飯。他給我講了他的傳奇經歷：他16歲時，上海「8.13」抗戰打響，即投筆從戎奔赴前線，又變賣家產組織游擊隊抗日。

【222】曾希聖（1904-1968），湖南興寧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223】宋平（1917-），山東莒縣人。時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曾歷任周恩來秘書、國家計委主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內戰爆發後加入民盟，解放後擔任安徽省政協常委。1956年，他發現家鄉肥西縣4個初級社並高級社時減產10%，卻報增產50%，他寫成材料往省裏一彙報，竟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判刑12年。

他說，誰知道禍中有福，過了6年勞改的囚禁生活，1962年平反了。要打成右派，說不定現在還戴個帽子呢。自己從小長在農村，對農民的疾苦總縈繞於心，農民是勤勞的，土地是肥沃的，可多年來他們還是缺衣少食，住著草屋，讓人心疼。今年夏糧大豐收，我再也坐不住了，走村串隊進行「私訪」，一處處的核實數字，終於寫出了八千字的報告。可是，到北京後，接連在新華總社和人民日報社碰了釘子。幸虧到你們所碰到了知音。只要你到安徽看看，調查調查，就會有止不住的喜悅，看到未來的希望。

說來也可歎，「六四」發生後，可能因為我的名字不允許出現在報刊上，所有的媒體在報道「郭崇毅上書」這件事上，無一例外都編造了不真實的情節。既使像鄧力群、郭崇毅這樣的「硬漢子」也不敢說真話^{【224】}。當郭崇毅的表兄唐德剛^{【225】}拜訪我說起這件事時，他說，在合肥見到了表弟，表弟一再讓我代他向你致歉，說：「實在是沒有辦法，才編了一段故事。」我笑著說：「為老百姓做了好事就夠了。」唐德剛說：「共產黨在什麼事情上不編假話哪？這真是民族的悲哀啊！」

4-7 農村問題的禍源是奴隸勞動加平均主義的人民公社

1979年6月上旬，王耕今讓我接待寫《印度對華戰爭》的英國作家馬克斯韋爾。他問我：「二戰以後，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是隨著物質成本的增加，人工成本逐步減少。馬克思說過，物化勞動追加時活勞動就會減少。為什麼中國出現了物化勞動大量追加，活勞動也在追加，勞動生產率反而下降的情形呢？希望你給我一個學者的真實解釋。」我感覺，這確是一個不身臨其境的人難以理解的問題。

我說：二戰以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人口每年都以1-3%的速度在遞減。中國從1949到1978年30年間，化肥施用量增加了150倍，機械馬力增加了12,000倍，農業人口卻從81.4%上升到84%，農業勞動力增加了兩倍，勞動生產率反而下降了。比如，中國在1956年人均佔有糧食612

【224】見國內各種報刊關於「郭崇毅北京上書」的報導及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225】唐德剛（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傳記文學家、紅學家。他在口述歷史方面有很大貢獻，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等。

斤，到1978年下降到590斤。為什麼會這樣呢？關鍵是左傾的做法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說，請你進一步解釋。

我說，這要解釋清楚很費時間。他說，我能不能請你中午一起吃飯？這樣我們可以進行充分的討論。當時外事紀律很嚴，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上級都有規定。王耕今告訴我，他對中國很友好，問什麼回答什麼，實事求是。所以，我可以沒有什麼顧忌地講。我說，中國從1956年過急地搞了高級社，當年生產就下降了。後來「窮過度」到人民公社，情況就更差了。他說，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個問題，急於實現共產主義嘛！但我還是不理解，問題怎麼會那麼嚴重？我們一邊吃著，一邊聊著。

我告訴他，要理解這種現象，就需要瞭解人民公社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也就會知道為什麼這種制度會帶來生產的萎縮。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農民的財產都歸公了，他們就在一種按自然村落為基礎組建的生產單位中勞動和生活，幾乎喪失了一切自由權利。農民沒有了種植的自主權：每個生產單位種什麼、種多少，都由上級的計劃規定，特別是實行「以糧為綱」以後，的確是「其他掃光」。農民根本無法從本地特點和需要進行種植。農民沒有了勞動的自主權：每天集體勞動，用工分計算勞動報酬。一般，全勞力10分，半勞力5分。早晨，鐘一敲，哨一響，農民就得一齊出工。遲到、早退扣工分，甚至「倒扒皮」（註：指誤一個工罰兩個、三個工）。一年四季，從早幹到晚，連走親戚、幹家務的時間都沒有，人被拴的很死。農民沒有了產品的自主權：農民無權支配自己生產的產品。分給自己的部分不管多少、好壞，反正就那麼多。想多要的沒有，不想要的也得分。集體生產的剩餘產品農民個人無權過問。農民所得遠小於勞動付出。

近30年大多數農民沒吃過飽飯。這是因為：一者，農民生產的產品先得按國家計劃低價強行徵購，剩下的產品不夠吃，僅僅能勉強維持生存；二者，農民的口糧分配基本上按人口平均，人口多的可以維持，勞力多的不夠吃。三者，加上各種攤派，農民幾乎被榨的一無所有。人民公社的勞動生產率大幅下降。所以，農民形容人民公社是「上工一窩蜂，幹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誰都磨洋工，分配大鍋飯，一齊綁著窮」，幹部則認為人民公社是「奴隸勞動加平均主義」，「生產比解放前還差」。但是，萬里去年在安徽大旱的情況下，尊重農民的意願，同意他們種「保命麥」，肥西縣搞起了包產到戶，今年夏糧就增產了2.6倍。馬克斯韋爾驚奇地問：可能嗎？我又給他介紹了郭崇毅反映的情況。並說，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只要調動起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和農村狀況一定會發生大的變

化。他高興地說：「政府的人只說面子話，你的分析和介紹令人信服。中國有你這樣的專家，農業一定會搞好。謝謝，謝謝！」

我回所後，立即把和馬克斯韋爾的談話，向王耕今作了彙報。他說：「你講得很好，既實事求是，又思想解放。最近，關於包產到戶的問題爭論很激烈，編輯部把爭論的問題整理了出來，你轉給郭崇毅看看，他能不能回答一下這些問題。」9月初，王耕今把郭崇毅寄來的第二個報告《責任到戶的性質及其有關問題》上送。很快，中央辦公廳將之轉發全國，這個報告對農村改革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10月初，我決定到幾個省轉一轉，看看動向。先去了周惠任書記贊成包產到戶的內蒙，到臨河找張木生沒在，和當地農民聊起來。問：什麼時候生活好？答：給地主扛活的時候生活好。幹一季子活，全家人一年就夠吃了。幹活時，地主給的飯食也好，都是白饅和麵條。問：解放後甚麼時候好？答：解放後一直吃不飽。要說好嘛，要飯時可以開個證明了！聽了讓人心酸。問：現在哪？答：開始搞「口糧田」，日子也許會好起來。

途徑濟南，在趵突泉喝了兩杯茶，看了看大明湖。和郊區的農民聊起來，問：什麼時候生活好？答：韓復榘^{【226】}的時候。問：現在哪？答：要能像荷澤那樣搞包產到戶就好了。本想去荷澤看看，但北京的事情很多，耕今讓我出來15天，只能走馬看花。直下廣東，到南邊看看。其實廣東惠陽、湛江不少搞了包產到戶的地方，農民都增產增收，上邊越糾偏搞的越多。但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我和順德老農的座談。

順德是珠江三角洲最富裕的地方。可我一進農民家，什麼東西都沒有，真也可以說是家徒四壁，窮困不堪。廣東農民一向習慣養「三鳥」（指雞、鴨、鵝），也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割的一家不剩幾隻。我和幾個老農座談，一個快80歲的老農說：「30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問：那什麼時候生活好呢？回答說：「陳濟棠^{【227】}的時候！」，實在令人深思。

總的看來，在解放思想的鼓舞下，各地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的願望恐怕誰都難以扼制。

【226】韓復榘（1890-1938），中國近代軍閥，曾於30年代任山東省政府主席。

【227】陳濟棠（1890-1954），曾於二三十年代主政廣東，在經濟、文化上頗有建樹。

4-8 參加「模型小組」和提出「中華振興百年設想」

1979年6月底，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決定成立4個調研組：張勁夫^{【228】}負責經濟管理體制組，馬洪負責經濟結構組，汪道涵^{【229】}負責技術引進和企業現代化組，于光遠負責理論和方法組。

在經濟結構組內，成立了一個模型小組，由工經所的張宣三^{【230】}負責，成員有數量所的張守一、毛立本和我。我們試圖仿照列昂節夫的辦法，搞一個中國的宏觀「投入-產出模型」。模型小組的幾個人，都思想解放、工作認真，而且數理基礎不錯。當大家夜以繼日地把各個產業的投入、產出數據搜集到手，計算「消耗係數」時都傻了眼。舉個例子說，一噸煤在上海售價是一百多元，投入後產出還盈利，而一噸煤在貴州售價不到20元，投入後產出卻虧損，這個「消耗係數」怎麼計算？既使「投入-產出模型」做出來，也不過又是一個「小貓哄大貓」的結果罷了。

張宣三是個明白人，文革前就和許良英^{【231】}一起翻譯過愛因斯坦文集，他拿給我一篇剛寫成的論文，題目是《試論唯意志論對我國經濟造成的破壞》，很敢講話。我悄悄和他商量說：「模型小組多我一個人也起不了什麼大的作用，我正組織一批人準備推動農村的包產到戶。」他說：「這可是個大事，去忙吧。」一周的時間，我既可以鑽到圖書館研究落後國家如何才能起飛的資料，又可以和朋友們討論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如何推動。

這時，馬洪找我和王貴宸說：「一諮，你當過公社黨委書記，有切身感受。我想，人民公社的『四大管理』（指勞動、工分、財務、物資的管理）是一個大問題，你能不能用三年時間完成一套管理叢書。怎麼樣？」。我笑笑說：「這個課題我不作。也許還沒作完，人民公社已經不存在了！」他一下愣在了那裏，不知說什麼好。王貴宸則對我宣傳包產到戶很不滿意，那時他對包產到戶持不贊成的態度。

吳琰在恢復高考時失去了機會，日夜忙著補課，準備考電視大學。丫丫兩歲多了，要人陪著，我又沒有時間，就托從事幼兒工作的二嫂劉秀嫻給她找了個全托的幼兒園，在北京火車站附近，是北京衛生局第三幼兒園。可能所有兩歲多的孩子都是這樣，一聽說有小朋友一起玩就很高興，

【228】張勁夫（1914-），安徽肥東人。時任財政部部長。

【229】汪道涵（1915-2005），安徽嘉山人。時任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後任上海市市長、上海經濟區主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

【230】張宣三（1916-），浙江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231】許良英（1920-），浙江臨海人。中國自然科學史家。

爸爸、媽媽不在身邊又會感到沒有依靠。週末去接孩子，她總會一下子撲到我懷裏。一次，從北京站乘公共汽車到西單，她不斷喊：「擠死了！擠死了！」下車一看，我抱她的左胳膊上竟有一截她被擠出來的屎巴撮兒。

我同時在聽幾門課，到北京農業大學聽生產經濟學，到院部聽發展經濟學，到人民大學聽人口經濟學，到北京大學聽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實行惡補。這時，彭意東找到我說，組織上讓他父親施壓，《沃土》可能辦不下去了，搞不好還會抓他，問我能不能幫幫他？我和吳琰商量，共產黨不可能允許民辦刊物長期存在。彭意東是個人才，最好保護一下。在全國總工會當副主席的顧大椿是吳琰父親介紹入黨的，我說你能不能請他幫幫忙，讓彭意東到全國總工會文工團去搞創作。吳琰去一說，事情倒是辦成了。可彭意東的才華似乎也從此淹滅了。

11月底，維凌建議找幾個朋友開個會，由我主講已經討論了一年的「改革構想」，大家進行討論，以便凝聚共識。週末，在農經所會議室，由我主持召開了一個「中國前途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何維凌、孟繁華、羅小朋、鄧英淘、王小強、白若冰、江北辰、楊冠三、趙小冬、陳必陶、王彥等人。我說，「中國向何處去？」是「四人幫」垮台後三年來大家討論的主題，根據我和幾個朋友的研究，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從各國的發展看中國。縱向來看，各國的發展大體有3個階段，這個看法既不同於馬克思的一元史觀，也不同於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我們的老祖宗認識到「道法自然」是很了不起的，其實萬事萬物的發展變化無不遵循自然，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亦概莫能外。正如下表所說明的：

類目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主要勞動人口	農業人口	工業人口	智能人口
主要勞動手段	人力	機電	電腦
主要產業型態	第一產業：農業	第二產業：工業	第三產業：服務業
主要經濟類型	勞動密集	資本密集	知識密集
經濟社會簡稱	農業社會	工業社會	信息社會
經濟發展階段	傳統經濟	近代經濟	現代經濟
政治發展階段	君權政治	精英政治	民主政治

我們可以看到，沒有第一階段的自然成長和內部分化，就很難有第二階段的正常發展。發達國家處於農業社會時，像英國1760年、美國1820年，也是80%的農業人口，人均佔有糧食500斤左右。當農產品加工發展出糧油、紡織、印染這些輕工業時，機械、化工、鋼鐵、軍火這些重工業

逐漸出現了。隨著工業社會的出現，君權政治解體了，產生了精英政治。精英政治既可以發展為民主政治，也可能走向獨裁政治。橫向來看，目前世界各國大體有3種模式：第一種是西方國家模式，第二種是蘇聯東歐模式，第三種是第三世界模式。

第二個問題：從中國的農村看中國。如果我們想走出自己的路子，就得從80%以上人口是農民這個最大的國情考慮。我們現在，第一種模式走不了，第二種模式走不通，第三種模式不能走。但第一種模式發展農業形成經濟的內部分化，第二種模式集中運用國力加快建設速度的經驗，都是可以借鑒的。從我國30年的經驗教訓看，農業搞的好，國家的日子就好過，農業出了問題，國家的日子就難過。我們的困難和劣勢在農村，潛力和優勢也在農村。安徽肥西去年秋種一搞包產到戶，今夏就增產兩倍半以上，若全國推行那還得了！況且，農村先行改革震動小而成功。

第三個問題：從中國的未來看中國。中國進入現代化發達國家之林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萬丈高樓平地起，我考慮是不是可以搞一個「中華振興百年設想」。比如說，第一步，如果能有20年的改革，通過農村改革、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到本世紀末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礎和民主政治的框架；那麼，第二步，就可能出現50年的起飛，使法律制度、社會政策、文化環境、民主政治的建設走上軌道；第三步，再用30年實現全面的振興，到下個世紀80年代，中國就可以成為世界一流強國。

我最後說，英洵不是提出要學法國布爾巴基學派^{【232】}，不斷「推倒重來」嗎？我這只是拋磚引玉，希望各位推倒重來。而後，大家進行了熱烈地討論，多數人認同這些看法，但覺得怎麼表述還需要反覆斟酌，少數人則擔心主流恐怕難以接受。但大家一致同意「構想」為下一步的研究開闢了思路，很受啟發。維凌還一再告誡大家，這是「內部討論，請勿外傳」，以免被視為「異端」，妨礙今後的合作研究。他的「方法論」介紹下一次進行。

那時，經濟學界相對比較活躍。年底，經濟所請來了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在四樓會議室講東歐經濟改革的經驗。布魯斯說：經濟決策有三個層次，國家決策、企業決策和家庭決策。蘇聯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時，是三個層次都由國家決定，以後前兩個層次由國家決定、第三個層次非集中

【232】布爾巴基學派：20世紀30年代，法國的數學期刊上出現了一批高質量的論文，署名「尼古拉·布爾巴基」。原來是一批青年數學家痛感法國數學的落後，決心進行有組織的集團性研究，並實行「推倒重來」的辦法，引進了數學結構的概念，編寫了多卷本的《數學原理》，對現代數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化；匈牙利是第一層國家決定，第二、三層非集中化；南斯拉夫則是三層都非集中化。按他的說法，我國一直實行的則是戰時共產主義的作法。

布魯斯的另一個說法，倒是應該引起注意，他說：經濟改革要以政治改革為條件，經濟改革因觸動既得利益而遭到反對，支持改革的人往往會被指責為修正主義分子。所以，改革必須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否則，改革很難取得成功。但經濟改革是民眾不可遏制的要求，一旦進行，既使遭到挫折，也會或遲或早地進行，直至尋找到民眾可以接受的方式。雖然布魯斯主張的，還是引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但當時對中國還是很有影響。

1979年的中國，將會載入史冊，一方面有喜人的進展，另一方面有惱人的憂慮：

首先，胡耀邦以非凡的膽識主持糾正、平反、昭雪了1949年以來歷次運動造成的300多萬件冤、假、錯案，使上千萬人得到公平對待；同時，他還主持為3,000萬以上的地富及其子弟恢復了名譽，使之擺脫了賤民身份。其次，萬里以極大的魄力在安徽支持農民搞起了「包產到戶」，開始衝擊不合理的人民公社制度；趙紫陽在四川搞起了擴大農民自主權和企業自主權的實驗；第三，西單民主牆、民間刊物和理論務虛會，發出了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第四，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點，深圳、珠海開始創辦經濟特區。

與此同時，第一，胡喬木為鄧小平起草了「四個堅持」的講話，全面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衣鉢，為思想解放劃下框框，開始打壓、逮捕有民主追求的代表人物，取締民主牆、民辦刊物和民間團體；第二，陳雲、李先念則以「調整」為名，企圖恢復50年代的計劃經濟；第三，王任重主持的國家農委則極力反對包產到戶，堅持一定要穩住「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第四，清理「三種人」時，又製造了不少新的冤、假、錯案，引起了不少地方的派系傾軋。

在1979年，實際上鄧小平主張的「政治上獨裁，經濟上開放」的格局已現端倪。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之間的矛盾衝突看來將會不斷上演。

4-9 王小強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

1979年12月，《未定稿》發表了王小強寫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一文。此文引經據典，論辯有力，一氣呵成，令人信服。一時間相互傳閱，真可謂洛陽紙貴。我看後立即拿給王耕今，他馬上請崔力群在《農業經濟問題》月刊上轉發了。《未定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後，依據于光遠

的建議在1978年12月創辦的內部刊物，出版一年來為破除迷信，衝破禁區發表了不少好文章，深受讀者歡迎。

在年初的一次青年人的討論會上，我認識了王小強。他瘦高的身材，黝黑的皮膚，一雙靈動的大眼睛透出聰明，講起話來娓娓動人，而且總有獨到的見解和獨特的視角。文化革命開始，他父親王勉即以「反黨」的罪名遭關押，母親被毒打後得了精神分裂症。他先後到志丹縣、遂平縣插隊，後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到洛陽農機學院。畢業後「上、管、改」（即當時提出的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回縣當鉗工。1978年因母親被迫害致殘而調回北京，仍到街道工廠當鉗工。期間，他刻苦攻讀馬列和各種文史書籍，寫的文章受到林韋賞識，經鄧力群批准調到了《未定稿》。

《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一文，開頭即引用新華社1948年「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解釋了什麼是農業社會主義。在用列寧、毛澤東的話論述後，又歷數這種思想在中國的表現，從「五斗米道」、「天朝田畝制度」到康有為、孫中山一直講到合作化。而後指出：合作化高潮實際上是「幹部的農業社會主義積極性」，「強迫命令農民群眾的結果」，「那些高喊平等、迫令老百姓窮過渡的統治者，自己卻享受著特權和奢侈豪華的生活」。此文對長期受極左束縛的農村幹部起了震聾發聵的作用。

此前，7月《未定稿》就發表了王小強《試論農民和中國革命的關係》一文。他指出：「農民革命的政治目的只是改朝換代，擁戴、推舉一個『好皇帝』，中共的成分農民佔了69.1%，他們中一些人往往「把革命理解為『江山易主』、『打天下，坐天下』，以解放人民的『恩人』自居，用封建社會家長專制的方式來管理」，並呼籲要「政治制度民主化」。看來，家庭的遭遇和基層的歷練，使他有一股強烈的改革意願。

有一次，他歎著氣和我說：「我面朝黃土背朝天幹十四、五個小時，只掙兩毛錢，和養兩隻母雞一天下兩個蛋差不多。」我笑著說：「不對，4隻母雞！我們那兒一個蛋只賣5分錢。」農民用兩分錢買一盒火柴，兩分錢買鹽，剩下的一分錢再買兩根「支農煙」抽抽。他說：「我覺得世道太不公平，就努力鑽研，終於有了機會，到《未定稿》工作。」後來，小強和我共同發起創辦農村發展組，並成為核心，在農村改革中做了許多工作。小強那股憂國憂民的精神，從他眼神上就能看出來，幾十年都沒有變。

顯然，上層對包產到戶的看法不一，爭論激烈，這一點也不奇怪。實際上，包產到戶是農民長期對抗強行集體化的方式。1956年搞高級社，浙

江永嘉縣副書記李雲河^{【233】}根據農民意願搞了包產到戶，效果顯著深受農民歡迎，但好景不長，1957年被批判為「射向農業合作化的毒箭」、「頑固堅持資本主義道路」，李雲河等幾百人遭懲處。1958年搞人民公社，湖南、江蘇、河南、甘肅等省的農民又搞起了包產到戶，也被批判。1960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為扭轉大量餓死人的局面，搞起了「責任田」（即包產到戶），得到毛澤東的首肯。

曾希聖得到上諭，立即在全省實行「責任田」，1961年底達到90%以上。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錢讓能^{【234】}給毛澤東寫信，支持和推薦包產到戶。1962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嚴厲批評了包產到戶，並批評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子恢^{【235】}、曾希聖等人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9月，毛澤東大講階級鬥爭，批判「單幹風」（指包產到戶）。爾後，一大批支持包產到戶的幹部受到批判、鬥爭和處理，僅安徽一省即達幾十萬人。

如果說，1979年春「張浩來信」引發的全國性激烈爭論，矛頭主要是反對包產到組的話，那麼，1980年春夏之交一場更激烈的爭論，主要是圍繞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是姓「社」還是姓「資」進行的。華國鋒、李先念、王任重對包產到戶一直持反對態度。1980年1月，國家農委召開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王任重大講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大多數人讚成。華東各省在小組會上，幾乎圍攻起搞了包產到戶的安徽。

此時，國家農委的機關刊物《農村工作通訊》連續刊出：《分田單幹，必須糾正》，公開點名批判安徽搞了包產到戶；《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則針對萬里在安徽農業會議上的講話——「包產到戶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進行指責。萬里雖於1980年2月調到中央，任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但國家農委的其他領導人，除杜潤生態度騎牆外，一致反對包產到戶。最有意思的是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久^{【236】}的安徽肥西調查，他作出了和事實大相逕庭的「包產到戶不如包產到組，包產到組不如集體生產」結論。

而接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張勁夫，一到任即旗幟鮮明地反對包產到戶。他從1980年4月開始連續在蚌埠、蕪湖、巢湖、合肥召開會議，批

【233】李雲河（1930-1998），山東惠民人。1956年在浙江永嘉擔任縣委副書記時，支持農民包產到戶。

【234】錢讓能（1933-），1962年8月曾給毛澤東寫了「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

【235】鄧子恢（1896-1972），福建龍巖人。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236】李友久（1917-2005），福建廈門人。時任農業部副部長。

判、指責、圍剿包產到戶是「經濟主義」、「機會主義」、「工團主義」，搞的鄉縣以上幹部思想混亂、惶恐不安，擔心又要折騰和清算。萬里支持的滁縣地區幾乎成為包產到戶的孤島，和滁縣東部臨界的江蘇，還豎起了「堅決抵制安徽的單幹風」、「反對復辟、反對倒退」的大標語。

看來，1980年關於包產到戶爭論的交鋒會更激烈的進行。應該說，何去何從的爭論，仍處於膠著之中，越往上層反對包產到戶的輿論越強烈。要能真正反映農民的意願和心聲，必須深入農村親身作一次比較系統的調查研究，以便作到心中有數，讓事實說話。我決定抓住戰機，用3個月的時間到安徽做一次深入的考查，並先後和維凌、繁華、英淘、小強、小朋等人，反覆交換了意見和看法。

4-10 安徽調查之一：趙紫陽批示「絕不能谷賤傷農」

1980年春節，我去給大姑姑陳心一拜年，遇到了三表姐吳學昭。吳學昭剛從四川調回北京，她還是那麼左得可愛。一見我，就疾言厲色地說：「表弟啊，毛主席屍骨未寒，你們怎麼就要破壞人民公社？」我說：「你知道全國有兩億農民吃不飽飯嗎？」她生氣地說：「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她被認為是個「左派」，特別是她和父親吳宓「斷絕關係」以後，在親友中口碑不佳。但她文筆很好，特別是以「蕭光」筆名寫的一些文章很有味道。

吳學昭的個人生活其實是很不幸的。她和一位越南歸僑杜展潮結婚後，育有一個聰明、可愛的女兒吳南纓。杜展潮時任新華社山西分社副社長，為人耿直正派、溫文爾雅、思想開明。因其係胡志明的好朋友，後來調任中國駐越南使館文化參贊。胡志明想讓他留在越南，他沒有同意。1971年回國述職時，住在廣寧伯街一號岳母陳心一家，因煤氣中毒不幸去世，令人惋惜。

吳學昭和蔣南翔還有一段淒楚的愛情故事。1948年，吳學昭在燕京大學讀書時，由敬佩而愛慕，與蔣南翔發展起了特殊的情感。後來，被蔣南翔夫人告到鄧穎超那裏，周恩來嚴厲批評了蔣南翔，並把吳學昭調離北京到四川中共西南局工作。文化革命中，吳學昭以蕭光的名義給中央文革的王力^[237]寫了一封信，王力的回信在西南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因為蔣南翔的夫人在文化革命中揭發丈夫，後來兩人離了婚。30年後，蔣、吳二人終

[237] 王力 (1922-1996)，江蘇淮安人。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

結連理。而大姑姑家，因為經常接待一些地下黨員，大姑姑自然在解放後成為「革命老人」，與大表伯吳宓處於冰炭兩重天的境地。

言歸正傳。當時，堅持農村改革的萬里正處在上下兩面夾攻之中，鄧力群轉給我一封信。這封信是張勁夫寫的，信中詳述了堅持人民公社的重要性並歷數包產到戶的弊端，還特別對安徽最富裕的宣城縣金寶圩水陽公社搞包產到戶提出了批評。我去找鄧力群，他說：「聽說你正準備去安徽做調查，把張勁夫的信轉給你看看。要回答信裏提出的問題，特別是富裕社隊為什麼搞包產到戶的問題。」我向他報告了調查計劃。

去安徽前，農經所主管人事的副所長鄭伯權，突然很嚴肅地找我談話。他說：「一諮同志，你要留神，你是耀邦介紹來的，不要一條道走到黑啊！你看看基層幹部的來信，他們說『包產到戶是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說『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央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准分田單幹』，我們黨可是有紀律的。」我說：「結論產生於調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頭，等我回來咱們再討論。」

我用了近1個月的時間，看了各種支持、反對包產到戶的資料，為使調查合理又設計了各種表格。計劃採取實地調查與書面調查、典型調查與普遍調查相結合，調查資料與統計資料、現實情況與歷史情況相印證，領導與群眾、正面意見與反面意見相參照的方法，選擇生產條件不同、經濟水平不同、工作狀況不同、歷史發展不同的若干區域進行調查。

4月15日，我到了安徽合肥。安徽省農委研究室的劉家瑞、辛生接待了我。我說明了來意，他們很合作，我們一起確定了調查的地點，並向若干地縣發出了我的調查表格。辛生送我出來時告訴我，現在全省從上到下對包產到戶的爭論都很激烈。我先到了肥西縣，縣委研究室主任魏忠說起包產到戶吞吞吐吐，似乎有難言之隱。其實，我早知道肥西縣委對包產到戶持反對態度，告訴他不必為難。不過，他說的「農民賣糧難」問題，卻引起了我的注意。

肥西縣1979年夏季豐收之後，今夏又面臨豐收形勢。這個縣一般夏糧產量在5000萬斤左右，徵購任務為500萬斤。1979年夏糧達到13,000萬斤以上，收購量猛增到9,200萬斤，是常年收購量的10倍以上。預計今年夏糧產量、收購量大體會和去年相當。喜人的豐收卻帶來了愁人的局面：農民的餘糧賣不出，糧站又難以多收購。市場價低於收購價還是賣不出去，很挫傷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這是一個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我立即返回合肥，向有關部門詢問情況。他們說：「自50年代以來，全省夏糧收購一直維持在7-8億斤，去年一下收了20億斤。地方以平價上調給國家的糧

食越多，虧損也就越多，自然不願多收。」我根據調查的情況，連夜寫了《「農民賣糧難」的問題急待解決》^[238]，全文分五部份：肥西縣的生產形勢；「農民賣糧難」的出現；「分季統購」辦法較好；省有關部門的看法；「農民賣糧難」的原因。快郵寄給了王耕今。

我又二赴肥西縣到山南區，拜訪區委書記湯茂林。湯茂林長得高高大大的，農民親切地稱他為「湯大膽」。我問他：「為什麼搞包產到戶？」他說：「農民要吃飯！」我又問，什麼人反對？他笑著說：現在是「農民要產量，幹部要方向」。關鍵是要不要從實際出發，尊重農民的意願，衝破左的框框。他說，你可以到處隨便看看就明白了。我就走到那裏看那裏，到農民家裏調查，到會計那兒對賬。果然，和郭崇毅反映的情況一致。想起李友久的報告，真不知這位副部長的調查是怎麼做的。

1978年秋種時，山南區77%的隊搞了包產到戶，1979年夏收竟增產2.65倍，夏糧收購增加5.7倍。據湯茂林說：「1978年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省委號召種『保命麥』。我在黃花大隊蹲點，根據農民意見搞了包產到戶，萬里同意試驗。誰知不逕而走，搗不住也扭不回。農民說就像『雞瘟』，一個隊瘟了，隊隊都瘟了。」農民家家戶戶糧食滿囤，見有人來都很高興。附近社隊的農民則說：「三年學郭莊^[239]，累得皮破筋骨傷；一年學山南，十年陳債一年還！」

回到合肥，省農委劉家瑞來看我，高興地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趙紫陽同志對你的報告做了長篇批示，特別指出「絕不能谷賤傷農」，還召開了相關部委的會議，責成他們立即解決。我心想，報告剛送出去10天就批了，可見趙紫陽是個幹練的人。當晚，郭崇毅請我到他家吃飯，再三感謝我為他轉送報告，我則對他為民請命、不計得失的精神讚佩不已。他小聲說：「張勁夫四處批包產到戶，好像很有來頭。你一定要把安徽的真實情況反映給中央。」我說：「我會的，你放心吧。」

4-11 安徽調查之二：張愷帆「大鬧無為」

郭崇毅陪我參觀了包公祠。而後我南下巢湖，這是安徽的魚米之鄉，南臨長江，西抱巢湖。巢湖地委研究室主任陳建章接待了我，從他臉上的皺紋，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飽經風霜的人。他解放前參加革命，一直在巢湖工作，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他熱情地邀請我到他家晚餐，估計省農委的

[238] 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271-274頁。

[239] 郭莊係安徽省宣傳的蕭縣「農業學大寨」典型。

朋友給他說了我寫報告的事，也許是有什麼話想私下說。過去在基層，誰有話要私下說，都是請你到家裏吃飯。

果然，一到他家，他就說：「聽說你在北京給郭崇毅轉了報告，剛到安徽寫的報告就受到紫陽重視，既然你能通天，我有些心裏話想讓你反映反映。」我說：「我沒那麼大本事，但還是敢說說實話。」他拿出珍藏的老窖古井，我們乾了三杯。他幾乎快掉出眼淚地說：「我們對不起農民啊！確實，從搞高級社起農民就沒吃飽過肚皮。去年搞包產到戶，情況才好轉。現在又批起來了，再折騰的話，可沒希望了。」一邊吃一邊喝，聽他繼續說。

他動情的說：「巢湖有史以來就是一個富裕的地方，物產豐富，山青水秀，我在巢湖生活 50 多年了。三、四十年代，我們這兒每個農民的收入相當於現在的 340 元，可現在每個農民的收入只有 80 元了，還在全省、全國屬於富裕的。日本鬼子打過來的時候，國民黨的軍隊和新四軍藏在林子裏，日本的飛機找不著。以後，劉伯承、鄧小平的軍隊南下，藏在林子裏，國民黨的飛機也看不見。1958 年大煉鋼鐵，樹木砍的淨光。再一大搞公共食堂，人一批一批的餓死了，好慘啊！」

我問他：「安徽究竟餓死多少人？」他說：1962 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問安徽餓死多少人？曾希聖先說 40 萬，追問緊了，報到 400 萬。實際上，有 600 萬以上。後來，大家計算是 800 萬！曾希聖被貶到上海虹口區當書記以後，痛哭流涕地說：「餓死 800 萬人，要是過去早該滿門抄斬好幾回了！」神經都有些失常。安徽一直說「金合肥，銀無為」，光無為一個縣那時就餓死了 40 多萬人，差不多餓死了近一半。

我決定到無為縣看一看。陳建章讓我先到半湯溫泉解解乏，而後陪我到無為。一路上說起 10 年浩劫的破壞，他說：巢湖是全國五大淡水湖之一，盛產銀魚，但大躍進時「變淡季為旺季」，濫捕濫撈、竭澤而漁，弄的銀魚幾乎斷子絕孫了，後來每年銀魚的產量還不到常年的十分之一。從巢湖地區看，農村的破壞是前所沒有的，農業的破壞最嚴重，林業、牧業、副業、漁業也都無不遭破壞。

無為縣委書記叫付昌堂，抗美援朝時失去一隻胳膊，回鄉後當支部書記幹的不錯。1978 年當了縣委書記，一上任就遇上嚴重的春荒。省委決定「借地度荒」（指：借一部分集體土地給農民自由種植以度過饑荒），而無為縣的農民卻順勢搞起了包產到戶，擋都擋不住。去年，無為縣糧食增產了 20% 以上，農民歡天喜地，今年包產到戶的隊已經佔到了 75% 以上。

我先去無為縣最窮的三汊河公社調查，他們1978年搞了包產到戶，1979年糧食增產48%，交售糧增長83%，農民人均收入增加98%。接著，我去了幾個1979年秋剛搞了包產到戶的富裕社隊調查。僅僅半年的時間，寶林公社的農民說，今夏每戶可以多收小麥300斤，副業收入將成倍增長；徐崗公社徐崗大隊的農民說，今夏人均收入可以增加70元以上，比去年多了30%。但農民們最津津樂道的，卻是張愷帆^[240]的「大鬧無為」。農民把這位「張青天」說得神乎其神，感恩不盡。

原來，張愷帆是無為人，1928年入黨的老革命。在他任安徽省委書記、副省長的1959年夏，不斷聽到無為傳來田園荒蕪、災情嚴重、民不聊生的消息。他難以入眠，趕到無為實地察看，立即有農民攔車下跪請他「救命！」。當他看到鄉親們面如黃蠟、骨瘦如柴、臥床不起、浮腫到腹，又見到家家斷糧、戶戶死人時，不禁潸然淚下。立即下令解散食堂、發救濟糧、派醫療隊。

誰知，張愷帆這些拯民於水火的做法，被安徽省委報到正在廬山開會的毛澤東那裏，立即惹得龍顏大怒，嚴厲批判張愷帆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可不得了，不僅張愷帆和他的親友受到批判鬥爭，還株連了一大批說真話的幹部受到打擊，僅無為藉的幹部受批鬥、處分的就達3萬人以上。

但最可惡的，還是後來那些草菅人命毫無人性的做法：張愷帆到無為時，該縣已經餓死了14萬多人。當時，該縣農民每人每天只有二兩毛糧（「毛糧」即未去殼的稻麥），每天都有人餓死，張愷帆的救急做法深得人心。批了張愷帆以後，省裏來的工作組不僅強令農民恢復「公共食堂」，還一家一戶把發給農民的「救濟糧」搜刮了回去，並撤走了所有的醫療隊。這麼一折騰，無為縣又餓死了28萬多人！有人說，無為縣餓死32萬人。但付昌堂親口告訴我，餓死了43萬人以上！究竟多少，尚需史家考證。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乘江輪西行，到安慶拜訪錢讓能。他1962年6月任太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時，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了一封《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根據自己的耳聞目睹和親身調查，感到「責任田」是一種既適合生產力發展、又深受農民歡迎的責任制。當時，安徽實行「責任田」很快就扭轉了「餓、病、逃、荒、死」的嚴重局面。他懷著為國為民的精

[240] 張愷帆(1908-1991)，安徽無為人。1959年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時曾下令解散了無為縣的幾千個「大食堂」，開倉賑糧。後被毛澤東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神犯顏直諫，相信毛澤東會同意。誰知，很快就挨了批鬥，特別是文化革命中還捆綁吊打、全省遊鬥。

錢讓能感慨地說，包產到戶為什麼越堵越多？因為符合農民的願望，這就叫「春風吹又生」嘛！我正準備到安慶農村做調查，省農委打來電話說：王貴宸和魏道南5月15日到合肥，希望我回來等他們。我只能馬上回合肥了。走前，錢讓能請我看了一場黃梅戲《天仙配》，惜惜而別。趕到合肥，他們還沒到。郭崇毅來看我，說起令人敬佩的張愷帆，他給我唸了張愷帆的一首詩《彭總罷官》：

誰說王朝去不還，
遺風依舊襲人間。
可憐一紙陳情表，
謫貶西南路八千。

4-12 安徽調查之三：人口問題十分嚴重

王貴宸和魏道南來到合肥，聽了省農委的介紹，就讓我與他們一起到肥西。我給他們介紹了一個月來在安徽的調查，魏道南先提出質疑：「這麼下去不是破壞了『按勞分配』嘛？」，接著，王貴宸也提出質疑：「這麼搞『公有制』不就剩下個外殼了嘛？」我一路上和他們辯論，感覺他們的觀點基本上與《農村工作通訊》第三期的相同。王貴宸提出，用一周時間到一個隊的農戶做深入調查，他和魏道南一組，讓我單獨一組。

我到了金牛公社，先和公社黨委溝通。當天，召開了各大隊支書、會計會議，我先「亮出旗幟，說明來意」：大家都知道，究竟什麼樣的生產責任制，能讓農民更多的增產增收，上下都在爭論。我希望弄清真實情況，把農民的要求反映給中央，供決策參考。5天內請你們做兩件事，一是選三個不同類型的大隊，調查清楚每一戶這兩年的收入和支出情況，二是每個生產隊、大隊這兩年的各項收入支出、作物產量、社員分配和交售數量。看大家面有難色，我笑笑說：第二件事不難，第一件事有些難，但也容易解決。

接著我「訓練幹部，傳授方法」。我說：我當公社書記時，做過很多農民的家庭調查。農民往往把收入說的少20-30%，主要是怕「共產」；又往往把支出說的多10-20%，為的是說自己「入不敷出」。幹部們都笑了起來，說：「陳書記啊，你還真瞭解我們農民！」我說：「怎麼辦哪？你先調查他的支出，而後再調查他的收入，兩頭碰來碰去就差不多了。可是，3

個大隊 400 多戶，怎麼能一下調查清哪？我給你們教一個辦法，在座的支書、會計分 3 個組，再帶上你們的小隊會計，每個組負責調查清一個大隊各戶的收入和支出。」

我把設計好的家計調查表發給大家，然後說：你們每個組的小隊會計有 40 多人，分工調查一個大隊，最少也是 3 個人調查一個小隊，只要按表格的項目一戶戶填寫清楚就行了，我估計兩天可以做完。每個組的大隊支書、會計負責監督檢查，做完以後再相互複查，一般就不會有問題了。有沒有聽明白？大家說明白了。一位抓農業的公社副書記，自告奮勇負責這件事。第四天，經過複查的 420 戶家計調查表，全部高標準的完成了。

當晚，幾位公社書記請我一起吃飯。聊起來，他們都說：前年秋天「借地渡荒」，農民一下搞起了包產到戶，秋種又快又好，我們心裏都又高興又耽心，怕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搞了包產到戶的隊，農民確實增產增收了。可今年張勁夫一來，又改變了萬里的政策，真不知道今後會咋樣？我說，現在中央一再強調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農民有了積極性，生產搞好了，是利國利民的事。

他們又說起另一件讓農民反感的事：原來是「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我連夜設計了糧管所、供銷社、信用社的調查表，並請公社通知明天下午各大隊婦聯主任開會。第二天上午，我抽查了 3 個大隊的家計調查，進展還順利。下午，大隊婦聯主任都來了，一個個垂頭喪氣，又牢騷滿腹。話匣子一打開，像炸了鍋一樣。她們確實受夠了委屈，鄉親們見到了，就像避「瘟神」一樣躲開，一轉身什麼髒話都罵得出來，讓她們很難做人。「計劃生育小分隊」到哪裏，就弄的雞飛狗跳，育齡婦女紛紛逃離，老百姓說「比日本鬼子掃蕩還可恨！」

有個公社老幹部說，「只生一個」不合國情，而且從根兒上破壞了中國文化。這話說的有道理，令人深思。我在研究各國發展史和人口經濟學時，發現人口增長的規律是：農業社會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故而維持低自然增長率；工業社會高出生率、低死亡率，故而出現了高自然增長率；現代社會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故而變為低自然增長率。

這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起碼有以下幾點值得研究：

——從全球看，大凡發展正常的區域，往往人口較多的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民眾生活水平也較好；反而是人口較少的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也較低，民眾生活水平也較差；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時，採取的「低收入，高福利」模式本來就刺激人口增長。再加上，從 1958 年開始農村又實行「吃糧不要錢」的政策，大大鼓勵了生孩子，人口的不合理增長是必然的。

——中國 30 年人口不流動，造成的近親繁衍十分嚴重，大大降低了人口素質。往往一個公社內的人口，幾乎都沾親帶故。許多山區居民（像，皖南山區、安康山區），生養的殘疾、癡呆兒童竟高達 8% 到 12%。

——8 億人口生活的農村，哪一家沒有男孩就被稱做「絕戶頭」，將來家中會無人下水、無人犁地。想生男孩不僅是因為農民沒有醫療、退休、養老保險，更重要的是農民有個勞動力延續的問題。

其實，按統計一對夫婦生 2.1 個孩子，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為 0。中國強制實行「只生一個」造成了三大問題：一是據 1980 年統計，城市一對夫婦平均生育 0.96 個孩子，而農村一對夫婦則平均生育 3.47 個孩子；二是農村各地不斷出現溺、棄女嬰，致使男女性比例嚴重失調，僅濠縣地區 1980 年男女孩子的比例即達 124:100，對未來的社會穩定構成威脅；三是隨著人口老齡化，一對夫婦將奉養四位老人，這將成為難於解決的社會問題。強制實行「只生一個」，往往採取野蠻的准軍事行政手段。什麼「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屋牽牛」、「寧可死人，不准超生」這一類的標語口號隨處可見。孩子們沒有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以後也會沒有伯伯、叔叔、舅舅、姑姑、姨姨，大多都會被寵成「小王子」、「小公主」，中國的「親情文化」將失去根基。「只生一個」本質上是「計劃經濟」在人口問題上背逆自然、扼殺人性的極端做法，對中國的危害將難以估量。

後來，在 1981 年，我曾和萬里談過以上看法，他很贊同。他問我：「有什麼辦法解決哪？」我說：「只要實行這樣一個辦法，一對夫婦若第一胎生男就不生了，若生女則可以生第二胎，第二胎還生女就可以生第三胎，依此類推，一對夫婦的生育率平均小於 2。用數學公式表示就是： $1+(1/2)^n$ ！，會永遠小於 2。」萬里說：「不行，不行！男女平等嘛，你這個辦法不行。」此議只能作罷。

4-13 安徽調查之四：萬里的膽魄和小崗的創造

一周後，我帶著金牛公社的調查資料，與王貴宸、魏道南會合。回北京後才知道，他們的調查資料，數字都對不上，顯然是缺少農村調查經驗所致。我們一起去濠縣地區調查，路上仍然不斷辯論前面提到的兩個問

題。滁縣地委辦公室主任陸子修^{【241】}熱情接待了我們。顯然，他對農村情況十分熟悉，據他說：從農民開始搞「包產到戶」起，大體呈現出的仍是「農民要產量，幹部要方向」的局面，農民說「好得很」，幹部說「糟得很」。

為什麼？農民說，過去生產隊是「生產瞎指揮，幹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只能綁著窮！」，而且有「四個苦了」（平均主義拖苦了，一平二調揹苦了，瞎指揮卡苦了，割尾巴整苦了），「四個夠了」（管夠了，累夠了，揹夠了，纏夠了）。農民的要求只不過是吃飽，穿暖，有住房，一搞「包產到戶增產增收了，農民覺得有奔頭了。你問他們對包產到戶的看法，回答你的都是「當家了」、「自由了」、「解放了」一類的話。幹部就不一樣了，反映比較複雜。從支部到縣委，幾乎都經歷了反對，懷疑，同情，支持四個階段。農民說幹部大多「一怕錯，二怕變，三怕亂，四是看著領導眼色轉」，關鍵是對農村受的左傾破壞認識不清，甚至信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說教。農民諷刺他們是「講話不離『三六九』」（指：三面紅旗、六條標準、九個指頭），處處跟著領導走，今天東來明天西，辦事寧左不要右。

陸子修又向我們詳細介紹了地區各縣的情況，還送來了他們的各種調查資料。而後，我們又走馬觀花轉了一下，王貴宸、魏道南就回北京了。我繼續到全椒、來安、嘉山、定遠、鳳陽做調查。我先到了來安縣皖東老區比較典型的玉明公社，「五風」摧殘，10年浩劫，使這裏受到嚴重破壞。民眾反映：「現在生活還沒有羅司令^{【242】}的時候好！」1979年，全社78個生產隊，兩個隊集體生產，減產17.8%；48個隊包產到組，增產14%；28個隊包產到戶，增產33.5%。今年各隊就都搞了包產到戶。

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說，現在全縣搞包產到戶的隊，已經達到86%。又帶我到與之交界的江蘇，一看那邊路口、田頭豎滿了標語牌，寫的都是「堅決反對復辟倒退！」「堅決抵制安徽的單幹風！」等，還用大喇叭高喊著。我問，大家怎麼反映？他說，雖然有萬里支持，現任省領導人又批起來了，幹部都有些耽心。我是豁出去了，正像農民說的「二十多年吃不飽，叫人咋說社會好！」農民能吃飽飯了，我撤職也心甘情願。

嘉山縣的幹部群眾，一提起萬里和王任重的對話，就對萬里敬佩不已。原來，1979年3月20日下午，華國鋒讓王任重給萬里打電話，詢問安徽農村的情況。據當時在場的人說，王任重說：「中央的政策是『三級

【241】陸子修（1933-），安徽來安人。時任中共滁縣地委辦公室主任，後任中共滁縣地委書記。

【242】羅炳輝（1897-1946），雲南彝良人。抗日將領。

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動搖。安徽一些地方搞了包產到組，還搞了包產到戶，這不是變成『三級半』、『四級』了嗎？」萬里斬釘截鐵地說：「『三級半』有什麼不好？為什麼只能是『三級』而不能是『四級』呢？我看五級才更好哩！家家戶戶搞核算，更精打細算，生產會上的更快！」

萬里接完電話又和大家說：「記住，老百姓有飯吃就是最大的政策，沒飯吃就沒有政策。老百姓生活天天下降，還怎麼讓他們覺得社會主義好？」他們還說起萬里到金寨的故事：金寨是皖西大別山的老區，出過共產黨60多位將軍、200多位部以上幹部。但左傾破壞嚴重，萬里去考察時，看到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18歲的姑娘沒有褲子穿，流著淚說：「共產黨讓農民吃飽肚子，穿上褲子，住上房子，才能算對的起農民呵！」大家對萬里的膽魄和真情無不讚佩。

現今，鳳陽的小崗已家喻戶曉，是他們帶頭創造的「大包乾」風靡全國，推動了農村改革的迅猛發展。據鳳陽縣委吳庭美介紹：該縣受「五風」摧殘嚴重，像小溪河鄉1958年就提出了「五不分」（好壞不分、強弱不分、貧富不分、大小不分、公私不分）、「六一樣」（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做的、照顧的都一樣），其他鄉也差不多。結果，從1958年到1961年，全縣勞動力減少36%（包括死亡和外流），縣委書記還在全縣廣播大會上講：「寧可人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左得嚇人。

小崗村是鳳陽縣梨園公社最窮的生產隊。1979年底，吳廷美寫了一篇小崗村包乾到戶的調查報告，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小崗的情況。1956年以前，小崗生產搞得還不錯，根本沒有人外流。1958年以後，「五風」極大的破壞了小崗，人口從1958年的175人降到1960年的39人，只剩下22.3%！34.2%的人餓死了，43.4%的人外逃了。1978年春，鳳陽實行「大包乾」（實際當時是包乾到組），小崗悄悄搞起了「小包乾」（即包乾到戶，後來被稱作「大包乾」）。結果，1979年一年，小崗生產的糧食相當於1966年到1970年5年的總和。

其實，小崗人是冒著風險搞起包乾到戶的：1978年12月，小崗隊長嚴俊昌、副隊長嚴宏昌、會計嚴立會3人商定，每戶一人開個會。會上議定：一是明組暗戶，土地分到戶；二是保證上繳，不准裝蒜；三是如果幹部坐牢，大家送飯，孩子養到18歲。並當場簽成契約，蓋了手印。小崗的做法很快傳開，儘管公社三令五申不准包乾到戶，還是蔓延開了。1980年1月初，萬里看到了吳廷美的報告，大加稱讚。

1月24日，萬里來到小崗，踏著泥濘挨家挨戶看了一遍，只見各家各戶糧食都裝的滿滿的，而後高興地和大家說：「我支持你們！」一個社員

說，有人批我們「開倒車」，萬里莊重地說：「只要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多提留，對社員生活有改善，幹一輩子也不算『開倒車』！」臨走前，他再三叮囑幹部，一定要做老實人，不搞浮誇。風陽縣委書記陳庭元說：為什麼農民喜歡「大包乾」？主要是簡單易行，利益直接。

1979年比1978年，鳳陽全縣糧食增產49%，人均收入增加85%。我又專門訪問了毛澤東表揚的「合作化帶頭人」陳學孟^[243]，老人滿臉蒼桑，有苦難言，半天只說出一句話：「還是『大包乾』好啊！」，老人屋裏同樣是家徒四壁。告辭出來，縣裏陪同的幹部給我講了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1960年，鳳陽餓死不少人，縣團委書記已虛弱的不能下床，拉著妻子的手說：「我不行了，死後你把我身上的肉醃起來，把孩子養大，跟著毛主席幹革命。」他死後，妻子掉著淚真這麼做了。人間慘劇啊！

4-14 安徽調查之五：回答張勁夫的質疑

陸子修是一個很有眼光和能力的人，我向他告辭時，他說：現在對包產到戶幹部還在爭論，可是農民又搞起了包乾到戶。正像大家說的「大包乾，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農民最容易接受。我說：「明年，我會帶一些人到滁縣做一個系統的調查。」他表示非常歡迎。已經出來兩個多月了，我得去宣城金寶圩水陽公社做調查，以便回答張勁夫的質疑。

途經馬鞍山，參觀了「千古一秀」的採石磯，從蕪湖到了宣城。宣城是個魚米之鄉，在安徽屬於富裕的地方。聽縣委書記朱景本^[244]介紹，1978年10月縣委決定搞「包產到組」試點，1979年4月鴿子山大隊吳西生產隊秘密搞起了「包產到戶」，並迅速蔓延到全大隊，秋收時增產很多。「包產到戶」一下子在宣城遍地開花，1980年1月達到84%。在省委召開的農業會議上，萬里高興地說：「我堅決支持你們！」

為什麼像金寶圩水陽公社這類富裕的地方也搞起了「包產到戶」？朱景本笑著說，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到水陽公社住了三天，這個公社是安徽省高產富裕的地區，有231個生產隊，人均收入高出全省平均水平90%、全國61%。可從1979年10月起，這些隊分三批全部搞起了「包產到戶」。他們都不存在「溫飽」的問題啊，當我和幹部、社員反覆討論以後，進一步印證了我在河南的調查，還是農民不滿意人民公社這種制度。

[243] 陳學孟 (1896-1983)，安徽鳳陽人。曾被毛澤東譽為「合作化的帶頭人」。

[244] 朱景本 (1924-)，時任中共宣城縣委書記，後任中共宣城地委書記。

我回到縣裏，寫了一篇《為什麼「富裕」公社也搞了「包產到戶」——安徽省宣城縣水陽公社調查》^[245]，講了五個問題：一，「包產到戶」改善了農民地位，農民有了種植、勞動、產品、經濟和生活安排的自主權；二，「包產到戶」體現了多勞多得，指出農業集體生產沒有找到科學的管理方法、社員勞動得不到應得的報酬，現在經濟合同普遍出現、生產管理大大改善；三，「包產到戶」做到了增產增收；四，「包產到戶」調整了幹群關係；五，總之，「包產到戶」維護了農民權益。

第二天，我拿給朱景本看，他連連稱好，說要印出來轉發。我悄悄告訴他：「張勁夫給中央寫信，點名批評水陽公社搞了包產到戶，所以我專程來調查。這個報告得先上報，暫時不宜印發。請你看看，為的是糾正不當之處。最好找些農民讓他們聽聽，看有什麼增補的地方。」他說，寫得挺好，不必了。我說，當年白居易寫完詩，不是唸給大家聽嘛，為的是讓大家都明白。他說，一些理論家寫的東西大多都很難讀懂，就照你的意思辦。

縣裏找了十幾個農民，給他們唸了一遍。大家都高興地說：「好，好！就是這麼回事，說到我們心裏去了！」朱景本請我吃飯，說起對包產到戶的爭論，他說：「只要上邊的人真到農民這兒調查一下，就不會說東道西了。為什麼農民說『要吃米，找萬里』？萬里讓安徽農民吃飽了肚皮呵！」我說，馬上要回去了。他說，我看你每天都緊張的工作，也休息一下，到黃山、九華看看嘛。我想，這倒是個好主意，第二天他派車把我送到了歙縣。

歙縣縣委書記程壽悌，人長得矮矮胖胖，但聲若洪鐘，熱情洋溢，講起話來條理分明而且很有前瞻性。根據他介紹的歙縣情況，我幫他整理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當前歙縣農村形勢、問題和建議》，後來刊登在1980年第9期的《農業經濟問題》上。他又帶我參觀了歙縣林業、漁業、牧業的責任制試點，以及到屯溪老街吃「一品鍋」，買了兩塊徽墨、一方端硯。三天後，他派車把我送到黃山，找到辦公室主任徐聞，請他幫我安排。

徐聞當過「右派」，有各種人生閱歷，又很健談。他先陪我泡溫泉，而後一起吃晚飯，夜裏在黃山賓館聊到很晚。第二天一早，他拿了一件塑料雨衣和一根竹杖交給我，並囑咐說：別著急，慢慢走。記住「不到文殊院，黃山未見面。不看天都峰，白跑一場空。不上光明頂，不見黃山景。不登獅子峰，黃山難覓蹤」。今夜你住到北海賓館，明早看了日出、雲海，從後山下來再找我。

[245] 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132-136頁。

我開始登山，到半山寺歇息片刻，往上走經過一線天、文殊洞至玉屏樓，真是一路行來，美景如畫。左側是聞名天下的迎客松，往南經天門坎過十分險峻的鯽魚背，到了天都峰，極目四望，雲海相連，千峰竟秀，確有「登峰造極」之感。西行經百步雲梯、蓮花洞至蓮花峰，果「非人間也」！若非竹杖相助，美景吸引，實在走不動了。俗話說「不怕慢，就怕站」，鼓起勁登上了光明頂，雖已夕陽西下，但「東海」奇景，「西海」群峰，南望蓮花、天都、玉屏，北視隱若可見的九華、長江，美不勝收，讓人流連忘返。趕到黃山賓館囫圇吃了兩口，在夜色迷濛中到清涼台「清涼世界」坐了一會兒，虧得披上那件雨衣才沒受涼。第二天，還沒亮，矇矓中我登上獅子峰看日出。雖不像泰山日出時，因海水的波動，太陽會一上一下的跳動，這裏太陽一露頭，就從雲海中射出萬道霞光。大家歡呼起來，看到了不常見的「雲海披金」，雲霧稍散又看到了惟妙惟肖的「猴子觀海」。回程往東南經風光幽勝的始信峰，觀賞了「十八羅漢朝南海」。真是不虛此行。

下山見到徐聞，他又讓我到靈泉泡泡解乏。我說：「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信然！黃山真是難得的勝境。他又熱情地派車把我送到九華。九華素有「蓮花佛國」之稱，與五台、普陀、峨嵋並稱「四大佛山」，為地藏王菩薩道場。李白的一首「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使之被後代譽為「東南第一山」。我懷著崇敬的心情，經九華街到其開山「總叢林」化城寺參拜仁德^[246]大師，10年浩劫對這裏的破壞隨處可見。我見他清癯的臉龐，瘦高的身材，談吐間顯然是個得道高僧。他在文革中一邊挨鬥，還一邊學醫，後來四鄰八鄉的人，有病就來找他，當地百姓說起仁德無不交口稱讚。但聽小和尚們說，管理局的領導原來是葉劍英的警衛員，動不動就訓斥他。出於好心，我去拜訪這位「領導」，誰知「領導」卻說：「整天宣傳迷信，不批還行？」，我給省委書記顧卓新^[247]寫信反映了一下，不久這位「領導」就被撤換了。真是蒼天有眼，我佛保佑！

接著，我去神光嶺拜謁供奉地藏菩薩的「肉身寶殿」，可惜的是中途的「十王殿」文革時盡皆焚毀。下午到了「百歲宮」，這裏供奉著110歲圓寂的無瑕和尚的肉身，還有他用舌血寫了20多年的81卷《華嚴經》，讓人內心無比敬佩。第二天，我登上了天台正頂，沿途隔不遠就有一座尼姑、和尚清修的庵堂，在曲折幽深的山路上平添了許多趣味和莊嚴。山風、松濤送來陣陣清香，確是「非人間」的仙境。

[246] 仁德 (1927-2001)，江蘇泰縣人。後任九華山佛教協會會長、安徽省教協會會長。

[247] 顧卓新 (1910-2002)，遼寧義縣人。時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

4-15 向各界彙報：「農村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

自貴池乘江輪下航至蘇州。這兩年，蘇州的社隊企業發展很快，農民從中受惠不少，也許和安徽做個比較有益研究。聽政研室介紹了全市經濟和農村情況後，到吳縣看了幾個社隊企業和生產隊。他們的社隊企業，無論規模大小、管理水平、經濟效益，都是安徽、河南等內地省份的社隊企業無法相比的。但存在兩個大問題：第一，從內部來說，企業負責人基本是縣社隊幹部的關係人，一般農戶雖有不滿，但企業的返還款畢竟能讓其受益。第二個問題是外部的，但比較難解決。社隊企業往往被認為是和國營企業「爭原料、爭資金、爭勞動」的「私生子」，受到各種歧視，只能在夾縫中生存，怎樣取得合法地位沒有解決。

據市縣反映，更大的問題是企業生產的「計劃指標」和「市場需要」不斷衝突，按計劃生產的產品經常賣不出去，按市場需要生產又完不成計劃，把一部分計劃指標分給社隊企業，他們又不願意接受，實在很難辦。在木瀆、東山和幹部、農民坐談，他們雖對農業集體生產也有類似其他地方的抱怨，但一般農戶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農業以外，除了到社隊企業做工、捕魚、養蠶外，還可以包工、包件，做些像刺繡、雕刻等一類手工藝品，再加上家庭其他副業收入，農業收入佔全家年收入不足 20%。說起建立生產責任制，他們也搞了些「小段包工」、「定額計酬」，或「包工到組」、「包產到組」。看來，從實際出發，允許不同模式才比較恰當。

7月15日，回到北京，整整調查了3個月。雖然人瘦了一圈，我卻十分興奮，似乎看到了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其實，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就是在土地公有的條件下，農民不得已採取的應對之策，也是一種回歸自然、回到常識的作法，但若不用「社會主義」來作解釋是行不通的。當天下午，我就向耕今彙報了3個多小時，他聽了十分高興。週末，我向維凌、小強、英淘、若冰、小朋、繁華、曉魯、小冬、北辰、王彥等20餘人，介紹了這次調查的前前後後，大家聽了也很興奮。

我說：「從1978年到現在，大家的各種討論已經進行了兩年半。現在看得很清楚，農村作為改革的突破口，是一條可行的路子。希望大家認真考慮。」散會後，我又和維凌商議，搞一個農村問題研究組織的條件已經成熟，不能錯失時機再拖延下去了。他說：「姿先生！我支持你大膽地幹。但我對農村問題研究得不夠，不過，我會全力地支持你。」為什麼叫我「姿先生」？我疑惑地看著他，他笑著說：「你沒看日本電視劇《姿三四郎》嗎？你就是我們的姿三四郎！」我們兩人哈哈地大笑了一陣。

接著，我先後給胡耀邦、鄧力群作了彙報，他們都不斷點頭、不斷稱許。特別是鄧力群聽我講到農民的苦況和農民的傾訴，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同時，我把為回答張勁夫質疑在水陽公社的調查給了他。我在鄧力群家從晚上8點一直談到夜裏1點多，當夜就和英洵住在了一起。第二天一早，英洵悄悄告訴我：「老爺子一夜都沒睡好，剛睡著就尿床了。」早上吃飯，羅立韻阿姨還告誡我說：「以後談事情不要搞到那麼晚，對身體不好。」這次還認識了羅小韻的丈夫杜鷹，一說話就知道是個既開明、又穩重的人。

從7月到11月，我應邀給書記處研究室、社科院、農經學會等單位作了10餘場彙報。彙報的題目就是：《農村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248]。彙報的內容大體相同，分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安徽農村的激烈爭論」。講述安徽省從下到上「農民要產量，幹部要方向」、「好的很」和「遭的很」之爭。農民是「餓怕了，窮夠了」，包產到戶實際上是廣大農民爭取生存權、生產權、生活權的結果，是廣大農民反對壓迫、剝削和特權的結果。萬里旗幟鮮明的支持，順應了農民的要求，才衝破各種「左」的束縛，帶來了生產力的空前釋放。

第二部分：「『包產到戶』的經濟效果」。我用大量調查數據進行比較，說明各種不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經濟效益。「第一，不同層次的縱向經濟效果比較」，用全國和安徽全省、若干縣、社、大隊、生產隊比較，說明實行不同責任制的效果。一般聯繫產量比不聯繫產量效果好，而聯繫產量的各種形式中，又以「包產到戶」效果最好。「第二，不同戶類的橫向經濟效果比較」，用一般社員戶、大小隊幹部戶、國家職工家屬戶、軍屬烈屬戶、農村五保戶比較，說明「綁著窮」的局面正在改變，不同戶的收入都在增加。那麼，「第三，為什麼『包產到戶』會取得出人意料的經濟效果」呢？一，「包產到戶」改善了農民地位，開始解決「自主權」問題；二，「包產到戶」體現了多勞多得，開始解決「大鍋飯」問題；三，「包產到戶」調整了幹群關係，開始解決「特殊化」問題。

第三部分：「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我先介紹了「第一，『包產到戶』的形式和問題」。「第二，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一，「包產到戶」在我國農村發展中帶來三個轉變，農民「第二次解放」，「合同制」出現，找到了「調動個體、發展群體」的好形式；二，「包產到戶」在我國農村發展中有三個重大突破，突破了斯大林集體化模式，突破了行政經濟體制框架，突破了「一大二公」的先驗層次；三，「『包產到戶』為我們提出了有關社會

[248] 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96-116頁。

主義理論的三個重大問題」，社會主義的階段性和我們處在什麼階段，公有化的條件和按勞分配，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我當時提出的這三個問題一直爭論到現在！「第三，看法和建議」：一，態度積極穩妥，二，允許多種模式，三，加強改善領導。

我的結論是：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正是這個創造使我們看到了農村的曙光，而農村的曙光就是中國的希望！幾乎每一場彙報結束，既有多數人的支持和讚許，也有部分人的反對和質疑。當時，我帶回大量的表格、數據和資料，江北辰介紹中央民族學院的謝揚幫助處理，後來羅小朋、王飛欣也參加了。王貴宸向我要走了在安徽農村調查的各種對比數據，與魏道南寫了一篇《關於安徽「包產到戶」情況的報告》，這篇報告也署上了我的名字。顯然，他們對包產到戶的看法，已經和在安徽調查時有了很大的改變，看來事實確能教育人。

朋友一再和我說：「老陳，你花上兩個月時間，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一定可以寫出比費孝通《江村調查》更有價值的書。」我說：「從農村回來，一想起農民活得不像人，我就睡不著。現在我無別所求，只希望農民能吃飽穿暖、自由自在。這麼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我何嘗不想快些寫出來，但個人得失無足輕重，以後再寫也無妨。現在最重要的是抓緊機會、趁熱打鐵，把一批有共同志向的人組織起來，一起推動農村改革。否則，機會稍縱即逝，以後再組織就不容易了。」他們見我每天忙的只睡三、四個小時，也只能贊成我先把研究組織的事搞成。

4-16 籌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從回到北京，在差不多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每天騎個破自行車各方聯絡，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我不斷和維凌、小強、英淘、若冰、繁華、小朋、漢清、曉魯、北辰、小冬、王彥等，或三、五人、或五、七人，最多時十幾人，一起商議如何搞一個研究組織的問題，總算在三個方面有了切實的共識，這就是：研究任務和方法，研究組織和人員，研究資金和管理。

1、關於研究任務和方法

第一階段，大約從 1979 年 8 月以後，參加討論的人大多認同了改革應從薄弱環節農村入手、應從改變人民公社體制入手，但誰也沒有估計到包產到戶會迅速發展，不少人主張要認真總結二十年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教訓。11 月底，我講了「改革構想」以後，支持推動包產到戶的人多了

這時發生了一個問題，我們這些研究人員中，只有我是個助理研究員，維凌是個助教，其他人都缺少學術職稱。在當時，級別不高、資格不老，辦事很難。我和維凌、英洵反覆商議，只能去求耕今。我向耕今說明了原委，他說：「一諮呵，你帶頭幹應該沒問題。」我說：「我們商量請您幫忙，攤子才能撐起來。」他說：「支持你們沒有問題，牽扯到所裏的事情，我可以幫助斡旋，所外的事我就無能為力了。」我說：「您放心，您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可以找杜潤生。他解決不了的，可以找鄧力群、萬里。」耕今說：「那我就掛個名吧。不過，你們的具體事情我可不管。」

這時，有一個好消息傳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基金》建立了，一年有 200 萬元撥款。大家有了積極性，用錢的地方也多了。我那補發的 1,000 元工資，在組建發展組中花的已經所剩無幾了。這個基金要能申請到，可真是即時雨。我反覆研究了基金使用《試行規則》，按規定必須以院裏的一個單位為甲方，以院外的一個單位為乙方，雙方簽訂合同，由甲方提供資金，乙方完成項目。耕今和我只能做為甲方，乙方需要找一個合適的單位。週末討論時，英洵提出，可以找他們系的楊勳老師，維凌也很贊成。

北大無人不知道楊勳。文化大革命時，她因反對聶元梓被抓進監獄，受了不少迫害，和她一起被抓的還有她弟弟楊炳章。楊勳和維凌還是同牢難友，彼此都很熟悉、信任。維凌帶我去拜訪她，她家住在北大東北角的朗潤園，她丈夫趙履寬是人民大學勞動經濟系教授，兩人都熱情而開明。我說明來意並希望她做項目的乙方代表後，她很高興地說：「這麼多年青年人自願組織起來，為改變農村落後面貌努力，我義不容辭地支持。」這樣，我們原來協調組的 5 個人，加上王耕今、楊勳就是 7 個人，後來改稱籌備組。

3、關於研究資金和管理

1980 年 10 月，我作為甲方（中國社會科學院農經所）代表，楊勳作為乙方（北京大學經濟系）代表，我們擬定並簽署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計劃提綱（草案）》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第一階段合同》^{【249】}，很快得到了社科院科研規劃局與農經所的批准。但當時的財務規定非常死板，雖然主管部門都已經批准了，可是錢怎麼也撥不出來。我和管理 4 個經濟所財務的會計穆尚群先後商量了七、八種辦法都不行。

【249】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 年卷，第 33-36 頁。

人家幹事都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我們可好，兵馬已動，糧草尚無。我和楊勳只得去找鄧力群，請他幫忙。他一聽，也覺得很奇怪，說早就批准了，為什麼還撥不出去？遂立即給社科院秘書長梅益打電話，請他來當面解決，我們真欽佩鄧力群辦事的果斷。問題似乎解決了，後來才聽剛調到院部當會計的杜英說：她按院領導的批示，把2萬元劃撥到北大經濟系提供的賬號上。誰知，事後不僅受了批評，還給了她一個處分。

款撥到北大經濟系楊勳那兒，她委託系辦公室主任董文俊和會計唱瑞華代管，項目支付由她簽字。我們做為一個剛組建的業餘民間研究組織，又沒有專業會計，萬一財務上出點問題可影響不好，這回算是放心了。可以說，沒有楊勳的支持和幫助，我們這個組織能不能順利成長都很難說，她為我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4-17 「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

1980年6月，趙紫陽要求組織農業部門的幹部和理論工作者，深入到不同類型地區和社隊，對包產到戶問題做一些深入的調查和分析。7月末，國家農委組織聽各調查組的彙報。奇怪的是，10個調查組竟毫無例外地都認為，包產到戶是「走回頭路」、是「發展資本主義」、是「破壞社會主義」、是「走獨木橋」。我被邀請參加了會議，會上我無所顧忌地談了自己的看法，四、五十人的會議室裏議論紛紛。

主持會議的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站起來問我：「小陳啊，你說的『大包乾』不是包產到戶，沒有了『五統一』，就是『分田單幹』，分田單幹！」我回答說：「農民說，『五統一』是『脫了褲子放屁，多費一道手』！」會場一片嘩然，杜潤生很不高興。我接著說：「農民還說，『五統一』是城裏人拍腦袋想出來的，誰也做不到。『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簡單易行，利益直接，最受歡迎。」杜潤生滿臉不高興地坐下了，其他與會的國家農委領導人張平化^{【250】}、李瑞山^{【251】}、霍士廉^{【252】}、張秀山^{【253】}、何康^{【254】}，一語不發直到散會。

【250】張平化（1908-2001），湖南鄱縣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中央宣傳部長，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

【251】李瑞山（1920-1997），陝西延長人。曾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

【252】霍士廉（1909-1996），山西忻縣人。曾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農業部長，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

【253】張秀山（1911-1996），陝西神木人。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

【254】何康（1923-），福建福州人。時任農牧漁業部部長。

杜潤生讓我留下來再談談。他說：「小陳，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要引導的。如果放任自流，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可能毀於一旦。我們要知道一種既能調動農民積極性，又能發展集體經濟的辦法。」我說：「現在農民搞的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就是這樣的好辦法。您不是說過，怎麼能讓農民把大田種的和自留地一樣好嗎？凡是實行雙包到戶的地方就做到了。」他說：「這麼作會不會背離社會主義？我還得再想想。」

接著，我去了鄧力群家。我說：「鄧叔叔，我今天參加國家農委的調查彙報會，面對農民的強烈要求和包產到戶大幅度增產增收的事實，調查組的人大多都視而不見，真不可思議。」他問，郝盛奇^[255]是什麼看法？原來他是研究室經濟組組長，我說：「他帶人到原來的陝甘寧邊區調查，他也承認那裏的農民比1940-1942年，收入減少60%、口糧減少40%，但仍不贊成包產到戶」。鄧力群說：「多年形成的觀念哪會一下子改變？要耐心做工作，事實會教育人。」

他又說：「郭崇毅的報告，小平同志看了很高興。你這次在安徽調查的情況，我向政治局的同志作了介紹。姚依林^[256]說，他抗日時在平谷待過，那裏老農說的話，與你的調查是一致的。農村被『四人幫』破壞的不成樣子啦，農民沒有積極性，中國四個現代化是沒有希望的。你的這次調查，對中央的決策有決定性的影響。但不能驕傲，一步步的工作要扎扎实實的做。」我連連稱是。

我說：「鄧叔叔，我今天來，主要是彙報一件事：『四人幫』垮台後，很多上山下鄉的知青回城讀大學，強烈希望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我們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想組織一個『中國農村發展與改革問題研究組』，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他說：「這是個好事，我支持。但『改革』兩個字是不是可以拿掉，社會主義還是要以完善為主。」我說：「農村搞包產到戶，不就是改革嗎？」他說：「可以這麼說，但主要是調整，是完善。」

杜鷹在一旁給我使眼色，我沒有再說什麼，走出來到過道裏抽煙，杜鷹悄悄和我說：「老頭的看法和我們不一樣，何必摳字眼兒，事情辦成不就可以了嘛！」回到鄧力群書房，我說：「叫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您看如何？」他說：「叫什麼名稱，你們自己商量，關鍵是能不能幹實事。」第二天，我向籌備組作了彙報，大家都說，這個名稱不錯。並要求各小組抓緊工作，早日拿出成果。

[255] 郝盛奇（1924-），安徽肖縣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組長。

[256] 姚依林（1917-1994），安徽貴池人。長期擔任中共財經方面的領導工作，一貫支持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六四」期間支持李鵬鎮壓學生。

會上，我提出專職研究人員太少，希望大家推薦。我又說：「1970年我插隊時，看到張木生寫的一篇《農民問題學習》，感到這個人有膽識、敢講話，可一直沒找到他。」會後，白若冰問我：「你敢用張木生嗎？」我說：「有何不敢！」他說：「木生可是個我行我素、天馬行空的人。」我說：「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批闖將！」他說：「你真敢要，我可以告訴他母親。」原來，木生的母親是人民大學的組織部長。

過了一周，若冰拿來了木生的簡歷和幾篇文章。我立即找耕今，請他想想辦法，能不能把木生調到所裏。耕今給國家人事局局長焦善民^{【257】}寫了一封信，信寫得很懇切，但沒有下文。8月13日是星期天，一大早耕今帶我到焦善民家，讓我介紹了木生的情況，焦善民當時就批示同意了。木生和杜英夫妻倆原來都是「以工代幹」，焦善民一批可好了，木生調到農經所作研究，杜英調到院部當會計。發展組不僅多了一員闖將，後來木生又介紹李零、沈志華、呂秋夢等能幹人才參加了發展組的活動。

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論還在激烈地進行。9月中，根據萬里的建議，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央召開了各省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包產到戶問題。會上，除了任仲夷^{【258】}、周惠^{【259】}、池必卿^{【260】}幾個人支持外，多數人都是沉默或反對。不過，會議通過了著名的中央75號文件，認為包產到戶至少在貧困地區是必要的，有所突破。後來，吳象^{【261】}根據會議精神寫了《陽關道與獨木橋》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我和籌備組的人商議，還是盡快把發展組正式成立起來，又經過幾次討論，我起草了成立大會講話。9月28日星期日下午兩點，在農經所四樓會議室，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正式成立了，到會的有幾十個部門的80多人。王耕今致詞以後，由我代表籌備組主講《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計劃的總體構想》^{【262】}。

「構想」分四個部分：第一，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分析，這部分的内容基本吸收了我1979年11月講「改革構想」第一個問題的觀點。第二，從我國經濟改革的需要分析：(1) 30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2) 農民

【257】焦善民 (1919-2010)，山東館陶人。時任國家人事局局長。

【258】任仲夷 (1914-2005)，河北邢台人。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為最重要的改革領導人之一。

【259】周惠 (1918-2004)，江蘇灌南人。時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第一書記。

【260】池必卿 (1917-2007)，山西平定人。時任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

【261】吳象 (1921-)，安徽休寧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後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62】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16-21頁。

問題在我國有特殊重要性；(3) 農業先行改革震動小而易成功。第三，從農村經濟研究的現狀分析：(1) 農村經濟研究的力量嚴重不足；(2) 農村經濟需要多學科綜合研究；(3) 從個別到一般是科學的方法論。第四，從完成研究任務的條件分析，我從研究任務、內容、成果、方法、步驟、組織、人員和其他 8 個方面作了分析。

我講了兩個小時，大家又討論了 3 個多小時。天黑了，還興奮地不肯離開，會議的熱烈場面令人至今難忘。會後，籌備組開會，我提議：請王耕今擔任組長，楊勳和我擔任副組長，大家一致同意。耕今私下和我說：「你當組長，楊勳為副，我當個顧問，這樣最順理成章。」我說：「您再幫幫我們，具體的事我處理，不讓您勞神。」真不容易，經過從 1978 年 11 月至今的 23 個月的反覆討論，發展組終於成立了！

一天，英淘找我說：「趙紫陽想讓湘魯當他的秘書，你覺得好不好？」我知道湘魯是個聰明、能幹的人，正在人大讀研究生。我說：「這對湘魯是一個很好的鍛煉機會，為什麼還拿不定主意？」英淘說：「他主要覺得學習機會難得，想明年畢業再說。」隨後，湘魯來找我，我和他說：「你不該失去這個機會。在總理身邊工作中學習，可以把人生理想和解決問題結合起來。無論從哪個角度對你都是有利的。」不久，湘魯到總理辦公室當了秘書。

4-18 鄧小平的一席話，又激發起人們的改革熱情

1979 年底，北京市禁止了民主牆；1980 年 3 月，民間刊物紛紛被迫停刊；人們追求民主的願望受到嚴重挫傷。但到 1980 年 5 月，鄧小平在內部發表了肅清封建主義影響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8 月又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提出要：「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人們又活躍起來，8 月底的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成了「民主、改革」的大會。

更重要的是，這一年秋季的基層人民代表直接選舉，實行了候選人差額提名，甚至公開競選，不少選民提名的候選人當選。不少大學搞起了「校園競選」，競選人以 77、78 級大學生為主，他們大多是自學成才，有基層生活體驗，又強烈希望改變中國不合理的制度環境。以北大為例，當時競選的代表者胡平、王軍濤、張煒，就是他們中的佼佼者，競選在緊張、熱烈而有序的氣氛中進行。11 月 6 日，北京市委下達了批評「競選是資產

階級形式」的意見，企圖禁止。為此，北大學生會主席張煒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

11月13日，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傳達了中央書記處的指示：北大選舉是健康的，選舉人是好的，希望能總結讓選民瞭解候選人的經驗。在選民尖銳的提問下，候選人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都作了精彩的分析。恰巧，11月16日我和維凌到北大找侯漢青，見到了北大學子像過盛大節日一樣的競選場面。我們這些經歷過文化革命的老大學生，既為這些年青一代校友的覺醒感到欣慰，又為他們的大膽言論感到耽心，共產黨究竟能允許他們走多遠呢？

我和維凌決定第二天聽聽胡平的演講。晚上，辦公樓禮堂擠得水洩不通，好不容易擠了進去。胡平演講的主題是「論言論自由」，其邏輯之嚴密、論辯之有力令人佩服。演講剛一結束，掌聲雷動、熱烈歡呼的場面讓人至今難忘。我和維凌想擠過人群和他結識一下，但根本走不過去。我們只能擠出人群，邊走邊議論：若上層能開明到使用這樣的人才，中國的改革將會出現一個上下、內外結合的良好態勢，共產黨能這麼作嗎？難！後來各高校參加競選的一批人才，大多被安全部作為「異類」盯上，受到不公正對待，十分可惜。

但張煒在競選演講中特別提到，只有「將自己的遠見卓識和工農的淺近的目標結合起來，才能共同組成改革社會的巨大力量」，並清醒的看到：「我們要根據我國的情況負責任地提出切合實際的要求和措施，否則不僅不能爭得應有的民主權利，反而會帶來動盪和倒退。」但北大的青年學子，雖多有基層生活的閱歷，卻很少有親身挨整的體驗，所謂「沒挨過刀子不知道疼」。所以，他們美好的願望很快就被現實擊的粉碎。

我和維凌、繁華議論了幾次。感到各地大學的「校園競選」，充滿了改革的激情，幾乎都是圍繞著「中國必須改革」的問題在爭論。但「改革從何入手」卻仍然莫衷一是，沒有人提出切實可行的方略。一直主張政治改革的維凌提出，能不能為他們做一些上下溝通的工作，找樸方、德平談一談？我說，你可以試試。後來，維凌說：「效果不大」。我則一直把主要的精力集注在發展組的工作上。

1980年夏天，拂不過張守一的盛情相邀，我還參加了在頤和園龍王廟舉辦的「數量經濟學講習班」，聽了美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克萊因講美國宏觀經濟模型、劉遵義講需求分析和中國經濟計量模型、鄒至莊講經濟計量學，等。講習班辦得不錯，但大多數人或缺少數理知識、或缺少經濟學知識，聽課很吃力。我倒是聽得津津有味，張守一還讓我給別的學員講

解。但我當時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怎麼搞好發展組上，找了個借口就溜號了。

為使我們發展組的研究工作更紮實可靠，1980年下半年，我主要抓了幾項工作：

(1) 用「德爾菲調查法」^{【263】}向全國一百名專家諮詢，請他們對我國農村發展應著重解決哪些問題，根據自己的判斷依序按 1-10 填入；第一次表格收到後，照統計分析的結果，按得票率多少將之排序再次送給這些專家，請專家再次提出修改意見；第二次表格收到後，再做統計分析，大體就可以看出專家的意見。這些專家的意見約 20 多條，主要的是：人民公社體制、土地、戶口、攤派、民少相公多、社隊企業、小城鎮、水利、科技普及和工農、城鄉關係等等。

(2) 編輯《「包產到戶」資料選》。包產到戶是怎樣發生的，又經歷了哪些曲折、爭論，隨著包產到戶的發展，一定是人們關心的。我們現狀組，一方面發出「徵稿啟事」從各種途徑收集；另一方面需查閱國家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的內部資料。我去找鄧力群，告訴他意圖後，他給政研室副主任梅行^{【264】}立即打了電話。第二天，梅行用政研室的名義給我開了兩封介紹信。我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每天到中央檔案館而後到國家檔案館，查 1948 年到 1980 年有關農村的各種資料。後經批准，拷貝了 6,000 多頁。可笑的是，我們用完以後，將這些資料交給了農經所，所裏竟將之封存了起來，再想看都不容易了。

說來有趣，新華社有個記者叫喻權域^{【265】}，應徵了一篇稿件是 1956 年寫的支持包產到戶的，可我從國家檔案館又查出 1957 年他寫的一篇激烈批判包產到戶的。為忠實於歷史，我們把這兩篇都收錄了。喻權域知道後，不斷打來電話，要求把後一篇撤下來。編輯組一致同意兩篇都上。後來，才知道此人是個風派，無心之舉卻留下了真實的歷史記錄。

(3) 編輯《中國農村文獻目錄（1900-1980 年）》。我請北大第一個圖書館系研究生侯漢青幫忙，他又請了系裏的教師孟昭晉、馬佩欣、肖自力、陳秉才和北大圖書館的王世儒一起來做。他們利用業餘時間無償勞動，異常辛苦。據他們說，《紅樓夢》賈寶玉的一個扇子墜，可以查到無數資料。可是農村問題的資料就寥若晨星了，需要在書林中搜尋，因為以前從來沒

【263】「德爾菲調查法」，為二戰時美國蘭德公司首先使用的一種專家諮詢調查方法。

【264】梅行（1919-2000），江蘇沙洲人。曾任國家計委研究室主任，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

【265】喻權域（1935-2010），四川重慶人。曾任新華社《半月刊》主編，製造出「馬丁事件」；「六四」後任《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為一著名的投機者。

有人編過，僅大卡片他們就抄錄了3萬多張。由此可見，以往中國社會科學的不務實。同時，由楊勳組織北大經濟系編輯《中國農村大事記（1949-1980年）》。

(4) 方法組、理論組於10月、12月分別完成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的構想與設想^{【266】}，現狀組於12月提出了「農村經濟調查表」、「農業生產責任制調查表」、「農村社會調查提綱」和「概略調查提綱」^{【267】}。這些紮實的基礎工作，為發展組各學科人員的合作、協調與成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5) 李誼青、何鳳琴完成了對全國2100個縣農民收入狀況的比較研究。他們把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區用不同的顏色標出來，結果發現：三類地區收入較高，第一類是歷史上高產的地區，第二類是大城市郊區，第三類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地區，即幾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區，實際上是政治破壞達不到的地區！1978年，全國農民從集體經濟得到的年收入只有76元人民幣，最窮的山西省平魯縣僅僅是21.97元人民幣！

(6) 我自己則通過對多數省的實際調查，分析各省的歷史資料，並研究人口統計報表，經過反覆驗證，得出了1958-1962年中國餓死了4300-4500萬人的結論。這個結論既使我震驚，又使我痛苦。震驚的是，這是中國歷史、甚至人類歷史上都沒有過的事；痛苦的是，那麼多百姓死於非命，我們當時竟一無所知。當我向鄧力群談起時，他眼睛濕潤地說：「教訓呵！慘痛的教訓呵！」不過，他建議我不要公開。我知道，廖蓋隆^{【268】}作報告說當時餓死2,800萬，就讓胡喬木狠狠地批評了一通，我現在可不能捅馬蜂窩。

春節時，楊小東在家搞聯歡會，請了很多朋友去。他父親許力群文革一開始就受到迫害，關在北京衛戍區10年，精神都有些失常，經常夢見被「逼供訊」，讓人痛惜。聚會中，我認識了不少中宣部幹部的子弟，他們各個才氣橫溢，而父母在文革中也都受過衝擊。記憶最深的是，小東一邊彈著吉他、一邊唱起了動聽的「兩隻鵝」，至今忘不掉的歌詞是：「人生就是這樣，有甜又有苦。烏雲怎能遮住天上的雨水！」

春節期間，我們現狀組的幾個人日夜加班，編選包產到戶的資料。一天，到趙小冬家，才知道她父親趙易亞^{【269】}原來是解放軍報總編，文革中

【266】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22-32、42-46頁。

【267】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47-95頁。

【268】廖蓋隆（1918-2001），廣東信宜人。曾任朱德秘書、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269】趙易亞（1917-2002），江蘇泰興人。曾任《解放軍報》總編。

慘遭批鬥後關了起來，母親因貼了陳伯達的大字報，被打的遍體鱗傷死在獄中，16歲的小冬帶著妹妹和弟弟到農村艱苦渡日。後來，小冬在北京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當了團委書記，但她永遠忘不掉農民的困境，聽說我們搞了發展組，她就把業餘時間都搭上了，那時大家為了農民真是一片赤誠。

4-19 陳雲適時出擊，讚賞「緩改革，重調整」

發展組成立後，我瘦了一圈。回家見到可愛的小丫丫，一身的疲勞就消除了。小孩子無限的精力和求知的渴望，總是讓人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丫丫已經3歲半了，我週末帶她去爬山。

早晨9點半，我們到了八大處的靈光寺，丫丫在魚池院看金魚戲水竟不想走了。經三山庵、大悲寺到玉泉庵，我們喝著茶歇了一會兒。登上香界寺到寶珠洞，在平坡山頂遠眺京城，丫丫高興地叫了起來。看完秘魔崖，我問丫丫：「你累嗎？」她說：「不累！」我心想，倒要看看你撐得住撐不住，就說：「那我們順著山頂去香山吧。」她興奮地一邊唱著一邊跳著往前走。我告訴她，前邊還有許多路要慢慢走，爸爸給你講故事吧。我給她講了木偶奇遇記和格列佛遊記。她說：「爸，我渴了！」我說：「現在沒水喝，先忍忍。」哈，山路兩邊有酸棗，我教她怎麼摘。兩人一下就摘了100多個，她說：「你一次吃兩個，我吃一個。」我問她為什麼，她說：「你大我小。」我蹲下摟著她說，你懂事了。她說，我長大了。看她走的滿頭大汗。我說：「丫，我們下山吧！」她說：「好吧，爸，你累了，我揹你吧。」我笑笑說：「你個小鬼頭，我先揹你，過一會兒你再揹我。」我把她揹下山，

褲腿上粘滿了蒺藜。她給我一個個摘掉，還問我扎的疼不疼。坐在公交車上，問東問西，問個沒完。回到家，我倒頭就睡著了。晚飯時，吳琰叫醒我，我問丫丫吶？她說，這個瘋丫頭，一回來就又找小朋友去玩了。小孩子的生命力真是旺盛啊！

這一年，1980年5月，鄧小平和李維漢^[270]談話後說：不贊成韋



[270] 李維漢（1896-1984），湖南長沙人。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

國清^[271]在軍隊重提「興無滅資」，思想戰線、各種制度都要肅清封建主義影響。8月，他又講話，強調「反對封建主義」、強調「政治體制改革」，主張「政治民主化」。這個講話受到各界要求改革的人們的普遍歡迎，各家報刊紛紛發表文章表示支持。10月，《光明日報》連續三天刊登各界名人談論政治改革的大作。一時間，人們以為所期盼的政治改革真的要來了。

但9月，胡喬木就波蘭出現「團結工會」，給胡耀邦寫信認為：中國也可能「爆發波蘭那樣的局勢」。10月，陳雲提出：「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他並利用華國鋒「洋躍進」造成的經濟過熱，也就是「宏觀失控，經濟紊亂」，來一個「收」，也就是「調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給了陳雲扭轉鄧小平基調的機會。

這時，我正為發展組的事忙的不亦樂乎。10月初，黃江南拿來一篇剛寫好的文章讓我看，他正在工經所讀研究生。文章的意思是：「洋躍進」造成的經濟過熱，會使財政赤字無法彌補，根據乘數原理，搞不好會爆發經濟危機；所以，當前必須抑制需求，進行調整，緩行改革。我說，青年人急於發揮作用是好的，但功力不足往往會適得其反。你說的乘數原理，對市場經濟國家是有效的，但中國不同。你看，農村改革已使多年賣不出去的農機具都賣光了，就是明證。

黃江南又找了朱嘉明，一塊去找翁永曦。翁永曦是個聰明能幹的人，但太急於出風頭，後來成為鄧、陳之爭的犧牲品。他們三人又去找了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四個人反覆討論後，在黃江南文章的基礎上，由朱嘉明起草了一篇對經濟形勢看法的報告，通過姚依林修改後送給了陳雲。報告中提出的「抑需求，穩物價；捨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針，被陳雲讚賞為「可以作為經濟工作的綱領」。

「中國經濟沙皇」陳雲發了話，誰敢不從？！不要說李先念本來就和他是一個看法，剛調到中央決策圈的趙紫陽又何敢置喙？不懂經濟的鄧小平哪裏知道，這4個青年人提出的24字方針，正是陳雲通過姚依林授意的，陳雲當然要充分利用。這次會議成為中國改革全面退卻的轉折點，陳雲適時在政治、經濟領域全面擴大了權力。而鄧小平也表態「完全同意陳雲的意見」，與4個月前講話的調門判若兩人。

從此在政治思想領域，「肅清封建主義」變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幾乎停頓；在經濟領域，不僅使守舊的堅

[271] 韋國清 (1913-1989)，壯族，廣西東蘭人。曾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書記，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持計劃經濟的人得以重用、開明的主張商品經濟的人受到批評，而且使沿海特區的改革開放、農村與其他已經啟動的改革都受到了很大影響；4個上書的年青人，被北京圈裏人戲稱為「四簽名」，他們雖然後來仍以受到陳雲的讚賞為榮，卻再也不提那「24字方針」了。

發展組以往的活動都是游擊式，哪兒方便，就在哪兒。1980年以後，維凌隨岳母一家搬到了木樨地22號部長樓。我們那時，幾乎每週兩三天都在他家討論、開會，甚至吃、住在那裏，少則三、五人，多則十餘人。我從自己補發的工資裏給了維凌300元，作為補貼他的伙食開支。維凌的岳母秦德君和夫人郭秋姮總是笑著歡迎大家，也真難為了他們。有了社科院那筆項目資金，我和楊勳商量，在北大招待所租了一間房，發展組總算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開始，辦公室讓張木生值班，可他是個坐不住的社會活動家。我想起了在貴州都勻麻袋廠醫務室當醫生的孫方明，他既有頭腦善于思索、又有一定犧牲精神，調他來說不定是個好主意。我先給方明寫了封信徵求他的意見，他很快回信同意了。接著，我和楊勳商議，請她用北大經濟系的名義借調方明，她說我試試看。很快，方明來到北京，住到維凌在北大的宿舍，每天到北大招待所值班，為發展組的成長做出了無私的奉獻。

有了北大招待所這個固定的辦公地點，各個高校的大學生聯絡起來就方便多了。楊勳又找了北大圖書館館長謝道淵^[272]，在北大新圖書館為發展組借了一間活動室，辦了幾十張圖書證，這樣大家出入北大也方便了。我們就利用週末和假期在這裏開會、討論、學習、講課，像維凌講「系統論」、「控制論」、「協同論」，小朋講「組織理論」，英洵講「耗散結構」、「模糊數學」，我講「農村調查」、「比較規範」、「指標體系」等等，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誰有什麼新的見解、看法，都可以拿來講解、爭論，好不熱鬧。大家就是這樣逐步調整了知識結構，增加了不同學科的協同合作能力。

現狀組幾個人，日夜編選《「包產到戶」資料選》，從700多篇文章中選出300篇，又精選出理論、歷史和調查報告120多篇。農經所沒錢印刷，怎麼辦？我請陸子修幫忙。他一聽，馬上答應由滌縣地區印刷發行。這一套上、下兩冊的書，1980年5月，一個月就在全國各個地區發行了五、六萬套，對介紹、推動、完善包產到戶起了很好的作用。農村變革的迅速、廣泛和深遠是多數人始料不及的。也無可挽回地改變了陳雲希望通過「24

[272] 謝道淵（1924-），安徽六安人。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後任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字方針」，把中國經濟「調整」到 50 年代的願望。我們編輯這本書的幾個人雖未拿到一分錢編輯費，我自己還貼了 200 多元，但大家都是心甘情願的。

4-20「北京三結義」：小凱、維凌和我的聚會

1980 年 11 月，維凌來電話，興奮地說：「老陳，快來我家，給你介紹一個難得的朋友。」我趕到維凌家時，只見客廳裏坐著一位雙目炯炯有神、文質彬彬的青年。他伸出手說：「我叫楊小凱。」維凌說：「他就是楊曦光！」我握著他的手說：「1967 年 1 月，我到長沙一中拜訪你，想看看這個『奪軍權』的頭頭是個什麼人物，可惜沒有見到。今天真是幸會。」維凌說，坐下慢慢聊。又叮囑秋姮，杜門謝客，無論什麼人找，都說不在。

說起來還挺有意思。小凱比維凌小 4 歲，因為 1968 年寫《中國向何處去？》鼓吹巴黎公社原則、砸爛封建專制官僚機器而入獄 10 年。此時，他剛考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所讀研究生。維凌比我小 4 歲，1967 年組織《共產青年學會》批判林彪、江青，也被捕入獄，後來下放到北大鯉魚洲幹校勞動，1978 年調到北大化學系作研究。而我，則因為 1965 年給毛澤東寫《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點意見》，批評共產黨不民主受批判，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後來到了農村，1978 年底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經所工作。

小凱出生於共產黨高幹家庭，卻很少有貴胄子弟的作派。其父楊第甫曾任湖南省委統戰部長，後來當了「右傾」。母親是省工會主席，文革時不堪批鬥而自盡。小凱之所以會在文革中寫出名動天下的《中國向何處去？》，他是從民眾對當局的強烈不滿，看出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而中國的政體又與馬克思設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無共同之處，所以需要暴力革命推翻特權階級，重建以官員民選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小凱被康生、江青點名批判後投入牢獄，先後在中國古拉格群島的三大系統：看守所、勞改隊、監獄關押 10 年，與形形色色人物的交流重新鑄造了他的靈魂，使他徹底放棄了對馬克思的信仰，成為一個極力反對革命民主主義、贊成現代民主政體的人。煉獄的磨礪，使他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他說，中國總是不斷把「一流的槍斃，二流的關押，只剩下三流的活躍在舞台上」，所以，「我永遠與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認同！」

其實，我們自幼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養成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情懷。相似的追求與命運，使我們一下子成了相見恨晚、無話不說的朋

友。維凌打趣地說：「我們都有前科，卻是一個老祖宗！老陳是『毛式青年』，小凱是『法式青年』，我是『馬式青年』！」大家哈哈地笑做了一團。維凌接著說：「不過，文化大革命改變了我們的命運。老陳的左傾被極左粉碎，我的左被大左打倒，小凱的極左又被權貴踩碎。其實，當年一代青年人大體都經歷了類似的心路歷程，左傾狂想被現實粉碎。」

我說：「小凱當年提出的『中國向何處去？』至今仍沒有解決。經過十幾年的歷練，我們又都再世為人，大家一定要好好交流一下！」實際上，個人的坎坷與國家的苦難，已經使我們從實踐中揚棄了革命民主主義，轉變為自由民主主義者，認同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但如果說年輕時的理想主義往往使我們追尋一個「應該怎樣」的「天國」，今天面對的實際則往往使我們思考的問題變成了「可能怎樣」的「現實」。

那麼，盡量避免「最壞的可能」，爭取「較好的可能」，就是我們能夠努力作的事情了。我們一致認為：自有人類以來就有了各種理想，這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因。而理想的「天國」只存在人的心裏，企望用想像中的「天國」強行改造現實，往往會帶來悲劇性的結果。共產主義是一個美好的烏托邦理想，容易吸引落後國家知識分子的信奉、以致獻身；而毛澤東這一代革命者的悲劇，就在於他們把這種烏托邦理想變成了「烏托邦工程」。

餓了吃方便麵，談到深夜4點，砥足而眠。我們為彼此有那麼多的共識感到興奮，剛迷糊了一會兒，天已破曉。抹了一把臉，漱了漱口，又聊了起來。我們談到，幾乎所有的共產黨人取得政權以後，都是企圖通過反覆進行「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來強行「改造社會」，實現一個革命的「天國」。但結果卻是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又不斷強化這種制度的專制性質，逐步剝奪了民眾的各種起碼權利；這種制度明顯地違背了人的自然本性，是沒有前途的。

毛澤東執政期間，不僅造成了8,300-8,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且更可怕的是，將中國幾千年發展形成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關係破壞殆盡，建立起一個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集黨政軍法經文教社各領域權力於一身的高度集權的專政極權體制。這種體制將軍事共產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東方專制主義的一系列極端做法結合起來，遠較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殘酷百倍，就在於他總想「徹底革命」。

文化革命開始的紅衛兵運動和後來的各種政治迫害，都是毛澤東以領袖和國家的名義，搞的無法無天、草菅人命的全國性清洗。期間發生了不堪忍受迫害的人們的造反運動，也都被殘酷鎮壓了。可以說毛澤東和「四

人幫」把中國搞的是天怒人怨，所以人們才強烈要求改革，不斷探討「中國向何處去？」。當然，各種力量能夠並生共存、權力能夠有效制衡，是最好的局面。可是，怎麼樣才能形成這種局面哪？恐怕一時很難作到。

我們還談到了給每個人定「成份」的不公平，覺得只有在中國這種落後國家才會出現這一類荒謬的現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實行歧視政策，實際上使人一生下來就處於一個不平等的起點。至於人們在一元歷史觀影響下形成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更是沒有意義的；所有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都是面對自己的問題予以解決，而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是先用一個甚麼「主義」生搬硬套的。

顯然，中國不改革開放是沒有出路的，這幾乎已經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毫無疑問，中國必須進行一場全面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但不能以暴易暴，需要以漸進改良的方式進行。維凌是堅定主張政治改革的，但至今未找到著力點；小凱認為憲政共和最理想，但須逐步形成制衡的力量，目前仍以從經濟變革入手為宜；我則仍陳述了從包產到戶入手的觀點。我們又討論到中國面臨著發展模式雙重轉軌和體制模式雙重轉軌的歷史性難題：即從發展模式來說，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軌、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軌；從體制模式來說，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從極權政治向民主政治轉軌，這個轉軌過程恐怕需要 50 年到 100 年。我們三個人都無可奈何地笑起來說：「看來我們這輩子只能甘心做鋪墊了，中國走到現代社會恐怕要到我們的孫子、重孫子嘍！」不過，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往往也會加快歷史的進程，我們只能「盡人事而聽天命」了。

眼看天又快黑了，我們每人吃了一碗方便麵。小凱笑著說：「難得啊，受益良多！」維凌感慨地說：「多少年了，從沒有與朋友這麼傾心交談過。」我說：「朋友好交，知己難尋。中國有我們這麼一批人，事情就好辦多了。但要盡可能避開意識形態的爭論，不事張揚地將改革推進。最好是踩線而不被罰出場外。」我邀請小凱參加「發展組」，他欣然允諾，但希望不公開以利工作。

維凌高興地說：「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我們就叫個北京三結義吧！」我急忙說：「千萬別這麼說，還是謹慎為好，省得惹麻煩。」大家都欣然贊同。兩天兩夜的交流，使我們三個人的心緊緊的連在了一起。在往後十幾年的歲月裏，我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相互配合，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心力。可惜的是維凌 46 歲因車禍、小凱 56 歲因肺癌，都不幸先後離開了人世，真是天妒英才呵！

4-21 「三總家鄉的農民又笑了！」

1981年1月10日到15日，在北大第二招待所會議室，發展組召開了中國農業發展若干問題討論會。會前，執行組總結了前一段工作，對項目的順利進展表示滿意，對下一段工作進行了安排，計劃暑期到滌縣地區做一次綜合調查，之前先到川貴雲做一次宏觀概略調查，為使大家瞭解項目的進展和今後的打算，決定開這麼一個會。並讓英淘請他父親、若冰請杜潤生到會講話，鼓勵鼓勵大家。

1月10日會議召開，王耕今主持，北大經濟系主任胡代光^[273]致辭，鄧力群講話^[274]。鄧力群講：「中國10億人口，其中有8億農民，這是我們的基本國情。」「你們當過農民，現在還想把自己的學識、能力用於農村，不愧是先進分子。」「不瞭解農村，就不能說瞭解中國；農村的事沒辦好，中國的事就不能說辦好了。」「看不起農民，農民也有權忘記他們、拋棄他們！」接著，他講了自己對包產到戶的看法：「這種包產到戶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包產到戶，儘管是大包乾，也絕不是分田到戶，更不是單幹。」「還要看到，包產到戶以後，出現了新的生產聯合、專業分工。」這種認識在當時的領導人中還是少有的。他還說：「你們擬定的題目和準備採取的步驟，我也贊成。」唯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他在講話中激烈地批評了胡平，我在整理他的講話時，把那些部分都刪去了，又一次體會到杜鷹說的「老頭的看法和我們不一樣」。

第二天，杜潤生講話^[275]。他說：「我來的主要目的，是表示農委對青年同志中有志於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同志的支持。」「你們自動組織起來進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事情。」「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他又說：「經驗證明黨如果根據假情報、假彙報做出決策，那是非常危險的。」「8億農民期盼著你們！」

他們講話後，各組對自己項目的進展做了交流。12日上午，謝揚介紹了《「包產到戶」資料選》的編輯情況；王文仲介紹了《農村社會學》的概況、農村社會學的調查方法；王世儒介紹了《中國農業經濟文獻目錄》的編輯經過。下午，李平山介紹了到甘肅進行農村調查遇到的各種問題，

[273] 胡代光（1919-），四川新縣人。時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

[274] 鄧力群講話，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5-11頁。

[275] 杜潤生講話，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12-15頁。

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關注。接著兩天，由十八個專題研究中的八個作了發言，舉行了各種形式的討論會。

會議的最後一天，我和楊勳代表執行組對討論會進行了總結。我們指出：對農村發展問題實行多學科綜合的系統研究，還是一種嘗試。我們已經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十幾個專業的研究人員參加工作，希望大家有對科學的獻身精神、有良好的學術和政治品德、有相當的研究能力，順利地完成項目。會議開的非常成功，增強了大家相互合作的願望，激勵了大家作好項目的信心。

會後，小強不好意思地和我說：「老陳，真對不起！我到甘肅的調查報告，用了你不少觀點，事先也沒和你說。」我說：「你覺得好的觀點傳播出去了，對推廣包產到戶有好處，就是好事。何必計較是誰的觀點呢！」小強是一個重情重義的性情中人。他去滁縣前悄悄和我說：「其仁私下和我說，要我和他一起離開發展組，我沒答應。覺得那麼做，太對不起你了。」我說：「你自由選擇。」他說：「我不會走！」

長期以來，由於沒有一部農業經濟文獻索引，作研究、查資料頗為不便。1982年3月，由侯漢清、孟昭晉牽頭編輯的《中國農業經濟文獻目錄（1900-1980年）》業已完成。他們這個課題組的6個人，用了5個月的業餘時間，在浩瀚的書林中抄錄了3萬多張大卡片，分類收錄了兩萬多條目錄，完成了這部100餘萬字的工具書。這部工具書，不僅提供了我國80年來農業發展史的線條，而且在圖書分類學和目錄學上也有所突破。

同時，我主持編輯的《包產到戶資料選》，收錄了有關的理論論文、歷史資料和調查報告120多篇，約60萬字，交付滁縣地區印刷並發行後，深受讀者歡迎。楊勳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業大事紀要（1949-1981年）》也完成了初稿，為編寫農業經濟史提供了基礎。此外，英洵和維凌還組織編寫翻譯了《經濟控制論》、《經濟發展概論》等書。

為了避免滁縣地區綜合調查的局限性，執行組商定由我、若冰、繁華和曉魯，先行到四川、雲南、貴州、安徽做了一次宏觀概略調查，瞭解一下各地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以後，出現的普遍性問題。我們拿著書記處研究室的介紹信，到這幾個地方跑了一圈。令人欣喜的是，農村出現的深刻變化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四川南充地區「三總家鄉的農民又笑了！」

南充地區的儀隴、廣安、南充分別是朱德^[276]、鄧小平^[277]、羅瑞卿^[278]三總的家鄉。1976年以前，每年都有農民外出逃荒要飯，多的時候達到20%以上，1980年以後一個也沒有了。我們先後拜訪了朱德的弟弟朱岱年、鄧小平的舅舅和羅瑞卿的嫂子。鄧小平的舅舅是個不務正業的人，1976年以前，不好好幹活，年年出去要飯，現在日子也好過了。羅瑞卿的嫂子見了我們，連連說：「現在政策好噢，莫變喲！」

但最令人難忘的，是朱岱年老人講的故事：「1961年過年，我哥和嫂子來看我。他們來前，廖志高^[279]帶人到了儀隴琅琊鎮，每家發兩斤肉，10斤米。我哥他們一來，聞著家家都有肉香，看著家家都吃米飯。高興地和我說：『鄉親們吃得不錯嘛！』我板著臉說：『你要是不來，大家都快餓死了！』廖志高站在我哥身後向我搖手，我就當做沒看見。把怎麼吹大氣，怎麼餓死人，一五一十都和我哥說了。廖志高臉上直流汗，我哥氣得瞪了他一會兒。走時流著淚，把他的軍大衣披在了我身上。」說起現在，老人高興起來了，說：「要吃糧，找紫陽！這兩年，我們收入增加了一倍，糧食也夠吃了，誰還要飯？日子好過了。」老人又說：「李井泉^[280]、廖志高可把我們害苦了！大家恨不得扒他們的皮，他們搞得我們家家斷炊，戶戶死人！好不淒慘。」一天夜裏，南充地委書記康世盛流著淚和我說：「老百姓恨死李井泉、廖志高了，他們在四川餓死900萬人啊！」後來，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281]告訴我：「四川實際餓死1,200萬人以上！」

一路調查，感慨良多。這兩年，生產持續增長，農民生活改善，市場繁榮，社會穩定，呈現出喜人的景象。幾個省主管農業的領導人都認為：「包乾到戶加合同」可能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路子來。從1956年以來，農村有過多次調整生產關係的變動，只有這一次真正是損失最小、收益最大的。而且，農村改革的成功，勢必衝擊各個部門，從而導致一系列改革的開始。

實行包產（幹）到戶一年以上的地區，確實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需要及時解決，主要是：生產要素的流動和轉移，包括生產資料（土地、耕

[276] 朱德（1886-1976），四川儀隴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

[277] 鄧小平（1904-1997），四川廣安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也是1978年到1992年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278] 羅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279] 廖志高（1913-2000），四川冕寧人。曾任中國四川省委書記。

[280] 李井泉（1909-1989），江西臨川人。曾長期擔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實行左傾路線，餓死上千萬人。

[281] 廖伯康（1924-），四川重慶人。曾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

畜、機具)、勞動力和資金；新的經濟協作和聯合；效率和平等，主要是貧富問題；領導和管理，包括合同、立法等問題，更需要關注的是，隨著包產(幹)到戶的實行，有關部門的改革問題，如：商業供銷、銀行財稅、工業交通、科技文化、人事勞動以致黨政領導部門等等，幾乎各個部門都會遇到如何改革，以適應廣大農村變革的需要。

各地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隨著各種農副產品的大幅增產，農民「賣糧難」、「賣豬難」、「賣油難」的問題日益嚴重。農民氣憤地把收購辦法叫「刀鞭政策」，說收購部門「一手拿刀子，多了砍；一手拿鞭子，少了趕」，與河南農民說的一樣。結果，這種作法造成蓬溪的蘋果餵豬了，簡陽的茉莉花漚糞了，眉山的玫瑰花倒掉了，儀隴的菊花爛壞了……

雖然流通領域確不適應新的局面，但許多問題它們也解決不了。像計劃價格缺少彈性，農民對低價產品少產、不賣，造成短缺；高價產品多產、多賣，又造成積壓；計劃指標要完成，收少了滿足不了需要，收多了財政負擔不起。僅四川一地，去年柑桔大豐收，卻一下腐爛了4,000萬斤以上，為什麼呢？開始，商業部門想多收購，地方想多留，彼此為購留比例爭執不下；果子上市後，商業部門又不准其他單位往外省運，結果造成了大批爛果。

那時，我們外出調查，都是一周裏，4天日夜加班把活幹完，另外3天則探古尋幽、拜訪名家，既可以開闊眼界，又可以調節心神。在成都參觀了武侯祠、青羊宮和杜甫草堂，到新都看了寶光寺。而後，至都江堰拜謁了二王廟李冰父子，到青城山上清宮夜宿尋幽，向道長請教「天人合一」。赴峨嵋山與報國寺老僧參禪，至萬年寺體味李白「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的意境，再自清音仙境穿一線天嬉娛猴群，到古木參天的洪椿坪，登九十九道拐過鑽天坡，夜宿洗象池，第二日上金頂，在霧色迷濛中瞻仰了佛光。下山後，拜謁大渡河、青衣江、岷江匯流處的樂山大佛。據說，1962年大佛曾閉眼不忍看四川餓殍遍野的慘像。貴州包產(幹)到戶成效明顯，安順農民都很滿意，趁便又一次欣賞了黃果樹瀑布。在雲南看了幾處農村和工廠，參觀了滇池、龍門和石林。但印象最深的，卻是曾給前省委書記賈啟允^[282]開車的司機說的話，雲南中部有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訓練基地，學的都是爆破、放毒、暗殺一類恐怖手段，聽得讓人毛骨悚然。看來，毛澤東當年要搞世界革命，不光是說說而已。

【282】賈啟允(1914-2004)，山西聞喜人。曾先後任中共貴州、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回北京後，由我執筆寫了《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283】}。曉魯執筆寫了《四川柑桔為什麼大批腐爛》^{【284】}，他是一個嚴肅的研究者，既眼光敏銳，又辦事穩妥。若冰執筆寫了《農副產品收購中的「刀鞭政策」》，文章很有見地，可惜他認為看法不成熟，就沒有發表。我把前兩篇文章送給耀邦看，他立即作了批示。還和我說：「你們的報告是從實際中來的，有見解，有生氣，不落俗套！」我又把一路的見聞向他作了比較詳細地彙報。他拉著我的手說：「小陳，聽你說『三總家鄉的農民又笑了』，大家都很高興！為什麼農民又笑了？因為現在農村政策調整的好，符合他們的利益了，過去許多左的做法不切合實際，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什麼時候農民心情舒暢，國家形勢就好。農民不滿意了，一定是政策上出了問題。我們要繼續克服各種左的束縛，8億農民富裕了，國家才能穩定發展。去年你在安徽的調查很好，你的意見對中央決策起了重大作用。」一陣暖流讓我感到沒有辜負農民的期望。

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11屆6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可惜的是，這個《決議》在鄧小平、胡喬木的主導下，對毛澤東從1956年開始的「反冒進」、「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反右傾」以至「文化大革命」，包括對彭德懷、劉少奇等人的殘酷整肅，這一系列「左的」、「極左的」錯誤作法，並沒能進行實事求是的清算，以致後來左的思潮在中國不斷興妖作怪。大局如此，也只能盡人事而已了。

這時，丫丫已經4歲，送到了香山的六一幼兒院，周末接回家。每到這時，她就成了家裏的開心果。無論誰說：「丫丫給我們跳個舞」，她就會自己放音樂，像模像樣地翩翩起舞。一天吃完晚飯，我說：「丫，給大家背一首《靜夜思》吧！」她鄭重其事地站到房子中間，朗聲背了起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低頭……」哈，忘了，她自己低頭一看，忽然說：「低頭屁股香！」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能在家享受天倫之樂的日子很少，每天都是忙於研究、連絡、聽講座。這時，聽到了萬里在農業部批評部領導人的講話，他說：「不久前，部裏有人還說中央決策是『方向、道路』錯誤，是『分田單幹』，搞『資本主義』。有些人拿了工資，吃飽飯，坐在北京說長論短不行，要下去調查研究。」接著，農委組織了17個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問題，還資助發展組8,000元，到安徽滁縣地區進行調查。

【283】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137-141頁。

【284】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275-280頁。

4-22 一次成功的綜合研究：滁縣地區的農村調查

去滁縣前，杜潤生專門和我說：「中央的政策是，30%的發達地區實行『專業承包』，50%的中間地帶實行『聯產到勞』，20%的落後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記住啊！」^[285]第二天上午，吳象問我，杜潤生和你怎麼說？我向他如實稟告，他說：「萬里讓我轉告你，不要有什麼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不過，不要對外講。」當天下午，萬里找我談，他說：「不要聽杜潤生那一套，他是個機會主義者，兩邊討好。你去年說『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很有見識。農村的情況一定要如實反映。」我一口答應了。

發展組有20多人報名參加調查，我建議按我們宏觀概略調查，提出的幾個問題分組。周其仁帶頭反對，但多數人同意我的意見。我想，面對實際，大家的意見會比較接近，就決定先不分組，下去再決定。7月15日，我們一行21人到達滁縣，住到了地委招待所。地委書記王郁昭^[286]、專員吳炎武^[287]、秘書長劉釗、辦公室主任陸子修、研究室主任朱成基等人，不僅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還親自給我們作報告。

大家認真地聽了3天報告。白天聽滁縣地委領導人和有關部門的介紹，隨時提問隨時回答，晚上自由討論直到深夜。在「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這個總題目下，我們這些不同學科的年青研究人員，第一次嘗試多學科綜合性研究。大家反覆爭論以後，將研究人員分成了典型調查、專題調查和綜合調查三大塊、九部分。問題基本上和我在北京提出的一樣，這時誰也沒有不同意見了。冒著酷暑，大家在滁縣緊張地工作了一個半月。

典型調查分別由楊冠三到全椒縣老觀陳大隊，陳錫文、馬蘇元到鳳陽縣小崗、雁塘頭生產隊，梁曉東到來安縣大余郢生產隊，蹲點進行。專題調查6組，鄧英淘、張阿妹調查糧食問題，白南風、鄧永思調查貧富問題，白南生、徐寬、趙明宇調查勞動和資金流動問題，張木生、杜鷹、謝揚調查協作和聯合問題，白若冰、王子平調查購銷和流通問題，周其仁、王小強調查基層管理問題。綜合研究由各專題出一人和我、楊勳、孫方明組成。

8月底回到北京，9月上旬大部分調查報告都完成了。我和方明日夜苦幹，趕寫出了綜合報告《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先請調查組的成員

[285] 《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123頁所述「再三講不要帶『框框』下去」，不實。他當時和我講的話，萬里、吳象和發展組的很多人都知道。

[286] 王郁昭（1926-），山東文登人。1978年擔任中共滁縣地委書記時，帶頭進行農村改革；後任安徽省省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87] 吳炎武（1922-），安徽五河人。時任滁縣行署專員，後任中共滁縣地委書記。

修改。我向鄧力群彙報了調查情況，而後拿報告給他看，他看後說：「報告寫得很好！但題目有些以偏概全。社會主義農業還是要走集體化的道路嘛！」為避免爭議，我說：「題目目前邊加上『雙包到戶地區』幾個字怎麼樣？」他說：「這樣就妥當了！」。

以後，這篇報告就以《「雙包到戶」地區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288】}上送並發表了，後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報告分三個部分：

一、幾個基本問題

(一) 糧食生產問題：1. 近期糧食生產的趨勢，兩年來滁縣地區糧食總產增長了40%以上；2. 中期糧食生產的預測，兩、三年內仍會以每年5-7%的速度增長；3. 糧食生產的可能前景，需創造「低能耗-高產出」的模式。

(二)，土地經營問題：1. 土地承包問題，按人口承包土地年變動率10%，按人勞比則為20%，這類問題不難解決；2. 土地使用問題，如何使農民有長遠打算尚未解決；3. 土地轉移問題，部分農民脫離土地是必然趨勢，土地流轉問題需及早研究。

(三)，貧富差別問題：1. 農戶的致富程度及其差別，目前95%農戶收入增加，但確實存在10%「冒尖戶」和5%「困難戶」的差別；2. 農戶對貧富差別的心理反映，目前反映不大；3. 扶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滁縣地區的困難戶已從30%降到4.5%，但「扶貧要扶本」，扶植其能力。

二、新的發展趨勢

(一) 勞動力和資金的流向：1. 農村剩餘勞力增加，目前有22萬農村勞力，約占20%，可以離開土地，5至10年後將達47-71萬，需及早做好準備；2. 農村資金狀況好轉，據調查，農戶的生產、生活支出比基本是三七開，近3年農民用於生產資料的投資大大增加；3. 近期內以重點發展家庭規模的多種經營為宜。

(二) 協作聯合的前景：1. 協作聯合的現狀，參加經濟聯合14種項目的農戶占4.5%，多為兼業；2. 協作聯合的特點，基本上和種植業相關、採取股份形式，但已從簡單協作、作坊式合作到工場式聯合逐層發展；3. 社會經濟效果，在種植業中發揮了個體、集體兩種積極性，有利於向專業化發展、資源合理配置、經濟結構調整，同時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的要求。

(三) 農村購銷趨勢的變化：1. 農村購銷基礎變化，農業生產增長使商品糧比重上升，農民三年收入增加兩倍，購買力提高；2. 農村購銷內容變化，農民購買化肥、農藥、耕牛、農機具增長很快，而農民購買「吃、

【288】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146-166頁。

穿、用、住」的順序變為「用、穿、住、吃」，「用」中以收音機、手錶、自行車、縫紉機增長最快，「穿」則化纖混紡銷量大增，「住」磚牆瓦頂正替換泥牆草頂，「吃」則從購糧變為煙酒等；3. 農村購銷對象和形式變化，從面對生產隊變為農戶，批量變另售；4. 農村購銷渠道變化，多渠道開始出現。

三、農村基層管理

(一) 建立合理的經濟職能結構：1. 農戶承擔了部分管理職能，主要是按合同組織生產勞動，積累，信貸，分配和監督，2. 必要的集體管理職能，像城鄉物資交流、農業技術推廣、扶貧、調整土地、抗災水利等，都不是個體農戶能承擔的，需要集體的管理；3. 經濟職能結構，大體是農戶、聯合體與國家在農村的經濟組織，分別承擔各自的職能。

(二) 農村幹部狀況：1. 農村幹部的收益，均高於農戶，因為他們「從田埂上掉到了田裏」，又有較強的經營能力，用水、用牛、買化肥、借貸款、請幫工都方便；2. 農村幹部的素質，據統計，社隊幹部年齡大、文化低、不適應很明顯；3. 穩定農村幹部，目前農村單項的、技術的、小經營的人才成長較快，能承擔綜合、複雜管理的人才難得，穩定並提高現有農村幹部隊伍十分重要。

在完成這個報告之前，調查組先完成了以下報告：楊冠三：《先進隊為什麼也搞起了包產到戶？——安徽省全椒縣老觀陳大隊包產到戶的典型調查》；陳錫文、馬蘇元：《巨大的變化深刻的啟示——安徽省鳳陽縣小崗、雁塘頭生產隊包乾到戶的典型調查》；梁曉東：《從「炮打不散」到包產到戶——安徽省來安縣大余郢生產隊生產組織形式演變的典型調查》；鄧英洵、張阿妹：《「雙包到戶」後的糧食生產前景問題》；白南風、鄧永思：《「雙包到戶」後農村社會的貧富問題》；白南生、徐寬、趙明宇：《「雙包到戶」後的勞動力和資金變動趨勢》；張木生、杜鷹、謝揚：《「雙包到戶」後的協作與聯合問題》；周其仁、王小強：《「雙包到戶」後農村基層單位經濟職能的變化和公社體制改革》；楊動、孫方明：《怎樣看待包乾到戶》。^{【289】}而後，請每個報告的執筆人，將其報告濃縮為 2,000 字的要點，交給綜合組。再由綜合組根據整體需要完成綜合報告。當時，許多年青人耽心自己的學問不如老專家，覺得這樣行嗎？我說：「我們對每個問題的研究可能都不如老專家，但沒有一個老專家有這麼廣泛的知識，這就是多學科綜合研究無人能比的優勢。」但報告中缺少土地問題和購銷問題的報告，我和

【289】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167-259頁。

方明說：「我們根據調查資料，把這兩部分補起來！」經過我和方明 10 多天的努力，報告終於完成了。又經調查組每人過目修改才定稿。

應該說，這是 1949 年以後，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次嘗試用系統分析的方法，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顯然，這種研究方式優於單學科的研究，從多角度分析問題，比較容易避免「瞎子摸象」的片面性，比較容易得到對複雜系統全面正確的總體認識。維凌、繁華一些沒有參加調查的朋友，看了我們寫的調查報告，也嘖嘖稱讚說：「姿先生，這是你的一個創造！」我說：「我們研究了那麼久，總得試驗一下嘛！」以後，發展組多次使用這種方法。

我向杜潤生做了詳細彙報，他對農村出現的新問題很關心，但總是對「集體經濟怎麼辦」更關注，對我們沒按他「切三刀」的意圖行事，很不滿意。吳象倒是對我們的調查十分誇獎，說：「我看你們的求實精神和理論功底，一般機關幹部是達不到的。萬里很稱讚你們這批年青人！」我說：「我們下去之前，就決定不帶任何框框，結論都是從實際中來的。您和萬里的囑咐我一直記在心裏。」

後來，萬里親自主持制定 5 個農村改革的「1 號文件」，杜潤生具體協調可以說功不可沒。但客觀地講，從 1978 年到 1981 年，農村改革的前幾年，杜潤生的態度始終是模稜兩可的。他在中國科學院與張勁夫關係密切，有人告訴我說，張勁夫在安徽反對包產到戶，就是和他商議過的。當然，他隨著農村改革的實踐，認識發展變化了，也不失為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的聰明選擇，這一點應該充分肯定。

4-23 楊冠三先後 5 年到鳳陽解剖麻雀

發展組成立時曾經討論過，為了真實地弄清中國農村 30 年來走過的曲折路程，需要對幾個不同類型的縣進行深入解剖，這樣才能準確把握農村問題的癥結所在。滁縣地區綜合調查結束時，楊冠三提出，希望批准他到鳳陽縣蹲點進行研究。我知道他是一位不善張揚做事認真的難得人才。在北京經濟學院讀書時，他組織的社會學小組，就受到老一輩社會學家的稱讚。我立即同意了他的研究計劃。

此後的 5 年中，楊冠三不顧寒冬酷暑，每年都用半年的時間住在鳳陽，查閱縣檔案館的幾百萬字資料，拜訪縣裏各界的代表人物。果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以他為主終於完成了一件前人沒能完成的研究成果《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一書。這本書以無

可辯駁的翔實資料，描述了從 1949 年到 1979 年 30 年間農村和農民遭遇的各種苦難，特別是用第一手資料披露了 1958 年到 1962 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實際上是 5 年），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真正原因與駭人事實。

雖然僅僅是一個不足 40 萬人的縣發生的事情，但對中國而言卻是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楊冠三深知這本書出版的震撼性，他和我商議，準備請王耕今與楊勳一起署名，以便減輕可能帶來的風險。王耕今稱讚這本書是「難得的信史」，楊勳也大力支持。但書稿送到出版社還是拖了下來，原因是「內容過份敏感，不宜出版」。經多次斡旋，直到 1989 年初書稿才以「內部發行」的方式刊印了。

以往出版的研究農村情況的著作，從來沒有這麼大膽直言，竟敢歷數中共在農村造成的種種問題，並且具體描述了大批餓死人的慘象！這部書雖為「內部發行」，卻打破了誰也不能談論「餓死人真相」的禁區。那麼，楊冠三的書中究竟有些甚麼內容那麼值得重視呢？下面摘引該書中的幾段供讀者參考：

一是「五風」猖獗百姓遭殃。

「共產風」為五風之首。從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運動開始，認為「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由上到下，層層「共產」，相互「共產」，集體「共」個人的「產」，各地都刮起了一股「共產風」，範圍無所不包。不僅隨意調動勞力、調動糧草、調動牲畜、調動農具，而且把社員家的禽畜鍋碗瓢盆都不分你我地「歸大堆」了，甚至扒房並村，鬧得雞犬不寧，造成了生產的極大破壞。自然條件優越的風淮大隊統計，因為「共產風」的破壞，三年生產連年下降，收入逐年減少，社員生活也一年不如一年。據調查，該大隊 1958 年總收入 38 萬元，糧食總產 157 萬斤，社員平均收入 78.87 元；1959 年總收入 14 萬元，糧食總產 127 萬斤，社員平均收入 29.35 元，比上年降低 62.8%；到 1960 年，總收入 7.7 萬元，糧食總產 59 萬斤，社員平均收入 4.4 元，比上年又降低 85%。

其次是「浮誇風」。縣委承認，「全縣浮誇非常嚴重，向上級報數字都是層層估，級級編，以弄報好，以少報多，沒有報有，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如，1958 年全縣糧產只有 1.5 億斤，卻上報了 4.05 億斤，多報了兩倍半以上；生豬實有 4 萬頭，卻上報了 16 萬頭，多報了三倍以上；該縣三年植樹 13 萬畝，卻上報綠化 72 萬畝，多報了五倍半；其他各項指標無不如此。

第三是「強迫命令風」。縣委簡報反映，此類問題層出不窮、不勝枚舉。如，宏光大隊強制推行旱改水，三年來一年不如一年，畝產從 50 斤到 30 斤再到 2-3 斤；縣裏的電灌站工地強制加班加點，死掉民工 2474 人，佔到民工總數 17.3%，其中：利民公社上工 500 人，死了 307 人，竟佔了 61.4%；縣裏水庫工地私設牢房，關的 70 人中死了 28 人，還將不聽話的民工的耳朵用鐵絲穿起來。真是草菅人命無以復加。

第四是「瞎指揮風」。主要是甚麼都搞「大兵團作戰」，勞動力來回瞎調動，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如，門檯子公社夏季麥收正忙，卻被調出 500 多勞動力去黃灣支援，往返八天，只幹了半天活，支援沒搞好，自己的麥子也因雨損失很大；很多公社耕地、犁田、栽秧、鏟草等等，都要搞「大兵團作戰」，弄得東調西，西調東，層層手忙腳亂。

第五是「特殊化風」。在縣委 1959 年舉辦的六級幹部會上統計，到會的 4,891 個幹部中，經濟賬目不清的有 4,062 人，竟佔了 87.14%。1961 年，在群眾生活出現非常困難、甚至開始餓死人的時候，縣、社領導幹部卻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大搞特殊化；縣委書記趙玉書還公然在會上講「死兩個人，沒甚麼了不起。」

二是「五風」嚴重破壞了生產力。據 1961 年《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所描述，該縣：勞力大幅減少。全縣 1958 年有勞動力 158272 人，現在只剩 106025 人，減少了 36%！耕畜大量死亡。1958 年有耕畜 37619 頭，兩年減少 13763 頭，占 36.6%；全縣農具更損壞 40% 以上。產量下降驚人。去年風調雨順，但糧產下降 63.5%；生豬飼養下降 43.4%。

三是實行高徵購，大批餓死人。據 1961 年縣委三級幹部會議所說，由於高指標、高估產，就帶來了高徵購，如 1959 年糧食總產只有 10,960 萬斤（虛報 40,500 萬斤），僅夠全縣口糧，卻徵購了 5,974 萬斤，以致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據縣委統計，僅 1959 到 1960 兩年（缺 1961 年），全縣就死掉 60,245 人，佔農村人口的 17.7%，死絕的達到 840 多戶；但這個數字比縣社幹部直接反映的——全縣餓死、打死、逼死的人約佔 30% 左右——是大大縮小的了；如，武店公社 3 年就死亡了 14,952 人，佔全社人口 33.9%；同時，還發現 63 起人吃人的悲慘事件！像這種第一手的調查實錄，特別是「餓死人」的真實情況，在國內過去從來沒有出版過。

《農村讀物出版社》能夠內部發行這部書，已經是冒了很大的風險了。多年以後，張廣友^[290]拿來他的書稿《三年大饑荒親歷記》，讓我幫他出

[290] 張廣友（1930-2008），遼寧鐵嶺人。長期擔任新華社記者，1979 年隨萬里到安徽作了大量關於農村改革的報導，1982 年任《農民日報》總編輯。

版。我看了以後，發現其中描寫鳳陽的段落全部是抄錄楊冠三書中的，就請他取得授權，但沒有了下文。接著，在楊繼繩^{【291】}出版的《墓碑》一書中，描寫鳳陽的段落，同樣也是全部抄錄楊冠三書中的，不知版權問題是不是妥善地解決了。

4-24 趙紫陽的批示和萬里的支持

好消息傳來，趙紫陽看到我們寫的滁縣調查綜合報告，當天立即批示：「這個報告把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來的情况寫的一清二楚，建議各省省委書記、省長認真一閱。」這個報告對在全國還有爭議的雙包到戶的推行、發展和完善起了積極的作用。很快，《中國社會科學》也刊出了這個報告，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調查組的成員總算放下了心，嘗到了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甜頭，大家都很高興。

1981年10月25日，在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鄧力群，先後都對發展組在農村改革中發揮的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說起我們的調查報告，耀邦說：「這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東西！」紫陽說：「他們的分析是從實際中來的，是動態的、發展的看問題，和我們一些人拍腦袋的結論不一樣。」萬里說：「這些年青年人沒有框框，比我們看的深、看的遠。去年，陳一諮就提出，包產到戶是『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很有頭腦。」

年底，萬里主持召開了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各地傳來的訊息，幾乎都是「隊不如組，組不如戶，不包到戶穩不住」。我和小強參加了會議，親身感受到了杜潤生協調各方的能力，他很善於調和各種意見，在激烈的爭論中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識。一天早上，他走到我們住的房間，嘴裏唸叨著：「『承包』，『聯產』，『聯產』，『承包』，你們說，究竟叫個甚麼名稱，大家才都能接受呢？」小強說：「我看『聯產承包制』，這個提法大家就都能接受。」杜老嘴裏唸叨著「聯產承包制」、「聯產承包制」高興地走了。後來，這個提法確實大家都覺得不錯。

在會上，我和小強討論以後，由他執筆寫了《論農村的聯產承包制》^{【292】}一文，文章分四小節：「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提出，聯產承包制的多樣化原則，聯產承包制的「統」「包」關係，聯產承包制對農村體制改革的意義。萬里看後和我說：「你們的文章寫的好！聯產承包制一定要深

【291】楊繼繩（1940-），湖北浠水人。長期擔任新華社記者，退休後曾任《炎黃春秋》副社長。

【292】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卷，第333-339頁。

入論述，你們這是第一篇！」會上，還開了個笑話。當各地反映「賣糧難」、「賣豬難」時，李先念作報告說：「動員農民吃豬嘛！」當時會場上就哄笑了起來，大家都想起了晉惠帝問災民為什麼不吃「肉糜」的故事。

因為農民當時每人年平均收入也就 120 元左右，養一頭豬到出圈要 6-8 個月，只能賣 100-130 元，扣除成本也就賺 60 多元，這些錢大體要支付一家人大半年的日常開銷。農民一般在過年或中秋才殺豬，大部分賣掉換錢，少部分留下來供年節使用。農民何嘗不想多吃些肉呢？但經濟條件還作不到啊！可見如果領導人長期當官做老爺，又不深入民眾，怎麼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呢！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央批轉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就是第一個「1 號文件」。這個文件最顯著的特點是，承認各種責任制、包括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耀邦高興地說：「最好每年來個『1 號文件』！」書記處大多贊成。第一個「1 號文件」發出以後，農民吃了定心丸。經濟發達的江蘇、廣東和產糧大省黑龍江也都搞了起來。一年之內，全國雙包到戶發展到 95% 以上，確是 1949 年以來「損失最小，收穫最大」的一次農村生產關係變動。

後來，連續 5 年發出了 5 個「1 號文件」。大家反映，這幾個「1 號文件」，一個比一個「寬」，一個比一個「活」，一個比一個「順民心」。5 年裏，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面對實踐，越往下層原來反對的人都轉變為支持了，而越往上層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企圖通過「打擊經濟犯罪」，不斷阻礙改革的進展。他們除了給經濟特區挑毛病外，就是給農村改革找問題。改革每前進一步，實在都是十分艱難。

1 月 10 日，母親發來加急電報：「你父病危」，我立即趕赴西安。父親雙目緊閉躺在病床上，看著他老人家瘦骨嶙峋的樣子，我不由淚如雨下，埋怨母親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母親含著淚說：「他不讓我給你說，怕你工作受影響。他為了早日正常工作，每天從家走到鐘樓再走回來。結果，運動過量，一天暈倒了。醫生說你爸文革時受傷很嚴重，現在諸症並發，每天都尿出大量蛋白。我一說讓你回來，你爸就瞪眼睛。」想起父親常年四處奔波做水利工程，一直身體很好，文革竟給折磨的沒了人形，不由心中酸楚。

父親醒來看我站在病床邊，說：「你回來幹啥？」我連忙說：「我出差路過，誰知您住院了。」他苦笑著說：「我不讓你媽告訴你，是不想耽擱你的事。好不容易有個幹事的機會，還不抓緊！抗戰時，奶奶病重，我要去看她，她叫你姑媽寫信給我，說『國事為重，不得離職』。現在你們年

青人，一事當前都是先為自己打算，這麼下去國家還怎麼搞好？快回去做你的事，農民苦啊！你能為他們做些有益的事，你爸在天之靈也會保佑你的。」

父親又說起：「1949年以前戰亂不止，但大多數地方還能做些事。從1949年到1956年還做了些事，讓大家看到了希望。1956年以後就不行了，運動不斷，幹什麼都不講規矩，誰提了意見就當敵人整，文革10年又都是破壞。人一生能做事的時間不多呵，你要趁著年青多做事，將來才不會後悔。諒呵，你是個聰明憨厚的孩子，遇事有大局觀。快回去做事吧，聽話。」在西安只呆了3天，我只得含淚回到北京。

1月25日，萬里在中南海接見發展組人員，與會的有耕今、楊勳、我、小強、英洵、若冰、木生、謝揚、方明和翁永曦等10餘人。萬里說：「去年災害很大，獲得豐收，證明路線、政策對頭。回顧歷史，牢騷、指責，沒有用處。現在需要建設性、創造性的勞動。你們組織起來搞研究，非常好，多多益善。」最後他說：「我支持你們的工作，感謝你們的成績。」一上午，我們彙報，他插話，十分活躍。

萬里談話中有兩點，我至今印象深刻。一是，他說：「共產黨進了城，許多人忘了農民。波蘭共產黨被老百姓罵成『賣國賊』，我們還沒有被老百姓這麼罵。搞不好，也會有這一天！」二是，他說：「引經據典只能作參考，不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早晚會清議誤國！」萬里從安徽到中央推動農村改革，思想解放敢作敢為，令人敬佩。他才不愧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旗手！現在有人說杜潤生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旗手」，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4-25 屋漏偏逢連陰雨，滄海桑田人難知

母親發來電報說：「你父已於1月31日仙逝。尊囑，喪事從簡，不讓你奔喪，好好工作，勿負父望。」我遙向西安給父親磕了3個頭，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誰知「屋漏偏逢連陰雨」，吳琰又給我出了個難題。她是個正直、熱情、上進的人，失去高考機會回到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同時在電視大學進修。發展組創建以前，她要學文學，我給她開了古今中外名著500多冊；她要考歷史，我給她把歷史上發生的大事的年代、背景、過程和意義列成表。發展組成立以後，我從早忙到黑，她再問我什麼，我沒時間和她細談，就一二三回答她。去年底，她在大連辦書展時，寫了一篇文章《求索》，講一個經歷文革磨練的青年，追求個人權利

不斷碰壁的故事。我和她說：「個人解放是人類解放的前提，你的《求索》告訴了大家這個道理。但『人創造了什麼樣的環境，環境就造就什麼樣的人』，當今中國若不改變體制環境，人的解放是很有限的。」

一天，她對我說：「我告訴你個事，你不許生氣。我和你一個朋友相愛了！」我像當頭挨了一棒，但故作鎮靜，就問她：「是誰？」她說：「我們準備結婚，而後去杭州。」我愣了一會說：「我尊重你的選擇，你們結婚時我參加婚禮。」但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1980年，吳琰懷孕做了人流，事後才和我說，考慮她身體不好，我雖安慰了她，心裏卻很痛惜。今年她又懷孕，不僅做了人流，還做了絕育，又是事後和我說，我只能搖頭歎息。我從小受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父母也用他們的言傳身教熏陶著我。幾個算命先生都說我這個人「多情而專一」，我一直主張愛一個人時，絕不對其他人動心。還記得1974年，我帶顧健到北京，英淘和我說：「小燕比顧健強多了，我帶你去見見吧！」我說：「我正和一個人談，又去見另一個人，我不能這麼做。」吳琰有了她心儀之人，我本該為她高興，可我很痛苦。

兩周後，吳琰很無奈地和我說：「他又反悔了！」我說：「你們真正相愛，就不要怕什麼，你告訴他，要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又過了幾天，吳琰說：「不行了！」我說：「那你準備怎麼辦？」她掉淚了，沒說什麼。我說：「你要願意，我們就一起好好過。」她點點頭。但畢竟這次的傷害是深重的，兩人的心裏從此結下了疙瘩。我覺得好像自己正在前面拼刺刀，背後卻讓自己人捅了一刀。

吳琰從1975年和我相識、相戀，至今8年了。生活中，哪家夫妻沒有磨擦？上牙和下牙還磕碰呢，家庭中沒有酸甜苦辣鹹，就不會五味調和。可能我一忙起工作就別的都忘了，確實對她關心體貼不夠。咳，男人的感情可能永遠沒有女人那麼細膩，但已相依為命，怎麼可能天天唧唧我我。何況我現在能做的事，也是我們多年的夙願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來，只能無奈捨小我而取大我了。

吳琰從小過集體生活，自香山慈幼院、景山小學、景山中學到集體插隊，按她的說法：「父母忙於革命工作，我從小就沒有家庭觀念。」是啊，這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曾經批評過她和英淘，我說：「你們從小生活在革命家庭，優點是『無我』，缺點是『無他』。能『無我』而『為國』十分難得，但『無他』就不好了。因為你們從小就有一般人沒有的政治、經濟優越條件，所以，別人為你們做事似乎都是應該的，而你們為別人做事就好像『恩賜』了，不少幹部子弟都有這種『貴族』心態。」

我又舉例說：「我們回北京後，農村的朋友來找，無非是求著辦些事，看病啊，玩玩啊，想弄點化肥啊，他們哪知道北京那麼大，辦事更不容易。可你們怕耽誤工作，不願見他們就不對了，為老百姓謀福利可不是一句空話。當年我們被打成『小鄧小平集團』，憑什麼常大全、李學收留你們？憑的是人的良心。我們可不能今天一進城臉子就變了！真正作到『無我有他』，才是做人的精義。」他們聽了我的意見，後來確實做得不錯。

恰巧，張守一和張宣三先後找我，要我一定參加在西安舉辦的數量經濟學年會。我正好趁開會到西安「烈士陵園」拜祭了父親。母親一再和我說：「你爸走前再三和我說，你做的事關係重大，一定不要讓你回來，我也只能按你爸的遺命辦，你別怪我。」我跪在母親面前流著淚說：「自古道『忠孝不能兩全』，兒子不孝，只能從命！」並告訴了母親吳琰絕育的事，母親掉著淚說：「她這是要絕我們陳家的後啊！」在心情沉悶中開了兩天會，和小凱住在一起，又結識了孫恆志^[293]、田國強^[294]，他們都是難得的人才。

心裏掂記著北京的一攤事，我就向張守一告辭回北京了。發展組專職研究人員太少，需要從應屆畢業生中選拔一些人才。我去找吳象，和他說，想在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中選幾個人到發展組。他立即向鄧力群做了彙報。2月25日，在書記處會議上，說起發展組這些人，他們一致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湧現出一批能深入實際、發現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辦法的青年人，並作出決定：建議各部門要重視使用這樣的人才。從這以後，一大批在改革開放中作出貢獻的青年才俊，被提拔到了中央、省、市各部門的領導崗位上。鄧力群又通過國家計委主任宋平給了發展組20個大學生名額。

3月12日，鄧力群向我們傳達了書記處會議精神，說發展組的工作受到了中央領導好評。今後發展組由書記處研究室和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指導，由我擔任發展組組長，耕今、楊勳當顧問，吳象代表研究室和我們聯繫。我說：「我與耕今、楊勳合作得很好，人員不變動了吧！」力群說：「耕今提了幾次，他一直只是掛名，你擔任組長是順理成章的事。」我隨即去找耕今，他笑著說：「我早就是這個意思。開始幫你一下是應該的，你就好好幹吧。」楊勳也誠懇地說：「你領頭幹，耕今和我當顧問。」

[293] 孫恆志（1947-），江蘇連水人。時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後任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294] 田國強（1956-），湖北公安人。後任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我們先從《未定稿》調來了王小強，從人大經濟系調來了白若冰。後來，從應屆畢業生中先後調來了楊冠三、謝揚、鄧英淘、羅小朋、陳錫文、杜鷹、白南生、白南風、周其仁、高小蒙10個人。在發展組創建中，江北辰做了很多工作，畢業時分配到遼寧渾河林場；高山北師大畢業後分到黨委宣傳部當部長；宋國青則分到陝西地質隊工作；他們都有很好的研究能力。我們給萬里寫了信，他通過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將他們3人也調給了我們。這樣，發展組一共有了18個專職研究人員。

我先後分頭和幾個骨幹商議，擬建立一個領導小組。英淘說：「老陳，你是單位元，無人可以替代。我這個人可以出戰略，出設想，但不會協調人。」說到其仁口才、文才都不錯，但維凌、小強、英淘都不同意，認為他「名利思想太重、個人算計太多」，維凌甚至說他像個「六耳獼猴，總想盜名竊譽，另搞一套」。大多數人認為，我和小強、維凌、英淘、木生5個人可以調配各方，一起共事。

人調來了，新的問題也來了。農經所沒地方給我們辦公，也沒地方讓我們住宿。我們只能自己想辦法，先在西直門內租了中聯部招待所的二層，既辦公，又住宿。我和大家商定：平日不坐班，各課題組自行安排，交流研究進展，每週二、五上午開例會一起碰頭。北京沒有家的幾個人，只能吃住在招待所，他們每天都是用煤油爐煮方便麵吃。小朋歎著氣和我說：「老陳啊，大家都抱著忘我精神跟你幹，可起碼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總該有吧？」我說：「你說的對，長此下去是不行的。」

我在一次例會上說：「我們的條件太差了，大家的生活很清苦，一定要想辦法解決住房問題。我回北京三年多了也沒房子，可看到城裏人滿意地挑選農副產品，農村人吃飽肚子喜氣洋洋，就會得到許多安慰。什麼叫獻身精神？不求功名利祿，但求心之所安！」南生和我說：「老陳，幾個小伙子住在一起，誰都沒有私人空間，時間長了會生出各種問題。」我點頭稱是，也就搬來和大家一起住，同甘共苦。

吳象告訴我：「新成立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杜潤生任主任，我兼一個副主任，由農口各部部长任理事，萬里提名讓你和楊勳也任理事。」我說：「我對名位不感興趣，只求農民吃飽穿暖、自由自在。」吳象說：「我們的心是相通的！但有個名義辦事方便嘛。」正好，我去找杜潤生，請他幫助解決住房問題。他無奈地攤開兩隻手，搖搖頭說：「這個問題我可沒辦法解決，誰讓你們是後娘養的兒子呢！」

我又去找王貴宸，他剛升任農經所副所長，主持所裏日常工作。他也沒辦法，說：「這個問題我可解決不了。所裏先來的人還沒房子，你們自

己想想辦法吧。」辦法還真想了一個，若冰通過他任北京市副市長的父親白介夫^{【295】}，在西直門外批了一塊地，可以蓋一個9層的宿舍樓。總算有些盼頭了，大家情緒也好多了。可是，一等就是幾年，1985年我離開農經所，大家還都沒有分到住房。

經朋友介紹，一個軍隊大院的女孩林宏來找我，她也轟轟烈烈地插過隊，但在現實中碰的鼻青臉腫。聽她介紹，許多充滿理想的青年人也有類似的經歷。她又介紹李敏^{【296】}的丈夫孔令華^{【297】}來找我，孔令華是武漢軍區副司令孔從洲^{【298】}之子，原在北京軍區當政治部副主任，毛澤東病逝後轉業當了哲學教員，日子過的很不舒心。他約我到景山後街他家去過幾次，看他家裏生活過得還挺清苦。說起來，我在北大時，還看過張少華（後稱韶華）^{【299】}，他們很少聯繫；李訥^{【300】}在北大當游泳隊副隊長時，還給我彙報過工作，他們姐妹倒常來往。

一年多裏，我們經常交流，他感激地說：「你是我中國問題的啟蒙老師。」一天，孔令華急匆匆來找我說：「李訥到秦城^{【301】}去看江青，她媽媽交給她一封信，讓她送給黨中央，控告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李訥來找我們問怎麼辦好，我們也很為難，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給出主意。」我說：「於情於理，李訥送信沒有問題，你們以不摻和為當。否則，會被認為你們都同意江青的意見。」他連說：「有理，有理！謝謝，謝謝！」趕忙回家了。望著他遠去的背影，令人不由生出「滄海桑田」的感慨。

我們聽說，中央要下文撤銷人民公社，既很高興，又很耽心。特別是怕地方一哄而起，造成已有的固定資產遭到破壞。夜裏10點，我們去杜潤生家敲門，他說：「你們的耽心有道理。不過，書記處已經開會決定了。」我說：「我們連夜寫一個意見，明天一早請您給轉一下。」我和小強、英洵、維凌一邊討論一邊寫，在謝揚家幹了一夜。3月18日，寫了個《對農村人

【295】白介夫（1921-），陝西綏德人。時任北京市副市長。

【296】李敏（1936-），湖南湘潭人。毛澤東與賀子珍之女，在國防科工委工作。

【297】孔令華（1935-1999），山西西安人。1959年與李敏結婚，曾任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298】孔從洲（1906-1991），陝西西安人。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副司令。

【299】張少華，為毛澤東兒媳，後改名韶華。曾就學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後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

【300】李訥（1940-），湖南湘潭人。毛澤東與江青之女，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文革中曾以「肖力」之名在《解放軍報》奪權，後又任過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

【301】秦城為中國關押政治犯的著名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境內。

民公社體制改革的幾點看法》^{【302】}，第二天一早交給了杜潤生。他立即上送書記處，後來形成了中央（1982）21號文件，對決策起了很好的作用。

木生可能較長時間在農村生活，自由散漫慣了，講話不注意分寸，組裏人都叫他「大嘴巴」。他帶一批人民大學的學生去廣西梧州調查前，我和他說：「你思想解放，人又仗義能幹。但你要注意，搞調查一定要求實。你喜歡的東西，10分說成12分可以，說成20分就不行了。不喜歡的東西，10分說成8分，別人還可以接受，說成三、四分就不可信了。」他紅著臉接受了，後來調查搞得不錯。

朋友介紹了一個老革命來找我，他說：「我叫李樹香，是359旅的老戰士。當年，毛主席寫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的那個張思德在我們旅，叫『氣死牛』，我被大家叫『氣死驢』。我現在退休了，聽說你組織一批年青人為農民謀利益，生活得很清苦。我認識很多人，不要你們一分錢，自願給你們幫忙，可以搞些後勤。歡迎嗎？」我說：「好啊，歡迎，歡迎！」後來，他還真給我們幫了不少忙。小朋說他「人老心不老，是個浪漫主義者」。

我們在討論《中華振興百年設想》時，又組建了由何維凌負責白南風、黃曉京等人參加的「東西方文明」研究小組；由楊冠三負責梁曉東、王子平等人參加的「鄉村三十年」研究小組；由高王凌負責李零、劉昶等人參加的「中國歷代土地、財賦、官制」研究小組；由毛揮負責的「社會公平與社會保障」研究小組，等。但發展組成立以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總體研究構想」，經過不斷探討終於形成了。

可能緊張的工作節奏，讓新到發展組的一些研究人員很不適應。周其仁給我起了一個外號「絞肉機」，還說：「老陳，你真是個『絞肉機』，是不是要把我們的肉都絞乾啊！一天都不讓人休息。」我只能苦笑地說：「等我們的『總體研究構想』論證作完，一定讓大家好好休息一段。」我知道，其實自己已經早就體能超支了，但不趁局勢允許抓緊推進改革，機會也許就會稍縱即逝了。年輕人哪裏能體會我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苦心。

關於「總體研究構想」，在我提出「分區開發」的設想後，英洵又提出了「立體開發」的設想，我和英洵、小強、維凌等人反覆討論以後，終於有了大的進展。寫出了《以農村為突破口，實行分區立體開發的改革戰略》^{【303】}一文，試圖提出一種分解國民經濟大系統、建立有時空結構的改革突破戰略，這個構想為我們今後的研究提出了總體架構。

【302】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2年卷，第264-267頁。

【303】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2年卷，第255-263頁。

4-26 《以農村為突破口，實行分區立體開發的改革戰略》

1982年8月，我們又集中人馬，在香山紅旗村開關門會議，夜以繼日地推敲了幾天。這個「改革戰略」全文分6個部分：(1) 改革實踐的啟示，三年改革的實踐告訴我們：改革必須區別不同的經濟活動、區別不同地區的情況、由點到面逐步推開；(2) 突破戰略，實行穩定全局而優先改革農村的突破戰略；(3) 開發戰略，實行農業生產結構、經濟關係、管理體制立體化的開發戰略；(4) 拓廣戰略，農村立體開發將推動國民經濟改革向縱深滲透；(5) 分區戰略，分區開發、重點突破，交替「掩護」、逐步過渡；(6) 戰略思想，「搞活農村，促進城市，全面調整，重點突破，先易後難，由點及面」。

會議商定兵分兩路：一路北上遼寧到山西，由我負責與小強、木生、杜鷹作「宏觀概略調查」，一路南下江西吉安，由英洵、小朋、高山負責，和錫文、方明、其仁、南生、南風、小蒙、曉京等人作「區域開發調查」，以論證總體構想的可行性。出發前，小強和我說：「你那個《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的報告，很有說服力，也很有遠見，為什麼不發表？」我說：「其實，我三部分都寫出來了，只是沒時間串在一起。」就商定由楊冠三給串一下，但當時的說法、觀點和事實都要保持原汁原味。

今年以來，我確實一天都沒有休息，每天睡眠時間只有三、四個小時，為了促成改革不可逆轉，我不知疲倦的拚命工作。10月7日，我們這個組先到了瀋陽，市副秘書長李長春^[304]向我們介紹了實行生產責任制前後的變化，講得有條有理、十分清晰，我請他寫個材料給我們。第二天一早，他就在門外等候，我又給他改了幾處，他拿回去又抄了一遍，畢恭畢敬地送來了。看來這個人很會作官，談情況時，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你剛想抽煙，打火機就遞上來了。不過，他的這個報告趙紫陽很快就批示了。

在鞍山，市長張建中^[305]說：「城市工業存在的問題和農業一樣，一是大鍋飯問題，二是自主權問題。我想，隔行不隔理，就把企業分成了四類：虧損的，保本的，微利的，贏利的。虧損的一承包，很快就超過保本的；保本的就也要求承包，很快也扭轉了局面；微利的、贏利的一看，也要求承包。就這樣，全市的工業企業實行承包，就都贏利了。」我們說：「你這個經驗挺好。但企業會不會為了追求短期效益，過度使用固定資產？」

[304] 李長春 (1944-)，遼寧大連人。時任瀋陽市副秘書長，後任瀋陽市市長、遼寧省省長、河南省省長、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廣東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305] 張建中，時任鞍山市市長，不久因勞積病故。

他說：「你們問對了，我們正研究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把他的看法上報了，趙紫陽很快作了長篇批示給予了肯定。

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李華忠^{【306】}向我們介紹了公司的情況。他說：「今年初，廠長有了生產經營活動的統一指揮權，再加上擴權讓利、企業留成，公司整體狀況開始好轉。可我們對工人的欠賬太多了，不說20多年沒怎麼調工資，工人居住的條件實在太差了。」我們看了工人住的宿舍樓，真是擁擠破舊不堪。李華忠說：「我們的工人一家幾代人，往往就在這樣的環境裏生活一輩子呵！我決心用企業留成先解決工人的住房問題。」從他說的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很有魄力的人。1988年，再見到他時，他高興地說：「工人住房問題解決了。」

10月14日，我們馬不停蹄地到了山西。山西省委書記王庭棟^{【307】}、副省長霍泛^{【308】}熱情地給我們介紹了山西農村改革以來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學大寨」的許多過左的做法一但改變，農民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第一年全省大增產，第二年就出現了新局面。勞動力和資金的流動，產生了各種協作、聯合組織；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對工業提供的生產、生活資料有了新的要求；農副產品的增多，迫使商業流通系統必須改革；新型經濟組織的大量出現，更給銀行財稅、公交科技、人事勞動等部門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真是形勢喜人，形勢逼人！和我們構想的「拓廣戰略」完全一致，我們心裏也特別高興。北大一個哲學系同學張維慶^{【309】}當了山西省副省長，主管文教。聽說莊則棟被貶到了山西，我請他適當關照一下，他倒是滿口答應。我又抽空拜會了北大老友牛輝林^{【310】}，他在太原市委當宣傳部副部長，是個真性情的正派人，只是聶元梓的追隨者總給他找麻煩。接著，省委農工部政研室的呂日周^{【311】}陪我們往晉北考察，從他的介紹聽出這是一個有頭腦、能幹事的人。一路上，看老鄉的勁頭和神態，與我1971年來的時候已是大不一樣了。

【306】李華忠，時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

【307】王庭棟（1923-2010），山西平定人。時任山西省委書記，後任山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308】霍泛（1915-2009），山西黎城人。時任山西省副省長，後任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309】張維慶（1944-），陝西臨潼人。時任山西省副省長，後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

【310】牛輝林（1946-），山西長治人。1964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文革中曾擔任「井岡山兵團」頭頭，帶頭反對極左派聶元梓；時任中共太原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311】呂日周（1945-），山西大同人。時任山西省農工部幹事，後任中共原平縣委書記、省體改委主任。

我們到應縣專程拜訪臧倉，他從 1949 年起就帶領村裏人，戰天斗地改變落後面貌，曾連續十二年被評為省勞動模範，大家稱他是「雁門關外一桿旗」，可聽說他帶頭在村裏搞起了包產到戶。我們找到他時，他正在地裏幹活。他黝黑的臉膛，健壯的身軀，樸實的談吐，一接觸就知道是個典型的憨厚農民。他說：「一人忙不如大家忙，一人急不如大家急。一搞包產到戶，家家戶戶都是糧滿囤。中秋節老百姓貼對聯，說：『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全靠鄧小平』。農村富裕了，國家才有希望啊！」

10 月 20 日，回到北京，我們立即先後向鄧力群、杜潤生作了彙報。過了兩天，鄧力群告訴我們說：「書記處、政治局的同志和小平同志，聽了你們調查的情況都非常高興。希望你們繼續深入實際，不斷為中央提供第一手的資訊。」杜潤生則說：「合肥正召開全國農業經濟學年會，聽說大家對包產到戶爭論還很激烈。你們敢不敢去放一炮！」這有何不敢？10 月 23 日，我和小強、木生趕到合肥已是深夜。我們連夜聽了會議討論的各種意見，根據調查的事實和向鄧力群、杜潤生彙報的內容，列了一個提綱。商定由我主講，他們二人輔講，這時天已快亮了。

10 月 24 日上午，我們以《農村發展·經濟改革·學術研究》^[312]為題，做了 3 小時介紹。可能因為過於勞累，我們三竿煙槍不停地抽，引起了部分與會者的不滿。散會時，不少人圍過來說：「你們的報告太好了！是從實際中來的，中央能聽取你們的意見就好了！」但也有人強烈反對。國家計委研究所的雷錫祿^[313]，手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們這些人，欺騙了 8 億農民，又欺騙黨中央！包產到戶是搞資本主義，不會有好下場！」我說：「8 億農民就那麼好欺騙？你最好到農村去看一看。」他轉身走了。也有人說：「你們三個年輕人，譜也太大了！一根接一根抽煙，中央首長也沒這樣。」我們直吐胸臆，哪裏會想到官場的規矩？新華社記者姬斌把會議的反映寫了個「內參」，後來竟引起了一場波瀾。

我和小強回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鄧力群和萬里先後的兩個報告都獲得好評。我讓木生先去江西看看，瞭解一下吉安調查的進展，不知木生這個「大嘴巴」在北京聽到了什麼，竟說我得了「精神病」，引起了大家的思想混亂。消息傳到北京，小強立即趕到江西，說：「沒那麼回事！」是呵，報告提綱是三個人一起列的，報告本身誰也沒有人提出甚麼異議，頂多是我們的發言過長、抽煙過多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

[312] 見孫方明著《潮聚潮散附錄》，第 51—112 頁。

[313] 雷錫祿 (1928-)，四川榮昌人。時在國家計委研究所作研究。

4-27 「你得了疲勞綜合症，是中晚期」

從來守舊的人總會給衝破舊羅網的人挑刺，這毫不奇怪。我決定立即去吉安看看，幸好當天飛往南昌的小飛機沒票了，否則我可能真就沒命了。我買了到上海的機票，計劃從那兒轉機。可是一下飛機就口吐白沫暈倒了，救護車把我送進了上海華東醫院。經過3天的搶救，主任醫師說：「你得了疲勞綜合症，是中晚期。也就是說，你所有的內臟器官都發生了病變，但還都是功能性的，如果有一個器官發生器質性病變，人也就不行了。」

我急忙問：「為什麼會這樣？」醫師說：「你身體有內傷，又長期睡眠、休息不足。現在，必須全休。再勞累，你活不過半年。」我嚇了一跳，將信將疑。不過，發展組1980年9月成立以來，我每天的睡眠時間從5小時減到4小時、3小時。最近半年，一天睡不到兩小時，人好像「飛車」了。看來，冥冥之中似乎有神靈護佑，鬼使神差把我送到了上海的醫院。否則，豈不沒命了。我問：「要休息多長時間？」醫師說：「一年到兩年。」

華東醫院又把我送到瑞金醫院，用剛進口的德國設備檢查胃。發現我的胃既有嚴重的胃潰瘍、已快穿孔，又有嚴重的胃粘膜炎脫垂，就通知上海各個醫學院的研究生來看。翻過來倒過去，老師一邊講解一邊錄像，整整折騰了一上午。確實，近一年來，我既睡不著覺，又吃不下東西。小強從福建省農委主任溫秀山^[314]那兒，弄來了幾斤名茶「黃金貴」，我每天早、午、晚各沏一杯，濃濃的喝下去，還是食慾不佳，沒想到弄了個胃粘膜炎脫垂。

華東醫院每天給我檢查身體的各種指標，我也每天記下來對照看有什麼變化。半個月以後，我按日期把各種指標用線連起來，發現只要睡眠、飲食比較好，其他指標也會變的比較好。醫院又用日本的180個指標給我測量，說我的身體狀況像六、七十歲的老人，但思維還像二、三十歲的人那麼活躍。我聽了很高興，覺得自己還能活下去。沈伯母和達非妹妹每天下班，都會給我送來一提盒食物，一格銀耳、一格素菜、一格葷菜，她們母女的深情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感謝才好。我感覺，自己的身體似乎在好轉。

達非說，她讀上海中醫學院時，曾拜著名中醫何時希為師，可以請何醫生幫我診脈。何醫生診脈後直搖頭，說：「你的尺脈已經摸不著了，外勞內傷，腎腦兩虧。若不立即休息，活不過一年。」我問：「怎麼休息？」

[314] 溫秀山（1922-1999），河北武安人。時任福建省農業委員會主任。

何醫生說：「你有積傷，加上過度勞累，過度思慮。靜養一年到兩年，也許能調整過來。否則，神仙也難救你。」何醫生不僅醫道高明，而且寫得一手飄逸的書法。

聊起來，何醫生原來是名門之後，不由令人敬重。其祖周三畏，南宋高宗時任大理寺卿，因不忍審岳飛遂掛冠而逃，至揚州隱姓為何，後歷代從醫為業。經宋元明清八百年，何家出了 28 位御醫。至何時希這一代，仍受其祖傳，15 歲起即隨父坐診。誰料 1949 年，因其常為票友，而那時又「娼優不分」，就給他定了個「壞分子」。直到改革開放，才摘掉帽子，准其行醫。我請他為我診治，他說：「上海不行，每天人來人往太多。可以到蘇州、無錫一帶，靜心治病。」

11 月 12 日，高山和孫方明來看我。我感謝大家的關心，但勸不要再來了，大夫說我「脈浮無根，陰虛陽亢，外勞內傷，腎腦兩虧」，病得很重，需要靜養。同時，我講了《關於發展組今後工作的幾點意見》^[315]。我說，我們搞「分區立體開發戰略構想」，兵分兩路：一路搞宏觀論證，一路搞區域論證，兩部分要互為補充。要根據對不同區域現狀、問題和趨勢的分析，找出共同點和不同點；共同點就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普遍性，不同點就是制定區域發展政策的出發點。

華東醫院根據上海市委的安排，把我送進了東湖賓館。維凌、英淘從北京來看我，兩人看我病成這樣都很動情。維凌說：「湘魯說，書記處很關心你的病，請上海市委全力搶救。還說你是『活著的羅建夫^[316]』，真要走了就全黨紀念。」不久，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317]、第二書記胡立教^[318]，先後都來看我。維凌又托他的中學同學劉貽典在我養病期間多幫忙，劉貽典的父親劉鑄就是華東醫院的副院長。何醫生還給英淘教了治鼻竇炎的方法。

小強帶著丫丫來看我。小強說：「有人說你得了『精神病』，我就不信。明明是疲勞過度，『飛車』了！你好好養病，外邊什麼事都不要管。」小強還說：11 月 6 日、8 日，趙紫陽、萬里先後在中南海，聽取了我們調查組的彙報。趙紫陽說：「你們的調查是動態的、發展的，從農村改革看到對

[315] 見孫方明著《潮聚潮散附錄》，第 113—120 頁。

[316] 羅建夫 (1935-1982)，湖南湘鄉人。是一位無私奉獻帶病工作而英年早逝的知識分子。

[317] 陳國棟 (1911-2005)，江西南昌人。曾任全國合作供銷總社主任，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318] 胡立教 (1914-2006)，江西吉安人。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

城市改革的推動，很有啟發，國務院沒有人這樣提出過問題。我們過去的計劃、設想，為什麼往往不成功？因為沒有和實際結合，是主觀的、一廂情願的。」萬里說：「我這次講話^{【319】}，引了你們調查的許多內容。你們敏感，肯想問題，想什麼說什麼，能反映真實情況。我講話強調『包』，就是想促進一下全國的改革。」

遺憾的是，吳琰沒有來。小強說：「她說工作忙離不開。」我沒說什麼，但心裏很不是滋味，我已面臨生死，她不來說明我們緣份已經盡了。但看著丫丫可愛的樣子，心裏寬慰了不少。我說：「給爸跳個舞吧？」她問：「跳什麼哪？」我說：「跳你最喜歡的！」她就一連跳了三個。丫留在賓館陪我。一次，朋友來時午餐加菜，她一連吃了五、六口豌豆炒蝦仁。我把她關到洗手間裏，我說：「你今天犯錯誤了。什麼錯誤，自己想。想好了，就敲門。」我午睡了。她很強，不肯認錯。過了兩個小時，她敲門了。我打開門，她低著頭說：「爸，我錯了，我喜歡吃的東西，別人也可能喜歡。你給我說過好吃的東西不能連吃三口以上。」我說：「好孩子，記住，幹什麼事都要先想著別人！」她點頭說：「我記住了。」

我那時病得饒是不輕，每天躺在床上靜養。一天，我聽貝多芬的幾個奏鳴曲，《悲愴》從心靈的哀傷到對理想的渴望，讓我深深體味到了經歷痛苦才有歡樂的意境；《月光》則不然，聽著聽著突然感到心臟不適，《月光》下的大海撥動了心弦，幾乎讓人窒息的差點閉過氣去；還好的是《熱情》在激烈的矛盾中，給了人頑強奮進的精神。這種與人生命運相契合的天籟實在是調節心神的良藥。

就在我重病之際，杜潤生很是奇怪。明明是他讓我們到合肥「放炮」，他也聽了我們在合肥講話的錄音，並沒有發現什麼問題，但卻聽了一些庸人的非議，說我得了「精神病」，還把發展組的骨幹召集起來，商量要不要把我送精神病院。小強說：「老陳就是累壞了，飛車了！」小朋說：「真把老陳送到精神病院，老陳說不定真就成了精神病人。」此議才作罷。杜潤生這個人真是沒有擔待和肩膀。

不僅如此，我後來發現，杜潤生這個人很滑頭，而且老謀深算。1979年到1980年，因為華國鋒、李先念、王任重反對包產到戶，他也隨之反對；後來又和張勁夫上下配合，反對包產到戶；支持翁永曦「緩改革」給陳雲的上書。1981年，萬里激烈批評農口領導人，他態度曖昧。我們去滁縣前，他又給劃框框；受陳雲賞識的翁永曦不行了，他就把姚依林的女婿

【319】指萬里1982年11月5日在全國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和農業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王岐山調到身邊。他一邊順應時勢，在萬里領導下制定1號文件，一邊又給自己留後路。正像他後來自露的玄機：「陳雲發話後，我心裏就踏實了。」

農研室和農研中心成立後，他把那些一直反對包產到戶的人，像謝華、劉堪、鄭重等^[320]，都留在身邊。萬里支持張廣友創辦《農民日報》，他就派了一個思想保守的李千峰^[321]當社長去摯肘。我不過1980年農委開會時，當眾說了「農民說『五統一』是『脫了褲子放屁』」，讓他感到難堪，他就一直耿耿於懷，總想伺機找我的麻煩，或者把我弄出發展組，或者把發展組的人弄走，讓我們散夥。

鄧力群就和杜潤生大相逕庭了。他不僅真誠地關心我的病，而且真誠地幫助發展組。1983年1月10日，他在中南海小禮堂會見發展組的骨幹，說：「陳一諮是一個好同志，一定要保護他。他的身體現在搞得這麼壞，是因為工作太緊張。」又說：「這個組不要散夥，不要散心，工作一定要搞好。」從中可以看到鄧力群的人格魅力，他認為對的東西就會一直堅持，哪怕承擔風險也絕不首鼠兩端。

1982年12月底我回北京，住到了廠橋的中央辦公廳招待所，身體狀況也較前有所好轉。這時，我最關心的是發展組怎麼辦？雖說有小強、維凌兩位副組長，但維凌是個「散仙」，具體的事務都會壓在小強身上，如何才能為他減壓呢？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又和骨幹反覆商議，建一個有力的黨支部是個辦法，陳錫文聰明、溫和、穩健，可以擔任書記；杜鷹內秀、開明、公正，可以擔任組織委員；高山雖有些軟弱，正像他和我說的「那麼多條強龍，我沒能力協調」，但正派、敏銳、能幹，當宣傳委員沒有問題。黨員會議上，大家都贊成。

耕今來招待所三次，說社科院正評職稱，「陳翰笙^[322]看了你寫的《農村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讚不絕口。又看了你的幾篇文章，找我去談，說：這個人的水平很高，一定要評研究員。」我說：「我不評研究員，水平也不會降幾分；我評上研究員，水平也不會長幾分。人怕出名豬怕壯，我真評了研究員，不僅麻煩會很多，而且會影響做事。」耕今後來和我說：「陳翰老為你的評職，和我談了三次。對你的淡薄名利，十分欣賞。」可是，小強、其仁先後找我，說：「老陳，你不為自己考慮，也得為我們考慮吧？」

【320】謝華、劉堪、鄭重，均在國家農委時反對農村改革，後隨杜潤生來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321】李千峰(1920-2005)，山東平陰人。曾任國家農委研究室副主任，後任《農民日報》社長。

【322】陳翰笙(1897-2004)，江蘇無錫人。曾留學美國、德國，1925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並經李大釗介紹參加中共；後創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年過80仍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

你不評，我們怎麼辦？」是啊，他們說的有理。那時，他們連個助研都沒評，我就報個副研吧。兩天後，他們已經把申報的各種表格替我填好了，其仁還寫了一個兩頁紙的充滿溢美之辭的評語。我說：「評價過高，不好。」其仁說：「一點不高，當之無愧！」很快，我評了個副研究員。其仁當年寫的那份評語，一定在我的學術檔案裏還可以查到。

這時，李雪峰^{【323】}住在我隔壁房間。他女兒李丹林是我北大同學，我很奇怪為什麼這個原華北局第一書記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一問才知道，原來文革之初，他擔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時批判過鄧小平。辦他案子的人怕拿不準得罪了鄧小平，問題就拖了下來。我替他給胡耀邦寫了申訴信。很快，胡耀邦就找鄧小平談了，給他安排了個政協常委。有趣的是，李雪峰的女婿會算命，說我手上有「仙人指路」紋，還說我有「天眼」。

4-28 名利於我如浮雲，蘇州休養議大局

朋友們絡繹不絕地來看我。若冰悄悄和我說：「本來，上邊準備讓你當農研中心副主任，合肥一炮給放砸了！」我笑笑說：「無所謂，名利於我如浮雲！」萬里讓秘書來看我，說：「萬里聽說，你文革被打得很慘，讓你開個名單。」我想：呂乃巖已經作了檢查。黃介山、任喜貴雖人品不好，但當時年輕人大多激進，得饒人處且饒人吧！我說：「我是讓打得死去活來，可整人的人也多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名單我就不開了。」過了幾天，他來說：「萬里讓我轉告，他說：你心胸比我們許多老同志都寬大。讓你一定好好養病。」

瓦崗、胡廟的幾個農村幹部，不知怎麼知道我得了重病，帶著慰問品來了。林莊支部書記林大友說：「大家聽說您累病了，都很著急，向您問候。」看著他們帶來的100多個甲魚、100多條牛鞭、40斤香油和一尺半長的木靈芝，我心中只有感恩。我並沒為他們做多少事，他們卻這麼誠摯的關心我。我說：「大家的心意我領了。東西我收下，可我得回禮。」我除了請他們遊覽外，到北京四季青買了價值相當的蔬菜種子送給他們。

1月18日，我在發展組骨幹會議上作了個報告：《發展組的形勢和今後的任務》，實際是想我萬一有個不測，發展組不致出大的問題。我講了三個問題：首先，我們組的形勢，無論政治學術、思想作風、組織團結，都在進步；第二，我們組的任務，從研究目的、方向、角度、任務、方

【323】李雪峰（1907-2003），山西永濟人。文革初期，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2見孫方明著《潮聚潮散附錄》，第121-140頁。

法、步驟，講到5年完成「分區立體開發戰略」，再用3年完成「中華振興百年設想」；第三，今年的工作。講完後，我覺得可以放心去養病了。

英洵、杜鷹來看我，都眼淚汪汪的很動感情。我說：「放心吧，我死不了。」我又請他們多給小強、錫文出主意。還特別告誡英洵，要學會團結各種不同意見的人，他說：「你就別操心了，好好養病去吧。」去蘇州養病前，我去看望鄧力群，我說：「鄧叔叔，多虧您的支持，要不發展組差點垮了。」他笑著說：「垮不了！農民需要你們，要為8億農民保重自己。你首先要好好養病，身體不行了還怎麼幹事。」

1983年2月，我到了蘇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黃炳福^[324]，把我安排到東吳飯店的一個套間，又給何時希夫婦一個套間。這個飯店不對外，是市委的招待所，院裏還有假山、魚池，安靜而清雅，倒是一個養病的好地方。我開始了養病生活：早晨6點起床，梳洗、活動，7時早餐，8時診病，9-11時看書、服藥、活動，12時午餐，下午1-3時午睡，3-6時見客、服藥、活動，6時晚餐，7-9時自由活動，10時熄燈。

客人慢慢多了起來，省委研究室主任朱通華^[325]、省委宣傳部長孫家正^[326]先後來看望了我。黃炳福每週來一次，幫我解決各種問題，令人十分感動。維凌來電說，他要帶小凱和吳笙來看我。一見面，大家很高興，深入地懇談讓人難忘。

每天上午，我們討論「局勢和前景」。維凌說：「我和姿先生常交流。小凱，你先談談。」小凱說：「維凌給我介紹了你們搞的《中華振興百年設想》，中國需要這樣的東西，我很贊成。但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我更喜歡《農村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以農村為突破口 實行分區立體開發的改革戰略》這樣的東西，既從實際中來，又有前瞻性。特別是你們這個『改革戰略』真能實現的話，應該給你們發一個最高的諾貝爾獎！」小凱還說：「誰也沒有想到，一搞包產到戶，一下子讓中國活起來了。發展組真是功不可沒！你們知道嗎？你們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先河，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靠一個民間組織，這麼有效的影響了決策！可是下一步該怎麼辦？」維凌說：「小凱啊，1978年底姿先生就和我說，農村要是搞起了包產到戶，就會帶動整個中國的改革。我當時還半信半疑，果不出其然，4年就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

[324] 黃炳福 (1945-)，江蘇武進人。時任中共蘇州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後任中共蘇州市委副書記。

[325] 朱通華 (1933-)，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研究室主任，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副秘書長。

[326] 孫家正 (1944-)，江蘇泗陽人。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後任廣電部部長、文化部部長。

我說：「且莫高興得太早，包產到戶只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農民有了積極性，但土地不是他們的，承包地又不斷變動，就出現了農民『一年蓋新房，二年娶新娘，三年吃喝玩樂走四方』的局面，他們沒有長遠經營的打算呵。要使農民有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動力，就要解決農民對土地有長遠經營的思想。」小凱說：「對！孟子說『無恆產者無恆心』，一定要『耕者有其田』。」我說：「這一步走起來恐怕比第一步還難。我就是為了形成不可逆轉的改革局面才累病了，看來太著急了不成。」

維凌說：「是啊，『包產到戶』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土地歸農民可就得改變共產黨『消滅私有制』的根本觀念了。」小凱說：「不要提『土地私有』，可以搞『兩田制』（公田、私田），『永佃制』這一類東西。」我說：「恐怕這個問題現在沒人敢碰。但按我的估算，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會有兩到三億，如果有一億人流動起來，城鄉隔離制度就會打破。加上農村改革的發展，勢必推動商業供銷、銀行財稅、工業交通、科技文化、人事勞動以至黨政領導部門的改革，事情就好辦多了。」

小凱說：「下層的推動是基礎，但上層既得利益者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沒有上層的強力引領，前景可不容樂觀。」維凌說：「我可以多做做樸方的工作。」我說：「我們三個倖存者，能在這裏聚會，也算上天護佑了。我覺得我的身體、知識、能力，已經適應不了今後改革的需要了。你們多加把勁、多想辦法吧！」他們說：「天生我才必有用嘛！該作的事還很多，你一定要養好身體，為國珍攝！」

他們走前，小凱說：「我和維凌議了一下，給你三條建議：你過去讀了許多書，又作了許多調查，才使你能有所作為。今後，第一，你要想辦法，一方面派人出國，開闊眼界，考察取經，一方面培養、發現系統學習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的人才；第二，孫中山當年革命成功，得到國際社會和海外華人的廣泛支持，我們願在這方面和你配合；第三，能否轉告趙紫陽，會見那些楊振寧^[327]式的花瓶人物禮儀上必要，但若會見像台灣經濟起飛五院士，如蔣碩傑^[328]、費景漢^[329]、鄒至莊^[330]這些人，可能對改革更有實效。」

[327] 楊振寧（1922-），安徽合肥人。因1957年與李政道提出「宇稱不守恆」而獲諾貝爾獎，但學界人士多不齒其為人，認為其人系一投機者。

[328] 蔣碩傑（1918-1993），湖北應城人。中央研究院院士，首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為促成台灣經濟起飛五院士之首。

[329] 費景漢（1923-1996），北京人。中央研究院院士，長期擔任耶魯大學教授，後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為促成台灣經濟起飛五院士之一。

[330] 鄒至莊（1929-），廣東中山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為促成台灣經濟起飛五院士之一。

10天後，我們依依惜別了。在黃炳福的關照下，我們品嚐了各種蘇州美食，又遊覽了當地名勝。丫丫的即興表演，更給我們平添了無限的樂趣。有意思的是，兩人走時，都送了我一本自己寫的《經濟控制論》。

維凌的朋友沈家模來看我，他家住蘇州，說有什麼事可以常來幫忙。正巧，沈家模來時，孫家正也在，他們二人還是南京大學同學。沈家模聰明、熱情、能幹，他請我到家裏吃飯，他母親虔誠地信佛，人很慈愛善良，一桌素菜作的十分好吃。家模六歲的小女沈越，長的漂亮、聰明、活潑，我認她當了乾女兒。多年以後，家模的老母還托兒子把黃楊木雕的觀音、濟公和關公，帶到美國讓我供奉。

4-29 母親的教誨：「人一定要慈悲為懷！」

在養病期間，我每天上午編輯發展組的文集《農村·經濟·社會》，下午聽何醫生講他的故事和中醫之道。老朋友劉一家^[331]來看我。他是蘇菜特級廚師，在蘇州松鶴樓主廚，為人誠樸厚道，本色不改。我1974年到蘇州時拜訪他，拿出20元說要請客，他給做了4個菜。菜上齊了，不見客人來。我說：「劉師傅，我慕名而來，今天請的客人就是你！」一下聊得很投緣。這次見面，更是格外高興。他又做了4個菜，我請何醫生夫婦與黃炳福一起吃，大家對劉師傅的廚藝都是誇讚不已。以後，差不多每周劉師傅都會抽空給我們做一次菜。

1966年見過的西園寺雪相法師來看我，他已當了市政協委員，一身官場俗氣，與九華山仁德大師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他文革也曾受苦，紅衛兵鬥他時，他苦苦求告，不要褻瀆菩薩，還很真誠。我和他談時，他說自己現在相信唯物論了，只是人有沒有靈魂，有沒有天堂、地獄還沒弄清楚。他被迫還俗以後，又被逼結婚，落實政策才回歸佛門。眼前看他言談舉止，對人世利祿頗為嚮往，還有些洋洋得意的官僚派頭，可見佛心不堅是難成正果的。

小凱回武漢後給我寄來一封信，是建議中央領導人會見著名經濟學家的，我請李湘魯轉給了趙紫陽。每周來看我的朋友多了起來。達非和她的朋友陶驊一起來看我，私下說：「老陳，你太善良了。好多人對樸方、陳元都是長遠投資，對你可是一次性使用。為國家、為朋友都是對的，但人性是很自私的，你也要學會保護自己呵！」我說：「謝謝你們的關心和好

[331] 劉一家，蘇州松鶴樓廚師，國家蘇菜特級廚師。

意。我何賞不清楚人性的自私，但母親的教誨：『人一定要慈悲為懷！』，我不敢忘記。」

我說：「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如果我們只看到人性的惡，那就會失去為人類進步而努力的信心。佛祖普渡眾生，耶穌受苦受難，孔子仁者愛人，都是為了抑惡揚善。人的一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只求能作到心之所安，成敗利鈍置之腦後可也！」她們搖著頭說：「當今之世，還有幾個人像你？病得都快沒命了，還這麼傻！」我說：「中國像我這樣『傻』的人越多越好。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我父親從小就叫我『憨兒！』」。

1983年4月底，在「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江南時節，小妹一詒陪著母親到了蘇州。我躺在母親懷裏，母親慈愛地撫摸著我的頭說：「去年你父親走了，今年你又生了這麼重的病。你父親再三叮囑，說你能為百姓做些事，讓你別為家事操心。你咋就累成了這樣？真讓人心疼。」我說：「媽，我不是好了嗎！」母親說：「好好養！不可大意。賈誼早死，顏回短命，沒有好的身體什麼事也幹不成啊！」我說：「僅遵慈命。」

我陪母親遊覽了拙政園、獅子林和虎丘，而後到上海看望了大哥陳一訥、大嫂鍾子榴，大姐陳一詠、大姐夫張鎬林，沈達力的父母沈灌群、石淑儀和妹妹沈達非。而後到玉佛寺拜會了真禪^{【332】}，龍華寺拜會了明暘^{【333】}。不知何故，明暘見我竟執禮甚恭，雙手合十稱我為「大護法」，並請我們母子在他的齋堂裏吃了一頓精緻的素齋。不過，比起九華山百歲宮全部用野菜、野菇、竹筍、山珍做的素齋，少了幾分世外的清雅，多了幾分鬧市的俗氣。

小妹回西安上班了，我和母親一起度過了一個月輕鬆愉快的日子。我仍是上午讀書、看稿子，下午就和母親聊天、遊玩。何醫生給母親號了脈，母親除了心臟負擔過重有些問題，其他還都正常。一天，我說起6歲時，父母帶弟弟妹妹去南京，把我一個人留在北京，我覺得父母都不要我了時，母親動情地拉著我的雙手說：「兒啊，當時我也是不得已啊。不過，世間的事禍福相依，你的獨立生活、工作能力，也就這麼鍛練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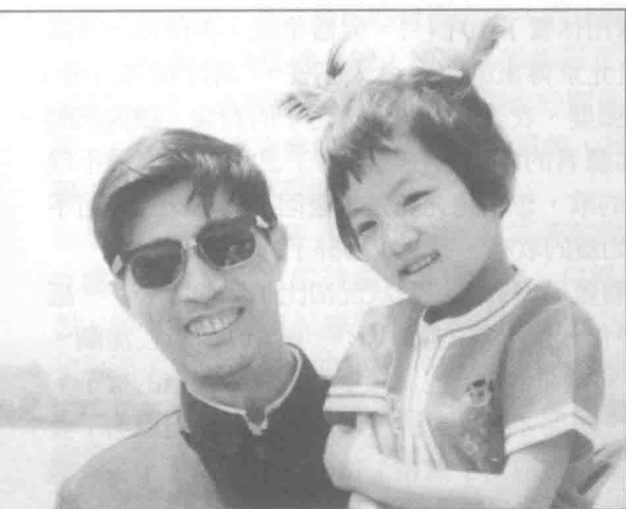
一天晚飯後，母親繞著養魚池走著說：「俗話說『三歲看大，八歲看老』，古人說『雖然大器晚來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孩子小時候的教育很關鍵。可文革一搞，你爸給打得死去活來，保存的資料都成了罪行。我看共產黨喜歡沒文化的人，誰沒文化反而活得自在，我也就再沒心思教育你

【332】真禪（1916-1995），江蘇東台人。時任上海玉佛寺主持，上海佛教協會會長。

【333】明暘（1916-2002），福建閩侯人。時任上海龍華寺主持，後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弟弟妹妹了。你爸晚年老埋怨我燒了他幾十年存的資料，他都不想想，當時不燒，不知道還要多受多少罪呢！現在，你總算趕上了好時候。」我說：「我們不再說這些沉重的話題。好好玩玩，輕鬆輕鬆！」母親拿出父親病逝前最後一張閤家照送我，照片後面用行草寫著：「庭樹不知人逝去，春來還發舊時光」。三妹一謀帶著女兒可可來了，我們又有了一個「小開心果」。我陪他們遊覽了無錫、宜興。接著，吳琰帶著丫丫、繁華帶著兒子小凡也來了。可能因為老觀念，母親不喜歡吳琰。為讓母親開心，我們乘夜船從蘇州到杭州，晚風拂面，塵煩頓消，心裏倒是一片寧靜。

我們住到了西湖邊的濱湖飯店，逛西湖、遊靈隱、喝龍井、吃醋魚，很是愜意。三個小傢伙簡直玩瘋了，捉迷藏、抓小雞、划船登山、唱歌跳舞，就沒見有累的時候。玩幾天，到了上海。我們住到了田鐵軍^{【334】}家，她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她先生黎曉初^{【335】}是上海建材局局長。兩人都是老革命，為人豪爽仗義、熱情好客。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家的5個孩子，都是領養的烈士、戰友遺孤，實在令人起敬。



母親回西安了，我一人回到蘇州，靜下心來繼續養病。過了半個月，黃炳福問我，想不想到下邊走走看看？正合我意。他帶我到縣鎮村和工廠看了不少地方，差不多每週出去兩天，8-11月出去了十幾次，使我收益非淺。至今難忘的幾件事有：

【334】田鐵軍 (1922-2009)。曾任中共上海社會科學院統戰部副部長。

【335】黎曉初 (1915-1998)，北京延慶人。曾任上海建材局黨委書記。

(1) 蘇州的鄉鎮企業發展迅猛。往往在和國營企業「爭資源、爭資金、爭勞動」中，依靠靈活的優勢會取得先機；

(2) 「計劃與市場」的矛盾持續加劇。計劃產品滯銷，計劃外產品市場份額加大；

(3) 政府部門的行為跟不上農村改革出現的新局面；

(4) 城鄉隔離制度造成的問題日益嚴重。如，農村孩子讀高中，因要吃商品糧，分數錄取竟需比城裏孩子多四十分，引起農村人的強烈不滿；

(5) 利用清理「三種人」，普遍出現了一派整一派的局面；

(6) 官員腐敗逐漸成風。鄉鎮企業向主管部門行賄，以便取得有利條件；平民辦事向官員行賄已很普遍；官商勾結「以利換權，以權換利」開始出現……，有一個鄧小平的親戚，受賄竟明碼開價，辦事非送乾隆以上年代的古畫則不可。

此外，有兩個歷史問題值得記下來：一是聽太倉、常熟的官員說，有史以來他們這裏都沒有災荒，自吳越爭霸起就是歷代的糧倉。但「大躍進」以後，不僅有人逃荒要飯，而且還餓死了人。二是文革開始紅衛兵錯整了不少人，後來被整的人難以忍受起來造反，現在那些被整錯的人，又讓當成「三種人」再次挨整，很是冤枉。看來，中國的革命、鬥爭文化真是誤國害民不淺。

4-30 老爺子生氣了，何維凌、翁永曦倒霉了

到1983年底，我已在蘇州休養了10個月。何醫生說，再休養一至兩年，身體才能調整過來。但北京傳來的消息令人不安，「清除精神污染」搞得人心惶惶，青年工人的頭髮、衣著都成了「清污」的對象。聽飯店的服務員說，連大家喜歡的鄧麗君的歌，也在「清污」之列，讓人很不理解。我請他們找了些鄧麗君的歌，想聽聽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一聽，可不得了，她那如泣如訴、如醉如癡的歌喉，竟把我陶醉了。

我又吃了4個月藥，身體雖仍虛弱，總體狀況卻比一年前好多了。感覺農村改革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但上層的意識形態爭論似乎還在加劇。1984年3月，我回到了北京。見到小強，他情緒不好，一臉無奈的樣子，發展組的氣氛也有些不正常。一問才知道：維凌出了問題，被迫退出了發展組；其仁出了問題，剛入黨又被取消了黨籍；翁永曦也出事了，被免職了；英洵、若冰因為爭論學術問題，又彼此鬧得很不愉快。

我趕忙瞭解，維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原來，鄧小平生氣了，說：「何維凌是壞人！」鄧小平為什麼這樣說？起因有二：一是維凌博學多才、廣交朋友，評議時政、口無遮攔。一次，政協秘書長郭則成的妻子張成蓮造訪，二人一時言語不合，維凌竟連推帶打將其轟出門外。誰知這個張成蓮乃鄧小平的廣安同鄉，跑到鄧家哭訴了起來，弄得鄧小平很是不快。二是安全部門截獲了維凌給秋姮的信，信中說：「我和鄧、胡二公子討論政局、軍隊如何如何」，被認為「有野心」。鄧小平故此發了重話。中央組織部下通知，不許維凌再任職發展組。真是奇怪，你們管得著嗎？我們組建時是自由組合的呀。

我去找鄧力群，先向他彙報了養病的情況，而後向他提了三個問題：一，「清除精神污染」很不得人心，經歷過文革，人們對這種運動式的作法普遍反感；二，我瞭解何維凌，他有缺點，持才傲物，目中無人，但不是壞人；三，現在年輕人提拔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翁永曦剛提了又免掉，影響很不好。鄧力群說：「你身體雖有好轉，還不能大意，繼續好好養病。『清除精神污染』是小平同志的意見，有些人也太不像話，清污不過是個溫吞水。何維凌是壞人，不適合繼續在發展組工作。翁永曦不該提拔，你替他說話也沒有用。」我還想替維凌說說好話，英淘給我使眼色。我到英淘房間，他和我說：「老陳，你說沒用，這是小平發的話。」我說：「哪兒能這麼辦事？一句話就把維凌的前途斷送了！」

我給鄧小平、萬里、鄧力群、杜潤生和中組部、北大寫信，說維凌是一個才華橫溢、憂國憂民的難得人才。因小節問題棄而不用，不僅可惜而且無理，要求恢復維凌的工作。但都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湘魯勸我說：「老陳，小平發了話，你得把和他的關係斷掉。你太重友情了，這不行。」我說：「維凌參加發展組是我動員的，我不替他說話怎麼行？朋友有難不仗義執言，還算朋友嗎？」

維凌卻了無介意，坦然處之。他笑著和我說：「姿先生，別白費心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英雄末路，只得棄業從文了。我計劃另闢蹊徑，編10本一套《社會學叢書》。你知道，1949年之後，中國的社會學就被取消了，但社會學的知識、方法，對研究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是非常有價值的。希望你幫助我！」我問：「怎麼幫你？」他說：「幫我弄2,000塊錢。」我想了想說：「一本200塊可不夠，最少得500塊。給你5,000塊吧。」

其仁出了什麼問題呢？原來是上海有人告狀，中央組織部長宋平批示開除他黨籍。我請錫文和杜鷹立即去調查，我說：「其仁是個人才，一定要想辦法保護他。」可是他們調查回來以後，直搖頭歎氣。這件事的發生

也怪其仁，他參加發展組後回上海探親，很得意地說起了農村改革為中央出謀獻策的事。與他中學時同一派的人很不平，說：「文革時的『胡傳奎』、『刁小三』都進了監獄，怎麼『刁德一』倒沒事？！」就向中央告了一狀。

當年，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文革開始，其仁15歲，學校的孩子們響應毛主席號召鬥「黑幫」。一個老師被鬥後，嘴裏塞了毛巾，關在房間裏，天黑以後孩子們都走了。誰知道第二天一早，發現這個老師死了，孩子們都驚慌得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後來上山下鄉，其仁到黑龍江建設兵團勞動。恢復高考，他考上了人民大學。學校發現這件事後，把他退回了兵團。他寫信申辯，學校再次錄取了他。因為他工作出色，發展組吸收他入了黨。由於宋平的堅持，其仁被取消了黨籍。

翁永曦的事更令人感歎：批鄧時，他在北大的發言，被《北京日報》整版轉載。在內蒙插隊後，調到《中國農民報》工作，後又到國家農委。1979年發表過「三個不能變」的談話（見本章第5節），1980年給陳雲提過「緩改革，重調整」的建議（見本章第19節），1983年剛提拔為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被人告到鄧小平那裏，1984年下放到風陽縣當陳庭元^{【336】}的副手，1985年再貶到嘉山縣當副書記，直到開除黨籍。

翁永曦雖然做事不紮實、過於急功近利，但還是懷著滿腔熱情努力工作。他說「三個不能變」是不瞭解農民疾苦的信口開河，提「緩改革」的建議確有投機心理。1980年，我和他大略說了《中華振興百年設想》，當晚他就向記者發表了「振興中華」的談話。他去風陽前，向我討教到基層如何工作？我再三叮囑他，要抓主要問題解決，所謂「救火要緊，顧不上水澆農田」，千萬不可去糾纏歷史問題和一般作風問題。

但他一下去就和陳庭元一批當地幹部，唱起了對台戲，豈能不被排擠？他一到鳳陽，找他解決歷史問題的人，就每天一大早等在他門口，縣裏其他領導人躲在一邊，看這些人和他糾纏不休；吃飯時，他在職工食堂排隊，縣裏其他領導人則照樣在小餐廳大吃大喝，故意給他難堪；到下邊鄉鎮開會，縣裏其他領導人坐小車走了，他騎著自行車在後邊滿頭大汗趕，他沒趕到會場前大家已經吃喝完了，他到以後誰也不說話，弄的他很孤立、很尷尬。他雖得到了清廉的虛名，卻什麼事也幹不成了。

滁縣地委耽心他繼續留在鳳陽出問題，把他調到嘉山當副書記。1984年初，他看山西呂日周在原平縣搞「政府搭台，民眾唱戲」效果不錯，就倣倣著也搞了起來。本來，這是個創新的做法，他又犯了急於出風頭的毛病，又是記者採訪，又是電視播出，事情沒做多少，聲勢搞的很大。一下

【336】陳庭元(1925-)，江蘇建湖人。時任中共鳳陽縣委第一書記兼滁縣地委副書記。

子傳到了鄧小平耳朵裏，本來翁永曦在老爺子那裏就有前科，老爺子生氣了，說：「這個人怎麼又出來鬧了！」結果，他這回被一擻到底了。

當年，老爺子一句話可是生殺予奪，誰讓你何維凌、翁永曦都撞到槍口上了呢！

4-31 「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真理負責」

英洵和若冰兩個人，性格特點大不相同。英洵自信豪爽，和人辯論起來寸步不讓，有時兩個大眼睛一瞪，咄咄逼人，往往給人一種強辭奪理的錯覺，使對方難於接受；這就妨礙了他和別人的交流，其實他是一個很講道理的爽快人。若冰就不同了，為人謙虛得有些缺乏自信，有時柔弱得讓人「怒其不爭」，但他很有頭腦和文才。1983年夏天，在發展組的一次學術討論中，兩人為「價值實現問題」發生了尖銳的爭論。

若冰在文革後期，就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開始質疑，後來又對資本主義的價值實現問題有所研究，看法雖有不成熟之處，卻不乏新穎閃亮的見解。那次討論時，英洵毫不客氣的把若冰的看法褒貶了一通，弄得若冰很不是滋味，隨口而出說了一句「我們可不是鄧家軍！」結果，弄得不歡而散。其實，學術研究中不同觀點的爭論是正常而有益的，但傷害了彼此的情感就適得其反了。

從此以後，組裏慢慢在私下流傳起這樣的說法：一部分人說，「我們是鄧力群的人」；一部分人說，「我們是杜潤生的人」。這可不是個好的傾向，任其漫延會破壞大家的合作。1984年4月我在民委招待所主持召開了一次會議，著重解決團結合作的問題。我說：「在我生病休養期間，大家同心協力，使研究工作能正常開展，很不容易；三個重點課題：合作經濟，糧食與財政、價格體制與分區立體開發戰略，都有實質性的進展；還到12個省市作了調查，開展了一系列講學和交流；並承擔了全國重點科研項目《中國農村發展問題》。」我接著說：「任何一個人、一個組織成長中都不會一帆風順。去年，我生病了，維凌離開了，其仁遇到挫折，對大家情緒都有影響。但大家心沒有散，研究組沒有垮，項目照常進行，還發展了幾名黨員。但要注意，大家都血氣方剛，各有所長，要相互體諒，不要任俠使氣，妨礙團結。說誰是誰的人，誰是誰的人，很不好。要知道，有幫派行會思想的人難成大器。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真理負責！」

在領導小組和黨支部成員會議上，我說：「海納百川方能成其大。春秋之法，責賢者備。英淘和若冰鬧了意見，都應該各自先作自我批評。特別是英淘，和人一爭論，就不顧情面，總要弄得臉紅脖子粗。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氏戒剛疆，久久自芬芳嘛！」英淘不高興地說：「我們又不是搞政治，搞學術就要自由討論，有什麼說什麼。」我說：「你說得不錯。但因為你父親支持發展組，你就要注意，不要給人一種以勢壓人的感覺。」

英淘生氣地說：「那好，我可以退出發展組。」我說：「你不要賭氣。發展組有你，可以搞得更好；發展組沒有你，照樣可以搞下去。可你離開了發展組，就你這牛脾氣，誰能跟你共事？」英淘負氣回家了。大家著急地說：「老陳，你去勸勸他。」我說：「他這個人，我太瞭解了。不用勸，他氣一消，就會回來。」第二天開會，他果然回來了。我拍著他肩膀說：「能屈能伸，方為大丈夫也！」他笑了。

會議結束時，我提了一個問題。我說：「我這次生病，對發展組影響很大，說明發展組還不成熟。按系統論的說法，我們應該建立起一種能自組織、自運轉、自繁殖的機制，離開誰都不會發生問題。小朋說一個有效的組織需要三種機制：科層機制、市場機制和克蘭機制。希望大家考慮。」英淘又說：「老陳啊，你可是單位元，無人可以替代。」我說：「沒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離開了誰地球都會轉！」會議總算融和了大家的關係。

4月下旬一天的傍晚，我去中南海辦完事準備回招待所，正巧遇上胡耀邦散步。我說：「耀邦叔叔，您好！」他一見是我，就熱情地說：「哦，小陳，好久不見了啊！聽說你在上海生了病，好了嗎？」我說：「還正在康復。」他說：「你看，我每天給自己規定走一萬步，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嘛！邊走邊聊。」我說：「您擔任總書記以後日理萬機，不好意思多打攪您。」他說：「沒關係，我特別喜歡聽青年人的意見，框框少，有朝氣！」

他接著說：「我聽紫陽、萬里、力群多次說過，你們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中國的改革開放需要大家、特別是你們青年人的努力。說說你的看法。」我說：「耀邦叔叔，民間有個說法，說為救國救民打天下的第一代，和上山下鄉經歷磨練的第三代，共同推動了農村改革。而在各次左傾運動中，飛黃騰達起來的那些第二代，往往不是整人有術，就是看風使舵，是『反向淘汰』的產物，是左傾路線的維護者，也是改革開放的『中梗阻』。」耀邦連說了兩個「有道理！」

我又說：「從我瞭解的情況看，多數省市主管農業的人，是搞『以糧為綱』、『學大寨』上來的；而主管工業的人，則是搞國營企業、『學大慶』上來的；至於主管組織、宣傳的人，多年受『階級鬥爭』、『繼續革命』的

熏陶，他們比別人都左，這您比我清楚。」耀邦沉思了一會兒，說：「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能強求。我一直主張多換思想少換人！條件變了，人也會變的。」

我說：「您說的有道理。小平同志也說『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變好，不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壞』。其實，文革就是明證。問題在於：如何才能創造一個好的制度環境？周揚^[337]提出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問題，明明很有道理，由此可以引導到馬克思的人的解放和制度改革，為什麼又被批判了？大家都議論紛紛，很不理解。」耀邦想說什麼，但沒有說，只是默默地走著，明顯讓人感到他有難言之隱。

我說：「耀邦叔叔，我初到農村，覺得人們常說的『經是好經，被歪嘴和尚唸歪了』有道理。等我調查過許多地方以後，就發現為什麼各個村鎮縣市這『好經』都唸歪了呢？各地的典型大多是『吃偏飯』的樣板，別處無法學。如果大家都成了『歪嘴和尚』，這經豈不是有問題嗎？」耀邦說：「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但實現起來是一個歷史過程。列寧、斯大林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可能搞過頭了。我們搞文革還不是也走向了反面。」最後，我說了一段可能會讓耀邦難受的話。

我說：「馬克思說，人創造一種什麼樣的環境，環境就造就一種什麼樣的人。我們這一代人，可能對不起創造了燦爛文明的祖先，也可能會對不起認為我們無能的後代！但，對不起我們這一代人的，卻是創造了這種制度的你們這一代人！」耀邦似乎受到了某種震撼，停住了腳步。他並沒有怪罪我的意思，握著我的手說：「小陳，我喜歡你這種敢言的年青人。我們的局限性確實很大。你們今後日子還長，會是有作為的一代！」我真後悔，不該在他老人家面前說這種不知輕重的話。

4-32 「這年頭，你不維護自己的利益，誰管你？」

1984年4月，我回到北京後，一直住在西直門中聯部招待所，也沒個自己的家。朋友來來往往，倒是很熱鬧。大家提起「清除精神污染」，都很不滿意。湘魯說：「運動一開始，有人把鄧力群《訪日歸來的思索》寄到中央辦公廳，說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自去年底，萬里說，「農村改革沒有污染問題」；趙紫陽說，「經濟領域不要搞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宣傳「新技術革命」的浪潮興起，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成了人們議論的主題。

[337] 周揚 (1908-1989)，湖南益陽人。中共著名文藝理論家，在其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期間，領導了多次批判運動；文革初被捕入獄，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期間，對過去的批判運動有所反思；1983年提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遭到胡喬木批判。

我從1978年底回北京後，先住在岳母家，1982年起就住了招待所。農經所分房子，按各種條件打分數，我從1980年就排在第一位了。可幾年過去了，排在我後邊的人都分到了房子，我還是沒有分到。我很奇怪，去問當了所長的王貴宸，他應付我說：「老陳呵，所裏很多人沒房子，你整天往農村跑，你分了房子，也住不了幾天，就先給別人分了。」我說：「貴宸，我大部分時間不在北京，可回來總該有個落腳的地方啊！再說，分房在所裏排隊，五年我都排第一，先分給別人可以，也該給我說一聲吧？」

王貴宸有些理虧地說：「你不要介意。你是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專家，又辦法多。你到院裏要房子，一張嘴就會給你。」我半信半疑地到院裏，找到院管理局局長常明生。他說：「你就是陳一諮呵，院裏要房子的人，只有你沒找過我。不過，你有重大貢獻，又身體不好，農經所已經用你的名義要走3套房子了，奇怪的是怎麼一套都沒給你？你回所要一個分房指標，馬上就給你分。」

我又找到王貴宸，問他常明生說的是不是真實？他不好意思地說：「唉，他說的不假，用你的名義，事情不是好辦一點嘛。」我說：「那你為什麼和我連提都沒提一下？做事總該光明磊落嘛！過去的事不說了。所裏給我個指標，院裏答應給我房子。」他又打起了太極拳，王顧左右而言他。我有些不高興地說：「若冰幫所裏弄了地皮，正蓋宿舍樓。所裏又用我的名義要了3套房子。現在院裏讓所裏出個指標，就可以給我房子，還為難嗎？」

他說了一堆困難，還是沒答應給指標。我又去找常明生。他直搖頭，說：「一諮啊，這年頭，你不維護自己的利益，誰管你？所裏不給指標，我也沒辦法。所裏無論如何都該給你個指標嘛！」就這樣，來回踢皮球，事情就又拖了下來。直到1984年底，英洵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父親，鄧力群立即找社科院秘書長吳介民^[338]，請他幫助解決；而鮑彤^[339]知道後，給社科院院長胡繩打了電話；常明生才答應，在紫竹院社科院高研樓借我一套房子。

這套借的房子在十一樓，只有三十四平方米。但王貴宸一聽說，立即笑咪咪地和我說：「老陳啊，我說你本事大，沒錯吧。我跟你商量一下，我和太太有一處一室一廳的房子，我兒子還另有一處一間的房子，想和你

[338] 吳介民（1922-2008），廣東增城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

[339] 鮑彤（1932-），浙江海寧人。1980年擔任趙紫陽秘書，並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7年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鮑彤反對鄧小平用軍隊鎮壓學生，被非法闖入秦城監獄。199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換一下。怎麼樣？」說心裏話，我從他 1980 年在安徽調查起，就覺得他很會看風來事，缺少一個研究者的正直品格；後來發現，他除了為自己爭一點虛名俗利外幾無所長；他和楊勳是人大同學，但為人、學識簡直判若雲泥。我說：「你好意思嗎？」他不高興地走了。

從小「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教育，使我對房子這類身外之物不太注重，覺得有一張床睡就可以了。不過，這也苦了發展組的兄弟們，直到我去組建體改所，大家都還住在招待所，沒過上正常的生活。事後想起來，總感到很對不起大家，並沒有作到「後天下之樂而樂」。有些朋友後來英年患病，很可能與當年過於勞累，而缺少必要的生活條件，有很大的關係。但願歷史會記住當年這些捨身忘我的年青人。

小強拿給我一篇寫發展組的文章。我一看，寫得真不錯，事實準確，表述活潑，文字優美，但不宜發表。我問小強：「誰寫的？」他說：「秦燕^[340]！」早就聽說，秦燕才貌雙全，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不簡單。小強說：「《黃河》月刊已經排版，秦燕讓我們過目一下，看有什麼問題沒有。」我說：「千萬不能發，一旦發出去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麻煩！」小強說：「那得你去和她說。她還要請你吃飯，想和你聊聊。」

我趕忙去拜訪秦燕。她家裝飾得很有情趣，看來日子過得很溫馨。她先生唐若昕^[341]也是個能人，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張羅了不少事，包遵信^[342]和金觀濤搞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就掛靠在那裏。我和她是第一次見面，她清麗脫俗、大方得體，儼然一個有教養的大家閨秀。她做了四菜一湯，手藝很不錯。

吃完飯，她問我：「文章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能發？」我說：「文章寫得非常好！無可挑剔！」她又問：「那為什麼不能發？」我說：「看了你的文章，對你的眼光、見識、才學，從心裏佩服。但你想，如果你把 1980 年和 1981 年我們在安徽的調查，及在北京彙報的真實情況寫出來，那些反對『包產到戶』的人，會不會把我們當成『眼中釘』、『肉中刺』？我們今後還有活路嗎？小強一定也和你說了，1982 年，我們把給鄧力群、杜潤生的彙報在合肥會議上講了，都引起了一場風波。你這篇文章一發表，還不鬧出亂子來？」

[340] 秦燕 (1955-)，北京人。著名影視作家。

[341] 唐若昕 (1955-)，浙江寧波人。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所、蛇口工業區、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工作；後任中共秦皇島市委副書記、邯鄲市市長、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總經理。

[342] 包遵信 (1937-2007)，安徽無為人。創辦《走向未來》叢書並任主編；八九民運中曾參與組織「首都各界聯合會」，後被捕入獄；出獄後受非法監控直到病逝。

她真是冰雪聰明，聽我一說，馬上就明白了。她說：「知道了你們的事跡，我非常激動。覺得應該盡快讓大家知道，就一氣呵成寫了這篇文章。沒想到一時的痛快，可能會將你們陷入困境，成為眾矢之的。我立即通知《黃河》編輯部撤稿子。」我說：「謝謝你的理解。你知道，真要推動改革，處處會觸動既得利益，一定得事事小心！」她說：「我對你埋頭做事、不求名利，真是非常敬佩。」

我說：「能認識你這麼個難得的識大體的才女，真是緣份！」我如釋重負地告別了秦燕。她用了那麼多的心血，寫的那麼好的一篇文章，聽了我一席話，竟毅然地就放棄了，真可謂大家風範。覺得不知若昕哪世修來的福份，能娶到這麼好的女子為妻，令人稱羨。可惜的是，我後來太忙，沒能和秦燕有更多的交往。但想起她待人的「軟雨嬌花態」，處事的「金戈鐵馬聲」，總難忘她當年對我們的深情厚誼。

幾凌家還是車水馬龍，幾乎變成了社會學和文化討論的沙龍。他告訴我，《社會學叢書》編委會已經組成，他自任主編；費孝通^[343]、雷潔瓊^[344]、李景漢^[345]等社會學老前輩，都同意擔任叢書顧問。經與作者反覆討論，確定一共出12本書，一年後全部完成。在他家，還見到了團中央書記劉延東^[346]，她父親劉瑞龍^[347]也住在這個樓裏。出來下樓時碰到了陳永貴^[348]，原來他和秦德君住一個單元的樓上樓下。我說：「永貴大叔，1971年我到大寨訪問，只見到郭鳳蓮，沒見到您，很遺憾。」他一臉沮喪，只點點頭，轉身就走了。

4-33 鄧樸方的眼光、才具和忘我

我們租的西直門內中聯部招待所，恰巧和鄧樸方創辦的殘疾人基金會的辦公室很近，我就經常到他那兒去聊天。他對我和發展組的情況很瞭

[343] 費孝通 (1910-2005)，江蘇吳江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曾被打為「右派」，後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344] 雷潔瓊 (1905-2011)，廣東台山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法學家，曾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參與創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曾任中央主席；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45] 李景漢 (1895-1986)，北京通州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社會調查專家。

[346] 劉延東 (1945-)，江蘇南通人。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部長、政治局委員、政協副主席。

[347] 劉瑞龍 (1910-1988)，江蘇南通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農業部副部長。

[348] 陳永貴 (1915-1986)，山西昔陽人。在其擔任昔陽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期間，艱苦創業修建「大寨田」，改變了落後面貌，毛澤東因而提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其本人也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並推行「窮過渡」、「割資本主義尾巴」等作法，直至改革開放以後才得到糾正。

解，原來他和維凌每兩周聚會一次，彼此交換看法。我們一見面都十分感慨，他很關心地問我病好了沒有，我告訴他好多了，正在治。我看他雖然坐在輪椅上，但臉色很好，二目有神。他有清晰的大局觀，辦事有魄力，只可惜高位截癱，只能坐在輪椅上，這妨礙了他和一般民眾的接觸。

1968年初，聶元梓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把鄧樸方打成了「反革命」，關押在北大東門外的物理大樓。出於對文革一系列做法的不理解和絕望，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企圖自殺，從八米高的樓上跳了下來，造成了脊椎骨重傷。新北大公社拒絕給他治療，終於造成他腰部以下高位截癱。1969年，何維凌出獄後，約我一起到積水潭醫院去看樸方。樸方躺在床上，那麼一個精明強幹的小伙子竟不能動了，讓人唏噓不已。樸方當時很悲觀，我和維凌不斷地勸慰他。他流著眼淚一再說：「今後我躺在床上，什麼事也幹不成，只能是個負擔，真不想活了！」我說：「現在這種局面很難持續下去，無論多麼艱難，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真要死了只會讓壞人高興。我三次被聶元梓的人差點打死，總算挺過來了。」他緊緊握住我的手淚流滿面地說：「謝謝你，謝謝你的鼓勵！」1970年底，羅小朋去江西時，我給他帶了一封信，可惜他們沒有見到。

他說起自己怎麼艱難活下來的過程，若沒有超凡的毅力幾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在清河救濟院和那些殘疾哥們的患難與共，使他在加拿大手術後，立即想到了中國還有5,000萬殘疾人。他沒有繼續作康復治療，提前回國為殘疾人創辦了第一個康復中心。他這種推己及人、忘小我而成大我的精神讓人敬佩。為了給康復工作籌募資金，他又創辦了殘疾人基金會。但募款不易，他又想以企業養事業，今年初他創辦了康華公司。

說起維凌，樸方說：「你告訴他，以後不能那麼率性而為，不能那麼張狂。他打了張成蓮，弄得我們老爺子發脾氣，還把我訓了一頓。」我說：「他是自持才高，說話辦事不夠撿點。老爺子說他是『壞人』，不就把他斷送了嘛！」樸方說：「你告訴他，讓他好好沉下心來，研究思索些問題。」我說：「維凌是個憂國憂民的人，也是個性情中人，總該給他個發揮作用的機會。」樸方說：「你放心，他這個人閒不住的。你先幫幫他。」

接著，他又說：「你到安徽調查的情況，維凌都和我說了。他還拿來了你的調查報告，寫得確實有水平，我都恨不得親自去安徽看看。」我說：「現在農村改革開了個好頭，但形成一個不可逆轉的局面，中國才有希望。」他問：「怎麼才不可逆轉？」我說：「本世紀末達到『小康』，這在系統論裏叫『狀態目標』，而保證這一點的叫『結構目標』，也就是一種什麼樣的組織結構，才能保證『狀態目標』的合理實現。」

他又問：「你說說看，什麼樣的組織結構？」我說：「發展經濟學講的五因素論（土地、勞動、資源、資金和組織）有一定道理，但組織是關鍵。東西德、南北韓發展的差異就在於組織，我們需要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組織結構，也就是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他說：「市場經濟肯定比計劃經濟有效率，但民主政治在中國恐怕一時還行不通」我說：「可以一步步過渡。若沒有民主政治作保障，市場經濟會不倫不類走上歪路的。」

一周以後，我們又一次談起這個話題。我說：「若不是你們老爺子力主改革開放，支持農村改革和經濟特區，中國的改革就不會有這麼大的成效。但從中國的歷史看，往往是人存政興、人亡政廢。若想中國今後不再發生文革那樣的悲劇，你們老爺子去年八月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是個關鍵。」他說：「事情沒那麼簡單，我父親那次講話以後，不少元老和理論家有不同意見，時機不到急不得呵。你再好好研究研究。」

我又說：「很明顯，1980年底陳雲提出『緩改革，重調整』的方針，對農村改革和經濟特區已經產生了不良後果。中國的改革如果總是進一下、退一下，走兩步、退一步或走一步、退兩步，還不知道會拖到猴年馬月什麼時候呢。」他說：「你看，人走路，總是一條腿在前，一條腿在後。右腿邁出去了，左腿在後邊；右腳一停，左腿才邁出去，這樣才能取得身體的平衡。否則，就會摔跟頭，心急吃不得熱稀飯嘛！」

我笑著說：「人生有涯，時不我待。我們有生之年，總該給後輩創造一個較好的制度環境，起碼形成一個不可逆轉的局面嘛！」他說：「壯志可嘉！那你下一步準備怎麼辦？」我向他介紹了《以農村為突破口 實行立體開發的改革戰略》，他饒有興味地聽著。最後，他說：「你們這個設想，維凌和我說過，不過沒有你說的詳細。確實很有意思。」我說：「這是一個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構想，能不能實現還要下大功夫。」

我又向他介紹了「中華振興百年設想」。他說：「有遠見！但現在關鍵是一步步怎麼走下去。我問你啊，為什麼不到下邊去幹幾年？」我說：「1982年，萬里就想讓我到一個市去幹，我沒有去；紫陽也說，要把海南給我們作實驗，我們也沒應承。」他問：「為什麼？」我說：「我在下邊10年，基層幹部都說：『下邊的問題在上邊』，上邊的政策不定，到下邊怎麼幹？所以，下去條件不成熟。」他說：「條件可以創造嘛！」

我說：「談何容易。海南要想搞好，就應當『內線封關，外線打開』，這樣才能和國際接軌。可惜現在卻相反，這就會弄得不倫不類。」他問我：「一諮，你說說看，改革是什麼？」我說：「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窮苦的老百姓富裕起來，政府就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

的機會和環境。」他笑著說：「你說的是原則。現實地說，我覺的改革就是：誰有本事，誰就從國家那兒撈一塊！」我一時感到很愕然。

我說：「我搞農村改革，就是覺得農民活的不像人。中國 80% 以上是農民，他們不富裕，中國怎麼現代化？」他說：「你還是太理想主義了。農民要富起來，城裏有本事的人也要富起來。過去國家把什麼都管起來了，現在國家要鬆綁、要放權，就是要利益共享，誰能撈一塊，就讓他撈一塊。」我說：「照你這個說法，那誰離權力近不就可以撈得多，還是一般老百姓吃虧嗎？」他說：「你看歷朝歷代，總是能人先得利嘛！」

我說：「不然，現代社會的實現，是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他又說：「你說的不錯。但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開始就能作到的。總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來，再達到共同富裕。」我說：「但決策者一開始就應當考慮好，否則，今後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嚴重的貧富懸殊。」他點頭說：「有道理。」

4-34 對農村改革和發展組的回顧

從 1978 年發端的農村改革到 1984 年，可以說邁出了難得的第一步，成為中國改革的突破口，也為中國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1978 年無論安徽肥西的山南、還是鳳陽的小崗，農民搞起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為了「活命」。到 1983 年底，農村實行雙包到戶的地方達到 95% 以上，為什麼呢？農民是「餓怕了」、「窮夠了」，凡是搞起了的地方，農民都會說「自由了」、「解放了」。所以，中國的農村改革實際上是農民長期對抗強行集體化——高級社、人民公社——的總爆發，是中國農民爭取生存、反對壓迫的結果。

1978 年，全國農民每人集體經濟年收入僅 76 元（加上個體收入約 120 元），兩億農民年收入則低於 50 元、人均口糧不足 300 斤毛糧，可以說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窮苦不堪。到 1984 年，農民的年收入達到 480 元（含家庭副業收入），較 1978 年同比增長 2.6 倍。同時，有 8,000 萬農業勞動力轉移到了非農產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的興起，不僅緩和了城鄉供應的緊張，而且促進了城鄉隔離的鬆弛。

更重要的是，隨著雙包到戶的實行和人民公社的解體，使強制推行了 20 多年的低價收購農產品、積累重工業資金的計劃經濟失去了基礎，為市場經濟的發展開拓了道路。農村形勢的好轉，在緩解了國民經濟困難的同時，還促使農產品購銷體制、農用物資供應體制、信貸稅收體制進行改

革，同時也促進了鄉鎮企業、地方小工業和商業的改革，並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

其次，雖然這次農村改革是農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動，而且是自 1956 年以來農村體制變動中損失最小、收益最大的一次。但若沒有一批開明的領導人，衝破重重阻力的支持，農村改革也不會那麼快地取得成效。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但在關於農業問題的決定中，仍然規定了「不許包產到戶，不准分田單幹」的條款。這就使得從 1978 年到 1982 年，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十分激烈。

1978 年，萬里首先在安徽尊重農民意願、衝破上層阻力，同意農民試行包產到戶，取得了極大的成效；1980 年，萬里調任國家農委主任後，不遺餘力地推行農村改革，並主持制定了 5 個「1 號文件」；說萬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旗手實在當之無愧。當然，在中央若沒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鼎立支持，農村改革也不會順利進行。加之鄧小平、陳雲先後表態支持，華國鋒、李先念、王任重等人的一再反對也就未能阻止。

鄧力群從 1979 年轉送「郭崇毅上書」起，在上層爭論不休時，堅決支持農民包產到戶，可以說功不可沒。為包產到戶和發展組的問題，我曾多次向他彙報、討論、甚至爭論，深感他對包產到戶的支持是真誠的。不應因他的許多「左」的作法不當，而抹殺他在農村改革中的貢獻。杜潤生雖說從 1978 年到 1982 年，對包產到戶首鼠兩端，但後來協助萬里制定一號文件，對農村改革還是有很大貢獻的。

第三，必須看到，農村改革的第一步仍然有許多局限。雖然包產到戶以後，農民生產的剩餘產品歸自己了，但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土地、草場、森林、灘塗等）所屬不清，因而農民沒有長期投資的打算。往往種地是掠奪式，草場只用不養，林木砍伐相當嚴重，灘塗則過度捕撈，這樣就不易形成資源、勞動與資本的較優配置，很難出現規模效益，也難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

為解決這類問題，我曾和先後杜潤生討論過五、六次。我提出過：「永佃制」、「雙田制（公田、私田）」、「地底權屬國家，地表權屬農民」、「農民長期承包，可以出租、轉讓」等等辦法，但一直難於解決。關鍵還是「公有制」的觀念，使這類問題拖而難決。故此，從 1984 年以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抑制，農民的收入水平也就徘徊不前。可以說，農村改革第二步的停滯，又延緩了中國整個的改革進程。

那麼，我們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呢？自 1980 年 9 月成立到 1984 年 9 月，4 年來為推動第一步農村改革，可以說起到了衝鋒陷陣的作用。

發展組的老人們都清楚，1979年到1980年發展組創辦的「尋路」時期是最困難的，1980年到1982年的「破冰」時期卻是貢獻最大的。往後的一些工作不過是順勢而為罷了，而且像土地和農民身份等重大問題，1984年以後一直並沒有得到解決，實際上農村改革停滯了。

從我1979年7月上送「郭崇毅上書」，1980年7月作《農村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彙報開始，到1981年4月印行《「包產到戶」資料選》、4月底的雲貴川調查8月寫出《「雙包到戶」地區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報告、1982年完成《以農村為突破口 實行分區立體開發的改革戰略》構想，以及發展組的許多研究成果，先後都受到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的多次肯定和稱讚，也受到鄧力群、杜潤生的重視。

更重要的是，我們第一手的調查資料和分析，不斷成為開明領導人決策的參考和依據。我們把下層的真實情況反饋給上層的決策者，決策者也就避免了因訊息屏蔽而造成的誤判。像1981年和1982年，中央制定「一號文件」前後，決策者都會三番五次找我們談話聽取意見。也因此，1982年初中央書記處才作出了要求各部門提拔年輕人的決定，使一大批有才幹的年輕人在改革開放中嶄露頭角，以後都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

發展組的一批人，確實有一股子不謀私利的獻身精神，我們把這叫作「積極正派有能力」。除了我四十開外，其他人都在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他們中小強、維凌、英淘、小朋、冠三、南風、曉魯、國青、若冰、南生、木生、錫文、杜鷹、其仁、高山、小蒙、曉京、毛揮、謝揚等人都是難得的研究人才。幾年間大家團結合作，不僅為中國的農村改革作出了貢獻，而且為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開了一代學風。

1949年以來，由於左傾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說真話的人、特別是學者無不遭到整肅。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幾乎無人敢於觸摸重大的現實問題，學者們或「經院註釋」、或「繁瑣考證」、或「聞論起舞」。翻開1978年以前的中國社會科學雜誌，除了抽象的理論教條，就是「假大空」的口號，對國計民生重大問題的實證研究幾乎絕跡。我們的研究則另闢蹊徑，從實際出發，不斷回答「現狀是什麼，問題是什麼，前景是什麼」。

我們秉持面向實際、面向民眾、面向潮流的原則，把調查現實素材做為研究的基礎，實行基礎研究、戰略研究、應用研究三結合，採取高層次、多學科系統分析的方法進行綜合研究，不僅可以使各學科的研究者相輔相成，而且容易使複雜的問題得到正確的解答，避免了「瞎子摸象」的困惑。幾年的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是成功有效的，既出了一批優秀的成果，又培養了一批務實求真、有創新頭腦的人才。

遺憾地是，在我被迫離國的1993年，周其仁給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創辦的《當代中國研究》編輯部投了一篇稿子，是他所編的《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一書的「前言」。文中說，發展組的成立是「借別人的光，也就是『搭便車』」。刊物主編給我說，文中似乎把你們說成了是一批「搭便車」的投機者。我看了以後很感慨：如果這麼說，周其仁確實是「搭便車」了，他並沒有參加發展組從議論到成立長達23個月的各種討論與活動。

我和周其仁說，你的文章不符合事實，發展組的成立並不是「借別人光」的「搭便車」，而是順應了農民的需要起了衝鋒陷陣的作用；是有了農村改革才有了分權改革的思路，並不是有了分權改革的思路才有了農村改革；發展組更不是有了支持才組建，而是組建中才尋求支持；而且鄧力群對發展組的支持比杜潤生更大；你要撇清和我的關係可以理解，但篡改歷史真相就不對了。

但周其仁卻說：「我就是這麼認識的」，「發展組不是你創辦的」，「我就是有意少選你寫的東西」，「鄧力群對發展組的支持是為了把我們拉過去」，很不理性。為了弄清他究竟編了一套甚麼樣的書，我請朋友從香港買來了《農村變革和中國發展》一書，我和楊勳、羅小朋等人議及此事，他們都認為「其仁不顧歷史事實，也太會吹噓自己了」，「發展組的成果幾乎都是他的了」。

不過，歷史從來就是這麼詭弔，「搭便車」的人不僅會漁人得利，而且還會得了便宜賣乖。一場大變動以後，大部分人趨利避禍可以理解，個別人投石下井也並不奇怪。隨著國內情勢的變化，有投機心理的人也會轉變態度。1989年我剛出國，周其仁就給我寫信說「你安全地出來了，實在是我們這個國家不幸中的一件幸事。」第一次見到我還說「老陳，沒有你就沒有發展組，沒有發展組就沒有我。」何以幾年後就變了另一副面孔？

發展組是誰創辦的、誰發揮了甚麼作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包產到戶」的推行改善了農民的境遇，帶動了經濟改革。正像馬雅科夫斯基的《英雄》一詩所說，衝在戰場前面的英雄都犧牲了，只有躲在戰壕裏的「英雄」才能享受鮮花和美酒。後來，王小強告訴我，王岐山知道了我和其仁的爭論，歎著氣說「也只有其仁這種人，能做出這種不顧倫理的事來」。歷史的真實只能靠後人評判了。

第五章 促進經濟改革 (1984-1986)

——組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農村改革出人預料的大見成效，對國民經濟系統的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但城市改革卻舉步惟艱，意識形態的爭論十分激烈。改革怎樣才能深入下去呢？

5-1 抓住歷史的機會，做一個大寫的人

歷史只給有準備的人提供機會。「四人幫」的垮台，給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們，提供了改變歷史的空間。當時，僅就北京而言，各種小組、學會、沙龍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但組織起來，專門研究農村問題的也就「發展組」一家。激進的朋友們批評我們是「狹隘經驗論」、「落後農民意識」，保守的朋友們則攻擊我們是「和民主牆呼應」、「想走第三條道路」。面對各種非難，我們「走自己的路，聽任別人去說」，並沒有絲毫動搖。

為什麼能這麼堅決？因為我們相信：佔 80% 以上的農村人口若沒有積極性，中國走向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回到北京後，每當談起在農村的請況，我們就會想起「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農民。他們那「能吃飽穿暖」的起碼要求，「活的像個人」的合理願望，難道不應該實現嗎？農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已經和我們的血肉融合在一起。他們的苦難，我們感同身受；他們的希望，就是我們的追求！

我不斷和大家說：「自古以來，老百姓要的就是：一吃飽穿暖，豐衣足食；二自由自在，自由選擇。一個政府不管標榜什麼主義，只要能作到這兩條，老百姓就會高興；作不到，就不滿意；反其道而行，一定難以維持。順應潮流也就是順應人心，滿足人性的追求。過去 30 年，為什麼沒有搞好？就是違背了人心。可是改革要達到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心急可吃不得熱稀飯。」

討論中，大家意識到：過去之所以犯了那麼多「左」的錯誤，就在於用理想代替現實，忘記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也就違背了人類行為應當師法自然的基本道理。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

效，就是順應了人心、潮流和自然。任何改革都會遇到既得利益的反對，這是毫不奇怪的。問題是怎麼把改革的阻力化解到最小？根據系統論的觀點，我們分析：

任何一個大系統都是由若干子系統構成的。如果大系統運作失靈，那麼，就需要有所改變才能維持其生命力。不論什麼系統，包括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學術系統等等，改變無非都是三種形式：一是推倒重來，二是另立體系，三是改變系統行為。我們面臨的任務，正像鄧小平所說：「改革是一場革命」。那麼，我們原來的大系統就需要有一個重大的改變。怎麼改變效果較好呢？

第一種方式：「推倒重來」。實踐證明，大多數已經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不採取這種非理性的方式；採取這種方式的國家，會造成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的長期紊亂，付出過大的代價，往往得不償失；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戰亂、動盪不止，破壞多於建設，人們早已厭惡這種激烈的方式；而且，只有在「統治者維持不了這種統治，被統治者忍受不了這種統治」的時候，這種方式才會發生。

第二種方式：「另立體系」。當一個大系統失靈，難以正常有效運轉時，其若干子系統為維持生命力，必定會產生調整或變革系統行為的要求，以滿足其發展的願望；而改變某些急需更新的子系統，就成為不可或缺的系統行為；這種改變了系統行為的子系統，可以被視為新的子系統，如果這些新的子系統能夠自運行、自擴張、自繁殖，其示範效應早晚會影響、改變或取代老系統；像「包產到戶」、「經濟特區」、「民間團體」的產生，無不如此；某些新系統即使一時被禁止、取締，只要符合潮流，總會不斷產生。

第三種方式：「改變系統行為」。大系統運作失靈，也就為部分或全部改變系統行為創造了前提；逐步改變其各個子系統的運作目標、程序、方法與規則，即可達「舊瓶裝新酒」之效；隨著各個子系統運作方式的改變，大系統的行為就會或遲或早地發生改變，直至發生從量變到質變這樣一個變化過程。人類歷史上各種大大小小的改革，大體上都遵循這樣的規律。

我從小即受到良好的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又接受了許多西方文化觀念。長大以後，相信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似乎「大同思想」和「共產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殘酷的現實——不斷的「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帶給老百姓的苦難使我覺醒。鑽研經史，研究國情，我意識到只有「影響決策」，才能「改變中國」。是啊，只有那些贏得決策者相信並接受的創意，才能轉變成創造歷史的行動。

1978年底，我回到北京以後，沒日沒夜地說服各方、務色人才，目的只有一個：讓老百姓過上人的日子！將個人的得失榮辱、身家性命皆置之度外。發展組自1980年創建，能在農村改革中發揮先鋒的作用，端賴天時、地利、人和皆備，決非幾個小人物一時的心血來潮「搭便車」。當然，發展組的一批有志青年，也都發揮了難能可貴的作用。他們也許追求的目標有所差異，但在「富民強國，振興中華」這一點上高度一致。

發展組的每個人，都有經歷文革和下鄉的艱苦磨練，也都有大幹一場的雄心和特長。他們中任何人跑單幫，也都會有出色的成就。但絕不會像在「發展組」那樣，發揮出一群大腦的組合優勢，彈奏出改變歷史的雄渾樂章。「發展組」的成員，有世家子弟、幹部子弟、平民子弟，個個都是強龍，但誰也不會以家庭背景顯赫而傲人。討論問題時一律平等，大家開會時經常爭論的面紅耳赤，會下又大多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我和大家說：「自古以來，江山代有才人出，但一流的破大難題，二流的構造體系，三流的拾遺補闕，四流的通俗解釋，末流的附庸風雅。農村改革破了改革從何突破的難題，越往後會越難。經濟改革可能是一場持久戰，而政治改革則是一場攻堅戰，一定要有長遠的打算。但我們生逢此時，就應該抓住歷史的機會，做一個大寫的人！為改革貢獻自己的才華。」一批能人組合起來，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既要揚其所長，又要抑其所短，還要使每個人能愉快地與他人合作共事。

發展組從滁縣調查開始，試驗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成功，以後的許多調查和研究報告，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當然，合作研究必須建立在個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個人的創意和一批人的腦力共同激盪才會產生出耀眼的火花。而且，二十世紀的重大科學發現，大多是跨學科協作研究的結果。我們總是用日本明治維新時，伊藤博文說過的話：「一個落後的民族，如果沒有一批忘我獻身的人，這個民族是不會振興的！」激勵自己。

5-2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農村改革的進行，把一統天下的計劃體制撕開了缺口，成為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起點。過去那種在計劃體制下，限制農村生產要素流動、打擊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不合理做法改變了，農產品越統越少、越少越統的惡性循環結束了。隨著取消人民公社建立鄉鎮，社隊企業改稱鄉鎮企業。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發展起農村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中國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成為推動經濟改革的一股巨大力量。為什麼會如此呢？

1949年以前，中國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作坊，鄉村集鎮上還有為數眾多的個體商販和小店舖。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村工商業急劇衰落，此後中國的廣大農村，幾乎沒有了什麼非農產業。除了少數比較富裕的地區，大多貧窮落後的地區，就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工業企業。1958年「大躍進」中，人民公社出現了一批農業機械加工、修理的社隊企業，但實行就地取材、加工、銷售的「三就地」原則。

「三就地」其實是，不允許農村發展商品性的加工業，因為政府已經用統購派購的方式，將可加工的農產品原料收走，以此保證工業化資金的積累。這種抑制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限制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做法，既造成了農村大量資源的閒置，又阻礙了農村經濟的增長和農民收入的提高。直到1978年，在農村社隊企業就業的勞動力近3000萬，但創造的產值在國民經濟中則不成比例。

在計劃體制下，資源配置完全由國家按統一的計劃進行，農村的生產要素不能自由配置。這不僅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造成了農村資源配置的浪費。農村改革以後，一是使農村剩餘資金大量增加，僅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從1979年到1984年農民擁有的生產性固定資產，就比集體經濟23年的積累還多了30%；二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組合，使個人集資的協作、聯合組織大量出現；三是市場的成長和拓展，鄉鎮企業依市場需求進行產銷，大大加快了改革的市場化進程。

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引起了主張計劃體制的領導人的反對，姚依林再三說：「鄉鎮企業不僅和國營企業爭資金、爭資源、爭勞動，還以小擠大，亂中取勝，助長不正之風，必須限制和整頓。」蘇南鄉鎮企業的一個主管說：「我們能在歧視中成長，在責難中壯大，靠的不是國家計劃，而是市場供求。」確實，和國營企業相較，鄉鎮企業有幾個優勢：

首先，鄉鎮企業沒有「鐵飯碗」，不吃「大鍋飯」，卻有自主權。他們的「人、財、物，供、產、銷」，都由自己決定；市場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而且「船小掉頭快」，利於選優汰劣。國營企業就不同了，他們雖說也開始「擴大自主權」，但「人、財、物，供、產、銷」還是都要由上級主管部門決定；而「鐵飯碗」、「大鍋飯」一時又難於打破，勞動、工資制度雖極不合理，也一時不易改變。

其次，鄉鎮企業的產品、技術結構利於揚長避短。當時，在中國勞動力剩餘而資金短缺的情況下，他們以生產佔用資金少、技術含量低的農副產品加工、日用消費品、輕工業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既能大量吸納農村勞動力，又能迅速周轉和積累資金。而計劃體制下的國營企業，則

一般有機構成高，就業崗位少，資金周轉慢，缺少競爭力，而且往往是自我循環。

再次，鄉鎮企業是農村改革後出現的非計劃經濟。改革越發展，市場越擴大，也就越有利於它的成長。因為鄉鎮企業實行自負盈虧，它的成長大大促進了生產要素的流動與組合，也使「計劃外產品」日益增多，從而促使計劃體制不能不改革。這樣，主張計劃經濟的陳雲，也不得不承認市場的作用了。但不受計劃體制約束的鄉鎮企業越發展，佔的市場份額越大，對計劃體制的衝擊也就越大。

從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國家的經驗看，當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村流動資金增多，勞動力出現剩餘時，農副產品加工業和輕工業的出現和發展是必然的。中國農村改革以後，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這是符合經濟自然成長規律的。但中國的不同特點在於，多年壓抑後的爆發特別猛烈，從1979年到1984年鄉鎮企業產值年增長20%以上，以後幾年則達到40%以上。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和經濟多元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鄉鎮企業在發展中，形成了各種模式，最突出的有「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其共同點是：人口多耕地少，本地勞動力大部分轉向非農產業，鄉鎮企業成為主要經濟支柱，產業結構得到合理調整，農民收入有較大增長，而且都是「能人經濟」。但其不同則是明顯的：

「蘇南模式」：蘇南是富饒江南的魚米之鄉，人文素質高，經濟環境好，鄉鎮企業起步早。除了有能人帶領，經營得法，還大多是以「集體名義」辦企業，辦事、佔地、貸款都比較容易，所以發展迅速，規模成倍增長。但也因為這個「集體名義」，就帶來了企業產權關係不清、以致負責人官僚化的弊端。我在蘇州養病時，參觀了若干鄉鎮企業，既訝異其發展之快，又感歎其官僚化之速。

「溫州模式」：溫州是個貧困地區，交通閉塞，2/3以上是山區，人均耕地不足半畝。但為了生存，那裏的人有一種特別頑強的拚搏冒險精神。他們幾乎是家家戶戶辦企業，家家戶戶有能人。所以，他們發展出一種以「家庭工業為基礎，購銷員為骨幹，市場為紐帶」的發展模式。因其產權關係明確，短期行為較少，多家聯合搞起股份制的規模經營，就顯得後勁十足，大有超越「蘇南模式」的態勢。

無論何種模式，鄉鎮企業都不同於計劃體制內的國營企業，他們沒有國家投資、產品也不由國家包銷。他們活躍在改革進行中的農村與正在需要改革的城市之間，城鄉民眾需要什麼，他們就生產什麼，大大豐富和滿足了市場的各種需求。當計劃體制在中國還佔主導地位的時候，鄉鎮企業

的發展成為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不可阻擋的推動力量。也是繼包產到戶之後，對計劃體制的又一次重大衝擊。而且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各地小城鎮像雨後春筍一樣的建設和繁榮起來。

5-3 「包」字的誘惑：高漲的城市經濟改革呼聲

連續幾年農村改革的成功，使中國農村面臨著新的轉折。推動這個轉折的，不僅是深入改革農村經濟體制、全面改組農村產業結構的任務，而且是國民經濟體制以及城市與大工業全面改革的醞釀。近兩年，發展組的成員幾乎跑遍全國，對農村生產責任制、發展趨勢、鄉鎮企業、經濟結構、市場流通、產品價格、體制改革等，特別是「縣級綜合改革」、「糧食統購改稅」都作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研究。

包產到戶的效益和鄉鎮企業的發展，為縣級綜合改革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發展組提出：「縣級體制改革，正發生在城鄉互相促進的樞紐點上。因此，它無疑是推動改革走向縱深的一個關鍵。」^{【349】}萬里在四川廣漢說：「縣城是城鄉經濟的結合部，是包括農、工、商、財、文各個方面的整體。」「要發展商品生產，只進行單項的、局部的改革不行，必須在全縣範圍內進行綜合性的同步改革。」可惜的是，當時大家對改革的關注點已經轉移到了城市經濟改革，並沒有把這個問題放在戰略高度予以重視。

北京的局面十分複雜。小強說，曾參加發展組的人大學生孫明，畢業後分配到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和張雲聲到溫州調查，竟得出了「如果說在北京看到了復辟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那麼在溫州就看到了復辟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的說法。小強和劉昶、小冬跑了一趟溫州，對溫州民間經濟的空前活躍，留下了難忘的深刻印象。木生和若冰則針對有人說，山西農民的聯合經營是「雇工剝削」，又作了進一步調查。而鄧力群則出於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希望發展組調查黑龍江、煙台等地農村能否保留一些集體經濟。

隨著改革的進展，「新現實」與「老觀念」的衝突在加劇，「改革」還是「復辟」的爭論一天都沒有停止。但是，農村「包」的效績，帶動了鄉鎮企業、地方小工業和商業的改革，也促成了城市虧損的中小企業紛紛進行承包。正像鞍山市長張建中所說，城市企業同樣存在「大鍋飯」和「自主權」的問題需要解決，虧損企業一承包很快扭虧增盈了，保本企業也要求承包，中小企業「包」的效果不錯，「包」的呼聲在城市裏高漲起來。

【349】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第4卷，第24-28頁。

萬里到北京以後，一直想把在農村「包」的經驗推廣到城市，他不斷支持大型國營企業試行「承包責任制」，像首都鋼鐵公司就取得了顯著的效績。他說：「30年的實踐證明，吃『大鍋飯』滋長懶漢思想。」「有些人調皮搗蛋，不幹活，照拿工資；有些人像『老黃牛』一樣地幹，但幹的再多也不多拿。」，「農村改革關鍵是正確處理國家、集體、社員三者關係，大中型企業改革關鍵是如何擺正國家、企業、職工三者關係。」

但城市經濟體制畢竟是一個複雜的大系統，牽扯的利益關係不像農村經濟體制那麼相對簡單，而且城市經濟體制是受國家計劃體制嚴密控制的。改革城市經濟體制必然要改革國家計劃體制，改革國家計劃體制又談何容易？不僅關係到國家各個部門的利益，而且關係到幾十年來對計劃經濟、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農村「包產到戶」的突破和鄉鎮企業的崛起，已經使堅持計劃經濟的傳統力量十分不滿，何況改革要改到計劃體制這個核心了呢？

中國的計劃體制不僅學習了斯大林模式，而且又有所創新。為加快工業化，積累資金的來源當時主要只能是剝奪農民。1953年開始，由陳雲主持陸續制定了對各種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制度。隨後又形成了一整套相當完備的、只保證城裏人利益的配套制度，如：戶籍制度、住房制度、糧食制度、副食品供給制度、燃料供給制度、生產資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勞動保護制度、養老保險制度，以至婚姻制度等……。而這些制度統統將農民排除在外，農民被徹底打成了「二等公民」。

這一套不合理的歧視制度，不僅成為中國農村長期貧窮落後的根源，而且成為整個中國和世界發展潮流相背逆的主要原因。領導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空想，卻造成了一個嚴格的不合理的等級社會。而這一系列的極左破壞，當人們表達出不滿時，就又遭到殘酷階級鬥爭的整肅。可以說，從1953年到1978年，中國基本上是在瞎折騰中渡過的，期間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高達8,000萬以上！更不要說無處不在、難以計量的其他破壞。

1978年12月，葉劍英曾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沉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而自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間，基本建設投資6,000億元，其中：2,000億元因為投資決策錯誤白白浪費掉了，2,000億元沒有形成生產能力，只有2,000億元形成了生產能力。萬里在國務會議上說：「如果這個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以國營企業為基礎，以對城市經濟的控制為中心的，農村改革一旦推開，馬上就面臨著和舊的城市經濟體制的尖銳矛盾。眼看著農村改革帶給農民的利益，城市職工改革的熱情越來越高。城市中小企業在「承包」中嘗到了甜頭，企業改革的要求也強烈起來。但計劃體制的主管部門卻出於慣性，處處給城市改革製造障礙，使得城市改革舉步維艱。

當時，一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認為：儘管我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說成是商品經濟，否則就會模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各種報刊雜誌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強調市場作用的「錯誤觀點」，說「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根本標誌」^{【350】}。一場曠日持久的「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從此展開，給人們思想上造成了極大的困惑。

顯然，幾十年形成的理論束縛，大大捆綁住了人們改革的手腳，改革的實踐確實需要理論的突破。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從來都是實踐創造理論。一旦某種理論形成也就會成為歷史，既可以指導實踐，又可以束縛實踐，在變革中更是如此。那麼，在我們面前就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無休無止的爭論，「屯重兵於堅城之下」而致「師老兵疲」；一種是順勢而為，以「農村包圍城市」，不斷擴大市場份額，層層剝筍，直至最後攻堅。

5-4 錯過了一次百年不遇的改革良機

十分可惜的是，中國錯過了一次百年不遇的改革良機。從1981年8月到1982年8月，在一年的時間裏，我和小強、英洵、維凌反覆研究，又經發展組再三討論，終於完成了《以農村為突破口 實行分區立體開發的改革戰略》一文。這個「改革戰略」的提出，可以說是發展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為中國近期5-10年改革畫的一張藍圖。遺憾的是，這個改革戰略卻沒有被決策者充分意識其重要性，而恰巧我又生重病住院難以繼續工作，只有徒呼奈何。

當1981年我們從滁縣調查回到北京以後，我感到包產到戶將會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因為這是廣大農民強烈要求改變貧窮面貌的要求，任何人都難以阻擋。那麼，農村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下一步又該怎麼辦呢？我們幾個人沒日沒夜地討論，回顧幾年的改革實踐，又從系統論、訊

【350】見紅旗出版社《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文集》。

息論、控制論的角度歸納，當我們完成了這個「改革戰略」的構想時，大家興奮的幾天都睡不著覺。

在全文完成以後，我又在文前提綱挈領地寫了幾句全文的主旨：

我國三年來經濟改革的實踐表明，改革必須選擇產生震盪較小而效果較大的領域首先展開，才能逐步成功。

改革的進一步發展，應當在穩定全局的條件下，實行優先改革農村的突破戰略；

農村的改革，應當實行生產結構、經濟關係、管理體制立體化的開發戰略；

全面經濟改革，應當隨著農村改革的發展，有計劃地實行向其他領域逐步過渡的拓廣戰略；

農村的立體開發和向改革縱深的拓廣，應當在負荷較輕、潛力較大、開發週期較短的地區實行重點開發的分區戰略；

這個戰略的指導思想是：搞活農村，促進城市，全面調整，重點突破，先易後難，由點及面。

這是一個從中國改革實踐總結，並對改革的整體性、關聯性、時序性、結構性與平衡性進行綜合評估的科學構想。「改革戰略」構想完成後，1982年10月，我們又兵分兩路進行實證。更讓我們喜悅的是，實證的結果說明我們的構想符合改革的客觀進程。11月初，趙紫陽、萬里聽了小強的彙報後，倒是給了很好的評價。趙紫陽提出了：「那把海南島交給你們搞試驗吧！」萬里則提出：「你們挑幾個人去擔任縣、市委書記吧！」但他們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個改革戰略的深刻涵義。其實，這個戰略有幾個重點：

第一是，從改革的實踐看，不是領導人想改什麼就能改什麼，而是在比較寬鬆的條件下，人們會選擇阻力小而收益大的領域先行改革。說明在一個失靈的大系統中，最先能夠改變的子系統，也是遵循「最小—最大」原理的。無論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的變革，除非有足夠的把握，決不能從攻堅開始。中國的農村改革首先是農民的選擇，有改革思想的領導人支持了這個改革，所以農村改革才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了最大的成功。

第二是，包產到戶使中國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但中國農村的平面墾殖潛力不大，想改變平面墾殖造成的「人增、地減、糧緊」的惡性循環，就必須實行農村生產結構、經濟關係、管理體制立體化。而這種立體開發，不僅在經濟上有全面緩解糧食壓力、增加農產品供給、鬆弛統購統銷

的意義；而且對改革也有戰略意義：一是在「包產到戶」基礎上進一步放寬政策、豐富農村經濟關係，二是建立綜合調控手段和多層次經濟管理體制，前者解決微觀效益，後者解決宏觀調控，「合題」則是農村的全面改革。

第三是，立體開發的過程，實際上是資源、技術、資金、勞動等生產要素合理配置的過程，也是種植、養殖、加工、運輸、貿易諸種經濟活動一體化的過程，更是適度規模經濟組織、合理的行政與經濟調控機制、有效的領導與管理體制形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鄉鎮企業的大量出現又進一步擴大了市場份額。若能順勢而為，大力扶持這些計劃外的市場因素，並加強縣級體制改革的力度，將會拓廣、演進成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改革。

第四是，應當在負荷較輕、潛力較大、開發週期較短的地區實行重點開發，仍然強調先易後難的改革原則。我們將中國劃分為五類區域：經濟重心區，近期緩解區，中期補償區，重點開發區和遠期開發區，提出「穩定全局，分區開發，重點突破」和「互相依托，交替『掩護』，逐步過渡」的方針。其實，也含有企圖改變人們總想通過「攻堅」，一舉奠定勝局的改革浮躁病。

第五是，必須意識到，中國的改革是一場持久戰。改革從大系統的薄弱環節入手、從震盪小的領域入手、從可使多數人得益處入手，才是成功之道。東歐改革凡從計劃體制入手者，沒有一個取得成功。原因就在於計劃體制一旦建立，一系列配套措施使之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還會產生許多既得利益者，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清醒地看到這一點，並不斷地另立體系，直至新體系強大到足以代替舊體系，這種「增新削舊，逐步過渡」的辦法，乃是使改革阻力減少到最小限度的可行方式。

假設這個改革戰略能夠實行，5年到10年，中國改革的局面一定會好上許多。但歷史不能假設，一旦改革者陷入和維護計劃體制者的不斷糾纏，從東歐改革的教訓來看，往往是改革者敗北。因為反對改革者，總會以「社會主義保衛者」的名義，利用權勢和傳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將改革者逐一清洗。當然，改革的大門一旦打開，再也難於回到舊體制，但是改革就會陷入久拖不決的局面。

不幸的是，中國確實又錯過了這個百年不遇的改革良機。人們被牽著鼻子應付眼前的事變，領導人則忙於日常事務，為改革前景進行謀劃的人少之又少。我和維凌去找德平，他已經調到中央整黨辦公室，想和他談談我們的「改革戰略」，可惜他腦子裏裝滿了「整黨」，不斷強調「整黨」的

重要性。我說，「包產到戶」以後，農村的黨群關係不是明顯好轉了嗎？什麼叫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就是證明。如果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黨風也會從根本上發生變化。最後，我們誰也沒說服誰，分別時都說看實踐發展吧。

5-5 莫干山會議：「價格雙軌制」的提出

1984年3月回到北京以後，我一邊養病、一邊工作。只有見到剛上學的丫丫，才能給人一種純真的快樂，帶她玩是唯一讓人樂以忘憂的事情。但和吳琰的關係似乎很難修復，幾次提到離婚雙方又都下不了決心。當時熱情的年青人，被農村改革所取得的成績所鼓舞，都躍躍欲試想一展身手，但大多缺少長遠的思考。

從1982年2月，中央書記處要求提拔青年人以後，一大批有才幹的青年人在各個領域中嶄露頭角。1984年5月，溫元凱^[351]在安徽發起組織了一個《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和中國改革研討會》。在改革熱潮的推動下，由《經濟日報》安崗^[352]、丁望^[353]等老報人支持，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張鋼等人斡旋了8家新聞單位和浙江社科院、經濟中心聯合發起，於9月召開了莫干山會議。

這次會議叫《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浙江莫干山召開，到會180多人。除了少數老年人，都是從全國選來的中青年學者，會議開的生動活潑、不落俗套，無論誰想討論什麼問題，都可以經會議秘書組同意「掛牌」，與會人員雖有分組，但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參加討論。會上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從早到晚，異常活躍。我本因病不想參加這個會，架不住朋友們一再相邀，也就上了莫干山。

大家早就聽說，由於受農村改革的鼓舞，中央領導人想加快城市改革。當時參與東歐改革的專家，到中國作報告都提出：價格改革是個關鍵。顯然，中央急需一個可行的價格改革方案。所以，會議一開始，對價格改革策略的爭論，就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國家體改委的徐景安和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首先提出了「放」的意見；剛從武漢大學畢業到國家物價總局工作的田源，則提出了「調」的觀點。兩種意見旗鼓相當，爭執不下。

[351] 溫元凱 (1946-)，江蘇無錫人。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系主任，80年代的改革鼓動家。

[352] 安崗 (1918-)，天津人。為《經濟日報》創辦人、總編輯。

[353] 丁望 (1926-)，江蘇南通人。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時當了右派，時任《經濟日報》副總編。

在與會者心目中，如果在價格問題上能有所貢獻，會議將取得成功。在羅小朋主持的一個討論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華生、何家成傾向「放」的意見，但認識到放開價格，可能帶來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的問題。他們提出了放開價格，同時實行工資指數化的意見。羅小朋指出：中國沒有要素市場，一下子放開價格不行；但調整計劃價格也不行，形不成市場；妥當的做法，「只有搞雙軌制」。

當晚，華生和社科院研究生張少傑、高梁、何家成、張學軍等人，一起研究提出了「放調結合」的思路。這個思路得到了多數人的贊同，由徐景安執筆寫了《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後來，華生的彙報打動了國務委員張勁夫，他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趙紫陽也批示說：「『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震動，又可解決問題。」

其實，正像包產到戶是農民的創造，雙軌價格早就在中國一直存在。前文提到過，1971年我和小朋、飛欣在河南插隊時，就發現了農村的三種價格——生產隊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價格」、農貿市場上下浮動的「市場經濟價格」和國家制定的「社會主義價格」。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後，生產隊的平均主義價格不存在了，但「市場價格」和「計劃價格」始終並存。農民在農貿市場交易按市場價格，賣產品給國家按計劃價格。

中國的計劃體制雖然控制很嚴，但因為中國區域廣大、人口眾多，卻從來沒有實現過統一的計劃價格。除了農村的市場價格，即使在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內部，也存在著轉讓價格和物物交換價格。1978年，為了鼓勵農民多生產糧食，中央不僅把糧食統購價格提高了20%，而且把農民超售的部分再加價50%。這實際就是利用了客觀上存在的雙軌價格調節作用。

發展組之所以在1982年，吸納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畢業的宋國青，就因為他1981年寫了《農村稅收及其他勞動扣除與擇優分配》^{【354】}一文。本來，杜潤生答應調他到農委工作，後來又變卦了，我們就通過萬里把他調來了。他最早揭示了計劃體制扭曲價格體制、特別是用統購統銷政策對農民徵收實物稅，以支持工業化的本質。並提出了用貨幣稅替代強制低價收購，改革統購統銷制度的方向。

【354】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1年卷，第419-428頁。

經過 1982 年到 1983 年的討論，宋國青「統購改稅」的改革思路，得到了發展組內部的認同。1984 年春，在杜潤生、高揚^{【355】}支持下，發展組獲得了在河北省稿城、寧晉進行糧食價格改革試點的機會。宋國青是這次改革試點的主要設計者，羅小朋則擔任試點小組的負責人。稿城是試行較穩妥的「差價稅」改革方案，寧晉則試行自由價格的改革試驗。詳見《關於統購改稅試點進行情況的報告》^{【356】}。

羅小朋在莫干山會議上，之所以會第一個提出「只有搞雙軌制」的意見，乃是來自「發展組」的集體探索，而非靈機一動的奇想。後來，「價格雙軌制」的實行，對改革計劃體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價格雙軌制」也使一些人，從價差中大撈好處。當時還沒想到：一要建設有規範的批發市場，二要把差價收入分配好。如果當時就能想出這些避免實行「價格雙軌制」弊端的辦法，也許改革的進程就會順利多了。

莫干山會議使一批青年學者登上了中國改革的舞台。會議文件《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紀要》^{【357】}，分八個部分：一、關於價格改革問題，二、關於工業企業實行自負盈虧問題，三、關於發揮中心城市多功能問題，四、關於沿海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問題，五、關於金融體制改革問題，六、關於發展和管理股份經濟問題，七、關於農村產業結構變動問題，八、關於我國現階段政府經濟職能問題。

這期間，我收到了小凱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寄來的信，說他在 1982 年被該校教授鄒至莊錄取為經濟系博士生，1983 年 9 月已到該校就讀，希望繼續合作。湘魯擔任的總理秘書的職務將由李勇接任，他計劃到基層任職，詢問我應該如何選擇？我建議他：一是去一個經濟關係比較豐富的市級縣當二把手，二是到一個大、中型企業當二把手，這樣既可以得到實際鍛煉，又不必承擔過重的責任。後來，他選擇到中國海洋石油公司當了副總裁。

5-6 全面經濟改革的起步：承認「商品經濟」

回到北京，我去拜訪胡耀邦，想把一些關於改革的思考向他彙報一下。他家正有幾個老同志在座，他們擔心農村出現兩極分化。耀邦說：「過去農民那麼窮，兩億人吃不飽飯！農村搞了包產到戶，農民有飯吃了，城

【355】高揚 (1909-2009)，遼寧遼陽人。時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356】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4 年卷，第 143-161 頁。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1984 年卷，第 143-161 頁。

【357】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編：《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1985 年卷，第 32-43 頁。

裏人日子也比過去好了。首先，我們要解決有沒有的問題，什麼都沒有，拿什麼分配？只會少數人搞點特權，多吃多佔。農民吃飽飯了，有多餘產品了，到集市去交換，市場才會豐富起來。」

他接著說：「農民『綁著窮』了30年，那時沒有東西，怎麼公平分配？平均主義是農業社會主義的作法。現在，農民剛吃飽，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社會主義是要講公平的。有了，就要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公平問題要關注、要研究，過個七、八年再大抓。現在抓會影響效率。」說著，說著，他站起來指著我說：「陳一諮，啊，這是我們的青年農村問題專家，給大家說幾句。」

我說：「耀邦說的很對。現在農民收入比改革前增長了2.8倍，但一年收入也就480多元，還有8,000萬人不得溫飽。城鄉收入差距從3.3比1，縮小到2.4比1。這5年的進步超過了30年！富一些的農民，多數在沿海省份和大城市郊區，佔農民總數不到1/10。其中，靠囤積倒賣、欺行霸市、非法交易的也就千分之六、七，這些人的問題要靠制定合理的政策去解決。」

耀邦又接著說：「我說同志們，中央3年連著發了3個1號文件，就是要解決農村發展中的障礙，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什麼歷史上會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先安定農民嘛！8億農民有了積極性，一人一年多創造100元財富，全國就增加800個億啊！」他喝了一口茶，拿起桌上一本書，說：「我最近看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寫的《激盪的百年史》，很受啟發，同志們不妨看一看。」

耀邦把書遞給大家傳看，說：「吉田茂在書中說：『日本國民從遵奉某種道德到普遍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日本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一個根本性變化。』這句話很值得我們思考。人人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利益，社會怎麼發展？怎麼進步？我們過去在這方面存在很大的問題。」耀邦的善於學習，在於他能把學習的東西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一點特別令人敬佩。

胡耀邦、趙紫陽、萬里主政的20世紀80年代，是中共建國以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黃金時期。在胡耀邦發起「真理標準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萬里在安徽發動了農村改革，趙紫陽在四川則同時進行了農村改革和經濟改革的實驗。1980年，萬里、趙紫陽先後調到中央，形成了「胡趙萬」體制。耀邦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紫陽第二」，老百姓也唱出了「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

趙紫陽主政四川，首先改變了作為「政治任務」強迫農民種三季稻的瞎指揮，說：「水路不通走旱路」，「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連續兩年使四川增產糧食 100 億斤；又改變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極左作法，鼓勵農民種自留地、種樹、種竹、種花果，恢復農貿市場；實驗聯產到勞、專業承包，並默認了包產到戶。於此同時，他最早帶頭探索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放權、讓利、減稅、鬆綁」，取得了良好效績。但他離開四川時，對農村改革提出「四專一聯，到此止步」（指：專業隊、專業組、專業戶、專業人和聯產承包），沒有公開支持包產到戶。

在胡耀邦、趙紫陽支持下，萬里主持制定了農村改革的 5 個「1 號文件」；在胡耀邦、萬里支持下，趙紫陽主持了對國營企業的擴大自主權、減稅讓利、利改稅、承包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還特別強調打通城鄉市場為以後的民營經濟大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調動老百姓的積極性，找到使老百姓得到實惠的辦法。當時鄧小平是支持他們進行經濟改革的，陳雲則不時的掣肘。

從 1983 年到 1984 年，中國對改革方向有一場大爭論。爭論的焦點是：中國當時的經濟性質是不是商品經濟？要不要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以陳雲、李先念、姚依林為代表的一批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是計劃經濟，並在政治上佔據「正統」地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觀點，則不斷在會議和報刊上受到批判。現實的發展和理論的衝突十分尖銳。

趙紫陽運用他的政治智慧，巧妙地解決了這個難題。他先讓馬洪搞了一個報告《關於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再思考》，投石問路送給一些老同志，沒有人反對。接著，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行討論。他問：「理論上有沒有問題？」楊啟先說：「理論上能站得住。」他又問：「和憲法有沒有矛盾？」鄭必堅說：「沒有矛盾。」他再問鄧力群：「老鄧，你怎麼看？」鄧力群說：「我 1979 年就贊成商品經濟。」

1984 年 9 月 9 日，趙紫陽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寫信，建議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概括為以下四層意思：一、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二、通過市場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產品和服務業；三、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今後應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四、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1 日、12 日，鄧小平、陳雲先後表示同意。

趙紫陽這封信看似保守，但他是用傳統思想包裝新思想，將挨過批判的說法「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當作社會主義異端的「商品經濟」，寫進了黨的決議。這在當時的中國實在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一次，馬洪問趙紫陽：「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什麼不同？」趙紫陽說：「就實際工作而言，沒有差別。用商品經濟，是為了減少振動，使更多人容易接受。」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定》，承認「商品經濟不可逾越」，並將「商品經濟」寫入黨的決議，是一次重大的理論突破。經過三十五年的曲折教訓，承認商品經濟是一個客觀存在，我們才回到人類的基本常識，多麼的不容易呵！是的，承認「商品經濟」既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全面進展清除了一個重大的理論障礙，也為商品經濟在中國理直氣壯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

5-7 與趙紫陽到廣東之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984年11月中旬，總理辦公室秘書李勇給我打電話說：「紫陽同志打算後天去廣東，希望你同行，一路上可以聊聊。不知你身體行不行？」我說：「還可以吧！」李勇說：「那就定下來。後天上午8點中央辦公廳派車接你。」我找小強、英洵、維凌議了一下，大家從改革的宏觀目標、市場成長、鄉鎮企業、縣級改革、企業改革、價格改革、對外開放、發展與穩定等方面，各自談了看法。

第三天早晨差10分9點，我到了西苑機場。機場上已經到的人有，國務院副秘書長李灝^[358]、商業部副部長姜習^[359]和總理辦公室白美清^[360]、李勇。過了不到5分鐘，趙紫陽和夫人梁伯琪^[361]到了。看他滿面笑容地走過來，頭上竟長的是棕紅色頭髮，令人驚奇。我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和他接觸，不由得有些拘束。不像我和胡耀邦1957年在第三次團代會就認識了，文革中又常去他家，什麼話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

趙紫陽見到我，笑著伸出手來說：「啊，陳一諮，陳一諮！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久仰大名，如雷貫耳！」握著右手，又把左手放在上邊，說：「久仰大名，如雷貫耳！」說得我不好意思起來，可拘束一下也消失了。

[358] 李灝（1926-），廣東茂名人。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後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深圳市長。

[359] 姜習（1923-），上海人。時任商業部副部長。

[360] 白美清（1935-），四川雙流人。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後任商業部副部長。

[361] 梁伯琪（1918-），河南內黃人。趙紫陽夫人。

上了專機以後，他讓我坐在對面，問我：「身體恢復得怎麼樣？怎麼會得那麼重的病？」我向他述說了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挨了一百多場鬥、三次差點被打死的經歷。他說：「你一個小青年也受了這麼多罪啊！」

我接著又說了在農村和基層 10 年，深感極左破壞，農民活得不像人。回京後，組織「發展組」推動農村改革，希望農民過上好日子。為抓住有利時機，使改革出現不可逆轉的局面，日夜工作而不注意休息，結果「飛車」了，得了疲勞綜合症中晚期，差一點兒死掉，已經休息了一年多。紫陽說：「你剛 40 多歲，還年富力強嘛！」我說：「我是年富而力不強啦！」他笑著說：「你還是年富力強！要工作好，也要身體好，來日方長！」

李灝、姜習坐在我兩邊，還沒怎麼說話，我把話停了下來。紫陽又接著說：「你們的很多報告我看過，很好！是從實際中來的。耀邦、萬里、力群都對你有很高的評價。早就想找你談談，可惜你病了。我還記得，你們 1982 年在遼寧、山西的調查，就是與眾不同。你們能從實際出發，從發展的、變動的趨勢提出問題、得出結論。你們的調查對政治局的決策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很多部門搞了不少計劃、規劃都不成功，原因就在於是主觀的想像，不是從實際出發的。」

紫陽懇切地說：「你們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現在改革的重點進入了城市，你能不能把一批上過山、下過鄉，對中國社會有深入瞭解、又學了各種知識、眼界比較開闊的年輕人組織起來，為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服務，為國務院和中央決策提供依據？」我感到力不從心，就說：「我知識不夠，身體也不行，恐怕難以勝任！」他笑笑說：「誰是都學會了才幹呢？一邊幹一邊學嘛！我比你大 20 多歲，還邊幹邊學呢！」

紫陽環顧大家說：「改革重點進入了城市，要比農村改革複雜多了。剛剛開過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確認了商品經濟不可逾越，是個很大的進步。問題是怎麼搞？大家都沒有經驗。經濟改革的決定還指出，城市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搞活企業，關鍵是改革價格體系，怎麼搞活？怎麼改革？二者究竟是什麼關係？怎麼配合？」誰也沒說話。他又說：「一批年輕人在莫干山開了個會，提出了 7 個報告，有的意見不一定可行，但思路很開闊，特別是關於價格改革的意見很有價值。一諮，說說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確實，9 月在莫干山會議上，青年學者就價格改革、企業改革、對外開放、金融改革、股份經濟、農村改革、政府職能等問題，提出了報告。但我自認還是個「門外漢」，不敢輕易回答。看了看李灝、姜習和白美清，他們似乎都鼓勵我說。又看看桌子上的「熊貓煙」，真想抽一口，以便理

理思緒。趙紫陽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笑著說：「想抽煙吧？抽吧，抽吧！」就把那盒煙打開了。我抽了一口煙，馬上靈感來了，就大膽地說：

「莫干山會議上，年青人思路活躍，討論了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價格改革問題爭論的最激烈，大體上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比較激進，以張維迎為代表，認為價格必須全面放開，不放開價格不能形成市場機制。從理論上說沒有錯，但具體操作則可行性不大。提出這種意見的青年學者，可能學了市場經濟學，但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還瞭解不夠。第二種意見過於穩健，以田源為代表，認為當前只能做價格調整，調的比價比較合理以後，才能進行價格改革，問題在於人為的價格調整永遠不可能調的『合理』，調出價格機制。」

我接著說：「第三種意見被會議上多數人接受，以華生、張少傑、高梁為代表，認為能放開的價格必須放開，以逐步形成市場機制；放不開的價格則進行行政指令性調整，叫做『放調結合，以放為主』。這種辦法可以逐步擴大市場份額，使指令性計劃的原材料和產品比重逐步縮小，最後達到大部分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問題可能出在有些人會利用兩種差價搞投機，但不可能有完美的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

我繼續說：「價格改革有三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價格水平問題，調整可以解決短期問題，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二是價格機制問題，只能在市場供求過程中形成。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說，價格在計劃體制下只是物物交換的計量符號，而不是市場條件下靈敏有效的調節信號，問題就在於我們還沒有形成價格機制的市場，而價格不放開也就永遠不會出現市場。三是價格管理問題，何者放、何者調，放多少、調多少，管理得當就會在計劃價格過渡到市場價格的過程中少出問題。」

我一下說了半個多小時，紫陽很認真地聽著。這時，他站了起來，以堅定的語氣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看著他那滿頭的紅髮和毅然的眼神，我不由從心裏產生了一股敬意。機艙內大家誰都沒有說話，我點起第三支煙，等他說下去。「改革總得過價格這一關，不付出代價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次把價格放開，也許會天下大亂，我下台，但三、五年市場形成了，人民會紀念我！」他在我心裏的形象一下高大了起來。

紫陽看了看大家，說：「當然，個人是無所謂的。但這種做法太冒險，國家和人民受的損失可能會太大。『放調結合』，『調放結合』，這個路子可能會行得通。」說著說著，他坐了下來。一個半小時，我們乘坐的三叉戟專機就到了廣州。下機時，紫陽專門讓李勇把一條「熊貓煙」送給了我。

入住廣州小島賓館以後，那條「熊貓煙」當然就被大家一人兩盒瓜分了。要知道，這種煙是專供中央領導的，市場上根本買不到。

5-8 與趙紫陽到廣東之二：「不改革，中國沒有出路！」

在廣州，紫陽考察了中外合資的花園飯店和一家國營飯店，兩家飯店經營水平的差距之大令人難以相信。國營飯店的書記和經理向總理傾倒了一肚子的苦水，雖說擴大了自主權，但上下左右的各條繩索把他們捆綁的沒有辦法。紫陽感慨地說：「這兩個飯店的差距就是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差距呵！看來，學外國的先進經驗，請外國專家進來搞些『以夷制華』，才能幫我們改掉那些陳規陋習。」

在佛山聽了市委書記于飛^[362]的彙報，考察了幾家「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企業。晚餐時，我坐在了第二桌。紫陽說：「一諮，坐到我這兒來！」我坐到了他旁邊。他說：「我給大家介紹，陳一諮！是我們年輕的經濟學家，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要知道，若沒有10年文革的悲劇，就沒有今天的改革開放。我們是痛定思痛，才改弦更張啊。十二屆三中全會，確認了商品經濟的不可逾越。認識這麼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經歷了35年。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今後路子怎麼走？還得靠大家探索。不改革，中國是沒有出路的！」

而後到江門，精明、幹練的市長易振球^[363]作了彙報。途經中山，拜訪了翠亨村中山先生故居和紀念館。有「梁膽大」之稱的市委書記梁廣大^[364]帶我們參觀了珠海，短短的5年時間，珠海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看來紫陽心情很好，和這些老部下也真是親密無間，他戲謔地說：梁廣大為什麼叫「梁膽大」，就是因為他「不學而有術，才敢作敢為！」。深圳市委書記梁湘^[365]來接我們了，紫陽笑著說：我們的「開荒牛」來了！

從珠海到深圳的船上，我有意坐得遠一點，以便紫陽和林若^[366]、杜瑞芝^[367]、于飛、梁廣大、梁湘，這些他多年的老部下聊一聊。誰知船剛一

[362] 于飛 (1929-)，時任中共佛山市委書記，後任廣東省副省長。

[363] 易振球 (1946-)，江蘇常熟人。時任江門市市長，後任廣東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

[364] 梁廣大 (1935-)，廣東南海人。時任中共珠海市委書記兼珠海市長。

[365] 梁湘 (1919-1998)，廣東開平人。時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深圳市長，後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366] 林若 (1924-)，廣東潮安人。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367] 杜瑞芝 (1921-)，山西榆社人，時任廣東省農業委員會主任。

開，他就招手讓我過去，坐在他對面。他說：「你和你的朋友，你們那些年輕人，還有什麼想法？隨便談談。」我看他一路關心的問題，都是城市改革和對外開放。我本來一直想找機會再和他談談我們那個「改革戰略」，但現在似乎有些氣氛不宜，就說：「1980年，我們『發展組』搞了一個《中華振興百年設想》。」他很感興趣地聽著，我接著說：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研究，中國要有20年的調整，50年的起飛，30年的振興。到本世紀末，要建立起現代經濟制度的基礎和現代政治制度的框架，大體上先要進行五個系統的改革：一是經濟領導和管理系統；二是科教領導和管理系統；三是行政領導和管理系統；四是黨務領導和管理系統；五是文化領導和管理系統。」紫陽說：「啊，五大系統！」我還沒顧上說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政治系統和法律系統的改革，船已到岸。

在深圳參觀了兩天，先後看了赤灣石油碼頭、八卦嶺工業區、蛇口開發區、中航工貿中心電腦廠、香蜜湖、怡景花園和新園賓館。這裏的發展真是難得，到處是熱火朝天的建設。特別是袁庚^{【368】}主持的蛇口開發區，豎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牌激勵人心，又實行了一系列新辦法，包括幹部聘任制，讓人耳目一新。梁湘和袁庚的彙報不落俗套，生動地介紹了特區克服各種困難取得進展的過程及存在的問題。

離開前，紫陽向深圳和珠海的領導人說：「我們實行對外開放，就是要通過經濟特區、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地帶，把外引內聯、把沿海與內地的發展結合起來，使全國經濟振興、人民富裕。」他又形象的說：「特區是『兩個扇面，一個樞紐』，即對外對內的兩個扇面，而特區和開放城市居中起樞紐作用。」而後，他接見了從香港趕到深圳來的許家屯^{【369】}和胡應湘^{【370】}，並肯定了有爭議的港商胡應湘回國投資是「愛國行為」。

在台商、港商雲集的東莞，考察了幾家合資企業，又看了林則徐銷煙的虎門。回到廣州，第二天一早，紫陽招集隨行人員開會。他說：「大家談談看法。一諮，你先說！」我毫無準備，遲疑了一下，說：「一路行來，目不暇接。廣東發展快，變化大。問題是怎麼把『進口替代』轉變為『出口導向』。」似乎並沒有講清楚。還是白美清有經驗，只說了兩句話：「我看，廣東現在是，一能源短缺，二交通緊張。」就把主要問題說清楚了，令人佩服。

【368】袁庚（1917-）原名歐陽汝山，廣東寶安人。時任深圳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主任。

【369】許家屯（1916-），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370】胡應湘（1935-），廣東花都人。時任香港合和實業有限公司主席。

在回北京的飛機上，紫陽說：「我們有些老年人舊的東西多，不思進取，喜歡爭論，把他們養起來好了。年輕人樞樞少，敢說敢幹，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作用。但人才不要集中在一個單位，要分散在中央和國務院各個部門，這樣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探索解決問題的辦法。你覺得怎麼樣？」我沒有回答。他繼續說：「要用一種新的方式組織年輕人，讓他們能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你考慮考慮怎麼辦。」

紫陽又問我說：「我也組建了幾個新的部門，可一搞起來就又變的和舊機構差不多了，不知道為什麼？」我說：「可能目標是新的，但制度、規則、方法都還是舊的。」他思索了一下說：「有道理！那你能不能搞一個新的？」我仍然沒有回答。他又說：「北京那麼多年輕人的各種組織，你一夥，我一夥，相互還不服氣。怎麼好像都說你的好話？」我不好意思的說：「我不知道。我也沒什麼本事，就是見才則喜。」

紫陽高興地說：「會用人可是個大本事！記住，第一，要把一批年輕人組織起來，為改革開放服務；第二，人才不要集中在一個部門，要分散在各個部門。」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自認力不從心，很難作出回答。下飛機時，李勇和我說：「紫陽請你把各個領域對改革開放有見解的年輕人開一個名單，供他參考。」飛機上卸下了一大巴士各種禮物，都是廣東各方面送給紫陽的，他看都沒看，就說：「全部送到宋慶齡兒童基金會！」

第一次這麼近距離接觸趙紫陽，給我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中國有這麼睿智、開明、忘我的領導人，真是老百姓之福。三天以後，我給了紫陽一個 110 多人的名單，後來其中不少人，紫陽都找他們談過話，現在大部分人也還在中國的舞台上活躍著。但趙紫陽向我提出的兩個任務，我還在思考，下不了最後的決心。12 月初，體改委副主任鮑彤找我談話，希望我接手組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我仍然沒敢輕易答應。

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書記安志文^{【371】}誠懇地找我說：「紫陽幾次批評我和馬洪，說農村改革取得成功，青年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要注意多吸收年輕人的意見。你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貢獻，很多青年人都很佩服你。我想請你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希望你接受。」我說：「我剛生了一場大病，還沒有好，身體不行。再說，我的知識、能力也不夠，恐怕難以勝任。」他說：「你先考慮，考慮。」

【371】安志文 (1919-) 陝西子州人。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5-9 袁庚：「一諮啊，歡迎你到蛇口來工作！」

1985年剛過元旦，袁中印拿著他父親袁庚的邀請函到北京，請我去蛇口參加由他父親主持召開的一個研究「蛇口發展戰略」的討論會。再三推托不過，我只能去出席了。蛇口在深圳的南頭半島，建設的已經蔚然可觀。第一天晚上，袁庚就請我們在「光華輪」上吃飯，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辭，希望大家為蛇口的發展出謀劃策。剛和紫陽來過這裏，接觸中深感袁庚是一個敢作敢當、無私無畏的人。

袁庚1978年到香港任職招商局副董事長，痛感國家閉關自守帶來的落後，向中央遞交了《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提出「面向海外，衝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建議由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蛇口工業區。1979年7月這個中國第一個經濟開發區正式運作，他擔任了建設指揮部總指揮。

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了「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企業投資以外資為主，產品市場以出口為主」的方針，並立即著手建設碼頭、開發赤灣，使之後來成為很少受到國內經濟形勢變化影響的開發區。1981年他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對當時中國思想解放起了啟蒙的作用，也使蛇口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得到了飛速的發展。

同時，1980年他開始實行幹部擇優招聘制，並大膽起用了很有才氣的、民主牆時曾任《北京之春》主編的周為民，努力消弭官方和民間在意識形態上造成的裂痕。1983年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成立，他提出「領導幹部得票少就下台」，實行了公開的民主投票，將領導幹部的罷免權、監督權交給民眾，希圖改變對上搖尾、對下像使喚狗一樣的「官場狗文化」。他還提倡輿論監督，在創辦的《蛇口通訊》上鼓勵揭露弊端。

袁庚的所作所為令人敬佩。在研討會期間，他專門請我一起去洗桑拿，開門見山就說：「一諮啊，歡迎你到蛇口來工作！」我有些詫異。他很坦白地說：「我眼見68歲了，總想找一個年輕人接班。上次你和紫陽來以後，我瞭解了一下你的情況。你經受過不少磨難，又能在北京組織人推動改革，了不起！我這裏正需要你這樣的人，你有沒有興趣？」我說：「對您的信任，我很感謝。但我身體不好，恐怕難以勝任。」

袁庚說：「北京有什麼好？束縛那麼多。很多脫離實際的東西，都是北京的秀才想出來的。下邊就不同了，你看蛇口一個不毛之地，幾年就變了！你能來，不怕發揮不了你的才幹，只怕每天都會有學不完的東西、幹不完的事情。」我說：「我看，你們這兒能幹的年輕人不少，像周為民、喬

勝利、顧立基都不錯。」他說：「周為民確實不錯，能用他已經費了不少勁。但他們三個扛大樑都還不行。」

我說了紫陽上次到廣東時對我說的話，袁庚沉吟了。過了一會兒，他說：「北京太複雜，紫陽確實需要一批人多給他出好主意。可是俗話說『寧為雞首，不為牛後』，下邊風險還是小多了。」我說：「我再想想。」他說：「散會前，我還請你洗桑拿，再聊聊。」第二天，我和維凌商議，他說：「蛇口是個幹事業的地方，我相信你來一定可以搞好。但北京更需要你，到蛇口幹可以樹個樣板，可只有『影響決策』才能『改變中國』呀！」

我說：「紫陽和我提了三次，鮑彤、志文也都先後和我談了。我之以下不了決心，一是身體不行，二是高處不勝寒啊。」維凌說：「想當年，我們都有為國為民『馬革裹屍』的雄心，可惜沒有機會。我現在編書是無可奈何，下一步準備到國外去發展。姿先生這五、六年貢獻不小，當然犧牲也很大。但歷史不總是會給你機會的，一旦放棄可能會悔恨終生。我勸你義不容辭地接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嘛！」

我認真地說：「我下不了決心，沒有絲毫個人得失的考慮，確實是覺得自己力所難及。你想想看，我要是進入舊系統，也就沒有了生命力；若在舊系統內建立新系統，則是很難存活的；除非另立的新系統，一個個都成長了起來，足以與舊系統對峙，並逐步改變整個舊系統。可惜咱們三年前研究的『改革戰略』沒能實施，十分遺憾。不能順應自然，強行攻堅，急於求成，只能讓自己演悲劇呵！」

維凌說：「我們這一生注定是要演悲劇的。只不過文革是被動的演，現在是主動的演。總不能不盡人事，『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嘛！」我說：「歷史給每個人提供的空間是有限的，從來人們都很難做想做的事，只能做能做的事，循序漸進才能成功呵。難道你忘了，我們和小凱討論的『應該』和『可能』的問題嗎？我生病以後，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條件不成熟，累死也沒有用啊。」

這時，維凌帶來一個朋友叫姬鵬，他原是文革時清華「四一四」的頭頭，現在廣東安全局辦的一家公司當總裁，局裏管事的老太太對他特別好，可一個朋友又推薦他到樸方辦的康華去當副總裁。鮑魚熊掌兩難取，請教我如何選擇？我說：「你這邊不辭，在康華掛一個副總裁，到廣州辦分公司，不就兼顧了嗎？」第三天，他又來了，高興地說：「老陳，成了！」一下送了我兩盒電子錶，我就一人一塊送給了參加會議的每個人。

維凌真是個社會活動家，到處是他認識的朋友，短短幾天就給我介紹了七、八個。其中，一個叫梁恆的，有著和中國同一代人的共同經歷，但

他在湖南師範學院讀書時，和美國籍的英文老師夏竹麗戀愛了，幸運的是由鄧小平批准了他們的婚姻。他和夏竹麗到美國以後，寫了一本書叫《革命之子》，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維凌帶他來拜訪我，請教中國改革的問題，我向他作了介紹，他寫在後來出版的《浩劫之後》一書上。

劉青峰告訴我，北大中文系同學黃虹堅，在廣州當記者，想來看我可又不敢來。我說歡迎她來，但直到會議結束，她都沒來。青峰後來說：「她不好意思見你。」我說：「你告訴她，那時她年輕，是響應毛主席號召。過去的事忘了吧。」原來她那時是新北大公社的一個狂熱分子，鬥我鬥的最積極，又堅決主張開除我黨籍，是中文系有名的大左派。不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散會前一天晚餐後，袁庚又請我洗桑拿。我說：「袁董，您看，人本來就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可我一起起河南農民的慘狀，就寢食難安。1979年順德的老農和我說：『30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講話』。六年過去了，變化很大。但中國離一個現代化社會還很遠。謝謝您的信任，北京雖然風險大，也許我還可以作些事。說不定哪一天，我會來投奔您。」袁庚誠摯地握住我的手，說：「那好！隨時歡迎你。」

5-10 思考怎麼辦，告別鄧力群

回到北京，小強和南風幾次來找我。他們說：「老陳，你老說你不行，那你說誰行？我們數來數去，還就是你最適。」我提了幾個人，都被他們一一否決了。小強說：「岐山和我說，『就靠在農村改革中的貢獻，老陳後半輩子，什麼都不幹，也不愁吃不愁喝嘍！』。我和他說，老陳可不是這號人。老陳啊，哪怕我們將來寫《多餘的話》也值啦！」我說：「讓我再想想。」

其實，我一直在進行著天人交戰：幹吧，風險實在太大，自己的知識、身體又都不勝任；不幹吧，確實會錯過一次難得的機會。我和小強、南風說：「那你們先幫我一個忙，我要先分析一下有關研究所的各種資料。國外找三、五家，像美國的蘭德公司^[372]、布魯金斯學會^[373]，英國的倫敦

[372] 蘭德公司 (RAND)，美國著名智庫。係一通過慈善、教育、科技促進美國公眾福利和提高社會安全的非盈利組織，在發展系統分析方面卓有成就。

[373] 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著名智庫。其歷史之久遠、研究之深入被稱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庫」，為研究公共政策的非盈利組織。

戰略研究所^[374]，日本的野村證券研究所^[375]，國內再找幾家搞的比較好的研究所。這樣，作個比較分析，以免抓不住頭緒。」他們高興地走了。

關門夜以繼日地研究了幾天，我感覺確實是「隔行不隔理」。任何組織不管大小，都要面對「現狀、問題和前景」，解決好「事權、人權和財權」問題，而一個好的研究組織則需要有超前的、創造的研究能力。目前國內的大多數研究所，存在著「自主權」問題、「大鍋飯」問題和「行政化」問題。政府部門的「研究室」大多是完成「交辦任務」，科研部門的「研究所」則大多是進行「理論研究」，就很難出能服務決策的優秀研究成果。

志文和鮑彤又找我談，我說：「若一定讓我幹，我希望由我們自行決定研究課題、人事安排和資金使用，也就是要有『研究、人事、財務的自主權』。否則，一切管的死死的，就會又變成一個官僚機構。而且，我身體不好，目前只能半天上班。」他們都答應了，讓我盡快寫一個組建計劃。我和小強說：「根據我的研究，這個研究所要搞好，一要有明確而有限的目標；二要有科學而合理的結構；三要有可行而有效的規則；四要有配備齊全的人才；五要有起碼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六要有熔爐式的工作環境。」

小強說：「我說你一定行，怎麼樣？除了你，誰能一下拿出這麼一套意見！不過，一個難題是為改革實踐服務，課題、人員、結構也就會不斷變動，和研究的連續性會有矛盾。」我說：「那肯定，但我們可以想法以不變應萬變。現在，我們需要立即給體改委寫一個『組建計劃』。我想，一是目標和任務，二是機構和人員，三是問題和建議。我們先想一想，明天寫出來，如何？」小強痛快地答應了。

第二天，我和小強寫了給體改委的報告。這時，英洵說他父親生病住院了，我立即到北京醫院去探望。我覺得自己對鄧力群的感情很複雜，既覺得很親近，又覺得很遙遠。

為什麼我會覺得和他很親近呢？從1974年春節第一次見面，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有肩膀、敢擔待的憂國憂民的可敬的前輩。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的無所畏懼讓我從心裏欽佩；「四人幫」垮台後，他帶頭反對「兩個凡是」，為撥亂反正作出了貢獻；1978年他寫的《訪日歸來的思索》給人們留下了開明的形象；1979年支持「郭崇毅上書」、支持農村改革；1980年支持發展組，沒有他的支持，發展組幾乎難以生存。

[374] 倫敦戰略研究所，英國著名智庫。以研究安全、社會、經濟問題為主。

[375] 野村綜合研究所，日本著名智庫。研究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情勢，被稱為日本第一個「現代思想庫」。

特別是，我每次從農村回北京，和他談起農民的苦況，他眼圈都會含淚，令人感動。他也對我有恩，1978年我給胡耀邦寫信，吳琰請他轉送，他二話不說，就親自去找了胡耀邦。當然，我能調到社科院農經所是胡耀邦批示的，但若沒有鄧力群的幫助也不會那麼順利。後來，從發展組籌備到成立、到作出貢獻，再到我生病休息，每遇到問題需要解決，他都毫不猶豫的給予幫助，不像杜潤生什麼實質問題都沒有幫我們解決過。

2006年我在哈佛，看到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該書說我「標榜他是由胡耀邦調回北京的。那是胡扯。他調回北京是我向中央組織部提出的。當然，徵得胡耀邦同志同意是事實。當時主要是想把這個小組搞大一些。後來小組發展到三四十人。」我想，可能是「六四」後，他想撇清與我的關係才這麼寫。一者，我給胡耀邦的信，中組部會有存檔，一查便知；二者，「這個小組」顯然是指「發展組」，這是兩年後才有的事。

那麼，為什麼他會「向中央組織部提出」調我回北京呢？我想，多次的交流，首先他覺得我是個人才，其次同情我文革的遭遇，第三感謝我對英淘兄弟般的關照。「六四」後這麼說可以理解，但畸形的制度把有「罕見人格」的「硬骨頭」也如此扭曲，實在令人唏噓。海外不少人把他說成「左王」，有一定道理，但卻犯了絕對化的毛病。他對理想追求的執著，連鄧小平都說他是「湖南的強驢子」，而且他為官清廉，不謀私利。

為什麼我又會覺得和他很遙遠呢？可能是觀念和追求的不同使我和他的距離越拉越遠。他確實讀了不少馬列的書，但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基本還是停留在斯大林模式上；他雖然支持包產到戶，但腦子裏還始終想著集體化；他對「四人幫」的破壞痛心疾首，但一直堅持「社會主義是完善，而不是改革的問題」；他對不同意見很難容忍，動不動就上綱上線；他主張「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傷了不少人。

發展組籌備時，我去爭取他的支持。他確實支持，但反對用「改革」這個詞，還嚴肅地和我說：「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往往是從『字眼』上開始的！」我心裏暗想，他總是「拿本本來」衡量事情，毛主席不是說過「從本本上討生活的共產黨員一批批成了反革命」嗎？他恐怕早晚會演悲劇。我深感他是一個理想的教條主義者，不像杜潤生是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其實他對「包產到戶」的支持比杜潤生堅決的多。

鄧力群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我說：「鄧叔叔，您多保重。紫陽、志文、鮑彤和我談，要我去組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他說：「我知道了。你好好幹！」我說：「我覺得，自己的能力和身體都適應不了。」他說：「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認真學習陳雲同志的經濟思想，

就可以搞好！有什麼問題，可以找周泰和、詹武，他們都在體改委。」他說的這兩位，曾經當過陳雲、任弼時的秘書。

我說：「感謝這些年您對我的幫助。臨走，我想和您說，像『清除精神污染』這一類事，不得人心，對您的傷害很大。我這可是逆耳之言，但請您考慮。」他歎了一口氣，說：「我也是身不由己啊，上邊讓搞的，我不能不搞。」我說：「像意識形態的爭論，盡可能緩和和一些恐怕比較恰當。」他沒有再說話。我與他告別有一種今後永遠可能分道揚鑣了的感覺。但我認為自己無愧，總不能因私情而忘公義啊！我為鄧叔叔深感惋惜，他如果主管經濟改革，也可能會是另一番天地，但人的選擇往往是身不由己的。

5-11 組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我又能有些什麼選擇呢？《左傳》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是立功，其次是立言，雖久不廢。」中國的現實給了我們改變這種不合理制度的機會。在各種機會中，目前還是只有「影響決策」，才能有效「改變中國」。農村改革的進展，經濟特區的建立，思想理論的活躍，都給人們帶來了希望。正像維凌所說，「英雄末路」才不能不「棄業從文」。那麼，怎樣選擇才能最有效地改變中國的不合理制度呢？

一是繼續從事農村改革。如果我們的「改革戰略」能夠實施，大力促進鄉鎮企業的成長，使之所佔市場份額逐步擴大；大力抓緊縣級體制綜合改革，為全局的經濟、政治改革打好基礎；一旦水到渠成，計劃體制、一黨專政這個「堅城」將會逐步改變。但目前領導人和社會精英的心思都轉移了，進一步的農村改革幾乎已經不是人們關注的熱點。我若堅持下去，只會是曠日持久而難見成效。

二是到基層任職磨練。萬里在 1982 年就想讓我到地方任一個市長，我之所以沒有去就是因為在基層的 10 年，深感即使你可以把一個地區搞好，上邊政局一變下邊一點辦法也沒有。如果想當官，上邊讓你到基層任職，不出幾年就會把你提拔起來，可我的志向又不在當官，只想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上人的日子。袁庚的蛇口開發區是個很誘人的地方，我之所以沒有答應去那裏，也是從全局考慮的。

三是為經濟改革出謀劃策。這個選擇雖然艱難、甚至凶險，但也不是不可為的，還是有一定的揮灑空間，說不定會在夾縫中走出一條路來。既然領導人和青年人都對我抱著希望，也不妨試試看。俗話說「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我也只能「當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了。再說，

還有一批共同在「發展組」幹過幾年的朋友，大家對多學科、高層次的系統性綜合研究，而後形成比較大的戰略對策，已經具有一定的實際經驗。

鮑彤提出，要把體改所辦成「既不同於以完成『交辦任務』為主的行政部門，也不同於一般『理論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而是辦成「緊密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服務的有創造性的和超前研究能力的研究機構」。我和小強討論：第一年「制定方針，摸索路數」，第二年「務色人才，形成架構」，第三年「建立制度，奠定格局」，決心三年內將體改所辦成「國內外第一流的研究所」。我送到體改委的「組建計劃」很快就批准了。

1985年中，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任命我為體改委委員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任命王小強、徐景安為副所長。1984年中，體改委就決定成立體改所，高尚全^[376]擔任所長不久，他為人開明、穩重，正摸索研究所該怎麼辦。但為了更好地發揮青年人的作用，才又找了我來。體改所行政上隸屬於國家體改委，但因為當時體改委領導人趙紫陽、安志文、鮑彤的開明，體改所從組建開始，即擁有其他研究機構所沒有的「研究、人事、財務」自主權，也就能發揮出其他研究機構難以發揮的活力。

體改所能夠擁有「研究、人事、財務」的自主權，在當時的國務院系統是破例的。長期實行一黨體制和計劃經濟的中國，任何下級部門的活動都需要經過上級部門的批准。為何體改所剛組建就能得到其他研究部門沒有的自主權呢？一者可能是前幾年「發展組」不斷提供第一手真實的、農村改革進展和問題的訊息，對決策有所裨益；二者改革重點進入城市經濟體制以後，利益關係錯綜複雜，需要有一個和部門、地方沒有利害糾纏的研究部門作客觀評估；三者需要一批條條框框少、能深知下情、敢向上直言的年輕改革者。

在送交體改委的體改所「組建計劃」中，我將體改所的「研究目標」確定為三句話：第一句是「依托本所研究力量，廣泛聯繫社會研究人員，特別是組織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二句是「對我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中近期重大戰略問題，進行綜合研究」，第三句是「為中央、國務院和委領導提供對策諮詢意見」。這樣，就把趙紫陽提出的兩個任務都包含在內了。

研究任務則有 10 條：(1) 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形勢的綜合研究；(2) 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研究，如：價格、金融體制改革的研究，計劃、物資體制改革的研究，產業結構與進出口戰略的研究，企業行為與政企關係的

[376] 高尚全 (1929-)，上海嘉定人。後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為中國著名經濟改革策略家。

研究，各地經濟發展與改革經驗的研究等；(3) 現行政策分析與儲備對策研究；(4) 與經濟發展和改革有關社會問題研究；(5) 有關國家經濟發展和改革動向研究；(6) 經濟發展和改革的綜合理論問題研究；(7) 國內外有關情報信息的收集與整理；(8) 編輯出版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刊物；(9) 組織有關社會研究力量開展研究；(10) 組織國內外的考察與學術交流。

研究方法概括了5條：(1) 從重大的現實經濟問題出發，進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2) 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結合，以應用研究為主，以對策研究為重點；(3) 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以宏觀研究為主，以戰略研究為重點；(4) 國內研究與國外研究結合，以國內研究為主，國外研究配合國內研究；(5) 所內研究與所外研究結合，兩者並重。基礎研究與專項研究可委託、承包給外單位或個人。

關於機構和人員：機構從簡，實行所長負責制，設副所長二、三人；組建若干課題組，視需要發展為研究室，人員實行任期制和聘任制；建聯絡室廣泛交流、委託、承包課題，採用合同制；專職人員與兼職人員逐步形成研究網絡；設編輯室，出版公開和內部的經濟改革刊物。同時，立即需要解決研究經費。辦公地點可暫時在中南海，但人員進出不便，需尋找一處便於聯絡各方的辦公地點。

這時，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在這個變動中，我本應坐下來和發展組的老人一起開個會，由我說明為什麼要去組建體改所，並聽取大家的意見，而後再由每人作出自由選擇。可是，我只委託小強和每個人談話，我則忙於籌建體改所的各种事務，這就使得有些可以到體改所的人沒有來。當然，留在發展組，可以繼續作熟悉的農村問題研究，但事後總覺得對那些老朋友不夠負責任。

結果，發展組一分為三了。到1985年底，留在發展組的老人，有鄧英淘、羅小朋、陳錫文、杜鷹、周其仁、白南生、高山、高小蒙、謝揚、劉虹等；到體改所的老人，有我、王小強、何維凌、白南風、王曉魯、宋國青、楊冠三、孟繁華、高梁、王飛欣、黃曉京等；還有一部分人作自己喜歡的事情了，像杜巖、白若冰、張木生、王彥先後去辦報紙了，孫方明當了朱厚澤^[377]的秘書，李零研究甲骨文了，高王凌研究清史了，等等。

[377] 朱厚澤 (1931-2010)，貴州織金人。曾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總工會書記處第一書記。

5-12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建立

紫陽提出的第二個任務怎麼解決呢？經過反覆協商，大家認為建立一個學會聯絡各方比較好。這時，很多人找我，希望我出面組織一個中國青年經濟學會。薛暮橋^{【378】}的秘書李克穆^{【379】}找到我，說：「薛老提出，應該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青年經濟學家組織，請你出任會長。」我說：「大家都希望建立這麼一個組織，但怎麼個搞法還得商量。當會長，我還不夠資格。謝謝薛老的好意。」過了兩天，薛暮橋讓我到他家去一趟。

薛暮橋是中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他 1932 年就參加了陳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組織的農村經濟調查，後來又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擔任《中國農村》雜誌主編。我如約上午 9 點到了他住的紅霞公寓。老人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陳翰老一再和我稱讚你，看了你寫的《農村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真是讓人高興。能出你這樣的學者，是中國之幸啊！多少年了，都沒看到過像你這麼認真作調查研究，又思想解放的文章了。」

我說：「您是我敬仰的前輩，我只是個不成熟的後學。」他說：「哪裏，哪裏，長江後浪推前浪嘛！今天找你來，我是想，你帶著一批青年人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現在很多青年人都成長起來了，應該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青年經濟學會，發揮他們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你就當這個學會的會長。」我說：「我可以組織，但我資格不夠，不能當會長。」他問：「你多少歲了？」我說：「快 45 歲了。」他笑笑說：「我當《中國農村》主編時才 28 歲。在你這個年紀，我已經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啦！該做的事不要推辭。說說你的想法。」我說：「謝謝您的鼓勵和信任。我們討論了幾次，覺得目前以先建立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為好。因為一下就建立全國的很容易一哄而起，而且會變成官辦的，讓一些看風爭名的、不幹實事的人蜂擁而上，使之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如果北京搞的好，可以起示範作用，再鼓勵地方搞起來。」

薛老說：「有道理，你這是積極而又穩妥的辦法。希望你把這個組織搞好。」從他家出來，我一直想，誰當會長好呢？確有不少青年人建議我當。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應該找一個更有影響、離決策更近的人來當比較好。有人提出薛暮橋、于光遠、馬洪、杜潤生等，當然他們都很好，但年

【378】薛暮橋（1904-2005），江蘇無錫人。曾任《中國農村》主編、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等職，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379】李克穆（1952-），時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秘書，後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副主席。

紀都大了，可以當顧問。我又徵求各方面意見後，決定請鮑彤擔任會長。他思想敏銳、方向清晰、辦事果斷、為人正派，很得趙紫陽賞識。

在體改委一次委務會後，我和他說起此事。鮑彤說：「我不能當。我資歷不夠，水平不夠，能力不夠。」我說：「第一，你為改革作了很多貢獻；第二，我們可以上下溝通；第三，菩薩太多拜不起。所以，請你當會長。」他說：「請給我一周時間考慮。」一周後，他同意擔任會長，由我擔任常務副會長。學會理事是從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優秀青年學者中推薦的，有 200 多名，可謂人才濟濟。

在學會理事推薦中，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在北京市西城區工作的青年學者姜洪，沒有被推薦，但他反覆找我，想當一個理事，我也認為可以。可大家一討論，多數人不同意他當理事，甚至不少人說，他要當理事，我們就退出。我去徵求鮑彤的意見，他問：「為什麼那麼多人不同意？」我說：「聽說他辦過民間刊物，參加過人大的競選，我認為不是什麼問題。」鮑彤沉吟了一會兒，說：「我也認為不是個問題。但如果多數人不同意，就不好辦了。你去說服一下，讓他自己好好幹，為了大局暫不加入吧。」

我和姜洪誠懇地講了自己當「反革命」到農村的經歷，而後說：「既然很多人對你有誤會，你就暫時為了大局，先不參加學會好了。你若能扎扎实實作些研究，我可以資助你一年項目資金。明年成果出來了，你再申請參加學會，大家就沒話可說了。」他很不高興地說：「你不讓我當理事，今後我們就永遠是對頭！」。後來，他到處說我的壞話，我聽了也只能一笑了之。一個只考慮個人得失而不顧大局的人，是不會有大出息的。

1985 年 5 月初，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隆重地在政協禮堂成立了。會長是鮑彤，我是常務副會長，副會長還有陳元^[380]、王岐山^[381]，秘書長由張鋼擔任，辦事機構設在體改所內。從此以後，每到經濟發展和改革遇到新問題需要研究、解決的時候，學會就召開各種不同方式的會議討論，並將討論結果上送決策者。紫陽多次聽取過學會組織的彙報，我向紫陽建議：重大問題最好聽不同觀點專家的意見，專門問題也可以請不同角度的專家來

[380] 陳元 (1945-)，上海青浦人。中共元老陳雲長子，時任中共北京西城區委書記，後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開發銀行行長。

[381] 王岐山 (1948-)，山西天鎮人。姚依林女婿，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副主任，後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行長、廣東省副省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北京市市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談，這就為決策提供了很多外腦，以盡可能減少決策失誤。紫陽也確能從諫如流，博采眾家之長。

但紫陽注意聽取青年人的意見，引起了一些老人的不滿，認為他被一些青年人的西化思想左右了。由於幾十年階級鬥爭觀念的薰陶，在有的老人授意下，不斷有告狀信送到總理辦公室。有的部門甚至提出報告，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382】}給中央寫的報告，就認為像福特基金會資助青年學者出國，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目的是影響國務院的決策，云云。但這些干擾都沒有影響紫陽對我們的信任，他還不斷提拔一些優秀的青年人進入領導崗位。

1985年初，我請維凌轉告小凱，準備成立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如果有可能，美國是否也可以搞一個，共同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後來，維凌告訴我，小凱和他的同學於大海^{【383】}正在斡旋成立一個中國留美經濟學會。5月底，在紐約中國領事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成立了，於大海當選為會長、小凱當理事。7月，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聘請楊小凱和於大海作了特邀理事。這個學會為中國的發展和改革作出了許多有益的貢獻。後來，於大海到北京訪問時，還向我表示，「想當一個縣長」，我當時很支持他的想法。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不僅召開各種關於形勢、發展與改革的專題、綜合討論會，而且還用「合同制」委託、承包課題，如：國家經委委託的國營企業研究；經貿部委託的外貿體制改革；人民銀行委託的金融體制改革；統計局委託的統計系統改革；以及我們委託、承包給有關學者和部門作的50多個課題，如，產業結構與進出口戰略，企業行為與政企關係，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社會公平與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國際比較，等等。

我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活動特點概括為「以任務帶組織，以課題帶組織」。因為如果沒有吸引人的任務和課題，組織搞的再大也會流於形式；有了值得完成的任務和課題，就會吸引能幹的人才，組織也才會不斷地有效運轉。這一年，全國各地紛紛建立起了青年人的各種研究組織。年底，我們把全國各省市青年經濟研究組織的負責人請到北京，互相交流，討論怎樣為推動改革開放服務的經驗。以後，又用體改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名義，聯合各家組織調查，辦各種培訓班，成立研究專門問題的小組，搞的有聲有色。

【382】趙復三（1926-），上海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六四」後譴責中國政府而流亡海外。

【383】於大海（1961-）。1982年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經濟學博士；1985年組織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並任會長；後任中國民聯主席、《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

5-13 過河先要試水深：組織 400 人進行全國大調查

體改所剛成立時，全國出現了經濟過熱的局面。由於 1984 年給企業和地方擴權，再加上實行雙軌價格，開始出現通貨膨脹，城市改革顯然比農村改革複雜的多。俗話說「過河先要試水深」，只有深入瞭解情況，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我們似乎應該作一次全國性的綜合調查，以便摸索城市經濟改革的路數。考慮到城市經濟關係的複雜性，一方面要作點、面結合的微觀基礎解剖，一方面要作宏觀調控的搜索分析。

也就是說，要弄清楚當前中國改革的現狀、問題和前景：究竟改革取得了哪些進展？現在改革面臨著什麼難題？解決這些難題有些什麼可供選擇的對策？如果我們自己都弄不清楚改革已經進展到了哪一步，弄不清楚現在改革的主要難題是哪些，我們將無法提出可供選擇的、有實際價值的對策。我反覆思考並與王小強商議以後，決心作一次全國性的綜合調查。我把這個意見向志文、鮑彤彙報以後，他們都非常支持。

因為在中南海辦公，各界人員進出不方便，3 月，我們搬到了老幹部俱樂部——養蜂夾道辦公，誰知仍然人員進出不便。5 月，我們又搬到陶然亭游泳池招待所辦公，這裏人員進出方便多了，利於和各界的合作。我們又從各部門挑選了解決 8 名科研骨幹，經趙紫陽批准調入體改所，他們是社科院的王曉魯、張少傑、彭照平、高梁、王飛欣，金融所的齊永貴，人民日報的孟繁華，經濟日報的王輝。考慮到張剛在莫干山會議的努力，調他來負責聯絡。

這次調查從 1985 年 2 月至 11 月，先後歷時 9 個月。調查主題、內容、方式由我確認後，具體工作由王小強主持，他和張少傑、白南風、楊冠三、刁新申、張剛負責組織實施，並發揮出了難得的高水平。調查先後經過討論方案、設計表格、試點調查、人員陪訓、全面調查、分組彙報、數據處理與材料分析、撰寫報告八個階段。參加調查的有中央和國務院各有關部委、研究機構、大專院校共 31 個機構的研究人員與在校生，共 400 多人。

調查範圍包括：20 多個部委、54 個城市、37 個縣、1,400 多個企業、2,400 多個居民。調查的主要內容有：(1) 城市經濟改革和動態；(2) 廠長（經理）的主觀意願；(3) 價格改革的社會心理；(4) 社會保障制度改革；(5) 青年生活與擇業傾向；(6) 企業幹部素質；(7) 政府職能與機構改革。調查人員共搜集整理了 1,400 多萬個數據，形成各類調查報告 185 篇 150 餘

萬字。在此基礎上，我們將1篇主報告和13篇分報告，編輯出版了《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和選擇》一書。

通過這次系統的調查，使我們認識到：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方面，自1979年以來，以簡政放權思路為主的城市經濟改革，使搞活企業、形成產品市場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市場機制開始顯示作用。表現在：分配製度改革強化了企業的利潤動機；計劃調撥體制改革使企業有了一定自主權；價格雙軌制對市場形成起了推動作用；經濟運行從「完成計劃」到「滿足市場」轉變；老百姓普遍認為「市場活躍了」，「東西貴點也能買到了」，「各種副食品豐富了」，總的情況是可喜的。

另一方面，消費膨脹和投資膨脹的出現，使改革面臨著新的挑戰。表現在：第一，消費基金膨脹，因為產品價格放開，而生產要素卻不能流動，勢必造成物價上漲，帶動工資的結構性上揚，消費基金膨脹，並造成消費需求超前；第二，消費性投資膨脹，源於「廠長不怕破產，工人不怕失業」，這就出現了銀行約束軟化的危險，並帶來了單位投資規模小型化和產業結構輕型化。而「雙膨脹」則會帶來全面的通貨膨脹。

當時，經濟學界的主流意見是，將經濟過熱的原因歸咎為投資膨脹，而我們調查得出的結論則是在投資膨脹的同時，存在著消費膨脹；投資膨脹中，非生產性投資膨脹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個調查的結論，對當時的中央決策和以後的經濟研究都起了很大的影響。但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一個全面系統的調查作為基礎，是很難得到上層重視和學界認同的。

消費膨脹和投資膨脹的出現給「簡政放權」增設了障礙。是收權回老路，還是深化改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挑戰，那麼該如何選擇哪？我們提出：在加強對工資總量和信貸總量實行宏觀控制的同時，堅決而審慎地把微觀基礎的改革推向縱深。也就是，解決消費膨脹的前提性機制是職工的失業，而解決投資膨脹的前提性機制是企業的破產。這就需要將市場機制引入工資決定，推進金融改革、要素流動和企業破產。

我們的報告一出爐，立即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體改委的一些朋友同意我們進一步改革的看法，但對我們指出的問題表示質疑；而計委的一些朋友則同意我們對問題的分析，卻對我們進一步改革的看法表示質疑。趙紫陽、安志文、鮑彤聽了我們的彙報，對我們的報告給了高度的評價。經濟

學界也大多贊同我們的看法，年終還授予了我們中國最高的孫冶方^{【384】}經濟學獎。美國日本等國也很快翻譯了。沒想到我們初戰，就獲得了成功。

1985年3月，中央黨校的研究生遲福林、吳偉找到我，希望由他們組織調查政治體制問題。其實，經濟改革中處處會遇到政府和企業的關係、黨和政府的關係問題。但體改委當時認為，這類問題不在自己的職權範圍之內，當然也就不能在調查範圍之內。而遲、吳兩位又雄心萬丈，計劃選10個省去調查省委運作的情況，包括查閱省委會議記錄，我和他們說：「這麼作，沒有政治局會議批准是不可能的，中國的事情是不可能一步做到的。」

遲福林和吳偉有些洩氣。我告訴他們說：「你們想一想，可不可以這樣，你們組織的10個調查組到縣裏去調查。縣一級『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上下左右的黨政企關係都可以調查清楚。而縣又與市、省大體同構，這樣作震動不大，又容易成功。如何？」他們也覺得有現實可行性，很高興地接受了。但他們下去不久，3個省的紅機子（紅顏色的電話機為中共內部的秘密通話設備）就電話打到中央辦公廳詢問。

中辦問體改委是怎麼回事，志文急忙問我是怎麼搞的？我和他說：「您不必著急。中央黨校專門研究黨的建設的研究生，到縣級去調查黨政企關係，不會有什麼問題。」他才放下心來。中央黨校研究生關於政治體制的調查，沒有收入到我們的調查報告集中，由他們專門出了《縣級黨政領導體制調查報告集》一書，受到胡耀邦、胡啟立的肯定。我將這本書送給了體改委的領導，他們看後也很稱讚。我還請樸方轉給了他父親一本。

5-14 習仲勳說：「中國專制主義的東西源遠流長！」

發展組實際上解體了，繼續留在社科院農經所的老人怎麼樣了呢？錫文仍擔任支部書記，其仁負責協調，英淘負責科研，小朋負責人事，但很難發揮他們的作用，杜潤生也希望他們到農研中心去。按當時的規定，到農研中心則需要編製和指標。他們商議，誰能搞到編製，就請誰當所長。經與當時任農研中心聯絡室副主任的王岐山協商，後來王岐山幫助解決了這個問題。1986年4月上旬，農研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成立了，王岐山當了所長，陳錫文當副所長，我和他們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384】孫冶方（1908-1983），江蘇無錫人。曾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著名經濟學家，為中國批判斯大林經濟體制第一人；孫冶方經濟學獎為中國大陸經濟學界最高獎。

王岐山在1969年到陝北馮莊插隊，因其「長袖善舞」，和插隊知青關係都搞得不錯。他與姚依林的女兒姚明珊戀愛後，1971被調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1973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1976年畢業後到社科院近代史所作研究。1982年轉到農研中心工作。我岳父吳奇寒曾和姚依林共事，在「一二九」運動時，大家都叫姚依林「滑頭」。看來，姚依林與王岐山此翁婿二人，倒實在有相通之處。

不過，話說回來，岐山也確實聰明而識時。1985年3月，一批年輕人在陶然亭聚會，歡迎熱情而幼稚的「改革明星」溫元凱。有人問：「岐山來了嗎？」岐山回答說：「來嘍！剪了辮子啦！」隱喻阿Q參加革命之意，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河南省委書記劉傑、省長何竹康，請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組團到河南作諮詢。學會推我當團長，我極力推薦岐山當，並給他當顧問。岐山一路行來，應酬得體，幹得很不錯。

諮詢團離開河南時，省政府聘請了團裏像3個人：齊永貴任河南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朱嘉明任省體改委副主任，黃江南任省外貿委副主任。其實，從組建發展組開始，我就考慮：在中國這個複雜的政治環境裏，自己沒有過硬的背景和靠山，一定要找一個更有資歷或背景的人撐檯面，否則自己怎麼能承受得起各種風險呢？所以發展組我請王耕今當組長，體改所出刊物請高尚全當主編，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請鮑彤當會長。

這麼做，既不是怕擔責任，也不是個人算計，而是為了更好的把事情辦成。當時，秦燕、唐昕^[385]、陶斯亮^[386]、戴晴^[387]等人先後找我談，想寫我的故事，都被我婉言謝絕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何況我們的工作整天就在風口浪尖上呢！我經常告誡大家說：如果我們的意見被領導人採納了，就是領導人的決策，過分的宣傳自己會惹麻煩；如果沒採納，或是還不成熟，或是沒被理解，就繼續研究，切不可急功近利，圖一時之快。

一天，王岐山和我說，周其仁這個人伶牙俐齒，但自我意識太強，很不好合作，你看該怎麼辦？我說：「他確實自視過高，你只要凡事都順著他，事情就會好辦一些。」岐山說，一天我去找老杜（指：杜潤生），其仁正從老杜的辦公室出來，我進了辦公室，看見老杜正在擦眼淚，我問老杜「您怎麼了？」老杜半天沒有說話，而後歎了口氣說：「現在的年輕人怎麼個人的盤算這麼多呢！」我突然想起了維凌說其仁是個「六耳獼猴」的話。

[385] 唐昕（1945-），江蘇鹽城人。時任《北京日報》記者，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副局長、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社會局副局長。

[386] 陶斯亮（1941-），湖南祁陽人。曾任醫生，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局副局長、中國市長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華醫學基金會副主席。

[387] 戴晴（1941-），江西臨川人。時任《光明日報》記者，後為獨立作家、環保活動家。

1985年11月的一天，羅點點^{【388】}來電話，說：「一批文學風流，特別是劉賓雁^{【389】}，想和你這個改革尖兵聊一聊，如何？」我說：「本人雖在北大中文系待過幾年，這些年主要一直思考的是農村、經濟、社會的問題，對文學沒什麼發言權。」點點說：「他們對改革的進展、問題和趨勢都很關心，一再說要請你給介紹介紹。」記得還是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時，我在內部閱覽室看到了過劉賓雁因之打成「右派」的《本報內部消息》和《在橋樑工地上》，不由心生敬意。看來，不好推辭。

週末，到了點點家，客廳中已有20多人。在座的有劉賓雁、張潔^{【390】}、張抗抗^{【391】}、張賢亮^{【392】}、達理^{【393】}等，許多文學名家。點點讓我介紹一下改革，我就從改革的背景講到農民的疾苦，從包產到戶講到全面經濟改革。接著，提問，議論，氣氛活躍而熱烈。這時，陳渝慶到我身邊，悄聲問：「我寫的東西怎麼樣？看過嗎？」她和馬大京合用「達理」的筆名發表了不少作品。因為是老同學，我笑著開玩笑說：「你那些東西無病呻吟，只能算不入流的狗屁！」誰知她大聲喊起來：「老陳說我們的作品是『狗屁』！」大家愣了一下，哄笑了起來。

張潔走過來傍著我的肩膀小鳥依人地說：「我這個『狗屁』的屁放得怎麼樣啊！」我趕忙道歉說：「我是和渝慶開玩笑，怎敢褻瀆各位。你的作品有真情，有味道。」抗抗問道：「你最喜歡誰的作品？」我說：「賓雁的《人妖之間》！這篇作品敢於直面人間疾苦，傾訴社會不公，反映了時代變革中的主題。所反映的問題，全國2,000多個縣恐怕概莫能外，當為傳世之作。」賓雁站起來，連忙搖著手說「不敢當，不敢當！」接著，他講了寫這篇作品的經過，赤子之心躍然而出。散會時，他高興地和我說：「找個時間好好聊聊！」

其實，1984年底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議，提出的「創作自由」可以說贏得了文藝界、知識界的普遍歡迎，是一次有改革創新精神的會議。但「左」的東西在文藝領域根深蒂固為害甚烈，多年來只要有人提出新的見解，往往就會受到不公正對待，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已經成

【388】羅點點（1951-），四川南充人。曾任醫生，後為獨立作家。

【389】劉賓雁（1925-2005），吉林長春人。中國著名記者、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7年又被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獨立中文筆會第一任會長。

【390】張潔（1937-），遼寧撫順人。中國著名女作家。

【391】張抗抗（1950-），廣東新會人。中國著名女作家。

【392】張賢亮（1936-），江蘇盱眙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中國著名作家。

【393】達理，為馬大京與陳渝慶夫婦寫作用的筆名，二人均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當了作家。

為常態。劉賓雁發表《人妖之間》之所以引起轟動，就是用文學形式真實地反映了生活，說出了大家感覺到而沒有深刻認識的問題。當然，他的這篇作品會引起爭議。所以，在作協四大上，他雖被選為副主席，但日子並不好過。

賓雁對社會主義的追求、思考和抗辯，正是出於他悲天憫人的對人類正義、公平的執著追求的赤子情懷。50年代，賓雁懷著對社會主義的憧憬，寫了《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一下子當了22年右派，歷經磨難而不改初衷；80年代，賓雁寫出了《人妖之間》那樣的振聾發聵之作，被民間譽為「中國的良心」，卻被既得利益者看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

1985年3月，維凌主編的12本《社會學叢書》完成了。他通過中國芭蕾舞團團長郁蕾娣^[394]介紹，認識了一位公安部副部長，經其斡旋到美國作訪問研究了。走前，他和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要取得成功，應該借鑒國際的經驗，爭取各國朋友的支持。」我希望他到美國「瞭解情況，廣交朋友，疏通渠道，籌措資金」。半年後，他從大洋彼回到北京，談到和朋友們一起在美國創辦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政治學會很高興，但自己沒個官方名分活動又很為難。希望我給他一個「所長代表」的名義，我同意了。

我抽空到西安看望母親。順便看望老友孫達人，他的經歷又增加了一段有意思的傳奇：1983年6月，西安市委書記突然找他談話說：「組織上準備讓你擔任副省長。」他很奇怪，以為自己聽錯了。連忙問：「什麼？」書記又重複了一遍，他推辭說：「不行，不行！」。第二天，省委書記又和他談：「組織上已經決定你擔任副省長，主管文教、旅遊、外事。」他只有硬著頭皮接受了。原來是中央組織部看中了他。中組部向陝西省委提出：要找一個這樣的人當副省長，來主管陝西的文化、旅遊事業。一是黨外知名人士，二是有副教授以上學術職稱，三是年齡在45到50歲之間。結果，全省只有孫達人夠這三個條件，他就中標了。可當上副省長以後，那些由他主管的廳局委辦的領導人，誰也不聽他的。因為他不是黨員，而那些下屬卻都是老革命。他只能申請入黨，工作才順手了一些。兩年後，他提出辭職，沒有批准。

[394] 郁蕾娣（1947-1994），浙江寧波人。曾任中國芭蕾舞團副團長，後客逝美國。

回到北京，李樹香和我說：「我的一個老領導想見你。」我問：「誰？」他說：「習仲勳^[395]！」我說：「好呵！」我們就一起去他家了。習仲勳滿面蒼桑、但笑容可掬地歡迎我們。我趕忙趨前一步，用陝西話說：「習叔，你好！」他問：「阿達人？」我說：「三原。」他笑著說：「我是富平，『金三原銀富平』嘛！」坐下來，他說：「我聽耀邦、紫陽都說過你，樹香也老跟我誇你。陝西還是有人才啊，敢說敢幹！」我說：「我是個陝西冷娃。」他說：「陝西冷娃好呵，就是容易吃虧。說說你為啥搞農村改革？」我把在農村的所見所聞、農民的苦況都跟他說了。他面色凝重地說：「我們黨對不起農民啊，左傾破壞太嚴重了。樹香說你的親戚是渭華暴動領導人，叫個啥？」我說：「王芾南，是我姨父。」他說：「認得，認得！我發動『兩當兵變』的時候，他是陝西省委常委。聽說他後來搞教育了。」我說：「他1957年當了右派，1979年才平反。」他連說：「可惜啊，可惜！」

我說：「習叔，你在廣東兩年多，平反冤案，發展生產，對外開放，建立特區，老百姓對你都是讚不絕口啊。」他說：「地方的事情不難辦，看準了、下決心就能辦到。中央的事情難辦啊，我們黨左的東西搞了20多年，再加上中國專制主義的東西源遠流長！每往前走一步都很艱難啊。」正聊時，齊心^[396]阿姨走了出來，聽樹香說她正在練毛筆字和畫水墨畫。齊心和習仲勳不知說了什麼，他們好像有什麼事要辦，我們就告辭了。習仲勳說：「本來想請你吃個飯，現在有個急事要辦，不行了。以後有機會，得空常來坐坐。」

出來後，李樹香問我：「你想不想見一見王震^[397]？」我說：「我一般不和沒有工作關係的人來往。習老是個鄉親，我姨夫也說認識他，我才來拜訪。我聽說王震左的很，經常反對一些改革的作法。」他說：「王老是我們359旅的老領導，雖然沒有習老開明，但人很仗義。你生病時農民送你的甲魚，我不是給他拿去20多個嘛。他很高興，還謝謝你哪。」我說：「下次有機會再說吧。」就沒有去。

[395] 習仲勳 (1913-2002)，陝西富平人。1928年參加中共，陝甘寧邊區的創建者與領導者之一；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後被康生等人認為「反黨集團」；改革開放以後，蒙冤十六年的他，先後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396] 齊心 (1925-)，1944年與習仲勳結婚，兩人相親相愛一起渡過了58年。

[397] 王震 (1908-1993)，湖南瀏陽人。中共開國上將，曾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國家副主席；改革開放以後，在經濟上開放，政治上保守。

5-15 我和鄧小平說：「中國需要自己的華盛頓！」

1985年6月，鄧樸方約我去他的辦公室。樸方坐在輪椅上，旁邊還坐著一個人，另有幾個人站著。樸方說：「一諮，你們兩人都是總理之才，認識一下，交個朋友。這是俞正聲^[398]，我們康華原來的總經理，現在煙台當市長。」我看俞正聲濃眉大眼，一臉英氣，說話條理清晰，待人彬彬有禮，立即產生了相見恨晚的感覺。樸方說：「一諮為農村改革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紫陽又讓他搞經濟改革。正聲，今後你們可以相互幫助。」

其他人都退出了，只剩下樸方、正聲和我。樸方說：「一諮，今天請你來，是想議論一下康華的事。我辦康華，是想為殘疾人基金會籌措資金。沒想到，下邊出了不少問題。想聽一聽你們的意見，下一步該怎麼辦。」我看看正聲，他說：「一諮，你是專家，你先說。」我說：「殘疾人的福利本來應該是由政府承擔的。但政府沒有錢，一時難以解決。你創辦殘疾人基金會實在難能可貴。但你這個基金會是社會保障、社會公平性質的。」

我看了他們一眼，說：「你們辦康華是想為基金會籌錢。可公司是要贏利的，這就和基金會的性質衝突了。再說，下邊一聽是樸方辦的公司，那還不打著你的旗號，一哄而起、魚龍混雜，問題也就自然發生了。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康華和基金會脫鉤！康華獨立經營，贏利按規定比例捐給基金會。基金會不參與商業性活動，只搞殘疾人的福利事業。這樣誰也沒話可說。」樸方說：「有道理！正聲，你說呢？」正聲說：「我同意一諮的意見。我有個急事，先告辭了！」我也一起走了，正聲說：「一諮，抽空到煙台看看。」

10月底，我和樸方談起我們在大調查中發現，經濟改革深入以後處處遇到政治體制的問題，我說：「看來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深入。你看，企業不改革就沒有效率，可政府直接管著企業，黨又管著政府，這就造成了政企不分、黨政不分。」樸方說：「你和耀邦去談談吧。」我說：「耀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樸方又說：「那你和紫陽談談。」我說：「紫陽也沒有這個權威。除了你們老爺子，誰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他說：「怎麼講？」我說：「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用目標取代過程，一個是用理想取代現實。不顧現實的情況，總想早一點兒實現共產主義。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找到中國的特殊性，共產黨才取得了政權。我們取得政權以後，就急於搞共

[398] 俞正聲（1945-），浙江紹興人。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煙台市市長、青島市市長、建設部部長、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產主義，造成了無數的破壞。在《黨章》裏面，寫著共產黨員必須怎麼樣，應該怎麼樣；從來沒有講共產黨可能怎麼樣，只能怎麼樣。」

我接著說：「必須怎麼樣，應該怎麼樣，有哪個人做到了呢？那只是一種原則的要求，而不是人們可以遵循的法律或者一種規定。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國家都犯了左傾的錯誤。雖然列寧也批判了左傾幼稚病，但還是犯了一系列左的錯誤。而這些左的東西給國家和民族都帶來了災難。我們從建國以後，以為黨和政府是代表國家的，國家是代表人民的，所以黨和國家就要把一切政治、經濟、社會事物都管理起來。」

「你想過沒有，其實，一個合理的社會，應該是個人能解決的問題，由個人解決；企業能解決的問題，由企業解決；市場能解決的問題，由市場解決；社會能解決的問題，由社會解決；基層能解決的問題，由基層解決；基層解決不了的問題，才要中央來解決。我覺得，我們現在這樣一種體制，是三個來源，一個是戰時共產主義的延續，一個是照搬斯大林的模式，第三個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延續。這三種因素在一起呢，就建立起來一個黨政經合一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按照行政層次、行政區劃、行政辦法領導和管理的體制，這個體制不能不帶有封建宗法的特點。」

我說：「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跟黨領導一切、毛澤東領導一切有關係。你們老爺子說，要在2000年實現小康，我看作到這一點並不難。但是，但是要在中國奠定一個千秋不廢之基，這卻是非常困難的。中國現在需要一個華盛頓，只有你們老爺子有可能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除了他老人家，沒有人能作到這一點。」他說：「你說的有一定的道理。我們都再想想。」

樸方問：「維凌出去怎麼樣啊？」我說：「他返美不久就來信了。講他結識了美國著名的金融家索羅斯^[399]。索羅斯信奉波普哲學，認為一個社會要進步就必須開放，在開放社會中才能作到人人平等。1984年，索羅斯在他的祖國匈牙利建立了一個基金會，想幫助匈牙利的改革開放，聽維凌介紹了中國的農村改革後很高興，願意資助體改所派一個代表團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進行考察。」樸方說：「這小子還真行！」

1985年11月中，鄧小平要找我談談。他子個比耀邦還矮半頭，但一見面就讓人覺得氣勢不凡。他用四川口音說：「樸方多次提到你很有見識，我想聽聽你對下一步改革的看法。」我說：「我們現在的改革實際上是共產黨將功補過。文革的浩劫造成了國家和民族的危機，也造成了無數家庭的苦難。您實行改革開放，深得人心。農民更是說『致富全靠鄧小平』。現

[399] 索羅斯（1930-），匈牙利籍猶太人。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畢業後，1956年移居美國；1970年創立量子基金，並開始進行慈善捐助；成為著名的貨幣投機家和慈善家。

在我們有著百年不遇的機會。本世紀末實現『小康』沒有問題，問題是怎麼才能奠定百代不廢之基？中國需要自己的華盛頓！只有您可以承擔這個歷史使命。」

鄧小平眼睛一亮。我接著說：「按系統論的觀點，實現 800 美元、1,000 美元，叫做狀態目標，而實現狀態目標依靠什麼樣的組織形式、組織結構叫做結構目標。許多國際著名的學者都指出，一個國家的起飛，關鍵不在資源、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的多少，而在組織的合理性、組織的效率。所以，形成一個現代化的合理的經濟、社會、政治組織結構，也就是形成一整套社會主義的文明制度，是我們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

小平點起一隻煙，很認真地聽著。我接著說：「現代化社會的各種事務日漸繁雜，政府的職能也在增加。如果我們黨和政府的職能不能分解，實現現代化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黨的權力過分集中，就會造成領袖擅權、發生錯誤很難糾正的局面。我們國家發生的『文革』兩億人被批判、鬥爭或牽連。而『大躍進』則餓死了 4,300 萬人！」小平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問：「四千——三百萬？」我也用四川口音回答：「死得（是的）！」我又說：「四川就餓死了 900 萬人！」他緩緩地說：「九——百萬？」我又說：「死得（是的）！」

我說：「我開始是聽南充地委書記康世盛說的。後來，我又做了些調查，又看了檔案。我還去了朱德的老家儀隴，和他弟弟朱岱年也談了。」接著，我給他講了 1961 年朱德拜訪朱岱年的故事。我加重語氣說：「就憑這一條，我們今天的改革是向老百姓贖罪啊！本世紀末，實現小康並不難。但要真正建立一個百年不廢之基，奠定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是最難的。1980 年，您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是這個意思。現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政企之間的關係和黨政之間的關係。」

我最後說：「我覺得，黨什麼都管，實際上就包攬了政府的事務，政府又把企業的人、財、物、供、產、銷都管了起來，所以企業就很難有活力。把黨政關係理順，已經成了當務之急。小平同志，老百姓都對您充滿了希望。去年，北大學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代表了大家的心聲。經濟改革只有輔以政治改革，改革才能深入推動。今天只有您能成為中國的華盛頓！」我們談了大約兩個小時，他站起來沒有再說甚麼，我也就見機辭退了。

李樹香這個老紅軍還真幫忙，他和我說：「總後勤部蓋了一批『寡婦樓』，用來安置軍級以上幹部的寡婦，可她們很多人不願意要。我去看了，建築面積 200 平米，樓上樓下，挺好的。現在總後勤部正在賣，一套

只要5萬元。我們買兩套，給你和小強。怎麼樣？」我說：「真是讓你費心啦，可我們不能要。所裏那麼多人沒有房子，我們一事當前先為自己打算，怎麼行？我就和大家一起住招待所。」老李說：「我實在是心疼你呀！」

過了幾天，老李又跑來說：「老陳，陶然亭公園有一小片地，300多平米，可以蓋一個小四合院。你們開會晚了可以住，來了客人也可以住。蓋起來不花多少錢，一年算下來還省錢。你和小強去看看吧。」我們一看，還真不錯，決定在那兒蓋房子。半年時間，房子蓋好了，還挺像樣，只花了15萬元。不過房子還沒用上，為了和大學聯繫方便一些，我們把辦公地點搬到了大學區。蓋的這個房子賣了21萬元，還賺了6萬元。

1985年10月，體改所搬到了人民大學對面雙榆樹的計委招待所辦公。建所的第一年，我們基本完成了「制定方針、摸索路數」的設想。體改所需要的研究骨幹也都先後到位了，「務色人才、形成架構」的步驟可以提前進行了。元旦，大家給我敬酒，把我灌醉了。李峻和我開玩笑說：「北大、人大的同學說：女孩子都向王小強傾倒，男孩子都向陳一諮傾倒。」我醉著說：「那，那，我跟小強換換吧！」大家都開心地笑了。

5-16 建立組織結構 實現正常運轉

我反覆思量以後，又分別和小強、景安商議，我們組建了10個處、室：綜合研究室、宏觀經濟研究室、微觀經濟研究室、經濟發展研究室、社會問題研究室、聯絡室、信息室、編輯室、科研處、辦公室；並分別任命齊永貴、宋國青、張少傑、彭照平、王曉魯、崔鶴鳴、張阿妹、王飛欣、白南風、楊冠三、高梁、王曉龍、張剛、李峻、趙淪江、孫志新為各處、室的負責人。

我們在體改所建立了縱橫結合的組織結構，以5個學術研究室為代表的縱向結構，目的在於形成研究的穩定性、科學性和專業性；而以若干課題組形成的橫向結構，則有助於研究的靈活性、現實性和綜合性。接著，又制定了科研工作管理辦法30條，將科研計劃、科研活動、科研成果、科研經費的管理納入制度化的軌道。

那麼，我們的「三個自主權」是如何實現的呢？

(一) 擁有研究自主權是能否產生高質量研究成果的關鍵。體改所從建立起，就沒有接受過任何一位領導人或部門的「交辦任務」或「命題作文」。那麼，我們怎麼制定研究計劃呢？

第一步，請每一個研究人員：(1) 根據自己對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理解；(2) 參考國內研究者的研究進展；(3) 參考國外類似改革成敗的經驗教訓，獨立提出自己認為恰當的所級課題、室級課題與個人課題。

第二步，由室級分析匯總。

第三步，召開所務會議，確定所級課題，也就是全所重點課題。這一類課題需要跨室組合研究人員，但不超過研究總量的 30%，叫作「指令性計劃」。

第四步，所務會議還需確認室級課題，確認後由室一級自主完成，也不超過研究總量的 30%，叫作「指導性計劃」。

第五步，個人課題由個人提出，可以跨室、跨所組合，經室內同意，所裏備案，這一部分約佔研究總量的 40%，叫作「市場調節」。

這種制定研究計劃的方法可以較好地調動個人、研究室和所級的三個積極性。

(二) 擁有人事自主權是搞好研究的保證。當時，中國實行的是一種小而全的「單位所有制」，領導班子的成員由上級指派，往往相互扯皮；加上「政治掛帥」，人員的陞遷黜貶先看出身和政治表現，由政工幹部說了算，不能量才為用；人才又不能流動，就造成了需要的人才不足、不對口的人員過多，這種狀況造成了普遍的低效率。我們根據建所的需要，研究骨幹分別從發展組、社科院等部門調來。

一般研究人員則實行兩名助理研究員推薦、主管研究的副所長批准即可入所的辦法。各地有志改革的年輕人紛紛要求來所工作，這一年招收的年輕人中好幾位都是省學聯主席。所裏研究人員的晉陞除考核業績外，還要接受民意調查。不少優異的年輕人入所一、兩年就能得到破格提拔。所裏從早到晚一片熱氣騰騰，經常是夜裏一、兩點還在爭論問題。記得「六四」後，體改所被迫解散時，全所人員平均年齡只有 28 歲。

(三)，至於財務自主權是很有限的。當時，因為實行「計劃經濟」，財政撥款是專款專用，也就是大家常說的「買醬油的錢不能買醋」。比如，財政撥款用來獎優罰劣就不可能。但研究經費根據課題需要由我們自己決定，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了。而研究人員出國考察進修的花費，為了不佔用體改委有限的外匯額度，我們就盡可能請一些著名的基金會贊助。那麼，怎麼獎勵優秀的工作人員呢？

我們建立了所長基金。我請一些私人朋友捐款，款項大部分來自民間企業，很小一部分來自所裏的稿費、項目提成。所長基金主要用於：(1) 工作人員獎勵。當時年終獎有三等，分別是 90 元、70 元、50 元，所長、

副所長最高只能拿第二等；(2) 送往迎來。接待國外朋友和國內副縣級以上人員均可使用；(3) 困難補助；(4) 婚喪嫁娶；(5) 節慶活動；(6) 業餘文體活動。這樣作，既不違反財經紀律，又解決了實際問題。

建所之初，我就一直考慮怎麼按照組織理論，使體改所形成「科層機制、克朗機制、市場機制」相互為用的局面，現在通過結構、運作、程序和方法大體作到了，效果看來還可以。我們又仿照「抗大」提出「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口號，給體改所提出了新的口號：「求實，創新，民主，團結」。我和所裏的年輕人一起住在招待所，大家都是忘我地工作，很少個人盤算，彼此相處的親密無間，非常融洽。

考慮到長遠，總不能沒有個固定的辦公地點，也不能讓大家老住在招待所。我和景安跑了幾次財政部，嘴都快說破了，倒是要了兩筆錢：一筆340萬，是買辦公室的；一筆350萬，是蓋宿舍的。後來買了人定湖北巷11號，原北京塑料學校的房子當辦公室。我請剛從部隊轉業的吳義章當了辦公室副主任專管基建，李樹香協助。我又給鄧樸方、齊永貴寫信，從殘疾人基金會與河南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各借了250萬元，從馬鞍山搞了1,000噸平價鋼材，責成他們3年內讓大家住上房子。

杜英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來找我。原來，她和張木生離了婚，一個人帶著不到4歲的仔仔，生活很困難，又不想回父母身邊。她哭著和我說：「老陳，你要是不管我，我就沒有出路了。只能去死！」說著說著又大哭起來。畢竟發展組剛成立時，她幫助轉錢還受了處分，算對發展組有過貢獻。我安排她在所裏當了助理會計，後來還給她和仔仔分了一間房子。誰知，她1989年初得了紅白狼瘡，年紀輕輕就去世了。

唐明峰是錢學森介紹到體改委工作的。1984年底委裏分他到所裏。可是，一年來他什麼事也不幹，是個滿嘴大言不幹實事的人，我決定解聘他。體改委秘書長洪虎^[400]急急匆匆打來電話說：「一諮啊，唐明峰拿著汽油，說要到天安門自焚。看在錢老的面子上，能不能不解聘他？」我說：「我們可養不起閒人。所裏是聘用制，不能執行規則，還怎麼辦下去？必須獎勤罰懶。你放心，他絕不會自焚！」唐明峰看鬧不出名堂，也就另找出路去了。

體改所之所以能使一批年輕人獻身忘我的奮鬥，除了那個激情燃燒的改革歲月的鼓舞，就是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制度，並形成了一個「熔爐式的

[400] 洪虎 (1940-)，安徽金寨人。中共開國上將洪學智之子，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秘書長，後任吉林省省長。

環境」，這就使每個人發揮出了潛在的能量，一年左右就出現了「求實，創新，民主，團結」的局面。

5-17 給青年人講述《人生的選擇》

1986年初，體改所進了一批青年人，一個個生龍活虎，躍躍欲試。我給他們開了一個會，我說：「你們這麼年輕到了體改所，讓人心裏高興。可我看你們還處在『狂妄期』，每個人大概都覺得自己不是個齊天大聖，也是個六耳彌猴，天老大，我老二！」大家都笑了。我說：「年輕人有氣吞山河的志向是好事，但若不能從腳下一步步做起，就會變得志大才疏，一事無成。」接著，我給他們講了一課，叫做《人生的選擇》。我說：

人年輕的時候都有一番雄心，但大多數人經過歷練以後，往往會隨俗沉浮而難有大成，只有少數人能夠實現自己的一定理想。法國啟蒙運動提出了「人生而平等」，但因為每個人出生地域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制度條件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個人稟賦不同、教育層級不同、努力程度不同、人生際遇不同，故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就產生了。

所以，中國古賢所謂「盡人事而聽天命」之說，就是告訴人們要「師法自然」、「順應時勢」的道理。但每個人首先要想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道理，才能立足到正處。當今之勢，人被現代化潮流攜裹，每個人都有成為現代化機器一部分的操勞與苦惱。企望實現年輕時的夢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過自由自在的日子，人生的選擇如何則至關重要。

第一是「選擇」。

首先，是要認識到「體能、技能與智能」的關係。一個人、或民族、或國家的人力資源能力是由人的體能、技能、智能三者構成的，獲得三者的社會支付成本為1:3:9，而社會收益則為1:10:100，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源能力在25分到65分之間，而中國的人力資源能力只有7分，所以人力資源能力的提高——智能投資對發展的影響是關鍵的。

其次，是要認識到「愛好、特長與需求」的關係。一個人應當從自己的愛好中找出自己的特長，在自己特長與社會需求的交叉點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樣才能比較輕鬆地勝任自己所從事的工作。

再次，是要認識到「見識、聯想與判斷」的關係。一個人的見識越豐富，聯想就會越廣泛，判斷也就會越準確。而見識則不僅包括各種書本知識，還應當包括各種社會知識。

第二是「取法」。

首先，是要認識到「正路、奇路與邪路」的關係。一個人只有走正路才能有大成，也才能進入主流，總想「一步登天」、「急於求成」，只會適得其反，甚至走上邪路。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若不能「以正合」，則「以奇勝」也只能得到自取其辱的結果。但走了正路，出奇制勝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邪路不能走，但不可不知，否則「君子可欺以方」，就容易上當受騙。

其次，是要認識到「學習、工作與問題」的關係。一個人從讀小學、中學到大學，所學知識的重點大多是「位置、邏輯、方法」。而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並不是哪一門學科知識就能夠單獨解決的，往往需要運用多學科的知識綜合分析，所以更注重的是如何解決「重點、角度、策略」的問題。

再次，是要認識到「現狀、問題與前景」的關係。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部門、一個地域、一個國家，要想得到合理的發展，必須正確地弄清自己的現狀是甚麼，問題是甚麼，以及可能的前景是甚麼。如果不能對自己的「現狀」做冷靜的估量，那麼就不可能對需要解決的「問題」有正確的方略，「前景」的不確定性就會增大。故而，「調查研究，分析利弊，制定對策」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第三是「運勢」。

首先，是要弄清「時勢、機會與才能」的關係。一個人能否有所作為，關鍵取決於「時勢」需要不需要，正像和平時期難以產生英武的將軍一樣，戰爭年代也不會出現治世的宰相；歷史是否給你提供「機會」，與你能否抓住「機會」，居於第二；而你的「才能」主要就表現在認清時勢、抓住機會的不懈的努力之中。

其次，是要弄清「勞動、資金與資源」的關係。微觀經濟學裏講，這三種要素之間的優化配置，就可以達到「邊際效益」。那麼，一個人擁有一種要素，同樣可以務色另外兩種要素，使之實現優化配置，以達到目標的最大化。

再次，是要弄清「生存、竟爭與選優」的關係。無論到任何地方工作，都會遇到「適者生存」的問題，如果周圍是一群雞，你與眾不同是個鳳凰，就可能呆不下去；只有生存下去，才能發揮你的才幹，在竟爭中脫穎而出；只有當你取得一定位勢時，也才可能把優秀的人才提拔起來，形成團隊的力量。

第四是「成功」。

首先，是要學會抓兩個 1/3。讀書、工作還是與人交往，都要學會抓 1/3；就是 100 本書、100 件事、100 個人，重點要抓住 1/3；而後在這 1/3 裏，又要學會抓住第二個 1/3，才能提綱攜領地實現目標；正像組織理論所說，一個人領導 8 個人效率最高，超過 8 個人付出的精力就會成倍增長。

其次，是如何作好事情。無論是做工作還是搞研究，都要學會，一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不能大處著眼會認不清大局，不能小處著手會陷於空談；二是「立足現實，著眼中期」，人不能拔著頭髮離開地球，立足現實就是作事要考慮「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同時要著眼中期，弄清目標是「收斂」還是「發散」；三是「務色人才，建立規則」，沒有出色的人才不行，有了人才不建立規則就會各行其是。

再次，是如何建立組織。做重大的事情靠個人的能力不行，捏成拳頭的團隊才有力量。建成一個有效的組織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明確有限的工作目標，二是科學合理的組織架構，三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規則，四是配備齊全的各種人才，五是優厚的工作生活條件，六是人際融洽的工作環境。

第五是「人生」。

首先，是要處理好「生活、事業與情感」的關係。人的一生有 5 個生活圈子：從小與父母生活在一起，成人後自己組織家庭，周圍則有親戚、朋友和社會圈子。「至親莫如父母，至近莫如夫妻」，一個人若不孝順父母就不會愛別人，一個人若沒有一個和諧的家庭也不會有愉快的生活。人的「理想、事業與職業」、「性慾、愛情與婚姻」都是有聯繫又有區別的东西。

其次，是「處世原則」。為人處世，有的人成功，有的人不成功，我的原則是「待人以誠，處事以信，求同存異，取長補短，區別對待」20 個字。既使受騙仍然待人以誠，這樣才會有長遠的朋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決不能輕諾而寡信；近距離共事要求大同存小異，遠距離相交則要求小同存大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之長棄人之短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揪人之短棄人之長則天下無可用之人；子不語怪力亂神，為何又「敬鬼神而遠之」呢？此處的「鬼神」指的乃是邪氣十足和整日空談的人。

再次，是「人生三境界」。子曰「吾十五而志於學，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其實是講了人生的三個境界：30 歲以前達到「廣專」，通過讀萬卷書使自己的知識從「廣」而到「專」；50 歲以前達到「博精」，則要通過走萬里路格物致知，使自己對事務的認識從「博」到「精」；50 歲以後達到聞

一知十，懂得萬事隔行不隔理；60歲的「通」，乃是意識到人世的千奇百怪各存其理；70歲才能「達」，像《莊子》「秋水」所描述的境界。

我最後說：「其實，農村改革就是在我們認清時勢、抓住機會並順勢而為才取得了成功。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歷史的大勢，你們生逢其時。但真要有為，就得從『求實』一步步作起，否則就不可能有『創新』，弄清立足點才能往前走。所裏決定，讓你們先到農村、再到工廠各3個月，做調查研究。這篇文章作好了，下一篇才能好作。」他們興奮地讓我把講的寫下來，我哪裏有時間啊。

後來，我在1993年到2005年，先後也給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一批留學生講過這個題目，很受他們歡迎。

5-18 索羅斯資助18人考察匈牙利和南斯拉夫

1985年9月，由體改委、社科院和世界銀行召開了「巴山輪會議」，60多位國內外經濟學家討論了宏觀經濟管理問題。匈牙利科爾奈提出的「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得到認同，但他主張的「所有制改革宜分步漸進，而計劃、物價、工資可能一攬子改革更好」的意見。波蘭布魯斯不贊同，認為只能「循序漸進」。南斯拉夫巴伊特則提出：宏觀調節信號的變化，只對進入市場的企業有靈敏的調節作用，而對沒有進入市場的國營企業往往是失效的。這個經驗之談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企業這個微觀基礎改革的配合，宏觀調節手段的改革可能不會成功。看來只有兩者相互配合，才能使改革深化。

1986年春，吳敬璉^[401]、周小川^[402]和樓繼偉^[403]提出了「價稅財聯動」的改革方案。所裏組織了幾次討論，大多認為缺乏現實可行性。顯然，吳敬璉受科爾奈的影響很大。話說回來，吳敬璉是個聰明的經濟學家，他對我們的大調查十分讚賞，甚至去年底提出到體改所工作的要求，據他說是馬洪不重視他的意見。我立即去經濟所做了個調查，結果經濟所的人對他評價不高，一是說他直到1983年還不贊成「市場經濟」；二是有些投機、

[401] 吳敬璉 (1930-)，江蘇南京人。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研究員，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402] 周小川 (1948-)，江蘇宜興人。時為清華大學博士，後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行長。

[403] 樓繼偉 (1950-)，浙江義烏人。時任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財金組副組長，後任上海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看風整人，像批孫冶方；三是脫離實際，又自視甚高。我聽了以後只能作罷。

小強告訴我，1984年7月他隨趙紫陽去安徽時，曾說起吳敬璉批評「行政性放權」。紫陽笑笑說：「這是書生之見。一步把權放給企業行得通嗎？哪個企業能接受？上邊那麼多婆婆！中國的條條塊塊把企業捆的死的呵。所以，現在搞擴大企業自主權是削弱條條，搞試點城市是削弱塊塊。條條塊塊削弱了，企業才能活起來。」我感到改革設計若不能從實際情況出發，主觀的設想往往會成事不足。

維凌不斷來信，說索羅斯詢問是否打算去匈牙利考察。1984年底，匈牙利科學院經濟機制局局長塔爾多什到中國訪問，他和我說：「我的朋友索羅斯對中國的改革非常感興趣。因為，第一，他對匈牙利改革的進展不滿意。我們是個小國，又受蘇聯控制，很多想做的事有困難；第二，中國是個大國，中國農村改革的進展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他認為一個有11億人口的大國改革如果成功，將是對人類的重大貢獻。索羅斯願意出錢，請我們派一個代表團到匈牙利去訪問。」我表示感謝並接受了這一邀請。

我請李峻具體籌劃。李峻先後去了外交部、新華社、社科院蘇東所，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我國每年有幾百個團去，你們不用去了，去了也不會看到什麼新東西。」李峻和我說了以後，我說：「我們帶著改革中遇到的問題去考察，自會有與眾不同的收穫。但我們必須做好考察前的準備。」我想，發展組和體改所的調查方法仍然是有效的，先宏觀搜索再微觀解剖，著重考察他們如何處理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的關係。

代表團組成了，我們組成了宏觀、微觀、社會和黨政關係4個組。高尚全任團長，我和小強任副團長，李峻任秘書長，團員有：體改所的張少傑、白南風、孫方明、趙淪江、崔鶴鳴、高梁，體改委的鄭洪慶^[404]，發展所的杜鷹、盧邁^[405]，北京物價局的馬凱^[406]，經濟中心的李劍閣^[407]，計委

[404] 鄭洪慶，時任體改委局長，後任香港中旅集團董事。

[405] 盧邁（1947-），歸國華僑。時任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市場研究室主任，後任中國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406] 馬凱（1946-），上海人。時任北京市體改辦副主任，後任北京市物價局局長、國家物價局副局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秘書長、國務委員。

[407] 李劍閣（1949-），江蘇南通人。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處長，後任國家計委體改法規司副司長、國務院證卷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的趙明【408】，人民大學的周新成【409】和中組部的劉澤彭【410】。

4月26日，我們乘漢莎經法蘭克福到了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匈牙利負責接待我們的是財政部財政研究所所長哈根瑪耶爾和科學院經濟機制局局長塔爾多什，根據我們的考察計劃，他們給我們安排了緊湊的日程。我們的考察不是靜態的，像詢問現在的改革進展如何，面臨什麼問題；而是從匈牙利在什麼情況下進行改革，每一步的改革是怎麼考慮的，實行的結果如何，與開始的設計有什麼差距，這種差距究竟是設計思路的問題，還是實行過程中的問題，等等。

我們先後和匈牙利「經濟改革之父」涅爾什，副總理馬爾雅依、法路維紀，愛國陣線總書記伊姆萊，計劃局第一副局長普羅伊以及各主管部門負責人、專家學者、企業領導人、個體經營者等一百多個人，進行了直率而深入的探討和對話，以至匈牙利的朋友說：「你們每年有四、五百個團來訪問，連我們的母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可至今為止，就只有你們的考察最系統、最深入。」

說來可歎，周新成擔任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所長，竟一次也沒有到這些國家考察過。我們開始在匈牙利考察的幾天，周新成不斷地和我說，你們問的問題都是些ABC，我在他們黨的決議中都看到過，問我就可以了。我說，決議中寫的東西和實踐是有距離的，要考察真實的情況就應該從ABC開始。又過了3天，周新成慚愧地和我說：「你們這些年輕人考察的深入和嚴肅讓我服氣了，看來我只配給你們整理資料。」

5月26日，我們到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萊德。與南斯拉夫「經濟改革之父」格理格羅夫，聯邦議會拉基齊，社會主義聯盟主席團成員洛日奇以及專家學者、企業領導人、各界領導者、自治企業工人、個體經營者、一般居民，進行了認真而廣泛的討論。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謝黎【411】也感慨地說：「國內一年有幾百個團來訪問，我看你們的考察最有針對性，也最成功。」還專門請我們在使館吃了飯。

從我們到布達佩斯第一天起，大家就被這個美麗而典雅的古城迷住了。多瑙河自西北向東南流入黑海，而布達佩斯就是「多瑙河明珠」。河西岸古樸的布達與河東岸繁華的佩斯，由八座氣勢雄偉的大橋連接起來。西岸巴洛克式的布達城堡與哥特式的馬加什教堂壯觀神秘，東岸是行政、

【408】趙明，時任國家計委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409】周新成，時任中共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所長。

【410】劉澤彭（1946-），山東黃縣人。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副局長，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副部長、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新聞社長。

【411】1 謝黎，山西太原人。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

商業和文化中心，各種商品琳琅滿目。人們對生活看起來都充滿了希望，一對對青年男女歡快地走著、跳著、抱著，我們好像到了天上人間。

大家都陶醉了，每個人心裏都在稱道：「人家的社會主義，怎麼就搞得這麼好！」臉上露出了羨慕的神色。為了節省美元，我們住在了便宜的旅館，在匈牙利財政部職工食堂吃飯。可一開始工作，大家都是勁頭十足，連接待我們的主人也讚不絕口。周末，主人會給我們安排遊覽名勝或到郊外野餐。還有一次到葡萄酒廠的酒窖裏喝酒，好幾個人都喝醉了。考察結束時，匈牙利財政部為我們舉辦了歡送會，雙方都是戀戀難捨。

等我們一到貝爾格萊德，大家似乎一下子都傻了。那裏市場繁榮，生活富足，特別是夜生活豐富多彩。原來鐵托說：「我們的物質生活比不上西歐，要在精神生活上超過他們。」後來就開放了各種電影、戲劇，人們確實從中得到了很大的滿足。我們批判了那麼多年的「修正主義」，也搞得這麼好。比較起來，只有我們自己把自己「瞎折騰」壞了。大家誰都沒說什麼，但人人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受騙」的感覺。

據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謝黎說，因為有輿論監督，匈、南兩國的各級官員很少有貪污醜聞，也基本上不享受什麼特權。一次，南京軍區司令聶鳳智^[412]訪問南斯拉夫，到南軍總參謀長家吃飯，看這位總參謀長住的是三室一廳的房子，而且自己動手做飯，就好奇地問：「你就住這麼大的房子嗎？也沒個人給你做飯？」那位總參謀長說：「就住這麼大，當然自己做飯。你哪？」聶鳳智沒有回答，原來他在南京住了100多間房子，為他服務的人就有100多。

在匈牙利幾乎每天夜間都安排了工作，到南斯拉夫以後，就有意的放鬆一下。晚飯後自由活動，大家可以看電影、戲劇、上酒吧、聽音樂會。我也看了幾場在國內根本不可能上映的電影，比如，一部反映黑山共和國開放前後變化的影片就非常感人，無非就是有些裸體鏡頭。還有一些恐怖、色情片，剛上映時大家好奇，過了一段時間，就習以為常了。從中倒是可以看出人家的開放和文明程度，比我們那可是進步多了。

我們在匈牙利考察其間，索羅斯專程趕了回去。他在布達佩斯最好的餐館裏，請我和小強吃飯。聽他介紹才知道，他是在匈牙利出生的猶太人，1948年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讀書，1956年帶著268美元到了美國。靠著超眾的才智和能力，他很快成為億萬富翁。1970年，他40歲時，母親告誡說：「你賺了錢，應該為人類做些好事。」他成立了「量子基金」。1980

[412] 聶鳳智（1914-1992），湖北大悟人。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

年，他以 10 億美元建立了「開放社會基金會」。1984 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匈牙利科學院 - 索羅斯基金會。

索羅斯和我們說：「我在英國讀書時，相信了波普『開放社會』的理念。波普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他認為任何封閉系統都很難得到發展，只有開放的社會才能學到各民族有益的東西，也才能使自己得到發展。同時，在一個開放社會才能做到人人平等，給每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使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發揮。我不喜歡資本主義的欺凌弱小，更不喜歡斯大林主義的專制。我熱愛我的祖國，我希望社會主義國家能實行開放，使他們在開放社會中享受人類的財富，在平等的機會中施展他們的才能。」

我和小強聽了他的介紹，都很讚賞。我當時就表示：「中國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為幾十年的封閉，使我們從經濟、政治、文化上都大大地落後了。我們要改革成功就必須開放，吸收各國好的經驗，使每個人都得到平等發展的機會，使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發揮。」索羅斯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交個朋友。我想在中國建立一個與匈牙利一樣的基金會，每年提供不低於 100 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項目。」

我和索羅斯說：「我願意和你成為朋友，並且願意和你在中國建立一個這樣的基金會。」但他當即提出：「我提供 100 萬美元的同時，希望中國政府也提供相當於 100 萬美元的人民幣來做這些項目。」我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但又是一個窮國。要中國政府出這麼多錢會有困難，如果不需要這些錢的話，基金會辦成的機會比較大。」索羅斯同時也請高尚全吃飯談了這個問題，高尚全對建立這樣一個基金會也非常贊成。

考察中只出了一個小問題：白南風是研究社會問題的，一次他和孫方明想去看脫衣舞。孫方明問我想不想去，我說有事去不了，他又去問劉澤彭。結果，劉澤彭大驚小怪地向高尚全彙報了。高尚全緊張地立即找我說：「老陳，我們團可不能出醜聞啊，你要約束住大家。」我為了緩和氣氛，說：「您放心吧，這件事我知道。南風是研究社會問題的，想看一看匈牙利的民俗風情。沒什麼！」他才放下心來，事情總算沒鬧大。

5-19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改革給我們的啟示

總之，這次我們對匈、南的考察十分順利和成功，給我們每一個代表團成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短的 40 天，我們召開了 111 次座談會，形成了 30 萬字的紀要。其間，代表團還就「價財稅聯動」、「社會輿論調查」、「工人自治」等熱點問題，向國內發了電報。我們回國的第二天，趙紫陽

就聽取了我們的彙報，並給了考察很高的評價，還使熱議中的「價財稅聯動」改革方案降下溫來。

儘管匈、南兩國的改革還存在許多問題，但改革的成效是巨大的，改革的經驗教訓足資參考。那麼，他們改革的進程如何？改革的經驗有哪些？改革的難點是什麼？我們從中能受到些什麼啟示呢？

（一）改革的進程。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1948年第三國際情報局批評了南斯拉夫，認為他們農業集體化搞得太慢，因而鐵托加快了步伐。結果，農民怠工了，機器扒窩了，土地荒蕪了。1953年鐵托大膽地挑戰「斯大林模式」，進行了改革：第一，放開價格；第二，取消指令性計劃；第三，取消物資調撥體制；第四，實行資金撥款為貸款；第五，企業實行工人自治。實行這些改革以後，生產發展、生活改善，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但面對國際市場，因為工廠的效率低而導致產品的成本高，所以缺少競爭力。加之1953年「放開價格」後出現了混亂，就實行了「固定、浮動、自由」三種價格，結果出現了「百慕大三角」，也就是價格不合理要補貼，補貼要增加稅收，稅收增加又降低了企業活力。到1963年就出現了「比價復歸」。1965年進一步放開價格，把投資權、分配權下放，又出現了「投資膨脹」和「消費膨脹」。但這時開始借外債，發展速度還不錯。

1956年，蘇軍鎮壓了所謂的「匈牙利事件」，改革先驅納吉遇難。卡達爾出任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後，開始推行改革，第一，寬容「事件」參與者，平反冤假錯案；第二，取消政治局委員特權，如：住房、吃飯、坐車不要錢等；第三，允許農民退出強制組織的合作社；第四，取消農產品義務交售制；第五，著手討論經濟改革。但直到1966年，才決心將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1968年取消了指令性計劃，開始實行間接調控。

其實，匈牙利1968年進行的改革，正是南斯拉夫1953～1965年實行的。他們實行的「價稅財聯動」到第二年，就變成了「一戶一率，一年一調」，發展到用三百多種行政性手段進行非規範化的調節，同樣陷入了「百慕大三角」式的「比價復歸」。1973年在蘇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蘇斯洛夫干預下，總理福克和主管經濟改革的副總理涅爾什下台了，改革受到了挫折。直到1979年，改革的步伐才又一次加快。

我們到匈南考察時，雖說他們在改革中遇到了種種困難，但他們20年與40年的改革，不僅使他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使國的家發展和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平均國民收入的增長遠遠超過了其他大多數東歐國家，從1953年到1986年，南斯拉夫從人均150美元增加到2,800

美元，匈牙利從人均 500 美元增加到 3,200 美元。我們瀏覽了他們的城市和農村，生活差距不大；農村、小城鎮和大城市的市場，供應都很豐富。

(二) 改革的經驗。

第一，取得政權的共產黨人幾乎都不斷犯「左」的錯誤。他們說：社會主義的空想，在十月革命以後就出現了，列寧搞了「共產公社」；到斯大林開始否定商品貨幣關係；赫魯曉夫更提出「建設發達的共產主義」，受到很多挫折；勃列日涅夫改提為「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契爾年科則說「我們處在發達社會主義的入口處」；再到戈爾巴喬夫就強調改革了。因為不能再用主觀幻想代替客觀現實了。不改革就難以為繼，不改革就會落後挨打，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蘇聯和東歐各國開始借鑒匈、南改革的經驗，紛紛推行改革。

第二，改革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改革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方面改革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個各自獨立又互相重疊的系統，不能把經濟改革單獨抽出來，沒有其他的改革，經濟改革也難以深入；另一方面這些系統的發育都有一個過程，不是靠人的想像力，宣佈一下就可以形成的。所以，不能把改革理想化，也不能企望改革一下就能成功。匈、南兩國都經歷了很長的計劃、市場均不能很好發揮作用的「兩不像」時期。

第三，改革不可能有一個包治百病的藥方。再好的方案也會有弊端，而且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改革方案不是不可以選擇的，但要遵循規律從實際出發，不是從書本上歸納、或從腦袋裏想像出來的，更不能過多地依靠政治力量干預經濟、社會生活的進程，否則就會犯錯誤。自殺性的嘗試越多，改革就越難取得進展。但頂住壓力，抓住有利時機，邁出實質性步伐，形成改革不可逆轉的局面非常重要。

第四，改革是全社會的事情。改革涉及所有人的利益，不是少數人的事情，不是哪個部門的事情。所以，應該把為什麼要改革，改革的目標，改革些什麼，改革會遇到哪些困難和風險，告訴全體民眾，增加社會對改革的理解和承受能力。匈牙利的改革一開始，就建立了「社會輿論觀測系統」，根據改革的需要，不斷調查民眾對改革的承受能力，以及不同階層民眾的需求和願望，並有的放矢地宣傳改革，這樣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五，改革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如果領導人認識不一致，就很難保持政治上的穩定，也就很難推進改革。因為當改革遇到困難的時候，反對改革的領導人就會以「人民利益的維護者」、「社會主義的保衛者」、「馬列主義的捍衛者」自居，而主張改革的領導人卻往往不能理直氣

壯地說明，改革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這樣，改革的力量就會一次次遭到清洗，直至改革被扼殺。

（三）改革的難點。

1. 必須注重微觀基礎的改革。南斯拉夫 1952-1965 年的改革被他們稱為「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場經濟的階段」，60 年代初就出現了如何擺脫「百慕大三角」（即「價格、補貼、稅收」的惡性循環）困擾的問題。匈牙利 1968 年實行「價稅財聯動」，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企業能真正作到自負贏虧，才是根本擺脫「百慕大三角」的出路。也就是說，國營企業只有進入市場，宏觀信號對他們才能有效地起到調控的作用。

2. 企業要以贏利為目標。格裏格羅夫再三說：「工人是現實物質利益的追求者，不能把他們理想化，如何使工人像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對待公有財產，像企業家那樣去經營，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解決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南斯拉夫實行「工人自治」將投資權、分配權下放以後，之所以出現「投資膨脹」和「消費膨脹」，就是企業追求短期利益的結果。國營企業的增殖無人負責，因為誰都不覺得財產是他的。

3. 防止出現惡性通貨膨脹。改革的過程中，出現通貨膨脹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定要警惕物價、工資輪番上漲，所帶來的惡性通貨膨脹。改革初期，往往投資少、見效快的加工工業會高速增長；當改革深入，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而消費品價格的補貼又難以增加時，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式的「比價復歸」。涅爾什將這種「投資品高價和消費品低價」的「兩級差價」問題，當作價格改革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4. 一步步推動基礎性改革。匈、南兩國很讚賞我國的農村改革，但我們在其他方面都與他們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他們在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工資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政治改革方面，都遠遠走在我們前面；而在建立要素市場、健全法制、輿論監督和政治環境寬鬆等方面，我們更是遠遠落在他們後面。正如張少傑所說：「人家是高收入水平下的改革問題，我們是低收入水平下的改革問題。」

5. 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深入。涅爾什說：「我認為我們經濟改革有兩大問題：一是產權無人負責，二是資金沒有價格，不解決就不會有效率；而政治改革的問題：或者是黨內派系公開化，或者是實行多黨制，否則就不能有效抑制腐敗，不會有真正的民主。沒有民主的效率是靠不住的，很難給人們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他的話實在令人深思。匈、南兩國從對改革的認識到實踐都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不久，趙紫陽對來訪的匈牙利副總理法路維基說：「你們的經驗對中國有很大的幫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的先行者和開拓者。成功經驗是主要的，遇到困難後得到的教訓也是財富。」我們回國後，集中寫作了10天，後來出版了一本近30萬字的書：《艱難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413]。因為我們一路省吃儉用，索羅斯資助考察的資金有所結餘，我們分給了代表團每個成員500美元。

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考察順利地完成了。代表團解散時，馬凱真摯地握住我的手說：「這次40多天的接觸，讓我從心裏佩服你，陳元要有你一半的能力就好了。」

5-20「馬丁事件」和「秦柳方告狀」

剛回到北京，鮑彤就找我說：「紫陽看了馬丁的文章，覺得這個人肯想問題。你派人調查一下他的情況。」原來，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報》發表了馬丁的一篇文章，題為《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我找來看了一下，覺得他抓住了經濟學研究近幾年出現的新動向，文章寫得不錯。再一瞭解，才知道這麼一篇綜述性的文章，竟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甚至釀成了轟動一時的「馬丁事件」。

事情是這樣的，馬丁文章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是：從批判經濟學轉向建設經濟學；從對經濟政策的理論闡釋轉向科學分析；從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排斥、否定轉向分析借鑒；從生產關係的研究轉向生產力以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作用機制的研究；從經濟關係的一般研究轉向經濟運行機制的具體研究；從經濟的定性分析轉向定量分析；從理論經濟學轉向應用經濟學；從微觀經濟轉向宏觀經濟、從短期規劃轉向長期戰略的研究；從孤立的單向度的經濟學研究轉向綜合的多學科的社會經濟研究；從線形知識結構轉向複合型知識結構。文章還提出：「中國經濟學家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中走出來，在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不應從書本教條出發，而應該從生動的事實出發，創立一門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科學。」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好文章。誰知文章發表後，先被海外媒體歪曲報導，再被國內媒體以訛傳訛，遂鬧出了一場風波。先是日本時事通訊社作了不實的報導；接著，受國內津貼的紐約《中報》發表社論尖銳批評了馬丁的文章；1986年2月，新華社編輯專供

[413]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編：《艱難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經濟管理出版社。

中央領導參閱的《國內動態清樣》以「紐約《中報》批評我國某些經濟學家『食洋不化』，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強大的生命力」為題，加前言報導了《中報》的社論；3月新華社主辦的《經濟參考報》又公開報導了同樣的內容。

這種唯恐天下不亂的作法，當然會引起上層的注意。2月，鄧力群說：這是「高層次的精神污染」，「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薄一波^[414]、胡喬木、胡啟立^[415]都作了批示。正在此時，對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持批評態度的、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秦柳方^[416]，給胡喬木寫了一個叫作《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的報告，大批經濟領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點名批評《世界經濟導報》，要求解散體改所，並提出「把那些搞自由化的年輕人下放到農村去」。

3月1日，胡喬木將這個報告轉送胡耀邦、趙紫陽。3月3日，趙紫陽批示說：「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陽同志意見。」並要求中宣部請經濟界、理論界專門座談，弄清事實得出正確結論。3月22日，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417]召集了專家、學者與媒體代表30多人進行討論，除了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就是在包產到戶問題上首鼠兩端的喻權域，在受了大家批評還厚著臉皮強辯外，其他與會者都稱讚馬丁的文章是一篇好文章。

著名經濟學家馮蘭瑞^[418]在會上尖銳地指出：「近年來，理論界氣氛比較緊張，與個別同志『慌報軍情』、干擾領導決策關係重大。」還有人提出：「為什麼這種極不稱職、謊報軍情的『哨兵』仍佔據輿論陣地？這種狀況不改變，不可能有寬鬆活潑的學術環境！」而那個製造事端的喻權域，事後不僅沒有受到任何處分，胡耀邦被迫下台時，他又在中顧委召開的批胡生活會上，以「馬丁事件」為例，大批胡耀邦、于光遠，「六四」後竟被提拔為《人民日報》國內部主任，可歎的是中國也就被這類人搞壞了。

我請張少傑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何家成，一起去南京大學調查馬丁的情況。他們親自和馬丁進行了交談，回來說：「馬丁真名叫宋龍

[414] 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系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415] 胡啟立(1929-)，陝西榆林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保留中央委員。

[416] 秦柳方(1906-2007)，江蘇無錫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417] 王惠德(1922-1993)，四川渠縣人。時任中央編譯局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418] 馮蘭瑞(1920-)，貴州貴陽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執行主席。

祥，是研究哲學的。剛畢業，在南京大學哲學系當講師。人很有頭腦，喜歡鑽研，但對經濟學不太懂。」我向鮑彤作了彙報。一次到委裏開會，體改委秘書長洪虎滿臉嚴肅地和我說了一件事。

洪虎是一個辦事很認真的人。他誠懇地說：「一諮啊，體改所的事，委裏都放手讓你去處理。你知道體改所是一個很敏感的地方，無數的眼睛都盯著呢。最近，還有人提出要解散體改所，可不能出麻煩啊。有人彙報說，你們的會議上竟出現了有婦之夫和有夫之婦接吻的不雅場面，這成何體統？一定要嚴肅處理。」我心想，真是一點兒小事就有人彙報啊，連忙說：「您放心，我回去就處理。」

回到所裏，我立即找張少傑談話。我說：「你是一個難得的人才，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但你取得成績以後實在有些輕狂。上次，你在會上和趙滄江親嘴的事兒，有人已經反映到委裏了，讓我處理。你看怎麼辦？」少傑很訝異地說：「真沒想到，這麼點小事委裏都知道了。我和滄江在匈、南考察時相處融洽，那天談到一個問題，情不自禁就親了她一口，並沒有想什麼，看來還真得小心了。」

我說：「現在整人，一是政治問題，二是經濟問題，三是作風問題。我們所大多是青年男女，乾柴烈火，一碰還不燒起來！我是睜隻眼、閉隻眼，考慮到對外形像，這次恐怕得給你處分。要不然，委裏交待不過去，也堵不住悠悠之口。」少傑很無奈。我說：「我先免去你研究室主任的職務。過3個月、半年，你表現好，再重新任命。你看如何？」少傑很委屈地說：「聽你的。」

我召開了全所大會，說：「我們所處在風口浪尖上，大家都在盯著。我們要提倡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風格，甚至不同的作派。但我們不能容忍損害體改所整體形像的行為，鑒於張少傑有傷風化的行為，現在免去他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的職務。每個人都要從中引以為鑑。」大家看我繃著臉，從來沒有的嚴厲，誰都沒有吭氣，但臉上卻露出不解的神色。

會後，一撥一撥的人來找我求情，我沒有說什麼。從此，所裏青年人的行為注意多了，可以說軍容風紀為之一震。我何嘗不知處分太重了，但我不能不「揮淚懲才子」以正所風。後來，我向委裏彙報，幾個領導都說「很好」。我心裏卻覺得有些對不起少傑，不到半年就又恢復了他的職務。少傑也是個豁達的人，後來始終在所裏起著學術帶頭人的作用。「六四」後，他到美國來看我。說起這件事，我向他表示歉意。他倒是很坦然地

說：「老陳啊，我們那時年輕，哪知道辦這個所那麼難。你辦事出以公心，我一點兒都不怪你。」

5-21 提拔周小川，保護孟璉，使用朱嘉明

「馬丁事件」告一段落。一天，鮑彤打電話找我。我到了總理辦公室，他已經沏好了茶在等著。他稱讚了幾句我們的匈、南考察，接著問我：「你對周小川印像怎麼樣？」我說：「接觸不多，印象不錯。」他又問：「怎麼個印象不錯？」我說：「我在幾次會上見過，感覺他一表人才，溫文儒雅，談吐不凡，很有頭腦。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成立時，大家推薦他擔任了研究部部長。」鮑彤感歎地說：「是啊，小川是個人才！」

我問：「怎麼了？」他說：「紫陽想用他都很難啊。」我詫異地問：「為什麼？」他說：「小川在研究經濟改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雖然還不成熟，若能提供一定條件的話，今後會有所作為。紫陽想讓他到體改委任個職，到哪個局當個副手，磨練磨練，可是誰都不表態。」我說：「小川對金融財稅體制改革不是很有興趣嘛，那到規劃局、宏觀局不都可以嗎？何況楊啟先^[419]、傅豐祥^[420]在這兩個局當局長，人都很開明啊。」鮑彤說：「難就難在他們都不表態。所以，想請你幫個忙。」

我知道，楊啟先、傅豐祥都是體改委委員，在委裏很有威望。為什麼他們對小川的事不表態呢？鮑彤和我都點起了煙。我心想，他們不表態，一者可能和當時老百姓對高幹子弟「走後門」謀取官位反感有關。小川的父親周劍南從部長卸任後，被紫陽聘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就有不少非議。二者小川剛博士畢業，一下安排局裏任副職，也會使一些老資格不滿，難以平衡。那麼，鮑彤找我談小川的事，顯然是想讓我「幫個忙」安排小川。

我說：「改革需要的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小川是個人才，破格使用才能發揮他的特長。這樣吧，先讓小川到體改所當個副所長。體改所的人都很年輕，比較好安排。」因為體改所組建時，即賦予了所長提名副所長的權力。由我提名小川擔任副所長，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鮑彤笑著說：「你這個主意不錯。下次委務會議上把你的意見說說。」

[419] 楊啟先 (1927-)，四川重慶人。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規劃組組長，後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420] 傅豐祥 (1929-)，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宏觀局局長，後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3天後的委務會議上，志文主持會議說：「小川研究生畢業了，紫陽希望他到委裏工作，大家看看怎麼安排比較好？大家議一議。」一分鐘、兩分鐘過去了，沒人講話。鮑彤給我遞過來一個眼色。我說：「我和小川接觸，感覺確實是個人才。不過，他剛畢業，還年輕。體改所的研究人員都很年輕，讓小川先到所裏當個副所長吧！」鮑彤立即說：「一諮這個主意不錯，我贊成。」志文接著說：「那就按一諮的意見辦吧，有沒有不同意見？」沒有人反對，我的提議就算通過了。

很快，體改委下發了任命周小川為體改所副所長的文件。不料，一周後，中央組織部來電話說：「周小川剛入黨，還沒轉正，不能擔任你們所的副所長。」我覺得沒有道理，就把我的意見立即轉告給了志文和鮑彤，我說：「小川即使是個黨外人士，難道當個副所長也不行嗎？這是違背中央破格提拔有改革開放思想年輕人精神的。」志文和鮑彤很同意我的意見，中央組織部倒也沒有再糾纏。

三個月後，周小川被任命為體改委委員；年底，又被任命為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元旦時，小川來看我，說起剛到外經貿部，年終獎金就發了3,000元。我吃了一驚，問：「怎麼會那麼多？」他說：「老陳，這你就知道了。外經貿部掌控進出口權，油水大得不得了。像進口1噸化纖3,600元，賣出去就是7,200元，1噸就淨賺3,600元。這些賺的利潤大多就都成了部裏的福利。」我說：「你這外貿體制改革任務不輕啊。」

1987年初的一天，我到體改委開會。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李嵐清^[421]見到我，悄悄地和我說：「小川調到外貿部有利打破鄭拓彬^[422]保守的一套。可是，他的人事關係還在體改委，關係不轉，就不屬於外貿部的人，只是個客卿，不利於他開展工作，你跟志文說說。」我說：「你直接說嘛！」他連連鼓動我去說。我和志文說了以後才知道，小川的預備黨員要到三月才轉正。小川黨員轉正以後，就把關係關係轉到外經貿部了。後來，他也確實為改革開放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王曉魯是最早參加發展組的成員，他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優秀學者。體改所組建時，調他來擔任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一年多來，他們對產業結構和區域發展的研究，就取得了令人讚佩的成果。一天，曉魯找我說：「老陳，我愛人的哥哥孟璉很有才華，在國家計委作研究工作，薛暮橋很欣賞

[421] 李嵐清 (1932-)，江蘇鎮江人。時任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後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422] 鄭拓彬 (1924-)，陝西澄城人。時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

他。可是，因為他曾在《四五論壇》上發表過幾篇文章，整黨時老被人揪住不放，你能不能幫幫他？」

我說：「怎麼幫？」曉魯說：「比如說，先調到我們所，過渡一下，再調走。」因為所裏規定，凡沾親者一律不能入所；既使所裏兩人戀愛結婚，也需一人調出，以免近親繁殖。我外甥女吳南櫻的丈夫林岡，原在胡啟立那裏工作，後從人大經濟系研究生畢業，想到所裏來。我為避嫌，都沒有同意他來。我和孟璉談了一次，果然很有見識。我覺得這樣的人才確實應該保護一下，就把他調來了。正巧，鄧樸方要組建戰略所，讓我推薦一個人，我就請孟璉去了。

維凌回國來找我時，一再說朱嘉明是個人才，在馬洪那裏得不到重用，希望我能給他提供些機會。說心裏話，我和所裏的研究骨幹對嘉明印像並不好，覺得他是個「說大話、不幹實事」的人，而且名利心很重。拂不過維凌的面子，我和嘉明談了幾次，聽他對問題的分析，感覺他比在工經所時紮實多了。我和他說：「你要認真作成幾件事，才能取得大家的信任。你先替我主持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常務工作如何？」他說：「沒問題！」

嘉明在通過博士學位前，找到我說，擔心南開大學的滕維藻^[423]教授找他的麻煩，因為上海陳琦偉^[424]的博士學位就被滕老卡住了，他希望我能幫他一下。我說：「只要你的水平夠，評審的時候你注意揚長避短就好辦了。」在他的博士評審會上，我採取了先聲奪人的作法，第一個發言，肯定他的水平和貢獻。滕老沒有多說什麼，他的博士學位無異議地通過了。後來，我又推薦他擔任了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的執行委員。

體改所成立學術委員會時，我們請體改委常務副主任安志文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425]當顧問，高尚全當主任委員，我當副主任委員。學術委員有：北大厲以寧^[426]、人大吳樹青^[427]、計委桂世鏞^[428]，體改委楊啟先、傅豐祥、周小川，體改所王小強、徐景安、李峻，還有何維凌和朱嘉明。雖然所裏很多人不同意嘉明當，我還是力排眾議讓他當了。無論如何，要多多益善地團結青年中的有志之士，改革才可能有效地從各方面推進。

[423] 滕維藻（1917-2008），江蘇阜寧人。著名經濟學家，時任南開大學校長。

[424] 陳琦偉（1952-），時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金融系，後任亞洲研究所所長、中國創業資本研究中心主任、亞商集團董事長。

[425] 劉國光（1923-），江蘇南京人。著名經濟學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426] 厲以寧（1930-），江蘇儀徵人。著名經濟學家，時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主任。

[427] 吳樹青（1932-），江蘇江陰人。政治經濟學家，時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教務長。

[428] 桂世鏞（1935-2003），浙江湖州人。經濟學家，時任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所長。

5-22 在中央黨校的報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6月10日，鄧小平發表了「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的重要談話，各地一批熱心政治改革的青年人紛紛活躍起來。7月，在文化部召開的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朱厚澤說：「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這就是後來被人們稱頌的「三寬政策」。我見到朱厚澤和他說：「您這個『三寬』提得好！很得人心。」

中央黨校的遲福林、吳偉找到我，說他們要搞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經副校長陳維仁^{【429】}和秘書長史維國^{【430】}同意，讓我給黨校的省軍級學員作一個報告，我婉言謝絕了。過了兩天，史維國親自來找我，他說：「你一直強調經濟改革要與政治改革相配合。現在小平發話了，你就講講『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係，聽講的人都是省軍級學員，他們理解了作用就大了。」實在推辭不過，我只有答應了。

7月10日，我以《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為題，在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上，作了個1小時的大膽發言。報告結束時，得到了滿場掌聲，大家紛紛圍過來和我說：「你這個報告理論結合實際，有廣度、有深度，對我們很有啟發。」過了幾天，遲福林告訴我：「你的報告錄音已經整理上報了。」我說：「你們怎麼也不讓我看。」他說：「老陳，整理錄音的人對你佩服不已，說你的報告一句廢話都沒有。」

我在這個發言裏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改革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客觀要求。我首先講到「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不可抗拒的潮流」。十月革命以來，年輕的社會主義者都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目標當作現實，二是用一般否認特殊。這種以理想代替現實的作法，給社會主義帶來了一系列損失。如果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但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系統的發育都有一個過程。我講了匈、南改革對我們的啟示以後，接著提出：「改革的關鍵是形成一個現代化的組織結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依托於制度文明」。

我說，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演進的過程，就是形成一個合理的組織結構的過程。而封建傳統的延續、軍事共產主義的繼承和斯大林模式的移

【429】陳維仁（1924-），雲南武定人。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430】史維國，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秘書長。

植，使「我們建立了一個黨、政、經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權的，按照行政層次、行政區劃、行政命令管理的產品經濟模式，這種模式就不能不帶有強烈的封建宗法的色彩」，後來胡喬木在這句話下面劃了重重的一筆，批道：「污蔑我們黨搞了封建社會主義！」差一點給我惹來了麻煩。

我接著說：「沒有一個現代化的組織結構，我們也可以把經濟發展上去，比如，犧牲人民利益的發展，破壞資源的發展，大量浪費的發展，實現竭澤而漁的高速度不是沒有可能的。但是，要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振興和持久繁榮發展，不奠定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卻是不可能的。所以，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文明的組織結構，我認為是十分關鍵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經濟社會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我說，我們研究發展和改革，必須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一是「雙重模式的轉軌」，也就是「從一個解決溫飽的發展模式向實現小康的發展模式轉軌」，「從中央指令性計劃的產品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式轉軌」；二是「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不同的區域對發展和改革要求不同的對策」；三是「經濟體制改革要和解決重大的經濟社會問題相結合」。而「社會經濟系統的發育，不是靠人的想像力，宣佈一下就可以形成，它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所以，正像不能把社會主義理想化一樣，不能企望改革理想一天就能實現。」南、匈改革中，先後出現了「價格——補貼——稅收」這個「百慕大三角」，造成了「投資膨脹」和「消費膨脹」，但人家在改革中還是前進了，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到十倍以上。我們卻是從1958年到1978年「瞎折騰」了20年，人均國民收入沒什麼增長。

那麼，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任務為何呢？「總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具體是三個方面：第一是自負盈虧的企業；第二是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第三是政府對經濟實行間接管理。」但作起來非常難，南斯拉夫與匈牙利先後改革了40年和20年，至今仍處於計劃與市場均不能恰當發揮作用的「兩不像」階段，而他們經濟改革的難題始終是這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證。我認為，我們政治體制的主要問題還是小平所說「權力過分集中」，表現在：一是在黨和國家政權關係上，權力過分集中在各級黨委手中；二是在國家政權內部關係上，國家機關直接受黨委制約，不向權力機關負責；三是在中央和地方關係上，地方缺少必要的自主權；四是在政府和社會關係上，政府把社會管死了；五是在黨內關係上，權力集中在黨委、特別是書記手中。

我覺得，政治改革固然是心中的期盼，但目前還不宜多談。就說了幾個不成熟的想法：一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關鍵是政府職能的分解與轉變；二是黨的改革，根本上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黨在不同層次、部門，以什麼形式、怎麼領導的問題，實際上黨和國家關係問題；三是幹部制度改革，幹部隊伍要分解、分類、篩選，不同崗位採取委任、考任、選任、聘任的不同辦法；四是觀念系統的改革。總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依賴於經濟民主化。離開經濟民主化談政治民主化，我看恐怕很難做到。

最後，我提出：「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但這是一個發展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應該「有計劃、分階段地實現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科學化和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幸好鄧小平看到了這個發言，說：「很有新意！」我才沒有被胡喬木整肅。後來，體改所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報告》1986年第31期刊出了這個發言，又被《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華文摘》先後轉載。

我要離開中央黨校時，一位國防大學的軍級研究員把我拉到一旁說：「我很敬佩你的精神，但中國現在的封建等級觀念，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像我們國防大學有師級研究員、副軍級研究員、軍級研究員、副兵團級研究員、兵團級研究員，不僅工作、生活待遇有等級差別，而且連家裏養雞都有等級差別，蓋的雞窩大小不一樣，連喂的飼料都不一樣。已經享受到的待遇，誰也不會願意失去啊。」

1984年底在武漢創刊的《青年論壇》，以其清新活潑、開明解放著稱。在創刊號上登載了胡德平的《為自由鳴炮》，與鄧樸方呼籲人道主義遙相呼應，造成了很大的反響。今年，該刊7月號、9月號上連載了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又一次引起了轟動。9月初，在《青年論壇》北京記者站的座談會上，胡平重申伏爾泰的觀點「我反對你的觀點，但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力」，但共產黨、特別是那些掌控話語霸權的左派能接受嗎？難以樂觀。

5-23 創建中國社會輿論調查系統、

中國企業跟蹤觀測系統和中國宏觀景氣分析系統

我們在匈牙利考察時，給國內發的第一個電報是，介紹他們實行「價稅財聯動」的情況，建議不可輕易啟動。第二個電報是，介紹匈牙利改革一開始，建立社會輿論觀測系統的情況。他們根據改革的需要，不斷調查民眾對改革的承受能力，以及不同階層民眾的需求和願望；並有的放矢地宣傳改革，把為什麼要改革，改革的目標，改革些什麼，改革會遇到哪些

困難和風險，告訴全體民眾，增加社會對改革的理解和承受能力，這樣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們建議國內也籌劃一個。

回國後，我立即請孫方明轉告朱厚澤，問他能不能搞一個？回答是有顧慮。我知道，朱厚澤缺少胡耀邦的膽魄，這個中宣部長不好當，但又覺得他也太畏首畏尾了。我去拜訪他，向他說明匈牙利搞起這個系統以後，對整個改革和社會輿論起了重大的正面作用。如果今後的宣傳工作能在民意調查的基礎上進行，將會給改革帶來巨大的正面效益。他還是下不了決心。我退一步說，由體改所組建一個這樣的調查系統，請中宣部配合，他倒是同意了。我回所後，立即與孟繁華、楊冠三商議，請他們著手組建。

同時，我去找高尚全和他商議此事。他親自聽過匈牙利朋友的介紹，當然清楚這件事的意義，建議我們與志文、鮑彤一起商量。商量的結果是，再建議朱厚澤做，他為難的話，我們就做。一周後，我們決定自己作，建立一個中國社會輿論調查系統，由高尚全擔任領導小組組長，我擔任副組長，由體改所社會輿論調查室孟繁華、楊冠三負責這個系統的調查業務和各種具體事務。這樣，中國第一家全國性的民意調查機構就籌劃起來了。

其實，1984年底，體改所剛組建，白南風與楊冠三就和北京一些大學的社會學系合作，首次把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方法引入改革決策研究，進行了對價格改革的社會心理反應調查。以後的兩年，又進行過14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社調系統的建立，可以使社會調查工作更科學化、正規化、有效化，社調系統的宗旨是：「科學、及時、準確、公正地反映公眾的意願，為改革決策和政治民主化服務。」

社調系統採用國際先進的社會科學統計軟件包（SPSS）進行統計分析，保持著很高的抽樣精確度，還進行電話調查、郵寄調查、個案調查和追蹤調查等等。特別是在楊冠三的努力下，社調系統在籌備中，就與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隊合建了全國農村居民調查網，調查網點按照多階段聚類抽樣方法進行；還組建了40個城市居民調查網；又與中宣部新聞局合作，建立了由100家新聞單位組成的新聞觀測系統，出版了《輿情調查》。並專門培訓了掌握抽樣方法、訪談技巧及統計分析知識的一大批調查員。

雖然我們1985年400人大調查的嘗試取得了成功，但這種方法帶有很大的隨機性和不穩定性。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匈、南改革的試驗，我建議體改所立即著手創建中國企業跟蹤觀測系統和中國宏觀景氣分析系統，所務會議無異議地通過了，並請彭照平籌劃前一個系統，請程曉農籌劃後

一個系統。我向體改委彙報後，也得到了一致同意。彭照平起草的關於創建中國企業跟蹤觀測系統的方案，立即得到了趙紫陽的支持。

因為在擴大企業和地方自主權中出現了投資膨脹和消費膨脹，那麼，究竟企業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反應的？如何預測經濟的景氣和週期？等，就成了新的問題。我們既沒有一個能在企業微觀層面上收集可靠的、可量化的並能與國際上同行的會計制度和分析方法接軌的信息系統，也沒有一個能夠在統計意義上定量收集和分析企業在「雙軌制」下運行的生產、銷售、投資、現金流動諸方面行為和效益的信息系統。顯然，這成了改革中急需解決的問題。所以，趙紫陽不僅批准了這個方案，而且委託鮑彤與財政部、國家科委協商，很快落實了 30 萬元的系統啟動資金，由體改所負責設計系統的實施。我立即任命彭照平為中國企業觀測系統主任，由他全權負責組建這個系統。

彭照平是一個聰明絕頂又辦事認真的人，他在社科院讀數量經濟研究生時就廣受好評，這回可以很好地發揮他的才幹了。照平很快就提出了實施辦法，在科學定點抽樣一批企業的基礎上，利用現行會計制度和統計制度，參照國際上通用的會計指標體系及其分析方法，定期地收集定性和定量數據，建立起轉軌時期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行為及市場表現的統計分析決策支持系統。他與李磊、李純夜以繼日的苦幹，在國家統計局工交司綜合處趙岷山的配合下，僅僅用了短短數月，就將「中國企業觀測系統」建立了起來，於 1987 年初夏開始運行。

該系統定期收集來自 2,000 家定點企業的定性和定量數據。定性數據來自於每 6 個月一次向樣本企業的廠長經理們發放的問卷。問卷包括生產能力的利用、產品銷售、原料和存貨、訂單和主要產品的價格諸方面與去年同期的對比，以及對今後 3-6 個月的預期；問卷同時也調查廠長經理對生產擴張制約因素不同程度的判斷，如市場需求、勞動力、設備、原材料供應、能源供應、電力供應以及流動資金等等。

在定量數據方面，該系統從其中 800 家企業中收集量度數據，共 100 餘項指標，涵蓋了企業資產負債、銷售收入、成本以及資金流動方面的活動。雖然該系統於 1987 年投入運行，所有抽樣企業均被要求提交 1986 年的季度數據。此外，該系統還收集年度補充數據。這類數據主要涉及固定資產投資、利潤留成的使用、職工人數的變化、產品種類的增減、產品成本結構的變化，以便於研究企業的投資和創新行為。

定點抽樣的企業分佈在 39 個工業行業和 30 個城市，這些城市包括最重要的工業城市（如：京、津、滬）、改革試點城市、沿海開放城市及計

劃單列市，同時也盡可能地照顧到城市的地域分佈。城市確定之後，企業在不同城市的抽樣數目則取決於各樣本城市的工業生產總值在這 30 個城市的工業生產總值之中的相對份額。確定了樣本企業在各城市的分佈之後，企業在各樣本城市中不同行業的分佈則取決於各工業行業的工業產值在該城市工業總產值中的相對份額。

中國企業跟蹤觀測系統的獨特功能在於，保持了數據的一致性，消除了不定期、不定點隨機抽樣調查之間數據的不可比性；它不僅收集定量數據，也採集定性數據。更重要的是，該系統體現了利用現行會計制度和統計制度，又盡可能的運用國際上通行企業分析方法的設計思想，突破了當時統計指標體系僅為計劃經濟服務的局限性。該系統建成運行伊始，適逢承包制在全國工業企業中大面積推行。

我們在系統內進行了廠長（經理）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表明，承包制在帶來效益增長的同時，還提出了其他方面相應改革的迫切要求。從中可以看到，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多種可能性和希望。調查的結果不僅專題報告給紫陽，還在《經濟日報》重要版面刊出。詳細的研究報告則在後來編入「中國企業制度改革研究課題組」撰寫的《承包制在實踐中》一書中，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

此後，我們又在該系統搜集數據的基礎上，對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長期虧損問題進行了研究。從對樣本企業中虧損企業在不同行業、不同時期的觀察分析表明，承包制不大可能從根本上把企業從長期虧損中解脫出來，其重要功能在於為企業之間的兼併和重組提供了一個機制，並將企業制度改革，如股份化、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等問題，推到了無法迴避的改革前沿。

該系統的建成和它所做的調查分析工作，很快引起了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同行的關注，體改所即與他們啟動了合作研究。不久，體改所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及世界銀行發起了聯合研究項目。所有這些項目均以該系統為基礎，試圖對企業效率、市場壟斷、投資行為以及宏觀金融政策對於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企業的影響和短期景氣循環等方面，從企業微觀層面上進行分析和研究。

此外，我們每個季度還向這些樣本企業發佈我們基於系統數據的分析報告和匯總指標，使企業領導瞭解樣本企業在本地區、同行業中的相對位置，以及其他企業領導對當前經濟態勢的估計和預期。這樣做就達到了信息取之於企業、又服務於企業的目的，也起到了調動樣本企業積極性的作用。「六四」後，系統和項目的進展受到很大影響，體改所也遭解散。然

而所幸的是，以此系統為基礎的與世界銀行的合作項目仍得以保留和繼續，後來由國家統計局將該系統延續至今，成為官方發佈微觀景氣報告的專門系統。

當年建立中國企業觀測系統的初衷，是為全國企業改革的研究與決策提供一個「號脈」的機制。試圖在企業的層面上探索改革的進展、存在的問題和可能的選擇；同時，也可以為改革的宏觀決策提供建立在調查研究基礎上的微觀依據。如今，每當《人民日報》上刊登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微觀企業景氣報告或相關報道時，總讓人免不了感歎紫陽當年的遠見和決斷。在他主政期間產生的種種進步，已滲透到國人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431】}

至於程曉農負責籌劃組建的宏觀景氣分析系統，進展得則相對緩慢一些。程曉農從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畢業後，分配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政策研究室工作，因為覺得那裏太呆板，調到了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他和宋進攻、黃運成花了不少功夫，但系統建設的收效甚慢。為什麼呢？首先是因為當時的財政、稅收、銀行的數據是保密的，訊息不公開，得到相關的資料很難；第二，中國的宏觀調控系統不完善，很難對市場與企業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三，體改所也人力不足。這個項目的進展可就不那麼順利了。

5-24 建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

1986年7月，維凌回國來找我，和他一起來的梁恆已經擔任美國中文刊物《知識分子》雜誌的主編，代表索羅斯和我談判在中國建立基金會的事。其實，高尚全和我一回國就在體改委的委務會上，一五一十地將索羅斯提出在中國建立一個基金會的意見作了彙報，大家都認為這件事很有意義。因為索羅斯提出「社會應該是開放的，開放社會中人人應該是平等的」，和我們的改革目標是一致的。

先後經過三個月的磋商，總算討論通過了雙方認可的方案。在磋商的過程中，體改委的幾個領導人都同意建立這個基金會。我並將每次討論的文件都送給他們看，也沒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磋商討論集中在三個問題上：首先，是基金會的宗旨。中方準備了兩個文本，一個是「支持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改革和開放」，一個是「支持中國的改革和開放」，我的設想是索羅斯如果不接受第一個文本，再拿出第二個文本，而索羅斯很愉快地就接受了第一個文本。其次，是基金會的資金。索羅斯每年提供不少

【431】以上關於中國企業跟蹤觀測系統的內容，部分引自明鏡出版社《趙紫陽與中國改革》一書，第105-112頁，彭照平著《趙紫陽支持建立「中國企業觀測系統」》一文。

於 100 萬美元的資金，而中方難於提供相應資金，索羅斯則表示：他可以一直資助到中國可以提供相應資金。資金使用的項目、數額，應該實行招標，體現公開、公平、開放的原則。三是項目的審核，需由基金會執行委員會的多數票決定，委員會的委員不能個人申請和推薦項目。

基金會擬定名稱為：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10月10日，索羅斯到北京。10月11日，鮑彤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了他。我與他分別代表中方和美方，簽署了《關於建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的協議》。基金會的中方主席是我，美方主席是索羅斯；中方主席的代表是李湘魯，美方主席的代表是梁恆。另有三個委員，索羅斯提名的環保專家梁從誠^[432]，我提名的何維凌、朱嘉明。這七個人組成了基金會的執行委員會。

關於基金會執行委員人選問題，索羅斯除了提名梁從誠以外，沒有提出任何其他，並不像後來有些人所傳言的那樣。我倒是和維凌討論過，想提名樸方當一個委員，既可以為殘疾人辦些事，又可以增加安全係數。維凌認為，由於樸方的背景，不宜進入。可惜我當時沒有去找樸方談一談，聽信了維凌的意見，以致後來生出了難於解決的風波。雖然基金會執行委員會 7 個人裏有 5 個人是中方委員，但沒有一個人有強硬的背景足以支撐。

我因為工作實在太忙，就請李湘魯作為我的代表，負責組建基金會辦事處。李湘魯任中國海上石油公司副總裁兩年後，到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任信息中心主任，我聘請他擔任了體改所兼職副所長，專門處理基金會事務。他十分負責地一件一件辦好了各種批准、註冊文件，並聘請了 4 位辦公室工作人員。而後，將基金會簽署的文件和希望開展的活動項目，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世界經濟導報》等報刊上發表，公開招標資助項目。

當時曾有學潮發生，索羅斯特別指出：「我不認為現代社會能靠學生運動實現，因為現代社會是靠程序、制度和規則來建立的。我希望有一批懂得這些程序、制度和規則的人，來建設一個開放的新社會。破壞一個舊的社會很容易，而建設一個新的社會是不容易的。」在基金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我提出：「為了使基金會很好地為改革開放服務，70% 的項目應該與改革開放有關，文化藝術的項目也要盡可能避免意識形態爭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大家都表示同意。

[432] 梁從誠 (1932-2010)，廣東新會人。時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後創辦《自然之友》會。

基金會公開招標以後，很短時間就收到了幾百份項目申請。辦事處對這些申請先作出分析，大體是三類：一類是可考慮批准的；二類是需由委員會討論的；三類是暫不進行的。從基金會建立到1987年7月活動剎車，半年多時間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召開過3次會議，批准了70-80個項目。比較重要的有：由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433】}為團長、體改所副所長徐景安為副團長的12人赴美經濟考察團；接待匈牙利經濟考察團的回訪；赴日經濟考察團；國外資金市場、期貨市場考察，等等；還有王克平^{【434】}的美術展覽，楊紹明^{【435】}的攝影展覽，黃河采風，藝術沙龍，等等。可以說，批准的項目已經盡可能避開了與政治有關的敏感問題。

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從這個基金會建立前的斡旋，到後來與體改所脫離關係，5位基金會中方委員都是義務奉獻，沒有一個人從中謀取私利。我本人不僅沒有推薦、批准過一個體改所的項目，而且自己也沒有用過基金會的錢，或是利用基金會為自己撈到任何好處，而所付出的則是承受辛勞、責任和風險。許多朋友問我：「老陳，你何苦呢？」我總是笑笑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嘛！」

這個時期，國內、國外來訪的客人特別多。像深圳、海南、上海浦東、浙江、江蘇、湖南、山東、瀋陽、馬鞍山等地，請我或作報告、或當顧問。我只應俞正聲之邀，到煙台去作了一場報告，並參觀了蓬萊閣、劉公島、長山島，去榮成參觀了胡耀邦題字的「天盡頭」。國外來訪的客人，像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海瑞·哈丁^{【436】}、密執根的李侃如^{【437】}、世界銀行城市發展局局長林某某，日本的三菱集團、三井集團、野村證券，韓國金星集團，等等絡繹不絕。

考慮到改革的迫切需要，如何能盡快培養出一批適用的人才？我在所務會議上提出：我在北大讀書時，就感到所學理論嚴重脫離中國的現實；到基層以後、特別是農村，更覺得缺少解決問題的人才。現在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一般都需要兩、三年摸索才能適應。我們能不能與一些大學合作，共同培養一批兩年制的研究生？我的設想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們開始與北大、清華、人大、復旦、南開、武大六所著名大學共同進行試驗。

【433】賀光輝 (1929-)，陝西清澗人。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434】王克平 (1949-)，北京人。1979年「星星畫會」代表人物，為中國當代藝術先鋒。

【435】楊紹明 (1942-)，四川潼南人。中國著名攝影家。

【436】哈里·哈丁 (1946-)，時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

【437】李侃如 (1945-)，時任美國密執根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

我們的作法是：給錄取的研究生，先用8個月講解、研究、討論基本的理論和方法；再用10個月去基層，其中6個月解剖一個麻雀（一個村莊、一個工廠、一個學校，等），再用四個月寫一份「現狀、問題和前景」的調查報告，請當地人鑒定是否符合實際，由導師評價學術水平；最後六個月交流、補充、總結、提高，而後「按需分配」，即根據供求雙方之需分配這些研究生，使需求方得到所需人才，使供給方的人才能發揮作用。

這時，掛靠到體改所的青年人組織越來越多。因為那時，凡是註冊成立的社會團體，都需要掛靠到一個政府部門，一般沒有油水，又有風險的組織就很難找到掛靠單位。體改所一下成了許多獨立社會團體的「避風港」，既要給人們提供發展的機會，又不能給自己帶來太大的麻煩。對此，我們只能制定一些管理辦法，包括每年要交一定比例的管理費，這就把那些一時興起搞的組織擋在了門外，也減少了我們的組織成本。

5-25 協助榮毅仁、唐克建立國際所

王彥把《農村經營報》改成了《中國經營報》，掛在了體改所。去年底，我和他商議出了一批掛曆還賺了錢。按規定，應該給體改所分成兩萬元。我讓他放在了報社，用來處理一些朋友沒地方報銷的賬目。一天，王彥拿著一張報銷單讓我看，搖著頭說：「老陳啊，你看，嘉明這個單子，什麼『辣子肉丁』、『醋溜魚片』都上來了，我怎麼報？」我說：「以後，你別拿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煩我，列入『招待費』不就完了。」

不過，嘉明這個「風流才子」也太不檢點，給我惹來不少麻煩。一天，嘉明的妻子馬小紅抱著兒子朱玄找我哭訴，說嘉明在外邊怎麼怎麼花，兩個女人還找上門來鬧，可對她又怎麼怎麼不好，還經常破口大罵，讓我「仲裁」。我說：「夫妻的事外人不好插嘴。」她一再苦苦懇求。我說：「我勸你千萬不要鬧，越鬧會越僵。他回家，你作好熱騰騰的飯菜。他吃好了，哄孩子玩，讓他高興。慢慢他會覺得對不起你，關係就會緩和了。」

維凌和嘉明為人是很不同的。維凌幹事情從不顧及個人得失如何，嘉明為個人撈名利卻是從不臉紅的。回過頭來看，維凌一生還真幹成了幾件有意義的事，嘉明則是一事無成。創辦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維凌出力最多，可他並沒有從中謀取任何私利。基金會創辦之初，維凌私下和我說：「是不是把索羅斯的錢一半放在香港，這樣進退有個餘地？」我沒有同意，主要是怕惹非議。不過，事後看來，他顯然比我有遠見。

不久，維凌又和我說：「我看，中國和美國的中小企業之間，彼此相互合作的空間很大，我想建立一個中美中小企業聯絡處，你能不能給我搞兩萬元開辦費？」我從朋友資助的所長基金裏給了他兩萬元。他說：「姿先生，你當這個聯絡處的董事長，我當總經理。」我說：「你不知道黨政幹部不准經商嗎？我什麼職務都不能當。」他說：「那我就全權作主了。」我說：「你就好好幹吧。」

開放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體改所正研究要不要成立開放研究室。正巧，這時在《北京日報》當記者的好朋友唐昕找到我，說：「榮毅仁^{【438】}和我父親想在中信（指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成立一個國際問題研究所，請你和他們聊聊。」我先後到唐克^{【439】}、榮毅仁家，與他們進行了交談，彼此都感到談得很好，以後榮毅仁每過十天半個月就請我去吃飯談一談。當時，我和他們說，其實發展組、體改所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首先是時勢的需要，其次是歷史的機會，第三是人才的務色。

我說：組建發展組時，為什麼我們提出骨幹一定要「積極正派有能力」？因為青年中，少部分人能作到公而忘私、為國為民，十分難得；大部分人還是既為國為民，又為名為利，這很正常；還有少數人爭名奪利，也不奇怪。我感覺，必須依靠第一部分人，讓他們領頭；團結第二部分人，使他們成為骨幹；警惕第三部分人，這些人不能進入核心。榮毅仁和唐克聽的頻頻點頭，並讓我給他們推薦所長的人選。

幾天後，我向他們推薦了華棣、李湘魯和朱嘉明。華棣是留蘇的導彈專家，70年代因研究中國第一代衛星和州際導彈有功而獲國家「突出貢獻獎」，鄧小平曾批示讓他到核工業部任副部長。但他這時的興趣轉向了國際關係研究，遂調到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可那裏的研究環境並不如意。我介紹他們3人不久，榮毅仁、唐克就任命了：華棣為新建的國際問題研究所第一所長，李湘魯為第二所長，朱嘉明為副所長。

袁庚到北京開會，和我說想在蛇口建立一個對外開放研究所。我請他與剛建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合作，後來他們確實在深圳建了一個國際所的分所。李湘魯找我商議，能從哪兒再找些合適的人才？我說：「你眼界太高了不行，人才要發現、也要培養。把格局搞大，人才就會投奔。大膽用人，才會形成氣勢。用10個人總會有兩三個不錯的，實在不行的解聘就是了。」但他不久就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了。

【438】榮毅仁（1916-2005），江蘇無錫人。時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任中國國家副主席。

【439】唐克（1918-），江蘇鹽城人。時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副董事長，曾任冶金部部長、石油部部長。

國際所成立以後，以中信公司研究機構的民間身份，為與韓國、沙特阿拉伯關係正常化作了先期斡旋，又對國際新格局的戰略作了有意義的研究，還對中國的海外投資問題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體改所成立「西部開發中心」，也請國際所等單位一起合作。後來，人們常說的「三所一會」，即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體改所 1987 年末的民意調查，大多數人不贊成張鋼繼續擔任聯絡室主任。張鋼為人熱情肯幹，因其在莫干山會議的勞績，不少朋友推薦他到所工作，我就聘請他擔任了這個職務。可是兩年來，他主持的委託、承包課題，幾乎用完了經費，卻沒有出什麼有價值的成果，所裏的民意調查沒過關。我和他談話說：「你不是不努力，而是知識不夠。看來這個聯絡室主任，你是不能再當了。我給你出三策：上策是到北大、人大讀兩年經濟學，中策是到地方去任職，下策是在所裏做些雜事。」他說：「我想一想告訴你。」

其實，張鋼到所工作以前，洪虎和我說：「張鋼這個人，社會反映不好。一是愛說大話、好擺譜，二是公私不分、化公為私，三是男女關係不清不白，最好不用。」我調查以後，發現張鋼確有洪虎說的問題，但並不嚴重。誰能沒有缺點呢？先試用一年再說。我又和鮑彤說了，他只說了一句話：「用誰不用誰，你決定。」我找張鋼談話，婉轉地說了洪虎對他的看法。他倒是很痛快，說：「我今後一定注意。」

我問他：「你是什麼學歷？」他理直氣壯的說：「大學！」我問：「那你的檔案裏怎麼說是初二啊？」他紅著臉說：「我初二插隊，以後讀電大畢業。」我又問：「你在《經濟學週報》是什麼級別？」他毫不猶豫地說：「正局級。」我心裏想，這個人真是敢吹牛皮，又問他：「那你每個月工資，怎麼才 38 塊人民幣呵？」他沒有說話。我說：「你現在還是以工代幹。我請你當聯絡室主任，把你轉成正式幹部，月工資 128 元人民幣，你願意嗎？」他連連說：「願意！願意！」看來一個人形成的毛病，一時很難改變。

不過，文革確實耽誤了一代人。當機會來臨時，他們的知識很難適應新局面，而社會經驗又給了他們爛芋充數的可能。幾天後，他來找我，說：「我願意到地方任職。」我說：「好，我可以幫你聯繫。但你到了地方以後，一定要扎扎實實作事。」我先後與海南省省委書記許士傑^{【440】}、瀋陽

【440】許士傑（1920-1991），廣東澄海人。時任中共海南省省委書記。

市市長武迪生^[441]、廣東省體改委主任易振球聯繫，他們都表示歡迎他去，並可以給他安排一個副局級體改委副主任，但他一直沒有去。「八九民運」發生了，「六四」後他逃到了海外。

5-26 中國文化書院和《走向未來》叢書

中國文化書院是1984年成立的。由北京大學哲學系馮友蘭、張岱年^[442]、朱伯崑^[443]和湯一介^[444]等教授共同發起，聯合了國內外幾十位著名學者創建的一個民間學術團體。他們希望以書院的形式研究和培養中國文化的人才，舉辦過《中國傳統文化》、《中外文化比較》、《文化與未來》等講習班，還準備搞《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函授班。他們的活動深受老一代學者的支持，也受到文化斷代的青年人歡迎。

1988年初，張岱年、湯一介、龐樸^[445]和梁從誡約我吃飯，熱情地向我介紹了書院的情況，並希望他們的項目能得到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資助。我說起1959年曾與父親拜訪過湯一介的父親湯用彤，也說起我祖父陳伯瀾係梁啟超好友，表伯父吳宓當年請梁啟超作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提起祖父，梁啟超連說：「我們是老友。」當時，雙方談得十分投機，也我表示了非常願意與他們合作的意向。

我說起：1980年發展組成立時，就建立了一個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小組，想從東西方文化的比較中取長補短。我自己則深感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不是盲目地崇拜英美，就是盲目地崇拜蘇聯，產生了幾代人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民族自卑感。五四運動提出「民主」與「科學」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就走向極端了。1949年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不斷批判中國文化的精華就更錯了。

大家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都認為復興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刻不容緩。說起自文藝復興以來，由於西方的興起，人們似乎認為只有西方文化有生命力，殊不知中華文化幾千年來歷久而不衰自有深層的原因。從諸子百家創造了燦爛的文明，到秦漢唐宋明清哪一代不是群星倍出。我說起

[441] 武迪生 (1935-1993)，河南西華人。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時任瀋陽市市長，因其銳意改革、為官清廉，深受民眾喜愛；1993年不幸於以色列墮機遇難。

[442] 張岱年 (1909-2004)，河北獻縣人。著名哲學家，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

[443] 朱伯崑 (1923-2007)，河北寧河人。著名哲學家，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國際易學研究會會長。

[444] 湯一介 (1927-)，湖北黃梅人。著名哲學家，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445] 龐樸 (1928-)，江蘇淮陰人。著名哲學史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1977年春節，和父親去涇陽看表伯父吳宓，老人家還堅持「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說「批孔就斷了中國文化的根」，大家對吳宓都深表讚佩。

《走向未來》編輯的第一批叢書12本，終於在198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套叢書的主編包遵信是我北大中文系的學長，他是一個思想的探尋者，為編輯這一套叢書費了很大的力氣。在大學時，他也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奉者，「九·一三」林彪摔死，驚醒了夢中人，他開始了對毛澤東及其路線的質疑。面對「四人幫」倒台後，人們的思想荒蕪，他想編叢書介紹西方思潮，作啟蒙工作。包遵信的想法得到了一批有志者的贊同。由他擔任主編，金觀濤、唐若昕任副主編，組成了一個編委會，掛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維凌說：「老包想讓你參加編委會。」我說：「推動農村改革，我必須全力以赴。發展組已經好幾個人參加了，我就不參加啦！」他們1982年開始與湖南人民出版社商談出版叢書未果，後來通過張黎群^[446]的推薦，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這套叢書了。

這套叢書的出版開了中國民間出書的先河，書剛出版就銷售一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後各種叢書紛紛出版，對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起了推動的作用。1985年，叢書又出版了14本，其中有發展組王小強與白南風合著的《富饒的貧困》、鄧英淘與何維凌合編的《動態經濟系統的調節與變化》。那時，編輯部的「義工」幾乎沒有什麼報酬，都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把他們組合在了一起。

包遵信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充滿熱情但不善運作。編輯叢書最出力的常務副主編賈新民^[447]，卻被以「作風問題」而除名，可惜的是他後來跳樓自殺了。金觀濤從杭州調來陳越光^[448]擔任了常務副主編。從此，中國科學院以金觀濤為首的方法論派成了叢書運作的核心。我和金觀濤相識多年，他很有才、也有頭腦，但個人盤算太多。維凌就說：「我們和濤濤（金觀濤小名）不是一路人。他始終在『觀濤』，我們則是在『弄潮』。」

但使我至今不能原諒金觀濤的，是他作的一件不光彩的事：1987年4月，我正在政改辦緊張地工作，在中組部工作的王軍銜^[449]來找我，他一直給《走向未來》叢書當義工，是個說話、辦事都很認真的人。他問我：「老陳，是你讓包遵信辭去主編的嗎？」我聽了很訝異，說：「我從來沒有

【446】張黎群（1918-2003），四川蒲江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任中國社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

【447】賈新民，《走向未來》叢書常務副主編，對叢書編輯貢獻良多。

【448】陳越光（1953-），浙江諸暨人。時任《走向未來》叢書常務副主編，後一直從事傳媒與文化事業。

【449】王軍銜（1955-），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調研員，為《走向未來》叢書作義工。

過問過叢書的事，怎麼會讓老包辭掉主編呢！」軍銜說：「是金觀濤在編委會上說的，老包已經無奈地辭職了。」我心想：金觀濤怎麼能作出這樣不光明正大的事情呢？軍銜說：「金觀濤還讓給你在叢書安排了一個『顧問』。」我說：「這我也一點都不知道。」我問軍銜：「現在還有沒有轉圜的餘地？」軍銜說：「老包已經負氣地走了。再說，現在負責常務的陳越光，又是支持金觀濤的，補救也晚了。」我當時也實在太忙，根本顧不上這一類事，木已成舟，也只能聽之任之了。

不過，這件事讓我始終不能忘懷。我一直認為，金觀濤太對不起包遵信了，而且我後來也沒有機會向包遵信作解釋，心裏總覺得從道義上欠了包遵信。原來，我只認為金觀濤名利心太重，個人盤算太多，從這件事開始，我對金觀濤的為人產生了疑問。70年代，我和金觀濤、劉青峰在鄭州交談時，對他們的雄心壯志與大膽探索十分讚佩。但當時聽金觀濤說：「現在我利用她（指劉青峰），20年後她利用我。」就很不入耳。

當時，劉青峰的父親劉仰嶠曾任教育部副部長，他們先後調入鄭州大學，就是靠了劉仰嶠的關係，但這麼明白地算計，卻讓人驚訝。當然，這在一般人眼裏也不算什麼，但對一個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來說，難道不該自慚形穢嗎？但金觀濤說的時候卻洋洋得意。從此以後，我從心裏就有些看輕他。不容否認地是，金觀濤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他曾和我說起，馬克思把人類的活動歸結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互動，他認為還應該加上意識形態，這三者是互動的。

後來，金觀濤運用控制論和系統論的觀點，分析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的關係及其「治」、「亂」循環，得出了中國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結論。這個超穩定系統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對社會進行強控制，阻撓制度變革和新社會組織成長；每一個王朝建立都會出現一段興盛繁榮時期，但王朝末期就會出現商業病態繁榮、貧富差距擴大、官僚極其腐敗的現象，結果就會發生大動亂，使積累的生產力付之東流。

這個標新立異的看法，在當時確實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一者，人們不斷在問：為什麼文化革命中封建專制會借革命之名捲土重來？二者，國內沿用的馬克思一元史觀難以解釋出現文化革命的原因。雖然金觀濤、劉青峰的《興盛與危機》一書並沒有講清楚中國這個「超穩定系統」何以形成，以及如何解構，但對人們解放思想還是極具價值的。

5-27「家國不易兼顧」，國事惟艱

1986年10月，海軍總醫院給我作年度例行身體檢查，竟說我得了膽囊炎。可我並沒有這種病的症狀，醫生一定讓我住院治療。住院後反覆檢查、化驗，並沒有發現什麼膽囊炎，而是我的膽異於常人，比一般人的大了1倍。朋友們開玩笑說：「怪不得你敢幹這幹那，原來是像姜維一樣『膽大如雞卵』！」我苦笑著說：「當年，姜維九伐中原，沒有成功。我們搞的改革能不能成功，也一樣是未定之天啊！」

住在醫院裏，我考慮現在最難辦的事情是，怎麼處理和吳琰的關係。她忘我的奮鬥精神有口皆碑。因為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她回北京後抓緊一切時間進修，連續4年在人民大學和記者協會辦的新聞學院讀書，取得學位後，到《工人日報》群眾工作部當了記者。她經常為上訪的民眾舒困解難，有時為一個冤案不眠不休地調查、分析、上報，直到問題解決。很快訪民都把她叫「吳青天」，在新聞界獲得了極好的聲譽。她也很樂於助人，曹天子和曹南薇^[450]兄妹出國遇到麻煩，她到處斡旋才把事情辦成。



但我們二人除了陪丫丫一起玩有樂趣外，家庭生活幾乎沒有；她住在母親家，我住在招待所。從1982年我在上海病倒，她沒有去看我，就說明我們的感情已經難以恢復。但她1975年放棄北京的工作和戶口，到農村的那份可貴令人難忘。我們結婚時，她說自己不能生育，我也毫不計較。她父親把

她「托付給你」的話，我一直沒有忘記。但她對我一次次地傷害，實在已讓我難以忍受。也許事業與家庭真是難以兼顧啊！

1985年，我從西安回京，正想和她談離婚的事，她先開口說：「老陳，我子宮生了腫瘤。醫生說，可能要切除。」我當時說：「你如果切除子宮，我們就不離婚了，我陪你一輩子。」我和她一起去了婦產醫院。我簽字後，醫生給他動了手術。術後，醫生和我說：「不用擔心。不是腫瘤，是子宮

^[450] 曹天子和曹南薇，均因出身不好難展報負，而曹天子又係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反革命」案要犯，故出國先後受阻。

囊腫，已經取掉了。休息一段時間，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我勸她一定要好好休息，去上班了。可她只歇了三天，也去上班了。

其實，從1978年底我回到北京，雖然住在岳母戚雲家並不自在，我和吳琰相處也還過得去。只不過我們那一代人因為文革的耽誤，總是想盡快給自己充電，以便能為國家有所貢獻。那時，我和吳琰都是沒日沒夜地學習、工作，連家務事也很少操心。憑心而論，若不是岳母家僱用了一位善良勤勞的周阿姨，將大部分家務事都做了，我們也不可能騰出手來作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般到了周末，家務事總是要自己做的。丫丫從兩歲就住到了全托的幼兒園，大多都是由我接送並陪著玩。那時，家裏來了客人，問她：「爸爸好，還是媽媽好？」她總是回答：「爸爸好！」過了一年，再問她，她就會說：「都好！」又問：「哪一個更好一點兒？」她會很機靈地說：「都更好一點兒。」那小腦袋瓜不知怎麼會那麼靈光，我的親戚、朋友沒人不誇她聰明可愛。但我搞起「發展組」以後，陪她的時間就少得多了。

也許是一心要抓住難得的機會忘我工作，也許是男人的粗疏忽略了情感的維護，導致了吳琰心靈的寂寞，以致出軌。我沒有埋怨她，但自己很痛苦。可她兩次不和我說，就做了人工流產，卻對我傷害很大。我得了中晚期疲勞綜合症，她竟若無其事，讓我徹底失望了。後來，她患子宮囊腫動手術，現在已經一年半了，也沒再發現有什麼問題。我決定和她認真地談一次。我們坐下來進行了一次有趣的對話。

我說：「我對你沒有別的要求，夜裏我一、兩點回家，你能給我下一碗方便麵吃，我就滿意了。」她說：「三天後給你答覆。」三天後，她和我說說：「你的要求，我做不到。我是個男人，不是個女人！」我笑著說：「怪不得我覺得你像個哥們，不像個老婆哪！」她說：「我還覺得你像個導師，不像個丈夫呢！」我說：「那我們保留好的，去掉不好的，離婚怎麼樣？不過，離了婚，你再找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可就不容易了。」她說：「離就離吧！」

1986年12月，我們到二龍路街道辦事處領了「離婚證」，10年的婚姻就這樣結束了，領證以後她掉了淚，但所幸的是我們始終保留了難得的友誼。為了不給家裏人帶來困惑，我們商定先不告訴他們，包括丫丫一直都不知道。我仍然是每個月到她家去看她和丫丫，她則是每個月帶丫丫來看我。後來，她告訴了母親戚雲，我去她家時，老人家就覺得怪怪的，我倒是還能坦然處之。不過，一個人雖覺輕鬆，卻也感到很孤獨。古人常「忠孝難以兩全」，但今人卻「家國不易兼顧」。

鼓舞人的理想是美好的，實際中的生活卻是殘缺的，天道總會「損有餘而補不足」。吳琰說：「願有情人終不成眷屬。不成眷屬總是有情人，成了眷屬就變成了冤家。」我說詩人寫道：「一個人太少，兩個人太多，這就是生活。一代一代的鮮花，一輩一輩的苦果，這就是愛的總合。」維凌、湘魯和唐昕安慰我說：「哥幾個給你組織一個『選美委員會』，保證讓你抱得美人歸。」以後，經常有人給我介紹一些名門閨秀，我卻因為實在太忙，連見面的機會都沒有。

記得1983年我養病時，每天上午編輯發展組的集刊《農村·經濟·社會》，周其仁就說：「老陳，你這個人就是愛生事，現在就好好養病，編這些東西幹什麼！」我說：「陳翰笙當年編《中國農村》也就編了三年，給後人留下了珍貴的資料，我們這個集刊也不知道能編幾年呢！」後來，真也就只編了四年。而其仁這個人，雖說有才，卻心術不正，王小強就很看不慣他這一點。

體改所成立後，編輯了3份刊物：一是供領導人內部參閱的《動態與建議》，二是半公開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三是公開發行的《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月刊。為了更好地反映發展與改革的研究，我們保留了一、二，又增加了給決策參考的《清樣》；將月刊改為《中國：發展與改革》，並同時出版年刊和系列叢書。這一套刊物先後不過也就出版了4年，因「六四」而停刊了。

雖然，1986年9月底中共12屆6中全會《決議》指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但內部傳來的各種信息都叫人感到不安，上層對「學潮」看法的分歧，對「新老交替」看法的分歧，都已浮出檯面。特別是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分歧，似乎已經到了要攤牌的地步，實在令人擔憂。特別是胡耀邦和香港記者陸鏗^[451]坦率的談話，聽說引起了鄧小平很大的不滿。也許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了。

[451] 陸鏗（1909-2008），雲南保山人。1985年發表《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的不滿，成為胡耀邦下台的導火線之一。

第六章 參與政治改革 (1986-1987)

——到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

經濟改革的深入與原有的政治體制發生了衝突。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就很難深入。胡耀邦下台，使中國的改革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挫折。政治改革還能進行嗎？

小引

這一章是本回憶錄的第二個重點，我將向大家介紹一段被中共塵封的重要歷史。這就是，從1986年9月到1987年11月，在趙紫陽主持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深入以後，如何設計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扭轉了胡耀邦下台後形成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積極推動改革向前發展的種種努力，直到中共十三大召開。本人有幸親身參與了當時趙紫陽領導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設的由鮑彤主持的辦公室的工作。

這個時期是中國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形勢最複雜、鬥爭最尖銳的時期，也是改革受到質疑、衝擊最大並向前推進的時期。這個時期大體可以分為3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86年9月到1986年12月，趙紫陽受命組建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鮑彤負責組建研討小組辦公室，並投入了緊張的工作。3個多月時間，夜以繼日地進行了各種形式的研討，本章將予以介紹。在研討的過程中，基本上確定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與重點。我相信這些當年研討的內容至今仍會對人們有所啟發。

第二階段，從1986年12月到1987年5月，學潮引起了黨內的嚴重分歧，鄧小平發動政變，胡耀邦被迫下台，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使一批主張改革開放的領導人和學者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改革面臨停頓和倒退的危險。但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仍在內部艱難地、秘密地進行著，並形成了兩個重要的文件。

第三階段，從1987年5月到11月，趙紫陽的「5·13」講話扭轉了左的政治大氣候，改革開放又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旋律，人們的改革熱情重新調動起來。直到中共十三大，開成了一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提出政治體

制改革的會議。1987年底，鮑彤主持的政改辦組建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究室，我則回到了體改所。

這一段歷史告訴人們，當年的趙紫陽與鮑彤是以何等的智慧、勇氣和魄力，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嘔心瀝血的努力。我所記述的內容，很難將他們那些有價值的思考、言論全部反映出來，但總可以給人們提供研究、借鑒的線索。知道趙紫陽與鮑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和政改辦的所思、所想、所說、所論的人，當時也不超過百人。我想，時至今日，披露這些當年秘密進行的內部研討，對保持歷史的真實是必要的。

當然，那時參加政治體制改革內部研討的人，大部分還都在工作；而參加政改辦座談的中央、地方領導人和專家、學者還更多。我也希望通過自己對這段歷史的回憶，能引出更多、更好的文字，以便對今天和今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起到積極有益的作用。只有先驅者的心血能澆灌出美麗飽滿的花果時，他們的努力才會給後人留下永久的紀念。因為篇幅的限制，可惜上百次的各種座談會的內容，難以一一照錄。

6-1 趙紫陽主持制定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

1986年9月，鄧小平連續3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他說：「我們在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

鄧小平又說：「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而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最中心的環節，還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並提出，要在明年舉行的中共十三大上把政治改革的問題提出來。而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趙紫陽主持制定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並於明年六、七月提出文件。

9月18日，趙紫陽邀請胡啟立、田紀雲^[452]和薄一波，座談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問題，在會上他們形成了5條意見。趙紫陽據此寫了一封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報告：

第一是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以下簡稱「研討小組」）。成員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書記處常務書記胡啟立、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中顧委常務副主任薄一波、人大副委員長兼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彭沖^[453]5人組成。

第二是這個小組定名為「研討小組」，因為它不是權力機構，職責是：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十三大前，探討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和設計藍圖，提供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決策參考。

第三是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以下簡稱「政改辦」），任務是「閱讀材料和議論問題」，並將閱讀的重要材料和議論的主要問題向研討小組推薦、彙報。

第四是辦公室由鮑彤、嚴家其^[454]、賀光輝負責。負責人今後還可以增加，但不超過七人，授權辦公室挑選十到二十名精幹的研究人員；專題確定後，再組織專題研究班子。

第五是辦公室成立後，要抓緊工作，在開始一個月內，搜集國內外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各種議論，提出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和重點的基本看法。

趙紫陽在信中特別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著眼點應該是：一、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二、有利於加快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迫切地提到了最高當局的議事日程上。那麼，為什麼由趙紫陽而不是胡耀邦，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呢？這個問題引起了人們的不少疑問。

9月18日上午，總理辦公室李勇通知讓我去一趟，說有重要的事情商量。進入總理辦公室，李勇讓我到裏間的客廳去。剛坐下，鮑彤進來了。他總是那麼精神飽滿而又彬彬有禮，他給我倒了茶，問起體改所的近況來。我向他說：「我是『趕著鴨子上架』，勉為其難。」他笑笑說：「體改所建立不久，成效不錯嘛！不過，現在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我等著聽他的下文。

[452] 田紀雲 (1929-)，山東肥城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453] 彭沖 (1915-2010)，福建漳州人。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454] 嚴家其 (1942-)，江蘇武進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六四」後被迫離開中國。

鮑彤拿出一份文件讓我看，原來是趙紫陽寫給中央常委的《關於成立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的報告》，這可是一件大事。我剛想說「非常重要，非常及時」，還沒來得及開口，鮑彤說：「根據紫陽的意見，研討小組下邊要成立一個辦公室，主要任務是『閱讀材料，議論問題』，為研討小組提供研討的意見和建議。紫陽讓我負責這個辦公室，想請你主持日常工作。」我吃了一驚，這麼重的擔子怎麼挑得起？

我連忙說：「體改所剛組建不久，工作很重，我脫不得身。政治體制改革是關係全局的大事，任務艱巨，理應未雨綢繆。我建議，請中組部的劉澤彭來做，他比我更合適。」鮑彤說：「你再考慮一下，給我答覆。」我說：「三天後，我給你答覆吧！」回到體改所，我立即給劉澤彭打電話，可惜他出差去了。我私下徵求了幾個朋友的意見，有的說「機會難得」，有的說「風險太大」，我一時還拿不定主意，主要是感覺自己難以勝任。

據我們社會輿論調查系統的調查，大學生當時有四個「不滿意」：一是對改革進展緩慢不滿意；二是對民主權力太少不滿意；三是對幹部、特別是黨內高幹子女腐敗不滿意；四是對知識分子政策落實狀況不滿意。並認為：中國革命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專制主義根深蒂固；社會主義優越只是理論的說教，無論經濟發展、政治民主都不如資本主義；應當廣泛吸收西方文化，不應用馬克思的理論禁錮人們的思想。

顯然，政治體制改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這件事若不能充分謀劃，則很難成功。從6月到9月，鄧小平多次講政治體制改革以後，在胡耀邦、趙紫陽的主導下，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社會各界更活躍了，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但是，在一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也出現了激進的情緒，像王若望提出「多黨政治」，方勵之提出「全盤西化」等等。與此同時，北京一批大學生上了街，許多大學貼出了大字報。如果學潮擴大，勢必又會引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看來情況複雜。

誰知，第二天剛上班，鮑彤來電話，讓我立即到總理辦公室。一見面，他就推心置腹地說：「紫陽已經決定，把你調到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以後，你大部分時間在政改辦，少部分時間在體改所，把所裏的工作安排一下就過來。我這個人，只能指揮三、五個人、頂多七、八個人寫寫文章。調你來，正好發揮你在組織方面的長才，而且你對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也發表了不少好的見解嘛！我們一起好好幹。」

正說著，趙紫陽從內間走了出來。他握著我的手說：「體改所幹得不錯嘛！現在看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很難深入，政治體制改革要提上日程，十三大的政治報告要畫一個藍圖。希望你好好幹！」停

頓了一下，他又說：「哈，上次在廣東，你不是跟我說有五個系統的改革麼！政治體制改革比經濟體制改革更艱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是第二次聽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說完這句話，他轉身走了。

看著紫陽離去的背影，我當時心潮澎湃。深感紫陽這種精神正是大乘佛教中捨己為人、普渡眾生的悲願，也正是中國傳統中為國家、為民族寧可犧牲自己的成仁取義的風骨！不禁自慚形穢，覺得自己應該義不容辭，而不該有所猶豫，就對鮑彤說：「好！既然需要，就這麼定了。我會盡力而為，爭取幹好！」鮑彤笑著說：「你回去把體改所的工作安排一下。10月初，政改辦就要開始工作了。」

6-2 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

為適應改革發展的需要，體改所又組建了綜合經濟研究室、政治法律研究室、數量經濟研究室和比較經濟研究室，分別聘請刁新申、程曉農、王飛欣、王輝、高梁、曹遠征為負責人。我用兩周的時間安排好了體改所及有關的工作，決定每週二、五上午到所處理各種事務，請王小強主持日常工作，就搬到設在中辦招待所的政改辦辦公了。從此，一天24小時吃、住在那裏，每天緊張地工作15個小時以上。

這時，陳子明^{【455】}和李盛平^{【456】}來找我，說要談談政治改革問題。陳子明創辦的民間組織，中國行政函授大學搞得有聲有色。從四五運動起，他就在青年人中很有影響。但李盛平一張嘴就說：「老陳，中國的政治改革離開我們是不行的。」我說：「你們消息倒很靈通啊。但人不可以太狂，地球離開誰都會轉！」他們表達了希望參加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意向，我說可以向上邊反映。我和鮑彤說了以後，鮑彤表示目前還不行，只能擱置了。

10月4日，鮑彤在中辦招待所二樓會議室召開會議。這個招待所位於北京地安門西大街38號，我1982年底到1983年初曾住在這裏養病3個月，和招待所的工作人員都很熟悉。那天，參加會議的除了鮑彤，還有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傑^{【457】}、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和我。鮑彤向大家介紹了有關成

【455】 陳子明 (1952-)，上海人。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76年因參與「四五運動」挨整，1978年參與西單民主牆，1980年當選北京市海澱區人民代表，後創辦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

【456】 李盛平 (1949-)，河北人。曾主持編輯《二十世紀文庫》等叢書。

【457】 周傑 (1927-2005)，江蘇阜寧人。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後任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立「研討小組」的情況，並就組建辦公室進行了討論。鮑彤提出，在座每個人可以推薦兩位研究人員，工作人員由中央辦公廳調配。

鮑彤說：「我只推薦一個人，是《人民日報》的政治評論員吳國光^[458]！」他說，他到《人民日報》拜訪錢李仁^[459]和范榮康^[460]，詢問報社現在最好的政治評論員是誰？得到的回答都是現年 28 歲的吳國光，但報社不同意調他走，只同意借調一年。周傑推薦了中辦經濟組的李丹鋼、中央編製局的呂長春，賀光輝推薦了體改委試點局的周大力，我推薦了中央黨校理論部研究生、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的遲福林、吳偉。

會後，鮑彤和我說：「你給安排一下，這裏位置適中，開會、聯絡都方便，今後政改辦就在這裏辦公。」我和中辦秘書局的貝際波^[461]、中辦招待所所長許士銘商定，租用招待所三樓直到工作結束。貝際波矮矮胖胖、精明能幹，他說：「陳所長，今後生活、後勤的事，我包了，您就不用操心了。」果然，在往後一年多的時間裏，政改辦日常行政方面的事務他都做得不錯。招待所一樓的餐廳可以給大家提供一日三餐，伙食問題也解決了。

10月6日，胡啟立和田紀雲召集鮑彤、周傑、嚴家其、賀光輝和我，聽取辦公室籌備情況，並對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問題發表了意見。首先，他們強調了搜集材料的重要性，提出可以給駐外使館發電報，請他們幫助搜集資料；其次，提出這項研究不是搞理論體系，而是從實際出發，搞政治體制改革設計，單項改革可以和總體設計並進；再次，要研究外國的經驗；第四，要瞭解地方的意見，可以開一些座談會；第五，要有一個時間表。

胡啟立說：「要解決一個大的思路問題：黨究竟要不要甚麼都管？甚麼都管只有上帝才能管好。」他接著說：要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寫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就要在明年7月拿出十三大報告的稿子，五、六月份拿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田紀雲說：「方案設計得好，沒人抓不行。80年代了，有些人還是50年代那一套，就沒法弄。」胡啟立最後說，目前必須抓住時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看準了就大刀闊斧地幹。「有的領導人很英

【458】吳國光（1957-），山東臨沂人。時任《人民日報》評論部編輯，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員；1989年赴美國，先後任哈佛大學尼曼學者、哥倫比亞大學魯斯學者、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

【459】錢李仁（1924-），浙江嘉興人。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460】范榮康（1930-2001），江蘇南通人。時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副總編輯。

【461】貝際波，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曾任陳雲秘書。

明，可是到了一定位子就變了。小平這樣開明很難得。但是，必須有制度，否則不行。」

10月7日，鮑彤召開了政改辦第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鮑彤、周傑、嚴家其、賀光輝幾位召集人；由我和陳福今^{【462】}負責日常運轉，陳福今是中央辦公廳政法組負責人；研究人員有吳國光、李丹鋼、呂長春、周大力、遲福林、吳偉；工作人員有貝際波、劉洪、許世銘。鮑彤指出：政改辦的基本工作方法，一是閱讀材料，二是議論問題。研究的著眼點應該是從「兩個有利於」，即長治久安和加快現代化建設提出。

那麼，研究的思路如何展開呢？鮑彤認為：可以從妨礙「兩個有利於」考慮，那些妨礙的東西就是政治體制的弊端，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在此基礎上，還要組織專題研討小組。主要的工作應該在明年四、五月間完成。他還特別強調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敏感性，一定要「滴水不漏」地保密。同時會議決定，政改辦要編輯兩份內部刊物，一份《研討情況》只送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人，一份《內部資料》則送省、部一級領導人，由我和陳福今負責簽發。

10月17日，胡啟立又一次聽取了政改辦的彙報。鮑彤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少奇同志八大就說過「我們沒有政權時，千方百計地要取得政權。取得政權以後，卻不會使用政權。」總是用革命的辦法、軍事的辦法、群眾運動的辦法解決問題。沒有合理的組織結構，就沒有穩定的體制，也就沒有穩定的政策。周傑說：結果，我們黨從領導力量變成了辦事機構。

鮑彤提出：「對於『建設高度民主』，有人認為不好解決。我們對『民主』的概念就不太清楚，沒有程序化。而程序是很重要的，沒有民主的程序，就沒有民主。」胡啟立贊成這個看法，說：「我們對西方的民主很不熟悉。西方對程序很重視。格理希^{【463】}最近寫書，說我們講廠長負責制，只講負責，卻沒有具體的辦法。他搞了一套規範，有了規範，職責明確。該做的沒有做是失職，不該做的做了也不對。」

胡啟立說：「我們的國家像一個大企業，而企業像一個小國家。權力看起來很集中，實際上集中不起來。連家庭糾紛、找對象這一類的事，都找黨中央給解決。長此以往，怎麼行呢！」他又說：「我們過去的政治體制是適應產品經濟的、是權力高度集中的。現在是為了與發展商品經濟相

【462】陳福今（1941—），雲南石屏人。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法組負責人。

【463】格理希，係西德專家，1984年受聘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

適應，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不是根據哪個領導人的主觀意志來考慮。亞洲『四小龍』為什麼上去了？要研究。」

此後，政改辦每週二、五下午舉行例會，內部討論問題。按研討小組的要求，政改辦的主要職責是：一、搜集信息，溝通情況；二、組織和協調研究；三、進行總體研究。政改辦的不定期刊物《內部資料》第一期刊登了鄧小平 1980 年 8 月《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第二期又刊登了鄧小平 1941 年批評「以黨治國」的文章；《研討情況》則先後刊出了美國學者鄒讜^{【464】}論述「全能體制」的文章、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政治改革的情況以及鮑彤關於「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的意見。

6-3 鮑彤提出：「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

政改辦成立後，首先整理了各方面對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10 月 10 日，先由中央黨校的遲福林和社科院政治學所的嚴家其，向大家介紹了這些看法。

遲福林說，1985 年春在黨校領導和體改所支持下，中央黨校理論部的研究生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他認為，有 6 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改革實踐的評價；二是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係；三是對現行政治體制弊端的看法；四是對政治體制改革基本目標的看法；五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甚麼；六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任務是甚麼。

他認為：以 1980 年鄧小平的講話為標誌，表明中央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已經明確，而目前改革時機成熟了；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主要是封建主義的影響；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建立現代化的政治結構，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大多認為是如何處理黨和政府的關係問題，究竟是「黨政分工」、「黨政分權」、還是「黨政分開」？需要很好研究。近期則應視需要與可能有多種做法：如，幹部制度與行政制度的改革，加強人大的監督作用，特別是強調黨政分開、黨內民主與政府職能的改革。

嚴家其說，政治學所的研究側重於文官制度、行政制度和西方政治學，與現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距離較遠。他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要分成兩個部分：近期目標是提高政府能力，長遠目標是發展民主化。我國，行政權是統一到黨的手裏。黨政分開是一個行政權統一的問題，不能搞多

【464】鄒讜（1918-1999），廣東大浦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

頭政治。行政權統一與黨政不分、權力高度集中不是一回事。改革要落實到行政立法上來。

鮑彤最後發言說，我說一個基本想法：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質上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從革命體制到建設體制的轉變。十一屆三中全會講了工作重點的轉移，但是還沒有來得及講體制的轉變。革命體制最明顯的特點是群眾運動、武裝鬥爭，這是搞革命的兩大法寶。現行體制仍然是這個色彩，沒有大的改變。從革命年代到建國後，一個一個的運動，都是用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他接著說，鄒讜的文章說我們是全能主義，希特勒是極權主義，國民黨是集權主義。共產黨是用全能主義來對付國民黨的集權主義。現在，我們這種全能的無所不包的體制應該改變了，要轉變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產秩序、社會秩序，使社會的每個細胞都發揮它的功能，而不能光使中樞發揮作用。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對我們的政治體制做一次自我的重新認識，黨要對自己重新認識，政府也要這樣。

10月11日，中央黨校和體改所在國防大學聯合召開了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國防大學校長李德生^[465]將軍出席了會議。人大國際政治系教授高放^[466]說，政治制度可分為根本制度與具體制度兩層，根本的一層是國體與政體，不需要改變；現在要改的是具體的政治設置：如，黨怎麼領導國家？國家機關內部立法、行政、司法之間是甚麼關係？中央與地方是甚麼關係？因為權力過分集中，集中於一個黨和少數領導人，以致形成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

他接著說，政黨政治是近代社會的產物。民主制度下黨與政分得很清楚，只有法西斯搞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國民黨也搞以黨治國，蔣經國現在已經提出了「黨政分家」。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關係，馬、恩沒有講過；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形成了黨政不分的體制，列寧對其弊端有覺察，提出黨應實行「總的領導」，但斯大林強化了這種體制；我們學蘇聯，比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西方學者把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

北大法律系教授龔祥瑞^[467]談了對政治體制及改革涵義的看法。他認為，政權結構的有序組合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進行重新組合或調整。目前改革的內容應該包括：人民和國家的關係、黨政之間的關係、中央和

[465] 李德生 (1916-2011) 河南光山人。時任國防大學校長。

[466] 高放 (1927-)，福建福州人。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

[467] 龔祥瑞 (1911-1996)，浙江寧波人。早年留學英法，致力將憲政思想介紹到中國，對公法學建設有很大貢獻，時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

地方的關係以及政權內部的關係。他強調，民主問題是關鍵、是重點。因為權力過分集中，特別是政權結構中缺乏制約機制，所以要通過代議、參與、自治等多種形式來發展民主。

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468】}認為，我們面臨兩個轉變，政治體制不能適應。一個是從搞階級鬥爭到領導現代化不適應；一個是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不適應。政治改革就是要改變不適應這兩個轉變的東西。過去講「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能不能、該不該領導一切？黨的權力太大，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不受限制，「文革」就是因此發生的。黨代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可是一個人不同意就不開了。中央全會也是這樣，想開就開，說不開就不開。

他強調說，「文革」的災難就是過去這種政治體制弊端的惡性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改變過去的黨政關係，改革要從黨的改革做起，黨內要從中央做起。中央黨校教授董新民認為，長治久安的體制應該做到：第一、決策人員和決策機構真正實行選舉制和任期制；第二、決策機構有真正的制衡制；第三、所有的活動法制化。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469】}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要求應當是發展民主、提高效率。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黨的改革問題，與會者的看法很接近，都認為應該限制黨的權力。中央黨校教授周逸^{【470】}認為，黨的權力與政府的權力是不同的。黨的權力是人民給的，要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了，黨的領導就加強了，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民主是相輔相成的。而政府的權力是行政權。中央黨校教授李思溫^{【471】}認為，各級黨的領導都應受到制約，黨章應該規定基層組織不起領導作用。中央黨校教授崔佩亭^{【472】}提出，要把黨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把黨的領導置於黨員的監督之下。

北京大學副教授黃宗良^{【473】}認為，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幹部階層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是改革幹部制度。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就是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權力壟斷；而蘇聯改革的主要阻力正是來自幹部階層。他建議，幹部制度改革可以從選拔與任命的環

【468】金春明（1932-），山東昌邑人。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469】沈寶祥（1932-），江蘇武進人。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主編。

【470】周逸（1920-），湖南長沙人。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471】李思溫，時任中央黨校教授。

【472】崔佩亭，時任中央黨校教授。

【473】黃宗良（1940-），廣東潮州人。時任北京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節改起，要改革終身制與上級任命的制度；同時，加強監督檢查制度，特別是通過群眾監督而打破「官官相護」。

6-4 黨史專家認為：「最大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

10月17日，政改辦召開了第一次座談會，主要請中共黨史專家談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由周傑主持。

曾擔任朱德秘書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474]，講了他的十八條意見：1. 保障人民的人身安全；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獨立司法；3. 加強人大作用；4. 人大要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5. 加強政協作用和功能；6. 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7. 調整黨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群眾團體的關係；8. 實行黨領導下的廣泛的新聞出版自由；9. 政企職責分開；10. 改革企事業單位領導制度；11. 企事業管理民主化；12. 黨在憲法與法律範圍內活動；13. 健全黨內民主生活；14. 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15. 加強黨與民主黨派的互相監督；16. 實行工作人員責任制；17. 實行幹部交替；18. 精簡機構。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王宏模^[475]說，現行體制的最大弊端是權力過份集中，形成個人專斷，造成決策錯誤，像大躍進、文革等。權力過分集中不利於長治久安，限制了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限制了國家行政系統獨立起作用，限制了司法獨立和監察體制。除了黨的集權，還有以黨代政、以政代企，所以，要分權、放權。現在的問題是黨怎樣領導？政府和憲法怎麼制約黨？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哪個地方有毛病都罵黨。

鮑彤就此評論說，美國是共和黨罵民主黨，民主黨罵共和黨；中國是人人都罵共產黨，共產黨員也罵共產黨。一切功勞歸於共產黨，一切過失也歸於黨；安危繫於一身，功過歸於一黨。

總參二部官員、前駐英國大使館武官陳曉魯^[476]介紹了英國的情況。他說，英國女王權很小，很少干預政治。所以，她威望很高，而政府則承擔民眾的抱怨。行政部門的文職官員與軍隊一樣，不屬於任何政黨，不因政黨更迭而改變，只對行政命令負責。軍隊效忠女王，但由首相指揮。教會不干預政治。同時，新聞獨立起很大的作用。關鍵是權力要受到制約。毛主席40年代批評蔣介石以黨代政，而建國後自己也搞黨政合一了。

【474】廖蓋隆（1918-2001），廣東信宜人。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475】王宏模，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476】陳曉魯（1948-），四川樂至人。曾任駐英國大使館武官，時任總參二部官員。

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逢先知^{【477】}，在發言中先回顧了鄧小平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他說鄧小平1980年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考慮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後來則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他認為，核心問題是分權，目的不僅是避免動亂，也不僅是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而應當是：一為發展生產力，二為實行民主。

鮑彤感謝黨史專家給政改辦的同志上了一課，並指出：「過去體制的毛病，一是不利於長治久安，二是不利於提高效率。革命體制就是戰爭、地下鬥爭、群眾運動的方式；建設體制就是各種社會細胞按其本來性質在一定規範內運行。不能是鬥爭、運動的體制，而應該是穩定的體制。從來沒有一種體制可以總是做出正確的決定，但是應該有糾正錯誤的機制。不能把一個人的錯誤變成所有人的錯誤，大家看到錯了還改不了。」

他接著說：「要形成一種新的機制，防止錯誤從小到大、防止錯誤長時間得不到解決。全能體制必然會發生文革式的悲劇。社會分工退化，工農商學兵都一樣。我們長期以來，習慣於單打一、一元化、一陣風、一刀切，這都不是正常的秩序。馬克思講機器分發動機、傳送帶、工作機，還有分工。我們想用發動機代替一切，怎麼行得通？所以，要形成合理的體制與機制，就要深入到建設時期的社會生活規範來研究。」

10月18日，政改辦召開了第二次座談會，主要請新聞界發表意見。由鮑彤主持。

社科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478】}介紹說，西方關心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希望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不希望改變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布熱津斯基^{【479】}認為，毛之後的中國由集權主義轉變為權威主義，他希望我們進一步變為民主主義。他認為，應該在經濟改革中找到力量，政治改革才有原始的動力，要用經濟的自發動力促使政治走上軌道。

《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陶凱^{【480】}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權力問題。老百姓關心兩個問題：一是不正之風，二是決策體系。決策沒有體制上的制約，就會出問題。他說，從領導體制來講，要用表決制代替協

【477】逢先知（1929-），山東膠縣人。曾擔任毛澤東秘書，時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478】李慎之（1923-2003），江蘇無錫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

【479】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生於波蘭華沙，著名的波蘭裔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國務活動家。曾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美國重量級智囊之一。

【480】陶凱，時任《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

商制；從老百姓來講，是個民主權利的問題。現在講民主是紙上談兵，要有制度的保證才行。

李慎之又說，1956年，毛主席就說過「我們要還政於民」，可現在還是訓政時期。外國人認為我們是非制度化的；香港雖不是民主的，但有自由和法治，是制度化的；台灣也在走向制度化。中國現在能執行憲法就夠了，憲法寫了言論自由等等，能做到嗎？制度化首先是憲法的制度化，不能總是變來變去。美國憲法制定中有許多考慮，二百多年基本原則沒有變。長治久安就是制度化。鮑彤插話說，制度好了，人差一點沒關係。

10月21日，政改辦召開了第三次座談會，請經濟部門負責人參加。由鮑彤主持。

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盛樹仁^{【481】}說，再不抓政治體制改革，則經濟體制改革就搞不下去了。像黨政分開問題，在經濟工作中主要是企業的廠長負責制問題，涉及企業怎麼辦的問題。不少企業在幹部任免權上發生了爭執，管幹部的認為權力應該歸黨委，而實行廠長負責制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廠長的幹部管理權。這個問題不解決，廠長和書記就都覺得自己的位子不好幹。半年多了，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他接著說，在中央層次，也存在著類似問題。國務院主管經濟工作，而財經領導小組是黨中央的。是否財經小組集中研究大政方針，具體業務可多發揮行政部門的作用？但為什麼一些問題總是提到財經小組會議討論？就是改革以來，許多問題綜合經濟部門處理不了。這就又成立臨時機構。鮑彤插話說，重大問題都是非常設機構來辦，目前國務院有正式辦公室71個，臨時辦公室65個，什麼「飛機辦」、「核電辦」、「旅遊辦」，等等。

盛樹仁建議，參考國外的做法改革國家的經濟管理體制。他說，比如日本對經濟有很強的干預，他們管經濟的是通產省，下轄的局都是政策性的。我們要有精幹的部門全力搞戰略，有的部門集中抓當前工作。今後有一條應該很明確，政府不要管那麼多具體的事務。但我們的各種機構中，缺少適合商品經濟的新型組織，如半官半民的行業機構，非行政性的智囊機構，企業化的工程集團，等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凱泰^{【482】}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解決黨怎麼領導、管理怎麼搞法的問題。而重點，一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相應的東西；二是解決引起社會不滿情緒的東西，尤其是黨風不正，包括用車、住房和各種「供給制」的特權。

【481】盛樹仁（1929-2003），湖北武漢人。時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482】吳凱泰，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6-5 地方大員的意見：放權、分權是關鍵

10月23日和25、26日，政改辦召開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座談會，請正在中央黨校省部級研究班的省級幹部和部分省、市領導人與會。主持會議的周傑先是請大家討論一下「三個條例」的《補充通知》草稿。

所謂「三個條例」，即9月15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但條例下發以後，立即遇到了問題。因為歷來是黨委行使領導職權，那麼，落實廠長負責制，究竟是黨委書記領導廠長？還是廠長領導黨委書記？按中國的習慣用語，就是倒底誰是「一把手」？為了釐清混亂，中央決定再發一個《補充通知》，明確規定廠長是「一把手」。草稿強調：「廠長是第一把手，處於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黨委的工作，是支持廠長。」多數人認為「一把手」的提法不好，我建議改成了「法人代表」。

考慮到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實際情況，我提出：現在這些企業裏的書記和廠長的關係，「同心同德」者不到20%，「同床異夢」者約50%，「同室操戈」者有30%以上。實行廠長負責制最好有一年的過渡：6,000家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中，條件成熟的立即實行；條件不成熟的，可以在書記、廠長裏選強的任廠長兼書記、弱的任副廠長兼副書記，一年後強的只任廠長，弱的專任書記，就自然過渡了。我的意見沒有被採納。

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483]發言說，權力過分集中是現行體制弊端的主要根源。現在是中央集權過多，黨委集權過多。中央部委搞集權，又政出多門。到了下面，則是權力過於分散，出現了有政府的無政府現象。上面是屁股指揮腦袋，誰指揮屁股呢？當前是財政體制與部門利益指揮屁股。解決的辦法是縱向放權和橫向分權。放權要解決頭重腳輕的問題，使權力重心逐步下沉，形成統一的中央和各具特色的、多樣化的地方。

廖伯康引用一些民間的說法，如人們說：人大是「掛了個大牌子，安排些老頭子，人說是好位子，實際是空架子，表決是做樣子，清談著混日子」；政協是「監督無權，參政無門，活動無錢」；民主黨派是「長期共存，未必未必；互相監督，豈敢豈敢？」，諷刺黨把一切權力都壟斷了。他說，政治體制改革「從何著手」呢？要找到動力、找到依靠力量，「我贊成選在權力下放，實行部、省分權。」

[483] 廖伯康（1924-），四川重慶人。時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後任四川省政協主席。

廖伯康批評幹部制度僵化，說甚麼人都叫幹部，年復一年弄了一堆濫竽充數的八旗子弟，除了清談、昏談，甚麼都不會，不改革不得了。而幹部為什麼只對上負責？因為只有任命制，沒有考核，沒有競爭，就產生不了工會領袖、青年領袖、婦女領袖、學生領袖。當他說到現在只有「官」沒有人才時，胡啟立評論說：「現在所有的機構都要評一個級別，強化了當官意識。大學校長只是個處級，很傷知識分子的心。」

遼寧省省長李長春也認為，現行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是高度集權。他說，政治體制改革本質上是兩方面，一是國家行政管理的高效化，一是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要從解決高效化入手，促進民主化。他強調，要向分級分權管理前進，向間接控制過渡，實質上是下放權限，這是突破口。目前國家的行政機構設置是部門經濟，各部門把著錢和物。要從國家層次將業務部門改成國家綜合部門的諮詢機構；改變投資體制，把擴大再生產放到企業，讓企業成為投資者。要形成分級包乾、分級負責的財政體制。

李長春接著說，政治生活也要分級分權管理。黨政分工要先把明顯由政府管的事情分出去，各級黨委不再設分管書記，黨委部門不再按行政管理對口設置。機構設置要自上而下改革，否則下邊不好辦。幹部制度改革，要有一套錄用、監督、迴避、獎懲制度。老同志安排要有新辦法，有功的可以給爵不給官。遼寧省人大有 11 個主任、政協有 13 個主席，年紀太大，多數勝任不了那裏的工作。

山西省委副書記王建功^{【484】}認為，現行體制的弊端是：權力高度集中，黨政職能類似，法制和民主不健全，幹部管理不科學。一是權力過分集中，黨的組織和國家機構橫向比較，黨的權力大，而黨委和政府兩種執政實體並存，行使管理國家的同一職能，黨委工作國務化，官僚主義難以避免；中央和地方縱向比較，中央集權多，滋長了下級一切看中央、等中央、靠中央的狀態；領導班子內部，主要領導人集權偏多，容易形成一言堂、家長制。

王建功說，二是法制、民主不健全，黨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制度、規範和程序，就造成了權大於法、法懼於權；國務活動缺乏法制化，立法、行政、司法如何支持與制約也沒有解決；民主缺乏制度保障。三是幹部管理不科學，幹部標準觀念陳舊，致使良才用不上、蠢才出來了；幹部任職期間沒有考核、獎懲、升降制度；缺少幹部交流、迴避制度，容易形成關係網。

【484】王建功 (1936-1998)，河北望都人。時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

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顧浩^{【485】}發言說，感觸深的有幾個問題：第一，黨政不分。實際工作中黨委包攬行政事務，組織上交叉兼職，機構設置重疊；第二，政企不分。江蘇省級機關有132個部委辦局，廳局級公司179個；第三，高度集權。中央各部門管得過嚴、過寬、過多、過細、過死；第四，機構臃腫。省級行政編制7,029人，現已達45,000多人；第五，效率低下，蘇州一張報告就蓋了200多個圖章；第六，人民政治參與機制不完善。

最後，顧浩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幹部制度改革，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治體制改革無從談起。他說，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六個問題：一、黨政分工，解決機構重疊、交叉兼職、雙重領導；二、權力下放，橫向、縱向分權；三、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四、機構改革，需從上到下改；五、幹部制度改革，要在「進、出、流、考」上下功夫；六、領導方式改革，要理順指揮系統，減少管理層次。

湖南省副省長俞海潮^{【486】}說，現在「權都在上邊，省裏沒有甚麼權；錢都在部裏，省裏沒有貸款指標。」所以，大家說「跑部（步）幹四化」，多往部裏跑就能弄到錢。遼寧省副省長聞世震^{【487】}認為，現行體制的主要弊端是封建主義，是缺少民主和法制。所以，民主是改革的基本方向。一要正確處理黨政關係，改變黨包攬一切的狀況；二要正確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職權，擴大地方權限；三要改革國家權力機構，通過人大反映人民意願；四要改革國家行政管理，縱向上簡政放權；五要改革幹部制度，使人才脫穎而出。

參加座談的河南省委副書記劉正威^{【488】}、上海工業建設黨委書記孫貴璋^{【489】}、貴州省副省長劉玉林^{【490】}、哈爾濱市長邵奇惠^{【491】}、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492】}等人，也先後都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特別是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作了分析，並一致贊成「權力下放」的意見。

【485】顧浩（1940-），江蘇南通人。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486】俞海潮（1932-），浙江奉化人。時任湖南省副省長。

【487】聞世震（1940-），遼寧海城人。時任遼寧省副省長。

【488】劉正威（1930-），河南新鄭人。時任河南省委副書記。

【489】孫貴璋（1935-），遼寧遼中人。時任上海工業建設黨委書記。

【490】劉玉林（1930-2009），遼寧瀋陽人。時任貴州省副省長。

【491】邵奇惠（1934-），江蘇宜興人。時任哈爾濱市市長。

【492】李錫銘（1926-2008），河北束鹿人。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六四」事件的製造者之一。

記得去年，浙江省長薛駒^[493]、湖南省長劉正^[494]就一再和我說過：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發展又極不平衡。中央只要控制住主要的總量指標，把具體的發展權力下放到省、市一級，一定會出現各顯其能的局面。這次地方大員基本上也都認為放權、分權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看來這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6-6 討論《政治體制改革涵義與重點的彙報提綱》

經過一系列研究、座談和討論以後，10月24日，政改辦初步討論了《政治體制改革涵義與重點的彙報提綱》。大家認為，在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與目標之後，應該把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放在五個方面：

一、是理順黨政關係，實行黨政分開。包括：明確黨在建設時期的主要職能，解決黨與政府、人大以及其他各種組織的關係，黨只在政治上實行領導，在不同層次上區分和明確黨組織的不同功能，並相應地改革黨的各級組織形式，如撤銷黨組，撤銷黨與政府的對口部門，在基層取消黨的專門機構，實行黨組織的屬地化，改革黨對幹部工作的領導，不再提「黨管幹部」。

二、是改革行政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機構。包括：在政府系統確立首長負責制，建立行政機關向上級、向人大負責的體制，確立政府對社會的宏觀和間接管理，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精簡與重組政府機構，並用預算控制機構和編製。

三、是改革幹部制度，實行分類管理，建立公務員常任制。包括：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在公務員系統實行常任制，常任制官員不因領導人的變動而變動，建立國家人事局代替黨的組織部門管理政府幹部，健全對幹部的監察制度以及幹部的福利、退休制度。

四、是發展黨內民主，防止黨內權力過分集中，以推動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包括：完善集體領導，實行黨的決策民主化，把中央委員會變為工作實體，吸收廣大黨員參與黨的決策，重大問題由全黨討論，從上到下解決黨內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建立黨內批評的制度規範，紀律檢查部門改由自上到下的「條條」垂直領導，對黨的代表大會負責。

[493] 薛駒 (1922-)，山西運城人。時任浙江省省長、中共浙江省委書記。

[494] 劉正 (1929-2006)，湖南長沙人。曾任湖南省省長、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時任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

五、是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特別是改革黨和人大的關係，減少人大代表的人數，提高代表素質，健全議事規則，建立提名制度，加強立法職能。

鮑彤在這次會上發言，總結了他此前的 10 個觀點。他說，第一，我們的制度基本上是好的。第二，但有重大缺陷，現在情況好，主要是靠人，將來要有制度保障。第三，革命過去很久了，建設也很久了，但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尚未完成，影響長治久安和現代化建設。第四，搞商品經濟是一個重大突破，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適應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有了這四條，今天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非常必要的。

鮑彤說，第五，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有近期與長期之分，近期是有限的，要與初級階段相適應；長期是搞高度民主。現在要搞初級民主，近期就是制度化：通過黨的領導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調整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發揮其各自的功能；以黨內民主為主，從黨內民主到政治民主；從健全國家法制入手，建立各種社會制度、建立正常秩序；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利於提高效率。而後，他探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內容。

他說，第六，關鍵在於黨政分開，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最大的問題是改變「一元化」領導的概念，對黨的領導作用要重新認識，對一系列相關問題要重新設計。抗戰後，毛主席多次提出過：「要反對國民黨的以黨治國，我們也不搞以黨治國。」現在蔣經國也在改革。鮑彤強調黨的「間接控制」，他認為「具體的事情少管一點，主意出得更好一點，黨員的作用更模範一點，黨的威信只會更高。」

他接著說，第七，黨的改革要做一個專題，有 4 個題目：黨的決策程序與民主集中制，各級黨組織的功能分解，領導方式的轉變，組織形式問題。我們現在政府機關幹部有 410 萬，黨的專職幹部有 67 萬。這麼多黨的專職幹部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是沒有先例的。是不是黨的基層組織的幹部可以不脫產，地方黨委也可以這樣？地方黨委設與政府的對口部，說明對政府不放心。長期以來，黨在思想上站崗放哨，中宣部是否要成為國民黨的新聞檢查處？黨在組織上應該怎麼管幹部？都管起來顯然不合理，都要改革。

鮑彤講，第八，政府改革。他說，在政治體制改革中，黨的改革最重要，人大的改革最敏感，政府的改革最複雜。至少有 7 個問題要研究：一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劃分，二是政府與企業的權力劃分，三是機

構設置與分工，四是編製，五是文官或國家公務員制度，六是行政監督問題，七是工作的規範化問題。

第九，是最敏感的人大問題。一是人大的權力是甚麼，二是人大能不能起作用，三是人大的組成問題。如果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就不可能起作用，因為實際上的最高權力在黨；或者人大成為最高立法機關，而不是最高權力機關。第十，上述變革涉及很多觀念的變化。最大的問題是，要考慮改革措施與黨章、憲法的關係，有沒有矛盾？如果有，怎麼辦？都要提出來討論。

10月28日，政改辦召開了第六次座談會，請中共中央各工作部門人員參加。主持會議的周傑要求大家側重討論黨政分開、民主黨派參政和幹部制度改革。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組織部副秘書長鄭科揚^{【495】}、中共中央宣傳部副局級調研員陸慶賢^{【496】}、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所副所長賈挺^{【497】}、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蘇沛^{【498】}、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堪^{【499】}。

鄭科揚認為，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理順關係，明確職能、職責和權力。黨委領導與政府領導的關係要解決，黨設分管政府工作的書記、設工業部、設經濟部等，體制上明顯的不合理。幹部制度改革是要創造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過去從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開始改革，有一定成效。但現在「幹部」這個概念包羅一切，用一種模式、一種要求管理各種幹部，成了政治等級、待遇等級，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陸慶賢則提出「黨怎樣領導思想工作」的問題。他說，現在是由宣傳部統管，越往下越嚴重。連報紙的紙張分配、技術改造、進口設備都要新聞局管。而中宣部出版局與國家出版局又沒有甚麼區分，本來出版社成立登記是國家出版局管，可是也要中宣部批准。在縣一級，教育、文化、體育、衛生、計劃生育等，都是宣傳部管。

賈挺著重講了民主黨派的問題。今年3月，胡啟立要求研究如何完善多黨合作，黨外人士反映強烈：一是民主黨派如何對共產黨監督？二是民主黨派如何參政？他們不甘於當花瓶。蘇沛說，現在下放權力往往是放到了縣、市，放不到企業，一些企業反映，「過去是賈母管，現在是王熙鳳

【495】鄭科揚（1931-），四川江油人。時任中央組織部副秘書長。

【496】陸慶賢，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局級調研員。

【497】賈挺，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所副所長。

【498】蘇沛，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

【499】劉堪（1926-2008），河北樂亭人。時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管，管得更嚴。」劉堪則說，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利益集團，群眾組織搞得很多，像行業、地區、產業協會，應該允許和支持。

6-7 駐外使節說：「我們不是法治國家，而是人治國家」

10月30日，政改辦召開了第七次座談會，參加者主要來自政法部門。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法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黃傑^{【500】}、公安部副部長俞雷^{【501】}、最高人民法院刑事二廳廳長孫琬鍾^{【502】}、最高人民檢察院人事二廳廳長胥奎首^{【503】}、司法部辦公廳主任李必達^{【504】}、民政部幹部處副處長林平^{【505】}。鮑彤主持會議。

黃杰認為，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執政黨要管大政方針，具體管理職能則應該屬於國家政權機關。然後，他論述了黨和司法機關的問題，他說司法的核心是檢察權與司法權，黨要保障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保障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目前黨的干涉太多、太具體，司法部門不敢、也不能獨立行使權力。政法委的職能是協調，但在下面往往就變成了對案件拍板。

黃杰接著說，我國的法律又不完備，大多是粗線條的，彈性較大，內容不確定，早先制定的法律又與改革後的情況有衝突，有問題就請示黨委，這樣打屁股也打不到自己。加上黨管幹部，人事權都在黨委，不聽話就給撤了，更促使政法幹部產生依賴思想。我們的政治體制缺陷很多，像人民的民主權利無法實現，黨和國家機構重疊設置，幹部制度不合理，以及整個制度中缺乏監督機制。

俞雷說，改革以來，公安、司法、安全的關係還沒有理順。從公安系統的問題看，國外警力一般在人口的0.2%以上，我們還不到0.06%，有的地方就搞了「合同制民警」，造成警察隊伍的混亂。國外只要不是戰時，社會治安都靠警察管理。警察不是軍隊，軍隊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警察是隨時都要使用的，但經費、人力都不足，裝備條件也很差，遠遠滿足不了維持社會治安的需要。

【500】黃杰，時任中央政法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

【501】俞雷，時任公安部副部長。

【502】孫琬鍾（1930-），河北懷來人。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二廳廳長。

【503】胥奎首（1928-2007），山西平陸人。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人事二廳廳長。

【504】李必達（1940-），湖北漢陽人。時任司法部辦公廳主任。

【505】林平，時任民政部幹部處副處長。

李必達就司法系統分析了8個不安定因素：一是公安部、檢察院、法院、司法部還沒有形成制約機制；二是勞動改造系統生產任務過重，管教人員的工資靠生產，為搞經濟忽略改造；三是勞改期滿人員難以安置，而且受歧視；四是律師太少，只佔總人口的0.001%，是世界各國最少的；五是司法行政不統一，司法行政由法院管，影響獨立審判；六是幹部待遇差別大，人才流向公檢法；七是群眾告狀難，審訴無門；八是所謂法制小報往往是傳播犯罪。

孫琬鍾反映說，不僅刑事案件，連民事案件、經濟案件，都無法獨立審判。「案件進了門，兩頭都托人」，原告和被告都去找大人物，一找就表態，弄得具體工作人員很難辦。現行司法幹部管理體制不利於獨立審判，必須改革。還要改變認為司法機關是「刀把子」、是專政機關的老觀念。黨委怎樣領導政法工作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往往運動一來，黨委聯合辦案，倒是「從重從快」了；運動結束，冤假錯案佔了70%以上。

胥奎首認為，黨要管黨的事情，就是管路線、方針、政策。現在黨委干預最多的，就是檢查機關辦的案子，像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受賄等等。他強調，要加強監督部門，特別是行政監督，國家工作人員的問題現在就沒有人監督。林平說，現在經濟部門膨脹得很厲害，而司法部門編制少，民政部也編製少，都難於適應需要，精簡機構要區別對待。

11月1日，政改辦召開了第八次座談會。請部分駐外使節參加，出席會議的有：前駐蘇聯大使楊守正^[506]、前駐英國大使陳肇源^[507]、前駐孟加拉大使肖向前^[508]、前駐聯合國大使凌青^[509]、現駐莫桑比克大使王浩^[510]、現駐丹麥與冰島大使陳魯直^[511]。鮑彤主持會議。

楊守正說，我們50年代搞「一長制」，後來搞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現在又搞廠長負責制。蘇聯從列寧時搞「一長制」，沒有改變過。蘇聯的企業廠長、總工程師、總經濟師、總會計師，後面才是黨委書記。書記級別比廠長低一、兩級，自然就以廠長為主，領導地位明確，指揮中不會發生困難。黨委是機關黨委性質。

他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小平和戈爾巴喬夫都這樣講。斯大林是一人拍板，與毛主席在世的時候差不多。斯大林

[506] 楊守正 (1919-)，浙江上虞人。前駐蘇聯大使。

[507] 陳肇源 (1918-1985)，廣東順德人。前駐英國大使。

[508] 肖向前 (1918-)，遼寧台安人。前駐孟加拉大使。

[509] 凌青 (1923-2010)，福建福州人。前駐聯合國大使。

[510] 王浩 (1919-)，山東牟平人。時任駐莫桑比克大使。

[511] 陳魯直 (1925-)，江蘇江浦人。時任駐丹麥與冰島大使。

死了以後，蘇聯的民主多了一些。我們的封建傳統更長，建國後我們不是法治國家而是人治國家。我們這裏，有的重大問題未經中央討論，領導人就發表意見。領導人說的話就登報，領導人批的項目就合法。我們法律可以不執行，領導人講的話不能不執行。實際上，我們人治的成份比蘇聯還多。

他接著說，黨作為領導核心，應該從具體的事務中擺脫出來，著重於制定指導國家的大政方針。蘇聯也是黨中央各部與政府各部重疊，多少年的習慣，分開不容易，問題比較複雜，難度很大。蘇聯的計委班子是工程技術人員，管不了宏觀經濟，正在做人的調整；宏觀管理要集中，不能分散為幾個單位，他們正在解決這兩個問題。他還說，保證國家主要立法的相對穩定是必要的，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行修改也是必要的，但不能變得更快。

陳肇源說，外國對我們議論最多的是辦事效率太差，英國人就最煩我們的官僚主義。一個英國律師說，在目前的體制下，你們的官員不貪污是不可想像的，這個問題是難以解決的。現在講權力下放，不知怎麼下放？重要的是人民應有的權利要受到保障和保護。新加坡的反貪污法很嚴格，你當官貪污了，10年、15年之後，還會受到追訴。只有發揚民主，才能監督官吏。他認為，要打破幹部任用的關係網，要借鑒外國的文官制度。

肖向前認為，要實現長治久安，有四個內容：一是充分就業，讓人人都忙起來；二是物價穩定，這關係到人心安定；三是保持經濟的實際增長，數字越高越不可信，說明浪費大、虛數大；四是收支平衡，有盈餘更好。他認為，國家控制不外兩個東西：一是鼓勵，要生產需要的東西；二是抑制，實際我們生產上的浪費比資本主義要大的多。

他說，政治體制改革，黨政分開是關鍵，問題是怎麼分？還有權力下放，放到哪裏去？外匯給你了，買了幾萬輛汽車，權力用到特權上了。精簡機構，至少有3,000萬人要精簡，怎麼辦？服務行業又沒有人幹。可不可以搞一個全民大討論。他又說：「我覺得，三權分立是避不開的，不能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就不吸收。」

政改辦在研討的過程中，先後又調來了十幾位研究人員：體改所所長助理孫方明、人民解放軍總參二部官員陳曉魯、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著作研究組負責人黃海、重慶市副市長於霽夫、北京市委工交部副部長李鐵林、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信息室主任高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張占斌、鐵道法院法官徐沖、國家機關黨委研究人員沈榮華、中央組織部研究室處長顧雲昌、王春生、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陳小平、中共貴州省委

副秘書長陳群林、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研究人員張偉、體改所研究人員王紹賢。

6-8 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黨政分開

在政改辦近1個月的討論中，重點逐漸往「黨政分開」這個問題上聚集。大家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有兩點：第一，應該是「黨政分開」，還是「黨政分工」？強調「黨政分開」的，主要是鄧小平；明確不同意「黨政分開」的是鄧力群，他主張用「黨政分工」。第二，應該以「黨政分開」為關鍵，還是「權力下放」為關鍵？前者是鄧小平提出的，後者則是許多地方領導人的意見。

10月底，政改辦總結前一段的研討，議論如何形成向研討小組彙報「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涵義和重點的提綱」。初步認為這次政治體制改革要涉及7個方面：第一，黨政分開，目的是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政府職能；第二，改革政府，逐步實行政企分開、權力下放、改革機構、完善政府機制；第三，改革人大，對人大代表和常委會進行實質性改革，或是權力機關，或是立法機關；第四，民主黨派和政協問題；第五，幹部制度改革；第六，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第七，機構改革。

鮑彤根據大家的討論，談了他的6點意見：

第一，從大家的座談、討論看，對黨的領導地位、作用沒有異議。沒有黨的領導作用，就沒有穩定的中心。

第二，大多數人對「黨政分開」的提法沒有意見。黨和國家政權是不同性質的組織，應該做質的區分。講「分開」，就是強調質的區分。現在黨政也不是沒有分工，但確實沒有分開，就是黨在直接行使國家政權的職能。現在事實上各級黨委都在直接指揮各級政府，越往下越嚴重。所謂指揮，一是政府各廳局的工作直接受黨委對口部門的領導，二是政府的幹部直接由黨委管理，「黨政分開」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實行「黨政分開」的利弊。有大利，有小弊。大利有三條：有利於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威信，更好地實現黨的主張；有利於國家機關建立正常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率；有利於理順黨與各種社會組織的關係。弊是不方便，不那麼痛快，在一些問題上要扯皮、有麻煩。但麻煩可能是好事，可以使黨更謹慎地決定問題。歸結起來，是「三好一少」：黨的主張要好，黨員的模範作用要好，黨與人民的關係要好，黨要管得少。

第四，實行「黨政分開」有沒有風險？有人擔心這麼作會不會削弱、否定黨的領導？實際上，以黨代政是種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黨的領導作用就是要提出正確的目標並使之實現，現在往往是忘記了目標，整天忙於討論具體的人財物問題。黨執政後的危險是什麼呢？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來了，黨的八大就提出來了，這就是：腐化！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黨的行政化、權力化，必然導致官僚化和腐化。

第五，現在實行「黨政分開」的有利條件。理論上有根據，歷史上有教訓，已經開始積累經驗。廠長負責制就是黨政分開的大動作，可以形成基礎，引起連鎖反應。那麼，難點何在？一條虛的是觀念，「大權獨攬」的觀念，「一元化領導」的觀念，等等。阻力會有，但這些非改不可。如果這點承受能力都沒有，就不要談改革啦！實的難點很多，集中到一點，是黨管幹部的體制。黨管幹部不能適應今天的形勢。

第六，「黨政分開」應該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如果廠長負責制能在半年內從兩萬個企業推廣到四十萬個企業，則是中國經濟、政治生活的大變動。這個改革如果能夠成功，就會震動較小地使政治體制改革形成不可逆轉的局面。

最後，他說，有關「黨政分開」的具體內容、具體步驟，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11月1日，周傑也就「黨政分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第一，「黨政分開」這個命題我贊成，比「黨政分工」明確。國民黨時期，共產黨沒有政權，當然黨政是分開的。取得政權以後，確實有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黨政分開。國家政權和共產黨不是一回事，兩者的職能、職責、職權不同。但共產黨也不能與群眾團體劃等號，畢竟是執政黨。問題是怎麼理解執政黨？黨掌握國家政權，又不是國家政權。不能「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是黨怎麼領導。

第二，關於「黨管幹部」，確實有以黨代政的問題。用人單位不管工作，工作單位不管用人。甚至高級檢察院、法院的院長調走了，人大都不知道。但「黨管幹部」還不能簡單否定，問題是現在黨管的太多太寬。像人大、國務院、軍委、高檢、高法的負責人，是中央常委定；下一個層次的人事，如中央委員、人大常委、部長，是書記處的人事小組管，由中央書記處定，具體辦事以中組部為主。

他接著說，省裏的六套班子（即：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省紀委、省顧委），由中組部考核、審查，經書記處人事小組討論，而後

由中央書記處定。現在國務院各部確定司局長都是黨組定。如果「黨政分開」，幹部究竟怎麼管？線劃到哪裏就需要很好的研究。還有新老交替的問題、人才交流的問題、部門地區之間調動的問題，等等，怎麼辦都要研究。

第三，中央、地方、基層，要分層次有區別的解決問題。各地差異很大，不同的縣、鄉情況又很不一樣。像江蘇就強調政企分開，因為蘇南鄉鎮企業發展快，需要獨立活動；北京的山區縣就說，不要強調黨政企分開，因為就那麼幾個幹部；鄉是基層，企業、學校、科研單位也是基層，情況又都不同。所以，要有大的規定，又不能太具體，應該允許按不同情況從權處理。

第四，「黨在憲法與法律範圍內活動」這個概括好，但還需要具體化。這包含兩個意思，一個是你共產黨搞了憲法，自己不執行怎麼行？二是憲法是根本大法，適用於全國，黨的文件不能與之牴觸。

在政改辦的研究討論中，主流意見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黨政分開」。不僅政改辦自己重點研究了黨政分開，而且組織了大量的專題研究和委託研究。對地方大員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權力下放」則研究不夠。如果當年的政治體制改革能以「權力下放」為重點，可能得到的支持會比較大一些，改革的阻力也會小一些，引發的制度變革效果則可能會更好一些。當然，歷史從來沒有如果。

6-9 研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

——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聽彙報並討論

11月7日、8日，研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聽取和討論辦公室《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與重點》的彙報。研討小組成員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出席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政改辦的鮑彤、周傑、嚴家其、賀光輝、陳一諮、陳福今、吳國光、陳曉魯、孫方明、遲福林、吳偉、周大力、李丹綱、呂長春、貝際波、劉洪等人。

鮑彤首先彙報了政改辦最近的工作情況，談到長治久安和制度化建設時，趙紫陽說：「現在國內外都關心小平同志，就說明我們的長治久安還沒有制度保證。」當彙報到建國以來一直都沒有完成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的轉變時，趙紫陽問：「組織形式的轉變、工作方式的轉變，都提過吧？」鮑彤說：「組織形式要適用於政治任務，但當時政治任務的定位就沒有定准，是搞階級鬥爭。」

鮑彤彙報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民主化，近期目標是制度化。趙紫陽問：「什麼樣的制度化？」鮑彤說就是按憲法與黨章辦事。趙紫陽說：「光說制度化，恐怕概括不了。」胡啟立說：「經濟改革是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句話就說清楚了政治改革能不能找到這樣一句話？」在鮑彤彙報了制度化的內容以後，趙紫陽說：「有了制度，還有個執行的問題，這和人的素質、和整個社會都有關係。」

趙紫陽說：「香港 60 年代以前，警察收賄犯罪嚴重，設了廉政公署，現在比我們好多了。我們有很多走後門，歐洲、美洲的國家也都有這一類問題。我們現在是沒有制度，有了也不執行；國外有制度，當然也不一定執行，但有個規矩總會好一些。我們過去把資本主義說得太壞了，現在又說得太好了，特別是在青年人中間。」胡啟立說：「紫陽這話說到點子上去了。」

趙紫陽強調：「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解決黨政關係、中央地方關係、人事制度之類問題。可以說基本理順甚麼關係，首先解決社會政治組織之間的關係。要用一個概括的說法，理順幾種關係。大家考慮一下。」他又說：「只說走向制度化，沒有涉及實質問題，分權才是實質問題。近期的目標，是要解決黨與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包括黨與政府、黨與人大、黨與別的社會組織、還有黨與企業之間的關係。近期目標能不能用『理順甚麼關係』並走向制度化？」

當鮑彤就「黨政分開」作彙報時，趙紫陽說：「黨政分開」似乎比「黨政分工」更準確。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用「黨政分工」不恰當。他問大家：有沒有比「黨政分開」更好一些的說法？有人說：「黨政職責分開」趙紫陽說：可以考慮。黨與政是不同的職責、不同的功能。不過，針對我們的情況，「黨政分開」很準確。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一個是黨的領袖組閣，一個是保證議案通過。

趙紫陽接著說：「黨政分開」的涵義，就是「黨不直接發號施令，不直接處理政務」。他強調，這是一篇大文章。將來的黨政關係究竟怎麼樣？這是個大問題，又是實際問題。從原則上說，黨不代替政府，不直接發號施令，這是個大事。既要改革，又要行得通，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先例。

鮑彤彙報到「黨實行政治領導，只管大問題」時，趙紫陽問：「甚麼叫政治領導？甚麼叫大問題？黨就管執政組成政府那些人。比如，黨中央讓我組閣，可以管我、撤換我、調動我，也可以討論怎麼辦。但是，屬於政府的事情，就不該再插手。既然要他組閣，就不要代替他。政府與人大

都受黨管，就體現了黨的領導，還可以通過黨員，黨還有監督。中央這一層很清楚，中央決定大問題，通過政府去發號施令，實行政府首長負責制。」

趙紫陽說：「還要解決黨怎麼管、怎麼領導的問題。」薄一波說：「按目前的具體情況，黨政分開是可以的。為甚麼機構這麼大？辦事效率這麼低？官僚主義解決不了？這些問題越搞越嚴重。小平提出的幾句話是原則性的，也是看到了目前這種現象的。毛病在什麼地方？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是根源。」趙紫陽補充說：「我們不是討論共產黨是否執政的問題，而是討論共產黨怎樣當好執政黨的問題。」

薄一波繼續說：「近期要解決這個問題。蘇聯 20 年代是一黨專政，後來講黨與非黨的同盟。我們在陝甘寧邊區搞了個『三三制』（指：共產黨、其他黨與非黨人士在政府中各佔 1/3）。進城以後，開始副總理也有非黨人士，部長中黨外人士也不少。」他沉吟了一下，又說：「黨究竟應該怎麼領導？黨要管大的事情。搞『工業 70 條』時，小平就說，黨委書記最好當，就是當『甩手掌櫃』。」

趙紫陽說：「國民黨的以黨治國，還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不分厲害。國民黨的中常委並不討論一切事；地方黨部不搞一元化領導，管事更少。一個省黨部書記讓他去當一個廳局長都會很高興。」薄一波說：「因此，他們的分散主義很嚴重。」趙紫陽說：「我們現在把企業問題解決了，將來地方黨委的問題要解決。但是，要反對封建割據，政令軍令要統一。」

當彙報到應該撤銷黨組的時候，鮑彤說，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議會黨團、工會黨團，相當於我們的黨組。在各部門設黨組，也就我們一家。趙紫陽說：「我們要改變許多觀念。黨組這個東西，有一個演變過程。建國時，政府各部裏有民主人士，部裏就搞了黨組。國務院搞總黨組，毛主席發了脾氣。後來，黨組變成了一種待遇，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就是黨政不分，也可以撤銷黨組。」

鮑彤彙報到建議大幅度消滅基層的專門性黨組織時，趙紫陽說：「匈牙利的企業裏，黨組織就非常小，他們有一個口號，叫『黨務工作社會化』。而我們呢？50 年代，黨的機關還很小。後來，突出政治，機構加碼，黨委就機關化、行政化了，現在黨委有很大的機關。」彙報到幹部制度改革時，趙紫陽說：「甚麼叫幹部？戰爭時期，習慣於說幹部，以區別於戰士。現在甚麼人都叫幹部，醫生怎麼能叫幹部？」

薄一波說了一個故事。他說：「政協召開時，毛主席和民主黨派的領袖說：今後各黨派不用籌措費用了，一律由國庫開支，民主黨派都很高

興。可他們的費用連共產黨的1%都不到。就這樣，黨的幹部就都由國家養起來了。文革前，黨的機構就膨脹了。毛主席又說：以後，黨的機關要用黨費開銷，人員不能太多。現在比以前膨脹得更厲害了。看來，這個問題不解決是不行了。」

當鮑彤彙報到要加強人大管理領導幹部的權力，比如國務院任命部長要對人大有詳細的介紹時，田紀雲說：「在任命幹部問題上，國務院也是橡皮圖章，無法向人大作說明。」顯然，這個權力在黨的手裏。趙紫陽說，有關人大的問題要很好的研究。在內閣組成問題上，他說：「總理的人選如果定了，內閣人選由人大審查，我們有這個條件嗎？按目前的體制，人大真成為最高權力機構，政府就很難辦事，政府職能就很難發揮。」

趙紫陽接著說：「現在說人大是權力機關，其實權力還不如外國的立法機關。作為立法機關，可以與行政機關相互制約；如果是權力機關，政府的行政權就不完整。怎樣發揮人大的作用？這是個大問題，社會上也呼聲很高。」鮑彤插話說：「三權分立的思想不能簡單否定。」趙紫陽說：「要從實際出發。把人大從權力機關改為立法機關，是不是可行？三權分立不能搞，人大的作用必須進一步發揮。怎麼樣發揮，要研究。」

趙紫陽說：「如果人大立法，又是權力機關，世界上沒有這種體制。人大要成為最高權力機關，黨的主要領導人要到人大去，這就不是橡皮圖章了。黨的領導人一部分進政府、一部分進議會，黨就沒有日常工作了，恐怕也行不通。如果按西方的辦法，黨員代表一定要同意黨的議案，我們的人大只能是橡皮圖章；如果可以隨便投反對票，中央政府在議會裏就沒有基礎，投反對票的會是共產黨員；如果要求所有的政府提案都得通過，人大的作用就很難發揮。」

當鮑彤彙報幹部制度改革，建議實行「文官制度」時，趙紫陽問：「社會主義國家有幾個實行文官制度的？」答：「只有南斯拉夫。」趙紫陽說：「他們那裏沒有『黨管幹部』。南斯拉夫之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一樣，都是『黨管幹部』，只是程度不同。黨管理幹部工作，不是管每一個幹部。現在黨管幹部就是黨任免幹部，組織部任免幹部。而組織部又不管具體的事，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幹部管理制度要改革。」

趙紫陽說：「將來如果黨委設組織部，也不要管具體的幹部任免，要搞幹部的宏觀管理，包括綜合、規劃、交流、培養、紀律等大的事情。而考察、任免、獎勵、處罰等具體的事情，都應該由政府各部門管。還有一個問題：哪一級黨委管到哪一層？外國是分文官和政治家，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家是黨管的。誰去組閣？黨的領袖去當首相、當總理、當總統。」

要研究國外的文官制度，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幹部制度的規矩也可以借鑒。」

薄一波說：「幹部制度改革要與『黨政分開』聯繫起來看。黨不管黨，管了甚麼？管了它不該管的事情。黨要真正甩開手，管政治思想工作。黨政分開到底搞甚麼？幹部制度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三十幾年來都有些混亂。建國開始，說中組部管五千人。其實，連五百人也管不了。到底黨管甚麼？所有黨員它都要管，但是應該有所區分。組織部就管不了政治局、書記處。能幹的人組織部就說他驕傲，不能用。」

薄一波又說：「去年，廠長負責制搞不下去。廠裏認為這個人可以，組織部就是批不准。兩個好幹部，一個好廠長，一個好書記，都有能力，放到一個廠子，這個廠子就垮台。現在年輕人也難以上來。」他轉臉對胡啟立和田紀雲說：「我們活著，你們難以上來。啟立、紀雲也五十六、七了吧？我們不死，你們也上不上來。為甚麼不能從20、30、40幾歲的人中選拔？」他問彭沖：「你們委員長裏面，九十歲的也不算甚麼吧！」

趙紫陽繼續討論文官制度，說：「要把幾個主要國家的文官制度搞清楚。看來，非搞文官制度不可。現在的辦法不行，一擴大自主權就結幫拉派、任用私人。搞年輕化，靠搞二、三梯隊不是長期辦法，只能是個過渡。」薄一波說：「不少人花力氣、花錢，把兒子弄進第三梯隊。」趙紫陽說：「要比較幾個搞文官制度國家的情況，看哪些與我們情況接近。還有步驟問題，即如何向這種制度過渡。改變黨統管幹部，要有新的制度。」

胡啟立說：「中組部搞了幾個方案。」趙紫陽問鮑彤：「你們是不是瞭解中組部的方案？要把幹部制度改革納入政治體制改革之中。要搞個專題，由組織部牽頭。啟立告訴中組部，請他們來介紹一下。」胡啟立說：「封建社會是搞科舉制，對社會穩定有很大作用。資本主義是選舉制和文官制度，也穩定，比較公平。我們搞第三梯隊是應急措施，人治因素太大，沒有把選擇幹部的權力交給群眾。新的制度不建立，妨礙長治久安。」

胡啟立還說：「組織部照樣也可以拉幫結派。廠長也一樣。」趙紫陽說：「我們現在的幹部制度，已經有了不同於過去的選拔方式，如推薦、聘任、招聘、承包，等等。過渡時期可以有過渡的辦法。像一個縣級幹部到一個企業任職，回來還是縣級幹部。總之，幹部制度是個重要問題。政治體制改革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是另一回事。現在要放進政治體制改革之中，作為一個重要的大題目。」

鮑彤彙報發展民主的設想時，彭沖說：「一定要有程序。」趙紫陽接著說：「我們和外國談判，也是先談程序。同英國談判香港問題，首先就是

談先討論甚麼後討論甚麼。美國國會開會，就可以用程序把議案擱置起來。我們沒有法制的傳統與習慣，辦甚麼事都是越簡化越好，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因此就沒有約束力，無法遵循。我們現在許多法律還是這樣，無法執行。」

鮑彤彙報說到有關表決和選舉時，趙紫陽說：「過去說這都是形式主義。文革當中，我們很多人都被無緣無故的關起來了，那時可真是無法無天。毛主席還專門批評過選舉，說選舉是形式主義，不要迷信選舉。報紙上還專門寫了這樣的文章。」趙紫陽這時提出了黨內民主的問題，他說：「黨內民主的重點，是解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問題。這方面，辦公室要看看其他國家有甚麼經驗。」

趙紫陽特別強調說：「黨中央要真正依法辦事，按黨章辦事。我們現在往往過份強調核心，變成了政治局領導中央委員會，常委領導政治局、書記處。這就顛倒了一個根本的關係，也就是：常委要置於政治局的監督之下，政治局要置於中央委員會的監督之下。這要立規矩，要形成習慣。現在這種制度，沒有事很好。但是，這種制度很難保證不出事。中國人背後計較，當面客客氣氣的。所以，往往中國政治不可測。」

胡啟立補充說：「中國人是先君子，後小人。如何保證文革不重演？紫陽講的這一條最關鍵。文革時雖然很多老師不同意毛澤東的做法，卻沒有辦法通過某種合法程序召開會議解決問題。今後五年內，如果政治局出現分歧，怎麼解決？」田紀雲說：「最高權力機關是黨中央，怎麼受制約？毛主席還犯那麼大錯誤。」趙紫陽說：「靠認識不行。毛主席晚年都靠不住，誰還能自己約束自己？」

趙紫陽說：「講社會民主，重點是黨內民主；講黨內民主，重點是中央一級。中央的民主健全了，可以影響全黨；黨內民主健全了，可以帶動全國。我們要形成一種風氣，建立制度、程序，要黨中央帶頭，由上而下。」彭沖說：「都要從中央帶頭。」接著，彭沖說起《深圳青年報》的文章「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薄一波說：「這個報紙如果是非黨的，議論我黨誰該上誰該下，不太好。黨內的，這樣講也不行。」

薄一波接著說：「當年西單牆也不能這樣，我看這些人膽子不小。這是不是合乎大家的要求？黨還沒有開代表大會，怎麼知道。民主是有界限的，要服從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現在不是紙上談兵，講民主要問是怎樣的民主？不能恢復到民主牆。黨內實行民主就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慢慢影響到社會上也民主。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是過渡時期。青年化是個大問題，要

一步步來。還要照顧到老同志。建議常委過問一下《深圳青年報》的事情。」

最後，趙紫陽總結這次會議說：「基本上同意彙報的意見。近期改革從哪裏開始？要以解決黨政關係和黨內民主為重點。黨政關係中，主要是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要解決黨與人大的關係、人大與政府的關係。在黨與政府的關係上，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在黨與人大的關係上，要解決人大如何進一步發揮作用的問題。我們這次改革，終究是要解決黨的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防止黨的權力過於集中於少數人、個別人、一個人。以黨代政，就勢必使各種社會組織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

趙紫陽要求在研討中應當明確，「一是基本目標，基本模式，二是過渡措施。目標模式能否選擇恰當，是很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要把目標告訴大家，我國實行的是個甚麼制度，政治體制改革完成的時候是個甚麼樣子，要弄清楚。此後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過渡。否則，目標就是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相當明確，但是如何達到彼岸，路子並不十分清楚。政治體制改革也是這樣。」

趙紫陽說：「所謂過渡，就是首先搞甚麼，先達到哪一步，步子該怎麼走。還有配套的問題，也就是同時還要搞些甚麼。不能某一個方面孤軍深入，要各方面配合，就是配套。還有承受能力的問題，這是個適應程度、適應能力的問題。過渡措施的問題，並不比目標設計簡單，反而更不容易。當然，可以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通過實踐，不斷補充、修正。但是，事先想清楚一些，就可以少出問題。」

趙紫陽談了人大的問題：「第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共產黨要不要執政的問題，而是如何執政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們討論人大如何發揮作用，不是搬西方的議會制。我們不搞三權分立，因為我們的立法機關和最高權力機關是一個東西，所以不能分立。既要發揮人大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又不能三權分立。這樣，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就不能是無限的。政治體制改革中，人大問題不作為一個重點提出來不行。人大的問題不能迴避。」

趙紫陽繼續說：「問題究竟在哪裏？一是人大的作用發揮不夠，二是人大的作用如何發揮。有人認為甚麼都要人大決定；有人認為人大不能干預政府日常政務，只是法律監督。黨和人大、政府和人大的關係問題，要研究並講清楚。還有人大的構成問題也要談。人大要有一些榮譽職位，但不能太多；不能都是安排第二線，也不能全不安排，可以搞個比例。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但外國議會的具體活動方式可以借鑒。」

趙紫陽進一步明確地說：「黨政分開這個題目中包括3個問題：黨和政府，黨和人大，黨和政府，這是最大的題目。黨的作用有中央、地方、基層三個分層。中國省、市一級黨委還不能像國民黨黨部那樣，也不能像現在這樣黨政不分，權力比中央還集中。」鮑彤插話說了廖伯康的意見。趙紫陽說：「有些道理。我想，中央可不可以多管一些單位。我在廣東的時候，想搞八十多個市，當然不能把省搞的七零八落。」

趙紫陽說：「中國的區域劃分，有沒有這個可能：只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設省。多搞一些市，東部發達地區可以主要搞市，由中央直屬，省的建置可以取消。當然，這不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是個行政區劃設置問題。不管如何，多劃，黨政要分開；少劃，黨政也要分開。」趙紫陽又提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問題，關鍵是言論和出版。這要放在社會主義民主專題中研究。」會議結束前，討論了組織專題研究的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胡啟立都提出，要找到一句話概括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每天晚飯後，政改辦不是開討論會，就是三、五個人一起議論。鮑彤問我的看法，我說：「可以用『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經過幾次討論以後，確定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個說法，以與「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適應，並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綱。這個說法後來成為共識，寫到了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中。

根據這次會議的討論，政改辦反覆討論、修改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彙報提綱》。研討小組將這個「彙報提綱」，送給了除趙紫陽之外的政治局其他四位常委。陳雲、李先念劃圈表示已閱，胡耀邦提出要不要斟酌「黨政分開」的說法，鄧小平則批示：「文件基本上是好的。還要搞一些改革的設想、方案，以及從哪裏入手。」至此，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與重點，大體上形成了基本看法。下一步，研討將進入專題研討階段。

這次會議後不久，《深圳青年報》負責編輯的人員受到了處分。這件事顯然和薄一波的嚴厲表態有關。當彭沖提到此事時，胡啟立反應最快，立即說：「這很不好，攪亂人心。」可能和這家報紙是共青團背景，而他是要表明這家報紙的言論，並沒有胡耀邦、胡啟立等共青團系統出身的中央領導人的支持。同時，胡啟立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主管宣傳事務，評論報刊言論是常有的事情。

6-10 政治法律學者的意見：「首要的是黨內民主」

11月21日，政改辦召開了第九次座談會。主要請的是研究政治法律的學者，參加會議的有：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龔祥瑞，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趙寶煦^[512]，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高放，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編輯部主任沈寶祥，《中國法學》雜誌社主編張尚鶯^[513]。鮑彤主持會議。

張尚鶯首先發言說：「改革的出發點要明確，就是發展人民民主。做法上有兩條，一是觀念先行，不改變觀念推不動改革；二是從中央做起，上下一起動，否則誰先動誰吃虧。我考慮『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這句話現在只是一句口號，沒有制度保證。領導人都不懂法律，不知道有行政法，認為法就是打擊犯罪的，辦事要靠政策。只講刑法，是封建主義；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行政法則是民主的產物。」

他說：「行政法就是限制政府的。官員違法了，民眾就可以告，才可能依法辦事。搞行政法，就是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設。首先是黨要改革，要搞個黨規，使黨政分開制度化。具體化了才能執行。黨不改，改革就改不好。現在的實際工作中，黨和政府混在一起，就不可能形成有力的工作系統。政法委的設置就很不適應目前的需要，主要的精力是打擊犯罪，黨的領導不是判案子，而是領導整個法制建設。」

趙寶煦說，現代社會應該信息發達，上下縱橫，「當前的問題是下情不能上達。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好像不知下情。比如談統一問題，說『凡我炎黃子孫皆願統一』並不成立。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英^[514]就說，搞交流可以，搞『統一』就把人嚇跑了。台灣許多人說，我愛國但更愛自由，統一了就沒有自由了，『一國兩制』在台灣並不叫好。台灣60%的人是中產階級，生活不錯，主要希望國民黨改得更民主一點，共產黨別來。」

趙寶煦認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弄清承受能力，主要是幹部的承受能力。比如，黨政分開，主要調查黨的幹部，看他們思想通不通。要分析不同的利益集團，匈牙利分成了12個，這是面對現實。搞廠長負責制，廠長和書記想的就不是一回事，這是因為利益不同。我們能否大體摸清10億人有多少種利益集團？各種利益集團對政治體制改革有甚麼想法？這樣，改革才能對症下藥。

[512] 趙寶煦 (1922-)，浙江紹興人。時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

[513] 張尚鶯 (1925-2006)，四川犍為人。時任《中國法學》雜誌社社長兼主編。

[514] 孫穗英 (1936-)，美籍華人。孫中山的孫女，後任孫中山和平教育基金會主席。

沈寶祥說，在黨校，大家見面先問政治體制改革的精神，「人們都議論這件事，說明這確實是個問題。這反映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很突出。既然大家關心，而民主又是改革的內容，就應該讓大家講話，發表各種意見。有個省委負責人發下去個講話，說中央講了，政治體制改革不准多說，不要多議論。這種氣候是不利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但反映了領導層的心理狀態。」

他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小平講了4條。我看，是8個字：發展民主，提高效率。領導主要從效率著眼，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需要民主。過去是君主，孫中山提出民主。香港報刊就問『是黨主還是民主？』實行黨政分開，就要黨與國家政權分開，包括與權力、行政、審判、檢察等四個機關分開。現在黨不僅包辦了政府的事，也包辦了人大的事。問題在於黨究竟怎麼領導？」

他接著說：「這次提出哪些因素影響長治久安？這個問題提的很好。世界上哪些國家不能長治久安？都是第三世界、不民主國家、專制國家。西方國家比較長治久安。這種情況值得思考。『文革』是怎麼亂起來的？是從政治、從上層亂起來的。從下面亂起來的情況很少，1960年餓死那麼多人都沒有亂起來。大家總是議論怎樣保證『文革』不再重演？關鍵就是領導制度，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

龔祥瑞談了對發展民主的看法。他提出了「一元化領導下的多元政治」的觀點，他說：「看問題，領導有領導的角度，群眾有群眾的角度。領導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領導制度的自我完善；群眾則認為是切實建設民主政治。一元化是在一個國家內建設，在一黨領導下建設；多元政治就是多黨派、多集團、多數人參與的政治。政治體制改革是從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轉化，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化。」

他說：「傳統模式就是一元化的、封閉的、中央集權的，現代模式是多元化的、開放的、分權和自主權的。所謂『分開』，就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教分開。所謂『一元化領導下的多元政治』有三層含義：一是多黨政治，有人說這是胡說八道，其實多元經濟要求多黨；二是多集團，多元經濟必然出現多種社會組織；三是多數人參政，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促使公民意識越來越強，人們就會要求民主、自由、平等。」

他繼續說：「民主是政權的組織形式，自由是一種權利。民主就要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保護少數，少數有可能成為多數。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是個人的人身、言論、行動不受侵犯，在法律範圍內發展。不要民主的法制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要講公民，國家是保障公民權利的。現在講

民主，不能滿足於代議、代表，要參政。民主還要講監督，信訪辦完成不了這個任務，建議在權力機關成立監察委員會。」

高放說：「大學生很關心政治體制改革，我在課堂上講權力合理配置，同學就說是『與虎謀皮』，根本做不到。其實，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弊端，根源在於政治體制。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先取得政權，而後再建立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體制。所以，改革要順利進行，應該從政治體制改革先行。但是，30年來，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成功。如果能以1980年小平的講話為綱，相信可以取得巨大成績。」

接著，他講了黨內民主問題。他說：「政治體制改革首要的是黨內民主。黨內權力高度集中，民主很少，國家的民主有什麼希望？」沈寶祥插話說：「完全同意。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高放繼續說：「黨內建設很多沿襲了地下鬥爭和戰爭年代的做法，不適應現代化建設。自黨的二次大，黨章就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都是最高權力機構，這是戰爭和地下鬥爭的特殊產物。斯大林那麼專權，都不敢這麼寫。」

高放說：「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全黨只能服從它，不能服從中央委員會。黨代會五年開一次，怎麼能起到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應該恢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實行代表大會年會制。當然，更重要的是黨代表應該民主產生，實行一人一票的表決制。廢除終身制是個大進步，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到，自己倡導又不實行，這對小平的威信損害很大。這說明我們的體制有毛病，很危險，影響長治久安。」

高放直言說：「我看中央可以設名譽主席，小平就可以當。現在，羅馬尼亞、朝鮮從『黨天下』發展成『家天下』，這是封建主義。我們的黨章規定，黨的領導人要選舉產生，可實際不是這樣，都是第一把手說了算，『一把手絕對真理，二把手相對真理，三把手服從真理』。現在口口聲聲堅持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很多東西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高放的話引起了與會者的共鳴，大家議論紛紛。

趙寶煦說：「這麼多年不民主的東西更發展了。」張尚鸞說：「從封建主義發展到民主制，分權制衡與不搞終身制是兩個要點。」沈寶祥說：「黨政分開就是對黨的改造，不改造就分不開。」趙寶煦又說：「外國人和我說，你們設想領導人都非常好，而我們設想領導人都是壞蛋，對他們有各種限制。我們的辦法，好人上台不妨礙他，壞人上台就被限制了。你們一有壞人上台，就沒有辦法了。」

高放最後說：「馬克思主義為什麼在青年中缺少威信？關鍵是大家看到的實際與宣傳的理論不是一回事。小平講領導就是服務，學生說『領導

就是別人為他服務』，實際情況不就是這樣嗎？憲法說『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可我們的人民有什麼權力？一個海澱區的人民代表還要黨委提名。實際與理論違背，理論還有什麼說服力？現在，民謠說『清官在戲台，當官靠後台』，『再來文化大革命，保皇派就沒有了！』，還不令人深思嗎？」

11月22日，政改辦召開第十次座談會。主要請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的學者，有副所長劉鐵^{【515】}，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吳仁彰^{【516】}，蘇聯政治研究室主任王器^{【517】}，東歐研究室主任趙乃斌^{【518】}，科研處長高中毅^{【519】}。鮑彤主持會議。

吳仁彰先介紹了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對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提出系統看法，二、改革的方向是發揚民主，發展自治；三、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交叉進行，更重視政治改革；四、政治改革做了甚麼？提倡公開原則，進行機構改革，進行幹部制度改革，實行黨政分工；五、改革阻力很大；六、注重理論但難以解決，像總在批評黨政不分，又總解決不了。王器認為，不能對蘇聯的改革評價過高。

趙乃斌說，東歐國家的政體分三類：第一類是保持蘇聯式體制的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特點是執政黨決定一切，黨政不分，缺乏自由民主；第二類是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但隨著改革發生了變化，如匈牙利、波蘭和保加利亞，實行黨政分工，黨的領導表現在路線制定和監督上，國家機關多一些獨立性，強調民主、自治和法制；第三類實行分權體制，就是南斯拉夫，明確提出黨不居於壟斷地位，自由民主多一些。

高中毅說，蘇東國家都經歷了以黨代政的階段，現在正在克服。對黨的作用，做了如服務、引導、監督、保證等多層次表述。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是多黨制；幹部由委派、選派向考聘發展；擴大權力機關的作用；國家職能社會化，即通過社會團體來管理。劉鐵說，我們的理論準備與幹部準備是比不上蘇聯東歐的。鮑彤說：「我們幹部的老化程度比他們嚴重，知識的程度也比他們低。我們的幹部，退下來還要安排。」

【515】劉鐵，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副所長。

【516】吳仁彰，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

【517】王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蘇聯政治研究室主任。

【518】趙乃斌，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東歐研究室主任。

【519】高中毅，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科研處長。

6-11 「上至當頭的，下至耍猴的」，吃皇糧的都是幹部

11月25日，政改辦召開了第十一次座談會。請的是中央組織部官員，參加會議的有：部長尉建行^[520]，副部長曹志^[521]，副秘書長鄭科揚，研究室主任劉俊林^[522]。鮑彤主持會議。

尉建行請劉俊林先講，他介紹說：早在1979年就開始了幹部制度改革，現在較大的改革有，一、提拔中青年幹部46萬人；二、廢除終身制，離休幹部127萬；三、實行鄉鎮幹部選聘，全國105萬中聘任的有20萬；四、在一些地方試行任期制；五、實行崗位責任制，這在縣、地兩級好辦，往上就不好確定了。次外，還包括幹部管理權限的下放、幹部的交流和對幹部的民主考評。問題是，改革屬於試驗階段，配套措施跟不上。

劉俊林說：「總體上，現行幹部制度缺少生機和活力，統得較多，管得較死，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弊病是體制單一，關係不順，渠道不通，職責不明，缺少法制。」他逐一分析道：「體制單一」是「按管理黨政幹部的辦法管理所有幹部」，目前250萬幹部中，包括演員、武警、教師、醫生和打字員等，「上至當頭的，下至耍猴的」，「吃皇糧」的都是幹部。這種體制，不能按各類人員特點管理，只適應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

他繼續說，「關係不順」主要指「條條塊塊爭權」，如：中央有九家部門在管理科技幹部；人才流動和部門所有制矛盾；管理權與監督權矛盾；幹部與工人一起管理，等等。「渠道不通」主要是上、下、進、出都有問題，特別是「上易下難，進易出難」。「職責不明」指幹部管理權限劃分不明，如組織部門和人事部門、勞動部門和人事部門之間。他說，有的省十一家部門管幹部。「缺少法制」是雖有規定，卻沒有法律效力。

他提出：「幹部制度改革要總體規劃，全面配套，分步實施。第一，改革集中統一管理為分類分級管理。怎麼分類？大體上按兩層分類，第一層分五類：黨的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企業工作人員，事業工作人員，群眾團體工作人員。每一類還可以再分，如企業人員就可以分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等等，每一類人員建立獨立的管理體制。像企業人員就由企業管理部門去管，做到管事與管人相結合。」

「第二，改革統包統分的辦法。近年幹部增加了很多，一是大專畢業生，二是轉業軍人，三是以工代幹的轉幹，進到幹部隊伍就一包到死。」曹志插話說：「最好是搞社會保險，否則越摺越沉，企業、機關都有這個

[520] 尉建行 (1931-)，江西新昌人。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521] 曹志 (1928-)，山東安丘人。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522] 劉俊林，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研究室主任。

問題。」劉俊林接著說：「要考慮建立一種社會調節機制。要賦予單位三個權：聘任權，解聘權，辭退權；也給個人三個權：應聘權，拒聘權，辭職權。很多單位都存在需要的進不了，不需要的塞進去的現象。」

「第三，任用形式要改革。現在主要是委任，這就造成了幹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要改革單一的委任制，實行考任制、聘任制。第四、在幹部識別、選拔、任用中要加強民主監督。現在群眾對幹部的問題沒有發言權，往往幾個人說了算。以後，提拔幹部時，要民主推薦；考核幹部則主要搞民主評議。」曹志說：「改革要擴大人民的權力，讓人們監督幹部。還有是怎麼使人才脫穎而出？這要從錄用開始改革。」

尉建行接著說：改革幹部制度的考慮，主要是「怎樣使人才輩出，怎樣使人盡其才。」他提出：「要適應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發展，怎麼改革幹部制度？這涉及幹部標準、管理體制、管理方法、幹部使用等多方面的改革。過去，中組部管 1.3 萬名幹部，現在管 2,700 人，由管兩級到管一級，是一個很大的改革。對於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不同時期的幹部，還要有不同的管理體制。」

他說：「要解決怎麼發揚黨內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現在黨風問題反映很多，一個原因就是群眾在幹部問題上發言權太少，幹部只對上負責，就有許多不正之風。民主評議與民意監督不是萬能的，但群眾大都反對的幹部是不行的。要建立群眾監督、交流、迴避方面的制度。怎麼鼓勵幹部上進？現在幹部中也有平均主義的問題，幹好幹壞沒有區別。總之，不能吃大鍋飯，要體現與貫徹競爭的原則。」

曹志認為：「幹部制度改革要理一下思路：怎麼適應商品經濟？怎麼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合？怎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這麼多年了，蘇聯模式、封建主義、平均主義的影響還沒有消除。改革先要弄清指導思想。考慮好先改甚麼？後改甚麼？」為此，他說，第一，要從體制上解決，不能按現行模式管，不能都叫幹部；第二，擴大黨內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第三，怎麼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必須改革考核辦法；第四，進和出的問題，口子要把好。

鮑彤首先轉達了研討小組關於幹部制度改革的意見，他說：「向研討小組彙報時，領導同志在幹部問題上有 4 個意思。一是與黨政分開相適應，幹部管理怎麼搞？也要分開。二是一旦分開，組織部工作有個轉變的問題，由微觀轉向宏觀。三是覺得『幹部』概念太籠統，要分解各類幹部，要建立各自的管理制度。其中，政府幹部，是不是要建立有中國特色

的文官制度？四是幹部後備隊伍問題上，現在的辦法有毛病，要考慮替代辦法。」

然後，他說：「我看，幹部管理要適應黨政分開的體制。幹部管理不分开，黨政也分不開，這是一篇大文章。」關於選任和委任的問題，他說：「國外似乎有兩種，一種是政治任命，一種是根據文官法任命。前者是當選的政黨首腦憑需要任命；後者是文官制度，是常任制，可以保證穩定和效率，文官不犯法、不瀆職就不能罷黜，不像我們『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官制度就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國家機器。有中國特色，就是共產黨的領導。這對考慮幹部管理範圍可能有啟發。組織部以後就專管政務官。」

鮑彤還說：「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單靠幹部制度怕是不行。」尉建行說：「要有社會條件。」鮑彤繼續說：「基本條件，如流動、公開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黨內民主與否，言路暢通與否，都是有關係的。『合則留不合則去』，就沒有那麼多問題了。民主監督問題是個大問題，不過要考慮適用的範圍與落實的方式。德、能、勤、績，主要看績。現在考績是個薄弱環節，管人與治事相結合，考績才有可能。」

6-12 高揚說：我們的「民主很差，專政也有些歪！」

11月28日，政改辦召開第十二次座談會。請前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高揚和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懷安^[523]談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鮑彤和周傑介紹了研討的情況。

高揚說：「我們現在叫人民民主專政，其實民主很差，專政也有些歪！說是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實際上沒當起來，又像主人又不像主人，『丫環拿鑰匙，當家不作主』。民主專政變成了共產黨專政，又變成了少數人專政。我們對幹部的管法也和封建制度差不多。要研究一下怎麼調整黨在國家中的地位，研究一下黨怎麼領導。現在這套搞法不行，不是領導，而是管理，也管不好。蓋個樓也得書記批錢，像個計委主任。」

高揚強調說：「一定要把黨委搞得精幹些。黨要搞調查研究，決定大政方針，實現領導工作現代化。這就要黨政分開，精簡會議，否則根本就下不去。像秦皇島的市長，每年夏天陪上面的人要用4個月。五級^[524]以上的幹部就是脫韁之馬，說下來就下來，誰也管不著。沒有制約，權力絕

[523] 王懷安 (1915-)，四川自貢人。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524] 職務與級別的對應關係是：國務院總理：一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二至三級；部級正職，省級正職：三至四級；部級副職，省級副職：四至五級；司級正職，廳級正職，巡視員：五至七級。

對，這就要出問題。封建皇權沒有制約才出問題。我們的黨是沒人管得了的。三權分立有它的道理，不容易垮。」

王懷安說：「現行體制的弊端，主要是權力過分集中。民主專政是專政多餘，民主缺少；民主集中是集中過份，民主缺少。」鮑彤插話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說明這種體制糟糕，一句話就造成動盪。」王懷安接著說：「民主是個關鍵。社會發展總是由少數人掌權過渡到多數人掌權。突破口是黨政分開。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黨員模範作用的領導、政策方針的領導。黨要想領導，是憑水平，不是憑權力。」

高揚又說：「從『五四』提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至今還是個問題。」鮑彤說：「賽先生成了臭老九，德先生是右派。」高揚接著說：「想一想，孫中山說的『訓政』，還是有一定的道理，我們不少幹部都不懂得『民權初步』。要啟蒙，要從教育幹部作起。我看，實行縣級選舉，不是不可能的。現在的選舉，是一種偽選舉，只是作作樣子，老百姓不但沒有興趣，還很反感。」

12月5日到6日，政改辦召開了第十三次座談會。請前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周惠^[525]、前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傑^[526]、前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安平生^[527]、前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528]談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周傑和鮑彤分別主持了會議。

安平生首先發言，他說：「政治體制改革，有一條不能動搖，就是黨的領導。說黨只管黨務，我不贊成；否定黨的一元化領導，我不贊成。黨的民主化與國家民主化要完善，這方面確有缺點和弊端。文革發生是制度上的問題，不是各省、各部而是中央。制度的完善，關鍵是中央，是政治局、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這裏出了問題不得了。中央核心機關沒有民主監督不行，要提高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地位，使之能監督政治局和常委。」

他說：「再一條是，要加大人大常委會的權力。同時，民主需要擴大。」他提出：「現在有沒有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如果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不好，我們幹了一輩子，豈不是白幹了？我們搞了三十多年社會主義，似乎又確實有這個問題。」

【525】周惠（1918-2004），江蘇灌南人。前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

【526】劉傑（1914-），河北威縣人。前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527】安平生（1917-1999），陝西周至人。前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528】池必卿（1917-2007），山西平定人。前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

劉傑談了幾點看法：「首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著眼點，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說我們的制度是『政治先進，經濟落後』，這個看法不對，我們過去錯誤的根本是集權制。現在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很及時。改革的基本內容是甚麼？我的看法是：第一，執政黨應當怎麼工作？黨章提出，黨要保證經濟、文化、人民團體獨立工作，怎麼作到？經濟的多元化必定會反映到政治上，要承認多元的政治利益。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應該是聯盟、合作，共同管理國家，可是現在民主黨派參加國家管理，比解放初份量輕得多了。」

「第二，最大的問題是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要解決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第三、有了經濟民主，才有政治上真正的民主。現在沒有言論自由，大家都準備兩套話，公開場合一套，私下一套。大問題還不敢讓群眾議論，政治體制改革就應該放手讓大家議一議。政務要公開，很多問題為甚麼不公開？第四、要制定新聞法。新聞不立法怎麼行？報紙上錯了，連更正都不作，怎麼能如實反映情況？」

「第五，怎麼選拔幹部？第三梯隊的辦法不行。現在人事權過份集中，選拔幹部還是手工業方式，伯樂式的辦法已經很落後了。」周惠插話說：「還不如相面的。」劉傑繼續說：「有人提『黨政分工』，應該是『黨政分開』。黨就是黨，政就是政。沒有制度改革，作風也改不好。包青天式的處理案件，伯樂式的發現幹部，搞聯繫點、接待日，都不是科學的方法。還有，現在越是大項目越出錯，而大項目往往就是最高負責同志決定的。」

劉傑最後提的意見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現在講不登報、不議論，實際上大家都在議論，關注的程度超過對經濟改革。群眾對改革的想法與領導有相當的距離。群眾對反反覆覆有意見，一個老工人就說，現在這一套不行，是『爺爺借債，孫子還錢』。搞官本位，一切都按官套，知識分子很傷心。能不能用好知識分子，是現代化成功的關鍵。可現在不當官不行，知識分子是『光著屁股坐花轎』。」

周惠說自己剛從外地回來，談一點觀感。他講了三件事：「一是，我在南嶽看到燒香的很多，特別是婦女，燒了香，磕了頭，哭一陣子，高興地走了。問了幾個人，都是家裏、鄰里的矛盾，沒辦法解決。二是，下山看見賣香蕉的，一個三分錢，一串一毛錢，我說買四個，他就不知道收多少錢了。三是，山下一個村子，村長攤給每戶1萬元，湊了100多萬，說是辦企業，錢折騰光了，什麼事也沒辦成，老百姓也沒辦法。」

周惠說：「這說明我們中國還很落後，這就是我們的國情。考慮政治體制改革，要從我們的基本國情出發，不能操之過急。文革是『社會主義好，大家來吃草』，三中全會以來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總體上還很落後。現在幹部是怕上不怕下，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裏。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發展民主，權力有了制約就是民主。現在很多地方，是集黨政企領導人於一身，官僚加老闆，這一類問題應當盡快解決。」

池必卿贊成黨政分開。他說，分管書記應該取消，對口部門也要取消，黨委機關要精簡。政府實行首長負責制，不能再搞黨組。人大不能成為養老院，人太多無法討論問題。他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一個是幹部制度，一個是精簡機構。他還說，農民和農村的問題太多，可是沒人表達，也沒人幫他們解決，是不是應該搞農會？現在，工人、農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維護。

6-13 胡啟立說「政治體制改革，要從中國實際出發」

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和重點已經基本確定。政改辦開始設計如何專題分工，並著手組建專題研討小組。鮑彤召集周傑、賀光輝和我多次討論怎麼組建，擬出初步意向後，經研討小組批准，自11月底到12月上旬，陸續成立了7個專題研討小組。根據我的建議，又在中央黨校成立了一套平行作業的小組，以便集思廣益、相互參照。

這些專題小組和負責人分別是：黨政分開專題組：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529]、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530]、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漢斌^[531]負責，溫家寶牽頭；黨內民主與黨的組織專題組，由周傑負責；權力下放與機構改革專題組，由賀光輝負責；幹部和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組，主要由中組部負責，曹志牽頭；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組，由人大、政協、統戰部等各部門領導人組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有林^[532]、中央統戰部部長閔明復^[533]負責；社會主義法制專題組，中央政法

[529] 溫家寶（1942-），天津人。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

[530] 陳俊生（1927-2002），黑龍江樺南人，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531] 王漢斌（1925-），福建惠安人。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532] 有林（1921-），黑龍江呼蘭人。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533] 閔明復（1931-），遼寧海城人。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六四」後被免職。

委副秘書長余孟孝^[534]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原則專題組，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負責。

中央黨校平行成立的7個專題小組，由副校長陳維仁、副秘書長史維國、科研辦公室主任杜光^[535]負責。專題小組的負責人分別是：「黨政分開」史維國、聶高民，「黨內民主」萬福義，「機構改革」王哲民，「幹部人事」蔡長水，「社會主義民主」沈寶祥、董新民，「社會主義法制」李用兵，「基本原則」崔佩亭、藍蔚青。

這些小組與政改辦一起，按照已經確定的思路和內容，承擔有關的研討任務。他們直接向中央研討小組負責，由政改辦負責聯絡、協調與綜合。可惜的是，當時沒有把「權力下放」單獨成立一個組，以致後來「機構改革」任務很重，「權力下放」這麼一個重要的問題就缺乏著力的研究。

12月10日，胡啟立召集各專題小組負責人會議，佈置了下一階段的研討工作。他先簡要介紹說，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問題，小平同志要求用一年時間拿出改革方案，書記處決定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又組織了辦公室，以弄清改革的涵義、目標和範圍。研討小組聽了辦公室的彙報，進行了討論，向常委作了報告。常委都看了，小平表示滿意。在這個基礎上，準備分7個專題深化研究。

在鮑彤宣讀了趙紫陽9月給政治局常委的信和這次專題研究小組的分工名單後，胡啟立說：「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任務艱巨。鮑彤他們已經花了很大的心血，中央領導同志也反覆研究。《彙報提綱》比較精煉，理出了頭緒，前進了一步。我補充幾個意見。」

「第一，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是一項極為嚴肅的政治任務。這是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直接領導下，由紫陽親自抓的課題，涉及國家長治久安。政治體制改革比經濟體制改革更深刻、更複雜，觸動面絕不比經濟改革小，不可掉以輕心。正如小平所說：一要堅決，二要慎重。所有參加研討工作的同志，要盡心竭力做好這項光榮而又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一定不能透露內部研究的東西。」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定要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原則。這次的方案只能是一個環節，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離開實際，再好的方案也難於實行。要研究西方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但更重要的瞭解黨情、國情、民情，注意聽取各階層民眾、特別是在第一線工作的同

[534] 余孟孝 (1931-)，江蘇蘇州人。時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

[535] 杜光 (1928-)，浙江溫嶺人。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主任。

志的意見和要求。如果大家都想到一起了，政治體制改革就有了社會支持的力量。」

「第三，要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理順各方面的關係。要長治久安，就要民主化，防止『文革』重演；要加快現代化建設，就要高效率，要求權力相對集中。七嘴八舌，議而不決，是沒有效率的。亞洲四小龍都不是民主的，印度學了美國的民主卻搞得很糟糕。玻利維亞建國160年，發生了190多次政變；600萬人，六、七十個政黨，亂成一團。中國要是也這樣，就和『文革』差不多了。」

胡啟立說：「我們出的題目是魚與熊掌二者兼得，既要高度民主，又要高效率，把兩者統一起來。小平指出：黨組織不是政府，我們不能以黨治國；要取消黨的基層組織的一切特權，否則黨就會成為群眾的對立面。『文革』的悲劇，問題是出在上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了問題。葉帥說『文革』時，他和總理都見不到毛主席。在中國，沒有黨內民主，人民民主是不可能的。要長治久安，就要解決黨內民主問題，要制度化。」

「高效率需要適當集中。黨政分開，黨管好黨，政府實行首長負責制，才會有高效率。應該對中央、地方、基層三個不同層次提出不同的要求。黨政分開應該是方針政策與管理執行的分工。在基層，企業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廠長負責制；鄉鎮政權以下的黨組織起監督保證作用。難度比較大的是省、市、縣三級黨政不分情況嚴重，改起來難度也大。我們的省很大，省裏必須根據中央的精神，制定重大的方針政策，黨政怎麼分開，需要研究。」

「第四，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實現長遠目標，恐怕要幾代人的努力。不是我們想幹甚麼就能幹甚麼，有了權就可以下命令解決問題。民主政治受經濟、文化因素的制約，政治不可能超前發展。孫中山就說有一個訓政時期，小平對中曾根說：如果說選舉好，我們再過二、三十年也許可以，但現在不行。我國十億人，文盲半文盲有2.3億，有些山區還是『四不通』（指「不通路，不通車，不通郵，不通電」），有些地方還以物易物，母系社會，拿鈔票糊牆。」

胡啟立透露說：「昨天，科技大學四千學生上街包圍了省、市政府，武漢也有一、兩千人上街遊行，要民主、自由、人權。熱情可嘉，思想不清，方法錯誤。他們本來應該帶鐵鍬來參加建設，卻帶著炸藥包來了！我們的大學生是社會的精英分子，連怎麼搞民主都鬧不清楚，怎麼能搞民主？搞不成，還給搞亂了。政治體制改革要精心設計，要分主次先後，要有分步實施的方案。」

「第五，公開宣傳要謹慎。要少公開宣傳；非講不可，以小平的講話為準。政治體制改革是當前的熱點，各方面的人都發表議論，這是好事。我們也能從這些議論中得益。有些議論是合理的，但短期做不到，如普選；有些則不能採納，如取消一黨執政，搞三權分立。不要把胃口吊得太高，否則會影響信心和積極性，特別是在民主、自由問題上，這是長期的事情。如果聽任錯誤觀點流傳，對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和出台很不利。」

胡啟立說：「大學生和工人想的不一樣，知識分子和農民想的也不同。過去對資本主義說得一無是處，不好；現在說得一片光明，也不對。紐約警察局長莫虎就認為北京的犯罪比紐約少得多，他不認為紐約比北京好。我們一定要注意：大鳴大放往往會帶來大的收縮，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這樣就不會有安定團結，就會右一下、左一下，扭來扭去。這麼下去，對國家沒有好處，對每個人也都不會有好處。」

胡啟立最後說：「各個專題小組可以根據不同情況安排進度。對內，要敞開思想，甚麼話都可以說，百無禁忌。《彙報提綱》也不是定論，只是供大家研討參考。最後，形成一個甚麼樣的東西，這個問題很重要。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要成為十三大報告的一部分。我們研討的意見形成文件，要在明年五月十二屆七中全會前拿出來，讓各地同志有個瞭解，可以發表議論，也便於我們修改。」

會後，大家對學潮的不斷發生議論紛紛，很擔心學潮弄得政治體制改革流產。我抽空拜訪了唐克和習仲勳，兩位前輩的說法更讓人感到形勢不容樂觀。聽他們說，陳雲、李先念、王震、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等一直對胡耀邦不滿，總想找機會搞掉他；雖然鄧小平說過「天塌下來有胡趙頂著」的話，但對胡耀邦不斷倡導「自由」、「民主」很不以為然；特別是胡耀邦講了「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下來」的話以後，更引起了鄧小平的不滿。

習仲勳語重心長地和我說：「小陳啊，權力這個東西腐蝕人呵，甚麼事情都是說著容易做起來難。耀邦坦蕩地說自己退，也同意小平退，搞不好還會給他惹麻煩。」我說：「耀邦叔叔也太率真了，這是犯大忌的。」習仲勳正色地說：「這是兩條路：我們不能總靠人治，要靠民主和法制！我贊成耀邦的意見。」在回政改辦的路上，我心想：共產黨的政治鬥爭真是無情，胡耀邦為改革做出了那麼大的貢獻，難道真要出問題了嗎？

6-14 何東昌認為：學潮是「煽動資產階級自由化」

據反映，11月以來，有30多所大專院校發生了學潮，原因是：2/3是對學校的伙食不滿、對治安不滿；另外1/3則是將這些問題與民主、自由聯繫起來。12月8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書記處作了個估計：一、當前政治經濟形勢是好的；二、出現了一些問題，學校中有管理不善的問題、也有缺少民主生活的問題，要改革、要改善，也不必大驚小怪；三、要善於引導，學會引導。既不要壓，也不要放任自流。

北京團市委為政改辦組織了一次大學生座談會。北師大研究生會主席黃卓越說，鬧學潮大多是生活原因，少數是政治原因，不能壓下去。對政治體制改革，「大家認為中央有分歧，到一定時候又會轉向。」北大研究生會主席張來武說，「政改熱似乎要出來，但出不來；談多了，就更出不來了。學生鬧事，有人認為太鬆了，要緊一緊，那倒是不鬧了，但總有一天會大鬧。民主是一個歷史過程，要一步一步發展。」

北航學生會主席於軍說，「大學生民主意識強，民主的素質卻很差。」人大研究生會主席尹運公說，「社會要有個出氣孔，不滿、牢騷可以發出去。這次學潮表面上是食堂等問題，實際是對改革緩慢、對不正之風不滿。現在的危險之處，在於改革的成敗繫於幾個人身上。」清華學生會主席潘福強說，「同學們對政治體制改革，七、八月間熱了一陣子，後來就冷了下來，因為不知怎麼改，無所適從。」

鮑彤問：「大學生最關心甚麼？」黃卓越說：「自我。對自己事業、生活的關心，超過對社會的關心。」尹運公說：「成才心理很重，希望得到社會承認。77、78級之後，享樂主義抬頭了。讓研究生走向社會實踐是個好辦法。」鮑彤又問：「大學裏，黨的專職幹部可以減少到甚麼程度？」張來武說：「只留一個，或者一個不留。在基層，黨的幹部最好是兼職的。最要緊的是黨委轉變職能。」

12月24日，中央機關黨委開會，通報「學生鬧事」的情況。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536]說：10月下旬，各地出現了學生鬧事，開始是因為伙食和治安。11月下旬，有人提出要爭民主、自由、人權，山東大學提出要搞「第二次五四運動」，科技大學因為選舉而集會、上街，武漢和上海也貼大字報反官僚、反專制，要求改革選舉制度、改革新聞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昆明、廣州上了街，杭州、南京也不穩定。

[536] 何東昌（1923-），浙江諸暨人。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一貫以極左著稱。

2 李鵬（1928-），四川成都人。時任國家教委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何東昌說，學生鬧事的特點，一是藉民主自由和反官僚專製作文章，二是出現了串聯，三是出現了違反憲法的口號，如「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華東五省自治」、「民主民權民治」、「國共合作」，還有「把馬克思主義趕出中國」、「敦促鄧小平退休」。社會上一些人，因為物價問題而對鬧事抱同情態度，非法組織開始活躍。他認為：「這是少數人利用學生關心政治改革，而煽動資產階級自由化。」

何東昌說，出現上述情況因為：思想界一些人發表了不少不負責的言論；國外如蘇聯、南韓民主化的影響；學生缺乏社會實踐，自負的獨生子女有表現慾；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同時，選舉辦法有問題；招生過多，後勤跟不上。他強調：「學生鬧事的後台，有三個東西：西方輿論、港台輿論和我們內部搞自由化的人。」他說：「有一個要不要改革的問題，還有一個怎麼改革的問題。在改革中，有人要搞西方模式，干擾很大。」

何東昌還說：「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可以把民主氣氛搞得更好一些。但是，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搞大民主，宣傳報道要十分慎重；黨員發表違反黨章的言論，要勸其退黨；公民不贊成憲法，可以讓他出國。國外輿論說我們表現了意外的容忍，是改革派在利用這種壓力，後來又失控了。」他最後說：「處理要後發制人。對有反動言行的，要取得證據，適當時候依法處理。」

胡啟立說，書記處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現在沒有動亂的基礎，不會發生大的動亂。鬧事的，只是少數搞自由化的人。」第二，「不能掉以輕心，要慎重對待。現在，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有些人用民主煽動自由化。」最後，國家教委主任李鵬²說：「重點是北京。北京鬧不起來，全國就鬧不起來。要爭取大多數，孤立與暴露壞人。今後還會有這樣的事情，要積累經驗來做這場鬥爭。」

在中央機關黨委會議，表達了對學潮相對強硬的態度之後，政改辦由鮑彤主持，12月26日晚上，召開了全體會議。會議傳達了中央關於學潮的指示，並通報了各地記者反映學潮的情況。大家暢所欲言，會議中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一直討論到第二天凌晨。

黃海說，「不能過分強調個別壞人的作用，不能否定學潮提出的有價值的問題。」孫方明說，「不能把學潮簡單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吳國光說，「學生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借鑒與思考，記者的反映誇大了不能為政府接受的口號。」周大力說，「學生提的問題，觸及了當前弊病。」賀光輝提出疑問：「中央領導的判斷難道不如我們？」於霰夫說，「我贊成光輝的看法。」鮑彤說：「學生要求改革的熱情是可貴的。」

嚴家其說：「對學潮，光不贊成不行；政治改革就會使今後少發生這類事。社會不公，政府若聽之任之，就會發生動亂。」張占斌說，「共產黨是搞學生運動起家的，不能怕學生運動。要讓學生對社會有更多瞭解。」顧雲昌說，「要考慮學潮對政治改革的啟示。」陳福今說，「鬧事是發揚民主的潮流，但要疏導。」李鐵林說，「從中要看到改革的必要和迫切。」遲福林說，「鬧事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是領導與群眾認識不一致。」

高山說，「這對政治改革是挑戰，也是練兵。」吳偉說，「要提高社會對改革的承受能力。」我說：「從體改所社會調查系統的調查看，青年學生大多是希望改革搞得快一點、好一點，但對國情瞭解不夠。青年人總是充滿熱情、充滿理想，引導得好會成為改革的動力。當然，他們有急於求成的想法，有偏激的想法，也不奇怪。我們都是從青年走過來的，當我們看不慣青年人的行為時就老化了。」

大家發言之後，鮑彤說：「對學生事件要做冷靜的、符合實際的分析。改革是減少這種震盪的根本條件。青年學生不是異己分子，要保護他們的民主意識。學生也會懂得搞運動無助於民主政治建設。問題是我們黨的基層組織相當脫離群眾，不能站到群眾的對立面。新聞界還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並不封鎖消息。各種利益集團的制約，要在輿論中表現出來。要有根本性的引導，比如說清楚我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一篇大文章。」

6-15 政改辦討論「黨政分開」和「黨內民主」

12月16日，政改辦總結了「黨政分開」的研討。大家討論以後，鮑彤就這個問題談了幾點看法。他說：「第一，小平關心政治改革，是能做點甚麼事情，哪些事可以先做。我認為，已經提出的都可以做，如：不設分管書記、常委，好處是避免政府分割；不設對口部，好處是減少層次；不設黨組，好處是各部直接向行政首長負責；有些部門，像宣傳部、組織部也可以改；黨的紀委與法院、政府監察分開，也可以做到；黨與行政分開，特別是企業，黨的基層組織不設專職機構。這六條，中央、地方、基層都可以做。」

「第二，為甚麼這麼做？最大的好處：一是使黨非行政化、非權力化，避免黨的官僚化，減少黨糾纏於具體事務，集中力量做好黨的工作。二是有利於形成政權的工作系統，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黨的權力化會破壞黨的威信，是使黨腐敗的可怕疾病，不從制度上解決不行。還有的好處是，

黨政分開可以使黨處在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上，暢通人民參與的渠道，對提高人民的積極性大有好處。」

「第三，前面提的事情能不能做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的工作內容、方法都會有變化，政府也是。這些變化如果在承受能力之內，就可以辦。搞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黨本身一致，中央一致。常委既然已經同意從中央開始，就可以動手先改中央的財經小組、外事小組、政法委。下面，工廠搞廠長負責制。兩頭抓緊，其他可以分步實行，時間可以拉長。上下一變，中間不變也得變。十三大前後要有一個變化。」

「第四，更深刻的是觀念的變化。要研究一個根本觀念，即『黨的領導』。這在許多同志思想中是不清楚的。領導地位、領導作用、領導權力是不同的，現在要強調領導作用，淡化領導地位與領導權力。人大與政府的權力是經憲法規定的，黨不能行使。權力問題要從國家體制考慮，權力來自人民而不是來自黨。小平同志多次講黨不應有甚麼特權，淡化權力這個概念，有利於加強黨和人民的關係。」

「第五，我們有個歷史情況，國家是黨的兒子。《聯邦黨人文集》講美國人是革命之子。我們國家也是革命的產物。沒有政府的時候，黨一切都管；有了政府，黨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管戰略方針、指導原則，施政方針和政策給政府管。黨不是萬能的，黨員是人，黨組織也是人的組織，不是神。黨運用組織措施要極其慎重。應該支持人大、政府、人民團體、企業行使其各自的權力。」

「最後，有個很大的體制問題還想不清楚。省裏書記、省長一身兼並不意味著黨政合一，問題在於黨的機關不要干涉政府的工作。最大的體制問題是中央一級的人事安排，關鍵是總書記是不是兼職。這個問題迴避不了，要認真討論，分析利弊，有個說法。」

接著，政改辦討論了「黨內民主」問題。陳曉魯發言說：「目前，黨內民主意識不夠，制度也不完善。黨內民主的目標，就是實現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與制度化。內容與原則是：黨員人人平等，少數服從多數，黨的活動公開，實行集體領導，進行民主選舉，實行自由討論與自由批評，加強民主監督，落實黨員權利。」鮑彤插話說：「現在黨內生活浸透了等級制，常委都要排名次。」

黃海認為：「黨的全委會應該是權力機構，常委應該減少；書記碰頭會是一個多加的層次，應當取消；黨的委員會不應該只包括黨務幹部。」他還談了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基層支部生活的改革，黨內監督的問題，紀委的問題，黨報黨刊的自由度問題。在反覆討論的基礎上，由綜合

組吳國光、孫方明、吳偉起草了關於黨內民主向中央研討小組的彙報提綱，提綱著重談了研討中的六個難點：

第一，關於黨的代表大會，有四個問題：代表常任制，會議年會制，代表團制，代表大會與同級委員會的權力關係；第二，關於代表和委員會的產生辦法；第三，關於地方黨組織的領導體制，有五個問題：委員會的組成，不設常委會和書記碰頭會，機構與經費，幹部管理，中央的相應變動；第四，關於政府與人大主要負責人的產生辦法；第五，關於黨的紀律檢查和監督；第六，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包括：代表人數，代表選舉，代表團，專門委員會，黨團問題，委員長的產生。

鮑彤說：「弄不清楚的問題要彙報。現在，既要搞黨政分開，就涉及黨的組織形式；既要講黨內民主，就有一個選舉的問題。如，省、市、縣可不可以不設常委，全會人數是否減少，這關乎組織形式。黨內民主，實行民主選舉是首要的。組織形式不解決，黨政分不開；選舉問題不解決，黨內無民主。」

我說：「我贊成鮑形的看法。從黨政分開、黨內民主入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可以從改變黨的組織制度入手解決黨政不分問題，因為原來的組織制度是黨政不分的保證。黨內民主的關鍵，是解決民主程序問題。要建立一套民主程序，包括選舉、表決和任用三種制度。組織制度與民主程序的建立就是入手處。」賀光輝重複我的話說：「噢，現行組織制度保證黨政不分，不解決分不開。」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邀請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楊小凱回國講學考察。小凱在與體改所、經濟學會交流以後，提出拜訪鮑彤。我陪小凱在中南海總理辦公室與鮑彤交談了一上午。事後，鮑彤稱讚小凱「有頭腦，有見地，是個難得的人才！」小凱則向我和維凌感慨地說：「想不到趙紫陽身邊竟有這麼聰明、這麼明白的助手。」他問我：「這次政治改革前景如何？能不能使反對派合法化？」我說：「絕對不可能。你想一口吃個胖子啊！」

小凱說：「老陳，你要知道，一天不能使反對派合法化，也就無法形成制衡的力量，政治迫害就難以避免。」我說：「我們又回到『應該』和『可能』的問題上了。你也太異想天開了。從中國的現實看，很多基本問題還都難以解決，但總會有所進步。路要一步步走嘛。」小凱回湖南老家探親還沒幾天，全國就開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也許小凱想為改革力量說些好話，他沒有遵守和鮑彤談話「不要公開」的約定，在香港與大赦國際透露說：「鮑彤告訴我，沒有『四項原則』老同志不答應，沒有『改革開放』老百姓不答應。『四項原則』是共產黨一

直堅持的，『改革開放』是三中全會以後才有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這一部份的份量會越來越重。」誰知港澳工委竟將小凱這個談話上報中央，以致差點讓陳雲把鮑彤打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

6-16 鄧小平發動政變，胡耀邦被迫「辭職」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家中會見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與何東昌。鄧小平嚴厲批評胡耀邦：「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他強調：「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要使用。不要怕流血！如果不採取強硬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開，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鄧小平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我經常批評美國的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10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會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所以，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當然，鄧小平的話不僅是針對胡耀邦的，還有更深的意涵。

胡耀邦對鄧小平的談話深思再三，覺得與鄧小平的分歧之大，是從來沒有想到的：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算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對學潮、對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和方針與自己非常不同。要自己「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甚至動用專政手段去處置學潮、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自己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做的。想到學潮將被鎮壓、一大批知識分子和好幹部將受到牽連，他徹夜難眠。

胡耀邦決心顧全大局，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辭職下台，以平息局面。1987年1月1日，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辭職信。聽說，就在當天夜裏，鄧小平在家裏召集了陳雲、彭真^[537]、楊尚昆^[538]、薄一波、王震，幾個老人一起策劃了宮廷政變。鄧小平決定把胡耀邦撤下來，他指定由趙紫陽擔任代總書記並牽頭，與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組成一個五人小組，主持中央工作。

[537] 彭真 (1902-1997)，山東東平人。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538] 楊尚昆 (1907-1998)，四川潼南人。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軍委秘書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在鄧小平談話前，趙紫陽憑他多年的政治經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給胡耀邦打電話說：「我勸你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胡耀邦說：「我並沒有犯甚麼錯誤，你讓我檢討甚麼？我辭職就是了。」趙紫陽很著急地說：「你常說我們黨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再拖就晚了，你盡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吧。」第二天，胡耀邦求見了鄧小平。

鄧小平說：「我們之間沒有必要再糾纏了，我打算開一次中央生活會，有甚麼問題擺到桌面上談，溝通一下思想。」1月6日，將鄧小平1986年12月30日的談話以中共中央1987年1號文件發出。1月10日，由薄一波出面主持，召開了一個中央生活會。會議一開始，薄一波就要胡耀邦作深刻檢討。根據老人的意圖，胡耀邦為了顧全大局，作了違心的檢查。老人們則一個個對胡耀邦發難。

彭真莫須有地攻擊胡耀邦，「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方勵之^[539]、劉賓雁、王若望^[540]打得火熱」。楊尚昆說，「如果你想亡黨亡國，就去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王震說，「你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就不必待在這裏了。」薄一波說，「你整天到處亂跑，全國兩千多個縣都快跑遍了，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譁眾取寵。」宋任窮^[541]說，「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你對小平同志的態度。」

接連幾天，「生活會」繼續批評胡耀邦。特別是鄧力群長達5個小時的系統批判，讓人感到胡耀邦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後台，大有將其批倒批臭之勢。薄一波、彭真、王震都要求胡耀邦辭職。只有習仲勳仗義直言，他說：「天啊！你們這不是重演《逼宮》嗎？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背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黨和國家埋下禍根。」胡耀邦說：「我考慮好了，不讓我幹，我就辭職。」

1月17日晚7時，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出了震撼性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對於胡耀邦下台的官方解釋，是中共中央1987年的3號文件。這個文件向黨內通報了中央政治局1月16日擴大會議的內容。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薄一波彙報了「生活會」的情況。

[539] 方勵之（1936-），浙江杭州人。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六四」後被迫離開中國。

[540] 王若望（1918-2001），江蘇武進人。中國著名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六四」後入獄，被迫離開中國。

[541] 宋任窮（1909-2005），湖南瀏陽人。曾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3號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生活會」對胡耀邦的批評，包括：第一，關於統一思想。他違背中央整黨決定指出的，「統一思想」是實現全黨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糾正違反四項原則的左和右的傾向，卻說是「一是樹信心，二是改革」，後來又說「整黨促進經濟，經濟檢驗整黨」，不提四項原則。第二，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者是一回事，他一直縱容。第三，在經濟工作上，他強調高速度、刺激消費。第四，在政法工作中，他宣傳人治。第五，在外交工作中，他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第六，在幹部問題上，他喜歡用同意自己意見的人。第七，在左和右的問題上，他只注意反左，不注意防右。第八，他不遵守黨的決定，擅自發表言論。等等。

薄一波最後發表評論說：「聯想到歷史上同類的問題，應該在鄧、陳、李健在的時候，建立民主集中制，以制約黨內的職權最高者。紫陽 1984 年就給小平寫過信，提出：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制度上著力。」其實，這封信是開人大時黑龍江省委書記陳俊生轉給趙紫陽一份材料，說在經濟改革中經常會遇到政治制度的障礙。趙紫陽把這份材料轉給了鄧小平，並附了一封信，與所謂「胡耀邦問題」毫無關係。

胡耀邦的被迫辭職，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黨內元老，發動的一次非程序性政變。鄧小平以打天下的「太上皇」自居，一批元老凌駕於黨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之上，就逼迫胡耀邦辭去了總書記。那麼，他們為甚麼要逼迫胡耀邦辭職呢？這些老人遠遠地脫離了時代，習慣於階級鬥爭的教條思惟，充滿了「打天下坐天下」的皇權意識，而「馬上治天下」靠鎮壓維持穩定是他們最熟悉的手段。胡耀邦多年來倡導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和民主、自由思想，被他們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就不奇怪了。

由於制度的局限，胡耀邦擔任總書記這個最高職務時，最高決策權卻掌控在鄧小平、陳雲手中，他們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其他元老大多是維護既得利益的守舊派，左右著中央的決策。真正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意識到現行制度弊端，並決心從根本上進行改革的人在中央還居於少數。隨著胡耀邦的下台，一批胡耀邦信用、提拔的人也紛紛倒霉。「老人政治」左右政局，鄧小平自斷其臂，使中國的改革面臨危機，所謂「胡趙體制」也隨之解體。我對改革的前景，從心裏生出一股不祥之感。

6-17 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衝擊下的改革

中央3號文件傳達以後，在黨政各級幹部、廣大黨員和民眾中，引起了極大的不滿，認為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解決？這麼匆匆忙忙決定究竟是怎麼回事？各省、市，甚至基層不斷向中央詢問，人們都對這件事表示質疑。後來，中央又連續發出了五個補充材料，但是仍然難以平息大家的情緒。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胡耀邦發起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一系列豐功偉績都記在了人們的心裏。

其實，現行制度有問題，人們有意見是正常的。意見中的多數是希望加速改革，少數是想從根本上改變。但隨著腐敗的日益嚴重，政治制度的弊端日益明顯，人們的不滿也在不斷增加。學潮一波一波的出現，正反映了人們的情緒。趁著胡耀邦的下台，陳雲的追隨者不僅掌控著經濟領導部門，還由宋平取代尉建行當了中組部長，王忍之取代朱厚澤當了中宣部長，王芳取代阮崇武當了公安部長。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了。從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在各領域有改革開放思想的代表人物，或被組織批判，或被開除黨籍，大有「黑雲壓城」之勢。雖然上層造的聲勢很大，多數民眾則很少像以往搞政治運動那樣響應。中國留美學生兩千多人，聯名發表了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公開信，抗議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鎮壓，抗議「政治迫害」，抗議「非法罷黜胡耀邦」。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風浪，直接衝擊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在一些左派的眼中，政改辦成了「自由化的窩子」，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成了「宣傳自由化」。在這種肅殺的氛圍中，政改辦舉行了多次會議，學習鄧小平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學習中央有關學生「鬧事」的講話，並為自己的工作尋找合理的根據，從速編輯了《鄧小平同志論政治體制改革》一書。政改辦倒是在壓力中一直保持著活躍的氣氛。

按鮑彤的說法，就是通過討論，檢討「我們的工作是不是符合小平同志的思想，從總體上是不是能站得住腳」，要和中央「對對表」。黃海說，「我們前一段的研討符合鄧小平思想。」陳曉魯說，「我們的文件不僅現在站得住，今後10年、20年也站得住。」吳偉說，「改革不能和自由化掛起來。」嚴家其說，「我看我們的工作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鮑彤的理論勇氣我很欽佩，你不帶頭講話是不會有這麼好氣氛的。」

吳國光提議，對當前的利益集團做光譜式分析。鮑彤說：「紫陽前幾天就談了利益集團問題。其實，小平說的改革中，一些人會得到一些東

西，一些人會失去一些東西，有些人得到這些而失掉那些，也是講的這個問題。這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利益的矛盾，改革中，利益的變動會引起衝突。改革的阻力、難點，就發生在這個背景下，要認真討論這個問題。」

我說：「我們在匈牙利考察時，他們的『經濟改革之父』涅爾什就說過，改革以後有『三個想不到』，一是中央部委反對改革，二是大企業反對改革，三是黨的各級組織反對改革。這個意見值得我們考慮。利益一元，就會輿論一律，有利於集權。利益多元，輿論也就不會一律了，就會有利於改革。」鮑彤接著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客觀上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改革就是要找到適度滿足各種利益集團的路子。」

鮑彤最後說：「我們前一段的研討，從現在的水平看，是站的住腳的。10年、20年後怎麼看？我不敢說。出了餽主意，是罪人；該提的問題沒有提，也是罪人。去年9月18日，紫陽有一句話沒有寫到給中央常委的信裏。他說，改革有三種：一種是現有體制好，小修小補就可以了；一種是不好，要根本改變；一種是要做相當大的改變。」他說：「我看，是要做相當大的改變。我們現在還遠遠沒有達到小平1980年講話的水平。」

對於大家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問題，鮑彤說：「下毛毛雨，對社會上，要到適當時機。到了春天就可以下了，春雨連綿。」嚴家其說：「春雨貴如油！」吳國光說：「夏雨遍地流！」我說：「秋實倉廩滿！」鮑彤對政改辦融洽的氣氛很高興，說：「我們有一個缺點，就是所有的同志都是倉促上馬，思想準備不足，但大家能全力投入工作，也算是冬梅傲寒風了！」會後，陳群林有些害怕地問我：「我們這兒是不是有些自由化？」

當時，經濟體制改革，也受到「反自由化」的衝擊。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畢竟還不能丟。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省長會議。趙紫陽總結說：第一，今年要壓縮空氣，使正確的建設方針和正確的改革部署互相結合。第二，要穩定經濟，問題是投資規模過大，結構不合理，要壓縮。第三，堅持改革，搞活企業是改革的出發點、立足點。第四，反對自由化，但現行城鄉經濟政策不變，全面改革的方針不變，對外開放的方針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不變，一國兩制的方針不變。

趙紫陽特別指出：「三中全會路線的基本點有兩個，一個是堅持四項原則，一個是改革開放，去其一都不可。反對自由化要注意政策，僅限於思想政治領域，要注意團結大多數。經濟理論問題不要輕易批，因為這裏問題很複雜，無法都合乎本本，其實經濟界陳舊的東西還很多。農村也不要搞反自由化。」他還說：「從學生鬧事可以看出，群眾的意見缺乏正常的

反映渠道，要主動與學生、教師和工人對話。匈牙利事件之後，卡達爾就很注意對話，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容。」

為了阻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向全局擴展，1月28日，由趙紫陽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並發出了4號文件《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通知說：「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又特別指出：「不要聯繫經濟改革、農村改革、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黨和社會上存在的其他消極、腐敗現象，是甚麼問題就解決甚麼問題。不要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掛鉤。」

與此同時，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盧之超^[542]負責的「反自由化小組」，駐進了中辦招待所二樓。他到處作報告，說：「現在政治上的自由化是經濟上的自由化引起的，經濟上的自由化為政治上的自由化提供了土壤。批政治上的自由化，不批經濟上的自由化，就解決不了產生自由化的跟源。」他甚至說：「現在是批了說自由化的人，沒有批幹自由化的人。胡趙體制，胡趙體制，批胡必批趙，不批趙也就批不了胡。」逕直把矛頭指向了趙紫陽。

6-18 研討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

——聽取並討論關於近期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彙報

1987年1月4日和2月4日，研討小組先後兩次召開了第二次會議，討論近期政治體制改革措施。參加會議的人員包括，研討小組成員、專題研討小組負責人、政改辦人員，並特邀了鄧力群、高揚。

會議開始，趙紫陽說：「今天請力群和高揚同志參加會議，聽一次關於近期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彙報，議論的問題涉及十三大。」鮑彤彙報了政改辦討論的意見。當彙報談到建議「大量減少黨的專職幹部」時，趙紫陽說：「蘇聯就沒有那麼多黨的專職幹部，這是我們的特點。至少，蘇聯工廠裏黨的專職幹部很少。我們50年代的時候也很少，後來，搞集體領導，學解放軍，搞政治運動，黨的專職幹部就多了。」彙報建議「取消地方各級黨委會的常委會」時，趙紫陽問：「甚麼時候地方黨委搞常委的？」王漢斌說：「北京市委50年代只有10個委員，還包括正副書記。」

彭沖說：「解放初期就是書記、副書記、委員，沒有常委。」趙紫陽接著說：「市裏開全委會比較方便，省裏怕是不行。我們現在有些東西不是

^[542] 盧之超（1933-），江蘇寶應人。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

工作需要而是待遇，書記比常委高，常委比委員高，拿工資也不一樣。」趙紫陽沉吟了一下說：「我看市裏肯定可以這樣，縣裏也可以，省裏還可以再研究。問題在於，書記處代替了常委，常委代替了全委，全委代替了代表大會。一層代替一層。」

薄一波說：「我們政治局委員現在搞到 20 幾個，太多了。進城以後，就是五個書記，兩個候補書記。八大時改了一下，設立常委，也就是過去的書記處，也還是那麼幾個人。省、市也只有一個書記、一個副書記。後來，省裏也醞釀成立了書記處，書記處、組織部、宣傳部，進城後又有統戰部、中聯部，越設越多。黨政真正要分開，就不能搞得太多了。人越多辦不了事情。」

彙報建議「取消黨組」，說到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工會黨團」、「議會黨團」時，薄一波說：「不設黨組，我贊成。黨外人士可不可以當省長、市長？共產黨把官位都佔了，又要搞點民主，就搞了些勞動模範、女的、少數民族，等等。不是黨員就不能當官，這就使有的人為謀利做官而入黨。只有黨員才能當官嗎？才是黨的領導嗎？這是黨員專政。」

彙報到選舉改革並建議實行差額選舉、取消代表比例、改革提名制度時，趙紫陽說：「選舉，一個是基層選舉，一個是全國選舉。基層選舉，不僅是縣級，也包括學校。選民都不認識你，不如不選。搞『代表比例』這個問題很大，讓人反感。選舉也搞指令，流弊太大，讓人反感。」胡啟立建議：「報批的名單就是差額，行不行？」鮑彤說：「這是個好辦法。籠子和鳥一樣大，就沒法飛，是等額選舉。籠子比鳥大一點，是差額選舉。」

趙紫陽說：「這可能是個好辦法。群眾可以在 15 個人裏選 10 個，這樣更可能實現領導和群眾相結合。我們現在的選舉制度一定要改革，當然一下子搞得那麼民主也不可能。這有各方面的限制。但只搞形式也不行。」他接著說：「有一個問題，你們彙報裏沒有講。我考慮，無論如何，今後要發揮全委會的作用。中央全會、政治局、書記處和常委之間，要發揮中央全會的作用。在十三大，全會的組成要不要改革？這個問題要討論。」

根據趙紫陽的指示，政改辦討論了十三大的改革問題。首先是中央委員會的組成問題。資料顯示，中共的中央委員裏，工農代表在九大佔 28%、十大佔 35%、十一大佔 27.7%。陳曉魯認為，中央委員可以減掉這裏的大部份，再減少一部份軍隊代表。顧雲昌認為，中央委員減到 120 人的話，要考慮用多長時間，十三大可以先減到 250 人。其次，討論了顧問委員會和紀律委員會的問題。關於書記處的改革，鮑彤認為「書記處可以

是秘書長的作用」；遲福林建議，書記處書記應當專職，並不兼國家職務，書記處應該明確為黨的辦事機構，政治局要年富力強。

在大家討論的基礎上，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十三大，書記處的職責按1943年的辦法，書記、總書記由政治局任命，都不兼政府職務；中央委員實行差額選舉；黨的中央人事與機構變動，要通過中央委員會、乃至全國代表大會決定；1/3中央委員要求，即應召開全會；顧問委員會要規定進入的資格年限；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明確職能，取消政府各部、群眾團體的紀檢小組，成立檢察部；等。

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二次會議繼續召開。當彙報到「中央書記處的功能」時，趙紫陽說「將來大問題要在政治局常委會定，書記處除了管理日常黨務外，就是政治局的辦事機構。」薄一波說：「這比較合理。常委不宜人多，五個人就夠了。」趙紫陽說：「應該明確，常委對政治局負責，政治局對全會負責，書記處是辦事機構。」薄一波表示：「我同意紫陽同志的意見。」

關於中央全會，趙紫陽說：「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矛盾：人少了，委員要減少很多；人多了，開會就很難。中央委員能減到150人，減下1/4，候補中委只搞50人，那就大大精簡了。」薄一波說：「中委必須選好，要有50歲、40歲的，增補的必須是年輕的。」關於「代表常任制」問題，薄一波說：「到21世紀這麼搞，我贊成。現在還不行，很難發揮作用。」

趙紫陽提出：「究竟怎麼扎扎實實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人們要求民主是潮流，我們要盡可能滿足。蘇聯東歐把群眾參加管理叫自治，我們怎麼個搞法好？農村條件差一些，機關、學校、科研單位、工廠的文化水平就比較高。我們的基層，黑暗的東西不少。基層民主非擴大不可。與此有關的是工會問題，現在由黨包攬、代替了工會，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黨政工團各司其職，事情才好辦。」

趙紫陽說：「我們過去對基層民主的認識不夠，要把人民參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薄一波說：「贊成這個意見。工會要為工人說話，學生會要代表學生利益。只為官方辯護不行。」趙紫陽又說：「許多事不公平，人民不滿意，要求解決，卻沒有說話、出氣的地方。光搞上訪不行，要從組織制度上解決。」薄一波說：「現在，書記廠長打擊工人，工人整書記廠長，都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6-19 研討小組召開第三次會議

——溫家寶彙報「黨政分開」專題

2月14日，研討小組召開第三次會議，聽取黨政分開專題小組彙報。參加會議的人員，除了研討小組彭沖缺席，特邀增加了胡喬木之外，還有專研討小組和政改辦人員。首先由黨政分開專題研討小組召集人溫家寶彙報。他說，研討的指導思想。一是鄧小平所說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因此要黨政分開；二是趙紫陽所說劃分黨政的職責；三是兩個有利於，即有利於長治久安、有利於現代化建設。

彙報到「選舉」問題時，趙紫陽以福建省龍巖市的選舉為例說：「龍巖市連續三屆市長候選人都沒有得到人大批准。第一屆是外地派來的沒選上，當選的是當地法院院長，可剛當選就給調走了。第二次，上級指派的候選人也沒當選，原來的一個副市長當選了，又給調走了。第三次也類似。你有選的權力，我有調的權力。像是開玩笑一樣。看來，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不行，社會監督和民主監督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趙紫陽分析說：「今年科技大學的事件，選舉是導火線。我們選民對選舉的興趣，還沒有菲律賓的大。我們的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人民中間、特別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不是簡單地要求有飯吃，還要求當主人翁，參與國家大事。對此，有條件就要搞民主。人們感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回答的問題，100年也要回答。隨著社會的發展，民主只能是越來越多。」

彙報到「差額選舉」時，趙紫陽說：「不僅中央要搞，省一級也要搞差額選舉。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長、副省長，放手選舉有甚麼不可以？要真正搞民主，不搞民主不行。但要注意，省長提名組閣的情況又不同，否則，一個班子三套馬車，相互扯皮怎麼幹？比如，可以讓他提三次人選，一次、兩次通不過，第三次通過。第三次也通不過，省長就辭職。總之，要制度化，要有實施細則。都說些原則話，不行。」

當彙報說到「三權鼎立不能照搬」時，趙紫陽說：「雖然話不能這麼說，但實際上，人大當然要監督政府，政府也要受法律保護。美國是三權鼎立，總統的決定，兩院可以否決；國會的議案，總統也可以否決。其他的國家也有別的办法，比如解散國會，辛亥革命後的國會制也是這樣。我們從蘇聯學來了一元化、蘇維埃，真要人大起作用就有了問題。彭真說，人大的監督是憲法、法律監督，講的好。不是日常事務的監督和干預。」

彙報到「要正確處理黨和群眾團體關係」時，趙紫陽插話說：「特別是工會。」他問鄧力群，可不可以主持這方面的研究？鄧力群搖頭。他又問高揚，有沒有興趣？高揚說：「沒有。」胡喬木插話說：「還有婦女團體等等，許多不同的利益需要協調。」趙紫陽總結說：「理順與群眾組織的關係，包括兩個方面：比如工會，一是要代表工人的具體利益，只考慮總體利益是不夠的；二是工會有監督幹部的作用，基層黑暗的東西要有民主監督。」

趙紫陽進一步指出：「黨政分開等等，都是為了民主化，總的目標是民主化。很多單位裏，不正之風、黑暗現象、拉拉扯扯，是直接壓制群眾積極性的最重要的東西。從根本上說，要搞直接民主，當然不可能一下子放開，但要定幾條制度。十三大報告要講這個問題，中國的民主化怎麼搞。我們黨的領導太絕對化，每一個黨委書記就是絕對權威，一個單位一個太上皇。這種情況非改變不可。」溫家寶的這次彙報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雖然沒有鮑彤的大膽敢言、才思敏捷，但講話卻簡單明快、嚴謹務實。

接著，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也就黨政分開問題彙報了黨校的研究情況。趙紫陽提出了「群眾自治」的問題，他說：「自治問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提，我們也提。就是盡可能地使人們參加管理，這可能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容。我們過去，一切事都包攬到黨委，矛盾也集中到黨委，像分房子、伙食這類問題，黨都要管怎麼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民主怎麼搞？要好好研究。」

趙紫陽說：「溫家寶這個彙報，大體還可以，還要有實施的措施。黨政分開，上頭要分，基層要分，中間可以晚一些。上面這一層，要搞一個文件，把中委、政治局、常委及書記處之間的關係理順，制定一套工作規則。十三大以後，要把決策放到政治局及常委會，書記處是辦事機構。中央委員的作用要發揮，爭取一年開兩次全會，主要是政治局向全會彙報，而不是指示。全會討論後通過決議，登報，實行公開化。」

薄一波說：「紫陽同志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黨與群眾團體的關係。比如，工會的問題我們從來沒有解決好。工會總要站在工人的立場說話，少奇就說過『工會應該理直氣壯地為工人講話』，工會不為工人說話還幹甚麼？一切都推到黨這裏，很不好。」他最後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要在十三大拿出來，但不能在十三大前漏出去。要定一條紀律，無論如何不能洩密。」

會議結束以後，政改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就蘇聯的改革進行了座談。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543]說：蘇共二十七次以來有很多變化，一認為傳統經濟體制是在粗放條件下形成的，要進行根本改革；二從提「發達社會主義論」到改提「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三認為公有制也會阻礙生產力發展，要不斷改變；四提出公有制實現有不同層次；五認為商品貨幣關係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六提出了企業「自負盈虧，自籌資金，人民自治」。

國家安全部八局的周榮坤^[544]說，蘇共這次把實現社會生活民主化作為改革的中心。戈爾巴喬夫談民主，涉及：生產中的民主，完善選舉制度，黨內民主，自下而上的監督，批評無禁區，加強法制，改進青年工作，選拔非黨人士，解決民族關係中的問題。顯然，蘇聯的改革進入實施階段。人民大學教授高放則說，蘇聯的改革令人鼓舞，他們就沒有終身制，終身制與共和國是不相容的。

這時發生了一件令人深思的故事：李錫銘參加一個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會議，拿出唸的講稿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剛唸了幾句，聽見大家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他馬上說「對不起，唸錯了。」他又拿出另一個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稿唸了起來。原來，他準備了兩份講稿，計劃在不同的場合唸不同的內容，結果把講稿拿錯了。會後，大家歎息地說：「領導人都這麼看風使舵，政治體制改革還怎麼搞？」可歎多年來的「階級鬥爭」，已經把許多居於領導崗位的人變成了「雙面人」。

在中辦招待所內，以鮑彤為首的一組人馬夜以繼日地研究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以盧之超為首的另一組人馬則尋章摘句地研究如何整肅「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這時，北大教授厲以寧^[545]遭到北京市政協批判，他給我打電話說「哀莫大於心死」，而社科院又批判起了董輔弼^[546]，他們是兩位優秀的經濟學家，應該保護一下。鮑彤和我商議如何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我建議，可以由政改辦委託課題，一個中央黨校，一個北大厲以寧，一個社科院董輔弼，三組同時進行。鮑彤同意了。

[543] 周叔蓮 (1929-)，江蘇溧陽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544] 周榮坤，時任職國家安全部八局。

[545] 厲以寧 (1930-)，江蘇儀徵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時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主任。

[546] 董輔弼 (1927-2004)，浙江寧波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6-20 「那就把陳一諮那夥人幹掉！」

與此同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浪越刮越大。人民大學副校長宋濤^[547]竟在校務會議上攻擊體改所是「趙紫陽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窩子」。在所務會議上，我提議組建「改革宣傳室」，並發起進行「改革與社會經濟發展知識競賽」，以調動起人們的改革熱情。但事情遠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農村實行包產到戶，雖然觸犯了集體化的傳統觀念，畢竟沒有傷害大多特權者的利益；經濟改革已經開始危及不少人長期享有的特權領地；政治改革將會使大批黨政官員難以接受，前景實在堪憂。

我曾問鮑彤：「為何不從行憲角度考慮政治體制改革？」他說：「我們只能從小平的意見考慮。」我又問：「軍隊問題怎麼辦？」他說：「不在我們的研究範圍。」顯然，這次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很有限地進行。搞不好恐怕會是空歡喜一場，也只能是盡盡人事了。我到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購買了30本內部影印本的《六法全書》^[548]，分給了政改辦的每一位研究人員，請大家在研究時參考。我又請高山負責，組織國內專家學者編一套《政治體制研究叢書》，叢書分六大類，包括：政治制度總論，政黨制度，政府制度，人事制度，民主制度，司法制度。這幾類書根據科學性、歷史性和實踐性的原則編輯。

我和高山說：「我們的政治素養不夠。要借助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以便為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借鑒。我希望收集國內能夠找到的，各種關於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的資料。國內，從孔孟、韓非到商鞅、王安石，從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到宋明清，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外，從柏拉圖到拿破崙，從華盛頓到林肯，從列寧到斯大林，甚至希特勒；各國政治、思想家的言論，歷史文獻，制度、規則、程序，都分類編輯出來。」

3月，編輯工作即開始進行，高山很盡力。北京大學圖書館負責編輯有關的目錄索引，人事制度由中組部編輯，其他五部分均由中央黨校負責組織編輯。先後約400位專家學者參與了這項工作，經過15個月的努力，近4,000萬字的這套叢書完成了。我和鄧樸方商定，請他父親為這套書題寫書名，並由他創辦的華夏出版社投資120萬元出版。叢書編委會由鮑彤、周傑、賀光輝、嚴家其、史維國和我組成，我擔任常務編委。

這也許是中國的宿命，每當改革要深入一步的時候，極端的思潮就會出現，而既得利益者便藉機扼殺改革，主張改革的人也會一批一批地遭到

[547] 宋濤（1914-2001），安徽利辛人。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548] 係台灣出版在中國大陸內部發行的影印本。

整肅。如果從制度上找原因，可能是共產黨欠賬太多，一有機會，人們就會想追討；如果從思想上找原因，共產黨「用目標代替過程，用理想代替現實」的思維模式，則深深影響了整個的社會情緒，人們缺少韌性的奮鬥精神，總想一步就能解決問題，結果卻往往適得其反。

我的麻煩開始來了。3月初，趙紫陽問我：「你怎麼在體改所說『共產黨還不如法西斯』呢？」我說：「我在所務會議上說，我們搞政治體制改革，是為了發展民主、建立法制。我們文革時亂鬥人、亂抄家，希特勒在德國整肅反對派還通過國會和法律。」他告誡我說：「以後說話要注意分寸。」我通過調查，發現所裏果然有一個某某部的「密探」，就把這個人調走了，但後來這個人「六四」後升了官。

一天夜裏，一位少將朋友告訴我：盧之超在軍事科學院作報告說：「現在政治上的自由化是因為經濟上的自由化，經濟上的自由化是因為農村人民公社解體。」宋時輪^{【549】}問：「農村人民公社是怎麼解體的？」盧之超竟回答說：「農村人民公社之所以解體，是陳一諮一夥人鼓吹包產到戶引起的。」當時，宋時輪拍著桌子說：「那就把陳一諮那夥人幹掉！」這位朋友參加了這次會議。我說：「這不奇怪，歷來搞改革都會有犧牲的。」

接著，鮑彤轉給我一封信，請我儘快作出說明。信是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寫給主任鄧力群的。鄧力群批示：「請啟立同志閱。」胡啟立批示：「請紫陽同志閱。」趙紫陽批示：「請志文、鮑彤調查、瞭解，寫出報告。」梅行的信是這麼寫的：

力群同志：

據聞，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福特基金會支持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與我體改所（所長陳一諮）、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關係密切，企圖影響國務院最高決策，這個動向值得密切關注。

梅行

我立即請維凌找小凱，將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成立以來的所有資料收集一套，並將其與福特基金會的關係寫一個說明。20天以後，我收到了小凱轉來的100多頁資料。我將這些資料分類整理以後，給趙紫陽寫了一份10頁紙的報告，並附上了50多頁的證明材料，包括：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為甚麼成立，中國駐美使館的支持與韓敘^{【550】}大使的題辭，學會的章程與財

【549】宋時輪（1907-1991），湖南醴陵人。中共建國上將，時任軍事科學院院長。

【550】韓敘（1924-1994），江蘇南京人。時任中國駐美國大使。

務管理規則，學會成立後的活動內容，學會與福特基金會的關係，學會與體改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係，等等。

鮑彤將我寫的報告轉給了安志文。志文看了以後，請體改委秘書長洪虎核實。當洪虎調查找梅行詢問時，梅行先說：「只是聽說。」洪虎又問：「聽誰說的？」梅行搪塞說：「記不清了。」鮑彤無奈地搖著頭說：「一個『據聞』就捕風捉影，顛到黑白，無限上綱，真是惡習難改。」這個無中生有的誣陷倒是沒有了下文。可令人深思的是：梅行在書記處研究室，對鄧力群從來都是說一不二的，為甚麼會給鄧力群寫這麼一封信呢？

回想從1980年，我到國家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查資料，梅行二話不說就給我開了介紹信；1983年我到蘇州養病，又是梅行給江蘇省委研究室寫信讓對我多關照，我對他一直是很敬重的。而且，梅行和夫人聶眉初在文革中飽受迫害。撥亂反正時，梅行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聶眉初在《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負責，聽孟繁華說她為人也很正派開明。但梅行過去長期在計委工作，當改革衝破計劃體制時，他就不滿意了。

梅行與鄧力群是無話不說的朋友，他這個「據聞」和鄧力群說說不就可以了嗎，又何必正式寫一封信呢？看來，事情不那麼簡單。從鄧力群的愛將盧之超在軍事科學院的報告，到鄧力群上轉的梅行這封信，都說明鄧力群向我發出了警告：陳一諮，你已經走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邊緣了！想起為中國進步而奮鬥的仁人志士的流血犧牲，想起農村千家萬戶的悲慘境遇，想起祖父戊戌變法後的境域，我別無選擇，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6-21 研討小組召開第四次和第七次會議

——討論「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

3月28日，研討小組召開第四次會議，聽取黨內民主專題小組的彙報。參加會議的人員，除了研討小組田紀雲缺席、薄一波請假，還有特邀人員，專題研討小組和政改辦人員。黨內民主專題組負責人周傑作了彙報。

當彙報到「黨內民主要抓兩頭」，「從中央和基層兩頭開始實施」時，趙紫陽問：「抓兩頭有甚麼根據？不是說『中梗阻』嗎？中間不搞能行嗎？討論黨政分開時，說到要抓兩頭，民主問題是否也要這樣？中間是否也可以緩一點？理由是甚麼？」胡喬木說：「是否考慮專講中央。」趙紫陽說：「當然，關鍵是中央，其他要有步驟地搞。這個問題可以再議。」

當彙報到「撤銷市、縣黨委的常委會」時，趙紫陽問：「這行不行？不是反而加強了書記個大的權力嗎？全委會閉會期間，有沒有一個人說了算的可能？」高揚說：「特別是幹部問題，更容易個人說了算。不一定是第一把手說了算，一、兩個書記就搞定了。」趙紫陽說：「要注意不要以常委會代替了日常工作，不要代替了全委會。不要常委會，可能會加強了書記的作用。現在，一是要加強全委會，一是要限制書記的權力。上次議的時候認為可以撤銷常委會，現在看來實際上可能不行。我看，能不能形成這樣一種體制：常委會決策，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黨的日常工作由書記管，政府日常工作由省長管。」

彙報擬議的中央「工作規則」時，趙紫陽說：「政治局委員只能在分管範圍內臨機處置，一定要嚴格區分個人意見與代表組織。」趙紫陽建議：「能不能劃分一下：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常委決定日常問題。」胡喬木認為：「沒有必要劃。」趙紫陽說：「不劃不行。沒個規定，怎麼走上軌道？怎麼叫制度化？」胡喬木堅持說：「規定是沒有用的。」趙紫陽說：「有規定就有制約，沒有起碼的制約會出問題，這是個法治和人治的問題。」

趙紫陽總結說：「常委作為日常工作的決策機構，政治局作為重大方針的決策機構。常委是第一線，要每週開會；政治局會議一月一次；中央全會半年一次；書記處不開會，書記分工辦事。這大體相當建國初的建制，書記相當於當時的秘書長、副秘書長，為常委服務、辦事；常委相當於當時的書記。」

5月28日，研討小組召開第七次會議，聽取社會主義民主專題小組的彙報。參加會議的人員，有研討小組成員，特邀人員，還有專題研討小組和政改辦人員。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組負責人胡繩、有林作了彙報。

當彙報到「人大的作用」時，趙紫陽說：「人大既不能是形式，又不能與政府或黨委扯皮。在重大的問題上，哪些事人大可以作主？這個問題要有個明確的說法。像人事問題，如果沒有黨內約束，投票就沒有保證；如果一定要黨員投贊成票，就又沒有民主了。」彙報到「人大常委80%是兼職」時，趙紫陽說：「將來常委是不是不兼職了？專職很重要。否則，看材料、研究問題，都沒有時間。」

中央黨校副秘書長史維國建議，在縣一級實行「議行合一」的制度。胡啟立表示：「這是個好主意。縣裏現在是五套班子（「五套班子」即中共黨委、紀委、人大、政府、政協，實際上還有武裝部，後來又增加了顧委），弄得焦頭爛額。」趙紫陽說：「這是個好的想法。縣裏搞人大、政府，扯皮多。『議行合一』既有利於民主，又有利於提高效率。人大選出一個

執行委員會，既執政，又是人大的常設機構，下設職能部門，縣長就是人大主任。大事由委員會討論，定下之後由縣長和職能部門去執行。」

薄一波說：「縣裏的幾套班子，頭頭級別都比縣太爺高一點，縣太爺不好辦事。」胡啟立說：「這既不是三權分立，又能夠發揚民主、提高效率。」趙紫陽說：「縣級政府改成委員會，對人代會負責，由人代會選舉產生，又是執行機構。問題是委員會搞多少人？」薄一波說：「老幹部搞了幾十年，不管如何都得留下。」趙紫陽說：「搞地改市，大家都有積極性，就是為了安排幹部。」

薄一波指著彙報提綱說：「這個提綱沒有講專政，專政算不算民主？」趙紫陽回答說：「專政是民主的保證，但不是民主。」鄧力群則說：「多數人的專政就是民主。」薄一波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但經濟發展不平衡，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平衡。要考慮怎麼弄得又民主又順當一些。我當年在解放區搞選舉，是靠擱豆子。」趙紫陽說：「我們過去還比較民主，在根據地選舉都是差額的，進城以後反而不民主了。」

彙報提綱最後講了「輿論」問題，趙紫陽說：「第一個是報刊搞輿論一律，甚麼也不能講，不行；放開，行嗎？報紙監督過去強調喉舌作用，傳播黨的聲音。如果主要是監督，那講陰暗面就多，能承受嗎？現在要有一個民辦報紙，專講反面意見，肯定銷路很大。」薄一波插話說：「美國人說趙總理支持《世界經濟導報》？」趙紫陽說：「這是沒有的事！不要聽那些傳言。第二個是社會民主，包括基層民主和社會協商對話。我們必須與不同利益的人協商與對話，只靠政協不行，要聽到不同利益集團的意見。」

趙紫陽歸納說：「最近小平說『無論如何不能搞西方的三權分立，那是幾個政府』，我們沒有搞。要保持高效率，就不能牽制得很厲害。行政機構要有效率，就涉及黨的領導、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的關係。原來的搞法不行，究竟怎麼搞會好一些？還有，民主與法治，民主的制度化就是法治，但有一個相適應、相結合的問題。目前的現狀不改變不行，步子走得太大也不行。要使民主化建康發展，一開始就不能出問題。」

趙紫陽接著說：「總之，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把行政工作搞得很困難，是不行的。比如，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又在黨的領導之下，將來幹部任免和財政問題，會成為人大與黨委矛盾的兩個焦點。所以，人大問題要好好研究。中國的權力機關在理論與實際上怎麼辦？是個難題。重大的事情黨決定，政府又對人大負責，關係很難理得清楚。開始研討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問題比較麻煩。」

趙紫陽最後說：「我看最複雜的是人大的問題。人大產生就說是權力機構，可真正發揮那樣的作用，就遇到與黨、與政府的關係問題。怎麼個搞法很值得研究，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由黨領導下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先例。用資本主義的辦法不行；社會主義各國的辦法，與我們過去一樣，可繼續那樣人大就仍然難以發揮作用。看來人大要有大的改革，恐怕是難以行得通的。大家再研究研究。」

關於如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趙紫陽說：「我們到底希望出現一個什麼樣的政治局面呢？是不是可以講『團結和諧的局面』？出現這種局面應該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的。」政改辦就這個問題組織了很多次討論。陳曉魯還提出了「權力來源」問題，他說：「我們是武裝競選，經過 20 多年選上了。一旦選上了，是不是就是千年王國了？建國後，我們或多或少地濫用了人民給的權力。」但這些問題都沒能深入討論。

關於發揮民主黨派作用問題。統戰部長閔明復認為：「從實行『一國兩制』看，除友黨之外，將來會出現反對黨，迫切需要有政黨法。還應當擴大民主黨派參政。現在的政協成了幹部休養所，成了老幹部向政府放炮的地方，成了中央安排老頭子的地方。」民建中央常委吳大琨^{【551】}說：「要提高民主黨派的作用。像企業、大學與科研搞活，這是民族興旺的兩個基礎，民主黨派都能發揮獨特的作用。」

民盟副主席錢偉長^{【552】}說：「現在，往往下情不能上達，意見難以發表。下面的領導向中央封鎖消息。要允許有不同意見，不要因此而大驚小怪。一定要有放氣的閥門，否則鍋爐就會爆炸。現在所有的職位都要向官級上靠。上海工業大學與科技大學應該合併，可是黨委不幹。兩個局級單位合成一個，幹部怎麼辦？爭權奪利！教授也要靠幹部級，知識分子深受其累。現在是官的世界，『官本位制』。這東西一定要改。」

民革中央副主席賈亦斌^{【553】}說：「發揚民主要和封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兩種思想作鬥爭。領導不改善，靠壓不行。」無黨派人士程思遠^{【554】}說：「『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個說法是違憲的。民主黨派應該有自己言論機構。」民盟副主席羅涵先^{【555】}說：「現在政府管事太多，要少管閒事。小飯

【551】 吳大琨 (1916-2007)，江蘇吳縣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民建中央常委。

【552】 錢偉長 (1912-2010)，江蘇無錫人。中國著名力學家，1957 年被打成右派，時任中國民盟副主席。

【553】 賈亦斌 (1912-)，湖北興國人。時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554】 程思遠 (1908-2005)，廣西賓陽人。曾為廣西桂系重要人物，後勸說李宗仁與其 1965 年歸國。

【555】 羅涵先 (1922-2011)，江蘇淮陰人。時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店買凳子，農科院買煙，都要上級批。」九三學社秘書長趙偉之^{【556】}說：「現在的一級教授不過相當於國民黨時期的中學教員，情況還不如過去。政協很虛，只是個大牌樓。」

關於發揮社會團體作用問題。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秉全^{【557】}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工會的作用，朝鮮倒數第一，我們倒數第二。我們的工會只是個三類科室（一類指黨委，二類指行政，三類指後勤），辦辦紅白事而已。」全國總工會工人運動研究所所長黎征^{【558】}說：「現在是全國性怠工。工會只能做黨的馴服的小毛驢，工會主席都是黨委派的。據上海的調查，只有9%的人認為工會能夠代表工人的利益。」

共青團中央書記劉延東、劉奇葆^{【559】}等認為，現在共青團很難代表青年利益，反映青年呼聲，所以對青年吸引力不大，共青團員只佔青年人的16%。基層團幹部的工作就是「打狗罰款攆大肚（指懷孕婦女），端茶倒水幹雜務」，團幹部說「跟著團支書跑斷腿，不如為書記倒杯水」。而且，很多團支書都是黨委指定，民主沒有保障。目前只有阿爾巴尼亞、越南和中國沒有《青年法》。

關於基層民主問題。大家在討論中談到：農村和工廠主要是幹部以權謀私問題突出；科研與教育部門主要是，人才使用不合理，且難以流動；幹部搞特殊，打擊知識分子；學生有民主要求，但簡單化。共同的問題則是，選舉不民主，選民冷漠；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幹部以權謀私，違法亂紀；群眾組織難於發揮作用。

關於新聞言論自由問題。社科院新聞所新聞法專家孫旭培^{【560】}說：「首先，對新聞有法律控制與政治控制，應當建立新聞法，實行法律控制；其次，是建立多層次的報業結構，以黨報為中心，以各種機關報為主體，包括民間報紙。人大可以成立新聞自由委員會。多少年，沒人說新聞是人民行使權利的工具。我們應該創造意見市場，依法管理。」

中共宣傳部出版局副局長袁亮^{【561】}介紹說，1985年書記處提出制定出版法，先後起草了三稿。遇到的問題首先是怎樣看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辦出版社、辦刊物？周揚就持這種意見，胡喬木則表示

【556】趙偉之（1924-2011），山東海陽人。時任九三學社執行委員兼秘書長。

【557】陳秉全，時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558】黎征，時任全國總工會工人運動研究所所長。

【559】劉奇葆（1953-），安徽宿松人。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560】孫旭培（1944-），安徽懷寧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561】袁亮，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局副局長。

不可以開「人人辦」的口子。國家新聞出版署負責人王強華^{【562】}說，1984年人大科教文衛委員會就動手搞新聞法，一直有分歧。人大法工委高鵬說，需要結社法，但甚麼叫社團要規定清楚。

6-22 研討小組召開第五次和第六次會議

——討論「機構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4月16日，研討小組召開第五次會議，聽取機構改革專題小組的彙報。參加會議的人員，有研討小組成員，特邀人員，還有專題研討小組和政改辦人員。機構改革專題組負責人賀光輝作了彙報。

當彙報到要改革黨和政府的「對口機構」時，薄一波說：「對口機構也不是下邊願意搞，上面要對口分錢發物。」趙紫陽分析說：「機構多，有3個原因：一個是體制上的，如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個問題；二是因人設事，幹部多又要有安排，許多局、處設立就是安排人；三是新舊體制交替，舊的沒撤銷、新的又要建立。不要一提機構改革就要撤臨時機構，我看在沒有改革以前，臨時機構是提高效率的一個辦法。」

趙紫陽說：「臨時機構問題的癥結，在於部門分得太細，結果部門之間扯皮。根本辦法是減少部。企業下放之後，經濟管理部門完全可以減少，減少部一級可以搞得快一些。」薄一波贊成地說：「要把舊框框取消，部可以大大減少。」趙紫陽繼續說：「在機構改革之前，臨時機構是一大進步。矛盾無法解決，就搞了這個。臨時機構是為解決問題逼出來的辦法。臨時機構與其說是組織機構，不如說是工作方法。」

彙報中，趙紫陽談到了「行政區劃」問題。他說：「中國的區劃太大。搞成100個中央直屬單位，可能效果更好。取消中間一層，中央轄省和市。省以下就是縣，可以減少層次。秦時還36郡，那時地方小，可是比現在中央直屬的單位還多。不過，區劃問題是一篇大文章。這個問題可以先不提。」

田紀雲說：「機構改革不能拖得太長，下屆政府應該有個新模型。」趙紫陽贊成這個意見，說：「關於下屆政府的組成，要提個藍圖。」田紀雲說：「自下而上地改，不可能；試點也不行。自上而下才行。」趙紫陽說：「自下而上，步履艱難；自上而下，勢如破竹。田紀雲接著說：「不宜把國

【562】王強華（1933-），江蘇南京人。時任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

務院機構搞得很大。要加重部的職能，綜合性要加大；專業部應該盡量合併、精簡。」

胡啟立提出：「機構改革怎麼和人事制度改革配套？群眾對黨風不正的意見，也比較集中在人事制度上。」趙紫陽說：「設計合理的機構，並不是個大問題。關鍵是人員的去留，這個問題很艱巨。現在，中央的國家機關的改革，條件已經成熟，不能再拖。企業下放了，企業集團單獨掛戶了，中央各部不再承擔這方面職責了，就為國家機關實行政企分開創造了條件。該設的設，該撤的撤，可以鞏固並促進經濟改革。」

趙紫陽還指出：「要搞配套方案，比如人員的設置問題。在部合併的同時，要考慮協會的問題，但協會要避免官僚化、行政化。大批幹部要轉到協會，協會不能成為二線，要合理地發揮作用。」他又說：「我當總理，明確兩條：一是不管政法，二是不管思想。思想問題放到政府來管不妥當。當然，這方面有些行政事務，政府要管。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個問題，怎麼個搞法需要研究。」

5月20日，研討小組召開第六次會議，聽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專題小組的彙報。參加會議的人員，有研討小組成員，其中薄一波請假，特邀人員，還有專題研討小組和政改辦人員。幹部人事改革專題小組負責人曹志作了彙報。

依照慣例，彙報時或彙報後，研討小組成員都會發問和議論。趙紫陽首先問：「甚麼叫薦任、委任、簡任和特任？」胡繩說：「就是分等級的。」鮑彤解釋說：「簡任是高級文官，薦任是中級的，委任是低級的，特任就是政務官。」趙紫陽建議：「我們就分：選舉的和任命的，是一種；另一種是非經選舉和非任命的。將來的人事制度要劃一個大槓槓：選舉產生的，實行任期制；非選舉產生的，實行公務員管理。」

趙紫陽接著說：「文官要穩定，要實行退休制，到了年齡就退休。選舉產生和政治任命的，實行任期制，省長、部長都是任期制。有些人本來是選舉產生的，屆滿之後如果夠資格，還可以當公務員。」高揚說：「觀念要改變，不然當了大官就不能當小官。」趙紫陽說：「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北洋時期，唐紹儀^[563]不當總理了，就回廣東當了縣長，幹得還不錯。」

趙紫陽問：「今後，是不是除了行政學院畢業的，文官考試及格的，都不能進入國家機關？」曹志說：「是的。」趙紫陽說：「這樣就有了一個

【563】唐紹儀（1862-1938），廣東珠海人。1912年曾任中華民國總理，後任過中山縣訓政委員會主席。

平等、公開的機會。」胡啟立說：「群眾對人事上的不正之風很不滿，現在上大學經過考試就沒人說甚麼。」鮑彤說：「這是國家機器的一個基本建設。難點是，一實施黨政幹部之間能不能交流？二是國營企事業幹部與國家機關幹部之間怎麼交流？看來，不能封閉，要交流。」

趙紫陽說：「我們不用『文官』這個詞，用『國家公務員』。公務員就是指不是選舉產生的、不是國家權力機關決定任命的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過去，分工不發達，一個幹部，一個群眾。解放後，就這麼套。結果，從售貨員、小學教員到護士、醫生，甚麼人都叫幹部。」鮑彤說：「和尚、道士都有級別的，什麼副處級、處級、副局級，等等。」趙紫陽問：「真有這樣的？」曹志說：「為了發工資，就都有級別。」

趙紫陽說：「國家機關原來這麼多人怎麼辦？台灣的辦法是依法銓敘合格後任用，我們也要有個辦法。新進來的要考，原來的凍結，合格的繼續留用，也可以經過考試取得資格。先在政府系統搞起來，要把政府搞得精簡、有效率、廉潔、制度化。」胡啟立說：「國家行政學院將決定公務員的質量。」田紀雲說：「日本的行政學院很嚴格，大學畢業的優等生才能進行行政學院。」

談到待遇問題，趙紫陽問：「為甚麼那些人願意到政府來？企業待遇不是更高嗎？」曹志說：「政府職位穩定，是鐵飯碗。」趙紫陽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素質要求比企業高，待遇又沒那麼高，誰幹？」胡啟立說：「名譽好。」趙紫陽說：「社會主義國家當官的工資雖然不高，可是來路多，生活水平比教授高多了。蘇聯部長以上就有特供商店。」胡啟立說：「當部長有吸引力，還有法定的好處，像配車啦，房子啦，等等。」

我插話說：「現在當大學教授很可憐，不僅整天擔驚受怕，而且生活也很清苦，連看病都很困難。像北大的一級教授、文學史家游國恩^{【564】}生病發燒，他女兒向學校要車，想把父親送醫院急診，學校竟不給車。游國恩女兒好不容易借了一輛平板三輪，把父親送到北醫三院，老人已經昏迷了，最後沒有搶救過來。一個國際著名的國學大師就這樣離開了人世。這件事在北大的反響很大，當時北大不是沒有車，車子都被行政幹部私用了。」

趙紫陽說：「像這樣以權謀私是不行的，幹部太特殊化！」他轉頭又問：「清朝就有簡任制吧？」曹志說：「清朝的制度比較健全，日本就是學的清朝。」趙紫陽說：「科舉制就是文官制度。打了天下就要搞科舉，從戰時體制轉到建設體制。這樣，人事部就是個吏部了。大的幹部由黨統一

【564】游國恩（1899-1978），江西臨川人。北京大學一級教授、著名文學史家。

管，各類幹部由各部門去管；再一個就是區分兩層幹部：選舉和任命的一層，公務員一層。前一層實行任期制，後一層實行考試和退休。」

曹志提出：「可不可以把人大改為國家行政學院？」鄧力群說：「人大有馬列主義的傳統，搞成行政學院不妥。」趙紫陽說：「人大可以變成個學區，下面搞幾個學院，將來重點是行政學院。」說到「看文件」問題，現狀是按級別發文件，不夠級別看不到。趙紫陽建議：「要少發文件。要通過法律、政府通告，也可以通過報刊傳達信息。我們過去戰時的、地下的、封閉的作法和一套觀念要改。對外開放，對內開放，都要開放。」

談到黨的問題，高揚說：「黨費增加一點，國家再補貼一點，這樣黨的經費自己出。否則，說不過去。」趙紫陽說：「絕不能走黨自己搞企業、公司這條路。否則，其流弊比現在這樣吃國家的更大，那個不正之風可不得了。」鄧力群問：「現在全黨的黨費有多少？」曹志說：「全年一個億，上交中央三百萬。」分管國家財政的田紀雲說：「一個億，一個中央警衛局都不夠用。」【565】

趙紫陽引開了這個話題，發揮說：「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一定要盡量擴大透明度。再有一個是對話。對話雖然麻煩些，搞通了就會得到群眾的支持。北大搞改革諮詢，沒想到那麼多人感興趣，有兩千多人提問。我們就缺少個『社會問事處』。」胡啟立也贊同地說：「學生的位置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是旁觀者、評論員，現在成了政府發言人，是參與者。」趙紫陽說：「與人民溝通、對話、協商，問事的渠道極為重要。」

李勇打來電話，說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讓我到莫斯科餐廳。我去了以後，見李勇一身軍裝和一位中年軍人在一起。李勇介紹說：「這位是總長楊德志【566】的秘書。」寒暄之後，這位秘書說：「總長有一個問題，想向你請教。現在軍隊的轉業幹部很多，地方上又難於安排。文革時，一個團級幹部轉業到縣裏，還能在縣裏當個副職；現在到縣裏，安排個局長、副局長都不易。這件事弄得軍心不安，很是難辦。」

我說：「我在基層時，也感到地方安排軍隊轉業幹部很為難。我倒是想了個辦法，不知行不行。比如，軍隊可以實行軍齡津貼、軍階津貼、軍功津貼，這三部分津貼一直由軍隊負責發放，任何時候都有；此外的軍職津貼到地方以後，隨擔任的職務變動。而軍隊幹部轉業前，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進行一定的培訓；到地方以後由自己選擇合適的工作。這樣矛盾就可以緩解。」他高興地說：「謝謝！我會如實向總長報告。」

【565】當時，中央警衛局每年的預算是8000萬元，實際的支出超過10倍也不止。

【566】楊德志（1911-1994），湖南醴陵人。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6-23 塔爾多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會打擊改革派」

自1987年1月，體改所與幾家報刊發起「改革與社會經濟發展知識競賽」以來，有各行各業近10萬人參與了這項活動。在4月初的優勝者座談會上，他們說：「參加競賽，既能認識到改革的好處，又理解了改革的艱巨性。」他們提出：「應當在政策制定機構和執行機構之間、政府和群眾之間建立通暢的對話渠道。」他們還說：「人民強烈要求改革，並把對明天的希望寄托在改革上。」

體改所新組建的改革宣傳室，由馮侖、王振耀、劉蘇裏等人搞得有聲有色。他們通過報刊、電台、電視進行改革諮詢、對話，還組織拍攝了「十大市長談改革」等等活動，他們組織的各種活動受到了民眾的廣泛歡迎。這些活動，回答了人們對改革的某些疑問，分析了社會中出現不良現象的原因，指出了新舊體制並存期間的難題，人們的理解則為改革的推進創造了條件。

4月中旬，以匈牙利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哈根瑪耶爾為團長、科學院經濟機制局局長塔爾多什為副團長的經濟學家代表團回訪中國。安志文讓我陪他們到深圳、廈門、上海參觀訪問。他們對中國的農村改革十分稱讚；關於經濟改革雙方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對能否順利進行政治改革持懷疑態度。塔爾多什私下和我說：「1972年我們的改革失敗，當時反對改革的人就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這個口號只會打擊改革派。」

匈牙利的朋友參觀了深圳與蛇口，讚不絕口地說「這是世界的奇跡！」趁匈牙利代表團參觀的時候，袁庚單獨請我到新建成的南海酒店喝早茶，而後又請我去洗桑拿。門剛關上，他就直截了當地問：「紫陽怎麼樣？」我說：「還行。」他說：「一諮啊，耀邦一下台，我就覺得紫陽日子不會好過。咱們是關起門來談心，誰也不知道，你說說心裏話。」我覺得袁庚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就向他介紹了北京的情況。

我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開始，胡耀邦下台，各領域有改革開放思想的人幾乎都受到衝擊。像萬里、趙紫陽、習仲勳、胡啟立，也都不同程度受到批評，中宣部盧之超就到處說『胡趙體制，不批趙批不了胡』，甚至說要把我幹掉。」袁庚說：「紫陽要是垮了，中國的改革搞不好就要走回頭路了。不過，我們這兒還好，反不起甚麼大的風浪。說說紫陽準備怎麼搞政治體制改革。」我向他簡單透了透氣。

袁庚說：「噯，就怕紫陽獨木難支啊！我看政治體制改革很難，老傢伙們習慣了老一套，改變不容易啊。一想到文革，就覺得中央的問題不解決，全局的問題也解決不了。真是讓人著急。」我說：「中國的事情著急也沒有用，只能一步步走。盡力而為吧！」袁庚依依惜別地說：「你要好好保重。北京沒法幹了，就到我這兒來。不過，中國歷來改革者都是沒有好下場的。為國為民，死而無憾！」

在廈門，見到了二表姐吳學文。她是吳宓的二女兒，說起大表伯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以致慘死，大家還是唏噓不已。她說：「父親為反對批判孔子，被打斷胛骨。他這種衛道的精神還是令人敬佩的。」我說：「大表伯總算平反了。但文革中左的影響可不是一下子能肅清的。」她說：「你從小就與眾不同。你為農村改革做的努力，親戚們都很讚許。希望你能為國家的富強多做貢獻。」

匈牙利經濟學家代表團到上海以後，由市體改委接待。我則先後拜訪了曾慶紅^{【567】}、孫恆志、陳琦偉、欽本立^{【568】}等一些老朋友。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助理黃安國^{【569】}和思想研究室主任魏承思^{【570】}說，剛傳達的王忍之^{【571】}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說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撥亂反正」，引起了思想上很大的混亂。大家說，否定文革是撥亂反正，如果說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撥亂反正，豈不是要否定改革開放？豈不是要否定三中全會的路線？甚至否定鄧小平。

我感覺這是個大問題，就說你們把大家的看法搞個材料送上去，同時給我兩份，我直接送給紫陽和樸方。上海市委宣傳部思想研究室在他們辦的《思想研究內參》上，刊登了上海理論界對王忍之講話的反應。據這份材料反映，復旦大學經濟系蔣學模^{【572】}等上海著名學者都認為：「三中全會以後的主流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有自由化也是支流。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開放和鄧小平，這個提法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亂。」

4月26日上午，我收到這份材料，立即給鮑彤一份請他轉給趙紫陽，同時給了鄧樸方一份請他送給他父親。4月28日上午，鄧小平就召見了趙

【567】曾慶紅（1939-），江西吉安人。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後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

【568】欽本立（1918-1991），浙江長興人。時任《世界經濟導報》總編。

【569】黃安國，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助理。

【570】魏承思（1951-），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思想研究室主任。

【571】王忍之（1933-），江蘇無錫人。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572】蔣學模（1918-2008），浙江慈溪人。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

紫陽，說反自由化不應該影響改革開放，還讓趙紫陽講一講這個問題，二人對形勢取得了一致的認識。中午，鮑彤召集政改辦會議，說要為紫陽準備一個講話，「五一」後要開宣傳、輿論、黨校的會議，會上要講兩條：一是反自由化，二是宣傳改革。總之，自由化不能搞，改革要加快。

其實，自4號文件將反自由化「嚴格限於黨內」之後，反自由化的力量一直要打破這個限制。最典型的是所謂「涿州會議」，一批左派在會上大肆攻擊改革開放，像賀敬之^[573]、熊復、劉白羽^[574]等人說：三中全會以來的「8年是噩夢一場，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受壓。這次一定要把反自由化進行到底。」「要堅決反對『和平演變』！」胡喬木也說：「最近幾年，我們黨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手裏了。」會議還準備批判100多個人。

趙紫陽狠狠批評了王忍之「第二次撥亂反正」的說法，問他：「你要撥誰的亂？反誰的正？你這種說法不是把矛頭對準了小平同志嗎？」王忍之急忙說：「是我偶爾失言。」趙紫陽又問他：「為甚麼聽到小平同志說『主要是反左』，你們中宣部如喪考妣？你對三中全會的路線是個甚麼態度？」問得王忍之汗流浹背。趙紫陽當然知道，王忍之敢於這樣說，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力量，但有了鄧小平的支持，就不能不壓一壓這股思潮。

鄧樸方告訴我：「老爺子看了上海的材料很不高興，覺得提『第二次撥亂反正』是衝著他來的。」我說：「這個說法是鄧力群提出的。胡喬木還說，『近幾年黨的領導權已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了』。」樸方說：「鄧力群也太不像話了，總想把我們黨往左拉。只有他們幾個人是馬克思主義者？！讓他們搞誰也沒飯吃。」應該說，上海市委宣傳部魏承思、黃安國等年輕人，在阻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擴大化上，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5月13日，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四、五個月了，政治思想領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幾天，小平同志說，去年發生的風波不應該影響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不僅要堅持，而且要加快。」他接著說：「其實，不改革也會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生產力不發展，就會限制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搞得社會主義沒有多少吸引力，豈不是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幫了大忙？」

趙紫陽指出：「近來，出現了對改革開放持懷疑、保留態度的錯誤觀點。說甚麼『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須反經濟上的自由化』啦，等等。試

[573] 賀敬之 (1924-)，山東棗莊人。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574] 劉白羽 (1916-2005)，北京通州人。曾任文化部副部長。

問，如果把現行政策說成自由化，搞的人心惶惶，生產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樹的砍樹，殺豬的殺豬，誰負這個責任？有人要打破4號文件的『框框』，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不僅政治上是錯誤的，而且組織上也是違反紀律的。」

趙紫陽的「5·13」講話，雖然使左派們十分不滿，但因為有鄧小平對講話稿批示的「完全贊成」，他們誰也不敢公開出來唱反調。這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疾而終了。全國的大氣候開始改變，人們又開始活躍起來，改革出現了新的態勢，不僅經濟改革得到了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的宣傳也開始提上日程，直到中共十三大推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使中國的改革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

但從反自由化以來，鄧力群主持的書記處研究室就一批批的收集整人的材料，一批批的報給中紀委。這些材料往往是斷章取義、無限上綱，像文革時搞大批判一樣，引起人們的反感。趙紫陽為了少傷害一些人，想盡了各種辦法，能保護的人就拖下來，使其不了了之。趙紫陽覺得改革開放需要新的理論指導，而鄧力群主管意識形態只會成為阻力。他得到鄧小平同意，調李瑞環^[575]主持中宣部，但陳雲不同意，沒有辦成。

轉機出現在中組部副部長李銳^[576]寫了一封《給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信中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生活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像這種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宜負責意識形態的領導工作。鄧小平很快作了鄧力群不再主持宣傳工作的批示，鄧力群的工作由胡啟立接管，同時解散了書記處研究室。趙紫陽還將《紅旗》改組為《求是》。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人雖然很不滿意，但也沒有公開反對，卻對趙紫陽更懷恨在心了。

6-24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3月21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就如何草擬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了系統的設想。信中提出：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報告的立論根據，系統闡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任務，著重闡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因為以此立論，有可能把必須避免左右兩種傾向說清楚，也可能把我們改革的性質和根據說清楚。

3月25日，鄧小平在趙紫陽的信上批示說：「這個設計好。」當時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兩個要點：一是承認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

[575] 李瑞環（1934-），天津寶坻人。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天津市市長。

[576] 李銳（1917-），湖南平江人。曾任水利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而不是資本主義；二是中國現在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不能用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那些原則來限制人們的手腳。隨後，組成了以鮑彤為首的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5月中旬完成的初稿送給了鄧小平。

鄧小平和趙紫陽說：「我們不能照搬三權鼎立，你們也沒有寫三權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點三權鼎立？我們主要是要保證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工作，不能干涉太多。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不能放棄。我們究竟要搞一個甚麼樣的體制？要搞一個增強效能的體制。」他還說：「左和右，仍然以克服左為主，因為左的積習很深，很難改。右的一發現就去改。經常妨礙我們的是左，反左糾左應該是我們的基本精神。」

4月下旬，政改辦完成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按鮑彤的說法，十三大報告講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公開的表達，「總體設想」則是內部的表達，主要內容區別不大，後者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可以著墨多一些。「究竟要搞一個甚麼樣的體制？」鮑彤說：「我們遇到一個兩難的選擇：即效率與民主，民主與穩定。近期應該著重解決效率與穩定，提高工作效率，保證社會穩定，是近期目標。」

鮑彤說：「我們要搞一個有效能的體制，解決穩定、效率問題，關鍵是解決黨政關係，否則其他關係解決不了。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是黨政分開，重點是提高政府與企業的效率，提高人民的積極性。黨政不分开，削弱了黨的領導，政府沒有效率，各種關係理不順。實行了黨政分開，還要精簡機構，專業部門要裁併，綜合部門要加強。人員素質的提高，要靠建立公務員制度，使人事幹部制度走上法制的軌道。」

在反自由化時，左派不斷說，「四項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企圖壓制、貶低改革開放。趙紫陽在「5·13」講話中強調了兩者同等重要，說前者是治國之本，後者是總方針。在反覆修改十三大報告的過程中，鮑彤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鄧小平對這個提法多次讚賞，認為「講得好！」

政改辦緊張地工作了8個多月，一天都沒有休息過。我提議，週末到郊區去散散心。大家乘巴司到了潭柘寺和戒台寺，玩的很盡興。正休息時，區委領導來看我們，原來是鄭熱力^[577]到門頭溝區當了副區長。鄭熱力1979年參加過發展組的活動，後來大概看沒甚麼油水，去了北京市委研

[577] 鄭熱力，(1954-)，北京人。曾任北京市北郊農場副場長，時任中共北京市門頭溝區委常委。

究室，很快又到北郊農場當了副場長。我說：「你倒是很會爬啊！」他悄悄說：「我每到周末，就給陳希同^{【578】}、李錫銘一家送一車新鮮菜果，你說能不提拔嗎！」

回城的路上，我和鮑彤說了鄭熱力的故事。他默然，我也默然。但我心想，在基層幹部行賄受賄為甚麼會成了常態呢？顯然，一級一級對上負責的積習，改起來決非一時之功。面對這樣一層一層、一批一批的幹部，當他們的特權受到限制的時候，他們會支持改革嗎？僅僅靠幾個開明的領導人，就能一下扭轉乾坤嗎？何況現在的領導人，哪一個不享受各種特權呢？事情遠遠沒有那麼簡單。

國家計委研究所的趙明來找我，再三請我給他幫個忙。原來「打擊經濟犯罪」各地都分配有名額，他的連襟在瀋陽是個「小倒」，因為排名在前要抓的幾個人聞風而逃，就把他的連襟頂數抓進了監獄，搞不好還會被殺。我看了材料直搖頭，怎麼能如此草菅人命呢？我讓他去找我堂弟陳一訓的大學同學叫陳冀平^{【579】}，是喬石^{【580】}的大秘書。陳冀平把材料給喬石看了，喬石立即作了批示，結果人放出來了。

5月上旬，體改委和體改所組織了北大、清華、人大的500多名學生，到北京的繁華地段與過往行人進行改革對話。當場提問的人有2,000多，旁聽的群眾有2萬多人，反映熱烈，各種媒體也紛紛報道。趙紫陽「5·13」講話之後，6月初，體改所的學者又針對群眾提出的100多個問題和幾十名大學生進行了對話，《人民日報》以「首都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同大學生對話錄」連載，好評從四面八方如潮般傳來。

政改辦則仍每日從早到晚，不斷討論、修改十三大報告和「總體設想」。我幾次開會都提到這樣一個大問題。我說：從1979年起，我一直在研究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國家，蘇聯的路走不通，西方的路走不了。但西方早期發展農業形成經濟的內部分化，蘇聯集中運用國力加快建設速度的經驗，都是可以借鑒的。我們進行的改革無非是為了掃除發展的障礙。那麼，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究竟需要一個甚麼樣的體制環境呢？也就是說，我們如何處理發展與公平、效率與民主的關係呢？

我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濟成長和政治成長是相輔相成的。農業社會的政治形態是君權政治，工業社會出現了精英政治；而精英政治既可

【578】陳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六四」事件的製造者之一，後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因「貪污罪」被判刑。

【579】陳冀平（1946-），江蘇南通人。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局級秘書。

【580】喬石（1924-），浙江定海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

能走向民主政治，也可能走向獨裁政治。這是由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統治走向一批人或若干家族統治的過程。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多數民眾一時還很難管理國家，我們必須重視這樣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是處理好政治參與和民眾水平的關係。第二個層面，是處理好政治精英與其他精英的關係。第三個層面，是處理好民主與效率的關係。中國的專制主義延續了2,000多年，一直就缺少民主、法治的傳統，我們既不可能像那些「可敬的共產主義者」想幾年時間實現共產主義，也不可能像那些「可愛的民主主義者」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建成一個民主社會。我們遠遠地落後於世界的發展潮流，應當奮起直追，但任何改革都會受初始條件與邊界條件的約束。

我根據幾年來對不同類型國家的研究，提出了當前世界範圍大體有四種發展模式：一是「硬政府，硬經濟」，即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集權政治、計劃經濟，此路不通；二是「軟政府，硬經濟」，即類似印度實行民主政治、計劃經濟，效果不佳；三是「硬政府，軟經濟」，像「亞洲四小龍」、土耳其、巴西等國在經濟起飛階段，實行威權政治、市場經濟，成效不錯；四是「軟政府，軟經濟」，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多採取這種模式，發展中國家往往在經濟起飛後也向這種模式轉型。

所謂「硬政府，軟經濟」就是有效政府、市場經濟。當然「硬政府」也有多種形式，但實質是政治權力要相對集中，以利於有效控制和協調；經濟權力要盡量分散，以利於增強活力和效率。但是，如果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一起分散，就可能造成尾大不掉、地方分割和各自為政，從總體上是沒有效率的；而政治權力的相對集中，要有利於民主化的進程，不能形成獨裁。

這一段的討論中，有件事情倒值得一提。就是政改辦在很小的範圍內議論甚麼是「國家領導人」的問題，而後由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大多數國家的「國家領導人」只有3到5個，像美國就是總統、副總統、參眾兩院議長和國務卿，英國是女王、首相、參眾兩院議長，等；到蘇聯用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說法，把黨的政治局委員也叫國家領導人，這樣國家領導人就達到了十幾個人；而我們「國家領導人」的稱謂變成了一種待遇，當時就有110多人。

當時，中國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的有：黨的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成員以上，人大副委員長以上，政府國務委員以上，政協副主席以上，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以上，中央紀律委員會副書記以上，軍隊軍委委員以上。這些人不僅出行可乘專用列車、飛機，而且日常生活、保健、安全都

有各種特殊優待，耗費了國家大量財力。因而建議，今後是否「國家領導人」只限於總書記、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政協主席和軍委主席。

趙紫陽的信沒有回音。但在趙紫陽5月29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聽取政改辦彙報《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時，當鮑彤彙報到這一問題時，楊尚昆高興地插話說：「這好呵，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嘛！」其他人沒有再說甚麼。當然，這個問題也就擱置了下來，沒有解決。5年之後，中國的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的人，已經達到了260多人，倒是創造了一項世界之最。可能除了中國以外，沒有任何國家的民眾，會接受這種官場的怪現狀。

為適應工作的需要，五、六月間，政改辦又調來了幾位研究人員，有政法大學應松年、國防大學鄧運、福建省委黨校嚴書翰、湖南省委研究室梅興保、山東省委研究室趙豐田、《北京日報》唐昕、《經濟日報》牛鐵航、社科院經濟所何家成、中央辦公廳調研室李元。薄一波的秘書王益^{【581】}和董宏^{【582】}，也不時參加一些座談會。此外，還調來了一些工作人員，負責資料和行政工作，如岳慧、閔曉燕、紀寧、張電輝、楊振芳、湯亞男等。

6-25 王芳說：「索羅斯是反共老手，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

反自由化開始，胡喬木就給鮑彤寫信說：「嚴家其有很多自由化觀點，應該回院接受批判。」鮑彤問我怎麼辦好？我說：「胡喬木這個人心胸狹隘。你要頂著不辦，他會糾纏不休。先讓家其避一避風，這樣兩邊都好說。」鮑彤讓我和家其談談。家其說：「我每一篇文章都說了要堅持黨的領導啊，怎麼會說我自由化？」我心想，家其真是個純真的人，就說：「你先回家作研究，院裏找你，你就說在為政改辦作研究。過一段再回來。」

我的麻煩可比家其多得多了。先後從全國人大、外交部、中組部、中紀委經體改委轉來了七八封信，都是告何維凌的，而說我是他的後台。告狀信有的說他有政治野心，有的說他狂妄自大，有的說他生活腐化，等等，弄得我很為難。我聽說維凌從美國回來了，立即去找他。他見到我很高興，還沒張嘴，就讓我劈頭蓋腦訓了一頓。維凌那麼一個錚錚鐵漢，竟抱著我痛哭起來，只說：「別人不理解我，你也不理解我嗎？」

【581】王益（1956-），雲南龍陵人。時任薄一波秘書，後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

【582】董宏（1953-），遼寧海城人。時任薄一波秘書，後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

我說：「我沒那麼大承受能力了。現在，只能去找樸方，讓他幫幫你吧。」維凌一邊擦眼淚一邊說：「姿先生，我沒有任何個人的動機，只是想為國家和民族貢獻自己的一點兒心力。」他說正在美國阿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籌備召開一個中美中小企業的貿易交流會。我說那你就好好幹吧。我接著去找了樸方，樸方說考慮考慮。其實，唐克告訴我，我已經被推舉進了十三大中委名單，可能因為維凌的事會黃掉，這對我來說倒不算個甚麼事。

更麻煩的事情來了。7月，公安部長王芳^[583]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說「索羅斯是個反共老手，一貫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動亂，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而「在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任職的何維凌、朱嘉明、梁恆，都長期與反動分子有聯繫。」信裏還沒有點我和李湘魯的名字。趙紫陽在王芳的信上批示說：「如果情況是這樣，希望體改所與索羅斯脫鉤。」我看到這封信後，立即找到李湘魯和朱嘉明，請他們作調查，弄清是怎麼回事。

李湘魯專程到了匈牙利，朱嘉明專程到了美國，他們查了各種資料。我們反覆討論以後，用大量材料證明：索羅斯先生是真誠相信波普哲學的。他認為，一個發達的社會應該是開放的，而在開放社會中每個人都應該是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太懸殊，社會的不公很嚴重；斯大林模式的極權主義不符合人性，所以支持匈牙利的改革。後來，他對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表示讚賞，就在去年10月到中國建立了基金會。

今年，索羅斯在蘇聯建立了一個與匈牙利、中國的基金會相同的基金會，和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蕾莎會談後，與蘇聯文化基金會簽署了協議。接著，又和波蘭高等教育部簽署了建立基金會的協議。對比幾個基金會的協議，宗旨、內容幾乎都是相同的。而且，索羅斯本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沒有任和關係。

10月，我根據和李湘魯、朱嘉明的討論與調查的資料，寫了一個報告送給了鮑彤。報告寫了4個問題：第一，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成立的背景；第二，介紹了索羅斯其人；第三，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成立的宗旨和過程；第四，介紹了索羅斯先後在匈牙利、中國、蘇聯、波蘭建立基金會的情況，並附上了他與這些基金會簽署的協議。我還特別介紹了匈牙利人對索羅斯的讚譽。匈牙利人普遍把索羅斯看成一位偉大的愛國者，黨的領袖卡達爾任命的總書記格羅茲授予了索羅斯「國家英雄勳章」，

[583] 王芳 (1920-2009)，山東新泰人。時任公安部部長。

認定他對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他還和哈默一起在匈牙利成立了管理學院，為匈牙利培養人才。

顯然，王芳的報告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可惜我的報告送給鮑彤以後，鮑彤批轉給新任的體改委主任李鐵映^{【584】}，李鐵映卻把報告壓了下來，沒有轉給趙紫陽。李鐵映的說法是「既然紫陽已經批示，讓體改所與基金會脫鉤，就用不著解釋了。」誰知，當年11月，王芳又給趙紫陽寫了第二份報告，類似第一個報告，無非把問題說的更嚴重而已，並且在報告中點了我和李湘魯的名。趙紫陽再次批示，讓體改所與基金會脫鉤。

人大副委員長彭沖任理事長的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是個官方認可的對外聯絡組織。彭沖說：「可以請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於恩光^{【585】}接過來辦。」於恩光曾經擔任過新華社駐倫敦和紐約的首席記者，既有眼光學識，又思想解放。我向於恩光介紹了基金會的情況，他說：「像索羅斯這樣的美國富商，熱心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沒有理由停辦這個基金會。」他表示願意繼續把這個基金會辦下去。

我因為離決策太近，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又不致傷害外國朋友的感情，也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把基金會有效地辦下去，將基金會轉交給中國國際交流中心，是一個可行的辦法。我給索羅斯寫了一封信，索羅斯回信說，他「愉快地接受這一決定」，並認為「這個交流中心可以更廣泛地開展國際間文化、藝術、社會、經濟、政治的交流。」

1988年1月，於恩光接任了基金會第二任中方主席。此時，索羅斯應於恩光之邀，訪問了中國。彭沖以中國國際交流中心理事長的名義，在人民大會堂宴請了索羅斯，程思遠、鮑彤和我都出席了宴會。後來，到1988年8月，王芳又給鄧小平寫信，說趙紫陽支持的索羅斯基金會，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從事顛覆活動。那時，趙紫陽的秘書李勇緊張地找到我，讓我再寫一個索羅斯基金會的詳細資料，我問：「為甚麼又要寫？」他說：「現在有人要拿這件事找紫陽的麻煩。」

那麼，王芳為甚麼毫無根據地連續拿索羅斯基金會作文章呢？說起來，這真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恥辱。王芳在浙江省當公安廳長時，陳雲和李先念這兩個甚麼事也不幹的元老，經常住在杭州，聲色犬馬窮奢極慾，陳雲喜美食美聲，李先念則好美食美色，王芳鞍前馬後伺候的兩位元老無

【584】李鐵映（1936-），湖南長沙人。曾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電子工業部部長，時任國家體改委主任。

【585】於恩光，時任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不誇讚。不久，王芳提升為省委書記。李先念的秘書王維澄^{【586】}久居局級幹部之位，一直提不成個副部級，王芳即請其在浙江省委掛了一個兼職的秘書長。

很快，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陳雲、李先念立即抓住機會，讓王芳接任了重要的公安部長職位，又把一天都沒有在浙江上過班的王維澄提拔到中宣部當了副部長。顯然，王芳拿索羅斯辦基金會這件事不斷作文章，其用意十分險惡：要藉機把趙紫陽說成與國際敵對分子勾結，破壞無產階級專政，以阻止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確實，「六四」發生以後，他們的目的達到了。這些人哪裏還有一點國家利益的觀念，他們心裏想的只有個人的利害得失，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啊！

6-26 我和鮑彤說：「不出3年，你就會成為晁錯！」

鮑彤是一個令我敬佩的人，也是共產黨內難得一見的人才。從1984年我認識鮑彤開始，就沒見他有過甚麼休息。他每天從早到晚、夜以繼日、朝思暮想、一言一語，都是如何解決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個又一個難題。他多次和我說：「我們現在所作的一切，都只不過是使我們的認識和行為回到常識。」這個觀點看似簡單、平凡，實際上卻包含著多麼豐富、深刻的含義啊，要使中國的領導人認識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

自1986年9月，我到政改辦工作起，鮑彤就和所有的研究人員一樣，住在招待所，吃在招待所，工作在招待所。早上7點起床，夜裏一、兩點鐘睡覺，經常還徹夜不眠，沒有節假日，沒有休息日。鮑彤捨身忘家的工作精神、對各種問題的深刻思考以及善於總結歸納的能力，都給在一起工作的同事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到1987年7月終於形成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和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兩個重要文件。

7月去北戴河之前，鮑彤和我談，說十三大以後，政改辦會改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究室，希望我留下來擔任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但需「與以前的朋友斷絕來往」，我答應考慮考慮。鮑彤確實是一個幹事情的人，特別是他那隻生花妙筆無人能及，但他又有致命的弱點：他缺少大的歷史感，不懂得從政治力量的權衡中作出判斷；他雖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又太低估政治現實的風險；他有知識分子的激情，卻缺少政治家的冷靜。

【586】王維澄（1929-），浙江桐廬人。時任李先念秘書，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政策研究室主任。

從7月到9月，我們先後談了八、九次。主要的談話內容是：鮑彤希望我「與以前的朋友斷絕來往」，我表示「我做不到。」我想，他很可能因為許多人狀告何維凌，耽心類似的問題發生。我和他說，我是「友直友諒友多聞」，從不交「佞友」。若為了一官半職而失去人生的好朋友，這不符合我為人的道德。我現在是「進一步山窮水盡，退一步柳暗花明」，為甚麼呢？許多青年人希望我能為改革多作些事情，而在你這裏「進一步」就會捆住我的手腳。

鮑彤說：「你留下來，正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啊！」我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如果將來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重大問題由鄧小平拍板，則此事可為。否則，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政分開，就是分黨的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一大批當權的黨的官員，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必定會極力反對。他們會把對改革的不滿，變成對紫陽的意見發洩到你的頭上，而後來一個『清君側』！」

我加重語氣說：「這樣，不出3年，你就會成為晁錯。」鮑彤默然無語。為緩和氣氛，我說：「老鮑呵，講感情，我應該留下；講公事，我理應助你一臂之力。可惜，我不認為自己適合在這裏工作。我『進一步』就會被官僚化，成為官僚體系的『同體』；不能循規蹈矩，則早晚會被當作『異體』清除。如果你不想看見我在你這兒兩、三年就玩完，而是希望我再多幹些年，就讓我回體改所去吧。」

在北戴河，我和鮑彤又談了歷史上的改革。我說，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傾力支持，變法成功了，商鞅雖被車裂也值了；王安石變法雖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仍無法克服官僚體制的阻力失敗了；光緒的「百日維新」同樣是既得利益的反對，而曇花一現。現在我們改革遇到的「中梗阻」，就是極左路線形成的一批既得利益者，他們和元老裏的守舊派很自然會結合在一起，改革越往前推動會越艱難，要作長期韌性戰鬥的準備。

鄧小平非法搞掉胡耀邦以後，雖然指定了以趙紫陽為首的五人小組主持中央工作；又指定了一個七人小組，由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窮、姚依林、王震、伍修權^[587]、高揚組成，考慮十三大人事安排，關鍵是：解決幾個元老的去留問題與新的政治局常委如何組成。當時，「元老政治」是中國政治生活中一時難於改變的特色。在鄧小平的主導下，經過七人小組斡旋，最後決定：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退出中央政治局，但鄧小平仍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彭真則全

[587] 伍修權（1908-1997），湖北陽新人。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副總參謀長，時任中顧委常委。

退。鄧小平還說：「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也就是說，今後只有鄧小平一個人是常委之上的「婆婆」，他的決策地位不變。這也是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宣佈「今後重大問題還要向小平同志請教，請他拍板」的緣由。正像後來趙紫陽所說，胡耀邦和他當時擔任總書記只不過是個「大秘書長」。

十三大新的政治局常委開始提出7個人，即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姚依林、胡啟立、田紀雲。後來被善搞陰謀的姚依林，用計弄下去了主張改革的萬里和田紀雲，常委成了5個人。趙紫陽3次提出自己仍願意擔任總理，但鄧小平說：「如果一年換兩個總書記，國內、國際形象不好，總書記不動了。看來，李鵬的爭議比較小，就由李鵬擔任總理。」由於李鵬不懂經濟工作，所以仍由趙紫陽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

北戴河是夏季休閒、療養的勝地，海邊分北區與南區。南區的北邊是國務院各部委的夏季辦公、休養地點，再往南才是一般民眾可以活動的地方，游泳的人多得像下餃子一樣。北區的南邊是一棟棟小樓，供部長以上的領導人和家屬使用，政改辦來的人就住在這個區；而再往北則是國家領導人的住的高級洋樓，這裏警衛森嚴，一般人進不去。鄧穎超^[588]當時就帶著李鵬，往這些高級洋樓裏一個一個地拜訪那些黨國元老，請求他們的支持。

當我得知李鵬將擔任總理時，心想：這下完了，中國的改革恐怕要走曲折的路嘍！當天晚上，我和幾個朋友議論起李鵬，大家都搖頭不止，因此一起喝醉了酒。因為從李鵬留蘇到任水電部副部長再到任教委主任，人們都對他的人品、學識、能力頗有非議。據熟悉他的人說：李鵬在莫斯科讀書時，每門功課都不好，字寫得像狗爬，外號「官迷」，同學們沒人看得起他。而李鵬在水電部當副局長升任副部長後，與他在一個局工作的兩個老局長怕受他打擊，立即辦了退休。李鵬和夫人朱琳^[589]訪問捷克斯洛伐克時還開了笑話，朱琳離開賓館前說自己的寶石項鍊被偷，人家的警衛人員很緊張，找來狼狗探尋，結果在沙發縫中找出來了一串假項鍊，很丟人。李鵬任教委主任後，重用的又都是些左的可怕的人；如果說李鵬這個人「無德無才無學無識」一點不錯，但他在拉幫結派搞陰謀詭計上可不可小覷。

[588] 鄧穎超 (1904-1992)，河南光山人。周恩來夫人，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等職務。

[589] 朱琳，上海人，李鵬夫人。

我抽空在北戴河找樸方，談了維凌的事。我說：「你們是老同學，像維凌這樣憂國憂民、有才有識的人，雖然各方面非議很多，他自己也有不當之處，但總應該幫他一把。我那兒是矛盾交集的地方，你幫幫他吧。」樸方慨然地答應了，他說：「你跟他說，我和他『約法三章』，一隻做買賣，二不搞政治活動，三言行要有所收斂。哪有上陣打仗不穿盔甲的呵！」回到北京，我把維凌和中美中小企業聯絡處的關係轉到了樸方那裏。

6-27 從「百人座談會」到中共十三大

8月10日，趙紫陽提議召開一個「百人座談會」，坐下來討論修改為中共十三大準備的政治報告。8月20日會議召開，參加會議的人分成了4個組：第一組是黨群政法，第二組是政府部門，第三組是新聞界，第四組是地方幹部。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分到各個組聽取意見，我負責會務則到各組都聽一聽。

會前，薄熙來^[590]、王滬寧^[591]先後來找我。薄熙來是薄一波的長子，在遼寧金縣任副書記，他主動找我請教基層工作的經驗，我們交談了一上午，看來他很有幹一番事業的雄心，我建議他要充分利用大連的旅遊資源對外開放。王滬寧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任教，很有頭腦，他來找我主要是交流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我們都認為，應當「以黨內民主推動社會民主」，而「黨內民主要從建立程序、制度、規則作起」，彼此很有共識。

我著重聽了第四組的討論。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說：「這個報告好就好在是一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他建議，加上發揮中心城市作用的條文。他說：「城市不活，企業難活，市場難活。中央應該一隻腳在省，一隻腳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應該一隻腳在企業，一隻腳在區鄉。」他私下和我說：「如果把權力下放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改革就會得到地方大員的支持。把黨政分開作為重點，會引起黨的幹部誤解和不滿。」

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也說：「應該把權力下放而不是黨政分開擺在首位。」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592]說：「報告說『關鍵是黨政分開』，上層說得比較明確。省、市、縣怎麼辦，就說得不清楚，誰是老大？誰是一把手？職責要明確，位置要明確。」江蘇省委副書記孫家正說：「民主是一個過程。」

[590] 薄熙來（1949-），山西定襄人。時任中共遼寧金縣縣委副書記，後任大連市市長、遼寧省省長、商務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591] 王滬寧（1955-），山東萊州人。時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後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副主任、主任、書記處書記。

[592] 董朝才（1932-2006），浙江江山人。時任溫州市委書記。

黨的職能、地方黨委職能要寫明確。」西安市委書記董繼昌^[593]補充說：「地方黨組織的職能沒有寫清楚，如何保證黨的政治領導？」

煙台市長俞正聲說：「地方的黨政分開要具體化。但現在條件還不成熟。」他建議：「地、縣設黨的書記處，領導黨的日常工作，黨委常委的召集人進入政府，通過常委會實行政治領導。中央也可以實行類似的體制。」他還說：「要強調民主監督與民主決策，不能迴避制約關係。沒有監督的效益，可能是錯誤的。」瀋陽市長武迪生質疑：「從黨包攬一切走到黨是政治領導，這一步變化太大了，承受能力恐怕不行。」

天津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張煒^[594]提出：「企業家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他說：「一定要形成民主決策，有些效率不能要，像搞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的那種效率。不承認制約是不現實的。黨政分開講得好！」蛇口開發區黨委書記袁庚則表示：「目前報告能寫成這樣，已經是難乎其難了。一定要發展民主！」首都鋼鐵公司總經理趙玉吉^[595]、大慶油田黨委書記王志武^[596]也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權力下放。」鮑彤解釋說：「講黨政分開是首要關鍵，因為小平說的切中要害。」

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先後討論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趙紫陽說：「提出黨政分開以後反映強烈，相當多的省委書記反對。」習仲勳說：「黨政分開是歷史性轉折。」薄一波說：「總的來說，比較適當。」9月27日，鄧小平批示：「完全贊成。」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這個《設想》。我特意參加了軍隊組的討論，當時宋時輪轉身問他身後的秘書：「為甚麼不提階級鬥爭？」秘書小聲說：「小平同志已經批示『完全贊成』了。」宋時輪大聲說：「我也完全贊成！」

1987年10月25日，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北京成功召開。鄧小平主持了開幕式，趙紫陽作了《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確定了經濟發展分三步走的戰略，提出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設計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即實行黨政分開的領導體制，並指出執政黨要經受改革開放的考驗，走出一條不搞政治運動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新路子。

[593] 董繼昌 (1930-)，陝西韓城人。時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兼西安市委書記。

[594] 張煒 (1955-)，湖北武漢人。時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後任天津外經貿委主任，「六四」事件中憤而辭職；留學美英，現任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595] 趙玉吉 (1954-)，時任首都鋼鐵公司總經理。

[596] 王志武 (1932-)，陝西寶雞人。時任大慶油田黨委書記。

趙紫陽的報告，首先系統論述了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且這個階段至少要上百年。這個論斷表示：中國是在搞社會主義，但還處在初級階段，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制定工作目標和方針，而不能超越。根據這個基本國情，確定的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趙紫陽接著論述了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1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關於經濟體制模式，趙紫陽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新的經濟運行機制應該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把國家、市場、企業三者關係的重點，放在市場方面；同時指出，要「通過國家和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按照等價交換原則簽訂訂貨合同等多種辦法，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應逐步轉向以間接管理為主。」

趙紫陽還第一次向世人公開了，被鄧小平稱之為「藍圖」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趙紫陽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過程，應該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黨中央認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而我國政治體制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遠未肅清。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興利除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此，趙紫陽提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而「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並圍繞著近期目標，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8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關鍵是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其含義是：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黨應當保證政權組織充分發揮職

能；理順黨組織與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司法、群眾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其他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使之各司其職，並制度化。

第二，「進一步下放權力」，過去，「上層領導機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陷於事務主義，」而「基層又缺乏自主權」。所以，「凡是適宜下面辦的事情，都應由下面決定和執行。」「下放權力必須以擴大中心城市和企事業單位的權力為重點。」

第三，「改革政府機構」，過去，「政府機構龐大臃腫、層次過多、職責不清、互相扯皮」，所以要「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政府機構」，並「加強行政立法」。

第四，「改革幹部人事制度」，重點是「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對各類人員實行分類管理」。

第五，「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要「及時地、暢通地、準確地做到下情上達、上情下達、彼此溝通、互相理解」，使得人民「建議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說」，要做到「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第六，健全若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包括：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能，加強立法和監督；加強政協組織建設；理順黨和行政組織同群眾團體的關係；依法堅持差額選舉制度；抓緊制定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法，建立人民申訴制度。

第七，「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應當逐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使各方面關係走向制度化、法制化。

第八，「黨內民主和改革」，「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切實可行、易於見效的途徑」，要建立中央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定期報告工作的制度；增加中央全會每年開會的次數，使中央委員會更好地發揮集體決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工作規則，使集體領導制度化；加強對黨的領導人的監督和制約；地方各級黨組織要要建立和完善議事規則、表決制度和生活會制度；改革黨內選舉制度，明確規定黨內選舉的提名程序和差額選舉辦法；制定保證黨員民主權利的條例。

趙紫陽的報告贏得了與會代表長時間的熱烈掌聲。他們稱讚說：「紫陽的報告出乎想像的好！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有份量的宣言，是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綱領。」當晚，根據代表的意見，由鮑彤主持十幾個人參與修改了報告，我們一直工作到凌晨五點，修改了186處文字。我回到賓館，想泡個澡解解乏，誰知竟在澡盆裏睡著了。直到清理房間的服務員叫醒我，說：「您怎麼在澡盆裏睡著了，會出事的！」我

驚醒了，一看已經8點了，急忙趕到會場，幸虧沒有耽誤開會。袁庚見到我，熱情地緊緊握住我的手說：「這個報告難能可貴！難能可貴！」孫恆志告訴我：「江澤民^[597]要見見你。」我到了上海團會議室，江澤民趨前兩步，握住我的手說：「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一諮同志，這個報告好啊！」可惜的是，既使「六四」以後，鄧小平還說：這個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十三大制定的路線不能改變，誰改變誰下台。」但往後的20多年來，十三大通過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不僅沒能實行，而且還有所倒退。

在十三大選舉中央委員的前兩天，我得知鮑彤放在了「候補委員」名單裏。我立即告訴了鮑彤，他還不相信。我說：「你趕快去瞭解，再晚就該選舉了。」他一瞭解，果然如是。鮑彤和我說：「紫陽告訴我，為了今後有利於開展工作，給我安排了中央委員，怎麼又成了候補？」我說：「你快問問紫陽。」選舉前一天，趙紫陽從天津回到北京，鮑彤找他說：「十三大開完，我就不再作這個工作了。」趙紫陽訝異地問：「為甚麼？」鮑彤講了所知道的情況。趙紫陽說：「給你安排當中央委員已經定下來了，怎麼搞得又變了？」立即打電話詢問，回答是「鮑彤確實在候補委員名單上」。趙紫陽又問：「誰給改的？」對方支支吾吾。趙紫陽說：「鮑彤不擔任中央委員，今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誰來主持？立即改回來！」這樣，第二天選舉中央委員時，鮑彤的名字出現在候選的中央委員名單上，他也順利地當選了。這就是當時的中國政治。

還有兩件事：一件是，在候選的中央委員名單裏，有朱厚澤與王忍之。但在候選人的介紹中，故意隱去了王忍之在文革時，當過「四人幫」寫作組重要成員的歷史。結果，王忍之比朱厚澤多一票當上了中央委員，朱厚澤落選了。另一件是，已經內定出任政治局委員的鄧力群，卻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落選，可能是他過左的言行、特別是批胡耀邦，引起了黨內很多人的不滿。張煒見到我，高興地說：「鄧力群落選真是大快人心！」

鄧力群沒能當選中央委員，在上層引起了相當大的震撼，特別是引起了陳雲派系的不滿。但鄧小平發話說：「承認選舉，不做變動。」後來，採取了一個補救辦法：安排鄧力群當中顧委常委。但在中顧委差額選舉時，胡喬木和鄧力群是得票最少的兩個人，鄧力群又一次從常委中落選了。鄧力群的落選，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重用的一批左派，卻被主管人事的宋平，後來安排到了一些重要部門工作，並一個個都受到了提拔。

[597] 江澤民（1926-），江蘇揚州人。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六四」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

總的來說，中共十三大開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扭轉了年初反自由化的左傾局面。政改辦的工作人員都參加了中共十三大的開幕、會議、討論和閉幕。經過十五個月的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及其辦公室，完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任務，並在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政治報告中寫上了其要點。這個設想雖然不可避免地有著歷史的局限，但希望通過和平改良的方式，使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努力，卻有著十分積極的價值。

在十三大召開之前，6月，我請高山負責，把研討小組和政改辦的所有文件、資料整理出來。這是一段珍貴的歷史，不僅對研究有用，而且可供後人借鑒。11月初，這項工作完成了，高山下了不少功夫，編了一本《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文件彙集》。包括：從1986年9月18日趙紫的信到1987年11月1日中共十三大結束，其間各次研討、會議、座談的記錄，文件，簡報以及中央、地方、領館上報的資料。我建議鮑彤在內部印150份，送給有關人員，以留下歷史的記錄。可惜，鮑彤當時沒有同意，這些資料如果還保存著是很珍貴的。

6-28 10年改革的基本經驗：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

中共十三大結束時，鄧樸方讓我轉告趙紫陽，建議他「要注意和萬里、李瑞環、江澤民、丁關根^[598]搞好關係。」我告訴鮑彤後，鮑彤問我：「樸方為甚麼提出丁關根？」我說：「我不清楚，只是原話轉達。聽樸方說，丁關根和小平同志打橋牌時，腦子像計算機一樣，特別好使，小平同志很欣賞他。」我直接向趙紫陽說了樸方的話，他非常感謝。趙紫陽問我：「為甚麼不在政研室幹了？」我說：「身體不行，難以適應。」

接著，我向趙紫陽提了三條建議：

第一條是，餘熱發光。現在規定，副部級60歲、正部級65歲退休，他們中除了身體不好和不贊成改革的人，其他80%以上的人還能發揮餘熱。若能在他們退休時，根據其特長適當培訓，就可以到企事業單位擔任董事長一類的職務。這樣，會使他們從退下來沒事作而非議時政，變成一股改革的力量。蔣經國執政之初，許多人都是他的長官和長輩，很難辦；後來他就採取這種辦法，讓他們到企業、公司、學校去任職，變改革阻力為動力。

[598] 丁關根 (1929-)，江蘇無錫人。時任鐵道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第二條是，培養人才。現在的大學生、研究生中，有很多人想為改革出力，但覺得「報國無門」。可不可以每年從他們中選拔1萬人，一考經濟社會政治基本知識，二考時政與策論；成績及格，就讓他們擔任副縣一級職務；由他們自己選擇到農村、工廠、機關、學校去磨煉。一年優秀的有20%，積之10年就是兩萬人，他們都會成為改革的力量。台灣現在縣一級的領導人，大多是大專以上學歷，不少還是留洋回去的優秀生。

第三條是，提拔優異。在中央工作表現優異的中青年幹部，提半級下基層任職磨練；幹得好就調回中央再提半級。而在市、縣級表現優異的中青年幹部，也可以提半級到中央工作；幹得好就再提半級到地方去作領導工作。這樣做，既有利於中央與地方上下溝通避免脫節，又有利於幹部深入實際、開闊眼界，可以培養一批將才、帥才。

趙紫陽說：「你的意見很有道理，可惜我不管幹部工作。」我說：「您作為總書記，理應有辦這些事情的權力。」他笑笑說：「一諮啊，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啦！」想起中國還是「老人政治」這個特點，我還能再說甚麼呢？

8月時，趙紫陽曾和我說：「10年來，我們的基本經驗是甚麼呢？我看是兩條：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兩者是缺一不可的，前邊加上社會主義就是要講公平。我們是追求社會主義的，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防止那些說大話、空話的人誤國。」我心想，趙紫陽是個難得的明白人。但他擔任總書記，既沒有人事管理權，又將把經濟管理權交給李鵬，這個總書記也實在難當。

我和孫方明合著了《政治體制改革一百問》，還請薄一波寫了序言，中共十三大召開後，11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還獲得了國家圖書獎。12月，又以我和陳福今的名義，由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政治體制改革講話》一書。出版這兩本書是為了宣傳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各部委、軍隊、院校，也不斷請政改辦的研究人員作報告，一時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但懷疑、反對的聲音也從各方面傳來。

考慮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艱巨性與長期性，我離開政改辦之前，與鮑彤商議，為了培養一支隊伍共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民間組織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具體運作可以由中央黨校負責，請各省市政研室、黨校以及學校的專家學者參加。幾天後，鮑彤同意了。我去中央黨校和陳維仁、史維國、杜光幾經磋商，議定了這件事，他們同意由中央黨校籌備主辦。

鮑彤說：「秘書長這個位置，我給你留一年！」15個月的日日夜夜，使我和鮑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在工作中也一直盡力與他配合。臨別了，我直言不諱地說：「老鮑啊，你在共產黨裏也算鳳毛麟角了。你還記得，我和你說的我是在寫《多餘的話》嗎？」他笑笑說：「歷史把我推上了這個位置，即使粉身碎骨也只能在所不惜了。」我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景不容樂觀，一定要知機，要『揣揣小心，如臨深谷』啊！」

鮑彤感歎地說：「那你不幫幫我？」我歉疚地說：「我這一年多已經是勉為其難了。說心裏話，我不適應這裏的工作。我一是身體不行，二是不願被管得死死的。回到體改所，我就靈活了。不過，我倒給你考慮了一個秘書長的人選。」鮑彤問：「誰？」我說：「陳曉魯！他的器識才學都比我強。」鮑彤說：「曉魯是高幹子弟啊。」我說：「洪虎不也是高幹子弟嗎？可以在體改委當秘書長。曉魯是個難得的人選，為甚麼就不行？」

鮑彤問我：「你覺得陳群林怎麼樣？」我說：「你太注重文字能力不行。群林在反自由化時來回動搖，人品學識都難以和曉魯比。」他說：「我再考慮考慮。」接著，他又問我說：「萬里即將出任人大委員長，想在懂經濟的學者裏找兩個人當人大常委，你有甚麼想法？」我說：「要我看，厲以寧和董輔弼就是兩個最好的人選。」他說：「你自己呢？」我說：「我回體改所順理成章。」後來，萬里接受了這兩個人選。

離開政改辦前，我和鮑彤一起在中南海小放映廳，看了一場內部放映的《南北亂世情》，演的是美國南北戰爭的故事。看電影的只有薄一波、胡啟立、鮑彤和我幾個人。放映結束，我感歎地說：「當年國民黨戰敗，若也能像南軍那樣，戰敗的將軍、士兵還能自由自在地活動，中國今天也許會好得多。」薄一波瞪了我一眼，說：「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是缺少階級鬥爭的觀念！」我心想，中國還不就是讓不斷的階級鬥爭搞壞了嗎！

看來，人到了一定年紀，很難擺脫歷史陳舊觀念的束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成王敗寇」，發展到共產黨不斷地搞「階級鬥爭」，以致在共產黨內、老百姓中都遭到慘酷折磨，弄得「你死我活」，一個國家還怎麼能搞得好呢？我的祖父就說過：「年事既長之人，於半生經歷，偶一閉目回思，即得以往之像。如水之行波，相推相抑，無時或止。惟其然也，故改造之為難。」其論深含哲理，不可不明查啊。

第七章「勝利大逃亡」(1987-1989)

——人員實行「三三制」，推出「三江一海戰略」

雖然中共十三大的召開看似改革力量佔了上風，實則上層反改革的力量已經控制了各個要害部門。如何從困境中找到出路，就成為一個很大的難題。

7-1 改革態勢不容樂觀，丫丫成長令人欣慰

1987年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閉幕。胡喬木可能是因為在選舉中的挫折，無奈地黑沉著臉和趙紫陽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站不住腳的。」胡喬木是個典型的宮廷刀筆吏，他對上很會阿諛奉承，對下則頗指氣使，多年來整人無數。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貝際波說：「文革時就數胡喬木給江青寫的效忠信最多、最肉麻。批鄧時，他又禁不住壓力，把和鄧小平私下的談話都揭發了出來。改革開放以後，胡喬木更成了打人的第一根棍子。」

鄧小平之所以啟用胡喬木，是為了借重胡喬木給毛澤東當了20多年的秘書，有「黨內第一支筆」之稱，用以強化自己的正統地位。其實，鄧小平和毛澤東在政治上是一脈相承的，1957年的反右是鄧小平主持的，從此中國成了「左派」的天下，所以後來給右派摘帽時不叫「平反」，還留了個小尾巴。1959年開始的中蘇論戰也是鄧小平主持的，為中國又培養了一大批「左派」。這些「左派」後來都成了中國形成左傾局面的基礎。

中央辦公廳的朋友說，在中南海小餐廳吃飯時，鄧小平經常愛和陳雲坐在一個桌子對面，鄧小平耳背，陳雲就伸過頭去說話。毛澤東一進餐廳，陳雲立即把頭縮回來，鄧小平和陳雲就像老鼠見到貓一樣，誰也再不說話，只是埋頭吃飯。可見毛澤東當年是何等的霸道。鄧小平雖無毛澤東當年之威，一句「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陳雲、李先念也只能退避三舍，怪不得當年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就強調要「反對封建主義和流氓無產者」了。

陳雲在延安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時，就有「小斯大林」之稱。後來，又被稱作「中國的經濟沙皇」，在人事和經濟部門有極大的影響力。在「四人幫」垮台以後，陳雲主張平反冤假錯案，主張實事求是發展經濟，對改

革開放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他提出「鳥籠經濟」，希望把中國經濟「調整」回 50 年代的作法，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當經濟改革深入以後，陳雲還一直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就成了改革的阻力。

如果說陳雲為人陰摯老辣，但還有一定求實精神的話，另一個元老李先念則始終是不贊成改革的。文革中，毛澤東打倒了除李先念以外的所有副總理，「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等，那些經濟領域極左的作法，很多都是李先念主持制定的。所以，從農村改革開始，李先念對每一項改革措施幾乎都極力反對，認為會否定了自己。他對堅持改革的領導人一直懷恨在心，以致後來拒絕參加胡耀邦的喪禮。

前文講過，陳雲、李先念利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機，已經重新控制了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公安部，姚依林則一直掌握著國家計委。而趙紫陽當代總書記後，由李鐵映擔任了體改委主任。李鐵映曾留學捷克斯洛伐克，是李維漢與金維映之子，一直從事技術工作，後來擔任過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老書記郭峰和基層對他評價都不好。他上任後就抓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希望搞環環相扣的配套改革。其實，這是技術官僚的通病。

為甚麼這樣說呢？一般技術官僚上任後，往往想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程式化。當然，自然科學的方法對解決社會問題有借鑒意義，像考慮「初始條件」、「邊界條件」對運動主體的約束，等等。但離開社會的實際運行，照套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很難成功的。李鐵映專門找我說：「你們所，一要好好研究陳雲的經濟思想，二要積極參加我組織的總體規劃。」我只能沉默不語。

在所務會議上，大家都不同意這個看法。一者，陳雲的經濟思想的確在 50 年代起過積極作用，但明顯不適合當今經濟發展的形勢；二者，搞總體規劃有參照作用，但研究的重點還應該是改革的難題。我向安志文談了所裏討論的意見，志文說：「你們有自主權，委裏的看法僅供參考。」後來，聽朋友說，一次李鐵映在國務院小食堂吃飯，見李鵬走過來，站起來拍著李鵬肩膀說：「哥們兒，來一塊吃！」李鵬拉下臉說：「公開場合，不要這樣！」可見兩人關係非同一般。

11 月 2 日，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為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為總書記。11 月 7 日，趙紫陽與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全體成員，在中南海紫光閣合影留念以後，我懷著既輕鬆又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體改所。小強很關心地問我：「老陳，你

怎麼回來了？留在政研室不是挺好嗎？」我說：「我可以留下來，但留之無益。」小強詫異地問：「為甚麼？」我說：「過幾天我告訴你。」

母親一直得不到我的消息。這一年10月，由三妹一謀陪同到北京來看我。是啊，一年多沒給母親寫信，也沒有聯繫過，實在不孝。可母親哪裏知道，我每天忙得連吃飯時都經常在辦公啊。政改辦的工作一天都不能停，我只能請小強幫忙照顧母親。小強真是仗義，為老人家安排了豐富的活動，在北京參觀名勝古跡，還去了北戴河。母親和三妹住在紫竹院社科院借給我的房子裏，我竟抽不出空陪老人家，哪怕聊一個夜晚，真是遺憾。

丫丫也一樣，雖住在北京，也見不著面。丫丫長得很秀氣，人又沉靜，還頗有些頭腦，奶奶十分喜愛她。從政改辦出來，我去看丫丫。她已經隨著姥姥搬到婦聯在東單的宿舍了。小傢伙一轉眼已經十歲了，居然看了金庸的《雪山飛狐》，能給小朋友們從頭到尾講下來。她問我：「爸，你這個所長怎麼那麼忙啊？你和《四世同堂》裏那個管妓女的所長大屎包差不多吧？」我苦笑著說：「差不多！差不多！」

丫丫從小就很有愛心，我給她買的小人書、紀念郵票，一套中往往最好的就送給小朋友了。我問她為甚麼，她就會說：「我喜歡的，小朋友也喜歡。送給他們，他們就很高興。」我聽了也很欣慰。她喜歡文史，特別愛看歷史故事和武俠小說，但不喜歡數理。我和吳琰說，不要老給她改作業，要啟發她內在的動力。我說，小學、初中時往往女孩子成績好，到高中男孩子就上來了，為甚麼？就是因為女孩子小的時候接觸社會面少。



一天，我和丫丫說：「爸爸小時候每周都有一天去釣魚、摸蝦、抓蚰蚰，可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你以後每天1小時做完作業，哪怕只得50分，爸獎你一個紅五星，剩下的時間就去玩；如果兩小時做完作業，得70分，不獎不罰；要是3小時才做完，就是得80分，也罰一個黑五星。得3個紅五星獎一面小紅旗，周末送你一個

小禮物；得3個黑五星罰一面小黑旗，周末打掃家裏衛生、洗碗，勞動一天。」丫丫同意了。

3個月後，丫丫的各科成績提高了不少。我給她的獎勵僅限於買畫冊、畫筆和書籍，以利培養她的特長。後來，她畫的一幅水墨畫《遠望》得了獎，登在一家雜誌上，還得了二十元獎金。她一天和我說：「爸，能不能送我一瓶法國香水？」我說：「一個小孩子還買甚麼香水！」她說：「就是東單街頭兩塊錢一小瓶的那種！」我笑著答應了。

7-2 《立足於打持久戰，著眼於打攻堅戰》

1987年11月中旬，我經過反覆思考，又和小強交換了意見，他很同意我的看法。而後，我在所務會議上做了一個報告，題目是《立足於打持久戰，著眼於打攻堅戰》。我說，從1978年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討論，實行改革開放到現在10年了。儘管鄧小平、趙紫陽都再三表示對改革的堅定信念，儘管民眾對改革寄予的期望已使中國處於非改不可的境地，但改革走到目前這一步究竟應該怎麼辦？人們分歧很大，議論紛紛。我談了自己的看法與大家探討。

我先對當前的局勢作了一個簡要的分析。我說：中國改革的難度已經日益顯現出來。目前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正如那些先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大家都希望改革搞得好一些、快一些，這是正常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評論改革、關心改革，也是正常的。一些人對舊體制的弊端有認識，但對建立新體制的難度認識不足，因而由「速勝」導致「悲觀」；一些人不能從實際出發，「屁股坐在計劃，腦袋想著市場」，對現實乃至改革方略發生了懷疑；一些人過於理想，一旦面對某些消極現象就產生了困惑。

可喜的是，我們所大多數人還是能從10年艱難複雜的歷程中，認識到改革所無法迴避的一系列深層次的難題，客觀、冷靜地總結改革的成敗與得失。應該說，10年的改革開放對於我們國家和民族來說，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不僅在於經濟的增長，不僅在於解決了溫飽問題，不僅在於人民得到了實惠，更重要的是人們進一步解放了思想，並且結束了我們30年來閉關鎖國和全面停滯的局面，開闢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只要回顧一下1978年以前，就會看到我們在改革的道路上已經走的相當遠了。舊體制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猛烈衝擊，新體制的因素也正在發育成長。如今企業的自主程度、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程度以及國家開放的程度都是10年前難以想像的；民眾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社會生活諸多方面享受到的自由，也是10年前難以想像的。全黨和全國思想觀念的

突破，使我們明確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

雖然我們面臨著通貨膨脹、產業結構不合理、企業負盈不負虧、少數公職人員貪污腐敗、市場秩序不健全等一系列嚴重問題。但是，不能不承認，這些問題的發生是在解決了吃不飽飯和衝擊了舊體制後發生的，是改革進程中新舊兩種體制並存的情況下形成的。我們說，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退回到舊體制更沒有出路。用今天對問題的某些認識來否定 10 年改革，就像成年人對自己青少年時代採取一概否定的態度一樣，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我們面臨著發展模式的雙重轉軌。一個方面是從溫飽型發展模式向小康型發展模式轉軌，原來為使人們得到溫飽而形成的產業結構需要在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調整，往往這種調整又總是滯後於人們需求的變化，而且在溫飽有餘之後需求的多樣化、貧富差距的加大和人們提高政治參與程度的要求都會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另一個方面是由封閉型發展模式向開放型發展模式轉軌，既要作到使原有的封閉系統和外部的開放系統銜接，又要使原有體繫在不發生較大震盪的情況下和外部世界結合，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變革。

同時，我們面臨著體制模式的雙重轉軌。一個方面是從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模式轉軌，這本身就是整個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決非簡單地調整價格訊號就能作到，它後面有一系列制度因素需要變革；另一個方面是從集權制度模式向民主制度模式轉軌，這更涉及一系列權力的調整。如果說第一方面是利益組合方式的全面變革，那麼第二方面則牽扯到權力的複雜調整。所以，體制模式的雙重轉軌必然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比發展模式的雙重轉軌更加困難和複雜。

我接著說，大家都讀過薩繆爾遜的《經濟學》，他在書中寫的這個故事大家應當記得：當普朗克得到諾貝爾獎時，人們向他祝賀說「祝賀你獲得了諾貝爾獎，反對你理論的人終於承認你的理論了。」普朗克笑笑說「不是反對我理論的人承認了我的理論，而是他們死得差不多了。」後人把這個故事叫做「普朗克效應」。我看，中國改革的「普朗克效應」，最少也要到四、五十年以後，也就是下個世紀三、四十年代。

10 年改革方方面面的嘗試，使舊體制未能發揮的潛力得到了空前的調動，既使改革取得了成效，也使深層次的難題浮現。目前，不可能寄希望於一種風險不大而又能收效很大的改革措施。改革開始的「黃金時期」結束以後，每走出一步具有實質意義的改革，都是有較大風險「啃硬骨頭」

的攻堅，都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決心，付出更多的智慧和努力。改革要在持久的進程中打攻堅戰，而攻堅也具有持久的性質。

在《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一書中，將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躍遷的進程劃分為幼稚階段、成熟階段及加速階段。在第一階段，主張現代化的領導人都是優秀的各盡所能主義者，充滿改革的熱情和勇於開拓的精神；但由於缺乏前例，他們雖然進行了各種艱苦的探索，為社會變革積累了經驗，並不會贏得全面振興的局面。當經濟體制、法律體制、教育體制、幹部體制、政治體制、文化觀念等都進入成熟階段，現代化才會加速。

我認為，我們必須要首先立足於打持久戰，同時要著眼於打攻堅戰。客觀條件不成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是有限的，「欲速則不達」嘛！為長遠考慮，我提議所裏的研究人員實行「三三制」，1/3 留在所裏作一些急需的和長程性的項目；1/3 出國留學、進修、提高；1/3 到基層，尋找改革的突破點，並可以到地方任職增加實際工作能力。我講話後，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可喜得是，所裏的骨幹都很贊成我的意見。

很明顯，久屯精兵於堅城之下必然會師老兵疲。正面攻不行，何如側面攻？根據大家的反覆討論，我說：現代經濟史、經濟哲學講到「斑疹效應」，從幾個點連成線再到面，而後擴及全身，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推進改革。我提出了一個「三江（疆）一海戰略」：比鄰香港的深圳如果能建立新體制，就有利於珠江三角洲建立新體制框架；上海浦東若能建立新體制，就可以推動老上海和長江三角洲建立新體制框架；新疆的開發，是中國又一個潛力大、收效快的區域；渤海經濟區的開發，是又一個著力點。

所務會議經過幾次討論，通過了我提出的人員實行「三三制」、推行「三江一海戰略」的意見，並進一步研究具體的實施方案。全所人員熱氣騰騰地在作著戰略大轉移，當時我們的這種戰略調整被北京的許多朋友們稱作「勝利大逃亡」。

7-3 應羅德丞之邀赴香港考察

11 月底，李湘魯告訴我，香港的羅德丞^[599]想邀請我去考察。我問為甚麼？他說，羅德丞在香港的名門望族中名聞遐邇，這個家族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執業律師。羅德丞的父親羅文錦被港英政府封為爵士，羅德丞自牛津大學畢業後即承父業在港開律師樓。羅德丞先後擔任了香港律師會會長、立法會和行政局議員，但他為了在香港回歸後當上第一任總督，1985

【599】羅德丞（1935-2006），香港人。曾任香港律師會會長，香港立法局、行政局議員，時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年又辭去了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擔任了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湘魯說：「我和維凌、嘉明都和羅德丞接觸過，這個人為人耿直豪爽、敢作敢為，又非常愛國，在香港政法商界影響很大，值得一交。你也順便去香港看看，我可以給你從深圳辦一個出境證，10天就足夠了。」我同意了，1周以後，湘魯給我辦好了手續。12月初，我到了香港。羅德丞開著他那輛掛著「18」號車牌的著名「老爺車」（勞斯萊斯），招搖過市地到羅湖來接我。羅德丞一路滔滔不絕地說著話，還不斷與路邊的民眾打招呼。

看來，這個人很會「作秀」，但他確實很爽快。他說，他看到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認為香港要回歸中國，只有和中國政府打好交道，才能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就辭去了在港英政府的職務，多次到北京拜訪各界名流，受益非淺。後來聽湘魯、維凌不斷說到你，就想和你結識一下。我說，我對你不起甚麼作用。他笑著說，我只想和你交個朋友。「老爺車」開得很慢，所過之處都有民眾向他招手。

讓人驚歎的是，一個彈丸之地的香港，竟建設的如此繁盛。車開到半山麥當奴道「惠苑」停了下來，這裏是他的家。他安排我住在他的豪華公寓裏，生活起居自有僕人照應。我在按摩浴裏泡了一會兒，小酣片刻，旅途勞累即時頓消。客廳足有200米大，一面牆的玻璃外邊即是碧波萬頃的大海，廳內茶水、咖啡與各種水果，都擺在大茶几上。

羅德丞說，要為我接風，請我到外面去吃飯。他問我：「要不要請一些名人陪同？」為少惹麻煩，我婉言謝絕了。他笑著說：「你們大陸當官的太謹慎了，什麼人都要接觸才能瞭解民情嘛！」我說：「我這次來也沒向上級彙報，以不暴光為妙。」他連說：「理解，理解！」車開到美軍俱樂部停下了。他說：「這個俱樂部只有會員才能來，是香港上流社會聚會吃飯、喝酒的地方。」

果然，裏面極其考究，菜單裏都是一些西方名菜點。由得羅德丞去點菜，讓我這個老土開開葷。就餐時，不斷有人來敬酒。我們一人要了一套菜，喝了兩瓶紅酒，結賬時竟花了近兩萬港幣，嚇了我一跳。羅德丞笑著說：「香港很多地方學的英國，是很講究身份和地位的。同樣的菜品在不同的地方價格會差上一、二十倍。」飯後，他帶著我欣賞了香港的夜景。

第二天，他帶我參觀了以他父親命名的羅文錦律師樓，遊覽了中環。中環對我刺激最大的是銀行、公司，凡是像模像樣的都會註明是「上海遷港」。是啊，令人深思的是，作為「亞洲第一明珠」的上海失去了光彩，才造就了香港呵。中午，羅德丞請我在一家叫做富客臨門的酒家吃飯，有

兩個何性的親戚陪同。原來，羅德丞的父親娶了香港第一世家何東的長女何錦姿為妻，香港賭王何鴻燊為其表兄。我們4個人一餐飯竟吃了近5萬多港幣。座中一個青年叫何向亮，是何香凝的侄孫子，羅德丞請他過兩天陪我參觀幾個市場。

第三天，羅德丞帶我拜會了香港經濟司司長陳方安生^{【600】}。羅德丞介紹說，她的祖父方振武乃抗日名將，她本人辦事精明果斷，乃香港政界之翹楚。聽她介紹了3個小時香港的經濟情況，條分縷析、歷歷在目，確為一不可多得的人才。因香港的公務員大多由香港大學培養，下午我特意拜會了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601】}。王賡武係著名歷史學家，由新加坡重金聘來擔任校長，我們交談了兩個小時。而後，我又拜訪了香港大學金融學家饒餘慶^{【602】}。

接著三天，由何向亮導引，我先後參觀了香港的菜市場、漁市場和米市場。香港的日常主要食品批量供需大多都在這裏交易。菜市場和漁市場早晨4點開市，到七、八點鐘就收攤了，米市場則會延續到11點多。他們的作法是：供需雙方直接討價還價，達成一致後，向管理員交6%的管理費，就成交了。管理員須取得政府的批准，一問之下我才知道，這些管理員大多都是英美畢業的碩士、博士。

他們採用這種管理食品批發市場的辦法，使得產銷直接見面、減少了中間環節的費用、供需雙方都比較滿意，而賣給消費者也容易使大家接受，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大中城市借鑒的好辦法。可我們又有多少大學畢業的學生，願意做類似的事情呢？我們的教育制度往往是培養一批批的清談家啊！根據社會發展的需求培養人才，也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實行市場經濟不解決這個問題看來是不行的。一天下午，我又拜訪了廉政公署。

休息了一天，羅德丞帶我乘船到澳門賭城去玩。那裏金碧輝煌、燈紅酒綠、人聲鼎沸、好不熱鬧。羅德丞進了貴賓廳，侍者恭敬地把我們引到一個台面前坐下，送來了咖啡、紅酒和水果。羅德丞說，這是個休閒的地方，來了就玩玩吧。隨即掏出了50萬港幣，分給我20萬，我怎敢玩呢？他玩了1個多小時，贏了10多萬元。走時，他說，你不玩，那錢就送你買幾件衣服吧，我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這錢我是一分也不能收的。

【600】陳方安生(1940-)，安徽壽縣人。時任香港經濟司司長。

【601】王賡武(1930-)，祖籍江蘇泰州，生於印度尼西亞。著名歷史學家，時任香港大學校長。

【602】饒餘慶，時為香港大學經濟系金融學教授。

晚上，他又帶我到富麗華去喝酒。他說，這裏是香港最名貴的酒店，不僅設備好、服務好，而且姑娘好，讓你開開眼界。他要了一個包廂，立即有漂亮的姑娘送來了美酒和水果。包廂裏音響放的音樂倒是很優雅，不一會兒，進來了兩個著裝華麗的美女，坐在了我們旁邊。她們向我們大獻殷勤，一會兒敬酒、一會兒餵水果。我看羅德丞已經把身邊的美女摟在了懷裏，無論我身邊的美女如何挑逗，我始終不為所動。酒喝到12點多，羅德丞給她們兩人每人1,000港幣，打發走了。他問我：「你就不想發洩一下？湘魯、維凌、嘉明可比你開明多了，別老那麼苦著自己。」我說：「我不需要。」他說：「這一家服務好，喝酒、唱歌加小費，一個人也就3,000港幣，叫一個小姐過夜再加2,000港幣，算很便宜了。」我說：「明天我還要去拜訪袁庚，早點休息吧。」

次日上午，我和袁庚談了兩個小時。中午，袁庚請我在合和大廈頂樓的旋轉餐廳吃了午飯。下午，我拜會了金庸^[603]。他請我介紹了改革的態勢，我則說起了他膾炙人口的小說。他問我，愛讀哪一部？我說，喜歡《笑傲江湖》，喜歡令狐沖，東方不敗有點像毛澤東，而岳不群、冷苦禪這類人文革中到處都有。他笑著說，令狐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可香港不少人喜歡《鹿鼎記》的韋小寶，這種政治上的流氓才能左右逢源。說著，他在他寫的《笑傲江湖》扉頁上給我題辭道：「一諮先生：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金庸敬題」幸虧有他的這個題辭，否則，過海關時他的書幾乎被沒收。

7-4 趙紫陽提出「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戰略

回到北京，我立即向趙紫陽彙報了香港之行的感受。我說，因為沒有了上海，才出現了香港；但香港永遠代替不了上海。如果加快浦東的開發，建成一個新上海，成為一個金融、技術、商業中心，就可以帶動老上海和長江三角洲的改革，中國的改革就會加速。而且，香港的市場管理、公務員制度、廉政公署，不能說就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總結了人類寶貴經驗的成果。

我還向趙紫陽談到：我經過反覆思考，第一，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很不平衡，不可能設計出一套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方案；第二，即使設計出了這樣的方案，也沒有領導人敢拍板實行這樣的方案；第三，假設拍了板，也沒有人有能力去推行這樣的方案。一個超大系統的改革，是可以分

[603] 金庸 (1924-)，原名查良鏞，浙江海寧人。著名武俠小說家和社會活動家。

解成若干子系統，逐一從最需要、最薄弱的子系統進行改革的。我向他談到了所裏討論的「三江一海戰略」。他讓我找即將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鎔基^{【604】}，談談浦東開發問題。

我帶著朱嘉明在國家經委辦公室，和朱鎔基談了兩個小時，朱鎔基連連點頭表示有道理。誰知朱鎔基到上海後，與江澤民談起我的意見時，江澤民卻說：「如果浦東那麼個搞法，還能由上海管理嗎？」一句話，說的朱鎔基啞然無語。後來，在國家計委和經委工作過的朱鎔基，輕車熟路地在上海大抓企業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雖然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在改革上卻始終沒能有什麼大的作為。

1988年1月，趙紫陽開始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大進大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他說：從去年秋天到今年初，我對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地進行了考察。我認為，我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又長期封閉。現在國際市場正在進行調整，不少勞務成本高的產業正往外轉移，這對我們沿海發展十分有利。我們沿海三角洲地區有1.2億人，如果搞「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可能是沿海經濟發展的新路子。

趙紫陽說：沿海要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主要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者勞動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相結合的產品。原料與產品用到海外，叫做「兩頭在外」，既能加快沿海的經濟發展，又不再和內地爭原料、爭市場。我們全國發展很不平衡。過去搞平衡發展，對沿海很不利，內地也不滿意。像沿海從內地搞糧食，就造成全國的緊張。所以這個循環不能靠內地，要靠外邊。

趙紫陽說，如果沿海的糧食問題也從國外解決，就有一個外匯的制約因素。所以，要「大出大進」，隨進隨出。外向型經濟的產品大量的賣出去了，也就有錢買我們需要的東西和糧食了。這樣作，沿海和內地的矛盾就可以大大的減少。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時，要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作用，使之成為生力軍甚至主力軍。這樣就可以把沿海地區農村的大量勞動力，轉入外向型經濟，轉向國際市場。

那麼，這個戰略能不能實現呢？趙紫陽說，首先，是有國際的機遇。因為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正在進行，隨著一些工業國家、或者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勞動力的費用也提高了。他們就會逐步把勞動密集型這一部分生產，轉移到勞動費用比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去。二

【604】朱鎔基 (1928-)，湖南長沙人。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後任上海市市長、國務院副總理、總理。

次大戰以來，就是這樣滾動式的轉移。日本曾經走過這條路，四小龍及東南亞一些國家也是走的這條路，而且非常成功。

趙紫陽說，其次，我們沿海地區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不但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也好，文化技術方面的訓練也比許多發展中國家要好。沿海地區又交通便利，信息靈通，人們市場競爭的意識也比較強，有發展市場經濟的傳統，對國際市場容易適應。既有機遇，又有條件。只要我們清除思想上、制度上的障礙，有合理的政策引導，沿海地區一定會很快發展起來。

為貫徹這個戰略設想，趙紫陽不斷向沿海地區的領導人提出：中央給了你們寬鬆的政策，你們就要加快改革。要大量吸收外資搞獨資、合資企業，現在獨資企業效益比合資好，合資比我們國營好。搞獨資總比我們借錢辦企業好，那怎麼才能吸引外資呢？根本上就是能讓人賺到錢。怎麼才能賺到錢呢？把管理權交給他，跟人家好好學。不要怕「喪權辱國」，引進管理比技術還重要。改善投資環境，花錢最少的辦法就是請人家來管理。

趙紫陽特別指出：這樣作，鄉鎮經濟、私人經濟可能會有更大的發展。目前，一些老的大中型企業搞合資的條件還不成熟，問題是卡在勞動力包袱、班子和資產評估上。同時，沿海地區的社會政策、人事制度、勞動保險的改革，步子都應該邁得更大一些，小企業拍賣要加快，舊房子的出賣也要加快，住房改革、機構改革也要加快。這些改革搞了不都是錢嗎？沿海發展不能靠向上伸手，更不能靠擠內地，要靠自己走出新路子。

趙紫陽這個高瞻遠矚的大膽戰略，為後來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奠定了基礎。當時，這個戰略得到了鄧小平、萬里和沿海地區領導人的大力支持和擁護。但陳雲、姚依林、李鵬和一些長期搞計劃經濟的人則不斷提出質疑。實踐證明，這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抓住了國際機遇，對中國在經濟發展中，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隨然「六四」以後就不再提這個戰略了，但事實上沿海地區還是在走這條路。而且凡是仍然自覺推行這一戰略的地區，經濟發展就快，經濟效益就好；凡是不那麼自覺或有些猶豫的地區，一下就差了很多。但總體來看，往後的多年實踐，中國之所以能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和實行趙紫陽提出的外向型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密不可分。但可惜的是，李鵬執政後推行「保護權貴，犧牲農民」的方針，使這個戰略畸型地走上了吸食民脂民膏的邪路。

7-5 體改所的一大特色：白南風、楊冠三的社會問題研究

體改所組建以後，先後設置了社會研究室和社會輿論調查室，分別由白南風、楊冠三負責。他們不斷對改革過程中的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輿論進行跟蹤調查，這在當時的經濟研究機構中是絕無僅有的，也是體改所的一大特色。白南風自1980年參加「發展組」以來，一直從事社會問題的研究。體改所剛建立，白南風和楊冠三就著手組織關於社會問題的研究隊伍。

1984年底，白南風和王小強寫了《加強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的社會學研究》一文，並較早提出：「改革從來不是一個純經濟行為。全面改革的實施，不僅涉及每一個人的物質利益，而且涉及到人們的社會地位、價值觀念等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他們在文中指出：「如果說價格改革背後是整個國家經濟管理、調控職能的變革。那麼，政企分開則意味著包括經營者與生產者、黨與政、政與企以及它們之間交叉關係在內的整個社會結構的一次重新組合。」接著，他們說：「為實現搞活企業的目標，除價格、稅收、財政、金融等經濟改革外，幹部、勞動、人事制度的變革勢在必行，同時相應的就業政策、戶籍管理，不同人群社會地位的變遷，不同組織的功能、組合規模、組合方式、動力結構、宏觀調控以及對經濟、政治的影響等一系列對改革前途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都將提上日程。」

他們又指出：城市與農村改革存在著重大差異，一是在改革的個人目標與社會目標上不同，二是個人目標的期望值不同，三是承受風險的能力不同，四是改革的對象不同，五是改革的環境不同。雖然改革的得失取決於經濟效益的提高，但成敗的關鍵卻往往決定於社會能否承受。所以，要注重對群眾改革意願、收入慾望和消費慾望、風險承受能力的研究，尤其是要注重群眾對改革方針、政策、步驟反應的研究。這篇文章在各個報刊登出以後影響很大。

體改所的這兩個社會問題的研究室，研究人員們通過不同形式的深入調查，寫出了許多對改革進程有重大參考價值的研究報告。像1987年底他們完成的研究報告《改革的社會環境：變遷與選擇》^[605]就很令人深思。這個報告分4個部分：

第一部分：社會心理環境的變遷。

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入城市。但城市居民與農民在素質上有很大區別，農民的直接要求是獲得良好的經營環境，城市居民則往往是寄望於國

[605] 見體改所《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報告》，1987年12月20日第39期。

家改變收入分配結構；而且，城市居民的收入期望高於農民，風險承受能力又低於農民，既得利益多於農民，政治敏感性高於農民。這就使城市居民容易形成不利於改革的要求與慾望，並在需求難於滿足時將不滿指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

隨著改革的持續，社會心理環境發生了演變：

第一階段：1984年。這一階段有三個特徵：一是舉國上下對改革熱烈討論，人們積累的改革願望，匯成一片改革熱潮，公眾的改革參與意識強烈；二是農村改革的成就，使城市居民對改革抱有過高的期望、尤其是收入期望；三是對改革及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上將帶來的變化，思想準備不足。

第二階段：1985年初至第四季度。人們經歷了以農副產品價格放開為主的價格改革，同時工業製成品價格上升，公眾的不滿上升，而且集中在物價上漲這一點上；收入期望繼

續提高和收入攀比心理強化；職業流動意願和擇業期望的增強；人們的適應能力有所提高；公眾對改革的支持已有部分來自改革的效果。

第三階段：1985年第四季度之後。改革進入新舊體制相持時期，由於改革的核心問題——企業制度改革未能觸及根本，相關的配套改革——就業、勞動工資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未能及時跟上，政治體制改革尚在醞釀之中，社會不均更加嚴重，這就出現了：

「不滿的多元化」，從只不滿物價上漲，擴大到對以權謀私、任人唯親、法制不健全、不能自由擇業、收入不平等多方面的不滿；「期望的多元化」，人們的參與期望（政治期望）和社會期望（自由擇業與公平競爭）增加了；「追求機會均等」，在人們的不滿中對機會不均反映最強烈；「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心理差異日益明顯」。

第二部分：期望、價值與改革態度。

公眾不滿程度的提高和不滿內容的增加，給改革帶來了新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搞清楚兩個問題：一是人們希望通過改革獲得什麼？二是人們對改革的適應性如何？

「改革期望與改革評價」，人們往往因為欲求不能滿足而產生對現實的不滿，故而人們對改革的期望越高則對現行改革的評價就越低。不滿多元化的背後就是期望的多元化，人們提高社會地位和實現自我的社會期望，增強了人們要求自由擇業、晉陞與收入能公平的機會期望，而在難獲滿足時就迅速強化了人們的參與期望。

「承受能力與改革評價」，對個人來說，改革增加了機會，也增加了風險。在改革初始階段，承受風險越高的人對改革的評價就越積極；改革進入相持階段，承受風險能力高的人對改革進展不滿足，承受風險能力中等的人往往對改革評價高，承受風險能力低的人當然會對改革評價也低。

「期望 - 能力與改革評價」，一般來說，期望低而能力高的人對改革評價最高，其次為期望高但能力也高的人，再次為能力低但期望也低的人，最後是期望高而能力低的人。但降低期望是困難的，而承受能力卻可以逐步提高。所以，為使改革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只能立足於公眾適應性的提高上。

「改革期望與價值」，改革期望和承受能力，與人們的價值取向有密切關係。對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的追求，最有利於提高人們自身的進取性和風險承受能力。過去，由於剛性的身份制度，在我們社會的三大身份——農民、工人、幹部之間流動的可能性很小。而在社會上的門路及與領導的關係，往往成為能否改變社會地位的關鍵。

第三部分：機會、風險與社會選擇。

「機會與風險」，人們的機會期望已經強化，如果不能通過就業、勞動工資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幹部制度改革，為人們提供更均等的機會，人們的不滿將會越積越深，而改革則難以深入。

「機會均等」，公眾的不滿由物價上漲向不正之風、職業選擇和收入分配問題的轉移，意味著現階段公眾不滿的核心問題是機會不均等，解決這個問題是從根本上解決公眾不滿問題的關鍵所在。

「社會評價與社會選擇」，增加合理機會，並使其均等化，關鍵是形成有效而合理的社會評價與社會選擇機制。其中包括有：

「市場評價」，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配套下（如變就業保障為失業保障、住房制度改革等），改變剛性的就業制度，建立中間組織，形成勞動力市場，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制度逐步社會化；

「科層評價」，這是擁有評價權力的人或單位、團體，根據有關規則進行的評價，只要規則足夠開放、合理，並能嚴格執行，也會提高機會的均等程度；

「自主選擇」，如果社會選擇是一個雙方選擇的過程，就會減少盲目的不滿，並且可以調節期望的強度和內容。

第四部分：組織發育與制度變革。

公眾不滿的核心問題集中到機會不均等上，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社會組織和制度的改革。也就是通過企業制度和就業、勞動人事、收入分配、

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幹部制度、教育制度、戶籍制度的改革，結合法律建設，在人的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方面形成有關規則和人力市場，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選擇機制。這個任務無疑是非常困難的。

「流動的願望與事實」，僅就勞動力流動和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而言，就是難度較大的改革。不僅需要制度變革，也需要組織的發育和分化。雖然在企業職工的調查中有近50%的人願意調換工作單位，但只有26%的人提出過，因為職工自己尋找職業比較困難；而因為「沒有相應的社會機構和制度保障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和重新就業」，甚至「廠長的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所以企業又難以裁員。

「組織與制度保障」，可見促進勞動力流動，就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的配套，還需要中間組織的協調、承擔流動服務以及解決從企業分離出來的各種非經濟職能。勞動服務組織要起到職業介紹、組織勞動力再培訓、維護工人權益的作用。而難度比較大的是企業功能的分離，我們的企業除了經濟功能，還有社會功能與行政功能，逐步將企業的非經濟功能分離出來，由相應的社會組織承擔，企業行為才能合理化，並促進勞動力的流動。

改革中的社會問題的癥結是機會不均等，這意味著公眾的不滿將是一個長期性問題。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未能在整體上有重大突破之前，機會不均等的問題是難以根本解決的。所以，建立合理有效的社會評價與選擇系統，才能逐步有規則地調節社會的利益分配和公眾期望的結構。

這個研究結果，又一次告訴了我們：改革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但改革的方向必須堅定不移，否則，出現對改革的不滿是很難避免的。

7-6 支持汪道涵、陳琦偉建立亞洲研究所

1987年，我在上海訪問時，認識了陳琦偉。他很有戰略眼光，是個憂國憂民的人才。他當時給了我一本書稿，是他翻譯的韓國前總統朴正熙所著《我們國家的道路》。當時，在一般人們的心目中，朴正熙是靠軍事政變上台的獨裁者，而且中國與韓國還沒有建交，這本書稿找不到地方出版。我回北京後，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稿。

朴正熙在書的《序言》一開始就寫道：「我們正陷於貧困和痛苦的惡性循環之中。我思考著，難道就沒有辦法使國家復興嗎？難道就沒有辦法改變我們民族的衰敗面貌，同時，建設一個健全的、民主的福利國家嗎？難道就沒某種有辦法來完成一場『人的革命』，以便使我們的人民能夠不

再說謊，拋棄趨炎附勢、游手好閒的惡習，重新成為勤勉的勞動者，來實行社會改革，建設一個沒有窮人的、繁榮和富裕的國家嗎？」

朴正熙一生忘情於國家和民族的富強令人敬佩。他在書中將韓國的問題歸結為三個方面：他首先強調「人的革命」，拋棄從李朝繼承下來的「宗派意識」和日本殖民時期產生的「奴性思想」；其次是「結束農民的長期貧困」，「把國家資源投入到創造繁榮的農業社會方面去」；再次是「建設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使之「扎根於韓國的現實土壤中」，就「應當向民眾灌輸自主精神」，否則，「『人民作主的政府』就不可能行得通」。

在朴正熙的治理下，出現了韓國崛起的「漢江奇跡」。朴正熙主導的「新村計劃」，使農民和漁民住的茅草房變成了磚瓦房，還掃除文盲，開墾荒地；朴正熙本人十分清廉，他建立起了嚴厲的監察制度，不僅行賄受賄，而且走後門、生活奢侈等，都成為打擊的對象；同時，朴正熙抓住機遇，引進外資，改造產業結構，建成高速國道，加快物流周轉，使韓國經濟得以突飛猛進。在朴正熙任內，韓國躋身到了「亞洲四小龍」的行列。

我看了陳琦偉翻譯的書，掩卷歎息，覺得這本書實在值得讓大家看一看。可到哪裏能出版呢？朴正熙當時還被認為是韓國的「獨裁者」，而且中韓又沒有外交關係。只能去找樸方，我向他極力推薦後，樸方說：「先看看再說。」一周後，樸方給我電話說：「確如你所說，值得一讀。但出版很困難，恐怕審查通不過。」我建議說：「由華夏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如何？」樸方同意了。1988年4月這本書出版了。

我在上海拜訪了汪道涵，他正擔任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陳琦偉帶我到了汪道涵家。我向汪道涵彙報了香港之行的感受，我說：「我去年底到香港，看到大公司、大銀行都掛的是『上海遷港』的招牌，讓人很受刺激。因為沒有了上海的繁榮，才出現了香港。可是香港永遠代替不了上海。現在香港成了中國出口的集散地，但香港的後方是珠江流域。上海30年代之所以能成為亞洲第一明珠，則因為上海的後方是長江流域。」

我接著說：「長江流域在亞洲是沒有任何區域可以比美的。長江流域的廣闊、資源的豐富、產業的齊全、勞動的充足、技術的先進都在亞洲是首屈一指的。上海騰飛之日就是中國改革取得決定性勝利之時。但改革10年了，上海的改革為什麼沒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一者財政負擔太大，不敢輕舉妄動；二者系統超大，變革難度太大。所以，我想上海的發展和改革要另闢蹊徑。」

汪道涵聽著聽著，站了起來，問：「你有什麼想法？」我說：「我反覆思考，上海應該實行一種新的發展和改革的戰略，以揚長避短，避實就

虛，這個戰略就是：加快開發新上海，推動改造老上海，帶動長江三角洲，以致整個長江流域。新上海就是浦東，利用浦東的口岸優勢，把浦東開發成一個金融中心、技術中心、物流中心、商業中心，但千萬不要把浦東搞成工業加工區，那樣作用就小多了。」

我繼續說：「浦東沒有老的負擔，開發阻力相對較小。一但開發起來，就會大大加快老上海的發展和改革，並帶動長江三角洲的發展。起碼可以使長江三角洲的進出口、資金與技術的需求通過新上海得到滿足。」汪道涵高興地握住我的手說：「一諮啊，你的話說到我的心裏了，我非常贊成你的看法。我馬上給中央寫報告，請你當我們的顧問。」後來，汪道涵確實很快給中央寫了報告，請體改所給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當顧問。

接著，汪道涵說：「考慮到中國在亞洲的作用，中國與亞洲的關係，台海兩岸關係，與進一步開放怎麼借鑒『四小龍』的經驗，我們正籌劃成立一個『亞洲研究所』。研究所由我擔任理事長，想請你和外交部章文晉^[606]擔任理事，陳琦偉擔任所長。希望你能接受！」我連忙說：「我力不勝任。」汪道涵誠懇地說：「改革開放，大家都是新兵，我看你行。」陳琦偉也在一旁敲邊鼓，讓我答應這件事。

看來汪道涵很欣賞陳琦偉。陳琦偉可謂三管齊下：其一，在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金融系當教授；其二，創建了亞商集團當實驗室；其三，又要創辦「亞洲研究所」搞研究。我雖然事情太多，但也只能答應了。陳琦偉確實是個難得的人才，後來他把這三攤工作都搞得有聲有色，無論教學、經商還是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陳琦偉告訴我，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607]和黨委書記林克^[608]要請我吃飯。

原來，復旦大學想請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弗理德曼來華講學，希望中國改革與開發基金會能給予資助，我表示可以向基金會反映。我特別向謝希德老師致意，說起學過她與黃昆老師合著的《半導體物理學》，還聽過黃昆老師講課。林克則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他說：「國家教委現在的一套管理辦法根本不行，搞不出好學校。如果大學也搞些『特區』，復旦願意當教育的『特區』，一定會搞得很活躍。」

我又拜訪了時任上海市委秘書長的曾慶紅，他正在研究幹部制度改革，是個很有頭腦的幹才。接著，我又和孫恆志、潘維明^[609]、陳樂

[606] 章文晉（1914-1991），浙江三門人。曾任外交部副部長，時任中國人民友好協會會長。

[607] 謝希德（1921-2000），福建泉州人。著名物理學家，時任復旦大學校長。

[608] 林克（1923-），江蘇如皋人。時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

[609] 潘維明（1949-），浙江溫嶺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後成為著名攝影家。

波^[610]、陳申申^[611]、陳偉恕^[612]、王新奎^[613]、王戰^[614]、何凌^[615]、楊博^[616]等，上海的一批青年才俊聚會了幾次。上海金三角企業家俱樂部主任楊博提出，想建立一個類似日本「經團聯」式的中國大企業聯合會，以反映大企業各種需求。我感覺這個想法很好，請他給我一份設想，我回北京後可以斡旋一下。

抽空看望了大哥陳一訥和大嫂鍾子榴、大姐陳一詠和大姐夫張鎬林，又看望了沈灌群、石淑儀兩位老人和達非妹妹。達非的婚姻很不幸，她父親給她找了一個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先生，兩個人從性格到情趣都差異很大，難以生活在一起，只能離婚了。達非當中醫倒是幹得不錯，特別是治療婦科不孕症已經小有名聲，東南亞的許多病人都聞聲而來診治，這給她的生活帶來不少樂趣。

7-7 推出「三江一海戰略」

回到北京，我把楊博起草的成立中國大企業聯合會的計劃給了李鐵映，但是沒有了下文。安志文找我談，他說：「每個領導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你們體改所思想活躍，經常能提出新的看法。今後，有什麼想法，還可以反映給紫陽，他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你從現在開始享受副部級待遇。」顯然，他在改革問題上是認同紫陽的，至於對什麼叫「享受副部級待遇」，我既沒有問是怎麼回事，也沒有「享受」過。

趙紫陽交接總理職務時，作了一個報告，叫《以改革總攬全局》。鄧小平似乎也發現了些什麼，特別叮囑李鵬說：「總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李鐵映組織的「經濟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研究，體改所沒人願意參加，私下裏還有人說，「這是畫餅充飢」。無論如何，體改所不能不參加，考慮到程曉農從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調過來，還比較會應付官場，所裏請他組織一部分人參加這項研究。

根據去年底所務會議通過的計劃，體改所研究人員的熱情集中在了組織中國西部開發研究中心、中國環渤海灣經濟研究中心和深圳綜合調查

[610] 陳樂波 (1949-)，上海人。時於上海社會科學院作研究，後經商。

[611] 陳申申 (1951-)，上海人。時於上海社會科學院作研究，後到美國經商。

[612] 陳偉恕 (1946-)，上海人。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秘書長，後兼經商。

[613] 王新奎 (1947-)，浙江定海人。時任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副院長，後任院長。

[614] 王戰 (1952-)，浙江寧海人。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後任上海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615] 何凌，時任《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後經商。

[616] 楊博，時任上海金三角企業家俱樂部主任，後經商。

組。「浦東開發」已經與汪道涵開始合作。這樣，我們開始實施計劃中的「三江（疆）一海戰略」。

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初，胡耀邦、趙紫陽就很關注西部開發，並多次提出「東西對話」（指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後地區的彼此取長補短）、「開發西北」。同時，一批熱血青年一直在研究西部問題。因為雖然東南部集中了中國的眾多人口、又是經濟重心區，但西北部卻佔了70%的面積、貧困人口也佔了70%。1984年，內蒙政策研究室的青年研究者郭凡生提出「反梯度理論」，與上海著名學者夏禹龍^[617]、劉吉^[618]的「梯度理論」展開了論戰。發展組的王小強、白南風等人同時也寫出了貴州、西藏調查報告和《富饒的貧困》，提出應當促成落後地區的「造血機制」而不是「越輸血越貧血」。

1984年10月，羅小朋提出了《關於建立不發達地區開發基金的建議》。王岐山找到我說：「世界銀行有一筆扶植落後地區的資金，但需要中國的配套資金。你幫我想辦法，怎麼能解決這個問題。」我說：「你可以去找宮著銘^[619]，他不是正在中國人民銀行當綜合局局長嗎？」他說：「我不熟悉大宮，你給溝通一下。」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就與鮑彤商議後給宮著銘打了電話。不久，王岐山組建的「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成立了。

在王輝負責的《經濟日報》經濟工程部的斡旋下，1984年底由《經濟日報》和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於1985年8月在蘭州召開了西部11省區經濟發展問題討論會，經濟工程部一方面組織、協調西部問題的研究，以中青年為主力軍在西部各省區調查了6個月，一方面由王輝主筆寫了會議的主報告《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若干問題》，這個報告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

幾經商議，由「三所一會」出面，組建了中國西部研究中心，請中信國際研究所朱嘉明當主任，體改所調進了郭凡生當一名副主任，體改所馮宛平當另一個副主任、田廣當秘書長。有了研究陣地，很快就把全國各地研究西部的力量聚集起來了，用招標、委託課題的方式對西部的各種問題進行研究。體改所經濟發展研究室與日本阿克塞斯研究所在合作研究中，提出了新疆是中國最需要、也最容易開發的一個區域。

[617] 夏禹龍，時任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618] 劉吉（1935-），安徽安慶人。時任上海市科技協會副主席，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619] 宮著銘（1946-），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綜合計劃司司長兼體改辦主任。

由張阿妹負責，小強、李峻、曉魯、凡生等人多次討論，並赴新疆考察。確實，新疆的開發前景是誘人的：遼闊的地域、雄厚的資源、豐富的物產，只要適度的資金和技術就可以把產品打入中亞。西部必須開放，而新疆就是向西開放的橋頭堡，若能在新疆建立「自由貿易區」，重現「絲綢之路」是指日可待的。後來，朱嘉明、郭凡生、馮宛平、鄒藍等人多次去新疆和中亞、西亞考察，為西部開發貢獻了心力。

中國環渤海灣經濟研究中心由體改所經濟發展研究室趙素英負責，因為範圍牽扯到三省一市（遼寧、河北、山東和天津），利益關係比較複雜，雖幾經努力，但未能取得較好的成效；但趙素英在江蘇儀征化纖廠搞的改革試驗倒很有成效。最可惜的是「浦東開發」因為江澤民不積極，也就拖了下來。而楊博與體改所合作，在上海召開了全國 60 個大企業的會議，準備成立大企業聯合會。

這 60 個大企業的產值佔了 1,200 億元人民幣，在國內舉足輕重。如果能成立中國大企業聯合會，第一，可以促進大企業的內部改革；第二，可以促進大企業的橫向聯合，互通有無；第三，可以打通大企業和國際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個組織可以爭取落實幾年來給大企業的自主權，也可以既削弱地方的塊塊管理，又可以削弱中央部門的條條管理，對改革進展很有利。雖然大企業很積極，但上邊就是拖著不辦。

當時，有一批企業家、經理，願意為改革開放作貢獻，世界銀行的林重庚^[620]也提出願意籌措一部分錢。為此，我準備建立一個中國發展與改革基金會。方案搞好後，好幾個領導人都想當這個基金會的頭，包括馬洪、杜潤生、許滌新^[621]等，以便為自己退休後找一個退路。在中國往往是，當官的看到有風險就縮頭，看到有好處就誰都想伸手，爭來爭去，誰也不讓步，直到爭得事情不了了之。

3 月，小強的父親王勉病逝了。老人在文革中飽受折磨把身體搞壞了，我曾到醫院去看他，老人流著淚拉著我的手說：「我們年輕時參加革命，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誰也沒想到文革那麼樣的瞎折騰，把國家破壞得不成樣子。幸虧實行改革開放，中國又有了希望。我看你是個真正幹事的人，小強跟著你幹，我也就放心了。今後，小強就交給你了，你們有機會好好幹一番事業。」

[620] 林重庚，菲律賓籍華人，時任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

[621] 許滌新 (1906-1988)，廣東揭陽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經廖暉【622】與趙汝衡【623】的介紹，王小強認識了中國芭蕾舞團的著名演員郭培慧。小強長得英俊瀟灑，說話娓娓動聽，又滿腹才學，是女孩子追尋的對象，但他一直沒有務色到自己的意中人。郭培慧秀外而慧中，人又溫文儒雅，很有教養，剛在巴黎的國際比賽中得了金獎。他們5月結婚了，真可以說是才子配佳人。

丫丫快11歲了，人長得秀氣文靜，又很有仁愛之心。她上幼兒園時，問她長大作什麼？她總是說：「當幼兒園老師，陪小朋友們作遊戲。」這時，再問她長大作什麼？她會說：「當一個女俠，幫助好人，懲治惡人。」她已經成了一個「金庸迷」，金庸小說的故事成了她和同學課後的主要話題。「六四」後，她還抱怨我沒有把金庸題辭的那套全集送給她，以致抄家時讓不知什麼人順手牽羊拿走了。

7-8 李灝請體改所派調查組到深圳

1987年底，從美國留學回國的林毅夫【624】要求到體改所來工作，希望當一個研究室主任。我召開了所務會議，大家認為，他沒有任何貢獻不能這樣安排。後來，王岐山安排林毅夫當了發展所副所長。我這時才知道，林毅夫有特殊背景：他70年代末在台灣當兵時泅水逃到大陸，在北大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又到芝加哥大學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回國後，總參二部給了他上校軍銜，政協又給他安排了一個委員。

召開中共十三大時，李灝就一再和我說，請體改所組織人到深圳作一次綜合調查，幫助深圳探索今後怎麼發展。1988年元旦前，我和王輝一起到深圳去了3天，作了一次宏觀搜索。回京後，經過籌備，我們應深圳市委、市政府之邀，組織了一個由體改所、發展所、國際所、中組部、人事部、中央黨校、政法大學42名研究人員組成的調查組。春節剛過，大家就從各地在2月27日紛紛到了深圳，調研一直到4月7日結束，先後45天。深圳市也從各有關部門抽調了120多人，與我們一起進行調研。

這次調研，對深圳經濟特區近年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有關的體制和政策問題，進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考察的重點是深圳改革開放所實踐的體制變革與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障礙，以及在國內率先確立新體制的可能性。調研分宏觀、企業、市場、投資、貿易、政治體制、公務

【622】廖暉（1942-），廣東惠陽人。時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

【623】趙汝衡（1944-），曾任中國芭蕾舞團團長。

【624】林毅夫（1952-），台灣宜蘭人。後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員、法制和社會 9 個專題組進行。調研結果包括 36 篇專題報告、專題資料和關於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兩份綜合規劃報告。

調查組到達深圳當天，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李灝就熱情地請大家吃飯。李灝說：「深圳經濟特區已經搞了八年，這個落後的邊陲小鎮已經發展成了一個繁榮的現代化城市。怎麼樣才能在深圳率先建立起按國際慣例運作、適應外向型商品經濟發展的體制呢？怎麼樣才能使深圳更好地發揮『四個窗口』和『兩個扇面輻射的樞紐』^[625]作用呢？我用一句形象的話說，就是要把深圳弄成按國際規則打藍球的地方，和國際接軌。」

他端起酒杯笑著說：「請大家乾杯！我這頓飯請你們吃，是表示市委和市政府對你們的歡迎和誠意，希望你們把聰明和智慧留給深圳，為深圳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出好主意！」從第二天開始，緊張的工作就開始了。市委、市政府給我們詳細介紹了深圳各方面的情況，又請有關部門分頭介紹了他們的狀況、問題和打算。我們的調查人員也不斷提出各種問題，請他們回答。大會介紹了一周，開始分專題進行調研。

上海陳琦偉請我在亞洲研究所成立大會上講一個話，我飛到上海。3 月 19 日，在華東師範大學作了題為《深化改革 創新理論》的報告。首先，我講了無論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都是一個過程，必須做長期探索的準備。其次，我講了深化改革需要研究的問題：新舊體制並存、「大進大出」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難點。最後講了創建新的理論隊伍問題。幾百人的會議室擠得水洩不通，會場氣氛非常熱烈。

那時，我們在深圳的研究人員一旦投入工作，就是夜以繼日地調查、分析、爭論，再調查、再分析、再爭論，直到弄清問題為止。深圳合作調查的朋友，都對我們的工作精神深表讚佩。但可能是長期勞累，我一下發高燒病倒了。住了幾天醫院，回到賓館還是全身無力，只能臥床休息。這時，在中組部工作的王春生主動來照顧我，每天給我做「病號飯」，不厭其煩地幫助我。至今想起王春生的愛心，我還心存感激。

一天，我正在賓館散步，迎面走來了習仲勳和齊心。我趕忙走過去，叫：「習叔，阿姨！」老兩口看見我也很高興，立即請我到他們的住處坐坐。原來他們正在深圳休養，住的小別墅和我的住處不遠。我落座後，習仲勳問：「對深圳印象怎麼樣？」我說：「發展變化的太快了！習叔，您當

[625]「四個窗口」指鄧小平 1984 年提出的特區要起到「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和對外政策的窗口」；「兩個扇面輻射的樞紐」指趙紫陽 1984 年提出的特區要成為「對外對內兩個扇面的樞紐」。

年向中央要求實行特殊政策太有遠見了。」習仲勳說：「我一到下邊來就高興，看到的都是生機勃勃；一回到北京就憋氣，聽到的淨是胡說八道。」

服務員送來了茶，我喝了一口，繼續聽習仲勳說：「在下邊幹得好壞靠實績，一看就清楚。在北京是幹實事的少，評論員太多，還淨說些歪理。」說起胡耀邦下台，我說：「耀邦叔叔那麼耿直正派的人，改革開放以來貢獻那麼大，不明不白就給搞下去了，大家都為他抱不平！」習仲勳激動地拍了一下茶几說：「咳，毛澤東搞家長制！鄧小平也一樣，還是搞家長制！這對黨和國家是災難啊！」

以後在深圳，我又去看過習仲勳兩次。他對黨內「左」的禍害深有體會，對黨內專制主義的影響多有批評，認為中國一天不走向民主和法制，就一天不可能現代化。他說，我們是個農民佔多數的國家，我們的黨員大多數也是農民出身，不可避免地會把農民意識帶到黨內來，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也離不開「打土豪，分田地」，打下了江山就要坐江山。我們黨內歷來就缺少民主的傳統，中國真正走向現代化不容易。

各個專題調查組緊張地工作了1個多月，到3月底基本收尾了。由我和副所長小強、李峻主持，聽了各個專題組的彙報，感到調查搞的不錯，決定向市委、市政府作專題彙報。市政府會議廳裏坐滿了人，每一個彙報都得到了掌聲和讚許。李灝高興地和我說：「深圳還從來沒有人做過這麼深入、全面的調研，你們的工作十分出色。」後來，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將這次調研的報告編了一本書，叫《深圳：新體制研究》。

調研的總報告由體改所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少傑、數量經濟研究室主任王輝、社會研究室主任白南風執筆，寫了題為《深圳：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制度變革》^[626]的報告。報告指出：「作為一個有幾千年封建傳統、實行了30年計劃經濟和封閉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會遇到什麼障礙，能否形成克服這些障礙的社會力量和制度環境，都遠不是已有理論的邏輯推演就可以把握的。而先行一步的經濟特區，則可能以其實踐向人們揭示這樣的障礙，並為問題的解決提供經驗。」

總報告是對各調研組分報告概述和提要，共5個部分：

一、現狀（1）：八年來的高速發展。

深圳經濟特區自1980年創辦以來，開發城市面積48平方公里，國民生產總值年遞增47.7%，工業出口值佔工業總產值的53.3%，深圳已經發展成一個以外向型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城市。對海外和內地投資者的開放政策，是深圳經濟成功發展的首要因素；工商企業的自主競爭，是另一個

[626] 見體改所《中國：發展與改革》1988年第8期。

基本原因。實行開放政策使政府把主要精力轉到了改善投資環境，改革計劃、物資、勞動、人事、工資、金融、土地、住房制度，並促進了政企分離和企業家隊伍的形成。

二、現狀 (2)：經濟繁榮中的舊秩序。

但舊體制從各方面影響著特區，使其演化為用傳統體制手段管理、調節的市場經濟。故而，企業自主但不獨立；競爭激烈但不平等；「放亂管死」的循環未能打破，乃是我國傳統經濟社會組織的深層結構問題。其協調特區經濟社會生活的方式是：1. 規範社會基本關係的主要手段仍是「條款加精神」，即用上下級行政渠道為主的「紅頭文件」進行規範，而不是法律、法規和政府政令；2. 管理社會日常運行仍是「一事一議」的「審批」方式；3. 行政隸屬仍是主導關係。

三、選擇：新城市還是新制度。

隨著沿海的進一步開放，以及外貿、外匯體制改革，將使深圳在吸引投資和爭取資源的競爭力下降；而香港回歸則對深圳的經濟體制、行政管理 and 法律環境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而，深圳面臨著選擇：是滿足於現有體制的容量，將其建成一個具有較強經濟實力和較好生活環境的新興城市呢？還是利用目前較好的經濟條件，針對經濟、政治體制的深層弊端，不失時機地進行根本性的制度變革，完成向符合現代商品經濟社會的躍遷，建成香港與大陸銜接的全新的經濟社會體制。

四、體制：建立新秩序的基本要素。

針對深圳現行體制的弊端，未來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應當具有如下四個基本特點：

1. 公平競爭的開放經濟。需著力從形成市場體系、改革企業制度、轉換政府職能和形成中間組織四個方面進行改革；

2. 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需下放政府權力、轉變政府職能，調整政府組織結構、實現管理職能專門化，變文件管理為法令管理，並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

3. 清晰完備的法制體系。要形成企業依法經營、政府依法行政的局面，需形成規範企業形式、責任和權利的法律，規範交易行為的法律，規範中間組織的法律，規範政府官員的行政法規和行政賠償制度；

4. 適應於改革需要的政治架構。以上三方面的改革，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樞來實施，這就要求從領導體制、立法權限和社會監督三方面，建立適應特區改革需要的政治架構。並應由中央制定一個具有基本法意義的法律，以保證特區各項改革的推進。

五、政策：特區功能與相關問題。

深圳特區在推進其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在一些重大的政策問題上，必須作出積極而慎重的選擇：

1. 對外開放政策。深圳應當充分利用地理上的有利條件發揮人才、信息、體制上的優勢，採取工貿結合的方針，將之建成「自由投資區」：可以自由興辦企業，人員自由進出，對外貿易則可以先「出口關在一線，進口關在二線」，而後實行「一線管人不管物，二線管物不管人」，為資金和勞動力的進出創造良好的環境。

2. 經濟發展政策。特區必須以開放作為考慮發展政策的出發點，而實行「兩頭在外」則勢必受國際市場和香港經濟波動的影響。因此，特區需要探索新的管理辦法，如：及時向企業提供各種市場信息，對有發展前景的產業給以資金支持，對市場穩定的行業提高規模效益，對企業投資予以指導，等。

3. 資金籌措政策。深圳逐步發展起來的房產和地產市場，將為特區發展資金的籌措和回收創造一個很重要的良性循環渠道。同時，要加快企業股份化的進程，形成二級市場，使企業有可能通過直接融資，為自己的發展籌措資金。

4. 收入分配與調節政策。特別是在政府與企業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企業職工與個體工商戶之間，急需形成一套合理的收入調節政策。應著眼於：一是形成合理的收入差別，二是形成合理的收入流程，並著手實行個人所得稅制度。

5. 就業與居住政策。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辦法是取消戶籍制度，目前可以逐步增加常住戶口在就業上的彈性、打破就業的鐵飯碗，逐步減少暫住人口在特區工作的障礙、特別是在居留管理和社會福利方面消除差別管理。

6. 社區管理政策。可以考慮在這裏進行社區自治的試驗，由社區居民管理一些公益性事務，逐步實現社會管理的民主化。

同時，這次調查形成的報告還有：

體改所比較體制研究室主任高梁寫的《關於全面深化深圳經濟特區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

體改所政治與法律研究室主任王飛欣、發展所王振耀、體改所姜新浩、馮倫、季曉南寫的《深圳經濟特區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

體改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宋國青寫的《特區要對內開放》；

體改所宏觀經濟研究室梁天征寫的《深圳特區發展的財政金融政策分析》；

體改所宏觀經濟研究室黃永山寫的《深圳財政稅收體制分析及進一步改革的設想》；

體改所調研室副主任姜斯棟、微觀經濟研究室劉瑞中、張波寫的《股份化：深圳特區企業制度改革道路》；

體改所政治與法律研究室許小團與劉瑞中寫的《深圳特區企業破產問題考察》；

體改所比較體制研究室主任高梁、信息室夏曉汛、經濟發展研究室時平生寫的《深圳特區投資環境的現狀與評價》、《進一步完善深圳特區投資環境的思路與對策》；

體改所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王曉魯寫的《深圳特區的工貿發展格局及模式選擇》；

體改所經濟發展研究室副主任張阿妹寫的《關於深圳外貿的發展與改革》；

體改所數量經濟研究室主任王輝寫的《關於深圳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

體改所調研室劉歷魯寫的《深圳特區市場成長的主要障礙與改革對策》；

體改所微觀經濟研究室劉瑞中與姚鋼寫的《完善競爭機制催育金融市場》；

體改所社會研究室段建敏、鍾國興寫的《深圳經濟特區勞動力市場研究》；

體改所經濟發展研究室鍾浩寫的《開放土地市場加快改革進程》；

發展所王振耀寫的《政制格局與發展目標的選擇》；

中組部王春生、劉蘇裏寫的《關於深圳特區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構想》；

體改所社會研究室鍾國興寫的《深圳社會中間組織的發展與對策》；

發展所冉志江寫的《用地方立法推動深圳特區的體制改革》；

體改所政治與法律研究室馬曉琳、許小團寫的《深圳特區的司法體制改革》，馬曉琳還寫了《深圳特區政治經濟改革的法制配套》和《深圳特區的立法問題》；

體改所比較體制研究室馮侖寫的《意識形態：獨特的難題與現實的選擇》；

以及季曉南寫的《深圳市行政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張其光寫的《專業人員群體分析》、閔尚峰寫的《分化中的深圳幹部群體》、盛斌寫的《深圳特區第二步改革的關鍵》，可惜我已經記不清他們在哪個部門工作了；這次調查共寫出各種報告 36 篇。參加這次調查的還有：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政法大學講師劉蘇裏、體改所研究人員劉能原、劉喜民、朱滿良、姜新浩、薛鵬和所長助理刁新申。

深圳調查基本結束後，我又請王輝帶隊與王春生、劉蘇裏、馮侖等人，到香港作了一次對照考察，研究香港的廉政問題、土地拍賣問題和市場組織問題，對深圳的發展有什麼借鑒意義。這次到深圳進行的綜合調查，體改所幾乎出動了大部分骨幹，調查可以說搞得非常成功，不僅深圳市委、市政府十分滿意，而且使參加調查的研究人員深受教育。大家從深圳的喜人發展中，看到了實行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績；同時也從存在的問題中，認識到中國走上現代化之途還有很長的路。10 年後的 1998 年，我在紐約見到了幾位深圳的官員，感慨之中，他們說：「深圳至今還在往你們當年調查提出的方向努力著。」

與此同時，我們還組織了海南洋浦開發的研究，計劃把洋浦建成一個自由港。春節剛過，趙二軍約著小強請我吃飯。經小強介紹我才知道，趙二軍原來是趙紫陽的二兒子，人很樸實，沒有幹部子弟的傲氣。趙二軍介紹了海南洋浦的情況，並表示自己一生若能貢獻給洋浦開發也值了。聽他介紹，我才知道，洋浦計劃將 30 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開發區承包給外商，希望我們做一個可行性研究。這倒是一個大膽的改革設想，我同意了。

政改辦剛成立時，瑞士留學生聯合會主席江上舟^[627]寫來一封談政治改革的信，很有見地。我把這封信登在政改辦的刊物《內部資料》上了。他回國後來找我談，確是一個熱血青年，滿腹理想。原來他是文革中挨斗的農墾部副部長江一真^[628]的兒子。那時，海南正在延攬人才，我就介紹他去找許士傑。後來，他在剛建立的三亞市當了副市長。雖然他努力工作，但不懂官場，在選舉中落選了。趙二軍說，江上舟很想到洋浦大幹一場。

[627] 江上舟（1947-2011），福建連城人。後任三亞市副市長、洋浦開發管理局局長、中芯國際董事長。

[628] 江一真（1915-1994），福建連城人。曾任農墾部副部長、衛生部部長。

7-9 王輝的研究《改革中的經濟秩序創新》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從農村到城市出現了大量的合同糾紛，很多合同難以履行。記得我們在匈牙利訪問時，張少傑曾詢問匈牙利的合同訂約雙方：「如果你已簽約，發現吃虧了，怎麼辦？」人家雙方都聽不懂，用迷惑的眼神看著。再問一遍，他們才明白，都會說：「簽了約，就得履行。吃虧，也得合同期滿再改。」看來，他們經過一定的資本主義發展，「契約精神」比我們強多了。我們則往往是自認吃虧的一方不履行合同。

1982年底，何維凌介紹我認識了在社科院讀研究生的王輝。1984年底，王輝調到《經濟日報》工作，當了經濟工程部負責人。他負責印行的《經濟內參清樣》主要反映對改革開放的想法和建議。王輝既有頭腦，又辦事認真，我調他擔任了體改所數量經濟研究室主任。從1986年底開始，他領導的《經濟合同與經濟秩序》課題組，對中國各種經濟合同違約的狀況，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寫出了《改革中的經濟秩序創新》^[629]研究報告。

王輝組織的課題組，對北京和其他地區的3個基層法院，從1978年到1987年的全部經濟合同案件，進行了調查、分析和研究。他們一方面細緻查閱各種卷宗，訪談法院經濟廳長、審判員和當事人，進行法理和定性的分析與把握；另一方面對1,400多個案例逐個分析和量化，每一個案例用10個指標衡量，從合同內容、合同違約原因和方式、糾紛內容、如何解決糾紛及補償等若干方面進行了定量和系統分析。

這項研究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正面臨著經濟合同廣泛違約的挑戰，而市場化的基本標誌就是契約化。當時，經濟合同從無到有，並從個別購銷活動迅速擴大到，加工承攬、租賃、聯營、科技合作、技術轉讓、拍賣投標、合資等，各種廣泛的交易和經營活動。這項研究針對我國的現狀，從經濟合同的約束力與市場秩序、違約分析與市場環境、違約預防和契約犯罪、合同價份與公平裁決、契約化與秩序創新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實證分析，並明確提出要建立以「契約化」為核心的新經濟秩序。王輝的研究報告共6個部分：

一、合同與中國經濟市場化傾向。報告指出：全國各種經濟合同從1983年的3億份增加到1987年的10億份。合同履行率的逐漸上升，反映了人們接受市場活動契約化的約束和市場有序化的演進；而合同糾紛案件的增加，則反映了市場契約有效性的提高；實現市場交易的有序化和規

[629] 見體改所《中國：發展與改革》1988年第7期。

範化，就需要建立完善的企業法人制度；目前市場中的欺詐、投機、脅迫正破壞著市場交易的平等進行；合同當事人的權利還缺少法律規範的保護。

二、違約分析。我國自《經濟合同法》實施以來，違約率逐漸下降；但因質量、數量和價金問題引起的違約糾紛始終很多；違約帶來的直觀損害和社會損害，導致市場效率和社會經濟效率下降；權力部門干預合同履行卻不斷發生，「合同簽字又畫押，不如領導一句話」；暴利機會的廣泛存在，滋長了違約行為；對法律的無知，造成的違約佔了合同糾紛的60%以上；市場價格的波動，也會引起違約。

三、「解紛」狀況的分析與公平裁決的困擾。經濟合同糾紛的解決能力、方式、質量、費用，體現正形成的新經濟秩序對新體制的適應程度。我國解決經濟合同糾紛的特點是：「解紛」機構的多元化和官方性；「解紛」方式的多元化；「調解」方式獨佔鰲頭；司法機構充當解紛主力；合同糾紛「及時、合理、守法」的公平裁決，是保證契約按規則運行的屏障，而我國目前實現公平裁決有許多困擾。

四、目前合同具有的約束力及影響、決定約束力的因素。合同的約束力就是合同所體現的法律強制力，而我國目前的合同約束力處於混合約束狀態，也就是說其法律效力與行政強制共同構成合同的強制力。因為經濟立法的落後，導致了合同約束力極不穩定；司法對違約責任條款的執行不力，也導致當事人藐視合同、隨意違約；行政權力對合同約束力的影響目前還難以避免；長期排斥市場經濟、缺乏契約意識的觀念也會造成心理約束。

五、新經濟秩序與現行體制的摩擦及對創新經濟秩序的影響。企業的法人地位雖在形式上被賦予，但仍實際上仍受制於行政權力；對契約行為的非經濟、非法律干預，使大量簽訂的合同無法履行；低水平的市場給尋找和形成交易夥伴帶來了高成本；大量違約造成的拖欠貸款現象，造成了新機制的不穩定；落後的商品銷售方式，使供銷合同成為違約頻率最高的類型；企業預算的軟約束狀態，為嫁禍於人找到了借口；大企業的壟斷與自由契約的衝突日漸增加；契約的嚴肅性因為個人責任的無法追究而受到損害。

六、建立我國新經濟秩序的近期工作和難點。1. 強化契約化進程中的法律約束機制，完善《經濟合同法》；2. 加強經濟司法隊伍的建設；3. 創新和改善企業制度，明確企業的權利和責任；4. 放活金融體制，建立金融調節系統，擴大資金市場。5. 提倡公平競爭，防止壟斷行為；6. 改善對指令性計劃合同的管理。

1988年4月，趙紫陽在王輝的研究報告上作了長篇評論和批示，並要求作者再寫一個1,000字的提要，印發省部級領導人。趙紫陽隨後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經濟工作會議上多次提出和強調要「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4月到8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家體改委就體改所的這項研究，組織和安排王輝課題組的研究人員參加了8次以上的情況彙報和討論。

由於該項研究包括大量的實證調查分析，僅案例附件就有11冊。為此，還鬧了個笑話。有一次在中南海的彙報和討論會開始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兼秘書長張勁夫把王輝帶去的一套共12冊（主報告及案例），誤當作12份相同的報告，分發給其他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如田紀雲、安志文、杜潤生及其他與會者。結果，有人拿了頭一本，有人拿了後一本，看得大家面面相覷、不知所云。王輝說了這12冊是一套後，大家才弄明白。

5月30日至6月1日，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當前改革和經濟發展形勢，正式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6月1日，新華社以「堅決穩妥解決好改革中的難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為題，報道了趙紫陽和中央對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高度重視的意見。從此，這個問題提上了中國發展與改革的日程。

這個主張立即得到了人大委員長萬里的響應與支持。7月1日，萬里以《同心同德，推進改革，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為題，在人大常委會發表講話，並進而提出，今後5年的首要工作是「抓緊立法工作，加快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隨後，在趙紫陽的直接推動下，中央在當年9月和1989年3月提出未來兩年或更長時間「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建設」。

王輝主持的體改所這項研究，也代表了體改所開放式研究的方式和特點。王輝在立題、立意及初期研究中，均在所內和所外尋求合作參加調研的人員。這項調研的參加者有許多大學的研究生和教師，包括李仁玉、劉凱湘、齊海濱、馮培等。這個項目也像體改所的其他一些項目一樣，部分研究經費來源於其他機構和組織。鄧英淘從項目開始就給了王輝很大的支持，還資助了項目經費。

體改所由宋國青主持的另一項研究，即組織「批發市場」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宋國青從多年在農村生活的實踐中體會到，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實質是對農民徵收實物稅。1982年，他就提出了「統購改稅」的思路，並在1984年到河北省搞改革試驗。從實行價格雙軌制以來，一方

面對改革計劃體制起了積極的重要作用，但也使一些人從價格差中大撈好處。如何使價格雙軌制揚長避短，就成為一個大問題。宋國青領導宏觀經濟研究室的一個組，完成了《中國雙軌經濟的形成與管理》的研究報告，提出了在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條件下，如何解決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价格差問題。顯然，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之差，就是一種變相的國家補貼；而利用這種價格差撈好處，就是把國家補貼變成一己私利。任其漫延，則會使這種撈取價格差的行為，變成貪污腐敗的溫床。他們提出了建立公開的、有規範的「批發市場」的意見。

也就是說，可以由國家組建若干批發市場，將部分市場短缺的計劃內物資拿到這個市場來「拍賣」。這樣作，既能平抑物價，又能將價差公開。因為短缺的計劃內物資的價格低於市場價，而這個價差正是國家對國營企業的變相補貼。如果搞起了批發市場，批發市場的成交價一定會在計劃價與市場價之間。就可以降低市場價，防止囤積居奇；又可以對成交物資徵稅，將差價收入進行二次分配，避免化公為私。

當時，因為各地基建規模過大，鋼材供給遠遠滿足不了需求，這就造成了鋼材的市場價遠遠高於計劃價，計劃價大體在每噸 700 元人民幣，而市場價則達到每噸 1500 元。宋國青建議，首先開闢若干鋼材的「批發市場」，對計劃內的鋼材進行「拍賣」，據估算：拍賣的鋼材價格會在計劃價與市場價之間，大約在每噸 1000-1100 元，起碼比現行差價低出 50%，不僅會平抑鋼材的價格，而且會抑制論番上漲的通貨膨脹。

這是個很好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夠進行試驗，會對改革起到正面的促進作用，消除雙軌價格帶來的弊端。可惜那時的李鵬、李鐵映，一門心思都用在怎麼樣阻滯改革、保護特權，以便自己能爬到高位上，將體改所上送的研究報告不置一詞，這麼好的一個改革建議就石沉大海了。

7-10 張震寰請張寶勝、嚴新給我「發功」

4 月上旬，從深圳剛回到北京，中央黨校副秘書長史維國就找我，商議籌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的事宜。其實，1987 年底已商定由中央黨校負責籌辦，因為他們不僅有雄厚的師資，而且在全國有 2,000 多所黨校，開展活動非常有利。史維國說需要一位有名望的人擔任會長，誰合適呢？確實，在多年沒有政治學研究的背景下，物色一名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擔任這個職務確實有困難。

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共中央組建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周傑、賀光輝任副主任。雖然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日程，但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對是明顯的。宋平主持的中央組織部，在內部發行的《組工通訊》上，幾乎每一期都刊出各地黨政幹部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削弱黨的領導」的文章。為緩解矛盾，趙紫陽特別提出把「社會協商對話」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議題。

接著，趙紫陽就文藝方針發表了意見。關於文藝改革，趙紫陽說：「一是黨委要少介入，只要不反黨、不搞顛覆，就少干預、少批評。一是演出團體問題，國家搞少數高水平的，不以贏利為目的，高待遇養起來；其他團體不搞國營，黨不去管，由政府按法律管，不犯法就不管。文藝問題上，既要有開放的一面，又要有嚴肅的一面。都放了不行，都嚴了也不行，要實行雙軌制。」鮑彤遵循趙紫陽的意見，還就新聞改革召開了許多座談會。

我和史維國商議，請鮑彤再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這個職務，確實他的負擔太重。我提出，請周傑擔任，不是很好嗎！就和史維國一起去找鮑彤。史維國介紹了研究會籌備的情況後，鮑彤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題還沒有破。成立研究會聚集一批人，一起進行研究、宣傳是個好辦法。會長誰來當？我和周傑商量一下。」3天後，史維國高興地告訴我：「周傑同意當會長了。」

我們又一起去拜訪了周傑，共同商定請薄一波當名譽會長。史維國建議，由我當常務副會長，我堅辭了，並提出請他擔任，周傑也同意了。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史維國說：「我看你臉色蒼白，好像身體很不好啊？」我說：「可能是累的。」他說：「周末，我請現在當中國氣功研究會理事長的張震寰^{【630】}，帶幾個氣功師給你治病怎麼樣？」我說：「好啊！」

週末上午，史維國接我到了中央黨校，中午請我和杜光一起吃飯，並議論了研究會的工作。下午5點，黨校副校長陳維仁請我吃飯，我和史維國一起到了黨校的小餐廳。陳維仁陪著張震寰，還有著名的氣功師張寶勝^{【631】}、嚴新^{【632】}和一位趙某某。飯前，張震寰介紹了他為什麼要研究氣功和特異功能。陳維仁剛表示不可全信，張寶勝指著他的右肩衣服說：「你的右胳膊窩著火了。你看，煙都從右肩冒出來了。」大家一看，果然從陳

【630】張震寰 (1915-1994)，北京人。曾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時任中國氣功研究會理事長。

【631】張寶勝，著名氣功師。

【632】嚴新，著名氣功師。

維仁右肩冒出了很多煙。陳維仁脫下衣服，右胳膊窩的衣服已經燒了一個洞。大家都很詫異。

我給每人一支「555」牌的煙，剛抽了一口。張寶勝用手一指，說：「你再抽。」我又抽了一口，竟變成雪茄味了。他又用手一指，煙變得什麼味都沒有了。大家紛紛稱奇之時，史維國給大家斟上了茅台，趙某某端起酒杯說：「乾杯！」喝到嘴裏的茅台酒變成了二鍋頭。每人又倒了一杯酒，他又向大家說：「乾杯！」這一次喝到嘴裏的酒又變成了水。張震寰笑著說：「這就是氣功和特異功能的神奇之處啊，人還有很多沒有認識的領域。」

說起氣功，我是相信的。記得1960年我去廣州看父母，父親因為工作忙，每天都要夜裏兩點以後回家，他回家後打坐兩個小時，也不睡覺，就一大早又去上班了。父親還給我教了太極推手和道家周天功，我生病時練一練還真有些效果。可惜的是我不能堅持，一忙起來就不練了。近半年來，我因為過於勞累不斷生病，每天練一會兒小周天、大周天，對身體似乎很有好處。

1982年，我參加在西安召開的數量經濟學年會時，會議的組織者找了七八個有特異功能的孩子，給大家表演各種人體的特異功能，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嘖嘖稱奇。表演結束後，孩子們紛紛被大家圍住問東問西。一位姓左的朋友問一個八九歲的女孩說：「你看我身上有什麼問題？」這個女孩看了他幾秒鐘說：「你左邊肝少了一塊。」這位姓左的朋友驚歎地說：「確實，我的肝動手術切了一塊。」真是不可思議。以後，全國興起了氣功熱，人們練起了各種各樣的氣功；真真假假各種特異功能，也被人們傳得神乎其神。當時，對氣功和特異功能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錢學森和張震寰認為：人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追求真理的過程。特異功能是客觀存在的，不能盲目否定、粗暴對待，應當拋棄教條主義。而文革中大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何祚庥^[633]，則批判搞特異功能是宣傳「唯靈論」。

張震寰是個老革命。他擔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員會主任期間，對國防科技曾做出重大貢獻。1985年退休後，1986年擔任了中國氣功研究會理事長。他和我說：「我考察過很多特異功能的例子，難免有不科學的成分。但盲目否定不是科學的態度，我們天天講實事求是，就要敢於面對事實。既然氣功和特異功能是客觀存在的，就應當認真進行研究。如果我們能重新認識氣功和特異功能，就會對科技進步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說：「人類社會發展了幾千年，但人對人本身的認識是很不夠的。人體的特異功能是不可否認的，我也見過不少例子。可究竟是怎麼回事，

[633] 何祚庥（1927-），安徽望江人。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研究者。

誰也說不清楚。說不清楚就應該研究，否則就永遠會不清楚。科學的發展就是把那些說不清楚的問題逐步弄清楚。」陳維仁、史維國也都贊成張震寰的看法，認為人體科學研究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應該把這項研究堅持做下去，不要扣個帽子了事。

一邊吃飯，一邊聊天，幾個氣功師也談了不少他們的看法。對為什麼有些人天生就帶有特異功能，有些人的特異功能後天才會發掘出來，有些有特異功能的小孩長大以後就沒有了，誰也說不清楚為什麼。飯局結束時，幾個氣功師說已經給我發過功了，還說我也有特異功能。我再三向張震寰和幾個氣功師表示了謝意。史維國把我送回了家，一路上他也對特異功能的神奇，連說：「難以想像！」

7-11 與朱嘉明赴南美洲考察

朱嘉明來找我，說國際所要組織一個團到南美考察，想請我參加。我說，我現在身體很不好，你再請別人吧。他說，你在國內一天也閒不住，出去走走也許身體還會好起來，而且，巴西運用外資和對付通貨膨脹的經驗，對我們也有借鑒意義。他的說法打動了我，我說：你說的有道理。那我就帶上宋國青吧，他是研究宏觀經濟的。這樣，我和朱嘉銘、宋國青，還有國際所兩個人，一起到南美以巴西為主作了 20 天訪問。

4 月 26 日，我們一行 5 人從北京起飛，途經美國的邁阿密，轉機到了巴西的里約熱內盧。雖然旅途勞頓，但里約迷人的景色還是讓人精神一振。裏約依山傍海，風景優美，氣候宜人，不愧是世界著名的旅遊勝地。我們住的旅館出門走不到 10 分鐘，就是湛藍的大西洋海灘，海灘上到處是不同膚色的人群，他們或散步、踢球，或衝浪、游泳，或沐浴陽光，還有賣各種食品、紀念品和寶石的小販。海風吹來，讓人流連忘返。裏約寬闊的海濱大道順著海灘向前伸展，人行道用黑白兩色小石子拼鑲成各種波浪形圖案，高大的棕櫚樹伴著海風婆婆起舞。遠處伸展雙臂、俯視人間的巨大耶穌雕像，在雲霧中隱約可見。

第二天一早，我們乘攬車登上了麵包山，憑欄遠眺裏約市容盡收眼底，海灣裏遊艇帆船星星點點。我們乘興又登上「耶穌山」參拜。下午，看了種著各種熱帶植物的植物園，世界最大的馬拉卡納足球場，與球王貝利的雕像合影。回到旅館，大家餘興未盡。明天一早，就要乘飛機去巴西利亞了，大家飯後又到海灘去散步，還從小販手裏買了些寶石。聽遊客說，巴西國家歌劇院晚 8 點有桑巴舞演出，不能錯過這個機會。我們趕到

劇院，節目已經開始。劇院豪華典雅，演員更是個個迷人，她們大多是混血姑娘。在熱情奔放的音樂聲中，她們身穿炫麗耀眼的服飾，抖動著曼妙的身軀，飛快地作出各種旋轉的舞姿，天使般的美讓人陶醉。

巴西利亞在巴西中部，原來是一片荒野。1956年，時任總統庫比契克為發展北部，用三年多時間建成了這座新城。1960年，巴西遷都至此。不到30年時間，這座新城已經成為一座繁榮的現代化大城市。1986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將之確定為「21世紀人類文化遺產」，並稱「它是城市設計史上的里程碑」，有「世界建築藝術博物館」的美稱。整個城市設計別出心裁，佈局像一架機頭向東且有後掠翼的噴氣式飛機。這架飛機象徵巴西是迅速發展的國家。機頭是國家的神經中樞，有三權廣場、議會、總統府和最高法院；機身前部是18座對稱的政府辦公大樓；議會大廈由眾參兩院會議廳和超高辦公樓組成，兩院會議廳是扁平體，平頂上有一仰一覆兩個碗形屋頂，上仰的是眾議院會議廳，下覆的是參議院會議廳，分別象徵民主和集中。巴西利亞的城市綠地佔60%，是首個全部由人規劃的未來城市，體現了人類精神智慧的偉大創造力。

我們專門拜訪了提出「蛋糕」理論（即所謂「只有將蛋糕做大，而後才能考慮合理分配」）的「巴西經濟奇跡之父」德爾芬·內托，向他請教巴西經濟起飛的經驗。他興致勃勃地與我們談了一上午，並指出：巴西「經濟奇跡」出現之前嚴重缺乏資金，人們爭論要不要引進外資，反對的人說「引進外資會使巴西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支持的人說「引進外資可以加快巴西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每引進100萬美元的外資，10年內可以產生300萬美元的效益。現在人們已經不爭論要不要引進外資了。

他接著說，為加快發展，大工程上的太多了，外債、內債造成了通貨膨脹，但經濟增長就會有通貨膨脹，適度的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怎麼把通貨膨脹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難題。雖然兩次石油危機對我們影響很大，幸虧我們有自己比較健全的銀行體系，也走過來了。現在人們的爭論集中在外資怎麼用才更合理，修公路，建水電、核電，要一個個來，不能過份追求規模和速度，這是一個教訓。

確實，巴西引進外資取得了不錯的經濟效益，建成了高速公路，建成了現代化工業，給人們提供了住房和小氣車。巴西的人平均國民所得已經達到3,000多美元，雖然貧富懸殊很大，但法定的失業救濟金是每周50美元，窮人的日常生活還是有保障的。等到了南美的最大城市聖保羅，才讓我們感到巴西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高，這個有1000多萬人口的城市比歐美的大城市毫不遜色，其發達程度令人驚歎。

我們在聖保羅總領館給國內發了個電報，就引進外資和通貨膨脹問題，談了巴西政界、學界的看法。並應總領館之邀，我給領館工作人員講了國內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進展，並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領館工作人員向我們反映了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1) 日本在 80 年前就有計劃地向巴西移民，現在已經有日本移民當了巴西的國會議員，而且日本的各種產品都佔領了巴西的市場，一些大城市好的地段也都被日本人買了下來。我國在這方面，一是起步太晚，二是方法不當。

(2) 我國可能是體制問題，搬到國外行不通。比如，巴西有 60 億畝可耕地，很多沒有開發，我們按生產隊方式讓一些農民來開發，結果，不出兩年，這些農民就跑光了。再如，林業部派人在亞馬遜河辦林場搞得不錯，頭頭一換就搞壞了，等等，例子很多。

(3) 還有，像日本、香港到巴西採買貨物的都是商人，他們能隨行就市買到便宜貨；而我們採買貨物的都是官員，東西便宜時沒有外匯額度沒法買，有了外匯額度東西貴了也買，淨當冤大頭，損失的都是國家。

有人說，巴西人熱情奔放，但懶散悠閒。當你看到了里約、巴西利亞和聖保羅，就不能不對巴西人的創造精神表示出由衷的欽佩。這次到南美訪問，巴西是考察的重點，一路行來大家都覺得受益非淺，顯然巴西的發展水平高於我們，他們的經驗對我們的改革開放很有借鑒作用。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不同的民族各自貢獻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只有善於學習的民族才能較快地進步。

我們訪問的第二個國家是阿根廷。從聖保羅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家匆匆地吃完午飯，馬不停蹄地去最著名的體育學校踢了幾腳足球，球星馬拉多納少年時就是在這裏學踢足球的。晚上，主人介紹我們到「探戈」發源地的小劇場，看了一場精彩的探戈表演。

第二天，一個農場主請我們去參觀他的農場，聽說他養了上千頭牛，是個中國移民。農場主帶我們參觀了農場的各種設施和牛欄，中午吃主人剛殺的小牛烤的牛排。

農場主說起自己的經歷，讓我們非常感慨。原來他是當年抗美援朝時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被美軍俘虜以後到了台灣，又移民到了阿根廷，經過多年辛勤勞作，辦起了這個養牛場。他養的牛賣到十幾個國家，也賣給中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他回國了幾次，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充滿了喜悅。但說起當年和他一起被俘後來回國的戰友，他的臉色沉重了起

來，說那些回國的戰友不是被關進了「瘋人院」、就是被當成了「四類分子」。

3天後，我們乘飛機途經還在冒煙的安第斯山，到了第三國智利的首都聖地亞哥。這是一個漂亮整潔的城市，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們生活的很舒適。我們吃飯時，詢問幾個當地人對皮諾切克的看法，他們一致地說：「皮諾切克是篡權者，我們不喜歡他。但我們喜歡他執行的路線。」原來合法總統阿連德推行激進的國有化，弄得經濟很糟糕，引起了各界的不滿。皮諾切克趁機發動了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

皮諾切克奪權後，重用在美國芝加哥留學的青年經濟學家，迅速整頓了經濟和社會秩序，使智利經濟逐步發展，人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皮諾切克確有他的成功之處，許多將軍想當部長，他說：「誰在歐美名牌大學拿了博士就讓誰當。」而且政府也很清廉。所以，我們到的地方，確實社會秩序良好，物價也既便宜又穩定。與人們談起來，大家幾乎都會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喜歡的是沒有皮諾切克的皮諾切克路線。」

中國駐智利大使館的官員告訴我們：智利的魚粉是世界上最好的，行銷全球各地。其中，香港、台灣、日本的商人最會抓機會，他們在魚粉價低的時候買進，價一上揚就又賣出，每年都賺不少錢。而我們的外貿系統則不然，魚粉價低時不來買，總是價上去了才買，年年都吃虧。更可氣的是，明明秘魯的魚粉不如智利的好，我們卻把商業當成政治，為支持秘魯的左派，花高價買秘魯的魚粉，吃虧的又是國家。

聖地亞哥市綺麗多姿，橫貫全城的奧希金斯大道林蔭覆蓋，隔不遠就有噴泉和紀念銅像，各種工藝品琳琅滿目。我們瞻仰了聖母像後，一路返回時，嘉明吹牛說，他下國際象棋是國內業餘冠軍的水平。我們買了一副國際象棋，從此開始直到回國，他和我下了幾十盤棋竟一盤都沒有贏。

我們途經秘魯的利馬，轉機到了訪問的第四國哥倫比亞。首都聖菲波哥大雖很繁華，但郊區大量貧民區的人們生活卻很困難。接著，我們途經巴拿馬飛，到了訪問的第五國墨西哥。飛機抵達墨西哥城時已經夜幕降臨，俯身下視竟是無邊無盡的燈海。乘出租車去旅館的路上，各種商店還都在經營，人來來往往熱鬧非凡。沒有想到的是，這個1,000多萬人的城市竟會如此繁榮。晚飯吃的是墨西哥餐，這個北美瑪雅文化發源地的食品味道不錯。飯後，我們上街轉了一個小時，各種貨物的豐富是國內難以比擬的。

聽墨西哥經濟學家介紹了情況以後，我們參觀了著名的瑪雅文化遺址、太陽神與月亮神金字塔。墨西哥國家博物館內，各種文物給參觀者介

紹了他們豐富的文化和歷史，博物館門前用大字刻寫著：「人啊人，你從哪裏來，又要到哪裏去？」令到訪者深思。

5月15日，我們乘機到了洛杉磯。維凌的朋友李三寶接待了我們。李三寶^[634]是哈佛大學歷史系碩士、加州大學博士，在加州大學長灘分校東亞系當主任，他的母親帶著5個未成年的孩子到了台灣，靠洗衣和縫紉把孩子們養大，並一個個上了大學讀了博士。李三寶安排我們拜訪了幾位著名的美國學者和活動家，像謝淑麗^[635]、吳家瑋^[636]、何炳棣^[637]、陶慕廉^[638]、李惠英^[639]等人，並請我們欣賞了《音樂之聲》，參觀了大學和中學的校園活動。然後，我們就滿載而歸地回北京了。

7-12 德國社會民主黨拉薩爾的精彩思想

回國後，我立即向趙紫陽彙報了這次南美之行，特別是介紹了巴西德爾芬·內托對引進外資和通貨膨脹的看法。我說：「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都會出現通貨膨脹，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也會出現通貨膨脹。特別是由於企業產權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投資膨脹、消費膨脹所形成的制度性通貨膨脹是難以避免的。當然，我們並不是鼓吹通貨膨脹，而是要承認這種客觀現實，把通貨膨脹限制在一定範圍。」

我說：「我們在巴西，早上用美元換巴西幣克魯扎多一個價，到晚上就是另一個價，早上換就會多換5-10%，他們的貨幣隨時都在貶值，人們也習慣了。而我們由於幾十年物價不變，人們對物價上漲的承受能力也就比較差。一些堅持計劃經濟的人認為物價上漲是改革帶來的，企圖用『穩定經濟』阻撓改革措施出台，只會把經濟『穩定』在舊體制內。」後來，那些搞計劃經濟的人就攻擊我們宣傳「通貨膨脹無害論」。

剛喘了口氣，休息了幾天，西德社會民主黨艾伯特基金會提出，邀請我、小強和所長助理刁新申到西德訪問。因為吳敬璉等人不斷宣傳西德當年實行艾哈德計劃採取「收緊銀根，放開價格」獲得成功的經驗，體改所的研究人員對這個看法是懷疑的，畢竟中國和西德是很不同的。我們接受了邀請，計劃訪問西德著名的五大經濟研究所。

[634] 李三寶 (1942-)，河北安國人。時任美國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東亞系主任。

[635] 謝淑麗 (Susan Shirk)，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後任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

[636] 吳家瑋 (1937-)，上海人。時任全美華人總會會長，後任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

[637] 何炳棣 (1917-)，浙江金華人。著名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638] 陶慕廉 (George Totten, 1922-2009)，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639] 李惠英 (1932-2004)，湖南湘潭人。著名社會活動家，被譽為「兩岸和平使者」。

6月12日，我們從北京飛到法蘭克福，再到波恩。西德外交部一位漂亮的女士負責陪同我們。萊茵河從波恩城中流過，把城市氣溫調節的十分宜人。波恩大學教學樓前的一大片綠茵場上，躺滿了赤身裸體曬太陽的青年男女。陪同先帶我們參觀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總部，門前豎立著該黨創始人拉薩爾的半身銅像。總部負責人熱情地向我們介紹了該黨的歷史和主張。讓我們意想不到的，過去我們在國內批判的「修正主義者」拉薩爾，竟然是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信奉的領袖。

據介紹，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在漫長的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從工人的黨轉變為人民的黨、從一個長期在野的反對黨變成了單獨或聯合治國的執政黨。之所以能如此，與拉薩爾的思想是分不開的。拉薩爾是一位發展了早期社會主義思潮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拉薩爾當年在德國工人和民眾中的名聲和影響，遠遠地超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成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

拉薩爾認為：人類社會出現不同的階級是一種客觀存在，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利益，階級之間也就會有鬥爭，但這種鬥爭要用妥協、對話的方式去解決，比如通過議會為弱者爭取利益；他不主張用階級鬥爭或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實行專政，認為不應當通過打倒一部分人、剝奪他們，去滿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他還說，一個國家或地區搞起了階級鬥爭，就會把社會撕裂，造成人為的仇恨。

拉薩爾還認為：私有財產的確會帶來不公平，但如果消滅或剝奪了私有財產，人就缺少了為自己增加財富的動力，因而將變得懶惰而不負責任，結果社會就難以進步；所以，他強調，應該保護私有財產，同時用二次分配的辦法，像所得稅、累進稅、遺產稅和社會福利等，來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應該說，拉薩爾反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的思想，至今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仍發揮著積極、正面的價值。

我們到基爾的世界經濟研究所，拜訪了世界自由經濟學家學會會長基爾什教授。會談中，我們提到中國有人說要實行艾哈德計劃的「收緊銀根，放開價格」，基爾什哈哈大笑地說：「德國可以這麼做，但是你們如果這麼做，就會遇到災難性的後果，就無異於自殺！因為你們和我們起碼有四點不一樣：一、你們沒有獨立的企業；二、你們沒有一個市場的環境和機制；三、你們沒有一批能獨立經營的企業家；四、你們沒有必要的法律」

基爾什還說：「撒切爾夫人在英國搞民營化，亞當·斯密經濟研究所幫助設計。你們要知道，每一個企業怎樣才能作到民營化？這有一系列的工程需要認真地做，比如：怎樣解決企業職工的失業問題、福利保險問題，

國有經濟的財產估價和產權歸屬問題以及民營化以後的投資和生產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一項項作具體的設計並解決。」我們感到他說的非常有道理，也不由對外電報導的鄧小平說要「價格闖關」非常擔心。

陪同帶我們去參觀了基爾北部與丹麥交界的一個小島上的天體浴場。從南往北看去，東邊是錯落有致、各具特色的一座座小別墅，西邊則是一眼望不盡的海灘。海灘上，各種膚色的男女老少，或躺或臥或坐或戲水或衝浪，人人都在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享受著。越往北走，一絲不掛的天體越多，我們這幾個穿著衣服的人走過去倒顯得很尷尬。藍天大海白雲沙灘與大大小小的天體，融成了一幅美妙的天人合一圖畫，讓人看得流連忘返。

接著，我們先後拜訪了漢堡經濟研究所、柏林德意志經濟研究所、埃森經濟研究所和慕尼黑經濟研究所，向他們學習如何進行宏觀景氣分析、如何進行企業跟蹤分析以及如何作經濟增長、經濟週期預測的方法和經驗，並達成了體改所向他們派研究人員進修的合作協議。年底時，我請彭照平到慕尼黑經濟研究所學習企業分析、程曉農到柏林德意志經濟研究所學習宏觀分析，以彌補我們在這方面的不足。

期間，大眾汽車公司請我們到沃爾夫堡廠區參觀。午餐吃得很昂貴，公司總裁介紹說：我們招待貴賓才能吃上這些東西，比如，這一盤沙拉，裏面的蘑菇是意大利橡樹林裏野生的，還是野豬用牙拱出來的。說到今年的歐洲杯，我說我也是個足球迷，公司總裁說，我請你看一場。誰知，我正在慕尼黑那家希特勒發動政變的啤酒館喝啤酒時，大眾汽車公司總裁竟派人給我送來了一張歐洲杯決賽的球票。德國人辦事的認真從中可見一斑。

歐洲杯舉辦期間，歐洲各國都會狂歡起來，比任何節日都牽動人們的神經，慕尼黑已經成了歡樂的海洋。今年獲得決賽權的是荷蘭與蘇聯，滿城都是身著杏黃色衣服的荷蘭人及球迷，他們臉上畫著圖案，唱啊跳啊地一直到通宵。幾個荷蘭人讓我在他們的背心上題字，我給他們寫了大大的「荷蘭必勝」幾個字，他們高興地一個個和我擁抱。蘇聯人揹著很大的北極熊，也在街上跳，但人數和氣勢上則比荷蘭人差得多。

6月25日，歐洲杯決賽在慕尼黑奧林匹克體育場舉行，體育場周圍熱鬧非凡，球迷人頭攢動地擠來擠去，想買到黃牛票。我的票是3,000馬克，出手可以賣8,000馬克，但我是不可能賣的。決賽場面精彩紛呈，荷蘭古利特和巴斯滕的球藝高超，特別是巴斯滕在右角的平行進球簡直奇妙

的不可思議。整個球場7萬多人的歡呼，像山呼海嘯一般聲震四野，讓我享受了一場從未經歷過的足球盛宴。人們這樣活著，是多麼地愜意啊。

我參觀柏林牆時，從西柏林這邊登上一個往東瞭望的小臺子，看到東柏林那邊靠牆200米之內是不准任何人靠近的。聽陪同介紹說，不少從東柏林往西柏林跑的人，都被東德的警察開槍打死了。我對記者感慨地說：「如果一種制度是合理的，為什麼要用一堵牆把一個民族的人隔離起來呢？這不僅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看著柏林牆下放著的無數紀念死難者的鮮花，我很悵然。

陪同帶我們參觀了科隆大教堂。這是德國的第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大教堂，與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羅馬聖彼得大教堂並稱歐洲三大宗教建築。教堂用大理石砌成，其內外雕刻皆似鬼斧神工，森然矗立的高大石柱、鮮艷繽紛的彩色玻璃、精緻的拱廊式屋頂及凌空升騰的雙塔均氣勢傲然。登上509個階梯的鍾塔，可以看到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吊鐘，並飽覽萊茵河與科隆市無盡的瑰麗美景。

中國留德學生聯合會會長李波^{【640】}，邀請我們和留學生進行了一場對話，並帶我們到斯圖加特大學經濟和社會學院作了一場報告。中國留德科學技術協會會長李金鎧^{【641】}是我的老朋友，他是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642】}的學生，因受到不公正對待，遂出國發展到德國當了教授。他也請我給他和他的朋友們講了國內改革開放的進展和問題，似乎出了國的中國人，更關心國內的局勢與各種存在的問題，是否能夠順利解決。

德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國人對工作認真負責，對朋友彬彬有禮，整個社會顯得和諧融洽。無論你走到那裏，都見不到吵嘴、罵人、打架這類不文明的行為；無論你走到那裏，都是秩序井然、遵守法紀的文明景象。晚上和周末，到處都是民間自組織的各種音樂演奏活動。孩子們則從小就很自立，八九歲的時候就每人揹一個挎包，一隊隊地由一位老師帶領，到歐洲各國去旅遊。我國要達到這種發展程度，恐怕還要很多年。

7-13 鄧小平的「價格闖關」帶來了麻煩

6月28日，我們回到北京。鄧小平喜歡「拍板」，不知是受了誰的慫恿，他老人家從5月19日到6月3日，連續向外賓放話，說中國要實行「價格闖關」。人老了，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可以理解。但這麼重大的問

【640】李波，中國留德學生聯合會會長。

【641】李金鎧，時任中國留德科學技術協會會長。

【642】黎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中國著名語言學家。

題，不經過反覆論證，就蒼促之間決定了，怎麼會不出問題呢？解決經濟問題可與打仗是很不同的。我聽了各研究室研究人員對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的分析，感到局勢很複雜。

政治體制改革遇到了極大的阻力。比如說，黨政分開的一些措施，像取消黨組、取消黨與政府重疊的對口部門、取消不在政府任職又分管政府事務的黨的副書記和常委時，馬上就遭到從中央到地方黨的幹部的反對。又比如，實行公務員制度也出現了困難，中央組織部認為「條件不成熟」。即使是機構改革也變成了修修補補，更不要說在中央建立程序、制度和規則了，因為老人們已經習慣了「權大於法」。

而經濟體制改革也停滯不前。中共十三大提出，企業改革應該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過去的簡政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並沒能有效解決公有企業的活力問題，因為公有企業的財產仍缺少責任人，故此需要在企業承包的基礎上進行股份化試驗。但這個改革被守舊派王震公開批評是「搞資本主義的一套」。而當時出現的通貨膨脹，既造成了民眾的不滿，又給李鵬、姚依林找到了反對改革的藉口。

趙紫陽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說，在改革的過程中，一定的物價上漲是不可避免的。1987年雖然物價上升多了一些，但是，無論從工農業的增長速度、基本建設的投資、外貿的進出口，還是從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來看，經濟的基本狀況都是好的。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能因為群眾對價格上升過高有意見，就改變改革的決心。只有深入改革才能解決問題。而李鵬、姚依林則認為，「經濟狀況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

社會的不滿意程度在增加。由於新舊體制並存，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企業改革未能深入，政治體制改革又受阻，人們不僅對物價上漲不滿，而且對各種社會不公的不滿、特別是對「機會不均」的不滿也更強烈了；民眾對改革的過高期望，則因為難以實現其需求而轉化為失望；對改革可能出現的代價與風險，大多數民眾也承受能力不夠；而對改革中體制轉變的長期性，則普遍估計不足。

為了突破改革的困境，趙紫陽先後提出了「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5月初，鄧小平接受了「長痛不如短痛」的觀點，要求政治局常委研究一下，能不能在3到5年內完成價格改革。趙紫陽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意見則對價格改革持穩妥的態度，提出價格改革要顧及民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並要配套進行工資改革，以免民眾的生活受影響。

從鄧小平提出「價格闖關」以後，各種報刊上也紛紛登出支持「價格闖關」的文章。因為李鵬不懂經濟，就在姚依林的主持下，由國家計委制定價格改革方案。後來，我聽國家計委農林水局局長王立新^{【643】}說，姚依林在制定一個大的價格調整方案的同時，還在悄悄搞一個治理整頓的方案。明顯的是，一直深信計劃經濟的姚依林，也不相信這個自己制定的價格調整方案能夠成功，故而早就在做改革失敗的謀劃了。

我主持召開了所務會議，又反覆進行討論以後，決定請各研究室圍繞價格改革問題給中央寫一組報告，提出：價格改革是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攻關，解決價格合理化的問題必須解決企業的獨立自主、自負贏虧問題，解決銀行的獨立經營問題，解決合理的稅收制度問題，解決福利保障制度問題，解決企業職工的失業救濟問題；若不能推動這些根本問題的改革，只對價格進行調整、或放開價格就不會成功，還可能出現搶購和擠兌。

一般民眾並不知道上層的複雜鬥爭。在姚依林為應付鄧小平給「價格闖關」造勢時，實際上就起到了煽動恐慌心理、火上澆油的作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討論姚依林制定的價格改革方案，趙紫陽說：「要考慮到方案出台後，一是怎麼保證不出大問題，二是配套改革怎麼進行。要避免出現東歐改來改去又出現比價復歸。我們要把企業推向市場，由市場決定價格。」

當時，安志文在北戴河告訴我，他提醒趙紫陽說：「如果這個物價上漲90%的價格調整方案，能換來新的機制，換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換來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那就是值得的。否則，冒了風險又不解決問題，就需要重新考慮。」趙紫陽看了體改所上送的7個報告，在省部級官員討論價格改革的會議上說：「體改所送來了7個報告，認為價格改革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層次攻關，希望大家都能認真的看一看。」

就在價格調整方案還沒有實施，只是8月19日在中央台播出消息後，立即引起了全國性的搶購和擠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局面。記得我剛從北戴河回到北京，田紀雲就找我去談。他問我：「你對當前出現的搶購和擠兌怎麼看？」我說：「群眾的搶購和擠兌可以說是一件好事，它把現在這個價格改革的方案沖掉了。否則，明年恐怕會天下大亂。」他又問我：「制定這個方案你們沒有參加嗎？」我說：「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很訝異。

8月底到9月初，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決定重新考慮有關價格改革問題。為了盡快地穩定經濟和人心，趙紫陽提出了要進行治理整頓，他說：「價格一定要改。但現在擠兌、官倒、中間環節盤

【643】王立新，曾任國家計委農林水局局長。

剝、地方政府行為這四個問題最複雜。明年要治理經濟環境，價格改革要推遲。目前，一是群眾承受能力差，二是要整頓秩序，這就要加強領導。」從「建新秩序」轉到「整頓秩序」，從「價格闖關」轉到「治理環境」，從「發展民主」轉到「加強領導」，中國的政治局勢就這樣，在1988年夏發生了轉折。

匈牙利1968年到1973年主持改革的總理福克，10月到北京訪問時，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經濟改革中肯定會出現經濟不平衡，那麼，究竟該怎麼辦？是堅持在改革中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解決了不平衡問題再去改革？」我說：「你提的問題很有意思，我很想聽聽你的看法。」他說：「可惜的是，匈牙利1973年的改革失敗，就是因為採取了第二種策略。」我說：「你的意見非常有道理。」我把福克的看法轉告了趙紫陽，他點著頭但沉默不語。

鄧小平急於求成的「價格闖關」帶來了麻煩。陳雲指示姚依林立即實行治理整頓的方案，重新恢復計劃管理部門對經濟活動的廣泛控制。鄧小平在「價格闖關」失敗的現實面前，也不得不同意了陳雲的意見。實際上，中國80年代的經濟改革就此止步了。

7-14 學潮分析：原因、後果及對策

如前所述，楊冠三和白南風曾先後組織了14次大規模的社會心理調查，這在當時各個研究所裏是從來沒有的研究領域。體改所社會研究室與社會輿論調查室組織的「改革中的社會階層和利益調節課題組」，完成了《學潮分析：原因、後果及對策》的報告。這個報告指出：

1988年6月2日至11日，由柴慶豐事件引發，北京大學出現了大字報、集會和演講等，並曾醞釀上街遊行和靜坐，形成1985年以來的第三次學潮。

我國改革將進入攻堅過關的關鍵時期，社會穩定已成為舉足輕重的問題。準確把握當前大學生的需求和心理狀況，對近年來頻繁出現的學潮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尋找根本性的解決方法，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義。為此，我們在這次學潮形成前、學潮中和學潮結束後分別對大學生進行了3次問卷調查。^{【644】}

一、造成學潮的主要原因

【644】3次調查的情況：學潮前調查，1988年5月26日進行，樣本460人；學潮中調查，6月8日上午進行（該日下午是學生預定遊行的時間），樣本250人；學潮後調查6月13日進行，樣本271人。

表面看來，在歷次學潮中，都出現過一些政治上不夠成熟、過激甚至有錯誤傾向的提法和口號。然而調查的結果表明，學潮的形成有著內容更為廣泛複雜的原因。

1. 社會原因

最根本的社會原因是，我國體制中存在著的一些短期內難以克服或根除的弊病，而大學生又缺乏「治病」實踐的機會。調查中，76.3%的人認為，造成這次6月學期的社會原因是「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在11項原因中高居首位；其次，是知識分子待遇問題。與前兩次學潮相比，此類原因在這次學潮中明顯地突出起來。60.4%的人認為，學潮的原因是「知識分子經濟地位低」，居第二位；37.4%的人認為是「知識分子政治地位低」，位居第四。這說明，在改革帶來的利益格局變化下，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強烈；此外，認為主要原因是「法制和社會治安狀況太差」的人佔47.8%，居第三位。

2. 當代大學生的特點

上述類型的社會原因，其他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也都同樣面對，為什麼只有大學生頻繁地掀起風潮？顯然這是與大學生的特點有關的。

特點之一，是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意願非常強烈。在我們過去的歷次調查中，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期望都明顯高於其他社會群體。在回答1986年學潮的主要原因時，62.4%的人認為，是由於「學生的民主意識與參政意識日益加強」，在7項原因中名列榜首。

特點之二，是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較強，振興中華的願望強烈，同時也往往把自己應起的作用想像得過高。對於1985年9月學潮的原因，58.1%的人認為，是「想激起全民對民族前途的憂患意識」，位居第一；21.5%的人認為，是「顯示大學生在社會劇變過程中的作用和力量」位居第三。

特點之三，是大學生對社會缺乏深刻認識，思想方式比較簡單，理想色彩濃厚。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沒有任何就業經歷和基層工作體驗，對中國的實際知之甚少，卻又自視較高，這妨礙了他們冷靜、深入和全面地分析問題。縱觀歷次學潮，其思想內容大多偏激、空洞，照搬西方教科書的色彩很濃。目前，大學生中已有不少人認識到了這一點。在我們的調查中，有13.1%的人認為，發生1986年學潮的主要原因是「學生缺乏對社會的深刻認識，思想過於簡單、激進」，在7項原因中位居第五。此次學潮中一份題為《對北大文化深層矛盾的初步反思》的大字報也說到「要求社會

單純無瑕，無法理解許多現實問題的客觀必然性，這反映我們政治上的幼稚，思想上的簡單」。

特點之四，是大學生對改革和經濟發展速度要求較高，缺乏耐性和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做實際工作的精神，總想一下子解決中國的所有主要問題。如做不到，便很容易降低自己對改革和現狀的評價及信心，甚至走向消極。在我們過去的調查中，大學生中認為改革速度太慢的人數比例，總是高於其他任何社會群體；與此相應，他們對改革形勢的評價也往往低於其他群體。在本次調查中，認為改革速度較慢或太慢的人數比例達41.3%，遠超過作出相反選擇的人數比例20.5%。

特點之五，是大學生的壓抑感和挫折感很強，情緒容易波動，容易失去信心。他們對各方面要求都較高，是政治參與期望、社會期望、經濟期望都比較高的群體，同時又處於心理狀況不穩定的青年時期。這樣，在這些期望和需求難以滿足的現實情況下，他們往往感到壓抑或彷徨，尋求發洩的機會。在我們對學潮前和學潮後兩次調查中，感覺「壓抑，想幹幹不了」的人數比例分別為21.1%和27.5%，感覺「彷徨，不知怎麼辦」的人數比例分別為24.9%和25.2%，在各種心理狀況中均居第一、二位。高達34.8%的人認為，此次6月學期的主要原因是「很多人沒有明確目的，只是想發洩」，在11項原因中位居第五。11.1%的人認為，1985年9月學潮中「少數人有理性判斷，大多數人是跟著起哄」。

特點之六，是大學生中的許多人具有優越感，這使他們對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改革，同樣存在著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問題。近年來，社會利益分自己格局的變動、教育制度改革帶來的畢業生分配「雙向選擇」，使習慣於認為自己（及知識分子）的地位就應該優越於其他社會群體的大學生具有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個體戶的高收入，用人單位不再像對待「金娃娃」那樣搶著、捧著大學生，都直接或間接地引起大學生的失落感和憤懣情緒。在我們的調查中，自認為接受現代文明最超前和以改革、振興為己任的大學生，竟有16.1%不贊成「對高校畢業生分配製度進行改革，改變統包統分，實行自由擇業」，還有37.6%的人認為不好說，贊成的人僅有44.1%，不及半數。

特點之七，是大學生的逆反心理很強。前述大字報中談到「凡是上頭講的就不信，凡是中國講的就不信，凡是組織講的就不信，似乎已成為不少學生的思維定式」。

3. 學潮參加者的動機和行為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大學生參加學潮的主要動機是憂國憂民，想為振興中華貢獻力量。一位大學一年級的文科學生在我們的調查問卷上寫道「極端地為民族前途擔憂，也為共產黨的前途擔憂」。他們並非改革的反對者，但由於大學生的一些特點所決定，他們在思想和行為上往往簡單而偏激。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忽視大學生們在學潮中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合理的、符合實際的想法。

二、目前我們採取的封策及其後果

歷次學潮，都在我們的大量工作下短期內結束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疏導工作，再加上事實的教育，取得了一些良好成果，大學生們比過去成熟了一些。在此次6月學潮中，有人提出將物價問題列入口號，遭到絕大多數學生的反對。他們認為，這將給中央的改革戰略部署帶來干擾和增加不利因素。關於擬議中的遊行未如期舉行的原因，30.1%的人認為，是「根據以往的經驗，遊行也沒有用」，29.0%的人認為，是「不少人對遊行是否能達到預定目標表示懷疑」，甚至有高達27.1%的人認為，是「許多人對遊行的後果把握不住，擔心會影響改革大業」，它們分別佔9項原因的第二、三、四位。

但是，不能不說疏導工作在我們的學潮對策中並未發揮主要作用，我們更多的是靠一些強制性措施起較大作用。63.2%的人認為，遊行未如期舉行的最重要原因是「官方表示要對遊行從嚴處理」，位居9項原因之首。

強制性措施並非壞措施，在維持社會正常秩序上，它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僅僅依靠它是不夠的。遊行胎死腹中，學潮迅速結束，從表面上看，此次學潮的處理效果明顯。但根據前面對學潮原因的分析，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由於造成學潮的主要原因并未消除，從長遠看，存在著再次發生學潮的隱患；第二，由當代大學生的特性所決定，簡單以強制性措施為主的對策，有可能降低大學生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感和親近感，降低他們對改革的評價。

幾次學潮的處理結果，並未使大學生的不滿得到緩解。在這次學潮結束後的調查中，僅有11.1%的人對「政府在這次事件中採取的控制措施」表示滿意，而表示不滿意的人高達52.9%。因此，大學生中對政府的信任感和親近感下降的傾向日益明顯。根據此次學潮後調查，38.8%的人表示，自己對政府的信任感減弱了，表示加強了的人僅有2.3%；34.0%的人表示對政府感到疏遠了，感到親近了的人僅有2.6%。學潮中和學潮後兩次調查結果，對政府領導改革沒有信心的人數比例分別為22.5%和

24.2%，認為政府不理解或不太理解當今大學生的人數比例分別為 90.6% 和 92.8%。

大學生對改革的評價和信心也在下降。對比學潮前和學潮後兩次調查，認為「當前的改革形勢很好或較好」的人數比例從 25.7% 下降到 14.9%，而認為「較差或很差」的人數比例則從 21.9% 上升到 40.5%；認為「改革有成功希望」的人數比例從 47.4% 下降 39.4%，而認為「沒希望」的人數比例則從 13.2% 上升到 14.2%，認為「難說」的人數比例從 24.3% 上升到 31.8%。

強制性措施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當代大學生心理狀況中的消極面。從學潮前和學潮後兩次調查看，表示「振奮、充滿信心」的人數比例從 16.4% 下降到 13.7%，表示「彷徨，不知怎麼辦」的人數比例從 24.9% 上升到 25.2%，表示「壓抑，想幹幹不了」的人數比例從 21.1% 上升到 27.5%，表示「無聊，什麼也不想幹，不想思考」的人數比例從 11.4% 上升到 13.4%，一些人在調查問卷中寫上「隨風飄蕩」、「無可奈何，走一步看一步」、「準備撈世界」、「為自己謀出路」這樣的話。

因此，從長遠看，單純的強制性措施不足以構成全面而有效的學潮對策。它不僅沒有消除造成學潮的主要原因，反而有可能強化當今大學生特點中導致學潮的各個因素。調查中，36.1% 的人認為學潮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上一些人對學生不理解，採取了不適當的對策，使得問題越變越大，釀成學潮」，這一條在 7 項原因中高居第二位。此次學潮中，52.4% 的人認為「在目前情況下，除遊行外，沒有其他表達意願和意見的有效渠道」，學潮結束後，這個比例上升到 65.7%。如果政府與大學生直接對話，充分傾聽他們的意見，情況也許就不是這樣。

結論：我們的對策應以疏導為主，強制性措施為輔。要致力於引導、消化、分散和削弱導致學潮的各項原因，尤其是當今大學生特點中的重要的不穩定因素。

三、學潮引起社會失穩的可能性

學潮雖是個別社會群體的局部不穩定現象，卻有可能引起較大規模的社會失穩。

與其他社會群體相比，大學生的利益是很不獨立的，因為大學生不是一個職業概念。相對而言，可以說大學生沒有現實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歷次學潮中，大學生首先關心的是國家大事，而不是自己的利益。這與工人、農民等其他社會群體有很大區別。正因為如此，便隱含了這樣的可能：大學生與某些利益群體結合起來，將自己較為空洞和不現實的口號及

設想變為與某些階層的具體利益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可能如果轉化為現實，將會導致嚴重得多的社會危機。另一方面，大學生由「虛鬧」向「實鬧」轉化，以知識分子的名義提出具體的利益要求，預示著不同利益群體間的相互攀比將進一步強化。工人群體的攀比心理和收入要求已給工資改革、勞動制度改革和企業改革帶來很大困難，其他社會群體若加入進來，將使各群體的攀比要求普遍高漲，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越來越大，社會失穩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目前，我們的改革已進入第十個年頭，利益格局變動和機會不均等現象已十分突出，各階層都有不少不滿。前幾年，工人的不滿較突出，現在知識分子和幹部的不滿也日益增強。而我們恰恰又處於需要以社會穩定作為堅實基礎的改革攻堅的緊要關頭，也許可以說，日前是改革的社會心理問題最嚴峻和最關鍵的時期。學潮問題的解決，已成為非常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四、一些對策設想

1. 安全閥機制

一個社會如果缺乏適當的提供公眾發表意見和發洩不滿的渠道，就像一個裝滿蒸汽的無孔鐵罐，不爆發則已，一爆發就不可收拾。這方面，許多國家都有成功的經驗。如日本的「春斗」鬥就是典型的安全閥機制。另一方面，社會的進步、有效的決策和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協調，也有賴於公共參與渠道的增加和規則化。

具體到大學生，首先是政府與他們的直接對話。從調查中看，大學生最重視這種方式。在回答「此次學潮之後，你認為再遇到類似情況時，採取哪種參與方式為好」的問題時，高達63.8%的人選擇「大學生與政府直接對話」，居8種方式之首。在回答「你認為政府在類似事件中採取何種政策為好」時，40.2%的人選擇「政府高級官員與學生自由對話」居4種政策之首。應該防患於未然，學潮起來後再開始對話，已使對話變得困難。建議在有關部門專設一個或一些專門和大學生保持日常對話的機構，凡是來訪的學生（個人私事除外），一律接待不誤，傾聽他們的意見，與他們平等對話。日本通產省在調節企業或有關社會群體間的利益矛盾時，做法是坐在那裏聽來訪者將一切意見或對政策的不滿說盡。這樣，即使將來出台的政策未按採訪者的意見加以修改，提意見的人也會認為政府已經耐心聽取了自己的意見，未採納是因為政策中不可能容納所有人的意見，使所有人都滿意。

其次是校園民主。調查中，大學生們優先選擇的第二種參與方式是「在校內設立公開論壇進行口頭討論」，人數比例為 36.2%。本次學潮中，出現了自發的公開論壇，許多人在那裏公開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因此，雖然遊行「流產」，大字報迅速取消，表示自己的心理狀態是「想發洩」的人數比例仍從學潮前的 8.1% 下降到學期後的 4.2%。大學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後，心理狀況開始趨向穩定，對社會的看法也日趨成熟，而在校園中，他們卻是「騷動的一群」。校園有一定的封閉性，可以考慮在「校園民主」方面做些文章，使大學生們有些日常的公開發表意見和「發洩」的機會、渠道。

總之，要想些辦法進一步滿足大學生日常的政治參與願望，不要使他們老「憋」著。如果學潮成了他們唯一的「發洩」渠道，學潮便會頻繁發生。另一方面，當學潮已經發生，就更需要政府與大學生的直接對話，以免刺激或迫使學生採取更激烈的形式。如果做到這一點，絕大多數大學生們並不願意採取激烈行動。根據學潮後調查，在對類似此次情況下的參與方式進行選擇時，大字報、遊行、集會只分別居大學生選擇序列的第三、四、五位，比例為 26.5%、25.7% 和 19.5%，遠低於「對話」和「公開論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認為在此類事件中「政府完全放任學生，不聞不問」是最佳政策的人，在調查中只有一個，僅佔全體調查對象 271 人的 0.4%。

2. 社會規則化與合理機會

大學生沒有現實的既得利益，卻有預期的利益，因為只要考入大學，就已確定了將來的身份是幹部，其未來職業無非是專業人員、黨政幹部、企業幹部或技術人員等等。這些職業都是以其社會地位和聲望為主要職業資源的。換句話說，人們之所以選擇這樣的職業，主要是看重它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職業聲望，而不僅是收入。因此，在大學生的各種期望中，社會地位是最主要的。在回答「你希望通過上大學獲得什麼」這一問題時，37.4% 的人表示，希望獲得社會地位，位居 6 項選擇之首 1；而選擇經濟地位的僅有 18.0%，居倒數第一位。

然而，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恰恰是滿足社會地位期望的方式最無規則，機會最不均等。例如，職務的晉陞，往往不是憑能力或刻苦工作，而是依據木人與上級領導的關係或其擁有的關係網。無論是對公務員還是對專業人員，我們從未實行過一套哪怕是效果不大的統一的績效考評制度。這樣，人們無法對自己的前途作出合理預期，既沒有努力學習和工作的動力，也沒有按步就班遵循一定社會規範渡過人生的意願，只會不斷滋生出類似「懷才不遇」、「社會不公平」之類的意識，其結果，許多社會地位期

望高的人不是混日子，就是要鬧事。大學生對此問題更為敏感，雖然前面談到有 37.4% 的大學生希望獲得社會地位，然而卻只有 28.1% 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大學畢業後將實際得到社會地位，位次從第一降到了第三；甚至還有 20.0% 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將什麼也得不到。

關鍵是通過社會的規則化，形成有規則可預期的合理機會。不僅有利於提高幹部素質和行政效率，也有利於社會穩定。

3. 知識分子待遇與競爭機制

知識分子並不具有比其他社會群體優越的天賦之權，但是，從民族和國家的長遠發展來看，目前我國的知識分子在經濟地位上是偏低的。為保證知識分子素質的不斷提高和減少人才流失，我們必須逐步提高他們的待遇。但這起碼面臨著三點困難 (1) 國家財政能力有限；(2) 其他職業群體的攀比；(3) 專業人員隊伍中亦存在濫竽充數之輩，若不分青紅皂白一律長工資，不僅會引起其他社會群體的不滿，也無助於提高知識分子素質。

在目前情況下，可以考慮大學、科研等事業單位逐步採取工資總額包乾方式，取消職稱評定，直接採用聘任制。這樣，用人單位要考慮聘任有真才實學和確實能完成工作者從事各級各類工作，不養閒人。多餘工資總額部分，用來給被聘任者長工資。本學年或年度未被聘任或續聘者，轉向其他單位甚至次一流單位尋求機會，或改行。這樣，既可達到提高待遇的目標，亦可解決前述困難；國家財政支出不必有大的增加；其他職業群體亦無法攀比（並非國家出錢讓專業人員普遍長工資）；同時在知識分子中引進了競爭和淘汰機制，使他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由供需決定。

4. 社會動員與社會穩定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過一個公式：社會動員 / 經濟發展 = 社會挫折。意思是，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動員越廣泛，社會挫折越大，除非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常高。因此，社會動員不宜過早、過大。這一點值得我們考慮。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推進改革，都不得不作了廣泛的社會動員。但社會動員是雙刃劍，它雖然造成了改革的聲勢，卻也同時提高了公眾對改革的期望。改革的社會動員不僅使收入期望提高，也使政治參與期望提高了。1986 年的全國性學潮，與 1986 年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大張旗鼓的宣傳直接相關。而這些期望都是在短期內甚至較長時期內難以滿足的，這就加強了社會不穩定因素。在改革面臨攻堅過關的時刻，如何既能統一認識又避免過分的社會動員，有效地防止公眾期望的進一步提高，是一個需要立即加以研究的重要問題。

很明顯地是，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看了這樣的調查分析，也會覺得對決策起的是正面積極的作用。趙紫陽雖然立即將這個報告批示給了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委，請他們認真研究，但李鵬和李錫銘卻將之束之高閣。而且在「六四」以後，竟無理地把體改所這些幾年來一直努力作社會輿論調查的研究骨幹，像楊冠三、白南風、楊曉等人一個個抓進了監獄，因為他們從實際中來的調查結論，不符合那些充滿階級鬥爭觀念的領導人的胃口。

7-15 參與組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

經過了半年多的籌備，1988年7月12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成立大會。研究會的宗旨是：「廣泛聯絡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的團體和個人，通過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為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服務。」研究會雖然自我定性為「全國性的群眾學術團體」，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這個主題在中國的特殊敏感性，就不能不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

研究會成立前，已經發展會員1,200多人。400多名會員參加了成立大會，會上通過了籌備組提出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章程》，選舉了理事會和常設機構。按照章程，研究會的領導機構是會員代表大會，執行機構是理事會。理事會的常設機構是常委理事會，由會長、副會長、幹事長、副幹事長組成；常委理事會的辦事機構是幹事會，由幹事長、副幹事長和各部主任、副主任組成；幹事會設會務、研究、聯絡、出版、事業部。

研究會的名譽會長是元老薄一波，會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周傑，副會長是中央黨校副秘書長史維國、我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高放，幹事長是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主任杜光，副幹事長是唐昕、盛斌、朱滿良，顧問由各有關部委的領導人於恩光、劉澤彭、李定、李淑錚、杜潤生、范榮康、趙東宛、趙復三、賀光輝、宦鄉、高揚、崔乃夫、錢其琛、郭超人、曹志、龔育之、尉建行、鮑彤、蔡誠等24人組成。

研究會成立後，還陸續成立了幾個民間性的研究所。包括：國家公務員研究所，社會調查所，環太平洋研究所，國際情報信息研究所，政治理論研究所；已經上報準備成立的還有縣級政權建設研究所、祖國統一理論研究所、政黨制度研究所、黨的章程研究所、黨內民主與黨的建設研究

所、政治發展戰略研究所；正準備建立的有湖北孝感的社會調查中心、沙市的企業領導體制研究會。

7月18日，研究會常務理事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1988-1989年工作計劃綱要》。這個綱要規範了研究會此後一年的活動，一共18項活動分別由五個部組織實施。雖然因為「六四」的發生而政治形勢突變，研究會不得不在1989年7月停止活動，但一年來，在那個改革形勢即將發生逆轉的歲月裏，研究會的骨幹一天也沒有停止地，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理論、鼓吹宣傳。

有一項重要任務沒有列入工作綱要，就是繼續完成《政治體制研究叢書》的編輯工作。鄧小平題字的《政治體制研究叢書》，各卷按3個部分彙編：第一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中外政治家、思想家的論述，及有關的重要文獻；第二部分是中國歷史上有關制度的改革，解放以來有關制度的改革，社會主義各國有關制度的比較，西方國家有關制度的比較；第三部分是解放以來、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有關理論觀點摘編以及重要書目、論文索引。

1988年5月，叢書的書稿全部交給了華夏出版社，10月出版社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了《政治體制研究叢書——資料卷》新聞發佈會，預計1989年9月叢書全部出齊。「六四」以後，因為書中收有胡耀邦、趙紫陽的講話、文章，編委會和編輯部的名單裏有鮑彤、嚴家其和我的名字，都成了不許出現的禁忌，可惜這套書被封殺了。印好的書只能堆在倉庫裏，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見天日。

研究會籌備期間，就醞釀要創辦一份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主題的刊物。8月，北京新聞出版局批准了研究會出版會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會刊由老資格的著名政治理論家、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主任、研究會幹事長杜光擔任主編。這份刊物可能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報刊史上唯一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主題的刊物。自1989年1月15日這份刊物創刊起，就不落俗套地發表了各種有創見的文章，但它的生命只有半年，「六四」後也停辦了。

8月，李湘魯告訴我，韓國總統盧泰愚想請我參觀漢城奧運會，不知北朝鮮怎麼知道了，竟威脅說如果我去韓國生命沒有保障。參觀奧運會是很誘人的，但為了不節外生枝，由李湘魯代表我去。李湘魯從韓國回來時，還帶來了盧泰愚送我的精美領帶和一套奧運會的金、銀、銅牌作為紀念。10月，李顯龍^[645]請我訪問新加坡，我實在太忙離不開，就請李湘魯、張煒帶隊去了。

【645】李顯龍（1952-），新加坡籍華人。李光耀之子，時任新加坡副總理。

9月，從治理整頓開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都停滯了。成立剛剛兩個月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就面臨著十分困難的局面。無論是領導機構的政策指導，還是廣大民眾的關切重點，都已經離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的活動當然不能不受到嚴重的制約，以致雖然下工夫組織活動，卻往往收效甚微。儘管如此，掛靠在中央黨校的研究會，在史維國、杜光的主持下，還是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

這時，體改所倒是辦成了一件大事。在吳義章的主持和李樹香的協助下，經過三年的努力，體改所終於給職工蓋好了住房。總算要結束從「發展組」到「體改所」，八年「打游擊，沒住房」的歷史了，我感到很欣慰。蓋了140套住房，賣掉50套還清借款，所裏還能有90套。所裏每個人都很高興，因為北京的住房問題實在是很難解決的。所裏由工會組織了「分房委員會」，根據年資、學歷、職稱、職務和貢獻進行了評分。為了公平，每個人的住房評分都張榜公佈，讓大家評議。助理研究員基本上都可以分到7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體改所這次分房很公平，大家都十分滿意。何維凌找到我和小強，希望能給他分一套住房，考慮到他對發展組和體改所的貢獻，我們商議後給他分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大家都有了住房，我也該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了。那時，我還借住在社科院紫竹院1號樓34平方米的房子裏。根據國務院的規定，我可以住使用面積120平方米的房子。為了工作方便，北京市東城區區委書記李鐵林^[646]，給我換了一套在安貞橋的住房。因為在政改辦工作時，我有一次去波蘭訪問的機會，讓給了我的副手陳福今。為此，他很感動，請我到他家去吃飯。他家在和平裏煤炭部宿舍，竟住了兩套四室一廳的房子。說起我至今還沒有住房，他自告奮勇地說，我給你往中辦反映一下。我說：「不必了，個人的小事不算甚麼。」

我從1978年底回到北京已經10年，每天思考的都是怎麼能促成中國的進步，至今還沒有一套自己的住房，當時北京像我這樣的情況是很少見的。李鐵林幫我找到一套安貞橋的房子，使用面積是78平方米，不違反國家規定，我就開始請人進行裝修了。遺憾的是，房子還正在裝修，「六四」就發生了，我一天都沒有住進去過。真應了社科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常明生所說：「這年頭，你不維護自己的利益，誰管你？」這句話。

可歎的是，那些製造「六四」血案的既得利益者，竟不僅知法犯法像文革中一樣抄走了我在紫竹院借住的房子裏的所有東西，而且還昧心地誣

[646] 李鐵林(1943-)，湖南長沙人。時任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區委書記，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陷我在北京有3套住房。說起來實在可笑，所謂我的3套住房，一套指體改所在陶然亭蓋好又賣掉的房子，一套指社科院借我住的紫竹院的房子，一套就是指安貞橋的房子。後來，《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647】}要採訪我這件事，我覺得那麼多熱血青年都死於非命了，這又能算個什麼事呢？就沒有談。

7-16「治理整頓」成了李鵬、姚依林大搞復舊的借口

「價格闖關」遇到了挫折，給了李鵬、姚依林恢復計劃經濟的藉口。本來兩種體制並存就矛盾交織，民眾對社會不公的不滿、對以權謀私的不滿、對秩序混亂的不滿、對改革停滯的不滿，掩蓋了改革給自己帶來的好處，懷疑改革的情緒在蔓延。各種順口溜在民間流傳：什麼「富了投機倒把的，窮了奉公守法的」，什麼「經濟秩序亂哄哄，官倒私倒樂心中」，什麼「中央是無主義政府，地方是無政府主義」，等等。

趙紫陽在9月下旬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主動承擔了「價格闖關」失誤的責任。實際上「價格闖關」之所以失敗，第一是鄧小平急於求成的輕易「拍板」；第二是姚依林主持制定的價格改革方案思路有問題，怎麼可能用計劃決定價格的老路子形成市場的價格呢？第三是民眾對物價問題本來就不滿，選擇這種時候進行價格改革並不當地予以宣傳，遂造成了社會的恐慌，引起了人們的搶購和擠兌。

其實，早在1986年6月體改所組團考察匈南回國後，趙紫陽聽取了我們的彙報，就否定了吳敬璉提出的「價稅財聯動」方案，並意識到「擴大市場，縮小計劃」只能一步一步走，深化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鄧小平剛提出「價格闖關」，趙紫陽即意識到這種想法太簡單了，就提出了價格改革離不開企業改革，企業機制問題不解決就會出現輪番漲價。所以，價格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特別是企業改革的進展。

1988年9月19日，趙紫陽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會見了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弗理德曼。趙紫陽在介紹情況時說：「目前的價格改革不是簡單的調整，而是要形成價格機制，由市場決定價格。但這時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難題，我們不能不把價格改革同治理通貨膨脹一起考慮。如果不治理，放開價格就意味著物價上漲；漲幅過大，人們的承受能力就

【647】曾慧燕（1956-），廣東吳川人。她剛出生父親即當了右派，1979年移居香港；從事新聞業後，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世界十大傑出青年」，時任《世界日報》記者。

有問題。無論價格改革，還是治理通貨膨脹，歸根結底要解決企業的運行機制。」

弗理德曼說：「抑制通貨膨脹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約束貨幣供應量，在中國就是少印鈔票。放開價格，對控制通貨膨脹是有利的，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鼓勵儲蓄和防止浪費的投資。企業要有活力，就要創造一個競爭的環境，私人企業多了就會迫使國營企業提高效率。改革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不要半途而『膠著』，處於不進不退的狀態，這反而會使問題更嚴重和持久，對國家和人民的損失更大。」

會見結束時，弗理德曼說：「我非常讚賞總書記說的，中國的改革方向是不會變的。中國改革成功，可以用30年取得西方200年的成就。」他還說「你剛才說我是教授，你是學生。但聽到你對中國經濟的分析，你的本質是教授。」趙紫陽把弗理德曼送到門外，弗理德曼和一起訪問的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張五常說，自己周遊列國50年，遇到的政要無數，但從來沒有遇到過像趙紫陽這樣思路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的國家領導人。

從中可見趙紫陽當時頭腦是很清醒的，但他高風亮節地主動承擔了「價格闖關」的責任，卻不僅沒有得到好的效果，反而成了一貫反對改革的人攻擊他的口實。自改革開放以來，陳雲始終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鳥籠經濟」，對趙紫陽進行的市場經濟改革持懷疑或反對的態度；李先念則因為文革期間，基本上由他主持經濟工作，許多左的東西都是他推行的，而且華國鋒時期搞的「洋躍進」也是他主導的，所以一直對改革開放非常不滿。

趙紫陽在實踐中認識到，要根治中國經濟的弊端，經濟必須一步步市場化，同時必須一步步解決企業的產權問題。而陳雲、李先念自然是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的，支持他們的還有姚依林、王震、胡喬木和鄧力群等，一批對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的人。李鵬、姚依林利用他們在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之便，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完全用行政手段恢復舊的一套，下放的權力被收回，市場調節的措施被取消，許多老辦法都復辟了。

比如，實行了在50年代都沒有行得通的「糧食專賣」。所謂「糧食專賣」，就是關閉糧食市場，所有的糧食都由國家專賣。本來中國一年大體上生產8,000億斤糧食，農民消費5,800到6,200億斤。剩餘的2,000億斤中，國家低價收購的大體是1,100到1,200億斤，半高價收購的有400到500億斤，在自由市場上流通的也就是400到500億斤。雖然流通量不大，但對調劑餘缺還是很有用的。到1989年春節時，山西省的30萬煤礦民工

回家過年後，回礦的不到一半人，因為買不到糧食，結果每天煤炭減產 30 到 50 萬噸。

又如，銀行實行了「資金計劃」。所謂「資金計劃」，就是由中央銀行把資金的存貸都制定成嚴格的計劃，一直下達到每一個基層的銀行，包括農村的信用社。如果一個農村信用社的存款計劃是 10 萬元，但這 10 萬元存款吸收後，必須按貸款計劃，將之貸給糧食局、供銷社購買糧棉油。假設我是一個農民，今天到信用社存了 2 萬元，明天要去取出 1,000 元都不行了，因為這 2 萬元已經進入了資金計劃。結果到了 1989 年初，農民和鄉鎮企業都不願意存款，造成了全國 80% 的農村信用社處於癱瘓和半癱瘓的狀態。

李鵬、姚依林還接二連三地頒發了許多條例、法令、規定，實際上把前幾年搞活企業的大部分措施取消了；把分散到企業和地方的權力又收了回來；把放開的物價又用行政手段管了起來；剛部署的沿海發展戰略也不提了。他們搞的「治理整頓」，實際上是舊體制的大復歸，改革的大回潮。結果，很快就造成了全國性的經濟滑坡、市場疲軟和生產停滯。若不是前幾年發展了個體經濟、合資經濟等非國有經濟，國家的經濟狀況會更困難。

不僅如此，不懂經濟的李鵬和堅持計劃經濟的姚依林，還藉著「價格闖關」的失誤，在陳雲、李先念的支持下，大肆攻擊趙紫陽。李鵬到處散佈「趙紫陽當了總書記還老插手國務院的工作」，還公開講「趙紫陽把國務院弄成了個爛攤子！」並把「治理整頓」的權力集中到國務院，架空了趙紫陽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紫陽通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的意見，李鵬、姚依林根本不予討論，更不執行。

他們和一批反對改革的老人刮起了一股很大的「倒趙風」，李先念甚至直接向鄧小平提出「趙紫陽不是搞社會主義的，應該讓他下台」，不過鄧小平這時還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在 1989 年元旦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帶頭攻擊趙紫陽，要清算趙紫陽在改革中的責任問題。同時，社會上也傳起了趙紫陽的孩子搞「官倒」的流言，更有元老子弟在一些大學公開說「中國現在的問題，都是趙紫陽和他用的那些人給搞糟的。」情勢在急劇惡化。

7-17 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協會組團到蘇聯訪問

1988年9月底，應蘇聯漢學家協會的邀請，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協會組織了一個以我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蘇聯進行考察。代表團一共5個人，有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黃海，還有中央聯絡部的3個人，其中一個是郭沫若的女婿。我們乘火車經過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火車停下時，我們下車活動了一下，這裏竟像我國的一個小鎮，站台上什麼東西都沒有，往後途經的蒙古境內也大多是黃沙一片，可見他們十分落後。

火車到了貝加爾湖，湖水湛藍，周邊是無盡的大森林。過去聽蘇武牧羊的故事，對蘇武在苦寒之地堅持19年「留胡節不辱」很讚佩，但一見中國古代叫做北海的貝加爾湖，我心裏竟生出了蘇武誤國的感慨，這麼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森林竟視而不見。火車穿行在西伯利亞，車上供應的飲食十分差勁，站台上又沒有什麼食品可買。車行一周，總算到了莫斯科。蘇聯漢學家協會會長基塔連科^[648]安排我們住在了紅星賓館。

紅星賓館是蘇共中央修建的豪華賓館。據說，蘇聯反對改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649]，當時就說：「這座賓館太奢侈了！」我們住進去以後，看到大廳的妝璜很一般。客房倒是出奇的大，光是客廳就有100平方米，臥房也有50平方米。客廳有一台很大的電視機，是電子管的，接通電源需要5分鐘才會出現圖像。餐廳很大，但吃得極差，只有幾片黑麵包、一盤撒拉、一盤素菜和一碗湯，沒有肉，也沒有酒、連啤酒都沒有。

基塔連科還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從對蘇聯情況的介紹中可以聽出，他顯然不贊成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倒是給我們當翻譯的岡察洛夫^[650]很開放，還有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加列諾維奇^[651]很敢說真話。他們給我們講了不少蘇聯改革的情況：

從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蘇聯開始進行改革，黨內建立了一些民主程序，社會和文化生活也寬鬆了，但政治、經濟體制的落後，仍然阻礙著蘇聯的發展。勃列日涅夫時期是停滯的，戈爾巴喬夫上台時面臨著各種危機。當時的蘇聯，經濟上人平均國民所得已經從革命前的歐洲前5名降到全球88名以外，各種消費品嚴重不足，已淪為原料出口國和糧食進口國；

[648] 基塔連科 (1934-)，時任蘇聯漢學家協會會長、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

[649] 利加喬夫 (1920-)，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張「市場要服從計劃」、強調階級鬥爭。

[650] 岡察洛夫，時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後任俄駐華使館首席參贊。

[651] 加列諾維奇 (1932-)，時任蘇聯漢學家協會第一副會長、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

政治和信仰危機十分嚴重，在蘇聯科學院的民意調查中，85%的人認為黨只代表「官僚和幹部」；而且民族關係、國際關係也都出現了危機。

戈爾巴喬夫一上台，就實行了加速發展戰略，卻收效甚微。為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需要，搞了些農工聯合體，又讓軍工企業生產民用產品，允許各州蓋民用住房。但整個經濟體制的運轉很難改變，全國的經濟活動都由國家計委的5600個「投入-產出」表控制。而軍事開支竟佔了國民收入的1/4，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決定從阿富汗撤軍。後來搞的反酗酒運動，又引起了民怨。戈爾巴喬夫這時提出了改革與新思維，將改革的重點從經濟轉向了政治，要用民主化、公開性，根本改革政治體制。

蘇聯科學院請我給他們的研究人員，作了一場報告：「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會議室裏坐滿了人，著名的蘇聯科學院院士費多謝耶夫^[652]、阿甘別吉揚^[653]、阿巴爾金^[654]、扎斯拉夫斯卡婭^[655]等人津津有味地聽了我的報告，還提了各種問題讓我回答。他們對中國的農村改革讚不絕口，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進展也很稱許，但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設想能否實現則提出了許多疑問。會議從下午2時開始，直到6:30結束。會後，不少人圍著我又提問了一個多小時。看來蘇聯人對如何走出改革的困境十分著急。

我們出國前買了20套五瓶一組的小包裝中國名酒，當我們拜訪計劃財政委員會主席馬斯連尼科夫^[656]時，他說蘇聯經濟被5,600張《物資平衡表》捆死了，不改革不行。我們送給了他一套中國名酒，他喜不自勝地說：「禁止男人喝酒，就像禁止女人生孩子一樣荒謬，戈爾巴喬夫禁酒很失人心。太謝謝你們了！」我們所經之處看到，俄羅斯人確實很能喝酒，可能和冬天寒冷有關。把這種禮物送給拜訪的主人，他們都非常高興。

蘇共中央總書記助理、蘇聯政治學會會長沙赫納扎洛夫^[657]，邀請我們到克里姆林宮坐談。岡察洛夫問我們，敢不敢進克里姆林宮？我說，為什麼不敢進呢？他說，從1959年中蘇關係破裂，就沒有中國人進去過。我說，現在中蘇兩國都在改革開放，進克里姆林宮表示了「新思維」嘛，應該沒有問題。

【652】費多謝耶夫（1908-），蘇聯科學院院士，著名哲學家。

【653】阿甘別吉揚（1932-），蘇聯科學院院士，著名經濟學家。

【654】阿巴爾金（1930-），蘇聯科學院院士，著名經濟學家。

【655】扎斯拉夫斯卡婭，蘇聯科學院院士，著名社會學家。

【656】馬斯連尼科夫，時任蘇聯計劃財政委員會主席。

【657】沙赫納扎洛夫，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助理、蘇聯政治學會會長。

第二天上午，岡察洛夫先帶我們看了紅場的列寧墓，而後帶我們參觀了克里姆林宮，10點鐘我們到了沙赫納扎洛夫的辦公室。沙赫納扎洛夫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向我們介紹了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通過的政治體制改革設想及進展。他說：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認為，不改革蘇聯的國家體制，其他的改革都難搞好。所以，我們首先實行黨政分開，將國家權力歸還給政權機關——蘇維埃，並建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聯盟院和民族院，設立最高蘇維埃主席，各級蘇維埃主席由同級黨委第一書記兼任，但要經過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

他接著說，黨要實現政治領導，也就是制定內外政策和社會發展的總方針，制定意識形態政策，培養選拔幹部，組織人民支持並參與改革。黨內經選舉產生的各級委員會是黨的領導機關，非經選舉的各部門是黨的辦事機構。同時，加強黨內監督，不僅將政治局的發言記錄發給中央委員，而且中央委員可以要求列席政治局會議。從1956年以來，黨務活動的開支不再有國家的財政撥款，由黨費和黨的事業收入開支。

我們問，那夠用嗎？他笑了笑說，黨的活動經費57%來自黨費，不僅黨的中央、地方、基層組織的專職幹部的工資由黨的經費支付，而且黨的會議開支、機關辦公費用以及辦公室和宿舍修建也都由黨的經費開支。經費的約束使黨的機關和專職幹部難於膨脹。黨的專職幹部不得超過黨員總數的1%，黨務幹部的平均工資在全蘇各行業中只排第二十四位，這就防止了黨的幹部特殊化。我暗想，在這一點上，蘇共可比我們好多了。

我又問，有關國防、外交重大問題的文件也給所有的中央委員看嗎？他說，那當然，當了中央委員就要保證他應有的權力。在回賓館的路上，岡察洛夫告訴我們，戈爾巴喬夫剛上台就和利加喬夫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當時就是把政治局會議的記錄發給了中央委員，大家投票不贊成利加喬夫說的「市場要服從計劃」，戈爾巴喬夫才取得了改革的主導。是啊，中國的重大問題若能由中央委員投票決定多好。那樣的話，胡耀邦也不會下台，趙紫陽的日子也會好過得多了。

週末，我們早晨參觀了莫斯科的農貿市場，物品不算豐富，大多是土豆、蕃茄之類，價格較國營的貴一倍以上。下午，我們參觀了莫斯科大學，從大學的建築、設備和宿舍看，起碼學生宿舍比北大、清華強的多，總體條件確實不錯。夜色迷濛中，我們乘車繞著莫斯科郊外轉了一圈，除了荒草，幾無燈光，給人一種破敗不堪的感覺，想起那首美妙動聽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不由讓人感覺很感然。

主人安排我們參觀了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還在一位集體農莊主席家吃了一頓飯。聽他們介紹，蘇聯農村的情況和我們改革前差不多，倒是農民的生活似乎比城裏人好過一些，因為集體分配的食品和蔬菜不夠吃，還可以從自留地裏補充。一般自留地的產量都是集體土地產量的3倍以上，像一公頃土地種土豆，集體能收5,000到6,000普特，自留地則可以收15,000到18,000普特，也和中國農村改革以前相似。

聽了蘇共中央組織部第一副部長柯留契科夫、蘇共中央經濟部專家組組長米留柯夫、蘇聯記者協會第一副主席祖博科夫，分別介紹了黨的組織、經濟情況和新聞改革以後，我們計劃去列寧格勒訪問。走前，誰知碰上了吳敬璉。我說：「這次『價格闖關』總算實現你的願望了！」他連忙搖著手說：「這和我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我說：「僅從經濟調節信號的改變，而不注重接受信號主體的改革，是搞不好的。」他沒有說話。

我們一行乘火車到了列寧格勒，先後參觀了十月革命炮打冬宮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以及冬宮和夏宮。夏宮有一張彼得大帝時的地圖，上面在西伯利亞部分竟用中文標著「大清帝國」的字樣，我驚喜地說：「趕快找個照相機，明天來人給拍下來！」到第二天去人拍時，那張地圖已經被取走了，真是遺憾。夏宮附近的皇村中學很漂亮，是個貴族學校，當年俄羅斯的著名詩人普希金曾在這裏讀書。

接著，我們去了拉脫維亞的首府理加，親眼見到共和國黨中央被撤銷的部門正在往外搬運辦公用具，以便把房子讓給科研機關。據黨的領導人說，被裁撤的黨的專職幹部很高興，因為作其他工作的工資都可以增加1/3，而擔任黨的專職幹部帶有某種黨員為黨盡義務的性質。在私下的談話中，拉脫維亞人一般都認為，是俄羅斯這個「落後」民族統治了他們這個先進民族。看來，蘇聯的民族矛盾會是個大問題。

這次訪問的最後一站是烏克蘭的首府基輔。烏克蘭是蘇聯的糧倉，基輔是烏克蘭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中心。烏克蘭的官員明顯地不滿「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掠奪」，他們說：「什麼『物資平衡表』，讓全蘇聯的人計算3年，也不可能算清楚烏克蘭一年的經濟活動。上帝也搞不好這種計劃經濟，我們不改革是不行的。」特別是切爾諾貝利核洩漏^[658]造成的嚴重問題，在烏克蘭造成了極大的民怨，據說會影響幾代到幾十代人的健康。

[658] 1970年，蘇聯在烏克蘭北部城市切爾諾貝利建立了核電站。1986年，核電站機組發生爆炸，所洩漏的核輻射劑量為投在日本廣島原子彈的400倍以上，給人類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我們參觀了基輔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聖索非亞大教堂後，就準備打道回府了。

但是，我們在蘇聯用1美元只能換0.6盧布，換的那些盧布卻換不回美元了。花掉吧，又沒有什麼東西可買。我除了買些紀念郵票外，把剩下的盧布換成了銅幣，投入旅館大廳的老虎機裏，幾乎300盧布的銅幣都投完了，管理人員才告訴我，這台機器壞了。他又沒有鑰匙打開機器，我只能自認晦氣，就算把這些沒用的錢捐獻了。

可歎的是，蘇聯有大片的黑土地，老百姓卻食品短缺；有無數的大森林，賓館裏卻沒有手紙；俄羅斯民族有著堅韌的性格，卻被一次次整肅的成了順民。聽工人、農民說起來，都是蘇共搞公有經濟和階級鬥爭惹的禍。不由讓我想起了廣東順德老農說的話「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講話」，看來一個老祖宗馬克思帶給人們的苦難都是差不多的。不改革怎麼會有出路呢？

7-18 我國所處發展階段需要一個甚麼樣的體制環境？

10月底回到北京，看來形勢很不妙。李鵬、姚依林利用治理整頓，大搞復辟、倒退已經很明朗。在所務會議上，大家一致認為，當前的治理整頓破壞了改革的局面，這麼搞下去會葬送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而且各省市來人都對目前的局勢表示擔憂。我把大家都看法告訴了安志文，他也直搖頭，並和我說：「你可以把你們的意見直接告訴紫陽。」我臨走時，他又說：「李鵬三次問我，你的素質怎麼樣，你要多注意一些。」

我向趙紫陽彙報了蘇聯之行。我說，蘇聯的改革可以用三句話說明：一是經濟發展戰略有所調整；二是政治體制改革確有進展；三是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入門。但無論是文化教養、素質訓練、規則程序，蘇共的水平比我們都高得多。黨若不能現代化、特別是上層領導集團不能現代化，國家就很難現代化。我接著談了現在的治理整頓在否定改革，趙紫陽說，志文曾提過，可能用「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說法就好了。

可能是聯繫到「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張炳九^[659]和吳稼祥^[660]提出了中國應該實行「新權威主義」的見解，也就是由有權威的領袖推行市場經濟。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對「好人政府」的批評。為甚麼一方面我們經濟發展比解放以後任何時期都快、人們得到的實惠也最多，而另一

[659] 張炳九，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副主任。

[660] 吳稼祥，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研究員。

方面人們又普遍存在著不滿、社會不穩定有所增加、政府的調控能力有所下降呢？這裏隱喻著極其深刻的問題。

我與小強、李峻商議以後，在體改所作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報告，題目叫作《中國改革的深層難題和戰略選擇》。我說，我們在改革初期，往往會把改革看得過於簡單，對改革帶來的好處又期望過高。南斯拉夫、匈牙利改革之初，都出現過一個黃金時期；但改革深入以後，面臨的難題就越來越帶有根本性，解決起來都很不容易。我們是一個更加落後的大國，問題比他們也更複雜。那麼，我們需要改變的是一種甚麼樣的體制呢？

1986年7月，我在中央黨校作報告時說，我們解放以後建立的體制，既有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延續，又有軍事共產主義的繼承，再加上斯大林模式的移植。這種體制是黨政經合一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和行政辦法管理的體制，這個體制具有兩個基本特徵：

一是「依附」，即將經濟、社會、政治各種組織，統統納入下級服從上級的「金字塔」等級結構之中，由於層層管理、層層依附，就缺少了活力；

二是「全能」，所有經濟、社會、政治組織在發揮本組織特殊職能的同時，還不能不負擔幾乎是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其他職能，連單位職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要管，就造成了缺乏效率。

其實，每一個「全能」單位職能的分解和社會化進程，恰恰是改變「依附」的必要條件。因為我們對此認識不足，以致一些有利於職能分解的改革，如社會保障、福利、住房改革、社會組織的發育等，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一個系統工程的問題，僅僅從經濟上「放」或靠價格、財政等經濟參數的改變，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像企業實現自主權，就牽扯到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改革和調整。

我們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出，告訴了我們應該在怎樣的立足點上和一個甚麼樣的初始條件下考慮問題，以避免犯左或右的錯誤；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提出，則給我們指明了長遠的目標。這是10年改革經驗的總結，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但從起點如何才能達到目標呢？也就是說，在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要有一個甚麼樣的體制環境，才能保證我們在下世紀中葉實現經濟、政治的發展目標呢？問題並沒有解決。

我接著說，那麼，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究竟需要一個甚麼樣的體制環境呢？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六、七十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化進程確實大大加快了。而在這期間，實現了現代化或向現代化

過渡到國家，都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問題。哪一個國家、民族、地區能把人類文明遺產中有價值的東西運用到自己國家的建設中去，她就發展、就騰飛、就能現代化。只有閉關自守、不求進取、盲目自大的民族，才會據絕人類文明，也就很難取得進步。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早期現代化的國家，在二次大戰以後已經把資源和勢力範圍圈定了。這對後進國家既是榜樣，也是威脅，既是示範，也是教條。而二次大戰後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加快現代化進程，必須在夾縫中求生存，根據本國落後的國情和趕超的任務，尋求非傳統的特殊道路。從經濟和政治體制兩方面按大類分，後進國家希圖實現現代化，大體採取了4種不同的模式：

——「硬政府，硬經濟」。即採取斯大林模式的集權政治、計劃經濟，在戰時動員體制情況下有一定效果，但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效益就不行了。一些落後的非洲國家採取這種作法都不成功。中國在解放初期採取這種作法，和蘇聯相似還比較有效，後來搞了過頭的階級鬥爭，呆板的計劃經濟又阻滯了經濟的發展。所以，在現代化的較量中，這種模式愈益無效。但這種模式集中國力發展所需的項目，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軟政府，硬經濟」。即實行某種議會民主形式，同時搞計劃經濟。印度就曾採用這種體制，結果很不成功。搞議會民主造成了大量的內耗，不能有效決策，嚴重地消耗了國力；實行計劃經濟又使經濟系統失去了活力和效率，影響了經濟發展。

——「硬政府，軟經濟」。像「亞洲四小龍」、土耳其、巴西等國在「起飛」階段大體都採用了這種模式，成效不錯。所謂「硬政府，軟經濟」就是有效政府、市場經濟。當然，所謂「硬政府」也有多種形式，但實質是政治權力要相對集中，以利於有效控制和協調；經濟權力要盡量分散，以利於增強活力和效率。但是，如果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一起分散，就可能造成尾大不掉、地方分割和各自為政，從總體上是沒有效率的；而政治權力的相對集中，要有利於民主化的發展，不能形成獨裁的局面。

——「軟政府，軟經濟」。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一般發達國家多採取這種模式，發展中國家若在發展早期採取這種模式很難成功，往往在經濟起飛後也向這種模式轉型。

為甚麼二次大戰後，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採用「硬政府，軟經濟」模式，能夠取得成功？很值得我們深思。從1979年起，我一直在研究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國家，西方的路走不了，蘇聯的路走不通；但西方早期發展農業形成經濟內部分化而起飛，蘇聯集中運用國力加快建設速度的經驗，

都是可以借鑒的。我們進行的改革無非是為了掃除發展的障礙。那麼，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究竟應該如何處理效率與民主的關係呢？

我們應該看到，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成長和政治成長是相輔相成的。農業社會的政治形態是君權政治，工業社會出現了精英政治；而精英政治既可能走向民主政治，也可能走向獨裁政治。這是由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統治走向一批人或若干家族統治的過程。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多數民眾一時還很難管理國家，我們必須重視這樣三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層次，是處理好政治參與和民眾水平的關係。我們要理性地看到，當 80% 以上的民眾還沒有條件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時候，比如說，當他們生活的基本問題還得不到解決的時候，當他們受教育的程度還很低的時候，當他們還沒有參政能力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去發展經濟，普及教育，提高他們的水平，使他們能逐步懂得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和如何參政；另一方面要看到真正能參政的人不到 20%，實質上只能是一種「精英政治」，即少數精英居於領導地位，代表多數民眾的利益，把握國家的發展方向。

第二個層次，是處理好政治精英與其他精英的關係。如果掌握權力的政治精英是一個壟斷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往往會實行獨裁政治，或出現獨裁者，阻礙歷史的發展；如果能不斷把有現代化思想、有知識、有能力的其他精英吸收到政治精英集團中來，那麼這個政治精英集團就會不斷更新，並代表不同階層民眾的利益，加快現代化的進程；應該看到，從君權政治發展為寡頭政治、賢人政治，以至民主政治是一個歷史的過程。

第三個層次，是處理好民主與效率的關係。一般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在出現精英政治的階段，特別要在掌控權力的政治精英內部，建立「決策前實行民主，決策後講求效率」的制度、程序和規則，這樣才能既避免個別領袖人物的專斷造成大的失誤，又可以防止議而或不決而不行。

中國的專制主義延續了 2,000 多年，一直就缺少民主、法治的傳統，我們既不可能像那些「可敬的共產主義者」想在幾年時間內實現共產主義，也不可能像那些「可愛的民主主義者」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建成一個民主社會。「善良的願望是通向地獄的橋樑」，用理想代替現實的思維模式，過去帶給我們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歷史上成功的改革，都是在初始條件與邊界條件的約束下，有效地推進了制度創新。

如果我們能在以上三個層次上，清醒而準確地把握效率與民主的關係，就有可能既不斷提高效率，又逐步發展民主。「硬政府，軟經濟」這樣一種體制格局，可能更有利於我們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並加快現代化步伐，在下世紀中葉實現我們建成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目標。如何選擇我國所處發展階段需要的體制環境，是關係我們民族能否盡快振興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7-19 我國改革面臨的三個根本性難題

我接著說，根據大家對改革 10 年的總結反思，面對改革深層次提出的難題，我認為制定我國發展階段所需要的目標體系與體制模式，已經成為我們研究改革和推進改革的當務之急。我的上述看法，其實去年在政改辦已經多次提過。我進一步提出，我國改革面臨著三個根本性的難題。

我說，按照馬克思的設想，要創造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優越的社會主義，只有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和真正的個人所有制，才可能做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果我們建立的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比，不能使人的才能得到更大的發揮，不能使人的需求得到更大的滿足，那麼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也就沒有了吸引力。

第一個難題：重新構造公有經濟。

公有經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二次大戰以後，很多落後國家剝奪了封建王公寡頭的財產，將其轉為公有財產。但凡是公有經濟採取國家所有、國家直接經營的方式，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南斯拉夫經濟改革之父格裏格羅夫說，不能把工人理想化，工人是現實物質利益的追求者，靠物質刺激解決不了他們當家作主的問題。其實，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解決使工人能像對待自己財產那樣對待公有財產的問題。

我國的企業改革從放權讓利、利改稅到承包制和股份制，目的是要解決誰對國有資產增殖負責的問題。只有國有資產的增殖有人負責，企業的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才能實現。否則，企業根本不會考慮是否重複建設、投資是否能收回來、利潤是否能最大化。從深圳看，價格是放開的，但外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是 9 萬人民幣，國營企業才只有 2 萬！為什麼差了 4.5 倍？就是國營企業的發展和約束機制沒有解決。

重新構造公有經濟，具有比一般經濟學意義上遠為深刻和複雜的內容。中國的公有經濟中，不僅要解決產權問題，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中的各種問題，還要解決生產組織和社會福利制度、組織的脫鉤問題。如果一個

企業內部既要解決幼兒園問題，食堂問題、家庭問題、住房問題，又要負擔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治安聯防以及黨、團、工、青、婦等一系列社會職能，它怎麼能去一心追求利潤最大化呢？答案是明顯的。

而這個改革，我們比起蘇聯東歐國家都要難得多。從 1942 年在延安搞大生產運動以後，形成了每一個小細胞都是一個小社會的「單位」。「單位」不僅帶有政權的特點，而且是社會生活所有方面不可或缺的樞紐。這種公有經濟形成的結果，不僅是將資產公有了，而且將經濟組織之間的關係公有了，將個人的福利、政治生活、選擇職業和遷徙的權力以及私人生活，都在福利單位所有、戶籍管理等制度下公有了。

這種「單位」不僅使企業缺乏活力和效率，也使個人缺乏活力和效率，從而使整個社會缺乏活力和效率。可見，重新構造公有經濟是在改變資源配置方式的過程中，各種社會組織，包括市場組織、生產組織、流通組織乃至每個社會基本「單位」的組織、運行、機制和規則的重新組合。這樣一個變革過程恐怕要有 50 年到 100 年。

第二個難題：重新構造權力格局。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也提上了日程。目前民主化、多元化已經成為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潮流，重新調整權力格局成為人們議論改革的核心問題。我認為，在我國所處發展階段，要使政治改革能順利推進，加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應該著力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是建立中央決策體系的民主程序和表決制度。改革面臨著深層次的攻堅，需要下大的決心，重大決策的猶豫不決和輕率反覆都有可能使全局陷於被動。因此，決策前由若干諮詢機構提供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由決策集團按一定民主程序充分討論，權衡利弊之後，實行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制度至關重要。這樣才能形成權力精英的共識，才能共擔風險，共渡難關。從長遠來講，這種從領導核心開始的民主建設逐步程序化、規範化、制度化，將有助於為改革培養一個有效、穩定、堅強的領導核心。

第二是理順中央權力機關和職能部門的關係。蘇聯科學院社會學部主任扎斯拉夫斯卡婭有一項研究認為：實行中央集權指令性經濟的國家，權力似乎集中於中央權力機構，實際上卻被掌握人財物的職能部門所分割。久而久之，這些部門的利益往往嚴重地影響了部門決策，甚至使一些本來從全局出發的重大決策都變成了部門利益平衡的結果，而中央所作的重大決策也往往在執行中被扭曲。如何使中央權力機構的決策，既不受部門利

益的干擾又能有效的貫徹始終？這也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第三是如何在保證地方有足夠自主權的同時，保持中央在全局的有效調控能力，是權力結構調整的又一個重大問題。實踐證明，我國自周秦以來實行的，中央集權式郡縣制體系，嚴重妨礙了商品經濟的整體發展。1949年以來，中央和地方的經濟、政治關係也始終沒能真正理順。對於這種體系的改造，多年來既有實行「聯邦制」的思路，也有縣級自治的設想，還有以大中城市為核心組織「經濟圈」的建議，這個問題需要很好地研究。

第三個難題：重新構造民族精神。

我認為，一個在精神上空虛、蒼白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興的。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面臨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道德觀念、人倫準則、行為規範和價值體系的激烈變遷。「五四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最大的缺陷是片面地、全盤地否定東方文明，未能繼承東方文明的優秀遺產，因此民主科學的精神也很難扎根，結果造成了一兩代人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民族自卑感。不是盲目地崇拜歐美，就是盲目地崇拜蘇聯。

而「文化革命」的災難，充分表現了民族傳統中劣根性的糟粕，這種民族精神的極度創傷至今並未得到很好的醫治，相互攻訐、無限上綱、不仁不義的行為隨處可見。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著深刻地變化，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一些腐朽的東西像金錢至上、物質崇拜、唯我主義也伴之而來。所以，重新構造民族精神已經成為我國面臨的重大問題。

從古希臘、羅馬以來的西方文明，就強調個人、強調利益；我國從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東方文明，則一直強調群體、強調理想。只有實行東西方文明的交融，使兩種文明的精華有機結合，才能形成符合現代化要求的民族精神。不承認個體、不承認實利的集體主義理想的空洞說教，人們已不再相信；而如果沒有群體和理想的追求，人人發展成自我中心和個人至上，對國家、民族都是極其有害的。

一個國家的落後不僅表現在經濟上，思想上的空虛是更可怕的。因此，我們要大聲疾呼：國家應該實行有效的強制性的國民性教育與改造。在改革這場重大的變革中塑造全新的道德標準、行為規範和價值取向，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提出這些看法，只是拋磚引玉，希望大家認真思考。

7-20《中國改革的深層難題和戰略選擇》

我進一步解釋了1987年底提出的「立足於打持久戰，著眼於打攻堅戰」的意見。我說：我們改革的任務繁複艱難，一系列條件的嚴峻約束，決定了改革的持久性質。產權的明晰、經濟組織的發育、企業家隊伍的形成、市場機制和市場秩序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完備，有一個過程；社會結構的調整、特別是社會細胞的分解和各種職能的社會化也有一個過程；權力結構的調整、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現更有一個過程。

我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人口，從目前的70%多下降到40%左右，至少需要幾十年時間；幾十年來在階級鬥爭、指令性經濟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幹部隊伍，要能熟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運行，也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少數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可以通過書本和國外的先進經驗接受新思想，但對大多數幹部和群眾來說，則只能從物質生活的環境變化中逐漸改變傳統觀念，這更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過程。

所以，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改革過程的是一個開展攻堅戰和持久戰的長期過程。所謂「險關後面是平川」的說法，只不過是一種文學家善良的願望。我們目前應該著力於三個方面的努力：

第一，選准改革的攻堅方向。

價格體系的不合理，曾是人們普遍議論的問題。南斯拉夫、匈牙利改革的經驗就是從價格改革入手的；西方經濟學家往往也是大談價格不放开就形不成市場機制；在我們的生活中，市場上有點商品短缺、有的商品剩餘，有的質次價高、有點質優價廉；企業剛取得自主權時，首先反映的也是價格不合理造成的苦樂不均問題；這些情況都使我們想到價格體系是經濟改革攻堅的根本問題。

今天，這個問題已經由實踐回答了。價格形成是整個經濟機制運行的結果和綜合反映，企業自負盈虧的問題不解決，放開價格不僅風險極大，而且不會使改革達到預期的目的。其實，農村改革的經驗早就說明了這個問題。農村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為農產品價格調整還是由於實行「包產到戶」呢？答案顯然是後者。因為實行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農民成為土地經營、勞動致富的主人，才真正調動起了生產積極性。所以，改革攻堅只有選准了攻堅的方向，才能有所進展。

第二，把握好平衡、穩定與改革的關係。

改革戰役即使方向明確，如果引起經濟過分失衡、社會過大震盪，超出人們的承受能力，改革也必然會陷於被動甚至無法推行。因而進行一定的調整，以求盡可能的平衡和穩定是必要的。那麼，有沒有可能在平衡和穩定的環境中進行改革呢？這裏有一個願望與現實能否統一的問題。農村改革的經驗同樣很能說明問題。我們進行的農村改革恰恰不是在寬鬆的環境下發動的，相反，倒是在農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進行的，而且為以後的發展和改革創造了相對寬鬆的環境。當然，城市系統的改革遠較農村改革複雜。

但從總的原則上說，應當有效地調控那些與平衡和穩定密切相關的「快變量」，如價格、利率、稅收等「參數變量」的改革；同時，堅決地進行深層次「慢變量」，如企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制度變量」的改革。單純只調控「快變量」，即使一時能收到平衡、穩定的效果，也不過是將一些根本問題積累了下來，一遇時機就可能釀發更加深刻的危機；相反，只有深層次「慢變量」的改革能取得實質性推進，也才能真正為平衡和穩定提供堅實的基礎。

第三，實施重點突破的改革戰略。

在新舊體制並存的局面下，實施重大攻堅的配套難度很大，改革的風險也難以預計，攻堅過程中又可能出現無法預料的問題，這就會在客觀上影響改革的決心和決策的執行。同時，重大攻堅久拖不決又會使全局陷於被動，問題的積累勢必醞釀更深刻的危機。

那麼，如何擺脫這種兩難處境呢？比較合理的選擇就是：在若干具有全局意義的戰略地區，配合沿海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組織重點突破。實施重點突破，不僅可以有單項的改革實驗，而且應當有全面綜合改革的率先實施。

在一個局部首先建立新體制格局，完成雙重體制的轉軌，可以為全國改革攻堅積累經驗、培養幹部和樹立樣板。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若干全面改革實驗區由點到面，進而連成一片之時，也就是中國改革全面深化之日。

我這個《中國改革的深層難題和戰略選擇》的內部報告，被《人民日報》經濟組組長艾豐知道了，他先以採訪體改所幾位所長的名義在內參上發表了，後來這個報告又在體改所辦的刊物上發表了。在美國讀經濟學和政治學雙博士的鄒剛告訴我說：「這篇文章被美國學術界認為，是1988年中國學術界最深刻、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篇。」

7-21 體改所的成功與困境

體改所組建之初，我提出了「第一年確定方針、摸索路數，第二年務色人才、形成架構，第三年建立制度、奠定格局」的設想，應該說，體改所在形勢需要時產生，在艱苦條件下成長。經過四年的努力，體改所終於基本形成了基礎研究、戰略研究、應用研究相結合的比較合理的研究結構，大體上實現了把體改所在三、五年內建成「有創造性和超前研究能力」的「國內外一流研究所」的目標。

1985年剛建所，我就大膽地組織了400人的全國調查。這次調查寫出了150萬字的調查報告，出版了《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和選擇》一書，受到國家領導人和學術界的肯定，並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還被歐美、日本等國翻譯介紹了；我們組織的中央黨校的研究生，也出版了《縣級黨政領導體制調查報告集》。同時，由我負責組建了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不定期地對經濟發展和改革的問題進行討論。

1986年我們組織了18位經濟學家，到匈牙利、南斯拉夫進行了考察，主人稱讚我們是中國來的考察團中最深入的。回國後，我們編寫了《艱難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一書，對改革決策起了很好的作用；借鑒他們的經驗，我們開始組建「三大觀測系統」，即「企業跟蹤觀測系統」、「宏觀景氣分析系統」和「社會輿論調查系統」。接著，我們和索羅斯建立了「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

1986年9月到1987年11月，我到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開始每週回體改所半天，三個月後只能每月回體改所半天，但體改所的各项工作都能正常運轉。在這期間，體改所不僅各研究室出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報告，而且還組織了多次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的改革宣傳活動。還制定了比較詳細、嚴格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基本規程」，使各項工作都有章可循。

從1987年底至今，體改所推出了「三江一海」戰略，人員實行「三三制」。組織了深圳的綜合調查，寫出了總報告《深圳：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制度變革》；參加了上海浦東開發的研究、海南洋浦開發的研究、西部開發的研究、渤海灣開發的研究；還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報告，像王輝的《改革中的經濟秩序創新》、宋國青的《中國雙軌經濟的形成與管理》、白南風和楊冠三的《改革的社會心理環境》和《關於學潮的分析》等，都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體改所為基礎研究組建的三大觀測系統已能有效運轉，這就使我們對經濟社會問題的調查從隨機抽樣走向了系統的規範研究，並能從微觀、宏觀和社會三個方面進行定量的綜合分析。企業跟蹤觀測系統對企業狀況和變化的多次分析，都證明其結論是正確的；宏觀景氣分析系統也建立了分析的指標體系，並開展了對經濟週期波動的分析；社會輿論調查系統則可以對改革的社會心理、群眾對物價、住房改革的反應等問題進行連續、定期的觀測分析。

1988年，應用研究的6個重點課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包括：企業和市場問題研究，宏觀管理體制研究，沿海地區經濟外向化研究，社會穩定與改革動力研究，經濟合同與經濟秩序研究和「西部問題」研究。在對策研究方面，對建立經濟秩序、學潮問題、價格「闖關」等重大問題，寫出了高質量的報告。還與中央電視台等單位合作，攝制了《決定命運的時刻》、《困谷中的選擇》、《價格改革之謎》等改革宣傳片。

當然，體改所之所以能在短短4年取得成功，首先是改革大環境的需要，其次是體改委的領導人的開明，給了我們3個自主權，再次是年輕研究人員熱情忘我的努力。像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礪就多次和我說，很羨慕我們能做那麼多事。其實，體改所組建之初，生活後勤條件一直很差。研究所4年間搬遷了5次，研究人員住宿在招待所，吃飯則「打游擊」。直到去年自力更生蓋好了住房，大家才有了個家，分房時本著「鼓勵強者，幫助弱者」的精神，使每個人都感到很滿意。

實際上，體改所始終處在風口浪尖的困境之中。進入體改所的年輕人不是沒有「既為弄潮兒，哪怕風浪打」的精神，但大多對「改革是一場革命」還是看得太輕易了。體改所組建不久，秦柳方就上書要求解散體改所，宋濤就攻擊體改所是「趙紫陽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窩子」。那些頑固的左派和既得利益者反對改革，是不想失去自己的特權，他們一天都沒有放棄「把陳一諮那夥人幹掉」的想法。

但真正的難處在於，我們還處於四面受「敵」的境地：中國多年來形成的僵化體制、陳腐觀念和過時規章，處處阻礙著我們的腳步，傳統的理論界認為我們是「破壞教條的異端」，清高的知識界認為我們是「被政府收買」的，循規蹈矩的政府研究人員認為我們「企圖另搞一套」。確實，我們不想在書齋裏構築那種抽象的理論體系，也不願意做那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奉命」研究。我們渴望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推動中國的進步。

當然，對於那些既得利益者來說，我們的努力可能會傷害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反對是不奇怪的。但是，對於那些充滿激情的民主主義者，他

們覺得我們缺少煽動的語言和理想。那麼，面對中國這樣一種制度，如果你不能拿出一步步推動社會發展和變革的辦法與措施，空喊又有什麼用呢？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激進的東西出現時，就為反對改革的人提供了整肅改革和民主力量的機會。

一個國家建立起民主制度是一個過程，中國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根據我的體會，要解決重大的實際問題，就要避開那些所謂「主義」的爭論，因為光憑喊口號而沒有實質進展是不可能走向民主的。多年宣傳的共產主義理念，在人們心中形成的「目標論」，危害實在太嚴重了。胡適先生說的「少談一點空洞的主義，多解決一點實際的問題」，對中國人來說實在太重要了。而從我創建「發展組」到組建「體改所」，始終遵循著胡適先生對我們的提醒。

但體改所還有一個改革需要與自身建設的矛盾。既要為改革服務，就不能不研究改革中出現的重大問題；而作為一個研究組織，又不能不考慮研究項目和研究人員的穩定性與長期性。所以，幾年來我們體改所的研究組織結構，就既要隨改革的需要作必要的調整和補充，又要清醒地使基礎研究、戰略研究、應用研究有效地結合起來。幸虧體改所充分發揮了年輕人的創造性，才使得這個難題能夠較好地得到解決。

7-22 金觀濤一句「盟主」，把我烤在了火爐上

1988年元旦過後，小強建議召開一次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理事會的茶話會，大家交流溝通一下。1月8日，茶話會在西苑飯店大廳召開時，經濟學會的大部分理事都到了，有300多人。大家讓我講講話，我講了改革的進展、問題和前景，肯定了大家的成績，鼓勵大家繼續努力。我講完後，大家一齊鼓掌。金觀濤端起酒杯大聲說：「老陳是我們的盟主，和盟主乾杯！」會場上「盟主，乾杯！」的聲音響成了一片，我給嚇出了一身冷汗。

我走到金觀濤身邊，小聲說：「你要害我呀？你沒看過武俠小說嗎，誰想當盟主誰就會讓人追殺！」他笑笑說：「沒那麼嚴重！你就是我們的盟主。」金觀濤的一句「盟主」，確實給我帶來了麻煩。後來，我去找樸方，他一見我，開口就說：「啊，盟主來了！」見到陳元，他也語帶嘲諷地說：「盟主駕到！」鮑彤因為長期勞累住進了305醫院，我去探望他，一見面他也說：「啊，盟主來了！」弄得我很不是滋味。

更重要的是，金觀濤一句隨口而出的「盟主」，很快就傳成了我是一個「野心家」，要「向黨奪權」、「另搞一套」。從此，我不僅被那些反對改

革的人當成了「眼中釘」、「肉中刺」，處處有人找麻煩，而且有關部門還把我當成「異類」，專門給我立了案，使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真不知當時金觀濤一時激動，信口開河說的話，竟會把我烤在了火爐上！

鮑彤在醫院裏情緒很不好，他悲觀地和我說：「我嘔心瀝血地希望中國能走上民主之途，可惜很難推動。我現在的心情就像龔自珍寫的『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可是，將來人們會怎麼評價我呢？是一個專制政權的爪牙，還是一個共產黨的走狗？有時真想與其房子修不好，不如把它燒掉重建。」我說：「你對改革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有些事情一時做不成，就耐心地待以時日吧。」

聽趙紫陽的秘書李樹橋^[661]說，去年清查大公司、特別是清查康華時，鄧楠^[662]到政改辦找鮑彤說：「老娘發脾氣了！」顯然，卓琳^[663]是在為已經殘疾的兒子鄧樸方打抱不平，鮑彤竟書生氣地置之不理。李湘魯聽說以後，立即到中國殘疾人基金會去找鄧樸方，想轉圜一下關係，鄧樸方也拒而不見。就不知道這件事在鄧小平心裏，是不是留下了不祥的陰影。鮑彤的書生傲骨在不知不覺間，在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關係上劃了一道裂痕。

趙紫陽的另一個秘書李勇找到我說：「盟主，不好了！」我問：「怎麼啦？」李勇說：「人家把索羅斯基金會的事，又告到了小平那裏，鄧辦讓寫一個材料。」我說：「我已經為此寫過兩個了。」李勇說：「你要抓緊寫，盡快給我。可不敢大意，搞不好就會弄成另一個陸鏗事件。」明顯是李先念慫恿王芳在背後投石下井搞趙紫陽。我又為此搞了一個 50 多頁的材料送了上去。

在太原市委當宣傳部副部長的北大老同學牛輝林去年來看我。吃飯時，牛輝林說：「你喝過鄧小平最愛喝的老白汾酒嗎？」我說：「我怎麼會喝上。」這時，他開車從太原來，給我帶來一箱老白汾酒。酒用淺藍色的瓷瓶裝著，一打開，滿室飄香，入口清香醇厚，確非凡品。聽輝林說，是汾酒廠擴產時，挖出的一窖清代存酒，現在只供領導人飲用。這一箱 12 瓶酒，我請客只用了 3 瓶。其他的 9 瓶，不知「六四」後被誰拿走了。

唐昕告訴我，他要編一套中青年經濟學家的叢書，讓我選 20 到 30 萬字出一本專集，我很快就編好了。小強和我說，唐昕編的這套書，只是何

[661] 李樹橋 (1944-)，河南內黃人。時任趙紫陽秘書。

[662] 鄧楠 (1945-)，四川廣安人。鄧小平次女，時任國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副局長。

[663] 卓琳 (1916-2009)，雲南宣威人。鄧小平夫人。

新^[664]當總編的一套書的「經濟學卷」，而何新這個人品質很差，你在何新的名下出書對你會有損害。我把前一段時間何新送的書翻看了一遍，又找人打聽了一下，果然何新學術與人格都很差。我立即找到唐昕，撤回了這部書稿。

何維凌在美國塔爾薩召開的中美中小企業交流會，有兩國 500 多個企業參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會前，他讓我請薄一波給一塊長城磚題字，又請汪道涵、唐克作為貴賓參加會議，都作到了。維凌還請了美國前總統福特到會講了話。維凌從美國回來告訴我，這次會議賺了四十萬美金。他說：「老陳，沒有你，我也搞不成。賺的錢咱倆一人一半。」我說：「我一分都不要。但我有個想法，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

他說：「你說說看。」我說：「現在每年夏天，北戴河人滿為患。但南戴河還沒有開發，你要有心，就在南戴河蓋上四十間房子，現在一間造價不會超過 5,000 人民幣，5 年、10 年以後就會翻幾翻。」他說：「可以。」我又說：「上海浦東開發區蓋好的兩層小樓，建築面積 200 平方米，一套只要 5 萬人民幣。你馬上買兩套，說不定一年就會漲價 1 倍。」他說：「沒問題。」只不過「六四」以後，這些房子不知落到了誰的手裏。

在美國工作的北大老同學施旭東^[665]來看我。她原是菲律賓華僑，父親是個富商。她是個熱情的理想主義者，1962 年回到中國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文革的發生，給她帶來了很大的迷茫和震撼。後來，她到美國從事中國文化產業的傳播。改革開放以後，她時時關注著中國的進步。我請小強、維凌與她一起在裕龍飯店吃飯，我們向她介紹了改革的進展和問題，她還是那麼純潔無邪地問這問那。

春節回西安探視母親。給她老人家在西苑飯店買了一盒冷凍的對蝦，這是母親多年想吃而沒有買到的。母親每天都練五禽戲，身體還不錯，見到我很高興。春節那天，母親操刀給我做了一頓豐盛的陝西飯，弟弟妹妹們都來了，家裏很熱鬧。我到陵園拜祭過父親的靈位後，又給親戚們拜了年。接著，去感謝幫助了生病的三妹調動工作的市委書記董繼昌，看望了當副省長的孫達人等老朋友。

走前，我請孫達人吃飯。正好拿在路邊剛買的一本《易經全解》卜了一卦，卦辭是「賢臣遭逐，小人得志」，我產生了不祥的預感。孫達人說：「你還信這些，不必介意！」我給他介紹了北京的複雜局面：在新舊兩種

[664] 何新（1949-），浙江溫州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有名的政治投機者。

[665] 施旭東（1938-），菲律賓華僑，祖籍福建晉江人。時在美國從事中國文化產業傳播。

體制並存的情況下，趙紫陽想推進改革，很難找到得力點；而李鵬一心搞復舊，卻很容易得到元老與舊體制的支持；搞不好，改革就會全面倒退。達人聽了，也感到問題確實嚴重。

我拜別母親時，她流淚了。母親痛惜地說：「我知道你在做明知不可為之事，吾兒好自為之。」為了緩和氣氛，我跪在母親面前，笑著耍賴地摟著母親說：「媽媽，我要吃奶！」母親推脫不過坐下來，解開上衣讓我吃了幾口，還慈愛地撫摩著我的頭髮，弟弟和妹妹在一旁笑成了一團。臨行，我把身上僅有的600美元給了母親。誰又會想到，我們母子這一別，竟成了永訣。

7-23 楊冠三預言：「可能出現動亂時期」

當時，中國的形勢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經濟出現了大滑坡，改革出現了大倒退，社會出現了不穩定。我們召開了幾次所務會議，大家討論的結果是，立即請體改所比較體制研究室主任高梁、副主任曹遠征抓緊組織研究「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不穩定問題」，請社會研究室主任白南風組織調查大學生狀況，請中國社會調查系統主任孟繁華、副主任楊冠三組織調查社會狀況，以便研究對策。

在1989年的新春茶話會上，趙紫陽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進行這樣一場巨大而複雜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他還說：「我們需要有不斷完善的民主，同時我們又需要安定的秩序。」但從1988年中以來，文化學術界批評政府的聲音越來越強烈。方勵之不斷向外國記者發出批評「四項原則」、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提倡「全盤西化」的講話，又於1989年初提出「大赦政治犯，釋放魏京生」。

接著，不少追求民主的學者、作家，不斷在各種研討會、聯誼會、沙龍上，向中央領導人提出「保障人權」、「爭取民主」和「釋放政治犯」的訴求。特別是2月13日，冰心^[666]、蕭乾^[667]等33名知識分子的《公開信》和3月8日王淦昌^[668]、許良英等42位科學界人士的《公開信》，各國報刊紛紛報導影響很大。這些活動自然引起了黨內強硬派與既得利益者的反彈，他們認為這些人是與外國勢力勾結的危險分子。

[666] 冰心 (1900-1999)，福建長樂人。中國著名女作家。

[667] 蕭乾 (1910-1999)，蒙古族，北京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為中國著名記者和作家。

[668] 王淦昌 (1907-1998)，江蘇常熟人。系中國核子物理奠基人之一。

而當最關心時局的青年人、特別是大學生，在失去了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以後，不斷地在尋找、在彷徨、在躁動。他們有愛國熱情而渴望改變現狀、思想單純而又很容易衝動，所以對批評現實的各種言論極易接受並信奉。體改所社會研究室從1988年北京大學發生的「柴慶豐事件」，分析了小痞子打死大學生何以引起學潮的原因，提出了「擴大校園民主，加強協商對話」和使學生「面向實際，研究中國」的建議。趙紫陽很快批示，請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研究解決，但沒有了下文。

1月上旬，體改委的幾位領導安志文、賀光輝、高尚全，聽取了我對體改所一年來的工作彙報。他們認為：體改所有朝氣、有熱情，人不多、能量大，為改革大膽探索、奉獻；體改所基礎工作紮實，研究工作深入，課題結合實際，像深圳綜合調查、社會輿論調查都做得很好，出了不少優秀的成果；體改所作風民主，學風求實，值得肯定，希望今後堅持自己的特色，並與委裏各司局更好的合作，不要搞什麼「勝利大逃亡」。

其實，為從長遠計，自1987年底開始，體改所就開始分批送研究骨幹出國進修，最早到英國牛津大學的是國際合作處處長趙滄江、宏觀經濟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維迎；接著，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宋國青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王曉魯到澳大利亞坎培拉大學，經濟發展研究室副主任張阿妹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數量經濟研究室主任王輝到美國藍德公司，綜合經濟研究室主任程曉農到德國柏林德意志經濟研究所，企業根蹤系統主任彭照平到德國慕尼黑經濟研究所等等，先後送出了大約30多人。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應趙紫陽之邀1989年1月訪問北京時，專程到體改所作了學術報告。當大家請教台灣經濟何以起飛時，費老簡潔地說：「一個字：跑！讓所有的人、所有的企業都跑起來。那就要政府創造跑到條件，把一切束縛跑到東西都改掉。」因為談得很投機，費老私下和我說：「你們所的年輕人都很優秀，可惜知識和眼光還不夠。要培養他們，到國外去進修。」我說：「我正在做這件事。」

他說：「很好！我從耶魯來時，耶魯大學董事長萬斯^[669]和我說，要設一個3,000萬美金的基金，為中國培養一批人才。你看如何？」我聽了很高興，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就約了北大校長丁石孫^[670]、人大副教務長吳樹青，三家一起在北大臨湖軒、香山飯店先後協商並達成了培養人才的協議。可惜的是因為「六四」的發生，這個計劃沒能實現。

[669] 萬斯（1918-2002），美國前國務卿，時任耶魯大學董事長。

[670] 丁石孫（1927-），江蘇鎮江人。時任北京大學校長。

2月中旬，我從西安回到所裏，趙淪江來談了在英國進修的情況，東歐發生的大變化，特別是歐洲共產黨的衰微，她還談起了父親的痛苦。原來她父親牛蔭冠^[671]是個老革命，當年滿腔熱血抗日，為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奮鬥，但現在很失望。特別是他參加革命時，由薄一波主持，讓他親自鬥爭自己的大地主父母，直到斗死才算革命意志堅定，晚年則十分痛悔不該那樣。說著，說著，趙淪江流下了眼淚。

兩年前，我結識了在北大當團委書記的劉曉峰，他主動要求到邊遠地區工作，先任青海省政府副秘書長，後又到格爾木市當副市長。去年他回京時，就一再邀請我去格爾木轉一轉，說那裏面積比江蘇都大，礦產很豐富，還可以打黃羊，可惜我抽不出時間。這時，他提出想到體改所工作，以便瞭解全局。我和他說：「現在形勢不明，你先不要來。」他說：「老陳，為報效國家，我甚麼都不怕。」我帶他拜訪了志文、光輝後，後來任命他為體改所副所長。接著，他又帶著時任北大團委書記李克強^[672]來看我，談了兩個多小時。

體改所比較體制研究室送來了他們的研究報告：「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不穩定問題」。他們的報告提出：這些國家的社會不穩定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第一種是社會騷亂或動亂；第二種是政變；第三種是內戰。而決定出現何種形態的條件有5個因素：一是民眾的不滿意程度；二是領導者的不滿意程度；三是反對派的組織化程度；四是控制傳播媒介的能力；五是控制軍隊的能力。這個報告給人以啟發。

2月21-23日，體改所召開的形勢研討會上，各部門參加會議的研究人員，都對形勢不表樂觀。宮著銘說，需要治理整頓，但指導思想、方法手段都有問題，從去年9月以來發的40多個文件都是行政指令性的，比50年代還嚴厲。整治的思路不對，總認為行政辦法可以搞好，究竟是回到計劃經濟還是要搞市場經濟，這麼一搞給弄亂了。林毅夫說，現在仍然在「放收」循環，過去只改了經濟管理體制，宏觀運行環境沒有改。

高山說，目前「行政秩序混亂，社會摩擦增長」，很令人擔憂。石小敏^[673]說，改革走市場化還是回到計劃化，認識的分歧造成了混亂。陳錫文^[674]說，當前農村日子很難過，農民不願賣糧，就強行收購，還不給錢

[671] 牛蔭冠 (1919-1992)，山西興縣人。時任全國合作供銷總社主任。

[672] 李克強 (1955-)，安徽定遠人。時任北京大學團委書記，後任團中央書記、河南省省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673] 石小敏 (1950-)，北京人。時任國家體改委處長，後任體改研究會秘書長、副會長。

[674] 陳錫文 (1950-)，江蘇丹陽人。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後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打白條。吳曉靈^[675]說，應該控制信貸總規模，不要只控制貨幣發行。丁寧寧^[676]說，保命的要管死，斂財的要放開。張少傑說，現在是制度積累的深層次問題，不可病急亂投醫。吳稼祥說，事實說明傳統的路子、方法已經走到了盡頭。宋廷明^[677]說，情況確實嚴重，江蘇出現的「兩升四降」，就是工資和價格上升，而生產、投資、財政、出口下降，在全國也大體如此，應該立即提高利息，放開糧食市場。

楊冠三發出了驚人之言，他說：「改革進入無動力狀態，可能出現動亂時期。」他們在調查中發現，社會不滿迅速增加，在 48 個測度指標中有 43 個是不滿意；由於機會不公，人們的「相對剝奪感」在漫延；因為「合法性危機」，精英又處於「無動力」狀態。他的分析令人深思。李湘魯說，至今我們沒有實現社會的穩定轉變，出現了舊權威與無權威的循環。樓繼偉說，要從進一步認識體制環境作文章。會後，我們將這三天研討會的意見整理成會議紀要，上送給了中央領導人。

7-24 應外務省之邀與高山訪問日本

1 月 26 日，我參加完美國總統老布什在北京長城飯店舉行的「德克薩斯火雞」招待會後，第二天日本領館請我吃飯，歡迎我到日本訪問。3 月 1 日，我和中央政研室綜合局副局長高山一起飛到了東京，日本外務省安排我們住進了新大谷飯店。當晚，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課長阿難請我們吃了日本有名的「鐵板燒」。飯後，日中友協石川賢作會長禮節性地來拜訪。接著，發展組的老組員黃曉京^[678]和體改所聯絡員趙文鬥^[679]來訪。

第二天，日本外務省的齋江女士陪同我們訪問了外務省。他們請我介紹了中國改革的進展和問題，而後提了一些疑問：如「計劃經濟的改革和一黨獨裁的改變不能分開處理嗎？」「中國黨能不能像日本自民黨實行一黨獨大和黨內派系公開化？」「中國的人大代表大部分是黨員，開人大又開黨代會，是不是太複雜化了？」「中國是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有黨委，企業黨委究竟幹什麼呢？」「老一輩不容易按規則辦事，怎麼辦？」等等。

[675] 吳曉靈 (1947-)，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後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676] 丁寧寧 (1947-)，河北武安人。時為中央黨校博士，後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研究部部長。

[677] 宋廷明 (1945-)，四川閬中人。時任國家體改委理論宣傳司司長。

[678] 黃曉京 (1957-)，北京人。曾在發展組、體改所作研究，後東渡日本讀學位、經商。

[679] 趙文鬥，時任《經濟日報》駐東京記者。

中午 12 點，一邊吃飯，一邊由經團聯常務理事糠遲^{【680】}介紹日本的經濟發展。他說：二戰以後，日本的制度改革在美軍的監督下進行，一是農地改革，無地的農民得到了土地，又不負擔軍費，國內市場發展起來了；二是教育改革，實行 9 年義務教育；三是職位改革，把 80% 是軍人的 22 萬人，從政府機構趕了出去，為青年人的發展提供了條件。60 年代日本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所得倍增計劃」使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市。

他接著說，日本政府在 60 年代實行貿易自由化，70 年代實行投資自由化，既發展了經濟，又防止了通貨膨脹，關鍵是實行了自由競爭。因為人的自由流動，城鄉的差別也不大，像東京的收入高支出也高，鄉村的收入低支出也低，而且鄉村的文化環境也在不斷改善。資金、技術、勞動自由流動，由市場決定，大大提高了效率，若是由政府干預就不會這麼好。隨著經濟發展，成本也在提高，我們正計劃減少法人稅，增加消費稅。

下午兩點，我們拜訪了日本國民經濟研究協會會長竹中一雄^{【681】}。他說，日本、韓國、台灣都在人平均國民所得達到 300-1,000 美元時出現過不穩定。怎麼才能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呢？一是發展和提高教育水平，廣泛的理性討論有助於求得共識；二是只注重發展經濟，不注意經濟、政治、文化的均衡發展，就一定會出現不穩定。老子說「禍福相依」，遇到失敗就是解決問題的時候。國民黨在大陸失敗了，在台灣卻成功了，就是這個道理。

他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在明治維新成功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勝利了，導致了侵略戰爭的失敗。失敗以後，經濟上又成功了，如果滿足了還會失敗。中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遇到困難是正常的，注意吸收外國的成功經驗很重要。像日本戰前，能幹的人才都集中在政府和軍隊，戰後分散到企業和社會，才出現了均衡發展，台灣也是這樣。日本政府制定了大的產業導向政策以後，像教育、能源、交通、其他，讓人們自由選擇。

下午 4：30，日本內閣企劃廳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所長香西泰^{【682】}會見了我們。他說，我們也為通貨膨脹問題很傷腦筋，從統制經濟轉到市場經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發生這個問題。1949 年日本實行「道奇計劃」，廢除統制經濟、推行市場經濟，為了防止通貨膨脹，實行了嚴格的緊縮政策；50 年代初，收入差距擴大，我們用 5 年時間解決了。經濟發展中，「環境問題」很大，我們的環境廳用法律和政策有效地解決了。

【680】糠遲，時任日本經團聯常務理事。

【681】竹中一雄 (1923-)，時任日本國民經濟研究協會會長。

【682】香西泰 (1933-)，時任日本企劃廳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所長。

香西泰友好地說，人們對問題的看法總會不一致，有的人左一點，有的人右一點，一萬年以後也會這樣。你們中國把一些理念的不同當成意識形態爭論還說得過去，為什麼把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也當成意識形態的問題爭論不休呢？那什麼時候解決實際的重大問題呢？這種爭論不休，只會對國家和民眾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啊！我深深感謝他對中國的關心。我回國後，把他的意見告訴了趙紫陽，趙紫陽說：「這是我們的一個大問題啊。」

6點鐘，日本最大的野村證券公司請我們吃飯，飯局設在東京最貴的銀座的一家叫做銀閣的著名飯店。主人是吉村和米田，包間中間擺著一張長方形的矮桌，相對而坐正好可以坐主客4人，腿放到桌下的槽中很舒服。我們剛坐下，進來了4個日本的歌舞伎，她們每人都是濃妝艷抹、身著和服，手上端著食盤。她們分別到每位客人面前，鞠了一躬而後跪了下來，將食盤中的酒倒了出來，自己先嚐一口再遞給客人。

我和高山從來沒有遇到這般陣仗，有些不知所措。吉村和米田已經端起酒杯向我們致意，據他們說，這是日本招待最尊貴客人的禮節。我們與他們乾了杯，這種日本「薩克」度數很低，實際上是中國唐代的清酒，我當晚喝了十七八瓶也沒有醉。吃飯間，他們說了兩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吉村說，孟子說過「無恆產者無恆心」；米田說，還要加上一句「民不富則國難強」，說得十分有道理。日本外務省的陪同齋江，從上午8點起到晚上6點走，給我們安排了5個活動，我們對她工作的認真負責、對朋友的熱情守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飯店已經夜裏11點多，我們睡了一個好覺。

第二天，齋江陪我們去了日本農林水省，小風企劃官作了「21世紀日本農業」的報告，又討論了：1. 結構政策，主要是體制與活力；2. 糧食管理的檢討；3. 今後10年農產品的需求與管理。下午2點，日本的中國問題研究所所長辻康吾^[683]，請我講了「中國改革的進展和難題」；日本政法大學教授粕谷，向我們介紹了「日本高成長時期的社會問題」；而後，我們去了新宿，日本阿克塞斯研究所江本來，又和我們談了新疆開發的問題。東京都大學榮譽教授、日中21世紀友好協會首席委員岡部達味^[684]，請我們吃了飯，並討論了中國的改革問題。我們又到青山學院，給亞洲政經學會的成員作了演講。晚上與中國留學生聚會。

3月5日是禮拜天，我們參觀了雕刻的森博物館。這個博物館的特點是不同的館裏放著不同文化的藝術品。參觀的人大多是八九歲到十一二歲

[683] 辻康吾 (1931-)，日本著名漢學家，時任中國問題研究所所長。

[684] 岡部達味 (1932-)，時任東京都大學榮譽教授、日中21世紀友好協會首席委員。

的小學生，由老師給他們講解，看來日本對「先有模仿，才有創造」頗有一番安排。而後到著名的櫻井茶屋吃午餐。下午參觀了御關所和一家手工藝工廠。返東京後，外務省給我們安排欣賞了一場日本的歌舞伎。看來，日本對傳統和現代的各種文化的保護，是下了功夫的。

我們到亞洲所參訪，宗像^{【685】}所長和濱部長向我們介紹了韓國、台灣、新加坡發展的經驗。他們說，這些地方實現經濟起飛都是用了「開發獨裁」的辦法，就是：在一段時間內，把政治反對派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呼聲壓制起來，讓民眾的注意力集中到發展經濟上。像韓國在1948年人平均國民所得只有67美元，到1988年已經達到3728美元，台灣、新加坡也大體如此。「開發獨裁」對落後地區有效，但若不能轉向民主化則傷害也很大。

下午，我們到富士見市參觀了日本花農、菜農的生產和經營。農民都是按技術員規定的流程作業，產品由農合組織成批買走，賣給各經銷店。說實話，和日本的農民聊起來，他們可沒有中國的農民聰明。晚上住在瀨裏奈吃鐵板燒，來了一批留學生又請我們喝「撒克」，一直聊到深夜。

第二天我們拜會了日中經濟協會的佐久間先生，他請通產省產業政策局產業構造課的山田，給我們講了日本的產業政策。日中貿易中心會長木村一三^{【686】}，坦率地提出了他對中國改革的意見。他說，中國的決策和研究沒有一體化；經濟比軍事複雜，長官意志搞建設不行；想當然不會成功，用指導戰爭的辦法搞價格改革行不通；放開價格之前要打好基礎，否則一定會出問題；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是搞不好的，特別是黨要改革，你們還缺少一步步可以實施的行動性綱領。中國很可能出現滯漲，要盡快實行傾斜的產業政策，這樣才能保證重點。

日本國策研究會會長法眼晉作^{【687】}和我們說，重視教育是日本成功的重大原因，要想盡辦法提高國民教育水平，日本最好的建築往往都是學校。我們接受日本自民黨顧問、眾議員稻葉修的邀請，去他家拜訪，他一再強調日中友好的重要性。接著，我們遊覽了淺草，這是日本保持了江戶時代風情的旅遊勝地，在走往淺草寺的路上，佈滿了賣各種食品和工藝品的商店，人來人往，十分熱鬧。晚上，著名漢學家清秀請我們吃飯，彼此談的很愉快。

【685】宗像 (1936-)，時任亞洲所所長。

【686】木村一三 (1917-2006)，時任日中貿易中心會長。

【687】法眼晉作 (1910-1999)，時任日本國策研究會會長。

3月8日，我們乘新幹線前往關西，參觀了瀨戶大橋後，乘飛機從四國到了大阪，住在了皇家飯店。留日法學博士季衛東^{【688】}來訪，他是一個熱情而理性的人，1983年從北大法律系畢業後，東渡日本在京都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現在神戶大學法學院任教。我們談得很投機，都有一種相識恨晚的感覺。我心想，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正缺少這樣的法律人才。晚上，日本岡山商科大學校長井尻宴請了我們。

到三洋參觀。三洋在1947年還是一個小廠，現在是日本五大電器工廠之一。工廠的管理十分嚴格，我們到車間參觀都要換掉衣服和鞋。每個車間門口都放著兩個橡皮人，據說工人緊張地勞累一天，下工時往橡皮人身上打幾拳，就會心理平衡一些。我們原計劃在日本訪問十天，外務省的陪同齋江建議我們再延長五天，我們在京都辦了延期手續。參觀了清水寺、平安神廟和二條城。日本阿克賽斯研究所所長江本佳隆請我們吃飯，給我耍了一盅從未吃過的「河豚精子」。

參觀日本零售業的霸王大榮公司，看了神戶人工島。訪大阪產業開發研究所，尾上所長談了他對中國的看法，他說：中國處於現代化起步階段，但對公害問題缺少大的準備；經濟合理性差，工人懈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工不清。他認為，通貨膨脹和環境問題將會成為中國的大問題。3月11日，我們乘新幹線回到東京，住到了魯迅的朋友松本重治創辦的國際交流會館，留學生李廷江^{【689】}、黃曉京、時輝^{【690】}、張紀濤^{【691】}接待了我們。

曉京和時輝陪我們去了秋葉園、原宿和明治神宮。遇到了兩位台灣的女記者，她們熱情地邀請我們吃飯。飯間說起日本女人的賢惠，女記者發表了高見，她們說：「日本女人是嘴好心壞，老公不能掙錢了，就一腳把他踢出門外。中國女人是嘴壞心好，一旦成家，處處為老公著想。為什麼成親時，一個叫『新郎』，一個叫『新娘』，就是女人有了一個新的兒子，男人有了一個新的媽媽！」大家聽得都笑了，我鼓掌說：「妙論，妙論！」

3月13日，李廷江陪我們到了川崎。拜訪了川崎市勞動組合聯合會以後，廷江帶我們到了熱海，在那裏我們好好地泡了一次溫泉。令人感歎的是，溫泉牆壁的瓷磚上都刻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的頭像，以及他們的

【688】季衛東（1957-），江西南昌人。自日本京都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後，於日本神戶大學法學院任教。

【689】李廷江（1954-），遼寧瀋陽人。自日本東京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後，於日本亞細亞大學任教。

【690】時輝（1955-），北京人。曾在農業部、發展組作研究，後東渡日本讀學位、經商。

【691】張紀濤（1953-），江西九江人。時於日本東京經濟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詩句。接著，我給日本社會黨作了個報告。晚上參加了社會黨的餐會，幾十人圍成一圈席地而坐，邊吃邊唱邊跳很是熱鬧。飯後，大家一起跳舞，一位漂亮的女士非拉著我跳，我勉強跳了幾下就逃跑了。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MOA美術館，遊覽了箱根，回到了東京。日本三菱集團的武田^{【692】}來訪，說要到中國投資，我給他介紹了青島市長俞正聲。我們又感謝了國際交流會館的主持加藤干雄，他對中國留學生一直很關照。當晚，李廷江、黃曉京、張紀濤、杜進^{【693】}、時輝等一批朋友，買了很多撒克，大家都喝得不少，每個人關心國家進步的情懷溢於言表，令人感動。3月16日，我們返回北京。

回想在日本的半個月，所見所聞實在讓人佩服。日本這個民族靠著堅韌不拔的毅力，在二戰以後的四十多年間，把日本建成了一個發達的現代社會。他們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又吸收了現代文明的精華。他們迅速建設了有自己特點的民主政治，形成了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他們的政府工作人員辦事認真負責，企業有效率，工人守紀律，人和人之間禮貌相待，整個國家充滿了活力。實在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7-25 改革 10 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剛回國，就電話不斷。第二天到所裏，劉能元搶著向我彙報了「改革 10 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的籌備情況。早在 1988 年初，一批在 10 年改革中作出貢獻的中青年學者就不斷找我說，改革開放 10 年了，我們應該組織一個研討會，回顧與展望一下。確實。在農村改革、經濟改革以及政治改革中的重要問題、重要想法、重要設計，大多都是中青年學者首先提出來的。價格闖關沒有成功，我們開始準備這個會議。

丫丫快 11 歲了，越長越清秀可人。除了畫畫，她還喜歡上了做衣服。我送給她幾個從日本帶回來的小手工藝品，她十分喜愛。她問我：「日本好玩嗎？」我說：「挺好玩的。」她懷疑地問：「那為什麼日本鬼子殺了那麼多中國人？」我說：「殺中國人的是日本的法西斯。現在多數日本人還是對中國友好的。」她又問我「你怎麼總是比誰都忙啊。幾年了，都沒帶我去玩過。」我說：「老爸確實很忙。過一段一定帶你去玩！」誰知這個話竟沒能實現。

3月下旬，體改所進行了年度總結。我做了一個題為《選題方向·組織結構·辦事程序》的報告。我說，我們面臨著「計劃」與「市場」兩套

【692】武田，時任日本三菱集團常務董事，後任駐中國總代表。

【693】杜進（1953-），上海人。時於日本一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邏輯系統的尖銳衝突。大家選題，要從中國經濟成長和政治成長的過程中，需要解決哪些難題入手，推進改革的自然發展過程，而不是搞什麼人工構造的體系，任何烏托邦工程對一個社會都會害人非淺。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我們決定組建五部一處。

經過所務會議多次討論，體改所決定將已有的 18 個處室進行改組。為了將基礎研究、戰略研究、應用研究相結合的研究結構保持下來，並能更有效地配合改革的實際需要，我們將三大系統組建成了基礎研究部，將綜合研究、比較體制研究、社會研究組建成戰略研究部，將企業研究、市場研究、社會保障研究與政治法律研究、宏觀體制研究、產業和區域研究、外貿外資研究組建成應用研究一部與二部，將改革宣傳、信息、編輯、培訓、西部中心與青年經濟學會組建成聯絡諮詢部，由所長辦公室與外事處組成行政處。

這期間，我還與威廉姆森^{【694】}討論了交易費用問題；蓋特納^{【695】}請我吃飯議論了日本的情勢和中國的改革；美國大使館的博瑞克^{【696】}在建國飯店請我吃飯時，神秘地說，有什麼需要，他們可以隨時幫助，似乎嗅出了些什麼；聽取日本青山大學名譽教授石川滋關於低度市場經濟的報告並宴請了他；世界銀行林重庚請我和李昌^{【697】}、江平^{【698】}、吳明瑜^{【699】}吃飯，議論起國內情勢都感到不樂觀。

日本三菱集團的駐中國總代表武田找我談投資的事。我帶他去青島找了俞正聲，還順便看了青島附近的黃島。黃島實在是一個天然的休閒勝地，海邊是細細的黃沙，人走進海水 200 米才到腰深，若在海邊建一些旅遊設施，一定會吸引不少遊客。我和正聲說：「你為什麼不把黃島海邊的地批租出去？」他笑笑說：「我何賞不想，但洋浦的事鬧得沸沸揚揚，還是再等等看吧。」登嶗山，參拜了上清宮，喝了聖水洋的泉水，連夜趕回北京。

趙二軍找我，談了關於洋浦開發的爭論：今年 1 月，以清華大學教授張維^{【700】}為首的五個政協委員到洋浦參觀以後，給政協提出了一個報告，

【694】威廉姆森 (1932-)，美國人。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交易費用學派之集大成者。

【695】蓋特納 (1961-)，美國人。曾任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後任美國財政部長。

【696】博瑞克 (1945-) 美國人，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政治參贊。

【697】李昌 (1914-2010)，土家族，湖南永順人。時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698】江平 (1930-)，浙江寧波人。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副主任。

【699】吳明瑜 (1931-)，浙江德清人。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

【700】張維 (1913-2001)，北京人。力學家，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

認為洋浦把土地承包給外商是「喪權辱國」，結果鬧出了一場風波，還引起了一些學生上街遊行。但海南省委認為，用外商的錢搞開發，這麼作並沒有錯。下午，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省長梁湘請我去討論這個問題，我建議他們直接給鄧小平寫報告，我可以代為轉送。直到4月28日，鄧小平發出了「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指示，這場爭論才平息，但卻錯過了外商投資的時機。

抽空去看維凌，他笑瞇瞇地說：「姿先生，你放心。你讓我辦的事都辦了。」正好湘魯、唐昕都在坐。我說：「兩年多了，你們的選美委員會怎麼不見動靜？莫不是好的讓你們過了篩子，賴的又不好意思推給我？」大家哈哈地笑做了一團。維凌說：「大丈夫何患無妻！你就沒碰到中意的？」我說：「也碰到過，只是沒有時間接觸。」維凌詭笑著說：「姿先生，你就作些犧牲，多成全哥們兒吧。」

4月1日，我到京豐賓館召開了「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的主席團預備會，發起單位有30多家。晚上，順利地開完了主席團會議，王岐山、劉延東等人推舉我當了主席團主席。夜裏，到餐廳去吃夜宵，我跳起來想用手打開天花板上的燈，落地時一下把右膝蓋扭傷了，疼得站不起來了。從日本來開會的杜進把我攙起來，扶著我坐到了餐桌的椅子上。吃了一碗餛飩，兩個人把我抬著送到了客房。

第二天早上，右膝腫得更嚴重了，大家都勸我去醫院，可上午的開幕式還要我主持，臨時換人也不妥當，我只能堅持一下。大會從全國各地來了500多位代表，9點的預備會上介紹了會議的籌備過程，通過了主席團名單和會議日程及會議規則。10點，由我主持宣佈大會開始，而後各發單單位代表講話。王岐山走到我身後，悄悄地說：「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701]想講一分鐘話。」我說：「那好。」萬潤南上台講了話。

其實，早在一年前，萬潤南就提出想與體改所合作。我請人做了一番調查，發現這個人很能幹但不正派。文革中，他在清華大學時，與劉少奇的女兒劉濤^[702]談戀愛。同學和他說，劉少奇是最大的走資派，剛被打到，你就和他的女兒戀愛，不怕惹麻煩嗎？他詭秘地說，劉少奇總有一天會平反。後來，劉少奇病故了，他就和劉濤翻了臉，劉濤哭著說，你是天下最無情的人。接著，他和李昌、馮蘭瑞的女兒李煜結了婚，馮蘭瑞給他搞了4萬元啟動資金和進口額度，他開始從日本搞電子零件，這樣四通就搞起來了。

[701] 萬潤南 (1946-)，江蘇宜興人。時任四通公司總裁。

[702] 劉濤 (1944-)，湖南寧鄉人。劉少奇之第四個孩子。

我的膝蓋腫得更厲害了，當天下午1點，大家把我抬到了301醫院。醫生讓我立即住院，我住進了外科病房，病房醫生給我右腿打上了石膏，一動也不能動了，各地的代表紛紛來看望我。會議結束時，胡啟立、李鐵映等領導人到會，看望了與會代表。陶斯亮正在病房看我，胡德平也來了，我握著德平的手說：「等我能下床了，就去看望耀邦叔叔。」德平說：「你隨時都可以來！」誰知我這個願望竟沒能實現。

我住院以後，每天都有各地的朋友和親戚來探視。所裏來人給我介紹了研討會上的各種意見，主要是：對改革出現的停滯提出質疑；對治理整頓造成復舊表示不滿；對中央聲音不同感到不安；對社會問題的漫延非常擔心；對今後局勢的發展十分關注。一起合作10年的王小強，要去美國進修了。我誠懇地和他說：「你一年後回來，接我這個所長。醫生說我現在是『氣血兩虧，入不敷出』，需要休息。」小強很動情地說：「你別多想，就是累壞了。一定要好好休息。」

第八章「天安門事件」(1989)

——1989年中國的「六四屠城」

胡耀邦的不幸病逝，引發了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最大的一場愛國民主運動。趙紫陽緩和矛盾的努力，遭到李鵬的強硬抵制。鄧小平血腥地鎮壓了這場運動。

8-1 中國的困局和胡耀邦病逝

聽說樸方也在301住院。4月13日晚飯後，我讓護士用輪椅推著到了他的病房。上次見樸方，還是1月中旬與唐昕一起找他，談《政治體制研究叢書》出版的事。樸方躺在病床上，氣色不太好。他和我說：「我已經肝復水了，可能活不久了。」我說：「人的生命力是很頑強的，你大風大浪都挺過來了，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有問題！」我耽心他為康華的事情心理上受到了打擊，我說：「無論外邊現在說些什麼，你都要看開一些。」

樸方苦笑著說：「我問心無愧，有什麼看不開的？」我說：「你開創了中國的殘疾人事業，光這一條就可以載入史冊。」他問我：「外邊到底怎麼樣？」我說：「情況不樂觀。」就把知道的情況說了說。我最後說：「從去年『價格闖關』沒有成功，搞『治理整頓』很多東西又復舊了，民眾的不滿在增加。趙紫陽和李鵬的施政理念又不同，事情很難辦。」樸方沒有說話。與開完十三大後，他主動讓我給紫陽稍話，態度有了微妙的變化。

已經談了兩個多小時了。我說：「樸方，你休息吧。我看中國的改革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計劃明年也退下來，養一養病。由副所長王小強接我。」他說：「也好！退下來，可以冷靜地思考思考。」我回到病房，心裏感歎：真是天意弄人啊！像樸方這樣眼光、才幹俱佳的高幹子弟很少見。若樸方沒有殘疾，一定會是一員改革開放的大將，中國也說不定會有另一種更好的局面。

4月14日，周傑到醫院來看我，說起當前的形勢很是憂心。趙紫陽希圖推進改革的意見，都被李鵬肆無忌憚地阻擋了。經濟改革的停滯和政治改革的難於進展，使民眾極其失望，北京的大學生們躁動不安，紛紛以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的名義，舉辦各種研討會抨

擊共產黨的「不民主」和腐敗。居民們則對物價上漲和社會不公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不滿情緒。周傑還說到，政研室和研究會現在都很困難。

周傑走後，我想：李鵬那麼有持無恐，顯然背後有一個多數元老支持的既得利益集團。當時，元老政治是中國政治的一大特色，這些元老在文革中大多受到過迫害，但幾十年搞階級鬥爭和公有經濟的慣性，使他們在觀念上很難接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新的作法，更不能允許觸及他們長年擁有的各種特權。在他們後面，則有一大批靠歷次運動中左傾而提拔起來的中層幹部，這些人對改革開放大多持懷疑或不滿的態度。

胡耀邦希望能擺脫斯大林、毛澤東的極端行為，回到馬克思「人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努力沒有成功，被他們逼迫下台了。趙紫陽推動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作法，自然成了他們攻擊的目標。當新舊體制並存處於改革「陣痛」時期，民眾不滿通貨膨脹、官員腐敗、分配不公、治安惡化時，更迫切地希望有效的加快改革步伐；同時，也給那些反對改革的人製造了把中國拉回舊體制的借口。

畢竟改革開放已經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10年來，農民的收入增加了3倍，許多農民走出了世代居住的村莊，尋找發展和致富的機會；城裏人的收入也增加了1倍，開始享受越來越多的現代物質、精神生活；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吸取各種知識，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日益強烈，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幹部們也從打開的國門中瞭解到中國的落後，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日趨積極。人們還是普遍嘗到了改革開放的好處。

與此同時，人們對改革的期望值也大大提高了，總希望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實惠。但被禁錮在舊體制中的改革不僅步履維艱，而且越來越令大家失望。從1988年夏季的搶購潮開始，物價再度上漲，民眾爭相儲物保值；而獎金的增加，又進一步刺激了通貨膨脹；腐敗與官倒也愈演愈烈。據體改所的社會調查，1985年大部分民眾對腐敗等社會問題的認識，還認為通過整黨、加強紀律會好轉，到1988年就認識到是體制問題了。

這時，整個社會的心態和反映是複雜的。知識分子大多希望加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進一步提高知識分子待遇，迅速扭轉社會上的各種不正之風；工人希望增加收入、穩定物價、清除腐敗，又對打破大鍋飯還有顧慮；幹部們既希望減少上層的特權，又擔心改革會危及自己的地位。大家雖然對改革的進程不滿，但多多少少都懂得中國不改革沒有出路，對退回舊體制則更不滿。若不找到有力的借口，李鵬們很難搞垮黨內的改革力量。

種種孕育的矛盾，反映在理論界、思想界、文化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激烈地要求進一步的改革；同時，各級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幹部也紛紛要求推進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團則意識到改革的深入，將給他們帶來一系列損失。所以，大家都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特別是趙紫陽這時處於一種「欲進不能，欲罷不忍」的境地，而李鵬們依靠舊體制卻是輕車熟路很容易主導局面。

4月15日，我在病床上吃完晚餐。中央台《新聞聯播》節目裏傳來了胡耀邦病逝的消息。我驚呆了，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淚。從1957年在第三次團代會上，他給我題字「青年代表著國家的未來」；到1962年他到北大物理系搞「甄別」時說的「千錘百煉才能成鋼」；再到1971年春節我向他彙報農村情況，他鼓勵我說「青年人的雄心壯志和廣大民眾的利益結合起來才会有大出息！」他的教誨一直激勵著我克服萬難努力奮進。

耀邦叔叔才73歲呵，怎麼會就一下走了呢？再想起，1973年在他家吃飯時，他那麼坦蕩地談「男女平等」問題；1975年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最緊張的時候，他無所畏懼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悲劇」；1976年的「批鄧」高潮中，說到天安門事件，他堅定地指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順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1978年若不是他的批示，我也調不回北京，為改革奉獻自己的心力。

雖說他身居高位日理萬機，有時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但我找他平反冤案，他二話不說立即處理，是他大無畏地主持平反了1949年以來歷次運動造成的300多萬件冤假錯案。當我向他反映整「三種人」往往變成一派整一派時，他清醒地說「對造反派應該區別對待」。他在中央黨校發起的「真理標準」討論，打破了「兩個凡是」和「繼續革命」的禁錮。沒有他為國為民無私無畏的奮鬥，中國不可能短短幾年從百廢待興變成欣欣向榮呵。

1978年，當萬里在安徽試行包產到戶時，他最早表示了堅決支持；1981年他又對我1980年的安徽調查和1981年的四川調查，給了很高的評價。因為他當了總書記，我覺得不便多打攪他，就找他請教的次數少了。但1984年4月，我養病回京時，在中南海碰到他，耀邦叔叔還是那麼熱情地關心我。我最後一次當面聆聽耀邦叔叔教誨，是1984年9月，他清醒地提出了「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就要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

耀邦叔叔是我接觸過的中共領導人中，最光明磊落、耿直正派、無私無畏、敢作敢為的人，他對我的指教和幫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我淚如泉湧，真後悔在耀邦叔叔受到不公正對待時，沒有抽空去看望一下他老人

家。想起他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巨大貢獻，就這麼含恨地離開了人世，我一夜都難以入眠。當夜，不時傳來忽起忽落的哀樂聲，民眾心裏對胡耀邦 1987 年的含冤下台，一直是深表同情的。

因為我和護士們的關係處得很好，第二天一大早，她們就破例讓我的秘書楊曉進到病房來。楊曉一來，就激動地和我說：「昨天夜裏，北大、人大貼出不少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和輓聯。」親友們不斷到病房來探視我，也給我帶來了各界民眾悼念胡耀邦的信息。特別是學生的情緒越來越激烈，平日缺少發洩的渠道，一旦爆發往往難於控制。

8-2 人大貼出的「關係圖」和北大提出的「七條」

4 月 18 日下午，李峻帶著體改所的幾個骨幹來找我，看來大家都很著急。我在病房開了個小會，先請社會調查系統和社會研究部介紹了他們這幾天調查的情況。

看來，人們在胡耀邦身上寄托的哀思，反映了大家對改革前期的懷念和對現狀與前景的失望，特別是人們對胡耀邦被老人非法搞下台深感不滿。尤其是青年學生認為，胡耀邦下台與當年的學生運動有關，也有通過悼念表達愧疚的意思。故而，胡耀邦的突然病逝，迅速引起了校園、工廠、機關廣泛的悼念活動。活動中，也出現了批評鄧小平、趙紫陽、李鵬及各個領導人和各種社會現象的大字報。

人們的不滿集中在三個方面：人們對改革進程不滿。很多人認為，經濟改革已經 10 年了，很多基本問題還解決不了，通貨膨脹持續發展；而政治改革只是一句空話，所謂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權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都無法實現。人們對社會狀況不滿。對官員腐敗、貧富不均、教師地位低下、幹部及其子弟的經濟政治特權、官倒形成的暴發戶等等，都十分不滿。集中起來，可以說是對機會不均等的不滿。人們對「工作失誤」不滿。本來新舊體制並存，許多問題的存在有著深刻的體制原因。但近一年來，李鵬反覆講「工作失誤」，目的是攻擊趙紫陽，卻讓民眾覺得領導人太無能了，所以才有這麼多的失誤，才把中國搞成了這個樣子。

從各地傳來的情況看，大體和北京差不多。雖然各種意見都出現了，也不乏激烈的說法，但主調還是「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經過討論，我提了 5 點意見：第一點，要理解和支持學生和民眾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第二點，要理解學生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願望；第三點，要保持冷靜的頭腦，體改所人員一律不要介入學生運動；第四點，要研究作

些什麼實質性的工作。比如，迅速把群眾合理的意見反映給上層；建議上層領導人盡快和學生對話以緩解矛盾；盡可能勸阻過激言論和行為的出現等。第五點，我特別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靠學生運動實現的。但不能對學生運動潑冷水，要進行疏導。

當天，天安門廣場上已經擠滿了人潮，許多大學生還在不斷成群結隊地湧來。花圈、輓聯、詩歌、悼辭，貼滿了紀念碑，一些學生、幹部開始發表演講，提出改革和民主的訴求。體改所社會研究部主任白南風做了兩個特大氣球，用解放牌大卡車運到了天安門廣場。結果，寫著「耀邦不死」的那一個氣球飛上了天，寫著「改革萬歲」的另一個氣球卻掉到地上破了，這件事給大家一種不祥的預感。

晚上，楊曉給我拿來了一張貼在人大的「關係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係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還是有意地在故意攪渾水？不可小視。像在「關係圖」中，「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係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楊曉告訴我，周少華^{【703】}原來很支持學生，看到這張「關係圖」，轉而罵學生：「純粹是小孩子在胡鬧！」

周少華在體改委擔任試點局局長，人很開明能幹。無論在體改委還是在社會上，人們都很稱讚這位衝鋒在改革第一線的女將。她父親周榮鑫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和教育部長，受「四人幫」迫害至死。父親慘痛的經歷，使她痛感中國不合理的體制必須改革。所以，她一直一心一意積極的搞改革是有目共睹的。她對「關係圖」的看法，應該說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支持改革的高幹子弟的看法。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看似一張小小的「關係圖」，搞不好就會把事情變成「平民和貴族」的鬥爭了，何況還傷害到了鄧小平。據我所知，鄧小平這個人剛毅果決。早在二野時，他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毛澤東說他是「鋼鐵公司」。毛澤東喜歡「運動群眾」，鄧小平則是「害怕群眾」，毛澤東又批評鄧小平是「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故而，鄧小平在受辱的情況下不得已會韜晦，但在掌權的時候決不會讓步。

4月19日，我和體改所的幾個骨幹說：「從這張『關係圖』反映的情緒看，搞不好這次學生又要鬧『悲劇』了。要抓緊作領導人的工作，盡快促成與學生對話，以免情勢的惡化。同時，一定要想辦法勸學生理性、冷靜。」說心裏話，從看到『關係圖』開始，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多年

【703】周少華（1943-），山東蓬萊人。時任國家體改委試點局局長。

未見的北大老友程遠通^{【704】}從瀋陽趕來看我，他一直在民主黨派裏工作，人顯得蒼老多了。他也主張中國應該發展民主，但耽心現在會不會亂。

4月20日晚上，經醫生同意，楊冠三和楊曉陪著我到北長街會計司胡同胡耀邦家致祭。耀邦家門口排著泣不成聲來致祭的長龍，德平看我駕著雙拐排在後面，激動地走過來和我長時間地擁抱，叫我直接進了靈堂。看著耀邦叔叔的遺像，他那深沉凝重飽經風霜的面容似乎有些憔悴，他那坦盪開明剛毅果決的眼神又似乎有些迷茫。看著耀邦叔叔的遺像，為什麼這樣功在千秋深受百姓愛戴的改革領袖，竟會如此含冤地離開人世？為什麼那些文革受盡折磨而後平反的老人，對恩人竟如此懷恨？

我不禁淚流滿面。眼淚模糊了視線，我的腦海中突然閃現出，兩果《九三年》中郭文被送上斷頭台的一幕。我先後向眼圈紅腫的李昭^{【705】}阿姨、劉湖^{【706】}、胡德華^{【707】}、安黎^{【708】}致意後，德平摟著我悲傷地說：「人都不在了，難道稱呼他一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行嗎？家屬就這一點要求。」我後來才知道，是鄧小平不同意在胡耀邦的悼辭裏用這個提法。憑心而論，中國共產黨裏還沒有一個人比胡耀邦更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華。

德平對各界群眾自發為他父親舉辦的悼念活動非常感謝。但他也十分耽心，會不會鬧出什麼問題，他一再說：「希望悼念活動，大家能在理性、祥和的氣氛中渡過。想辦法勸勸學生，激烈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把事情複雜化。」我和他說：「要防止釀成1987年的悲劇重演。群眾紀念你父親，是希望搞好改革。如果政府能有一個進一步改革的態度，學生的工作也就比較好做。學生能適可而止，事情就好辦了。」

聽德平說，《新觀察》和《世界經濟導報》，昨天上午召開了一個座談會紀念胡耀邦。他也說到：「希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在祥和的氣氛中渡過。」會議到了50多人，李昌、胡績偉^{【709】}、秦川^{【710】}、于光遠、吳象、蘇紹智^{【711】}、於浩成^{【712】}、嚴家其等人都到會講了話。回到醫院，白南

【704】程遠通（1935-），遼寧瀋陽人。時於民盟遼寧省總部工作。

【705】李昭（1921-），安徽宿縣人。胡耀邦夫人，曾任北京市紡織局局長。

【706】劉湖（1945-），湖南瀏陽人。胡耀邦二子，時任華潤集團副總經理。

【707】胡德華（1948-），湖南瀏陽人。胡耀邦三子，後自中國科學院軟件中心下海經商。

【708】安黎（1942-），陝西綏德人。中共組織部長安子文之女，胡德平夫人。

【709】胡績偉（1916-），四川威遠人。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

【710】秦川（1920-2003），貴州赤水人。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

【711】蘇紹智（1923-），滿族，北京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712】於浩成（1925-），滿族，北京人。曾任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法學雜誌》主編。

風在病房等我。他拿著抄寫、拍照的一些大字報，並給我介紹了這兩天各方面的情況。

最重要的是19日凌晨，北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向政府提出了7條要求：要求黨中央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要求新聞立法，開放報禁；要求公佈中央領導及其家屬的財產和收入；要求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要求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要求政府肯定學生此次自發舉行的悼念活動。北大學生提出的「7條」，顯然多數條款表達了知識分子與追求民主的人們的願望。

8-3 矛盾的激化：「新華門事件」與「大會堂事件」

白南風向我描述了激怒學生的「新華門事件」：

4月19日夜11點多，3,000多名學生坐在中南海正門新華門前的地上，反覆呼叫「李鵬出來！」「李鵬出來！」圍觀的民眾有七八千人，公安、武警動員民眾離開。4月20日凌晨1點，還有300多名學生坐在那裏，他們計劃早上5點撤離，以免妨礙交通。但在4:20分時，公安、武警與這些學生發生了衝突。原來，在公安、武警強行將學生拉上公交車時，一些不願意上車的學生和公安、武警發生了爭執。在相互推搡的過程中，公安、武警毆打了一些學生，大約有四、五十人被打傷。學生覺得，自己是一片愛國之心，希望政府能理解，希望領導人能出面，對他們的行動給予肯定。結果，領導人沒有出面，學生對政府就已經感到失望；而公安、武警對學生的撕打，進一步引起了學生情緒的激化。目擊者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女生氣憤地喊了一句「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當時，立即有學生制止了這個女孩，公安、武警擠過人群要抓她，很多學生保護著她走了。我們可以設想，如果這些學生抱著「打倒共產黨」的心理，就不會去靜坐。因為靜坐就表示他們對政府還是抱著希望，希望政府能解決問題；他們失望之後，出現一些偏激情緒是可以原諒的。但4月20日的《人民日報》刊登的「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一文上，卻只說學生打了公安和武警，根本不提學生被打的真相。

這件所謂的「新華門事件」，大大激化了矛盾。特別是政法大學的學生王志勇，19日夜在人民大會堂南側被武警打傷後，校內掛出了他的血衣，引起了學生激烈的情緒。學生到校外大量散發「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的傳單，校園內四處張貼著「實行罷課，抗議警察

毆打學生暴行」的標語。北大的學生也貼出了類似的標語，並有人開始罷課。這股情緒迅速在北京各高校蔓延。

4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李鵬一開始就說：「學生悼念耀邦活動的性質正在起變化。一些學生是被壞人操縱的，他們的矛頭是對準黨和政府的，特別是對準老同志的。但大多數學生還處於中間狀態，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黨中央要旗幟鮮明地指出問題的真相。」趙紫陽不贊成李鵬的看法，他說：「我不相信這麼多學生會被少數人操縱。當前，要通過對話解決問題，還是疏導為好，不要激化矛盾。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

4月21日，李峻告訴我：北大學生王丹^[713]等人正正籌備成立「團結學生會」，會上有人轉達了金觀濤「現在是行動的最好時機，要採取統一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動」的意見，並開始派聯絡員與各高校進行聯絡。各高校的學生紛紛遊行到天安門，一路上喊出的口號是「耀邦不朽」，「打到貪官」，「民主萬歲」，「新聞要講真話」，「暴行可恥」，「反對專制」，「愛國無罪」和「實行罷課」等，沿街的群眾不斷給學生各種鼓勵。

中共中央決定，明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追悼會。從晚上7點開始，各高校的學生一批批地趕往天安門。夜裏10點半，楊曉滿頭大汗地跑來和我說：十幾所大學的上萬名學生，在北師大舉行了「全市高校學生誓師大會」，北師大學生吾爾開希^[714]主持了會議，會上提出了紀念胡耀邦、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控訴「新華門事件」的暴力行為等訴求，並一起趕往天安門廣場匯合。廣場約聚集了10多萬人，但秩序良好。

4月22日上午10點，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楊尚昆主持，趙紫陽致悼辭，鄧小平出席了會議。《悼辭》對胡耀邦的評價與《訃告》大體一致，因為鄧小平不同意，沒有接受家屬要求給胡耀邦「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評價。追悼會結束時，趙紫陽向鄧小平說：「對這次學潮，我向政治局提了三條建議，一是追悼會結束後，對學生遊行要勸阻，讓他們復課；二是對學生以疏導為主，可以開展多層次的對話；三是要避免流血，但對打砸搶行為要依法懲處。」鄧小平說：「好！」趙紫陽把向鄧小平

[713] 王丹（1969-），山東鄆城人。就讀北京大學歷史系，為「八九學運」領袖。

[714] 吾爾開希（1968-），維吾爾族，新疆伊寧人。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為「八九學運」領袖。

提的三條意見，告訴了還在會場的政治局委員，楊尚昆說：「我贊同紫陽的意見。」李鵬也說：「我同意。」

前一天夜裏就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等待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的20多萬學生，一直秩序井然、氣氛肅穆。追悼會結束後，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門前，向政府遞交了請願書，求見李鵬而無人理睬，在場學生一片哭聲，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和不滿。學生撤走前非常失望，喊出了「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這就是著名的「大會堂事件」。

學生對於自己忍著飢渴，坐在天安門廣場20多個小時，卻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出來傾聽一下他們的呼聲十分不滿。他們一路撤回學校，一路高喊「為民請命，萬死不辭」，「反腐敗，反官倒」，「自由萬歲，民主萬歲」的口號，圍觀的群眾則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南開大學的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到北京火車站時，又遭到武警的毒打。這件事在北京各高校傳開以後，學生的情緒進一步被激化。

武警兩次襲擊學生，都是在學生即將撤離，活動高潮已過、學生人數較少的時候發生的。這說明，當時負責學運的陳希同、李錫銘等人，一開始就把學生的活動視為「階級敵人的破壞」，企圖用政治高壓和棍棒恫嚇學生。豈不知，這種在1976年鎮壓「天安門事件」的做法，更加激起了民眾的義憤和學運的擴大。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校的學生紛紛成立「學生自治委員會」，並準備成立北京市高校臨時學聯。

4月23日，趙紫陽出訪朝鮮。在北京火車站，趙紫陽和李鵬說：「對於學潮問題，我還是那三條意見。」喬石說：「這三條意見是疏導學生、平息學潮的穩妥之法。」我當時對趙紫陽這時出訪朝鮮很不理解，十分耽心李鵬會作手腳。

當天下午，人大貼出了《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內容是：完全支持北京高校學生提出的「7條建議」，堅決支持學生及社會各屆人士的愛國民主運動。即日起，博士生全部罷課。「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造成的失誤」（李鵬語）應以集體辭職，來表示「集體負責」（李鵬語）的誠意。強烈要求75歲以上的黨政軍領導全部辭職。反對暴力，保護人權，軍隊不應參加和干預國家事務。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經費不得由國庫負責。解除報禁，新聞自由，允許民辦報刊、電台和電視台。由社會各屆人士成立「廉政委員會」，清查黨政領導層中的腐敗現象，立案審查高幹子女親屬的非法經營活動，並將結果公佈於眾。

李鵬看到這份《宣言》後說：「這是赤裸裸地向黨宣戰！」果不出其然，4月24日晚上，李鵬就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議。會議一開始，李

鵬說：「自胡耀邦去世到今天，首都幾十所高校的學生，已由寫小字報、上街遊行、罷課，發展到公開成立非法學生組織，極少數人操縱並利用了學生，形勢十分嚴峻。」給會議定了基調。蹊蹺的是，一直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卻沒有接到開會的通知，被排除在了會議之外。

8-4 「4·26 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接著，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作了一個早就準備好的長篇講話。他的講話集中起來是兩點：第一點是學生是被少數壞人操縱的，他們的矛頭是對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是對準老同志的，特別是對準小平同志的。他又拿出那張貼在人大的「關係圖」大作文章。還說，北京參加學運的只有一、兩萬人，鬧事的也不過幾百人，人並不多。他的第二點是說，面對這種局面，中央主要領導人卻軟弱無力。壞人已經在攻擊我們的老一輩革命家了，攻擊小平同志了，怎麼能縱容這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明顯把矛頭對準了趙紫陽。

一貫左傾的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說：「這次學潮已經波及 20 幾個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無論從大字報的內容，遊行的口號，以及罷課，成立非法組織，其目的就是煽動鬧事，製造動亂，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當時，胡啟立說：「我建議，我們還是聽聽群眾的意見，再下結論。」王震馬上說：「為什麼不先聽聽我們老同志的意見？！」其他人就不再開口了。李鐵映說：「這是一場典型的動亂。」

從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兩天來，各地的朋友不斷來病房看我，談的情況都不樂觀。4月24日夜，楊曉帶著陳子明來看我。子明也對學生的過份情緒化很耽心，詢問我的看法。我和他說：「青年學生享受了改革開放的好處，卻沒有嘗到過共產黨的苦頭，難免把事情看得簡單化，這次搞不好又會演出一場悲劇！一定要引導他們從實際出發，不可能一步達到目標，提的口號要讓大多數老百姓能接受。」

4月25日上午，李鵬向鄧小平作了關於學潮情況的彙報。根據李鵬提供的材料和觀點，鄧小平說：「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動亂。」當晚，我聽了鄧小平講話的傳達。接著，又聽到了中央台提前播出的《人民日報》「4·26 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我驚呆了，不禁淚流滿面。完了！中國人怎麼就這麼苦啊，難道是一種宿命嗎？

本來，在胡耀邦病逝的第二天，鄧小平派夫人卓琳和鄧樸方去胡家悼念。我認為，這說明他對胡耀邦晚年遭到的不公正對待，是有悔意的。可是，當我看到那張「關係圖」，就感覺鄧小平可能承受不了。在鄧小平掌握著實權的情況下，他一定要在光榮而不是受辱時才會讓步。鄧小平一再強調穩定是有道理的，但他把民眾對民主的訴求一直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就大錯而特錯了。

也許一場比胡耀邦下台更大的暴風雨就要來了。我急忙先後給楊尚昆、萬里、胡啟立、喬石、田紀雲、李鐵映等領導人打電話。我說：「改革開放已經10年，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距今也已經13年，為什麼還用當年『天安門事件』鎮壓群眾時社論的調子？如果沒有10年改革，也不會這樣民心可用、民氣可用地關心國事。要搞民主政治，就必須學會妥協，按人民的意願去推動改革。」

他們有人說：「如果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工人也有要求怎麼辦？」我說：「不管誰的要求，都應該討論。沒有妥協就沒有民主。現在這樣把學生說成『動亂』，說學生背後是『一小撮』，學生一定會被激怒。即使學生被壓去了，損失最大的將會是共產黨和政府。因為這樣作，將會失去一代甚至幾代，對黨和政府尚抱有希望的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他們希望共產黨粉碎『四人幫』後能將功補過，繼續擴大壓迫只會造成對國家的傷害。」

還有人說：「學生的情況很複雜，有壞人在操縱。」我說：「哪一次運動、哪一個組織都會有『壞人』，共產黨也一樣。藉口有『壞人』，打擊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絕對是錯誤的做法，而且會把事情弄得更複雜化。紫陽說對學生要疏導、要對話，問題才能妥善地得到解決，我認為這個方針才是正確的。對當前學生和政府發生的矛盾，不應該去進一步激化，而應該逐步去舒解。過去那種『我壓你服』的階級鬥爭辦法過時了。」

果然，一石激起千層浪。社論廣播後的當晚，北京大約有七、八千學生頂著政治高壓上街遊行。他們呼喊著：「抗議誣蔑」，「反對鎮壓學生運動」，「中央電台，顛倒黑白」，「《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北京日報》，胡說八道」，「堅持罷課，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學生愛國，愛國無罪」，「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求自由，爭民主，不動搖」等等口號，沿途受到了各階層民眾的同情和支持。

不少學生還到《北京日報》社門口焚燒報紙。原來這張報紙是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徐惟誠^[715]主管的，他正是「四人幫」重用的寫作班子「洪

[715] 徐惟誠(1930-)，安徽蕪湖人。時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六四」後升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廣思」^[716]的核心成員，文革中就不斷煽動「極左」，犯下了很大的罪行；1978年以後，他一直對胡耀邦、趙紫陽實行的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因而受到左傾領導人的器重；這時，他不斷用文革式的語言造謠攻擊學生，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不滿。

4月25日夜，北大學生自治會發表了3點聲明：(1)我們學生運動一不反黨，二不反憲法。我們的目的是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學生運動決不是所謂動亂；(2)我們將繼續罷課，讓新聞界作出公正報導，嚴懲打人兇手，要求新聞立法，實現新聞自由；(3)我們反對打、砸、搶，希望同學們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搗亂破壞。

首都高校學生聯合會於夜裏11點發出通知：「4月27日全市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匯合，抗議『4·26社論』。」在「4·26社論」見報的當天，周勇軍^[717]於政法大學主樓前召開了中外記者會，宣佈「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的成立，該會的宗旨是「民主，科學，自由，法制，人權」，活動方式為「和平請願」；還宣佈了決定4月27日舉行大遊行的消息，遊行的統一口號是以下10條：(1)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2)民主萬歲；(3)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4)維護憲法；(5)愛國無罪；(6)新聞要講真話，抗議誣陷；(7)人民萬歲；(8)穩定物價；(9)國家興亡，匹夫有責；(10)人民警察保護人民。到廣場以後的口號是：「要求對話」，遊行歌曲是《團結就是力量》。在政府的壓力下，臨時學聯宣佈取消了大遊行的「決定」。

「4·26社論」像一顆炸彈，在全國各高校炸開了，學生的情緒達到了10天以來的最高點。不僅學生們難於接受，而且教師們也很難理解，「覺得中央定調太高，與在此之前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如果中央領導出來對話，也不會導致激化矛盾」。北大激進的學生說「要鬥爭到底！」北農大則貼出了的大字報「哥兒們、姐兒們、爺兒們：趕快把書扔到火爐裏，去當倒爺吧，去醉生夢死吧，去放縱淫蕩吧！」

雖然各省紛紛向中央表態支持「社論」，但各高校的負責人則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於問題的解決」。比如：清華說，「社論把一些學生推了過去，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學生不能接受」；北大說，「社論採取一概否定和簡單化的做法，不實事求是」；武大說，「社論發表後，問題更深化了」。四川反映，「學生遊行，教授、幹部都很同情，說明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武漢反映「學生運動的根本原因，在於黨風、政風」。

[716]「洪廣思」，文革中中共北京市委大批判組的筆名，徐惟誠為其負責人。

[717]周勇軍（1967-），四川蓬溪人。就讀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為「八九學運」領袖。

8-5 平和理性的「4·27大遊行」

雖然北京各大學收到了臨時學聯取消大遊行的「決定」，但從「4·26社論」播出的4月25日晚上開始，北京各高校的學生經歷了兩個不眠之夜的煎熬、爭辯和思索，最終還是難以接受政府強加給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罪名，一股真誠、委屈與憤懣之情充斥了心胸。4月27日早晨，北京15萬名大學生，不約而同地紛紛走上街頭，參加了這次著名的「4·27大遊行」。僅北大就有300多名學生，在遊行前寫下了遺書。

上午8點多，北大的2,000多名學生走出了南校門，緊跟著紅底黑字的北京大學校旗的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擁護社會主義」的兩條橫幅。早已等候在路邊的民眾，歡聲雷動，報以熱烈的掌聲。隊伍走到中關村時，與清華大學的隊伍會合了。往南遇到了警察組成的人牆，學生與警察交涉了十幾分鐘，沒有結果。幾百個圍觀的民眾喊著「讓開」、「讓開」，插到了警察與學生之間，並高呼「人民警察愛人民」。

到9點多，民眾在前面，學生在後面，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隨著人流的增加，警察組成的人牆被人們攔腰截斷，人流像潮水一樣湧了過去，參加遊行的學生越來越多。到11時，遊行隊伍裏加入了人大、農大、交大、民院、北外等十幾個院校的學生，打的標語又增加了「為了中國的前途，九死不悔」，「沒有自由，毋寧死」，「我以我血薦軒轅」，「媽媽，我們沒有錯」等，許多圍觀的民眾感動的流下了眼淚。

遊行隊伍走過白石橋時，學生的標語和口號主要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民心不可侮」，「失民心者失天下」，「誰掌握青年誰就掌握未來」，「和平請願，絕非動亂」，「官倒不倒，人民不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貪官」，「鎮壓學生運動決沒有好下場」，「新聞的生命在於真實」，「位卑未敢忘憂國」等，學生的這些標語、口號與平和理性的遊行，贏得了民眾的普遍好感。

下午1點多，北大一行人在西直門與北師大一行人匯合，而後沿長安街東進。每個學校都由戴著糾察袖標的學生糾察隊維持秩序，遊行的學生無論是被勸阻的時候，還是行進的時候，秩序都出奇的好，顯得冷靜而講策略。雖然警察、武警和軍人一路攔截，但始終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衝突。特別是天安門一帶，雖早已被警察和軍人封鎖，但有幾百名民眾自發地走在遊行隊伍前面，為學生們開路。

下午4點多，學生通過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時，密密麻麻的軍警滿滿地坐在地上。學生遊行的目的地本來是天安門廣場，當他們衝破層層

阻攔進入廣場後，學生糾察隊卻聰明地指揮遊行隊伍未在廣場停留，而是沿北邊馬路與警察擦身緩緩而過，從而避免了一場嚴重的衝突。晚上7點，最後一支遊行隊伍經過了金水橋。一天的學生遊行順利地結束了，沒有發生任何惡性事件，使各屆民眾的同情更傾向於學生。

誰也沒有想到，北京的學生會組織起這麼大的自發遊行，而且是這麼平和、理性、有秩序。當然，如果沒有「4·26社論」強辭奪理的威嚇，各屆上百萬的民眾也不會給學生那麼多的支持。「4·27大遊行」的實際和「4·26社論」的宣傳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就把政府放在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因為民眾從遊行學生所提出的訴求，看到的是與政府所說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相差了十萬八千里的情況。

4月28日香港《明報》的社評《可喜的「4·27運動」》說：「將來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稱為『4·27運動』，與1919年的『5·4運動』、1935年的『12·9運動』、1976年的『4·5運動』，並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還說：「這四次運動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的本質都是愛國運動」。

4月28日下午，在李鵬主持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李鵬說：「這場動亂是由國內極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勾結國外反華勢力進行長期預謀和準備的結果。」楊尚昆說：「我認為，絕大部分學生的主觀願望是好的，對學生的行為總的是要疏之導之，不能壓。」喬石說：「學生由悼念耀邦同志到最近的一連串行動，有不少是出於一腔熱血，為國擔憂的。」田紀雲說：「這次學潮在群眾中同情、支持者為數不少，這是因為學生所提口號很有吸引力。中央通過這次學潮也該好好反思一下。」

而薄一波、宋平、姚依林、陳希同、李錫銘、李鐵映，則應和李鵬的說法。但楊尚昆所說「我們應該要求各地各部門與學生、教師、工人等開展不同層次、形式多樣的對話。北京可以帶個頭。」還是被會議接受了。會議安排，全國學聯和北京市學聯出面，於4月29日下午，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718]、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719]等人和北京的學生代表進行座談「對話」。

袁木此人是個典型的政治投機分子。他原係新華社記者，文革中受到重用，調到了中央組織部。中央組織部揭批「四人幫」時，部長郭玉峰^[720]因為堅持左傾路線、不平反冤假錯案，被開除黨籍；袁木則作為中央組織部被批判的第二號人物，差一點打成了「三種人」，他痛哭流涕地

[718] 袁木（1928-），江蘇興化人。時任國務院發言人，後任李鵬辦公室主任。

[719] 袁立本（1940-），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秘書長。

[720] 郭玉峰（1919-2000），河北海興人。文革中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檢討了自己的「失足」，後來在李先念的保護下總算過了關。李鵬當上總理以後，能言會道的袁木當上了國務院發言人。

在和學生「對話」之前，李鵬召集袁木、何東昌開了會。李鵬說：「對話一定要態度堅決，旗幟鮮明。」還說：「老袁，請你稍個話給對話的學生，『4·26社論』講的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是針對極少數人的。」下午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都是「指定」的，所以對話實際變成了官方避重就輕的自我辯解。袁木的表演雖然得到了李鵬、李先念等人的稱讚，卻引起了廣大學生的強烈不滿。

「對話」剛一結束，就引起了20多個城市高等院校學生的抗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王丹、吾爾開希召開記者會，認為參加對話的學生沒有代表性，對話不平等，迴避實質問題。各地的學生普遍認為袁木等人，在三個大問題上繼續「愚弄民眾」：一是對胡耀邦下台的真相沒有正面答覆；二是對「4·20報導」新聞不說真話進行迴避；三是對中央領導人是否廉潔含糊其辭。紛紛準備在「5·4」70週年時舉行遊行。

4月30日下午，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與北京市屬高校學生進行了對話。其中，最讓人難忘的是：當學生要求他們回答其家庭收入時，陳希同信誓旦旦地說：「我每月的工資加補貼一共300多元！」天真的學生們哪裏知道，他們面對的這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從當上市長那一天就已經是一個腐敗分子了呢？更不用說，誰又會知道像鄭熱力那種想得到提拔的人，每周都會給書記、市長各送一車菜果肉蛋了。

其間，我二哥陳一諤、二嫂劉秀嫻，三哥陳一詢、三嫂周羨梅，表姐夫郭笙、表姐李仁，妹妹陳一諾、妹夫劉國平，堂弟陳一訓，堂妹陳一詳，表妹王亞葵，外甥女李棟林和吳琰帶著吳笙等親戚都到病房來看望我；一些老同學付成勵^[721]、馬文熙^[722]，老朋友史維國、沈祖俞^[723]、潘維明、羅小朋、王飛欣、高山、張學軍、何家成、沈家模、王玉潔、王春生等也來探視；他們都對當前出現的局勢很耽憂，生怕政府對學生進行鎮壓。

體改所的同事李峻、李湘魯、劉曉峰、白南風、楊冠三、張少傑、齊永貴、趙滄江、刁新申、郭凡生、高梁、曹遠征、崔鶴鳴、姜斯棟、夏曉汛、趙素英、黃永山、楊曉、趙桔等，更是不斷給我介紹外面發生的各種情況。年長一些的人都認為，政府不會允許這種局面持續下去；年輕一些的人則覺得，學生的行動正在推動著中國的進步，對學生「4·27大遊行」

[721] 付成勵（1944-），北京人。筆者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學，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

[722] 馬文熙（1944-），江蘇南京人。筆者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學，後從事教育工作。

[723] 沈祖俞（1931-），浙江寧波人。時任浙江省省長。

表現出的冷靜、理性大加讚賞。他們還給我介紹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引起的震盪。

8-6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引起的震盪

「4·26社論」發表的當天，江澤民在上海召開了萬人黨政幹部大會宣佈：「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市委決定：停止欽本立同志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職務；並向《世界經濟導報》派駐整頓領導小組，由劉吉任組長，孫恆志、張家俊為成員，馬達任顧問。」整頓小組進駐《導報》後，遭到了報社工作人員的抵制。時任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孫恆志難於下手，很快就辭職了。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於1980年6月創辦，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與上海市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合辦，時任上海市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欽本立當總編輯。《導報》創辦期間，得到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錢俊瑞^[724]的支持，並聘請著名經濟學家陳翰笙、薛暮橋、宦鄉^[725]、許滌新、馬洪、于光遠等人當顧問。《導報》甫經問世，就提出了「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瞭解世界」的著名口號，形成了不小的影響。

《導報》創辦伊始，即以其思想解放與大膽探索獨樹一幟，發表了一系列有見解的文章，不僅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作出了貢獻，而且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呼籲。所以，《導報》自然成為了80年代深受中國知識界、思想界最受歡迎的媒體。可以說，《導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故而在其深受改革力量歡迎的同時，也就成為保守力量痛恨的對象，必欲除之而後快。

1985年底，《導報》發表了南京大學青年學者馬丁《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一文。1986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秦柳方，以《經濟研究的一些情況》報告到胡喬木那裏，列舉了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許多罪狀，點名批判《世界經濟導報》，要求解散體改所，鬧了一場所謂「馬丁事件」的風波。《導報》因而被指責為「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

1987年初，胡耀邦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落馬。《導報》雖深受讀者歡迎，卻處處受到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等人的刁難。當年4月，

[724] 錢俊瑞（1908-1985），江蘇無錫人。曾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725] 宦鄉（1910-1989），貴州遵義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總幹事。

我在上海到淮海中路《導報》辦公室拜訪欽本立時，在座的還有朱杏清、何凌、陳樂波等開明的年輕人。經歷了文革的磨難以後，大家都有一種絕不能再讓這類浩劫重現的願望。所以，欽本立老人對胡耀邦的被迫「辭職」大不以為然，認為「又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

1988年底，《導報》刊登了蘇紹智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週年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摘要。這篇發言講到：為什麼在「真理標準討論」和改革開放理論探討中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會受到不公正對待？為什麼目前理論界仍被狹隘的宗派把持、處處設禁？為什麼改革10年仍沒有學術自由？等等。該文發表後，有關報紙立即接到中宣部通知：不准轉載《導報》刊登的蘇紹智文章。總編輯欽本立的去留也成了人們關心的問題。

1989年4月10日，《導報》又公然發表了與李鵬「治理整頓」唱反調的文章：千家駒^[726]寫的《走回頭路不是沒有可能的——讀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上海市委還沒來得及處理這件事。胡耀邦的病逝就引起了學潮。4月19日，《導報》決定刊登由《新觀察》和他們一起召開的紀念胡耀邦座談會的發言記錄。政治嗅覺敏銳的江澤民立即警覺到可能發生問題，馬上派出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宣傳部長陳至立^[727]找欽本立談話。

曾慶紅建議將嚴家其、戴晴等人發言中直接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要求為胡耀邦平反的內容刪節500字，如：說鄧小平「忘了人民，脫離人民」；說「黨中央不承認錯誤，重蹈覆轍就在眼前」；說「黨的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都是非程序更迭」等等。欽本立則堅持不願改動，他說：「出了事情我負責。」江澤民又請汪道涵一起說服欽本立。顯然，江澤民是從政治需要出發的，而欽本立則是從政治道義考慮的。

《導報》北京辦事處約見和電告一些海外駐京記者，希望得到海外輿論的支持。4月23日上午，海外一些報紙刊出了《導報》被「查封」的消息。當晚，欽本立在家裏召開編委會說：「我本來就認為沒有什麼錯，這些市委要求刪去的內容正是我們的報紙要說的。我就是要鄧小平在胡耀邦辭職問題上作出檢討。鄧小平早檢討，早主動，早得人心。他要檢討，我們就擁護他。」得到了編委會的贊同。

江澤民意識到整頓《導報》後，上海的學生運動和新聞界肯定會有強烈的反應。因此在4月27日召開了全市大專院校負責人會議，提出了穩定上海的要求。但在《導報》上海辦公室和北京辦事處，電話晝夜不停地傳來了全國各地的問候。僅北京一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

[726] 千家駒 (1909-2002)，浙江武義人。曾任民盟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常委。

[727] 陳至立 (1942-)，福建仙遊人。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

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中國婦女報、文藝報等都有編輯記者表達了對《導報》的慰問和支援。

一場席捲上海以致全國新聞界的抗議上海市委整頓《導報》的風暴來臨了，電報像雪片一樣飛到了欽本立的身邊：「正義為本民主為道本立則道生欽老闆安康」；「人民不希望中國只有一個聲音民主遲早會代替專制真理最終將戰勝強權」；「赤子心華夏魂憂國憂民憂黨四十餘載報涯坦蕩無瑕」；「您是我們心中的普羅米修斯真理是無法封鎖的」；「縱觀今日大陸眾多報刊，敢為天下先，並能不囿於一黨或階層之利益，而為民族利益和未來吶喊者，唯《導報》而已。」等等。《中國日報》74名編輯、記者在簽名信中說：「威武不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乃10年改革先鋒」。香港《文彙報》社長李子誦^[728]、總編輯金堯如^[729]則表達了香港新聞界的「不勝駭異」。

4月28日，嚴家其起草了《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捍衛新聞自由》，這封由58名著名人士簽署的公開信說，我們認為：一、中共上海市委無權撤銷一家報紙（非上海市委機關報）的總編輯職務，這種做法是違反中國共產黨關於「黨政分開」原則的，也是對憲法和法律的漠視；二、中共上海市委某負責人說《導報》439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談會內容」，「將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這是對座談會參加者的嚴重「誹謗」；三、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導報》提出版面處理意見和其他干涉《導報》編輯工作的行為，違反憲法第35條，侵犯了新聞自由，是一種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法行為。

公開信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應收回停止欽本立《導報》總編輯這一越權和錯誤的決定，應對誹謗4月19日座談會參加者進行公開的賠禮道歉，保障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保障新聞自由。」公開信的簽名者無疑是受到了「4.27大遊行」成功的鼓舞，希望趁勢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同時，《導報》的真正上司——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也致信江澤民，指出欽本立「是受本會及上海社會科學院委託，主持世界經濟導報工作的，停止他的職務應由本學會及上海社科院負責人協商後解決。」該信還指出上海市委的決定「違背了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有關精神，不符合幹部任

[728] 李子誦（1912-），廣東順德人。時任香港《文彙報》社長。

[729] 金堯如（1923-2004），浙江紹興人。時任香港《文彙報》總編輯，「六四」發生在報紙頭版開天窗「痛心疾首」，後退出中共。

免的法定程序。」並宣佈上海市委的決定「無效」。可以說，《導報》事件激起了中國新聞界尋求自我解放的浪潮。

8-7 衣錫群告訴我：體改所已被誣為操縱運動的「黑手」

4月28日夜裏10點，北京市西城區區長衣錫群^[730]悄悄來到我的病房。老衣是一個充滿詩人理想、又能腳踏實地做事的難得人才。他告訴我，北京市委召開了局級幹部會議，李錫銘和陳希同在會上除了大講「這次學潮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外，突然點名說「政研室」、「體改所」和「發展所」是「操縱學生運動的三隻黑手」。我說：「我4月2日就住進了301，怎麼會操縱學生運動？笑話！」

衣錫群說：「無風不起浪。你還是要小心一點兒。」他走後，我左思右想，終於想明白了：鮑彤主持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他思想解放、敢說敢幹，但他又是一個很遵守紀律的人，決不會去操縱學生運動；陳錫文主持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他一直一心一意研究農村問題，而且是個循規蹈矩的人，更不可能去操縱學生運動；我已經在301醫院住了近1個月，怎麼會去操縱學生運動呢？！

應該說，政研室、體改所和發展所，那一家都不可能操縱學生運動。李錫銘、陳希同這麼說，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籌劃的陰謀，他們果然要下手清算改革了！！在中國的歷史上，保守力量清算改革力量總是會加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三隻黑手」就是一個信號。為什麼會專門提這三家呢？一家搞政治體制改革，一家搞經濟體制改革，一家搞農村改革，而且都直屬在黨中央和國務院。

我回想起1978年到1989年，10年來的風風雨雨，真是讓人感慨萬千。若不是「四人幫」造成的百廢待興的局面，若不是我在農村近10年的調查研究，若不是胡耀邦、鄧力群的幫助，我何能創建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為農村改革盡自己的心力？但1984年以後，農村改革陷入了停頓的狀態，不能實行「耕者有其田」，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依然使農民處於二等公民的地位。究其原因，仍在於共產黨過時的意識形態與不合理體制的障礙。

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萬里在第一線衝破層層阻力推進改革；但陳雲、李先念、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等人不斷製造事端。所以，中國的上層決策，總是在問題突出時實行「務實主義導

[730] 衣錫群（1947-），時任北京市西城區區長。

向決策」，剛過了兩天好日子就又實行「意識形態導向決策」了。衝鋒在改革第一線的闖將，總會成為「意識形態導向決策」的犧牲品，因為他們離經叛道了；實行「務實主義導向決策」時，反改革的人則會在舊體制下存活。

這也是舊體制的慣性帶給改革者的悲劇。其實，第一步農村改革的成功，為經濟改革提供了難得的條件，趙紫陽又聰明地將「商品經濟不可逾越」寫入了黨的決議，才会有以後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我雖受命組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但在實踐中方深深體會到中國改革的複雜性與長期性，許多問題的發生非人力可在短期內解決的，體制環境的約束使任何人都不可超越歷史，人類社會的發展畢竟是各種合力的結果。

「老人政治」大大阻礙了中國的正常發展，這一批領導農民革命的領袖只懂得「馬上打天下」，即使像鄧小平這樣在老一輩中的開明者，也擺脫不了革命意識、革命手段的局限，對如何建設一個現代社會也是「瞎子摸象」。多虧了胡耀邦、趙紫陽這一批經歷了文革而覺醒的領導人，才使得中國的改革能推進到一定的深度，出現了中共執政以來的最開明時期。胡耀邦的黯然下台，標誌著中國的改革出現了重大挫折。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分道揚鑣，實際上是帶領中國走向何方的兩種路線的分野。鄧小平的歷史局限性明顯地表現在他對建設一個現代社會的無知，而他個人的專斷性格則是造成胡耀邦扮演悲劇的重要原因。198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嚴重地打擊了改革力量，雖然趙紫陽和鮑彤煞費苦心設計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中共十三大似乎開得很成功，但中共的保守力量實際上已經控制了中國的各個要害部門。

從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到，老謀深算的陳雲通過姚依林，中央人事小組在討論十三大常委時，先把萬里排除在外，接著又把田紀雲擠了出去，這樣就使得中央的最高權力不會被改革力量所左右。而中央最重要的幾個部門，像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公安部等也都被反對改革的人所把持。故而中共十三大之後的1988年，趙紫陽恐怕早就感覺到，胡耀邦下台以後，自己也已經是舉步維艱了。

鄧小平急於求成的「價格闖關」，使趙紫陽更處於雪上加霜的境地，「治理整頓」則給了李鵬、姚依林全面復舊的機會。兩種體制並存的天平，就此向舊體制復歸傾斜。改革不能深入，民眾的不滿在聚集。為改革作出重大貢獻的胡耀邦不幸病逝，人們對他晚年遭遇的不公平深表同情，「八九民運」的爆發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鄧小平難道真聽不見民眾的呼聲嗎？「鋼鐵公司」、「高高在上」的性格和陳腐的觀念又一次左右了他。

從「4·26社論」的發表，可以看出鄧小平一定會實行鐵腕，而最終的受益者肯定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特別是以李鵬為代表的頑固派。雖然「4·27大遊行」和「《導報》事件」，顯示了民間的可貴傾向和力量，但面對著掌握了全部國家機器的專制國家，組織化程度很低而獨立公民社會沒有形成的民眾往往會是軟弱無力的，學生的激情和知識分子的理想也很難對抗殘酷的現實。

捫心自問：10年來，我無愧於心。從回到北京起，我就廢寢忘食地為推動改革而努力，一直把個人的得失毀譽置之度外。但這一次恐怕是在劫難逃了，在李鵬們的眼中，我創建發展組是在「破壞人民公社集體經濟」，1987年就說要「把陳一諮那夥人幹掉」；我組建體改所是在「破壞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被誣為「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窩子」；我參與政改辦是在「削弱和破壞黨的領導」。更不用說，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也都成了我「勾結敵人」的罪證。

可能是冥冥之中上蒼眷顧，給我作了很好的安排：醫生說，我右膝打的石膏，最少也還得兩個月才能拆掉，那麼我就可以在病房裏躲過這次危機。恰巧，當天上午高尚全、趙淪江來看我，說美國駐華大使洛德^[731]邀請我作為「國際訪問者」，從5月5日到6月5日訪問美國1個月。也許性格決定命運之說是有道理的，想起先賢「時窮節乃見」的教誨，個人生死事小，國家命運事大，我怎能躲避呢？看看錶，已是4月29日凌晨4點，我決定既不住在醫院，也不去美國，天亮後出院盡力作些緩解目前矛盾局面的工作。

早飯後，我和護士長說要出院，她驚訝地說：「那你會留下終身殘疾。」我堅持請她轉告病房醫生。9點，醫生來了，勸我耐心養病。我向他反覆說明了情況，請他理解我的焦急心情，並表示我出院後，一定會在政府與學生之間積極做工作。醫生被我說服了，給我拆了腿上的石膏，又給我作了按摩和電療，還讓技工做了兩隻輕便的鋁合金拐。臨走，醫生說：「我們都為學生耽心啊，要勸他們冷靜。你的病加重了，立即就回來。」

中午，我回到家。下午3點，來了一屋子人。我請其他人都走了，只留下了維凌。維凌也是心急如焚，說：「政府過份強硬的態度，造成了學生更大的反感，矛盾不是緩和而是加劇了，早晚會鬧出大事來。」我們商議：要從兩頭做工作，一方面通過鄧樸方做鄧小平的工作，給學生轉圜的餘地；一方面做學生的工作，說明過份激烈只會適得其反。

[731] 洛德（1937-），時任美國駐華大使。

吳琰帶丫丫來看我，閒談之間，吳琰突然冒出一句：「你要進監獄，我天天給你送飯啊。」丫丫好奇地問：「爸，誰要抓你啊？」我笑著說：「沒有的事。」

8-8 我帶李峻、白南風與鄧樸方長談了5個小時

4月30日，趙紫陽從朝鮮途經瀋陽時，就聽遼寧省委反映，「4·26社論」與鄧小平講話引起了很大的不滿。回到北京後，趙紫陽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更感到「4·26社論」很不得人心，而學潮則得到了社會各屆廣泛的同情。如果學潮能以對話、疏導的方式解決，就可能推動中國的改革；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就會造成中國改革的倒退。怎麼才能扭轉局面成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5月1日中午，楊曉告訴我，王丹在北大圖書館前主持召開了「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自治委員會」中外記者招待會，有60多個記者參加，3,000多學生旁聽。會上宣讀了幾份聲明，有關於要求對話的，有批評「4·26社論」的，有給香港同胞書，還有國內學者、作家的公開信，留學生的支持信等等，並決定「5·4遊行」以紀念「***」5·4運動70週年。他還說，上海的學生計劃5月2日舉行遊行。

5月1日下午，趙二軍找我談楊浦開發的事。我笑著說：「大家都傳你是個官倒啊？」他說：「老陳，你要相信，我絕對清白！」當天下午，我在中南海見到了趙紫陽，我向他簡介了社會動態，並說「如果按『4·26社論』的方針辦，中國改革的進程最少會拖長20年。」趙紫陽說：「不拖長20年，也會有10年，說不定還會走上歪路。」

5月3日上午，趙紫陽的秘書李勇到家裏找我。我帶他到所裏，與李峻、刁新申、白南風、楊冠三、趙淪江進行了座談。何維凌、孟繁華都建議我去找鄧樸方談一談。中午，我給樸方打了一個電話，說我想帶兩個人和他談談學潮的問題，他讓我下午兩點到他家。

下午，我帶著李峻和白南風準時到了樸方家。先由白南風介紹了他們社會研究部對學潮調查的情況，從胡耀邦病逝到民眾的悼念，從「新華門事件」到「大會堂事件」，從「4·26社論」到「4·27大遊行」，談了近兩個小時。李峻則用近一個小時，向他介紹了社會各屆的動向。樸方聽得很認真，還不時點頭，有時還會提一、兩個問題，看來他聽得進去。

接著，我進一步根據所裏的研究向他分析了學潮的起因：一、人們對改革進程的不滿；二、人們對社會狀況的不滿；三、人們對「工作失誤」

的不滿。學潮中雖然有偏激的說法，但主調是「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之所以「4·27大遊行」那麼多人參加，又有那麼多民眾同情，就是因為大家都不能接受「4·26社論」的說法。大學生中流傳著一個笑話，說江青看了社論，一口咬定是姚文元起草的。

樸方說：「是嗎？」我說：「是！因為這個社論的調門與1976年鎮壓『天安門事件』的社論如出一轍。學生們認為自己是大人了，動不動就說『壞人』操縱，他們很難接受。不僅李鵬、李錫銘的彙報不符合實際，而且李鵬把你父親的講話傳的範圍很大，一下把你父親推到了前台，更使學生對你父親有了埋怨。『4·26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樸方說：「那你說現在該怎麼辦？」我說：「現在緩解矛盾的最好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個話。」

樸方說：「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我說：「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怕又盼，怕是怕在他們中抓『壞人』，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在接見外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這是應該肯定的。但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年輕人嘛，說點過激的話，做點過激的事，沒有甚麼，不要去追究。這麼說，有肯定，有批評，矛盾就緩解了。」樸方很高興地說：「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看。」

已經快晚上7點了，我最後說：「樸方，現在大家都很著急。緩解矛盾是上策；下策就是對抗流血，要盡量避免；如果上策做不到，那麼維持秩序，不發生對抗，不發生流血，這是中策。」樸方說：「謝謝你們給我介紹了這麼多情況。」這次談話歷時五個小時，我們二人走出門後，總算鬆了口氣。

當天晚上，李峻把我們和鄧樸方的談話，向體改委的領導做了彙報。後來聽說，楊尚昆轉告趙紫陽，王瑞林^[732]和鄧的孩子都說，現在可以不再提「4·26社論」，以便慢慢淡化。而且，希望趙紫陽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加上鄧小平關心青年的內容。

5月3日，趙紫陽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大會上講話，他說：近10年來的成績，有賴於社會的穩定。如果發生動亂，就會鬧得國無寧日。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民主走上法制化。這個講話普遍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會前，李鵬、姚依林堅持要在報告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

[732] 王瑞林(1930-)，山東招遠人。時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自由化」，趙紫陽說：「現在加上這樣的話，只會激化矛盾，擴大對立。」楊尚昆表示同意趙紫陽的意見。

5月4日，趙紫陽在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進一步表明了以溫和方式對待學潮的態度，他認為：學生對黨和政府是既滿意又不滿意，他們希望我們改掉弊端，但「中國不會發生大的動亂。」他還說：「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講話一結束，楊尚昆就走過來，一邊拍著趙紫陽的肩膀，一邊緊緊地和趙紫陽握手，並說：「講得好極了，我完全同意。」喬石也和趙紫陽握著手，說了相同的話。這個講話受到全國各地的一片稱讚。

這一天上午，北京51所大專院校的約10萬多學生，從早晨8點多往天安門廣場集中。下午3點，他們宣讀的「五四宣言」說：「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緊緊地繫著我們的每一顆心。這次學運的目的只有一個，即高舉民主、科學大旗，把人民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促進自由、人權，促進法制建設。」還宣佈：從5月5日起北京各高校復課，並繼續要求與政府對話。

趙紫陽在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講話以後與李鵬說：「我認為『4·26社論』定性偏高。為了緩和矛盾，由我承擔責任，這篇社論算我簽署的。重新再寫一篇社論。」李鵬表示堅決反對。此前，4月30日，趙紫陽從朝鮮回到北京在火車站問李鵬：「情況怎麼樣？」李鵬說：「群眾意見很大。說你的兒子是最大的官倒。」趙紫陽給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要求審查自己的兒子，並在這次會上提出希望把這封信發到省軍級。李鵬卻說：「你這樣做，不是向老同志示威嗎？」硬給阻止了。趙紫陽還對李鵬說：「我希望你能聽一聽學校裏同志們的意見，我們的認識和他們有很大的差距。」

5月6日，李鵬召開了北京六所高校黨委書記、校長會議。但他並不是要聽取大家的意見，而是會議一開始就對與會者說：「『4·26社論』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意見起草的，代表中央的精神。趙紫陽的講話只代表他個人。」接著，他又講了「三不變」，即：對著次事件定性「動亂」的這個判斷不變，學生受「壞人」操縱這個判斷不變，學生搞的組織屬於「非法」這個判斷不變。李鵬說完後，誰還敢發表不同意見？

會議結束，與會者都很沉重。北大黨委書記王學珍^[733]把李鵬的說法在黨內傳達以後，很快這個「三不變」的講話就傳到了學生中。剛復課的學生又一次被激怒了，據北大、人大的學生說，他們感到自己的愛國熱情被政府誤解了，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明明是愛國的行為，卻被當成了

[733] 王學珍（1926-），浙江龍遊人。時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

「壞人」，每個人都面臨著後顧之憂。特別是那些說了過頭話、做了過頭事的學生，覺得自己沒有出路了。

趙紫陽緩和局勢的努力又一次被李鵬破壞了。一場更嚴重的學生與政府對抗的行動，正在北京各高校醞釀之中。

8-9 李先念蠱惑鄧小平實行鎮壓

就在趙紫陽的「亞銀講話」受到各方面好評的同時，一貫反對改革的黨內元老李先念跑到鄧小平那裏進行蠱惑。李先念向鄧小平說：「我早就跟你說過，趙紫陽不是搞社會主義的，應該讓他下台。怎麼樣？另一個聲音出來了，趙紫陽公開唱對台戲了，這是第二個司令部啊！再不下決心制止我們就都完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就翻天了，成千上萬烈士的鮮血就白流了！」王震也大吵大鬧地說：「我們再讓步，就把中國送給他們了！」

鄧小平沒有說甚麼。李先念又進一步說：「我就不信了，抓他個幾十萬人，天就會塌下來？不下決心鎮壓，國家真就要改變顏色了。」鄧小平臉色鐵青地抽著煙，李先念語帶威脅地說：「小平同志，毛主席寄望於你，我們也都寄望於你。生死關頭，你的鐵腕到哪去了？早下決心早解決問題，再拖下去可真就難辦了。外電都說，趙紫陽這個講話是在爭取人心，矛頭是對著你的呀，他想搞政變啊。」鄧小平臉色凝重地似乎下了決心。

李先念這個人骨子裏很左，又十分投機。自1954年起就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毛澤東不信任陳雲以後，一系列左的經濟政策大多出於他的手筆。像什麼「以糧為綱」、「農業學大寨」，什麼「以鋼為綱」、「工業學大慶」，直到華國鋒時期的「洋躍進」等，都是由他主持制定的。所以，「四人幫」搞得「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李先念是難逃其責的。從實行改革開放以後，李先念幾乎對所有的做法都持反對的態度。

農村改革實行包產到戶，他帶頭反對；沿海建立經濟特區，他帶頭反對；實行商品經濟，他帶頭反對；引進外資和外企，他還是帶頭反對，等等。所以，他對胡耀邦和趙紫陽可以說是恨之入骨。當年，他和陳雲慫恿搞掉胡耀邦，使鄧小平自斷左臂；甚至胡耀邦病逝後，通知他回北京參加追悼會，他都以要去葛洲壩為名予以拒絕，直至知道鄧小平要與會，才很不情願地參加了。

李先念不僅經濟上左傾，而且政治上也左的出奇。他主政湖北時，動不動就製造「階級鬥爭」，整人無數、殺人如麻；大躍進餓死人，發生了「信陽事件」，明明是極左路線造成的問題，他一句話「階級敵人專政」，

就一下整了 20 多萬基層幹部；駐馬店大水後，本應檢討治水方針，又是他大筆一揮卻把當地的書記打成了替罪羊。更惡劣的是，1975 年，他在毛澤東那裏揭發了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進行政治投機。

那是「1975 年的國慶節，李先念聽了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他根據毛對文化大革命的一貫看法，覺得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接待外賓後，在毛澤東的書房裏，他對毛說：『最近，有一些講話，我覺得有問題，味道不對，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對鄧小平講話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視。一個毛遠新，一個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謀而合，共同對鄧小平提出了質疑，焦點問題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734】

可惜鄧小平一直並不知道，李先念向毛澤東揭發他的這件事。否則，鄧小平怎麼會聽信李先念的挑撥離間，先後斷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呢？中國的專制政治歷來充滿了陰謀詭計，李先念與陳雲聯手「廢胡、倒趙」的算計終於要實現了。那麼，他們究竟代表了誰的利益呢？可以肯定的說，他們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內最保守、最腐敗，而且最享受特權、最脫離民眾的既得利益者。

如果說，陳雲反對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主要是出於政治理念，思想一直停留在 50 年代的話；那麼，李先念反對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則不僅是出於自己一貫左傾的經濟、政治理念，而且包含了卑劣的個人爭名奪利行為，他痛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一個重大原因，就是認為他們推行的各項改革開放政策，都是在否定自己過去的成績。而陳雲、李先念這兩個元老，長期只當「甩手掌櫃」，又享受各種特權，早已不知人間疾苦為何物了。

1988 年秋，陳雲全家到珍稀的含氫蘇打溫泉——「嶺南第一泉」廣東從化溫泉療養，住在有各種特殊供應的小樓裏 1 個月。走的時候，陳雲的工作人員去結賬，管理處說：「省委已經報銷了。」陳雲聽說後，嚴肅地說：「一定要自己付賬。」工作人員又去結賬。管理處只好按每人每天收 1 元人民幣了結。陳雲連說：「都說物價飛漲，我看還可以嘛！」他哪裏知道，若是一般人的話，每人每天收 50 元人民幣也不夠啊。

更不用說，這兩位元老平日的居住、食品、醫療、保衛，以及冬夏的療養、春秋的旅遊，每年的費用都多於 300 個以上中級幹部的收入。可以說，他們早已不食人間煙火。1981 年，李先念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一句

【734】據著者徐景賢說：「李先念的家人希望用重金買下這一段真實的記錄，不要出版」，被著者拒絕。見徐景賢著：《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版，第 376-377 頁。

「動員農民吃豬嘛！」引起了會場上的哄笑，鬧了個很大的笑話。這絕不是偶然的失語，而是長期脫離民眾、高高在上的結果。每年他們都要到江浙去療養，特別是到杭州這個「天堂」花天酒地幾個月，民脂民膏何償痛惜？

如果說，陳雲還比較節制，無非是聽聽評彈、越劇；李先念就不同了，聲色犬馬無所不用其極。王芳之所以會從一個省公安廳長提為省委書記、又提為公安部長，就是鞍前馬後伺候兩位老人家的回報。陳雲、李先念在自己周圍聚集起了一個強大的反改革集團，控制了各個要害部門，一次次地清除掉搞改革的人馬，已經使鄧小平處於相對孤立的狀態。而學生和民眾「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的訴求，他們豈能聽之任之。

李鵬從小就在特權的蔭庇下長大，他沒有學到周恩來的親民，卻學到了如何搞陰謀的狠辣。他讀書一直很差，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同學輕視的對象，即使在莫斯科讀書時受到同學的嘲笑，他也從不諱言「我將來要當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但他的水平實在太差了，負責一個小小的豐滿水電站都搞不好。幸運的是「朝裏有人好作官」，提拔接班人時，為照顧鄧穎超，李鵬調回北京，被安排到水電部當了個副司長。

接著，李鵬可謂一路青雲官運亨通。李鵬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響，把「計劃經濟十階級鬥爭」當成了社會主義的圭臬，從小養成的特權思想又不把民眾放在眼裏。改革開放以來，李鵬沒有做過任何有益改革的事情，但卻很會拉幫結派的一套，在每次反改革的浪潮中都是身先士卒。李鵬自然成為陳雲、李先念看重的人物，直到他當上了總理，又在姚依林的不斷指點下利用舊體制與趙紫陽相抗衡。

李鵬一夥對享受特權認為是應該的，是他們前輩打天下換來的。他剛當上代總理，就用二百萬人民幣修了個游泳池，專供自己使用。他兒子李小勇在長城飯店強姦了女服務員，女服務員向飯店經理哭訴，反而又被保鏢揍了一頓，李小勇則揚長而去。他們奉行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民眾看在眼裏氣在心裏，時間一長怎堪忍受？學潮一起，百姓們自然歡呼雀躍地給予支持。

趁趙紫陽出訪朝鮮之機，李鵬抓住了鄧小平「中國不能亂」的心理，謊報軍情騙得了鄧小平的口諭：「這是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這可是維護既得利益特權，阻擊改革深化，將趙紫陽拉下馬的難逢之機。幾乎反對改革開放的各種人物，都空前地活躍了起來。由於鄧小平的專斷和缺少民主理念，中國的改革面臨著嚴峻的局面，搞不好從事改革的人馬與學生運動，一齊都會遭到無情的整肅。

8-10 趙紫陽、胡啟立、萬里扭轉局面的努力

5月4日，趙紫陽在「亞銀講話」結束後，與李鵬作了一次私下交談。趙紫陽說：「我聽各方面對『4·26社論』的反映很大，也已經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我們能不能解開這個結，緩解矛盾？」李鵬說：「改變社論的定性不可能。」趙紫陽說：「這次學潮，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與黨和政府的主張是基本一致的，二是參加遊行和支持學生的人非常多。要平息事態，應該著眼大多數。」

趙紫陽說：「『4·26社論』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學生認為，社論給他們戴了個帽子，情緒激烈了起來。我主張鬆一鬆口，對社論做些改變。」李鵬說：「小平、陳雲、先念等老同志都認定，這次學潮有極少數人在背後操縱。目的是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所以社論的定性不能改變。」趙紫陽說：「把絕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嚴格區別開來，才能避免激化矛盾。」李鵬說：「我不同意。」

5月4日的遊行隊伍中，出現了「首都新聞工作者」的橫幅，有200多名記者、編輯參加了遊行，他們的出現大大緩解了學生對新聞界的不滿。新聞界打出的標語有：「新聞自由，新聞民主」，「新聞公開有利於安定團結」，「新聞要說真話，我們想說真話」，「重大新聞應該讓人民知道」，「強烈抗議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等等，他們同時也提出了與中央領導人對話的要求。為了盡快平息事態，

5月5日，體改所往各高校派了聯絡員，勸學生們要適可而止，千萬不要激化矛盾釀成流血，否則局面會難以收拾。

5月6日上午，趙紫陽同胡啟立、芮杏文^[735]就新聞工作進行了討論。胡啟立說：「學生強烈地要求新聞界對他們的活動進行如實報導。一開始是對4·19、4·20晚學生在新華門靜坐示威的報導不滿，認為太片面；接著對『4·26社論』不滿，認為對學生的定性完全是錯的；上海整頓《世界經濟導報》又被傳得紛紛揚揚。學生提出『新聞要講真話』的呼籲，在新聞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趙紫陽說：「我看，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

芮杏文說：「新聞要講真話，老百姓才會相信。現在，我們的記者就不相信自己，還打出標語『不要逼我造謠』。看來，我們的新聞體制的確需要盡快改革。」趙紫陽說：「聽了不少反映，看了不少報告，我覺得新聞改革既是大勢所趨，也是人心所向。新聞一定要講真話，千萬不能製造假

【735】芮杏文（1927-2005），江蘇漣水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新聞，不能隱瞞事實。新聞要做到：客觀、全面、真實、及時，這也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部分。」

胡啟立說：「新聞界正簽名要求與我們對話。」趙紫陽說：「我們應該歡迎各種形式和層次的對話。與新聞記者對話，傾聽他們的呼聲，瞭解我們的想法，有助我們的新聞改革。今後，在處理一些敏感的新聞事件時，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千萬不能匆忙、草率地簡單下結論。《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搞得我們很被動，原因就在這裏，要引以為鑒。」當天下午，胡啟立、芮杏文向北京新聞界主要負責人作了傳達。就這樣，出現了十幾天新聞報導的活躍期，廣大民眾也才可能從廣播、電視、報紙上瞭解到一些真實的情況。

5月6日下午，趙紫陽拜訪了楊尚昆。趙紫陽說：「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了各種意見。總覺得，這次學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擁護黨和支持改革的。所以，我在亞銀講話說『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楊尚昆說：「你在亞銀的講話反映很好，黨內反映好，社會的反映也好。這次學潮的確跟以往不同，支持學生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幹部。所以，對這次學潮，應該疏導，不能鎮壓。」

趙紫陽說：「我今天就是想談這個問題，『4·26社論』稱這次學潮是『動亂』，把矛盾激化了。社論發表後，我聽說北京市的幹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我覺得，能不能爭取小平同志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戰友，向他反映的話，效果一定更好。」楊尚昆說：「我去同小平同志講。他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能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我試試吧。」

同時，北京幾十所高校組織的「對話團」提出了和政府對話的要求。他們說：「最近，北京及全國各地高校學生通過遊行、請願等方式，反覆表達了同黨和政府要求對話的要求。黨和政府領導人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表達願意同學生對話，共同商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希望「就當前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

5月8日上午，趙紫陽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李錫銘說：「這次學潮確實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趙紫陽說：「這次學潮發生的社會背景十分複雜。一、由於近年社會中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現象，使不少人對我們的社會制度產生了懷疑。二、我們工作中的失誤，使民眾對我們的方針政策的信任程度降低。三、通貨膨脹直接影響了民眾的生活水平，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所以這次學潮在民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趙紫陽說：「群眾現在最大的意見是腐敗和官倒，希望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我提出六點意見，如果這些意見公佈出去，群眾看到了中央和國務院解決問題的誠意，對平息這次學潮、緩和矛盾是會有好處的。這6點意見是：

一、盡快公佈審查四大公司的結果（「四大公司」指，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康華公司、光大公司和中國農業投資公司，為國務院直屬的四個部級公司）；

二、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特殊供應，但七十五歲以上的老同志仍然保留，公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經歷和財產；

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專門受理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及其子女違法亂紀的案件；

四、盡快制定新聞法，擴大新聞自由；

五、司法獨立審判，不能再搞黨委聯合辦案，運動中會有個別壞人，但不能再搞過去那種從重從快處理，以免誤傷好人；

六、總之，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進行。

如果大家同意，我建議：由新華社發個通稿，明天在《人民日報》上刊出。」當時萬里就說：「我完全同意紫陽同志的意見。」李鵬則說：「這只是你個人的意見，政治局沒有討論，不能代表政治局的意見。」

5月9日，萬里把趙紫陽的這些意見，向人大常委會的黨內副委員長作了介紹。這些副委員長一致表示贊成，並且決定：如果中央、國務院不發表這些意見，我們用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李鵬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給萬里打電話說：「政治局沒有討論這些意見，中央不同意發。」

5月10日，萬里又開會轉達了李鵬的意見。這些副委員長非常惱火，他們說：「究竟是我們監督你政府，還是你政府領導我們人大？！」大家討論以後，以人大常委會的名義寫好了一個稿子，請《人民日報》發表。但李鵬讓袁木要來了這個稿子，他看了以後，覺得全文發表不行，完全不發又說不過去，於是讓袁木把這個稿子刪節、壓縮、修飾以後交給了《人民日報》。後來，大家在5月12日的報上，看到了見報的稿子。李鵬這麼有持無恐地，阻撓有利於疏解民怨、有利於緩和矛盾的措施，若背後沒有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他是不敢這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8-11 學生「5·13」絕食與戈爾巴喬夫訪華

趙紫陽緩和矛盾的努力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關心中國改革進程的人們都是心焦如焚，特別耽心搞不好引起對抗造成流血。5月9日上午，周傑和史維國一起來找我，表示希望與我一起找鄧樸方，再做做鄧小平的工作。我給鄧樸方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平日照顧樸方起居的阿姨。她問：「哪位？」我說：「我是老陳，找樸方。」她說：「老陳呵，樸方不在，和老爺子出門幾天了。」我問：「什麼時候回來？」她說：「可能還得兩、三天吧。」我突然覺得，莫非老爺子去調兵了？情況很不妙。

我和周傑、史維國說：「樸方和老爺子出去了，恐怕要糟。學生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果不適可而止就麻煩了。」他們說：「大家現在就是耽心對抗造成流血啊。關鍵是小平同志的決策。」我說：「『動亂』這個帽子不摘掉，學生不會收手。李鵬堅持這個提法，一點都不讓步，背後一定有人支持。小平同志一直認為『中國不能亂』，但如果鎮壓了學生運動將失去人心，會損失更大。」除了兩頭做工作，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那麼，學生們在做什麼呢？朋友給我拿來了幾盤錄音，是北大學生的辯論：復課還是絕食。據說，早在胡耀邦追悼會剛結束，作家鄭義^[736]就在北大提出過「絕食」的建議。鄭義用他文革時的經歷說明，絕食是給對手施加壓力、迫其就範的有力武器。無庸諱言，鄭義的蠱惑起了作用，在學生得不到政府的滿意回應時，就憤怒地走上了破釜沉舟的一步——絕食。殊不知當年鄭義面對的地方政府，與現今學生面對的中央政府，區別甚大。

文革中的地方政府既不願與民眾對立，又不願開罪中央政府，故而往往能對絕食這類行為採取妥協的態度。而當今的中央政府，既有政治強人鄧小平獨斷朝綱，又有一批經歷過文革十分反感群眾運動的老人，更有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維護自己的特權。所以，絕食雖能獲得廣泛的同情，卻很難取得什麼實質性的進展，反而給李鵬等人主張鎮壓找到了藉口。因為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絕食，他們會認為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趙紫陽得到學生準備絕食的信息後，5月13日，藉與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了談話。他說：「大學生也好，其他公民也好，如果有意見，就去干擾國際會議，妨礙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就不會得到人們的同情和支持。千萬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學生們毫不理會。下

【736】鄭義（1947-），四川重慶人。中國當代作家，代表作為《老井》。

午3點多，先後有300多名頭紮白布條的大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們打出了「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罷課，請求對話」等標語。

同日，一些高校貼出了《絕食書》和《絕食宣言》。《絕食書》說：「我們最純潔的愛國熱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情，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呀！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而死亡正向他們逼近，您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理由去偷生。」「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絕食宣言》說，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絕食口號：「不是動亂，立即平反」，「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民主力量，支援我們」，「世界輿論，聲援我們」。

下午5:40，北京高校的學生拉開了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一幕。學生的絕食確實得到了廣泛的社會同情和支持，機關、團體和市民紛紛給學生各種支援。因為右膝活動不便，我大部分時間還是躺在床上，看看各種材料、聽聽情況介紹。這一天晚上，楊曉給我拿來了一張紙條，是陶斯亮寫的：「統戰部知識分子局開會，聽取各路精英的意見，怎麼不見你這一路神仙！」陶斯亮怎會知道，我不宜出面再添亂呢。

聽楊曉說：陶斯亮很著急，希望盡快找到能使學生停止絕食的辦法。閻明復在統戰部與學生和知識分子代表進行了座談。王丹說，「4·26社論」給學運定的「動亂」不糾正，同學們的安全沒有保證，學運不會平息。知識分子代表都是建議政府正確評價學運，並在此基礎上調解學生與政府的對立。座談會結束時，王丹感慨地說：「沒想到共產黨高幹中還有閻明復這樣的好人。」可他那裏知道，像閻明復這樣的好人並沒有改變歷史的權力。

當晚，北大教授季羨林、嚴家炎^{【737】}等 300 多名教師，就學生絕食發表了致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公開信，建議：領導人應該盡快與學生進行實質性對話，應當盡早對這次學潮的性質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應當高度重視這次絕食請願活動，以人道主義的態度保證學生的身心健康。

5月14日，在《光明日報》的座談會上，蘇曉康^{【738】}說，「4·27大遊行」意味著中國歷史已經走到一個新時期，強人政治結束了。共產黨應該吸取歷史教訓，北洋政府鎮壓「5·4」，國民黨鎮壓「12·9」，「四人幫」鎮壓「4·5運動」，都沒有好下場。應該承認學生自己選舉的組織有天然合理性；所謂動亂的根源恰好是腐敗和官倒；必須有新聞自由，權力受到監督；學生要有理性，政府和黨更要有理性。

包遵信說，應該肯定這場學生運動是一場非常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溫元凱說，要真正有誠意的理解學生、保護學生、引導學生，學生也要認清國情、推進實際的民主和改革。嚴家其說，當前的事件標誌著人治時代的結束，以建設民主和法制為目標的新時代的開始。

晚上9點，由溫元凱、蘇曉康、劉再復^{【739】}等12名學者簽署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在天安門廣場宣讀了。呼籲要求：中央負責人立即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經民主程序產生的組織是合法的，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並提出，為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順利進行，懇請學生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學生們並沒有聽從學者們的呼籲，反而發出了不願配合的聲音，說什麼「政府的說客來了」，「他們來摘桃子了」，「只會教訓人」，「沒有骨氣」，「不要上當」，等等。

8-12「5·15」北京知識界3萬人大遊行支援學生

5月15日一大早，李峻告訴我：「所裏很多人要響應嚴家其和包遵信的呼籲，參加下午的知識界大遊行，正在趕製一面體改所的旗幟。」我說：「參加遊行可以理解，也是每個人的權力，但體改所的旗幟絕對不能打！誰敢打出體改所的旗幟，我就開除誰。」李峻笑著說：「老陳，你也太嚴厲了吧！」我將「三隻黑手」的說法，悄悄地告訴了他，他嚇了一跳，說：「真有這麼嚴重嗎？」我說：「寧可信其有！」

【737】嚴家炎（1933-），上海人。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738】蘇曉康（1949-），浙江杭州人。中國報告文學家，代表作為《河殤》。

【739】劉再復（1941-），福建南安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我駕著雙拐到了所裏，楊曉剃了個光頭、眼圈紅紅的走了過來。再一看，所裏的許多年輕人都剃了光頭。我說：「你們要幹什麼？都要當許褚、李逵，赤膊上陣嗎？要讓人家來抓嗎？怎麼這麼沉不住氣？我們需要的不是百夫長，而是萬人敵！要每臨大事有靜氣！你們倒好，一個個剃成了禿子，那不是讓人家一抓一個準嗎？」楊曉拿來了留學英國的李磊發回的傳真，號召所裏的年輕人起來「造反」，字裏行間倒是充滿了熱血。

我召開了一個臨時所長辦公會議。大多對學生的絕食反響強烈，對政府的冷血深表不滿。我說：「越是危急時刻，我們越是要冷靜。學生絕食把自己置於死地沒有退路了，四面八方都在同情、支援。那麼，反對學生運動的那些人又會做什麼呢？事情不會那麼簡單。我覺得，學生如果不及時退出天安門廣場，恐怕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果學生聰明，就立即退出天安門廣場，哪怕戈爾巴喬夫走了再回來呢。有進有退收發自如，才行啊！」

外面來了5個人，拿著丈量土地的儀器，一邊丈量，一邊記錄。我問：「這是幹什麼的？」李峻說：「這是居民委員會丈量所裏的土地和建築。」我心想：早不量，晚不量，現在量，一定有文章。就又問：「來了幾天了？」說是昨天來的，一間一間房子的丈量。我覺得很好笑，李鵬、陳希同的「作戰計劃」，恐怕是把我們所當作一個「據點」，提前做攻佔的準備了吧。為防不測，我把所裏、家裏近幾年的重要信件和《大事記》轉移了。

我又請一個軍內的朋友去打聽一下軍隊的動向。第二天，他告訴我說：「老陳，不好了，各地都有部隊以『拉練』、『野營』、『換防』的名義，在往北京四周調動。」看來，鄧小平準備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了。學生的不知進退將導致什麼樣的局面呢？天津開發區的張煒來電話說：「看了學生絕食的場面，讓人淚流不止。為甚麼領導人就那麼鐵石心腸？我和吳稼祥、石小敏一起發了一個聲援學生的聲明。」我說：「小心，情況會更嚴重！」

5月15日下午兩點，首都知識界200多個單位的3萬多人，走上街頭聲援絕食的學生，嚴家其、包遵信、錢理群^[740]、王魯湘^[741]、柯雲路^[742]、鄭義、趙瑜^[743]等人走在前面。上午剛成立的「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同意知識界的代表到絕食圈內行走慰問。

[740] 錢理群（1939-），浙江杭州人。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741] 王魯湘（1956-），湖南漣源人。時於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

[742] 柯雲路（1946-），上海人。中國當代作家。

[743] 趙瑜（1955-），河北安平人。中國當代作家。

王魯湘代表知識界宣讀的《5·16 聲明》說：

一、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是不夠明智的。如果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遵從民意，順乎潮流，將出現一個民主的穩定的中國。反之，將極有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二、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三、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學生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強烈反對的腐敗現象。黨和政府應該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除特權，查禁官倒，消除腐敗。

四、《人民日報》、新華社隱蔽事實真相，剝奪公民的知情權；上海市委停止《導報》主編欽本立職務。這是完全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新聞自由是消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五、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並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涵義。

六、所謂抓「一小撮」、「長鬍子」的幕後指使者的提法是錯誤的。所有公民都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

接著，包遵信、鄭義、嚴家其和徐剛^[744]講了話，表示要與「同學們戰鬥在一起！」受到了絕食學生的熱烈歡迎，全場唱起了《國歌》和《國際歌》。客觀地說，北京知識界的看法雖然充滿了理想主義的願望，卻代表了當時追求中國進一步改革的人們的看法。

從早上到晚上，北京的各個機關、科研、新聞、文藝、醫務、企業系統的工作人員，自發組成聲援隊伍，先後大約有 80 多萬人，四面八方地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們打出的橫幅、標語主要是「孩子們沒有錯」，「拖延真誠對話，就是殘害學生」，「政府，你打算讓學生餓多久」，「不能坐視學生餓死」，「惜我學生，悲我政府」，「接受條件，平等對話」，「聲援學生有理，抗議政府無情，學生有好歹，人民不答應」，等等。

各種旗幟、標語、口號從復興門一直到天安門。北大的隊伍呼喊著很有代表性的口號：「數千學生、絕食廣場，無能政府、沒人相信，學生愛國、我愛學生，北大教授、罷教支持，抗議政府、見死不救，師生同在、流血不怕，救我學生、責無旁貸。」中央美術學院打著一幅 50 多米的橫幅，寫著：「門前連日動地聲，千呼萬喚是民情，莫說學生不足論，滿懷憂患九州同，健全法制唯民主，清除腐敗立新風，治國貴民誠以信，何患天下不太平。」

[744] 徐剛（1945-），上海崇明人。中國當代作家。

這時，絕食的學生已經增加到了3,000多人，有100多人出現了暈倒休克的現象。當晚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的民眾達到30萬人以上。全國各省市也出現了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浪潮。那麼多的學生絕食了。當我在電視裏看到絕食的學生倒在媽媽的懷裏，還說「媽媽，我們沒有錯！」「我愛我的媽媽，我愛饅頭、米飯，但我更愛我的祖國！」時，禁不住淚流滿面，我被深深地感動了。學生絕食的現實，可以說牽動了社會各界的心。而情緒最複雜、反應最熱烈的莫過於北京的知識分子。學生已經絕食4天了，政府仍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德高望重的老學者與各大學的校長們，忍無可忍地站出來說話了。

當日晚間，我接到一個神秘的電話，一個人啞著嗓子和我說：「老陳，我在電話亭裏給你打電話。告訴你，你們所已經被定為『反革命組織』了，你也上了黑名單！」我聽出來是在公安部當副部長的一個朋友，我說：「謝謝你的關心，我肯定是在劫難逃了。名單裏還有誰？」對方回答：「還有老鮑，家其，……」一陣雜音，電話斷了。我給鮑彤打了個電話，沒人接。我給家其的電話，是高皋接的，她說：「放心吧，我們挺好！」

5月16日，北京大學朱德熙^[745]、馮友蘭、季羨林等10位著名教授聯署發出的《緊急呼籲書》，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懇請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肯定這次學潮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即不是動亂。絕不以任何形式對學生「秋後算賬」，同時承認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並承諾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式對靜坐學生採取暴力。二、希望學生從大局出發，停止絕食，撤離天安門廣場。

同時，北京十大院校的校長聯署給絕食學生的公開信，他們是：北師大校長方福康^[746]教授、清華校長張孝文^[747]教授、北大副校長陳佳洱^[748]教授、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教授、北方交大校長萬明坤^[749]教授、北外院長王福祥^[750]教授、人大副校長黃達^[751]教授、北航校長沈士團^[752]

[745] 朱德熙（1920-1992），江蘇蘇州人。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746] 方福康（1935-），浙江定海人。時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747] 張孝文（1935-），浙江寧波人。時任清華大學校長。

[748] 陳佳洱（1934-），上海人。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749] 萬明坤，時任北方交通大學校長。

[750] 王福祥（1934-），山東壽光人。時任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

[751] 黃達（1925-），天津人。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752] 沈士團（1940-），浙江嵊州人。時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

教授、北科大校長王潤【753】教授、農大校長石元春【754】教授。信中表達了大家的焦慮，希望不要激化事態，能冷靜地用對話解決問題，並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同學直接見面和對話。

不斷有絕食的學生暈倒。除了北京各個高校的著名教授和負責人以外，各界人士和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都紛紛發出公開信或呼籲書，敦促政府與學生盡快對話，避免事態的惡化。周傑憂心忡忡地來找我，他對當前局勢找不到妥協點感到很為難，不改變「動亂」的定性學生不接受，而改變「動亂」的定性李鵬又不同意。我們商議，總不能眼看局勢惡化，除了繼續做老人的工作外，可以促成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出面，組織一個各方代表參加的「事件調查委員會」，來做一些緩和矛盾的工作。

當天下午，楊曉帶著政法大學的陳小平【755】和北大的陳波【756】來找我。他們哭訴了絕食學生的慘狀，大罵政府的沒有人性。我給了他們每人5,000人民幣，讓他們給學生買飲料；又把老同學施旭東剛給我的600美元，分給一人300留作他們急用。齊永貴從美國考察回到海南，問我有沒有什麼事？我說：「你趕快派人送10萬人民幣來。他說，10萬不行，5萬可以。我說，那就5萬，要快！」他派許佳送來了錢，羅安義收到就給學生買飲料了。

楊冠三和白南風都說，學生已經失控了，沒有誰的話他們能聽進去，似乎陶醉在「勝利」的盲目喜悅中；而且哪個學生領袖提了比較溫和的看法，就會被認為是「立場不堅定」被趕下台；況且沒有哪個學生領袖能作出冷靜的決定，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意見辦。對勸學生撤出廣場的忠告，他們一概聽不進去。倒是不少絕食的學生急需救助，最好是先給他們買一批飲料送去。我讓馬上從所長基金裏拿出兩萬元，給學生去買飲料。

8-13 《5·17 宣言》

5月1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一行抵達首都機場。楊尚昆為其就地舉行了歡迎儀式。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正式會談中，楊尚昆向戈爾巴喬夫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情況時，說：「無論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實際情況。不改革，我

【753】王潤（1929-），時任北京科技大學校長。

【754】石元春（1931-），湖北武漢人。時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

【755】陳小平，中國政法大學講師。

【756】陳波，北京大學著學系教師。

們中國的發展就沒有希望。改革又不能照搬現成的模式，這就免不了會出現失誤。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意見可以交換。」

5月16日上午，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會晤，鄧小平說：「我們這次會見是為了結束過去，開闢未來，完成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歷史使命。」在趙紫陽下午會見戈爾巴喬夫之前，鄧辦通知趙辦：希望趙紫陽說明，上午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會晤就標誌著中蘇關係的正常化。因為蘇聯與中國兩國不同，蘇聯老一代領導人退位後就只能代表自己，現任領導人才能代表組織，而中國則還由老一代在左右局面。

所以，當趙紫陽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並宴請戈爾巴喬夫時，戈爾巴喬夫高興地說：「我們兩黨總書記的會見，說明我們兩黨之間的關係已經正常化，這是有歷史意義的。」趙紫陽馬上說：「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見面，就是兩黨最高級的會晤。」而後，他對面呈不解的戈爾巴喬夫說：「我們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通過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這個講話在下午5點多播出了。

顯然，趙紫陽如果不做解釋，就等於默認了戈爾巴喬夫的說法；而這個解釋其實在此前已經多次提過，並了無新意。只不過在當時的局勢下，卻被有人誤讀為趙紫陽和鄧小平攤牌的一個信號，這種對政治鬥爭一廂情願的主觀判斷，確實造成了嚴重的口號升級，從而大大加劇了矛盾。當晚在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上，趙紫陽又一次提出改變「4·26社論」不當定性的問題，遭到李鵬、姚依林的堅決反對。

5月17日凌晨，趙紫陽代表政治局常委向學生發表了書面講話。他說：「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賬』。」他還多次呼籲說：「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盡快恢復健康。」

當時上萬名請願的學生一直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午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隊伍越來越大，接連兩天都是以工人、幹部為主的一、二百萬人的大遊行。參加遊行的人除了學生、教師和工人以外，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各部門的遊行隊伍特別引人注目。設在天安門廣場的「學運之聲」廣播站播出了嚴家其、包遵信等人發起並簽署的《5·17宣言》。憑心而論，這個宣言從道德倫理上說是無可辯駁的，但從政治倫理上說則無疑激化了矛盾。《5·17宣言》全文如下：

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起，三千餘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佈，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到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

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這個宣言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遊行隊伍中明顯地增加了批評鄧小平的標語和口號，如：「鄧大？黨大？」「聽小平的？聽人民的？」「小平下台，人民作主」「小平您好，糊塗」，「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等。

中午，民盟主席費孝通、民建主席孫起孟^[757]、民進主席雷潔瓊、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致信趙紫陽，表達了他們的憂心如焚，認為學生是愛國的，建議領導人盡快與學生對話，希望學生停止絕食。同時，還有民革主席朱學范^[758]發出了緊急呼籲；團中央、全國青聯和學聯也發出了緊急呼籲。後來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

[757] 孫起孟（1911-2011），安徽休寧人。時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758] 朱學范（1905-1996），浙江嘉善人。時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當天，全國 27 個省市爆發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參加遊行的既有學生、教師，也有工人、幹部，他們都表達了對北京絕食學生的強烈支持，對政府遲遲沒有作出反應十分不滿。喊出的口號已經從「清除腐敗，打倒官倒」發展成「反對老人政治」、「打倒封建專制」。各地都反映，人們的不滿情緒正在日益增長。但遺憾地是，民眾的普遍要求與上層多數官僚的願望是相反的。

8-14 鄧小平再一次發動政變，搞掉了趙紫陽

5 月 17 日下午 4 點，趙紫陽如約到了鄧小平家。本來是他打電話要求和鄧小平個別面談，想陳述一下自己對修改「4·26 社論」的看法。結果，卻是鄧小平通知開了一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其他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列席常委會的楊尚昆都到了。趙紫陽預感到事情會有些不妙。鄧小平說：「現在這樣拖下去不行，究竟怎麼辦？還有沒有退路，往哪兒退？請大家來談談看法。」

趙紫陽說：「對當前的問題，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軟辦法，一種是硬辦法。軟辦法就是承認學生是愛國的，承認學生組織是合法的，改變『4·26 社論』的說法。硬辦法中，一種是空硬，就是發表『4·26 社論』那樣的東西，公安局發佈十條不許學生遊行、上街，實踐證明這種辦法是沒有有效的；另一種辦法是實硬，也就是戒嚴、軍管。這種辦法短期可能會奏效，但長期會造成對國家更大的傷害。」

趙紫陽接著說：「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與學生對話主要卡在『4·26 社論』的定性上，我們對社論的定性鬆一下口，可以贏得社會同情，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李鵬馬上表示反對趙紫陽的意見，並說「4·26 社論」是正確的，發表後形勢已逐步好轉，趙紫陽的「亞銀講話」又重新點起火來，以致發展到今天這種混亂的地步。姚依林則攻擊趙紫陽，一是趙搞亂了經濟；二是趙支持學生、支持動亂，和小平同志不一致；三是趙分裂了黨；四是趙的兩個兒子是最大的官倒。

鄧小平說：「現在，北京乃至全國形勢都相當嚴峻。如果中央旗幟鮮明，不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你越讓，他就越鬧。不採取緊急措施，肯定是頂不住的。考慮來考慮去，要請解放軍出來，要在北京實施戒嚴，只有這個辦法能在較短時間內讓局勢安定下來。」趙紫陽說：「有決斷總比沒有決斷好。不過，小平同志，這個方針我很難執行。」鄧小平故作姿態地說：「少數服從多數嘛！」

其實，鄧小平所說「少數服從多數」，也不過是說說而已。當時的5個政治局常委，只是趙紫陽、胡啟立主張修改「4·26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沒有明確表態，並沒有真正進行投票。「戒嚴」這個重大決定，實際上是鄧小平在李先念、陳雲、王震等人影響下的朝綱獨斷。鄧小平還拍板「戒嚴的事由李鵬、喬石、尚昆主持」。李鵬喜形於色地立即緊鑼密鼓地進行了部署，他找了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羅干^[759]、袁木、何東昌等人，開始做在北京「戒嚴」的準備工作。

趙紫陽根據學生和各界的要求，希望改變「4·26社論」的努力失敗了，鄧小平作出了實行「戒嚴」的決策。當天晚上，有兩個家庭舉行了非比尋常的「5·17會議」：

一個是鄧小平家的「5·17會議」。據鄧小平家人透露：晚飯時，鄧家人坐在一起，召開了一個「太上政治局常委會」。鄧小平臉色凝重地一語不發，看著嚴家其、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全家一致認為「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剝成肉餡了！」鄧小平使出了鐵腕，下定了「不怕流血，強行鎮壓」的決心。

一個是趙紫陽家的「5·17會議」。趙紫陽心情沉重地回到家裏，吃晚飯時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我不能當千古罪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家人一致表示無怨無悔地支持他的決定。

當天，正在加拿大訪問的萬里，公開發表了他對學潮的看法。他說：「中國改革開放1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但政治體制改革慢了一些，民主發揚不夠，群眾監督也不夠。現在，學生、知識分子和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促進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萬里的講話被冠以《學生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愛國行動》的標題，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刊出，各界人士普遍認為這個講話群眾和學生能接受。

但萬里和民眾哪裏知道，鄧小平已經決定要實行「戒嚴」了呢。從胡耀邦病逝以來的一個多月時間裏，始終貫穿著兩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群眾愛國民主運動與一批既得利益者的鬥爭，另一方面是黨內改革力量和李鵬等保守力量的黨內鬥爭。而李鵬的險惡用心可以說是路人皆見，他們的方針是：一激怒學生，不給退路，二激怒鄧小平，搞掉趙紫陽，為整肅黨內的改革力量和社會上的民主力量作足文章。

[759] 羅干(1935-)，山東濟南人。時任國務院秘書長。

比如，5月16日在部分學生準備停止絕食時，飛機就來到天安門廣場上空撒「4·26社論」的傳單激怒學生和民眾。特別是5月17日，陳希同得到李鵬關於要實行「戒嚴」的消息後，晚上在天安門廣場斷了水，又撤走了維持交通和治安的全部警察，更激起了各界的憤怒。雖然人們很憤怒，但始終保持了克制和理性的態度，由一部分學生和民眾組成的「糾察隊」，把天安門廣場的秩序維持的特別好。

「危機深重的中華民族啊！」幾個來看我的朋友都表達了這樣的憂慮，但誰也找不出解決問題的好辦法，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當矛盾的一方發出過於強烈的訊號時，另一方一定會作出更強大的反彈。而從歷史上看，掌握權力的一方往往會佔有優勢。我提出，學生除了有道德和心理的優勢以外，最重要的組織和軍事優勢都在政府手裏，若學生能「適可而止」那就是很大的成功了。比如，現在先退回校園，以後有需要還可以出來嘛！

趙紫陽遇到了比胡耀邦更大的難題，也遇到了比胡耀邦更難的處境。趙紫陽再三想改變「4·26社論」定性的目的，是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以避免「調動軍隊」「實行戒嚴」「造成流血」的後果，但他的努力失敗了。

自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以後，趙紫陽三次要去看學生，都遭到李鵬的反對。第一次，是5月14日，學生絕食的第二天，趙紫陽說：「我必須去看學生。」硬讓李鵬給擋住了，不讓去。第二次，5月15日，趙紫陽已經上了車，李鵬打開車門說：「如果你去看學生，你要承擔分裂黨的責任！」結果，趙紫陽坐著車在天安門廣場轉了兩圈，沒有下車。5月18日清晨，趙紫陽堅持看望因絕食住院的學生，李鵬拒絕去，但車子開動時又來了。

5月19日拂曉，趙紫陽要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李鵬堅決反對。趙紫陽覺得，這麼多學生已經絕食7天了，無論如何一個人也要去。李鵬看沒法阻止也跟著去了，但他非常害怕，不到一會兒就溜號了。而趙紫陽則發表了他在天安門廣場的「告別辭」。趙紫陽一而再、再而三地懇請同學們「冷靜」、「理智」的思考，他還反覆指出「現在情況已經非常嚴重」，「情況一天天嚴重」，「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人們可以從他真誠而痛苦的眼神中，看出他對青年學子命運的耿心、深情的勸誡和含蓄的警告。而當他說「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的時候，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學生們對趙紫陽熱烈鼓掌，一些學生聽了他的講話激動地哭了。

是的，趙紫陽5月17日下午從鄧小平家裏出來就在想，無論如何也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總書記。5月18日，趙紫陽從醫院看望學生後回到辦公室，即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鄧小平寫了一封辭職信，但被楊尚昆勸阻了。當夜，他和秘書李樹橋說：「我不能當千古罪人！但這樣的時候，我不說話行嘛？」急白了頭髮的趙紫陽，不顧個人安危，才有了他那篇在天安門廣場的「告別辭」。

實際上，自趙紫陽表示了不同意「戒嚴」以後，不僅失去了合法總書記的地位和權力，而且被監控起來失去了起碼的人身自由。鄧小平像搞掉胡耀邦一樣，似曾相識地如法泡製了又一次宮廷政變，搞掉了趙紫陽。砍掉了左膀胡耀邦，又斬斷了右臂趙紫陽，鄧小平終於掉進了陳雲、李先念早就給他挖好的陷阱中了。胡趙主政的中國10年改革就此止步，李鵬左右政局的一個全面倒退的時期就要到來了。

8-15「三所一會」發表《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5月18日上午，中央辦公廳一個朋友告訴我，鄧小平決定「戒嚴」和趙紫陽可能下台的消息，看來中國改革的逆轉不可避免了。中午，軍內一個朋友又告訴我，北京四周已經都部署了部隊，只讓軍人學「4·26社論」和一些北京發生動亂的材料，說明部隊進駐北京是早晚的事了。我架著雙拐在房間裏走了走，又到床上躺一會兒，電話一個也不接，思索著該怎麼辦。下午，秦曉^[760]拿著一副雲子來看我。我們下了兩盤圍棋，但都心不在焉。談起當前的局面，誰都找不出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晚飯時，維凌來找我了。以下是我們兩人的對話錄：

何：樸方告訴我，老爺子決定要「戒嚴」了，你怎麼看？

陳：老爺子主張改革開放功莫大焉。這次決定「戒嚴」，可能成為他一生最大的失誤。

何：怎麼說？

陳：中國不改革沒有出路，改革開放是順應人心、順應時勢的。但這次學潮，學生明明是愛國的，卻被說成是「動亂」，不僅學生不能接受，其他各階層都不能接受。老爺子「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又缺少對現代社會的認識，總想「快刀斬亂麻」，還不斷受到李先念、陳雲這些老人的左右，所以，才作出這個決策。殊不知這個決策將大大地失去民

[760] 秦曉（1947-），時於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任職。

心，將大大地推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甚至將造成中國改革的全面倒退。

何：中國需要改革，但改革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怎麼行？學生這麼鬧下去，只會添亂。「文革」的苦頭大家都吃夠了。

陳：改革確實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但決不能「一鳥入林，百鳥壓音」。究竟是「萬馬齊喑」好呢，還是「萬馬奔騰」好呢？當然是後者。改革因為利益調整就會帶來不穩定，要在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形成新的穩定，而不是用「我壓你服」的辦法形成穩定的假象。你也知道，我早就說過，從君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之間，有一個精英政治的過度階段，中國在這個精英政治階段，恐怕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而落後國家的「起飛」，確實需要政治上強有力的領導推行市場經濟，朴正熙、蔣經國的成功就是如此。

你看，這次學生絕食以後，每天上百萬人遊行支持學生，還看不出人心所向嗎？我之所以說「民心不死，民氣可用」，就是說這種精神會是多麼大的一股推動改革的力量呵！如果給學生摘掉了「動亂」這頂帽子，而後說：你們不是希望中國的事情辦的好一些、快一些嗎？現在你們可以五個人、十個人一組，到農村、工廠、機關、學校去作六個月調查，弄清那裏的「現狀、問題和前景」，學生接觸了實際就會成為推動改革的力量。變「亂」為「治」，何樂而不為之？

何：姿先生，像你說的有一定道理。但「戒嚴」可以盡快地恢復秩序進行改革啊，你怎麼會認為會造成改革的全面倒退呢？

陳：維凌，你想想看，陳雲、李先念、姚依林、李鵬這些人都是不贊成改革的啊，長年形成的「階級鬥爭」思維，使他們會藉「戒嚴」之名行反改革之實，多年來奮鬥在改革第一線的黨政幹部、社會上支持改革的民主力量和學生中熱心改革的青年精英，恐怕都會遭到清洗。而後，必然是舊的一套捲土重來。不過，歷史的發展往往是螺旋式上升的，何況從來都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嘛！

何：那你準備怎麼辦？

陳：我是在劫難逃嘍！發展組、體改所、政改辦都是我創建或參與的，已經被誣為「三隻黑手」，我又上了黑名單。這回趙紫陽一下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全副武裝的組織化程度很高的軍隊一進城，學生和民眾哪裏能夠抵擋？一場大的悲劇就要發生了！我不能不作出痛苦的抉擇：與其跪著生，不如站著死！古人叫做「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我

即使殺身成仁，也要留下凜然正氣！我想，明天召開一個「三所一會」的會議，發一個公開的聲明。表明我們的態度。

維凌跪了下來向我說：「姿先生，這麼多年來，我們是無話不說的摯友，我敬佩你為人的品格和視死如歸的精神。可以說這10年來，沒有你就沒有我。但你也知道，我和樸方的關係非同一般。無論我做什麼事，都請你放心，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緊緊地擁抱，而後灑淚而別。

5月19日上午9點，在體改所會議室召開「三所一會」（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骨幹會議，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大家的意見趨於一致。

中午11點，由我口授了一個六點聲明，白南風等人整理出一份文字稿，再請與會者修改。大家都表示同意以後，又請研究法律的學者看了沒有違背《憲法》和《黨章》的條款。中午，我們緊急發出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 1、 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絕大多數社會階層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 2、 事態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完全是由於黨和政府決策上的失誤和拖延所致。
- 3、 建國以來，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脫離人民，違背良知，與人民的意願直接對立。其原因在於傳統政治體制不能按法制軌道運行，沒有政治公開性，形成了只關心上層權力鬥爭、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為重點局面。
- 4、 目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致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這種黑暗是前景是經歷過10年文化革命的中國人民所無法接受的。
- 5、 為此，
我們呼籲，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由全國人民共同作出判斷和選擇；
我們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進行干預；
我們呼籲，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對政治局最近一段時期的工作進行審議；
我們呼籲，各界聲援活動務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這次學生運動

已經取得的成果；

我們呼籲，各階層人民組織起來，協助大學生做好維持秩序和後勤服務工作；

我們呼籲，絕食人員多多保重身體，爭取盡快結束絕食，你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祖國需要你們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勝利！

- 6、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中國現代化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1989年5月19日

這份聲明當即發送到各個新聞機構、北京各高校和天安門廣場，並在北京街頭張貼。在李鵬宣佈戒嚴前已經從幾百份變成了幾千份、幾萬份到處張貼。由於它符合多數人的願望和心理，所以在各界民眾和黨政機關內影響很大，許多人打電話或親自來表示「堅決支持」。散會時，馬凱把我拉到院子裏，悄悄地說：「老陳，形勢可能會有大的變化，你一定要保重。」我很感謝他的好意，就說：「個人生死事小，國家前途事大。」

下午兩點，我召開了全所大會。我講了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發表聲明的理由，並希望大家繼續作好兩方面的工作：勸領導人理解學生的愛國精神，緩解矛盾，避免流血；勸學生適可而止，退出廣場，不激化矛盾。最後，我宣佈從現在開始：辭去所長職務！當時，場面熱烈，掌聲、哭聲匯成了一片，但大家一致反對我辭職。

8-16 李鵬宣佈「戒嚴」，我最後一次見鮑彤

5月19日下午5點，我到了北京大學。找到了幾個老朋友，我對他們說：「這一、兩天北京就會『戒嚴』，決不能讓學生往槍口上撞。你們想想辦法，怎麼樣能讓學生停止絕食，避免流血。」他們說：「現在廣場上誰勸都不行，外地來到學生越來越多，幾個激烈分子一鼓嘈，想退出來的人也就不好意思退了。」我說：「當時提出絕食的人，就沒有提出有進有退，給自己留下退路嗎？這種絕對化的思維，真是害人非淺呵！」

他們說：「只聽說要『置之死地』，沒聽說怎麼才能『而後生』。」我說：「往往群眾運動難於有好的結果，就在於運動會被一波比一波更極端的口

號所左右，大家都看過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一定要讓學生明白善良的願望是通向地獄的橋樑，目標只能一步一步地實現。學生再不知進退，就要演出一場空前的大悲劇了。」錢理群等人都說：「我們一定盡量作學生的工作。」

當天下午，北京市民就發現了開入北京市區的軍車，人們開始自發地起來抵制。在城西的公主墳、城西南的六里橋、城東的呼家樓等地都有軍車被堵。老百姓向軍人講述北京的情況，解釋學生的要求和主張，請求他們不要去天安門廣場，千萬不能鎮壓學生。晚上9點多，天安門廣場的廣播站播出了「結束絕食，改為靜坐」的通知，同時，還宣佈「所有進入廣場的主要路口都被老百姓封鎖了。」

因為得知「戒嚴」的消息洩露，原定5月21日0時開始戒嚴的時間，提前到5月20日上午10時進行。5月19日晚10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西郊的國防大學禮堂，召開了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主持大會的喬石指出：「趙紫陽同志因為身體不適，向大會請假。」在李錫銘代表北京市委介紹了北京市學潮的發生和發展情況以後，李鵬代表政治局常委作了主報告。

李鵬說：「中央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當前形勢相當嚴峻，如再不迅速扭轉局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不知是激動還是緊張，李鵬聲色俱厲地揮著拳頭，但講話不是結結巴巴、就是亂斷句，引來不少私下的嘲笑。李鵬說：我呼籲，「停止絕食」，「停止遊行」。楊尚昆說：「北京現在處於無政府狀態。解放軍進駐北京是為了維護治安，絕不是來對付學生的。」

5月20日凌晨，李鵬簽署了《戒嚴令》，北京社會各界像炸開了鍋，絕大多數學生、教師、幹部和市民都表示不能接受。人們似乎對戒嚴無所畏懼，在通往市區的路口上，幾十萬名學生和市民設置路障、截堵軍車，幾萬人高喊著「反對戒嚴」、「李鵬下台」的口號遊行示威。這一天，全國有120個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口號中增加了不少「結束老人政治」、「打倒李鵬」的內容。

5月20日上午9點，我和劉曉峰去看鮑彤，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煙，剛毅的臉上充滿了正氣和義憤。見我來了，他就說：「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唯一合理的方針。把學生的愛國行動說成『動亂』，把廣大的學生當成敵人，還有沒有一點人的良知？而且，又一次非法地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戒嚴？！和人民對抗，和人心對抗，會有什麼好結果呢？這是困獸猶鬥！」我插了一句：「也許會狗急跳牆呢？！」

鮑彤激動地站起來說：「我真想掛一個『中共中央委員鮑彤』的牌子，到天安門廣場和學生們一起絕食、抗議！學生明明是愛國的，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李鵬非說是『動亂』，是非混淆到如此地步，還大言不慚地宣佈『戒嚴』，真是沒有天理了！」我說：「老鮑，不要激動。李鵬這個人，無德無才無識無能，但在搞陰謀勾當上的確有一手。李鵬肆無忌憚地要搞掉趙紫陽，背後一定有一個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啊。」

鮑彤說：「我們黨就是讓這樣的人搞壞的。李鵬從小就不學無術，一心想爬上高位。」我說：「我聽外交部蘇聯東歐司的朋友，講了很多李鵬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話。」鮑彤說：「李鵬和朱琳的那些醜事，要讓老百姓知道了，還不笑掉大牙啊，太丟人了！」我看氣氛緩和了一些，就說：「昨天『三所一會』發了一個聲明，反映還不錯。」鮑彤說：「作為一個公民、一個黨員，當然有發表自己意見的合法權利。」

我說：「看來中國得來不易的改革局面。要喪送在李鵬這些人的手裏了。不過，當務之急是怎麼盡量避免流血。」鮑彤說：「流血恐怕難以避免了。如果民眾進一步發動起來，李鵬就會陷於汪洋大海之中，也許能防止事態的惡化。」我感到鮑彤還是過於樂觀了，但是在危機關頭還是要盡量爭取好一點的結果。可笑的是，後來在李鵬編造的拙劣「日記」裏，說鮑彤和我說「以後你們不可能再從我這裏得到什麼情況了」。實際上，自我與鮑彤共事以來，他從來沒有和我說過類似的話，李鵬如此編造無非是給鮑彤製造罪名。

我回到所裏，見到了白南風、張鋼等人以「三所一會」名義發表的《關於時局的再次聲明》。《聲明》指出：「李鵬5月19日晚上的講話恣意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製造事端，激化矛盾，漠視各界人士的呼籲，排斥趙紫陽總書記5月4日以來的一系列正確講話的精神，嚴重惡化了局勢，致使社會面臨動亂。」雖然這個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但直接點名李鵬不是引火燒身嗎？不講策略不行呵，我立即讓他們收回。

隨後，我召開了所務會議。我說：「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致的，想法也是一致的，但現在不能書生氣。為什麼呢？因為雖然李鵬的講話大家都反感，但他畢竟是代表中央講的話。用『三所一會』的名義發聲明直接批判他，就會把我們置於和他公開對抗的地步，就沒有了迴旋的餘地。我們要認真研究一下，究竟應該怎麼辦。」可以說，在這個關係國家前途的關鍵時刻，體改所的骨幹們沒有退縮，表現出了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取義成仁的耿耿風骨。

大家討論決定，搞4份傳單：一是《李鵬其人》，揭露李鵬一貫反對改革、製造陰謀、品德惡劣的真面目；二是《緊急告全國同胞書》，指出當前國家面臨著改革還是倒退、光明還是黑暗兩種前途；三是《敦請人大常委會行使權力案》，要求人大常委會立即組織調查當前事件的真相；四是《緊急呼籲人大常委會提出彈劾李鵬案》，要求人大常委會對欺上壓下的李鵬進行彈劾，並用不同的名義散發了出去。

同時，一份廣為散發的「《人民日報》號外」，揭發了李鵬等人如何顛倒黑白、陰謀策劃搞掉趙紫陽的內幕，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極大憤慨。由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北京市高自聯、絕食團發表了《首都全體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聲明》，提出了：罷免李鵬，反對軍管，不承認戒嚴等要求。北京的各個城區、各個高校和天安門廣場充滿了迎戰的氣氛，從四面八方開來的軍隊都被民眾擋在了北京郊區。

下午，時任天津外經貿委主任的張煒給我打來電話，他說：「老陳，我已經辭職了。我很痛心，我不能接受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更不能同意把愛國的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在執行政府職責和自己的良心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只能服從良心選擇辭職。」晚上，陳琦偉氣憤地在給我的電話裏說：「中國共產黨是4,600黨員的黨，不是幾個寡頭的黨！我明天要到人民廣場發表演說，強烈抗議用軍隊對付民眾的錯誤作法。」

「戒嚴令」就像在欲燃的乾柴上倒了一桶油，一下把北京城裏的男女老少都動員起來了。從5月20日起，北京城裏每天都有一、二百萬民眾上街遊行、截堵軍車。誰能想到，40年前歡迎解放軍進城的北京民眾，竟會這麼樣地40年後不一樣了呢？！後來聽說，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761]抗命不調兵，被送上了軍事法庭，但他的話「寧可殺頭，也不能作歷史的罪人」，卻留下了擲地有聲的正氣和良知。

[761] 徐勤先（1935-），山東掖縣人。時任38軍軍長，因「六四」拒絕調兵被判刑5年。

8-17 康華副總裁黃大樹對我的警告

5月19日，在上層通報「戒嚴」的消息時，徐向前^{【762】}元帥說：「但願絕對不是衝學生來的。」聶榮臻^{【763】}元帥說：「絕對不要發生流血事件。」葉飛^{【764】}、張愛萍^{【765】}、肖克^{【766】}、楊德志、陳再道^{【767】}、宋時輪、李聚奎^{【768】}等7位上將，給鄧小平和中央軍委寫信說：「請求軍隊不要進城，不要在北京實行戒嚴。」他們都認為理智、克制的態度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在北京的800個將軍中有500多個簽名反對動用軍隊。但他們的努力也改變不了鄧小平的決策。

5月20日，「戒嚴令」宣佈的當天，全國有130多個城市舉行了遊行示威，「李鵬下台」成為大家集中呼喊的口號。海外留學生也掀起了強烈的抗議活動，美國的5,000多名中國留學生在華盛頓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堅決反對軍事管制，堅決反對鎮壓愛國民主運動」其他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也紛紛舉行了反對軍管和戒嚴的遊行活動，日本有5,000多人、英國3,000多人、法國3,000多人。

5月21日，楊冠三告訴我，包遵信、陳子明、王軍濤在北師大了召開會議，建議成立一個協調性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以便協調行動、影響學生，改變天安門廣場出現的政出多門的局面，當前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撤」還是「不撤」，希望體改所能夠參加。我和冠三說：「一、無論成立什麼組織，都不要以體改所的名義參加；二、勸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撤出來是當務之急；三、你一定要冷眼旁觀不能盲動。」

這一天的晚上，在鄧小平家裏召開了「八老會議」，參加會議的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會議一開始，鄧小平說：「目前，戒嚴了秩序也沒有好轉。我們黨和國家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關頭，趙紫陽固執己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先念馬上說：「我老早就說，問題出在黨內，黨內有兩個司令部。趙紫陽就屬於另一個司令部，他的目的就是逼我們交權、下台，搞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接著說：「趙紫陽明顯地支持這次動亂，他這個總書記不能不換。」陳雲說：「先念跟我講過，江澤民是一個總書記的合適人選。」李先

【762】徐向前（1901-1900），山西五台人。中共開國元帥。

【763】聶榮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中共開國元帥。

【764】葉飛（1914-1999），福建南安人。中共開國上將。

【765】張愛萍（1910-2003），四川達縣人。中共開國上將。

【766】肖克（1907-2008），湖南嘉禾人。中共開國上將。

【767】陳再道（1909-1993），湖北麻城人。中共開國上將。

【768】李聚奎（1904 - 1995），湖南安化人。中共開國上將。

念又接過來說：「江澤民這個人給我的印象不錯，我同意他作為總書記人選。」王震說：「李鵬可以當總書記嘛！」楊尚昆提出喬石可以當總書記。鄧小平最後說：「趙紫陽、胡啟立先停職。總書記人選大家再醞釀一下。」中國的前途就這樣被8個老人非法地決左右著。

香港傳來令人感動的消息：5月21日下午，香港各界市民進百萬人舉行了環島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民主運動、譴責李鵬及戒嚴；晚上，又有上百萬人參加了「全港市民聲援愛國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成立大會，聯合會的成立宣言呼籲：市民為中國的民主前途出力；解放軍不可鎮壓學生；全國人大召開緊急會議；罷免李鵬；軍隊撤離北京。同時，香港各界紛紛發表聲明，要求政府取消戒嚴令，與學生對話。

5月22日，嚴家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了會議。嚴家其等人主張學生撤出廣場，鄭義等人則強烈反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也在進行「撤」與「不撤」的大討論：主張「不撤」的人認為，「這時撤離天安門廣場，意味著對政府高壓政策的屈服和學運的失敗」；主張「撤」的人認為，「爭民主、爭自由，不能以學生的鮮血為代價」，應當「以退為進，走向全國」。這個討論導致了學運領袖和學運事實上的分裂。

「戒嚴」3天了，軍隊雖然還被民眾擋在北京城外，但早晚總會進城。晚上8點，我給鄧樸方打了個電話。我說：「樸方啊，我和你相識相交20年了，從來沒有求你辦過什麼事，這回要請你幫忙了。」樸方說：「什麼事啊，說吧。」我和他說：「樸方，為了老百姓，為了苦難的中國，為了不發生流血慘劇，求你轉告老爺子撤退軍隊，解除戒嚴吧！」樸方說：「老陳啊，我只是做殘疾人事業，其他的事都力所不及啊。」

我說：「你別給我打官腔了！聽維凌說，你對當前的局面不是也很著急嗎？也想事情能比較緩和地解決嗎？」樸方說：「是啊，北京人誰不著急啊，誰不想事情緩和地解決呢。」我說：「北京市民的情緒你應該都看到了。這麼對抗下去，早晚會流血。如果軍隊鎮壓了學生，會大大地失去民心，甚至失去一代、幾代知識分子的擁護，也會造成中國改革的全面倒退。」樸方說：「老陳啊，問題沒有你看得那麼嚴重吧。」

我說：「上次我就和你說過，『9·18』發生後，我父親代表清華學生到南京總統府絕食，蔣介石第三天就出來見了絕食的學生。這次學生絕食7天，政府都不聞不問，已經引起了民憤。現在每天幾百萬民眾上街，如果學生被軍隊鎮壓，老百姓怎麼能接受？還不急紅了眼！如果共產黨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和百姓，一定會遺臭萬年！我就辭職、退黨，再不會為這個政權服務了！」樸方說：「冷靜一點，不要這麼激烈！問題沒那麼嚴重。」

吳琰來電話說：「晚上有兩個老朋友一定要見你。」讓我10點到她家。我9:50到了吳琰家。丫丫見到我說：「爸，你沒事吧？」我說：「沒事。你媽哪？」丫丫說：「她每天都去天安門採訪，天亮才回來。爸，你說，李鵬怎麼那麼壞哪？大哥哥、大姐姐都快餓死了，他也不出來看看。我們小朋友這幾天都在喊『打倒李鵬！』，『打倒李鵬！』，大家嗓子都喊啞了。」我說：「丫丫，你還小，要好好學習！」正說著，兩個老朋友來了。

他們都是元老子弟，都很關心我的安危。第一個說：「老陳，咱們哥兒們這麼多年，你為改革嘔心瀝血，身體累垮了，家都沒有了，大家心疼你啊。10年來，你為改革作了那麼多貢獻，何必把命運和趙紫陽拴在一起呢？」我說：「我不是甚麼趙紫陽的人，他也確實沒給我個人什麼好處，但我佩服他為中國改革的奮鬥精神。這次學運他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認為是正確的。難道你們也認為學生是搞『動亂』嗎？」

他們笑笑說：「老陳，這是權力鬥爭啊！」我說：「權力鬥爭就要以犧牲老百姓的利益為代價嗎？搞改革是共產黨在將功補過呵！這次要是鎮壓了學生，以後就不會有人相信共產黨了。」第二個說：「你咋就不為自己想想呢？你只要發一個聲明，支持李鵬，批判趙紫陽，我們保你不會有什麼問題，說不定還會給你個部長幹幹！」我笑笑說：「我在政改辦時，李鵬的老婆朱琳就拉攏過我，我都沒有賣賬。」

我接著嚴肅地說：「謝謝兄弟們的好意。但我告訴你們：文革中我沒有被打死，是個倖存者。後來在農村看農民活得不像人，才決心搞改革。我搞改革不是為了當官，我不圖甚麼功名利祿。讓我違心地支持李鵬作不到，我不會賣身求榮，更不會投石下井。也許我這次被打死了，兄弟們只要記住：老陳這個人，一生沒有幹過對不起國家和人民的事情。」我們一直談到凌晨三點，相泣而散。

5月23日下午，維凌來找我，說他一直在鄧家和學生之間作工作，我們又一起商討了如何才能平息這次事態。接著，在康華戰略所當副所長的孟璉帶著一個官氣十足的人來找我，他傲慢地說：「我是康華副總裁黃大樹^[769]，這次來找你，是想告訴你：學生再不退出廣場，就會血流成河了！學生怎麼可能對抗解放軍呢？當然，鬧成這麼大的亂子，事後總會整人的，像你這樣的人是逃不掉的。現在的問題是，要避免大的流血。」

我心想，這個人說話口氣這麼大，似乎是有來頭的。我「逃不掉」，似乎理所當然。他又緩和了一下語氣說：「你的影響力大，趕快勸學生立

【769】黃大樹，時任康華副總裁。

即退出廣場，事情還好辦一點。當然，將來那些鬧事的，有的會坐牢、殺頭，多數檔案裏塞上材料，分到邊遠地方也就是了。」當想到可能發生的大流血時，我只能義不容辭地說：「我雖然能力有限，但我會盡力而為勸學生退出廣場。」

8-18 趙紫陽不具備扭轉時局的實力

5月22日，剛吃完午飯，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的兩個高級軍官來找我。他們很嚴肅地和我說，戒嚴部隊三天進不了城，說明了人心所向！現在他們部隊80%的官兵都同情和支持學生與趙紫陽，難道就這麼把事情拖下去，讓大家都不喜歡的李鵬殘民以逞嗎？是呵，不應該坐以待斃。他們說，請你轉告紫陽，需要我們做些什麼，我們會義不容辭地站在他和民眾一起。他們希望盡快地聽到回音。

這可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我估量了局勢以後，托一個能接近趙紫陽的朋友給他帶話。我說，現在如果有一個毛澤東，有一個群眾信奉的、有威望的領袖，他一定會一方面指揮8341部隊佔領各個要害部門，一方面走到天安門廣場，說：「同學們！你們是愛國的，我支持你們！」而後，帶領著同學們走到中央電視台，發表電視演說，召開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將中央的分歧交給大家仲裁，也許就能扭轉歷史，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局面。

當時的情況是：

第一，民情鼎沸。從學生絕食以來，北京市的廣大民眾、幹部普遍認為學生是愛國的，政府對學生的冷漠態度更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越來越多。李鵬剛宣佈北京實行軍管、「戒嚴」，北京每天就有100多萬人上街遊行抗議，而且不斷喊出「李鵬下台」、「小平退休」和「擁護紫陽」等口號，並且不分男女老幼無不氣憤地堵截軍人進城。近兩天，上街的民眾竟已達到二、三百萬之眾！全國各地民眾的遊行抗議也有增無減。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民意明顯地大大有利於改革。打開塵封的歷史，如果說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時民情激憤，那麼現在則達到了民情鼎沸的程度。

第二，軍心有變。軍人三天進不了北京，當圍堵軍人和軍車的學生與民眾，向軍官與士兵介紹了北京的情況、特別是學生為什麼會絕食以後，獲得了很多軍人的同情，他們也在問「為什麼北京的市民會那麼強烈地支持學生？」「為什麼北京的市民不認為發生了『動亂』？」「為什麼北京那

麼多的市民會阻擋軍隊進城？」這一類問題，以致出現了 20% 的軍人同情學生、40% 的軍人出現了動搖。再加上北京市的公安幹警 80% 也同情和支持學生。如果中央警衛團也有 80% 同情和支持學生的話，事情說不定會有轉機。因為中央警衛團最熟悉北京各個要害部門和領導人的所在地。

第三，李鵬孤立。可以說，自李鵬當了國家教委主任以後，就沒有作過一件讓老百姓滿意的好事；而李鵬擔任總理以後，更沒有作過一件讓老百姓滿意的實事；5 月 19 日夜，李鵬在宣佈北京實行軍管、戒嚴大會上殺氣騰騰的講話，又給人們留下了非常惡劣的印象，顯然李鵬的看法與民眾的認識差距太大了。全國各地都發出了「李鵬下台」、「打倒李鵬」、「李鵬不除，國無寧日」的強烈呼聲，可見李鵬已經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據李鵬身邊的人透露，「戒嚴」的第三天，李鵬在辦公室「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李鵬也許知道，除了幾個元老支持他以外，再沒有什麼人喜歡他。

第四，尚有可為。在這種情況下，無為而束手就擒，豈不是就放棄了可以爭取較好局面的可能？雖然「老人政治」在左右著中國的政局，但經歷了 10 年改革的中國，大多數幹部和民眾還是能分清黑白、認同胡耀邦、趙紫陽的。否則，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紀念胡耀邦？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在李鵬宣佈「戒嚴」以後立即喊出「擁護趙紫陽」？人心向背是很清楚的。也許只要趙紫陽振臂一呼，天下大勢就會扭轉。

下午三點，我得到的回答是：「紫陽認為，無論如何，他都不願意看到流血。」是啊，他敢於公然反對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已經很難得了。但他在危機關頭首先考慮的還是國家和百姓——「不願意看到流血」，實在是高風亮節，令人敬佩。但他這一點和胡耀邦很相似，他們確實都缺少打天下領導人的實力和膽魄。怪不得去年八月索羅斯和趙紫陽會見後說：「趙紫陽是我見過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可惜不是個大政治家。」

是不是趙紫陽和萬里聯手，還能夠改變局勢呢？也不可能。何況萬里還在加拿大訪問。其實，就在 5 月 23 日上午，趙紫陽已經被秘密監控而失去了自由。薑還是老的辣，鄧小平出手就把對他威脅最大的老朋友制住了。扭轉時局的可能性基本上消失了，我作好了當譚嗣同的準備。可能因為工作太忙，我夜裏經常會說夢話，一次一個朋友住在我家，我說夢話是在作報告。他很好奇，就向我提問題，結果是他提什麼問題，我就回答什麼問題。我如果被抓了，豈不是很容易洩密嗎？我想，一旦被抓，我應當先咬斷舌根。

5月23日晚上，楊曉告訴我，街上貼了一份「首都各界聯合會籌委會」的《再告愛國同胞書》，說：「目前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如果這次運動失敗，中國人民又將回到反動腐朽的封建專制時代」，「以李鵬的為首的一小撮為了他們的私利，肆意摧殘學生、迫害知識分子，妄想撲滅民主、自由的火花，斷送整個人民的希望，這是我們誓死不能答應的！」並呼籲：聲援學生，保護學生，挫敗李鵬的陰謀。

5月24日，今天已經是宣佈戒嚴的第5天，軍隊仍難於進城。上午，因肝炎在家養病的司機郭軍來找我，他說：「我跟著你，你到哪兒，我就給你開車到哪兒。」我說：「你好好在家，肝炎不能累著了。」他激動地說：「我在家也沒法養病，鄰居白天黑夜都上街擋軍隊，怕他們對學生動手。我也不放心，就和他們一起上街。我給你開車，比較安全，你不想到四周看看嗎？」我說：「我腿不方便，從醫院出來還沒有看過。」

郭軍開著車，我們在北京城裏轉了一圈。到處是民眾的海洋，到處是抗議的人群，到處是設置的路障。一路上，胳膊上帶著紅袖章的老爺爺、老奶奶，隨時會檢查車上有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北京市委下令，哪個工廠、機關不上班就處分領導人，但一到下午五點以後，人們就像潮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湧向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廣場上飄揚著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的校旗，新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的總指揮柴玲^[770]，正帶領著大約10多萬名學生進行宣誓。但靜坐的學生中，外地學生很多，北京的學生已經不多了。

在北京城邊的幾個重要路口，路障一個接一個，盤查的特別嚴格。聽永定門外的老爺爺自豪地說：「剛戒嚴時，一隊軍車從南邊開過來，20幾個老奶奶躺在地上，說你們一定要過去，就從我們身上軋過去，結果把軍人擋住了。」北邊五道口的民眾擋住了一列坦克車，與官兵們談了差不多一天，軍人們被說服了，帶頭的軍官說：「寧可處分、判刑，也不能鎮壓學生。」又開著坦克車掉頭回去了。

北京的市民實在是了不起，從戒嚴令發佈以來，他們為了保護學生，不顧自己的安危，日日夜夜地守護著北京，日日夜夜地截堵著軍人，而且社會秩序空前地好，據說連小偷都比平常少了。我在北京四周轉了整整一天，心裏真是十分感慨：北京哪裏有半點「動亂」的影子？給這麼好的學生和民眾戴一頂「動亂」的帽子，還要派兵鎮壓實在是可惡之極！難道那些脫離民眾的元老們是魔鬼轉世？，他們真的就不怕上天的報應嗎？！

[770] 柴玲(1966-)，山東日照人。就讀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總指揮，「六四」時持激進態度的學生領袖。

8-19 首都各界聯合會的抗爭

其實，據體改所的社會調查，就是在黨政部門裏，司局級以下的幹部中，80%都是同情和支持學生和民眾的；在正、副部長中，70%都是同情和支持學生和民眾的；而在5月15日到18日這幾天，幾乎各界的著名人物都出來表示態度，希望政府承認學生是愛國的、主張與學生對話、反對用強硬辦法解決問題；首先提出不贊成動用軍隊的是，人大常委會的三個軍內副委員長；離休的八百多個將軍中，五百多個反對動用軍隊鎮壓。

在加拿大訪問的萬里，5月24日發表講話說：「要堅決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同時要堅決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趙紫陽希望他提前回國，李鵬卻讓他繼續到美國訪問。5月25日，萬里倒是提前回來了，但沒有按原計劃飛回北京，飛機降落到了上海。迎接他的是丁關根、江澤民以及早就為他準備好的與5月19日李鵬講話一個調門的講話稿。萬里十分生氣，但5月27日仍不得不基本上按其調門發表了一個「書面談話」。

雖然超過人大常委會委員2/3的57名委員，贊成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但在獨裁政治的淫威下，人們「歡迎萬里回國主持人大，罷免李鵬，伸張正義」的希望還是落空了。5月25日，在包遵信、陳子明、王軍濤的籌劃下，首都各界聯合會成立，並發表了《目前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其要點如下：

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中國社會各階層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已歷時1個多月，有力地喚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和民主意識，極大地推進了整嚙中國的覺醒與進步，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乃至世界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隨著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深入，廣大學生日益成熟，參加運動和推動運動的各階層更加廣泛、更加自覺，運動的近期目標和長遠方向日趨明確。

這場運動不僅是要把李鵬一夥專制者徹底趕下台，從實質上說，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改革與保守、民主與專制、前進與倒退、光明與黑暗的歷史性決戰！

這是迄今為止歷史賦予中華民族的一次最寶貴的機會。如果運動能夠深入而持久地堅持下去，中國人民從此將真正踏上民主、自由、法制、文明的道路。事實上，人們已經呼吸到了由這次運動帶來的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氣。

並且呼籲：各界建立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共產黨員挺身而出；民主黨派繼續努力；解放軍站在人民一邊；召開人大、中共特別會議；保持清醒和理智；堅決抵制軍管；等。

5月26日到5月27日，先後由陳雲召開了中顧委常委會、彭真召開了人大常委會中7名非中共黨員的副委員長會議、李先念召開了政協主席會議，進一步打通上層的思想。

5月27日晚，鄧小平又一次召開了「八老會議」，欽定了新的政治局常委，由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組成，江澤民為總書記。這8個老人置現任的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於不顧，非法地完成了又一次政變。

同日晚，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在天安門廣場發佈了由甘陽^{【771】}起草的《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其主要內容是：

一、這次學運和民運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純粹自發的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

二、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出發點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三、對於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抱什麼態度，已經成為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分水嶺。

四、李鵬總理以及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等領導人之所以如此不得人心，原因就在於他們無視人民的心願，對這場運動採取否定、反對甚至鎮壓的錯誤態度。

五、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這場運動應有的正確態度。

六、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對立面，誰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必將受到唾棄；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順應面，誰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就會受到歡迎和支持。

七、一些政治領導人總是習慣於把民眾的民主運動看成是黨內鬥爭對反映，試圖用解決黨內鬥爭的方式解決這次運動的任何企圖都是幼稚可笑、枉費心機的。

八、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次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目標。

【771】甘陽（1952-），遼寧瀋陽人。哲學研究者，曾任《文化：世界與中國》叢書主編。

九、一味採取高壓和恐嚇的非民主、非法制手段來解決問題是不會奏效的。

十、偉大的「4·27」和平請願大遊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值此一周月之際，我們倡議將之定為「中國自由民主節」！

從這個聲明可以看出，學生、知識分子與民眾的認知和中共上層領導人的看法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一場對抗恐怕是很難避免了，苦難的中華民族啊！

5月27日，體改委秘書長洪虎到所裏傳達5月22日楊尚昆、李鵬的講話，該講話無中生有地說：三所一會「冒充《人民日報》印發『號外』」。我當即站起來說：「我抗議！楊尚昆造謠！」並唸了一首詩：「赤膊條條任去留，此身於世何所求？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當晚，在國務院工作的李鵬身邊的一個好心人告訴我：「老陳，李鵬要抓你，你一定要小心！」我悄悄地回到家裏，拿了幾件換洗的衣服。電話鈴不斷地響，我一接，是美國梁恆打來的，他說：「年輕的空軍起義了，正在轟炸元老的家。」我生氣地說：「你不要胡說八道了！我這裏有竊聽。」他急忙說：「我只是客觀地給你介紹外電的報導。」我砰地掛了電話。電話又不停地響，我接起一聽是劉青峰，她說：「怎麼老找不到你？情況怎麼樣啊？」我說：「情況不好。我轉移了。」我剛進到車裏，兩輛警車開來了，我趕忙走了。

看來，李鵬真要動手了。為了安全，我住到了朋友家。我們發表《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的當天下午，5.19會議的情況就傳出去了，何維凌告訴了鄧樸方，馬凱告訴了陳元，朱嘉明給榮毅仁寫了檢討。朋友們早和我說了，這一點都不奇怪。剛一「戒嚴」，朱嘉明、李湘魯先後都出國了。趙二軍托朋友三次給我帶話，讓我立即去廣州。我不能走，我一走豈不是表示作錯了、心虛了？體改所那麼多同甘共苦的朋友怎麼辦！我絕不能走！

顯然，一場更大的悲劇即將上演。5月28日，我在我的《大事記》裏寫道：「改革行不通嗎？一定要流血嗎？應該盡可能避免，但現在的局勢……祖父戊戌上書失敗，父親『9·18』絕食，我應如何？置個人於度外，為了共和國，為了老百姓，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吾之願也！」5月29日，我又寫道：「民眾不畏死，奈何以死懼？倘流血可喚醒民眾，得來民主自由，吾願為之。」

5月29日下午，維凌興沖沖地找到我說：「姿先生，我幹了一件大事。我想了一個辦法動員學生，比如明天晚上10點全部撤出天安門廣場，再

把廣場打掃乾淨，表示歡迎解放軍進城。而後，開一個聯歡會，由軍隊代表和學生代表講講話，造成和解的氣氛。樸方很贊成，老爺子也首肯了。」我說：「維凌，你這個辦法真能實行的話，應該給你記一大功。問題是學生能接受嗎？」維凌說：「我馬上去斡旋！」我說：「祝你成功！」

小強從美國打來電話，痛哭流涕地要回國「與大家同生共死」。我說：「你一定要回來，我們就絕交！國內多你一個人也無濟於事，不過是多犧牲一個而已。如果我們犧牲了，你們在國外還能保存一部分改革的力量，繼續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努力！」小強泣不成聲地說：「那我就聽你的。」掛上了電話。楊冠三、白南風地不斷找我，告訴我各方面的情況，當我勸他們要小心時，他們都是一臉正氣，毫無懼色，但他們都在「六四」後被抓進了秦城監獄。

8-20 我向體改委黨組作的最後一次彙報

我決定向體改委黨組作一次彙報，坦蕩蕩地表明自己的觀點。5月30日上午，我到了體改委小會議室，體改委黨組成員認真地聽取了我的意見。我談完以後，體改委黨組成員紛紛表示理解。賀光輝還握著我的手說：「希望你再多做樸方的工作，請小平同志盡可能不流血地解決問題。」

根據我當時彙報的錄音記錄稿，特將這次彙報的內容照錄如下：

最近，關於體改所的謠傳很多，希望黨組召開一次委務會或黨組擴大會，由我來說明一下體改所的活動和我本人的看法。今天黨組給我這麼一個機會，我非常感謝。因為我覺得，能開這樣一個會，說明我們黨還是盡可能的要按照憲法、按照黨章，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問題。

關於體改所等三所一會在5月19日的聲明發表以後，體改委的領導同志對我們非常關心，先後5次找我們談話，領導同志語重心長、誠懇的關心和幫助，我們都記在心裏了。因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必須對黨負責，我也必須對人民負責，我覺得，我這10年來，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為中國的現代化、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努力工作。在當前的嚴峻局勢下，我覺得有必要把幾個問題向黨組作一個彙報。我現在彙報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這次學生運動。

這次學潮之所以發生，而且愈演愈烈，我個人認為，有這麼五個原因：

一、是對耀邦的悼念。群眾一方面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光明磊落，耿直正派，撥亂反正以來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懷念他；另一方面，覺得耀邦同志受到了不公正對待，群眾有不滿。

二、對改革的進程不滿。認為改革10年了，經濟改革的很多基本問題解決不了，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基本問題沒有多少進展。

三、對工作的失誤不滿。本來，在這樣一場變革中，誰都沒有經驗，再加上新舊體制並存，存在著很多深刻的問題，並不主要是由於工作失誤帶來的。但是近一年多來，反覆講工作失誤，使人們覺得今天這個局面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無能造成的，加重了群眾的不滿。

四、對各種社會現象的不滿。知識分子地位的底下，官員的腐敗，官倒發橫財，在用人上任人唯親，社會分配的不公，等等，都是造成群眾對社會現實不滿的很重要的原因。

五、政府的態度激化了矛盾。任何一次自發的群眾運動不可能都是那麼冷靜的，由於以上四個原因，學生開始起來的時候，當然各種各樣的口號和說法都會出現。如果我們能採取一個正確的態度，比如說，肯定大家對耀邦的悼念，肯定學生對進一步要求民主、要求改革這種願望的理解，肯定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是合理的，同時給學生們指出你們的要求跟我們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很多問題的解決，不是短期內就能奏效的，希望大家不要採取過激的行動，黨和政府的領導人馬上聽取大家都意見，和大家對話，我覺得運動初期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那麼，為什麼這次學生運動會愈演愈烈？學潮發生以後，我們的領導同志缺少深入的全面的、科學的調查研究，沒有看到學生這樣一種愛國熱情，這樣一種民心可用、民氣可用，這樣一種主流；而且把一部分過激的口號和過激的行為看得過份嚴重了，以致造成了愈益尖銳的對立，據我瞭解：

第一次矛盾激化，在4月20日凌晨。學生們在新華門靜坐，本來計劃在5點鐘撤出。4:40的時候，大部分學生已經撤出，這時候武警開始把學生進行分割，而且發生了廝打，一些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學生覺得是抱著一片愛國之心，希望政府能理解，希望領導人能夠出面。結果領導人沒有出面，學生對政府感到失望，而武警對學生的廝打又引起了情緒的激化。據一些目擊者說，在發生廝打的過程中，一個小女孩在激憤之下喊了打倒共產黨，當時立即有很多學生制止她，而武警又上去抓她，很多學生保護了她。如果這些學生一開始就抱著打倒共產黨的心理，就不會去靜坐，因為靜坐就表示他對你還有希望，他還抱著希望，希望你還能解決問

題。但他失望之後，那麼年青的孩子喊出了一些過激的口號，我覺得是可以原諒的。

第二次的矛盾激化是4月22日，當那麼多的學生坐在天安門，希望領導同志接見，假如說學生提出的七點要求有不合理之處，起碼也可以出來講幾句話。如果那個時候把現在這些話說了，包括學生是愛國的，我們是理解的，我們很多看法是共同的，希望大家能回校，我們開始對話，我覺得也可以緩解，但是又沒有這樣做。而在學生撤離的時候，南開大學學生到火車站要上車的時候，又遭到武警的毒打，有些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這個時候，學生的情緒更進一步被激化。

當4月25日晚廣播了動亂的社論之後，學生更加憤怒了。這個社論沒有充分的肯定學生這些合理的要求，也沒有冷靜地指出學生運動中存在的問題，而是一下子上了綱，群眾馬上就聯想到「四五」運動時候的社論。但是，我認為學生們還是很冷靜的，在4月27日的遊行中，他們喊出了「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這成為這次遊行的主調。這個社論是把學生運動激化的第三個因素。

當5月3號趙紫陽同志講話、5月4號和亞行的講話發表以後，大部分的學校已經復課，沒有復課的只是北大和北師大兩個學校。那麼為什麼以後學生的運動又進一步激化呢？直接的原因是5月6日李鵬同志召開了北京六個院校的負責人會議，會議上講了三個不變：動亂的性質不變，一小撮壞人挑動不變，學生的非法組織不予承認。「三不變」迅速地傳遍了高校。據北大、人大的學生說，他們感到自己的愛國熱情被政府誤解了，自己沒有退路了。明明是愛國，卻被當作了壞人。每個人都面臨著後顧之憂，特別是那些說了過頭話、做了過頭事的相當一部分學生，這才發生了絕食。

絕食發生以後，各界都發表了聲明，希望政府盡快同學生對話。但是，我覺得政府在這樣一種新的情況下，仍然沒有能夠採取正確的對策，更使學生覺得把他們逼上了絕路。我覺得即使學生絕食也仍然表明了他們還是希望黨和政府肯定他們，仍然是對黨和政府抱著希望，而不是和政府截然對立。如果他們完全失望，我想就不會採取這種方式。

至於戒嚴，也可能政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戒嚴。戒嚴10天了，為什麼每天晚上二三百萬群眾忐忑不安地走上街頭？這種作法究竟是否正確？我相信歷史會作出評價。

第二，關於體改所的活動。

學生運動一開始，4月18號，李峻同志去找我，所裏的同志要求悼念胡耀邦。我表示了4點意見，回來以後在幹部會上傳達了，又向全所傳達了。第一點，支持同學們悼念胡耀邦，當時中央也是肯定大家悼念胡耀邦的，所以我們放了個氣球，「耀邦不死，改革萬歲」，一個氣球破了，「改革萬歲」沒吊上去。是不是天意，改革萬歲不了，那我就知道了。第二，我們要理解學生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願望。第三，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要直接介入學生運動。第四，就是要研究做些什麼實質性的工作。

當時之所以這樣，從我的思想裏有這麼一個根本性的考慮，我覺得學生的熱情固然可愛，但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往往用民主政治的目標取代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往往用商品經濟的目標取代商品經濟發育的過程；短期內是難以實現的。但是回過頭來說，並不能因為這個目標是遙遠的，短期內實現不了，當學生們這樣一種愛國熱情出現的時候，去給他們潑冷水，站在群眾的對立面。我作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巴黎公社發動的時候，馬克思是反對的，當巴黎公社發動起來以後馬克思是極力稱讚的，當巴黎公社失敗以後，馬克思說它是一次偉大的人民革命，但是是一場悲劇。雖然它失敗了，但決不能掩蓋它在歷史上的偉大豐碑這樣的意義。

我們之所以讓大家保持冷靜，不直接介入，研究作實質性的工作，就是企圖在學生和政府之間找到共同點，因為我個人感覺，在現代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這樣的衝突會不斷的出現，沒有妥協就沒有民主政治。一種意見佔了上風，把另一種意見打成反對派，打成敵人，只會造成專政。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就表明了這一點。實際上政府的某種退正是進，是向民主政治前進，它不僅不會丟面子，不僅不會瓦解我們這個黨，相反的會使我們這個黨學會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我們考慮到維護大局和我們所的特殊地位，我們不願給政府帶來更大的麻煩，也不願和學生發生衝突，所以迄今為止，我們一直不允許打著所裏的旗號上街。我明確宣佈，誰打著體改所的旗子上街就處分誰。

我4月底出院。在電視裏看到很多感人的鏡頭，很多孩子講了許多感人的話：「媽媽，我們沒有錯！」他們把黨和政府看成自己的媽媽，他們希望被理解。他們寧可犧牲自己，要為國家和民族的進步而奮鬥。當一個孩子的媽媽去勸解她的孩子的時候，她的孩子說，「我愛我的媽媽，但我更愛我的祖國」。難道說這樣的孩子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嗎？是在製造動亂嗎？我看到這些鏡頭的時候，流淚不止，我被深深的感動了。

首先，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覺得，我們不應該沒有一個態度，第二，所內所外的多種說法也使得我們應該表示一個態度。我們如果不表示

一個態度，所內的同志們會拋棄我們，所外的同志們也會覺得你們是一批沒有靈魂的人。所以在十九號我到了所裏，經過反覆的討論，我們幾個所的所長在中午吃飯以後共同草擬了一個聲明，會議是我主持的。

我們的聲明首先分析了學生運動的性質，肯定了這次學運。第二，我們對黨和政府遲遲不決策，造成事態的擴大表示了不滿。第三，我們對於解放以來從未出現過的黨和政府與民眾這樣的尖銳對立，黨和政府這樣的脫離群眾表示了強烈的不滿。第四，我們耽心事態向惡化方面發展，耽心出現軍管流血，造成更嚴重的後果，這都是我們對形勢的分析。所以第五點，我們發表了幾條呼籲。一個我們呼籲把分歧公諸於眾，讓人民解決。憲法規定，一切權利屬於人民，十三大報告也說重大事情要讓人民知道。第二條我們希望開人大最高權力機構會議，調查這個事件。第三我們希望召開黨的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第四我們號召大家都保持理智，都不要採取過激的行動。第五我們號召維持秩序，並且做好天安門的後勤工作，因為當時天安門出現斷水，有的當時還傳達了不許派救護車，不許用高級營養品等等，怎麼能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呢？我們呼籲大家來做好這項工作。第六條我們呼籲停止絕食。最後我們講，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擋現代化潮流，對政府是如此，對極少數極少數人也是如此。（附：見聲明全文）

我覺得我們這個聲明，光明正大，義正詞嚴，符合憲法，符合黨章，符合我們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黨員的權利和義務，沒有任何違法之處。有人說，你們怎麼知道有分歧呀，正像李鵬同志講的，任何一個有政治經驗的人都會發現，在黨內、政府內有不同意見，這麼長長的拖而不決，顯然是有不同意見，這是不奇怪的。而且我們的六點呼籲完全是要求在民主的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有人說，你們是不是得到了什麼內部消息，我們得到的是我們的社調系統，我們的同志從多方面反映來的客觀情況，我們自己作出的判斷。至今我仍然認為我們這個聲明是正確的，至於裏面是否有個別措辭不當，它是否在客觀上起了不好的作用，我想歷史會作出評價。有人問，哪些人參加起草了這個東西？我覺得，如果不違背憲法和黨章，任何人沒有權利這樣追問，這是我們作為一個黨員的起碼的權利，這種追問本身就是違法的，除非我們這樣做違法了，那樣可以由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傳審，責任當然由我個人負責。我願意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講這些話。

至於說什麼我們盜用人民日報號外的名義發表什麼內部的情況，我們不知道，沒有這事。還有人說，你們還有另外的聲明，我們沒有，這是盜

用，我們就發表了這一個聲明。如果說還有其他的人有什麼問題，我認為，是他個人的問題。某些領導如此不瞭解民情，如此不能反映民意，令人驚訝？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有了不同意見就要追查政治謠言，就要清查；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是軟弱無力的表現。所以我們永遠要記住，決不能和人民對立，這是一個原則，一個真理。

我個人還有一點感覺，我也想表達一下，我覺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動亂的那篇社論，竟然和「四五」那篇社論如此相似，目前，各機關的表態竟然也和「四五」運動以後各個省、各個機關的表態那麼相似，不同的是這一次更多的民眾如此一致地表達了不理解，不滿意，我覺得我們黨如果要能夠繼續領導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必須和民眾同心同德。我記得中學的時候我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中曾經講到，任何個人、任何領袖、任何政黨，如果歪曲事實，背離人民，早晚是要被歷史所拋棄的。我作為一個黨員，從我入黨的那一天就不想當什麼官，我也不想通過入黨給我撈到什麼好處。我今天也只想談真話，我希望我們黨內的同志都能夠冷靜地坐下來調查事實，認清真相，作出正確的抉擇，否則，歷史將會對我們這個黨做出令人非常難堪的結論。

當我在醫院聽到4月25號晚上廣播社論以後，我兩夜沒有睡著，我流淚了。我深深奇怪的是，為什麼離1976年過去14年了，我們這個社論的水平竟然還和1976年一樣？我認為中國從此要進入一個動亂的多事之秋了。我當時和很多同志講，這個話我5月3號也和鄧樸方講了。我說，這一次如果處理不當，那麼黨和政府最大的損失還不在於失去了這批大學生，而在於失去了一大批對共產黨還抱有希望，希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改造中國，使中國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改造黨本身，使黨能夠領導現代化這樣一批為黨和政府服務的知識分子，我認為出現這種局面是相當嚴峻的。

第三，關於我的活動。

我4月1號腿摔傷，4月2日住院，4月20日到胡耀邦家去進行了一次悼念。5月3號，我和李峻、白南風，我們3個到鄧樸方那兒去談了5個小時，為什麼？我們怕發生流血，我們希望小平同志出來講話，樸方問我，談什麼呢？我說，只要講幾句話就夠了，娃娃們是愛國的，希望中國的事情辦的更好一點；這是應該肯定的，年青人嘛，說點過激的話，做點過激的事，沒有什麼，不要去追究，學生們就平息了，我認為這是上策，下策就是對抗流血，要盡量避免，如果上策做不到，那麼維持秩序，不發生對抗不發生流血，這是中策。本月22日上午，我又給樸方打了個

電話。我說：「我最後一次說，我求你轉告小平同志，救救我們的共和國，救救我們的老百姓。小平同志出來講幾句話，事件就緩解多了。」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我不能違背我的良心，做我不願做的事，說我不願說的話。

陳一諮

1989年5月30日

我之所以把這個《向體改委黨組作的彙報》的錄音記錄稿，按當時的彙報內容全部抄錄在這裏，是為了留下真實，給後人提供研究這一段歷史的素材。

8-21 我給體改所骨幹的留言：《論實事求是》

我從體改委小會議室出來，剛坐上車就發現有兩輛警車尾隨，這已經是第三次了。幸虧郭軍車技高超，甩掉了警車。朋友告訴我，鮑彤失蹤了。我趕快打聽，據鮑彤的家人說，5月28日上午，讓鮑彤去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此後，人就沒有了消息。5月31日凌晨，又聽說，何維凌被公安部抓走了。何維凌怎麼也會被抓呢？他不是正在斡旋學生退出廣場的事情嗎？很明顯，一些人不希望看到局勢緩和。

從學潮開始發生，李錫銘和陳希同就抱著敵視態度，而且他們重用來主管宣傳的徐惟誠，又是「四人幫」寫作班子裏的紅人，每天在《北京日報》上都製造很多謠言，唯恐天下不亂，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普遍反感。特別是戒嚴的前一天，陳希同下令，在天安門廣場斷水、斷電，企圖造成混亂，讓人們認為他們是一夥沒有人性的冷血動物。而每當學生們商量著要退出天安門廣場時，就有人添油加醋地擴大事態，刺激學生們的激進情緒。

按說何維凌在天安門廣場斡旋學生退出，是拿了鄧家「上方寶劍」的，抓他的人不會不知道。可是何維凌還是被抓了，這說明有人是鐵了心要製造事端，不把矛盾激化，怎麼找到鎮壓的藉口呢？王丹已經宣佈：「5月30日，我們將舉行大遊行，所有的學生將返回學校。」說明學生已經接受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建議，決定退出天安門廣場。雖然學生中意見不一，但這總是一個好的矛盾緩解的苗頭。

5月29日夜裏，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將一座「民主之神」石膏雕像，分成幾塊運到了天安門廣場進行組裝。5月30日上午，「民主之神」組裝

完成，學生發表了《民主之神宣言》：「民主之神，70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為了你，我們難道還要等70年嗎？民主之神，一切專制壓迫下人民的渴望。」「民主之神，你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你是1989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用以激勵大家。

5月31日晚上，楊冠三告訴我說，現在天安門廣場上已經失控，南京大學的學生李錄^{【772】}特別激進，堅持不退出廣場，得到了不少外地學生的支持；雖然北京的學生大多退出了廣場，但難以左右局勢；還有人提出了「千人接力絕食」計劃，等等。無意間，我看到了電視劇裏上演的連續劇《袁崇煥》，不由想起了趙紫陽的悲劇，隨口吟道：「自古臣錯君無錯，功高震主焉能全？不脫六道輪迴苦，豈只前朝岳于袁^{【773】}！」

考慮到形勢的嚴重性，6月1日上午，我召集了體改所的80多個骨幹，做了一個報告《論實事求是》，算是給大家的最後留言。我說：「當前局勢的嚴峻，大家都看到了，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可能很快就會發生了。大家為避免流血，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很多事情不是我們能左右的。也許軍隊很快就會進城，一場悲劇幾乎是難以避免了。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怎麼樣才能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呢？」

看著大家痛苦而無奈的表情，我說：「我最後給大家做一個報告，題目是《論實事求是》。為什麼要講『實事求是』呢？第一，什麼時候我們講實事求是，什麼時候我們就能取得成功；什麼時候我們不講實事求是，什麼時候我們就會遭到失敗。從建國以來，凡是違背實事求是這個原則的時候，我們都受到了懲罰；而凡是遵從實事求是這個原則的時候，我們就會取得成功、取得進步。」

「那麼，目前，高層領導人和廣大民眾對這次學潮的看法差距如此之大，還怎麼實事求是呢？第二，當大的環境不能實事求是的時候，我們怎麼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1967年，聶元梓在北大抓『反革命』，中文系把一個私下批評了江青、林彪的同學馮隆被打成了『反革命』。當時讓我揭發，我如果揭發了，馮隆就會被打成『反革命』。可他明明不是反革命，我該怎麼辦？我只能忍受住各種酷刑，一口咬定沒有這回事。似乎這麼做沒有實事求是，其實沒有把不是反革命的同學打成反革命才是實事求是！」

【772】李錄（1966-），河北唐山人。時為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六四」時持激進態度的學生領袖。

【773】「岳于袁」指岳飛、于謙、袁崇煥三位愛國將領。

「第三，是不是實事求是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如果大的環境不能實事求是的時候，從來都是『坦白從嚴』，會害人害己，『抗拒從寬』，因查無實據。你若趨時而上，則不僅會傷害了自己的同事和朋友，而且最終傷害的就是你自己。因為你把不該揭發的問題揭發了出去，既不是實事求是的看問題，又會讓別人受到不必要的麻煩，還使人對你的人品產生了懷疑。」當然，這個「打預防針」式的報告，大家都心領神會地接受了。

6月2日下午，劉曉波^[774]、周舵^[775]、侯德健^[776]、高新^[777]，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宣佈「有限絕食」開始。他們發表了講話和《六二絕食宣言》，說：「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之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

並且提出了：

1. 此次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運動，一直採取合法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來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李鵬政府，居然以幾十萬軍隊來壓制手無寸鐵的大學生與民眾。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制度。

2.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以致近代，敵人意識成了中國人的遺傳。1949年以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

3. 此次學運，獲得了空前的、全社會各階層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軍管的實施，已把這次學生運動轉變為全民的民主運動。但無法否認的是，很多人對學生的支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和對政府的不滿，而缺乏一種具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意識。

[774] 劉曉波（1955-），吉林長春人。時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因長期堅持非暴力爭取人權，2008年發起《零八憲章》，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被中共多次判刑。

[775] 周舵（1947-），湖南人。時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776] 侯德健（1956-），台灣知名作曲家。

[777] 高新，時為北京師範大學《師大週報》主編。

4. 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5. 在這次運動中，政府和學生都有失誤。政府的失誤，主要是在舊的階級鬥爭式政治思維支配下，站在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致使衝突不斷加劇；學生的主要失誤主要是內部組織的混亂，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

他們的絕食雖然又一次引起了人們的震動，但鄧小平等老人同時作出了「迅速制止動亂，恢復首都秩序」並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的決定。軍隊在集結多日之後，最後行動的命令終於下達了。

6月3日凌晨，沉睡的北京市民聽到了這樣的廣播：「起來吧！軍隊進城了！現在事態萬分緊急，請大家立即行動起來！」一批批學生和市民奔赴北京的各個路口，圍堵軍人和軍車。顯然，他們中間瀰漫著一股強烈的對抗情緒。

8-22 6月4日凌晨，我發表了《我的辭職和退黨聲明》

6月3日下午，在楊尚昆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李鵬說：「從昨天起，北京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今晚，我們要採取斷然措施，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當晚6:30，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了《緊急通告》，要求「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這個《緊急通告》的連續播出給了人們提醒，軍隊即將進城。但人們仍然不顧生死地從四面八方湧上街頭。夜裏11點，西南木樨地方向傳來了槍聲，我心裏一驚：槍響了，一場流血慘案要發生了！最不願意聽到的聲音傳來了，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槍聲時斷時續，6月4日凌晨3點多，猛得響了一陣子，似乎又沉寂了。快4點時，張少傑滿身血跡、上氣不接下氣地找到了我說：「老陳啊，我差一點就沒命了。六部口已經血流成河了！」張少傑說：「我正坐在電報大樓的台階上，看許多民眾攔截軍人。突然，大樓的門打開了，裏面衝出來一隊軍人，拿著衝鋒鎗就向人群掃射，當時一大片人倒下了。我嚇得從台階上滾了下來，只見六部口的街上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下水道裏血嘩嘩地在流個不停。我趕緊往回跑，剛到家就來找你了。這回軍人一開殺戒，真不知道會死多少人了！」軍人如此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是可忍孰

不可忍？！所裏的年輕人不斷地從木樨地、西單、六部口、天安門跑回來，痛哭失聲地描述了軍隊殺人的情景。

我禁不住淚流滿面，先將我《向體改委黨組的彙報》印了出來。接著，凌晨5點，我悲憤地寫了《我的辭職和退黨聲明》，我在聲明中寫了5條：

（一）這次以學生為先鋒、各階層廣泛參加的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二）以李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發動的這場清算改革的軍事政變，是逆歷史潮流的、是不得人心的，這種倒行逆施已經寫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不可違背的潮流。但經濟改革不解決產權問題，政治改革不解決民權問題，中國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四）中國共產黨公開與人民為敵，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民眾，已墮落為法西斯式的政黨；

（五）我鄭重宣佈：自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黨，並辭去黨內外一切職務。

我將這個聲明複製了若干，貼在了幾個顯要的地方。這時，還不到凌晨6點，國務院的朋友給我帶話說：「李鵬認為你是『趙紫陽黑線和學生運動黑手之間的樞紐』，要『不惜一切手段將陳一諮緝拿歸案』，你可千萬要小心啊。」我覺得，國家讓李鵬這類人搞成了這般模樣，自己的生死已不足掛齒。但朋友們流著淚勸我說：「李鵬若讓人把你綁架到新華門，一陣亂槍打死，說你是個暴徒，就太不值得了！」想想也對，怎麼也不能白白送死，我讓郭軍開車把我藏在了朋友家。仍不斷能聽到時斷時續的槍聲，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到底怎麼樣了？這是我當時最關心的問題。

上午8點多，幾個朋友告訴了我天安門廣場凌晨發生的事情：凌晨1:30，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又一次發出了《緊急通告》，稱：「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學生與市民紛紛開始撤離。

到凌晨3點時，幾十萬人的天安門廣場，只有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3,000多學生了。這時，劉曉波、周舵、侯德健、高新四人商議，決定說服學生和平撤出天安門廣場。他們在廣播中說：「現在，整個北京已經開始流血。血已經流得夠多了，足以喚醒人民。我們多保留一個人，中國

的民主事業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呼籲，各校同學馬上組織撤離。撤離時，一定要堅持非暴力的原則。」

同時，他們向解放軍官兵喊話說：「你們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嗎？這裏都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我們強烈要求，你們馬上停止屠殺群眾，停止自相殘殺。我們正動員學生們和平撤離，請你們配合，派代表來談判。」戒嚴部隊同意學生從廣場的南邊撤離。凌晨四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了，學生們唱起了悲壯的《國際歌》，開始撤離。過了半小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一下子全亮了，一排排端著槍的士兵和坦克向學生靠近。

廣場北端的「民主之神」轟然地被裝甲車碾倒了。接著，坦克和裝甲車繼續往南，一路撞倒、碾碎了廣場上的帳篷等物，學生們在坦克和裝甲車的縫隙間撤離，他們仍然唱著《國際歌》，並不時喊著「血腥鎮壓」、「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等口號。凌晨五點多，戒嚴部隊完成了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幸虧沒有大面積死人。那麼，這次所謂「平息反革命暴亂」，究竟死了多少人呢？

我先後給復興醫院、郵電醫院、協和醫院、北醫三院打電話詢問，這幾個醫院的屍首都在 30 具到 45 具之間。據幾個朋友當天上午的統計，被打死的學生和民眾約在 1,500 人到 3,000 人之間。但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中國政府仍是諱莫如深，民間也沒有一個被大家接受的權威數據。只是中國政府總是厚顏無恥地宣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打死一個人」，據我所知，體改所的研究人員黃永山就親眼看到人民大會堂小柏樹牆下打死了人。

朋友們都處於激憤之中。大家預感到會流血，但誰也沒想到軍隊會用衝鋒鎗、機槍、坦克、裝甲車，對付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一個在木樨地的朋友介紹了那裏的情況。他說：6 月 3 日傍晚，木樨地聚集了上萬民眾，他們中有學生、有幹部、有各行各業的群眾。他們都是聽說部隊即將進城的消息以後自發來的，他們沒有任何人組織，也決不是什麼「暴徒」，他們只是憑著天性和良知不希望看到流血衝突。

木樨地的民眾實在是可歌可泣。民眾推倒了汽車和無軌電車橫著躺倒在木樨地橋上，又將鋪在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壘成牆，用以和軍隊對抗。他們組成了人牆阻擋軍隊的前進，軍隊多次鳴槍示警，但他們毫無懼怕之意，對持從 9:30 到 10:30。可能是為了按時到達目的地，軍隊在人群面前開了槍。人群中不斷地高喊著「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等口號，軍隊開始用衝鋒鎗掃射，約有上百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老百姓這麼不顧生死究竟是為了什麼？他們不希望看到愛國的學生倒在軍人的槍口之下，他們更不希望看到人民的子弟兵屠殺自己的孩子。但

是，他們的血肉之軀怎麼能抵擋得住現代化的武器呢？他們的努力失敗了，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為之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很多老將軍目睹了這個慘象，哭著說：「日本人在南京搞了大屠殺，共產黨在北京搞了大屠殺呀！」決定「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鄧小平、李鵬，從此在人們的心裏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罪人」。是的，毛澤東、「四人幫」不敢幹的事情，鄧小平卻冒天下之大不韙幹了。鄧小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寫下了可恥的一頁，他從一個改革的功臣變成了歷史的罪人。

8-23 萬里帶來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6月4日，雖然是星期天，但北京各高校都浸沉在悲憤之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哀樂。整個北京城也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燃燒的軍車堵塞在各個主要路口，橫七豎八的隔離墩歪歪扭扭地躺在路上。北京的主要媒體，像《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都採取了對抗的態度。當晚，「新聞聯播」節目的著名主持人薛飛^[778]、杜憲^[779]眼睛紅腫、身著黑衣出鏡，以低沉的語調進行播音，以表達對死難者的哀悼。

最令人難忘的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向全世界播出了：「請記住 1989年6月3日。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悲慘的事件。幾千名民眾，其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裝的士兵們在向市中心推進的過程中殺害。士兵們駕駛著裝甲車，用機關鎗來對付千萬名試圖阻擋他們向前推進的本地市民和學生們。當裝甲車強行通過之後，士兵們仍然肆無忌憚地向街上的民眾掃射。請與我們一起抗議這個嚴重違反人權、殘暴鎮壓人民的行徑。」

6月5日凌晨，北京各處還不時響起零星的槍聲。中共元老萬里派人給我送來一封急信，寫了兩行字，一行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行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決定，先暫時到南方避避風頭再說。這就有了我在本書一開頭《楔子》裏所述，1989年6月5日到1989年7月5日，歷時一個月、途經12省市、3次險些被抓的逃亡過程。

貨船在海上慢悠悠地往東航行，我仍然半睡半醒地躺在船的底艙。貨船走的太慢了，可我的思緒卻不停地轉動著：離開自己的家園和親人實在是出於無奈，李鵬派400個特工抓我也未免太大動干戈了；如果不是隨時

[778] 薛飛（1959-），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的著名主持人，「六四」後被免職。

[779] 杜憲（1954-），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的著名主持人，「六四」後被免職。

面臨著死亡的威脅，我倒是願意和他辯論到底；但共產黨這種專制政權會給你講話的機會嗎？隨意的構人入罪還不是家常便飯；我出走了會不會給母親和丫丫帶來麻煩呢？此生總是連累家人跟著擔驚受怕真是罪過；體改所恐怕躲不過這一劫了，那麼多優秀的青年改革者會怎麼樣呢……

想著想著，我又睡著了。再一次醒來，船長笑咪咪地和我：「你真是累壞了。現在安全了，可以到上邊透透風了。」我從船艙登上了甲板，天已經大黑了。原來是夜裏十二點了，陣陣海風吹來很是舒暢。船長打來一盆溫水，讓我擦洗了一下。接著，搬來一個小方桌，放上了四個菜和幾瓶啤酒。貨船上還有3個工人，我們5個人連吃帶喝，不消一刻功夫，便風捲殘雲一般將東西都吃光喝淨了。

小船停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海浪拍打的船身不停地搖蕩。不知道小船會把我載向何方。我疑惑地問船長：「我們的船怎麼開得這麼慢？」船長說：「哈，老石，這你就知道了。我們的船每小時最快只能開30海哩，但澳門炮台的快艇能開到六十到八十海哩。所以，不能硬闖。如果引起了守軍的懷疑，他們的快艇開過來，我們就沒跑了！現在把船停下來，到早晨九點他們換崗時，慢悠悠地開過去，就萬無一失了。」

看來，這個船長很不簡單，對一路的情況瞭如指掌。船長突然問我：「你究竟是誰？」我說：「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叫陳一諮！」船長興奮地說：「你就是那個李鵬要抓的陳一諮嗎？」我說：「正是！」船長說：「我們早就聽說了，要不是你帶頭支持包產到戶，我們現在還吃不飽飯哪。能護送你去香港，是我的榮耀！」我問：「你是哪兒的人？」船長說：「我家在福建，包了隊裏這條船跑運輸，混口飯吃。」

船長又拿出兩瓶啤酒，說：「咱倆乾了！」我們咕嘟咕嘟一口氣乾了這兩瓶酒。船長說：「我們農民過得不像個人啊，這幾年才過得好了一點。李鵬這個狗娘養的，竟敢用軍隊鎮壓學生，大家都恨不得宰了他！」我問他：「你把我偷運到香港，就不怕出事嗎？」船長說：「怕甚麼！我們那兒公安可黑了。只要塞給他們三、五百塊錢，甚麼事就都擺平了！」說著說著，他翻開了衣領，衣領內側赫然用紅絲線繡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八個字。船長說：「三民主義比共產主義強多了！我們那兒老百姓都喜歡三民主義！」

我環顧四周，天上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太陽在地球的另一方。依稀可見的，只有天邊飄忽明滅的幾點燈光。人在大海上真是太渺小了，茫茫的蒼穹不知會把我這個苦命的尋路人送到哪裏？我想，共產黨建立的制度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既得利益者總是極少數，這種制度下的大多數人都

是有良知的，否則，何以有那麼多的人支持這次民主運動？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孤立那些獨裁者，爭取大多數民眾。還有，我們必須打破共產黨長期毒化人們的「階級鬥爭」理論，無端地把人們劃分成「左中右」，造成中國人族群分裂的局面。

天亮了。船長仍讓我回到了船的底艙。八點多，貨船起航了。果然，到9點時，北邊澳門炮台的炮口都看得清清楚楚。貨船不緊不慢地開了過去，船長下來和我說：「過了澳門炮台就安全了，你再耐心地在船艙裏呆兩個小時，我把船開得離岸邊近一點。你現在還可以睡一覺。」我哪裏還能睡得著呢。張目四望，到處都是一艘艘的貨船，遠處的一棟棟樓房和奔跑的汽車也進入了眼簾。船長又請我吃了一頓午餐。船長告訴我，他要上岸去聯絡。

3點時，船長搖著一隻小艇上岸去了。5點，船長回來了。船長說：「我把你送到岸邊。有一輛銀灰色的小轎車會停下來。你拉開車門，坐進去。會有人把你帶到安全的地方。」我登上了小艇，船長把我搖到了岸邊。我無以表示對船長的感謝之情，就把藏在鞋底的、僅有的三百美元送給了他。後來，我才知道，香港一個商人為了救我，主動捐了三十萬港幣，而且至今不願透露姓名。

我剛登上岸，一輛銀灰色的小轎車就停在了我的面前。我打開車門坐下，車就開動了。小車在香港島上拐來拐去，把我帶到了一個賓館。賓館的一套客房裏，中間坐著一個人，兩旁各站著一個人。中間那個人站起來握著我的手說：「老陳，你好！我是岑建勳^{【780】}。這次救你，可真不容易。先是找不到你，而後專門派船把你接來。你先洗個澡吧！」我的身上沾滿了油泥，洗了三遍才洗乾淨。衣服也髒得沒法再穿，只能扔了。

岑建勳派人給我拿來了一套內衣和一套外裝。岑建勳詢問了我出逃的經過，而後指著身旁的兩個人說：「就是他們組織人救你的！」我拱手一揖道：「救命之恩，無以為報！」他們倆人也拱手道：「義之所至，理當效勞！」我問：「你們冒這麼大風險救人，要是出了事怎麼辦？」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那我們養他全家！」我又問：「要是出賣了呢？」他們毫不猶豫地說：「那就殺他全家！」我心想，好傢伙，我這回碰上「黑道」了。

岑建勳請我去吃了海鮮。吃飯間，說起北京「六四屠城」，大家都唏噓不已。岑建勳又說起許家屯都收到了李鵬的手令，要「不惜一切手段將陳一諮緝拿歸案」。我笑著說：「可惜馬克思不收我這個叛徒，閻王爺也不收我這個無罪之人，佛祖和上帝又都保護我，才讓我從層層密網中逃出了

【780】岑建勳（1952-），廣東恩平人。香港著名電影導演、社會活動家。

生天！還要我和這幫魔鬼周旋。」他們稱讚地說：「我們救了很多，只有你坦然自若，毫不懼怕，令人敬佩！」

岑建勳年輕時就是一個愛國青年。70年代參加過保釣運動，後來到英國讀書、工作。80年代回到香港，創辦了德寶公司，從事演藝業，成為著名的藝人。北京發生民主運動以後，他認為自己雖然不懂政治，但國家要進步，就必須有更多的人支持民主。他說，當政府用機槍和坦克鎮壓了民主運動，還在全國搞起了白色恐怖，更引起了大家的義憤。在這種情況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伸出援手，使可能遭到厄運的朋友脫險。他們救助一批人也是為了給國家保存人才。

岑建勳和我商量著說：「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鮑恩明天中午要請你吃飯，他可能會請你去美國，你有甚麼考慮？」我說：「離開自己的國家，我實在是情非得已。下一步怎麼辦，我還沒有考慮。」岑建勳說：「嚴家其和吾爾開希都想去美國，可是美國不接受，他們現在都去了法國。我建議你也去法國，這樣大家彼此會有個照應，你覺得怎麼樣？」我說：「我對國外情況知之甚少。我就聽你的，也去法國。」

8-24 北京「六四屠城」震驚全球

香港各種報刊的重要版面上，刊登的都是各種對北京「六四屠城」的報導以及血淋淋的照片，人們看到後都充滿了悲傷和憤怒。我幾乎一夜無眠，看了各種報導：從6月4日上午起，全國的60多個城市發生了示威抗議。成千上萬的學生和民眾胸佩白花，抬著花圈，打著標語，到市中心發表演說，散發傳單，開追悼會。沿途的各個地方都貼滿了「六四慘案，駭人聽聞」、「反對暴力，反對鎮壓」、「李鵬是劊子手」、「打倒鄧李楊」等口號。許多城市還阻斷了交通，幾條鐵路幹線都有人臥軌，致使京廣、津浦、隴海等線陷於癱瘓。

幾乎各種報刊上都登出了「王維林^[781]隻身擋坦克」的照片、人們搶救混身都是血跡的受難者的各種鏡頭，以及民眾憤怒的譴責。有一則消息報導說，鄧小平內定江澤民為總書記以後，和李鵬、姚依林的談話中說：「不要不服氣。現在，你們和我在國內、國際的形象都不好。」看來，鄧小平還知道自己幹了這件連毛澤東都不敢幹的、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殺人勾當，是不會得人心的。北京的「六四屠城」迅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781] 王維林，「六四」時在天安門廣場以身體阻擋坦克車隊，被人們認為是一個標誌性的勇敢象徵。

6月4日中午，在美國的3,000多名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和旅美華僑，高呼著「死難同胞永垂不朽」、「打倒獨裁」、「打到共產黨」等口號，到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前集會抗議。80多歲的任之恭^{【782】}教授激動地說：「中國政府用殘酷的方式殺害同胞和人民，是不能得到人民擁護的。黨和政府很野蠻，在國際上的形象已經降得不能再低了。」美國的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費城、芝加哥、休斯頓等地都舉行了類似的示威抗議活動。

英國各地的華僑和留學生2,500多人遊行到中國領館進行抗議。英國社會自由民主黨領袖發表演講「要求英國和其他國家盡一切努力，使民主、自由、和平不被蹂躪」。波蘭團結工會的駐英代表說：「中國學生不但在為中國，而且在為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而戰鬥。」法國則有六百多名我留法學生、學者在中國駐法大使館前示威抗議，要求「嚴懲殺人兇手」、「還我愛國同胞」、「堅決反對屠殺」。

從6月4日上午開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瑞士、瑞典、墨西哥等地都舉行了規模不小的遊行示威活動。其中，香港有200多萬市民，身穿深色或白色衣服，在跑馬場舉行了「黑色大靜坐」，而後參加了環島大遊行。人們頭戴黑紗或手持小黑旗，橫幅或紙牌上寫著「痛心疾首」、「反對暴力」、「中國人為何殘殺中國人」。剛擔任了「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的香港立法局議員司徒華^{【783】}在演講中因情緒激動而暈倒。

與此同時，世界各大國政府紛紛對中國政府表示強烈的譴責和抗議：6月3日，美國總統布什說：「中國政府顯然已經決定對以和平方式要求民主的中國公民使用武力。我對中國決定對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以及隨後造成的人身傷亡深表遺憾。」基辛格則說，鄧小平如果從人民大會堂看一下上百萬的示威者，就應該想起文化革命時人們在那裏反對「四人幫」和支持他的情形。鄧小平是主張經濟改革的，如果不搞政治改革，對抗可能會長期存在。鄧小平如果從改革倒退，整個世界的形勢都會發生變化。

6月4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聲明，對在北京發生的「不加區別的槍殺手無寸鐵的人民深為震驚」，她並且支持香港人民面對「最近一系列悲慘事件所採取的堅定立場」，這一事件「還提醒人們，儘管東西方緊

【782】任之恭（1906-1995），山西沁源人。著名物理學家，曾任美國華人各界聯合會首任主席。象徵

【783】司徒華（1931-2011），廣東開平人。曾任香港立法局議員，「六四」後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織「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並任主席，為香港民主派代表。

張關係得到了一些緩和，不同社會之間依然存在著非常大的鴻溝」。英國工黨領袖說「北京的槍殺事件是對人類的犯罪」。英國自由民主黨領袖則說「中國正處於恐怖悲劇的邊緣，我們應該站出來講話，以避免悲劇的發生。」

法國總統密特朗發表講話對北京發生的流血事件深感震驚，他說：「一個政權為了維持下去，不惜向爭取自由的青年開槍，這個政權就沒有前途。」法國前總統德斯坦說：「天安門廣場的『天安』就是天上的和平，在這個和平的廣場上，昨晚留下了幾百個或者幾千個年輕人的屍體，我對他們遭到殺害十分激動。富有像徵意義的是在同一天，一方面是北京的鎮壓，另一方面是波蘭的選舉，都以不同方式標誌著共產主義的終結。」

西德總理科爾說：「北京發生的事件令我非常震驚，我對爭取更多自由和人權的中國學生表示由衷的同情。」西德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對中國內部鬥爭的激化表示巨大的憂慮，並對武力的使用已導致生命的犧牲感到深切的遺憾。」同時，「呼籲中國領導人不要離開和平與政治解決衝突的道路，並恢復受到所有人歡迎的改革與開發的道路。」西德社會民主黨則表示「我們對中國的改革受挫以及軍隊行動所造成的大量犧牲表示遺憾。」

意大利政府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對學生使用暴力，並呼籲同學生進行對話」。上議院議長聲明說：「我以整個參議院及參議院中所有政治力量的名義對中國學生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特別是他們遭到的不分青紅皂白的鎮壓和暴力令人毛骨悚然。」自由黨書記說：「西方民主國家不能只是表示憤慨和對中國人民表示支持，面對如此野蠻的行為，政府應該根據事件的嚴重程度採取特殊措施。」

瑞典首相卡爾松發表講話，「譴責北京使用軍事暴力對付示威者。對於這種令人震驚的使用軍事暴力的做法，必須給毫不猶豫地予以譴責。如果中國現在要以朝著更加封閉的社會發展取代其積極的變化，那將是極其可悲的。天安門廣場表達出的意見受到了赤裸裸的暴力對待。要求和平改革的願望被極殘酷地鎮壓了，這種殘酷性可與大屠殺相提並論。但我們仍然呼籲北京的當權者不要繼續使用武力。」

加拿大政府發表聲明指出，對「中國軍隊對主張民主的抗議者的鎮壓感到震驚，並敦促北京停止愚蠢的屠殺。」外交部長克拉克說，「中國政府不分青紅皂白和野蠻地使用武力對付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我們對這種愚蠢的暴力行為和因此而造成的死亡表示強烈震驚。我們要求中國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停止它的軍隊的這種野蠻的屠殺。」

而法國共產黨總書記馬歇則對「來自北京的消息感到震驚和憤怒」，他還在發表的公報中說「軍隊干預，發生傷亡，這是極其令人遺憾的。世界和中國本身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經驗證明，不可能通過武力解決問題：可以制止提出問題，但同時也使這些問題惡化。」

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奧凱托對「軍隊瘋狂屠殺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和示威遊行者的罪惡行徑表示強烈譴責，並對這場大屠殺中的死難者表示深切哀悼」，他在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中說「中國正在發生的大屠殺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份，我們與中國那些必須對其犯下罪行負責的人之間毫無共同之處。我們負有一種建立在採用非暴力原則基礎之上的義務，在任何地方它都要求充分地尊重人權、民權和自由。」

接連的幾天，整個中國籠罩在一片混亂和恐怖之中，每天都有各種形式的抗議發生，每天都有各種暴力事件出現，示威遊行遍及 180 多個城市。鄧小平則繼續採取強硬的態度。6月9日，他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他又說：「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將這次人們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

但北京「六四屠城」的發生，成為當時世界上人們最關心的大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在公開譴責的同時，紛紛宣佈對中國實施制裁。看了各種報導，心裏實在是非常難受，中國的改革不知會推遲多少年了。

8-25「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化妝離開香港

從7月5日晚上6點貨船離開海口，到7月7日6點登上香港，我在海上渡過了48個小時。早晨9點，岑建勳叫我去拜會了「六哥」。六哥是這次救助因北京「六四屠城」而逃亡到香港的各種人士的前線總指揮，他的名字叫陳達鈺^{【784】}。聽岑建勳說：「六四屠城」一發生，六哥悲憤過度，心力衰竭住進了醫院。兩天後，他自行出院，開始籌劃怎麼幫助那些落難的愛國人士。

我們到了九龍旺角通菜街的義德洋行，六哥平日就在這裏辦公。六哥的雙胞胎弟弟七哥陳達鈺^{【785】}也在這裏，就是親身前往海口將我交給船長的那個人。他們兄弟二人原籍江西，文革中實在熬不住批鬥，游水逃到

【784】陳達鈺（1944-），江西人。排行第六，人們稱其六哥。1972年，因不堪忍受大陸文革批鬥，遂偷渡到香港，後經商創辦義德洋行。

【785】陳達鈺（1944-），江西人。為陳達鈺同胞弟弟，排行第七，人們稱其七哥。與兄一起經商。

香港謀生。經過 10 年的奮鬥，兄弟二人於 1980 年帶著在阿爾及利亞賺到的近 200 萬美元回到香港。他們先後投資金融、股票、地產、酒店和夜總會，過起了舒適的日子。

兄弟二人配合默契，七哥經營業務，六哥則廣交朋友。他們雖都貌不驚人，但其扶困救危的俠肝義膽，卻深得香港各界人士的好評。六哥和我說：「我別無所求，只是一顆愛國之心。俗話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救人總比殺人好。我是個小人物，但我不忍心看到那麼多愛國人士遭無端殺害。」陳達鈺、陳達鉗兩兄弟不顧個人安危，先後組織救助了 100 多人，實在是譜寫了當代中華俠義史的新篇章。

中午 12 點，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鮑恩請我吃飯。鮑恩說：「陳教授，首先，祝賀你脫離了危險！其次，我代表美國政府歡迎你到美國。美國政府會在 3 年內，每年給你提供 5 萬美元的生活費，並且給你提供工作和住宿用房，配備一名秘書。」說實話，我那時對到國外以後怎麼辦，並沒有甚麼打算。心想，別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要利用我吧？就按岑建勳的意見說：「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的朋友都去了法國，我也準備去法國。」

下午兩點，岑建勳帶我去金庸家，拜訪了他。因為北京「六四屠城」，金庸已經宣佈退出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他聽我講述了北京「六四屠城」的前前後後，含著淚水說：「大家都想著怎麼用妥協的辦法解決問題，誰也沒有想到中國政府會出此下策呵。」我說：「上次我和你說，毛澤東很像你寫的東方不敗。鄧小平則像任我行，關在地牢裏是個讓人同情的英雄，一當上日月神教的教主，就成了個殺人不眨眼的獨裁者。」

5 點多，金庸要留我吃晚飯。岑建勳和他說：「陳教授晚上已經安排了飯局，這次就不叨擾了。」金庸握著岑建勳的手說：「這次你幹了這麼了不起的事，救了這麼多的人，真要對你另眼相看了。欽佩，十分欽佩！」我們剛要出門，金庸說：「等一等！」遂轉身到內間去了。不一會兒走出來，手裏拿了一個信封，交給我說：「陳教授，不好意思，拿著去放鬆放鬆！」我接了過來。

一上汽車，岑建勳哈哈大笑地說：「老陳，你猜猜看，信封裏裝的是甚麼？」我說：「不知道。」岑建勳說：「一定是 5,000 港幣！」我打開一看，果然是 5,000 港幣。岑建勳說：「查良鏞這個老色鬼！他是讓你去富麗華夜總會玩一夜，喝酒、唱歌加上一個女人陪夜，正好是 5,000 港幣。你不知道吧，查良鏞就是香港的韋小寶啊。」我心想，自己現在身無分文，這 5,000 港幣說不定還能救救急呢，哪裏有心思去玩啊。

晚上6點多，我們到了一家酒樓。二樓八桌已經坐滿了人，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看來都是三山五嶽的英雄豪傑。他們看我和岑建勳走進來，紛紛站起身來，拱手一禮，齊聲說：「陳大哥，辛苦了！」我心裏想起了當年孫中山拜洪門，這些人肯定都是各個碼頭的頭面人物，馬上也拱手一禮說：「各位兄弟，辛苦了！」落座後，岑建勳讓我介紹了北京「六四屠城」的情況。說得大家熱血沸騰，紛紛走過來向我敬酒。

每人敬了我3杯紹興酒，我是來者不拒，一連乾了180多杯。大家驚歎我的酒量如此之好，我笑著說：「我在農村當公社書記時，是隔頓不隔天，就把酒量練出來了。可那時，農民還吃不飽飯啊。我當農民時，看公社天天有酒席，還說『幹部一杯酒，百姓千滴淚』，但當了幹部才知道，誰來了都得應酬，沒有辦法啊。制度不合理，才做成了一系列的問題。所以，我回到北京就想辦法推動農村改革。」

大家聽得很有興趣。我接著說：「1980年順德一個老農說『30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後來，我到蘇聯、東歐訪問，發現他們的問題和老農說的差不多。公有制搞得大家吃不飽飯，階級鬥爭搞得大家不敢說話。國家要富裕就要搞市場經濟，百姓要敢說話就要搞民主政治。可是這次北京『六四屠城』以後，恐怕中國的改革又會倒退了。」大家七嘴八舌地連連稱是。

已經夜裏10點了，大家紛紛站了起來，一齊說：「陳大哥，今後有用的著兄弟們的時候儘管說！兄弟們會萬死不辭，兩肋插刀！」我心裏想，過去常說「忠義每多屠狗輩」，果然不假。也立即站起來說：「各位兄弟，俗話說滴水之恩，尚當湧泉相報。救命之恩，難以為報。兄弟我只有為國為民，鞠躬盡瘁。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大家乾了這最後一杯！」乾杯後大家依依而別。

回到賓館，我往北京打了兩個電話。我和體改所副所長李峻通上了電話，他問我：「你在哪兒那？安全嗎？身體還行嗎？」我說：「我在南方，還安全，放心吧。身體還行！」他說：「安全就好。」我接著叮囑他說：「千萬記住：無論出現甚麼問題，你都推到我的身上。」接著，我又和黃永山的女友通了電話，她泣不成聲地說：「永山剛下飛機就被公安抓了。他被打得都沒有人型了，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看來我們對李鵬的狠辣還是估計不足。我又往美國給王小強打了個電話，小強問：「老陳啊，你在哪兒吶？」我說：「我昨天晚上到了香港。」小強哭著說：「沒想到事情弄成了這樣。你能逃出來真是萬幸！」

一覺睡起，已經是7月9日早上9點了。岑建勳告訴我：「北京在香港滲透得很厲害。你目標太大，很不安全。今天晚上就送你去巴黎。上午你看看要不要買些東西，下午我帶你去英國政治部，他們給你安排。」我哪裏有心思買甚麼東西呢，就請岑建勳找來了各種報刊。一上午，又看了世界各地華人、各國對北京「六四屠城」的報導，反映實在是太強烈了。顯然，北京政權已經成了全球人人聲討的對象。是啊，20世紀以來，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首都發生過如此駭人聽聞的慘案。北京「六四屠城」的悲劇，用血淋淋的事實向全世界宣告了：共產主義制度是多麼地違背人性、草菅人命和不得人心。

下午3點，我到了英國政治部。他們說：「密特朗總統特別邀請您，參加法國大革命200週年慶典。為了出關方便，我們要把您化妝成一個英國警長，從特殊通道送到直達巴黎的飛機上。」從這時開始，他們給我化妝。先是洗澡、理髮，而後用一種淺棕紅色的染料全身上下塗抹，接著，全身內外都換上了英國名牌服裝。又給我教怎麼走路，怎麼與人打招呼，怎麼應付緊急情況。晚飯後，又演習了幾遍。

晚上7點，我和10餘個英國警察分乘3輛小轎車出發了，小轎車前後各有一輛警車。很快就到了機場，我們的轎車直接開進了停機坪。下車後，我前邊是5個英國警察、一個英國警官，而後是我，我身後又是一個英國警官，5個英國警察。他們把我直接送上了飛機。到夜裏9點，飛機發動了，10多個英國警察還站在那裏。飛機起航了，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則是「道不行，乘機飛往西」。誰知這一走，竟是一條再也難於回到自己家園的不歸路呢。

結語：路漫漫其修遠

從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一晃 20 多年過去了。我和朋友們說「如果過去到農村『土插隊』是『苦其心志，直面感受』，現在到海外『洋插隊』則是『陶冶靈魂，縱橫觀察』。確實，遠離中國就很難對中國的「現狀、問題和前景」有親臨其境的感受，也就不容易對人們關心的熱點問題提出對症下藥的見解；但視野的開闊卻是和在國內時所無法比擬的，故而從全球看中國，就會對中國的觀察又格外深刻。

由於中國從 1949 年到 1979 年的閉關鎖國，我們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局限，不同程度都受到「共產黨文化」的影響，既未能繼承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未能領略西方文化的精神實質。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就成為我到海外後的迫切任務。研究與探討中國所走過的曲折路徑，分析各個實現與走向現代化國家的經驗教訓，將是本書下卷所要講述的內容。

本書的結語將簡述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創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1990 年，在余英時^[786]、費景漢^[787]、丘宏達^[788]等國際著名學者的幫助和指導下，我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創建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dern China)。目的是通過研究中國和蘇聯東歐國家的變革，為中國在海外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人才。經過反覆的研究，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遵循了「三個積極促進」的研究方向。

[786] 余英時 (1930-)，安徽潛山人。當代人文大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密執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在「天下無道」的時下，實為堅持「仁為己任」、「士志於道」的傑出代表和中國士子的精神導師；為 1990 年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發起人之一。

[787] 費景漢 (1923-1996)，北京人。著名經濟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耶魯大學榮譽教授；為促成台灣經濟起飛「五院士」之一，後擔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為人耿直豪爽，多才多藝，期盼大陸制度變革平穩轉型；1990 年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董事長。

[788] 丘宏達 (1936-2011)，福建澄海人。著名國際法學者，曾長期擔任國際法學會副會長、會長，馬裏蘭大學榮譽教授；因不滿李登輝台獨傾向，1994 年辭去政務委員職務；為人正直，治學嚴謹，充滿報國情懷；自 1999 年起擔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董事長。



1990年5月19日，筆者（左）、費景漢先生（中）余英時先生（右）合影。

第一，積極促進中國全面建設性地進步。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是破壞多於建設，好不容易有了1978年到1989年的10年改革，又因「六四」中斷了。確如費景漢先生所說，所有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無不是靠「制度演進」，中國太需要經濟、法律、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設性進步了。

第二，積極促進中國制度變革的平穩轉型。制度變革有激烈與平穩的不同形式，但激烈轉型，往往會使投機者得逞，一般的老百姓損失較大；而平穩轉型雖然時間較長，卻對大多數老百姓最有利。

第三，積極促進中國兩岸的良性和平互動。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以和平代替戰爭、以對話代替對抗，已經成為解決問題的主流。中國人甚麼時候學會了和平互動，兩岸之間才會出現良性的發展。

那麼，無論中國將來是誰執政，都面臨著三大類問題：

第一類問題是基本問題。如，土地、人口、資源、環境、污染和教育、文化問題等，這一類問題不管誰治理國家都必須面對，我們也應該組織有興趣的學者予以研究。

第二類問題是技術問題。如，生產力佈局、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科技發展問題等，只要能夠合理使用專家並不難解決。

第三類問題是制度問題。如，經濟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會政策、文化政策和國家統一問題，這六類問題的解決既不能照搬書本，也

不能生套別國的模式，只能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因勢利導一步步走向人類共同追求的基本路徑。這一類問題應該是我們關注與研究的重點。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建以後，開展了一系列有意義的活動：召開各種類型的學術討論會；出版各種類型的學術刊物，包括《當代中國研究》季刊和普及知識叢書，組織了各種類型的研究項目，特別是大型的研究項目《世紀之交中國總體研究計劃》；培養了大批優秀的研究人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在國內各個崗位上發揮著建設性的作用，少部分留在海外的學者，也在各個領域發生著重大的影響。

第二、中國改革的新政與畸變

當代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能夠成為現代化國家。中國的改革已經 30 多年了，大體上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胡趙新政時期——「人的解放」與「簡政放權」

自 1977 年 3 月胡耀邦領導平反冤假錯案始，到 1989 年「六四屠城」止，這 13 年可以說是中共建政 60 年中最開明的時期，也是在胡耀邦和趙紫陽領導下中國改革取得重大進步的時期，稱之為「胡趙新政時期」實至名歸。

胡耀邦糾正、平反了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在歷次運動中造成的 3 百多萬件冤假錯案，使受牽連的 2 千多萬人恢復名譽；他還使在歷次運動中受盡屈辱的「地富反壞右」及其親人子弟共上億人脫離苦海，擺脫了「賤民」身份；他衝破阻力組織「真理標準」、「生產目的」、「人民主人」的討論，一次次沖決極左的羅網；他不斷批評「家長制」、「一言堂」、「假大空」，肯定「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提倡文學藝術自由、言論自由、民主選舉，並保護「西單民主牆」和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

趙紫陽也是中共建政後最開明的最高領導人。他首先推動農村改革，贏得了「要吃糧，找紫陽」的美譽；同時，他在工業、商業企業中實行「簡政放權」的試驗，特別是在最艱難的國營企業改革中不斷探索，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到「放權讓利」、「利改稅」，從「企業承包」到「股份制」實驗；後來，又提出「大進大出」戰略，為中國「外向型」經濟的高速成長奠定了基礎；他主持了政治改革的研究與推動，並指出：改革 10 年的基本經驗是兩條：「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天安門事件」中，他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寧可不當總書記，也不做「歷史的罪人」，他的高風亮節將永垂青史。

第二個階段：改革畸變時期——「反攻倒算」與「兩個傾斜」

1989年以「六四屠城」結束的「天安門事件」，實質上是以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發動的一場清算10年改革的非法軍事政變。「六四」後，江澤民、李鵬立即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對改革進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他們製造恐怖，逼迫全國人民說假話；誣陷「反腐败、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的青年學子為「暴徒」；全面整肅黨內改革力量和社會民主力量，堅持改革的各界代表人物遭到清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領域都出現了歷史大倒退；反對鎮壓學生的中共合法的總書記趙紫陽被非法囚禁致死人們又經歷了一次毛澤東時代的「國家恐怖主義」。

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重申經濟改革，使中國走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但他隻字不提政治改革。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經濟的自由化迅即為權力資本化和權貴的掠奪開了綠燈；而江、李的「穩定壓倒一切」，則進一步使中國出現了一個「改革畸變時期」。江、李以「穩定」為名，特別是為了「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實行了「兩個傾斜」的政策，即「犧牲農村，保障城市；犧牲平民，保障權貴」。80年代在農村改革中狀況稍有好轉的農民的利益又一次遭到剝奪，城市裏上千萬工人則被迫下崗。

理解這「兩個傾斜」是理解中國90年代以來各種所謂「改革」及其畸變的關鍵。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本質上是一種按權分利的「等級分租制」，將「兩個傾斜」的錯誤政策制度化，不僅保證了權貴的利益最大化，而且使「社會福利制度」泡沫化，隨後出現的集權化政府主導的「國進民退」就毫不奇怪了。為滿足權貴聚斂財富的貪慾，又以各種低廉的「優惠」條件大規模吸引國際資本，壓搾那些上億的可憐的農民工使他們成了永久的二等「奴工」。這種不計資源消耗和成本的發展、不顧環境大規模污染和破壞的發展，這種「吃祖宗飯造兒孫孽」的發展、「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窮」的發展，給中國的未來埋下了無窮的隱患。

中國的制度性社會不公與機會不均自然會繼續擴大，不僅釀成了世界上少見的貧富懸殊，而且權貴的大肆掠奪又使中國走上了「權貴國家主義」的畸形道路。中國哪裏還有一點點社會主義的影子？這也是中國「群體突發事件」和「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的主要原因。當權者為壓制廣泛的社會不滿，一方面加強集權，整肅異己；另一方面，則引進先進技術手段對全社會進行監控。民眾親身體驗了「網絡警察無孔不入，安全密探隨處監視，惡警城管橫行霸道，百姓蒙冤無處申訴」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專制恐怖。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所有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雖「國情」各異，但建成一個現代化大廈的五個基本構件缺一不可：其一，要有比較公平合理的經濟制度；其二，要有比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其三，要有比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四，要有比較公平合理的社會政策；其五，要有開放多元的文化環境。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二方面有缺失，可以不斷改進，大約還不至於妨礙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例如，城市國家新加坡在第三、第五兩方面就有缺失。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僅在其中某一方面單項突進，而其他方面則遠遠落後，那是不可能構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目前世界上還從未有過這樣取得成功的先例。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制度演進」的過程。這種演進表現在從保護少數到保護多數、再到保護全體「人生而平等」、「權利與生俱來」。二十世紀以來，制度環境的改善為民眾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使人的聰明才智能夠更好發揮。這種改善主要表現為：人權保障、自由保障、財產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此乃人類幾千年文明匯聚形成的主流價值而並非所謂的「西方價值」，凡是以「傳統」與「國情」為借口，拒絕這種制度環境改善的國家，至今尚無一個實現了現代化。

第三、專制的缺陷和民主的迷思

從文藝復興到光榮革命，人類的發展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把許多國家帶上了現代化之途。特別是 20 世紀以來，人類既取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重大進步，也經歷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災難。

人類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制度環境的改善和科學技術的創造。

首先，人類通過改善制度環境，大大調整了人與社會的關係。隨著「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成為人們普遍尊奉的價值，比較符合人性的現代經濟、法律、政治制度逐步建立了起來。那些取得現代化進步的國家，主要是靠制度環境的改善，為每個人提供了比較平等的權利，創造了比較平等的機會，從而調動了人們的發展動力，煥發出了空前的積極性，並不是源於人性的改變，也不是說教與強制的結果。

其次，人類通過科學技術創造，大大優化了人和自然的關係。當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比以前更合理的制度環境下時，人的聰明才智得到了更大的發揮空間，創造發明層出不窮，社會財富大量湧現。從蒸汽機到電能、原子能的利用，從動力、噴氣交通工具到衛星上天、人類登月，從電話、

電報、電視到電腦、網絡革命等等，現代科技幾乎滲透到人類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類的行為和思維。

與此同時，人類也經歷了有史以來的巨大災難，其主要表現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橫行與共產主義的試驗。無獨有偶，這兩者不僅開始都是以「國家社會主義」的面目出現，而且都是企圖以暴力手段強行改造人類和世界，卻給人類和世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使上億人、十幾億人或因戰爭、迫害和飢餓而死於非命，或受盡恐怖的折磨和奴役。

不過，無論希特勒怎麼打著實現「高貴日爾曼」社會的旗號，還是東條英機如何鼓吹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企圖，由於都是赤裸裸地進行武裝侵略，他們屠殺猶太人、中國人和其他不順從的民族，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構成的法西斯行徑容易被人識破、激起公憤，故而其雖對人類和世界破壞嚴重，造成了5,000萬人以上的非正常死亡，但持續的時間只有十幾年，而且不斷受到正義的聲討。

而共產主義試驗就不同了。在資本主義早期，一批理想道德主義者出於對社會公平的關懷，提出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將之變成一種「烏托邦工程」強行實施時，災難便隨之而來了。馬克思即已將社會主義思想推向了極端，而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試驗，更是給蘇聯人和中國人帶來了無窮的災禍和苦難。因為這種試驗貼著「公平、正義、為人民」的道德標籤，極易在落後國家找到市場。

但當試驗行不通時，人們稍有懷疑就會被視為「異己」、「反黨」和「敵人」，而遭到一輪又一輪的清洗、迫害和屠殺。蘇聯在推行「共產公社」和「強行集體化」時，先後餓死了3,000萬人，其他非正常死亡的人也在2,000萬以上。而中國在「大躍進」失敗後餓死的人則達4,300萬人以上，僅1949年到1979年間非正常死亡的人就高達8,000萬人以上；波爾布特^[789]在柬埔寨主政的兩年多時間，就殺害了600多萬人中的170多萬人。

共產主義試驗帶給人類的災難之慘烈和長久，亙古罕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成長和制度演進的過程，沒有一個走上現代化的國家是靠全面割斷歷史、否定傳統而完成飛躍的。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試驗，不僅用「烏托邦工程」強行構造了一種違反人性、頭腳倒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而且從根本上摧毀了自己國家幾千年所積累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關係，甚至其社會的基礎細胞。

[789] 波爾布特（1928-1998），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1976年，在他擔任柬埔寨總理期間，要建設一個「沒有富人和窮人」的社會，強制實行「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私有財產，無貨幣，無商品」，甚至「無家庭」的共產主義。曾在一天之間把金邊的200萬人驅趕下鄉，只剩下了5萬多人。

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試驗失敗以後，又開始回到常識和主流，但他們真正走上現代化的軌道還會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那麼，中國呢？自秦漢以來，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雖有1911年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建立過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1949年毛澤東卻在中國全面地復辟了專制制度；在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的30年，中國獲得了快速的經濟發展，但這種只模仿經濟和技術的「後發優勢」又能維持多久呢？

中國至今沒能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彌補自己的「後發劣勢」，故而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官員腐敗和道德淪落而難以自拔。究其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廣大的民眾缺少起碼的民主權利：缺少人權保證，缺少法律保障，缺少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和輿論監督，缺少對政府的權力制衡。這些現代化社會的基礎要件的缺失，將給中國的後續發展帶來難以估量的嚴重後果，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因為這種「後發劣勢」惹來了無窮的麻煩。

歷史已經證明，民主制度比專制制度更符合人性、更符合潮流。在20世紀，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20年代只有23個，到40年代就有了40多個，到80年代則發展到近100個；而實行專制制度的國家，卻從100多個減少到20多個。民主制度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需要一定的條件。但專制制度之所以會大幅減少，正是因為這種制度有著致命的缺陷，不能給大多數人提供了比較平等的權利、創造比較平等的機會。

當然，並不是說民主制度的出現，就能夠解決人類社會的各種問題。而是民主制度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歷史所呈現的「弱肉強食」和「殺富濟貧」式的惡性循環。那麼，為甚麼大多數西歐國家能最先走上民主之途呢？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從啟蒙運動到光榮革命，這些國家在500年間，使教權、王權與貴族權力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制衡，況且歷史上他們就有城邦政治的傳統，故而走向民主制度比較容易。

而專制制度雖然在農業社會普遍採取君權政治的形態，而隨著工業社會的出現也逐漸轉型為精英政治；社會的治理由一個人或一個家族，變成為一批人或若干家族進行；精英政治既可能走向獨裁，也可能走向民主；如果掌握權力的政治精英，不是一個壟斷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就會逐步出現寡頭政治、賢人政治以致民主政治，這是隨著民智不斷開啟的歷史自然發展過程。

所謂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並不是說人類對「人權、自由、民主、法制」的追求沒有普遍性，而是指各國都有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不同政治形態的特殊性。世界上眾多的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各有自己的發展階段、文化特色和歷史傳統，這個豐富多彩的多元社會需要互相取長補短，

也才能萬紫千紅百花競放。而民主之所以成為當今人類的追求，也正是人類普遍覺醒、人性渴求尊嚴的反映。

但在實行民主條件不成熟的國度，「照搬西方民主」只能帶來麻煩，像造成政局混亂，各黨爭利，資源浪費，社會動盪，甚至民粹主義氾濫，也是不爭的事實。故而，我們既要打破對民主的迷思，又要有對民主的不懈追求，也就是說既不能企望民主一天就會實現、民主能解決一切問題，又要一步步紮實地作好民主的基礎工作——特別是在民眾中做好民主啟蒙的工作，以培養國民的公民意識。其實，中國一天形不成制衡權力的力量，就不會有民主可言。

我從1980年組建發展組開始到後來在體改所、政改辦，都講過經濟發展階段論和政治成長階段論的關係。1987年和1988年，我又先後在政改辦、體改所講過，要處理好：一政治參與和民眾水平的關係，二政治精英和其他精英的關係，三民主和效率的關係，目的就是為了使中國在精英政治的歷史階段，盡可能地避免走向獨裁政治。但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畢竟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太長了，政治強人鄧小平既在1989年製造了「六四」悲劇，又在1992年「南巡」時推動了市場化，使中國終於形成了「政治上獨裁，經濟上開放」的格局。

不過，江澤民按程序退位交班，從中共的歷史看確實是一個進步，這就為中國的專制制度從獨裁政治走向寡頭政治邁出了一大步。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人們對貧富懸殊、官員腐敗、道德淪落的不滿就會與日俱增，「後發劣勢」帶來的種種難題就會日益困擾當政者。為解決這些因制度不合理而產生的問題，法制建設、文化建設以及民主建設就必然會迫切地提上日程，但實現民主政治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也許人們會問：何以台灣能夠走向民主？須知，從1949年以後，台灣與大陸即走上了不同的路徑。從蔣介石的獨裁時期到蔣經國的威權時期，台灣縣以下的民主選舉始終在進行，這就逐步形成了以知識分子為中堅的公民社會；而台灣實行三七五減租的和平土改，為中產階級的發展則提供了堅實的條件。這就為上世紀80年代，蔣經國開放「黨禁」和「報禁」創造了前提，也為台灣走向民主奠定了基礎。而毛澤東在大陸的倒行逆施，不僅阻滯了現代化進程，而且從根本上破壞了民主成長的元素。

第四、中華民族面臨著五大挑戰

古人說，「不能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中華民族當前面臨著五個大的挑戰：

第一是經濟發展戰略的挑戰。

1980年，我們在發展組成立之前就討論過，歐美的模式我們走不了，蘇聯的模式走不通，第三世界的模式不能走。但歐美模式發展農業形成經濟的內部分化，蘇聯模式集中運用國力加快建設速度的經驗，都是可以借鑒的。之所以說歐美的模式我們走不了，是因為他們的經濟發展走了一條高能耗的路子；而我國人口眾多，人均擁有的可耕地面積、能源保有量、水資源使用量均處於世界後列，如果也走高能耗的路子是很難有持續發展的。

試想五十到一百年後，中國人能家家戶戶擁有自己的小汽車嗎？能源的限制就做不到這一點。故而，中國在開發不可再生性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核能等）的同時，必須注重可再生性能源（如，水能、風能、太陽能、植物能）的開發。顯然，當今世界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走高能耗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必須著眼開發大自然給予人類生存提供的可再生性能源，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持續發展之途。

從全球範圍看，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在國際競爭中，固然一個國家擁有的人口、土地、資源的多寡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卻是人力資源的開發；顯然，發展第一產業（農業和採掘業）的附加價值不高，能滿足國內需求就不容易了；適當發展第二產業（工業）是必須的，沒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很難站住腳；但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智能產業，方為強國之途。近代以來，智能產業的高速發展，往往能決定這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提升。

10年前，我曾和一批朋友談起過：中國人口眾多，聰明能幹，但資訊不發達，教育不普及，若不從迅速開啟民智入手，則很難與發達國家比肩。開啟民智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全國建立起若干個智能中心，幅射到2,800個縣裏普及電視、電腦教學，將現代化的各種知識迅速傳遞到孩子們那裏，這個辦法既能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又能大大減輕教育和交通成本，如果每個縣都能形成小的智能中心，那麼中國的長足發展就是無庸置疑的。

再說，中國從東晉南遷以後，經濟重心區就轉移到了東南；而東南人口眾多、資源稀缺，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可耕地面積必然會日益

減少；如果不能在東南沿海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那麼私人交通的擁擠、城市建設的繁複以及巨大的能源消耗將成為難以解決的問題。故而，中國急需建立一個高層次籌謀長遠綜合發展戰略的研究機構，為子孫後代計未雨綢繆，規劃全局與未來。

第二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挑戰。

中國在有利的國際環境下，使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目前的經濟體制模式能持續維繫下去嗎？許多人將中國由一個強勢政府控制國家資源和國有經濟主導的體制稱為「中國模式」，這種體制與斯大林、希特勒當年實行的「舉國體制」並無本質的區別；幾個寡頭掌控國家的命運，少數權貴左右經濟命脈，絕大多數人仍處於無權的地位。其實質正是一種「權貴國家主義」，這也正是中國改革畸變的必然結果。

這種「中國模式」在一定的條件下，確實能運用「舉國體制」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付出的巨大成本也是前所未有的。「國進民退」的出現，正是政府主導資源配置排斥市場機制的後果。靠政府強化行政權力進行管制並投入大量資源實現的經濟增長，不可能不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民間「仇官，仇富，仇警」心理的增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必然現象。

從近代以來，各國的經濟發展證明：市場經濟是達致資源最優配置的有效途徑。中國從一個失敗的集權的計劃經濟進行改革，顯然應當堅持市場化的導向。而中國改革的畸變卻使得集權的慣性左右了局面，政府主導取代了市場化改革。須知一個欲實現現代化的國家，若沒有廣大民眾積極性的調動和創造性的發揮，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中國出現的「民窮國富」、「國進民退」，恰恰顯示的是一種反向的路徑。

「民富則國強」，這是人類歷史證明了的。只有「民富」，國家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而建設一個現代社會，欲使「民富」則須：保障「私權」，限制「公權」。也就是說，必須保障民眾自由選擇的權利、擁有私產的權利以及自由生存的權利；同時，必須限制政府行為，使政府從「全能型」向「有限型」轉變，從「發展型」向「服務型」轉變，只有政府能為民眾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和條件」時，中國才能走上現代化之途。

第三是政治制度轉型的挑戰。

從孫中山 1911 年在亞洲建立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至今已經一百年了；台灣繼承孫中山的遺志走向了民主，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而毛澤東 1949 年在中國大陸卻一步步復辟了東方專制主義，並通過一個個左傾的政治運動剝奪了人們的各項基本權利——人權、自由和民主；鄧小

平在實行改革開放之初就意識到「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但他囿於既得利益鎮壓了「八九民運」，也就錯失了在中國推行政治改革的機會。

中國要不要民主？這幾乎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但為甚麼中國至今仍見不到民主的進步，這卻是讓人們困惑的問題。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在中國實現民主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為甚麼民主就那麼難於在中國成長呢？這顯然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需要人們認真的探討。我在這裏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於關心中國走向民主的方家。

中國自秦漢以來的兩千多年，實行的是「權在中央」的中央集權體制；支撐這個中央集權體制的官僚系統的任免升貶，亦均由中央生殺予奪；宋明以降，官場更形成了普遍的「兩面人格」——對上是奴才，對下是主子；民眾亦養成了企求「明君」、「賢相」、「清官」的心理；中國從古至今，「官商一體」、「官商勾結」、「警匪不分」、社會不公的傳聞不絕於耳，以今為甚。

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則是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幾千年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將中國倒退到了王朝時代，只不過換成了「黨天下」；人們的命運——起落沉浮、生老病死，均由黨來決定；而幾千年來逐步形成的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宗族的、文化的關係，亦被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破壞殆盡；所謂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不過是只打開了經濟發展的門戶，其他領域的發展則均乏善可陳。

若從中國的發展階段來看，仍是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期，只不過「後發優勢」的模仿為其添加了不少光彩而已；當然，隨著經濟的多元化，社會、文化也會逐步多元起來；而政治改革至今仍是中國改革的瓶頸，但中共高層的有序交接，有可能使其從寡頭政治走向賢人政治；至於中國走向民主政治，恐怕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如果中共的領導人有心引領中國走上民主政治之途，目前仍是只能「從兩頭作起」。

上頭是從中央作起，建立起合理有序的程序、制度、規則，從寡頭政治走向賢人政治；下頭就是從基層、特別是從縣級作起，可以進行各種民主試驗，逐步形成一個個的政治社區。從世界範圍來看，一個國家人均收入超過 6,000 美元以後，國民自下而上的民主要求會日益強烈；中國自秦漢以來，實行的專制制度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縱向中央集權制，而橫向的政治社區始終沒有形成，那麼以縣為單位進行民主試驗，對於中國來說就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是政治思維再造的挑戰。

中國幾千年專制主義傳統形成的「成王敗寇」政治文化思維，到共產黨大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將這種落後的政治文化思維發展到了極致。從1949年中國搞的一波接一波的運動都要抓出一批「敵人」，而且一次比一次多；其實，共產黨發動的這些「階級鬥爭」，無不是為貫徹「領袖」越來越左傾的政治路線，整肅「異己力量」的借口和手段；但這種落後的政治文化思維大大毒化了民眾，直到文化革命中的兩派鬥爭，彼此均將對方視為「敵人」，要將其「打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以致造成了冤魂遍中華。

滅絕人性的不斷的「階級鬥爭」，使中國從嬰兒到老人，幾千萬無辜的生命死於非命，幾億國人在恐懼中苟活，那麼為甚麼中國人就不能從這些悲劇中，認真地吸取以往血的教訓呢？正是共產黨刻意掩蓋、抹殺「反右」「文革」「六四」這一類罪惡的歷史事實，使人們逐漸失卻了記憶。殊不知所有以「階級鬥爭」為圭臬的黨派，掌權後無不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造成了歷史的大倒退。

自古以來各國各代，總有人想走的快一點，有人想走的慢一點；有人想往左走，有人想往右走；有人注重效率，有人強調公平；其實，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本屬正常。而在專制社會，往往是得勢的一方整垮弱勢的一方，形成弱肉強食的惡性循環；只有到民主社會出現以後，才出現了用對話、妥協解決問題的「你活我也活」的新局面，人們總算擺脫了「今天你打倒我，明天他打到你」的恐懼；中國一天不拋棄「鬥爭哲學」這種落後的政治文化思維，則很難取的實質的進步；而建立程序民主對促進中國政治文化思維的改善則至關重要。

正像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拉薩爾提出的，階級是客觀存在的，不應當用「鬥爭」而應當用「調合」的方法解決彼此的爭端，他的思想對全球社會民主黨起了指導的作用。而至今在中國延續的動不動就是甚麼「左派右派」說、「姓社姓資」說、「敵對勢力」說，都仍然是「階級鬥爭」說的翻版。這種落後的政治文化思維，不僅與當代人類追求的「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價值格格不入，而且嚴重地束縛著國家的進步和人們的思想，更不要說進行有效的政治制度改革了。故而，進行政治文化思維的再造就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重大問題了。

第五是道德文化重建的挑戰。

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形成的優秀文化道德傳統，中國則一直被人們稱為「禮義之邦」。但1949年以後，被「共產黨文化」——革命文化、造反

文化、鬥爭文化、痞子文化、幫派文化——破壞無遺。記得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余英時先生說：「我看，大陸的中國人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不講道德的人了。」誠如斯言！從國內國外傳來各種的訊息，甚麼「禮義廉恥」、「仁愛誠信」，中國人都不講了，到處充斥的都是「造假」，實在令人汗顏！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文化逐步被解構，「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的文化激進主義，1949年以後中國又陷入了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社會環境中。毛澤東時代中國文化被政治專政，一方面外來的馬克思主義以國教的地位君臨天下，中國文化中人本的、寬容的、優雅的一面被當作封建文化蕩滌；而儒家「綱常名教」的秩序傳統，卻進入統治者的行為之中；這種「反智主義」，在文革時期發展到了極致。

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注重經濟發展，在缺少公民意識和公民道德的環境下，出現了人們精神生命力的萎頓乃至淪喪，為價值失範和拜金主義氾濫打開了大門。中國文化在中國大陸崩裂瓦解的同時，卻出現了台灣的中國文化、香港的中國文化、新加坡的中國文化、海外華人社會的中國文化，而且我們從許多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的身上都能看到中國士子的精神和風骨，所以人們提出了「文化中國」的概念。

所謂「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對中國大陸而言，一個國家的落後不僅表現在經濟上，思想道德上的空虛是更可怕的。人們不能在「天地君親師」面前學會懺悔和反省，塑造自己的道德人格，只能是自我的膨脹和迷失，我們面臨著十分嚴重的道德重建的任務。我注意到，在國內學者的不斷的努力下，中國文化的精華正被人們重新關注，講解「儒道佛」的課程和講座也開始出現，給小孩子講授「三字經」、「弟子規」的學校也應運而生，但教育人們懂得公民權利和義務的課程至今還沒有出現，這是讓人感到很遺憾的。

人啊人，你要往哪裏去？

從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的解體，世界的冷戰格局結束了。1989年夏，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文，簡單地認為：意識領域的戰爭已經結束，西方形態的自由民主獲得了最終的勝利，「標誌了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而他的老師亨廷頓發表的「文明的衝突」一書卻構建了一幅正好相反的未來圖景，他指出：世界主要文化群落之間充滿了衝突，接著發生的「9·11」事件似乎證明了這個判斷。

其實，只要認真地觀察就會發現，無論少數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還是制度模式，都遇到了不可迴避的瓶頸。隨著人類的覺醒、人口的激增和資源的短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再採取少數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再者，因為每個國家各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文化特色和歷史傳統，更難於「拷貝」的則是制度模式，發達國家強力推行某種制度模式，往往會帶來適得其反的後果。

今天的人類確實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以啟蒙運動和分析科學為標誌的西方文化，使人類社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但強調個體而忽略群體、強調物質而忽略精神的發展，又使人類社會出現了畸形——人人追逐金錢造成的物慾橫流、道德淪落，成為困擾人類前進的難題，近年出現的「金融危機」正是人性貪婪的結果；而分析科學的絕對化，又將整體的、關聯的、豐富的自然世界無限割裂，使人類的生存陷入困惑。

面對全球不到 20% 的發達國家和 80% 以上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解決人類需要共同解決的難題，諸如：生存與發展的問題、資源與消耗的問題、貧窮與富裕的問題、環境與污染的問題、增長與公平的問題、效率與民主的問題，就成為考驗人類智慧的迫切任務。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問題是不同的，「9·11」的恐怖襲擊以及其後各地出現的恐怖主義行為，不正是一些極端主義分子對現狀不滿而產生的極端行為嗎？不能從原因上解決問題，緩解矛盾，「反恐」則也很難取得實效。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兩千三百年前偉大詩人屈原的求索，至今仍追考著人們。人呵人，你要往哪裏去？

附錄：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裏【790】

——有感於幾位好友患癌症而英年早逝

不知是怎麼了，近一年多來噩耗不斷，幾位 50 多歲的好友，都因罹患癌症相繼棄世，令人唏噓不已。反觀我從 2002 年，先後患淋巴癌、膽道癌以及治療的過程，或許值得人們深思。

一、何以這些國之良才會一個個英年早逝？

從 2010 年 4 月到今年 5 月，這幾位與我相交相知 20 多年的著名學者白南生、張少傑、蔡定劍、齊永貴先後病逝，他們為中國的農村改革、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對外開放曾做出過重大的貢獻。遺憾的是他們都只活了 50 多歲，為什麼這些國之良才，正當壯年就會一個個英年早逝呢？

首先，是社會環境的惡化。本來中年人就承載著工作與生活的雙重壓力，在中國則正像老百姓說的，「不該施肥的猛施，該施肥的又沒有。結果，老苗不斷貪青，壯苗長成了癟子。」在中國又因為長期「官本位」左右一切，充斥著「對上是奴才，對下是主子」人格扭曲的官場陋習，使正直的學人很難有施展長才的環境。

其次，是生存條件的破壞。「吃祖宗飯，造兒孫孽」的過度開發，造成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山川植被的破壞，空氣污染的加劇，飲用水的污染，各種食品的污染；「不顧道義向錢看」，造成了人們處處造假，毒糧食、毒蔬菜、毒奶粉、毒牛奶、毒食品充斥市場，嚴重地損害了人們的健康。

第三，是心理狀態的不平。社會不公、貪污腐敗、貧富懸殊，又給有良知的士子帶來了靈魂的拷問。是違心地同流合污，還是出污泥而不染？在這種兩面為難之下，或因言行分離而慚愧，或因不合俗流而痛苦。久而久之，心氣鬱結，肝氣不暢，長期的心理失衡豈會不帶來身體的病變？「五勞七傷」積而成疾則勢所必然。

第四，是治療方略的不當。這幾個朋友曾經先後用西醫的辦法，間錯也用中醫的辦法治療所患癌症，為甚麼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會都走了呢？正

【790】本人自 2002 年即受癌症折磨，至今已逾 9 年。經友人建議將此文附於本卷之後。

所謂歧路亡羊，缺少良好的治療環境。我在海外求醫，經過比較分析後，專注於中醫，不僅治療花費遠小於他們，而且治療環境利於靜養，就幸運地活了下來。

二、因禍得福，我的生命延續了下來

我以為，迄今為止千百萬個研究者並沒有弄清楚癌細胞產生、發展的機理。西醫採用手術、放化療、納米介入等辦法，企望徹底消除癌細胞，並沒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效。據美國國立衛生院報告，採用手術、放化療等辦法，治療癌症患者的成活5年率還不足5%。而不用這些治療手段的若干患者，卻往往能活的時間更長。

這說明，自分析科學產生以來，雖然西醫用解剖學、病理學等方法，使人類對人體本身有了科學的結構性認識，治療疾病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西醫至今並沒有給癌症患者提供出有效的治療方法。作為有靈性、有思想、有意識的人，其身體各部分的相關性、互動性、整體性彼此都有些甚麼關係，西醫也沒有合理的解釋。

西醫對許多綜合性的慢性疾病的治療，往往只是機械地看到物質的人，而沒有看到精神的人，遂產生了典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故而，西醫對綜合性慢性疾病的治療，往往都難以取得良好的療效。西醫治療癌症目前的主要手段就是手術及放化療。也許儀器能檢測到的癌細胞切除了，但因為產生癌細胞的機理並不清楚，癌細胞隨時都可能再生長出來。

所謂「聖人不病，以其病病」。用放化療的辦法抑制癌細胞是否有效且不說，凡是身患癌症手術後使用放化療的人，自身的免疫系統無不受到破壞，直至病人的機體平衡系統紊亂和免疫系統承受不了化療的毒性而衰亡。我的幾個朋友劉賓雁、楊小凱、熊劉怡，前些年分別患上了直腸癌、肺癌、淋巴癌，他們採取西醫手術及化療的辦法，都因為免疫系統不能再接受化療的劑量而遺憾地離開了人世。

2002年，我患了淋巴癌。當時右脖頸的瘤子已經長得有鴿子蛋那麼大，西醫給我作了活體細胞檢查以後，讓我立即住院作手術。我當時住在紐約，沒有醫療保險。如果住院治療，醫療費、住院費我就付不起。我們發展組的老成員趙小冬，給我在自然療法中心作了檢測，我女兒給我帶回的檢測報告說，我的癌細胞比很多死去的癌症病人還多。我開始尋訪中醫，卻因禍得福了。

一位 84 歲的台灣老中醫告訴我：從自己行醫 60 年的經驗看，如果你的瘤子在 1 公分之內，你願意切除我不反對；可你的腫瘤已經長到了 3 公分，若動手術則很可能切不淨，而且是治標不治本，並不能解決腫瘤再生長的可能；手術後就得放化療，又會破壞免疫系統，很可能活不過 5 年；如果用保守療法，比如，用中醫、氣功的辦法，也可能活 5 年、10 年、20 年，甚至更長。

我突然想起了著名導演吳天民給我介紹的中醫戴克剛。他是中國 40 年代「八大名醫」戴希聖之子，自幼即研習中醫典籍自學成才，經生物醫學工程之父馮元楨之邀來美講學。後在美自開診所，治療心血管系統疾病有奇效。1992 年 8 月，蔣緯國到洛杉磯開「中國前途研討會」，請我演講。吃飯時，蔣緯國讓我坐在他旁邊，另一邊坐的就是戴克剛，蔣當時就是專門從台灣來請戴給他診病的。

我給戴克剛打了個電話，他說你快來看，不要耽擱。我飛到洛杉磯，戴克剛也同意我用中醫調理，並給我開了藥。他說：你的瘤子是一層一層長起來的，現在要用藥把它一層一層地剝掉。我吃了 3 天藥以後，大便開始出現黑色粘乎乎的東西。連續吃藥半年，大便中黑色粘乎乎的東西似乎越來越少，脖子上的瘤子也明顯地在縮小，但人也拉洩的有氣無力很虛弱。我每天又練起了父親 1960 年在廣州教的道家功。

2003 年春節前，好友陳科文請我去他家吃飯。我告訴了他自己的病況，科文說：我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作了幾年癌症研究，發現西醫的手術及放化療效果並不好，就在新澤西開了一家「念力與自愈力研究院」，搞起了選擇醫學，專治各種疑難病症，特別是癌症。科文又說，他請了廣東羅浮山張真人的關門弟子何斌輝，給大家傳授太極五行功。我聽了半信半疑，因為在海外教授各種功法的很多，其中不可信的居多，就讓他先給我寄一些材料來。記得小時候，看那些修煉得道的神佛，頭頂上都會放出「金銀青紅黃白黑」七色的毫光。而父親給我教的道家功也是要練成「精神內守」。「太極五行功」似與之相通，已經治好了不少癌症病人。

太極五行功的要點，就是用日、月、木、火、土、金、水七星的能量，補充人體自身能量的不足，並祛除體內的邪氣。又將道家的陰陽互生、互補與中醫的五色、五官通五臟、與練功結合起來，這種功法讓我眼睛一亮。我到陳科文主持的講習班，聽了何斌輝的講座，並避谷半個月，自己感覺練此功法後，神清氣爽受益非淺。從此，我每天中午、晚上都各練一遍這種功法。

但到 2006 年中，我突然手腳又出問題了，胳膊麻痺的抬不起來了，兩隻腳也走不動路了。我先後在麻州總醫院和康復中心看了 5 個月，都沒有甚麼效果。這時，曾在中國科學院院刊當編輯的劉明棻介紹我認識了郭德純老師。郭老師當過中國科學院的顧問，有特異功能，他給我發功、針灸、艾灸 3 個月治好了我的病。郭老師說「你的病是 40 年前的積傷復發，你身上有十幾處斷傷和淤傷，能活下來就是奇跡！」是啊，1967 年，文革中我曾三次被打得昏死了過去，留下了終身殘疾。

三、恬淡虛無，精神內守，與晚期癌症周旋

赫爾岑說，世上有兩種人，多數是現實的人，少數是理想的人。多數現實的人很容易陷入「泥潭主義」而不自拔。而理想的人患上了「真理病」則是很難治癒的。我和幾位逝去的朋友，可能就都屬於第二種人，總想在有生之年多作些事，不甘心此生虛度，故而心一直放不下來。

2008 年 7 月，我在赴紐約開會的旅途中，因為長期的勞累，突發了急性胰腺炎，疼得在飛機上打滾，險些痛死過去。但這次生病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我又沒日沒夜地工作起來。到年底，我經常感到頭暈眼花全身無力，醫生讓我停止工作立即全休。原來，醫院給我作的血液化驗檢查結果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4 個肝功指標超過正常指標 10 倍，癌症血液指標超過正常指標 100 倍，黃疸指標超過正常指標 70 倍！作 CT、核磁共振和超聲波檢查後，醫生說是 4 期膽道癌，必須立即切除膽道、一部分肝和大腸，用大腸再造一個膽道。我問主治醫生，不作手術行不行？他和其他幾個醫生商量了一會兒，搖著頭回答我說：那您就想吃點甚麼就吃點甚麼吧。

我從醫院出來想，看來西醫已經宣判我的死刑了。怎麼辦？我先後詢問戴克剛和郭德純兩位醫生能不能治，他們都說很難辦。這時，我因為嚴重的黃疸，全身上下出了無數紅點而且奇癢難熬。一周內，大便拉出的都是深黃色的油花。據說，因為膽道不能正常工作了，這叫做「脂肪瀉」。接著一周，大便拉出的又都是灰白色的「陶土便」。因為鞏膜黃染的關係，我看交通燈時綠燈變成了淺藍色，紅燈變成了淺粉色，醫生也不讓我開車了。

短短的 3 個月，我的體重很快從 156 磅掉到了 108 磅。走路也走不了幾步，上樓都得爬著上去，說話也發不出聲音了。眼看著一副奄奄欲息的

樣子，讓親友們都很著急。小女從我的好友那裏知道，在溫哥華有一位著名的中醫叫卓同年，治好了不少絕症，是不是可以請他來給我看看病。

2009年1月31日，經朋友及小女懇請，卓同年醫生專門到洛杉磯來為我診病。卓醫生確實不同凡響。他生於浙江諸暨世家，幼而聰穎好學異於常人，急公好義為諸友所稱道。及長，研習中醫不落俗套，自新疆中醫學院畢業後，他遍學名山隱逸的奇技，採大家碩醫的所長，學得了早已失傳的漢唐古法，像「扁鵲脈診」、「玄晏針法」等，可以說在當時已經獨步天下。

然而，卓醫生深感從宋明以降，中醫界備受陳規所縛，難展其才。遂於10年前負笈東渡，在溫哥華創辦了極康中醫院，以其自創泛系唯象理論診治各種疑難病症。更難能者，即使患者萬里之遙求醫，卓醫生亦不辭辛苦、不計酬勞立往施治，至今已診治50餘國上萬名求診病患，治癒各類危重病患上千例，令西醫學家們嘖嘖稱奇，故得享「中醫傳教士」之美譽。

卓醫生先用扁鵲脈診給我診了脈，又用玄晏針法在我背上扎出了不少黑血，再用一種黃色的粉末吹入鼻孔，還用艾條灸關元和中脘兩穴。診治後，卓醫生告訴我說：你病得很重，積勞成疾，積傷復發，五臟俱損，命懸一線。我可以治你的病，但救不了你的命，要救命還得靠自己。先用3個月的時間，以去黃疸為主，配合服藥、艾灸與練功，看看效果再走第二步。

兩個多月後，我的黃疸指標降到了1月時的1/7，只超過正常指標10倍了。4月12日，卓醫生從溫哥華第二次飛赴洛杉磯為我診病。他說，你的胃、脾、胰、膽、肝都壞了，現在第二步要再造五臟，關鍵是看你能不能作到閉關6個月。閉關期間，除了服藥、艾灸、練功以外，甚麼事都不要做，甚麼人都不要見，甚麼問題都不要想，不打電話也不接電話，把心放下，以免五癆七傷，只有作到恬淡虛無、精神內守，病情才會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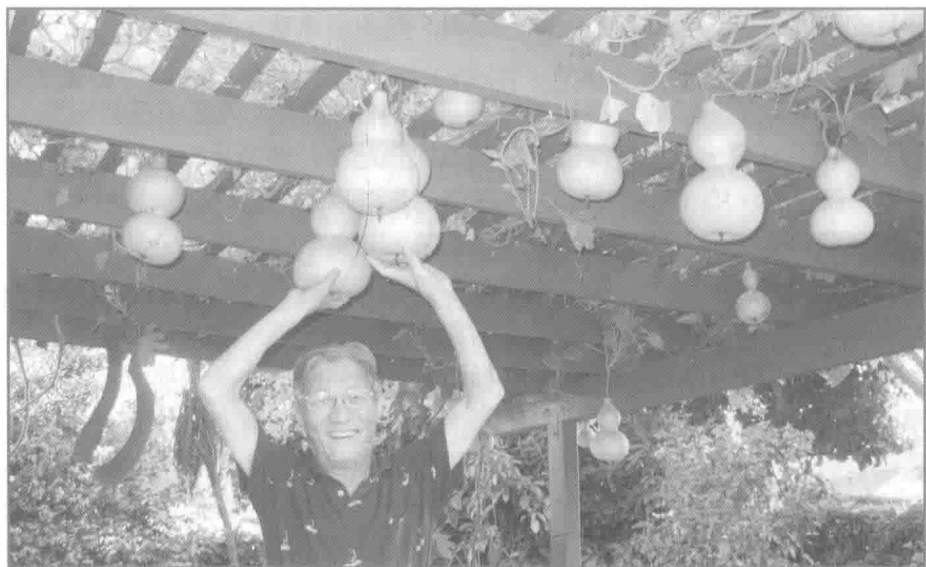
9月26日，卓醫生第三次到洛杉磯給我診病時，他高興地說，你的生機已經大於危機，繼續閉關。到年底，奇跡出現了，我血液化驗的各項指標幾乎都趨於正常了。自2008年底患惡性膽道癌以來，洛杉磯西醫名家梁宏連不斷悉心為我檢查身體、觀察病情變化，他說：「真是奇跡！我行醫還沒有見過一個晚期癌症病人，黃疸那麼重，能活下來的。」郭德純老師也來電話說：「你已經摸著閻王爺鼻子啦，硬讓卓醫生給拽回來了。」

四、消滅癌細胞，還是與其和平共處？

2009年底，卓醫生在北京和我女兒說，你爸今年初能生存的可能不到5%，現在超過50%了，但一定不能大意。可是，人這個東西，往往病稍好轉又會不自覺地大意起來，稍一加重又會病急亂投醫。到2010年，在名醫卓同年的盡心診治下，我自己也從癌症病患中不斷地有新的體悟。

環境的不如意，心理的不平衡，人體很容易出現心臟和肝臟的病變，從而產生癌細胞。癌細胞一旦查出，人們往往會過度反應：一是驚慌失措，自造精神壓力，故人們常說，癌症80%是被嚇死的，不是沒有道理；二是病急亂投醫，特別是有本事的人，心放不下，為了多做事，總想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三是誤聽流言之言，以為只要手術切除，加上放化療，就可以根治，殊不知往往會適得其反。

正像人世間真假、善惡、美醜長期並存一樣，人體自身的陰陽、寒熱、正邪同樣並存。可以說，人類迄今對癌細胞的認識還處於幼稚階段，也尚未找到對付癌細胞的有效方法。實踐證明，西醫手術及放化療的「對抗性」辦法，是治表不治裏的，而且副作用太大；而中醫治療癌症是用調節人體陰陽、寒熱、正邪的「平衡性」辦法，明顯地比西醫合理，但並不是說中醫就已經弄清楚了癌細胞產生的原因和機理。



中醫的科學性在於，通過望聞問切大體弄清病人的總體狀態，而後給病人一個輸入，如藥石針灸。再根據病人身體的反饋，進一步瞭解病情的

變化，而後依次反饋不斷調節治療方案。我從中認識到：任何人一旦罹患癌症，就要準備以恬淡之情，在自己內心打一場持久戰，而這場精神持久戰的關鍵，是不斷地要扶正驅邪，增強自身的免疫力，使之能夠抵禦癌細胞的生長。如果說，癌細胞的產生是上天的示警，那麼就須明白應當順應自然，萬不可再明知不可為而強為。

首先，要有一種似有若無的心態。我得知自己患了淋巴癌以後，先以一種類似精神勝利法的心態，內心不斷告誡自己：我沒有得癌症，即使得了也能治好；同時，調查研究以尋找如何用穩妥的辦法進行治療。其實，這種精神勝利法的「念力」往往可以主導你的心緒，自然會促成人體自愈力的不斷產生，不可小覷。這是自身抵禦疾病的難得利器。

其次，是要把心放下，做到「了無罣礙」。靜下心來，參禪悟道，明天地之造化。想一想《紅樓夢》的「好了歌」，不就豁然開朗了嗎？人生如戲，或演悲劇，或演喜劇，或演滑稽劇，或演荒唐劇，由己亦不由己啊。而權力使人腐敗，金錢使人奢靡，虛名使人膨脹，情色使人迷亂。大千世界，芸芸眾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如恆河沙數，離了誰地球都在照樣轉，心還放不下嗎？

第三，是要認真治療，戰略上可以藐視，戰術上必須重視。癌症治療的效果主要還是靠病人自己，因為這是要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和體內的健全系統與癌細胞之間，彼此相互搏弈消長共存的過程。良醫如卓醫生者，不僅可以幫患者作出正確的判斷，而且更可以給患者心靈和方法的啟迪，但卻掌控不了你的心理、心態的變化。自身狀況的把握首先還得靠患者自己。

西醫總想靠手術及放化療的辦法，切掉以致根除癌細胞。這種思路之所以不成功，就在於並沒有弄清癌細胞何以產生、何以繁殖，就像摘除一個壞零件一樣機械地進行處理，這可以說是分析科學在醫學領域對待有靈性的人治療失敗的一個典型。僅就目前所知，癌症產生除一部分與自然環境有關外，大部分都與心理、精神因素有關。所以，治療癌症用物理手段往往是不成功的。

故而，癌症患者想從根本上一下清除癌細胞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人類的智慧還沒有找到這種有效的辦法。而實踐證明，癌細胞越殺則生長的越快，如果患者的免疫系統難以抵禦癌細胞的繁殖，癌細胞就會窒息了患者的生命。但是，想辦法不斷增強自己的免疫力，讓癌細胞與人體的其他細胞和平共處，又不讓它的發展危及生命，應該是當下我們能夠作到的。

五、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一旦身患重病，你的生命究竟掌握在誰的手裏？最終還得靠自己。人的生命是堅強的，又是脆弱的。有時甚至得與失、生與死就在一念之間，我的一生有過多次這樣的經歷。

1958年，我得了嚴重的關節炎，走路都困難。我硬是到十三陵工地勞動，每天疼痛地爬著去上工，一個月後竟好轉了；1960年，我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弄得人很虛弱，每天打太極拳、打坐，堅持了半年又好轉了；1964年，我在湖北農村得了鉤蟲病，當地叫「黃瘦病」，每天大便潛血4個加號，人常處於昏迷狀態，經過半年練功也好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我挨了100多場鬥爭，3次被打得昏死過去，自己也多次想自殺，但又覺得自己不能死，硬挺過來了；1974年，我在河南農村得了嚴重的脈管炎，雙腿吊在病床上不能走路，幾個名醫都治不好，我硬是每天跑步，3個月後也好了；1982年，我因過於勞累，在上海病倒了，得了嚴重的疲勞綜合症，屬中晚期，經中醫調治了一年，又好轉了。

從2002年至今，我一直在與嚴重的疾病周旋。2002年得了淋巴癌，2005年胳膊和腿不能動，2007年患急性胰腺炎，再到2008年得了惡性膽道癌，西醫已經宣判了我的死刑。甚至到2009年，卓醫生給我診病後都說，我的生存率只有5%了。兩年半後，卓醫生說，我現在活下來的機會已經上升到了60%！

和疾病抗爭的過程中，我感到：少數疾病是因為自然環境造成的，多數疾病則是自己的行為違背了自然的規律。中國古聖老子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實乃洞悉天人地三才關係的至深之理。可惜我未能參透，以至不斷地作出違背身體規律的事情，怎麼會不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懲罰呢？

人們常說「天道不可違」，但作為有靈性的人又有哪一天不違背天道呢？我們生於天地之間，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但若認真反思，人在滾滾紅塵中，難免會沾染各種俗氣。悟以往之不薦，知來者之可追，如果我們能夠順天道自然的生活，就可以戰勝疾病，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2011年5月

MEMOIRS OF CHEN YIZI
CHINA'S REFORM IN THE 1980S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ISBN 978-988-15571-4-8



9 789881 557148

HK\$148